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陈海宏 等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上)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陈海宏 等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出版

ISBN 978-7-208-06776-9
9 787208 067769 >
定价：（上、下册）76.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上）

[英] 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 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下）

[英] 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 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英)曼(Mann, M.)著；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2，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ISBN 978-7-208-06776-9

Ⅰ．社… Ⅱ．①曼…②陈… Ⅲ．权力-研究
Ⅳ．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4209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
[英]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 等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57.5
插　　页　8
字　　数　781,000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6776-9/K·1296
定　　价　(上、下册)76.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二卷。迈克尔·曼分析了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权力关系的历史。他主要关注于法国、英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根据这些细致的帝国研究，作者提出了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阶级冲突、现代国家和现代军国主义的新理论。

作者简介：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二卷）、《不连贯的帝国》、《法西斯主义者》、《民主的阴暗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005年出版）

一、世纪文库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吕澂著
《〈马氏文通〉读本》 吕叔湘 王海棻编
《中国制度史》 吕思勉著
《汉语诗律学》 王力著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顾颉刚撰
《中国文字学》 唐兰撰
《中国哲学十九讲》 牟宗三撰
《魏晋玄学论稿》 汤用彤撰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撰
《诗论》 朱光潜撰
《文献学讲义》 王欣夫撰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撰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编著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陈垣撰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著
《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著
《印度哲学概论》 梁漱溟著
《中国封建社会》 瞿同祖著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李景汉著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李安宅著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 李安宅著
《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英]锡德尼·维伯 比阿特里斯·维伯著 秋水译
《哲学研究》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陈嘉映译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著 高达观等译
《恶的象征》 [法]保罗·里克尔著 公车译
《国民经济学原理》 [奥]卡尔·门格尔著 刘絜敖译
《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德]赫尔曼·哈肯著 凌复华译
《我的艺术生活》 [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瞿白音译
《时代的精神状况》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 王德峰译
《心灵、自我与社会》 [美]乔治·H·米德著 赵月瑟译
《蒂迈欧篇》 [古希腊]柏拉图著 谢文郁译注
《伦理学原理》 [英]乔治·摩尔著 长河译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 阎克文等译
《道德哲学原理》 [英]亚当·弗格森著 孙飞宇 田耕译
《论暴力》 [法]乔治·索雷尔著 乐启良译
《论教育学》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赵鹏译
《教育片论》 [英]约翰·洛克著 熊春文译
《形而上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李真译
《论三位一体》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周伟驰译
《论李维》 [意]尼克洛·马基雅维里著 冯克利译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朱利安·班达著 佘碧平译
《论法国》 [法]约瑟夫·德·迈斯特著 鲁仁译
《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美]约翰·杜威著 傅统先译

《性经验史》(增订版) [法]米歇尔·福柯著 佘碧平译
《政治科学要义》 [美]加埃塔诺·莫斯卡著 任军锋 宋国友 包军译
《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 [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著 周炽湛 曾晓阳译

二、世纪前沿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吴叡人译
《权力与繁荣》 [美]曼瑟·奥尔森著 苏长和 嵇飞译
《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 [英]马克斯·H·博伊索特著 张群群 陈北译 张群群校
《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 庞学铨 李张林译
《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著 邓红风译
《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著 应奇 葛水林译
《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 [加拿大]詹姆斯·塔利著 黄俊龙译
《反资本主义宣言》 [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著 罗汉 孙宁 黄悦译
《驯服全球化》 [英]戴维·赫尔德等著 童新耕译
《为承认而斗争》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 胡继华译
《奢侈的概念》 [英]克里斯托弗·贝里著 江红译
《国体与经体》 [英]约瑟夫·克罗普西著 邓文正译
《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 [法]皮埃尔·罗桑瓦龙著 吕一民译
《民主的经济理论》 [美]安东尼·唐斯著 姚洋 邢予青 赖平耀译
《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 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 邓安庆 朱更生译
《宪政之谜——国际法、民主和意识形态批判》 [英]苏珊·马克斯著 方志燕译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著 陶东风译
《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德]约恩·吕森著 綦甲福 来炯译
《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 [美]赫伯特·金迪斯 萨缪·鲍尔斯等著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 汪丁丁等主编

三、袖珍经典

《原始分类》 [法]爱弥尔·涂尔干 马塞尔·莫斯著 汲喆译 渠东校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 渠东译 梅非校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德]马克斯·韦伯著 胡景北译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陈涛 周辉荣译 刘北成校
《奢侈与资本主义》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 王燕平 侯小河译 刘北成校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苗力田译
《实用人类学》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邓晓芒译
《图腾制度》 [法]列维·斯特劳斯著 渠东译 梅非校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德]维尔纳·桑巴特著 王明璐译
《图腾与禁忌》 [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赵立玮译
《社会形态学》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 王迪译
《信任》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 瞿铁鹏 李强译
《权力》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 瞿铁鹏译
《对欧洲民族的讲话》 [法]朱利安·班达著 佘碧平译
《永久和平论》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 何兆武译
《相对论的意义》 [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 郝建纲 刘道军译 李新洲审校

《对称》 [德]赫尔曼·外尔著 冯承天 陆继宗译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法]马塞尔·莫斯著 汲喆译 陈瑞桦校

四、大学经典

五、开放人文

(一)插图本人文作品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著
《历史研究》(插图本)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 刘北成 郭小凌译
《希腊罗马神话》 [德]奥托·泽曼著 周惠译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 [美]查尔斯·盖雷著 北塔译
《法国史图说》 [法]E·巴亚尔等著 黄艳红等译

(二)人物

《我的大脑敞开了——数学怪才爱多士》 [美]布鲁斯·谢克特著 王元 李文林译
《古多尔的精神之旅》 [英]简·古多尔 菲利普·伯曼著 祁阿红译
《美丽心灵——纳什传》 [美]西尔维娅·娜萨著 王尔山译 王则柯校
《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科学罗曼史》 [美]丹尼斯·奥弗比著 冯承天 涂泓译
《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 [英]约翰·格里宾 [英]玛丽·格里宾著 江向东译
《福柯的生死爱欲》 [美]詹姆斯·米勒著 高毅译
《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的历史回忆》 [美]达娃·索贝尔著 谢延光译
《原子在我家中——我与恩里科·费米的生活》 [美]劳拉·费米著 何兆武 何芬奇译

(三)插图本外国文学名著

(四)科学人文

《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 [美]迈克尔·波伦著 王毅译
《生命的未来》 [美]爱德华·威尔逊著 陈家宽 李博 杨凤辉等译校
《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 [英]约翰·巴罗著 李新洲等译
《真实地带——十大科学争论》 [美]哈尔·赫尔曼著 赵乐静译
《第五元素——宇宙失踪质量之谜》 [美]劳伦斯·克劳斯著 杨建军等译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比]伊·普里戈金 [法]伊·斯唐热著 曾庆宏 沈小峰译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 [英]西蒙·辛格著 薛密译
《机遇与混沌》 [法]大卫·吕埃勒著 刘式达等译
《天遇——混沌与稳定性的起源》 [罗]弗洛林·迪亚库 [美]菲利普·霍尔姆斯著 王兰宇译 陈启元 井竹君校
《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美]威廉·J·米切尔著 吴启迪 乔非 俞晓译
《上帝的方程式——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膨胀的宇宙》 [美]阿米尔·D·阿克塞尔著 薛密译
《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 [美]亨利·N·波拉克著 李萍萍译
《未来是定数吗?》 [比]伊利亚·普里戈金著 曾国屏译
《林肯的DNA——以及遗传学上的其他冒险》 [美]菲利普·R·赖利著 钟扬 李作峰 赵佳媛 赵晓敏译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006年出版)

一、世纪文库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撰
《词学通论》 吴梅著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撰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刘师培撰
《唐诗杂论》 闻一多撰
《经典常谈》 朱自清撰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撰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梁启超撰
《中国史纲》 张荫麟撰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撰
《当代中国史学》 顾颉刚撰
《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钱存训著
《中国文学精神》 徐复观著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 徐复观著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
《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著
《神话与诗》 闻一多著
《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著
《经学抉原》 蒙文通著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著
《中国音乐文学史》 朱谦之著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蒙思明著
《国故论衡》 章太炎撰
《周易古史观》 胡朴安撰
《印度哲学史略》 汤用彤撰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著
《明末清初的学风》 谢国桢著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谢国桢著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 詹承绪 王承权 李近春 刘龙初著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美]马士著 张汇文 姚曾廙 杨志信 马伯煌 伍丹戈合译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著 渠敬东 曹卫东译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 [德]亨利希·库诺著 袁志英译
《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译
《多桑蒙古史》 [瑞典]多桑著 冯承钧译
《历史哲学》 [德]黑格尔著 王造时译
《政治家》 [古希腊]柏拉图著 洪涛译
《诗学》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著 罗念生译
《修辞学》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著 罗念生译
《论怀疑者》 [丹]克利马科斯(克尔凯郭尔)著 陆兴华 翁绍军译
《论灵魂与复活》 [希腊]尼萨的格列高利著 张新樟译 王晓朝校
《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 [德]阿尔弗雷德·韦伯著 姚燕译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德]卡尔·洛维特著 李秋零 田薇译

《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著 傅统先 邱椿译
《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奥] 瓦尔特尔·霍利切尔著 孙小礼 黄耀枢 汤侠生等译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美] 悉尼·胡克著 金克 徐崇温译
《历史中的英雄》 [美] 悉尼·胡克著 王清彬等译
《希腊人》 [英] H·D·F·基托著 徐卫翔 黄韬译
《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 [法]菲斯泰尔·德·古朗士著 吴晓群译
《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 [俄]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著 吴安迪 徐凤林 隋淑芬译
张百春校
《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 [英]托马斯·霍布斯著 毛晓秋译

二、世纪前沿

《寻找政治》 [英]齐格蒙·鲍曼著 洪涛 周顺 郭台辉译
《公众舆论》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 阎克文 江红译
《民族与民族主义》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 李金梅译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 叶江译
《重构美学》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著 陆扬 张岩冰译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德]汉斯·罗伯特·耀斯著 顾建光 顾静宇 张乐天译
《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 [美]茱迪·史珂拉著 刘满贵译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 [美]赫伯特·金迪斯
萨缪·鲍尔斯等著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 汪丁丁等主编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美]赫伯特·席勒著 刘晓红译
《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 [美]斯蒂芬·罗思曼著 李创同等译
《人工智能哲学》 [英]玛格丽特·A·博登著 刘西瑞 王汉琦译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 [美]赫尔曼·E·戴利著 诸大建 胡圣等译
《强与弱——两种对立的可持续性范式》 [英]埃里克·诺伊迈耶著 王寅通译
《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 [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 梅俊杰译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美]理查德·桑内特著 黄煜文译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美]埃里克·沃尔夫著 赵丙祥 刘传珠 杨玉静译

三、袖珍经典

《拉辛与莎士比亚》 [法]斯汤达著 王道乾译
《彻底的经验主义》 [美] 威廉·詹姆斯著 庞景仁译
《现代君主论》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 陈越译
《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 [法]古斯塔夫·博蒙著 裴亚琴译
《精神分析与宗教》 [美]埃里克·弗洛姆著 孙向晨译

四、大学经典

五、开放人文

(一)插图本人文作品

《世界史纲》 [英] H·G·韦尔斯著 梁思成等译
《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著
《欧洲漫画史》 [德]爱德华·富克斯著 王泰智 沈惠珠译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郑振铎编著

《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郑振铎编著

(二)人物

《原子舞者——费米传》 [美]埃米里奥·赛格雷著 杨建邺 杨渭译
《酶的情人——一位生物化学家的奥德赛》 [美]阿瑟·科恩伯格著 崔学军 倪红梅 王伟等译 李照国审校
《玻尔兹曼——笃信原子的人》 [意]卡罗·切尔奇纳尼著 胡新和译
《心灵裸舞——凯利·穆利斯自传》 [美]凯利·穆利斯著 徐加勇 汤清秀译
《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 [英]阿瑟·I·米勒著 方在庆 伍梅红译 关洪校
《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 [美]康斯坦丝·瑞德著 袁向东 李文林译
《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 [美]爱德华·威尔逊著 杨玉龄译

(三)插图本外国文学名著

(四)科学人文

《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 [美]T·A·赫彭海默著 朱卫国 向小丽译
《收获之神——生物技术、财富和食物的未来》 [美]丹尼尔·查尔斯著 袁丽琴译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谢延光译
《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 [美]雷·库兹韦尔著 沈志彦 祁阿红 王晓冬译
《大自然的常数——从开端到终点》 [英]约翰·巴罗著 陆栋译
《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 [美]亚历克斯·罗森堡著 刘华杰译
《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 [英]南希·卡特赖特著 王巍 王娜译
《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 [南非]保罗·西利亚斯著 曾国屏译
《天地有大美——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 [英]格雷厄姆·法米罗主编 涂泓 吴俊译 冯承天译校
《从前有个数——故事中的数学逻辑》 [美]约翰·阿伦·保罗斯著 史树中 杨杰 熊德华 唐国正译 史树中校
《剑桥五重奏——机器能思考吗》 [美]约翰·卡斯蒂著 胡运发 周水庚 杨茂江译
《涌现——从混沌到有序》 [美]约翰·霍兰著 陈禹等译 方美琪校
《数字密码》 [美]德里克·尼德曼 戴维·博伊姆著 庄莉译
《地球探赜索隐录——地质学思想史》 [澳]戴维·R·奥尔德罗伊德著 杨静一译
《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 [美]约翰·C·伯纳姆著 钮卫星译
《爱因斯坦在中国》 [美]胡大年著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007年出版)

一、世纪文库
《国史要义》 柳诒徵撰
《殷墟陶器研究》 李济著
《安阳》 李济著
《汉代社会结构》 瞿同祖著 邱立波译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蒙思明著
《中国佛教史》 蒋维乔撰
《中国基督教史纲》 王治心撰
《中国社会史论》 熊得山著
《中国戏剧史长编》 周贻白著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著
《西方美术东渐史》 [日]关卫著 熊得山译
《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日]小野泽精一 福永光司 山井涌编 李庆译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 屠友祥译
《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 [法]帕斯卡尔著 何兆武译
《伦理学》 [德]朋霍费尔著 胡其鼎译
《佛教伦理学》 [英]哈玛拉瓦·萨达提沙著 姚治华 王晓红译

二、世纪前沿
《国家的兴衰》 [美]曼瑟·奥尔森著 李增刚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 [英]迈克尔·曼著 刘北成 李少军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 [英]迈克尔·曼著 陈海宏等译
《真实与惟一的天堂——进步及其评论家》 [美]克里斯托弗·拉旭著 丁黎明译
《神经元经济学》 [美]阿尔多·拉切奇尼等著 汪丁丁 叶航 罗卫东主编
《解构的共通体》 [法]让—吕克·南希著 郭建玲 张建华 张尧均 陈永国 夏可君译 夏可君编校
《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 [美]加勒特·哈丁著 戴星翼 张真译
《论自由》 [法]雷蒙·阿隆著 姜志辉译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郭忠华译

三、袖珍经典
《大学的兴起》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 王建妮译
《大学之理念》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 邱立波译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法]雅克·勒高夫著 周嫄译
《美学原理》 [意]克罗齐著 朱光潜译

四、大学经典

五、开放人文
(一)插图本人文作品
《DNA——生命的秘密》 [美]詹姆斯·沃森著 陈雅云译

(二)人物

《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 陈泽环译
《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著 刘北成 刘援 吴必康 刘新成译

(三)插图本外国文学名著

(四)科学人文

《现代世界中的数学》 [美]M·克莱因主编 齐民友等译
《世界科学技术通史》 [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 哈罗德·多恩著 王鸣阳译
《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 [澳大利亚]约翰·C·埃克尔斯著 潘泓译
《爱因斯坦奇迹年——改变物理学面貌的五篇论文》 [美]约翰·施塔赫尔主编 范岱年 许良英译

目录

第一章　导论/1

第二章　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26

第三章　一种现代国家理论/50

第四章　英国工业革命和旧的资本主义政权，1760—1880年/108

第五章　美国革命和联邦自由资本主义的确立/156

第六章　法国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186

第七章　四至六章的总结：阶级和国家的出现/234

第八章　地缘政治与国际资本主义/277

第九章　围绕德国的斗争(一)：普鲁士与集权民族资本主义/324

第十章　围绕德国的斗争(二)：奥地利与邦联代议制/361

目录

第十一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一)：定量统计资料/393

第十二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二)：军事权力的自治/437

第十三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三)：官僚机构化/486

第十四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四)：民事机构的扩展/527

第十五章　英国工人阶级抵抗的兴起，1815—1880 年/561

第十六章　中产阶级国家/604

第十七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 年(一)：英国/660

第十八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 年(二)：工人阶级运动的比较分析/695

第十九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 年(三)：农民/762

第二十章　理论总结：阶级、国家、民族及社会权力的来源/796

第二十一章　经验主义的巅峰——超越巅峰：地缘政治、阶级斗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815

附录：国家岁入及雇佣状况的附加表/884

译者说明/899

第一章

导　论

这一卷继续论述权力历史，时间跨度是“漫长的19世纪”，即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论述重点是具有权力优势(the leading edge of power)的五个西方国家：法国、大不列颠[1]、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普鲁士—德国以及美国。我的基本理论依然不变。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从根本上决定了各个社会的结构。我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这四种权力来源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其中有一种或几种在构筑一个社会时是最根本的？

那些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对此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明确而肯定。他们断言，归根结底，经济关系构筑了人类社会。韦伯的回答则更多地带有否定性。他说，对于他所谓的各种“社会行动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作出“任何重大的一般概括”。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但是我能改变韦伯主义的悲观主义吗？

在这方面，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我希望读者耐心地往下读，先听我报告好消息。本卷书将提出三个关于首要性的一般概括。在此，我先来个开门见山，一一列出，容后在其他章节里再补充各种细节，作出各种限定。

1. 在18世纪，经济和军事这两种社会权力来源在决定西方社会结构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到1800年，“军事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这两个事件改造了西方。前者提供的主要是“威权型”权力，后者提供

的主要是“弥散型”权力。由于它们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因此无法说哪一种具有终极首要性。

2. 但是，进入19世纪后，由于军事权力被纳入“现代国家”，还由于资本主义对经济进一步进行了根本改造，经济和政治权力来源开始占上风。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关系以及国家和民族，变成现代的主要权力运作者。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关系依然表现为相对弥散和含混的状态，而国家和民族则成为威权式解决这种含混状态的主要手段。同样地，由于它们也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无法说哪一种具有终极首要性。

3. 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处于衰落状态，其重要性也降低了。中世纪欧洲主要是由基督教结合起来的(见第一卷)；1760年，教会依然(正在)改造着论述沟通(discursive communication)的手段。然而，在这一时期后期，尽管教会维持了许多权力，读写能力也还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能与以前相提并论的意识形态权力运动。最重要的现代意识形态所关注的是阶级和民族。从我们后面将要解释的一个特征看，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权力(除了在罕见的革命时刻；见第六、七章)更具有“内在性”而非“超越性”，并且促成了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集体运作者——军国主义和国家的出现。

现在再来看坏消息，更确切地说是使问题变得复杂的消息。但是，根据这些坏消息，我们可以构筑一种更丰富的理论，借以考察实际人类社会的复杂构成因素。

1. 四种权力来源与台球不同。每个台球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彼此相撞时会改变方向。这些权力来源是“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互动不仅会改变它们的外在运行轨迹，而且也会改变彼此的内部形状。这里所讨论的事件——法国革命、英国霸权、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兴起、中产阶级政治或农民政治、战争的原因与后果等等——都涉及到不只一种权力来源的发展。我反对“纯粹”的单一原因理论。一般概括不能上升为一个关于“终极首要性”的简单陈述。前面提出的三个陈述可以成为粗略的和“不纯粹”的一般概括，但绝不

是历史法则。

2. 我提出的这些粗略的和不纯粹的一般概括，也没有区分帕森斯提出的个别权力和集体权力(Parsons, 1960, pp.199—225)；但是它们的历史发展是分道扬镳的。个别权力(distributive power)是运作者A支配运作者B的权力。如果B获得更多的个别权力，那么A必然丧失某些权力。集体权力(collective power)则是角色A和B的联合权力，他们合作开发自然或剥削另一个运作者C。在这一时期，西方的集体权力急剧增长：商业资本主义和继之而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军事革命加强了西方列强的实力；现代国家促成了一种新的集体权力运作者——民族——的出现。尽管社会权力的其他来源也对此推波助澜，但集体权力的这三场“革命”主要(分别)是由经济权力关系、军事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导致的(意识形态权力的“革命”——话语能力(discursive literacy)的扩张——则不那么“纯粹”)。个别权力变迁则更复杂、更“不纯粹”。随着“政党民主制”开始取代君主制，各个国家集体权力的日益增强实际上削弱了政治精英支配臣民的种种权力。一般说来，军事精英和意识形态精英也未能增强他们支配其他人的个别权力。但是，出现了两种重要的不纯粹的个别权力运作者，即阶级和民族。它们的出现最初是对军事和经济权力关系的回应，然后则被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加以制度化了。它们的复杂历史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

3. 阶级和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出现就交织在一起，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通常，人们把它们分开考虑，视为相互对立的东西：资本主义和阶级划归“经济”领域，民族国家划归“政治”领域；阶级是“激进”的，而且通常是“超越民族”的，民族则是“保守”的，会削弱阶级的力量。但它们实际上是同时兴起的，而这就引出了一个进一步需要解决的终极首要性问题：社会生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围绕着弥散的、市场的、跨民族的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组织起来，或者围绕着威权的、领土的、民族的和国家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社会组织应该是跨民族

的，还是民族的或民族主义的？ 国家应该具有较弱的权威还是较强的权威，应该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 市场应该是放任自流，还是应该受到有选择的保护，或是受到强硬的管制？ 地缘政治应该是和平相处，还是兵戎相见？ 到1914年为止，人们无法作出任何简单的选择——而且迄今也没有作出选择。 这些考虑至今依然是现代文明的重大两难问题。

4. 通观西方文明的历史，阶级和民族国家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宗派的"和"部门的"运作者(阶级的竞争对手)以及跨民族的和"区域性"的运作者(民族的竞争对手)历时不衰。 我把这样一些组织视为部门权力组织，如著名政党、贵族世系、军事指挥体制以及内部劳动市场等。 我把这样一些社会运动视为旨在取代全国性组织的、基本上带有区域性色彩的社会运动，如少数派教会(以及某些多数派教会)、手工业行会以及脱离主义运动。 它们都损害了阶级和民族国家的构成，削弱了后者的权力，破坏了后者的纯粹性。

5. 社会权力来源之间、集体权力运作者与个别权力运作者之间、市场与领土之间、阶级、民族和地方性的、部门性的、跨民族的和区域性的组织之间的这些互动关系产生出一种全面的复杂性，往往使同时代人很难理解。 它们的行动也因而带有许多错误、明显的偶然性以及意外的后果。 这些情况也会反过来改变市场、阶级、民族、宗教等等的结构。 我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错误、偶然性和意外后果，但是它们显然也是错综复杂的。

因此，这一卷将广泛地展开讨论前述三个粗略而不纯粹的概括，同时也考虑这五种复杂情况。

在这一章和下一章里，我将讨论社会学理论。 接下来是五组叙述章节。 第四、七章论述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其中涉及四种权力来源的转型。 有两种转型早已开始——资本主义和军事革命，但是它们在18世纪促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转型，尽管后两者各有相对独立的逻辑——话语能力的兴起和现代国家的兴起。 我认为这四种革

命都是极其重要的。从波士顿茶会(Boston Tea Party)到大改革法令(Great Reform Act)，从珍妮纺织机到史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车头，从网球场宣誓到卡尔斯巴德法令(Karlsbad Decrees)，从瓦尔密战场到滑铁卢战场，所有这些事件都不是纯粹的，而是包含着四种权力革命的各种组合，并且往往是以人们无法控制的复杂形式，席卷着阶级、民族及其竞争对手。在第七章，我将对这一时期早期阶段的权力发展情况作一总结，并强调军事国家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根本作用。

第九章和第十章着重考察普鲁士和奥地利逐鹿中欧的斗争，以及阶级和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这两章将解释更为集权的民族国家为何最终战胜了更为分权的联邦体制。第十章的结论将总结这两章的论点，并讨论中欧的解决方式是否普遍适用于整个西方文明。

第十一、十四章分析现代国家的兴起。我展示了五个国家的财政和官员的统计数字。另外，我把国家成长分解成四个不同的进程：规模、范围、代议制和官僚机构。迄1815年为止，国家规模的巨大增长是由军事发展引导的，同时使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了。这也培育了广泛性(extensive)和政治性的阶级和民族，损害了区域性和跨民族的运作者。与一般看法相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继续成长。但是，1850年以后，主要为了回应工业资本主义，各个国家都极大地扩展了它们的民事干预范围，由此相当意外地整合了民族国家，培育了民族性的阶级，削弱了跨民族的和区域性的权力运作者。

大多数关于现代国家的功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韦伯主义理论都强调国家的规模、范围、效率和同质性的发展。但是，随着各个国家的成长以及接踵而至的多样化发展，它们的两个新兴的控制机制——代议制和官僚制——也竭力同步发展。代议制的冲突集中于哪些阶级、哪些宗教和语言团体应该有代表权，应该在什么方面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如何集中权力，如何成为全国性？尽管许多理论对“什么人”作了阐述，但是没有涉及“在什么方面”。诚然，关

于美国的国家权利和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奥地利的诸多民族有许多经验研究。但是中央集权国家和区域性权力运作者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很普遍的，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在这一时期这两个问题都未得到解决，因此随着国家的成长，国家就变得不那么完整一致了。最明显的证据是，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脱节：阶级越来越纠缠于国内政治，而政治和军事精英则垄断着对外政策。马克思主义、精英理论和多元理论都过分地把国家视为首尾一致的整体。我用第三章提出的“多形”(polymorphous)理论来证明，现代国家往往混杂地“定型”为四种主要形式——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军国主义国家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第十四章的结论对我关于现代国家的兴起的理论做了总结。

第四部分即第十五、二十章，考察中下层阶级的阶级运动以及1870年以后大众性民族的兴起。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同时而含混地造就了阶级和地方性、部门性组织。我把这些后果主要归因于威权性政治权力关系。第十五章讨论19世纪初期英国的“第一个工人阶级”。第十六章考察中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和流动职业者(careerists)以及他们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关系。第十七、十八章描述阶级、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三方面对工人的精神争夺。这种争夺最终因各种现代国家的定型而武断地解决。第十九章分析“生产阶级”、“信贷阶级”(credit classes)和“局部部门”对农民的精神争夺以及相似的结果。第二十章对全部有关论述作一概括，并对整个“漫长的19世纪”的各种社会权力来源之间的关系作一总结。

第七章、第十章的结论、第十一章的结论、第十四章的结论和第二十章提炼出这一卷的结论。但是，关于这一时期还有另一个极其经验的结论。西方社会断然地投入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世界大战。前一个世纪也是以一系列残酷战争——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告终的。第八章和第二十一章讨论了这些结局。第二十一章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是我的一般理论的最后一个经验例证。这一章驳

斥了各种主要以地缘政治或阶级关系为中心的解释。这二者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行动在客观上是非理性的，而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人们会认识到这一点。阶级、民族及其竞争对手的交错缠绕，导致了意外的国内后果和地缘政治后果的恶性循环，情况极其复杂，以至于参与者无法完全理解，多形国家无法加以控制。因此，我们应该从这种堕落中吸取教训，对权力实行制度化，以免重蹈覆辙。

这一章的余下部分和接下来的两章将进一步解释我的IEMP权力模式。我再次重复我在第一卷开始时对读者的忠告：如果你觉得社会学理论晦涩难懂，那么可以直接跳到第一个叙述章节，即第四章。稍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过头来读理论部分。

IEMP权力组织模式

我们先来考察决定着社会整体结构的权力组织。这些权力组织有三个形式特征和四种基质。

1. 如前所述，组织包含着集体权力和个别权力。大多数实际的权力关系——例如阶级之间或国家与其臣民之间——都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包含着这两种权力。

2. 权力可能是广泛性的，也可能是深入性的(intensive)。广泛性权力能够把广阔领土上的大量人员组织起来。深入性权力能够动员其参与者的高度献身精神。

3. 权力可能是威权性的，也可能是弥散性的。威权性权力包含着由一个运作者(通常是一个集体)意志命令和部下的自觉服从。在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中可以找到最典型的例子。弥散性权力不直接由命令实施。它是以相对自发的、不自觉的和无中心的方式扩散的。人们会被迫以明确的方式投入行动，但不是由于某个人或组织的命令。弥散性权力最典型地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组织中。一个典型例子是

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这里包含着相当程度的强制，但这种强制是非人格化的，表面上往往是“自然”的。

最有效的权力运作是把集体权力和个别权力、广泛性权力和深入性权力、威权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单一的权力来源——例如经济或军事——很少能凭自身决定整个社会结构。它必须与其他权力资源结合起来，例如我在这一时期所确定的两组笼罩性的二元决定因素。实际上，社会权力有四种重要来源：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

1. 意识形态权力源出于人类对寻求生活终极意义、共享规范和价值、参与审美实践和仪式活动的需求。如果控制了一种兼有终极意义、价值观、规范、审美和仪式的意识形态，就能造成普遍性的社会权力。在第一卷里，宗教提供了这方面的大多数例子。在这一卷里，宗教与世俗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交相辉映。它们都越来越重视阶级和民族的意义。

每一种权力来源都造就出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弥散性的，是通过说服、“真理”声称和参与仪式“自由”来行使支配权。它主要有两种弥散方式。首先，它可以是“超越”社会空间的。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可以穿越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的边界四处弥散。属于不同国家、阶级等等的人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一种意识形态能够为之提供似乎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样，意识形态权力就能超越性地扩散，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独特的和强大的社会互动网络。其次，意识形态权力能够强化现有的权力组织，促进其“内在士气”。超越性是一种基本独立的权力形式；内在性则能复制和加强现有的权力关系。

2. 经济权力源出于人类榨取、改造、分配和消费自然资源的需求。它是一种特别强大的权力，因为它把深入的日常劳动合作同广泛的物品分配、交换和消费环网结合在一起。这就提供了一种稳定混合体，兼有深入性和广泛性的权力，通常还兼有威权性和弥散性权力(前一种权

力是以生产为中心，后一种是以交换为中心)。第一卷把这种经济权力组织称作“实践环网”(circuits of praxis)，但是这一术语过于晦涩。我现在抛弃了这一术语，而使用更常见的标签来表示这几卷所讨论的经济合作与冲突的形式：阶级和地方性、部门性经济组织。

任何复杂社会都是对经济资源实行不均等的控制，因此，阶级就无所不在了。马克思在拥有或掌握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人与只能控制自己劳动的人之间作了最基本的区分。我们显然可以更进一步，更细致地区分拥有更特殊的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利的阶级。这种阶级可以分成更小的局部的运作者，如熟练工人工会或某一行业。阶级之间有一种上下联系——A 阶级高于 B 阶级。但是在横向上也有另外的集团冲突。仿照人类学的术语，我把这种集团称为“部门”*[2]。与部落、世系、庇护网络、乡土关系、工业企业等等一样，一个部门集团的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不同部门在横向上彼此竞争。在人类社会中，阶级、地区和部门相互交错，相互削弱。

我在第一卷里证明，当时部门和地区通常是压倒了阶级。阶级一般仅仅是“潜在”的：主人、劳动者和其他人相互之间展开斗争，但通常是半隐蔽的，深入性的，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地区层次。大多数广泛性斗争发生在部门之间。但是，当阶级关系逐渐占了上风时，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即出现“广泛性”阶级。阶级关系有时是“对称”的，有时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广泛性阶级通常首先出现：唯有有产者广泛地组织起来，而劳动者则局限于地区性和部门性组织。然后，在对称的广泛性阶级结构里，两大阶级都在相似的社会空间范围组织起来。最后，我们看到组织起来控制国家的“政治阶级”。在此，我们依然可以区分出对称的和不对称的阶级结构(后者是指唯有有产者在政治上组织起来)。马克思在其洋洋得意的时候声称，政治性的、对称的、广泛性的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正如第一卷

* segments，人类学中指部落中的氏族，但在这里似乎应译成“部门”。——译者注

里论述的(除了古希腊和罗马早期共和国)，只是在工业革命前夕，阶级才变成政治性的和广泛性的。在大多数农业社会里，广泛组织起来的支配阶级把从属的潜在阶级"囚禁"在前者的部门权力组织里。这一卷将描述一种未完成的趋势，这种趋势是马克思所说的充分的、对称的阶级斗争以及连带的对地区和部门的改造。

3. 军事权力是物质力量的社会组织。它源出于有组织的防卫必要和对外侵略的效率。军事权力既有深入性一面，又有广泛性一面。这是因为它既是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密集组织，又必须能够把广阔社会空间领域的大量民众组织起来。凡是垄断这种权力的人，如军事精英集团和等级，都能行使某种程度的一般社会权力。军事组织基本上是威权性和"集中强制性"(concentrated-coercive)的。军事性造成了纪律严格的、常规化的强制，尤其在现代军队里(第十二章将强调军事纪律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就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而言，军事权力占有双重社会空间。它造成了一个集中的核心。在这个核心里，强制导致了积极的合作，例如早期社会的奴隶劳动或这一卷里所讨论的仪式化的"力量显示"。但是，它也造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更消极恐怖的军事现象。第一卷第五章"最初的支配性帝国"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军事权力有所变化。它在形式上是被国家垄断的，受到国家的限制，但是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军事精英集团在国家里保持着相当大的自主权，对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4. 政治权力源出于领土内集中管理的有效性。政治权力意味着国家权力。它基本上是威权性的，由一个中心发号施令。国家组织有两个方面：对内它是"领土范围内中央集权"的，对外它涉及地缘政治。这两方面都影响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第三章将从理论上论述现代国家。

争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戏剧。各个社会首先是由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构筑成的。这四种权力仅仅是理想型，它们都不可能以纯粹

形式存在。实际的权力组织都混合着这几种权力，因为这四种权力都是社会存在所必不可少的，它们彼此之间也是相互需要的。例如，任何经济组织都需要其一部分成员持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和规范。它也需要军事保护和国家调节。因此，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组织有助于经济组织的构筑，反之亦然。社会里没有各自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自主层面或子系统(如“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君主制国家到民族国家”等等)。在大转变时，诸如“经济”或“国家”等组织的这些基本相互关系以及这些组织的特性都发生变化。甚至“社会”的定义本身也会发生变化。纵观这一时期，民族国家和更广泛的超民族的西方文明都作为基本单位而竞争。社会学的主要概念“社会”一直在这二者之间徘徊。

因此，这些权力来源就产生出重叠的、间隙的权力关系网络。这些网络各有其社会空间边界和动力。它们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对于权力运作者来说是意外的突发后果。我的 I E W P 模式并不是把一个社会系统分成四个“子系统”或四个“层次”、“维度”或社会理论家所偏爱的其他几何术语。它是一个对付乱麻的切入分析点。这四种权力来源给有所追求的人类提供了不同的、具有潜在力量的组织手段。但是选择何种手段，实行何种组合，则取决于历史形成的权力构型和从中新兴的构型之间的持续互动。社会权力来源及其体现组织都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杂”的。它们是在制度化的力量和新兴的间隙性力量之间的复杂游戏中纵横捭阖。

漫长的革命世纪?

与第一卷相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差异：第一卷涵盖了一万年的人类社会史和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只涉及一百五十四年和一个文明的核心区，即西欧及其主要的白人殖民地。第一卷里讨论的许多宏

大问题，在这一卷里都没有涉及。我无法继续(只以有限的方式)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支配性帝国与多元权力运作者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我所归属的文明仅仅是后者的一个实例而已。这一卷用微观取代了宏观。

缩小范围，是有充分的理由。西方文明现在已经改造了全球；它的文献资料丰富，便于我们把宏观结构、集团决策和个人的能动作用结合起来，作出细致的描述。我还可以作更多的比较分析。对于第一卷，有人评论说，我在原则上反对比较分析。其实不然。实例越多，而且在世界历史的时间上越接近，我们就越容易作比较。请记住，这一卷的五个实例都是“国家”或“列强”，而不是“社会”整体，我们易于对它们进行富有成效的比较。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认为这个时期与以前的历史有根本差异。他们相信，全部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由某一种革命决定的，通常说是有一种经济革命决定的。这种解释比我的 IEMP 模式简单的多：权力的来源不是四个，而是只有一个基本来源；其模式不是复杂的、盘根错节的、形状变异的体系，而是单一的辩证体系。这种单一革命模式有用吗?

先是大约从 1780 年到 1850 年的七十年间在英国，接着是在下一个七十年在西欧和美洲，发生了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革命，即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人类支配自然、支配自己的身体的能力，改变了人类居住的位置和密度，改变了地球的景观和自然资源。到 20 世纪，所有这些变化传遍整个世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社会之中。这不是一个一元整体的社会，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权力网络。整个网络风雷激荡，帝国纷纷崩溃，人流、物流、信息流空前活跃，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和大气环境都面临威胁。

无论就“量”而言，还是就“质”而言，多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把这些变化称之为“革命”。这就大体以 1800 年为界，把人类历史一分为二。经典社会学理论应运而生，基本上用一系列的两分法，将

此前和此后的社会区分开，每一个社会都被认为具有统一的、系统的特征。主要的两分法有：从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圣西门)；从玄学阶段到科学阶段(孔德)；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斯宾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及马克思)；从身份到契约(梅因)；从机械的劳动分工到有机的劳动分工(涂尔干)。即使韦伯不搞两分法，他也把历史视为单一的理性化进程，尽管他把这种进程追溯到很早。

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1950年代，帕森斯确定了有关人际关系变化的四组二元对立。它们是，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从重视归属到重视成就，从重情感到情感中立和工具化，从专属某一特定关系到身兼多种关系。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关系是被前四种支配着，工业社会则是被后四种关系支配着。后来，孔德和马克思的幽灵又出现在福柯对古典时代和资产阶级时代的划分中(1974，1979)，这不同的时代都是由各自的“知识型”或知识和权力的“话语构成”所支配的。吉登斯(1985)在他所谓的前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非连续性”划分中，引用了所有这些学者的观点。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三分法，即主张到20世纪晚期有三种社会。这些理论都认为人类社会有两次转型——从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目前在学术界甚嚣尘上，尽管它在社会学领域只是匆匆穿行。它的正当性取决于在先是否确有一个“现代”时期。上述这些第三阶段都不在本卷论述范围之内(它们将在第三卷出场)。但是，这些修正意见都没有质疑第一次转型的革命性、系统性，它们只是增添了第二次转型。

我要否定这些两分法和三分法，只需批判它们的两个主要假设和它们内部的一个分歧。首先，它们假设，这个时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性质。其次，它们把这次转型确定为在一次经济革命中实现的。多数理

论都是很明确的，少数理论是遮遮掩掩的。例如，福柯从未对他所谓的转型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他反复地而且明显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把它说成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个别权力理论，他从来搞不清楚谁对谁做什么)。我反对这两个假定。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批判不同的两分法之间的分歧入手。有些人认为新经济的实质是工业化(圣西门、孔德、斯宾塞、涂尔干、贝尔、帕森斯)，另外一些人则给它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亚当 · 斯密、政治经济学家们、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者、福柯、吉登斯、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进程，在最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早就有了一个资本主义为主的经济。

1770年代，亚当 · 斯密把他的市场资本主义理论应用于一个农业为主的经济，而且几乎完全没有暗示即将发生一场工业革命。如果资本主义论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把英国革命转型的开端定在18世纪、甚至17世纪。如果工业化论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坚持以19世纪初为起点。但是，如果双方都有可取之处，那么就是说历史上有不止一个革命进程，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分辨清楚。实际上，经济转型是极其复杂的。当前一些经济史学家贬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而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大约从1880年到1920年有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先进的经济体产生影响。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关系也因地区和国家而异，因此我将证明，经济转型不是只有一种，也不是有条不紊的。

这是一种质变吗？就集体权力而言，确实如此，但就个别权力而言则不是。在集体权力的后勤能力方面，当时确实有一种空前的、真正呈指数增长的转型(正如吉登斯所强调的，1985)。我们只要想一想集体权力的三个尺度：动员大规模人员的能力、从自然界获取能量的能力、这种文明集体地剥削其他文明的能力。

人口的增长表明动员人力进行社会合作的能力增长。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直到1640年人口才增长到500万。1750年以后，这种增长呈

曲线上升，到1810年达到1 000万，到1840年达到1 500万。过去用一千年才达到的数字现在只用30年。俯瞰全球，直到183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第二个10亿，用了一个世纪；第三个10亿，用了30年；第四个10亿，用了15年(McKeown 1976, pp.1—3;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pp.207—215)。在以前的一千年里，预期寿命基本上滞留在30多岁，19世纪欧洲的预期寿命延长到50岁，到20世纪更延长到70多岁，这是人类命运的重大变化(Hart, forthcoming)。实际上在所有的集体动员形式方面都发生了类似的加速运动。从1760年到1914年，有关信息和物资交流、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武器杀伤率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显示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速起飞。集体权力的动员，即涂尔干所谓的“社会密度”真正呈指数增长了。

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能量的能力也极大地加强了。在第一卷所讨论的农业社会里，主要依赖人和畜的肌肉来产生能量。肌肉需要农产品提供卡路里。这就几乎需要所有的人都参加劳动。这就出现了一个能量陷阱，除了供养少数统治阶级、军队和教会外，几乎再也没有其他非农业活动的可能性了。兰德斯(Landes, 1969, pp.97—98)指出了采煤业与蒸汽机造成的变化：到1870年，英国消耗的煤就超过了1亿吨。由此可以产生大约8亿卡路里的能量，足以满足一个由2亿成年人的前工业社会对能量的需求。英国在1870年间的实际人口是3 100万，但是只有40万矿工就生产出这么多的能量。人类现在汲取能量的能力甚至已经构成对地球资源储备的威胁和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汲取能量的速率简直令人吃惊。农业社会偶尔能达到一个煤矿或一台大型蒸汽机的集中能量——例如，一个罗马军团修建一条大路，埃及人修建一座金字塔。但是，在这些地点会聚集成千上万的人和牲畜。辅路上运输车辆熙熙攘攘，直通大型仓库。周围若干英里的农业地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把剩余产品运送到工地。这种农业后勤能力的前提是一个囊括地方/地区权力组织和部门权力组织的权威主义联邦，强制性地把它们的力量集中到这项极其艰巨

的工作。但是，到1870年，蒸汽机在英国随处可见，每台蒸汽机都牵涉到大约50名工人及其家庭，少量的动物，一个小商店，以及两辆运输车。能量生产再也不需要那种集中而广泛的强制动员。它弥散在整个市民社会，改造了集体权力组织。

这个独一无二的文明现在能够支配整个世界。拜罗克(Bairoch, 1982)汇集了生产情况的历史统计资料(见本书第八章)。1750年，欧洲和北美的工业产值大约占世界工业产值的25%，到1913年，就占到90%了(可能稍少一点，因为这种统计通常会低估非商品经济的产值)。工业能够转变成巨大的军事优势。欧洲的小股陆军和海军就能够威震整片大陆，瓜分整个世界。只有日本、中国内陆以及那些难以深入的、毫不诱人的国家没有被纳入欧洲人的帝国及其白人殖民地。东亚奋起直追，加入这伙劫掠地球的幸运强盗。

正如两分法理论所提示的，西方的集体权力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西方各国在更高水平上组织起来，能够更强有力地动员人类能力和开发自然界，也能更强有力地剥削不发达的国家。它们的社会密度非同寻常，这使它们的统治者和民众能够真正参与同一个“社会”。当时，人们把这种集体权力的革命称作“现代化”，甚至说成是“进步”。他们觉得有一种趋势，正在走向更富裕、更健康、各方面都越来越好的社会，人类福祉和社会道德都会改善。几乎没有人怀疑欧洲人在自己的祖国和殖民地都在开始实现一次总体社会组织的质的飞跃。对于这种“进步”，我们可能持怀疑态度，甚至感到惊恐，但是在漫长的19世纪，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

变化的时段是很短暂的，重大的转型大多发生在一两代人期间。这与第一卷所描述的大多数结构变迁迥然不同。例如，西欧资本主义关系的兴起用了几个世纪。当时人们可能感受其中某些方面(如，劳役转变成货币地租或强行圈地)，但是大概没有人意识到正在发生巨变。与此相反，19世纪的宏观进程被身临其境的思想者逐一辨明——由此产生了两分法理论。它们实际上是当时的各种现代化意识观念的更科学

化的表述。

日益强烈的自觉性和反思性造成了反馈效果。如果社会参与者越来越意识到当时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型，他们或许会竭力反抗。但是，如果正如这里所说，转型加强了集体权力，那么他们更可能竭力使现代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取决于他们的个别权力。

从表面看，在这个时期快要开始时，个别权力也发生转型。阶级和民族出现了，成为权力角逐中较新的角色，并造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这种社会政治事件。第一卷已经证明，阶级和民族组织是农业社会所罕见的。现在，正如马克思、韦伯等人所指出的，阶级和民族斗争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与集体权力一样，个别权力也从特殊主义转向普遍主义。

但奇怪的是，结果并不是革命性的。想一下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许多在1760年的英国所能发现的个别权力关系，到1914年依然存在——实际上至今依然存在。在它们发生变化的地方，实际上在1760年以前早就在演变之中。亨利八世引起了国家新教，内战只是确认了它，18世纪到19世纪前半期则使之世俗化。立宪君主制在1688年确立。从18世纪到20世纪，君主的权力不断削弱，而其象征性尊严则日益受到肯定。农业和商业早就资本主义化了；工业是按照18世纪的商业制度塑造的；各种现代阶级逐渐被这种资本主义所同化。议会上院、剑桥和牛津这两所古老的大学、公学、伦敦商业区、皇家卫队、伦敦各俱乐部、行政公务员阶层，所有这一切都兼有旧时代与19世纪的混合因素而得以延续。诚然，也出现了真正的权力转移现象——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兴起，政党民主、大众民族主义及福利国家的发展，但是整个趋势与其说是两分法理论所设想的根本性转型，不如说是逐渐的演变，所显示的乃是统治体制的坚韧的适应能力。

英国或许是一个极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最保守的国家；但是我们在其他地区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模式。欧洲的宗教格局是在1648年确

定的，此后没有重大的改变。基督教自那时起已经半世俗化了。诚然，几乎就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开始之时，有两个王权遭到了大颠覆；但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在这两个国家工业化之前发生的，而且(我们后面将会看到)法国革命需要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实现比它最初的承诺稍多一点的变革，而美国革命者制定的宪法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保守力量，压制后来的个别权力关系。在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震撼了原有政权，但很少推翻原有政权——与法国和俄国这两次社会政治革命相反，在其他许多地方发生的革命失败了，更多可以见到的是有限的改革。在19世纪，旧政权和新资本通常融合成一个现代统治阶级；然后，他们逐渐出让公民权利，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日本这个重要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有更大的历史连续性。

或许是我的选择性太强了，从而低估了真正的个别权力转移。但是，就个别权力的转型而言——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革命中正面对抗的辩证意义看，相反的情况似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就权力的地缘政治分布而言，似乎也是这种情况。国家变成了民族—国家，但是依然有兴有衰，许多世纪里，只有少数国家始终在争夺领导权。从中世纪到这个时期，法国和英国一直是竞争者，而普鲁士的发迹、美国的崛起、奥地利的衰落，则是新情况。16世纪以后的潮流是列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强大。但这种趋势因工业革命而减缓(Tilly, 1990, pp.45—47)。工业革命偏爱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多民族帝国；它还偏爱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潮流也仰赖非经济权力关系。

个别权力具有令人惊讶的连续性，但也有例外。在这个时期，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开始发生急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我在其他著作(1988)中描述过“父权制”的终结，“新父权制”的填补，以及随后更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兴起。最简单的指标就是长寿。从悠远的史前时期起直到19世纪末，女人的寿命大约在30岁至45岁，而男人比女人的

寿命大约长 5 年。然后，这种差异就颠倒过来了：男人的寿命为 70 岁，而女人比男人长寿 5 年，而且这种差异还在扩大(Hart，1990)。我已经放弃了在这一卷里集中讨论性别关系的最初设想。性别关系有其自己的历史，目前女性主义学术圈正在重写这一历史。现在还不到进行大综合的时候——尽管我将论及这一时期性别、阶级和民族之间的联系。但是，除了性别外，个别权力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像正统理论所暗示的那种大。阶级和民族—国家并没有彻底改变社会分层状况。

曾经有不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加以论述。摩尔(Moor，1973)认为，旧的土地占有方式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大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罗坎(Rokkan，1970)区分了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种革命，认为它们各自都产生两种政治分裂。民族革命造成中心与边缘、国家与教会的冲突；工业革命则导致土地与工业、业主与工人的冲突。罗坎把革命的二元论转换成四种斗争的复杂组合，较早发生的为后来发生的建立参照系。李普塞特(Lipset，1985)认为。20 世纪各国工人运动的不同表现，取决于早期的封建主义是否还存在。科里根和塞耶注意到英国统治阶级的持久性——其"所谓的通情达理、节制、实用主义、讨厌意识形态、'随机应变'、诡诈、乖僻"(Corrigan and Sayer，1985，pp.192以下)。迈耶(Mayer，1981)认为，欧洲的旧政权不是被工业化扫荡的：只是由于它们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久拖不决，还由于它们对社会主义作出过度反应而采纳法西斯主义，它们才自取灭亡。

这些学者提出两个重要观点。首先，传统是起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也罢，工业化也罢，都不能扫荡一切，自身反倒要被纳入旧的形式之中。其次，这些学者超越了经济领域，给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增添了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地缘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关系。他们的论证大多是正确的。本书后面的章节将援引他们的观点，尤其是罗坎的观点，因为罗坎认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等重要。

不过，个别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首先，旧政权不可能简单地忽

视或压制阶级和民族。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妥协(Wuthnow，1989，III；Rueschemeyer，Stephens and Stephens，1992)。但是，民族斗争也与阶级纠缠在一起，从而改变了所有的权力运作者，这种改变不仅是“辩证地”和“对称地”进行的，而且其方式极其复杂，往往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其次，那些传统对立的阶级和民族权力组织——无论是局部的还是部门的，也无论是超国家的还是地方性的——都没有被消灭，而是转换了形态。由旧政权显贵所控制的松散网络变成了更具有渗透力的显贵和代办政党，从而使阶级的政党陷入困境。军队也从大贵族或雇佣军承包人的“私有”团队所组成的松散联盟，转变成现代的专业力量，实行高度集中的方针以及严格的控制和纪律。天主教会在捍卫其超民族主义时，凭借着更强大的地方—地区动员能力，调动起对民族—国家不满的反中央集权力量。诸如此类的组织改变了政权与民众的关系。

总之，经济转型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集体权力被彻底改造；多数个别权力发生变化，但没有彻底转变；传统的支配权力运作者的生命力超出人们的想象；权力运作者意识到结构性转变，但是这些转型极其复杂。对于社会变迁理论来说，这一切都具有深意。

社会变迁：战略，复杂的纠葛，意外的结果

在本卷考察的这一时期之初，发生了三场革命，而每一场革命都使其参加者感到惊讶。首先，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由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发动的，不是按照哪一个人的意图发生，斯密在世也会惊诧。其次，英国在美洲的移民无意之中卷进了历史上第一次殖民地革命。第三，法国旧政权遭到政治革命的袭击，而这场革命的参加者几乎没人有此预谋。当时，权力运作者在争论，未来的革命究竟会重演还是可以避免。殖民地革命不在这一讨论之内，但是我将认真考虑

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

工业化难于开创，但易于模仿和调适——只要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商业化。在欧洲各地，从意大利北部到加泰罗尼亚，从乌拉尔山到大西洋，从美国到日本，到处都有成功的调适者。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增加利润和减少弊端。工业化在各地是按照当地的传统来调适的。政治革命恰恰相反，似乎易于开创，但难于模仿——旦旧政权面对威胁作出调整。革命纲领可以调整；政权和新兴权力运作者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间或者作出选择，或者随波逐流。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各有偏爱：君主统治，法治，经济自由主义，民主或民族主义。各种半自觉的混合镇压手段的战略造成了各种非革命的发展模式。

因此，传统既没有被颠覆，也不是简单地延续。由于“政权战略—漂移”和新兴阶级和民族的战略—漂移之间的冲突，传统要么被修改，要么被强化。所谓“政权”(regime)，我指的是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的权力运作者的联盟，是由国家统治者加以协调。我们在第三章中将会看到，统治者包括“政党”(韦伯意义上的)和“国家精英”(精英主义国家理论意义上的)。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调动新兴的阶级和民族力量的现代化联盟，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内乱或遭受列强凌辱。政权通常拥有比在其统治下的各阶层更多的后勤能力。但是，它们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们的凝聚力。在阶级和民族的兴起时代，党派之争促成革命。我把它们应付新兴社会阶级和民族挑战的尝试称作“政权战略”。不是所有的政权都有这种战略，甚至眼光远大的政权都发现自己在复杂政治的打击下而陷入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的各种轨道。因此，大多数权力运作者既有计划又随波逐流——因此命名为“战略—漂移”。

开始时，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沿着从专制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的渐进路线发展。马歇尔(Marshall, 1963, pp.67—127)认为，根据英国的经验，实现充分的公民权益要经过三阶段演进。第一阶段是法律的或“公民的”权利：“个人自由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人身自由，言论、

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签订有效契约的权利，获得司法公正待遇的权利。”英国的公民权利是经过“漫长的18世纪”才确立下来，所谓“漫长的18世纪”是指从1688年到开放天主教的1828年。第二阶段确立“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参与握有最高权力的议会的权利。这一阶段也历经了从1832年大改革法案到1918年和1928年的普选权法案的一个世纪。第三阶段、即20世纪阶段，确立“社会权利”或福利国家：“获得一点经济福利、确保充分分享社会遗产并且按照社会流行标准过上文明生活的权利”。

马歇尔的理论在英语世界引起较大的兴趣(最近在澳大利亚学者中引起热烈讨论：Turner，1986，1990和Barbalet，1988)。他的权利类型中有两种看来是不同性质的。公民权益可以分成个人和集体两种亚型(Giddens，1982，p.172；Barbalet，1988，pp.22—27)。我们将会看到，虽然18世纪大多数政权承认了个人合法权利，但是直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才同意工人享有集体组织权利。(见本书第十五、十七、十八章)。我还把社会权利(马歇尔所说的“分享社会遗产”的权利)细分为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两种亚型——接受教育、从而参与文化和获得职业的权利，引导经济生存的权利。通过漫长的19世纪，所有的中产阶级获得了意识形态—社会权利(见第十六章)，但是经济—社会权利还微乎其微(马歇尔已经指出这一点；见第十四章)。各地公民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发展步调，有些还彼此冲突。公民权益的发展大概不是像马歇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单线发展进程。

另外，我早已指出(1988)，马歇尔的进化论、对地缘政治的忽视以及英国中心论都是立足不稳的。我们可以首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各个阶级——或者其他任何权利运作者——会要求公民权益？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国家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要知道，在此之前大多数人并非如此。那时他们生活在地方或区域权力所主宰的网络里，同时受到国家和超民族的教会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在18世纪，国家通过战争而大规模地加强财政和人力榨取，把臣民束缚在民族的平台

上，进而使他们政治化。于是，各个阶级不再像过去那样致力于在市民社会里与其他阶级较量，而是在政治舞台上显示自己愈益强大的力量。于是，“军国主义”阶段之后便是其他对被束缚的民族的激励：官职角逐、关税、铁路以及学校。正如国家先是变成全国性政府(national state)，然后变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阶级也是先被束缚，然后不自觉地被“民族化”和政治化。民族对于公民权益至关重要(如Giddens所确认的，见Giddens，1985，212—221)。我们应该不仅对阶级斗争而且对民族斗争(national struggle)进行理论概括。

实际上，当时有两个公民权益问题：代表权以及应该代表谁和在哪儿代表的全国性问题。在哪儿就涉及到国家怎么会是中央集权的和全国性的，或者怎么会是权力分散的联邦制的。专制主义会遇到抵制，国家的权力会被分散到地方议会。语言、宗教或区域方面的少数群体通常会抵制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3]。启蒙时期的现代化鼓吹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殊途同归：未来的国家将既是代议制的有是中央集权的。后来的进化论者如马歇尔则认为，民族—国家和民族性的公民身份乃大势所趋。的确，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确实是中央集权的、代议制的和以公民为本的民族国家。

但是，这种“现代化”不是单向度的或进化的。工业革命没有把世界变成一律，而是使不同的政权战略具有现代方式。推进革命所提供的集体权力可以被任何政权用来强化自己原有的特点，无论这些政权是政党民主制还是专制制度，也无论是中央集权的还是联邦制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这两个方面。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总体明显趋势也是如此。各个政权在竞争中的兴盛和衰亡，取决于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实力较量、外交联盟、战争、国际经济竞争以及意识形态诉求在西方的回应。当大国兴起时，其政权战略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当大国衰落时，其战略也土崩瓦解。一个大国的战略如果取得成功，就会改变以后的工业化进程。德国的半权威主义君主制和疆域更大的美国的中央集权制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战争

造成的结果。接着它们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型资本主义公司，以及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调控。

最后，“复杂的纠葛”(impure entwinings)也搅乱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因此，我的论述将逐渐地偏离“战略”——偏离那些始终如一的精英，后者有着明确的利益、明确的观点、理性的决策以及无限的生命力。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转型，阶级和民族斗争都是多方面的、相互纠缠的，是利用间隙展开的。任何权力运作者都不可能是全知和全能的。他们会犯错误，会无意之中造成某些后果，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特性。这一切都是历史形成的体制与在缝隙中冒出的力量二者造成的非系统的、非辩证的进程。我提出的 IEMP 模式能够观照并开始解释这一团乱麻；两分法理论则无能为力。

注 释：

[1] 我仅讨论英国本土，不包括爱尔兰，尽管这个时期英国一直统治着爱尔兰。经过反复斟酌，我决定在这一卷里像对待其他殖民地(除了后来的美国)那样对待这个欧洲最大的殖民地：一般不予讨论、除非涉及到它们对这个帝国国家本身的影响。

[2] 美国的阶级理论家已经开始用“segment”指一个阶级的一部分，即欧洲人所说的“阶级宗派”(class fraction)。我赞成人类学和欧洲人的用法。

[3] 对我 1988 年的论文忽视宗教和族裔，特纳提出了很好的批评(Turner 1990)。我现在努力加以弥补，郑重地考虑民族问题。特纳还批评我偏重统治阶级的战略而忽视下层阶级的战略。在这一卷里，我将对这两个方面加以重视，但仍强调前者。

参考文献

Bairoch, P.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Barbalet, J. 1988. *Citizenship*.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Corrigan, P., and D. Sayer. 1985. *The Great Arch*. Oxford: Blackwell.

Foucault, M. 1974.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Allen Lane.

Giddens, A. 1982.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rt, N. 1990. Female vit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healt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Sociology, Marburg.

Forthcoming. *Life Chances and Longevity*. London: Macmillan.

Landes, D.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 M. 1985.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his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Mckeown, T. 1976.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In my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rshall, T. H. 1963.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einemann.

Mayer, A. J.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Croom Helm.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arsons, T. 1960.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 In his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Rokkan, S. 1970. *Cities, Elections, Parties: Approaches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Oslo: Universitets forlaget.

Rueschemeyer, D., E. Stephens, and J.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to Chicago Press.

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Turner, B. S. 1986. *Citizenship and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90. Outline of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Sociology* 24.

Wrigley, E. A., and R. S. Schofield. 1981.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14—1871*. London: Arnold.

Wuthnow, R. 1989.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章

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

在 18 世纪——而且从那时以来——人们逐渐习惯于区分两种社会活动领域——“市民社会”(或简单说“社会”)和“国家”。这一章和下一章的标题似乎遵从了这种习惯。尽管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学者和马克思在说到“市民社会”时仅仅指经济制度，但另一些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格森、潘恩、黑格尔和托克维尔——则认为，这一概念包含着本章所讨论的两个领域。在他们看来，市民社会意味着(1)基于私人产权的权力分散的经济市场和(2)“各种民间组织……科学家和文人圈子、学校、出版商、酒馆……宗教组织、城市协会和独立的家庭”(Keane, 1988, p.61)。这两个领域都享有至关重要的非集中的和分散的自由。它们希望以此来对抗国家的威权主义权力。

但是，把社会与国家这样明确地划分开是危险的。令人不解的是，这种划分极其政治化地把自由和道德安置在社会而不是在国家里(黑格尔显然在这方面持不同看法)。这种情况表现在 18 世纪许多反抗他们所认为的专制主义的作家中，近些年来则表现为苏维埃、东欧的持异议者竭力动员非集中的市民社会力量来反抗国家压迫。但是，国家并不像这些意识形态告诉人们的那样是脱离其他社会生活的。本书第一卷表明，市民社会从发轫之初就是与现代国家纠缠在一起的。这一卷将表明，在漫长的 19 世纪，市民社会尽管没有完全地但也越来越从根本上成为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这就牵涉到经济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因此，这一章和第三章的正文经常

批驳标题中所隐含的这种区分。

经济权力：资本主义和阶级

到1760年，西方经济权力关系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的支配。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我把资本主义定义如下：

1. 商品生产。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都被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都被赋予交换价值，都可以与其他要素交换。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弥散的经济权力形式，除了它要求威权主义保护。

2. 生产手段的私人排他所有制。生产手段，包括劳动力，都完全属于一个私人资本家阶级。

3. 劳动是"自由"的，但脱离生产手段。劳动者可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自由地出卖和收回他们的劳动，不受权威主义的限制；他们获得自由商定的工资，但是对剩余价值没有直接的所有权。

马克思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革新了社会的"生产力"——集体经济权力。这是最明显地声称这种特殊的经济生产方式在现代具有"终极首要性"。但是，马克思也主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别经济权力——也在革新社会。这样，剩余价值就可以由"纯粹经济手段"通过生产和市场来榨取，而无须借助于独立的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他对资本主义和以前的生产方式的比较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Poulantzas，1975，p. 19；Anderson，1979，p. 403；Giddens，1985，p.181；Brenner，1987，p.227，231，299）。我对此不能苟同。马克思还主张，商品生产把同样的关系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领域。因此，经济阶级斗争就变成"纯粹"的、广泛性的、政治性的、超民族的，而且最终是对称的和辩证的。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但较为

罕见(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承认这最后一点)。他把阶级冲突看作是现代发展的火车头，认为它导致了现代特有的意识形态、政治以及各种军事斗争。它们的形式“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辩证法决定的。马克思希望而且有时还预言，这种情况最终导致革命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很显然，马克思在什么地方出了错。他夸大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以及在此之前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即使有些革命接近于成功，其原因也不是阶级冲突。他夸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而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军事的、政治的和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这一切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有一种对马克思的传统批评遮蔽了我们的理解：他究竟错在哪里，我们应如何改善他的思想。即便说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阶级毕竟存在，而且是在与其他权力运作者争夺对人们灵魂的控制。在马克思主义退潮和后现代虚无主义的时代，有些历史学家似乎根本遗弃了阶级(例如 Joyce, 1991)。但这种做法不过是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我们应该更细致地提出我们关于阶级以及各阶级争夺权力的斗争的观念。

马克思在描述法国农民时极其明确地谈到阶级：

>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1968, pp.170—171]

第十九章将证明马克思关于“小农”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实际上能够形成许多组织。但是这一段论述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兴趣。历史

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引用它，并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另外两个特征联系起来。他们说，小农形成了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他们与生产手段有着同样的联系，但不能产生集体的阶级行动。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后来的评论者引申出第二个特征：农民“在客观上”而不是“在主观上”是一个阶级。他们说，我们必须分析阶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主观的阶级意识，二者对于阶级的形成都是必要的。法国革命史专家亨特(Hunt)说：“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的形成取决于两个方面：经济条件和文化，或者说，社会地位和意识”(1984, p.177)。社会学家韦斯特加德(Westergaard)和雷斯勒(Resler)宣称，他们对20世纪阶级结构的分析工作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入手的：“权力、财富、保障和机会的客观杠杆是如何促成了具有共同身份意识的集团。‘自在阶级’是如何转化为具有积极意识的‘自为阶级’？”(1975, pp.2—3)

应该说，马克思确实会引起误解，因为他本人反对唯心主义的主张可能导致这些评论者所强调的客观经济现实与主观意识的二元论。但是马克思本人在上面的那段引文中并没有提出这种主张。他明确地把农民的“文化”包括在所谓的阶级的客观方面。相反，农民的“纯粹地域性的联系”是经济性的，使他们无法像一个阶级那样(所谓主观地)行动。马克思根本没有谈到什么阶级的经济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分。相反，他区分了阶级的两个基本上属于经济方面的前提：“相似性”(农民具有这一特征)和“集体依存”(他说农民缺乏这一特征)。农民在经济上的相似性使他们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和更大的文化同一性。但是他们同样来源于经济的组织能力则局限于局部和地域。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经济权力组织，因此应该用两个标准来界定：经济和组织。

马克思广义的经济标准是对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模式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对抗阶级：资本家占有者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在确定小资产阶级这个中间阶级时也是根据他们

对生产手段的占有，而不是根据他们对其他人的劳动的控制；他还留下了关于中间阶级兴起的指导性意见(见第十六章)。这些阶级可以视为“客观”的，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其他“客观”标准来界定阶级。所谓的工业社会理论家们是根据在分工中的特殊角色来区分阶级的。这种方法产生出不计其数的行业阶级。韦伯主义者是根据市场能力来区分阶级的，他们根据财产占有权、稀有职业技能、职业权力和教育程度，划分出许多阶级。在这些同样“客观”的模式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在前面的引文中，马克思给了我们第二个标准：阶级是拥有组织能力的。只考虑经济标准而不考虑组织标准，只能产生我所谓的“潜在阶级”——大体上相当于“客观阶级”或“自在阶级”。这种潜在阶级几乎不会引起社会学家的任何兴趣。理论家们往往会提出他们所喜爱的分析范畴作为理想类型，但是其中只有少数有助于解释现时世界。如果阶级是现时世界中的重要权力运作者，它们就应该是广泛地或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在整个这一卷书中，我都将分析阶级和其他运动的组织能力。它们的后勤状况如何？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地理和社会范围并且如何传递信息、交换人员以及组织请愿、罢工、暴动和革命的？

马克思认为，现代阶级卷入了一种正面的阶级之间的辩证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都获得了植根于生产的组织能力，但是也使整个社会和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都统一起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这样的能够改变社会的阶级组织的确出现了。诚然，他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一个被剥削阶级怎么可能毁灭以前的全部历史，并且奋起消灭一切阶层划分。但是，马克思确实发现了一个基本真理：资本主义创造出具有潜在广泛性的、政治性的和(有时是)对称的和辩证的阶级。这种阶级在以前的社会里极其罕有，但是现在一直是无所不在的。

阶级意识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尽管它并不纯粹也不彻底。多数支配阶级都表现出自我矛盾的意识。他们都有各自完整的共

同关系，都很敏感地捍卫自己的利益。那么，还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例如18世纪英国的乡绅或19世纪普鲁士的容克地主更具有阶级意识呢？但是，他们通常否认社会是分裂为敌对阶级的，而认为部门性和地方性的组织(或许能得到规范共识的支持)是更重要的。诚然，依附阶级通常都被纳入这类组织中，但是马克思认为，它们能够获得阶级意识。他关于上升阶级的意识的模式隐含着四个要素。我曾在以前写的一部论述工人阶级的著作中加以分析(1973，p.13)：

1. 身份认同。把自己确定为工人阶级，认为自己在经济中与其他工人共同承担着一种特殊角色。[1]这种自我认识并不一定与阶级冲突相联系。

2. 对立。认为资本家及其管理人员构成了工人的永久敌人。认同加上对立就会产生冲突，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是广泛性的。它可能局限于工作场所、行业和地方社区，而没有遍及整个阶级，仅仅认可宗派的而非阶级的冲突。

3. 整体。承认前两个因素是(1)工人整个社会状况和(2)整个社会的界定特征。需要补充的是，(1)给宗派冲突的意识增加强度，(2)把宗派意识变成广泛的阶级冲突。

4. 取代。设想取代现存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权力关系方式。这将加强广泛的和政治的阶级冲突，并认可革命斗争。

我将分析上升阶级所表现出的这些阶级意识要素达到了什么程度。大多数人可能更多地意识到第一点而较少地意识到第二点，更多地意识到前两点而较少地意识到后两点。但是很少有人完全是由这些因素支配的。我们每个人也是家庭、跨阶级的社区和工作场所、教会组织、其他自愿协会、民族等等的成员。社会是复杂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多种权力网络都在争夺我们的灵魂。在现代社会，阶级只是最重

要的身份认同的形式之一。处于类似经济环境中的人们也会受到其他身份认同的影响。只有少数人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受一种阶级身份——或宗教身份、民族身份或其他某种单一身份——的支配。在后面的章节里，当我描述阶级的“行动”时，我不是像苏联的英雄无产阶级绘画那样在制造人民大众坚决行动的形象。我一般只是描述少数的战士。他们确实充满这种动机，而且能够动员许多人，使后者相信他们的阶级情感比他们以前所认为的更重要。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希望自己继续是本分的劳动者、天主教徒、公民等等。

我确定了六种主要的阶级角色：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通过新旧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冲突而出现于该时期的前半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出现于该时期后半期的两大广泛性集团；中间阶级，出现于整个19世纪；农民，在这整个时期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我在三章的开头，对这些阶级作了界定：第十九章论述农民，第十五章论述工人阶级，第四章论述其他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似乎对这些阶级都很熟悉。但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不认为这些阶级是纯粹的，也不应该仅仅从与生产手段的关系来界定它们。整体的和纯粹的阶级从未领导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通常认为表面具有阶级性质的社会运动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凡是有整体的阶级运动出现的情况时，它们都不是纯粹的，它们的力量既来自经济权力网络，也来自非经济权力网络。尽管它们被视为纯粹的经济组织，但它们本身具有多种成分，无力采取集体行动(尽管其中的派别可能拥有自己特殊的组织)。四种经济缺陷一直在削弱阶级整体的团结：

1. 经济部门分裂了阶级。资本和劳动本身的碎裂一直具有不同形式，而且各部分之间有时彼此冲突。农业通常产生出自己的次文化。农业劳动者很少把自己看作是与产业工人并列的“无产阶级”；有产业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产生出自己独特的运动(见第十九章)。产业之间的差异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兴起，扩大了他们原有的多质性。

2. 直接的经济生产关系更容易产生出以单个企业、产业或行业为界限的较小的集体而不是一个阶级整体。 这种情况更可能强化部门性组织而非阶级组织。 在这些界限内会形成高度的团结，但与同一阶级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联系。 它们至多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门工会运动；否则它们就会与自己的雇主结成部门同盟，而反对其他的工人和雇主。

3. 阶层和宗派分裂了阶级。 18 世纪末，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包括自由职业者、商人、代理人、店主、手工业师傅、手工业者以及其他人。 后来的“中间阶级”也包括许多行业和三种成分(自由职业者、名利追逐者和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则包括各种市场劳动力集团，尤其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以内部劳动市场为后盾的工人和往往以种族和性别为特征的新工人。 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组织——即不同行业、职业和工会——使之区别于“自己阶级”的其他成员。 内部劳动市场、管理职业以及其他的等级依附形式产生出部门组织，破坏了阶级组织的前景。

4. 民族国家割裂了阶级，把后者变成民族的组成部分。 尽管存在着超越民族的阶级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从来没比在现代资产家阶级那里更强烈的了)，但是从来没有产生出强大的超越民族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 最大的阶级运作者一般都受到民族的局限，例如“英国工人阶级”、“法国资产阶级”等等。 我们将会看到，阶级的民族分割实际上是极其复杂的。

由于这四个原因，生产关系不会仅仅产生出整个阶级。 它们也是我们的各种身份的战场。 由于内部宗派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分割，纯粹的经济运作者通常比马克思所描绘的大阶级概念要小，也更受局限，而且也更细碎。 但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价值规律”或其他什么经济规律使所有的经济原子两极分化，从而进入两大阶级阵营。 相反，是由非经济组织铸造了这些经济上不同的部分、阶层和局部之间的团结。 社会中的阶级冲突是

由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权力关系促成的，也是被它们规定着的。这一情况通常都被用来解释为什么阶级缺乏团结——例如，它们被宗教所分裂。但是，非经济网络也会产生出阶级团结。马克思所忽略的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权力关系不完全是外在于资本主义和阶级的现象。它们的组织促成把完全不同的、往往具有对立身份和利益的经济运作者转化为相对紧凑的阶级。我所说的阶级都是被社会权力来源的发展缠绕着的。现代阶级(尽管指历史上的而非后来发展了的阶级)的“纯粹性”从来都只是部分的。

我们将会看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在市民社会及其阶级的发展中起着一种十分重要的建设作用。革命政治并不只是产生于在市民社会中已经“外露”的阶级冲突。法国革命期间兴起的阶级运作者在革命前几乎并不存在。它们是被革命的权力过程创造出来的——部分原因在于充满战斗精神的思想家们极力煽动阶级情绪，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是被政治权力关系无意之中培育出来的。国家也是不纯粹的，既具有经济性，又具有政治性质。它们有财产，有花销，要征税。在18世纪，官位、特许权、免税权都是经济奖赏，也造成了宗派性、部门性政治。在朝和在野之间党争不断。在朝的党派出自地主家族、商业寡头以及与王权有关的人士。在野的党派最初是由出自同样集团的不满派别领导小资产阶级构成的。因此，宗派政治就与从商业地主资本主义向制造业资本主义转变时期产生的阶级和部门斗争纠缠在一起。“在朝派”、乡绅和商业寡头形成了一种旧制度阶级，“在野派”和其他各种派别和阶层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小资产阶级运动。这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也是来源于(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来源于)国家的政治结构。只是在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时，“阶级”才变成广泛性的和政治性的。在宗派政治斗争较弱的地方，如在德国(或日本)，就没有发生革命，阶级政治也淡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也几乎无需阶级斗争。

关于意识形态的和军事的权力关系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评价。马克

思相信，阶级创造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达自己的实践活动和利益。它们可以借助于类似他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不过是表达一个已经形成的阶级本身早已潜在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同其他的“工具性”行动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交换理论、合理选择理论)一样，人们不知道利益本身是如何驱动马克思所看到的那种行动。通过建立工会，乃至通过构筑街垒或同哥萨克搏斗，使工人直接对抗雇主和国家权力，符合工人个人的利益吗？阶级确实存在，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规范和激情，鼓舞它们奋不顾身、自我牺牲乃至暴戾残忍。这些有助于它们克服自身复杂的经济地位而迸发出斗志昂扬的集体行为。意识形态应该是阶级内在的和超越阶级的。第二，如果意识形态很重要的话，那么思想家也同样重要。18世纪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思想家们发现了有一些信息和沟通媒介超越了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纳税人、官场失意者等等的各种抱怨。记者、咖啡馆老板、教师等等煽动起阶级意识。一个世纪以后，中间阶级对国家教育的依附，促成了对其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改造(见第十六章)。

再有，恩格斯相信，某些类型的军事权力有助于阶级意识的形成：普鲁士军队的普遍兵役制将会培训出革命者。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的军事系统往往提供了对依附阶级实行的有效的片面纪律，有助于现存体制和支配阶级的延续。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他的军事权力组织——游击战争和失败的军队——则有助于阶级的形成。

因此，阶级的形成过程是不完善的和断断续续的，因为正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权力网络与经济斗争相互交织，把多种经济身份融合在一起。

这也对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的最高性质——对称的和辩证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是在不同的权力网络中组成的，那么它们就不会在同样的基础上对峙。马克思认为这种冲突的战场是不言而喻的，其他很多人也持同样看法。资本主义总是被

视为超民族的、超越国界的，流行于任何商品交换和利润占上风的社会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出现在国家疆界之内。其社会空间结构取决于各国内部的和地缘政治的关系。只要资本主义的局部现象和各种权力运作者能够存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可能有三种社会空间形式：

1. 超民族的。其组织和斗争不太涉及并超越了国家边界。阶级遍布于资本主义的全球范围。国家和民族与阶级斗争并不相干，它们的权力因阶级的全球分布而被削弱。由于后面将要解释的一种特征，利益更多地是由市场而不是由疆域限定的。具有基本上跨民族性质的阶级的典型是中世纪贵族。他们是由遍布欧洲的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他们展开了自己阶级的外交，并发动了许多战争。相比之下，多数经典理论家——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涂尔干——在考察资本主义的未来时，觉得会和平得多。现代阶级将会是跨民族的。

2. 民族主义的。[2]一个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居民变成一个准阶级，其经济利益与其他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居民发生冲突，“民族”或更严格界定的“阶级—民族”之间彼此竞争、相互剥削，在国际分工中从事各自的实践。民族主义的阶级助长了我所说的利益的“地域”界定(后面将予以论述)以及侵略性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世纪之交的研究者如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 1899)和奥本海默(Oppenheimer， 1922)等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当时被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组织予以强调，近来又被鲁斯托(Rustow， 1981)概括成“超分层结构”(super-stratification)概念，意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宰制。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晚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和蔡斯-邓恩(Chase-Dunn)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当代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中，都渗透着同样的历史倾向。

3. 民族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在地域上局限于各个国家范围内，基本上不涉及其他国家的阶级关系。在此，阶级实践不是“扎根”于国际空间。各阶级卷入国内的民族认同斗争，但它们的民族感是内向的——脱离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无足轻重。在市场关系或

地域关系方面，它们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或地缘经济利益。对于战争与和平，它们没有处心积虑的成见。目前还没有哪一个重要理论派别对这种阶级组织模式加以概括，而我将强调它在这整个时期的重要性。

这是一些理想类型。实际的阶级(以及其他权力运作者)通常包含着这三种组织的一些因素。一个阶级可能包含着明显的派别，另一个阶级可能相对地是超民族的，还有的阶级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阶级运作者可能同时感受到两种或三种组织形式的撕扯，从而减弱了阶级凝聚力。一个阶级也可能比另一个阶级更局限于民族范围，例如，今天劳动与资本相比就是如此。因此，阶级不太可能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迎头相撞。

民族国家的结构性作用意味着，它们的地缘政治也是与阶级交织在一起的。人们通常分析阶级斗争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例如本书第十二章讨论的社会帝国主义理论)。但是人们很少反过来分析，而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如 Skocpol，1979 和 Maier，1981 所作的分析)。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是“英国制造”的。英国的准霸权及其在法国、德国等地引起的抵抗，改变了阶级斗争的性质。晚近的美国霸权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孤立地谈论阶级斗争或地缘政治。在此，我斗胆地宣称，在本书之前还没有人试图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来考察两者的联系。

不仅阶级，而且经济“利益”和“利润”这些概念也都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经济利润和利益的理想类型概念，分别称之为“市场概念”和“地域概念”(参见 Krasner，1985，p.5；Rosecrance，1986；Giplin，1987，pp.8—24)。有一种市场概念认为，利益就是属于私人的，并因占有市场资源而得到加强的，不考虑国家地域、战争和侵略性外交的。它是跨民族的、和平的。资本家在一切有市场的地方追逐利润，而不考虑国家边界。地缘政治在此与“利益”无关。但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地域概念则认为，利润是由国家对地域的权威性控制来保障的，往往是由侵略性外交来保障的，在极端的情况

下，是由战争来保障的。市场和地域，资本主义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就是本卷的主题。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这些理想类型。资本主义和国家共存于这个世界，彼此相互影响。在这方面可以划分出六种主要战略：

1. 自由放任。国家仅仅认可(或者说无力改变)现存的市场条件，也不想强行改变它们。

2. 民族保护主义。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国家凭借权威进行干预，但只是宏观地与和平地干预市场条件(在论述19世纪的德国时，我将把保护主义分为"有选择的保护"和"宏观协调的保护")。

3. 重商主义。国家力图主宰国际市场，竭力强行控制这些资源，实行外交制裁(可能是与同盟国家齐心协力)，甚至炫耀武力，但避免进行战争和领土扩张。这种旧式的重商主义的公式是："实力"和"富裕"并重。

多数国际政治经济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上述三种战略结合起来。尽管它们内部矛盾重重，但不总是会触发战争(正如Krasner，1985分析的"第三世界反抗全球自由主义"中的冲突)，但是另外三种政治经济战略则暗含着更大的侵略性：

4. 经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直接的经济利润而征服地域。

5. 社会帝国主义。征服的首要目的是控制现有的而不是新的地域和居民。这是为了转移对现存国家地域内的阶级冲突或其他集团冲突的注意力。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阶级注意力的转移；韦伯则认为社会帝国主义可以被任何当权者在反对任何敌人时所利用。当权者的动机首先在于国内政治、内部政治(Innen-politik)；地缘政治、外部政治(Aussenpolitik)是其副产品。

6. 地缘政治帝国主义。国家把征服地域作为目的本身。

这六种战略表明，"实力"和"富裕"、地缘政治和资本主义、地域和市场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便是两个极端的例子也不是绝对纯粹的。19世纪的英国基本上倾向于自由放任，因为更黩武的战略(第三

种和第四种)已经促成了不列颠帝国和皇家海军，此时国际贸易关系几乎就是英国的关系。另一个极端是奉行地缘政治帝国主义的希特勒。他迷恋世界权力，而对经济几乎漠不关心。但是，他也认为，这将给德国带来利润。国际政治经济战略——如自由放任或保护主义——都不是出自于“纯粹”的经济利益计算。现实生活的利益界定受到地域、民族认同感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如地缘政治也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二者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任何一种战略都不能简单地说比其他战略更划算。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实行某一战略，通常都是由于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交互作用，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和地缘政治权力网络交互作用的结果。

意识形态权力关系

正如我在第一章指出的，我认为，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权力大大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关紧要的。在第四、七章中，我把意识形态权力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和民族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和独立的组成部分，尤其影响着它们的思想情绪。在第十六章和第二十章中，我将把这一论点贯彻到整个19世纪，描述国家教育机构对中间阶级兴起的重要作用，并将讨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第十五章中，我将区分在漫长的19世纪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各种主要意识形态形式，并在第十七章和第十九章中考察它们的发展情况。在这一卷中，我没有充分地探讨这些晚近的意识形态的潜在自主性。这个任务留给了第三卷。在第三卷中将考察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面将集中论述较早时期的情况。

关于1760年前后的意识形态权力，我提出两个概括性观点。第一，与市民社会的其他重要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阶级——一样，意识形态权力网络也分为跨民族的和民族的领域。一方面，欧洲——

逐渐发展成“西方”——是一个规范共同体，其意识形态间隙地、“超越地”弥散于各国。另一方面，国家构筑了限制信息自由流通的屏障。如果语言共同体与国家疆界吻合，这种屏障就更有效。接着，纵观这一时期，民族的意识形态权力网络往往在得到加强，而跨民族的意识形态权力网络依然保存着，但被削弱。第二，18世纪，论述沟通的媒体经历了革命性的扩张，使得意识形态权力能够具有某种自主的作用。

一千多年来，欧洲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价值观、规范、仪式和审美观弥散于整个大陆。它原来是统一的基督教信徒世界，后来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丧失了在国家中的权力，但是在家庭和地方上，尤其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基督教的历史性权力及其后来的部分衰落留下了重要的遗产：沟通媒体成为间隙性的，不受任何单一的权力组织控制。由于读写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会扶持的，因此不管国家或资本主义多么努力，也不能完全控制媒体。欧洲人也把他们的意识形态扩散到他们的殖民地，使“基督徒”等同于“白人”，使“欧洲”概念扩大为“西方”。意识形态信息扩散到整个西方，不太受民族疆域的限制。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的这种自主性是异乎寻常的；在近代早期，日本或中国都没有与之相似的情况。做一个西方人，也就意味着参与一种具有某种程度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权力组织，游刃于其他权力组织的控制之外。这也意味着，与现实主义者所说的相反，国际舞台绝不是无法无天，没有规范的。

有些理论家们强调，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迅速扩散。他们往往声称，这种情况表明“思想在社会中的自主性”(例如 Bendix，1978)。我对此不能苟同。但是，我也不想用“唯物主义”来反驳这种“唯心主义”。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把思想都归结到它们的社会基础。我的观点是一种“组织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是应付现实社会问题的尝试，但它们只能通过特定的沟通媒体而得以扩散，它们的特点会改变意识形态信息，从而使意识形态权力获得自主性。因此，意识形态权力

组织的特征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关注1760年前后“论述能力”(discursive literacy)的革命。所谓“论述能力”是指不仅能够读写算式和名单，而且还掌握对话和论证的语言技巧。在这一卷里，将描述漫长的19世纪中的各种论述性意识形态(discursive ideology)。有一些是宗教：清教影响了美国早期历史；道德严正的新教影响了英国；新教和天主教的分裂在德国具有长久的作用。另一些是世俗性的，通常与宗教发生争执：启蒙运动、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关于民族和阶级的两种最重大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都遍布把论述能力的交流所联系起来的广阔地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令人信服地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时空)共同体”。那些从未见过面的、从未有过直接联系的人——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还是尚未出生的人——都在设想中被集合在一个“民族”中。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秘书向我解释美国的感恩节时所说的：“此时我们会想起当年乘‘五月花号’远道而来的祖先。”她的想象力令我惊讶，因为她是一个黑人。我要给安德森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作些他绝不会同意的补充：如果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它的对手——阶级——似乎更是形而上学的，是一种十足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因悠久的历史传统、国家疆域(过去的和现在的)、语言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等而得到强化。阶级只有很短的历史(除了统治阶级)，而且一直与其他阶级一起生活与合作，那么阶级怎么会被想象和创造成某种共同体呢？我们将考察，随着论述能力超越了一直禁锢着它的特定旧制度网络而弥散于整个社会，这两种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共同产生的。

安德森所说的“印刷文化”而不是他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基础结构。文本能够被复制并流入千万人之手。通常对读写能力的衡量标准是最低限度的：能够在婚姻登记册上签名。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在大多数国家，这种能力成倍增长，在瑞典和

新英格兰大约90%的男性和67%的女性，在英国60%的男性和45%的女性，在法国和德国50%的男性具有签名能力(Lockridge，1974；Schofield，1981；Furet and Ozouf，1982；West，1985)。男性最初领先于女性，但是到1800年，女性赶了上来。签名并不能衡量出论述能力——许多能签名的人几乎不会写其他字，而且根本不能阅读。但是，签名能力属于迅速发展的基本读写能力。论述能力是由九种主要媒体承担的：

1. 教会。从16世纪起，新教教会，接着是天主教教会，都鼓励阅读《圣经》以及读写简单的教义问答。这是签名能力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直至18世纪末，教会学校是促成早期论述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且是大多数国家的初等教育。1800年，大部分文学畅销书依然充满宗教思想。

2. 军事系统。1540—1660年的“军事革命”使陆军和海军都中央集权化和科层化了。训练与后勤变得标准化了；炮兵和海军的技术发展了；参谋机构与作战部队的分工使得书面命令和地图识别变得制度化了。训练和海军旗语手册在军官中广泛推行，陆军军需官、炮兵和海军军官都必须具备充分的读写和计数能力，高级军官越来越需要具有现代意义的“学识”。服役人员愈益增长，到18世纪末达总人口的5%，这就使得军队成为论述能力的一个重要媒体。

3. 国家行政机构。在19世纪晚期基层官僚机构大规模扩张(见第十一章)之前，国家行政机构发展得很慢，主要集中于为军队提供支持的财政部门。但是，由于在培养行政官员方面，大学逐渐取代了教会和上流社会家庭，高级行政官员的读写能力也逐渐世俗化了。

4. 商业。17和18世纪，商业大规模扩展，通过合同、账目与各种销售手段而扩散了论述能力。商业和智力行业中的文化程度要比农业和制造业的文化程度高。商业也促进了妇女论述能力，尽管不如随着工业化工作地点愈益脱离家务对妇女的影响更大。

5. 法律行业。法律占据着教会、国家和商业之间的空隙。18世

纪，这一行业的规模翻了一番，法律教育也大大扩展了。

6. 文学媒体。 自 17 世纪晚期以来，文学作品的写作、印刷、流通和阅读急剧膨胀，被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手段彻底改造。 文学作品散布到中间阶级的家庭中。 尽管文学作品的制造者大多是男性，但是其消费者主要变成女性。

7. 定期媒体。 报纸、杂志和世俗宣传品是在 17 世纪末真正开始出现的，在 18 世纪则以几何级数增长。

8. 话语交流中心。 科学院、俱乐部、图书馆、沙龙、酒馆和咖啡馆都迅速发展，成为论述印刷品的公共讨论中心。 甚至理发店和假发店都备有报纸和印刷品，也成为讨论中心。 除了沙龙外，所有这些地方基本上是男性的天下。

这些分散的和零星有统计的增长率还不能构成一个表示论述能力膨胀的总体指标。 但是，在整个 18 世纪，论述能力很可能比基本读写能力发展得更迅速。 一个大规模的沟通网络正在出现。 哪些人加入了这一网络，又是谁在控制着这一网络呢?

基本需求首先出自于教会，然后出自于国家(尤其是它们的军事系统)和商业资本主义。 这就表明有两种不同的宽阔轨道。 我把英国作为一种弥散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类似于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的”)轨道的原型。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一种权威主义的“军事国家主义的”道路的原型。 旧制度的法国则是二者的结合。 在英国，商业扩张产生出众多有读写能力的小资产阶级、律师、大学、普通学校以及适用于文学媒体的大众市场经营技术。 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和行政机构的扩张把律师、大学、普通学校以及文学媒体同国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法国既是商业性的，又是国家主义的，因此经历了二者的扩张。这两种道路都把新的东西与旧的东西结合起来。 “新”权力网络——由小资产阶级、职业官员和公务员组成——也与商人和贵族阶级、僧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结果在上述三种情况中造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发育状态，而且没有一种是完全和谐的。

到1760年，国家和各资本主义阶级都可以说是思想家的主要主顾。但是仅仅有需求不一定能导致有效的控制。英国并不是没有国家和教会，奥地利也不是没有资本主义和教会。在各个国家中，教会、国家和阶级有着各自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需求。而且这些因素内部在采取何种现代化战略的问题上也分裂成各种派别。结果产生了思想家得以活动的间隙。

但是，派别斗争也分裂了思想家。这尤其体现在启蒙运动中宗教与科学、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市场与地域之间的矛盾(Cassirer, 1951; Gay, 1964, 1967; Payne, 1976)。哲学家推崇人的理性(reason)。理性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他们称之为体系精神(esprit systematique)，也就是，推理计算的系统应用，对一切社会制度进行穷根刨底的质疑，探究它们是否能给人类造福。但是，理性也被人看作是一种道德“本质”(substantive)，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幸福和良好社会究竟是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充分的理性，但是愚笨的大众、不开化的野蛮人乃至往往不够理智的妇女都可以用文化和教育来改善。这就是康德的著名论文《什么是启蒙?》的主张。尽管多数著名哲学家是反宗教的，但他们的道德主义显然出自于欧洲的宗教精神，而且不亚于教会内部的道德呼声。意识形态就像道德和激情那样，与科学一起泛滥开来。

当理性运用于社会时，也包含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形式合理性是反中心的，尤其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的鼓励。在资本主义的英美核心地区，这就促成了一种主要提倡自由体制的战略：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个人社会公民权，有产者的扩大的政治公民权，道德的(往往是新教的)个人主义以及通过私人慈善和志愿工作传播启蒙和道德的义务。这些观念也在其他国家产生共鸣，因为这些哲学家们本身是国际性的。他们鼓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纲领。由于他们掌握熟练的语言技巧并四处游说，使得他们很容易进行宣传。但是，在绝对主义的欧洲，实现本质性理性的能力更多地是被寄托于正在现代化的国

家。当绝大多数哲学家推崇资本主义和个人结合的“自由”和物质进步时，多数人也看到，确立开明的社会责任需要立法行动。康德就体现了这种暧昧性。他一方面相信开明绝对主义，另一方面相信，启蒙运动的国际性传播将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在使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模式时，哲学家们不可能维持住这一模式的基本二元论。

当资本主义的“手”后来变成“看得见的手”以后，这种暧昧性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尽管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把自由放任说成是自然法则，但这毕竟预设了一个阶级社会，这个社会由占有生产手段的人和仅仅拥有自己的劳动的人组成。因此，“这只手”既体现了又掩盖着阶级权力。它也体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权力。这种权力能够把贸易条件强加给弱小的资本主义民族。此时的自由贸易其实是英国支配的贸易。19 世纪的思想家们，无论是新兴阶级的思想家还是国家的思想家，都要求控制“这只手”，鼓吹更具有权威性的地域国家的权力。

阶级与民族国家的纠缠产生出新的困境，权力运作者看不到任何出路。的确，正如我们在考察阶级时所看到的，对阶级和国家的认同一直是不稳定的，受到思想家们的强烈影响。思想家们能够利用社会间隙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影响社会的种种认同。西方思想界探讨了各种发展中的超越性矛盾。经济理论分裂成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两种更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民族地域”理论和卡尔·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这三种道路的分歧很快就在全球性的霸权角逐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共鸣。

请看日本明治政府 1889 年宪法的主要制定者伊藤博文的描述：

> 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时代。国内各种观点极其纷杂，互不相让。有些遗老依然满脑子神权思想，认为限制皇权就是大逆不道。还有一大批有实力的年轻人是在曼彻斯特学派(即自由放任理论)流行之时接受教育的。他们的自由思想极端激进。政官员

> 倾向于倾听德国反动时期的理论家的意见，而民间有学识的政治家没有尝过执政责任的辛酸，容易受到孟德斯鸠、卢梭等等法国文人华丽词藻和简明理论的迷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起草了宪法的初稿，呈献给陛下。(转引自 Bendix，1978，p.485)

在这里面是否能看到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换言之，哲学家们——伊藤博文所说的曼彻斯特理论家和德国理论家——仅仅是明治政府和西方类似政府的协助者，葛兰西(Gramsci)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吗？难道他们仅仅是向政府提供可被接纳、否定或修改的思想方案吗？意识形态媒体毕竟是在履行特殊的技术职能。它们扩展了阅读教义问答、训练手册和商业合同的能力。或许，思想家们是在为已经形成的阶级和政治体制提供纯粹内在的信念(morale)。

但是，思想家们也拥有两种创造性权力。首先，阶级和国家职能不是已经建构好的，而是在间隙中兴起的。思想家们帮助创造了它们的“想象的共同体”。这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见第五章和第六章)尤为明显，但也相当普遍。其次，论述媒体也拥有新的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手段摆脱了控制。大多数手段不是互不相干的，不是仅仅能向特殊主顾传达技术知识。它们也联合起来传播有关一般意义、规范、仪式和美学的争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财政学(cameralism)、启蒙运动、福音运动、社会契约论、政治和“经济”改革、“改良”、政治经济学——充溢了所有的媒体。它们的主张是普遍主义的，既适用于道德又适用于科学，影响了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斯密学派、李斯特学派和马克思学派三种道路的争论，不仅涉及阶级和国家的经济利益。许多社会经验存在于阶级和国家的间隙；欧洲在追求现代化和进步的“圣杯”。这些思想家不完全是经济实用主义者。他们看到意识形态在道德和哲学上的冲突，既关注经济学，也关注宇宙真理和道德。这三个人都以启蒙运动为依据：如果理性占据了一种社会运动的头脑，那么世界就能改善。作为超越性的思想家，他们应该获得更巨大的

共鸣。

因此，论述媒体的主要人物形成了一种关于他们自身共同体的意识。正如早期的僧侣那样，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精英——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集体运作者出现了。诚然，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或者说不是“纯粹”的；许多人依然忠实于自己的主顾，而且他们的主顾用奖赏、惩罚、特许和检查等各种方法来控制他们。但是，这种控制斗争被这些主角看作是现实的和新奇的，被他们说成是争夺膨胀了的意识形态动员权力的斗争。阶级、民族、国家、教会和其他因素都为权力而斗争。一个超越性的、被改造了的西方思想界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在后面的叙述章节里，我将对这一思想界的自主性程度和权力作出评估。一般而言，它们在早期比在晚期更强大，因为在晚期，政府形成了应对战略，成为在国家制度内限制意识形态权力网络的中心。

结论

资本主义和论述媒体是散布于18世纪欧洲文明中的市民社会的两幅形象。尽管它们相互交织，但不能彼此归并，尤其在更偏西部的、更资本主义的国家。尽管它们肯定受到支配阶级、教会、军事精英和国家的支持和影响，但是它们没有完全受到这些因素的束缚。因此，对于其他权力组织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性的和间隙性的。但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本书后半部分将描述这两种性质的衰落。市民社会一直是同国家交织在一起的，在漫长的19世纪，情况更是如此。

注释：

[1] 1973年，我使用的是“在生产过程中”这一说法。现在我用更模糊的术语“经济”取而代之，这样更符合本书的一个一般性论点。

[2] 在上一卷中，我用“民族内”(inter-national)这一标签来表示这类组织。为了理解这种标签，读者必须注意其中的连接符。没有连接符的“international”通常用来表示接近于我所说的跨民族(transnational)组织(如“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因为“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t)通常表示我所说的这第二种类型的一般含义，所以可以使用这个词。

参考文献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nderson, P. 1979.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Bendix, R. 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enner, R. 1987.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In T. Aston and C. Philpin,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ssirer, E. 1951.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erguson, A. 1966.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uret, F., and M. Ozouf. 1982. *Reading and Writing: Literacy in France from Calvin to Jules Fer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y, P. 1964. *The Party of Humanit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I: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Gilpin, R.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umplowicz, L. 1899. *The Outlines of Sociology*. Philadelphia: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ocial Science.

Hunt, L.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yce, P. 1991.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t, I. 1963.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on History*, ed. L. W. Beck. Indianapolis, Ind: Bobbs-Merrill.

Keane, J. 1988. Despotism and democracy. In hi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 Verso.

Krasner, S.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ckridge, K. 1974. *Literacy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Maier, S. 1981. 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

Mann, M.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Marx, K. 1968.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Oppenheimer, F. 1922. *The State*. New York: B. W. Huebsch.

Parkin, F.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ayne, H. C. 1976. *The Philosophes and the Peopl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LB.

Rosecrance, R.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üstow, A. 1981. Freedom and Domination: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 English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ofield, R. S. 1981. Dimensions of illiteracy in England, 1750—1850. In Literac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ed. H. J. Gra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tt, I. 1963. The Rise of the Novel.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West, E. G. 1985. Literac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J. Mokyr. London: Allen & Unwin.

Westergaard, J., and H. Resler. 1975.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Heinemann.

第三章

一种现代国家理论

第一章对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作了明确的区分。但是，现代国家似乎把这二者融合在一起，因为现代国家在形式上垄断了军事暴力手段。正如第十二章和第二十一章将要显示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结束军事权力组织的自主性，但是却通过形式上属于国家的各种组织改造了军事权力。因此，这一章将把军事权力放在更广阔的关于政治权力的讨论中来考察。

我将回顾五种流行的国家理论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概念。然后，我将分成三个阶段来阐释我自己的理论。我将首先提出一个国家的“制度”定义，力求确定现代国家的许多制度特征。然后为了概括这些复杂情况，我将进行一种“功能”分析，提出一种关于国家功能的多形态观。我确信，现代国家(在本卷的时空范围内)“定型”为几种主要形式。由于其他三种社会权力来源的不同影响，现代国家分别形成资本主义型、道德—意识形态型和军国主义型的国家。由于国内政治斗争的不同影响，它们分别落定在两个轨迹的不同点上。一个轨迹是“代议制”，在这一时期从专制君主制发展到政党民主制；另一个轨迹是“民族性”(national)，包括从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到松散的联邦制。尽管现代国家大多具有弥散性，但它们也最终具有家长制性质，制约着性别和家庭关系。最后，我将讨论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以至于可以说，某种或几种成形过程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一般特点。

五种国家理论

通常人们把国家理论分为三种：阶级论的、多元论的和精英论的(有时被称作国家主义的或管理主义的)(Alford and Friedland 1985)。因为精英主义类似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以我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讨论。但是我把精英理论分成两种。这两种关于国家自主性各有其独特的观念。我把这两种分别称为“真正的精英主义”和“制度国家主义”。另外，我把许多经验研究所暗含的理论当作第五种，称之为“混杂”(cock-up 或 foul-up)理论*。我将从这五种理论，尤其是制度国家主义中汲取营养。

大部分阶级理论都属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倾向于把国家还原到经济权力关系。国家是为经济生产方式和阶级服务的。现代国家是由两个阶段的政治化的阶级斗争决定的，先是封建领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然后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理论应用于现代西方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它认定，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说，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在漫长的19世纪所讨论的五个主要国家，要么已经，要么正在迅速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阶级论的弊病在于，它把这一点看作是它们的唯一的基本性质。诚然，马克思有时似乎谈到国家也包含着其他权力。我将在第九章讨论他所承认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具有的相当有限的自主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国家仅有相对的自主性：归根结底国家服务于资本积累和阶级调整。马克思主义者也添加了什么“历史偶然性”和“局势”等，但很少把这些东西上升为理论。这些东西仅仅添加在经验层面(例如 Wolfe 于 1977 年发表的现代国家历史论著)。尽管比起单纯地用阶级来解释，阶级+偶

* cock-up 是英式英语的表述，foul-up 是美式英语的表述。——译者注

然性显示了更多的经验敏锐性，但这并没有使理论发生根本改变。

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都否认所谓的经济还原论(reductionism)，但当他们论述国家时就原形毕露了。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8，pp.18—22)、杰索普(Jessop，1982)以及奥菲和龙格(Offe and Ronge，1982，pp.1—2)都声称，国家只能根据其与具体生产方式的关系来界定——他们都说，“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可行的概念，而一般抽象的“国家”概念则毫无意义。以这种方式界定“国家”的人考虑的仅仅是阶级关系，如泽特林(Zeitlin，1980，p.15)认为：“‘国家’这一概念是用以描述合法的阶级宰制的集中而有组织的手段。”近年来，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那么坚决了。杰索普(1990)现在强调政治中的“偶然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仍然带有过于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资本家阶级从本质上看是在追求“价值形式”，但也会有其他的积累计划(我在本卷中也将强调这一点)。支配阶级怀有“霸权计划”，为此他们会组织跨阶级的联盟，有时甚至还会追求非经济目标，如提高军事权力或振兴道德。但是他在理论上依然只考虑阶级，然后对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相对自主性、局势或偶然性，但他们在国家理论上提供的始终是还原论观点。本书则试图有所改进。

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机遇问题越来越悲观，因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持“工具观”或“结构观”。要么把现代国家公务人员看作资本家阶级的直接工具(Miliband，1969)，要么认为他们的功能是在结构上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Poulantzas，1973)。很少有社会学家会把“米利班德—普兰查斯争论”当作国家理论的重大争论，因为从其他几种理论的角度看，这一争论不过是局限于极其狭窄的领域。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国家是帮助资本积累和调整阶级斗争，甚至有时代表了那些局部利益的资本家来损害一般资本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争论，有关综述可见 Jessop，1977，1982)。这些功能“要求”极大地扩展阿尔杜塞(Althusser)所说的“压迫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警察、福

利机构、教育、大众媒体等等。国家不是一个运作者，而是一个场所，阶级和阶级的“派别”或“部分”(Zeitlin, 1980, 1984)在那里组织起来。但实际上，国家既是一个场所，也是一个运作者。

持较乐观态度的阶级理论家强调，资本主义仍然蕴涵着矛盾和阶级斗争，只不过这些都政治化了，转移到国家层面，表现为“国家的财政危机”(O'Connor, 1973)，“合法化危机”(Habermas, 1976)或“危机管理”(Offe, 1972, 1974; Offe and Ronge, 1982)。奥菲特别承认，国家也变成一个运作者，并因此导致了它在通过发展福利计划来调和阶级斗争时其本身的制度利益同资本主义积累运动的矛盾，因为后者始终想颠覆这种福利计划和缩减国家开支。阶级理论也派生出一个经验主义的激进学派，尤其是以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56)和多姆霍夫(Domhoff, 1978, 1990)为代表。他们认为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被权力精英和阶级派别所盘踞的各种机构和部门组合成的。除了这些激进派外，多数阶级理论家认为国家是消极的和统一的：它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政治场所。国家—社会关系构成了一个系统：国家位于由经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中心，它复制了这些生产关系的统一性以及它们的制度性矛盾。因此，归根结底，现代西方国家是由一种结晶过程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与力求解释一切国家的阶级理论不同，多元主义理论只声称解释现代民主国家。多元主义是自由民主制(尤其是美国民主制)对自身的看法。正如本迪克斯的一部著作的书名所提示的，现代化使政治权力“从国王转向人民”(Bendix, 1978)。达尔(Dahl)指出，这包含着两个进程：(1)代表社会多种利益集团的政党和压力集团之间的制度化“较量”的出现；(2)人民“参与”这种较量的范围扩大。较量和参与结合起来，产生了真正的民主制(达尔称之为“多头政治”)。正如达尔指出的，因为这种较量在西方出现得较早，而当时参与极其有限，因此本书论及的这段历史就更具有危机性。我把达尔所说的较量称作“政党民主制”。对于多元论者来说，政党民主制的日益扩大乃是最终决定着

多数现代西方国家的结晶过程。

通过政党民主制，国家最终代表了公民个人的利益。阶级可以视为政党背后最重要的利益集团(Lipset, 1959)或仅仅是各种对抗性利益集团的一种类型，而这些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可以是经济部门，宗教群体、语言群体和种族群体，也可以是地区、性别、年龄等等)。极少数多元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利益集团拥有同样的权力或政党民主制能实现完全的政治平等。但是多数人则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所产生的竞争和参与，足以保证政府受到多种相互竞争的和积极应对的精英集团的制约，而不会仅仅落入一个精英集团或一个支配阶级之手。达尔认为，权力不平等不是累积性的，而是不断地被打破(1956, p.333; 1961, pp.85—6; 1977)。

多元论正确地认识到政党民主制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尽管它可能夸大了"民主制"的现代国家现在最终的结果)。它也认识到，对于社会来讲，除了阶级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它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尽管它提出一种更复杂的国家，但是它与阶级论一样最终陷入归约论和功能论。它不认为国家有任何自主的权力——国家依然是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运作者；政党和压力集团的政治是内聚性的，集中于对国家的控制。其次，它认为阶级、部门、宗教、地区等等在竞争中是相似的和体系化的。这也与阶级论一样，国家被视为统一的和系统化的。政府和多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民主的功能系统。多种利益集团所拥有的权力大小是与其选民的力量成正比的。这些势力合成了一个整体，即"社会"。民主政府反映了整个"社会"及其"需求"。

在伊斯顿(Easton, 1965, p.56)看来，"政治系统"是"一个社会中权威性地分配价值的最广泛的行为系统"。"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政体"(polity)、"政治群体"(political community)或"政府"(government)都具有统一性(coherence)。多元主义者避免使用"国家"这个词，可能是因为这个词更接近于德语的"权力"一词。其实，选择哪个词都一

样；我使用最短的词：国家(state)。无论多元主义者使用哪个词，他们其实都赞同普兰查斯的功能主义见解：国家是社会的一个“统一因素”。只不过多元主义者的社会观与他不同。我们将会看到，无论国家还是社会通常都不是统一的。

相反，第三个学派，即“精英论者”或“国家主义者”关注的是国家所拥有的自主权力。但是应该指出，他们有两种不同的自主观。如果其中一种或两者没有包含着相当多的真理，那就与我把政治权力当作社会权力的第四个来源毫无关系了。尽管二者都包含着一些真理，但有一种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精英理论是在20世纪初兴起的。奥本海默(1975)强调在“政治阶级”的历史中权力日益增强。莫斯卡(Mosca, 1939)把政治权力限定在集中制组织中。他正确地指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和统一的少数总能击败和控制无组织的大众。但是，莫斯卡和帕累托(Pareto)强调，政治精英的权力起源于别的地方，即市民社会。因此，这种权力最终会受到从那里兴起的反对派精英的威胁。新兴精英集团控制了其他(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军事的)权力资源，就能推翻衰落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机构中组织起自己的权力。因此，古典的精英论者把政治权力看作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看法十分正确。

但是，在1980年前后，社会学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上。西达·斯科克波(1979, pp.27, 29—30；参见1985)把国家定义为“一组以一个行政权威为首并在某种程度上由行政权威加以协调的行政管理、治安和军事组织……一个自主结构——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和利益的结构”。她试图用“国家中心”理论来修正“社会中心”的多元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斯科克波本人和她的批评者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说法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自主性观点。我分别称之为“真正的精英主义”和“制度国家主义”。

真正的精英主义强调国家精英支配社会的个别权力。因此，国家被视为运作者。克拉斯纳(Krasner, 1984, p.224)明确地说：“国家应

被视为独立的运作者。”列维(Levi, 1988, pp.2—9)也表示：“统治者在统治着。”她认为，国家是有理性的运作者，极力扩大自己的利益，变成市民社会的“掠夺者”——这是典型的美国人观点。凯泽和赫克特(Kiser and Hechter, 1991)提出了一种国家的“理性选择”模式，认为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有理性的运作者。波吉(Poggi, 1990, pp.97—99, 120—127)承认国家是“服务性的”(即服务于多种利益)和“有偏袒的”(即偏袒某些阶级)，但同时也认为国家从根本上是“侵略性的”，恪守“它们自身的”利益。真正的精英主义者则颠倒了阶级论和多元论，认为个别权力现在主要是从国家向外扩散，而不是向国家内扩散。

精英理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强调了国家的一个方面，即国家是处于一个国家世界，国家是根据地缘政治“采取行动”的。几乎所有的阶级论者和多元论者都居然对此保持沉默，真令人无法解释(Shaw 1984 和 1988 年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沉默中是个令人尊敬的例外；米尔斯和多姆霍夫在激进派中也是如此)。少数谈论国际关系的阶级论者往往把国家关系归结为扩大到全球的生产关系和阶级——这种分析的最近表现就是世界体系理论。反之，受真正精英论影响的理论家们则强调地缘政治、战争和军事财政(Giddens, 1985; Levi, 1988; Tilly, 1990)。

精英论者得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支持。现实主义者尽管对国家的内部结构几乎毫无兴趣，但他们认为国家是对自己的领土享有“主权”的、统一的权力运作者。“国家领导人”(statesmen)被授权在国际上代表整个“民族”利益。但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更高的理性或规范的和谐，而只有个别权力的实施、无规范状态、无政府状态(Poggi, 1990, pp.23—25)。因此，国家和国家领导人所制定的对外政策乃是系统地、“现实主义地”谋求“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反对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安全是第一位的——毫不放松的防卫加上不断的侵略。摩根索(Morgenthau, 1978, p.42)宣布：“全部历史表明，凡是在国际政治中表现活跃的民族都始终准备从事战争形

式的有组织暴力，或积极卷入这种暴力，或正在从这种暴力中恢复过来。”因此，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内部的统一性、零和博弈、无规范状态以及对外战争。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不论是否现实主义者，都强调建立国际规范的困难。他们往往把现有的规范归因于“霸权”或强权(例如 Lipson，1985)或民族利益的“现实主义”算计，如均势体系。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一致只能是暂时的，而且是由利益决定的。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派观点是批评现实主义的，而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指责现实主义者忽视全球性的超民族的和超政府的权力网络。这些权力网络切割了国家的主权，降低了它们的凝聚力，提供了另外一种规范即世界秩序的来源(Keohane and Nye，1977，pp.23—37)。因为相互依赖理论的提倡者们关注的是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很少论及早先各世纪。他们似乎赞成现实主义者的这样一种观点，即过去通常是均势或霸权支配的时代。罗斯克兰斯(Rosecrance，1986)是一个例外。他认为，历史上一直有不同程度的重商国家和帝制国家，两者体现了不同的规范体系。我在第八章和第二十一章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在多重权力运作者文明中，如欧洲或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关系存在于一种更广阔的、包含着超民族和超政府权力网络与规范的文明中。

现实主义和相互依赖理论的拥护者们也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盲点：他们都只关注温和的和平主义国际规范是如何产生的。相互依赖理论家们认为，当代的合作规范反映了多元物质利益的共同点；现实主义者则认为规范是国家利益的综合权衡产物。但是许多超国家或超政府的规范和意识形态并不是温和的，或者不是反映在市场上和平地表现出来的物质利益。它们可能体现了压迫阶级以及其他权力运作者的利益，可能会以更高理想的名义鼓动战争，甚至可能把战争本身加以理想化。规范结合体可能导致无序。无序很可能不是由于缺乏一种国际体制，而恰恰是由于有一种国际体制。现实主义者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例如，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历史叙述中，平静、理性的均势或霸权时期几

次被激烈动荡时期打破，如1772—1815年和1914—1945年。但是摩根索不想解释这些中断时期。因为他早就把意识形态描述成利益的合法化手段或“伪装”，因此他没有任何理论概念可以用于解释那样一些时期，即外交和战争本身都深深地浸透着激烈的革命或反动意识形态的时期(1978，pp.92—103，226—228)。我认为，利益权衡总是受到各种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权力来源的影响，总是涉及到从复杂的依附关系到阶级和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各种规范——这些规范有时是和平的，有时则是暴烈的。

现实主义和真正的精英主义往往也与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国家的统一性、系统性——只不过是把国家看作一个精英集团运作者。克拉斯纳认为，国家精英集团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性比对内政策方面大，相对“隔离”于国内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压力。国家被说成是“一组角色和机构，具有特殊的、脱离和有别于任何特定集团利益的冲动、义务和目标”(1978：10—11)。我在本书中将使用克拉斯纳的这个“隔离”(insulation)比喻，同时修正他的结论。因为国家领导人也具有国家本身之外的社会身份，而且他们也不是统一的。

首先，正如杰索普(1990)指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资源几乎完全不能满足雄心勃勃的国家主义纲领。国家精英集团需要与社会中“在野”的权势集团结盟。这些联盟不是通常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之间的联盟。劳曼和诺克(Laumann and Knoke，1987)指出，在当代美国，由多重组织构成的网络通常穿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形式上的分野。国家运作者通常也是“平民”，具有社会身份。多姆霍夫(1990，pp.107—152)指出，现代美国的多数“国家领导人”出自大企业和律师事务所。他们构成了一个“政党”，更多地“代表”着一个国际资本家阶级的阶层，而不是仅仅代表美国。

所有的阶级理论家都强调国家领导人的支配阶级身份和所代表的支配阶级利益。作如一个社会学家，我相信社会身份不能简单地简化为阶级，因此，在本书中我将拓宽他们的论点。尽管我赞同克拉斯纳的

观点，并将证明19世纪的国家领导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隔离于平民和支配阶级，但是我认为他们并不能与之完全隔离，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许多社会身份。他们都是男性白人，基本上出自旧体制，来自主流的宗教和语言团体。所有这些社会身份都影响着他们的对外政策，决定着使他们与其他国内外权力运作者联合或分裂的规范，对国际间的暴力冲突起着抑制或加剧的作用。

其次，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统一的运作者。对于“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这种说法，基奥恩和奈(Keohane and Nye，1977，p.34)追问：“是什么样的自己，是什么利益？”因为国家精英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有些温和的国家主义学者承认这一点。梯利(1990，pp.33—34)就承认，国家的物化最终是站不住脚的，他承认这也是由于他对社会阶级的忽视。他表示，原来的这些说法只是实用主义的和为了解释上的简化。斯科克波也认为，精英的权力和统一性是变量。政治体制起着决定作用。民主政体禁止可能导致权威主义政体的精英自主性。她对近代早期革命的分析(1979)是以国家自主性为中心的，其理由很充分，因为那是基于绝对君主制的权力。在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君主权力通常几乎接近于真正精英主义意义上的国家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不会是绝对的。但是，斯科克波最近与别人合写的论述20世纪福利纲领的著作(Weir and Skocpol，1985)则把专业化官僚中的精英自主性视为一种更隐蔽的、更不明确的自主性。在特林伯格(Trimberger)关于发展中国家“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分析(1978)中，国家精英集团也有所不同：它是行政官员与军官的一种革命联盟。因此，国家精英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能是不统一的——尤其是在我们所讨论的时期，军人、官员和政党是与国家并存。

但是，斯科克波似乎也有些不自觉地倾向于对国家自主性观点作一种更根本的修正。让我来引证她的一个说法：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和利益的结构”。“利益”显然是运作者的特性——这是真正精英主义理论的一种表述——但是，“逻辑”就不一定涉及任何运作者或精

英。国家自主性可能与精英自主性没有太大关联，而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自律逻辑相关。这些特定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在早先的权力斗争中产生的，然后变得制度化了，对后来的权力斗争起着制约作用。斯科克波及其合作者(Weir et al.，1988，pp.1—121)特别强调美国联邦主义和政党赞助制度在19世纪是如何制度化的，然后又如何阻碍美国国家权力的发展，尤其在福利政策领域。尽管斯科克波及其合作者坚持说国家精英(官员、技术官员和政党领袖)拥有某些运作者的自主性，但他们更关注国家制度对一切政治运作者的主动影响。联邦主义、政党、有没有内阁制政府以及我们称之为国家“体制”的其他许多特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构成了权力关系。劳曼和诺克(1987)提供了一个经验主义色彩更浓的制度研究。他们考察了国家部门和压力集团之间互动的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当代美国国家是由复杂的“组织”网络构成的。

这是一种“国家权力”，几乎谈不上什么“精英权力”，因为它主要是集体权力而不是个别权力。它主要影响着政治化运作者的合作方式，而不太涉及谁对谁发号施令。这种理论主要不是为了预测国家精英支配市民社会运作者的状况，而主要是为了说明所有的运作者都受到现存政治制度的制约。因为国家本质上是变动的社会关系被权威加以制度化的途径，所以国家更容易用一种“政治外套”(political lag)理论来解释。国家不仅把现存的社会冲突加以制度化，更是把对新冲突具有影响的历史冲突加以制度化——国家从一种被动消极的场所(马克思主义和多元论的观点)不是变成运作者(真正精英论的观点)而是变成一种积极活跃的场所。本书第二十章将从这一观点来论证西方国家。

我把这种探讨国家权力的方式称作“制度国家主义”，而且把它纳入我本人的更具有包容型的“组织唯物主义”之中。因为在这个时期一种真正大型的政治制度组合——民族国家——兴起了，这种理论将在我们的讨论中显现出相当强的解释力。真正的精英主义可能适用于解释最具有权威主义性质的和最专制的国家，例如纳粹国家或斯大林主义国家(尽管在这种国家那种精英一致性的假设也必须有所松动)。甚至

在现在的某些国家，运用真正的精英主义也有助于解释绝对主义的和权威主义的君主制。但是总体上说，我将更多地运用制度国家主义来鉴别主要的国家自主方式。

很显然，有许多学者是不能严格地纳入以上这些理论学派的。有些学者采用了两种甚至更多的理论。鲁谢迈耶和埃文斯(Rueschemeyer and Evans，1985)认为，资本主义给国家设置了界限，但是精英还是有某种自主权。劳曼和诺克(1987)则吸收了以上所说的四种理论。达尔早先提出多元主义时承认，法人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集中权力已经威胁到民主。凡是具有现实敏感性的人——如达尔、多姆霍夫、奥菲或斯科克波——都会看到，这三种学派关于国家的论述各有道理：国家既是运作者又是场所；这些场所有很多的房屋，有各自不同的自主性和凝聚力，但是都会对来自各种压力作出反应，这些压力来自资本主义、其他的重要权力运作者以及更普遍表达出来的社会需求。

但是，许多关于国家行政机构的实证研究不太重视上述理论所强调的那些因素——国家精英集团、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社会整体的利益。它们把国家描述为混乱的、无理性的、各自为政的、不时地受到资本家和其他利益集团无规律的压力。用显微镜来看，国家“巴尔干化了”，分解成许多相互竞争的部门和派系(Alford and Friedland，1985，pp.202—222；Rueschemeyer and Evans，1985)。例如，帕吉特对美国房屋和城市发展部的预算作了剖析(Padgett，1981)，在这里面没有看到国家这个统一的运作因素，而是看到许多各自为政的行政部门。再加上外交政策，情况就显得更加混乱不堪。艾伯提尼(Albertini，1952—1957)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交状况作了长期研究。他发现，各国都陷入了各种争端，有的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争端，有的是国内事务争端，这些争端是以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是现实主义—精英理论所强调的内聚力或阶级论和多元论都不能解释的。因此，艾布拉姆斯(Abrams，1988，p.79)说，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神话：“国家是一种实际上的分裂状态的统一象征……各种政治建制的活动……显然不可

能显示出统一性——正如它们常常发现它们无法作为一个更统一的凝聚力量活动。”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第五种理论，用一种传统英语说法：国家不是一种共谋，而是“混杂物”(cock-up)。在美式英语里则是：国家不是工具，而是“混杂物”(foul-up)。

大多数社会学家会对“混杂”理论不屑一顾。他们认为，社会生活是有规律、有秩序的。很显然，有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更有秩序，但是，难道国家的失误也与国家的战略一样具有某种连贯性吗？诚然，从某种根本意义上说，现代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实行的是“政党民主”(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和多元论者所说的)。它们也包含着君主制和官僚制的精英(正如精英论者所指出的)。它们是大大小小的强权，或具有世俗性或具有宗教性，或是中央集权的或是联邦制的，或者带有父权主义色彩或者赞同男女平等。这些国家被模式化了。鉴于系统论有泛滥之势，我们怎能只谈国家模式而不研究具体的国家？我们是否必须像劳曼和诺克(1987)那样抛弃实质理论，完全根据现代政治势力的密集组织网络分布图的形式特征来建构我们的理论？尽管他们的组织理论有其长处，他们的研究也与我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的理论有时不是有见木不见林之弊吗？美国的国家确实处于某种“制高点”，在宏观层次上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它的基本制度是联邦制，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我无需根据这种复杂的组织权力网络图就能猜出这些。实际上，由于这个组织网络很少呈现为资本主义的防护壁垒，因此劳曼和诺克(1987，pp.383—386)就从根本上否认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就重复了多元主义的错误：把公开的政治争论和政治组织这一平台当作全部政治平台。

我自己的更充实的组织唯物主义观点，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我要确定政治建制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和多元主义都是还原论，都不太注意政治特殊性。真正的精英—现实主义则把那些特殊性当作异常现象，夸大国家运作的力量和凝聚力。“混杂”理论则大量地制造各种

特殊性。在开始确认政治特点的一般模式时，我们最好从马克斯·韦伯开始。韦伯有时被人说成是真正的精英论者，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韦伯确实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国家理论，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一些概念，我们可以用来建构这样一个理论。进行制度研究，可能会制造组织的复杂性，劳曼和诺克就是如此(他们使用了大量复杂的数据，比我研究历史上的国家时想运用的资料要多得多)。因此，其次，我打算运用我的"高级国家成型"多样化理论。

韦伯的政治概念：一种制度分析

韦伯首先是一个研究社会建制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家。他在讨论国家问题时，首先把国家的制度性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政治权力"、"国家"和"现代国家"。在第一阶段，有政治权力，但没有国家：

> 在一个给定的"地域"里，由于行政班子使用暴力以此相威胁，使得一个"统治团体"的存在和秩序持续地获得保证，那么这个团体就可以称之为"政治团体"。(Weber，1978，Ⅰ，pp.54—56)

因此政治权力本质上是地域性的，它是由一个专业化的(暗含着中央集权的)班子强行推行的。接着"国家"在第二阶段出现了。

> 当行政班子成功地维持了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来贯彻自己的命令时，这种能够持续运作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就将被称为"国家"。(Weber，1978，Ⅰ，pp.54—56)

关于国家的这个制度性定义受到广泛的认同(MacIver，1962，p.22；Eisenstadt，1969，p.5；Tilly，1975，p.27；Rueschemeyer and Evans，

1985, p.47; Poggi 1990, Chapters 1 and 2)。我有一点异议：历史上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暴力手段，甚至在现代国家里，暴力手段基本上独立于国家(的其他部分)之外。

因此，在接受韦伯影响的同时，我选择用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联系来提出我的定义：

1. 国家是一组分工合作的制度和人员；

2. 具有向心性，即与中心有双向交流的政治关系；

3. 具有明确的地域；

4. 借助某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使某种程度的权威，确保令行禁止。

这是从制度角度而不是从功能角度对国家下的定义。其中没有提到国家做些什么事情。诚然，国家会使用暴力，但是只是当作维持自身统治的手段，其本身并没有被赋予什么内容。在我们所讨论的各种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及某些现实主义者从功能角度界定国家：国家的功能是制造出主要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满足对疆域安全的需求(现实主义观点)。但是国家承担的功能是很多的。虽然国家确实有阶级功能和安全功能，但是国家也调节各种争端，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群体以及其他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分配资源，把某些建制神圣化，把另外一些建制世俗化。国家还做许多事情。各种不同的国家以各种不同的热忱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因此很难从功能角度来界定国家。后面我将进行一项功能分析，确认不同国家的功能定型过程。

按照我上面提出的国家定义，可以得出所有的国家共有的四个政治制度特征：

1. 国家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实现中央集权的。在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方面，它所调动的资源与此不同。诚然，它必须依靠那些分布在它之外的资源。但是国家拥有另外一种独特的权力资源：它本身天然地就会形成对一块明确疆域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说，把这块疆域上的权力集中起来。

2. 国家包含着两种二元关系：它既是地方又是人群，既有中心又有疆域。政治权力既是"国家主义的"，掌握在中心的精英和机构手中，同时又是由中心的人员与机构同全部疆域的人员与机构之间的"党派"关系构成的。因此，国家将会呈现为两类形式，一类形式主要是由外部社会造就的，另一类是它自身的政治程序所固有的。

3. 国家有不同的机构，为其地域内的不同利益集团担负不同的功能。然而，不管国家拥有怎样的中央集权、怎样的个人理性(private rationality)，它仍是不纯的。它的政治肌体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在不同权力网络的渗透之下，因此，**国家不需要结果上的统一性乃至一致性**，除非社会有这样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而我的社会模式把社会看成是交错重叠的权力网络，不存在统一性和一致性。

4. 如果将国家定义为一定的地域，那就进一步意味着此国和彼国之间的一系列"政治"关系，即**地缘政治**。韦伯通过他的著作，尤其当他论述自己的德意志帝国时，强调地缘政治有助于国内政治的形成。柯林斯(Collins，1986，p.145)认为，韦伯之观点是"政治的运作方式是由外及里"，虽然他有时强调与此相反的结论。政治和地缘政治缠绕在一起，因此，研究其中一个时，不可偏废另一个。

完成解释韦伯的第三个阶段，即"现代国家"阶段之后，我应该如下扩充有关"现代国家"的观点：

> "现代国家"具有一种行政、法律秩序，且后者随立法(legislation)而变，同时，立法也决定了行政人员——他们也一样受到制度的约束——的有组织行为。这一由秩序组成的体系要求对国家的组成成员、公民——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拥有令行禁止的权威。因此，"现代国家"是具有明确地域的强制性组织。

这样一来，现代国家将更大范围内例行的、正式的、合理化的

(rationalized)制度加于其公民和地域上。它既用法律，也用行政贯穿其地域[体现了韦伯所谓的“理性—法制”(rational-legal)统治]，而先前的国家却做不到。梯利(Tilly 1990，p.103—116)正确地称之为“直接”统治，以区别先前国家所体现的非直接统治。它不仅关涉到国家日益增强的对社会的统治，相反地，它也关涉“公民”和“政党”渗透现代国家。国家已然成为**民族国家**，以代表公民们的内在群体(community)意识，以及强调他们与他国公民们之间的外在利益的不同。因此，韦伯认为，对绝大部分历史上有名的国家而言，“合法性”问题即统治者和他的人员之间的凝聚性问题，而在现代国家，它主要关涉统治者、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韦伯有时选取现代国家的一个制度(institution)：“独裁式官僚政治”(monocratic bureaucracy)即集权于一人之下的官僚政治，作格外的强调，并有以下著名的论断：

> 从单纯技术的角度而言，独裁式官僚政治的种种形式能取得最高程度的效率，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上是最理性的(rational)对人类施加威权的手段。比起其他任何手段，它在缜密性、稳定性、规训的严厉和可靠性方面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它使得组织头目们对结果(results)尤其具备高度的可计算(calculability)能力……实际上，在所有的领域，组织的现代形式的发展，无非就是官僚行政的发展和不断传播……显而易见的是，独裁式官僚政治的发展植根于现代西方国家……而对大众行政的需要使得它在今天变得全然不可或缺。在行政的领域里，选择只存在于，要么做这个领域的浮泛涉猎者，要么做官僚行政者。

韦伯看到，官僚化支配了整个欧洲。他不但认为德国是官僚化的先驱，而且也竭力证明，两个看起来完全非官僚化的国家——沙皇俄国和联邦党治下的美国——同样处在官僚化的控制之下。在存在争夺政

治权威的地方，就存在独裁式官僚政治，而民主政体因为将责任进行中央集中，无疑只会更增强独裁式官僚政治。韦伯对这一“不可抗拒的进攻”表示出极大的苦恼，他颇富修辞味地问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保有任何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的残余”？然后又问道：“在这种背离心灵的官僚行政中，这种官僚理想型对生活的全面控制中，保持一份人性，我们该怎样反击这一机器呢？”(1978, Ⅱ, p. 1403; Beetham, 1985, p.81)。

在某种程度上，韦伯似乎意识到他论断的无力，并沉思自问：现代化是否增强了官僚政治的**权力**——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权力”一词在这里突然变成了斜体。接着，他作了肯定性的回答：“羽翼已成的官僚政治的权力是巨大的，在通常情况下是压倒性的。政治的“主人”发现，他们在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员时，其情形类似于一个“半瓶子醋”面对一个专家(1978, Ⅱ, p.969—1003，以及摘自 p.991；有关的出色评述见 Beetham, 1985, pp.67—72)。

在这里，当韦伯突然肯定有关官僚政治的真正精英理论时，就犯了一个大错。因为，官老爷们(bureaucrats)很少宰治现代国家，同时，国家行政也很少是独裁式的(见第十三章)。对此，既有概念上的反对，也有经验上的反对。

奇怪的是，从韦伯对他自己的德意志帝国的剖析中，就能找到经验上的反对(例子)。韦伯从德意志帝国不仅鉴别出一个强大的官僚体制，而且鉴别出三个不同的政治制度(institutions)，即官僚体制、二元政治首长(皇帝和执政)和多政党制(尤其是容克政党)。韦伯并没有将“政党”这一术语局限于那些为竞选而互相攻击的政治政党，而是将它定义为旨在获取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任何集体性团体。正像第九章所显示的那样，韦伯断言，在不同的时期，以上三个运作者支配了帝国。然而，请注意，政党有别于另外两个运作者。官僚体制和行政首长(executive)与真正的精英论是相容的。政党权力源自中央和地域之间的双向关系，容克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却被包容进了军事及其他关键机

构。韦伯的著作给了政党以最大的重视，是政党，而不是官僚体制或行政首长，组成了他的三分模式中的第三个运作者，该三分模式由社会分层、阶级和不同的社会身份集团所构成。

尽管韦伯没有针对现代国家的完整理论，但他的思想有别于先前所述的国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和多元论的赞成者恰恰相反，韦伯不是一个还原主义者，他认为国家有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不同于现实主义(realism)和真正的精英论者，他并没有将权力仅仅赋予核心精英们，也不认为他们必然就是凝成一团的。劳曼和诺克 (Lauman and Knock, 1987, p.380)与其他许多现代学者一道认为，韦伯是现实精英论者，他们想当然地假定，韦伯忽视了公私之间界限的模糊，并因此而批评他。然而，当韦伯分析政党时，他做的恰恰不是这样。政治权力自然而然是一种中央集中式的资源，一种中心和地域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及一种此国和彼国之间的关系。韦伯并未将这些制度性因素铸成协调的国家理论，然而，通过纠正他的主要概念上的混乱，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韦伯的观察混淆了有关国家力量的两个概念，即他所表述的“渗透”和“权力”。当韦伯说官僚政治增强了渗透时是对的，然而他的错误之处在于说它增强了权力。韦伯混淆了集体性基础权力和个别的专制权力。前者被制度国家理论所强调，而后者则被真正的精英论所强调。

专制权力即针对市民社会的国家个别权力，它源自国家精英的一系列运作，而这些运作不需要与市民社会群体作例行公事式的协商；它也同样源自如下事实：只有国家是天性地在一定区域内中央集权的，国家具备有益的社会功能，这些社会功能要求具备从此种组织形式到彼种基于不同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权力运作者——这些运作者自己却不能胜任履行这些职能。起初居于国内的这些权力运作者，在就向谁运作其权力时，有一定程度的个人空间和自由——程度大小取决于市民社会中的权力运作者的能力，即通过代表集会(representative assembles)、正式的政党和宫廷小党派(court factions)等等来

组织自己的能力。作为结果，他们要么压制了来自中央政治的权力(后面将对此进行讨论)，要么削弱了国家权力，从而在外部增强了超民族关系。拥有专制权力的国家，要么成为真正精英论所强调的自律的行为者，要么因为其内部的同质性，成为多元的，或是混乱的自律行为者。

基础性(infrastructural)权力即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它或是专制的，或是非专制的，而制度性能力则旨在贯穿其地域，以及逻辑上贯彻其命令。基础权力是集体权力，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它通过国家基础来协调社会生活。正是这种基础权力将国家确定为一系列中心的、放射的制度，并以此贯穿其地域。韦伯含蓄地指出，由于现代国家增强了其基础权力，后者增强了针对社会的专制权力。但是我认为，也不见得总是这样。基础权力是一个双向车道，正像马克思主义者和多元论者所强调的，它使得市民社会的政党能控制国家。增强了的基础权力并不一定增强或减少个别的、专制的权力。

然而，行之有效的基础权力确实会增强集体性国家权力。因为社会生活在此时越来越通过国家制度来协调，这样，基础权力将越来越建构社会生活，并增强社会生活的“地域内集中”或“归化”。从基础上讲，越有权力的国家，越能在它的“国家”疆域之内，或沿着中心和地域间的权力放射线，禁闭更多的社会生活。基础权力增强了国家的和地缘政治的集体权力，而以牺牲地方—区域的以及超民族的集体权力为代价，同时，却留下了谁控制基础权力这类分配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制度国家主义的解释性权力在现代国家中得到增强，原因就在于大为增强的现代国家的集体、基础权力。

表 3.1　国家权力的两个维度

专制权力	基础权力	
	低	高
低	封建制的	官僚政治的—民主制的
高	帝国的/绝对主义王权的	威权主义的

如表3.1所示，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结合成为四种理想型。

封建主义国家结合了很少的专制及基础权力，它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到社会生活。在它自己的私人领域，它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在社会领域里，却几乎没有权力。中世纪的国王拥有国家，国家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衣橱和给他带来收入的私产，他在国家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在社会以外，却力不从心。他的命令是非直接的，取决于自主的贵族、教会，以及其他法人实体的基础结构；他的军队(的忠诚度)取决于上述贵族、教会等等的分摊，同时，后者就有可能削弱他的统治。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欧洲绝对主义王权就接近上表中的第二个理想型，它们都拥有断然的专制权力，而少有基础权力；它们的军队令人生畏，然而，由于将军们的权力倾轧，它们的军队倾向于分裂。现代西方自由一官僚政治制国家接近第三个理想型，它拥有广大的基础结构，且这一基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要么被资本家，要么被民主化程序、步骤所控制(至此，我还没有论述是二者中的谁)。现代威权主义国家——顶峰时期的苏联——同时拥有专制权力和实质性的基础结构(尽管它们的凝聚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

16世纪以来，倾向于更强专制主义的君主专制勃兴于一时，造成了代议制的不稳定和广泛的政治冲突。但是，由于国家参与了第一章所述的一般集体权力的指数级增长，其基础权力在两厢情愿中也得到的长足的发展。如表3.1所示，现代国家的非寻常的力量是基础的(infrastructural)。然而，农耕国家甚至都不知道它的下属价值几何，更遑论向他们精确地收税了；他们不懂征收收入税，只知道粗估这些财富(如：房屋和土地的大小，市场上商品卖多少钱，等等)，同时，须依赖自主的地方贵族去榨取它。然而，今天，美国和英国能“从源头上”向我们的收入和财产收税——他们知道我大约价值几何——甚至无需我动手，他们就能做到，以至于不论谁控制了它们，都将拥有比以往农耕国家对我先辈而言更多的、针对我的无限权力。正像亨廷顿(Huntington 1968, p.1)所观察到的，英国、美国以及苏联(1991年前)若与历史上著

名的国家相比，或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那么，它们三者彼此之间更相像——“政府正统治着”，实际上，(不管)是运作内阁，还是控制总统选举，或作出政治局的(Politburo)决定，也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们都拥有比历史上著名的先驱更多的权力动员能力。

但是，得到扩展的不止是国家基础。集体性权力的后勤发生了革命，它使得所有权力组织的基础渗透能力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市民社会控制国家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现代社会既涵盖了威权主义国家，这种国家能有效地控制它地域内的日常生活(以前没有哪个著名的国家能做到)，也涵盖了通常由市民社会所控制的民主—政党国家(以前只有小型的城市国家能做到)。这样一来，无疑就使表 3.1 左上所示的国家走上了末路——即那些自主的和相当有凝聚力的、(总体上)微弱的、能享有来自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却不能对市民社会行使有效权力(控制)的国家。针对并无权力的自主性(autonomy without power)，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非常紧密的相互渗透。

这就使我们的研究遇上了难题。以这种相互渗透为例，国家从哪里结束？市民社会又从哪里开始？国家不再是小型的、具有个人自由的、有中心的，以及有自身合理性的精英的地区。“它”包含了各种制度，也包含了能从中心伸到各个地区，甚至有时能伸到超民族空间的触角。相反地，市民社会比以往变得更政治化，向外遣出突袭性群体——压力集团和政治政党，进入国家的不同地方并从侧翼以超民族的方式包围它。作为二元的现代政治权力，国家既是地点，又是运作者；既是基础结构，又是专制；既是精英，又是政党，这些二元性都关涉到有其多样权力特征的中心，以及中心—领域之间的关系。“它的”统一性总是存在问题，只有在一个方面“国家”是单数的，即当基础的相互渗透增强时，“国家”倾向于“归化”(naturalize)社会生活。原则上，现代国家的权力并不关涉对社会行使权力的“国家精英”，而是关涉紧张的国家—社会关系，后者在民族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地方的—区域的层面上，或超民族的层面上禁闭社会关系，因此，相比前此

以往的国家，后者使多得多的社会生活政治化及地缘政治化。

在这一章里，由分析韦伯开始，我确定了所有国家共有的制度特征，然后，又确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在这些宽泛的类似点之外，国家和国家之间会大不一样。在下一章里，我将进入细节，列出漫长的19世纪里西方社会的主要制度特征，并以那些与国内政策有关的特征作为开始。

19世纪的政治制度

国内政策

表3.2给出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制度(我将在后面处理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第一(竖)栏列出的是制度(机构)，剩下的四栏列出是由谁来控制它们的——利用来自“被隔离的”或“被嵌入的”这两种不同权力的协助。如果一个国家想成为专制的(就像真正的精英论那样)，它的网络必须与市民社会隔离起来(正像克拉斯纳所认为在外交政策领域所发生的那样)；第二栏列出的是隔离的形式，它使得国家精英能从市民社会的压力和利益中超脱出来。然而，如果国家制度被“嵌进”市民社会，那么，就像阶级和多元理论所强调的，这些国家制度将被控制起来。

但是，全然的专制主义和彻底的隔离似乎并不存在。因为国家既有中心，又是中心和地域之间的关系，其自主性不但要求其主权所及的领土(territorial reach)，而且要求其中心被隔离。最基本的是，国家的资源平台，即能渗透到市民社会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网络——必须从市民社会的控制中隔离出来。然而，这种隔离从未显著过，因为不管国家想增加财政收人，还是想豢养军队，通常都得需要地方的—区域的显要人物的帮助。在这一时期，正像表3.2和真正的精英—现实理论所明确指出的，全然的国家自主性是不大可能的。如果说它成立，是因为预先

表 3.2 19 世纪国家的权力网络

政治制度	专制国家	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国家—市民社会之间的同盟	统治阶级	各种利益集团
最高行政首脑	绝对主义王权，王朝	被嵌入宫廷和旧制度中	被嵌入封建—资本主义的社会中	宪政上被嵌入财产(estates)、议会和法人特权中
法官/司法官—警察	被隔离的王家宫廷	被嵌入法人、合法职业和大学中	被嵌入财产法中	市民公民身份(civil citizenship)(个人的和集体的)
民政(civil administration)	被隔离的王家或官僚制官员集团	被嵌入旧政体、新专业人员和大学中	为资本主义而起作用的(functional for capitalism)	对议会负责的精英管理式(meritocratic)的官僚体制
政党，集会(assemblies)	一党制政体(在这一阶段没有集会)	有限的立法机构(legislature)，隔离并支配(divide and rule)党派寡头政治及宫廷阴谋	1. 基于财产的选举权 2. 对议会主权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限制	政治公民身份
外交	被隔离的"国家领导人"	被嵌入旧政体中	被嵌入有产阶级中	对议会负责
军事	被隔离的特权阶层	被嵌入旧政体和其他特殊主义的集团中	被嵌入有产阶级中，并对民政高级官员(civilian executives)负责	对议会负责
专制权力	高	中等	低	低
国家理论	真正的精英—现实论	制度国家主义论	阶级论	多元论

假设了第一栏中的制度全部被隔离。其实，更有可能的是，有的(制度)被相对隔离，而有的则被嵌进了支配阶级，或被嵌进了多元的权力网络中(参考 Domhoff, 1999, pp.26—28)。这样一来，国家的统一性(凝聚力)比前三个理论流派中任何一个所认为的都要少。国家与其说从整体掌握着隔离(权)和自主性，还不如说这些隔离和自主性是由国家的(不同)部分来掌握的。

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第三栏所列出的“中等程度”的专制权力。国家制度有可能被更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 市民社会权力运作者所掌握，正像韦伯所解释的容克(Junker)党那样。按照他的说法，由于德国君主已经与容克们——它们原本是社会的支配者，而现在，尽管他们仍控制军事和绝大部分民政部门，却在经济权力方面大为削弱——形成了特殊主义的联盟，因此，德国君主从资本家和绝大部分公民那里得到很大的自主性。通过特殊主义的、深入的联盟，政权(regimes)能够从更宽泛的社会势力——阶级论和多元论详述了这些势力——那里赢得一定程度的隔离和自主性。政权在分离和控制(社会势力)，以确保这些特殊主义的部门同盟、政治圈内人(political insiders)的同时，鼓励那些“圈外人”抱着能够进入圈内的希望，以缓解他们的反对。当然，包含在这一同盟中的权力平衡也能从反方向起作用：特殊主义的市民社会群体能有效地“殖民”国家的部分地区，并利用它反击其他的国家精英和更有权力的运作者。例如，美国南部政客曾经有过的、针对代表大会机制的历史性控制，就被嵌进了南部各州的商人—种植园主寡头政治中(Domhoff, 1990, pp.53, 104—105)。第三列则列出了漫长的 19 世纪中主要的、特殊主义的、深嵌的或半隔离的部门同盟。

表 3.2 的第一行表示的是最高行政首脑，即真正精英—现实理论中的“首席模特”，亦是真正精英自主性最重视的。这样一来(就像现

---

* Particularistic 意指利己而排他的，只忠于本党的(独忠的)，或完全忠于某一宗派／政党的，以及富于特征的、私利的等等，它在文中的意义非常丰富，这里取“特殊主义的”作为译法。——译者注

在)，所有的国家宪法都会赋予它们的高级行政官员以一定的权力，尤其在对外政策方面(就像第十二章所显示的)。绝大部分西方行政官员源自王权的绝对主义阶段。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包含了三个真相。其一，绝对主义统治者比立宪君主或共和制(国家)行政首长拥有更多的专制权力，因为正像当代人所相信的，宪法至关重要，它会不同程度地固守国家的自主。其二，在绝对主义王权，或在威权主义君主制中，更多(东西)取决于君主的能力和精力，以及取决于由君主赋予他们大权的首席大臣们。就像历史学家所断言的，一个玛丽亚·特里萨或一个俾斯麦(值得考虑的)，一个路易十六和一个贝特曼(Bethmann)—霍尔维格(可以忽略的)，由于能力不同，他们的表现也大不一样——对一个立宪君主或甚至一个议会制中的首相就更是如此了。其三，世袭君主和他们的家庭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成其为中心和地域间的一种关系，原因乃是他们其实是居于中央的运作者，他们形成一个核心，并出于对权力的苛求将国家精英隔离。

然而，进一步地，出于对社会行使权力的需要，君主还得控制国家制度。在中央，他们可依仗宫廷。廷臣通常都是贵族、高级牧师和军队指挥官，正像阶级理论所指出的，这些廷臣深嵌于支配阶级之中。对此，君主的手段是分而治之，利用血亲和侍从构成的网络来分裂支配阶级，使之分裂成忠于自己的“嫡系”和“外党”，并把后者移除掉。然而，由于社会和国家变得日益普世主义，因此，这种策略会导致君主和宫廷被嵌入旧政体中，即被嵌入君主和旧的有地阶级和高利贷阶级——以及各级已确立的教会和官员集团——之间的、以宫廷为中心的政党同盟中。

旧政体支配了第三列的绝大部分“半隔离”。这种“政党携精英”的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就像Mayer 1981年已经有力论证的)，甚至在威权主义君主制中保持着更重要的地位。更有甚者，连立宪君主制国家都保留了这种旧政体的东西，因此，共和国也展示出“旧的”因素：“共和国显贵们”，“一百个(或二百或四百个)家族”，“权贵们”

等等。在所有的国家里，或在过去，或在现在，政治权力被掌握在以“老钱家族”(old money)*为中心的“上等阶级”手中。对应于传统的地位，这些阶级或有地，或有钱——术语“权贵”在英国就有这样的功能，在美国可以关系到外交政策的制订。可以说，就像第十二章所清楚表明的，旧政体对外交把持着相当的权力。

阶级理论认为，旧政体作为一小部分，被合并到了日益增长的支配的资产阶级中。尽管多元论者很少将他们的理论运用到非民主政体，但是，多元的权力网络有可能同样蔓延到了绝对主义君主国家。绝对主义王权支持者(absolutists)在面临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时，会把政治权力和基本权力(privileges)授予市政当局、专业人员团体、商人集团以及同业公会，甚至农夫，而这些权力平时只授予有地贵族。就像廷臣，他们的基本权力是特殊主义的，他们的政治倾向于党同伐异，形成宗派斗争。在本卷的下面章节中，我将评估有关旧政体的阶级和多元论观点。

表3.2的第二行表示的是司法—警察制度以及法庭—法律执行机构。在这一阶段，警察权力从军队中区分并突显出来，但它还不是主要的权力运作者(见第十二章)。法庭则重要得多。法律承担着双元的角色，即在表达君主的愿望的同时，体现习惯法和神法(divine law)。君主有可能在他(她)的最高法庭里取胜，但较低程度的正义和公正能被地方—区域贵族——常常是教会里的显要人士——所实现，或与他们协同在一起。欧洲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甚至绝对主义君主都不愿看到法律和习俗被破坏(Beales，1987，p.7)。欧洲的混血特征使法律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中心场合，并赋予了律师集体的身份认同，使之无法还原成国家或市民社会。君主们授予律师以集体特权(corporate privileges)，其目的就在于减少他们嵌入社会的程度。在这方面，法国君主制走得最远，它赋予贵族以物质上的特权(material priviledges)和组织集会(议会)的

---

* 也就是那些所谓的蓝血家族，如范特比尔特家族、阿斯托家族等等。——译者注

权力。因此，他们的这种特殊主义的同盟在1780年底的崩溃就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决条件(见第六章)。这种半隔离策略的成功有多种多样。在有的国家，律师与法院一道和专制主义结成同盟(就像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而在有的国家，却与其敌人结成同盟(如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如果司法机构获得了一些自主，它或许有时是自己的，而不是国家的。

18世纪，正在上升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将它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法律上，其原因在于，要确保T·H·马歇尔的关涉市民权利的三头统治同盟(triumvirate)中的第一头：市民的公民身份(civil citizenship)。这些阶级是为个人，而不是为集体要求司法权利。在这方面，旧政体被证实是合作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身正变得资本主义化，对这种个人的、财产的权利——被C·B·麦克弗森贴上了"占有式(possessive)个人主义"的标签——平等有更多的准备。同时，君主寻求与他们的臣属发展更多的普世契约关系。现代国家开始体现韦伯的"理性的—法制的统治"(Poggi, 1990, pp.28—30)。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针对市民权利的迎头阶级冲突(不同于先前的国家)。旧政体在不断增长的阶级压力下变得党争起来。国内法律规范的传播甚至有时是君主们自己来进行的。然而，尽管法律规范的语言是被设计用来保护男性财产持有者(有时是保护占支配地位的种族或宗教群体)，但它仍是普世的。法律有着突显的权力，它有助于扩大下层阶级、宗教群体和妇女的权利。在一段时间里，法律机构——一半在国家之内，一半在国家之外——施加了基本的压力。然而，自大约1850年之后，它们变得保守起来，并连结成类似旧政体和已制度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结合。对更进一步的集体性市民、政治公民权利的增长而言，个人的市民身份被证实是一种障碍。

表3.2的第三行表示的是民政。除了司法和军事事务，以前的国家并没有管理太多。19世纪，国家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基本(管理)范畴。但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财政和人力资源(就像列维在1988年所强

调的)，专制主义需要把岁入和支出拨款从市民社会中隔离出来。皇家领地和帝王权利(如：国家拥有的开矿权和出卖经济专卖权的权利)意味着一些岁入被隔离，就像古代的税收制度化形式。发动战争是国家的特权，成功的战争可以通过战利品和在国内的强制增加岁入(尽管失败的战争有可能削弱权力)。18世纪，很少有君主对议会拨款。然而，由于现代国家福利规模的增长，传统的被隔离的岁入被证明是不够的。因此，税收和借贷的新形式使得(国家)行政被嵌入纳税人和借贷者中，尽管(君主)与交税的农场主和商人之间的特殊主义的同盟会损害支配阶级的统治。这样一来，财政平衡表既复杂又多种多样。我将在第十一章中讨论它们。

国家的官员原本对君主负责，然而，实际上他们得依赖地方—区域显贵人士来进行管理。1760年，通过我们今天所谓的腐败——占据官位的行为，行政(administration)被嵌入了地方财产关系中。正像第十三章所显示的，行政在本质上被官僚化了。这一官僚化包含了君主、支配阶级和多元压力集体之间的冲突。君主想方设法地要把官员作为一个依赖的集团隔离，隔离到专业法律集团和高级教育集团里，并且，通过后两者，(君主成功地)把官员隔离到了阶级和其他权力网络中，尽管这种隔离包含了个人偏爱的嵌入；支配阶级则努力确保官僚政治被类似他们那样的人所掌握，以及确保官僚政治对由他们所控制的议会负责。更大众化的政治运动寻求将官僚政治嵌入到关乎成就的普世标准中，并对民主集会(assemblies)负责。通过这种旧政体的高官和旧政体的“孝子贤孙”(highly educated sons)之间的特殊主义的、半隔离的同盟，出现了温和的国家自主。然后，通过吸收职业中等阶级的“孝子贤孙”，这种温和的国家自主得以扩大。这里，对这些半隔离的策略而言，控制中等和高等教育是非常关键的。

这样，国家内一个不同(于以前)的“专家政治—官僚政治型”的政治制度就形成了，在原则上，它对最高层负责，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官僚式隔离。甚至在那些国家代表了其社会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地方，国

家仍是中央集权的，而市民社会和阶级则相反，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被韦伯(1978, Ⅱ, pp.1417—1418)确认的两种专家政治(technocratic)的垄断——它们关乎技术上的通晓和沟通上的行政渠道——印证了被斯科克波和她的同事所强调的，关乎隔离的隐秘的、有限的形式。阶级和其他主要的权力运作者并没有固有地组织起来，以便管理所有的国家职能。他们有可能激励自己，将符合自己愿望的政策合法化。而一旦达此目的，他们就会解散或转向另一个兴趣点，从而把文职官员(civil servants)留在和平状态里。所有这些(行为)与克制的自主连在一起。如果权力运作者一旦不再激励他们自己，那么，部门的自主就会抬头。比起议会制政体，这种(此伏彼起)在威权主义式国家中更有可能发生。一旦没有以对议会负最终责任的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内阁，那么相形，立宪最高领导人、威权主义式君主被证明在掌握“他们的”专家政治—官僚政治型组织方面，拥有更少的控制。事实上，即便与威权主义式政体相比，立宪政体也没那么自主，但却更具统一性。

这样一来，精英的自主性有可能是**多元的**，它降低了国家的统一性。尽管官僚政治的增长看起来是向中央集中的，而它实际上呈不规则蔓延状态。其后，数以千计的，数以百万计的国家公务人员执行(精英制订的)政策。专家官僚政治和官僚政治固有地是专业化的和多元的，这就如同混杂理论所强调的，增加了国家的复杂性。在引导有关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分析方面，没有什么东西比韦伯的垄断式的官僚政治概念更误导的了。实际上，国家行政几乎从未形成一个单一的、官僚式的整体。

表 3.2 的第四行表示的是立法集会(assemblies)和政党。就像韦伯所做的，我延伸了这一概念，不仅用它来表示政党，而且用它来表示任何一个压力集团。绝对主义君主制没有正式地认可政党，同时，它也没有(不同于 20 世纪)意愿通过一党制政体来进行专制统治。然而，在行政上，绝对主义君主制试图建立特殊主义的、嵌入的同盟，使之在部门的党派间——由宫廷(court)和议会派系所组成——扩散，体现了阴谋和

幕后的依附主义(behind-stairs clientelism)。更正式的、却常常不那么部门主义的倒是19世纪出现的正式的政治政党，同时，通过马歇尔的“政治公民身份”，它使得弥散的市民社会运作者能控制国家行政官员(以及彼此)。这种确立的、独立的合法集会，通常为宪法所肯定，且这些集会是通过扩大的参政权得以秘密选举的。这些都保证了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多元的特性。

然而，政治公民身份并没有像马歇尔所含蓄指出的那样，得到平稳的发展。威权主义官员能够对派系和政党分而治之，与显贵人士中的政党寡头结成特殊主义的和部门主义的联盟。同时，宪法有突显的特征来阻止进一步市民身份的发展。直到这个时期的末尾，正像财产和性别对集会的自主性带来的限制一样，它们对选举权也保持着各种限制。如果说宪法“固有地”保护对立政党的权利的话，宪法也抵制社会的变迁。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宪法保存了一个联邦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使之演变成非常特别的社会状态，并抵制那些要求集体及社会公民权利的运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固守议会的主权，正是后者保存了一个相对中央集权的、两党制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在一个更本质的意义上，出于对资本主义的依赖，政党和集会是受限制的。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政治权力运作者相信，财产权利和商品生产是“天然的”，因此，他们很少考虑去侵害这些权利。然而，即便他们这么做了，正像资本主义积累为自己提供了资源(如奥菲和龙格在1982年所强调的)，他们的权力也仍然是受限制的。这是一个针对真正精英论和多元论观点的、关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认为(还未达到发动革命的标准)：不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反资本主义政党，都不可能摆脱这些“限制”，而这些限制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而设立的。我已经指出过，在得到他们自己独立的财政资源方面，国家之可为甚少。这也恰好支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确实成型为资本主义，但却不仅仅是资本主义。

对外政策

表3.2的第五行和第六行表示的是外交和军事制度。正像我前面所论证的(在1988年重印的论文里，并请参阅Giddens，1985)，绝大多数国家理论忽略了外交和军事权力。然而，国家存在于由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且在战争和和平之间游移不定。对农耕国家而言，它的至少四分之三的岁入被用在战争上，因此，其军事首长的地位远胜于文官。国家看起来就像是一台战争机器，然而，这台机器既因外交而起，又因外交而平息，常常被引导到和平和妥协上。这就是外交政策的本质二元特性。

欧洲的外交家居于“多重的—权力的—运作者的文明”中。他们并非居于无政府的黑洞中(就像一些现实论者所观察到的)，相反，他们居于一个有着共同观念和理解的规范群体中，这些观念有的是非常普遍的，有的被某些超民族阶级或超民族宗教所共享；有的是和平的，而有的则是暴力的。许多在国际范围内运作的权力网络并不运行于国家之内。我在第二章里指出，对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来说，尤其如此。国家不可能完全禁闭信息、商品和人员的交流，也不可能太妨碍个人财产权利和贸易网络。国家领导人具有社会身份认同，尤其是关乎阶级的和宗教群体的，他们的观念将有助于界定有关利益和道德的概念。

这样一来，外交和地缘政治就被规范所统治。有的规范界定哪些国家利益是合理的，并被这一文明之内的国家领导人所公认；有的规范为有血缘关系的贵族、为天主教徒、为“欧洲人”、为“西方人”，乃至有时为“全人类”增添规范性的理解。战争甚至也被规范所统治，这些规范有的是“限制性的”，有的当然是暴虐的。许多世纪以来的文明的稳定，增加了人类理性地计算“国家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被一些现实论者认为是普世的人类能力。特别的是，欧洲外交有着一个世纪之久的，关乎两个特殊地缘政治形式的经验，即在两到六个势均力敌的强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其中一个称霸的企图和随后遭到的反击。这些共同的理解有时被贴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结束了1648年

宗教战争的(Rosecrance, 1986, pp.72—8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但是，它们体现的是更早的欧洲规范。

外交就是同盟外交。几乎所有的战争都发生在同盟的权力集团之间，除非其中的一个主角能成功地在外交上孤立他的对手。在一场战争中，其中一方会寻求利用他的朋友，(希望)在理想状态下迫使敌人在多个战场上作战。当然，这些都是极其现实主义的策略。然而，有的同盟者也会寄希望于共同的规范，寄希望于那个时代的宗教团结；以及在这一时期，寄希望于反动君主的团结，或“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的团结；以及寄希望于自由政体对互相走向战争的日益反感(见第八章和第二十一章)。

但是，17和18世纪看到了战争的诱惑。欧洲向东扩张到亚洲，向东南扩张到奥斯曼的土地，向南扩张到非洲，以及通过海军据点和定居殖民地，扩张到全球。到1760年，战争成本(财政上的和道德上的)持续上升，但是，得到的利益也呈上升态势。对欧洲列强来说，殖民战争并非是通常的零和(游戏)。参与者都有份：如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冲突，或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冲突，胜利者得到他们最想要的，失败者也可退而求其次。殖民主义非同寻常地有利可图，同时，欧洲人庆贺他们推进了基督的、西方的或“白种人的”文明和“进步”，从而战胜了野蛮人的、土著的或业已腐败的文明。

欧洲的进攻所带来的是更大的国家。1500年，欧洲有大约二百个独立国家，而到1900年，只余下大约二十个(Tilly, 1990, pp.45—46)。胜利者将历史为己所用。1900年，没有几个德国人会持这样的看法：他们是1815年被普鲁士王国所取代的三十八个州的前公民，这从他们的民族(national)自我认同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德国的胜利者，而非萨克逊式或赫斯式的失败者。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穷兵黩武被美化了。战争在各国之间是普遍的，而在漫长的19世纪，对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战争看起来完全是正常的。

战争和挑衅的外交无处不在，它们灌输了关乎物质利益和资本主义

利润的概念，带来有关的身份认同、社群和道德的地方性概念，尽管这些概念与“多重的—权力的—运作者的”文明促成的、利益和利润的、更以市场为取向的概念是共存的。这样一来，就带来了如第二章所述的六个国际政治经济(元素)：自由放任，保护主义、商业本位主义，以及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帝国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策略(strategies-drafts)。

在外交决策中，有五个主要的、有组织的运作者参与其中：

1. 阶级。我将回到第二章我所分析出来的三种阶级组织。绝大多数早期的理论家们认为，超民族阶级和其他利益集团主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社会，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民族的边界。诚然，挑衅的超民族阶级有时确实是存在的，例如，中世纪好战的欧洲贵族，或者想方设法要推销革命的革命性资产阶级。但是，在这一段时期的绝大部分时候，就超民族阶级外交上的专业知识和利益、温和乃至绥靖而言，他们多半都是世界性的(cosmopolitan)和国际的。对自由主义论者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社会的宰治者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是工人阶级。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相互依赖论理论家强调的则是这种绥靖的超民族主义。

这样，到1900年，这个世界似乎显得更加暴力，理论家们开始强调相反的一面：“国家主义的”阶级，即从其他国家的居住者的反面来界定的阶级。在外交上，它被认为是有自身专业知识和利益的，但是，它又是挑衅的、扩张的，甚至是军国主义的。基于这一洞察，其中心理论可以说是经济帝国主义。

在市民社会中，占有专业知识和利益的有组织运作者控制了超民族和国家主义外交。例如，一场大的战争的结束，往往会产生一种利益膨胀，即取胜列强中的支配阶级的利益会膨胀起来。第八章阐述了1815年胜利的列强们是如何想要重建旧制度的。多姆霍夫(1990, pp. 107—152)和梅尔(Maier, 1981)就曾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就推行了世界新秩序。但是，如果民族的阶级居

于支配地位，外交就不会那么专业。同时，如果阶级和其他利益集团被禁闭在他们的国家边界以内，就有可能对外交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沉溺于国内政治中，并可能把外交留给别人，以至加强了国家领导人的“隔离”。还有可能的是，他们推出的外交政策，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因此，这些政策是相当肤浅的，并非根植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中，从而是易变的。

本卷将讨论阶级组织的全部三种形式的缠绕式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民族的阶级以一个相当强的面目出现，并认可在对外政策方面，其他四个有组织的运作者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四个有组织的运作者中，其中一个主要植根于市民社会中，有两个植根于国家中，还有一个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活跃关系。

2. 特殊主义的压力集团。在阶级和其他主要权力运作者的漠不关心中，那些更特殊主义的政党会在基础上制订对外政策。在某一地区或国家里，经济部门、工厂，甚至个别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最明显的是阶级小集团(fractions)，即多姆霍夫所确定的一种现代资本家群体中的国际小集团，它存在于大型集团和银行之中，且后者有着全球利益。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绅士资本主义”就是一个相对明显的阶级小集团，他对英国的对外政策施加了影响(见第八章)。1890年代，三个可供选择的德国对外政策[世界政治的(Weltpolitik)、中欧的(Mitteleuropa)和自由主义的]就部分地来源于阶级小集团(见第二十一章)。相似地，韦伯认为，经济帝国主义——即他所谓的“战利品(booty)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源于在国家权力中拥有自己物质利益的资本家，而我们今天把国家权力称为“军事的—工业的多元体”。非经济压力集团也到处存在，出名的有与其他国家相联的人种、宗教或语言群体。

比起国内政策方面，压力集团在其他方面可能更有决定权。通常，阶级和其他更宽泛的权力运作者更紧密地控制着国内政策。压力集团也更反复无定地被激活。例如：在最近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矿业集团就影响了对智利政策，黑人群体影响了对南非政策；而犹太群体则

影响了对中东政策，等等。然而，压力集团的关心范围是狭隘的：犹太人和黑人对美国的智利政策没有兴趣，绝大多数矿业集团对中东政策也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受压力集团操纵的对外政策可以是一系列短而急促的结晶，几乎不存在什么总体模式。就像涂尔干所指出的："没有什么比利益更反复无常的了"。

3. 国家领导人。在专业地考虑外交时，现实论聚焦于国家运作者，甚至(正像他们的名称所显示的)就是具体化了的国家。国家领导人身边围绕着高级行政官员。君主长期以来就拥有制定对外政策，包括发动战争的特权。被禁闭阶级在国内的发展认可这种特权的存在，存在到了甚至民主时代，尽管其他权力运作者减少了隔离。社会压力经常通过国家领导人自己的身份认同显露出来。这些身份认同几乎全部来自旧政体中的阶级，它们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合理性，以及一些他们的超民族统一性。再一次地，就像针对国内政策，特殊主义的同盟——而不是全部被控制的或全然被隔离的国家——出现了，并仍然处在高级行政官员和旧政体之间。国家领导人处理日常的外交事务，结成或破坏同盟，以及以战争作要挟，甚至，在没有与其他权力运作者作充分商量的情况下，走向战争。由于他们是通晓世界和通晓多个语种的专家，因而，他们在支配专家政治—官僚政治权力方面堪称"行家里手"，在对整个对外政策范畴的把握上拥有最广阔的视野。这样，随着他们的隔离达到顶峰，或走向瓦解，不同的对外政策便应运而生。

但是，甚至旧政体的国家领导人也被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改变。就像韦伯观察到的，国家领导人在代表国家的同时，开始代表民族。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开始取决于在众列强——即在这里区别出来的有名的权力运作者——的关系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请参阅 Rosecrance, 1986, pp.86—88)。韦伯强调，国家领导人已经变得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活跃，并把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认同为民族—国家的粗暴权力，意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就是最大的功绩，相应地，失败也会葬送他们(Collins, 1986)。韦伯认为，这也会发生在君主身上，发生在主要的大臣身上，

以及经选举的领导人身上。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当悲观的关于民族的观察：有的民族在他们的世界任务方面，总结出更自由和更绥靖的观点，这样，作为绥靖民族的美德的样板，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就会作秀(strike poses)、赢得威名和选举。韦伯就是一个德国国家主义者，他的政治学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民族的政治威信(national political prestige)的总体看法。

4. 军事。这里，我将转向表3.2的第六行，转向国家对有组织军事权力的垄断——封建摊派和私人军队已告消失。在高级将领和高级行政官员的正常控制之下，军事变得中央集权起来。通过针对军事人员的工资、福利和有退休保障的国家雇佣，现代隔离技巧被发展起来。绝大部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官员集团主要来自旧政体(见第十二章的数据)。他们倾向于在对外政策中体现浓厚的军事作派，但对日常的外交没什么兴趣；他们常常更冷静地理解战争的现实性，对发动战争小心翼翼，并倾向用规范来“限制”它。

19世纪的高级将领与国家领导人密切相关，因为他们都完全受训于旧政体。同时，由于他们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品而言，是主要的顾客，从而，他们也与工业资本家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正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名了“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在他之前，后者早已存在。而且，军事也在国家内产生了准特权阶层。他们具备一种专家官僚式的自信，同时，他们的技巧开始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控制中被移除；针对大众(mass)士兵，他们制订出部门的纪律(discipline)，并从边缘社会阶层招募下属。随着杀伤性武器比例的增长，他们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冲击也同步增长。19世纪，(军事)战略思考开始有节制地倾向于进攻，而不是防守。在外交形势每况愈下的情形下，高级将领主张动员和先于敌人发动进攻，就像1914年7月末发生的那样。因此，尽管军事与行政高官、旧政体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但他们的专业技能还是促进了国家内特权阶层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往往是不明显的，有时又是毁灭性的。在有组织暴力的国家垄断中，军事权力的自主性得到了幸存。

5. 国家主义政党。[1]当那些有着强烈物质外交利益的阶级缺失时，一种在政治上更加根植于国家主义的阶级便应运而生。这最早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然后又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阶级和其他运作者获得市民的和政治的身份认同，国家便成为“他们的”民族—国家，一个他们效忠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民族—国家的权力、荣辱，乃至物质利益都被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同时，国家领导人、压力集团和军队动员了这种感觉。进而，国家主义政党和压力集团把这种感觉加于国家领导人身上。然而，在这一时期，挑衅的国家主义从没有人们相信的那样广泛地存在，它有着特殊的核心推行者，即我所确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statist nationalists)。他们直接隐含在国家制度中——即不断增长的国家雇佣人员数量，以及那些经由国家教育制度而社会化(socialized)的、不断增长的人群。另外，更温和得多的国家主义出现了，它来自那些享有公民身份的阶级、不断中央集中的利益集团——即中产阶级和支配的宗教、语言、人种及区域性共同体。在20世纪，随着工人阶级、妇女和少数民族获得公民身份，这种温和的国家主义得到扩展。

国家身份认同的增长，以及国家民族主义的主要推动者，有时赋予了外交一种大众的、情感化的、和民族的色彩。但是这一增长缺乏阶级和特殊主义压力集团的利益合理性，也缺乏对被隔离的旧政体国家领导人的准确的、植根于一定标准的理解。阶级论、多元论以及现实论理论家们都认为，物质的集体利益主宰了对外政策。但是，政治民族主义有可能决定了物质的集体利益的概念，而不是相反。如果有一个列强怀疑“国家荣誉”，那么，大众的、浅薄的、易变的、且情感化的国家主义就会支持(对它进行)侵略或坚固防守。最极端的大概是，当国家对世界充满了非常广泛的圣战立场的时候——如保卫基督教或雅利安种族，要给世界带来解放和友爱，或者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等等。在这一时期，只有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这种极端的情绪。

在漫长的19世纪，这五个有组织的权力运作者合起来决定了对外

政策，今天仍旧如此。同时，由于他们的兴趣的程度、关心的范畴各不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很少有系统的共识或迎头撞击。除非存在实质性的阶级小集团(fractions)，或道义上的国家使命介入其中，国家领导人掌握着例行的对外政策，其他的则更零星地、更飘忽不定地出入同盟、危机和战争。就像类似的精英—现实论、马克思主义和多元论所认为的，这对于一个很系统化的对外政策而言，看起来是非建设性的。

我已经确认了对内和对外政策中的不同的、有组织的运作者。国内政策机构经常不同于对外政策机构，同时，不同国家的同一种机构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各个政体在理解对方时遇到了麻烦。现实论者在计算各自的国家利益时，需要相互之间的准确理解，尤其在处理外交危机的时候。这种准确理论常常是缺乏的，尤其在第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如何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不论国家，还是市民社会都不是自主的或统一的实体。在国家和民族的市民社会里，以及在超民族文明里，专制权力更多地来自特殊主义的、半隔离的同盟，即有组织的运作者之间的同盟，而不是来自中央集中的精英(阶层)。国家人员能够行使自主性权力，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独享的中央集权的好处。君主、官僚、高级将领，以及其他都是以个别权力运作者出现的，而很少作为单数的或统一的国家精英出现。但是，中央集中权力的机构几乎没有个别权力，除非有市民社会的选区来扩展它，从而赋予它获得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渠道。杰出的国家精英——这些真正精英理论的关键性大人物——在本卷中还没有崭露头角。现代国家远非是单数的或中央集权的，而是多形的权力网络，并延伸到中心和地域之间。

功能分析：一种多形的成形模式

在化学中，多形体指的是一种物质，它可以成形为两个或多于两个的形态，通常可以归属于不同的系统。这一术语亦表达了国家成形的

方式，即国家的若干权力网络成形为中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中心——的方式。国家有多重制度，履行着多重职责，并通过它们的地域和地缘政治来动员选区。就像罗斯诺(Rosenau，1966)指出，并得到劳曼和诺克(1987)正式同意的那样，不同的“问题区域”(issue areas)或政策域(policy domains)动员不同的选区。因此，国家是完全多形的。或许，就像艾布拉姆斯(Abrams)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描述某一特定国家时，我们不能只用到“国家”。相反，(这时)我们应该放弃使用制度性研究方法，而使用功能研究的方法。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从某一特定国家所担负的潜在功能的角度，来简化国家的多重制度。因为这些功能弥漫在多重的制度和选区中，同时激活国家去寻求更简单的总体成形。

在这一时期，国家持久地、大量地成形为“资本主义的”、“王朝的”、“政党民主的”、“军国主义的”、“联邦制的”、“路德宗的”等等(类型)国家。稍后，我在确认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一个或多个成形时，我将使用“高级成形”这一术语。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现代国家最终分别成形为资本主义的、政党—民主的以及追求安全的(security-pursuing)国家。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模式化的、等级的关系存在于多重制度之中。混杂理论明确地反对这一看法，而多元理论补充说，政党民主就是在许多其他的成形之间存在的系统妥协方式。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最终暗示，单数的统一国家会在不同的成形中作出“终极的”的抉择。有两种评判方法可以确定这种终极抉择，以确定一些它们之间的成形或妥协是否真是终极决定性的——可以用“等级的”和“终极的”两种检验(方式)。其中，一种方法是直接的，另一种则是间接的。

直接的检验将确认国家最终成形为X，而不是Y，比如说，成形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由于X和Y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在一般情形下，我们知道，X(资本主义)决胜于Y并不是因为这是必然的，而是在“最后情形”的意义上，即国家系统地避免了无产阶级革

命，且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有所为的地方进行了限制。那么，这种直接的检验能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应用吗?

斯坦因梅茨(Steinmetz)就曾经试过，他试图将德意志帝国福利国家政策中的对立阶级和(“真正的”)精英理论应用到这个检验。他说，要支持精英理论的话，我们得确认：

> 那些直接对支配阶级的利益构成挑战的政策……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理论最终取决于显示出来的“不沟通”(non-correspondence)情形，即国家官员和政策制订者直接与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的利益相冲突。(1990，p.244)

斯坦因梅茨认为，在德意志帝国，精英理论不适用于这种检验，原因在于不存在“不沟通”。福利政策实际上很对许多资本家的胃口，同时，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原则也影响到它。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和福利之间存在沟通。在第十四章，我赞同斯坦因梅茨的绝大部分经验性结论。只是，我不赞同他的方法论，不赞同用它来回答国家的“终极”性质。原因在于，我们能否将这套检验，这套不沟通、针锋相对的竞争和随后的胜利—失败二元对立分析运用到整个国家。这就暗示着一种社会体系，一种将把全部的限制加于其国家的社会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式就没有这么看，因为它把阶级斗争看成是二元对立的整体，并认为阶级建构了整个社会和国家。假设有关这些二元对立的术语仍然还存在理论上的争论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作一个评判。

可以用二元对立的术语来表述这种迎头的阶级冲突。国家不可能既是封建的又是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既是君主制的又是政党民主制的。因为国家必须成为其中之一，或它们之间的系统化妥协。在这一阶段，国家压倒性地成为并保持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的或社会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确认一些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系统的冲突会破坏通常由资本主义施加给这些

国家的“限制”。鲁谢迈耶和埃文斯(Rueschemeyer and Evans，1985，p.64)则把这些限制罗列为(在不断增长的对资本的威胁情况下)那些将资本主义阶级分离出去的东西；列举为来自下层的威胁促使资本主义阶级把权力移交给政权(political regime)(同时，政权会自律地采取与阶级冲突达成妥协的行动)；以及把限制列举为从属的阶级获得了市民社会的权力，以便由他们自己来掌握国家。在现代国家，资方—劳方的斗争一直是系统(存在)的。只有在它们(上述的限制)产生的情况下国家才能有效地运作，同时，它们的有效产生是解决阶级斗争的前提条件。国家需要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将资方和劳方之间的斗争化解，而这种斗争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他们为整个国家而争夺。我们能够分析出他们不断的迎头(由X对Y)冲突和“不沟通”，分析出谁将赢得这场斗争，同时得出某种系统化结论。

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冲突模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跨越边界，运用到所有的政治上去？问题就在于，从每一种功能成形必须被稳定地制度化的意义上看，它无不是系统的和带限制性的。就像国家，它要么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要么是这两者之间的某种相对稳定的妥协。因此，国家要么是世俗的、天主教的、新教的或伊斯兰教的(成形)，要么是某种制度化的妥协。它必须稳定地在国家中心和地方—区域之间将政治权威进行分野；它必须在司法、行政、军事防御和外交安全方面取得工作效率。这些成形中的每一种都内生地系统化，并且包含针锋相对的挑战和不沟通，这些都使得当代西方国家寻求在大范围内将它们制度化。

但是，功能性成形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系统化的。比如说，阶级和宗教的成形就不一样，有时会发生冲突。然而，它们之间的冲突很少是系统化的，也很少构建成一对二元对立体。国家并非经常地在它们之间作出“终极”的选择。例如，今天的意大利保持了政党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天主教的成形，但它也保留了家长制的以及其他的成形。斯坦因梅茨会发现体现在福利政策中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情形就

是这样的，因为这些福利政策本质上就是经济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阶级冲突。(尽管斯坦因梅茨没有去考虑它们是否是家长制的，它们实际上就是！)

因此，对于现代国家理论的“老兵”(war-horse)争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人们对美国新政的福利和农业政策进行争论，绝大多数学者强调阶级成形。那些政策最初都是经济政策，且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考虑到阶级或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美国的福利政策亦是(即便很少清晰地显现出来)家长制的，以及经常是种族主义的。那么，这三个针对福利的不同成形之间有何种关系？一些美国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杰出人士深陷其中，争论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相互缠绕，迄今还没有达成最后共识。斯坦因梅茨或许会在德意志帝国的政策领域——如阶级利益、文化斗争和俾斯麦外交——发现沟通或不沟通。这些政策领域各不相同，虽并没有迎头相撞，却也相互缠绕。对于美国的阶级、联邦和外交政策的领域，我们或许也可以这么说。

尽管没有迎头冲撞，但是，国家可能仍会根据成形的最终重要性，来分配优先考虑的顺序。下面就是四种分配优先考虑顺序的国家机制：

1. **法规和宪法**明确了权利和义务。民法和刑法确切地规定了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它们所肯定的民事和政治权利。然而，它们并没有规定权利将被怎样地分配。宪法被期望分配主权，但是，它并没有显示它是如何确定其考虑顺序的。同时，正像安德森和安德森(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 pp.26—82)所论述的，18 和 19 世纪的宪法通常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它们体现的是对行政权力的未竟的斗争。

2. **(国家)预算**显示的是财政上的优先顺序。所有的国家行为都是费钱的，因此，预算能显示最终权力和限制所处的位置。是实行累退税制还是实行累进税制，是“要黄油还是要枪炮”，其选择有可能诱发迎头的冲突，并显示权力的系统分配。这是我对国家财政进行分析的有效假设。但是，财政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职能部门(functions)的成本

并不简单等同于它们的重要性。如，外交行动所费甚少，但究其结果，很有可能是破坏性的。无论如何，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候，国家没有统一的预算，或者可以说，即使有，有的项目却是由宪法来固定的，并不存在重新分配的可能。

3. 正像多元论者所确认的，**民主—政党的多数派**(Party-democratic majorities)能显示权力带等级性的分配，它的政策能显示最终的优先顺序。然而，政党的策略通常是，避免迎头的冲突或作出最终的决策。执政党在原则的问题上打擦边球，作出“急就章”式的妥协或互助。政权很少在黄油或枪炮间作出选择，它们会根据复杂变化的政治成形，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即黄油和枪炮两者都要。没有哪一个国家赋予妇女选举权，好些国家也并没有赋予全部男性以选举权。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了呢？在好几个国家，通向君主的渠道与议会中的多数党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国家有着许许多多的(功能)“大厦”，议会也并没有例行地控制外交或军事事务，阶级和其他利益集团占据了宫廷、军队、行政(班子)以及议会。议会并没有真正，有时甚至没有(被赋予)宪法的主权。

4. **独裁制官僚政治**能理性地在国家行政中分配优先顺序。尽管韦伯夸大了官僚部门(bureaucrats)的自主性，但是，根据等级和功能，官僚部门就能被确定，同时，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权威地决定了(这些部门的)优先顺序。在整个时期里，基本的国家官僚化发生了。然而，就像第十三章所显示的，这种官僚化还不够彻底，当接近国家行政的顶点时，尤为如此。威权的君主制分而治之，以避免统一的官僚政治；议会政权在把政治上的忠诚者选入最高行政层面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行政并没有完全地被隔离，它们体现了国家其他部分的、原则上的成形。

显然，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具有统一性。根据它们是如何明晰地设置最终的决策(部门)——它们的**主权**，我们就能把一些国家(从别的国家中)区分出来。应该看到，18 世纪的英国和普鲁士，比起法国或奥地利，更明晰地把主权设置在支配性的关系中[即关乎君主和议会或

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到1914年，民主政党(party democracies)相比那些威权的君主们更是如此。在这些对比中，它们中的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地体现了混杂(理论)。然而，总体上，尽管现代国家试图在所有上述四种国家机制中增加它在分配上的统一性，(但究其原因)这一试图是对承担更复杂功能性成形(如第十四章所述)的回应。这样一来，国家曾经是(现在仍是)不完全的。我认为，在这一时期，总体的国家统一性或许趋于下降，因此，优先顺序通常并没有系统地分配好。

相对金钱是衡量经济权力的尺度，集中的物质力量则是衡量军事权力的尺度，没有一种单一的、普遍的衡量政治的尺度存在。这样也就不存在衡量终极国家权力的最终手段。因为，不同的成形会产生单一的系统国家，它不但要求国家官员拥有非凡的组织能力，而且要求市民社会运作者有格外的政治利益。为什么资本主义阶级，或工人阶级，或天主教教会应该关注例行的外交？为什么国家主义政党或军队会关注工厂安全立法？国家并没有例行地在诸如阶级调节、政府中央集中(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或外交等职能中分配基本的优先顺序。强力的政治运作者务实地追求国家多重职能的绝大部分，同时，根据特殊的传统和现实的压力，它们会实用主义地、匆忙地应对关涉到它们的危机。

这样一来，政治成形很少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冲突。我们不能例行地运用“谁赢了”这种直接检验。国家很少以是 X 而不是 Y 这种方式体现出来。我所关注的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但同时也是家长制的；它们是强权，它们中除了奥地利都成为民族—国家(同时，它们有可能是天主教的、封建的、相对的军国主义的，等等。)资本主义的逻辑并不要求一定的性别、强权或国家逻辑——反之也成立。这些 X 和 Y 并没有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渗透，相互缠绕，以至于针对其中一个的危机解决方案会对另一个——有的是无意的——产生影响。甚至，在实际上，那些在原则上针锋相对的成形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冲突，因为它们会与其他的成形缠绕在一起。我发现，鲁谢迈耶和伊文斯的有关劳方能取胜于资方的三个条件(我前面提到过)太过严格。我还发现，无论马克

思的两个对立阶级是如何的冲突，支配阶级——它掌握了社会权力的大部分资源(尤其是国家的和军队的资源)——都将取得胜利。被支配阶级能得到更多机会的地方，就是那些它们的威胁(threat)与其他的威胁——它们来自其他阶级，但更多地来自宗教或军队的小集团，和政治上的去中心主义者(decentralizers)以及外国强权——缠绕在一起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和支配阶级有可能将集中的权力失去给潜在的阶级敌人，同时，被后者的间歇性显现完全击败。这种情况在法国大革命(见第六章)和民权运动(见第十五章)中出现过。

显然，不同的国家成形支配不同的国家制度，一个完全的、针对劳力有合理区分的官僚制国家需要这样。然而，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不存在，现在亦不存在。情形往往是这样的，国家的左手不知道自己的右手在干什么。美国的被隔离的外交使节(他们周期性地受压力集团的影响)处理着对伊拉克关系，直到有一天，1990年8月，他们的(包括外国人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完全占据了总统的注意力。近年来，北约核潜艇指挥官带有一个封好的指令，他们会在与总部的联络被切断时打开它。人们相信，指令是这样的："进攻，将导弹对准此处所示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右手的无名指(军队)能够自主地毁灭国家、资本主义，也许还有这个世界。(这时的)国家并不知道它的成员在干什么。

直接的试验失败了，我们能否采用第二种也是非正常的试验？国家的成形很少会直接发生辩证接触，但也许通过它们强有力的、不可预期的影响力，一个或多个成形的后果往往会破坏其他的限制和整体的模式？这至少是一个"高水平的成形"？

高级国家成形

本卷对前所问到的问题给出了恰如其分的答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成形，然而，我得谨慎地用肯定(的语气)回答：在这一时期，我确

认了六种高级西方国家成形方式。前五种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道德的、军国主义的成形，以及在易变的立场下的代议制的连续体(从专制君主制到政党民主制)，和基于“国家的”、从中央集中的民族—国家到联邦政体的成形。同时，我确认了不同的意识形态—道德的成形，它们中一些是宗教的(如天主教的、路德宗的)，另一些则是更宗教—世俗的混杂型。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成形)更多地(尽管不是全部)还原为代议制的和民族的，因此，它们的意义或多或少地下降了。当意识形态—道德的成形与第六个国家高级成形缠绕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以最强有力的面目出现，遗憾的是，在本卷中，我只是提到过第六个国家高级成形：家长制的国家。而当它动员深入性权力与动员广泛性权力关系连结在一起时，我们就能发现其意义，在广泛的层面上，我通常强调四种国家高级成形：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的、代议制的以及国家主义的(national)。

这四种成形中的每一种都产生了自身迎头的二元冲突，并结合带来这一时期的基本政治。诚然，有些国家同时是天主教的，有些是新教的，有些是世俗的，还有些是海权的或陆地权的，或者，有些是单一语言的或多语言的，有些带有各式各样的旧政体或官僚政治的色彩，所有这些都将产生不同的成形。然而，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我发现了四个大的轨迹：(它们都)趋向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熟，趋向于更宽泛的代议制，趋向于增强国家中央集权，以及趋向于职业化和将国家军国主义官僚化。现代西方国家在宗教、语言等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在种种社会权力普遍发展的强制下，一个普遍资本主义的(给冲突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一个更具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国家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特征被强加给了现代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将所有四个趋向现代化，它们就不能幸存下来。

事实上，国家成为资本主义是再明显不过的。整个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给予私人财产和资本积累以特权上是坚定不移的。而在传统上，欧洲国家对它们的臣属的财产没有太多的支配权。到资本主义财

产和市场都彻底制度化的时候(在英国是1760年，在西方的其他地方是1860年)，几乎所有的政治运作者都已经把它们的逻辑制度化了。由于所有的国家都进行了商业化和工业化，它们在成形方面变得更相似了。我可以用形容词来表达资本主义的特征：自由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等等。同时，国家(包括区域)经济互不相同，英国是这一时期真正的工业社会；德国和奥地利则是出名的后发者。这些资本主义成形中的形形色色有其重要性，尽管我们应该看到，在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中，它们通常没那么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国家的执行长(executive)是，而且只能是这么一个集体(committee)，它可以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共福利谋利益"(1968，p.37)。这里，除了"而且只能是"之外，它都是对的。西方国家以前是、现在仍是资本主义的，它是这么一种成形，并在针锋相对的反对者的挑战中相对稳固。在这一时期，我们几乎不能发现什么来自封建运动的迎头冲突。实际上，封建主义倾向于将自身转变为资本主义，并且，它与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认为的那么冲突。更多的反对倒是来自社会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一面)，尽管资本主义的成形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阶级冲突，但同时也引向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霸权。

尽管西方国家过去是、现在仍是、而且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多元论者还是寻求加上许多成形。对阶级，他们添加上了部门的权力运作者，其中，有些是经济的，有些则不是经济的：城市与农村的、区域内的冲突、天主教与新教的以及与世俗、语言与民族的冲突、政治化的性别冲突——所有这些形成了政党，并且，这些冲突有时候增强，有时候削弱了阶级。同时，国家也有更特殊主义的压力集团。一个工厂、集团，或一个职位、部门，甚至一个知识分子沙龙，都有可能决定保持政治平衡的政党，或者能享有良好的沟通渠道，以便作出政策决定——尤其在对外政策上。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区域或地方政府都是独特的。然而，是不是这些多元论者的添加仅仅只是细节，或者它们真的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分母？宗教群体、区域性党派，甚至沙龙都有可能

改变(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本质上是否还是资本主义的呢?

确切的答案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在西方的这一时期，权力网络也围绕其他的高级国家的范畴(issues)来成形。其中的两个以市民身份为中心，即谁享有它，以及它存在于哪个地方，我用术语来表述它们，即“代议制”的问题和“国家的”(national)问题。

代表权(问题)主要围绕达尔的两个民主先决条件：竞争和参与。竞争开始表现为一场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它产生了“局内的”(in)和“局外的”(out)、“宫廷的”和“国家的”党派。当它们中的一个党派通过赢得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组成一个代表主权的政府时，竞争就完全出现了。这种选举首先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保证，过了几十年，在英国也得到了保证。参与关涉哪些阶级、种族、宗教和语言群体，关涉它们中谁应该被赋予选举权和得到政府官位(这是以后的事)，以及得到国家的教育文凭。在这一时期的最末段，参与还关涉妇女选举权的问题。

一些政体产生了更多的竞争，而另一些政体则产生了更多的参与。在漫长的19世纪，竞争是一个(比参与)远具重要性的让步。一个政体，当反对党能够成为代表主权的政府的时候，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它拒绝一个在其中只有男性才享有选举权、且其政党不能拥有主权的政体。威权的君主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情愿在男性普遍选举权上作出让步，而不愿在议会的主权方面作出让步，其原因在于，前者仍然允许君主拥有显要的专制权力(在20世纪的独裁政体中，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第二阶段，尽管比起普鲁士—德国，英国在选举权方面有更多的限制，但我还是要把英国称之为政党民主(国家)，而不是普鲁士—德国。议会是代表主权的，而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则不是。我们应该看到它们政治上质的不同：英国的政治关涉到政党，而德国的政治关涉的是政党以及君主制。

这样一来，在这一时期，代表权持续稳定地由专制君主制向完全的政党民主制演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不均衡地推进。[2]开始是

英国，然后是美国引导了这条道路，留下法国在后面走弯路。到1880年，所有这三个"自由"国家(除了美国南部)都提高了它们选举的自由度和开放度，与此同时，它们还获得了主权的合法性(sovereign legislatures)(尽管它们在对待谁应该享有选举权方面各不相同)。由于它们演进的主线是代议制，因此，我经常把它们与另外两个持久的君主政体——奥地利和普鲁士—德国——相对照，后者没有允许议会拥有主权，而且它们的君主组建他们自己的内阁(ministries)。但是，我们可以分辨出这一时期的不同程度的专制：俄罗斯式的"独裁"拥有比奥地利式的"王朝主义"更多的权力和自主权，而后者则比德国式的"半威权主义"君主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对德国的权力")。同时，在所有国家，冲突——针对更多政党民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支配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政治。

然而，同样地，许多国内的争论也围绕到哪里去参与。国家应在何种程度上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和"国家主义的"(national)呢？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的冲突给美国带来了内战，给德国、意大利和哈布斯堡大地也带来了战争。这一争论持续地建构了世俗的政治。联邦主义在美国始终很重要。德国的政党政治则显得很复杂：一些政党基于阶级，一些政党明显基于宗教[最知名的是天主教中心(the Catholic Center)]，一些政党并不明显地基于宗教[如类似于保守宗(the Conservative)、民族自由党(the National Liberals)，以及表面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党(the Socialist)那样的新教政党]，另一些政党则基于种族[丹麦人、波兰人和亚尔沙斯人(Alsatians)等等]，还有一些政党基于区域[巴伐利亚农民党、汉诺威教宗党(Hanoverian Guelphs)等等]。然而，它们中的许多政党都围绕着"民族的"议题。天主教徒、南德意志人以及种族政党是去中央集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北德意志的新教中央集权主义者。

19世纪，(英国的)下院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宗教问题，而不是政治经济或阶级问题。尽管区域很重要，但它同时也表述了这样一个议

题，即英国应在何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和国家主义的(national)。是否应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建立国教会呢？教育、社会福利应该是统一的、国家指导的吗？它们应该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纵观所有的国家，活跃的天主教徒都反对国家中央集权；教会在仍然保持超民族的同时，增强了地方—区域的组织。

所有的国家都在为不断增强的斗争所困扰，这种斗争来自中央集权与地方—区域权力的对立。原因在于，历史上有两种有名的反击专制主义的方式：将民主代议制中央集中，或削弱所有中央国家权力和促进多元的地方—区域政党的民主。19世纪，国家基础权力的巨大增长使如下的问题异常恼人：把这些权力放置到哪个地方？例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和区域的少数派就坚定地拥护"反国家主义"(antinational)的"去中央集权"(decentralization)。然而，这些至关重要的、关涉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一直以来都被所有国家理论所忽视(尽管没有被 Rokkan 所忽视：1970，pp.72—144)。阶级和多元论理论家使用同样的模式，以分析地方和中央政府；精英论理论家和韦伯很少提到地方政府。然而，现代国家的政治从基础上关涉到不同层次政府的权力分配。表 3.3 表示的就是原则上的选择。

表 3.3　国家的问题：中央对地方基础权力

		中央政府	
	基础权力	低	高
地方政府	低	（前现代国家）	联邦(制)民族—国家
	高	邦联(confederate)国家	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所有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国家都扩张了它们的基础，因此，表 3.3 的左上部分是空的。绝大部分扩张关涉到地方—区域政府，关涉邦联国家的发展。正像在 19 世纪的美国，绝大部分政治职能被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而不是被华盛顿(中央政府)所承担。或者，扩张也有可能压倒性地关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就像大革命以来的法国；或

者，扩张在这两个层面均匀地展开，进而产生一个联邦国家，就像在德意志帝国和20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们相信，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的奥地利—匈牙利(最初是在美国)，代议制运动的敌人是中央集权。然而，在法国，民主曾经就是中央集权。在这些争论中，阶级和国家相互缠绕，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对另一个产生了无意的影响，并各自地成形。阶级和国家是“不纯的”，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相互缠绕。

在对外政策方面，国家(关注的)议题的焦点是，挑衅的地缘政治外交应该是何种程度国家主义的，何种程度上是国防的(territorial)，以及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掌控对外政策。这个议题连带牵涉到第二章所确认的国家政治经济的第六种形式，同时它也牵涉到第四种国家高级成形：**军国主义的成形**。这一时期之初，国家至少将岁入的四分之三用在军事上；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末，军事支出已经下降，仅相当于40%左右。这样一来，军国主义仍然遍布在国家里，在财政政策里，以及遍布在针对公民身份的二元的、代议制—国家的(national)成形中。

同时，军国主义与国内代议制和国家的成形也有关系，而压制就是(军国主义)对付这些成形的明显手段。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对内和对外压制间的混合，因此，也就不可能将它们在单一的军国主义连续体中进行排位[就像我处理代表权(representation)一样]。美国最低程度地卷入军事地缘政治，因此，也最少受它的威胁。然而，贯穿整个时期，美国在国内进行针对土著美国人的种族灭绝的同时，奴隶制也招致了相当的地方压制，因此，美国人的生活中遍布着暴力。由此看来，美国的地缘政治军国主义的程度是低的，然而，其国内军国主义在我所述的五个国家中也许是最高的——毫无疑问也是最具暴力的。另两个悖论之一就是，这个时期的最强权：大不列颠在国内是最和平的；悖论之二是，对奥地利，由于其政体受到跨边界的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威胁，国内的和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融合在一起。军国主义的成形是二元的，从而也是复杂的。

军国主义动员的不只是军事。在这一时期的前半个阶段，旧的军事体制(与君主制结成特殊主义的同盟)有助于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概念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对外政策形成相对的国防定义(territorial definition)。20世纪之初，这些(清晰的概念)在主张地缘政治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政党的支持下，在主张国内军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阶级的支持下被强化。所有的军国主义者受到了更倾向反战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同时，后者很少是直接的反战论者，更经常的是他们寻求限制镇压(行为)、军事开支、征兵和战争。在西方，要废除军事实在是很难的，因为它们为权力带来了太多的利益，但是，它们或许可以降为政治的最后工具。这也是绝大部分类似的自由主义者和外交使节的愿望，然而，1914年(的战争)证明他们的愿望落了空。

如果能够就这四种高级国家成形的“终极”关系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这会有四个难题。其一是样本的数量。我已经确认了四种主要的成形。尽管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成形只是一个二元对立体的，然而，问题在于，它们能产生十六种可能的组合。诚然，资本主义的变体相对最少，但是，军国主义包含了两个有区别的维度(地缘政治的和国内的)，同时，代表权问题和国家的问题将以多个形式成形。因此，为数众多的可能性所造成的可能组合(成形)也是不可胜数的。这样一来，再一次地，宏观社会学将比较方法的边界进一步向外拓展。具体地说，不可能有足够的国家，可以用来在检验每一种成形所造成的冲击的同时，却把另一些成形看成是不变的。

其二，这些国家并非都是高度自主的、类似的情况。所有四种权力来源——超民族经济的、西方文明的、军事群体的以及外交的——在这些国家中迅速扩展。一个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单个震惊性事件，或者像普鲁士—德国这样一个单个国家的崛起，对所有的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将某一特例理论化显然有其限制。

其三，所有四种成形相互缠绕产生了突显的、不可预期的后果，从

而影响到各自的发展，即“互相作用”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民族—国家发展并变化着，就像它们将偏爱的、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代议制和军国主义，以及后者的合理性内在化(internalized)一样；资产阶级也变化着，它们将偏爱的，相互竞争的，关乎代议制的、国家的以及挑衅的领土利益概念内在化；军事也变化着，它们保卫财产，保卫拥有选举权的阶级以及国家。在本卷中，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民主、民族—国家以及军事特权阶层没有以“纯”的形式出现。19世纪，国家是在所有四种成形的缠绕争斗中，以非辩证法的方式建构而成的。

其四，阶级、代表权(representation)、民族—国家以及军队—市民关系不但参与国内政策的制订，而且也参与对外政策的制订，因此它们的不纯度不断上升。对外政策保持愈加被隔离、更特殊主义的状态——这使得旧政体下的国家领导人、军事特权阶层、反复无常的国家主义党派和压力集团更多地掌控了对外政策；而资本主义、代表权以及国家中央集权更多地掌控了对内政策。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斗争极少迎头相撞，但是，它们以重叠的、缠绕的方式演变成不同的成形，进而，这些成形以无心的方式相互影响。对此，我的终极经验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生原因：任何一个单一的运作者，即那些类似绝对主义君主、阶级、议会、高级官员和多元利益集团的“精英”——都不能控制它们产生的各种结果。现代国家成形时突显出来的形式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曾预想过的。同时，这些形式又反过来转变了它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利益。

基于以上这四种障碍，我更倾向于使用深入的而不是广泛的权力研究方法，即把研究建立在对五个国家的相对丰富的了解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许多国家和变化的肤浅的了解上。甚至，就用这五个案例[有时，也会发生用它们中的几个来轻率地代替整个五个(个案)]，我就能反击“单一的因素”(single-factor)理论，并且反击就一般模式得出宽泛的结论。但是，我的研究同时是某一时和某一地的历史，也是关涉一个异常的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结论

通过借助所有这些主要的国家理论，我已经得出了我自己的多形(国家)理论，它部分关涉制度，部分关涉功能。我认为，阶级理论强调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以及强调阶级斗争经常支配了政治，是正确的。然而，我不认为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成形在某种程度上是“终极决定性的”。我也认为，多元论对多重权力运作者、多重国家职能和(部分的)迈向民主的进展所作的确认是正确的。这将引领我们进入第二种高级国家成形，即代议制国家成形。在这种成形中，君主发动了一场针对政党民主的(与第一种成形中的阶级斗争缠绕在一起)、无望取胜的战斗。同时，在国家的议题(national issue)上，多元论与第三种成形是相符的。然而，我拒绝接受多元论的民主概念，因为它把民主概念看成是终极决定性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投票或共享的观念，还有更多的权力形式影响了结果的出现。就真正的精英论者而言，我接受了他们关于中央国家的人员能够建构自主的权力运作者这一看法。进而，我确认了这一时期中的两个相当不同的运作者。此时，君主制仍然存在于一些国家，它拒绝政党民主，乃至产生了不同的代议制成形。同时，尽管地缘政治的和国内的压制通常与市民社会运作者结成特殊主义的同盟，但是，这些压制造就了第四种国家成形，即军国主义的成形。只是，第一种权力，就其本身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而后者则是更飘忽不定的。是所有这些成形的组合(加上来自道德—意识形态的和家长制的成形的影响)，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国家的“终极”模式。

然而，正像混杂理论一样，我相信，国家来得比任何单一理论所认为的要混杂得多，却没那么系统和统一。这样一来，我通过借助国家主义理论的另一形态和马克斯·韦伯，就发展出了我称之为“制度国家

主义”的理论。要想理解国家，要想理解它们对于社会的冲击，我们就必须明确它们的制度特征。由于现代国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制度性基础，因此，它在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建构者的角色的同时，还提高了所有成形的权力。这样，我的西方社会史将把焦点逐步集中在国家成形上，而这些国家成形是互相缠绕的、代议制的以及军国主义的，并关涉资本主义的非系统发展。

注 释：

[1] 这里，我再一次在韦伯的意义上使用“政党”一词，意指任何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集团。对国家主义者而言，他们一般通过院外集团(如海军联盟、帝国联盟等等)来施加压力，而不是通过赞助正式的政治政党的形式。

[2] 在这一时期，它(代表权)是单向度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20世纪，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因在于，这时绝大部分专制国家已经放弃了君主制，并实行政党独裁或军事政体。它们中，每一个国家都具备“非民主”特性，且有别于君主制。

参考文献

Abrams, P. 1988. 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

Albertini, L. 1952, 1956, 1957.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ford, R., and R. Friedland. 1985. *Powers of Theory: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E. N., and P. R. Anderson. 196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ales, D. 1987. *Joseph II . Vol. I :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0—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etham, D. 1985.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ndix, R. 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ock, F. 1977.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lins, R. 1986. Imperialism and legitimacy: Weber's theory of politics. In his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 A. 1956.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olyarch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mhoff, W. 1978. *The Powers That Be: Processes of Ruling Class Domin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The Power Elite and the Stat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Easton, D. 1965.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Eisenstadt, S. N. 1969.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Giddens, A. 1972. Politics and Sociology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London: Macmillan.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76.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 Heinemann.

Huntington, S.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 1977. Recen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l.

1982.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 and J. Ny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Kiser, E., and M. Hechter. 1991.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Krasner, S. D. 1978.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umann, E. O., and D. Knoke. 1987. The Organizational Stat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evi, M. 1988.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pset, S. M. 1959. Political Man. London: Mercury Books.

Lipson, C. 1985. Standing Guard: Protecting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cIver, R. M. 1926. The Modern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ier, C. 1981. 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6.

Mann, M. 1988.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rshall, T. H. 1963.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Heinemann.

Marx, K., and F.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yer, A. J.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Croom Helm.

Miliband, R.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Mills, C. W.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mmsen, W. 1984. The Age of Bureaucracy: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 Oxford: Blackwell.

Morgenthau, H.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Wa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Mosca, G. 1939.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Hill.

O'Connor, J.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Offe, C. 1972.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lass structure: an analysis of late capitalist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2.

1974.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Germ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1, ed. K. Von Beyme. London:Sage.

Offe, C., and V. Ronge. 1982. Theses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In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ed. A. Giddens and D. He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ppenheimer, F. 1975. The State.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Padgett, J. F. 1981. Hierarchy and ecological control in federal budgetary decision ma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Poggi, G. 1990.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u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ulantzas, N.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Verso.

Rokkan, S. 1970.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Approaches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Rosecrance, R.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osenau, J. 1966. 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 R. B. Farrell. Evanston,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Rueschemeyer, D., and P. Evans. 1985. The state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lying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w, M. 1984. War, imperialism and the state-system: a critique of orthodox Marxism for the 1980s. In *War, State and Society*, ed. M. Shaw.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Dialectics of War: An Essay on the Social Theor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Pluto Press.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inmetz, G. 1990.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of an autonomous state: industrialists, Junk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Imperial Germany.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2.

Tilly, C. 1975.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Trimberger, E. K. 1978.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ir, M., and T. Skocpol. 1985.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wed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 Evans,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r, M., et al. 1988.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lfe, A. 1977.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Zeitlin, M. 1980. On classes, class conflict, and the state: an introductory note. In *Classes, Class Conflict and the State: Empirical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ed. M. Zeitlin.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84. *The Civil Wars in Chi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四章

英国工业革命和旧的资本主义政权，1760—1880 年

在第一章中列举出了英国的矛盾之处：英国在世界历史上集体权力中最伟大的冲击——工业革命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但在个别权力方面却没有看到任何变革。在爱尔兰以外的英国本土上出现了渐进的代议制改革和民族的统一，其原因何在？

修正主义经济史学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简单的方法，他们把工业革命的“革命”二字去掉，认为工业化也是伴随着仅仅是适度的结构改变的渐进过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早期无产阶级运动的干扰而对工业化不屑一顾，他们强调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早期过渡，这种过渡以现在从农商资本主义到工商资本主义的转变而结束(E.P.Thompson, 1963)。辉格党派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扩散的渐进现代化，他们把工业现代化看作是民权与宪政的成就相互影响而稳定发展到更大的民权和民主的过程(Plumb, 1950, p.140; Marshall, 1963)。摩尔(1973, ch.1)综合了辉格派和马克思派的观点，认为：英国经过改革而进化到民主是因为缺少一种使用强迫劳动的土地贵族，并且出现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和辉格派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把民主强加于国家之上。托利派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旧政权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和政府，并在整个 19 世纪迫使人们服从。它最终的衰落更多地来自本身的错误和分裂，而不是工业革命施加的压力(Moor, 1976; Clark, 1985)。

我毫无保留地借鉴了以上所有观点并且加入了我对军事和地缘政治.

的侧重。工业化的结构实际上是由时间更久的市场资本主义组成的。英国政府很早就把民权和一种初步的政党民主形成为制度。然而在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多)之间存在冲突，但这些阶级并不纯粹，部分是由社会权力的非经济来源塑造而成的。各阶级身份最终被强化，随后因战争压力而妥协，导致双方共同支持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两个阶级的核心融合成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体现为今天仍存在的“旧资本主义”。我的解释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权力组织、经济权力组织、军事权力组织和政治权力组织。我对国家的特别机构予以特别关注。无论是旧政权的自由主义还是改革的胜利，都不能被归纳为工业主义或资本主义。四种社会权力来源的综合发展导致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走向妥协，实现了政权现代化和民主。

工业革命

让我们由所熟知的最简单数据——人口的规模开始，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很多东西。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表A3.3)及里格利(1985)证明人口的增长在1520—1700年间主要在伦敦；从1700年到1770年主要在历史性的地区中心或港口，如诺里奇、约克、布里斯托尔或纽卡斯尔；1770年以后主要在新的制造业和商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从1520到1801年，农业人口的比例从76%下降到36%，也就是说生活在农村的人(少于5000人的地区)从事非农业的人口从18%上升到36%。到1801年，农村的服务业、商业、“原始工业”已与农业相持平，但城镇仍只容纳了28%的人口。当时的资本主义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相差无几，农业、商业和工业也相差无几。从农业郡到制造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口大迁徙，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史前阶段，其中包括以伦敦为主导

的两个世纪。此后，以工业为中心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这比第一章中讨论的两分法理论所暗示的迁徙更复杂，更少革命性。也许英国的个别权力机构真的能应付工业革命。实际上，修正主义经济史学家一直在将“革命”的某些内容从工业革命中去掉。他们认为1760年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830年前达不到3%，与人口的增长率大体相同。出口缓慢且主要来自同一个工业部门——棉花业。这期间，英国几乎不存在工厂、蒸汽动力的机械化、出口的增长及工业结构的变化。到1841年，机械化已完成了“革命”，其数量低于劳动力的20%，且主要集中在纺织部门(Harley, 1982；Crafts, 1983，1985, pp.7—8；Lee, 1986)。然而，如果我们用稍长的时间框架考察，将发现变化确实是惊人的。到1850年，大部分的劳动力和投资已经转移到城市、商业和制造业。以前的三个世纪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长时间的农业发展时期，过去的两个世纪也从未有过如此的商业扩张，也从未出现过以商业、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用世界历史的术语讲，如果上述情况合在一起不被称之为“社会革命”，那还有什么能被称为“社会革命”呢？只要把“它”看作许多的连续过程而非单一的一维事件，我们就必须称这些事件为“革命”。

革命的原因仍存争议。多数历史学家把它归为农业的需求(Eversley, 1967；John, 1967；McKendrick, 1974，1982, pp.9—33；Pawson, 1979；更多的欧洲学者观点可参见Hagen, 1988)。另一部分人声称1710年后农业增长缓慢，到1760年后完全停止。他们强调工业生产力和国际商业供应方面的推动力(Mokyr, 1977，1985；McCloskey, 1985；O'Brien, 1985)。争论本身揭示了革命的最普遍原因：供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三个部门内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的经典规律——供与求、市场竞争、利润的刺激、边际效用等等——现在能够描述18世纪晚期的英国经济。大部分人口(首次在广泛社会内)在整体市场的市民社会里成为商品的购买者和销售者。很少有经济学家去评价市场机制的独特性。然而，这些机制至今仍未能支配人类社会。

在第一卷里我确定了使这样一个长期经济得以实现的条件：私人财产分成小块的出现，对土地劳动力的剥夺，在基督教世界规范标准内部地方庄园网络的统一，欧洲大陆的“经济资源分散投资组合”(Jones，1982)，以及有利条件从更潮湿的土地到公海航运的转移。所有这一切在世界上尤其在西北欧和英国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

通过人口的增长揭示了革命中期的原因首先来自于农业，农业产量在到1710年的一百五十年间翻了一番，解放了的大批人口进城从商，也迎来了农业经营的多样化。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部门的整体需求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推理文化以及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公路、运河、邮政(Albert，1972；O'Brien，1985)。最后，英国开始支配国际航运和商业；这也是地缘政治、军事的原因和结果(例如：军事工业成为钢铁和纺织品的最大消费者)。到1770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控制了文明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产生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

直接原因来自三种工业部门：煤炭、钢铁和棉花。它们集中于：

> 用快速、规范、精确、持久的机器代替人的技术和劳动；无生命资源动力代替有生命资源动力，特别是将热能转为功的蒸汽机引进生产，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几乎是无止境的能源供应；新的更丰富的原材料得到应用，特别是矿物取代了植物和动物物质。(Landes, 1969, p.41)

这些发明虽小，但是在早期的技术突破方面是很大的进步(Lillee, 1973, pp.190—191；也可参见我的第一卷：pp.403—408)。蒸汽机本身就是一个连续递增革新的佳例，它在军事附加的最后推力下连接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随着对煤炭需求的增加，要求挖掘更深的煤层，结果煤层被水淹没，第一台蒸汽机(纽柯门的空气动力机)就用来从煤层中抽水。然而煤炭供应的增长又造成了运输煤炭入炉的困境，纽柯门—瓦

特的抽水机由此改为拉煤的牵引机车。煤炭价格下跌，使得焦炭代替木炭，从而使持续高温成为可能。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较好的设备及铸造技术的需求。所以在兵工厂内，开始采用蒸汽机来提高铸造技术。市场压力自始至终都是重要因素：煤铁消费者的相互需求(特别是军队)及其副产品工业(主要是铁路)。在供应方面的革新依然不可预测，但其发明并非简单的跟随需求变化。但是我们确实不完全明白纽柯门、瓦特、布尔顿、阿克莱特、威奇伍德及其他人是如何得到他们的发现的(Musson, 1972, pp.45， 56， 68； McCloskey, 1985)。

我们的确知道大资本和复杂科学直到很晚的时候也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工业革命在英国主要靠小企业主以及他们的家庭和朋友们的金钱资助，而不是像后来其他国家那样有大量的原始资本(Crafts, 1983；Mokey, 1985, pp.33—38)。有组织的科学在早期也没有起很大的作用(Musson and Robinson, 1969； Musson, 1972)。大部分实验局限在小作坊，甚至在单一的工作台上进行。瓦特的著名水壶确实存在，就是实验室中的微型烧水壶。科学在生产化学品中很重要，它也间歇地用于机械，但很少用在纺织工业上。为数不多的发明者只是些“熟练工匠”(见兰德斯的手稿)，大部分人在技术手工行业受到训练，并广泛阅读了启蒙时期的自然哲学。利用自由市场去探求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比有组织的科学更重要。

没有大规模科学、复合技术以及集中的资本，工业企业只能保持小规模，主要由已存在的商业机构组成。企业主(“中间人”)往往来自普通商人。企业以家庭为基础，且主要由妇女掌管，与供货商保持长期的私人联系(Wilson, 1955； Pollard, 1965； Payne, 1974； Chandler, 1977；Davidoff, 1986)。蒸汽动力使一些工厂(我在第十五章里列举了数目)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大量劳动者成为可能。家庭之间往往有专门的合作关系，一般商人把工厂分成更小、更专门的企业，一个企业主可以和一个熟练的技工发明者合作，来监督雇用工匠。超过五十人的企业寥寥无几。国内外独立的工作代理机构负责销售和分配。

支配这个世界的是小雇主、批发商、贸易商、工程师和独立的工匠，他们雇用的劳力和少量的家庭资本合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他们的工业革命——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成就——但是他们还没有组织为一个阶级。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广泛组织。文明社会在农业和商业方面已经制度化，“看不见的手”促进着无人专注的事业向前发展。与法国不同，在英国，旧政权体制已经彻底制度化，把资源看作商品，捍卫绝对财产并追求海外利润，小资产阶级利用组织起来的其他阶级获取利润。

18世纪的各个阶级

英国没有自封的资产阶级。与其意思最接近的词是“人民”，指的是那些在新兴民族国家中有利害关系(即财产)的人。然而，多数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却被排除在选举和政权机构之外，不是人民的正式成员。此外，当时的阶级术语五花八门，本卷中我认为大致有五种可归为“资产阶级”。

1. 旧的政权，1760年的英国统治阶级包括君主和宫廷、国教会、贵族、乡村贵族、商业寡头组织。他们拥有大量财产作资本。他们通过“禄虫”来控制政府。许多高级专业人员和公务员(包括高级军官)是这一阶层的人或者依存于这一阶级，虽然这一“新的”资本不在此列。尽管旧政权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其组织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持敌意的当代人称之为“该死的腐败”。后来“旧政权”蔓延到整个欧洲，这一标签并不意味着显示和谐，而是政治上的宗教林立。

2. 小资产阶级(包括独立工匠)通过商业、制造业获得少量资本。他们的数量、财产、文化和自信心都处于上升阶段，但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因此他们有时反对旧政权。他们包括克拉斯茨所称的“有机知识分子”、少量律师、教师、记者，他们明确有力地表达资产阶级的自由

观念。在法国和英国的较小范围内，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在领导着革命。“中等阶级”是当时英国用的最普遍的称呼，但是“小资产阶级”一词更准确，其含义是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但这词并不理想，因为该名称在英美不如在欧洲大陆响亮。我把“中等阶级”一词保留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使用(见本条目的第五个阶级，Neale, 1983 年用于指上述人)。

3. 农场主拥有和控制(如舒适的佃农)少量的土地财产，大部分使用家庭劳力或使用少量雇佣劳动力。在欧洲大陆用“农民”一词足够了，但在英美这一词却稍带贬义，因而用“农场主”一词来勉强替代。大部分英国小农场主没有土地财产，他们虽然从地主那儿租地，但却拥有某种稳定的土地保有权。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是以上三种阶级是 18 世纪主要的资本主义行为者。农场主保持着他们的阶级身份(见第十九章)，但是在 1830—1870 年间，许多国家的其他财产拥有者分化组合，形成了两个新阶级。

4. 资产阶级是旧政权与包括土地、商业在内的小资产阶级上层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到了大约 1870 年，资产阶级统治着英国，“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法院、教会、土地贵族、金融机构、工业公司以及民族国家大多都集权于他们的手中。这种融合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把英国的各种形式统称为“旧政权的自由主义”。

5. 中产阶级形成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及其他地方(尽管现代人通常拼为“中等阶级”)，这一阶级及其三个派别——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员、流动职业者——将在第十六章中讨论。原来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工匠变成了无产阶级。这些阶级是很理想的形式，它们并没有坚决地凌驾于 18 世纪的社会之上。它们并不仅仅在耍阴谋诡计，它们的声音代表了整个时代。最早以“政治算术家”面目出现的三位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格雷戈里·金(1688)、约瑟夫·马西(1759)和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1801—1803)对他们所称的英国主要社会阶级的人数和收入进行了统计(见表 4.1)。

表 4.1 1688，1759，1801—1803 年按男性户主的社会阶级

英国家庭和家庭收入的百分比

当时的各个阶层		所属阶级	1688		1759		1801—1803	
辉格党政客	社会学家		%家庭	%收入	%家庭	%收入	%家庭	%收入
人民	高头衔者、	旧政权	5	28	5	27	5	28
	专业人员、绅士、巨商[1]、	农场主	16	22	16	25	15	26
	自由职业者、农场主、小商人、制造商、较大的工匠[2]	小资产阶级	15	26	19	27	16	23
（处于边缘的）平民	较小的工匠[3]、	（处于边缘的）	12	8	17	9	21	13
	劳动者、农场雇工、	劳动者	45	12	37	8	36	8
	贫民、流浪者、陆军和海员	—	7	4	6[4]	3	11	15

注：

① “各商人团体 1688 和 1759 年每年的平均收入至少 400 英镑，1801 到 1803 年每年收入 800 英镑。”

② 1688、1759 每年平均收入为 40—399 英镑，1801 到 1803 平均为 80—799 英镑。国王把“所有制造业贸易”概括为平均每年收入 38 英镑，我把他们平均分成较大的工匠和较小的工匠(假定年收入 25 英镑)。

③ 也包括矿工和建筑工。

④ 因那年军队扩编而明显低估了。

资料来源：当代人估计数(Gregory King, 1688, Joseph Massie, 1759, Partrick Colquhoun, 1801—1803)，修订(Lindertand Williamson, 1982, Crafts, 1985)

我的“旧政权”理论已被上面三位社会学家认同，所有杰出的“高头衔者”和“技术专业人员”都被划分为相似的类型：贵族和绅士、牧师、政府官员、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我把这种划分稍作改动，通过增加“较大的商人”来使旧政权更像阶级，而与社会地位的级别联系不太密切。上述三人的估计有所夸大，认为旧政权占家庭的 5% 和国民收入的 27% 到 28%。高头衔者和绅士只占家庭的 1% 强，但却占国民收入的 15%。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员在这一整个时期保持最富有集团的第二名，之后是大商人。

在社会的底层，正走下坡路的劳动者，或许是不同等级划分的典型

产物。他们的数目也掩盖了这一时期贫民的主要变化：农业劳动者相对减少。说到“平民百姓”，这些经济学家对按经济部门形成的差别不感兴趣。只有科尔库霍恩试图将工业劳动者和矿工归为独立的部门类别。在英国和法国，自由党和辉格党派作者往往把有财产、受过教育的“人民”与下层“平民”区分开来。这在启蒙哲学家霍尔比奇的言论中特别明显：

> 我认为“人民”不是指愚蠢的平民，他们被剥夺了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随时会成为扰乱社会的狂暴煽动家的工具和共犯。每一个能以财产收入体面生活的人，每一个拥有地产的家庭成员，都应被视为市民。(《社会制度》,1773, vol.2)

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多数人像1688年一样在农村务农或像后来一样可能从城市、商业或工业部门吸引出来，都无关紧要。但是他们只占人口的40%强，与中间阶层人数相当，并不占人口的大多数。

社会学家很容易把“中产阶级”里的农场主确认为一个独立阶级——占15%的人口拥有25%的财富。他们对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划分不清。金和马西分别少计和多计了店主的数量。马西统计下的多数商人被金划归为制造业商人，而科尔库霍恩则把他们划为工匠、手工业者、机械师。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划分折中一下，则商业人口占9%到12%，可能拥有20%的国民财富。在工业和建筑业中，社会学家把雇主和独立的工匠，有时也将技工和劳动者混为一谈。马西按家庭收入划分制造商；科尔库霍恩按是否拥有资本划分。由于他们中五分之四的人缺少资本，他就把他们归入了巨大的工人阶级范畴，即工匠、手工业者、机械师和在制造业、建筑业中工作的劳动者。

同时代的社会学家还不能确定如何处理新的行业阶层，如何从商业中区分出制造业者和建筑业者，他们混淆了工匠和劳动者。他们不能

确定“人民”从哪里结束，“平民”从哪里开始。

他们陷入了两难处境中，没有最好的途径对大部分人口实际上正竞争着的经济身份进行确定。在表4.1中我已经采用了一种不完全的解决方法，即把商业和工业类型结合成一种综合的“小资产阶级”。15%—19%的人口占有23%—27%的财富。他们的规模和财富又随着制造业、建筑业、工匠的增长而增长(因为1801—1803年的扩大征兵而在图表中显得模糊不清)。在辉格派的用语中，农场主和旧政权被称为“人民”，他们以下的人被称为“平民”。但在小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潜在的错位。工业、建筑业内不断增多的人口并不像商业中的那些人富有，他们的收入与国民人均收入大体相当。四分之三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者(约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是工匠，他们比我在表中列举出的位于“边缘”的较小工匠拥有更多的财产，生活更稳定，但两者却一同分享许多共同的人生经历。

这些“中间”阶层可能分解为两种主要的形式：一是反对旧政权和农场主的更宽泛的小资产阶级，或是表现为与其下层商业小资产阶级、工匠和劳动者的对抗，工人阶级或平民仍居其下。“阶级”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像后面几章中展示的那样会随时间和国度而变化。这是个问题，不仅仅是各阶级强弱之别，而是它们作为阶级的强弱和存在(如Moor, 1973; Rueschemeyer、Stephens和Stephens, 1992所言)。在这一章和第十五章中，我把英国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看作是集体运作者，但我们经常发现在二者中存在着同样的行业。我们看一下这些潜在的阶级的一部分(在同代理论中有重要意义)是如何心不甘情不愿地发展成为广泛的政治存在的。

经济中的各阶级，1760—1820年

商业资本主义统治着18世纪的英国(Perkin, 1968；Abercrombie, Hill

and Turner, 1980, pp.104—119； Hill, 1980)。旧政权、农场主、小资产阶级都在市场上出售商品，且大部分都雇用自由工资劳动者。契约劳动力日益减少(Kussmaul, 1981, p.4)。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终结了一般土地所有权，大部分可转让的封建特权和限制到1700年时都被废除了。绝对的个人财产仍通过"严格规定"保护家庭的法律来约束，以使继承人抚养其兄弟姐妹(Bonfield, 1983)。但与旧体制的法国不同，英国没有享有特权的阶级，他们把非资本主义的财产奉为神圣。

1760年到1820年间，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也获得了胜利(不是中等阶级而是旧政权)，旧政权的立法目标多放在工业传统主义，而很少放在农业方面。政府已长期管理工资、学徒期和价格，建立起垄断公司并为大企业颁发执照。但是到了1820年，政府取消了对工资、学徒和工会的限制，大部分国际商业从垄断下解放出来。这是未经改革的议会通过立法实现的。议员都是拥有商业和银行利息的商人、银行家、土地所有者和专业人员，没有一个是工业家。1804年，大皮尔提议立法废除行会会规，以"保护学徒健康和道德品行"。他或许是两院中唯一雇用学徒的议员。给这样一个政权贴上"自由放任主义"的标签似乎并不合适，它的海军通过《航海条例》无情地强制执行对海上贸易的垄断。最具资本主义性的新兴美国政府，不是致力于国际自由贸易而是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沃尔夫更恰当地运用"敛财国家"来描述英裔美国人的诸州(1977, pp.13—41)，简而言之，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的经济对立。普遍立法推动把州及其划界的领土看作是公民社会的边界，他们大多数毫无意识地被归化了。大部分"不列颠人"和威尔士人现在显然是英国人，虽然许多爱尔兰人不在其列。当代人不假思索地把英国等同于不列颠(像我们以前做的那样)，宣称英国正变成"欧洲最具民族性的民族"。这种阶级民族的身份产生于法国革命中更彻底的民族主义之前(Calley, 1986, pp.97, 100； Newman, 1987)；背着组成国家的那些人，这种以财产为基础的民

族国家正在形成。

但是在英国展开了经济争论。农业利益集团和大部分工业集团支持保护关税，而棉花行业则寻求自由贸易。针对19世纪40年代的《科恩法案》，许多工业主转变立场，争论达到白热化。关于《贫民法》也存在道德意识的争议。自由放任主义要求对市场及强壮贫民工作予以最小限度的干预，然而，旧政权特别是教会支持地方家长式的统治。《贫民法》在整个19世纪30年代都引起争议，但是任何一场争议都没有引起小资产阶级和旧政权间的阶级斗争。

在他们之间存在重大的经济阶级斗争吗？我认为他们的经济冲突是间接的，并由政府的政治经济进行调节。但是麦肯德里克、布鲁尔、普拉姆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旧政权的“委托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市场”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并因消费者经济和大众文化而加强。他们印证了18世纪消费上的激增——各种各样的商品，如衣服、陶器、书籍、种子、剃须刀及铁制棺材。“为保死者安全——最好用铁制棺材”，是市场上的典型广告语，免除了购买者对盗墓者的担心和恐惧。假定这与旧政权的委托制管理产生冲突，这种体制内的商人和专业人员依靠的是名人，而不可能执行对他们的信用。因而，布鲁尔(1982，pp.197—198)说：“中等阶级”，“拥有动产的人、专业人员、商人和店主”被鼓动换旧政权为“基础广泛的市场和平等基础上的政治”——即阶级斗争。

群众消费主义也推翻了旧政权地位秩序的质量划分，引进更巧妙的扩散的财富标准。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

> 在英国，好几个不同级别的人不易觉察地完成了位置置换，一种平等的精神贯穿于政府机构的每一部分。因此，所有不同地位和条件下的人相互间形成强烈的竞争。每个低级别的人本身却有上升到直接高于他们级别的永无止境的野心。这种像是风尚的形势一定总是处于失控变动中。奢侈之风肯定会像传染病

一样蔓延。(节引自 McKendrick, 1982, pp.83, 11)

普拉姆认为这种“风尚”包含着一种“改进”的意识：

> “改进”一词在 18 世纪的英国是个最被滥用的词——地形、花园、农业、科学、音乐、艺术、文学、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等等，都被一如既往地看作改进……之后，商人把这样的词放入其信念中，这个词是“新方法”，或是“最新风尚”……在接受新事物和科学时采用了相当谦卑的行动，如种植报春花或是黄瓜，用斗牛犬与黑狗杂交，给小孩子望远镜或地理游戏卡，参观在英格兰所见到的第一只袋鼠或是观看对于人类生活中最伟大革命之一做出很大贡献的气球升空。(1982, pp.332—333)

思想史学家常常会问，为什么英国不像法国和苏格兰一样产生启蒙运动？他们的结论是，英国实际上已经现代化了，所以它不需要现代化的思想。但是，或许英国真的宣扬过启蒙思想，比如广告标语。“英国启蒙运动”比之修饰、打扮和悼念死者更缺少哲理和正式的思想，只是简单的鼓励美德、功利和理性原则，而非社会地位的排他主义或公司特权。

麦肯德里克和他的同事论证了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崩溃而非正面的阶级攻击。但是，难道旧政权智慧者把这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丢弃他们的利益吗？消费者经济必须有论证沟通的基础机构，而这些机构又是如何有力地表达其阶级利益的呢？

意识形态中的革命

在整个西方，话语能力已蔓延到第二章中所列出的九个行政机构。

像其他地方一样，教会提供了最初和最持久的宣传，接着英国的扩张增加了“印刷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主义渠道。这就像麦肯德里克和其他同事所暗示的那样，把资产阶级和旧政权分开，是鼓励阶级身份的差异，抑或是使它们融合呢？

识字的最低水平是在结婚登记中签署自己的名字，18世纪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男性的60%和女性的45%(Schofield, 1881； West, 1985)。商业城市，特别是工匠和商人的识字水平比农村和工业城市更高(Houston, 1982a， 1982b)。比之更有意义的是话语能力的传播。宗教讲义最为畅销，然后是描述性的小说(在妇女中特别流行)，男人们读的写实文学、报纸、期刊和小册子。1787年伯明翰的一个书商夸耀自己的存书3万卷，每月有10万本书和小册子被阅读——每人平均两本(Money, 1977, p.121)。读书和写信的能力甚至渗透到了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包括他们的佣人。主张市场协调论的作者和出版商提供了大量市场需求信息，体现了普遍的价值(Cranfield, 1962, 1978；Watt, 1963； Wiles, 1968； Brewer, 1976, pp. 139—153， 1982； Money, 1977, pp.52—79)。

整个世纪，报纸和期刊增加了10倍以上。首先以旧政权和商人为目标(船只载满报纸的订书钉)，然后向下层传播。到18世纪60年代，报纸已经进入55个地方城市，伦敦拥有4种日报，5种或6种三周刊(同样在地方发行)，更多的周刊和双周刊。日报的年均销售量超过了1 000万册(Cranfield, 1962, pp.175—176)。读者群也不断扩大，蔓延到“受尊敬的商人和市民”、“绅士、贸易商或他人”、“不论男女各行各业的人”。地方出版者对地方政治问题非常谨慎，直到1790年才出现社论专栏，政府的行贿事件确保了保守派观点的广泛传播。但是，大部分刊物流行于中等地方城市，它们确信，“激进原则，即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知道政府事务”(Cranfield, 1962, pp.184, 273)。到1770年，小册子发行500—5000册，传单和漫画发行量更高。每份小册子都有20—55个人阅读和讨论。

到1800年，大约有600个图书馆和订阅书刊俱乐部，散布在绅士、专业人员、商人、制造业者和高级技工中的读者约有5万人。反对者代表比例太高，而其中妇女反对者又太少，他们大多私下阅读(Kaufman, 1967, pp.30—32)。大批的旅店、小酒馆、咖啡屋、理发馆和假发制造厂都储存报纸、期刊、小册子，因而这些地方成为人们交谈的中心。1739年，伦敦有551座咖啡屋、654个旅店和小酒馆(Money, 1977, pp.98—120； Brewer, 1982, pp.203—230)，它们大多宣称连接社会各阶层，把绅士、专业人员、商人和有教养的工匠连在一起并举办联谊会议(几乎没有妇女参与)。来自欧洲大陆的访问者在与家乡的俱乐部进行了比较后，给予了中等阶级中肯的评价。

新问题随之出现了：像罗马帝国后期(见第一卷，第十章)以商人、制造业者和技工为中心的间隙沟通网络一样，这一次有更多平均扩散的沟通机构。这等于在意识权力关系中出现了革命：一种在扩散的网络周围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固有地不易为任何权威政权所控制。各种政权试图建立审查机关颁发执照，限制集会和讨论。但是政府在税收之外没有什么机构，教会可以作为更有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审查机构，但是所有的审查机构仍不健全。这些机构是竞争的权利运作者为了进行争权夺利而设立的。

麦肯德里克、布鲁尔和普拉姆(1982，特别是Brewer)认为它们鼓励了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就像我已经说明过的那样：罗马网络推动了颠覆性的基督教的发展。在罗马出现的集团不被人们接受，不仅帝国政府不接受，而且官方文化和社会团体也不接受。因而他们发展起一种与帝国官方相对抗的意识。但是18世纪的英国，不存在这样的被隔离的团体。小资产阶级并不总是被排除在选举和政府机关之外(像我们将在后面所见到的)。他们参与同一种经济和文化，阅读同样的印刷文件，参加类似的俱乐部，并且讨论同样的想法。

这些机构从旧政权网络开始就扩大了，就像大规模消费主义从消费开始就扩大一样。确实，他们经常讨论一些更直率的教义问题，而不

是去适应政权体制。但他们暗示了三套阶级关系：现代化的旧政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国内合作、地方政府的超阶级组织。在某些新兴的制造业地区，相对抗的政权(像曼彻斯特那样)进行更多的合作；小资产阶级组织与激进工匠结成联盟。

这种联合产生了模棱两可的不纯洁的意识。在一个极端，在少数激进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独立工匠中形成了具有阶级特性的战斗意识以及对旧政权的反抗。他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中把自己骄傲地看作是"勤奋的阶级"。像"民族"和"人民"这样的标签只包括那些有独立财产和受教育的人，而不包括劳动者(依靠别人维持生计的人)。包括也进行工作的独立资本家——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企业主或是工匠(与游手好闲者和食利者相对而言)——政府"禄虫"和消极地运用资本的印度长官。"该死的腐败"剥夺他人的劳动果实，并鼓励依靠庇护制。允许对市场、劳动开放的商业是自由的，但若受特别的庇护制控制便是腐败。一家伯明翰的激进报纸在描写选举中的两个候选人时，使用了从一个生意兴隆的消费行业——赛马中吸取的比喻手法。称竞赛是在凯利先生的马"独立"和卢斯先生的黑马"地方长官"间展开，"独立"是从自由商业中得到的，而"地方长官"是纯种的阿拉伯马的后代，二者都是专制和腐败的同胞兄弟，得到州运动员的支持(Money, 1977, p.105)。

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它甚至有时提出一种可选择的社会"卓越形象"。纽曼(1978)认为：这种阶级意识汇合了新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现在又得到其地缘政治对手——法国的鼓励。随着旧政权文化的广为传播和法国的弦外之音，小资产阶级的不满获得了民族的色彩。英国的真诚、直率、辛勤工作和新教的简朴，与法国贵族、天主教的骄奢、颓废、傲慢和懒惰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的美德主要在它的人民，尤其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身上。

然而，阶级意识的诸要素并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与旧政权更一致的观念共存在一起。两者都包括"新教宪章"的相互重叠版本。

经过激烈的特别选举，伯明翰的工厂主和商人从郡的贵族手中获得了沃里克郡的席位。但是他们的骑警队迅速地发誓要支持：

> 以我们最优秀的宪法原则为基础的这个地区的法律和自由，通过防止……对革新的每一项侵害和对狡猾的或富于幻想的人提议的滥用……通过促进这一个大帝国的商业利润，本郡声称它享有相当大的一份利润。(Money, 1977, p.211)

在此，伯明翰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被看作是在“旧商业”体制和宪法的框架内是可以实现的。可选择的杰出的思想很不易繁荣，在后面的章节中表明了在美国和法国情况已很少如此。

原则上，教会和宗派也带有道德意识，但有时是模棱两可的信息。不信国教者占人口的10%，占经常参加教会人口的20%以上(Currie,等，1977, p.25)。他们首先在贫民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招募人员，然后扩大到小资产阶级(Gilbert, 1976, pp.59—67)。但是宗派变动很大，有些主要由劳动者组成，拥有一些情绪高昂的“理性反对派”印刷的畅销小册子、得到捐款的书馆、文化和哲学社团、卫生诊所及学校(Seed, 1985)。有些宗派选择了激进的政治主张，这些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派别。许多辉格党政客依靠激进的反对派当选，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韦斯蒂(托利党人)和大多教会领袖使他们的集会远离国家政治生活(Ward, 1973, pp.70—104)。不信国教者是形形色色的，更多的人参与地方社区活动而不涉足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没有称为被压迫者的一种“安慰的宗教”(正如E. P. Thompson所言)。

国教会同样变得更多样化，虽然大多数僧侣集团仍被认为是“该死的腐败”，但福音派教徒们活跃于人道主义事业，偶尔也参与政治改革。总之，活跃的宗教团体致力于家庭和地方社区活动。这样就产生了政治上的多样性和比阶级意识更多的超阶级和地区的意识。教会和大多数话语机构促进了更多的阶级合作和地方主义而不是冲突。这种

多样化的政治将致力于建立何种政权呢？

政治主权和代议制

到了大约1700年，所有欧洲国家都已建立起基本的领土主权。国家敕令，税收官员和招募的军官被派往领土内的各个地方。驻外大使和其他主权国家谈判时更喜欢特殊的“治外法权”地位，有关边界、河流和海岸已经签订了许多协定，将军们还垄断了军权和政治家的外交权。主权以君主、他的家族及其代理人为中心，这些人大体上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就像第三章中讨论的政府理论精英学派所强调的一样。主权由一个君主在国内和地缘政治范围内进行统治。

但主权的有效范围仍然很狭窄。政府实际上无权干涉所谓的个人财产关系，也不能对知识和价值拥有最终所有权——这就是当时国家和平民社会之间的区别。政府权力主要是不固定地行使司法权，维持基本秩序、征税以及征募士兵和海员。很少有机构去实现进一步的政策目标，虽然有一些目标经常被提及。为了实施实际的政策，君主不得不与数量大得多的政治外围人员合作，这些人包括半自治的贵族、侍臣和议会议员，他们也享受政府机构之上的财政权并控制地方行政。

此后，我们就不再与这一时期的单一政府打交道了。其统一性和凝聚性从两方面减少了。首先，整个政府——法院、议会和形形色色的行政阶层事实上都是双层的，有两个政府，在中央是潜在的独立的君主精英，另一个是在与平民社会之间辐射的网络，这一网络，我沿用韦伯的术语，叫作“党派”。18世纪的党派主要是指占支配地位的各阶级一起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各支配阶级之间的各种关系组织起来的派别；其次是把与各级教会一起的关系以及各教会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这些党派使政府功能多样化，作为政党网络以多种形式具体化，处于政府机构内外，动员起来影响它们。政府的功能越多样化，范围越大，

潜在的党派就越多，政府职能多样化就越强。18 世纪，政府职能和政党相对较少，但是政治精英和政党之间及内部存在着“在朝派”和“在野派”、“宫廷”派和“乡村”派，许多党派有组织地进行对抗。因为长期来超国家的教会已经比政府更广泛地渗入到地方，政府对宗教的干预如今已经产生了最为焦躁不安的政治化，这促进了贯穿 17 世纪的代议制压力。如今欧洲人和殖民地社会对政治都相当厌恶。

显要人物都已政治化了。专制王朝时的宫廷和皇家行政机构是政治精英和政党相互影响的政治机构。在代议制政权中，侍臣附属于议会中显要的政党。在整个 18 世纪，英国政府发展形成了政党民主的胚胎。专制权力受到立法、政治和行政权力的限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国教会最引人注目地享有这些权利。从立法上(不如行政上)这是个相当集权的政府，在政府中主权象征性地属于“议会中的国王”，在议会里政党公开进行竞争，国王的权臣仍通过“购买”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只是到了世纪末，真正的反对党才可以赢得选举组成政府。

有效的主权和真正的政府权利一起，支持宪法思想渗透到地区并动员资源，主要依靠政治精英和党派网络通力合作。英国政府控制主权，但如表 4.2 所示，它并不是唯一的。

表 4.2　18 世纪政府与统治阶层神职人员的关系

专制权力	与统治阶层和神职人员各机构的关系	
	中央集权的	非中央集权的
高	普鲁士	奥地利、法国
低	英国	北美殖民地

英国和(近期)普鲁士政府的精英已经集中了他们与统治阶层和神职人员党派的关系，并被吸引进入政府。虽然统治阶层的权利基础仍是地方性的，但一些集体组织却是集中的——在普鲁士集中于皇家机构内部(大学也与日俱增)，在英国集中于议会和通过官职“占有者”。通过对比，奥地利贵族和教会的权力经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体现了更大的自

主性，大多与皇家行政机构区别开来；在法国，他们大多在王权机构之外组织起来，享受免于政治义务的特殊豁免权。这些集权的政府多控制在王朝的“精英”手中，而很少控制在政府精英和阶级神职人员的“派别”手中。

这样，18世纪政府的基础结构权力与王朝精英的专制主义关系便不大，而与协调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主要党派关系的能力密切相关。第十一章表明，18世纪的英国和普鲁士政府可以抽取更高比例的国家收入供政府开支。普鲁士是专制政体，但英国不是。它们与奥地利、法国决定性的区别不在于君主专制权力的程度，而在于它们的政府陷进统治阶级集体权力组织的深度。它们的政府精英实际上很少有自主性，而奥地利和法国的政府精英则有更多的自主性，但他们被架空了，与市民社会隔绝开来。尽管真正的精英理论和阶级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议，但政府同时集中了贫民社会关系和谐的运作者和地区。18世纪的自治政府在大部分的时间和地区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

这也意味着奥地利和法国政权机构不擅长处理来自平民社会的新压力。英国和普鲁士政府已经将有直接“代表”统治阶级和教会的机构稳定下来了。因此，如果平民社会开始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压力。那么这些压力可以潜在地通过党派而直接进入中央权力机构。在普鲁士，这些压力是通过行政机构进入的。在英国，这些压力通过议会及其他刚萌芽的政党民主进入。那么，议会代表谁的利益呢？

政府代议制的定型是否会将政权和小资产阶级分开，从而导致两阶级之间的冲突？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男性被排除在选举和政府职位之外(还有所有妇女)，这导致1832年《大改革法案》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被描述成阶级斗争。但是英国的政治机构是排他性的。大约有50万有产男性(占成人男子的15%)可以选举和担任公职，公民权的不平等植根于阶级歧视、传统习惯和地理因素之上。议会中有代表的市镇选民从威斯敏斯特的1.2万纳税人到劳塞勒姆的零选民不等，劳塞勒姆的庇护者可以随意分配其席位，到1830年，掌握在庇护人或公司手中的65

个选区席位只有50或更少的选民；而43个选区有超过1 000的选民，7个选区的选民超过5 000人。人口的不平衡增长产生了诸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兹那样无代表权的新兴城镇，虽然它们的40先令不动产拥有者可以在周围城镇的选举中进行投票选举。情况最坏的地区是苏格兰，只有4 500个选举人，威尔士的公民权比英格兰要广泛得多(Brock, 1973, p.20, 312)。

因此，公民权利一团糟。更多的有产小资产阶级被赋予了程度不等的公民权，剩余者，即各地的工匠和新兴制造业城镇被排除在外；老港口城市、郡政府所在地及小城镇则更加变化不定。总括来说，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投票权，更多的人因参加长期建立的庇护—受庇护者网络而“被实际代表”。许多人或许像我们在伯明翰、伯沃里克郡看到的那样，由中间现存的“党派”舒适地进行操作。因此一些小资产阶级通讯网上散播的信息将在议会中被公开。它们很难体现被排除在外的各阶级庄严的政治原则。

这样，即使激进主义者也感觉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的诱惑。首先是集中于议会、法院、新教的不信国教派(前两者在政权内部，后者在其可尊敬的边缘)争取公民政治权利的传统斗争。它们可以与在野的议会外派别、律师和普遍的沙文主义结成联盟。英国人不是“奴隶”和“天主教徒”，他们也不穿不自由国家的“木鞋”。他们拥有“生来”即有的自由权，这一权利甚至得到了政权的承认。法学家布莱克斯通运用公民的政治权利来定义全民的自由权：个人和私有财产权的自由，主要在法院和为洗雪冤情通过向国王和议会请愿来反对君主，大人物和其他人可以加强这种自由。(Gash, 1986, p.11)。第二，如果这还不够充分的话，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可以要求“改革”——“人民”的政治公民权利。很少有人想要充分的“民主制”。为了给予所有独立的男性一个“在国家内的坐标”和在有限政党民主制主权国家内的坐标，他们就财产资格限制而争论不休。

为了争夺新兴阶级的灵魂，双方的言论通过地方和地区不均衡地传

播开来。尽管伯明翰的小资产阶级分裂于两派之中，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却更多地被改革所吸引。这里面也没有很多英国“妥协的天赋”。确实，不列颠是有宪法的，宪法授予普遍的最低限度的权利(主要是公民权)，但是，由于潜在的颠覆性的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所以最终的妥协就成了主要是英国公民权利混乱所造成的不可预料的后果。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应该给予什么经济刺激来平息阶级的怨恨。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明显地被没有代表的政府支付了，虽然这是显而易见的误导，因为我们还没有涉及政府的政治经济。

旧政权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吗？不完全的庇护政治在其他国家长时间存在。莫兹利斯(1986)注意到：拉丁美洲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准议会机构在工业化之前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寡头政治面对着新型的商业阶级，它们的力量虽不足以掌权，但却可以破坏它。寡头政治发展了两种不完全包含的策略：庇护人主义和平民主义。在庇护人主义中，专一主义被扩展，以至于地方寡头统治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发言支持”庇护人，尽管可以控制群众的平民主义领导人被允以分享权力。莫兹利斯论证说，这样的政治仍控制着半发达国家的议会制政权，但是他认为，英国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平衡发展创造了一种对现存政权足够强大的平民社会和对庇护人阶层足够强有力的阶级。

庇护人主义确实在英国衰弱了(虽然它从未消失)，同时平民主义从来没有表现出其重要性。难道部分阶级组织的衰弱和广泛的政治阶级组织的崛起就是深层进化或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对此我将给出合适的答案。我先指明的是用经济的术语来解释政治的进化理论，而阶级发展却忽略了政权的独特性。

欧洲各国长期以来相当衰弱。甚至到18世纪它们的领土范围也仍然很狭小；它们可以做的事情不多。英国国王在议会中领导国教会，制定对外政策，保卫王国安全(特别是爱尔兰)，制定法律以加强最低限度的治安和慈善事业，以及征税。教会实际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当时

其上层却十分昏庸。外交政策很少与大陆有关。自1745年以来，王国还没有受到国外的威胁；关于爱尔兰问题意见一致；大多数防卫活动都委托给驻扎海外的海军；部分治安活动和慈善事业则由地方世俗机构和教会机构办理。

像1763年到1764年通过的法案所揭示的那样，大多数地方是专一主义的，例如，《私法法案》允许执政者约翰·纽伯特在精神错乱期间出售其地产，并解除与约翰·维勒的婚姻。但是大多数有关公共利益的法案并不十分广泛。税收立法包括在丹巴郡出售每品脱麦芽酒强征2苏格兰镑或1/6英镑，与一般关税和消费税等同。政府订单与重建希林菲尔德到里丁的公路有关，还修改了叛乱法案。在这一届议会的176人中，145人以地区和个人事物为目标(Gash, 1984, p.14)。由集团官僚机构完成的情况很少，更多的是由地方贵族掌管的公共机构通过动员不完全的庇护人与受庇护者的关系来完成的。政府与阶级利益的关系仍是个问题。它拥有的机构权力太少而不能顾及太多的经济发展和控制阶级斗争。

为什么被排除在外的大众要求参与这个排他性的政权呢？他们以前很少有这种意向(除了对宗教意识动员的地区之外)。新兴的资产阶级起初对此也不感兴趣。但是当他们要求参与时，政权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最初的媒介是后来标名为“经济改革”的问题，这就把我们带到了18世纪政权机构的排外主义心脏，远离了单纯的经济或阶级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化的概念。

国家的政治经济

旧政权的政府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它们也分配经济庇护权、征税并借债。收入和支出为那些掌握政权的人提供财政利益，而那些不掌权的人却要付出代价。分享职务的好处和政府公债的条件，

获得豁免税收的特权，是政治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因。某一时期政府支出增加而不再考虑这些利益，要求改革和话语能力网络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与法国相比，英国很少出售官职、增收农耕税和授予经济特权。然而在支出方面，类似的操作在较小的范围内是存在的。也许1.6万名政府官员中有一半人是由庇护人分配的。最好的教会生活等于同政治庇护者的关系以及是受庇护者。有强有力庇护的军官在陆军和海军中能很快晋升。政府在殖民地商业中授予特权和垄断权。两院的议员身份益处多多，支持国王的大臣获利更丰，因为汉诺威的国王们是官职和荣誉之首，而且这些官职和荣誉都由国王亲自经手。

在财政方面，英国政府虽未彻底腐败，但也是堕落的。大约1/4的财政是借贷来的(大多在战时)，从1697年开始由英格兰银行组成一种国家信用体制。其余的财政来源是税收，主要是落在商人头上的关税和消费税，还有作为补充的土地税(见表11.6)。尽管财政官员有利可图，但它只允许了很少的特权。在土地税收、关税和消费税之间存在着政治选择，土地税直接取自土地所有权(间接来源于雇农和劳动者)。关税和消费税多数由商业利润组成，虽然也影响到了群众，也因为普遍的堕落以及强征实物和赊销，有利于那些能存钱的有钱人，而不利于不能存钱的人。战争期间这种堕落更加剧了，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似乎变得更为严重，因为政府要保持高税收以偿付债券持有人。这些选择分裂了阶级和可能在原则性的宪法条款中维护自身利益的各个部门。

起初，财政问题产生了正当民主的雏形，它的产生不是通过持异议者阶级，而是通过执政派和在野派的部门党派。他们的党派早就产生了“宫廷”和“国家”或宗教的原则性思想，但这些思想在18世纪已经衰落了。不信国教者和天主教徒仍是“在野派”。尽管投票的限制条件已经取消了，但天主教徒仍被排除在立法机构之外，且两种宗教都被排除在公职和大学(以及法律和医学)以外。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国王及其在贵族中的永久多数和下院中支持他的大臣派别同下院中的反对派之

间的冲突，反对派关心的是庇护而不是原则。随着观念的衰弱，地方资助者控制了更多的选区。竞选越来越少，并在1715—1760年间衰落下去；之后竞选有所上升，其原因我将作进一步的探讨(Holmes, 1976；Speck, 1977, pp.146—147, 163；Clark, 1985, pp.15—26)。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政治活动只是与部门党派关于薪俸的争论有关，尽管其外部潜伏着更多的原则性、遭排斥的阶级和教派。

下院最大的政党由200—250人组成，包括“在野者”、独立的乡村绅士(虽担任像法官那样的地方官员，但不领国家薪俸的人)和土地税收官员。他们支持低税收并谴责大臣的腐败和“专制统治”。但是他们属于旧托利派，支持教会和国王反对“激进主义分子”。继而是100人左右的法院和国库派成员——文职官员、侍臣、律师和追求肥缺、高薪和荣誉的军官，其中多数人效忠大臣和国王。最后是100—150人的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拥有土地派的领导者和他们的作为大臣和演说家的代理人，他们都是这一时代的著名人物。少数人像埃德蒙·伯克一样，宣称其一贯的原则。大多数人根据他们概括的政府机构问题或排除在机构之外的问题，或是财政利益问题，来明确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原则。他们大约代表了200个统治家庭。独立者代表了5000—7000个绅士家庭及3000—4000名富商、店主和专业人员中的国库派成员。总之，下院议员党派直接代表了英国1%的家庭的物质利益(Smith, 1972, pp.68—102)。

那时，这些党派为了获得15%有选举权的人的支持而相互竞争，尽管这些竞争有时只是敷衍了事。剩下的85%的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无权者。这不是民主制，但这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竞争。正如达尔(1971)观察到的，他认为这至关重要，因为它通常是世界上通向实现民主的第一步。英国产生了党派民主的基础。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即被排除在外的85%的人并不是单纯以阶级划分的。因而制度化的竞争并不完全接近于新兴阶级。但是即使如此，党派和新兴阶级彼此之间没表现出有多少兴趣。

政府依靠党派竞争，这种党派竞争我在第三章中所提到的“特殊主义的嵌入”。国王的大臣们不得不维持宫廷和国库的分赃以贿赂“执政派”，但是又要以低税收、民族胜利以及与新教法规协调一致满足“在野派”，并避免“被排除在外者”太多的公开的不满情绪。大多数政府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以稳定、平衡和现代而广受欧洲各国羡慕。这些品质是随着党派的制度化并且带有腐败的烙印而产生的。这是“该死的腐败”。

政府受到如此的谴责，只是因为两种压力结合起来——军国主义与财政压力以及那些政治上被排斥的人的意识形态的出现。1760—1832年间，它们融入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强化了党派间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已成为由提出各项原则的思想家所领导的更少部门化的半阶级的斗争。军事财政压力来自三次浪潮：七年战争、美国革命以及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后果。在这些战争中，许多旧政权成员自己开始游说建立更现代的政府。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他们的现代化原则开始与被排斥的小资产阶级的那些观点联系在一起，即“无门的国家”。

1760—1815年间的战争与改革

在国外，英国政府实际已经定型为军国主义者。战争使英国更“伟大”。结束于1763年的七年战争给英国带来光荣的胜利和一个版图很大的帝国。1776年到1783年间英国失掉了北美殖民地，但又从1792到1815年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中得到了补偿。我在第一卷中讲过，这些大规模战争对国家财政通常都产生影响，不能因为英国成为强大的帝国而夸大了其所有的历史经历。战争开始时，花费增长了两倍，起初全是军事花费的结果，后来主要是偿还债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剧增的战争费用开始下降，但还是高于战前水平。在政府将其财政规模扩大三倍的时期，它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两倍

多。如表 11.3 所示，和平时期英国中央政府抽取国民收入的 11%，战时至少抽取 22%，而在拿破仑战争时抽取率高达 30% 以上。而且，大多数榨取是通过间接税和借贷而递减并引起分裂。

这种军事主义怎么能与社会生活无关呢？战争带来的突如其来的费用增长产生了许多政治问题，这比和缓的工业革命带给政府的问题更加尖锐。然而，政府确实通过征集金钱而赢得了战争，在北美的失败并没有在国内产生太大的麻烦。战争并没有像北美殖民地、法国和一些奥地利省份那样造成现存政权的倒台。比较而言，英国的财政军事危机还是相当温和的。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政府的君主制决策机构中党派已经被制度化，并且在压力下，不必分裂政府便能顺从并延伸。军事主义可以由一个不成熟但却是君主党派的民主来控制。

温和的压力在两个阶段改良了政治。政权本身最关心它们战争期间的最大花费，之后开始寻找提高行政和财政效率的方法。在获胜的战争中，纳税人在抱怨声中缴纳额外税收。在第二阶段，战争结束但纳税人补贴了债券持有人时，激进的改革者出现了。税收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综合财政出现了)，但因为税收在战后与日递减，因而从中等和贫苦阶层的收入中榨取的部分增多，这引起了普遍不满的产生。

来自旧政权中的“执政派”和“在野派”以及来自更激进的“新排斥者”的改革家们，通过跨阶级的意识权力网络传递信息和原则，产生了在旧政权边缘周围的经济改革运动。执政派寻求行政进步以削减花费；“在野派”攻击腐败和排他主义；“被排斥者”受到党派主义的鼓励，开始要求人民对财政的控制。正如我们在第十五章中将要看到的，“被排斥者”因税收进一步递减而愤怒了。18 世纪中期，国家和阶级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重要；到 1815 年，国家已相当重要，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阶级剥削。军事财政的压榨推动了政治和民族的阶级斗争。

这些战争在普遍性和意识形态方面各不相同。七年战争是王朝统治的列强之间的传统战争，带有模糊的宗教色彩，多是新教徒反对天主

教徒。但与后面各场战争不同的是，它不涉及分裂的政治意识形态。参与者发挥作用的理性观点使其成为一场“有限战争”(Mann, 1988b)。在英国，一般来说，有产的“人民”支持战争，而“平民”比地方组织更少参与支持。政治问题关心的是战略，是和平能否很快实现，以及到战争结束以后人们所能勉强接受的各种负担。但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战争结束后，“在野派”和“被排斥派”却希望有一个花费更少的政府。当这一要求迟迟没有实现时，他们便谴责腐败。一些人也要求进行公民权的改革。大臣们则以逐步升级的庇护和施加压力作为回答。对专制主义的谴责增加了。

米德尔塞克斯郡有广泛的公民权，约翰·威尔克斯是其议员之一。1763年，他因出版煽动性的诽谤书而被捕。在“在野派”支持下，他声称享有议会特权，对他的被捕进行了挑战并取得了成功。他通过法律行动来反对政府对出版权的干涉，继而迫使政府将下院的辩论予以发表。尽管以公民权利为中心，威尔克斯在广泛的城市市民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全国组织要求进行选举权改革，短期议会把占有各种职位者逐出下院，并约束大臣的权威。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他支持造反的美国人。伦敦的领导层感到恐惧的政府代理人报告说，“严肃谨慎的贸易商和技师”支持威尔克斯(Christie, 1982, p.75)。但威尔克斯和后来怀维利的组织都没有把普通工匠和劳动者包容在内。小资产阶级、伦敦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中小零售商和贸易商，以及少量城乡不动产商，成为威尔克斯组织中的核心。这种“动荡”有时蔓延到更下层。伦敦北部的暴动者中很多是抗议劳动纠纷的工匠和劳动者(Rudé, 1962, pp.172—190, 220—223)，“人民”和“平民”都能动员起来，但却从未形成两者的联合力量。

引报业人士、漫画出版者、手工艺品生产者、酿酒商、酒店店主以及城市商人作为例证，他们所有的政治观念都与政治精英的观念截然不同。多亏威尔克斯这些人……在1750年以前鲜有政

治影响，而在18世纪60年代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Brewer, 1976, p.268；参见 Christie, 1962]

威尔克斯的组织以话语能力——分发印刷的传单、小册子和请愿书——为中心。1769年，来自15个郡和12个自治城镇的5.5万名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捕的威尔克斯。威尔克斯把许多城镇动员起来，而一个“在野派”即罗金厄姆的辉格党则动员了各郡。政府被迫加以模仿，扩大了自己的出版和请愿企业。辉格党和大臣们为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展开竞争，辉格党通过提出经济改革计划而与“被排斥者”激进分子走到一起。到18世纪90年代，双方都在曼彻斯特使用了大规模动员战术(Bohstedt, 1983, pp.100—125)。历史上第一次扩散到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活动，是在英国发生的(也在美国，见第五章)。

1779年，威尔克斯获得了伦敦市一个获利颇丰的闲职，由“在野派”变成“在朝派”，从此在历史舞台中隐退。他的组织也变得不再黑白分明，他们采用了两种途径进行改革，即先前实行的大众传媒、请愿、暴动，及后来的法律和议会斗争。议会或许可以提高公民的身份，但他们害怕暴动和选举权的扩大。英国的律师中没有积极分子，这一点有别于美法两国。他们都维护传统和惯例，确保古代法规定的权利，仅此而已。这就形成了之后英国法律的普遍保守作用。威尔克斯的运动如此自相矛盾，而且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也吓走了“在野派”的同情者。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政府花费的减少，人们的不满也渐平息。

美国的战争运动起初使政府力量加强，但到1779年，英国军队接近崩溃，因为法国已经宣战，而爱尔兰的志愿者运动也威胁说要发动起义。战争引起税收递减、贸易混乱、政府不能正常运转(尽管后勤三千英里的供应线可以使当时的任何国家紧张过度)。税收刺激了经济改革的要求。话语网络再一次活跃起来。一个伯明翰小酒馆和咖啡屋的店主在他的酒馆内用诗歌宣布了一场辩论，激起了纳税人与债券持有人之

间的冲突。他强调所用的话语就是下院一份反战动议的内容：

……作为一个朋友
对我的国家，我希望战争结束，
但我们发现，税收工作尚未完成，
税收一直且仍在增长，而这一切本该结束。
但那些每年品尝贷款甜点的人，
无疑会让这一工作继续下去。

这场战争也产生了各项原则，但与七年战争不同。美国反叛者将传统的保守与要求普遍契约权利合在一起反对专制主义。这在财产所有者的市场经历，在道德的新教主义，在已确立的公民权利中产生了共鸣。殖民地人民声称“无代表不纳税”。政府则认为纳税人“实际上被代表了”：议会议员代表独立的人，因而间接地代表了整个国家(Brewer, 1976, pp.206—216)。罗金厄姆及查塔姆辉格党已长期在野，这足以使他们采取这些原则。他们通过混合的经济和选举权的改革推动消减王室影响，阻止政府的定约者人驻下院并剥夺税务官的选举资格。

第二次激进运动，是由教士克里斯托夫·怀维利领导的1779—1780年社团运动(Christie, 1962)。通讯委员会在近四十个城镇和自治市中组织了要求经济改革的请愿，并动员了乡村的“在野派”和“被排斥者”中的有产阶级。怀维利比威尔克斯更依靠宗教积极分子，他认为他从不信国教者处获得了比例不一的支持。他串连起激进分子要求年度选举和100个新城镇的选区选民。但这使他的罗金厄姆辉格党联盟及他自己的一些城镇社团感到担忧。即便有他精明的领导也不能掩饰这些裂痕。“在野派”退缩了，把烂摊子留给了城市激进的“被排斥者”。1780年7月底的戈登暴动使他们毁于一旦——在捍卫新教宪章反对天主教的过程中，他们烧杀抢掠。有产者在恐惧中抱成团，对微小的经济改革要求作出让步，但在选举权改革方面却固执己见。

法国革命使改革和激进的话语能力再一次复兴，其中以群众组织宪法情报协会为典型。托马斯 · 潘恩 1791 年版的《人权》到 1793 年共售出了 20 万册。但是处决路易、恐怖政策和革命军队的接连胜利又使“在野派”疏远了“被排斥者”。改革的担子又回到了工匠社团的身上。这些社团在战时的爱国主义中显得无足轻重。以法国为例，政府党争不会在这一点上趋于原则一致。法国革命的胜利使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发生(至少是不太可能)。畅销小册子庆祝英国不经流血暴力便取得了繁荣和自由。正如 1793 年反天主教歌唱家所唱的：

> 祝愿古老的英格兰拥有了欢乐和喝彩，
> 拥有了自由和繁荣，但却还没有平等。
>
> (Dinwiddy, 1988, p.62)

拿破仑的兴起减轻了对革命的恐惧，但却加深了地缘政治的危险。战争需要人民大众为之付出代价，正像法国那样几乎成为民族战争。一些民族主义开始产生，但与腐败和排外主义政府在一起却显得局促不安。大臣们寻求经济节约的办法。皮特的改革削弱了从事战争各部的“该死的腐败”。在法律行业、教会、东印度公司，以及所有五港同盟的闲职人员到大批领国家养老金者，曾是在政府“城堡”现在是在引人注目的角落仍保持着重要职务的任命。当“城堡”现代化在进行中时，便很难再为庇护制度辩护。保守党的领袖劳德 · 艾登悲叹道，“碰到一枚炸弹，全部都将消失”。政府开始接受官僚系统、责任制和民族统一(Rubinstein, 1983)。在民族战争的压力下进行的经济改革培育了民族国家(见第十三章关于行政细节的叙述)。

然而，经济改革和选举权改革之间的联系被法国的幽灵切断了。已在野二十载的新教公益派辉格党发展了其原则性对立，但却与有组织的“被排斥者”激进派社团雅各宾俱乐部无关。议会中的改革努力只

带来了少量选票，由城市贫民和手织机户发起的阶级暴动被孤立和镇压下去了。

1815—1832年的改革，而非革命

战争的结束又把改革提上了日程，改革出现在军事—财政循环的第二阶段。和平时期直接军事花费减少，但债务偿还问题又引起轩然大波。1816年，议会废除了针对富有者的收入税，只是增加税的递减以偿还债券持有人。战时预算的改善暴露了占据官职者的花费。利物浦爵士的战后政府希望能削减花费，但是政府成员却从“该死的腐败”中大获其利。激进的小册子宣称，两百名托利党贵族和主教每年获利达两百万英镑，主要来自于挂名闲职，官位薪俸和教士的俸金——远远大于他们的农业租金——这还没有把东印度公司的收入算进去(Rubinstein, 1983, pp.76—77)。如今这已被广泛认定为腐败，尤其是在报刊中。1820年皮尔写道：

> 舆论从来没有对公众措施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也从来没有对他所拥有的份额感到如此不满。习惯于运行其中的通道已大大拓宽，开挖渠道的技师们从未梦想过各种各样的河流现在正为一条出路而斗争。(Brock, 1973, p.16)

创建于1821年的《曼彻斯特卫报》以及《威斯敏斯特评论》(1824)，这些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发行的受尊敬的改革杂志，肯定了皮尔的观察。1819年到1823年间，尽管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仍优先于经济改革，但辉格党的领导人仍致力于选举权的改革。“每个酒馆都在阅读”科贝特的《政治纪事》，它反复强调：议会改革是根除腐败的债券持有人和“吞税人”的最终途径。正如1832年《特别黑皮书》所解

释的："廉价政府—廉价面包—廉价法官—工业自由和生产将奖赏我们在改革法案的胜利中所作出的努力"(Gash, 1986, pp.45—46)。1823 年，劳德·约翰·鲁塞尔写道：

> 1793 年为数不多的热情的雅各宾成员到 1817 年及此后几年内已转化为成千上万的反叛者。六千万税收的压力使更多强壮、忠诚的人不再支持本国宪法，而更倾向于公民布里索的演讲……这本应在半年之内完成。(Dinwiddy, 1988, p.70)

但是战后的不满仍遇到了镇压，这些不满受到了正在改革的"在野派"的支持。为了弄懂改革者中广泛的团结，我首先转向大众运动的改变。

像在大多数农业社会中那样，群众通常不能形成自己广泛的政治组织。对没有文化、没有选举资格的平民来说，强有力地展示其不满的方法就是通过暴动与地方民众队伍。博斯特德(1983)统计了 1790—1810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暴动。占 39% 的最普通形式是粮食暴动，最多的是抗议高物价，22% 的暴动有军事目的——反对强迫征兵和类似征兵的方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暴动(辉格党、托利党、激进分子以及"国王和国家"暴徒)占了 10%，只略高于劳工暴动。伦敦与此不同，"混杂的"的暴动占了 2%，主要指向不得人心的名人，他们帮助囚犯逃离制裁或"在戏院闹事"。其中许多应被归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在伦敦暴动中这一类型所占的比例从 14% 达到了约 25%。"争斗"(多是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的冲突)占 16%。伦敦极少有粮食暴动，劳工暴动较多。

但是暴动鲜有广泛性。暴动都因阶级差异而中断。"平民"多是因为粮食和征兵而发动起义，但这并没有引起"人民"过分的担忧。农民从高粮价中获利，而小资产阶级也完全能负担得起高粮价。两者都不可能被强行征兵。劳工纠纷把人民与平民区分开来，因为前者雇

用了后者。这样的阶级划分有助于当权者动员部门组织，镇压叛乱者。只有某些暴动的矛头指向政府。示威的工人经常请愿要求地方政府干涉他们的雇主。大多数粮食暴动与政治无关。1766年的粮食暴动是因为《海关条例》变更造成的。这一条例使谷物生产者转向出口。这使城镇及乡村特别是生产其他农作物的乡村面包价格大涨。但这些暴动并不直接针对政府而是针对可见的市场销售者，如矿主和零售商，他们有时也要求地方政府的帮助(Williams, 1984；参见 Stevenson, 1979, pp. 91—112； Bohstedt, 1983, pp.211—212， 296)。这些地方政府机构本身并没有受到攻击，因而有时也富有同情心。

英国缺少政治革命的决定性组织，原因是群众运动中阶级和目标的差异。但他们对正进行独特行为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在他们的著作中隐含着20世纪的理论和政治假设。他们假定的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阶级斗争必定涉及政治，与20世纪发生的事情并无二致。一方面，像E·P·汤普森(1963)和福斯特(1974)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夸大了平民中的政治激进主义，或者说他们通过夸大卫理会那样的安慰思想来解释起义的失败。另一方面，像克拉克(1985)和克里斯蒂(1984)这样的保守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完全相反的原因，如政治满足、顺从和物质的丰富。我们来分析一下克里斯蒂的著作，此著作明确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没有革命的问题。

克里斯蒂援用了取自20世纪经验的各种保守的论点。他认为，一场革命避免了，原因是英国是个多元社会，而不是定性的分成阶层的社会(20世纪阶级衰落)；是服从于乡村、教会和国王的社会(谦恭的托利党的选民)；是上升的变革的社会(二战后富裕)；是一个有慷慨的《贫民法》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一个合法工人联合的社会（“工业冲突制度化”）。这些都与20世纪相关，因为所有日常生活经历都与国家相互关联。国家的阶层结构、普遍选举权、国家政党、政府调控经济、福利国家以及制度化的联合经营关系，都在大众实际经历中打上了国家政治的烙印。

克里斯蒂的某些论述同样适用于18世纪，但不适用于英国的“国家”，《贫民法》在大众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尽管它看起来更具地区性而非国家性。由市场孕育而生成的财富的多元差别，以及缺少法律上的特权，意味着物质问题没有必要牵扯到国家——正如法律上的特权的确渗透到经济中的法国那样。克里斯蒂的其他论述也不适用于18世纪。他夸大了繁荣，当时大多平民与此不沾边儿，如果对保守主义而言木已成舟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世纪30、40年代又从下层出现了大宪章运动的反抗呢?(见第十五章)。如果物质繁荣阻止了革命，那么为什么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美国)以及欧洲第二繁荣大国(法国)又发生了革命呢?周期性的衰落、糟糕的收成和经济的急剧通胀都在三国中引起了普遍不满。只有在1788年和1789年的法国乡村因某种原因与革命有关——法国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为了改善他们的命运，法国农民攻击贵族的法律特权；这也涉及向国家的正面攻击。

但是，英国平民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权力无论如何都没有很大联系。通常他们表现出满足和服从，但这不是政府之所以存活的原因。有时他们也变得傲慢无礼，继而发动叛乱；但他们的集体暴动和阶级抱怨很少直接反对国家，也不涉及整个阶级，他们也很少与不满的有产“人民”(在政治上受排斥)结成联盟。他们的满足不起任何作用。“人民”部分控制了进行抗议的广泛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以话语能力和网络为中心。大多数平民的不满情绪是通过他们传送的，但他们也还没有真正广泛地从政治上组织起来。这是英国宪章运动之前缺少革命运动的理由。

然而，组织性的转变正在进行中。粮食运动日渐衰微，劳工纠纷和政治纠纷与日俱增。工业区在伦敦和商业城镇取得了领导地位。新兴的工厂城镇吓坏了旧政府的观察家们，特别是宗教观察家。他们的描述使用了所能用到的最坏的比喻。工厂就像地狱之火，由被罚入地狱的工人——男人、女人和小孩进行操作。这与他们以前对地狱想象的画面不同，因为以前小孩从来不在被罚入地狱者之列。城镇冒着

烟，像战场一样发着恶臭，到处是落魄的喝醉了的幸存者。人口的急速增长导致混乱和不信教，及“危险的阶级”。危险是因为从一开始他们便处于政府部门组织之外。即便是军队也很少驻扎在工业地区，他们不得不去镇压人数更多的有组织的抗议和示威。

变成暴动的群众游行让位给大众集会，由煽动者作演讲，提出主义和请愿，以协调地区甚至国家范围内的行动。记者参与讲坛并报道他们的不满和政府的残暴。“彼得卢”一词被记者们发明出来，用以表达英国军队如何滥用在滑铁卢的胜利，于四年后的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用暴力驱散示威人群。大众示威和报刊评论运动使话语机构扩展到全国各地。美国和法国革命发展了印发宣传和口头集会的双重组织(见此后两章)。英国激进主义领袖，如普雷斯、汉特、科贝特和奥康奈尔，像1789—1790年法国革命中的激进分子一样表达了改革的建议。但是“面对一个未被击败的、镇压的政府，起义的唯一选择就是组织起来”——史蒂文森认为(1979, p.317)——外加看来较为温和的外表。他们限制了可选原则并借助“威吓语”要求实行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旧政权中鼓吹现代化的人和富裕小资产阶级认为，有产者只有被完全代表了，才能维持区域秩序。可敬的理性改革和普遍的鼓动仍相互分离，但在19世纪20年代两者都与更具民族性和阶级性、更少部门、地区性的组织发展了合作关系。

继而，意识形态权力方面有了突破。在美法战争中敌人已经世俗化，宗教不再是地缘政治的威胁。不信国教者和天主教徒在战时显示了忠诚，但对他们的法律义务已几十年不再执行了。由于歧视天主教徒，统治爱尔兰更为困难。国教会教士的道德腐败被广为宣扬。撤销反对不信国教者的《宣誓和社团法案》以及天主教的《解放法案》已几近成功。1828年在克莱尔郡的选举中，奥康奈尔压倒多数的胜利是对一项法律的嘲讽：一个天主教徒可以经广泛选举而当选，却不能坐上自己的席位。下一届选举中天主教徒可能席卷所有的爱尔兰席位。托利党的威灵顿公爵抢在宪法危机之前采取了行动。1829年他的《解放法

案》获得通过。旧政权放弃了对新教灵魂强有力的部门控制(Clark, 1985)。

辉格党的现代化鼓吹者大受鼓舞，在1830—1831年的会期中提出了一个改革法案。格雷及其内阁已下定决心进行改革。随着工匠话语网、社团和联盟的扩大，民众运动得到进一步加强(见第十五章)。辉格党利用大众示威给上下两院施加压力。第一次，旧政权派别与“被排斥者”的普遍运动串通起来。但是这使工匠中的激进分子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害怕如果中产者被赋予选举权利，那这一法案将推迟他们自己的代表权。但他们不能反对这一法案。尽管保守派意识到：只有另外的改革建议才能阻止这一法案，但是他们还是不能赞同辉格党的改革。1831年，他们击败了第一个法案，但是政府呼吁重新选举。选举在示威和暴力中进行，结果公开的保守派人士元气大伤。这使许多乡村成员改变了立场，支持第二个方案。在街区人民的支持下，“该死的腐败”议会进行了自身改革。正如卡莱尔解释的，这看起来是“代表统治者的一方放弃了权力”(Perkin, 1969, pp.183—195)。

政府没有转向完全的民主制。的确，它因两个论述而引人注目，一个是进步而含蓄的，另一个是反动而又明确的。它含蓄地接受了现代化和进步的改革观点，把排外主义等同于腐败。不均衡的人口增长使得现存的政治选举权利不能代表政治公民权的任何普遍原则，它既反动又腐败。放弃了绝对主义，随后又放弃了主要政府部门的排他主义，再后来又放弃了僧侣教会，政府原则已一无所剩。它也承认了小资产阶级为英国繁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因为一个经济化政府的支持，英国现在能够通过自由贸易统治世界。小资产阶级拥有支撑国家的财富。但是，他们不再被排斥，就像一文不名的“平民”一样。因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明确寻求把小资产阶级与暴民分开。

财产权——不论其来源、亲系及庇护人——统治着国家。研究揭示，有代表权的自治市镇所规定的70英镑的财产资格，保持了选民的“独立”身份，其中包括了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但对50—100个雇佣工

匠来说，只有1人有选举资格(尤其在伦敦，教育资格限定同样鼓励了这种“独立”)。新的财产资格限定比现存的几种更严厉，它剥夺了几千选民的选举资格，但总的来说，有30万男性公民加入了已有的50万名选民中。140个腐败选区的废除敲响了王室和大臣对下院庇护制的丧钟。用政治术语来说(尽管没有象征意义)，英国已不再是君主制了；繁荣于欧洲中心的部门划分和统治也在那里结束了。在政党民主制以前战败的上议院也衰落了。但是，郡和自治市之间的席位分配却未发生变化，而且郡的“实际上起作用的代议制”和部门组织仍存在。人事和党派没有很大改变。直到19世纪60年代，土地贵族构成了下院的多数(Thomas, 1939, 4—5)，然而政府已经由“议会中的国王”为中心的排他主义改变成以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为中心的博爱主义。

旧政权自由主义的胜利，1832—1880年

小资产阶级看似胜利者：自由贸易；废除了庇护制；社会公职；市政府、教会、牛津、剑桥以及公立学校的改革；废除了议员的土地资格限制、教会不动产税、城市公地的圈地运动以及“知识税”——所有看起来在1760年是革命性的，但一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最终实现。政府将不再干预而是对扩散的市场力量“袖手旁观”。

但旧政权贵族统治的国家用立法实现了自由主义。他们的庇护网络仍控制着大部分郡和一些城镇，他们有从事政治的闲暇和财富，并且控制着伦敦。汤普森(1963，p.298)断言，小资产阶级选民不是通过“议会构成而是在立法过程中”统治人的。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政府本身已转向了新原则。实权在本世纪中期已世俗化，当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时，教会衰落了。政权已经默认了原来资产阶级的观点，一种财富即消极的土地财产没有权利征用另一种财富的费用，即工业和商业中的积极资本(Perkin, 1969, pp.315—316)。但旧政权从转变中

所失甚少，却通过驾驭小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到其资本主义独特的商业形式而有所得(Ingham, 1984；亦见“大英帝国的衰落”，Mann, 1988a)。

在维多利亚的长期统治期间(1837—1901)，英国经济火了起来。到19世纪60年代，像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一样，富人干得很好从而使不平等现象加大(Kuznets, 1955, 1963；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3)。其中，土地所有者最为成功。据鲁宾斯坦(1977a, 1977b)估计，1815年拥有超过10万英镑财产的人中88%的人的财富来自土地。1809—1858年垂死的百万富翁中95%的人仍是大地主。即使到了80年代，大多数百万富翁仍是大地主。1832年，土地和农场构成了全部国家资本的63%(Deane and Cale, 1967, p.271)，大多用于工业的扩展中。18世纪的《抵押法》和利息率的改革，西伦敦和乡村银行的出现，保险公司、地方抵押市场以及专业财产管理，这些都使旧政权能够使用更多样化的资本主义控制农业收入(Mingay, 1963, pp.32—37)。采矿业把小部分地主变成了煤矿主，同时城市化使地价上涨，从而使地主有能力成为城市交通业的股东。

随后，运河和铁路给相邻的地主带来了意外之财，并通过削减城市市场的费用分配而增加了农业的收益和租税(F. M. L. Thompson, 1963, pp.256—268)。地主的投资通过私人银行和掮客经伦敦城进入政府储备、商业和外贸，比较而言，他们很少投资工业。到1905年，伦敦城从银行、保险、航运中获得的“看不见的收入”超出了对外投资的收入，两者又都远远超出了国内制造业的收入。这样，伦敦城在海上霸权的保护下转向自由贸易，到这时为止自由贸易与政权的陈旧部门仍格格不入。伦敦城和国库加强了联合，这一联合从此控制了英国的政治经济。投资通过乡村和城市银行、贴现公司、证券经纪人和掮客到借贷给工业的银行，通常是短期或更普遍地贷给制造业供应厂商和批发商。因为土地很容易抵押，因而地主的债务通常反向流动；小资产阶级的储蓄通过掮客和保险公司转入地主的消费和投资(Crouzet, 1972, 1982, pp.335—341；Cannadine, 1977, pp.636—637)。

商业化影响了所有有产者，资本的循环带有扩散下放的烙印。排

他主义可归属的家系和头衔在社会区别方面就不太有决定意义了。资本也通过家族扩散。族长曾经负责土地财产，但资本股权却分开管理和拥有。无论是归属于何种地位的人，都可拥有股权。所有通过生活圈的财产流动和产生的棘手问题都被股票持有者更容易地控制了。年轻的子女、非长子后裔、长者和年老体衰的族长，不必有控制地产的长期密切关系，都能给予股权。更重要的是对有产家族妇女的影响，结婚的嫁妆、未婚的女儿、未婚的阿姨和寡妇都可以予以股权。这带来了对这个世纪中叶法律进行变更的要求，以便妇女可以成为财产拥有人。政权由较多的私人企业主构成，而不是由家系构成，它主要通过阶级和市场而不是通过部门组织来进行统治。

铁路也引人了经济集中的办法，因为在资金可以流动之前所有的轨道和全部的车辆就得各就各位。到1847年，铁路总花费(不包括购买土地)占了国民收入的7%。英国繁荣消退以后，铁路出口到国外。新的地方股票交易和联合股份公司(先是无限责任公司)转到了铁路；像伦敦股票交易所那样，迄今主要处理的是政府股票。数量最大的股票持有人混杂着中上阶层、专业人员、商业零售店主，他们主要来自伦敦和商业地区，而不是来自工业地区。他们是当地的大地主，有助于影响议会，因为每一个公司都必须按议会的私法建立。一种“新的腐败”出现了，到1805年，157名下院议员和49名上院议员是铁路公司的董事。第三个投资群体是富有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储蓄购买至少1股(价值100英镑)，同样他们又是来自商业而不是工业地区(Pollins, 1952；Barker and Savage, 1974, pp.77—79；Reed, 1975；Crouzet, 1982, pp.335—341)。靠股息生活者的资金在平民社会扩散，把财富从土地和商业转到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业企业中。旧政权的个别利益被商业资本主义融为一体。

“该死的旧腐败”没有消失，而是从一旁潜入伦敦城，到今天依然存在。占有职位者——地主更年轻的子女放松了与政府排他主义的联系，而进入了伦敦城的商业。整个19世纪，除农业外，财富主要来源

于商业、金融、交通业，商人、银行家、船主、商业银行家、股票持有人和保险掮客发了大财，制造业还不在此列，制造业从没有引导商业成为财富来源(Rubinstein, 1977b, pp.102—103 页)。旧政权在殖民地和海外贸易中积累的财富已购买了地产、头衔及政府股票，然后成为抵押贷款。如今伦敦城的继任者也可以同样这么做。格劳兹特说，他们修建了“比工厂更多的方特希尔(Fonthills，修道院)”(1972, p.176)。他们更多地投资于土地而不是工业(F. M. L. Thompson, 1963, pp.20—21)。贵族和地主更多地参与伦敦的市政府会议而不是工业企业。正如激进的支持制造业的下院议员罗奇代尔 · 约翰 · 布赖特经常评论的，伦敦城是一个支持贵族的院外救济系统。

土地、金融和商业的融合减轻了农业收入和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始的土地资本价值下降的影响。从事多种经营的人很少依靠土地取得财富和地位；其他人卖掉了城市土地来投资股票和政府债券。尽管更小的中上层和地主阶层遭受了真正的衰落，但大家族却躲了过去。托利党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到 1895 年，金融取代了土地成为议会议员的主要商业利润(Thomas, 1939, p.15)，土地、商业和金融业资本家融入为单一的广泛的政治阶级，与国家经济、家族和教育(“公立”学校)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官僚政府并致力于在英国霸权下的自由贸易。旧政权的自由主义者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制造业主属于这一阶层，但在它的边缘。他们在议会中没有几个代表。大多数议员来自金融、商业和铁路业——这种情况在托利党内也是如此，起初他们的议员超过了自由党(Thomas, 1939, pp.13—20)。自由党代表了更广泛的财富，托利党人仅代表了土地、商业和金融。但各政党也因地区和宗教而分化。政党和经济部门在经济政策上分歧很小。在 1846 年废除《谷物法》和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关税改革运动的这段时间里，议会很少关心本身的经济。主要的问题(直到 1914 年仍十分重要)是宗教、教育和爱尔兰(第三章里强调的民族国家定型后的英国版本)及工人阶级代表权(资本主义政府定型的一部分)。甚至关税

改革平息后，工业也没有向伦敦城的自由贸易之神和金本位制发起挑战。

“第一个工业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像它的主要对手那样彻底工业化。英国在权威工业组织的政策策划方面是落后的：社团主义、政府教育和政府为高技术工业提供的国家资金(Longstreth, 1983； Ingham, 1984； Lee, 1986； Mann, 1988a)。英国的资本家组织没有广泛地扩散，他们被承诺要保护市场。市场力量是工业革命首先在那一岛屿产生的主要原因。英国采取了传统的步骤，那就是使结构制度化，这曾是使英国“伟大”的根本缘由。在已变化了的世界上，它们却促进了英国的衰落。

因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资产阶级和制造业主没有构成有组织的阶级或阶级派系。在维多利亚鼎盛时期，他们主要是商业旧政权自由主义者的“实际代表”，较之以前，很少依靠部门组织。有产者已经合并为单一的国家资产阶级，组织成为自由的旧政权贵族领导的群众政党。

结论

英国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便完成了工业革命；正是改革使旧政权涂上了新的自由色彩，从而存活下来。世界第一个工业国使带有旧色彩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形成为制度而未经历此时期的过度混乱，混合改革和旧政权的连续性已成为其近代历史的特征。这看似一个演进的过程，然而在17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内战、判决和处死国王及宗教分裂。1715年和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叛乱已成为回忆。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宪章运动的确是一场革命运动，但却被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绞杀了(见第十五章)。因而，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建立的这个联合对英国近代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实际上，这

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因而自由主义已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球性战略。

我的解释已经包括了所有四种社会权力来源。我还没有正式地排列它们的重要性，这一努力将从第七章开始。首先，经济权力，在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英国农业使商业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化。这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它同样确保经济组织而不是权威可以被不寻常地扩散："看不见的手"限制着所有的权力运作者。确实，它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大市场也确保了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保持半潜在状态，而不是参与面对面的辩论经济的阶级斗争。旧政权没有把小资产阶级排除在市场之外，市场是通向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因而小资产阶级非常繁荣。在 19 世纪早期，他们对市场利益的平行占领已发展成为亲密无间的关系。土地和工业等附属于金融和商业，融合后的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了一种独特的自由贸易和金本位的强迫观念——英国旧政权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

宗教和随后的国家扩张，尤其是市场资本主义，产生了第二个主要权力网络，即话语沟通的大众意识形态网。这成为偶尔传递小资产阶级之间道德化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在其他国家，它们协助摧毁旧政权的道德内聚力并提供革命领导和社会重组原则。但在英国，这一网络是由消费者市场推动产生的，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都参与了这一市场。资产阶级意识和旧政权价值的现代化，可以联合产生一个普遍妥协改革的"半原则性"运动，这一运动通过混合的阶级部门组织传播，这一点比法国的程度强多了。意识权力关系或许是四种权力中最少自主性的一个，因为它们大部分由资产阶级和政府组织产生。

第三，政府特征，正如制度化的中央集权理论所说的(第三章讨论了)，也有助于产生"改革"而不是"革命"。英国政府在政府精英和统治阶级之间已经使集权、竞争性的政党关系制度化。我没有试图解释这一早期的、初步的"政党民主制"，因为它发生于一个较早的历史时期(我在第一卷中没有过多地讨论)。或许这些制度兴起的阶级还原

理论有某些力量，尽管我认为这一原因与军事财政压力和意识形态论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这一早期过程的政治结果达到了它自己“滞后”的权力自主。因为这一时期提高了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实用性，因而其现存制度的特性在西方社会中渐渐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特征：以后各章中展示了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同样的过程。

在英国，选举权与“实际代议制”混为一谈，这与新兴阶级不完全相关。1832年以后，这一混乱被整理为财产选举资格的限制，并导致了封闭(直到维多利亚中期繁荣时仍对许多工人有财产限制)。1832年以前(并从18世纪60年代始)，如果有来自下层的压力，则政府心脏处的“党派”或许会屈服并扩大其范围——证明不像法国、奥地利以及英国的殖民地政府那样脆弱。而且，改革的鼓动宣传集中在其他政府体制的特性上，而不是阶级选举上(18世纪晚期各国均是如此)，其政治经济的重要意义在逐步上升。“经济改革”运动要求清除政府腐败，有意识地减少税收及无意识地促进政府的集中化和“自然化”。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对旧政权不满的核心所在，也是现代化的政权党派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而抛弃“该死的旧腐败”的关键问题。

但这受到第四种社会权力来源的逻辑的推动。由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兴起所创造的军国主义具体化产生了财政和政治压力。政府为赢得战争，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并进行了改革。如果没有法国战争，一个非“民族”化的、更加部门化的旧政权或许不用进行大规模改革，就可以进入工业社会。享有个人社会公民权外加或许部分政治公民权的现存的小资产阶级，可以继续作为一个部门的君主制政权，但又是非民主的受庇护者，正如他们之前的小农场主已经做到的那样。普鲁士德国的进程证明了发展相似轨迹的可行性。

旧政权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广泛政治阶级冲突已经强化，而后妥协。但这并不“单纯”：它同样是由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权力网络塑造的。英国的现代化不是一维的进化，工业资本主义不能决定国家结构。恰恰相反，英国政府是多型的，它定型为持久的资本主义与军

事主义。它们的共同影响推动其代议制定型向政党民主发展以及其“民主的定型”向更集中的民族国家发展。

在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基本上依靠市场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联合。两者相互加强；英国地缘政治霸权的兴起部分要归因于其开拓性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同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也大大受益于皇家海军以及精明的海外联盟和富有经验的国家的财政。但是用艾恩公爵的话说，英国地缘政治的胜利是“该死的短跑”；如第八章中证明的，这胜利决定性地依靠英国海军和获得盟友以迫使法国两线作战的外交技巧。不管什么时候，法国都在进行两线作战，它失败了。当英国在美国革命中两线作战时，它也失败了。旧政权自由主义的切实可行性不是一种逐步发展的必要性，也不是农业和工业革命的结果以及阶级力量的平衡。它从两个基本权力斗争——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更偶然性结合中导致了最后的现实情况，即其中每一方都在帮助减少对方的部门和区域的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 S.Hill, and B.S.Turner. 1980.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Allen & Unwin.

Albert, W. 1972. *The Turnpike Road System of England, 1763—18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ker, T., and C. Savage. 1974.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ransport in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Bohstedt, J. 1983. *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England and Wales, 1790—181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nfield, L. 1983. *Marriage Settlements, 1601—1740: The Adoption of the Strict Settl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wer, J. 1976. *Party Ideology and Party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 N. McKendrick, J.Brewer, and J.H.Plumb. London: Europa Press.

Brock, M.1973. *The Great Reform Act*. London: Hutchinson.

Cannadine, D. 1977. Aristocratic indebtedn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ase re-open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30.

Chandler, A.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e, I.R. 1962. *Wilkes, Wyville and Reform: The Parliamentary Reform Movement in British Politics, 1760—1785*. London: Macmillan.

1982.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London: Arnold.

1984. *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lark, J.C.D. 1985.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ley, L. 1986. Whose nation? Cla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tain, 1750—1785. *Past and Present*, no. 113.

Crafts, N. 1983.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700—1831: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6.

1985.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anfield, G.A. 196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Newspaper, 1700—17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The Press and Society: From Caxton to Northcliffe. London: Longman Group.

Crouzet, F. 1972. Capital forma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his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982. *The Victorian Economy*. London: Methuen.

Currie, R., et al. 1977. *Churches and Churchgoers: Patterns of Church Growth in the British Isles Since 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ahl, R. 1971. *Polyarch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vidoff, L. 1986. The role of gender in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griculture in England 1780—1850. In *Gender and Stratification*, ed. R. Crompton and M. Mann. Oxford: Polity Press.

Deane, P., and W.Cole. 1967.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nwiddy, J. 1988. England.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O.Dann and J.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Eversley, D.1967. The hom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50—1880. In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E. Jones and G. Mingay. London: Arnold.

Foster, J. 1974.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Gash, N. 1986. *Pillars of Govern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State and Society, c1770—c1880*. London: Arnold.

Gilbert, A. D. 1976.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 England: Church, Chapel and Social Change, 1740—1914*. London: Longman Group.

Hagen, W. 1988. Capitalism and the countrysid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terpretations, models, debates.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Harley, C. 1982.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1841: evidence of slower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Holmes, G. 1976. The Electorate and the National Will in the First Age of Party. Inaugur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Houston, R.A.1982a.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cy: northern England, 1640—17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35.

1982b. The literacy myth: illiteracy in Scotland, 1630—1760. *Past and Present*, no. 96.

Ingham, G. 1984. *Capitalism Divided?: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British Soci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John, A.H. 1967.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00—1760. In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50—1815*, ed. E.L.Jones. London: Methuen.

Jones, E.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P. 1967. The community library: a chapter i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7.

Kussmaul, A. 1981. *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znets, S. 199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9.

1963.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Ⅷ-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s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1.

Landes, D.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C.H. 1986. *The British Economy Since 1700: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llee, S. 1973.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In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3: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C.M.Cipolla. London: Fontana.

Lindert, P. H., and J. G. Williamson. 1982. Revising England's social tables, 1688—181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

1983. Reinterpreting Britain's social tables, 1688 - 191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

Longstreth, F. 1983. State Economic Planning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conomic Policy in Britain, 1940—1979. Ph. 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cCloskey, D. 1985.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60: a survey. In *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J.Mokyr. London: Allen & Unwin.

McKendrick, N. 1974. Hom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A new view of the role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English Thought and Society. London: Europa Press.

1982.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economy. In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ed. McKendrick, Brewer, and Plumb.

McKendrick, N., J. Brewer, and J. H Plumb, eds.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ress.

Mann, M. 1988a. The decline of Great Britain and

1988b. The roo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capitalism. Both in my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rshall, T.H. 196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his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Heinemann.

Mathias, P., and P.K.O'Brien. 1976. 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15—181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Mingay G.E. 1963. *English Landed Socie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okyr, J. 1977. Demand versus supp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85.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J.Mokyr. London: Allen & Unwin.

Money, J. 1977.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Birmingham and the West Midlands, 1760—18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oore, D.C. 1976. *The Politics of Deference*. Hassocks, Sussex: Harvester.

Mouzelis, N. 1986. *Politics in the Semi-Periphe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Musson, A.E. 1972.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hi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Musson, A.E., and E.Robinson. 196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eale, R.S.1983. *History and Class: Essential Readings in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Blackwell.

Newman, G. 1987.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O'Brien, P.K. 1985. Agriculture and the home market for English industry, 1660—1820.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0.

Pawson, E. 1979.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ayne, P.L. 1974. *British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Perkin, H. 1969.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hillips, J.A. 1982. *Electoral Behavior in Unreformed England: Plumpers, Splitters and Straigh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latt, D.C.M. 1972. *Latin America and British Trade, 1806—1914*. London: Black.

Plumb, J.H. 1950.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Commercialization and society. In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ed. McKendrick, Brewer, and Plumb.

Pollard, S. 1965.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Arnold.

Pollins, H. 1952. The finances of the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railwa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5.

Reed, M.C. 1975. *Investment in Railways in Britain, 1820—4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binstein, W.D. 1977a. The Victorian middle classes: wealth, occupation and geograph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30.

1977b. Wealth, elite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modern Britain. *Past and Present*, no. 76.

1983. The end of "old corruption" in Britain, 1780—1860. *Past and Present*, no. 101.

Rudé, G. 1962. Wilkes and Liber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ueschemeyer, D.; E.Stephens, and J.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ofield, M. 1981. Dimensions of literacy in England, 1750—1850. In *Literac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A Reader*, ed. H.J.Gra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ed, J. 1985. Gentlemen dissenter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rational dissent in the 1770s and 1780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8.

Smith, R.A. 1972.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s: Patrons and Place-Hunte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peck, W.A. 1977.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Arnold.

Stevenson, J. 1979.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England, 1700—1810*. London: Longman Group.

Thomas, J.A. 1939. *The House of Commons, 1832—1901: A Study of Its Economic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Board.

Thompson, E.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Thompson, F.M.L. 1963.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ard, W.R. 1973.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790—185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Watt, I. 1963. The Rise of the Novel.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West, E.G. 1985. Literac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J. Mokyr. London: Allen & Unwin.

Wiles, R.M. 1968. Middle class literacy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fresh evidence. In *Stud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R.F. Brissende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D.E. 1984. Morals, markets and the English crowd in 1766. *Past and Present*, no. 104.

Wilson, C. 1955. The entrepreneur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3.

Wolfe, A. 1977.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New York: Free Press.

Wrigley, E.A. 1985.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5.

Wrigley, E.A., and R.S. Schofield. 1981.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London: Arnold.

第五章

美国革命和联邦自由资本主义的确立

在英国本土，战争与改革是分离的——前者在国外，后者在国内。然而，在包括英属爱尔兰在内的其他国家，武装斗争把二者混在了一起。法国和美洲爆发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场革命。美洲革命的结果是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民族最少、联邦州最多的最资本主义的(most capitalist)国家。我把美国描述成自由资本主义、联邦、政党民主、不均匀的军事体制、显著的国内而非地缘政治特色的组合体。我将努力解释它是如何获得这些特性的。

美洲殖民地

1760年，北美殖民地有200万人在英王统治下生活，土著美洲人(印第安人)不计算在内(他们在殖民地有10万人，越往西越多)，非洲裔奴隶占所计人数的20%。白人中约75%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因而除土著和奴隶外，大部分居民已经习惯了英国的统治。北美是英国的，它的思想机构和经济机构与母国非常相似——这是那种弥散的市民社会的第二故乡，包括资本主义和达到大众话语能力的商业资本主义之路(见第二章介绍)。它的军事和政治机构的原型也在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第四章中所描述的适度集权的旧政权自由主义的美国变体，但在财政军事压力之下爆发了一场革命，首先扩展了美国的独特性，而

最终是由它们发展成资本主义和联邦的自由主义。即使在危机之前，美洲权力的五个特殊性也已经显现，重在强调英国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方式：

1. 殖民地与母国相距三千英里，有相对逻辑上的自主及事实上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在18世纪的通讯条件下，北美不可能脱离伦敦。各地的情况如此不同，使得伦敦在重要决断方面需要经常的咨询，但是帆船至少四个月才能完成整个航程，占去整个运动或农忙季节。无论怎样，伦敦对商业利润的兴趣超过了对帝国组织的兴趣，因而他们采取了称之为“有益忽略的政策”，给予殖民地以自主权，因为毕竟它们是本土的堂兄弟，而不是外国人或土著。专制统治对于国王来说是不合法的，然而选举殖民地的下院议员在政界占据一席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法国革命最后采取了中央集权化的途径)。北美殖民地实际上是自由的。

自主权指复合的权力分散的自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重要的殖民地——实际上这些殖民地与加拿大、英属加勒比地区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其海岸线长达1 200英里。如表4.1显示，北美有一个权力分散的宪法政府。每个殖民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有自己的民选议会，警察和税收机构。这些小政权的日常工作——它们的财政资源，司法程序以及法案的通过——都是美洲式的。只有5%的议会法案不能通过英国议会的批准(Palmer, 1959, p.190)。大部分殖民地的议会是英王政府的分支代理，尽管部分议会仍受业主或特许状政府的统治。总督有很大的政府权力：他可以否决议案，解散议会，任命上院或立法委员作为行政权威。但只有经过殖民地贵族的同意，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英国议会拒绝把总督、政府员工、法官的薪金添加到议会给国王的年俸中。地方立法机构投票决定它们的薪俸，因此总督受地方议会的控制，成为一个“在国外的相当有力的协商者”(Pole, 1966, p.503)。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名义上的主权国家在地方生活中几乎没有制度化。在这样的自主权中，地方统治将如繁花盛开。

2. 殖民地的经济是独一无二的——基本上是土地所有制的，甚至有些原始，但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 90%以上的白种人是农场主，来自比任何欧洲国家更不规范的环境。 制造业仍然不重要。 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熟练的劳动技术使白种美洲人比欧洲人更富有。 美洲军队士兵比英国士兵身高平均高 2 英寸，这说明了他们在饮食上的优越性(Sokoloff and Villaflor， 1982)。 农场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剩余产品。 两种主要经济形式，即小型农业和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烟草的南方种植园，产生了不同于欧洲的三个阶层，即种植园主、种植园奴隶和高度自主的农场主。 英国是欧洲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但一旦美洲的农场主开始为世界市场生产，美洲就比英国更资本主义化。

3. 殖民地有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全球的欧洲人相对于其他大陆民族明显的权力优势形成了意念上的种族主义。 但北美的欧洲人生活在另外两个不同的种族中：与好斗的"红种的印第安人"争夺土地，同时剥夺非洲黑人的劳动力。 这种三角关系在这里比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维持的时间更长。 大环境对欧洲人异常适宜：印第安人始终保持强力的军事威胁，黑奴对种植棉花、烟草永远有用。 在本卷涉及的时期之内，北美社会的双重恐怖一直是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对非洲人的奴役。 这对欧洲人影响深远，鼓励了一种权力关系中无孔不入的暴力——无耻地对待印第安人，奴隶法规中赤裸裸的欺骗，白人持有武器的惯例化。 它增强了好战精神以及团结和合乎规范的社区的种族定义。 尽管背景不同，白人在相异的种族间组成了一个比 18 世纪任何欧洲国家所存在的更和谐一致的社区。

4. 白人社区因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对的经济平等而加强。 几乎所有白人都是新教徒。 许多宗派定居在一起，围绕信仰机构加强团结并鼓励识字。 18 世纪最早的三个伟大意识基础机构之一即宗教发起的识字运动，在这里扩展到了最大程度。 到 18 世纪晚期，除了生活在遥远农业地区的人以外，北美人的文化水平已与英国人相差无几。 三分之二的男性公民，一些女性，以及新英格兰的所有男性清教徒都识字

(Lockridge，1974, pp.72—101)。不断扩散的意识权力网(在第二章中论述过)，像18世纪中期的宗教改革运动—大觉醒一样渗透到了白人社区。布道和小册子把自由市场扩展到了灵魂拯救领域。虽然圣公会教堂也建在那里，但只控制部分地区，超越教会区域的宗教骚乱使它的等级制减弱。跨教派新教主义潜移默化地把殖民地的灵魂和统治者的灵魂一分为二。

相对的经济平等同样使白人成为一个整体。确实，殖民者中包括大部分表4.2中区分的英国阶级。贵族和上层代表着旧政权，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许多人保持几代的财富和地位)。控制着海外贸易的海岸商人寡头集团、牧师、律师、追求庇护的军官和配备有人员的行政机构也是旧政权的代表。相对于欧洲来说，北美的有产“人民”是小得多的独立农民，还有更少的小资产阶级、贸易商、店主、工匠和城市劳动者，占白人的40%和全部人口的1/3。美洲更穷的“平民”也不一样，有印第安人、黑人，也包括少数白人契约奴或乞丐。虽然在整个18世纪不平等的现象日益恶化(Henretta，1973, pp.102—112；Nash，1975—1976)，但富足的土地加上劳动力短缺，使所有的白人生活得到了保障。不存在大量被排除在外的白人贫民，因此也不像英国那样有一个清晰的反对阶级概念。白人融入平民社会，他们可以参加日常活动，在这一点上甚至优于英国。但黑人和印第安人则被排除在外。

5. 移民使更多的白人从对部门权力组织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扎根于习俗和依从中的地方政权还年轻，尽管这些习俗和依从很难培养，特别是在移民很久的南方地区和父权制的清教徒控制的新英格兰。它没有教会政权和贵族阶级的“该死的腐败”网。英国支持的圣公会只建立在南方。18世纪早期的北美人已经拥有像英国一样的社会公民身份(Bailyn，1962，p.348)，同时，政治公民权也有很大的发展，因为有更多的人获得了投票权。政府庇护制也受到了限制，然而，确实存在面向市场的腐败。殖民地的行政机构是土地授予、贸易和奴隶特权

的主要来源。 与英国的多样性相对比，旧政权体现了“新资本主义的腐败”。

移民极大地解放了。 多达 20% 的移民是受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地主剥削的贫苦佃农。 现在他们在边缘林区和边疆拥有自己的农场，获得了自由，也稍稍富裕起来。 更多的人——贝林(1986)估计约占英国移民的一半——是从城镇地区来的贫苦工匠和贸易商。 为了偿还路费，他们自卖为契约奴。 他们像奴隶一样廉价出卖劳动力，继而忍受通常为四年的人身依附，待期满后，多数弃商而在边疆地区购买小块农场。 到 18 世纪 70 年代，契约形式衰落，自由劳动力兴起(像英国农场一样)。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远离部门权力组织的动向，这种流动比单纯的职业迁徙更有意义，职业迁徙即现代社会学中所指的“流动”(尽管梅因 1965 年论证说也有一定的职业流动)。 像其他殖民地早期发展的年代一样，美洲也存在个人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机会。 拥有勤劳、天赋、运气和少量资本的工匠，将比欧洲更容易地发展成为农场主。 在上层阶级，同样的结合可以使体面但家境并不富裕的青年利用家族关系获得财富和地位(Mann and Stephens, 1991)。 虽然北美以农业为主，但是却没有欧洲的贵族制。 因为美洲乡村的白人代表的是流动和独立，而不是稳定和依从。 欧洲 18 世纪的小农场主(农民)通常在经济上独立于上一等级，却没有政治上的独立。 而北美逆转了其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描写北美资本主义先驱的过于文雅的词语，即指部门权力组织之外的独立小农场主。

这五种变体确保了被认为英国化的北美白人殖民者能组成一个比其母国平民社会更具凝聚力、更少分裂的组织，这种更具流动性的地区平民社会，欧洲大陆国家是不能与之比拟的。 美洲，特别是在中等州和边疆农场，小资本家人数众多且都独立自主。 他们的独立经过了毕生与贫困和屈从的斗争，来之不易。 但是较大的财产集中、政治庇护及立法上的屈从在确定城镇、港口、南方农业中何为商品方面也发挥了作

用。因此，北美的资本主义包括四个不同组成部分：

1. 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小商品资本主义，其精神因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著名。

2. 较大的私有财产集团。雇用自由劳动力，其所有者往往在农场、商人、金融和制造业利益中占其二。

3. 为世界市场生产大宗产品的南方奴隶制资本主义。

4. 政府和"类似旧政权"的资本主义活动庇护者，包括许多契约劳动者。

不过，这也因地而异，十三个殖民地和广袤的土地确保北美比英国经济更加多样化，更少经济集权和某些方面的"民族化"。通过革命，殖民者开始减少这样的多样性。粗略算来，北美革命使第一、第三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战胜了第四种。第二种形式使中产阶级分裂，但它的革命派别在新政府中成功地掌握了权力，因而新政府仍是邦联的而且权力分散。后来，内战摧毁了第三种形式，即奴隶制资本主义。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以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出现，这种资本主义结合了权力分散和大量财产的集中，因而荒谬地被灌输了小资产阶级精神：它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并保持了邦联制。

革命前，政治更倾向于使那些处于第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人(小生产者)反对其他三类。殖民议会依据财产资格选举。因为存在大量的小农场主，40%—80%的白人成年男子(因地而异，平均50%左右)都被赋予选举权利，其选举权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广泛得多(英国有选举权的成人男子约占15%)。凡有财产者都可以参加城镇大会(北美会议)，其中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占了多数。但其成员通常兼有商人、土地所有者、官员和律师(南方为奴隶主)等角色的显要家庭垄断了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它们占了被选任议会和城镇大会成员中的多数。政府像英国城镇一样，由一种互通姻亲的扩展的家族网络统治着。

大港口城镇经历的冲突最大。保守派和改革派政党在零星的暴力

中呼吁由阶级确定的跟随者。像英国的激进主义一样，混乱的动力十分明显：暴乱者可以反抗，但不能组织起来寻求别的解决办法；主要的改革派领导人来自显要的“在野党”，只能偶尔与小资产阶级和工匠活动分子合作，而这些人的阶级意识仍模糊不定，且随地区而变化(像在英国)，在三个主要港口城市中，18 世纪 70 年代早期，费城偏左，波士顿偏右，而纽约的方向仍不明确(Nash， 1986， pp.200—247)。

在其他大多数地区，选举人已经接受了政治上无权的状态，不再出来投票并接受了殖民者贵族政权的任命权和依附网络(Dinkin, 1977)，用当时的话讲就是“滔滔不绝的贵族制面对沉默的民主制”(Fischer, 1965, p.4)。大多数殖民地居民能与占领经济和睦相处，与他们的白人邻居合作，并剥削和消灭他人。我前面已经说过，对 18 世纪早期西方国家的人来说，政治和政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北美人民生活在富足、税收很少、独立而又远离西方社会的边远地区，英国政府和殖民地政府看起来都无关紧要。因此，由于人们弃权，所以还不是非法的政府。

在大众的政治冷漠中，分割的旧政权出现了。殖民地本来可以继续顺从大不列颠温和的腐败统治，虽然确实存在前面所列举的北美的特殊性，但是像哈茨(1955)论证的那样，它们并没有稳步发展为 19 世纪繁荣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地方殖民地政权已经开始在繁荣稳定的农业社会中制度化。政府的成熟需要时间和稳定，但是只发生在南部上层和新英格兰的禁欲主义元老中。模仿英国的一个权力相当分散的旧政权，本来可以繁荣昌盛，而且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我们可以把这种反逻辑的论证扩展到地缘政治权力中。即使没有革命，在 19 世纪中期的某一时间，殖民地势力的增长也会在议会中脱离女王的控制。到那时，或许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接受像那些仍保留的白人统治区域一样的更松散的政治联盟形式。现代政治和地缘政治权力证明有很大的不同：在讲英语的联邦共同体的持续统治下，它的中心会穿过大西洋，或许能避免发生在衰落的英国和美国霸权之间的大国

权力冲突的不稳定时期，这种霸权恐吓并改变了世界。

叛乱

在大不列颠及其他地区，军事财政支出(虽然受地缘政治推动)分为不同的途径参与控制权力关系。它迫使英国政府采取政策，以清楚表明美国的特殊性。反过来，这迫使许多北美人民首次认为殖民地政府是重要的，而后来又认为它是不合理的。然后他们推翻了它并建立起完全不同的政权。

在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期间(美洲称之为“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殖民地人民支付紧急税款换取地方议会权力的增加——即增加权力分散的政治自主权。英国的胜利结束了法国和西班牙对敌对的印第安人的补贴，并确定了殖民地的疆域。对殖民地的军事威胁解除了。从在美洲的英国人的观念来看，胜利是一种灾难。殖民地现在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或统治了。实际上，许多人认为英国政府不必要地干预了将印第安人赶出家园和向西部的扩张。但战争使英国获得了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和自由贸易区域，还可在美洲常驻部队。它寻求把帝国组织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希望殖民地居民能提供其维持费用，并相信它拥有一种新的强行执行其愿望的方式，即一支常规军队。

英国政府从没有要求北美人缴纳同英国臣民一样高的赋税，相比较而言，北美直接的财政压迫甚至少于普鲁士(其大部分财政收入来源于皇家领地)。但是，像我们同样可以在法国看到的一样，财政上的痛苦源自日益严重的强征和政府可以使征税制度化的程度。殖民地没有制度化的国债，因此英国要求殖民地缴更多的税。然而，许多事情对于地缘政治和帝国已十分明显，殖民地有一个地方利益概念，长期实行地方财政控制和逃避关税。正如它对形势的看法一样，北美逻辑上的自主权是由一个被地缘政治必要性驱动的政权所提供的。财政军事压力

使得政治斗争和不满情绪逐步升级。

18世纪60年代晚期到18世纪70年代，财政利益上的直接冲突越来越具有原则性并进一步扩展。像英国(第四章)和法国(第六章)一样，它动员起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意识权力网。北美的作家和演说家把利益归纳到原则中，它们利用了前面讨论过的美洲的五种特殊性。利益和原则被用在民主精神和议会的实际逻辑统治中进行讨论。17世纪已半废的清教激进主义传统与备受尊重的洛克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结合，在实际经济独立、资本主义契约精神和新教主义中产生回响。在财政压力下，北美扩大了英国的传统思想，宣称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英国获得大量的支持。宗教、文化和平等的白人社区的一致性，使有原则的道德反抗渗透到了美洲意识和政治权利网这两个层次上。

普遍的一层反抗集中在小农场主、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它们通过口头集会动员起来——暴动、示威，把人浑身涂上柏油并粘上羽毛以示惩罚，对王家和地方官员采取其他恐吓手段——弥合了"人民"和"平民"之间的鸿沟，就像法国革命群众和英国彼得卢时期的示威一样。在北美及一定程度上在英国，俱乐部、小酒馆和北美城镇会议机构，是小资产阶级、小农场主与第二阶层的结合点，即指显贵家族网。首先集中在殖民地议会中，当出现僵局后，显贵人士把他们的网络通过扩大的家族关系、话语能力机构和法律职业扩展到了整个殖民地。

话语意识火了起来。1763—1775年间，报纸数量加倍增加(Davison, 1941, p.225)。1776年，约有400种小册子出版，多数长10—15页，占多数的是研究假设、探索论证逻辑和考虑结论的推理解释类的小册子。它们的风格意味着读者有财产、有文化且老练(Bailyn, 1967, pp.1—21)。托马斯·潘恩1776年出版的《常识》，卖出了12万册(相当于整个殖民地人口的3%，他的《人权》一书后来在英国以同样比例卖出)。小册子的作者和记者几乎都不是专业人员。小册子是由那些担任律师、布道者、商人和种植园主的名流贵族利用闲暇所写的；报纸是他们的信

件、演讲、布道和官方报告的摘选。他们实际上并非激进派，更确切地说是殖民地统治政权中的进步“党派”。就像法国旧政权中现代化的开明人士一样，他们在政府的压力下，被推到了“国家”的对立面，推向非此即彼的原则性观念。

律师变得举足轻重。在整个18世纪，如英国法律职业为不列颠旧政权服务一样，他们成为殖民地政府用处极大的助手。法律训练成为通向王家庇护、政治擢升和获得地位的垫脚石。起初大部分律师是王家托利党人。但英国的税收造成律师观念上的困境。税收符合英国国会的统治，但与地方政治和法律实践相悖，违反了英国合法权利观念所必需的习惯法。激进分子利用英国法律框架保护自由主义的存在，反对专制君主统治。

律师成了一个更资本主义化的自由概念的主要实践理论家，即“必不可少的知识分子”(借用格拉姆斯克的话)。许多律师是财产所有者而不是内行理论家。年长的律师大多成为保王派，因为他们与殖民地政权卷在一起。但18世纪70年代训练出来的年轻律师，没有卷入旧政权，成为反对派领袖，并最终成为反叛的爱国者(Mckirdy, 1972；Murrin, 1983)。像法国一样，他们大部分看起来非常成功，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陷于“封锁的流动”。他们是有相当天才的实践理论家。正如英国将军盖奇在《印花税法案》之后向他的上层人士解释的那样：“律师是提出要求的呼声传遍各地的源泉。”革命领导人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英国的稳固统治依靠王权与地方显贵的联盟。但这一联盟现在已经分裂为保王派和爱国派。爱国派动员起了法律和话语能力网络，联系或有时控制了更普遍的口头集会网络。因为北美白人中很少有贫困的“危险阶级”，显贵爱国者与欧洲相比很少受到来自下层平民的革命恐怖的惩罚。

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是1766年初的反《印花税法案》。自由之子社通过报纸、小册子和相应的有产者关系网——绅士、不动产终

生保有者、手工业主和独立贸易商，建立起贯穿各殖民地的联系。他们需要下层民众的支持来反抗英国军队。这种联合的反抗运行起来。1776年法案被禁止，自由之子社相继解散。当第二年政府转向征收消费税的《唐森法案》时，他们又恢复活动。因为税收落到了所有消费者的头上，因而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他们转向抵制英货，并惩罚那些破坏抵制运动的人。由那些有资格投票选举议员的人选出，并由经常参与法律实践的显贵人士组成的特别法庭赋予此事件以司法公正的氛围(Davison, 1941, pp. 63—82； Maier, 1973, pp. 77—112, 280—287)。由殖民地政权成员领导、各殖民地共同组织，并获得大众支持和运用意识动员新方法的一场反叛正在进行中。

然而，英国不会放弃他们的原则。伯奇(1976)和波科克(1980)认为英国政治家有他们自己的原则。代议制和君主制在国王议会惯例中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允许殖民地议会批准和否决税法，将分裂英国自由概念所依据的议会君主制政体。然而，我怀疑革命是由原则冲突所引起的观点。那是关于权力意识的过于静态的观点，通常从权力斗争本身得出。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英国旧政权多是无原则性的，因其反对者(美洲等)表达他们对被排除在外的不满而逐渐上升为原则。英国政府有两个更具讽刺性的观点。首先，它认为美洲的原则是不愿分担帝国防御费用的烟幕，而又不愿增加英国本土的税收负担。其次，它务实地找到一种最不痛苦的财政支出方式，但是必须依靠驻军强制执行。它征收了土地税、关税和附加的印花税等所有税收项目。

若不是英国政府因没能觉察美洲的特殊性而失算，就是它已别无选择。与英国不同，在殖民地，这样的财政计划没有在税收机构中形成制度。税收受地方贵族部门组织的监督。这样，武力强迫不仅仅是备用的威胁(像英国)，它还用来征集税收。任何权宜之计，任何集结待发的军队，违反了地方自主权和自由的意识，将激起更强烈的反抗，然后是英国强制的升级，继而是更严重的原则对立。北美人民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小型常规军不足以在广泛反抗的大国领域内征税。第二，

征税不仅仅是坏心眼的大臣而且是国王议会的要求。北美的反抗转向了有原则的反对议会统治的原则斗争。

1775年夏天，英国诉诸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但他们的军事优势不大。北美人装备精良，多数佩带随身武器，许多人当过民兵，一些民兵权威人士拥有紧急使用的大炮、弹药、车辆、马匹和地图(军服和操练手册较晚)。18世纪的军队已经装备齐全，其军事力量足以打败英国的首次攻击，并留出时间准备一次更加有组织的反抗。

殖民者因军事冲突而分裂。至少20%的白人成为保王派。这种分裂不仅仅建立在阶级、地区或部门基础之上。许多作者认为爱国派和保王派是依据经济部门的不同而划分的。爱国者卷进了向西部的扩张——因英国的政策而受挫(Egnal, 1988)。然而他们缺乏证据并且与斯蒂芬斯和我(1991)发现的爱国派领导人的实际上的多样化经济利益相冲突。或许最清楚(虽仍粗糙)的划分是把两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第三种区别开来。执政派经营并从政府政治经济——殖民地政府和商业——中获利更可能成为保王派(Brown, 1965)。大部分独立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奴隶主很少卷入政府和商业，他们是爱国派(奴隶制在南方已成制度，不再需要英王的军事支持)。因而，最明确的区分或许是——“执政党”对“在野党”。像其他地区一样，“在野党”宣称普遍的原则，而“执政党”则宣称特殊主义传统。但这种划分有时是模糊的：一个有凝聚力的地方显贵人士群体可以围绕它的立场组织社团，从而使大部分反对者沉默。

布朗指出，判断往往受他们认为会赢的那一方的影响，这又根据可以看到的地方的恐怖平衡而发生变化。爱国派集中于弗吉尼亚的绅士和新英格兰的民主派的奇特同盟，保王派集中于纽约和许多中部殖民地团体。双方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最富有、最显贵的家族成员。这次反抗不是一场革命。迄今为止，军事和财政压力只是扩大了北美的特殊性，北美投入了战争。

战争与"革命"

武装冲突很快升级为内战。在每一阶段双方都认为对方会退缩。双方都冒着全面战争的危险，相信它们会赢——战争近似于竞争。历史传统强调英国的错误、反叛者的超意志和持久的力量。近代修正主义强调宽泛的地缘政治。英国政府害怕叛乱会蔓延到爱尔兰，法国的阴谋可以从爱尔兰威胁到英国本土。因此，更多的部队用来对付爱尔兰的危机，而没有给北美的英国将军派去更多的军队。法国和西班牙参战后，战争平衡状态被打破。载着军队的法国军舰突破重围，确保了1781年纽约康华利将军决定性的投降。如果没有法国，战争将会拖延下去，或者最终以妥协结束。战争结果对美国非常重要，战争过程和结果主要取决于军事和地缘政治权力关系——最后时刻取决于战争的运气。这是早期美国历史必要的间断。

战争使造反更接近革命。独立战争是不是革命仍有争议。按社会学观点，革命可以被定义为决定性权力关系的暴力转变，现实世界的革命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美国实践明显地模棱两可。我不愿用"革命"一词源于以下四个原因：

1. 独立战争包括三个不同的斗争：推翻英国旧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建立各阶级新的社会关系。如果这三种混合成单一的暴力大变革，像法国和俄国革命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一场"革命"。但它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

2. 虽然与英国的斗争以暴力方式解决，但其他两种斗争是妥协的，继而通过后来几代人的冲突而更加制度化。这场"革命"以暴力开始，然后是断断续续几十年的半混乱状态，最后政治和意识权力确实转变过来了，但阶级关系没有多少转变。

3. 虽然这种转变非常重要，但改革发生的方式值得商榷，假如得到

暴力冲突之助，或许是深层进化过程的结果。

4. 革命的领导人即开国元勋，自始至终都是白人有产者。斯蒂芬斯和我自己的研究(1991)表明，开国元勋们比比尔德(1913)、索尔伯格(1958， p.387)和麦克唐纳(1958)等早期研究者所认为的更上层，更有组织化。

一百二十九个开国元勋签署了 1776 年的《独立宣言》、1783 年的《邦联条例》，并且都是 1787 年制宪会议的代表。几乎所有的人都来自最富有、最显贵的家庭，没有穷人和手工劳动者(除了医生和一些积极的中层农场主)。只有约二十人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或职业生涯。其余的人来自符合绅士身份的各种行业——平均说来，主要是种植园主、律师、商人、金融家、制造商、高级官员或其他职业角色中的三个。他们同样属于在地方社团中占重要地位的富有的大家族。他们通过这样的关系得到官职、通婚并接受遗产。只有两位元勋看起来是白手起家，其余的是流向较高社会阶层的有天赋者，相对来说是从扩大家族关系中获益较少的"穷亲戚"。他们的教育几乎达到了最高水平，虽然只占殖民地人口的 1%，但他们的文化网络是高尚的、延伸的和密集的。找一个同类的保王派领导群体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看起来也非常富有(Brown， 1965)。难道这不仅仅是旧政权中的帮派主义？毕竟，伯奇(1981)已经表明，同一上层阶级在革命后继续控制着美国内阁。

但四种相反的、潜在的"革命的"力量同样有影响力：

1. 战争期间，参与者运用了极端社会的和政治的直接暴力。战争不仅仅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还是社团间、邻居间、朋友间的内战，并且将斗争到底。即使排除战斗，暴力也像革命性实践(法、俄革命)一样伟大。与法国比较而言，美国被剥夺财产、流亡国外的保王派可能达到法国的五倍之多(Palmer, 1959, I， pp. 188, 202)。土地重新分配，一般从富有的保王派转到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手里，革命用暴力大量地剥夺了保王派的经济权利(虽然与俄国不同)。

2. 这种行动按照革命的政治观念是合法的。爱国者参照人民的道德权力反对“专制主义”、“奴隶制”、“特权”、“腐败”和“阴谋”——所有这一切都与法国一样。保王派和英国原则上只是适当地保卫法定权威，它们对意识斗争不感兴趣。这种意识的不对称同样类似于任何革命。

3. 战争导致了政治上立法的突然转变。抛弃英国和保王派，需要更新政权，必须由成文文件来“构建”。权力来源于“我们人民”和广泛选举的会议，他们的投票是至高无上的，可以创建政府。1780年，马萨诸塞的叛乱者，在英国超出特别政治重组的逼迫下，宣布了“由人民规定和创建的”宪法。这是对西方叛乱传统保守主义的背离。从被悠久传统证明有理的权利角度来看，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叛乱辩护。实际上美洲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正如贝林所说(虽然证明是一个保守的、非革命性事件)，他们宣称不是寻求“推翻或更换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是维护被腐败宪法所威胁的自由以及原则上的现有自由条件的确定”(1967, p.19)。事实上，只要英王不再变着法儿征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但只要英国不克制自己，政治秩序便不能恢复。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叛乱者成为政治革命者。他们被迫创立了自己的政府，人民成为积极的政治力量，不再仅仅被动地体现传统的自由。从此以后，只要反叛者模仿美国的发明，建立起选举会议，他们就成为革命者，法、俄革命即属此类。

4. 历史舞台上的“人民”证明，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立法。它导致了政治民主和更民主的政治经济。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起义的富有显贵都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人民”的概念与英国的人民概念相同，即指白人财产所有者、“有教养和财产的人”。但他们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战斗，虽然帝国的大部分军队远在三千英里以外。他们需要比“人民”更多的人，即他们也需要“平民”。在美国，这批暴乱者随身携带武器。在反叛一方，出现了领导者和普通好战分子之间可以算得上是阶级斗争的事情(Countryman, 1981, 1985; Nash, 1986;

Rosswurm, 1987)，这种斗争是明确的且已被承认的，但却受到抗击更危险敌人所需纪律的遏制。

随着战争产生模糊的革命结果，军事权力关系组织与所有正面、反面的革命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现代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尽管经常是以权力分散的游击战形式进行。在危机期间，反叛者宣布了控制地区的普遍兵役制，并使之逐渐固定下来。民兵的主要作用不是赢得战斗(虽然一些独立小分队为正规军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而是强制性地动员中立的多数人参与小规模军事行动。一旦他们被说服或被拖进地方反英分遣队或反对他们的保王派邻居，那他们就没有退路了：他们是反英王战争的叛乱者(Shy, 1973)。

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对国内权力结构产生了各种影响。如果旧政权的各级指挥机构能够赢得战争，那就不需要激进化的结果了。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看到，奥地利和普鲁士人在1812—1813年继续控制它们的部队，并且能同时打败法国和抵制改革。但美国战争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军事组织，它们分散在十三个自主的殖民地中战斗，大量则认为明确规定的前头部队和小规模战斗人员都有重要的游击队特性。甚至大陆军也权力分散，而且由于供应不足而走向地方自给自足。该军由华盛顿领导，华盛顿作为统帅，其才能是在军事政治方面而不是在综合的运动策略方面。这样，当“人民”战斗时，他们是在一个相当自主的地方群体中作战，是作为自由男人(有时是妇女)逼迫甚至杀害他们以前所顺从的地方权贵。

这样，像帕尔默(1959)所强调的，战争迅速动摇了地方殖民庇护网并大量地扩充了普遍的、民主的地方殖民权力关系。“当水壶开了以后，渣子就会浮起来，”一个不满的马萨诸塞反叛者抱怨道(Handlin and Handlin, 1969, p.11)。参军入伍的青年人和强征的民兵不是财产所有者，也无权投票。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公民权要求——并且有一段时间难以抵抗。

在逻辑和策略上，运动要依靠交通线上的港口城市和其他城市，也

要依靠农场主的内部供应和侧翼包抄。在许多地区，这种大量组织的上升力量是以牺牲显贵为代价的。

对殖民政权微不足道的两组人成为反叛成功的关键。第一，城市手工业工人、工匠和小店主(底层的小资产阶级)能够对城市议会进行压制，组织暴力反抗保王派，因为每个地区都要宣布是支持国王还是支持反叛者。第二，新近定居西部的小农场主，那时他们或者没有选举权，或者选举权受限，他们有自主的社区和贸易组织。他们阻止保王派在本地区活动，参加并为军队提供供应。他们支持革命事业，特别是支持政府废除这些“新资本主义的腐败行为”——经济特权和垄断。所谓战争时期形式的革命是指地方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够实现小资产阶级和农场主的要求。民众城市会议和乡村社团组织成为新兴叛乱政权和民兵的地方机构。城市和乡间受限的印刷品网络——报纸、小册子和相应的委员会——被民众的口头集会所控制(参看 Henretta, 1973, pp.162—165；essays in young, 1976； Steffen, 1984)。

因此，当保王派呼吁人们战斗时，他们开始根据政府普遍原则来逐渐地证明叛乱有理(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他们的雄辩在语气上逐渐地更平民主义化，在实质上也更民主。意识原则超出了要求帮助的呼吁，开始得到推广。正式的政治批准随之而来。大部分州对政治权利的财产资格要求降低了，废除了地方教会的法律权利，成年白人男子享有选举权的比例从 50%—80% 上升到 60%—90%，甚至一些妇女和黑人也获得了选举权(Williamson, 1960； Dinkin, 1982, pp.27—43)。地方部门贵族通过庇护和顺从网络控制的局面削弱了，这是因为 18 世纪 80 年代参加选举的人数翻了一番，人民授权代议制广泛实行(18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在城市议会中开始)，也因为大众竞选活动趋于活跃。

达尔的“竞选辩论”、我的“政党民主”制度化了。诚然，领导地位在阶级结构中只是稍有下降，仍控制在“优等一类”的手中，但他们与选举者的组织关系变了。正如库克为新英格兰解释的一样：“当革命摧毁了社会安排的等级观念基础时，关于顺从的政治消失了，政治领

导人不再被看作是社会的上层，而是成为人民的仆人。”(1976， p.192)

立法机构中小业主数目大增。1765年，马萨诸塞议会中拥有超过2 000美元者占50%以上，到1784年，只有22%。1750—1775年，殖民地议会中手工业工人和小农场主的代表不到20%，到1784年，已占所有立法者人数的40%，但大部分来自于北方(Main, 1966, pp.406—407页；Henretta, 1973, p.168)。政治权力仍是地方性的，但开始向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场主手中转移。乡村机构是英国式的，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这一过程超过了英国式旧政权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这种妥协是一场战争的后果，这是与同时发生竞争的军事结果进行一场本可避免的战争。

这又因经济改革而得到加强。叛乱者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支持了经济自由。他们减少了政府的商业主义，废除了代议税和长子继承制，增加了选举官员的比例，并试图使授地脱离庇护。他们的努力在显贵中保王派较多的中部地区效果明显。小农场主和小资产阶级获得了显贵们原来的土地、官职和地方权力。除此以外，各州不再存在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利区别。韦伯的“(小商品)资本主义精神”在北部和西部占了统治地位，它与奴隶制资本主义瓜分了南方。这种转变又因与战争无关的欧洲倾向而加强。欧洲人口的增长已超过了农业的供应能力。美国的谷物生产者大多是小农场主，可以靠出口获利。到18世纪90年代，北方各州已在人均财富和出口上超过了南方各州(Appleby, 1984)。其中，中部各州的增长最快，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小农业资本控制了中部各州的经济命脉，新的选举制可以把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

在战争的后期，随着军事行动更加统一，战略中心转向了更保守的南方，军事权力关系的中央集权化扭转了这种权力的左倾转移。作为军事和政治大本营的领导的开国元勋，现在在南方种植园主组织中，为他们的社会保守主义找到了更大的地方支持。大陆军日益增长的军事原则也支持他们的权力。激进的业主或许可以控制其他各地的地方会

议，但却不能控制作为爱国战争成果的中央集权化权力的顶层。

宪法的确立

1783年，战争结束了。英国和保王派受到驱逐，民兵组织也随之解散了。激进主义者虽然仍保持了在个别州的影响，但已丧失了对领导层的影响。各州议会采用了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取消了债务(大部分是贫苦农场主所欠)，实行累进税收以及土地特许状。1783年的《邦联条例》只包括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由于受到地方阶级激进主义的威胁，因而显贵们组织起来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

1783年，他们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就是主要的反应。他们就国家应该是代议制的(对白人男子而言)，意识上不应确立任何宗教，及应该授予白人公民不多的民权(足够强制非白人)等方面取得了广泛共识。当然，它的父权制社会本质是确定不移的。讨论集中在第三章提到的现代国家的“定型”中的剩余两种形式——资本主义和民族上。

第一次辩论不是关于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对的资本主义，而是关于非传统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政府应帮助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小业主或大业主的模式(奴隶主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这的确涉及这个政府应代表什么人以及政府的经济权力应是什么的问题。这与另一个定型问题紧密相关，即这个政权将如何中央集权化和民族化。因为刚刚完成对君主制的战争，所以他们将避免建立一个像后来的法国革命党人所引进的中央集权一样的政府，甚至不愿建立像英国一样的集权政府。由于显贵控制着大陆会议，所以大多数显贵比激进派更支持建立集权政府。但奴隶主和小州的显贵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双方的定型交织在一起，所以没有发生正面的阶级冲突。

制宪会议是当时唯一的主要决策，是在没有群众压力和参与咨询的紧闭的门后进行的(图表描述见 Collier and Collier, 1986)。经过两周的激

烈辩论，五十五个与会代表创建了一部供各州批准的新宪法。代表们全是最富有的财产所有者，许多是属于三个开国元勋群体的贵族。他们希望获得权力，限制地方立法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危急情况，如马萨诸塞反税收和债务的阶级暴动——谢斯起义出现了。但代表们的辩论并不集中在阶级问题上，他们对此拥有共同默契的思想。他们也没有过多地考虑宗教问题。虽然来自不同的宗派，但他们都是无派性的多教派州代表团的成员，因而很快达成了政权应当世俗化的协议。

然而，代表们在讨论“国家的”集权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来自小州的代表，特别是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会立法反对奴隶制的南方各州的代表，害怕集权的政权，担心来自大州选民的“独裁”。为了达成一致，防止激进主义，代表们不得不在州权问题上达成妥协。但遗留下来的漏洞(特别是关于未来各州的宪法问题)以及确保州权问题——以及它与南部奴隶州和新西部州的关系——仍悬而未决。他们部分有意地、部分无意地在避免阶级对抗的宪法条文上显示了团结。

代表们对权力的分割问题精打细算，通过同时防止专制和大众意志的突然表达，产生了一个既对保守者也对激进的权力分散主义者有吸引力的、权力分割的中央政府。政府权力被分割成五个代表性机构——总统、国会两院、十三个州和地方政府。这种分权不是根据一贯的原则，这种原则可能使它们之间产生等级制度。当时的经济权力和立法机关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参议院和众议院根据交错选举有不同的投票制；众议院产生国家预算；参议院在任命总统和批准外交条约中有更大的权力，但其选举权更受限制；总统由选举团间接选出，以确保更好地代表有产者的利益；总统不能立法，但可以否决国会的立法(除非两院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选举权没有得到明显的扩大(除了取消宗教的限制)。选区被有意扩大以便能超阶级地、无懈可击地控制暴乱。

分权产生了最高法院。这是个天才的发明，与其说它是自觉的策

略，不如说是有关权力性质的共识，这证明有非拟议中的巨大后果。它根源于革命和宪法起草中显贵的律师兼财产所有者的优势——五十五个代表中至少有三十三人曾执业律师，但其中只有四人是纯粹的律师(Mann and Stephens, 1991)。起义反对的是国王议会的君主专制主义，随之产生了地方立法机构反对财产法的时期。这样，代表们认为，确保宪法在最高法院监督下成为法律依据是十分谨慎的——如果必要(虽然其含义看来未被反对者认同)，同样反对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

宪法将随社会权力的变化而变化，但其修正须与开国元勋确立的原则保持一致。宪法的修正要求绝对多数，需要超阶级阵线的意见一致。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但法官是终身制的，因此往往比授权者更持久。他们可以否决立法行政行为，裁决政府或个人的行为与宪法精神是否相一致。较小的法院对相应政府机构履行相似的职责。

这样，一直到最高法院的法律行业，成为个人、公司和政府代理的积极调解人——一个更加中央集权化的政府行政部门的替代品(像Skowronek, 1982, pp.24—30观察到的)。法律机构经过几十年时间才达到完善。到了19世纪中期，法律已高于政治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绝对高于政党民主。看起来，美国的社会与政治上的公民权利似乎已经制度化了。但是它的公民身份仍是高度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在反君主制的政治公民权利中确立的。“人民的多数……将永远受限制，”阿普比尔总结道(1987, p.804)。

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评论中强调律师的权力，他有一句名言，即“法官与法庭”是“美国的贵族”。但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美国的法律与资本主义财产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富有的贵族律师有其独特的权利概念。他们确立了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利的平等(MacPherson, 1962)，把它标榜为“不愿与人分享的个人主义”。虽然麦克弗森过早地设置了这种观念，扭曲了17世纪霍布斯和洛克的观点，但它确实支配了开国元勋们的思想。私有财产真正成为神圣的，同样不受政府和无政府主义的侵犯。在这方面确立的法律原

则保护个人及其财产自由。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场主是主要的激进对立面。但他们也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因此他们也不反对这一原则。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没有直接辩证的阶级冲突。这种有利于大财产所有者的解决方法(随着金融和工业日益集中，小农场主再次陷入债务中)，悄悄地通过了革命后的各种冲突。

一旦受剥削的社会群体——较低的阶层、妇女、黑人和少许存活的土著美国人——被承认拥有个人公民身份和政治上的公民权利，则世界上将没有任何政权比美国更积极地促进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和自由权。但集体权力将永远附属于个人权力。劳工联合(见第十八章)、激进的农场主(见第十九章)和20世纪拥护更大社会公民权的斗争，都以自身的代价揭示了这一点。与马歇尔的公民权扩展进化理论相反，美国的社会公民权没有很大发展，个人权利的确立使得劳工和农场运动的集体权利仍处瘫痪状态，甚至比其他国家持续的时间都长。政府立法机构不能从宪法上取消债务，也不能(直到进入20世纪)通过法律使设置纠察或其他反对雇主财产自由的“密谋”行为合法化。第十八和十九章揭示了大资本所有权开始得到确立，对19世纪劳工和小农场主之类的抱怨同样有不利影响。律师解释说，已确立的宪法成为美国资本主义财产权利的最可能的保障(Hartz, 1955：103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律师在以前和现在都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四十年时间里，他们从革命阵营转为保守阵营——这个过程中基本没有来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反对。

尽管宪法是在费城的真空中写就的，但普遍的社会压力却不容忽视。新宪法在个别州的通过是悬而又悬的，有时还要对付相当多的反对者。他们被迫在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与要求保护个人权利的反对者妥协，这就是以合在一起著称的《权力法案》。因为宪法中没有直接谴责激进派政治经济目标的条款，所以，他们没有像预料中的那样激烈地反对新宪法。

18世纪80年代，两个平等的“党派”出现了，它们包括了立法机

构中四分之三的代表。梅因(1973, ch.2)称他们为“商业世界主义者”和“农业地方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主要是城市商人和专家，得到附近城市中种植园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支持——实际上，1776年以前，旧政权与地方殖民政权相似。地方主义者是新兴的政治家，代表内陆各州的小资本主义农场主。工匠、小制造商、小贸易商(底层小资产阶级)在两个党派中分流了，他们的阶级身份把他们并入地方主义者，而他们的城市利益又使他们加入世界主义者的行列。18世纪90年代，两派成为松散的政治党派，许多世界主义者成为联邦党人，而许多地方主义者(包括南方种植园主)则成为最初的反联邦党人，后来成为杰斐逊时代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党员。美国正式定型为完全政党民主政治，比其他国家都早。

这种存在疑问的定型——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和政府应怎样国家化——在两党间仍有分歧。联邦党人支持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有限的选举权，以确保经济发展和私有财产权；其对手支持相反的意见，他们的冲突自相矛盾。联邦党人用没有其他选择的手段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结果。

对专制集权主义死灰复燃的恐惧在所有阶层和地区蔓延。因此，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权力分散。宪法把大部分政府机构及职能(教育、健康、家庭、法律、公共工程、警察、贫民工作)授权给了不同的行政部门(见Lowi 1984年对三个政府部门权力的总结)。实际上，宪法把这些问题中的剩余权力——在各地都相同的权力——也授予了各个州政府。按欧洲甚至英国的标准，美国的国家权力生来就发育不良。第十一章中显示了美国与同一时期欧洲的相应政权相比，仍不够强大有力。

尽管如此，他们仍取得了两项对达到目标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首先，前已描述过，体现了确保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因它看起来不像是中央集权，所以潜在的阶级对抗没有发生。其次，联邦党人(特别是汉密尔顿)创造了“最新发展理论”，认为英国提供了未来经济的模式，他们希望政府鼓励金融业和制造业的集中。他们把攻势集中在确

保联邦政府机构的大规模经济活动上，特别是获得银行、货币和信贷机构，同时寻求制定保护制造业的关税(Ferguson, 1964； McGuire and Ohsfeldt, 1984)。在支持扩大邮政、关税和土地机构以及保护航运的小规模海军和用于屠杀印第安人与承担国内土木工程的小型常规陆军方面很少有争议。这种狭隘的现代化中央集权主义获得了许多改变信仰者的支持。托马斯·潘恩(他们政治上的敌人)认为，他的乡村民主联盟是狭隘的，对新兴国家的经济需求漠不关心(Foner, 1976)。19世纪上半叶，各州积极资助公路、运河和颁发公司许可证，南方在这方面稍逊色(Pisani, 1987；他们的支出数据由Holt提供，1977)。联邦党人获得了财产权利和机构的发展，但不是通过期待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而是通过联邦政府(法院和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劳动划分)。

就选举权而言，联邦党人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选举中的部门权力。他们的庇护网努力控制新兴的大众选民。意识权力网的扩张部分是因为联邦党人的政策：18世纪90年代，邮政局增长了12倍，报纸增长了2.5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通讯协会和竞选集会广泛传播。农场主、小资产阶级和工匠有了其他的组织。贵族依地区划分。南方种植园主在阶级基础上支持联邦党人，但中央集权化对奴隶制的威胁使他们加入了民主党阵营。有产阶级和他们的委托人(像19世纪英国的统治者一样)的选举联盟从来没有实现。这减少了面对面的政治阶级冲突。这样也把联邦党人放在了选举的麻烦中。地缘政治使这一局面更加恶化。联邦党人把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子，可以强有力地执行其政府行为，合法征税，即没有民主的宪法制国家。但英国曾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而且是美国革命的继承者——法国的敌人，又是现今美国主要的贸易对手。联邦党人的外交政策很可能被诬蔑为反美。

杰斐逊的民主党在1800年的大选中获得了全面的胜利。阿普比尔总结道："认真努力在全国大选中掌权的任何美国群体将永远不会再拥护等级价值观或顺从的政治实践。"到1810年，激进的政党竞争使投票人数超过了成年白人男子的一半，远远高于殖民地时期的比例(Fischer,

1965, pp.182—192)。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的民主派带领小农场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工匠进行了进一步的选举权改革。杰斐逊党人和杰克逊党人在把“勤奋”和“农民”与寄生的资本家比较时能表达人民的反资本主义意识(Hartz, 1955, pp.120—125)。有时，美国的政党听起来与英国的激进派和法国的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贫苦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相类似。但它们的选举目标几乎不用暴力即可达到，一般是在因战争扩大和被宪法制度化的北美殖民地机构中获得。因为宪法确立了私有财产和权力的严格划分，所以联邦党人和贵族不太害怕选举权的改革。到1840年，所有的成年白人男子都拥有了投票权，最初的现代两党民主制确立。“获胜政党分赃制”确定两党之间的职位分配(见第十三章)。为政党民主和代理制分割的阶级斗争已不能威胁到财产准则。

1840年时，这一切意味着相当连贯的政治策略。美国的政府除了在南方外不可能“过时”。殖民地的战争破坏了靠出身、宗教、惯例特权及依附而制定的准则，随后小资产阶级选举的攻击使其进一步被破坏。小农场主领导的小资产阶级赢得了群众民主，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早，同时又暗存进一步的激进含义，但是激进主义者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政权因为真正的权力分割而开始保守，其划分的基础结构悄悄地转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规划。法制确立了资本主义私有权的概念。这种组合近似除南方以外地区的资本主义自由制霸权。宪法作为法律准则——而不像别处的政府或君主制议会——在19世纪晚期成为象征性的、受尊崇的国家心脏。

事实证明，宪法和政府都没有对全国性的州权问题提供多大的帮助。奴隶制越来越与北方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但软弱的联邦政府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一冲突，甚至不能权威性地确立新的西部各州体制(是否为奴隶州)。联邦陷入了一场内战，暂时增加了政府的中央集权。直到20世纪，美国才卷入了对其他强国的挑战，要求全国动员和高技术的军国主义。这样，民族国家滞后了。整个18世纪晚期，随着州和

地方政府基础结构的加强，美国政府从邦联发展到了更联邦的形式，这是我在表3.3阐明的意义。联邦机构遇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来自不满的农场主、工业部们和其他方面的挑战——在强硬的国内军国主义政策的扶持下，这种联邦机构具有连贯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党民主的政权策略。这些挑战和反应将在第十八和十九章中讨论。

关于美国的结论

关于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我讲了三个主要问题：如何描绘它的新兴政权，它的兴起有什么特点，以及它是否是革命。

在赞成美国政权是联邦的、政党民主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方面，我只是接受了传统的智慧。下面各章中表明，自由资本主义战略已经成功地吸取了所有工业社会和大规模种族移民所赋予它的东西，因为美国最终成为西方霸权强国，它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影响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它的政党，法院内奉行的资本的自由主义，以及其邦联主义，也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存活了下来，尽管邦联主义因为新政和超级大国的地位而被修改(也结束了其军国主义的不平衡)。

在解释其崛起的历史学家的讨论中，我同意贝林(1967)和阿普尔比(1984)的观点，他们反对布尔斯廷(1959)、德格勒(1959)、哈茨(1955)和李普塞特(1964)的把资本的自由主义从开国元勋追溯到早期殖民地的建立和新世界没有经历封建主义上的观点。我认为，独立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是干预破坏“过时”的地方政权的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干预，不管是否在英国的控制之下，这些政权或许会发展到与敌国英国的政权相类似。确实，殖民地也包括另外的权力组织，当这些组织扩大时，便导致了更纯的资本主义轨迹，但出现这种扩大要通过三个附加的、不可预料的过程：

1. 作用在英帝国身上的地缘政治的和财政军事的压力使北美的当事

人分裂为对立的派系，这一现象又因战争中法国的军事权力而加强了，只是英国人没能守住他们的殖民地。

2. 半游击的战争状态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加快了温和的民主改革步伐。一旦起义的贵族在武装反抗英国和保王派的斗争中被迫向“人民”(20世纪早期的大众含义)寻求帮助，那么旧政权就不能简单地转而为本地美国人所控制。除南方以外，地方政权更多地是控制在阶级而不是部门组织手中。然而，为了赢得战争，平民和贵族权力运作者不得不妥协。

3. 在战争结束时，交织在一起的阶级和民族军队之间的大略平等而混乱的政治权力平衡，确保了胜利者之间不致失和。然而，通过战后结合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妥协，他们的权力关系和冲突已经制度化。贵族有他们自己最初的制宪领域。通过把意图、错误的估计和未料到的结果混在一起，他们设计的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带来了保守的后果。他们在州权问题上相互妥协，破坏和削弱了阶级斗争的北方—南方(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制度化。联邦党人和贵族在两个领域内减少了对他们的财产权的正面集中的攻击，宪法确立了财产法，且为大资本主义提供了集中的政府机构(后来出乎意料之外地因个别州而加强)。但是他们错误估计了控制选举的能力，人民(成人男子)保住了两党民主制。结果是除南方以外巩固了资本主义自由、政党民主和联邦的政权领导地位。因为权力斗争纠缠了完全不同的因素，所以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和透明的。贵族和大众从来没有发生作为阶级敌人直接的、辩证的正面冲突。他们首先在战争中结盟，继而彼此错身而过，把精力集中在尽管交叉但却相异的政治定型和政治权力网上。

一般说来，我考察了社会权力四个来源中的首要关系的转变。意识权力关系在构成整个权力关系方面的作用下降。早期结果——螺旋式向下发展到起义，贵族和平民起义者之间战时权力平衡的改变，以及战争本身的军事结果——主要由交叉的经济和军事权力关系决定。它们用一种混乱的方式——而且总是记住了经济关系除了阶级成分以外还

有部门、地区和国家的组成部分——联合起来塑造了新共和国的政府机构。然而以后(像制度化的国家主义可能暗示的那样)其政治机构有了自己的自主权，严重限制了美国的发展。在不受其他列强威胁的国家内，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尽管不是国内军国主义)通过整个 19 世纪证明很少有一般权力的重要性。现今美国的发展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已经制度化了的联邦制、政党民主和国内军事政权组织的限制。这就是第一章中提到的这一时期普遍过渡的美国版本，它以一种初步的"最终"双重决定方式从经济军事权力关系过渡到经济—政治权力关系。

最后，这是一场革命吗？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制度转变的完成是用该词日常含义的"革命"方面——因为在权力关系社会学意义上的暴力转变上缺少革命。对立的阶级力量没有像法国那样面对面交锋。而且，资本的自由主义制度很快就变得保守了。大约四十年后，它比其他任何政权都更彻底地制度化，更加抵制任何改变。它向我们揭示了如何避免阶级斗争——当然不是全部的，但最起码揭示了如何最好地避免广泛面对面的单一政治冲突。据证明，像其他地区一样，农业的商业化同样具有破坏性。小农场主是不满的，工业革命是残酷的，无产阶级也是牢骚满腹，但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被政治和军事机构限制在非阶级组织的轨道上，这一点比其他国家更彻底。早期殖民革命的制度决定性地形成了美国以后的权力结构。

参考文献

Appleby, J.A. 1984.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American heritage: the heirs and the disinherite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Bailyn, B. 1962.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7.

1967.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Beard, C. 1913.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Birch, R.C. 1976. *1776: The American Challenge*. London: Longman Group.
Boorstin, D. 1959.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Brown, W. 1965. *The King's Friends*.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Burch, P.H., Jr. 1981. *Elit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Ⅰ: *The Federalist Years to the Civil War*. New York: Holmes & Meier.
Collier, C., and J.L.Collier. 1986. *Decisions in Philadelphia*.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Cook, E.M., Jr. 1976. *The Fathers of the Towns: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ountryman, E. 1981. *A People i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New York*. Baltimore: Johns Hop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 Wang.
Davidson, P. 1941. *Propagan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Degler, C.N. 1959. *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Dinkin, R.J. 1977. *Voting in Provincial America: 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Thirteen Colonies, 1689—1776*.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2. *Voting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Original Thirteen States, 1776—1789*.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Egnal, M. 1988. *A Mighty Empir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erguson, E.J. 1964. *The Power of the Purse: 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Finance, 1776—179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ischer, D.H. 1965.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Foner, E. 1976.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dlin, O., and M.F.Handlin. 1969. *Commonwealth: A Study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Massachusetts, 1774—1861*, 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tz, L. 1955.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Henretta, J.A. 1973.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1700—1815*.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Holt, C.F. 1977. *The Role of State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conomy, 1840—1902*. New York: Arno Press.
Lipset, S.M. 1964. *The First New Nation*. London: Heinemann.
Lockridge, K.A. 1974. *Literacy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Lowi, T.J. 1984.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analysis. In *The Costs of Federalism*, ed. R.T.Golombiewski and A.Wildavsk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McDonald, F. 1958. *We, the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Guire, R., and R.Ohsfeldt. 1984.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 quantitative rehabilitation of Charles A.Bear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McKirdy, C.R. 1972. A bar divided: the lawyers of Massachuset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Library* 16.
MacPherson, C.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ier, P. 1973.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in, J.T. 1965.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legislatur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3.
1973. *Political Parties Before the Constit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ann, M., and M. Stephens. 1991.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social class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Murrin, J. M. 1983. The legal transformation: the bench and bar of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In *Colonial America: Essays in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d. S.N.Katz and J. M.Murrin. New York: Knopf.

Nash, G. 1973.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1700—1765.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0.

1975—6. Urban wealth and poverty in pre-revolutionary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6.

1986. *The Urban Crucible: The Northern Seaport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R. 1959.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isani, D. 1987. Promotion and regulatio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Pocock, J.G.A. 1980. 1776: The revolution against Parliament. In his *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 1641, 1688, 17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le, J.R. 1966.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London: Macmillan.

Rosswurm, S. 1987. *Arms, Country and Class: The Philadelphia Milita and the "Lower Sort"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hy, J. 1973.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military conflict considered as a revolutionary war. In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d. S.G.Kurtz and J.H.Huts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kowrone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koloff, K., and G.Villaflor. 1982. The early achievement of modern stature 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6.

Solberg, W. 1958. The Federal Conven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s.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Steffen, C.G. 1984. *The Mechanics of Baltimore: Workers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63—1812.*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illiamson, C. 1960. *American Suffrage: 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 1760—18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oung, A.F. (ed.). 1976.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第六章

法国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

分析法国革命的传统中心问题是：它是不是一场阶级革命。从饶勒斯到勒费弗尔的史学家的答案是肯定的，认为革命是封建旧政权与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但是三种修正派别对此持有异议。因为科班(1967)的经验研究表明，革命始于旧政权的派别斗争，后来由资产阶级领导。以贝伦斯(1967)和斯科克波(1979)为代表的第二种修正派观点认为，革命的原因是列强竞争引起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又引发了阶级斗争。由奥祖夫(1976)、富雷(1978)、阿格隆(1981)、亨特(1984)、休厄尔(1985)提供的第三种修正派观点，把革命看作是观念、感情和文化形式所推动的，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阶级动员是更具象征性而不是实际上的。这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智慧，在法国历史学家中法规已经代替了阶级。知识界转向对内部的探讨。

我赞成所有这些争论中的某些部分。像往常一样，我的解释糅合了意识、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所有方面。除农民阶级外，革命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阶级斗争，但是当它一旦成为阶级斗争时，也就成了民族斗争。阶级不是“单纯”的，同样要受到意识、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限制。革命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斗争，不仅仅是因为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逻辑，而更多是因为其军国主义(造成财政困难)，是因为对战时精英和党派关系制度化的失败，也是因为带有可选择的话语意识结构的扩张。我也提供了证据来支持本卷中关于阶级冲突的一般争论：比较“单纯”的地方——由生产方式

造成的冲突，也就是面对面的交锋——他们能更准确地觉察对方。统治阶级控制政权的组织性优势，使他们可以镇压或招抚对方以避免革命。阶级冲突与其他冲突交织在一起，统治阶级便不能全力维护其阶级利益。就像在法国一样，广泛的抗议导致其失去平衡，以至发生错误，从而导致革命形势的产生。很快我就会重谈错误这一点。

我赞成贝伦斯和斯科克波的财政—军事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大部分，实际上，本卷涉及了这一时期的所有国家。但是我的观点同样建立在戈德斯通(1991，pp.172—174)对斯科克波的批判上。因为她坚持真正国家的精英理论。斯科克波把财政危机看作是与单一的政府精英对抗的“客观存在”，她忽视了精英内部和党派斗争。法国金融业的瓦解(垮掉整个旧政权)只是因为法国政权两个主要因素之间和内部恶化的党派关系，即君主政权精英和深深植根于法国社会的特权党派。别的国家用以解决党派争端、财政争端的君主代议制的制度化在法国没有实现，这导致了法国的垮台。斯科克波的真正精英主义更多地解释了其中央集权制，而很少涉及革命。

关于阶级修正主义我有三点不敢苟同。我不同意科班关于革命领导者是衰弱的旧政权派以及戈德斯通的革命机动性受到限制的观点。我也不赞同斯科克波和戈德斯通的奇特“单阶级”模式，他们的确强调了农民阶级，但是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城镇以及巴黎，革命需要一个具体方向。他们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理论而非自下而上的理论(像阶级理论)。然而精英—政党斗争制度化的失败也引入了被排除在外的阶级，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都是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兴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像富雷和里奇特(1970；参见 Furet, 1981)所论证的那样，认为这与 1789 年的事件无关，是 1791 年开始的一个“侧滑过程”，他们希望支持在 1791 年之前而不是之后的革命目标。

我赞同现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学派的某些经验主义的论证。因为

意识权力在革命中确实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在英国和美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我希望现在简要看一下文化学派的论证。问题是它是理想主义的。如今理想主义者可以制造有用的、试验的因果论证，强调意识机构的作用、象征性和仪式性的实践作用和思想意识的内容的作用。但是他们很少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因果论证通常归入了更加完整的理想主义，避开了因果分析，而是重新用文化术语来描述整个社会过程。这是黑格尔和德国理想主义的传统做法，通过话语分析和像福柯和格尔茨这样的作者运用到当代社会科学中。

因而，林恩·亨特把革命看作"文本"，在它的内部模式和它与政治文化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上，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阐明了革命对象征性文学及道德方面表现出极大兴趣。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但是她因为某些原因拒绝"透过字面看本质"，因而她的结论，即革命的起源"必须在政治文化中寻找"，就不是论证而是冗辞。她没有在文化和其他任何东西之间建立因果关系(1984, pp.24—25, 234页)。为了设立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透过革命的文字和文本向外看，找到它们的来源，它们仅仅是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的结合吗？还是它们表达了特殊的意识机构的需要呢？这些因果问题，亨特都回避了。

富雷同样试图把革命再描述成文化象征的过程。但是他加入了因果的论证，例如，他认为当王权在革命开始时崩溃，那么它就被口头语言所代替。任何宣称在国家名义下代表公众意志说话的人都能取得政权，因此他说从字面上看，这些革命成为一场文字战争。

这成功地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文本和象征性对话的整体性上引开，而放在交流的特殊媒介和信息上，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社会其他力量来源上。如果人们能被文化信息感动，他们仅仅需要被打动。我们不能假设他们拥有同样的文化。我们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无数研究中知道(尽管是规范的功能主义理论)，广泛的社会各阶级几乎从来不是如此的。交流机构应该是我们分析意识权力(或文化，如果这个词确切

的话)的对象。这样(建立在 Eisenstein1986 年的理论上)我的分析始于 18 世纪机构的膨胀、“舆论”的产生及它超出了极权的控制。

富雷和亨特都正确地强调了革命逐步升级为原则政治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妥协。随着危机的加深以及实际政治对解决危机的无能为力，权力运作者转到了原则性解决方式上。“原则”带有一般原则和道德原则的双重含意，因为革命被“价值”和“单纯”迷住了，也被带有“真实情感政治”(亨特语)和意识形态的理性重建方案所迷惑。一旦原则被激起，我们就确实可以怀疑，观念制度和精英操纵了某些权力。与实际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运作者不同，他们追求一般过渡的原则性知识。

为了检验这一怀疑，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原则性的内容就可以被理想主义者概括为实权派的经历吗？或者，理想主义者的不同经历就可以创造出来吗？第二，意识形态专家拥有超过实际运作者的集中或分散的权力技能，以致他们能影响原则的被激起和修订吗？通过探索观念制度，及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将评价意识权力的因果性重要意义。这一方面都从本章到第七章进行论述。

最后，我回到错误的估计上来。法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独特的事件。它是第一次也是实际上唯一成功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其权力运作者是无意识的。开始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处在一场革命中，他们把事后认识描写为可怖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国家和特权阶层。他们的错误估计有助于实际政治的枯竭和对革命意识原则的依赖。如果国王和特权阶层知道翅膀下潜伏着何等危机，他们就会有与现在不同的行为，就像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所做的那样(他们有法国革命为鉴)。我试图解释深深植根于阶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中的权力过程，但是这一切却会因权力运作者不同的决策而停止或改弦易辙。我并不把这阐述为普遍的社会学原则，而是作为实施机构的特殊方式，在此方式下的权力运作者对间隙出现的权力网络的兴起一无所知，因此倾向于错误估计权力的可能情况。就像革命发生时政权丧失了集中维护其利益的权力一样，错误估计对革命是必需的。

旧政权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

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衰退的、后进的或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如斯科克波承认的)。到1789年，法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繁荣已持续了一个世纪，但是法国看起来"后退"了，即它被其强大对手英国甩下了。在18世纪70年代，化学家拉瓦锡估计英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法国的2.7倍。实际上，一些历史学家估计整个英国的经济更加先进(Crouzet, 1966, 1970; Kindleberger, 1984)，其他人持不同观点，认为两国当时经济实力相当(O'Brien and Keyder, 1978)。

戈德斯通的经济估量看来更具说服力(1991, pp.176—192;参见 Vovelle and Roche, 1965; Crouzet, 1970; Léon, 1970; Chaussinand-Nogaret, 1985, pp.90—106; Dewald, 1987)。

戈德斯通估计，法国经济在1700—1789年增长了36%，但是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贸易增长是2倍，工业增长80%；农业仅仅增长25%，每个部门的增长率都与英国相似，因而没有任何部门特别落后(尽管早期的资料表明英国农业增长率更高)。但是在低增长的农业部门，英国只有1/3的人口，而法国却有4/5的人口，法国经济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其农业的规模。因此30%的人口增长，尽管比英国的增长率低，对农业人口来说是很大的负担，致使农业产量在1700—1789年人均下降4.3%。经济问题不是落后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部门间发展不平衡。这种问题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甚至更为严重，但是却没有引起革命，我们不能把法国革命归因于经济状况，革命原因中更重要、更直接的是政府财政问题。

法国地缘政治军国主义带来了财政困难。整个18世纪英国和法国为全球霸权而战。英国在四次战争中胜了三次，只是在同时面对北美殖民地起义时失败了。即使在那次战争中法国也没有得到任何便宜，

用以抵补其高额付出。英国得到了全球霸权而法国得到了债务。尽管幸运和地缘政治促成了这个结果(第八章中讨论)，但是英国政府拥有以其财政效率为中心的巨大权力，法国政府只能征收占国家财政一小部分的税收(Mathias and O'Brien, 1976; Morineau, 1980)。法国政府征税很多，但得到的很少，因为它要花费更多的钱支付税收者和债权人。

随着英法竞争的加剧，英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而法国政府财政却明显削弱(Behrens, 1967, pp.138—162; Riley, 1987)。许多评论家认为，英国受到了它的议会政权的帮助，英国的财产所有人赞同间接的关税和消费税以及英国银行组织的贷款。地缘政治的胜利使得军事、财政的支出不那么具有切肤之痛。但是像表4.1中说明的其他形式的君主"代议制"或许也同样生效了。普鲁士没有议会，但是统治阶层在皇家中央行政机构中有行之有效的代表。君主制和政党民主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代议制形式。普鲁士和英国证明了，两者都可以使精英政党关系稳固地制度化。但法国却没这么做。

因为财政是法国政府力量的源泉，因而其危机席卷了所有的机构，法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松散的王国。随着君主制向法国所属岛屿之外的疆域扩张，它采用排他的方式处理地方权力网，产生"行会"和"阶层"的相当分权的集权主义。各地区的赞同、三种社会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市民的和专业的社团(特别是以最高法院著称的律师集会)都带来了"特权"，即高于农民的权利和豁免公民义务尤其是纳税义务。与英国和普鲁士不同，法国的赞同是建立在把中央政权排除在外的基础之上的。除专制政体和省长(王室成员监管各省)外，我不同意托克维尔的著名论断，即法国政权在革命以前即已高度集中(1955)。它应该具有双重的含义：高度集中的君主精英政权和特权阶层；分权的各贵族党派。在整个18世纪，双方越来越水火不相容。

大多数税收是直接的土地税，因为土地所有者拥有豁免权和确定自己税率的权力，因而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像戈德斯通(1991, pp.196—218)观察到的，法国的税收问题不是缺少财富，而是对那些越来

越无力缴税的农民实施高度压迫的税收制度。像英国一样，部分解决办法来自于贸易的间接税收，但是商人和市民行会同样拥有特权，王室的反应使政府更加陷入排他性的、团体的状态。它卖官以换取现金，授予愿意给予它资金的人以年金享受权，授予任何愿意预先垫付税款给国王的人以税收的权利。与英国银行极相像的机构是富人拥有自主权的公司，即农场主总公司(如税收农场主)，它与外国银行谈判，为政府提供贷款。

卖官和农业税支付了路易十四及其继承者的战争(Chaussinand-Nogaret, 1970; Bien, 1987),但是也对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我估计有超过20万个买卖的公共官职(见第十一章)。几乎所有显贵家族都拥有官职和农业税收权力，他们巩固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特权派”，阻碍了政权的现代化(Matthews, 1958：249; Durand, 1971, pp.282—362; Doyle, 1980, pp.120)。政府机构的财政从法律、行政机关转到从富人到国王的借贷机构(Bossenga，1986)。这种专制政体与普鲁士甚至是奥地利的专制政体不同。它的国库只有264个工作人员，而奥地利在各部和政府银行中的相应人员则数以千计(Dickson, 1987, I，pp.306—310)。法国的政府精英是君主、法院、部分神职人员和以特权贵族的蔓延党派网为中心的行政机构(人数最多的是朗格多克一支，Beik, 1985)。贵族和资产阶级融合为“有产阶级”，他们大多不是资本家，因其收入多来源于封建税收、租税、官职及年金。贪污腐化，甚至培育了“现代”的现金经济，官职成为市场上的买卖商品(Taylor, 1967；Belk, 1985, p.13)。

因为拥有特权，所以商人和制造业者很少反对贵族或者支持改变“资本家”的价值。他们要求受封为贵族，婚嫁制度有利于富有资产阶级与没落贵族之间的通婚(Barber, 1955；Lucas, 1973, p.91)。在革命前，封建旧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不明显，不存在显而易见的资产阶级身份或反对派，除军队(其更为复杂的宗派主义将在以后讨论)在特权阶层和向上层流动的家族(像戈德斯通，1991，p.237所说)之间没有“尖锐的冲突”。达恩顿宣称蒙彼利埃的当代统计揭示了紧张的阶级

关系，资产阶级作者认为财富应该比荣誉更重要并批评了贵族特权。但是他又表现了对普通群众的巨大恐惧："本质极坏，无法无天的寻衅闹事和抢劫"(1984，pp.128—130)。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想进入各级政权组织，显示"操纵的顺从"，通过获得特权寻求物质利益，"对贵族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投资现金的一部分"，包括上层商人家庭(1987, pp.51；参见 Bonnin, 1987)对特权的要求扼杀了阶级和国家的普遍特点。

就他们来说，贵族的城市化把他们与农民区别开来。一些人成为食利的工业家。一半以上的锻造车间和矿藏归贵族所有(很少自己经营)。当时拥有财富的贵族与天生的贵族一样多。乔西南德—诺加雷(1985，pp.23—34)统计，1789 年 1/4 的贵族之家是 1700 年以后受封的，大约 2/3 的家庭是 1600 年以后受封的，他附加说："贵族现在什么也不是，只是成了贵族的平民而已。"达恩顿(1984，pp.736—740)认为，他们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就像时尚和法式家常菜都成为平常之物一样。但是"资产阶级"一词也同样指那些脱离租税、年金和官职的，过着贵族式生活的人们，他们与商人、贸易商、制造商的数目相当。泰勒(1967)估计，即使在商业城市波尔多，第三等级包括 1 100 个非贵族有产者和专业人员，比之 700 个商人和贸易者，其中大多已封爵。城市有产阶层已合并了，因而不存在冲突。

乡村生活更不协调，旧政府统治的法国有三种剥削方式：第一，最古老的一种是来自封建生产方式，地主在与生俱来的等级特权下通过租税剥削农民。第二，特权者和公司组织，是由政治决定的，来自于晚期专制主义的财政需要。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封建性是由政权产生和维持的(Bien, 1987, p.111)，"封建主义"一词现在被用来(扩展到别国)辱骂这种封建主义的结合和专制主义剥削。第三种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经常控制生产和市场，但在政治、社会上附属于前两种方式(Dewald, 1987)。那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生产，因而少数农场主控制了他们的劳动力(Cominel, 1987)，土地、产品是商品，而劳动力则很少是商品。农民和地主，甚至商人、制造商，技工和工人都被限定在传

统的劳动规章中。

农业资本主义开始与其他两种剥削方式产生冲突。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农民不满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剥削。他们缴纳传统地租的方式，现在已变为货币和实物形式，不再是劳役地租，而且伴随着令人憎恶的领主垄断。这些平民可以使用领主的磨房、烤炉或者是压力机。重担不会把他们压垮，除非像 1787 和 1788 年那样的农业歉收把他们推到只能勉强糊口的境地。但是法国不是东欧，农奴制、领主等级制及无偿带役制已基本消失了。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有人身自由，他们自由地耕种和出卖土地上的产品。这些小商品生产者既不植根在生产中，也不植根于地区社团关系的领主特权中。除了全国最大的地主——深入到每一个村落的教会——几乎没有作用于其上的部门权力来限制阶级行动。特权看来来自外部，即巴黎和宫廷。正如巴林顿 · 摩尔(1973，p.73)观察到的，不满来自“他们不彻底的位置即他们对土地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

农业阶级的冲突从传统的潜伏状态中爆发了。维持有产者特权的旧政权阶级定型日益依靠外部增援，依靠三种加深的定型如政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天主教信念。只要旧政权把自己的政治、恰当的军事和精神合为一体，那么，只有地区性阶级组织的农民就无能为力了。然而对于君主制精英、有产者阶层、官员和神职人员来说，相互争吵将是危险的时刻。

旧政权中的意识形态和军事权力

意识权力在四个时期促进了革命。第一，18 世纪下半叶，政权失去了对其大部分网络的权威性控制。第二，在 18 世纪 80 年代，法律行业和启蒙运动参与支持政府精英的意识和政治原则。第三，从 1789 年起突然之间更多普遍的意识形态网络推动了这个组合左转，发展了印刷

字的双重组织和口头集会，就像我们在美国革命中看到的。第四，一场政治家无法解决的危机存在于所有这些网络的联合中，即产生了一种卓越的意识，通过它，政府和社会可以组成新组织。在此四阶段中意识的作用不断升级。

在18世纪其他先进国家中，基本的读写能力趋于发展中，到1750年在城市男子中已达到70%—80%，论述能力增长得更快。教会主要通过雇用学校校长、在群众中增加教会出席率而支持了大部分话语能力的增长。欧洲教会虽然丧失了对政府的影响，却开始了在地区的复兴。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传播方法。神父和教师"日渐倾向于把他们教给孩子和家庭的道德世俗化"(Furet and Ozouf, 1982, p.80)。大众教育并不直接具有颠覆性，因为其信息主要是宗教的和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但是它较少受安全当局的控制。

第二章提出了不集中的读写教育扩张的两种主要途径。因为法国存在商业经济和大政府及军队，它结合了这两种途径，即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的中央集权。贸易和政府权力的增长——军官队伍、世俗官员和半官方的法律机构的增长——使中等学校教育、书本和期刊的出版发行、收费图书馆及学术机构(文学俱乐部)迅速扩展。专制主义的媒体和信息不同于立宪制政权下的媒体和信息。商业和法律被归入有产的旧政权，学校教育为天主教会所垄断，并与政权交织在一起。这看起来似乎是有效的控制，但它同样把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了政权本身。

启蒙运动因引发了革命而长期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他是这样仿拟的：

我跌倒在地上，
那是伏尔泰的过失。
我的鼻子在水中，
那是卢梭的过失。

但是，如果有哲学家推动，则政权必然倒塌。启蒙运动已深入到政权的一半，几乎所有的哲学家生来就有贵族头衔(卢梭除外)。他们的许多观点——抨击封建主义、宗教迷信、形而上学和经院哲学，以及赞美理性——都在有教养的人们中流行。在逝世的十八个财政大臣中有七个宣称他们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Behrens, 1967, p.136)。尽管哲学家们受到迫害和审查，但他们能扭转这一局面。他们在1750—1763年由马勒泽布控制着审查机构。他们在1760—1772年控制着法兰西科学院(Gay, 1967, I, pp.22—23， 76)。马勒泽布宣称(像其他有文化修养的人那样)："不管罗马或雅典的演说者在集会的人群中说什么，有文化修养的人在分散的人民中间。"(Eisenstein, 1986, p.200；参见Starobinski, 1987)哲学家们在贵族的沙龙中，包括在国王的堂兄弟、奥尔良大公的沙龙中高谈阔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侍安—图·迪·潘女士记述了公主和公爵夫人模仿哲学家的样式，她解释其意义为"自由思想者"(1985, p.81)。凡尔赛失去了巴黎的沙龙文化主导的地位，紧张情绪在沙龙和排他主义的"奢侈品"、"道德不检点"的宫廷原则中产生。宫廷和国王的议会统治着政府和政治，而沙龙和学院统治着它的理论和道德。启蒙运动即使不是政治的核心，至少也成了它的意识。现代化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百科全书》是启蒙运动的宣言。它的文章覆盖了知识的每一个分支，论证各处的人类理性，"把批评习惯组织起来"可以击败宗教迷信、排他主义和特权。通过受教育形成的理性可以建立一个由理性普遍原则统治、由美德管理的社会。正如达恩顿的研究(1979， pp.273—99)所揭示的：这种破坏性的观念渗入了旧政权的每个细胞。到1789年，书已经卖出了15 000册；有最高法院的老行政城市比港口城市和制造业城市销量还多，在贵族和神职人员中比在贸易商和制造商中卖得好。后来开始向下传播，通过图书俱乐部在为政权服务的低层律师、神职人员、官员和地方贵族中的销售量占总数的一半，超过了在贸易业和制造业人员中的销售量。

罗奇关于地方文学院的研究揭示了相似的模式。20%的学院派成员来自第一等级(神职)；37%来自第二等级(贵族)；40%是第三等级的平民。不到4%的平民从事商业和制造业，29%的律师和官员(35%的贵族是官员)，23%的低级教士，26%的医生和18%的小康人士，虽然女士在沙龙中非常活跃，但俱乐部、学院和共济会中都是男性，因而知识界成为“各地担任公职的资产阶级而被同化为神圣的社会特权阶层”(Roche, 1978, I, ch.4, p.245)。不断扩大的共济会是主要的讨论中心，除了少数几个神职人员温和地反对僧侣插手政治外，其构成基本相同(Le Bihan, 1973, pp.473—480)。报刊数量稳定增长，但和发行量更大、更多的英美两国报刊不同的是(Censer and Popkin, 1987, p.18)，直到18世纪70年代晚期，他们描述的仍是城市贵族的世界(Botein, 1981)。中等教育也不同。根据帕尔默(1985, p.23)的说法，“贵族的儿子与商人的儿子在同一教室上课”，因此他们进入相同的文化网络，但是他们在革命中仍是对立的双方。

这些媒介拥护第二章中提出的两种现代化路线：一是政府领导的，一是融入社会的。某些哲学家称赞君主制体现了“仁慈的专制主义”。达朗贝尔说，伏尔泰的谄媚的《彼得大帝》使他作呕，虽然他本人接受法国王家的年金。立法者应颁布公司权利法，资助教育和社会福利，扫除排外主义行会的特权。如果尊重法律，那就是好的政府。因而伏尔泰支持君主来反对特权，并批评议会(律师的集会)是落伍的、自私的，阻碍了有效行政权力(Gay, 1967, Ⅱ, pp.67, 474)。然而哲学家发现，这种方案比之他们自己腐化的宫廷和行政机构来说，更适用于他们所知不多的政府(如俄国和奥地利)，法国政府需要彻底的改革以成为仁慈的专制主义。

第二种启蒙运动的方案把理性看作平民社会的非集权化。教育能通过培育男人(甚至女人)的内在理性而开导他们。应鼓励个人自主权，美德应得到报答，经济、政治、宗教和理性的自由应得到谨慎的发展。大多哲学家是家长式作风的，他们希望引导人们逐渐地走向启蒙。没

有人相信民主制。许多人拥护盎格鲁—美利坚的宪政主义。因为所有的成年人都拥有普通的人性，所以所有的人都应拥有平等的公民权或“消极的”公民权。有教养的、拥有财产和“独立”的首领人物应有政治或“主动的”公民身份，把权利建立在“理性”的原则上是与实际的社会秩序和特权相矛盾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自我提高来参与政治。美国革命的胜利鼓励了这种通向改革的平民社会道路。

君主制下的精英对政权内部的思想混乱并非视而不见。它对此进行了检查。1600—1756年，在巴士底狱监禁了3 800多个作家、出版商和书籍报刊的销售商(Eisenstein, 1986, p.201)。大多数人默许保持产生于群众的思想是可以选择的。正如贝克尔(1932, p.31)指出的：“他们鼓励探讨无神论，但不是在牧师的面前。”专制主义总是认为秘密决定必然导致特权。但是“舆论”一词的出现预示着政府被限制的可能性，即被贝克尔(1987， p.246)乐观的语言“全民一致的政治”所限制(Ozouf, 1987)。但是一致并不存在，政府不再知道应相信什么。

这种情况在教会中尤其是这样，特权阶级反对启蒙运动对其财产、腐败和操纵迷信的攻击。许多哲学家认可休谟把宗教描述成“病人的梦幻”，健康的受启蒙者会扔之一边。大多数教会也不满宫廷的世俗化、三心二意的审查和对新教的容忍。它默许王权脱离教权(Julia, 1987)。然而理性也渗入了教会。詹森派与耶稣会的斗争使教义变得相对化，攻击《圣经》的字面真实性，并把科学融入了信仰正义(Cassirer, 1951, pp.140—184)。19世纪中期以后，有产者阶层中去教堂的人数下降(Vovelle, 1984, pp.70—71)。因为多数高级教士都是贵族，不去教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几个大主教(包括18世纪80年代的“政府的两个主要大臣”)不再信仰上帝。低级教会牧师和学校教师憎恨没有真正宗教资格的贵族上层特权和反对宗教信仰(McManners, 1969, pp.5—18)。教会内部的不满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地方部门对农民的控制主要依靠教会。世俗的现代化和启蒙运动的骚乱把君主与教会分开来，削弱了政权和政

府内在的道德。它们对意识的控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它们的军事权力也是如此，为所有政权所必需的军队现代化也产生了冲突。尽管欧洲的政权因财政现代化而受到震撼，但它们迅速对军队进行了彻底改革。七年战争的灾难结束以后，法国军队对战术和技术进行了改革，未受军衔的军官和许多低级军官变为职业性的，士兵现在不均衡地来自有文化技术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见第十二章)。但是军官仍是腐化的，军团掌握在贵族庇护人手中并保持有效的独立，还存在许多不合格的高级军官。在一些将军的帮助下，战时部长大臣力图消灭腐败并鼓励军队的职业化。

改革引起了分裂(Corvisier, 1964; Bien, 1974, 1979；Scott, 1978, pp.4—45)，三个政权派别掌握了军事特权。在宫廷中有代表的大贵族垄断了最高军衔；近来被封为贵族的富人可以购买军衔；没落的老贵族，如果有为军队服役的传统，可以通过关系和经验寻求晋升。在旧政权中几乎没有采取直接经验和美德来任命和提升。但是第三派即老贵族的军事经验基本可以胜任。这样改革结合了(在现代看来是怪诞的)1781 年《塞居尔法案》废除腐化的条款，要求贵族的四代人中的任何人直接进入军官团体(从士兵中提拔仍需军官拥有财产)。这提高了军官的职业化，但同时加深了军官与士兵间的裂痕，把它们化为“出身”与“美德”之间的准阶级冲突，并在富人和平民内部产生出敌人。因为军官与未授军衔的军官都是有文化修养的人，所以这些冲突广泛地在小册子和学院中传播。1789 年，政权的右翼证明了它的脆弱性。

财政危机和原则性抵抗的加剧

军队和教会没有引起 1788 和 1789 年的斗争。它们所做的只是引起了政权的微弱反应，其原因在于国王无力解决财政问题。18 世纪 30 年代，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收税的费用、由税收农场主和金融家

组织的偿还贷款的费用，以及在特权豁免中征税的费用，已成为沉重的负担。1757—1763年的七年战争的惨败导致了危机。由于缺少普遍的税收，政府以高回扣和高利息借贷。债务从战前占全部岁入的30%上升到战后的60%强(Riley, 1986, p.231)。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不得不维持下去，因为政府只能通过进一步借贷支付日常开支。这是主要问题，而且美国战争的花费使其更加恶化。在1776—1787年只有24%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进人国库，其余的则用来偿还不断积累的债务，特别是偿还征税者的佣金。

大臣们现在意识到农民已经被推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从18世纪60年代末到革命，大臣们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1774—1776年的王室审计官杜尔哥和1777—1781年的王室审计官内克尔减少腐化和税收的官员，试图恢复自由交通并从税收农场主的控制下恢复谷物自由贸易，限制GCF(主要税收农场主公司)的自主权(Bosher, 1970, pp.90, 145—162)。正如财政大臣克洛纳1787年对贵族大会解释的，特权成为主要的问题：

> 在这个广大的王国里，没有发现不同的法律、对立关税、特权和豁免权，是不能够前进一步的……这种普遍的不协调使行政变得复杂，干扰了行政，阻塞了其前进的车轮并使费用加倍，破坏了各地方秩序。(Vovelle, 1984, p.76)

半个世纪以来，政府精英不断地攻击其传统支柱即党派和特权阶层。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政治结合以及有产者与专制政府削弱了，同样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和军事支持。改革大臣面临来自控制议会和宫廷的特权有产者的反对。国王——必须被看作是革命不可少的原因——颤抖了，陷于精英和党派利益之间，成为一个独裁者，亦即有产者权利的维护者。每一次危机时，他首先支持改革，挑战议会，继而屈服于宫廷阴谋，罢黜改革大臣，中止改革计划。

与其执政君主同伴一样，路易面临很重的压力。这应在1789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他不得不处理严重的政府机构问题，这是我讲述的五个政权中唯一的一个。所有政权都包括战时精英和党派。问题是他们是否有办法解决。杰出的行政首领——这一时期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波拿巴或俾斯麦——或许能够成功。但很明显，路易不在此列，很多行政领导也不在此列，大多数政府发现了更多的机构解决方法。它们把“主权”置于专门的政府机构中，因而政府某个部门作出的决定便具有权威性。英国的议会主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发展了复杂的、特殊的最高权威，其内部关系由宪法和最高法院明确指明。我们将发现，在这样的立宪制政府中，对外政策(外交政策)的主权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但是，同样存在主权专制主义版本。18世纪普鲁士国王把它置于国王和经常被称为“官僚”(虽然是错误)的大臣之间的关系中(见第十三章)。他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大臣确实是整个贵族阶层的“党派代表”。尽管普鲁士国王在大臣之间进行分割和统治，尽管宫廷阴谋交织在他们的关系中，但是在这些机构中作出的大多数决定将长久有效。直到18世纪末这些机构才衰退，因为那时政府功能已大大膨胀。即使在王权和各省权力两种威权之间有明确分界的奥地利政府机构，也拥有一致性。马丽亚·特里萨和约瑟夫二世知道哪些机构是他们的。但是路易面对的是机构间的不一致，有产阶层的宗派主义渗透于政府的每个办事机构。他的大臣控制不了自己的部门(见第十三章)。他的法律官员属于自主的全体会议，他的教会和军队分裂了，他的慌乱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后果是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的，路易的大臣放弃了他们宣称的改革计划，亏损更加恶化，他们的不称职越来越多地受到痛斥。君主不断地宣布其废除特权的决心，但未能完成。普鲁士的路线是“自上而下保守的现代化”，因机构的不一致而在内部受阻(Moore, 1973, p.109)。这样，旧政权便不能实施第一种“中央集权论者”的启蒙方

案，其大部分成员转向第二种，即平民社会方案，并且倾向于代议制。

这样，精英一党派的冲突就成了原则性和集中性的。杜尔哥是重要的哲学家，内克尔属于启蒙运动沙龙。他们的政权反对者同样增加了原则性。私有财产、拥有官职、纳税农场和特权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各部的财政家对改革十分愤怒，国王随心所欲地干预基本的财产权并干预地方以保障其专制统治。他们从保卫排他性特权到呼吁基本的法律和关税，之后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对君主专制(Bossenga, 1986)。最高法院改变了他们的防御策略，从古老的特权到自由再到单一的普遍“自由”，这在18世纪80年代获得了普遍好评。法律不再是一个团体，整个18世纪，随着法律成为获得官职的主要途径以及法律教育的扩展，法律职业增加了两倍多，年轻的律师参与了启蒙运动的广泛网络。

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律师，早已开始了他们在旧政权中的生涯，购买官职并靠其成果生存。但是，罗伯斯庇尔、巴伊、布里索和巴雷尔也为他们的地方学院撰写关于真理、公正和自由的一流散文。汤普森(1936, p.40)论证说，法律职业分为两种：文职人员和案子的实际获胜者，罗伯斯庇尔属于前者中的一员。但是法律实践与社会、哲学和美学的原则是混为一体的。经过卓越的教育，罗伯斯庇尔开始接受维护穷人的案子。这在律师革命中是普遍的，显示了社会良知伴随政治理论的发展而发展。

这种良知从何而来？这不是阶级利益，因为年轻的律师都来自特权家庭，享受看起来成功的早期阶段的事业。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怨愤和激进，因为他们是不成功的(像Goldstone 1991年说的)，而且他们的政治观点萌发于他们实践与原则的相互作用中。随着法国成为商业国和日渐繁荣，他们的实践大大扩展到了包括农民和市民阶层在内的诉讼案(Kagan, 1975, pp.54, 68)。他们的原则受家长道德观的影响，起源于教会，现在被启蒙运动的话语机构所传递。

因此，在执业的同时，罗伯斯庇尔也参加了一个阿拉斯沙龙，讨论

哲学、美学和政治改革。在帮助一个启蒙的阿拉斯律师反对地方迷信后(此人在他的房子上树起了避雷针)，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作家。他的短篇发表在一个期刊上(他送给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抄本)，他参加了一个文学俱乐部和阿拉斯的学院，在那里他获得奖励并最终被选为院长(Matrat, 1971, pp.11—35)。一篇关于犯罪羞耻的稚嫩文章揭示了启蒙及运动的影响以及他的共和信仰的产生。他论证说：

> 共和国能量的主要动力，如孟德斯鸠已证明的，是美德，即政治美德，是对自己的法律和国家的爱……一个有高度原则的人将随时准备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财富、生活、生命——除了荣誉以外的所有东西。

罗伯斯庇尔已为“美德的共和国”作好了准备，但他不甚明确如何制造有美德的人，蹩脚地依靠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理性和雄辩——这是用来攻击偏见的武器(Thompson， 1936, pp.23—24)。

另一个较之稍差的高尚动机是韦德耶的，他是后来革命安全委员会的首领(Lyons， 1977; Tournier，未注明出版日期)。韦德耶的政治观念部分来自地方拥有土地的律师贵族的派系斗争。韦德耶和达明斯分别是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小城帕米尔斯的“在野派”和“当权派”。因而，利翁斯说韦德耶是为了把达明斯送上断头台而革命的(达明斯也是如此)。然而这太具讽刺性了。经过地方宗教和法律教育，在军队的一段时间内，韦德耶的知识范围大大扩展。他回到帕米尔斯阅读伏尔泰、休谟的著作和《百科全书》，在一个关于地方医院的案子中他维护了穷人的利益，之后在地方上名声大振。作为地方法官，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一员。尽管是少言寡语且更少作演讲的人，但韦德耶仍显示了其政治良知，确保了他进入议会。他签署了《网球场宣言》并愿意放弃他的家族特权。他转向左派而同时达明斯成为右派。整个革命期间地方的“当权派”和“在野派”的派系政治比英国和美国更具原

则性。

受启蒙的律师如罗伯斯庇尔以及像韦德耶这样的温和反抗的律师，还不能像革命者那样思考，但是君主政府不理智的进攻使旧政权处在从巴黎到帕米尔斯的紧张状态中，推动律师逐渐转向更坚持原则。同样，哲学家也远离了君主政权。狄德罗首先支持对最高法院特权的攻击，并认为它是对自由的威胁(Gay, 1967：Ⅱ，p.474)。改革者从中央集权转到平民社会的现代化路线。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律参与领导了日益原则性的旧政权运动，他们宣称代表人民发言。君主制机构被孤立，要求实行代议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外围是激进的新闻工作者和律师，如马拉和布里索，准备用原则性的行动计划取代旧政权。1780年，布里索给一个急切主张改变建立在目前实践基础之上的朋友回信说："如果你认为我会乐于接受目前已烂熟于心的实践，那么你是错误的。不管新理论是如何的怪异，它们将永远不会等同于荒谬和庸俗不堪的实践。"(Palmer, 1959, Ⅰ，p.261)。但是很少有人倾听布里索的想法，他们以后会接受的。

1787年，一个绝望的财政大臣卡隆，要求建立一个贵族的专门集会。社会已经有四年的和平了，其前任内克尔已经建立了乐观的财政报告(保持政权的信贷率)。因此，集会对巨大的财政赤字感到震惊。其成员不相信，他们要求查看账本，并且通过宫廷阴谋迫使卡隆辞职。其继任者——不信基督教的大主教洛梅尼·布里耶纳面对资金短缺的压力。他寻求隐蔽地进行其要求代议制的事业。他求助于高等特权贵族外法国已知的唯一的代议制机构——古代的三级会议，国王对未知的代议制政府领域采取专制的分而治之策略。像古老的传统做法一样，每个地区的团体都被要求往巴黎递交成文的请愿书。这两个策略立即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政府事先意识到这种结果的话，它将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如像普鲁士国王所做的，即按更加普遍的原则改革其行政机构，则法国的君主制就有可能存活下来。请愿以陈情书的形式出版，即由每一等级的地方代表写成的"请愿书"(Taylor, 1972;

Chartier, 1981; Chaussinand—Nogaret, 1985, pp.139—165;关于农民问题，Gauthier, 1977, pp.131--144)。一些是在“初级”会议中写就的，另一些送交地区会议讨论，并且选举代表进会议。这出人意料地发动了一场具有自己的动力的民族政治运动。它加速了意识原则的传播和三种交流通讯机构的融合，这种融合最终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和革命的精英集团：政权启蒙运动，政治—权利的律师以及在小资产阶级、低级神职人员和上层农民中扩散传播的文化。第三等级会议吸收了资产阶级和上层农民，但是领导权仍由律师和王家官员掌握。看起来不必为政权担忧；因为请愿将在其自己的官员的掌握中进行。政府取消了审查，允许议事录自由流通发行。期刊和报纸激增，意识机构脱离了政府的控制。

大多数议事录保留了下来。它们的内容看起来对政权并不是极坏的消息，大多数议事录公开声称对国王忠诚并抱怨地方的不公正，但没有指明是普遍原则，农民责骂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并反对税收。贵族和第三等级议事录抱怨王权的随心所欲。但是大约半数的请愿文件(大多数在巴黎和大城市)提出了更具原则性的改革方案，总的说来，是要求定期召开会议并制定成文宪法，出版自由，税收平等。其间没有任何民主制或革命的迹象；并且它们的语言也多是旧政权律师的用语，而不是哲学家的用语。

不过，许多议事录是在大法官裁判会议揭示了政治对话的普遍性和资本主义与民族的秘密发展后写的草稿。农民抱怨特权和封建主义是过去的野蛮的残余，是自然权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多数议事录承认法国是个单一国家、单一国民或民族，包括人民同意才能纳税的自然权利应受到尊重。相比较在英国、荷兰和匈牙利已形成的财政政治而言，“民族”一词的含义经历了相似的转变。最初是指同一祖先的人——以血缘为纽带但不一定非得是地缘和政治的纽带——它现在由不满特权的纳税者宣布，这些人要求以古老体制为基础的“民族自由权”(Dann, 1988, pp.4—7)。

主要的改革机构被认为是古老但非传统的等级会议。自1614年起没有开过会，因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控制它。它的古老法规证明存在“中央集权机构”的两个非预期的后果。首先，每个人都知道它有三个等级，但是谁有资格当选，他们又是如何投票选举的呢？许多人害怕国王将随心所欲地制订法规，因而巴黎最高法院宣布了1614年的法规，这在其后果被预料到之前已获承认。但是1614年法规将第二等级贵族的资格限制在旧的“佩剑贵族”。法国1789年比1614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有财产的人不是贵族，而许多在18世纪已封贵族的人则没有进入第二等级，因为只有少数人有资格入选。旧政权的有产者之间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政治分裂(Lucas, 1973, pp.120—121；Goldstone, 1991, pp.243—247，虽然他认为他们的党派斗争早已开始)。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被授予一致的政治权力。以凡尔赛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被赋予了某种政治的现实。

一些批评家要求有更多的第三等级代表，另外的人要求各等级合为一体。这种要求太过激进。但内克尔说服国王扩大第三等级，以便更好地代表有产者，并且，如果他需要分裂和统治前两个等级的话，可以把它作为反对它们的砝码。这样它的人数就超过了其他两个等级的总和，尽管三个等级是分开相对的。这看起来是一个理性的妥协，但这突然之间增加了第三等级反对特权的声音。

第二，没有人预见到公开选举的影响。在第一等级中，堂区牧师通过投票击败了高级教士并且提供了最多的代表，包括许多对现政府不满的人。第二等级选举出人意料地控制在保守派手中，在此等级中，地方市民中已受启蒙的贵族只占1/3。这两个等级党派主义严重，第二等级贵族与他们在第三等级中的合伙业主之间的裂痕加深了。在党派主义下，国王试图把专制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运用到未知的代议制领域，最高法院和民族阶层都抵制排他主义。与被排除在外的第三等级博爱观的公开冲突也已发生，第三等级是潜在的资产阶级。尽管这产生于旧政权党派，但看起来更像阶级斗争。

意识精英集团的崛起

然而，第三等级看起来不是一个阶级或一种威胁。新兴的资产阶级如此多地与旧政权交织在一起，而不能产生独立的意识或组织。因此选举并没有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在革命中当选的代表的背景中非常明显。表 6.1 分析了 1789 年 1/3 前革命党派成员从事职业的比重。第一行将第三等级代表的背景进行了分类。(从 1789 年 6 月起他们把自己变为民族集会。)

半数的代表是王室官员，一般的地方有法律官员，1/4 为独立执业的律师，其中至少 72% 曾接受过法律培训。14% 的人从事私人商业或贸易，只有 6%(都是大工业农场主)从事农业，他们代表了法国人口的 3/4。7% 的其他职业者是医生、军官、学术人员和哲学家的不相干的集合行业。科班(1964, pp.59—61)用这些数字来说明其阶级理论：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引起的，而是由对衰落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满的官员和律师阶层发起的。戈德斯通(1991, pp.247—249)把原因归为年轻的精英集团导致了“封闭的流动”。但是事实并不支持任何一种观点。三个等级的代表由整个有产阶级自由选择，经常没有大的冲突。代表中有许多法国最著名的法律家族成员。参加革命的律师在年龄、家庭纽带、财富方面都与那些没有参加的人无重要区别(Seligman, 1913, Ⅰ, pp.118—186；Berlanstein, 1976, pp.177—182；Fitzsimmons, 1987, pp.34—38)。

投票人在无选举经验的情况下选谁代表他们呢？出于理性，他们选举那些有相关经验的地方杰出人士，首先，他们选择担任公职的律师，他们有最丰富的公众职责经验，并且在专制主义下他们与政治家关系最密切。他们把应做好的事干得非常出色：策划请愿文件(议事录)。作为思想家，第二个有价值的技巧也出现了。以罗伯斯庇尔为例，他不仅仅是激进的演说家，更是有熟练演说技巧的、杰出的学院和文学

表 6.1　1789 年之前法国革命者的职业比率

	王室官员	独立律师	其他专业人员	商业、贸易与农业	私有财产者或未知	百分比%	数字
1. 1789 年国民议会	49	23	7	20	—	100	648
2. 1789 年制宪会议积极分子	44	33	16	6	—	100	62
3. 1789—1791 年制宪会议中坚定的革命者	23	26	18	20	12	100	287
4. 1792—1794 年国民公会	27	27	24	15	7	100	749
5. 1792—1794 年国民公会积极分子							
5(a). 库辛斯基的主要成员	23	27	43	6	3	100	162
5(b). 1792—1794 年 CPS 成员，CGS 核心成员或执行人	25	26	38	7	4	100	80

注：

1 与 4 指同一组织，始于 1789 年 6 月，1790 年 10 月改为立法会议，1792 年 9 月被国民公会替代，1795 年 10 月解散。

资料来源：

1、2：勒梅(1977)很可能包括了农业中的私有财产者。

3：以 1792 年的某文件命名，即 1789—1791 年间的“坚定爱国者”，根据道桑(1972：238—9)提供的数据。他将其归因于阿尔基耶的代表。然而马恩普里厄的爱国者代表的备忘录归于迪布瓦—克朗塞。

4：帕特里克使用了 Kuscinski 的传记。

5(a) 其成员传记被 Kuscinki 赋予两个或更多的栏目空间。

5(b)：CPS 即公共安全委员会，CGS 即普通安全委员会，前者 23 名成员及后者的 36 名长期在职的成员于 1792—1794 年间被砍头或谋杀(为首的丹东派成员和吉伦特派成员以及前奥尔良公爵菲利浦 · 埃加利特)。

沙龙的改革家。选民已经在考虑原则问题，如随着讨论各等级之间如何开会而使请愿会议获得成功。受可选性政治原则的影响，几乎所有到达巴黎的代表都支持改革。谁能更好地考虑原则而不是奖励来自体面家庭的文章的竞争者——像罗伯斯庇尔？

事实是多伊尔(1980，p.155)所说的，“是非商业的、职业性的富有

资产阶级压倒一面的胜利”。科班是正确的，一个马克思式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革命的。直到1794年，从右翼到左翼(从国民议会座席安排中创出的词汇)，从体制的君主主义者和右倾热月党人，经由布里索派和吉伦特派的中心，到左派的雅各宾派和忿进派，其领导人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任何阶层的典型。表6.1的第四行表明，1792年的国民公会中只有15%的代表是直接的生产和商业阶级，这15%中主要是商人和部分农场主。只有一小撮艺人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制宪议会，尽管他们提供了令人震撼的革命部队。像表6.1中第二行和第四行所揭示的，这些阶级产生了更少的领导者。勒梅(她没有解释如何划分激进主义)把62名国民议会的代表划分为激进分子。其中只有6%的人是农场主、贸易商和零售商。我估计他们构成了革命代表迪布瓦—克朗塞1789和1791年间支持革命的坚定爱国者名单中的20%，或许这就是革命资产阶级—农民运动的中心。但是，在国民公会中，用第五行(a)和(b)中的方法计算，他们中的激进主义者下降到只有3%—4%。

那么哪一阶层有最多的革命领导者呢？踉踉跄跄地走进革命中，律师和官员仍是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表6.1中表明他们联合的比重在国民公会中从72%下降到54%。革命前官员下降得最厉害，从49%到27%(几乎都是法律官员)。如果只是分析1789年之前的职业，则表格可能扩大了这种转变，因为一些领导人在革命机构中服务以后才进入国民公会。如果我们包括进1789年以后的行业，官员的比例就从27%升到至少43%，而与此同时，独立律师降到35%以下(这一估计由特德·马格丹特从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提供的)。

其他有学识的专业人员加入了律师行业，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24%，并包括一些1789年以后的官员。其中有55名牧师、46名医生、41名学术和文学人物、36名军官。独立的拥护者和其他有学识的专业人员组成了更多的激进主义者。在国民公会中，他们中的一半是激进主义者(勒梅划分)，尽管只有成员的30%。用两种方法计算，增加到国民公会的2/3。其他有学识的专业人员占了激进主义者的40%。在他

们当中作家和神职人员比法律和军事这样的技术专业人数更多。这些倾向在巴黎的公会和各部中特别明显。随着法律官员的下降和思想家的增长，领导关系发生转移。“会议室中的人”让位于“讲台上的人”(Dawson, 1972, p.125)，因为雄辩的说服取代了官员间的派系斗争。

他们中有多少人参加了印刷出版的话语启蒙运动网络？下面这些数字必然低估了包括许多没有保存下来的网络和活动。共济会成员名单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尽管几乎不占压倒优势的领导人中共济会成员的存在，在等级议会中，他们占了第二等级贵族中的28%，相较于第三等级中的17%—19%，教士中的6%(共济会成员是反宗教的)。这些都是拉马克的数据(1981)，他没有系统地搜集国民公会的数据，但暂时认为共济会占其成员的15%。我发现共济会包括了我的两组激进派成员的至少20%。

表 6.2　已知发表的文学、社会或科学著作的成员比例表

出　版　的	比　例	总　数
1792—1794 国民公会	23	892
国民公会积极分子(Kuscinski)	56	162
国民公会的积极分子(CPS, GPS)[a]	58	80

a. 见表 6.1 的注 5。
资料来源：Kuscinski(1916)和很多议事录、传记。

我也考察了会议成员的出版物，从库辛斯基纪念性的《国民公会词典》(1916)开始，其中列举了国民公会成员的大部分著名的出版物。我为其增补了许多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我忽略了仅仅是对当天发生的事件所作的政治评论回忆录和出版物——尽管达恩顿(1987)认为，即使两名国民公会议员里瓦尔和法布尔 · 德埃格朗蒂纳的政治出版物，也有比他们实际从事的政治活动更典型的文学类型和终极美德的膜拜。我没有把出版物限制在1789年以前。有多少国民公会成员出版科学文化或社会著作表明与启蒙运动在知识兴趣上相似？结果在表6.2第一行，同样，它们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至少 1/4 的国民公会代表的出版物显示了很广泛的知识兴趣。一些出版物显示了专业学识。阿博拉斯特的文章《关于不同形式的新原则》和巴拉永的《一种癫痫的观察》是数学家和医生的著作。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出版物看起来像取得公职的资格证明？这些出版物远远超过了现代机构如美国国会和英国下院成员的著作。其他的著作更加普通。一些出版物描写了太阳下的任何事情，如博内·特雷彻斯的《自然法则基础上国家间的普遍而永久和平》，博纳曼的《共和制政体或人的自然权利和政治天赋发展解析》。其他的出版物系从政治中概括而来，如布雷松的《宪法基础上的反映》或关于早期哲学家的——如德莱耶关于培根和孟德斯鸠的作品。一些出版物谈了关于艺术家的作品，如埃沙塞里曼的《关于戏剧和鼓励戏剧艺术的观点》和布基耶的《致国王身边的画家 M·弗内的书信》。一些人写小说，如安贝尔的悲剧《吉斯的亨利之死》和德维尔的《寓言》。这些成员都是启蒙运动的信徒。

这些就是普通的议员，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像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代表对比是相形见绌的，他们的全部作品也远不如哲学家孔多塞和画家大卫这样的代表。但是，杰出人物与知识兴趣有关吗？激进派议员发表得是不是更多？答案是肯定的。表 6.2 中第二行和第三行显示了激进派中的一多半出版了非政治性著作，是普通民众中比例的两倍多。但是，揭示领导人物的成就，比揭示普通人物的容易多了。除了传记以外，我没有发现梅兰·蒂翁维尔的任何作品。然而他却是拉丁语专家、哲学家以及共济会成员。他真的没有写什么文学性的东西吗？难道拥有图书一千五百册的皮内·伯蒂及勒贝尔都没有写吗？[他的传记作者 Homan(1971)对此表示了沉默]或许他们写文章给报刊或者自己出钱出版诗集。但是我在伦敦和洛杉矶的图书馆里没有发现任何作品(在法国进行广泛的研究或许能揭示其他东西)，因而我称这些人为“未出版者”。我们对伟大的领导者、“十二个统治者”，即自 1793 年到 1794 年间统治法国公安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了解得最多，表 6.3 包括

了他们的简历。

表 6.3 "十二个统治者"的文化活动(1789 年以前)

罗伯斯庇尔:

独立律师、阿拉斯学院院长。至少有三篇文章获得学院奖(一篇获二等奖),还有一篇未曾发表的关于美的诗歌。

圣茹斯特:

法律学生。发表诗篇《奥根特》,是一首讽刺性的色情长诗。

巴雷尔:

律师,后来成为法官。图卢兹的弗罗拉学院领导成员之一,写过许多关于法规和刑法改革及关于卢梭的文章,曾获学院奖。

卡诺:

军官、阿拉斯学院积极活动成员。在杂志上发表歌词、诗歌、小品文,为沃邦撰写颂词以及军队的重组方案。

比约·瓦雷纳:

教授。参与学院生活,出版了许多剧本(如《女人》、《当她不存在时》),写了一篇反对教会的辩论文,即《对法规和迷术的最后一击》,出版《社会体制的再生原则》(1795)

埃洛·塞谢勒:

贵族、法官。活动于文学沙龙及学院中,发表《对宣言的反映》、《雄心壮志的一种原理》、游记,以及关于地质学家布封的书。

科洛·德埃尔布斯:

演员、导演、经理人。发表了许多剧本(如《路西》、《鲁莽的父母》、《农民法官》、《好心的安烈万》)。

让班·圣—安德烈:

海军上尉,后成为新牧师。发表布道书及《对新教堂公民组织的关注》,是蒙托邦学院成员、共济会员。

库东:

独立律师、克勒芒—芬兰德学院的积极分子。参加奖项的竞争,撰《论耐性》,发表一本两幕的政治喜剧《贵族皈依者》。

金海岸边的普里厄 :

军官、第戎学院成员、巴黎自然历史协会成员。在《化学年鉴》及《工艺学校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写关于军事策略的文章及《关于光分解到最简单元素的问题》。

马恩的普里厄:

独立律师、学院成员、共济会成员。后在流亡中写就《弗莱芒语言研究》、《共济会历史探讨》、《法律词典》以及许多诗歌。

兰代:

起诉人。1789 年之前活动不详,在地方出版物以外进行了倡导改革的演说,出版《回忆录》一书和《关于公众信誉和生计的小品文》。

十二人中的十一人(兰代除外)为出版社写了非政治性的文章,委员

会中行政工作非常重要的人——普利厄斯的库东和“胜利者”卡诺——都是影响很大的学者，甚至最年轻的圣茹斯特，1789年时只有22岁，也参与了启蒙性出版物的写作。十二个人等于是很好的“西方文明部”！正如现代部门的成员一样，如果这些作者不是世界历史上革命法庭的坚决拥护者，两个世纪以后将无人去读他们的作品。到1789年，除圣安德曾经过商(不成功)外，没有人从事生产，他们都不工作，靠租金、年金和职位(旧政权中中层成员)而舒适地生活。他们其他的共同身份是：“十二个人全部是知识分子……都涉足18世纪的哲学领域”(Palmer, 1941, p.18)。

这种倾向或者是真实的——领导人物越出名，就越有资格担任公职，并成为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种典型产物。更全面的研究将揭示几乎所有的议会成员都是启蒙运动的激进派。包括“文化资本家”在内的一些商人和制造业主；从事印刷业或来自消费工业，其经营场所是革命的讨论中心，在那里出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最突出的是酿酒商桑泰尔和屠户勒让德尔。实际上，所有议会成员包括腐败的官员在内，都从财产和贿买官职中获得收入。他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全日工作，而是有闲暇写小册子和短文以及在集会中高谈阔论。

不管怎么说，革命领导人构成了一个意识精英集团，18世纪两个主要意识力量的突击队，就是法律职业和论述文学印刷品的发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启蒙运动的原则开始取代法律的“准原则”而占据统治地位(其区别将在第七章中解释)。精英反对国王，把法律概念总结为政治原则，有文学修养的人相信理性可以重建政府和社会。他们把启蒙观念传播到旧政权乏味的文体形式中。革命集会中的演讲事先写下来，沿袭昆体良的论证原则和古典雄辩技巧、范式和例子(Hunt, 1984, p.33)。启蒙的领导人着迷于美德，即政治美德。他们宁愿在政治上而不愿在经济上冒险。他们提倡“人权和公民权”、“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为“国民”、“民族”争求政治权利，反对国王和排他主义的特权。遍布欧洲的论述能力，把“民族”潜在的范围从特

权者扩展到所有拥有财富教养的人。在反特权的斗争中第三等级领导人把它打到了更下一层的范围，正如卢梭所说的，人民和民族是一样的。旧政权的警句“一个国王，一种忠诚，一种法律”被民族、法律和国王所取代——只有民族被大写了。

领导者把价值、规范与事实——亨特的“真情实感的政治”混为一谈。正如布林顿(1930)所解释的，雅各宾派表达了“即时观念的欺诈意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宣称美德和纯洁性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哲学。美德和恐怖最终合为一体。圣茹斯特明显地认为对恐怖政策的批评是财政和性关系的腐败，“人们会认为，每个人只要认为受到自己良心和法律的不灵活性的惊吓他就会对自已说：我们美德不够，因而如此害怕；哲学的立法者同情我的弱点，我不敢对你说，我腐败，我宁愿对你说，你太残忍了！”(Godechot, 1973, 1988)

圣茹斯特相信他关于道德的高谈阔论，像巴雷尔这样的趋炎附势者却不相信，但他写的从公安委员会给国民公会的报告已有了这种倾向：“委员会忙于重建的伟大计划，其结果将废除共和国中的不道德和不公正、迷信和邪恶……我们必须把共和国建立在原则和道德的基础之上，如果你支持它，它将会致力于伟大的计划。”(Gershoy, 1962, p.226)。

一些人相信“共和国的美德”，另一些人发现相信这一美德有益无害。道德原则的上升不是在所有的革命中都会发现的。布尔什维克宣称科学法则，但是他们的道德原则(被称为同志关系)直接来自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法国革命者则不同，他们产生于启蒙运动，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融为一体。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科洛 · 德埃尔布斯和其他人文章和诗篇的重要意义。这里存在一个意识的因果性链条，从教会到启蒙运动学院再到“共和国的美德”。宫廷、法院和街区的政治家不得不作出让步而用权力去进行道德鼓舞和压制。

意识精英集团也代表资产阶级吗？叙事体的历史总是把 1789 年—1792 年的领导者描述成为“资产阶级”或代表资产阶级党派(Furet and Richet, 1970； Boiloiseau, 1983； Vovelle, 1984)。确实，地方革命的核心

骨干已成为资产阶级。1789年，王家市政当局为由商人和律师控制的特别永久委员会所取代。继而在第二次冲击后，律师又被更小的商人和店主、手工业主以及像学校教师和理发师兼外科医生等更小的专业人员所取代。到1791年，大部分城市议会已被地方经济运作者和文化专业人员所控制；乡村城镇为小农场主、手工业主和日益增多的教师所控制(Hunt, 1984, pp.149—179)。各省的政治形式比国家的政治形式更能直接地反映阶级结构。甚至政府领导人也经常喊出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支持美德和工作，反对特权，支持普救论，反对排他主义，支持自由政策，反对特权和垄断。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绝对的私有财产应得到保护，反对特权和类似的无财产者。

然而，在很长时间之内，精英集团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权力的周围和内部有阶级力量出现。这也许就是如此富有的人领导一场真实革命的重要原因。他们开始确认准阶级行为者：宫廷和贵族集团、资产阶级贵族和“国民”(小资产阶级和民众的联系。)，但是他们没有形成明显的阶级联盟，像费里埃、马卢埃和米拉博这样的右派在反人民的宫廷和贵族间尝试进行温和改革以巩固“秩序党”。即使是像巴纳福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左派，在这一时期也希望更激进的改革来联系整个资产阶级反对宫廷和暴民。右派和左派对来自宫廷和街区的威胁有不同的评估。法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从1789年到1794年，大多政府领导者更害怕的是街区而不是宫廷。甚至制宪会议地点的选择也揭示了这一点，巴黎会众要求的呼声更倾向于凡尔赛宫廷的阴谋。与英国不同，旧政权—资产阶级秩序党没有占上风。

自上而下的螺旋形政治行动的结果，意识原则和阶级加强了。国王和贵族集团不奏效的敌视反而逐步增强了道德原则和阶级意识。新兴资产阶级在旧政府不妥协的刺激下和意识精英集团的领导下开始捍卫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如果没有这两种政治和意识权力的过程，法国的资产阶级将仍是一个潜在的阶级，陷入旧政权组织中而不能自拔。卢卡斯(1973，p.126)已观察到：“革命产生了资产阶级，尽管它不

是因资产阶级而产生。”更准确地说：一个政治对手和意识领导层产生了革命和资产阶级。

1789年5月初，三级会议在巴黎集会，同时国王的大臣罢免了改革者。他们讨论财政危机问题，各等级只在它们分别召开的会议中讨论。国王从开始时到下台都没有颁布任何改革计划。国王对立宪君主主义者“使自己成为普遍意志的代表”即领导一个民族的秩序党的呼声充耳不闻。他的作为使他们注定要衰败，也使国王自己失败了。

第一次冲突结束了，不管各等级分开集会还是一起集会。以英国范式称自己为下院议员的律师和有教养者论证说，因为国家没有分裂，因而各等级应融合在一起。开会投票显示贵族3：1反对合并开会，并开始联合在国王的周围。教士是较薄弱的环节。许多低级教士更接近于他们教区的居民而不是高级教士。正如一个小册子中所论证的：

> 认为团结精神属于教士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市民中有三个等级？每个人都在两个旗帜——贵族和平民中的一个之下，这是瓜分法国人的唯一团结的呼声。教士也分裂了……教区牧师成为人民中的一员。(McManners, 1969, p.18)

从6月13日开始，神职人员转向第三等级，这时第三等级在6月17日重新命名为国民议会，6月19日，教士集团以1/3微弱多数通过加入国民议会。国王询问是否由一个不满的、自封为“爱国者”领导的军队，去镇压所谓的“集会民族”的团体。他的将军建议他谨慎行事。当启蒙的贵族也转向第三等级时，路易看起来屈服了，建议所有的贵族和教士都加入国民议会，旧政权在革命者真正发起攻击之前就塌陷了。

但是国王和宫廷并不是真心实意的，7月初，两万部队集合在巴黎周围(Scott, 1978, pp.46—80)。然而士兵和未受军衔的军官看到了更多的平民而不是他们的贵族军官。一半的军官离职，就像是1789年和1780年的传统一样。大多士兵识字并阅读巴黎人的小册子。军官建议，最

明智的方法是法国军团撤离巴黎！ 外国军团看来是忠诚的。 但是 7 月 14 日以后(巴士底风暴)，民众和新巴黎市政府武装起来，并因军队逃离而更坚强不屈。 用外国军团反对巴黎的市民和民兵看起来是政治冒险(尽管如果国王不准备妥协的话，这是唯一的抉择)。 政权的军事力量逐渐消失，政治和意识权力仍保持其基础地位。

1789 年 8 月 4 日，国民议会投票一致通过“摧毁全部封建政权”，贵族地位上升以后，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要求废除更多的封建租税和特权。 这种场景使历史学家着了迷。 休厄尔(1985)论证说，这是一种突然的感情政治的原则，一旦提出将限制政治实践，因为它需要与《人权宣言》中颁布的高度抽象的、“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原则”相一致。 西尼克斯认为贵族要求废除其“邻居”的特权。 这种激情或许是真实的、令人惊奇的，但这一形势由第三等级的爱国者与启蒙贵族协商，却被城市暴动和农民起义(以后讨论)所镇压，因而改革需要阻止无政府状态。 他们一致认为贵族应该充当代言人，防止阶级敌对破坏国家的团结。

他们的希望异常成功。 意识精英集团发现了基本的权力技巧：道德信仰激起原则宣言，而后宣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民众的压力确保了以后的背叛将冒失去尊严、地位甚至生命的危险。 领导人并没有对这一策略的成功抱很大的期望。 他们把希望寄予实际政治——一种解决财政危机和农民暴动的方法。 但其内容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终结封建主义，指责特权和地方主义促使国家分裂。 “民族”和“封建主义”被虚构出来，前者是道德和团结的象征，后者是不道德和分裂的象征。 实际联盟的界线重新划定。 不再是作为自然联盟(与国王)的三个等级反对无产者，而是分成特权者对国民之间模糊的较低的界限。原则国家在夹缝中形成。

正如菲茨西蒙斯(1987， p.41)所指出的，原则具有自己的动力：它废除了像律师阶层这样的合作团体，尽管对这个阶层没有明显的敌视。这是两重意义上的原则叙述，激发了新的社会和道德秩序。 这种激情

不单来自会议的发言人，还来自于他们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话语网络的标语(以俱乐部、小册子和报纸为中心)以及窗外群众呼吁的标语。国民议会10月份从凡尔赛迁到巴黎以后，这种相互作用加强了。走廊里的人们——部分是受雇捧场的，另一部分则代表窗外的民众——干预了争论。部分是出于偶然，革命领导人看到原则性的标语可以加速建立不相干的权力运作者之间的感情联系。但是那些称赞他们的人不容后退——特权者在政治中湮没了。意识权力技术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时刻，原则是意外出现的革命政治财产，是行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路易站了出来，宣布“我不允许我的教士和贵族被剥夺资产”。路易正确分析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却错误地相信他有能力阻止它的发展。教士阶层迅速地被拆散了。到10月份，教会财产被出卖，许多家庭的财富(包括富农)被应用于革命。但是爱国者不明智地使用了他们启蒙运动的现世主义，在1790年11月迫使神职人员宣誓对国家效忠，并宣称国家高于教会与教皇之上。半数人(2/3的议会神职人员)拒绝宣誓。教会一分为二——革命的“立宪教会”和“拒绝宣誓效忠的”反革命教会。大多数地方的神职人员转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高于农民之上的特权。贵族虽然没有如此迅速地被剥夺财产拥有权，但他们的权力也衰退了。他们因失去特权而获得补偿金，但在农民控制的乡村，这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保守派贵族退出了他们的阶层或者转移到反革命组织中。自由派贵族在制宪会议中地位下降，在1791年10月份的会议选举中失去了独立地位。

革命成为阶级斗争

1790年以后革命过程的关键是五种权力运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四种开始近似阶级——以宫廷为核心的旧政权阶级、富裕的资产阶级、以激进派为核心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尽管所有这些阶级都来自

不同的政治权力过程。它们之间的冲突导致第五种权力运作者分裂为右派和左派，这种意识精英集团最终导致了革命，我从旧政权阶层开始论述。

在1790年年中，存在着双重的政权体制。君主、贵族集团、教士等级已经丧失了对新政府机构选举、集会和俱乐部的控制。他们退守其传统权力，即宫廷阴谋。国王及其家庭假装与革命联合，并公开在财政上予以支持，他们与从米波拉、拉法夷特到布里索派、丹东的温和派谈判。所有这些都不是真诚的，因为国王把外国军事武装的干涉视为解救之途，并与贵族使者一起策划组织地方和外国的军事力量。宫廷中围绕王后的奥地利一派更是顽固的不妥协派。许多阴谋被揭发出来，更多的阴谋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富雷(1978)论证说，阴谋成为革命的中心神话，但这是误导——几乎没有什么是意识上无辜的。阴谋不是被发明出来的。革命者不得不对付宫廷分裂他们的真实企图，在地方发动起义并处理来自欧洲各国的军事干预。

这些阴谋与革命机构的真正公开和“道德”，即集会(整个法国的集会和俱乐部)中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形成了对比。这确实涉及了“国民”，延伸出有产者并包括了平民。国王和贵族集团的阴谋正是展示了他们是与“国民”对立的，他们是不道德的，秘密制造阴谋和行贿。在审判国王期间，圣茹斯特的宣言再一次响彻法国：“没有任何个人可以进行无害的统治。这种愚蠢的念头真是太明显了。每一个国王都是叛徒和篡权者。”(Curtis, 1973, p.39)贵族统治者的阴谋和革命者公开的宣言之间的对比，使“国民”神圣不可侵犯，而阴谋制造者成为恶魔。到1791年，罗伯斯庇尔把所有富有者都视为阴谋制造者：美德存在于国民和平民意识中。

随着这种对比越来越清晰，决定了务实的政治寻求两套政府机构间的桥梁。费里埃(1822)和马卢埃(1874)的回忆录中是长长的耶利米哀歌，他们的君主立宪党派不断地被宫廷阴谋和路易的不真诚所困扰。国王逃亡国外的企图的流产及随之而来的外国入侵，向中间派表明了他

们从旧政权中将一无所获。大多数人转向了左派，相信或模仿以前被他们斥之为不切实际的普遍原则。那些仍然与国王谈判的人只能期待最坏的结果。他们是国家的叛徒。最终国王与其家族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不妥协使有产派的秩序破裂，分化了其政治和意识机构，使他们的敌人成为神圣者的原则性代表，并把自己的党派转变成恶魔的代理人。到 1791 年底，旧政权结束了。

还剩三种有组织的阶级。在规模和早期影响上占第一位的是农民阶级(见 Lefebvre, 1924, 1954, 1963, ch.4, 1973；Moore, 1973：pp.70—101；Skocpol, 1979：pp.118—128；Goldstone, 1991, pp.252—268)。1787 年和 1788 年的歉收，1788 年的严冬，加之人口的压力和物价上涨，加剧了农民的苦难和失业。但是为什么这可以导致一场革命的农民运动？像第四章所说的，英国的面包暴乱不是针对政府，而是把矛头对准垄断市场的阶级。法国的专制主义承担面包供应责任，因而使得面包成为政治问题。还有“特权”，封建租税在歉收年景遭到很大破坏。许多贵族退出政府，部门权力受到削弱，军队和教会中也同样出现分裂——这在乡村中十分严重，农民是探索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解放者。农民的记事录中深层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农民支持第三等级站出来反对国王和贵族。1789 年夏天同样可以看到分散的乡村暴动，以大恐慌著称。贵族领导的暴徒抢夺农民财产的谣言传遍了整个法国。农民拿起了武器，但是没有发现暴徒，他们焚烧庄园并破坏封建义务的记录。

城市武装使政权丧失了机动性。农民面对着受到削弱的部门的控制。农民起义往往以成功结束。农民夺取了农村政权，旧政权被剥夺了乡村的权力基础。城市革命仍在继续。正如摩尔(1973，p.77)所说的：“农民尽管不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却是革命的决定者。”其富有战斗性的核心是现今的阶级意识。

农民要求从特权和专制所有权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财产权利。意识精英集团也是如此。它原则上废除了封建租税——农民迫使其实施——并把教会和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以低价出售。直到 1791

年，革命在可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中已相当普遍(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如果没有城市与乡村运动之间的“资本主义联系”，革命便不能继续前进。城市革命在政治和意识观念上引发了封建主义与商业的小商品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冲突。否则，它将像大多数中欧国家一样仍处于潜在状态。

此后，农村的幻灭和分裂出现了。封建主义的瓦解没有为大部分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土地买卖只使有能力支付的人获益。富裕农民和购买土地的资产阶级组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层。城市革命者不得不解决公用土地问题，而对此他们知道得甚少。军队和城镇同样急切地需要面包。资产阶级拥护自由市场供应，而长裤汉们则支持强制下的价格和数量控制。富有和贫穷的农场主都支持一个保持价格稳定的市场。随着革命在1792年和1793年左转，市场走向控制，开始有利于农民。在恐怖之下，政府尽量把被没收的产品和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缺少执行机构。支持社区集体主义反对贵族和富农的极左派农民的选择权限毫无结果。农村开始右转，较密集地区组织的神职人员领导了革命。无套裤汉在城市中被孤立。大部分组织起来的农民欢迎1794年8月的热月党人，但是城市与农村的紧张状态一直持续了整个18世纪90年代。农民权力成为早期革命的必要因素，如今又成为其覆灭的必要因素。由始到终，农村革命一直支持农业小资本主义。农民有产者控制了土地。但是，像第十九章中表明的，他们坚持分散的地方政治权力。

从1790年开始，革命以城镇中三种剩余的权力运作者为中心，它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后盾的意识精英集团领导。新的立法原则是“国民”或“民族”。但是像英国和美国一样，国民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从殷实的有产者到全部男性平民不等。殷实的财产所有者领导了革命，但需要民众的支持以反对敌视的宫廷，他们在五种重要的政治组织之间相互影响：俱乐部、出版社、集会、国民自卫队和城市公众。除城市公众外，其他四种首先为意识精英集团所控制，但是它

们继而自下分布在小资产阶级和技工中，产生了一个自主的无套裤汉阶级运动，该运动分裂了精英集团并加强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城市公众对革命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强制国王。对暴民来说，面包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18世纪的所有国家中(像我们在第四章英国中看到的)，在平民暴动中以食物暴动为主。巴黎的技工有一半工资用来保证生存，如果面包涨价，便会面临饥饿的威胁。粮食暴动在革命进程中不断发生，这尤其提供了女性的战争精神。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把普遍的中心社区都动员了起来。这一时代普遍运动的强度来自于家庭和社区内阶级的加强(第十五章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暴动者们首次喊出了思想家们从特权和腐败中“解放”出来的口号。贵族、教会特权阶层、富裕商人和资产阶级垄断者等旧政权的“利益”是阻止公平的食物分配。暴动者开赴凡尔赛俘获王室成员，他们高呼：“让我们得到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面包师的儿子!”1790年有了好收成之后，市场发挥作用，意识精英集团与小资产阶级并肩战斗。但是，1791年的歉收、反革命者以及货币流通的不稳定造成了粮食短缺。暴动者要求政府干预，并强烈谴责意识精英集团。那么谁将获胜呢?

俱乐部是革命的有组织核心。1790年雅各宾俱乐部有成员3000—6000人。在121名领导人物中，至少有100人以知识渊博的政论家、政治家、作家而著称于世，他们沉迷于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赞美普及读写能力：“人类最伟大的公民权利保卫者已经发现了：它是出版物”，“没有杂志和时事报纸，美国革命便不会发生”(布里索)；“大地域内的稀疏人口可以像小城内的居民一样自由……通过印刷品，各地人们争论的内容是一样的”(孔多塞，解决卢梭如何在比小城政府更大的范围取得民主的问题)(Kates, 1985：pp. 83—85, 177, 180； Eisenstein, 1986, p.191)。布里索派和吉伦特派成员更注重于出版社。雅各宾派使他们相形见绌——俱乐部从1790年3月的24个到1790年12月的200个以上，1791年3月达到426个，而到1794年初时已达到6000个以上，触

角直到村落。较大的俱乐部拥有阅览室和印刷机构，他们的集会以主要期刊的到达来定时。通过一个到各地区中心和巴黎的相应网络来交流各项决议。俱乐部是讨论印刷品的口头集会。

早期的雅各宾派大都是有产者，后来其成员扩大，包括很少的贵族，几乎没有农民、劳工或仆人。1789—1791年间的13个俱乐部的成员中，包括了16%的官员和有薪雇员，16%的富裕资产阶级(批发商、投资者、制造业主和靠租税生活的人)，14%的手工业主和贸易商，13%的自由职业者(多是律师)、口若悬河的牧师，5%的军官和未受衔的军官。另外24%是低级技工，其中有许多技术能手(Kennedy, 1982, pp.73—87及附录F)。因此雅各宾派成员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特别是1791年俱乐部对"顺从"的公民敞开大门后。大部分领导人仍是殷实的资产阶级，但在公众的压力下，他们开始支持民主制。

国民自卫军及地方政府、各区委员会中有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巴黎各区(Soboul, 1964, pp.38—54)和普罗旺斯公众与部门(Vovelle, 1976)中的激进派都是手工业主、熟练工人和向左邻右舍生产和销售的小店主。他们的领导人是小制造业主和低级专业及行政人员(Andrews, 1985)。他们动员地方民众，从拘捕记录中看出，这些民众多是作坊主、工匠、店主和小商人等拥有少量资产的劳动者。挣取周薪的人没有被充分代表。暴动者集中于小资产阶级的邻区而不是工业郊区(Rudé, 1959)。他们的艰辛劳动和坚定的独立精神与富有者的闲散寄生形成了对照。他们把自己称为无套裤汉——没有长及膝部的马裤(穿长裤)——显示生产工人的光荣。妇女参与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和观念的传播。尽管在巴黎对富裕资产阶级的强烈打击令人生畏，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尽管是"国民"，但他们不能组织国家。

革命者在双重机构间分化。来自富裕资产阶级的意识精英集团控制了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中的国家宣传机构。但是他们却与一个不可靠的国王分享行政机构和军队。为了给国王施加压力，他们需要公众暴力，但这种暴力掌握在混乱的小资产阶级机构手中，把各个部门以及原

则性的国民自卫军和暴民与煽动性的印刷品联系起来。这两种阶级权力有组织基础间的分裂，只能由雅各宾的左派来弥补，因为其巴黎和全国性的组织支持了两个阶级某些渴望达到的目的。从1792年下半年开始，雅各宾派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都是革命本身。

革命成为民族斗争

然而，直到现在阶级斗争也不“单纯”。选举权问题成功地完成妥协，冲突因小资产阶级缺少国家性组织而受限，允许精英集团保持市场“自由”并且需要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者，但是对第二阶段的军事和地缘政治权力关系的干预强化了阶级及国家。

1791年底在意识精英集团内部，权力从君主立宪派手中转移到了雅各宾派手中，他们通过把“国民”和“国家”的标语左转来回应贵族统治集团的阴谋。国家是自由独立公民的社区，贵族、教士阶层，或许连国王都要被排除在外。逃亡贵族的财产被没收。在法国的边境地带这使得冲突民族化和地缘政治化。因为“国家”没收了法国阶层中的德国贵族的财产。阿尔萨斯人“希望”回归法国，但是，这种志愿公民权的革命原则抛开了财产权和古代条约的权利。奥地利和普鲁士被说服认为他们的事业同样是路易、逃亡贵族和德国贵族的事业，他们的判断没有更好的理由。这是王朝的排外主义与全民族的对抗。

逃亡贵族的首领布伦瑞克公爵不再谨慎行事。他呼吁起来反对革命，并发誓对反抗的巴黎毫不怜悯。这一声明加强了巴黎革命者的团结，并宣称一旦逃亡贵族军队失败，便敲响了国王的丧钟，而且削弱了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力量。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动员起来保卫国家。1792年8月10日，国民自卫军和巴黎民兵袭击了杜伊勒利宫。国王被擒，法国宣布为共和国，宣布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一个小资产阶级共同体始终与意识精英集团领导的会议保持一致，保卫财产安全，温和的布

里索廷斯派现在发起了战争，他们相信能加强国家团结，把公众的愤怒引向外国的威胁，并且提高军队的声望。他们和宫廷都希望彼此走向战争。

1792 年 9 月 20 日，入侵的普鲁士和逃亡贵族的军队(奥地利军队滞后)到达了马恩河北部的村落——瓦尔密高地。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代表革命的一支混杂的法国军队。其中有一支完整的王家部队，即资产阶级军官领导的炮兵。它受到一支由旧步兵团和革命志愿兵拼凑起来的几个营的支持，其忠于革命的军官是来自专门行业和市镇的资产阶级。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他们期望可以凭才能和战斗经验获得提拔。许多人是从未受衔的军官中新近提升的，而这在革命前很少见。大多志愿兵是来自巴黎和其他城镇的店主、技工和自由职业者。“武装起来的民族”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具有高文化修养的人(Scott, 1978)。

对国民来说幸运的是，这是一场炮兵战争，正适合了法国的力量。大炮在瓦尔密高地周围密集轰击了十二个小时。法军坚守阵地，高呼“祖国万岁”。天黑前，普鲁士军队以良好的秩序不情愿地撤离了法国。革命和国家保住了，路易的命运已成定局。1793 年 1 月，他及其家人被处决。弑君罪将一去不复返。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旧政权被颠覆了。“瓦尔密战役”是一场小型军事行动，但它却是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歌德作为见证者。天黑前他发现自己坐在围着营火的普鲁士撤退军队中间。他想在他们中欢呼：“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你也可以说，我就在现场”(Bertaud, 1970； Best, 1982, p.81)。

瓦尔密大捷使革命得以延续。在政府的动员下，市民在战场上不断获胜。一年后，当奥地利来犯时，他们再次获胜，奥军被击退。他们动员了以技工和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军官为主的 30—40 万大军。1799 年，民族武装击退了入侵者的第三次进攻。十五年中，这支只由法国人组成(加上来自姐妹国的“地方爱国者”)的军队，是欧洲唯一的民族军队。即使在危机中当军队缩小并职业化时，它仍然在小册子和俱乐

部的深入渗透下存在，并为伟大的祖国而战。

伴随着战争和接见群众，革命者重新运用他们的意识经验，以形成强制的自给自足的后继原则。布里索的论证并没有赢得议会、俱乐部、政府部门和国民自卫军的支持。罗伯斯庇尔反对战争，说明了战争如何不可依靠，而依靠那些将军是多么地危险，因为他们的忠诚令人生疑。如果战争失败，革命将会终结，关于战争的普遍实施，罗伯斯庇尔论证说：

> 理性的传播过程是缓慢的，这是自然法则。最邪恶的政府受到偏见、习惯和其人民教育的有力支持……在任何政治家头脑中都能形成的最疯狂观念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只需武装入侵，就会使另一个国家的人民采用他们的法律和制度。没有人会仁慈地喜欢鼓吹武力的人。(Gauthier, 1988, p.31)

但是国民议会选择战斗作为具有很高的感情原则的声明来团结各个权力派别和保护财产。根据记事录得知，当一个吉伦特派代表宣称国家准备为宪法而牺牲时，国民议会沸腾了：

> 国民议会的所有成员，被同样高涨的情绪所鼓舞，他们叫喊：是的，我们发誓！这种热情的出现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点燃了他们的心，法院和外交部大臣、传达员及参加会议的所有男女与代表们一起站起来，挥舞着帽子，把手臂伸向主席桌，并喊着同样的誓言。他们喊道：不自由，毋宁死，要么实行制宪，要么死亡。人们报以掌声。(Emsley, 1988, p.42)

这种热情实际上把原则加入到分析中，许多温和派把战争视为把启蒙原则付诸实施。正如波科克已经证明的，有产的公民—士兵共和国

的理想化阶级观念在欧洲知识分子之间已长期流传。有产的民兵可以利用此事反对君主制和暴民。小资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也把这种动员看作可以提高它们在革命中的作用。雅各宾派的思想领袖，掩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裂痕，创造出一个有力的新的进攻武器，一个到处反对旧政权的武装民众。正如早先废除封建特权一样，其创造性原则由发起人确定，与布里索廷斯的期望相反，战争使领导权左转，把小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和地区委员会送上政治舞台。"国家"在阶级组成上发生了变化，现今已包括(男性)城市平民。一个新的集体运作者在夹缝中产生了，这使那些造成这一局面的大多数权力运作者十分吃惊。

现在，左派与右派，吉伦特派与蒙塔格纳德人，以及雅各宾派别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阶级斗争，虽然斗争意识聚焦于这一时期的其他政治问题：政府应怎样集权或地方化。巴黎公众和各区是左派的革命信念的基础，因此右派通过分散政府权力来寻求与暴民统治作战。这正与美国革命后的保守政策相反，在美国，对付暴民统治的方法是集权。这就是为什么在同样是两个保守的国家，联邦制在美国意味着集权而在法国则是分权。吉伦特派试图寻找到一个分权的联邦政府来更好地保护财产。

吉伦特派因自1789年日益增长的政治集中和不得不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巴黎作战而受损。但是1789年以前，法国政府一直是二元的，其专制君主制更集中，许多行政部门和法庭地方化。尽管国民议会立法铲除了其中一部分，但是它不能一举清除地方主义。斗争是势均力敌的，但战争却使它发生了倾斜。它加强了巴黎蒙塔格纳德机构和集权主义者的逻辑。小册子中写道，联邦制的美利坚和瑞士有令人羡慕的国内自由，但是它们有地缘政治上的弱点。为了反抗入侵，需要"国家统一"(Godechot, 1956; 1988, pp.17—18)。他们的布里索廷斯联盟因为在执行战争上摇摆不定而使吉伦特派处境恶化，有些人甚至与敌人进行谈判。对阴谋的指控导致了恐怖政策，直接针对吉伦特派、富有的资产阶级以及贵族，吉伦特派垮台了。

随着战争增加了政府的经济干预，法国更加中央集权化。军队需要供给，而它们的主要供应基地——城镇，也同样需要供应。余下的意识精英集团仍希望保护财产和自由市场，但是又不得不提供面包以防止公众的愤怒。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公安委员会，组织经济干预和实行恐怖政策，而同时仍回避阶级划分问题。罗伯斯庇尔宣布："无论用什么方式政府必须被拯救，什么东西都可以制度化，除非它要走向灭亡。" (Boiloiseau, 1983, p.9)。"美德共和国"赞美"纯洁"并清除"腐败"，但是其政策较少有原则性。罗伯斯庇尔周旋于资产阶级财产自由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之间。激进的雅各宾派代表和无套裤汉的武装分队在各地流动，以确保供应、组织活动积极分子及处置反对者。他们非常成功，但通过各种策略，这里是恐怖，那里是安抚，总之，根据地方情况的轻重缓急和他们的偏好而定。委员会在看起来存在威胁的地方进行打击，一会儿肃清资产阶级调解人，一会儿清除各部门的逃亡贵族和恐怖主义者，在这里强制施行配额和最高价格(损害农民和商人利益)，在那里又强制实行最高工资(损害工人和技术人员利益)。尽管他们保证了军队的良好供应，但城市却危在旦夕。

对激进派的支持渐渐远去，无套裤汉没能阻止热月党人的攻击。这是 1794 年出现的更混乱的党派，它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并致命地削弱了意识精英集团。这一资产阶级政权的出现终结了大革命。大革命中模糊的阶级终于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前瓦解了，切断了与特权的联系，正如它的敌人曾经做过的那样，资产阶级控制了高度集中的民族国家。

战争仍在继续。富雷说："这场战争挽救了恐怖政策，创建了最后一个革命正统的暴力庇护所" (1978, p.728)。但是战争同样也改变了革命的正统性。它以更强壮、更集权的国家政权为基础。波拿巴统治下的军事原则赋予它专制独裁的色彩。热月之后，它的集权行政机构实行比英国更直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1815 年后，证明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但却是资本主义政府之间持久划分的源泉：一方面是盎

格鲁一撒克逊式政府，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和国家的中心和领主位置；另一方面是更加集中、组织明确的国家主义的大陆模式，这是稍具暴君式的政府，集中设置和加强资本主义的更多标准(Birnbaum, 1982)。在它最终获胜之前，复辟的君主制和复活的教会仍发动战争反对这样集权的共和主义的民族国家。

关于法国的结论

就原因来说，法国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民族性的，更不是由阶级掌控的。它的开始是因为政府的军国主义造成了财政危机，又没能使政府精英与特权阶层之间正常的派系主义制度化，因而使整个旧政权丧失了机动性。这一危机又因军队和教会中的派系主义没有解决而进一步加剧。到1789年，通常针对政治反对派、市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的防御垮掉了。持续发展的阶级对抗在夹缝中产生。农民很早便发起了阶级革命并不断获胜。在城镇中权力为意识精英所控制，部分是资产阶级，部分是旧政权的现代化者，但都不是来自两个阶层的主流，并且带有明显的启蒙运动道德原则的成见。

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念的政权精英集团被右派通过外国军队半心半意支持的国王和宫廷所制造的并不奏效的阴谋连续打击，并被左派的小资产阶级不断猛击，小资产阶级在身份和地位上日益强壮，但在政治的整体和选择上依然薄弱。在重负之下，意识精英集团有了创造性权力的发现，发展连续的原则性思想和权力技艺强制实行这些思想(我在第七章中进一步讨论)。精英集团与阶级的相互作用强化了第二种间隙权力运作者的现实性，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它推翻了君主制并迫使教会回到地方组织中。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意识精英集团的联盟被分化了，其领导权最终转向更具资产阶级身份的人手中。

因而冲突开始受到阶级和民族的出现的限制，这种限制又交织着意

识、军事和政治的权力关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最后斗争取代了意识精英集团，并承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胜利和大革命的结束，法国过去是并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其政府定型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不管其制度是随之而来的共和制，还是帝制或君主制。

作为同一过程的-·部分，法国政府甚至法国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意识精英集团提供了旧政权和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联系。在各旧政权地缘政治的压力下，它被巩固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性的。这些中介确保了专制主义因素被变形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霸道强权的民族国家的形式。战争打败了吉伦特派的联邦选择后，政治公民权作为集权被构想出来——与美国的方法正相反。因而法国政府可以把国家情感动员到一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在第七章中将看到)。法国如今不再是一个排他主义的集成体，也不是由君主制和教会紧密结合起来的权威团体，而是一个像英国一样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但是这一文明社会更多地依靠一个民族国家。欧洲现在有不止一种的现代化模式。

参考文献

Agulhon, M. 1981. Marianne in Combat: Imagery and Republican Symbols from 1789 to 18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rews, R.M. 1985. Social structures, political elites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92—94.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

Baker, K.M. 1987.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old regime: some reflections. In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ed. J.R.Censer and J.D.Pop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ber, E.G. 1955. The Bourgeoisi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C.L. 1932.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ehrens, C.B.A. 1967. *The Ancien Regime*.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5.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Beik, W. 1985. 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lanstein, L. 1976. The Barristers of Toulouse, *1740—178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ertaud, J.P. 1970. Valmy. Paris: Julliard.

1979. La Révolution Armée. Paris: Laffont.

Best, G. 1982. 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70—1870.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Bien, D.D. 1974. La réaction aristocratique avant 1789: l'exemple de l'armée. *Annales E.S.C.* 29.

1979. The army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reform, reaction and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88.

1987. Offices, corps and a system of state credit: the uses of privilege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Ⅰ: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ed. K.M.Baker. Oxford: Pergamon Press.

Birnbaum, P. 1982. *La Logique de l'Etat*. Paris: Fayard.

Boiloiseau, M. 1983. *The Jacobin Republic, 1792—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is, P. 1960. *Paysans de L'ouest. Des structur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 Paris: Vilaire.

Bonnin, B. 1987. Un bourgeois en quête de titres et de domaines seigneuriaux: Claude Perier dans les dernieres années de l'Ancien Régime. In *Bourgeoisies de Province et Révolution*, ed. M. Vovell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Bosher, J.F.1970.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ssenga, G. 1986. From corps to citizenship: the Bureaux des Finance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

Botein, S., et al. 1981.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and French society: a cross cultural approac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Brinton, C. 1930. *The Jacobins: An Essay i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Cassirer, E. 1951.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enser, J.R., and J.D. Popkin. 1987. Historians and the press. In *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ed. J.R.Censer and J.D.Pop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rtier, R. 1981. Cultures, lumières, doléances: les cahiers de 1789.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4.

Chaussinand-Nogaret, G. 1970. Capital et structure soc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Annales E.S.C.* 25.

1985.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bban, A. 1964.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minel, G. 1987. *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xism and the Revisionist Challenge*. London: Verso.

Corvisier, A. 1964. *L'Armée francaise de la fin du XVII e siècle au ministère de Choiseul: Le Soldat*,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rouzet, F. 1966. Angleterre et France en XVIII e siècle: essai d'analyse comparée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Annales E.S.C.* 21.

1970. An annual index of French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In *Essays i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ed. R.Cameron. Homewood, Ill.: Irwin.

Curtis, E.N. 1973. *Saint-Just, Colleague of Robespierre*. New York: Octagon Books.

Dann, O. 1988. Introduction.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O. Dann and J. 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Darnton, R. 1979.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 bourgeois puts his world in order: the city as a text. In his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The facts of literary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Ⅰ: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K.M. Baker, ed. Oxford: Pergamon Press.

Dawson, P. 1972. *Provincial Magistrate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France, 1789—17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wald, J. 1987. *Pont-St.-Pierre, 1398—178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ckson, P.G.M. 1987.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yle, W. 1980.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urand, Y. 1971. *Les fermiers-généraux au XVIII èm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Eisenstein, E. 1986. On revolution and the printed word. In *Revolution in History*, ed. R.Porter and M.T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sley, C. 1988. Nationalist rhetoric and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O.Dann and J.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Favier, R.1987. Un grand bourgeois à Gap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Pierre-Daniel Pinet. In Bourgeoisies de Province et Révolution, ed. M.Vovell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Ferrières, Marquis de. 1822. *Mémoires*, 2nd ed. Paris: Baudouin Frères.

Fitzsimmons, M. P. 1987. The Parisian Order of Barris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uret, F. 1978.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Paris: Gallimard. Translated as: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ret, F., and J.Ozouf. 1982. Reading and Writing: Literacy in France from Calvin to Jules Fer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ret, F., and D.Richet. 1970.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Gauthier, F. 1977. La voie paysanne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l'exemple picard. Paris: Maspero.

1988. Universal right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O.Dann and J.Dinwiddy. London: Hanbledon Press.

Gay, P. 1967.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2 vol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Gershoy, L. 1962. Bertrand Barère: Reluctant Terrori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dechot, J. 1956. La grande nation. Paris: Aubier.

1973. Nation, patrie, nationalisme et patriotism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Actes du colloque Patriotisme et nationalisme en Europe a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et de Napoléon.

1988. The new concept of the Nation and its diffusion in Europe.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O.Dann and J.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Goldstone, J. 1991.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man, G. 1971. *Jean-François Reubell*. The Hague: Nijhoff.

Hunt, L.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ulia, D. 1987. The two powers: chronicle of a disestablishmen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Ⅰ: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ed. K.M. Baker. Oxford: Pergamon Press.

Kagan, R.L. 1975. Law students and legal care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no.68.

Kates, G. 1985. The Cercle Social, the Girondi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M.L. 1982.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irst Ye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berger, C. 1984.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Kuscinski, A 1916. Dictionnaire des conventionnels.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Lamarque, P. 1981. Les francs-maçons aux états-généraux de 1789 e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EDIMAF.

La Tour du Pin, Madame de. 1985. Memoirs. London: Century.

Le Bihan, A 1973. *Francs-maçons et ateliers parisiens de la Grande Loge de France au XVIII e*

siécle. Paris: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Lefebvre, G. 1924.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on Française*. Lille: Librairie Papeterie.

1954. *Questions Agraires au Temps de la Terreur*. La Roche-sur Yon: Henri Potier.

1963.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3. 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Pantheon.

Lemay, E. 1977. La composi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les hommes de la continuité?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4.

Léon, P. 1970. L'élan industrial et commercial.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ed. F.Brandel and E.Labrous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ough, J.1960. *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Longman Group.

Lucas, C.1973.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60.

Lyons, M. 1977. M.-G.-A. Vadier (1736—1828): the formation of the Jacobin mentalit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0.

McManners, J.1969.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London: SPCK.

Malouet, P.V. 1874. *Mémoires*. Paris: Plon.

Mathias, P., and P.O'Brien. 1976. Taxat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 1715—181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Matrat, J. 1971. Robespierre, or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Paris: Hachette.

Matthews, G. 1958.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Morineau, M.1980. Budgets de l'état et gestation des finances royales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264.

O'Brien, P., and C. Keyder. 1978.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Ozouf, M. 1976.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9. Paris: Gallimard.

1987. Public opin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I: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ed. K.M.Baker. Oxford: Pergamon Press.

Palmer, R.R. 1941. Twelve Who Ruled: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During the Terro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vol. Ⅰ.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ity: Educa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trick, A. 1972. *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volution: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ocock, J.G.A. 1975.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ley, J. C. 1986.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che, D. 1978. *La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 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 1680—1789*, 2 vols. Paris: Mouton.

Rudé, G. 1959.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cott, S. F. 1978.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ligman, E.1913. *La justice en Franc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2 vols. Paris: Plon.

Sewell, W.H.Jr. 1985.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七章

四至六章的总结：阶级和国家的出现

许多人欢呼，称自177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是欧洲和美洲的革命时代。一些人把这等同于阶级和民主制——帕尔默(1959)称之为“民主革命时代”，另一些人把这等同于两个大陆上国家的兴起(Anderson，1983)。一些国家确实走向了国家主义和民主制，但是许多国家的革命并未成功，法国革命是不完全的革命，而美国革命只是概念模糊的革命。而且，这些事件促进了其他国家政府为避免革命而与新兴的阶级和国家妥协。它们的妥协证明在世界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以制度化的形式长久地固定下来。这一章概括了现代西方历史上的主要创造性阶段。四种最伟大的现代政权的定型——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代议制以及国家问题——一同被制度化。阶级和国家远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兴起的，而且由社会权力的所有四个来源所形成。尽管对立的部门和地方组织已经削弱，但是阶级和国家却幸存下来并完成了转型。

为了解释所有这些，我从这一时期的三种权力革命开始。首先，经济革命与其说依赖工业主义不如说依赖资本主义。只有在英国(欧洲的少数地区)确实发生了工业化，但是英国个别权力的改变，并不比其他地区更大。第四章显示了英国的工业主义是如何被已经制度化的商业资本主义所塑造的。这一时期工业化只是在英国极大地提高了集体和地缘政治的权力。其个别权力和影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小，在我的叙述中一般不指那些制造业资本家和工业。一个更加广泛弥散的农

业、前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产生了更加密集的组织网络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们与旧政权的对抗是这一时期国内主要权力之争。

第二，强化了的地缘政治军国主义，刺激了大规模政府的增长和现代化。在以前的几个世纪，和平时期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下，战争时期约达5%，到18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与和平时期相比上升到10%，战时上升到20%(在普鲁士是30%)，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一比例是30%—40%(见表11.3)。不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增长都用于武装力量。军事人力在整个中世纪翻了一番，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又翻一番，达到全部人口的5%(见表11.6)。这些强征大大高于任何现代西方政府，等同于1990年那些极端军事化的国家：在财政支出上等同于伊拉克，在人力上等同于以色列。如果我们考虑到伊拉克[1]和以色列如此繁重的军事义务形成的改变，我们便可以估计它们对18世纪欧洲的影响：政府对它们的臣民更加重要；政权孤注一掷的经济化和现代化；政治反抗深入到广泛的政治阶级斗争，取代了部门组织，深入到国家斗争，取代了地方组织。作为日益增长的国家军国主义的产物，代议制和国家问题提上了西方的议事日程。

第三，资本主义与国家政权的交织发展激起了意识形态权力领域内的革命，这场革命已经由教会开始。它们共同要求扩大并使话语能力(阅读和写作非公式化文本的能力)网发生转变，而后发展成为自主权力。教会领先的阶段之后，话语能力发展为两种方式。一种主要在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受商业资本主义的刺激；另一种主要受军事和政府行政增长的刺激，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占统治地位。法国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这些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能力路线是将阶级和民族发展为广泛政治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关于阶级和民族，我与其说是坚持“永久主义”或“对原始之尊奉”，不如说是坚持现代主义(这些区别来自关于国家主义的文学；见Smith, 1971; 1979, pp.1—14)。一个国家是确认其独特种族身份和历史、要求有自己的政府的跨阶级的共同体。各国倾向于认为自己对美德拥

有截然不同的主张，许多国家更前进了一步，进入与其他“劣等”国家不断的侵略冲突中。国家，不管是否具有挑衅性，只是兴起于 18 世纪的欧洲和美洲，在其他地区较晚——许多作者都同意这一论点(如 Kohn, 1944； Anderson, 1983； Gellner, 1983； Hroch, 1985； Chatterjee, 1986； Hobsbawm, 1990)。在那之前，统治阶级和极少数的附属阶级能够广泛地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因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与农民的大众文化相隔离，因而很少有政治单位是以文化分享而划定界限的，正如发生在国家内的一样(见本书第 1 卷第 527—530 页；Gellner, 1983, ch.1； Hall, 1965； Crone, 1989, ch.5)。与广泛和政治的统治阶级不相称的是排外的部门网络衰落了，其建筑基石是地区，而不是阶级。

这些广泛的主张需要限定，像我们在第一卷中看到的，阶级斗争在一些像古希腊或早期的罗马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中能得以发展，在其他地区如果宗教社区所占比重很大，也可能出现。正如史密斯所提到的，种族意识，即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身份和历史的意识(通常带神秘色彩)，在以前的历史上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如果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或政治的社区，那么一个弥散的民族意识就可能会出现(像包括所有三者的英格兰)。然而，这只是几个专门化的本体中的一个，受地区、宗教、团体和阶级身份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法国革命之前，“国家”一词通常意味着一个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亲戚群体。像“政治国家”这样的词，在 18 世纪英国出现，是指那些有选举权和官职担任权利的人(通过血缘和财产授予的)。“国家”主要是“横向的”(用史密斯的话)(限于统治阶级)。史密斯也确认了“纵向的”(比如跨阶级的)民族共同体，他认为这在农业社会中非常普遍，因而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永久主义”的理论(Armstrong, 1982,如是做的)。我在第一卷中通常反对这样的永久主义，实际上史密斯也同意，“国家主义，作为理论和运动，都是一个完全现代的现象”(1986：18， 76—79)。

但是，我承认国家有一些“前现代”的历史。我认为，在我所说的时期开始以前已经存在国家发展的两个“原国家”阶段。我称之为

宗教阶段和商业—国家主义阶段。继而我认为“漫长的19世纪”在两个进一步的阶段中——军事主义阶段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把原国家变为完全成熟的国家。在这一章中我将全面讨论军国主义阶段，把其分为两部分，即1792年以前和1792年以后进行彻底讨论。第四个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待以后章节讨论，其历史将在第二十章中作总结。

在始于16世纪的第一个阶段——宗教阶段，新教主义和天主教的反改革派创造了两种潜在的原国家。第一，基督教会将话语能力网络横向扩展，达到每一个主要的本国语言，并且(更多地)传到每一个中等阶级的人。尽管乔叟和他的同代人用三种语言写作(英语、盎格鲁—诺曼底法语和拉丁语)，但莎士比亚的作品只用了英语，英语到17世纪末成为写作中的标准形式。在许多国家，政府和教会的书使用本国语，以牺牲其他方言和语言为代价，从国内向国外逐步传播，因为这是上帝的语言。像威尔士和普罗旺斯的地方和边境语言留给了边境地区的下层人民。在胜利的本国语言大体与整个国家疆域相一致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在其有文化的臣民中增长了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不同的教会组织、不同的政府和区域的地方，它们的冲突可以达到一种更普遍的国家力量，正如宗教战争中它们做到的一样。然而两种归化的倾向很不稳定，因为大多数教会(整个天主教教会)是跨国界的，其政府、语言和教会边界只是有时相一致。

如果我们按目的论来看待西方历史，那么从现在到过去国家建立的这一宗教阶段看起来像给世界上大规模地强加上了意识形态力量。但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产生了初级的原国家。即使在政府、语言和教会比其他地区更加一致的英格兰，人的意识在17世纪或18世纪早期仍然有一定阶级限制，并被打上了新教及其派别的深刻烙印。对于要融合并加强这样一种原国家的特性的整个社会生活，政府的作用并不大。这一阶段最重要的遗产或许是我称之为“集中权力”的领域。教会早已深深植根于家庭生活圈和社区季节性的周期仪式中，尤其是在乡村。通过反复的文化灌输，教会开始把社会生活熟悉的道德领域与更广泛、

更世俗化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为最广泛的“家庭”单位最终会成为国家，所以我将描述这种动员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

约始于1700年的商业—国家主义的第二阶段，这种共同体的有限意识，进一步世俗化为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国家现代化，承袭了许多文化能力的扩展，它们都在不同的国家占主导地位。契约、政府记录、军队操练手册、咖啡屋的商业讨论、培养显要官员的学院——所有这些机构都世俗化，并把统治阶级的共同文化向下传播(像以前各章中详细列举的)。因为现有的国家都是法治的，一个基本的共享“公民权”已越过国家疆域向外弥散，共同宗教不定地弥散于更普遍的团结意识。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和教会的话语能力保持了某种超国家性，始终受到限制。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可以像产生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一样很容易地产生了西方世界，但仍然没有调动起社会。

这样的原国家转变为跨阶级的、与国家相关联并最终走向侵略的共同体，开始于这一章讲述的第三阶段。到1840年，所有的先进强国都已相当于准国家，但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英国本土和法国各民族加强了现存政府，它们是加强政府的民族典型；在普鲁士德国，民族比任何现存政府都大，并正从一种非政治角色变成创造国家(或泛国家)的角色。在奥地利的土地上，民族都比国家的界限小并且是颠覆国家的。为什么国家以这些不同的方式发展，我的答案集中在把第三阶段不断增长的军国主义插入不同的经济、意识和政治权力关系中。

有关阶级的主要戏剧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第六章中展示了这次革命并不是始于阶级斗争，但是在马克思的意识中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典型——广泛的、对称的政治斗争。然而它是这一时代唯一的此类事件，其主要效仿者是海地的黑人起义。在美洲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但那里的革命缺乏阶级基础和社会革命性。法国是唯一一个由于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他国家的革命受惠于法国军队的帮助，并在法军离开后衰落(相似的后果在1945年到1989年的东欧发生)。我分析了英国和美国较温和的改革结果，在以后章节中讨论更保

守的法国和奥地利，现在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旧政权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进行评价。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看起来在法国是可行的，为什么在别的地方就不可行？我认为如此多变的阶级和国家结果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我在四个阶段中对这种共同出现作出解释，首先集中于阶级，之后聚焦于国家。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如马克思所见，资本主义是革命性的，首先在农业和商业上，其后在工业上，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把它较自由的市场关系和绝对财产私有的生产关系更广泛地弥散到平民社会。资本主义同样有助于话语能力(“印刷资本主义”)及其共同思想意识要旨的更广泛传播。集体权力相当一致地发生了根本性巨变。任何政权如果不能适应掌握在新兴阶级手中的资本主义个体权力，那它就不能存活，它们的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包括代议制政治中的多数。我们太熟悉这些争论了，不必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马克思的另一观点，即认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带来了广泛的政治阶级冲突的意义上彻底变革了个体权力，这是错误的。在德国(后来在日本)，一定程度上在英国，这样的地主实际上在农业、商业，继而在工业中都成为资本家，没有经过社会剧变便改变了他们的权力基础。阶级的紧张关系仍未浮出水面，有时发生分裂，但总是地方性的，且无关乎政治。即使是在地主唾弃资本主义的地区，冲突仍保持惊人的静态。在18世纪的法国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和俄国，资本家从属于旧贵族，但是在部门组织内是对操纵和服从而不是对阶级敌视作出反应。确实，他们与旧政权妥协部分是因为双方都惧怕下层的“人民”和“平民”。但是在1848年这已不是首要的原因。缺少这种恐惧和广泛的“秩序党”使得法国革

命成为可能，由于没有自己的广泛组织，资产阶级便利用旧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把自己的经济实践和子女放入旧政权中，购买官职任命权、官职、头衔和贵族姻亲伙伴。他们不是为了地位而牺牲财富，而是打入政权内部以确保政府职位的收益，并确保特权以对抗不稳定的市场。

我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需要财产私有和市场竞争，它在法院和市场之外很少有延伸的组织，且并不倾向于彻底变革，而是去适应其他的个体权力组织。如果说，种族的差别被制度化为隔离政策，或者如果父权制已制度化，那么资本家就把它们置入市场预测中。或者说，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根据种族消费和性别平等来分析。他们的统治可能加强旧政权、种族隔离和父权制，但是资本家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那些个体权力组织开始分裂，那么资本家就会改变他们的控制策略，以便没有他们也能获利。资本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体权力关系的强有力的改革者——也不是任何经济生产力模式。

这一时期任何地方的富有资产阶级都不想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旧政权的阶级斗争中与小资产阶级并肩作战。在马克思的阶级意识中，联合了“大”、“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重要的权力运作者——在它本应该是特定阶段。尽管一些富有资产阶级谴责封建主义，但他们是与现代化的旧政权派系结盟，而不是与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除非非经济权力关系的干预，后面详述)。这不是阶级意识的失败，而是阶级组织的失败。资本家收买宫廷和议会的影响以赢得商业垄断和特权，获得税收农场和政府官职，利用联姻进入庇护—依附网等，从而融入了旧政权的经济政治中。确实，这种“腐败的”操作逐渐衰落，但更多的是来自旧政权中“现代化者成为资本家”的压力而不是来自独立资产阶级的压力。新的制造业资本主义建立在由弥散的市场联系起来的过剩小企业主的基础之上。制造业资产阶级缺少权威性的组织。资产阶级只是一个“潜在阶级”，那些或许属于它的人不需要只

靠阶级或自己的政府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小资产阶级资本家显出更多的阶级特征和组织，正如麦肯德里克、布鲁尔和普拉姆关于英国，索布尔关于法国，纳什关于美洲殖民地的研究，小店主、贸易商和工匠对腐败又寄生主义的旧政权经济是如何控制他们的劳动力和把产品售与特权阶级的市场这一问题十分不解。在危机中这种生产连同市场的阶级身份和地位意识，可能爆发为对“旧腐败”和“贵族统治阴谋”的政治谴责。但是，直接经济剥削的观念更多地是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生产关系发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起义，尤其是在下层平民支持下的起义，往往以粮食暴动开始。这些都是以市场为中心，通过小资产阶级对当地社区的强烈渗透而得到动员，并且通过广播小册子或其他印刷材料而得到话语交流网络的支持。包括家庭、女人与男人，更多地是通过街道和邻居而不是通过工作进行组织。温馨家庭和广泛政治的结合(在反强制征兵的暴动中也很明显)给这样的运动以相当大的道德动力。

但这些阶级暴动的目标有限：表现为对旧政权的不满和寻求实际让步，而不是寻找代议制的新结构，仍然仅仅具有很小的革命性。尽管首都的暴动或许直接指向中央政府，但这些暴动都是在当地组织起来的，如果政府分配粮食或制定粮食价格，则暴动更具政治性。粮食暴动或许会造成旧政权的忧虑或不稳，但它们不构成资产阶级组织，如果使其政治化，则多在以话语能力的传媒为中心的阶级权力组织的控制之下(后来再讨论)。然而，随着这促进了广泛的政治保护，它同样控制了道德的凶残，降低了激情，并特别是通过把妇女排除在外，而使其基础变得狭窄(在第十五和十七章中进一步讨论)。

因此，把生产力和市场的经济组织结合起来，可以解释潜在的阶级冲突加之激烈的地方抗议，能够导致政府的让步。但它不能解释广泛而仍不太政治化阶级或体制上的民主改革或革命。小资产阶级在弥散的市场内活动，市场一般的参量由他们的上司们设定，政府只是提供有限的协助。他们偶尔展现的愤恨是所有进一步阶级冲突的必需条件，

但它不是直接“单纯”地产生这一时期广泛的政治阶级冲突。因为政府不是经济生活的中心，资产阶级革命有助于向大众“国家”推进。小资产阶级中的不满分子确实为反对旧政权、争取公民权而斗争；他们的斗争也确实产生了“民族”觉悟。但由于军国主义和思想意识的干预，他们卷入了行动当中。

1792 年前的军国主义

为什么一个阶级组织可以是广泛政治性的？马克思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阶级组织直接出现于生产关系中。但他错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资产阶级更愿意选择部门组织而非阶级组织，后面各章中揭示了更多的无产阶级组织经常性地与部门或地方组织竞争。然而，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惊奇，阶级政治组织同样有特定的政治事业，其中涉及政府制度的特性。

这些制度特性现在集中于政府的军国主义。我首先讨论 1792 年前的子阶段，即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前的阶段。梯利(1975, 1990)和我(在第 1 卷)已证明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斗争都是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危机所造成的。同样，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只有在列强争夺对人力和财政需求的压力下，政府通过正常途径不能达到目的而寻求强征新税、贷款和强征兵役时，小资产阶级才会广泛地为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随着政府榨取的增加和更具侵略性，社会的紧张局势被迫转向“国家”的政治水平。不满集中于政府的花费(税收和征兵)和好处(可获利的政府任职、经济垄断、债券持有人以及税收和强制征兵的豁免权)。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市场关系，而是这些构成了这一时期最有争议的政治经济。让我把一个观点彻底讲清：我不能断言这些不满比反对直接经济剥削的不满更甚，实际上，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这些人肯定是较少的。但是我可以断言，这样的不满经常能激起“政治”

行动。

军国主义也激励君主制政府精英，使行政机构合理化，打击花费过大的排他主义特权，而这一特权阶层到目前为止是支持他们的。这样，政治斗争便开始于旧政权内部半原则性的精英与党派冲突。进一步的财政和强制征兵的痛楚以及以政权派系斗争为表征的机会，迫使更广泛的纳税阶层走出了漠视政治的传统，开始质问政府的合法性。如果政府机构不能解决精英党派之间的斗争，那么扩大政权现代化者的两项要求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组织便会出现。他们要求自由反抗政治经济的公民权，当抗议失效时，他们就要求拥有政治公民权。

只是这一途径可能会潜在地导致革命，因为只有它可以动员起民众——城市和乡村的劳工和小农——在有产者人民的要求背后。如果没有平民的支持，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1789 年法国农民起义迫使政权现代化者向左转，进行了结构改革，城市无套裤汉继续了这种压力；美国的城市平民和小农场主为赢得战争提供了军队和供应，并迫使起义的贵族在 18 世纪 80 年代左转。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政治经济——税收、掌握国债和经济的特权、债务法和由政府控制的垄断与价格。小资产阶级、农民，有时还有城市贫民的阶级联盟，因政府制度的特性而具有政治性。

财政危机有两个因素。第一，苛捐杂税的增长率足以引起不满。但是特定的增长率不能产生相同的政治反应。英国是税收最高的国家，普鲁士是征兵役最甚的国家，继而是法国和奥地利，美洲殖民地是税收和兵役最轻的国度。这种以强征为依据的排列与政治愤怒的程度无关。税收率是这一时期革命和暴动的蹩脚的预言者，因为大多数税率都相当稳定。主要的花费增长依靠贷款支撑。

第二，政府将精英党派冲突制度化的程度也能解释危机的严重性。在表 4.1 中表述的区别中，英国和普鲁士的政权有政府精英和统治阶级党派的集中机构协调，可以操纵这些机构的更高总收入，减少旧政权党派的争吵。在英国，议会继续投票征税，银行继续增加贷款——两者

互相偿还。关于两者的谈判已经制度化，终极的统治权在议会，在那里政府精英的“当权派”和“在野派”之间相互作用。在普鲁士，统治权在国王和贵族的关系中，在政府行政机构中以不同的水平制度化。他们一致同意从剩余的人中征税。国王也可以在自己领土的制度化管理中抽取一定的资财。

但是，在法国和北美殖民地中，假定的主权国家机构很少被融入地方贵族中。强征适度(法国)甚至是轻微增长(美国)的税收努力从外面打击了政党，从而结束了其特权，或是从它们身上强征新的税收。奥地利处于中间地位。尽管其中央政府微弱地融入地方贵族中，但是它与地方贵族有制度化的排他性协议，据此战时税收和兵役可以增加，虽然增加不多。

当大规模采用贷款方法时便产生了独特的等量问题。因为富有的债券持有人由纳税者偿债，因而贷款是税率递减的。这种形势比战争本身更加持久，并且难以使其合法化。英国和法国比其他国家借债更多，因而在这方面产生更多的和平时期的不满情绪。

这样，强征暴敛的危机在各国政府间是各不相同的。普鲁士的强征由现在的财政机构掌握。在各国中，普鲁士有稳定的教会，宗教削弱了不满的道德基础。抗议主要在政府内部以行政改革运动的形式和两个新教教会最终融成单一的政府教会来表达。这保卫了进入行政机构的新规则(同样进入地方的代议制会议)，融合了政府精英和有产阶级党派，并把它们的政治和道德与广泛的阶级不满隔离开来。因为普鲁士政府借款很少，所以纳税者没有反对债券持有人。在英国，实际的强征由政府精英和执政党掌控，但是税率递减的借贷和间接税收在“在野党”和“被排除在外”的党派中产生了不满，这些不满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正在出现的、有集体组织能力的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以“新教法规”为意识基础，由每日的宗教仪式在道德上加以强化。但是，这些党派的阶级组织从未成为自主性的，而且在与由旧政权的现代化者和被排除在外的下层平民组成的在野党、甚至是执政党的联盟之间保持

着分裂状态，其宗教组织也产生了模糊的道德信息。民主改革经常是产生骚乱而不是产生革命。

奥地利的强征暴敛最终超出了已经制度化的地方安排的能力，危机看起来像多元的地方斗争，而不是单一集中的斗争，不满更多地是以地区、民族而不是以阶级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久我们就将看到)。但是在北美殖民地和法国，以低层教会不满(法国)和新教徒阶层(北美殖民地)为道德基础反对非制度化、不合法的财政掠夺和改革，使得旧政府开始分裂。被排除在政府外的小资产阶级和农场主出现了，他们起初受旧政权现代化者的鼓舞，后来具有了自主性。

如果没有财政军事危机，政府和“国家”政治就不足以突出大众经验，以激起代议制方面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性事件，资本家将逐步把自己融入旧政权经济中，削弱自主性的阶级组织。大多数人将宁愿继续忽视政府。现在，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被政府的财政掠夺“囚禁起来”，被其政治化和“自然化”。

就像在许多比较客观的社会学中一样，只有很少事例作为概括总结的基础。然而，20世纪早期类似的变动给我以鼓励。到那时这些财政军事压力已不再是阶级政治化的主要途径了。但是，随着军事地缘政治的逻辑把政府的掠夺转向大规模的人力动员，另一条类似的途径发展起来。在一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由无产阶级鼓动的革命的程度直接随着政府在大规模动员战争中垮台的严重程度而变化。在西方历史的这两个主要革命阶段之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也产生于类似的压力。除1830年法国和低地国家的革命以及1848[2]年一些失败的革命外，所有的西方革命都有类似的触发途径：军事地缘政治把阶级压力——首先是财力，继而是人力——加到了政府机构中，考虑到历史难以预测的行为和独一无二的情况，这种关系与我们在宏观社会学中发现的情况是一致的。

许多相同的过程也推动超过原国家水平，进入跨阶级的自身意识中。那些有能力抵抗政府掠夺的人是富有者，但是他们的数量现在超

过了传统排他主义的部门政治的容量，这种政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们的要求给予快速反应。他们转向了称之为“国民”或“民族”的普遍联合。如果像普鲁士一样避免了财政危机，这些情形就不会出现。在像英国一样发生财政妥协的地区，他们激进的含义就会削弱。但是在美国甚至更多地在法国，财政危机会使“国民”和“民族”政治化。在英国和法国，民族都是这样在加强国家的。“民族”一词的含义从血缘拓宽到公民权。但它保留了家庭的比例——国家成为所有人的“王国”和“父母”，是一个血缘家庭与另一个血缘家庭的联合。国王、贵族和神职人员不再象征门第家庭，在法国革命中他们正式被排除在市民家庭之外。神父沃尔菲尤斯宣称：“真正的‘祖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中所有公民由同样的法律保护，因相同利益结合起来，享有人类的自然权利并参与他们共同的事业。”(Kohn, 1967, p.43)

财政危机向被称为“新兴的阶级国家”的方向发展。自觉的国家由此产生了争取代议制政府的必不可少的斗争。无论后来在国家的名义下出现了多么残暴的行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它的产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那些民主理想，而那些理想在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

然而，国家的黑暗面也明确地展现出来，因为民主理想产生于战争。如果没有征兵、战争税收和递减的战争贷款的压力，人民将仍保持对政治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政府。现如今一个有限的民族部分地控制着国家，而国家的主要功能却是制造战争，因而国家有点侵略性。对外政策不会保持如此的节制，它是国王私下制定的。18世纪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斗争，虽然因政府的掠夺产生了普遍对战争的反对，但也受到了政府外的压力集团和爱国示威游行的支持。话语能力网产生了本国美德和敌国道德败坏的成见(如 Newman 和 Colley 所指出的，参阅第四章)。国家有私人个体的特性，被人爱也被人恨。侵略性的国家主义即使在这些国家中到1792年走得还不远，但是它已经出现了。

1792年以前的军国主义阶段部分同样开始产生一种主要的持久的复杂情况。寻求政治公民权的努力产生了代议制和“国家”问题，使

国家分成加强型政府和颠覆型政府两种类型。英国本土和法国是前者的代表，奥地利是后者的实例。奥地利的财政危机较独特，不是在规模上，而是在其组织后果上出现了危机。多数军事开支取自于税收，以所谓的历史行省的“军事特别税”而著称。其余的部分由借贷而来(Dickson, 1987)。但是特别税的方案(通常取决于可以组织的军队数量)证明不充分的君主制信用很差(它宣布1811年破产)。高额强征税收必须与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协商。这样，奥地利的持不同政见者便按地区组织起来。

“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出自在地方集会和行政机构中确立地位的贵族。实际上，在18世纪80年代，约瑟夫二世已经激起了欧洲最初的两次“爱国”运动——一次在经济最发达的省区，即奥地利的尼德兰，另一次在一个最落后的地区，即匈牙利。它们都是强有力的地方政治组织，在尼德兰是所有富有阶层，在匈牙利是受限制的贵族阶层。到当时为止，只有所谓的历史国家(如政治自主权)才组织了那些持异议者。第一个颠覆型的政府将从如此多样的地区运作者中出现。

自觉国家出现的这一早期军国主义阶级建立在两个原国家阶段之上。例如，奥地利的地方运动并不是产生于乌有的——他们在古马扎尔人、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相似的贵族及教会(以及奥地利尼德兰的市民和富有农民、其他各地的中等阶层)中产生共鸣。但是这一时期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我抛弃安东尼·史密斯的国家主义理论)，存在跨阶级阵线的包括不同层次人们的国家指数增长。跨阶级国家与其说是被其资本主义的形式所推动，不如说是被政府军事推动而前进的，因为财政军事压力比商业、工业资本主义更直接、更一致地给政府以迎头痛击，国家以地方政治机构的形式出现于所有地区，而不单出现于经济更先进的地区。国家以不同的外貌出现，因为政府机构不同：英国是加强型政府，奥地利是颠覆型政府。但是正在出现的国家与阶级有更多的共同特征，它们动员起异常强烈的思想意识，因为这对1792年以后的军国主义产生相当的影响，我暂时停下来讨论一下意识权力。

意识形态的力量

小资产阶级和"国民"虽然因军国主义的财政和兵役强征的后果而愤怒，但他们仍需进一步组织的方法。为了作为一个阶级或国家获得斗争的胜利，他们需要一个体现终极价值、规范、仪式和美学实践的有意义的体制。它要求具有双层意义的意识形态内在的集体精神和先验的启示，以在自己的集体身份上赋予道德，否认对手的道德，使斗争整体化，并想象另外一个值得以斗争去争取实现的社会。实际上，阶级特别是国家的道德力量已十分明显。社会的"利益驱动"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像阶级和国家这样的具体组织的成员能被强烈的集体情感所推动，打破酷刑、谋杀和种族灭绝的禁忌，在街垒和壕沟中牺牲自己的生命。唯一解释民族主义情感力量的重要努力来自"对原始的尊奉"和"永久主义"学派——民族主义如此强有力，因为它非常古老，并已深深地扎下根(Armstrong, 1982; Smith, 1986)。但我不相信其正确性。

我认为我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我说"更好一点"，是因为一个全面的解释需要比我这里能做的对社会生活的内部领域进行更严格的分析。我们在这一章中看到，当阶级和国家可以动员更集中的成员网时，他们已经拥有了更多的道德热情和更多的激情。我将考察，当无产阶级的根基由家庭和地方社区转移到雇佣关系时其热情的衰退。在这一早期阶段，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并将在第十五章中再次看到)，当剥削来自家庭，当它与男人和女人都有关，当其组织是街道、村落和住宅区时，下层和中等阶级的抗议会更激情奔放。抗议会更有激情，是因为不公平的粮价、销售和土地税以及征兵，这些不仅直接与自身而且与亲密的所爱之人都有很大关系。家庭是主要的道德和情感媒介，因为它是社会交际的场所，包括爱和恨的体验和社会的沟通。民族主义也在各处产

生了一个虚构的家庭：国家被错误地假设为一个血统共同体，也是我们象征性的因果和父亲。我认为，民族主义的道德激情来自它连接家庭、地方社区和广泛的民族地域的能力。

集中的家庭和社区组织可以产生强烈的感情。或许会冒有起义或暴动的危险，但是不会产生整个阶级和国家的广泛团结一致。这种强烈的思想须通过更广泛的权力组织动员起来。这就是国家的前两个原国家阶段被证明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教会在家庭、邻区和广泛权力的活动场所中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联系。它们长期垄断传统的社会道德，它们的仪式集中在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舞台(洗礼、婚礼、丧礼)；"阶级"和地区的不满通过宗教异端，通过从阿尔比派教徒到英国内战的分裂动员表达出来。近来，教会通过组织大众识字成为社会有用知识的主要教师。这种传播还是道德上的，因为其主要工具书仍是圣经、说教和布道。

教会的僧侣统治集团与旧政权联系过于密切，不能直接鼓励阶级和国家的特征，但是从亨利八世到拿破仑政权却没收了教会财产并用君权法则代替教会法则。现在它们也侵占了教会的教育。最广泛的原国家权力关系被世俗化。在政府中有影响的教士逐渐被自己下属的神职人员和教区居民看作是世俗和不道德的。18 世纪的宗教改革者和持异议的教派通常对教会教父的转变不感兴趣，他们比前人更关心当地的社会进步(詹森主义是一个例外)。大觉醒运动、卫理公会、敌对的法国乡村的教区牧师——他们都把道德说教与民众社会实践联在一起，同时履行宗教仪式，这使他们植根于家庭和社区生活。宗教开始向地方权力关系撤退——我将在以后各章节中讲述——但是它却在家庭、地方和更广泛的权力关系中留下了道德交流的伟大遗产。

在第二个原国家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政府取代了教会而成为集中和最广泛权力之间的主要信息传播者。但是二者却没有适合此项任务的自身的权威组织。商业资本主义只是提供了被弥散的不道德市场联系起来的微小生产组织。军事政府不断增长的权威组织被认为是

剥削的和不道德的。因而资本主义和政府主要是通过它们创立的不断扩大的话语网络而不太直接地动员起来，书写、阅读和口头集会网络成为集中、广泛、世俗的手段和神圣道德之间的主要联系；因为教会和宗教狂热仍有影响，所以在这些网络中仍存在宗教和世俗道德的思想竞争。产生了一个善于辩论的知识阶层，为阶级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权力的来源。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思想不如科学原则先进，但他们具有惊人的道德说教能力。

前面的章节中表明了大多数新兴阶级和国家运动的思想意识及其领袖都是来自外围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来自小资产阶级成为激进派的地区。我已评论了激进派的社会背景。他们是下列职业的典型代表，是18世纪80年代被布鲁塞尔警察围捕的翁基斯特基层组织(在奥地利尼德兰地区的激进爱国者)的成员：八个律师、四个医生或药剂师、三个商人、三个靠租税生活者、三个假发制造者、三个咖啡店主、两个印刷工以及三个牧师(Palmer, 1959, Ⅰ, p.353)。只有商人和食利者看起来是主要社会阶级的心脏，他们在资产阶级和旧政权之间平分。这真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吗？其他的爱国者至少是半职业化的思想家。他们的工作以话语能力和博学多识为前提条件；他们的财产对通讯网至关重要。假发制造者(在几个国家中都是活跃的激进分子)使我非常迷惑，直到我认识到他们的店铺(像咖啡店和小酒店一样)里有杂志和小册子，供顾客在假发修整的漫长过程中阅读和讨论。第五章和第六章表明了法国和美国的革命的领袖都有很好的教养。许多法国革命者曾经写过非政治性的散文和文学著作。许多政治组织也有“文化”——小册子、请愿书、相似的协会、革命者的演说策略等等。这些激进派看起来不如知识界那么资产阶级化，这种知识界在独特的阶层意义上是动员起来的知识分子。

一个思想先驱引导资产阶级和一些国家，这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方案。要按工人阶级去解释列宁的思想(第十八章中讲述)：由于听任自己，资产阶级只能运用经济主义——18世纪部门控制的顺从。列宁

说，革命意识以超阶级的、先驱知识分子的领导为前提条件。他没有解释这种知识分子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者卢西恩·戈德曼(1964)试图努力做到这一点。尽管生产模式之间的矛盾存于社会危机之下，戈德曼认为生产模式是通过知识分子而不是通过上升的阶级而最清晰表达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公开的立场和职业思想作用而具有“最大限度可能的觉悟”。但是他说，新兴阶级盗用了他们的思想之后便把他们抛弃了。这一论证需要扩大，因为矛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一个思想先驱可能最清晰地表达这种体验和对其他权力运作者的需求(经济、军事和政治)，但是其思想意识继而又被他们占有。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自主权力是先驱者的成就：其思想和方法是从自己的话语网内部而不是从阶级和政府的矛盾中被清晰表达并强迫接受的。

我在讨论法国革命中把两种相对的论证作了最全面的分析。两者都有某些动力，因国家而异。思想家的口号和原则被政治、军事和政治运作者采纳为解决真正问题的最佳方法。但是思想意识的来源也包括两个由扩大的话语能力网带来的新兴力量：

1. 思想家的原则是“过渡性的”，它违反了旧政权本质上的特点和部门。知识是普遍的，相同的原则能适用于人类所有的哲学、道德、伦理、科学、社会学及政治体验。话语网传播的不仅仅是理性的重建，而且还是道德的重建。旧政权意识到了危险，开始审查、特批及保护，以寻求使每个基础结构都与这些原则绝缘从而阻止过渡。如果律师把自己限制在法院中，如果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读写能力意味着更好的账目和契约，如果教会教育增加了教义的阅读，如果报纸张贴轮船到达时刻表和政府公报，那么旧政权也许会安全地实现现代化。特殊的庇护腐败和强制可以使每一个部门的行政机构井然有序。但是隔离没有成功。18世纪的机构包含了三种过渡状态。

(1) 专门化的学问成为博学多才者道德化了的知识。教义和布道关乎广泛的社会道德，而不仅仅是教理。教义、布道、小说、社会散文，以及关于各种各样事情的小册子——都十分畅销，意义和社会道德的问

题交织在神学、哲学、第一首被改编为本地方言的诗歌以及像《坎迪德》那样大量发行的讽刺小说中，被新奇的印刷术所印刷复制。法律培训与绅士的仁慈教育交织在一起，法律观念成为普遍权利。报纸对一切都讨论并做广告。

(2) 话语能力通过旧政权向下传播：政权现代化者在宫廷、法院、议会、政府行政机构、学院和沙龙、军官团体以及教会与保守派的争论中表达了改革的思想。如果他们的派系争论不能被制度化，他们就会要求下层的支持。宗教场所、咖啡屋、小酒店、一些学院以及销售为五千份的报纸和小册子动员了中层农场主、工匠、贸易商、学校教师、牧师、官员、军官和妇女。

(3) 话语能力网用相对的参照点把社会实践看作参照物。宗教网尤其是新教和清教网劝诫其成员要像早期基督教团体一样过朴素的生活。与欧洲，与它的殖民地以及与欧洲和其他文化的接触相比，世俗的启蒙运动实践了文化人类学。据推测，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波斯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甚至是休伦族的印第安人(伏尔泰的《天真少女》)的行为都被认为与我们应如何举止密切相关。实际上，这些一般看来真实的描述是道德和政治的宣传册子，休伦人并不如此真诚，如此天性正直。伏尔泰的观点是，我们应该谴责奢侈、欺骗和腐败。这样，话语网讨论了本迪克斯(1978)所称的可选的“参照社会”。美国和法国革命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两种有吸引力或无吸引力的参照社会(依个人观点而定)。

然而，过渡性在意识形态基础之间是根据财政军事危机的强度而变化的。虽然有政治影响，但是宗教机构的过渡性因缺少明确的阶级或国家政治而停止了。法国天主教会的识字运动、北美殖民地的大觉醒运动，以及英国卫理公会的发展都绝对使学校民主地赋予个人以基本知识，赋予进步的家庭和地方社区以基本道德并使旧政权统治阶层世俗化。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对中等教育和家庭法规的侵犯以及没收教会财产，都同样会使其等级世俗化。天主教会发展成地方权力网的跨国

同盟，深深植根于家庭和社区生活，控制了家庭生活仪式和农村社区的季节仪式，并控制了大部分初等教育。新教少数派教会也大都做了相似的事情，尽管已建立的新教教会仍保持着更大的中央集权制。这样，民众的思想意识比启蒙知识分子的意识更容易受宗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能不仅仅加强了旧政权。

奥地利和普鲁士国家主义的基础，产生了官方经济学派和启蒙专制主义的思想意识，抨击教会贵族统治集团和特权行会的排他主义，但是受专制主义的限制。知识界有时推动激进的改革运动，但很少把它们宣传为潜在的阶级运动。它们没有发展成为普遍性和全国性的运动，因而主张国家主义的过渡性是有限的。

国家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路线贯穿于法律职业中，从王权统治下出现的法律实践日益与公民契约有关，煽动性的语言概括了这一点。权利和自由很少存在于社团和社区排他主义的习惯中，而更多地存在于财产和人身的普遍权利中。尽管吸收了奥地利尤其是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但在英国改革和法国革命的早期阶段以及在美国革命中，律师在现代化改革中仍举足轻重。在实践中，美、英、法的律师感到了新旧生产方式与政府政权之间的冲突(尽管他们很少这样表达)。他们表达了一种“半意识形态”——一半反对，一半有原则性的思想。但是当政权学会了对付资本主义时，他们便把这融进了政府机构的实践中，如美国最高法院、拿破仑的《民法典》，以及普鲁士的“法治国家”。到19世纪40年代，法律丧失了其不稳定的半意识形态作用，支持了新政权。

商业资本主义是其他话语能力机构——如讨论(学院、阅览界、小酒馆、咖啡屋)、报纸、小册子、杂志和文化媒介网的主要生产者。在英国，特别是被宗教道德化加强时，它们宣扬阶级的改良主义和进步，即一种个人成就和社会及政治改革的真实方案。在整个西方大陆，在欧洲商业资本主义与军事集权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启蒙运动方案便会适当地出现，这是比喻向一个更好的社会形式转变是正确的斗争。其

格言是知识的过渡性，康德的“敢于明智”和伏尔泰的“粉碎丑恶”(指迷信)。它总结了比较政治社会学和伦理学，鼓励这种培养道德的理性向下传播。它不带有明确的阶级主题，其激进主义受国家主义的限制，但是财政危机激化到超出了精英集团和党派政治的国家制度化的控制，像法国，启蒙运动便大量产生了由职业化知识界所主张的可选择的原则性思想。

话语能力首先产生于教会，继而产生于政府和资本主义，但是它发展了一种新兴的权力过渡。如果没有这种权力过渡，现代化过程中的教会经济、军事政府将保持分离状态并彼此隔绝。抱怨经济特权的资产阶级可能认为除了服从控制外别无选择，自由贵族可能从提高他们的地位的要求中退却，正探索中的神职人员可能采纳詹森主义的退却和调和。记住韦德耶，他是小城镇著名的不满分子，是律师和“战士”，阅读了启蒙运动的文章并转向政治活动，最终成为革命的首脑。转变成为潜在的思想武器。思想家可能找到联盟来智取旧政权，使它们的排他主义腐败处于道德原则的影响之下，动员民主情感，并使神圣的传统相对化。

新兴的阶级和国家实际上是不相干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包括小零售商、店主、小贸易商及中间人、少量的专业人员、小制造业主、工匠、手工业业主，他们的生产关系五花八门，并有地方性。多数是雇用少量劳动力的独立小企业主，但还有许多受雇的专业人员(教师、记者、律师、官员、小册子撰写者)以及受雇于其他工匠的工匠。只有有限的阶级身份，地方部门身份来自这种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更多的阶级身份从财政危机中产生。但是意识机构的过渡鼓舞了制度冲突的道德和原则观念，这种冲突存在于新旧社会之间，存在于封建制度的排他主义、依赖、世故、懒散、腐败与勤奋阶级和民族的坚定独立、诚实和辛勤劳作之间。同代人经常把资产阶级多元化为勤奋阶级或中等阶级，但是新兴阶级与财政危机及意识机构交织在一起，有时能将他们造就为一个团体、一个阶级和一个国家。

阶级，即使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也不“纯粹”。这一时期的阶级运作者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由附加的意识、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交织创造的，这种交织处于阶级、财政军事危机和意识形态原则之间的某种“三角状态”，思想家帮助把普通家庭完全不同的经验合为一个协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新旧形式的斗争通过意识而非经济组织联系起来，最初出现意识权力的自主性超出了戈德曼的“最大限度可能意识”的简化论概念。知识界不仅仅帮助现存的阶级和国家发展内在的道德，它同样帮助设想并且因而创建那种阶级和国家。

2. 只有在少见的革命危机中当实用政治失败时，第二个新兴意识形态力量即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行为之上的思想先驱才会出现。思想家在高等原则性知识和道德方面信心十足，道德、科学和历史是他们的专长，他们藐视实用主义者和趋炎附势者。实干政治家知道，不是原则，而是妥协、腐败和强制统治着世界。但是当财政军事危机恶化而旧政权又拒绝让步时，他们的实效制度化已黔驴技穷了，逐渐上升为依靠原则及其使用者。做到这一步，通过宣布废除特权，号召武装国民和废除宗教迷信。确实，巴纳夫、布里索、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煽动性语言经常是有计划的，但是随着实用政治被搁置，他们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力量，即通过援引原则和情感促使人们进行实现自我行为的能力，而这些原则和情感则由危机产生的书写和文字机构源源流出。

暴民、小册子、写作和修饰的经典规则在法国革命集会中一起出现，其形式是在强烈感情中相互作用的演讲、运动和观众。这里，原则的宣布达到了一种感情的、仪式的及伦理的满足，这在非革命形式下会被嘲笑。但即使在法国它走得也太远了。因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对“美德”和“纯洁”的追求越来越过分，这加速了他们的毁灭。因为经常反对注重实效的妥协，他们被怀疑阴谋独裁，但是当热月党人发动反对他们的政变时，他们始终是顺从的。这令人惊奇。

这样，在法国，偶尔在美国，意识形态力量第二次表现为以自我实现原则感动人民的能力。思想家控制并在道德上迫其追随者勇敢宣

布，义无反顾地步其后尘，因为撤退是困难的。一旦特权被宣布废止，革命中的政治家就没有人会支持它。注重实效的政治家只会在细节上有所退缩，但不会在废止原则上有相反的改动。法国永久地改变了。一旦贵族或富有的邻人被宣布为国家或革命事业的叛徒，他们就会被拖进死囚押送车，被没收财产，从而削弱了部门服从网络。路易被国民议会宣布为国家的叛徒而被处死，这样就把整个欧洲分化为两个武装阵营。国家宣布武装起来，结果全球都武装了起来。宪法也被制定出来，体现了最伟大的原则即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美国的宪法仍然限制了实用政治。19世纪法国的阶级斗争变成了与各种宪法进行的竞争。

这些"时刻"，意识形态权力精英达成了原则性的公报，公报部分地来自先前的话语能力网的经验。美国人转向了法律和新教原则，法国人转向了道德的启蒙运动原则。当然，对"不言而喻"的权利，对没有特权的民族平等，对武装起来的国民等还有一种实质和经济政治上的满足。它们是作为终结了不满的纳税者阶级而产生的。但是，这种终结是在思想先驱的写作、演讲与民众集会、小册子和群众口号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在这种书写和文字交流的能动的相互作用下，思想家偶然发现并利用了简单的方案和大众的感情，为完成意识原则配备了权力技巧，他们发现了权力组织的"超验"原则。

自然，革命者要依靠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组织来使他们的统治制度化。但他们的思想改变了这些。法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美国把经济和政治权力融入了动员阶级和国家的更活跃的公民权，特别是在军队中，这像在一般的现代革命中一样。这种国家政府动员了可能比旧政权更大的集体权力。旧政权不得不在自卫中进行改革。意识形态权力只能影响革命的转折，但这些转折证明了世界历史的转折。

然而中欧发展了更保守的思想，更多地通过国家主义的渠道弥散了。传统上贯穿于北德意志加强型政府的路德教派证实了这一点，大多数教会更难与政府合作，开始从底层分裂。行政部门、教会学校、

军队和主要城市比商业资本主义的增长更快。话语能力在旧政权的委托人中兴旺发展，但在小资产阶级中很少。尽管稳步增长，但德意志人的识字率只有25%左右。学院、俱乐部和报纸被官员、教师和神职人员所控制(Blanning, 1974)。激进思想只适合于雇员和专制政体的仆从，尽管许多人指的是教育和特权间的冲突和互换地称自己为中产阶级或“受教育阶层”(Segeburg, 1988, pp.139—142)。财政不满在大多数德意志政府中并不多(除奥地利外)，因为它们的财政更多地是从君主特权的王室土地中抽取(见第十一章)。因此，像所有地方因财政和征兵问题而引发的政治改革家那样，德国政治改革家的愤怒之火不如其他地方的改革家那么大。

此外，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话语能力网在中欧国家超出了政府的控制。与英法不同，国界和语言区域在有产阶层中并不是大体上一致的。奥地利国家比任何语言区域都大。德意志国家要小得多。奥地利通行着9种以上的主要语言，外加许多小语种。德意志在1789年有超过300个国家，加之1500个小公国，到1815年还剩39个国家。双方都包括至少两个主要的宗教团体：新教和天主教(奥地利还有东正教会)。因此在奥地利(起初)和德意志，话语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非政治的，不是肯定或否定地针对政府，经常被描述为在小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少世界性，而是更狭窄的“文化上的”民族骚乱。这与英法不同。

在德意志和中欧的浪漫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情感和精神多于理性和政治。席勒把德意志的“伟大”定义为与其说来自于政治，不如说来自于“精神世界的探索”。缺少一个使知识分子能自由地创造一个“世界精神”的中央政府：是教育(正式教育和道德培养的结合)而不是地缘政治将获胜。对奥尔德林来说，“德意志的精神”将引导“人民和君主”，德意志将掌握意识权力而不是军事或政治权力，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理想。席勒和歌德共同写道：“忘记吧，德意志人，你想成为国家的希望。然而要教育你自己……成为一个人”(Segeburg, 1988, p.152)。

德意志知识分子学习历史、文学、哲学和作为交流媒介本身的语言。他们讨论语法要点，整理德意志语，并被整个中欧其他人所模仿，整理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之后是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及斯拉夫语。当然，他们工作使用的材料是在现存的语言区域中，不同地区和阶级的捷克人说一种可以共同理解的方言，这赋予他们一定意义上的社区；但总的说来，像科恩(1981)已展示的，很少有捷克人会想象这是一个整个的国家个性。捷克语是出现于私有家庭和地方社区的特殊个性，而德意志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和政府中的特殊同一性。那些使用德意志语的人经常把自己视为“德意志人”，尽管他们有捷克语的姓。集中和广泛的同一性并不一样。哲学家和原国家主义知识分子看起来没有威胁到政府。实际上，政府、教会甚至一些旧政权贵族也支持语言标准化，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但是这微妙地破坏了政府权力，因为这鼓励社区统一性，以致超越或破坏了国家边界。

这些思想家“民族”的身份表面上是非政府性的，但是他们带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影响。他们吸收了启蒙思想对理性、教育和现代化文化的主张，通常有自由政治的影响，但是其他的思想潮流有保守的影响(Droz, 1966)。德意志浪漫主义者的进步与其说是由个人带来的，不如说是由社区带来的。赫德发现，民族灵魂在平民的歌曲和方言中表达出来并把它投射到历史中。他认为，他使德意志国家重生而不是创造了德意志国家。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可能鼓励资产阶级要求有限的民主，但是在德意志国家主义、教权主义和较低的财政不满中，它经常使过去的秩序浪漫化。集权的统治者在统治者、古代社区和宗教中明确清晰地表达了一个精神联盟。奥地利和天主教浪漫主义设想了一个由皇帝、教会和议会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

所有这些或许无关紧要，中欧原国家主义只涉及一小群知识界人士，大多数忠于他们的统治者，终日忙于深奥的知识。罗克(1985, p.23)称此为“第一阶段国家主义(博学爱好时期)”，之后发展到“第二阶段(爱国鼓励时期)”，最后“第三阶段(大众国家运动的兴起)”。他

严格追求经济和阶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简单的结论。不幸地是，他忽视了大多数政治和所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地缘政治随着法国革命军国主义在欧洲增强了阶级和国家的特点，学者们施加了他们的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影响。

1792 年以后的军国主义

在英国，之后短暂地在美国，开始了本迪克斯所称的、对现代化者来说的“参照社会”，但是 1789 年之后，法国的影响超过了它们。革命吸引了现代化者，但当它转向暴力并打击外国旧政权时，法国便成为除了激进派之外的恐怖例子。从那以后，旧政权和富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到，派系斗争将把它们引向地狱。这促使它们妥协，“动员更多的国家政府行政机构和军队”。法国被打败了，而且是被欧洲一半的国家打败了。

法国很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后军国主义的步伐慢了下来。一场纯粹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本应该采取美国的策略，使法国权力分散，以预防“暴民”。但是拿破仑代表他自己，而不是资产阶级。他依靠可怕的国家军队和中央政府成为将军和独裁者，并不断把它们扩大。督政府的法律改革发展成为《拿破仑法典》，即一部综合法典；革命者使行政集权化的努力部分地实现了；教育集权化使教会和政府的等级制度服从政府。拿破仑在削弱公民权的同时把国家政府制度化了。他下台以后，民族国家到 1848 年被君权主义和教权更持久地削弱了，教权主义已被迫回到地方层。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共和制民族国家开始了其最终胜利的旅程。

英国和俄国的社会结构受法国军队的直接影响最少。它们既没有经历过常规占领，也没有因军事而蒙羞。它们的传统军事结构证明是充分的——英国海军，加之雇用欧洲人进行大部分陆地战斗，俄国独裁

政体在"寒冬将军"的帮助下，领导贵族和农民保卫国土。恐怖政策和波拿巴使法国成为一个反面的参照社会，减缓了英、俄的国内改革。独裁统治允许亚历山大从改革转为反动，而不会造成严重的动荡或刺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

战争期间，英国小资产阶级分裂了，激进派受到了镇压。但是财政压力最终产生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小资产阶级和旧政权达成了妥协，政治公民权被授予有产者。新的"统治阶级国家"视自己为唯一的能妥协和逐渐进化的政府，能胜利统治处于动荡状态的野蛮的有色人种的全球帝国。英国采用制度化的自由放任政策，看起来非常平和，已经享受了全球权力，它不再需要侵略扩张。它的国家主义已圆满地完成了——只是在偏远的殖民地才面露凶相。英国从民族国家到完全的单一民族的政府的转化过程是相对平稳的(见第十六章)。

法国在欧洲的影响更大。法国宣扬舆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终止特权、没收教会财产、信仰自由、脱离行会和其他团体的经济自由、赋予有产男子政治公民权利。波拿巴取消了政治公民权，却未取消社会公民权。1808 年他给其兄弟威斯特伐利亚的创始国王杰罗姆写信道：

> 在德意志，像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样，人们渴望平等和自由。《拿破仑法典》的益处、公开法院的法律程序、陪审团，这些东西使你的君主制将非常杰出……你的人民将会享受其他德意志国家所不知道的自由和平等。

欧洲大部分是由不同王朝统治的，在强有力的地方贵族统治集团、市民寡头集团和不属于王朝的地方教会中，不满情绪在滋长。这里，集中的地方权力关系并不能加强广泛的政府。贯穿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波兰和爱尔兰的许多地方，贵族或富有资产阶级——在乡村依靠神职人员——联合地方力量欢迎法国成为"国家"的解放者。他们的"国

家”经济是传统分割和排他的：显要人物以共同的居住地域和血缘关系联系起来，应当统治着他们自己。但在经济先进地区(荷兰，瑞士的一部分，一些意大利城镇)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体包含了更多世俗和民主的雅各宾主义。国家应该体现所有男子或所有男性有产者的社会和政治公民权。到18世纪90年代，即使这些地区也很少工业化，但是它们却已商业化和城市化了。它们的激进主义者认为，统治应从王朝、贵族集团和排他的委托人传到普遍有产的“国民”。

正如在阶级运动中一样，在保守的神职的和激进的“爱国者”中，领导者都是不按比例地出自意识形态行业——牧师、律师、教授、出版商和记者——通常由学生和神学院学员作为突击部队。在较落后的爱尔兰，这引起了沃尔夫·托恩那样的奇怪局面，此人是一个新教律师和世俗启蒙运动的狂热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英国人的农民牧师起义。几乎在任何地方的爱国运动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即制造业阶级，都只有很少的代表。德国人也是这样。在德国几百个政府中(包括一些脆弱的政府)没有一个是由爱国者推翻的，而都是由法国军队颠覆的。主要是国家主义的路德教在通往意识形态的道路上只产生了很少的爱国者(Blanning, 1974, pp.305—334)。

其他地区的爱国者动员了话语能力网的跨国界联盟的地方集中。因为法军临近，共济会的地方分网、先知先觉者俱乐部、雅客宾派和秘密社团激增。尽管规模小且不胜任作代表(只有在奥地利的尼德兰地区它们组织了一个广泛的大党，即翁基斯特)，但它们的激增扰乱了地方政府。后来它们形成了后备民兵和委托行政机构。在法国边界，爱国者领导了由法国武装保护的“姐妹共和国”。

有时还加上另一个密集的语言火花。为了寻求地方支持，爱国者用地方书面语言表述他们的要求，这种语言大多不是统治王朝所用的语言。它也不是大多数平民的口语，平民的许多方言经常是能相互理解的。爱国者语言受限，促使他们进行更多的语言活动。法国革命者曾寻求使法语向下层传播。格雷瓜尔神父在1790年的语言调查表明，3/4

的人懂一点法语，但只有10%稍多的人能准确地说法语。正如公安委员会1794年宣布的：

> 君主制与通天塔一般无所不能，但是在民主制下，任由市民忽视国语并且没有能力控制政府就意味着背叛祖国。它意味着市民不能领会报刊新闻界的祈祷，因为每一个印刷工都是语言和立法的教师……在自由民族中语言对所有人必须是统一的。(Kohn, 1967, p.92)

在意大利、低地国家和波兰，这提高了语言社区、仍提供大部分教育的神职人员和默默无闻的语言学家的政治意义。

"民族主义"一词1774年在德国首次使用，1798年在法国使用。它还没有成为广泛的用语。法国从1797年把自己描述为"伟大国家"，法国领导者并不认为自己与别国对立，国家被联合起来，以反对反动的王朝，建立普遍的自由与和平(Godechot, 1956; Mommsen, 1990)。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大规模动员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财政和人力需求迫使政府进行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这使政府缓慢地离开了部门排他主义，日益把排他主义视为不道德的腐败，走向更普遍的行政、军事服务和道德原则。第二，战争动员的规模——占全部人口5%的人被强征入伍，大约一半的农业和制造业产品进了战争机器的口中——意味着整个民族被组织起来互相残杀。在英法两个最先进的参战国中，在1802年以后助长了普遍的侵略性国家主义——英国的雅各宾主义和法国的反革命分子衰落以后，当两国将战斗必须进行到底这一点清晰明了之后，对敌人否定的民族成见变得更加普遍了。地方传说有与此相关的内容，即西哈特尔普尔的市民发现一只穿制服的猴子在他们的海滩上洗澡，就把它当作法国人给绞死了。

民族主义在大陆上的增长更加复杂。[3]起初，特别是在较发达的地区，人口的大部分发生了分化。许多法国的改革措施，尤其是《民法

典》广受欢迎。莱茵河的拿破仑联盟允许中等国家(如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使小政府现代化，并吸收小政权以与奥地利的力量持平。工业从法国对制服、枪支和饲料的需求中获利。当“解放”运动转为帝国主义侵略时，法国激起了地方的民族主义。对等的贸易条约支持着法国。财富、发明和熟练工人经常被用车送往法国。到1799年，反对法国的起义遍布欧洲。一些人在旧政权和宗教保守旗手的领导下战斗，一些人激进地要求民族自决。正如在英格兰一样，以个人特性为基础的“民族特性”的对照模式出现了，德国人把自己刻画为开放、正直、虔诚的性格，而把法国人刻画为狡猾、轻浮和不可信的形象。民族和“伟大国家”不再是一体的。

波拿巴使矛盾进一步恶化。他的个人生涯激励了整个欧洲的激进爱国者，证明资产阶级出身加上美德便可以进行统治。但是他反对民族主义，只有当爱国运动适合其个人利益时，他才予以帮助。他支持王朝帝国，而不是君主国家政府的联盟。他任命他的亲戚和元帅为各国国王，并使他们与欧洲王室联姻。他与约瑟芬离婚，并于1810年娶了奥地利国王弗朗西斯的长女。正如维也纳的歌谣中所说的：

> 路易丝的裙子和拿破仑的裤子
> 现在统一了奥地利和法国。
> (Langsam, 1930, p.142)

由于帝国统治沦落到了起义和镇压的循环，所以甚至他的仆从国王都建议对爱国者妥协。但是波拿巴只是不断加强他的君主专制统治。如果这能带来和平和财富的话，还无关紧要，但战争带来了赋税、兵役和英国的封锁。到1808年，几乎所有的爱国者都转而反对法国；1812年之后，即使是积极的协作者也抛弃了这一失败的事业。

但是他们能求助于谁呢？保守的爱国者——贵族和神职人员所动员的农民——在落后的西班牙和多山的瑞士以及蒂罗尔可能动员部门集

中的地区游击战争。其他地方需要大规模军队把法国人赶走。在大革命中以及19世纪后期，大规模部队之间的战争支持了“单一不可分”的政权。一位米兰爱国者觉察到了意大利联邦的军事力量薄弱：

> 意大利可能轻易地被入侵，联邦制的各共和国间的民族妒忌，联盟操作的缓慢，这一切都使我拒绝联邦主义计划。[意大利]需要一种形式的政府可以提供对入侵最有力的抵御：这样的政府就是唯一不可分的共和政府。(Godechot, 1988, p.23)

他推荐了一种意大利宪法，以1793年的法国宪法为模型——这个国家已极其成功地抵御了外国侵略。

在中欧，意大利的乌托邦在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强有力政府下，可能成为现实。德意志爱国者会或者选择法国的统治，或者支持这些极权君主制。支持波拿巴的小德意志国家和激进爱国者，因其衰落而前途未卜。自由主义看来与排他主义和小国的军事失败联在了一起。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族主义在德国还只是刚刚开始，到1815年，它们都衰落了。

法国在乌尔姆、奥斯特里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的决定性胜利，在1805—1806年分别压垮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但是这两个君主制政府却没有倒台。它们被失败所震撼进而打算改革，学会驾驭少量的民族主义到专制政体中。在中欧，法国几乎没有废除贵族的特权(他们需要贵族的支持)。但是《民法典》和公共土地与教会地产的出售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类的人创造了一个更资本主义化的环境。在法国，革命鼓励了资本主义加上法律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在政权的精心管理下，德意志现代化可能保卫更多的资本主义和官僚政治，但是不能保护更多的自由。代议制可能满足行政机构，但不能满足议会政治。

普鲁士的改革者，大多数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官员，耶拿战争之后取得了进展，然后不得不妥协(Gray, 1986；更多的细节见第十三章)。他

们赋予在国民议会中的全部财产所有者以政治权利的计划失败了，但是在市一级部分地实现了。中央行政合理化，政府服从于法律并对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开放。公共教育扩大了，在路德派和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的话语能力向下扩散传播。受压迫者和犹太人被解放出来，徭役劳动被废除。作为交换，农民把土地的1/3交给贵族，贵族现在拥有了失去土地的自由劳动力，而不是农奴。农业资本主义获得了进步。军队引进了普遍兵役和精英阶层的晋升原则，并且建立了参谋学院。所有军人首次被允许佩普鲁士绶带作为帽章。还仿照法国的公民军队创造了战时后备军(见第十二章)。1813年，国王呼吁"我的人民"——"我"和"人民"有些矛盾——对法国宣战。1813—1815年的战争期间，战时后备队的热情提高了自由的希望。1806年，波拿巴的支持者黑格尔，已经把普鲁士的官僚政治视为一种"普遍阶级"，可以发挥人类精神的潜力。尽管这对我们来说有些怪诞，但许多德意志自由民族主义者却充满希望地注视着普鲁士。

1815年后发生了一些反应。如在奥地利，君主和法院都害怕武装暴民。卫戍部队的司令官和警备大臣警告说："武装一个国家就意味着组织和助长叛乱和暴动。"(Ritter, 1969, Ⅰ, p.103)。然而许多职业军官支持变革，因而战时后备队保留了下来，但只是作为预备力量而不是常备民兵。这样就发展了一种路德派的普鲁士—德意志的民族特性，这与宗教和国家忠于一个强大政府的思想感情是联在一起的。

而哈布斯堡则有不同的选择。当有人被作为奥地利的爱国者推荐给皇帝弗朗西斯时，弗朗西斯回答说："他也许是奥地利的爱国者，但问题是他是不是我的拥护者。"(Kohn, 1967, p.162)哈布斯堡家族不可能统治一个国家政府。他们是统治多语言、多省份帝国的君主，在某些省份得到了天主教会的辅助。尽管奥地利的核心是日耳曼人，但还有很多人说其他的语言。但是王朝拥有神圣罗马(德意志)帝国名义上的领导地位已有四百年的历史了，奥地利人可以设想出一个可选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下面是法国的关于约翰大公的密友、后来成为反法起义

领导人的行动报告：

> 霍迈尔男爵……曾担任《地理、历史、政治和军事科学档案》期刊的编辑职位。在这个听起来相当无害的标题下，他继续在宣传革命教条方面模仿托马斯 · 潘恩。他宣称，这些教条可以带来德意志的重建和幅员辽阔的德意志在一个新宪法下的重新统一。他很少自己发言，而是非常聪明地援引许多受尊敬的德意志作家的话，而这些作家从来不考虑革命。即使路德也放在了促进作用的名下……这些引文最受喜爱的主题是德意志的统一和不可分割。作为历史学家和帝国的档案保管员，他能接近许多关于古代德意志统一的资料，保留了许多风俗习惯和语言，而这些都被我们完全忽视了。(Langsam, 1930, p.497)

这样一个档案保管员能够担忧占领军——但他同样担忧自己的帝国。

弗朗西斯希望除掉法国人，但不是根据可以接受的条件。他妥协了，改革军队，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创造了战时后备队，许诺普遍的改革(他从未兑现过)，在 1809 年，发动了反对法国人的起义，呼吁“德意志国家”作为哈布斯堡和奥地利的“联盟”和“兄弟”。查理大公在阿斯波恩遭受了第一次惨败。拿破仑这一失败打破了他不可战胜的神话。拿破仑恢复元气，使奥地利将军求和。但是奥地利仍是德意志抵抗的领导，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在对拿破仑的最后追击中可以任命查理大公为联军最高司令。当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复兴时，“日耳曼会员证”受到了抗拒。弗朗西斯拒绝德意志帝国的王冠。官员被命令只能谈奥地利爱国主义——甚至尊敬地谈到拿破仑，因为，毕竟他是我们君主的女婿(Langsam, 1930, p.160)。部门的王朝主义再次兴起。

但是，奥地利的地区民族问题因战争而恶化。哈布斯堡家族在荷兰、波兰和意大利激进的爱国者中深受损害。拿破仑的离去短暂地减轻了疼痛，但是拿破仑时期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变得勇敢起来，他们受到

民族主义者的责骂，民族主义者坚持声称一个由种族语言文化限定但受外国人统治的民族，应有自己的政体。最终这些破坏政府的民族获得了胜利。

奥地利土地上的运动不是直接由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发展造成的(如马克思主义者和 Gallner, 1983, ch.3),因为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和阶级中产生。民族主义在不同水平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中在全欧洲出现(Mann, 1991)——这是我从修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即民族主义来自于“不平衡发展”(Nairn 拥护此观点,1977)中找出的唯一扭曲的意识。民族主义者对阶级、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几乎没有只字片语(直到很久以后大规模的农民民族主义的出现)。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他们可以缩减这些力量？罗克(1985)对经济和阶级进行了最仔细的分析，主要依靠欧洲八个颠覆型政府的小国中民族主义社会拥护者的实例(包括两个奥地利的小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他的第二阶段民族主义，即当重要的爱国运动开始了普遍的狂热，但还没有大规模追随者的时候，大体上与 19 世纪上半叶贯穿大部分奥地利国土相一致。罗克赞同一些概括总结。情况大体上仍涉及知识界(其神职人员一翼已衰落)，大部分不均匀地包括有文化的市民行业，即受压迫的少数人能达到的高水平行业。直接生产的资产阶级和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部门都缺少代表。但是民族主义者通常在市场发达的地区更为活跃。

然而，罗克的国家，不包括奥地利最发达的拥有颠覆型政府的地区，如奥地利本土、奥属尼德兰和北意大利。在第一次爱国者骚乱时，它们被商业化和城市化了(捷克在骚乱到达时也是如此)。但是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各国都敌视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它们仍然是农业国，并且非常落后。那里大概有一种起步水平的市场所支持的话语沟通，超出这个水平爱国者才会可靠地组织起来——正如罗克最后总结的。但是超出那种动员水平之外，还有经济和阶级的多样性。实际上，罗克的民族主义社会并不总是最重要的运作者。在 1848 年的革命中，许多地方“民族”运动的领导人都是贵族，他们只为自己

寻求代议制(Sked, 1989, pp.41—88)。马扎尔的贵族保持了控制地位，尽管大部分贵族并非如此。正如罗克的观察，大规模的颠覆型政府的民族主义(他的第三阶段，多发生在19世纪后期)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什么样的共同阶级动机可能引导所有人宣称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参见 Sugar, 1969)?

我的解释以军国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为中心，以前曾经讨论过。大多数不满与政府的政治经济有关：其不断增长的财政和人力强征以及其官职战利品——费用和津贴。但是财政不满在这里以地区为单位来表达。这对政府的国家定型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英国的财政和人力的不满可能产生中上阶层和自由民控制的阶级暴动。但是以地区为基础的不满可以导致地方贵族领导的起义。他们掌握了民兵，有时领导正规军队，受到下层教士的同情，调动了家族和家庭受到外敌攻击时的地方紧张情绪。政治代议制由地方社团和地区建构与由阶级建构是一样的——什么地方设置公民权与谁将获得公民权一样重要。

无独有偶，美国也因地方—国家的斗争而四分五裂。19世纪中期的美国，州权调动了强烈的地方感情，控制了政治，直到内战才结束。在奥地利的土地上，内乱充满了整个19世纪——1821年，1830年，1848—1849年，1859年，1866年以及1908年——通常受到外国列强的煽动。尽管只有这两个国家发生了内战，但地方对中央集权政府的反抗在所有五国中都发生过。

但是，奥地利的地方民族主义唯一一个(在五国中)涉及语言问题，尤其通过政府的破坏行动。两个问题产生了：公众尤其是政府应该用何种语言？公共学校应该教何种语言？正如盖尔纳(1983)所论证的，读写能力是文化之本，在军队、社会管理、法院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雇佣中能切实感觉到。随着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扩展，它们充斥了更多的非日耳曼语种的人。更多的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地方语言成为官方语言方面有绝对的兴趣。哈布斯堡家族不是冷漠无情的，他们鼓励军队中的双语制。但是为了强征税收，他们转向了周期性的镇

压，这推动了他们依靠主要的奥地利—德意志军队和中央行政机构。其他的语言社区被隔绝在行政和法院之外，因此1848年的革命者提出了抗议(Sked, 1989, pp.41—88)。

但是，语言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工具要求(盖尔纳的例子)。当教士和语言学家致力于产生标准化的地方语言时，这成为公众地方相互作用网络的纽带，并在小学、教会和市场交换中被再生产出来。语言逐渐成为局部植根于跨阶级社区的统一观念，指向能彼此理解的“我们”与“外国人”不能听懂的征服者的鲜明对照。运用“国家”一词使他们自己合法化，甚至在他们只承认贵族政治公民权的地方(如匈牙利)或“国家”由一小撮知识分子发明的地方(如斯洛伐克)也是这样。地方与语言同一性的联合意味着哈布斯堡家族更多地被狂热的颠覆型政府的“国家”而不是阶级所攻击。

在1792年以后的军国主义阶段，革命者和波拿巴赫然耸立。尽管民族的兴起从20世纪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在这一时期其发展是不可预料的，根据主要侵略国决议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地缘政治后果。如果路易十六妥协了，如果布里索廷斯预见改革将毁掉他们，如果法国在乌尔姆一战中撤退(就如他们被希望做的那样)，如果督政府没有产生一名成为无情的占领者的卓越将军，如果他没有作出侵略俄国的可怕决定……这些以及其他的“如果”或许可以阻挡民族主义的潮流。

1815年的事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潮流。法国的失败使列强达成了一致决议，力争减少民族主义。列强的协议以及王朝的神圣同盟作出决定，反对激进的爱国者(见第八章)。尽管英国是民族政府，但它不支持欧洲政府的民族原则。普鲁士政府在与奥地利的争夺中冒险使用了德意志的旗号，但那时，由于害怕人民，仍使其政府忠于分裂的王朝统治。哈布斯堡政府是自觉的王朝，俄国则只知道王朝统治。美国远隔重洋，民主制的“病菌”不能再传染到欧洲。世界似乎开始了谨慎的现代化进程，由旧政权王朝网络和全球的英国自由经济这两种跨民族主义所统治。

民族主义不能被驱散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在这一短暂阶段中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改变了权力组织。英、法、美现在是民族政权，不能再回到排他主义的旧政权。尽管美国保持了地区性联邦，但英法两国日益集权。虽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势头不可遏制，但它们内部的民族力量得到了加强。第二，资本主义和政府的现代化势不可挡，支持物质和道德“进步”，使政府在战争中更加强大。它们的联系意味着阶级和国家将继续发展广泛的政治组织。民主的民族—国家将占统治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更中央集权的普鲁士和更联邦式的奥地利将长期生存下去。但是旧的排他主义部门秩序确实衰落了。第三，工业资本主义后来增加了社会相互作用的密度，并改变了政府的职能。这种联合的非预想后果在发展的第四阶段产生了成熟的民族—国家，这将在以后各章中论述。

结论

这一时期看到了阶级和民族的出现。正如马克思的观察，18 世纪资本主义确实取代了现在我们所称的封建主义，在旧政权与资产阶级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阶级斗争。但这通常只包括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马克思新兴阶级的历史范例，但在大的历史记录中却无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同样夸大了他的另一个新兴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力量。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各阶级都被证明远不如马克思和许多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广泛和具有政治性。

旧政权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很少直接出现在经济辩证法中，军国主义政府的定型发生于其间，在政府精英之间、“执政”与“在野”党派之间、“国民”和“平民”之间产生了财政危机和严重冲突。经济生产力的直接关系，对部门妥协更具有特殊性、多样性并经得起检验。小

资产阶级和旧政权之间的大多数冲突来自于政府的政治经济，之后，话语能力网络的扩大帮助了一些政权的现代化者和新兴的小资产阶级超越他们之间的冲突并使政府现代化。在精英党派冲突未形成制度的地方，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渗透进阶级结构并产生了阶级敌视。革命者掌握着意识形态力量，或许能夺取控制权并改变社会结构。法国革命向所有的旧政权发起了进攻。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加强了军国主义，使未发酵好的掺了假的酒味道更浓。

没有完全成功的革命，大多阶级冲突仍是隐含而不完全的。国家只是半隐半现。随着新兴阶级和民族与旧政权的妥协，政党民主既不稳定又不平衡地踉跄前进。政权越来越资产阶级化，因为阶级部分地与地方的部门、地区组织相融合。政府和军事实现了现代化和职业化。不再像以前那样排外和腐败，开始吸收专业人员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后代。旧政权、富有资产阶级和专业人员之间的通婚日益增多。英国资本主义保有旧政权的商业主义色调，德意志资本主义需要中央集权论者的色调。19世纪所有国家中新产生的富有者都融入了国家政权和地方、部门权力网中。

小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中产阶级，见第十六章)的融入看起来问题更多。他们的成员数目巨大，且他们对公民权的要求更激进。旧政权不愿与他们联姻。但是，甚至最忠实的小资产阶级也被赋予了全部公民权和部分政治权利。法规把“个人权利”及个人和财产自由奉为神圣不可侵犯，尽管各个政权在像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样的更集体性的社会权力的让步方面各不相同(没有任何政权允许工人不受约束地自由组织)。小资产阶级被有限地授予了不同程度的政党民主。

现在开始了“贵族”政党统治的时代，政府主要由富有的财产所有者控制，他们利用行贿、赞助、地位服从和温和强制(投票通常不是秘密的)的办法说服中等阶层投他们的票。美国除南方以外扩大了成年男子的投票权，地区、宗教和种族使阶级分裂并保持了其政党的部门性和贵族性。在英国，两个贵族政党扩大了选举权资格以“控制”对方。

奥地利和普鲁士落在了后面，但最终授予了一些地方的继而是中央的代议制。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这两个著名的反民主主义者，首次引入了普遍的成人男子选举权(尽管类似于有限的君主制)。贵族政党在部门上融进了许多小资产阶级(虽然在奥地利各省他们经常是反政府的)。社会密度的大规模增长和阶级、民族的出现意味着更大的集体和个别权力的调动。“国民”和“平民”与旧政权有了更多的直接联系。但是这些比马克思和任何其他使用二分法的理论家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更具合作性，也更多变化。

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主导性的现代主义理论，即民族不是阶级的对立物，因为它们同时兴起，两者(不同程度上)都是现代化教会、商业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现代政府兴起的产物。因此我的理论包括了所有四种社会权力来源。意识权力控制了第一个原国家阶段，因为教会通过组织大规模话语能力传播了广泛的社会特点。在原国家主义的第二阶段，不同的商业资本主义结合和现代化中的政府，围绕着排他主义的经济作用、方位和地区，继续传播更普遍的原国家(和阶级)特点。在决定性的第三阶段即军国主义阶段，18世纪和19世纪初地缘政治的费用的不断增长推动了民族、政府的广泛特点，正如它们使阶级和地方的不满政治化一样。加强地缘政治的斗争给了民族身份以第一次侵略性的情绪。这样，原国家便成为实际自觉的、跨阶级的、在某种程度上有侵略性的国家。但是新兴民族(和阶级)也动员了一种道德狂热，当意识权力关系把家庭和地方社区与资本主义和军事政府对广泛剥削的认识联系起来时，由世俗和宗教的知识人士构成的话语能力网也把广泛的政治阶级和国家的不满在原则上组织起来。

新兴阶级和国家现在影响政府机构并被政府机构影响着。受到军国主义的鼓舞，由意识、阶级和国家所强化的道德狂热要求更具代表性的政府并向民主制演进。然而，国家在这一点上面临着一个抉择：使中央政府民主化或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寻求政府中地方席位的民主化。因为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相互交织，所以它们的选择在原则

上已经决定了。

从政治上讲，抉择要根据政府机构是否已经中央集权化。英国政府已中央集权了，而奥地利和美洲殖民地则没有。在后者，代议制的拥护者依靠地方机构，他们感觉比任何中央政府都更能控制它。从意识形态上讲，现在能强烈地感觉到前两个国家阶段的合理性，因为政治区域与宗教和语言社区的关系十分易变，而两者却能为了广泛的目的而动员地方强烈的思想感情。语言问题也能产生公共教育和公共职位资格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些政治和意识权力关系使整个(或核心)政府区域集权化，那么强化型政府将产生，如英国大陆和(经过革命变迁以后的)法国。在它们分权的地区，则产生颠覆型的政府国家，如奥地利，而美国和德国则代表中间类型。美国没有很多意识强化的政治分权，因此其“国家”观念仍是介于两者间的模糊平衡。德国是另一种中间类型，因为政治分权存在于广泛的意识社区中。尽管它迅速地转向第三种轨道即创建型政府，但它的民族性也仍然模棱两可。

大多数理论用经济或政治权力关系或用两者来解释民族主义。但是民族是因四种社会权力来源的交织作用而出现的。这些来源关系随不同时期有变化，在这一时期之前及之初，地缘政治已产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后者导致了重复发生的政府财政危机，从而使阶级关系政治化和“自然化”。最后的和最深刻的危机发生在18世纪末。早期的政府在国内相对而言微不足道，尽管经常脱离统治阶级而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凌驾于政府之上。以前，政府精英或政府机构的本质对社会的关系不大，如今它们却至关重要。公民权利的兴起与现代阶级兴起为政治权力一样，被习惯地叙述。但是阶级本质上不是政治的。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附属阶级很大程度上漠视政治或者寻求逃避政府。它们现在被关进了民族组织和政治的牢笼，由收税人和征兵的官员这两种人看守。

在整个同一时期及以后，阶级关系也被商业的、随后是工业的资本主义革命化了。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政府开始围绕阶级和民族塑造思

想意识。虽然它们受集中力量的道德宗教动员的影响很大，但如果按“终极首位的”意义来说，当这一时期开始时，孤立两种社会权力本源即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军事和经济的革命交织在一起产生了现代政府，这种政府被证明有新兴的权力特性。在代议制问题上，政府在更具鼓动性的权威君主制和萌芽中的政党民主之间以不同的位置予以定型(加上殖民地开拓者的变型)。在民族问题上，它们在中央集权政府和联邦之间定型。财政军事危机的最后一个阶段使政府规模大幅度增长并使阶级政治化、自然化。这没有使政府精英的个别权力获得增长，但它确实使政府机构的集体结构权力增加，提高了我称之为“机构国家主义的理论”的意义。因而讨论中的终极首位，或许已转向经济和政治的权力的联合。以后各章证明了尽管资本主义继续使经济生活革命化，但政治机构却施加了保守影响。解决早期阶级代议制和国家冲突的法规——《美国宪法》、竞争性的法国宪法、英国旧政权的自由主义、普鲁士专制君主制、哈布斯堡王朝邦联制——异常持久。它们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互作用，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下一阶段阶级斗争的结果。

最后，我已经证明，作为普遍人类向实现自由的演进的一部分，现代社会并没有尽力向民主和民族公民权利发展。当然，现代社会彻底改造了民主制，正如古希腊人已改造过的一样，因为他们不能躲开他们的政府，但可以躲开中世纪的政府。我们所称的“民主制”不是简单的自由，因为它是社会限制的结果。吉登斯把现代政府描绘为一个“权力容器”，我更倾向于使用被控制的“牢笼”一词。在现代早期，人们陷入了国家的牢笼，因此寻求改变这些笼子中的状况。

这也发生在这一章所介绍的国家发展的两个前期阶段中。世界“原始文明”时期的第一个永久性政府，产生于依靠冲积成的及被灌溉的河谷种植的围笼。第二阶段即希腊民主，同样是控制的产物，部分是经济的、部分是装甲步兵的战争的产物。在第一卷中，我论证了希

腊人不必要比他们最强大的对手——波斯人——更有政治上的自由。波斯大帝的专制主义比希腊城邦中形成的专制主义更不重要，因为波斯的臣民相比希腊人来说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微弱。在所有三种情况下——原始文明、希腊、18世纪晚期——牢笼加强了。随着这种发展，同样普遍的反作用也发生了：居住者更关心的是牢笼内的状况而不是牢笼本身。

注释：

[1] 指1990—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的伊拉克，战争之后发生了变化。

[2] 1848年法国革命及德国的大多数暴乱的原因并不在此，但是奥地利范围内的许多严重的暴乱主要源于财政危机(见第十章)，这也是英国宪章运动的部分原因。

[3] Hobsbawm(1962, pp.101—116)对民族主义有简短的精辟见解，Palmer(1959)的论述较长。Godechot(1956)到1799年时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很成功；详细论述参见Dunan(1956)、Connelly(1965)、Devleeshovwer(1968)，以及Dovie and Pallez-Guillard(1972)的作品。关于莱茵，法兰西的效忠派的对照研究，参见Diefendorf(1980)的著作。

参考文献

Anderson, B.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rmstrong, J.1982. *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endix, R.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anning, T.C.W. 1974.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ainz, 1743—180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tterjee, P.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Totowa, N.J.: Zed Book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ohen, G.1981.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nnelly, O. 1965. *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 New York: Free Press.

Crone, P.1989.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Devleeshovwer, R., et al. 1968. *Les pays sous domination française (1799—1814)*. Paris: CDU.

Dickson, P.G.M.1987.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iefendorf, J.M.1980. *Businessmen and Politics in the Rhineland, 1789—183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vie, J., and A.Pallez-Guillard. 1972. *L'épisode napoléonien. Aspects extérieur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Droz, J.1966. *Le Romantisme allemand et l'Etat: Résistance et collaboration dans l'Allemagne napoléonienne*. Paris: Payot.

Dunan, M. 1956. *L'Allemagne de la Revolution et de l'Empire*, 2 vols.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Gellner, E.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Godechot, J.1956. *La Grande Nation. 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de*

1789 à 1799, 2 vols. Paris: Aubier.

1988. The new concept of the nation and its diffusion in Europe.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O.Dann and J.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Goldman, L.1964. The Hidden Go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Gray, M.1986. Prussia in transit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Stein reform ministry of 1808.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6.

Hall, J.A.1985. Powers and Liberties. Harmonsworth: Blackwell.

Hobsbawm, E.J.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roch, M.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hn, H.1944.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lier.

1967. Prelude to Nation-States: The French and German Experience, 1789—1815.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Langsam, W.C.1930. The Napoleonic Wars and German Nationalism in Austr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nn, M.1991.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European nationalism. In Power, Wealth and Belief: Essays for Ernest Gellner, ed. J.Hall and I.C.Jarv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kham, F.1954. 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Mommsen, W.J.1990. The varieties of the nation state in modern history: liberal, imperialist, fascist and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nation and nationality.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ation State, ed. M.Mann. Oxford: Blackwell.

Nairn, T.1977. The Break-up of Britain. London: Verso.

Palmer, R.1959.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itter, G.1969. 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 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 Vol. I: The Prussian Tradition, 1740—1890. 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Segeburg, H.1988. Germany.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O.Dann and J.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Sked, A.1989.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815—1918. London: Arnold.

Smith, A.D.1971.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Duckworth.

1979.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Sugar, P.F.1969. External and domestic roots of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 In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ed. P.F.Sugar and I.J.Leder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Tilly, C.1975. Introduction. In hi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第八章

地缘政治与国际资本主义

理论视角

我在本章将尝试说明在“漫长的 19 世纪”中地缘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全面关系。这种关系把第三个因素加入其中，即欧洲(变成了西方)文明。欧洲长期以来是一个多权力运作者的文明，它包含着固有的矛盾，即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导致战争，但又受到共同规范的调节。18 世纪的战争变得更具有破坏性，代价更为高昂，然而对列强也大有裨益，且部分受到超民族制度和多国外交的限制。社会有两个层次，即国家层次和欧洲层次。由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产生的集体权力的急剧膨胀，闯入这个半限制性的双层次世界，使该世界带有互相矛盾的、超民族的、民族的和民族主义的内涵。

1. 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关系的革命导致了一个局部的、超民族市民社会的产生(如第二章所述)。话语能力的网络系统打破了国家的界限；私人财产权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大部分自治国家中实现了制度化。资本家的扩张可能会削弱国家间的敌对状态。如 19 世纪的大多数作家预言的那样，欧洲由于超民族的工业化而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的中心。

我们可以把“强硬”观点和“软弱”观点区分开来。前者预见国家会最终消亡。超民族的阶级将会和平共处，普遍的和平将会随之而

来，这是从康德到约翰 · 司徒雷登等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渴望的。国家的永久性军事防卫设施可能会继续对资本家的发展有帮助，但旧的军国主义国家将消亡。利益的自由放任概念将取代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有时也可能需要一点有“选择的保护主义”。在“软弱”的超民族国家中将继续他们隐秘的外交政策，甚至发动战争，但对经济和社会没有明显的影响。权力结构是双重的：这就是超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有限竞争。

2. 但当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国家现代化交织在一起时，也会增强民族主义组织。19 世纪国家永久性军事防卫设施的扩张无意识地“归化”了经济运作者(我将在第十四章中解释这一点)。资本主义也向广泛的阶级妥协，这些阶级由于国家财政而具有政治意义，要求获得公民权。旧政权在把他们纳入君主独裁的更为集中的部门性组织时左右为难。阶级需求和政权反应共同引领欧洲以三种方式向民主国家方向发展，这一点我在第七章中已指明了。在英法这样的国家里，被同质性的文化和语言的“统治阶级民族”所控制的现存政权拓展为政权加强型国家。其次，在像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由于文化和语言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统一的社区，但又分裂成许多小邦，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政权创造型国家。再次，像奥地利、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联邦国家被区域民族主义和颠覆政权的民族搞得四分五裂，后来形成它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到 1918 年，民族国家在整个西方完全占统治地位。阶级更多地被限制在一个民族内部，这迫使国家远离传统的自治，而社会远离超民族主义。

3. 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也限定了民族主义组织。资本主义与侵略性的地缘政治是交织发展的。它的集中权力可能会提升民族间利益和冲突的领土概念。如高伯特所说，重商主义现在正变成真正的“永久战斗”。欧洲通过战争正逐渐统一成为或大或小的国家，有利可图的殖民主义促进了军国主义的产生。如世界体系理论家(Wallerstein, 1974； Chase-Dunn, 1989, pp.201—255)已阐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具有两面性：在西方中心是自由市场、自由劳动；在外围则是不平等交换和强制劳动。这或许又反过来冲击西方，促进了其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组织的发展。

因此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是三维的。首先市场竞争是固有的，超民族的，无论商品在哪儿生产，在哪儿交换，都无需注意政治边界，都会为财产拥有者提供弥散的、获取利益的机会。其次，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阶级是在主权领土的层次上组织起来的，他们越是煽动鼓励，也就越具有版图化和"归化"特点。再次，当资本主义由于国家界限变得具有封闭性时，这激发了殖民和欧洲的领土争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向来并且同时是超民族的、民族的和民族主义的，这就产生了错综复杂和多变的权力关系。

理论1和3的"强硬"观点几乎完全统治着社会理论，作为对手他们之间也会出现偶尔的妥协。从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维科到圣西门、孔德、斯宾塞和马克思都期望风头正劲的超民族主义的胜利。20世纪初这种自由马克思主义观点似乎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备受民族主义者称道的即将到来的民族主义的胜利(通常亦称为种族主义)受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非难——民族主义的胜利即一个民族国家成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优等民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把这种理论发展到极致。随着"二战"中自由马克思主义联盟的胜利，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不再流行，但其影响依然存在。正如民族国家竞争的历史一样，很多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现实主义也把外交历史假设为置身于国际无政府主义中的主权国家的权力。吉登斯(1985)也提出过有关国家的兼容性理论：民族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巨大的权力容纳器"、"教师"和"监督者"，这加强了国内和地缘因素对社会的支配。但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超民族主义在1945年以后的世界上，以相互依存和世界系统理论的形式卷土重来。自由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妥协倾向已初露端倪：全球的相互依赖取决于一个没有危险的霸权大国的存在。

由于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居主导地位，近期涌现的大多数地缘政治

理论表面上是经济主义的，即把“权力”转向了经济权力。通过对军事和经济统计资料的整理，肯尼迪作出如下结论：

> 世界上生产平衡的改变，引发了军事权力平衡的改变；不同帝国和国家的兴衰……受到主要大国战争结局的影响，胜利总是属于物质资源丰富的那一方。(1988，p.439)

战争仅仅决定着生产权力的改变，从而进一步决定地缘政治。然而，实际上肯尼迪的理论最终是双重的：因为他把主要大国的争夺和战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常数，经济权力仅提供了由他们定义的进行到底的方式。肯尼迪既没有尝试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总结，也没讨论秩序与和平有时比混乱与战争更能体现国际关系的特色。

现实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已对最后的争论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们从霸权或霸权均衡的角度去考虑，对19世纪和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转变作出了解释。霸权国家或霸权主义者，是指那些在国际范围内把自己的规范和政府行为强加于别人的强国。金德尔伯格(1973)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首先提出这一理论。他认为在30年代美国企图取代英国已经丢失的霸权地位，但以失败告终。今天美国已经能够将自己的国际规则推向全世界，但它拒绝这样做。直到1945年以后才接受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英国已无力称霸世界，但美国却是不愿称霸世界。”国际资本主义需要一个霸主来避免无谓的竞争，关税战争甚至是真正的兵戎相见。

现实主义者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数量庞大的文章(仅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就有二十篇文章)。大多数作者认同两个霸主维持了全球自由贸易原则，避免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战争——大英帝国在几乎整个19世纪发挥了这种作用，而美国则从1945年始发挥此种作用。英国的实际情况表明了其霸主势力不可能是最大的，但其最先进的经济实力使它得以建立新的经济规范和制度。英国建立起世界储备

流通货币体制，伦敦一跃成为其金融中心，海上运输成为其主要的运输线。与此相反，当多国竞争占主导地位时，资本主义发展动荡不安，并导致了战争——18世纪英德竞争导致一战期间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系列战争(Calleo and Rowland, 1973； Gilpin, 1975, pp.80—85，1989；Krasner, 1976； Keohane, 1980)。然而许多作者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Keohane, 1980； Rosecrance, 1986, pp.55—59， 99—101； Nye, 1990; pp.49—68； Walter, 1991)，我也借鉴了他们的怀疑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家认为霸权是一大进步，他们试图结束理论上的二元主义。他们依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单一逻辑”来解释列强的竞争(Wallerstein, 1974， 1984， 1989； Chase-Dunn, 1989, pp. 131—142， 154， 166—198； Arrighi, 1990保持了更多的二元主义)。他们把17世纪末的荷兰共和国也加入霸主行列，因为荷兰的货币流通、金融制度、航运业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对于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霸主而言，海权是连接经济与军事霸权的纽带(Modelski, 1978， 1987；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88)。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民族经济使其政府拥有了权力，尤其是海权，这些权力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提供了地缘政治秩序。沃勒斯坦得出了与肯尼迪相同的结论：

> 那些飞速发展政治、军事的国家并没有取得胜利，反而是慢慢地发展其长期竞争能力的国家成了赢家……当霸权到了必须消耗本国资源方能维持胜利时，世界战争的高潮已不可避免，否则战争只会在个别国家发生。(1984，pp.45—46；Goldstein 1988 and Modelski, 1987)

这些是霍布斯主义的伟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论，并被转换成国家的理论。他们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是美国人，他们极力吹捧美国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宽厚仁慈的统治。英国人加入后极力称赞自己的历史是伟大而又光荣的。但该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

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强国会持续不断地缓慢发展，除非一个国家的霸权足以建立起世界政府。他们是二元论者：无政府的伟大权力竞争是人类权力关系一个接近永恒的决定性因素；竞争的结局和秩序的崩溃是由经济权力关系决定的。世界体系理论家如调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均衡地渗透到全球范围内，当世界革命爆发，世界政府成立时，全球最终会出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经济结局。

这些经济的二元论是错误的，至少我们上面谈的是这样。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更加复杂多变，前途不稳，在发展中被社会力量的各种来源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包含着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组织原则。让我们看一下它们是怎样共同决定地缘政治权力的。

权力的决定性因素

我定义了五种主要的地缘政治权力的决定因素：我的四种来源再加上其中二者——军事和外交领导艺术——的有特色的结合。(本部分主要参照 Knorr, 1956 和 Moregenthau, 1978, pp.117—170)

1. 经济权力。强大的权力实际上是由国家经济的规模和现代化的不同结合来决定的。真正贫穷落后的国家几乎从未变成强国，除非所有其他权力来源都情愿对此作出补偿。但在地缘政治方面，地缘经济——经济如何打入区域和全球地理范围——也影响着经济的规模和现代化，或许这也加深了它们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英国用了几百年才使其沿岸地缘经济创造出财富与权力，而这一切都是随着航海革命和新大陆的发现才完成的。只有与地缘政治有关时，经济权力才会转变成权力，就如我们在其他来源中看到的那样。

2. 意识形态权力。热衷于权力冒险的运作者可能会对意识形态来源和地缘政治的关系感兴趣：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固有的道德原

则——和道德先验的合理侵略的信念。如果一个权力丰厚的资产阶级没有民族统一性，那么它的资源对强国计划所起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一支强大的装备良好的军队没有令人信服的信念，它将会不堪一击。

3. 军事权力。具有进攻性地缘政治的富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武装部队，那么它们将被打败并被吸收到军事力量更强大的国家里面。某些武装力量对短暂的权力计划来说尤为奏效，如 18 世纪以及以后的英国和普鲁士—德国。还有一些是不奏效的，如 19 世纪后期的俄国。军事权力有它自己的逻辑：它的组织可以“强制集中”资源。经济权力无论其如何强大，只有具备了人力、武装力量、物资储备，才能正常运行，经济权力还要受到纪律的约束，还要致力于反对敌人的有效制裁。这不仅需要国民生产总值，还必须有致力于训练和实战的军队。1760 年，普鲁士的经济只比奥地利略为领先，但基于经济上的普鲁士的军事(和政治)动员却占绝对优势。军事权力资源必须与目前的地缘政治任务密切相联——对于炮舰外交而言，他们需要的是炮舰，而不是集中在一起的导弹组(或核武器)。

4. 政治权力。现代国家把经济和意识形态资源，国民生产总值和道德准则转变成军事权力——这是一项它们或多或少能起作用的任务。奥根斯基和库格勒(1980, pp.64—103)指出，在 1945 年以后的战争中，经济资源不再预示着结果。他们宣称卓有成效的政治组织(尽管它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混合)是至关重要的，如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胜利，北越对南越和美国的胜利。政体和国家管理必须为手头的地缘政治任务有效地提供资源。那些通常具有优势的、更具有内聚力的政治制度，其定型和派别斗争便更具有制度化。

这与国家外交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经济学理论家似乎忘记了所有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都是在联盟之间进行的。作为一个外交史学家，肯尼迪非常出人意料而想当然地认为：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可以战胜所有其他主要的强国；不结盟的奥地利在 1866 年可战胜普鲁士和意大利；一战中奥地利和德国可战胜英国、法国和俄国(以及后来的意大利

和美国)。通过把联合起来的经济资源相加，他精确地预见了谁是赢家。但最终获胜的是联盟。他们需要但没有得到解释。只有当给出他们所未能提供的解释时，霸权理论家才能把法国和德国描述成一个“失败的霸权挑战者”，而不是一个实际的霸主。如果失败者通过谈判使自己加入更强有力的联盟，他们就会成为胜利者，即合理的霸主候选人。

众所周知，他们在外交上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首先，他们的国家是松散的，互不相同的政治成形使国家有着互相矛盾的外交倾向，同时还缺少宪法来解决派别斗争。其次，别具一格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他们只是把目光投向国内，而忽视了联盟中“外国人”的作用。外交也有利于和平。19 世纪的和平更多的是由强国之间的外交决定的。而英国的霸权对此则影响甚微；同样它的衰退也多是由于这种外交的转换，而非英国的衰落。

5. 领导艺术。复杂的因果关系产生了短的周期和不可预见性。在紧急关头作出的外交和军事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类似于没有规范的“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竞技场就受到现实主义的青睐。外交家根据他们自己理解中的国家利益作出决断，而不顾及盟国因素。他们很难预见到结局，因为每个决断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第二十一章，在整个世界卷入一战的关头，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作战的不确定性更为严重。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留下了大量有关奥斯特利茨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的值得注意的叙述，这是他作为一个俄国炮兵军官参加土耳其战争，从亲身经历中搜集的资料。曾经有一次火炮起火，战场被浓烟笼罩，指挥官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做出准确的战术决策了。有时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根据纸上谈兵的军事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可以统观全局)则是错误的。

在偶发的小集团和个人决策的制定中，一些结局的出现带有偶然性——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随意，但却是从许多偶然的薄弱环节的串联中冒了出来(交战双方几个指挥官的决策、军队的道德信念、枪支的质量、天气的变化、战场的变换等诸如此类的因素)。这需要超凡的外交

和军事才能。如果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渊博的知识，那么一些人作出的决断将会是灾难性的，不合时宜的。奥地利将军可悲的轮替(来自托尔斯泰的“不幸的马克”在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遭遇和查理公爵的预测)通常是由于他们的鲁莽。其他的政治家和将军在外交或战争方面颇有远见，在有效开展工作和激发军队战斗力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洞察力，他们虽然不能把上述因素完全结合起来，但在事实上这些因素是奏效的。托尔斯泰相信库图佐夫将军是一位具有懒散、高龄和精明特点的独特人物，是这一特征让他打败了伟大的波拿巴。

传统上我们把“天赋”描绘成独特的个性(Rosenau, 1966)，尽管它在社会上被理解为领导地位。远见和天赋可在任何权力组织身上发现，发明家和成功的创业者也可拥有它。但在经济权力网络中，竞争、模仿和适应是更加形式化的和反复的，并且进展缓慢，远见受到市场力量的检查和限制。将军和外交家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的决定可能会使整个世界翻天覆地——像有缺点的军事天才波拿巴和外交天才俾斯麦所做的那样。

1760—1914 年的经济强国与霸权

从保罗·拜洛克经济统计学的恢弘巨著中，我可以掂出强国的经济力量。如果给出的数据是不完全正确的，那么数字只是残酷的指示器，并且一些是有争议的。(法国数字是学者的舞台，第三世界的数字则大部分是猜测的结果)当发展水平悬殊很大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字是不足为据的，所以我把目光对准了部门统计学。经济强国有助于权力的决定。这一时期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大型的制造工业和高效的农业。哪一个强国具备这些条件呢?

在表 8.1—8.4 上最为突出的发现就是西方经济权力的全球性扩张。表 8.2 统计表表明在 1800 年以前全部西方的工业生产是比不上中国的。

然后是欧洲和北美占全球工业生产的2/3，到1913年，则超过9/10。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这种变化，因为他们或许低估了自然经济(在被市场化之前或我们能衡量它之前，它消耗掉大部分剩余额)生产。但这种赶超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数字表明经济权力的同时，也更好的表明了地缘政治权力。因为国家和武装力量依靠市场化的、可衡量的生产剩余才能存在。拜洛克指出西方资本主义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如表8.4所示。

表8.1 各强国在欧洲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1830，1913

	1830		1913	
	%GNP	排名	%GNP	排名
俄　国	18.1	1	20.4	1
法　国	14.8	2	10.7	4
英　国	14.2	3	17.2	3
德　国	12.5	4	19.4	2
奥匈帝国	12.4	5	10.1	5
意大利	9.6	6	6.1	6
西班牙	6.2	7	2.9	7

资料来源：Bairoch 1976a, p.282。

表8.2 国民工业生产总值，1750—1913

(英国在19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0)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1913
所有发达国家	34	47	73	143	223	481	863
奥匈帝国	4	5	6	10	14	26	41
法国	5	6	10	18	25	37	57
德国	4	5	7	11	27	71	138
俄国	6	8	10	16	25	48	77
英国	2	6	18	45	73	100	127
美国		1	5	16	47	128	298
日本	5	5	5	6	8	13	25
第三世界	93	99	112	83	67	60	70
中国	42	49	55	44	40	34	33
世界总计	127	147	184	226	320	541	933

资料来源：Bairoch 1982, 表8。

表 8.3　国民农业发展的人均水平，1840—1910

［100＝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年净值产量(千万卡)］

	1840	1860	1880	1900	1910
奥匈帝国	75	85	100	110	—
法国	115	145	140	155	170
德国	75	105	145	220	250
俄国	70	75	70	90	110
英国	175	200	235	225	235
美国	215	225	290	310	420
日本	—	—	16	20	26

资料来源：Bairoch 1965,表 1。 奥地利的数字来自 Bairoch 1973，表 2。

表 8.4　人均工业化水平，1750—1913(英国 1900 年的水平＝100)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1913
所有发达国家	8	8	11	16	24	35	55
奥匈帝国	7	7	8	11	15	23	32
法国	9	9	12	20	28	39	59
德国	8	8	9	15	25	52	85
俄国	6	6	7	8	10	15	20
英国	10	16	25	64	87	100	115
美国	4	9	14	21	38	69	126
日本	7	7	7	7	9	12	20
第三世界	7	6	6	4	3	2	2
中国	8	6	6	4	4	3	3
世界总计	7	6	7	7	9	14	21

资料来源：Bairoch 1982,表 9。

随着西方廉价商品洪水般的涌人，中国和印度的原材料出口大为减少。 这种在地缘经济强国方面史无前例的变化，使得 19 世纪的西方在全球、在权力优势、在文化霸权一切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

在整个欧洲，俄国的所有资源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其人口规模和缓慢发展的经济决定的。 表 8.1 表明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 1830 年占据绝对优势，而在 1913 年仍略为领先。 表 8.2 表明俄国的

工业生产总值虽逐渐落在了英国然后是美国和德国的后边，然而它仍然是强国中的一员。与之相反，表 8.3 和表 8.4 表明俄国在工业和农业上的人均水平被其他强国远远抛在了后边。现代化在一个世纪中疯狂扩张其组织容量，被证明是代价惨重的。俄国的军事规模仍然强大，但其效率却下降了。

1760 年前后，俄国的所有经济资源受到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即英国和法国的挑战。但到 19 世纪法国又先后被英、德、美三国远远超过，失去了昔日的领导地位。英国一跃成为第一强国，因其从 1830 年到 1880 年的明显的工业优势和 1900 年前最为有效的农业(与美国一起)而稳坐经济第一把交椅(见表 8.3)。美国由于远隔重洋，1815 年以前没有卷入到欧洲的地缘政治。但这些表格却揭示了它在经济权力方面引人注目的增长。到 1913 年，其工业经济规模是任何他国的两倍——一个强大但仍在沉睡的强国。第三个成功的范例是德国，它曾经与其中欧的对手奥地利势均力敌。然而到 1913 年，其工业和农业总收入一跃而居欧洲首位(然而在人均工业生产方面仍落后于英国)。这一时期奥地利的经济权力依然在欧洲排名第四，其工业甚至赶上了法国。但如表 8.3 所示，奥地利的农业依然很落后。再加上政治的软弱(将在第十章讨论)，这严重削弱了奥地利的实力。

表中所揭示的绝对霸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单个国家或强国，而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全球和平的、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在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观点里，无论他们的贸易者、雇佣者和殖民者是英国人、法国人或实际上是丹麦人，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支配权是西方的、基督教的和白人的。这展现了实质上相同的权力机构。从全球视角来看，法国、英国和德国之间的争斗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无论谁赢，欧洲国家(或它们的殖民势力)依然以完全相似的方式统治着世界。这种多权力运作者的文明的霸主大部分不是来自单个的国家。

然而这些表格也揭示出了西方潜在的二流霸主。尽管英国的经济在西方统领全球的过程中从未在西方占压倒性优势，但显而易见它是

19世纪的经济领袖。是否可视其为霸权呢？这取决于如何来定义“霸权”。我首先采用了一个有点随心所欲的标准。从1817年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要求皇家海军达到卡斯尔累的“两强标准”，即拥有比任何实力相近的两国海军总和更多的一流舰船(通常比三国或四国总和还要多)。那是无可争议的海上霸权——在1900年以前无人对此持异议。难道是英国的经济适合这种标准吗？是英国的经济比任何两个实力相近强国的经济之和规模更大、更为先进吗？

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适合两强标准。它甚至从来都不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首先是俄国第一，后来是美国居上)。但英国的经济现代化确实适合这种标准。表8.2表明英国在1860到1880年之间的工业生产总值比任何两强的总和都要多。但到了1900年，英国的工业甚至不再位居第一；并且到了1913年，工业的两强标准转向了美国，并被保持了50年。英国人均生产的两强标准是衡量经济现代化的更好尺度，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1900年英国依然位居世界第一；直到1913年才落在了美国之后(见表8.4)。1860年前后，英国在大多数现代工业领域的主导性地位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它开采了占世界半数的铁、煤、褐煤，加工了占世界半数的棉花。因此英国关于霸权的统计学特征可能是经济规模与现代化的某种妥协。

这表明了一种模糊而短命的英国全球化经济霸权，我称之为“次霸权”。然而它必须远远超过17世纪荷兰共和国所拥有的经济优势，世界体系称荷兰为前霸主。尽管这一时期荷兰拥有最为现代的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它在陆地上的所有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却比不上西班牙。荷兰的经济不可能符合我的两强标准，尽管它的海军具备这一实力。更早一些的葡萄牙，尽管它的经济在陆上处于小国地位，却拥有让任何国家相形见绌的海军。且不论后来美国的成就如何，除罗马帝国外再没有西方国家同时取得经济和军事霸权。在这一章中我们再次看到，欧洲国家有着阻碍全部霸权实现的长期经历。

然而高度发展的英国霸权是现实存在的。首先霸权是区域性高度发展的，与其他强国达成了外交协议，恰如近代美国与苏联秘密达成的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协议。其次，霸权是部门高度发展的，正像霸权理论家自己承认的那样。在制造业方面，英国曾赢得短暂但规模宏大的历史性领导地位，其他国家向其学习并奋起直追。但英国其他方面的专业发展存在的时间要长一些，有些甚至到 1914 年后。大多数行业都是与商品流通有关的行为，英厄姆(1984)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如金融手段、航运、分配，都把英币作为流通储备。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所持有的超越民族的手段。因此矛盾之处在于：超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是独具特色的英国资本主义。

所以从经济角度看英国仅是“高度发展的次霸权”。它被假设为一个高度发展但绝对军事化的霸权——两强海军标准。这就确保了英国的航运和国际商业贸易,而主要产生于对印度征服的英币储备角色则保持了贸易和大量黄金储备间的良好平衡。霸权还需具备政治前提：国库和英国银行的城市权被侵占(Ingham, 1984)。在国外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很多人强调霸权无须限制——霸权原则体现在每个人的兴趣、宽厚甚至“本性”中(Keohane, 1894； Gilpin, 1987, pp. 2—3， Arrighi, 1990)。但是我认为，这离“霸权”的标准还差一点；英国仅是领头的强国，通过与其他强国的协调成为超民族的统治者。英国并不像霸权理论家定义的那样强大。西方是世界的霸主，但它仍是多权力运作者的文明。它的外交政策和超越民族的规范，帮助构筑了资本主义。面对激烈的竞争，它在前一阶段是如何运作的呢？

18 世纪的英法竞争

1760 年前后，英、法、俄三个强国脱颖而出。东方的俄国由于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其防线坚不可摧，并且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中

亚国家的衰落，俄国得以向南方和东方扩张。俄国占据了半个亚洲，从某种意义上远离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此未插手西方的英法争霸。除了这三个国家，紧接下来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二者对中欧的角逐我将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进行讨论。这五个国家的战争和结盟构成了西方地缘政治的核心。下一个是外围的美国，在欧洲大陆之外只是一个间歇性的地缘政治角色。再接下来的强国中只是属于次要角色的西班牙、荷兰、瑞典以及一系列小国。

英法几乎在整个18世纪都在争夺西欧和殖民地领导权，并且引领其他强国追随自己卷入了欧洲大陆的战争。根据霍尔斯蒂(1991：89)对1714到1814年战争的看法，挑起战争的动机67%是领土的扩张，36%是商业和航海争端，22%是王位继承争端，最后就是一些小的争端。因为领土的价值高于商业，且二者都极为重要，攫取利益的观念就被领土扩张强烈地激发起来。竞争的混合因素引自我在第三章定义的六个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中的五个。法国和其他强国正在断断续续地努力争夺欧洲的领土主导权，其他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则是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帝国主义驱动下的英法争霸(政权还没有动员广泛的社会帝国主义)。伯克直言不讳地指出："联合王国的商业因战争而导致繁荣。"凭着相对得心应手的军事和商业优势地位，欧洲海军与非洲国家进行不平等贸易。印度和北美是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莫卧儿王朝衰落后，英法的贸易集团就侵入了印度。当各国垄断了军权后，英法两国就接管了该国政权。印度的财富和贸易证明其潜力是无穷的。随着欧洲移民漂洋过海到北美，许多资本家剥削奴隶劳动，也经营起一项获利丰厚的贸易。现代帝国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的。

但强国之间并不总处于战争状态。在和平时期，它们致力于更加温和的方式，即出现于18世纪的重商主义。当国家在实际上不再鼓励以海上掠夺方式反对其竞争对手时，就积极地运用"权力"来确保"财富"。采取的措施即以关税、限额、贸易和船只禁运等方式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这些都受到装模作样的外交和偶尔的外来船只的影

响。重商主义没有明确的涵义，当没有这种政策时，事实上的经济就是由许多区域市场和超民族市场组成的，这样国家界限意义就不大了。然而国家仍是微不足道的，它只能极少地限制个人财产权，只享有有限的基本执行权力。走私似乎总是胜过合法的贸易，并且超民族的意识形态逃避检查控制。国家形成了两种以市场为目的的政治经济理论：温和的民族保护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世纪之末，一系列双边协议降低了部分关税，尽管多出自地缘政治的动机而非经济动机。

因此18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动是引人注目的，但殖民扩张却十分简单：伊斯兰国家和西班牙的衰落提供了权力真空；大国傲然征服小国。三个强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发动了大多数的殖民战争；其他国家则专注于欧洲的陆地战争。尽管战争在方式上仍是“有限的”和“绅士的”，但正如霍尔斯蒂所指出的，陆战不再局限于以前的目标，因为各强国正伺机把它国彻底肢解。随着侵略野心的增强，战争也加剧了。只有联盟威慑、战争耗资，或许还有比战争确实可取的弥散的文明情感能阻止强国远离连绵不断的战争(Holsti, 1991, pp.87—95, 105—108)。

究竟鹿死谁手？起先，法国位居第一，它的国内资源最丰富，人口更稠密，更为富有。法国政府利用这些资源建立了一支强大有效的部队，从而成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霸主，仅受到类似于荷兰与英国庞大联盟的限制。随之英国开始威胁到法国。它的农业飞速发展，海运商业增强了海上主导权(熟练的水手可在和平时期的商船上进行训练)。它的制造业在18世纪中期以后缓慢发展，尽管农业和服务业在全国范围内仍超过工业。英国的经济优势是必要的，但不足以支撑对法国的挑战。

其次，英国比法国更具有凝聚力(如第四章所述)。法国的版图扩张面临两种途径：进入欧洲和越过大西洋。这两种主张都在法国国内形成一派，且他们的压力使法国不仅要成为欧洲陆上强国，而且要成为海上殖民强国。随着英国的崛起，法国在两大野心面前有点力不从心。它缺乏独裁政治体制来有效解决政治冲突。英国则相对得心应手，在

国会之外存在专制君主。英国除了占有汉诺威(它的王朝家族)，它已经放弃了对欧洲的领土野心，这样做是为了穿越大西洋进行海上商业扩张，并且在其他强国衰弱的欧洲边缘建立海上据点，同时这种策略被命名为“公海政策”(Brewer, 1989)。军队规模很小，政府集中精力发展海军，以保卫海峡，防止敌人登陆英国。皇家海军的威望、来源、作战效率是有口皆碑的。“统治阶级民族”互相争吵而又通过国会多数票来解决争端。于是就形成了地缘政治意图和军事契约。

第三，这也得益于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随着商业的繁荣，英国通过英格兰银行、自治城市和国库(如第四章所述)发展金融制度，动用地权和商业收入加强海军力量。凯恩和霍普金斯(1986, 1987)称“陆上利益”为“绅士资本主义”，即旧政权、军事和资本主义国家定型的融合。他们同意将税收和贷款用以保障海军的扩张。飞涨的战争花费意味着拥有流动资产(商业)的国家，比资产都限定在大陆上的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在这一点上英国比法国有优势，恰如荷兰比西班牙有优势一样。尽管战争都耗资巨大，但全球范围内成功的海上战争比欧洲陆战能获取更多的商业回报。18 世纪的战争拖垮了所有的强国，但相对于其他强国，英国所受的影响则微不足道。

通过 18 世纪出色的领导艺术，再加上这三个有利因素，使英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英国政府利用其流动的商业资金组成了大陆联盟(起初是保卫汉诺威的需要)。英国皇家海军在法兰西帝国纵横驰骋并封锁了法国港口，这降低了法国流动商业资金组建自己联盟的可能性。皮特正确地断言：“在西里西亚将赢得加拿大”，那里它的普鲁士盟国正在战斗。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控制了印度的经济，这使得英国能够偿还借自荷兰的国债(Davis, 1979, p.55；Wallerstein, 1989, pp.85, 139—140, 181)。普鲁士看似败局已定，却出乎意料以自己特有的作战方式取得了胜利。英国和普鲁士联盟在战争中的地位上升了，而法国和其盟国的地位则下降了。英国以其传统的方式对此表示了谢意：把伦敦的酒馆命名为“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王妃”。

18世纪，英国赢得了所有的三次战争，而法国旧王朝的陆军和海军则在这三次战争中陷入了两线作战。英国唯一的一次失败是法国掉转矛头，以财政支援美国和爱尔兰叛乱者。英国扩张兵力，把陆军派往美国和爱尔兰，海军更是遍布全球。一艘法国军舰偷偷地、出其不意地把军队运往康瓦利斯勋爵投降的约克镇。但七年战争(1756—1763)确保了英国对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的主导地位，破坏了法国的港口经济，减少了法国的财政收入。北美殖民地的丧失被证明并非灾难性的，因为英美间的贸易仍在继续。英国在18世纪掌握了两个牟取暴利的途径：对印度的殖民掠夺和与北美的贸易。

对英国优势地位的简短概括包括全部五种权力的决定因素。英国经济增长并实现经济现代化，地缘经济与海上商业扩张紧密相联。这加强了社会精英和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并增强了把财富与思想转化为海权的国家能力。它的外交家在第二条战线以灵活的手腕引导流动商业资金向有效的军事联盟发展。像肯尼迪强调的那样，地缘政治权力与其他权力是相关的。英国权力与其对手法国的特征是有紧密关系的。

直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仍在欧洲大陆占优势，但英国和它的海军已控制了海岸线和扩张的帝国。我们不应该夸大任何一方的权力。英国的棉花、铁、采矿业已开始了革命。但它们的大部分权力更多地体现为超民族的，而不是民族的。法国政府仍信心百倍的(或许是错误的)与英国签订了1786年的《英法商业条约》，该条约削减了两国间的重商主义和关税。两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不能称其为霸主。法国吸取了外交上的教训，把目光对准了来自英国的威胁，在欧洲大陆保持了一种低姿态(它们也都是资金短缺)。

在英国军队不能打败法国军队，而法国军队也无力越过海峡时，两个强国都不能对彼此的国土予以打击。这就像肯尼迪就1800年前后的情景所描述过的一个相似的比喻："像鲸鱼和大象一样，在自己的领域内它们都是最大的生物。"(1988：124)皇家海军鲸鱼看起来可能是壮观

的，但它有大片的海洋要去控制。逻辑上的困难是巨大的，战船太小，在3 000吨以下，舰队的总船只不超过30艘。在望远镜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们用信号旗联系。海军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很难发现对方，更不用说进行决定意义的交战了。法国避免与它们相撞，英国则力图寻求交战机会，但很少成功。英国已上升为法国的对手。

欧洲旧王朝的外交家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规范的解释：保持权力均衡以反对可能出现的霸主。地缘政治可能在某一时段相安无事，战争费用的增加和掠夺对象的减少有效地制止了进一步的黩武主义。

这儿我提出一些与事实相反的假设。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发生，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战争，那么工业革命、超民族的资本主义方式以及全球帝国还是英国式的吗？英国霸权可能会出现问题吗？我们也不能确定。沃勒斯坦(1989)一反其早期著作中的经济主义观点，认为英国霸权缘于两种地缘政治的成功，对此他说不能解释为经济因素。第一种成功我刚刚讨论了；第二种成功涉及拿破仑，我接着就会谈到。对法国的制造业我比沃勒斯坦更倾向于悲观的看法，并且我把制造业和海上商业领导权分开来看。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工业革命对英国造成了有利的影响，对法国则造成了不利影响。但无论如何，英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更改的，这是由英法不同的国内经济和英国对制造业的同情态度所决定的。但如果没有商业殖民战争的利润，英国也不可能在19世纪的航运业、国际贸易和国际信贷中占主导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英国的规范就不会那么重要了。通过超民族主义和通过强国间协议分享认同和规范，这或许更混乱(如现实主义者所述)，或许(更有可能)更有秩序。

波拿巴失败的霸权

法国大革命出乎意料地爆发了。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法国转

向战争和征服，除了其传统外交政策或者现实的霸权策略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来源。它在宗教战争后首次介绍了其重要意义——远远超过攫取利益的战争。它还介绍了进入现代后政治经济的最终政权：社会帝国主义政权。它对旧政权阶级和民族的特殊威胁导致了激烈的阶级冲突，也促使法国革命军竭力去推翻旧政权及其外交体系。当时的战争变得较少限制性，较少职业化，并且与市场和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阶级联系得更紧密一些。首先，冲突波及法国以及其爱国者同盟——该同盟是为了反对旧政权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及一些小的君主和教会国家而成立的。但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它的军官救世主摇身一变，声言自己就是霸主。欧洲其他政权按习惯一致响应，但实际上是阶级利益的驱动。

拿破仑·波拿巴以实例论证了我的第五个权力决定因素——领导艺术天才。他的统治独一无二，没有君主的合法继承权，而是依靠专制。他是一个特殊的将军，只是历史偶然性注定了他的失败；他是一个在所有竞争对手中独领风骚并能够使革命制度化的政客。在本卷所涉及的时间内，拿破仑的才能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恐怕无人能比。我们有必要考察他的动机、他的成功和他的失误。

早在1799年波拿巴似乎就切实决定夺取全球霸权；图谋把英国的部分霸权转向法国。他追求地缘政治帝国主义。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权力”会给法国带来“财富”，但他还是对此考虑甚少，并且没有选好经济获益的明确目标。他很清楚：“我的权力取决于我的荣誉和我所赢得的一系列胜利的荣誉。如果我不用新的荣誉和新的胜利去充实它，那么我的权力将会失去。是征服造就了我，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持现在的地位。”他会用法国的民法、法国的共同市场(大陆体系)以及法国模式的国家制度来使霸权制度化。融合的最高形式即王朝——他的高级将领和家庭成员都被任命为周边保护国的统治者——尽管这降低了他组织起来的心神不宁的阶级和民族的认同感。

在大革命之前，波拿巴的经济权力仅与波旁王朝时相仿。法国经

济富足，这是波拿巴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法国资源仅与英国相当，远远比不上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三国之和，甚至这还不包括它偶尔与之为敌的俄国。波拿巴的大陆霸权主要基于他特殊的能力，即组织将资源转化为集中的权势和军事权力。他以三种方式来发挥革命军的优势，激发革命军的意识形态热情，每一种方式都大力冲击了秩序问题。

1. 他在法国和其附庸“姐妹共和国”的市民官员中间激发起一股革命民族理想，给他们提供职业、自由和动力。约在 1807 年前后，他强征入伍的士兵和雇佣士兵与其他军队的士兵毫无二致——尽管他们依然怀有明显的基于对自己皇帝的崇敬的道德信念。但被现代价值观念武装起来、并得到择优录取制度确认的军官集团和专业人员，则保持了比其他多数军队更多的政治保证，特别是在中欧国家，很多人怀疑其未经改革的政权是否足够地“现代”以存活下来。波拿巴把意识形态权力与军事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公民战士特别是下层军官和无委任状军官的“内在道德”。这进一步激怒了他的旧政权敌人。这不仅是指国外的现实敌人，还指波拿巴在他们的领土上煽动阶级和民族的颠覆。这场战争带来了意识形态和对新社会秩序的忧虑。

2. 他以军事方式来组织由欧洲农业革命产生的经济权力，并把它与军官道德联在一起。在第一卷中图表 12.2 揭示了在 18 世纪，西北欧和东欧的人口几乎以 50% 的幅度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谷物总产量比率的上升造成的，如第一卷表 12.2 所示。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增加，他们减轻了历史战争的主要后勤保障限制，即由 50 英里外的地方保障食物的难题。大部队只有在春末到秋中这段适合出征的时间才能来去自如。但那一时期对人员和马匹的供给仅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得以实现。波拿巴的疏散战略解决了这一点。18 世纪的军队已朝更为分散的体系发展，波拿巴把这一点更为发扬广大。他依靠运动战来保持战略主动权，他仅用概括的命令将部队分为自治的几部分，然后以相似的自治权将其分为军或师，疏散到辽阔的前线和许多交通要道。官员们将利用他们的自主权决定驻扎在乡村，而远离要塞(直到耗尽当地

的食物供应)。他认为，一个约2.5万—3万人的兵团，可以依赖自己来判断是否能避免战役和是否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遭到强兵突袭。所有这些极大地提升了机动部队和经济的规模。这场战争比18世纪的战争带来了经济的更大混乱，尽管它有潜力重新整理经济秩序。

3. 他把官员道德、农民的盈余以及疏散战略和运动能力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运动战略。他把几个兵团分散运送，越过辽阔的前线去包围敌人，并且通过威胁其首都和宫廷(当时首都太大以致不能作为要塞来防御)达到签订协议的目的。当敌军准备好进行战争时，拿破仑迅速集中兵力，反击敌军战线上的某一环节，在数量上超过敌人，冲破敌防线，使之导向常规战争。战胜后，法军会利用战败的敌人来武装自己。在西欧和中欧，这一策略特别奏效，尤其是对付协调力差的联盟军队。法国在联盟增援前就迅速出兵。无论敌人撤退到哪儿，法军都会根据发现的装备追上他。当统治者丧失首都或从国土上逃跑时，他会要求缔结和约(在后勤方面，参看 Van Creveld, 1977, pp.34—35，40—74；在战略方面，参看 Chandler, 1967, pp.133—201；Strachan, 1973, pp.25—37)。这发生在弱一些的大国和两个中欧强国，即奥地利和普鲁士身上。甚至强大的俄国军队被击败后，沙皇也被迫接受和约的条件。波拿巴凭借集中优势兵力和军权的机动性，曾打败过更胜一筹的经济强国。他对社会权力全部来源的动员组织，意味着比起在18世纪的战争中国家所处的形势，那时的国家更容易被入侵、击败，然后也更容易被强行重组起来。

拿破仑在陆地上强行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秩序。但他在海上的霸权图谋却失败了。1789年后，法国海军由于不能保卫大革命而停止发展。尽管拿破仑重建了海军，但他缺乏海军方面的经验或者说远见。他在中东和波罗的海的霸权图谋，在尼罗河和哥本哈根战役中被纳尔逊的舰队粉碎了。他于是决定(像后来的希特勒一样)获取大英帝国权力的最简便途径就是入侵英国本土。只要越过海峡，英国就无法与“伟大军队”抗衡了(Glover, 1973)。但皇家海军控制了海峡，法国要么进

攻，要么把其从近海引开。法国、荷兰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在数量上超过英国，但在船艺和战斗经验上却大为逊色。舰队司令们的怯懦也表明他们承认这一点。在拿破仑的威胁恫吓下，法国和西班牙的主要作战舰队都驶向了特拉法加角附近。

像所有的战役一样，特拉法加战役存在着偶然性因素，其运行也别具一格。但它的结果看起来极像战争评论家所说的，如战役本身呈现给我们的。一旦占优势的英国军队的调动运用了纳尔逊的冒险战略，即径直穿过法西战线，那么法国就败局已定。经过六小时的激战，超过半数的法西舰只被击毁或被俘获，其中伴随着大量的人员伤亡(参见基根1988年的一个图表说明)。1805年10月21日下午6点，纳尔逊阵亡，但地球上并未出现法国霸权，也未出现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帝国。由于较少受到多权力运作者文明的制约，海空仍让人感觉自由自在。

英国的海权取得了胜利。由于对海权的控制和走私对大陆体系的破坏，英国现在强制推行经济封锁。俄国在1810年放弃了这一政策，这表明沙皇敏感地感觉到了历史的潮流。法国的国际贸易遭到了破坏(这是从1793年，英国夺取了法国在美洲的主要港口圣多明各开始的一个过程)。英国封锁了伦敦的主要贸易对手——阿姆斯特丹。英国在1815年前的出口翻了一番。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法国的某些工业也十分繁荣。但法国在技术上落在英国的后面，进入全球市场和信贷的能力也削弱了。法国在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多数领地也被剥夺了。英国凭借实力，确立了其海上贸易霸权，其制造业也遥遥领先。英国的成功在于把制造业领先地位和商业主导地位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确立了全面的次霸权。

随着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的封锁，拿破仑除了在海上重整旗鼓，就是在欧洲大陆争取霸权，别无第三条路可走。(再次像极了后来的希特勒)他选择了后者。1807年后，只有西班牙和俄国这两个最大也是最反动的国家拒不让步。西班牙的情况很特殊，因为英国海军能够登陆援助那儿的起义。波拿巴已经征服西班牙，并任命其兄约瑟夫继

承西班牙的王位。 约瑟夫竭尽全力对付一次民众叛乱。 这次叛乱得到了由惠灵顿领导的英军的支持，并得到了海军的援助。 当游击队员和惠灵顿的边战边退战略牵制了法国 27 万大军时，波拿巴入侵了俄国。

这是致命的失误，也是三次失误中——拿破仑在企图建立未来一百三十年间中欧头号帝国的过程中，曾犯下的三次显著而类似的失误——最严重的一次。 波拿巴决定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与 1914 年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和 1941 年希特勒的策略同出一辙。 依赖于一系列快速胜利产生的信心，他们的常规战略就是准备速战速决，对他们所低估的敌人取得决定性胜利，然后转向更加顽固不化的敌人。 但这种快速胜利并没有变成事实。 在一场消耗战中，大部队可能会取得胜利(如肯尼迪所述)。 1914 年，德国的高级指挥低估了他的西方敌人(错误判断了法国军队的力量和英国外交支持的力量)。 1812 年和 1941 年的失败，都是没有正确理解俄国政权与所有遭遇过的其他政权的显著不同。 俄国是反动的，俄国的专制政权和贵族官员集团还没有被现代化政治分开，并且牢牢控制着农民。

1812 年 6 月，拿破仑带领 45 万人(一半是法军，一半是盟军)越过俄国边界，留下其余的 15 万包抄俄国的侧翼和后部——这是人们所知的西方历史上、甚至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军队(我怀疑中国的数百万大军在一次战役中会动员这个数目的军队)。 他们带足了给养(尽管没有足够的牲口饲料)，能支撑 24 天——运货马车和舰只 20 天，人员 4 天，其余的靠驻扎的乡村来补给。 俄国军官在战术上并不统一，结果(或许是意料之外)是沿袭惠灵顿的西班牙战术，力图避免战斗。 交通线的拉长、后勤保障的困难以及俄军的反击，削弱了拿破仑的实际作战能力。 在他到达莫斯科后的第十八天，可调动的军队已只剩下 13 万人。 库图佐夫迫于宫廷的压力，极不情愿地把军队停留在了博罗季诺的阵地。 像往常一样，俄国官兵没有临阵逃脱，而是坚守阵地，不惜流血，使法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 库图佐夫承受不了令人恐怖的惨重伤亡，最终撤退。 法军占领了又一个首都。

但出乎波拿巴意料的是，俄国政府并没有投降。库图佐夫疏散了自己的部队，在初冬向东部进军。俄国的经济、地缘经济和政治条件——它的幅员、它的冬天、政治和经济的落后——现在都变成了有利因素。像1941年一样，俄国政府独断专行，比任何欧洲政府都更少地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影响。它能放弃领土，烧毁其臣民的房屋和城市，破坏农民的谷物。它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比波拿巴的任何其他敌人都更得心应手。沙皇和他的宫廷，不像他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同僚那样，急于考虑进行和谈。

破天荒第一次，拿破仑没有跟在敌人后面，他也不能在已被俄军烧成空城的莫斯科度过冬季。10月份，在无力坚持的情况下，他命令仅存的10万壮兵撤退。因为他凭借的是一时冲动，所以撤退瓦解了残余的“伟大军队”的士气。他的给养所剩无几，在乡村已呆不下去。俄军的“严酷的冬季”包含两种战略。在初冬和冬末，雨水和解冻会使道路泥泞，从而导致运输受阻，枪支和给养难以运到，拿破仑的军队会由于缺乏装备和食物而屈服；在隆冬冰雪会把他们冻死。这两种战略都会打败法军。分散的俄军小分队力图避免战斗，而是破坏行军线周围的乡村(和农民)来支援“严酷的冬季”战略。当拿破仑和它的高级官员放弃了他们的士兵，当士兵丢掉了他们笨重的军需品和运输工具，当健康的士兵丢下了伤病员，当骑兵吃掉了战马，“伟大军队”便成了溃不成军、逃离战线的乌合之众。

内伊元帅在给妻子的信中，极其痛苦地写道：“军队已成为毫无作战目的的乌合之众。饥饿不堪、瘟疫横行……‘普遍的饥荒’和‘严酷的冬季’已征服了‘伟大军队’”(Markham, 1963, pp.184—185)。军队在实实在在地大量缩减，不足4万人的法军艰难地退入德国境内，这是自公元9年瓦鲁斯军团消失在德国丛林中以来，主力部队最彻底的损失。

一旦俄国战役失利，拿破仑就同时失去了夺取霸权的机会。君主们害怕爱国者就像害怕拿破仑一样。他们为了恢复“均衡”的旧秩

序，甚至不惜与拿破仑共享天下。他们提出了协定条款，但拿破仑不愿接受帝国的失败。他征募了新的军队，但他的敌人也不甘落后。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他们被迫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进行动员。拿破仑独一无二的优势丧失了。俄军和英军(和英国的经费)在法国东部和南部成功地集结，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坚定了信念。俄、英、普、奥四国再加上瑞典合伙对付拿破仑。1812到1815年之间，强国间的同盟恢复了欧洲多权力运作者的文明。盟军参加了莱比锡战役(民族之战)到滑铁卢战役——惠灵顿率领的军队抵抗住法军、坚持到普军到来的地方——的一系列交战。联盟在凡尔赛宫以外交方式重新确立了均势政策。

让我再作一次相反的假设，算是后知之明吧。我认为是波拿巴的领导才能颠覆了他。他采用了错误的外交战术。他应该循序渐进，首先对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盟，或者首先对付俄国人——当然前提条件是与其他敌人讲和，然后再转向它国。他的主力部队应该能够打退惠灵顿的进攻，重建的海军应该能够防守海岸线。或许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征服英国或俄国，但他赢得陆战和占领俄国的欧洲部分的能力，应该会使英国小心谨慎，使俄国沙皇受他的保护。这或许会开创法国陆上霸权反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新时期——与近几年美苏争霸相似的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英法或许会达成冷战的妥协，否则封锁会继续进行，法国将不得不建立强大的舰队，或者英国被迫提升其陆上力量。它们会寻找保护国，派遣远洋海军，加强经济封锁来反对大陆体系。由于这两个国家对国内和地缘政治的干涉，跨国主义可能会被减弱。工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其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命运的影响。

或许法国的大陆霸权不可能长久。这几个主要的落后国家——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会在英国的支持下崛起，恰如奥普在英俄支持下崛起一样。对于假设的结果我们不能确定。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那些企图在实质的多国家体系中争夺霸权的国家，其外交和军事战略必须是近乎完美的。但拿破仑的政策却并非如此。在中世纪，教

皇是拥有把任何国家逐出教会的特权的统治者，这就给了其他强国有机可乘的外交信号。当1812年波拿巴犯了致命错误时，英俄特殊的外交政策也暗示了同样的机会。地缘政治权力包括外交政策，还包括把经济资源向均势权力的动员。如帕雷托所述，狐狸和狮子的特性很少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强国身上出现。拿破仑发迹于雄狮般的军国主义，他摈弃了狐狸式的外交策略。法国的雄狮战略成就了其霸权，但被英俄的狐狸策略推翻了。外交技巧对西方强国关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拿破仑的战败并非由于经济权力。在他招致了众多的反法同盟国家时，与20世纪的德国相比，二者的经济差距微乎其微。任何单个强国在一场经济消耗战中，无论其武装力量作战如何勇猛，都会被几个强国的联合作战拖垮。但不幸的是，拿破仑像德国皇帝和希特勒一样，被迫从闪击战转向了消耗战。他追求的是霸权冒险，这与三个德国人即中世纪的国王亨利四世、威廉皇帝和希特勒所追求的一样。或许正如惠灵顿描述自己胜利的名言一样，每一次都是“注定的相差无几的事情”，而失败的地区相似性都是引人注目的。

一个强国位于欧洲中心，它的主要对手分布于两翼。它动员了相当的经济资源，转化为不同寻常的军事力量。但这激怒了两线有作战能力的对手，它们联合起来组成外交同盟。两线同盟不能很好地协调战略，即使按照19世纪早期的后勤保障水平，它们甚至也不能及时运送军队和供给到彼此的前线，帮对方解围(像一战中所能做的那样)。但它们能增加资源到前线，以此来压倒敌人，并且能阻止机动援兵的进入(靠优势交通线的有利条件)。如果它们在总的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方面占绝对优势，这场消耗战在正常情况下会取得胜利。波拿巴或者希特勒所有的才能、法军和德军所有的战斗力量，苦于这种至关重要的外交策略，都变成了军事力量这一不利条件。只有亨利通过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调整了这种劣势。亨利个人是只狐狸，他巧妙周旋，只在教皇面前卑躬屈膝。其他人都像猛狮一样作战，但最终一无所有。

这种霸权的丧失是由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

力和外交权力的关系决定的，是在紧急关头由领导艺术促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由有缺陷的天才决定的。他的致命错误是将霸主的桂冠拱手让给了敌人。普鲁士将军格奈瑟瑙以讥讽的口吻描述道：

> 大不列颠并不比这个暴徒有更多的责任。在他挑起这一系列事端的过程中，英国的伟大声望和财富都得到了大的提升。它是海上的主人，现在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世界贸易中，它绝不惧怕任何一个对手。(Kennedy, 1988, p.139)

强国间的协调与平衡，1815—1880 年

从 1815 年到 1914 年这一段时间并不是一个很“和平的世纪”。霍尔斯蒂(1941：142)指出，在 1815—1914 年的 100 年间，跨越国际体系的战争仅比上个世纪少了 13%。然而和平仍主导着欧洲的中心(尽管不包括它的外围)。列强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已学会了小心谨慎。尽管中心在 1848—1871 年也爆发了战争，但这些战争都短暂而激烈，并具有决定意义。紧接着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在 1914 年的战火中达到了顶点。这种变更使得 19 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纪，引发人们在这个世纪里探索国际和平与秩序的原因。许多作者把和平与秩序的出现归因为 1815 年后在英国霸权下欧洲中部超民族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因为 1880 年英国霸权的丧失。但这过于考虑经济因素，也过于在意英国的权力。19 世纪的世界秩序实际上取决于三个相互交织的权力网：外交谈判达成的强国间的协调(以重建的旧秩序所规定的团结一致作为基础)，英帝国高度发展的次霸权以及扩散的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超民族主义。所有这三种相互交织因素的衰落导致了 1880 年后的紧张局势。

对大多数开明者而言，该时期的相对和平宣告了新的世界秩序的到

来——从此时开始的19世纪的超民族和平主义这一社会理论在第二章中已讨论过了。关于1914年和1939年的后见之明使得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有些不合时宜。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怎样才是合理的呢？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期超民族的和平主义是否已几乎征服了西方？

如我们在第十二章将会看到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家绝大多数都来自旧的统治阶级。他们普遍的社会认同增强了权力现实主义的平衡。他们构筑了一个微妙的同盟体系，来阻止毁灭性战争、革命阶级和民族动员这三者的任何令人不安的再次的联合。法国把其政治家的态度转向了战争、国际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三者休戚相关，这是18世纪所未曾出现的。战争带来了社会灾难。他们决定采用割据手段维护欧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殖民领地的稳定，并且控制阶级关系，但仍然靠市场调节经济(也伴随一定程度的民族保护主义)。俄国将其扩张范围延伸到了欧洲之外，并在那儿建立起了大面积的势力范围。普鲁士和奥地利致力于暗中扩张来对抗列强，但更重要的是对付小一些的国家。欧洲列强规定的团结一致大为增强，这根源于共同的阶级和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它们的权力平衡既是地缘政治的——在强国之间，又是超越阶级的——在旧君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

他们的努力卓有成效。[1]英、俄、普、奥四国通过同盟的协约与平衡开创了30年的和平和国内稳定。立宪主义缓慢发展，但君主仍然与他们的出身和他们掌握的多数权力有关，教堂仍然与灵魂有关。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衰落、工业的停滞还是国际和平，也不管是强国地位的上升或衰落，异常自觉的协约政权的策略带来了欧洲的阶级稳定。法国受到了众君主国的围攻，这些国家的君主得到了列强的认可——夸大的荷兰和萨丁尼亚—皮蒙特王国，复辟的波旁王朝控制下的西班牙以及割让给普鲁士的莱茵区。来自下层和外部的革命被来自上层的温和改革和镇压所取代。到19世纪中期，断断续续的革命已被镇压，一个驯服的法国也承认了这种协约。

我们很难把这些协约国分出高下，但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接近地缘政

治霸权。毫无疑问权力归属于1815年的大事：沙皇与20万俄军长途跋涉穿过巴黎(另外还有60万机动兵力在其他地方)，而此时惠灵顿的军队仍在附近，并且英国战舰包围了法国海岸。但俄军返回了祖国，沙皇亚历山大沉迷于他的梦想，俄国军事力量在19世纪中期以后衰落了。在凡尔赛的两个主导性人物即两个强烈维持现状的强国的代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亲王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梅特涅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持续了二十年。奥地利深受国内动乱的羁绊，人们把中欧冲突的解决更多地寄希望于普鲁士而不是奥地利。然而至迟到1850年，在“奥尔米茨之辱”中，普鲁士宁愿改变立场，遣散军队，也不愿再冒险与奥地利进行战争。陆上强国彼此之间是激烈的竞争对手。美国尽管其权力在稳步增长，但也是在其长远利益与协约国相一致时，才偶尔出手相助。

英国从大多数陆上事务中抽身，并没有去填充空缺的领导地位，外交大臣坎宁(卡斯尔累的继任者)退出了协约，因为他相信这将会由俄国来主导。英国从来都没有称霸过欧洲，就像波拿巴所为之奋斗的、后来美国已实现的那样称霸欧洲。阿里吉(1990)的判定是错误的，即认为这个协约“从一开始就主要是英国支配欧洲大陆的一种工具”。英国仍然斤斤计较它干涉欧洲大陆的开支，并沾沾自喜于它在地中海驻军的低支出和在其他地区的海军优势。的确，陆上强国陷入了恶性的经济困境，不得不向英国负债，成为英国的债券持有人。坎宁主张靠英国的金融权力迫使其他强国就范，但他很快又从这一立场退缩和害怕了，主要的是这将会破坏权力的均衡。

英国的权力在其他地区几乎不受限制，已经没有殖民对手能与之抗衡。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帝国都大为削弱，英帝国现在则大为提升(Shaw, 1970, p.2)。在其国界外的地方，在东地中海、远东，以及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的主要对手好像是俄国——英国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标志，英国已经取得了高度发展的海上商业霸权、洲际霸权和殖民霸权。这应该感谢“那个暴徒”波拿巴。然而英国也通过谈判与势均

力敌的欧洲王朝达成一致，即通过分权来共同控制地缘政治秩序。

这种协调状态所以能维持，不仅是由于维持现状的一句空洞承诺，更是由于一系列繁琐的条约和联合行动。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紧接着在1817年举行了艾克斯—拉—查波尔会议。在神圣同盟内部、东正教国家俄国、天主教国家奥地利和新教国家普鲁士宣称他们有权根据圣经的训示，对国外反自由、反国家、反民族的运动进行干预。君主们所履行的并不是同盟冠冕堂皇的理想(这样宣称只是为了取悦沙皇)，而是它的反动意图。梅特涅在1819年颁布的《卡尔斯巴特法令》中，禁止自由运动，并在所有的德语国家强制推行。国会授权奥地利军队去镇压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义和1823年的皮蒙特起义，还授权其参加法国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军队去镇压1823年发生在西班牙的起义。1823年英国宣称，它的海军将会拦截任何到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区镇压起义的法西远征军，以实例证实了欧洲和谐的限度。大西洋是属于英国的。

几个强国疲于应付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区域性的，后变为民族性的。它们之间经常意见不一，但也意识到这种不和可能会把它们拖向战争，而这是它们想方设法竭力去避免的。低地国家政府缺乏合法性，小国在掠夺成性的强国的夹缝中，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对立面，勉强存活。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一路衰落下去。在整个19世纪20到30年代，所有的强国都被法国在低地国家中咄咄逼人的态度给吓住了。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中欧不再锋芒毕露，英法俄支持希腊反对土耳其的独立战争，在普鲁士的调解下于1829年取得成功。但分歧也由此产生。这种和谐减弱成一种实质的现实的权力平衡。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互不相让，自由英国和法国(在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统治之后)经常与这三个反动的君主意见相左。但他们仍然努力协调对比利时国家的政策模式，在1830年承认它的“永久中立”(如他们在1815年承认瑞士的“永久中立”一样)。并且他们在1839年最终解决了低地国家的边界问题。这三个君主经常各持己见，但仍采取联合行

动。1846年，他们联合镇压了波兰起义，并承认奥地利对自由城市克拉科夫的吞并。奥地利请求俄国军队进入匈牙利帮助镇压1848年革命——19世纪欧洲革命的最后努力(巴黎公社除外)。甚至在1878年其他强国也只是在外交辞令上迫使俄国放弃他刚刚征服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一些国家宣布独立，另一些国家则被拱手送给了奥地利，以保持巴尔干的权力平衡。

所有的这些协议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欧洲任何地区出现任何强国的霸权，二是维持秩序。“秩序”意味着能够控制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对反动君主而言，它意味着镇压改革；对自由强国而言，它意味着以承认资产阶级和民族自决为代价而避免革命。外交政策潜意识地迎合与霸权稳定完全相反的理论：通过避免霸权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包括反动阶级秩序和市场秩序。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外交家们都不得不夜以继日地不懈努力。他们必须应付一个有着巨大潜在冲击力的问题：许多现存国家与新崛起民族国家并存的矛盾。霍尔斯蒂(1991：143—5)通过计算得出：在1815—1914年间有超过半数的战争——相比之下，上个世纪仅有8%的战争——是由新国家产生所引起的。这些问题远远超过了主宰着18世纪战争的领土扩张和商业动机。在低地国家、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这些纠结的国家和民族问题几近导致了永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但这在列强中并未引起激烈战争，这应该归结于他们领袖谈判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经过协调的外交政策仅影响了三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它最终发现了剥削东部民族主义国家的机遇；其次是普鲁士，它把侵略目标转向了中欧的民族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的野心使第三个国家，即多民族的奥地利，产生了不稳定因素。在整个19世纪，秩序、地区霸权和“民族”霸权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相反的。

国家也把它们的国际政治经济转向更市场化、更温和的选择。如最近所证实的，列强之间的战争只是危及到了旧的王朝。第三世界国家被实行高压统治，并被殖民地化，但强国对弱国的这种蹂躏也是试探

性的，当彼此之间发生殖民冲突时，会接受第三国的调停。领地的利益概念并未终结，但却通过共同协商趋于稳定。在1814—1827年，一系列商业条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英国分别与阿根廷、丹麦、法国(两个)、荷兰、挪威(两个)、西班牙(两个)、瑞典(两个)、美国(三个)和委内瑞拉签订了商业协约。这些协约确立了英国的国际贸易条款，因为(除委内瑞拉和中国)直到1850年后才有新的商业协约出现(外交部1931)。没有一个协约仅仅是商业性的。对双方而言，地缘政治同盟利益与商业利益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超民族的资本主义，1815—1880年

这种协调和平衡更多地得益于扩散的、超民族的工业资本主义。拿破仑战争削减了国际贸易，在这一阶段，首先是工业革命阶段，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然后在英国和法国，如表8.5表示，国际贸易在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率上升。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到19世纪80年代，其发展趋于平稳。

表8.5 1825—1910年英、法、德、美对外商品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1825	23(27)	10	n. a.	n. a.
1850	27(33)	13	n. a.	12(13)
1880	41(49)	30	35	13(14)
1910	43(51)	33	36	11(12)

注：1. Kutznetz 没有给出所有国家在同一年的数字。我的数字或者就是这一年的，或者是邻年的，也或者是一段时期内的，但总体上与下面的趋势相一致。因此只是大约的统计(如所有的国民统计一样)。

2. 英国的数据在圆括号里加上了服务业，美国的数据在圆括号里加上了大多数的服务业。

3. 法国的统计加上了净国民生产总值，因此，我在原数据的基础上适当降低了一下百分比(5%)。

资料来源：Kutznetz, 1967, 附录图表1.1, 1.2, 1.3, 1.10, 当前价格表。

英国的国际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5%上升到了50%。相对于出口而言，进口贸易激增，到19世纪80年代达到顶点，随着商品输出在国外投资的发展，进出口贸易达到平衡。尽管我们缺乏其他国家的准确数据，但到1880年前后，当它趋于平稳时，全球国际贸易可能要比世界生产增长迅速。据库兹涅茨估算，对外贸易在世界生产中的比值，从1880年的3%突增到1913年的33%，其中绝大多数的增长是欧洲国家完成的。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对外贸易几乎毫无起色，仅局限在本国国土内。随着贸易的扩张，它的双边性特点减弱，对条约的依赖性减少，而超民族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两个强国之间的贸易更多的偏离了平衡的主题，因此货币和信贷成为更佳的解决方式。随着黄金标准的普遍采纳，各国货币可自由兑换，这一标准于1821年开始于英国，1873年继续于德国，1897年结束于俄国。随着英币作为储备货币，币制平衡一直持续到一战。1850年后，所有对外贸易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都合并了银行和信贷系统。

贸易扩张是与英国的经济次霸权相一致的，并且按常理经济霸权促进了贸易扩张——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但还有其他的原因。从1815年开始，西方工业化显示出固有的超民族特征。当代国家软弱的政权基础结构已不能控制地区商品交换的这种大幅度扩张。不是国家而是私有业主促进了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大多出现于国家控制的间隙，最终通过公平自由的市场实现的。当然殖民地情况各异，必须靠军事武装取得并维持。但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市场，就英国的进出口需要而言，国家相比于私有业主、发明家和熟练工人，所获得的机会要少得多。

工业化的扩展主要是对超民族市场三个特征的反应。第一，一个地区农业和工业的现存水平非常重要。与英国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需要有先进的社会组织；与英国产品进行竞争，需要其资本主义制度与英国相差无几。第二，工业化离不开用来火力发电的煤以及铁。第三，要建立起与英国及其他地区的通讯网络，减少交通费用。这样工业化就首先在相对先进的地区即拥有煤和临近资本主义发源中心的地区扩散。

扩散的地区性远超过民族性，并且超越了国界。它的传播经过低地国家——荷兰和奥属荷兰(后者于1830年成为比利时)的一部分以及北部法国——不是某一国的全部领土；然后到达莱茵、萨尔、瑞士的一部分，也是穿越国界的地区，而不是主要国家的中心疆域。西里西亚、萨克森、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化穿越国界进入普鲁士、奥地利和一些小国；北部意大利存在着领土纠纷；加泰罗尼亚处于边界地区，并未完全统一到西班牙王国中。早期工业化主要发生在国家基础统治的核心地区之外。波拉德(1981)强调说，这一时期的经济步骤、地区性和超民族性的特征要比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征显著的多。资本主义扩展不仅是间隙性的，而且是超民族性的。

英国制定的市场条例比任何其他的地区都要多，因为工业商品和商业资本绝大部分都在英国产生或者从英国流通。从那种意义上来说，大部分的规范都是“英国化”的。但这仅是对规范的一种简便的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没有明确的起源地，并且规范依赖于绝对私有财产的制度化。还有几乎在整个西方，规范都依赖正式的自由劳动。已变为商业资本主义超民族工具的市场，在英国发展了它的最高形式，但它并不仅仅是英国式的。麦基翁(1983)指出，英国对他国的关税和进口限额政策并无重要的影响——这是对英国推行霸权稳定概念的决定性破坏。帕默斯顿承认，“英国政府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实力阻止独立国家进入这样一种安排：即出现在独立国家面前的、能极大促进各自利益的相互商业贸易”(O'Brien and Pigman, 1991, p.95)。

然而英国没必要用“实力”。它的经济为全球带来了效益从而得到广泛的认可(如阿里吉1990年观察到的)，其经济是开放的、自由的。英国的对外方针没有侵犯任何西方国家的领土。英国在帝国中的影响和在地中海的影响恰如其分，他们仅是防卫而已。分散的战略据点和监视哨所(后来成为铁制船的加煤站)，像亚丁、新加坡以及香港，这些不大的新地区是那时英国政府寻求的目标(尽管有时白人移民会把它们拖入欧洲)。加拉格尔和鲁滨逊(1953)宣称尽管英国更喜欢“非正式帝

国”，但如果必要，它也会转向正式的政治控制。但它几乎从来没有必要去反对其他西方列强。英国的海上实力确保了自由平等贸易。那些能够控制自己领土、确保自由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只要站在英国货物或英国干涉这一边，就不会受到不公平待遇(Platt, 1968a, 1968b; Semmel, 1970; Cain and Hopkins, 1980, pp.479—481)。

对其他列强来说，英国式的贸易条款仅是技术性的。皇家海军独占了贸易路线并强迫拒不服从的非西方国家接受。英国树立了一个工业资本主义未来的典范，这个典范可供模仿，有时也会被抛弃。英币得到了黄金可兑换性和从世界主要票据交易所伦敦贷款承诺的支持，从而能够得心应手地主导国际贸易。英国的技术、熟练工人、经理和资金引起了他国的注意，并受到他国的模仿。

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希望英国是另外一个样子呢？已建立起来的国外企业——例如多数先进国家的纺织业，或者法国的冶铁业。在本地区受到地方专业技术和低运输费用的支持，完全能够和英国竞争(经常得到国家温和保护的支持)。高就业和对专门消费品的需求，造就了西方城市手工业工厂的经济景气。很多国家利用英国资金发展自己的基础结构和制造业。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沿岸、葡萄牙曾长期为英国制造商和消费者提供初级产品。工业化的扩展沿着莱茵—萨尔一线穿过了比利时、荷兰、瑞士和一些小国的边界，在环西北欧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经济带。在那儿像比利时、荷兰这些后起之秀的产品可与英国商品相竞争，并且丹麦和瑞典的初级产品的制造商能够繁荣起来。他们接受了这种超民族的经济，而没有过分考虑是否是“英国式的”。

为什么外国都希望它是另外一个样子呢？列强宣称确保小国的领土完整,从而使小国接受了自己的领导。所以国家的贸易利益首先是财政方面的，他们把从复杂多变的民族和国际贸易中榨取来的钱作为财政收入(Hobson, 1991)。在总的贸易流动中，为了强征海关税和国产货物税的需要，他们很乐意交换复杂的垄断特许权。随着贸易的发展，各国保持高关税的兴趣下降了。在经济萧条阶段，贸易收入和税收缩

减，政府就会提升关税(Mckeown, 1983)。我们在第十一章将会看到，国家在19世纪中期的财政压力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低的。

这样19世纪中期以后，地缘政治、经济和财政三方面的动力同时引导西方政治经济脱离保护主义向自由放任主义发展。1842到1846年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宣称对任何商品都实行自由贸易。19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体现了地缘政治联盟动力下降而商业财政动力上升的精神，国家也因此降低了关税。条约涉及的范围广泛，覆盖了注册商标、对彼此联合储备公司的承认、确认国际河流、海峡的法律以及参与国际贸易人群等各个方面——第二次商业条约的涌现，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外交部1931)。强国之间对经济超民族主义也进行了谈判协商。

因此经济太平和超民族的暗示被建立在乐观主义基础上。英国推崇超民族主义，就如主要王朝国家和大多数小国一样。因为超民族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主导趋势。强大的超民族主义——国家在超民族社会中衰落——是不大可能的。但为什么不削弱超民族主义，相对让个别国家投身外交甚至周期性有限的战争，但对公民社会却没有太大影响？战事稀少，在经济水平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从决定意义上来说，军事开支是不变或下降的(见第十一章)。事实上，这些战争似乎完美体现了"脆弱的超民族主义"，因为政府划清了军用和民用的界限。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英法军队与俄国交战的过程中，英国答应俄国政府从伦敦储备市场贷款，法国邀请俄国政府参加国际工业和艺术展览会。英国外交部长(Imlah, 1958, p.10；Pearton, 1984, p.28)宣称，"交易的一般方式"不应受干涉。有限战争过时了，流行的民族主义动员前景不看好。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式"。在世界各地的现代者看来，这体现了自然经济法则；而在多数君主眼里，它还不具备颠覆性。

但如所有的经济法一样，曼彻斯特的法律地位也依靠社会权力：依靠超民族扩展的资产阶级的剥削权，依靠地缘政治规范。超民族主义

并非私有财产、商品、市场和劳动分配相互作用的一个自然结果。国际范围内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以由两个主要外交技巧提供的强制和规范治理为前提的。强国之间的协约和权力平衡决定着国际关系的所有类型，英国高度发展的次霸权主宰着全球贸易路线、金钱和信贷。当上述两者衰落时，超民族的资本主义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地缘政治和资本主义的衰落，1880—1914 年

政治经济从来没有实现过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重商主义逐渐演变成了有选择的民族保护主义，关税和进口限额始终存在。国外经济学家倡导抵制英货、保护民族生产，工业学家寻求有选择的保护。但在19世纪40年代，超民族经济突飞猛进。铁路的飞速发展要求大量资本，而这是国内工业所无法提供的。英国出口工业品，而进口手工业品和食物。1873年左右，当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期繁荣过后，国外制造商受到的潜在威胁变成了现实，北美和俄国的谷物通过轮船和火车源源不断地运送进来，使英国农业受到很大冲击。农业竞争极为激烈(Bairoch, 1976b)，然而农民占欧洲消费者的60%以上，因此对制成品的需求下降。高效率使英国能够降低价格，并且大陆制造商和农民一起要求保护。社会精英实行贸易保护有他们自己的打算：高关税可保护受经济萧条威胁的国家收入。

随着权力平衡的变动，外交也随之改变。这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商业霸权影响不大，而对欧洲大陆平衡却影响深远。奥斯曼帝国权力的衰落、奥地利的国内困难和普鲁士的增长，破坏了均势外交，并引起两个地区霸主即位于东部和东南部的俄国、位于中欧的普鲁士的恐慌。扩张并没有对英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也没有严重冲击其资本主义的领导权。普鲁士正在征服一些小国并且威胁到奥地利和法国。俄国乘前资本主义强国衰落之机，的确危害到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1852—1854

年，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联合对俄，阻止其向地中海方向扩张。海权保证了英法的胜利。但在欧洲大陆，英国——被认为其经济霸权和海上霸权处于顶峰但实际上只有一支很小的军队——只能眼睁睁得看着法国和普鲁士分别在1859年和1866年利用意大利起义打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65年夺取了丹麦的领土(帕默斯顿曾竭力对此进行干涉，但于事无补)；普鲁士在1870年打败法国(英国仅向普鲁士许诺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

在这种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狂潮中，俾斯麦的有限目标就是竭力维持正在日益丧失的平衡。但普鲁士德国的权力膨胀，逐渐主导了欧洲大陆。俄国扩张也小心翼翼地穿过喀尔巴阡山，越过亚洲，使英国海权名存实亡。铁路的出现结束了陆军保障不足的弱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漂洋过海，不辞万里运送军队，反而比俄国从本土运送容易得多。但如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所承认的，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国依然主导着潮流，但没有哪个国家像霸主一样或者以集体的协约或平衡统治欧亚地区。自从崛起的强国很好解决了侵略问题后，平衡和协调争端就不再意味着麻烦。德国把其取得成功的三个主要条件中的两个制度化：忘却俾斯麦的外交着眼点，仍保持军国主义和部门分而治之战略。列强把其成功的原因制度化并放在第一位，这种趋势无论对和平还是对现实主义都是一个坏消息。(见第九章和第二十一章)

协调的恶化激发强国加入防御性联盟，并且大幅度提升军费。铁路、大炮和铁船使战争走向工业化。1880年后军费激增，且国内开支也增加(见十一章)。国家需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一点关税就能完成得很好。财政和经济动机结合在一起，促使政治经济向更多的地产阶级统治制度的方向发展，尽管在开始只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在第九章，我以德国为例研究了这一点。)1877到1892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提升了关税。到1900年，尽管没有禁止进口，但事实上已是如此。只有英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如表8.5所示。现

在国际贸易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率已趋于平稳，前五十年超民族工业资本主义的浪潮已宣告结束。

许多经济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解释了欧洲是如何从1914年步入下坡路的，这是传统的看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贸易保护主义的终止是由于缺乏重商主义——从长远来看是缺乏经济帝国主义。进一步说，1879年后在保护主义阶段的对外贸易，比早期自由贸易阶段增长还要迅速(Bairoch, 1976b)。现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增长乐观，19世纪中期左右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仍在扩展。关税是有选择性和实用主义的，并小心谨慎地征收。它们既不限制彼此的民族经济，也没有引起严重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更多地被划分为列强的利益范围。民族经济只占一小部分，这体现了不同税收的领土依附。

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市场经济是英美经济。尽管美国实行高关税，英美经济仍然几乎是一个整体。两国之间语言相同，文化也相差无几。19世纪中期后，两国在瓜分地缘政治的劳动成果问题上达成一致。在美洲英国听从美国，在太平洋两国和平共处，在其他地区美国听从英国。表8.6表明在进入20世纪后英美双方是彼此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它们在对方国家、在拉丁美洲、在加拿大的对外投资彼此互相渗透。英国更多地把资本投向其帝国成员国，而不是欧洲。

在1860到1913年间，英国对其成员国的出口比例由27%上升到39%(Woodruff, 1966, pp.314—317)。詹克斯(1963, p.413)估计，在1854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有55%投向欧洲，25%投向美国，20%投向拉丁美洲和其成员国。到1913年，在欧洲的投资急剧下降到6%，在美国投资基本与原来持平，而在其成员国的投资则上升到47%(不同的作者给出的数据略有出入，见Woodruff, 1966, p.154; Simon, 1968; Thomas, 1968, p.13; Born, 1983, pp.115—119; Davis and Huttenback, 1986)。英国公司在国外子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大部分投向了其成员国(Barratt-Brown, 1989)。由于英美的投资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因此在英美两国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的超民族主义，被两国错误的国内路线，以及美国的选

择性保护主义和英国的帝国政策削弱了(Feis, 1964, pp.83—117)。

在英国的领导下，全球的触角超越了英美范围，尤其是伸向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些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小国。1914年，英国在世界对外投资中占44%，可谓独占鳌头(接近其19世纪的规范)，法国占20%，德国占13%，比利时、荷兰、瑞士共同占12%，美国占8%(Woodruff, 1966, p.155； Bairoch, 1976b, pp.101—104)。如表8.6在“所有其他国家”这一栏中所反映的,英美的贸易是全球性的，它们的超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表8.6 1910年一国与其他主要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百分比

国家	奥匈	比利时	法国	德国	俄国	英国	美国	所有其他国家	全部百分比
奥匈	—	—3	—3	42	5	14	6	33	100
比利时	—3	—	18	19	6	14	5	38	100
法国	—3	11	—	12	—3	16	8	53	100
德国	10	4	6	—	12	11	11	46	100
俄国	3	—3	6	33	—	15	—3	43	100
英国	—3	—3	6	8	5	—	12	69	100
美国	—3	—3	7	12	—3	23	—	58	100

资料来源：Mitchell, 1975， 1983, F1， F2。

法国是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它首倡公平市场贸易。法国工业与英国或德国相比，其组织的民族性因素要少一些。特里比尔科克指出：“国际性的工业革命席卷了法国，使法国放弃了生机勃勃的国内工业区，而是动员人力和财力以完成更深远的、横贯大陆的任务”(1981, p.198)。表8.6中可看出法国的对外贸易在英美之后，排名第三。但它在投资方面却遥遥领先。1911年，法国卖出的股票有77%用于对外经济活动，而相比之下，德国仅有11%作此用途(Calleo, 1978, p.64)。法国的对外投资受到外交的监督和影响。随着法国军事力量的衰落，法国外交部开始寻求以资本作为秘密武器来对抗普鲁士陆军和英国海军。法国被迫同意流动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对外贷款。1894年订立的

法俄双边同盟条约基本上描绘出了法国的投资安排。截止到1902年，法国的对外投资反映了它的外交联盟。它把数量相当大的资金投向了其同盟国和保护国——28%投向了俄国，9%投向土耳其，6%投向意大利，6%投向埃及。随着1904年与英国达成谅解，法国与英美范围的贸易激增，30%的资金投向南美洲(Trebilcock, 1981, pp.178—184；同时见Feis, 1964, pp.33—59, 118—159；Born, 1983, pp.119—123)。地缘政治把法国范围和英美范围日益连在了一起。

全球第三大投资国是德国。它的界定是最为地区性的。德国的对外投资较少，并受到由总理领导的帝国银行的监督。投资受到德国外交的支配。到1913年大部分投向与之毗邻的保护国和缓冲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诸国——尽管也扩展到了俄国和拉丁美洲(Feis, 1964, pp.60—80, 160—188；Born, 1983, pp.123—134)。在20世纪初，德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一再下降，这在所有的列强中绝无仅有。表8.6表明德国贸易主要是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东欧国家进行的，二者平分秋色，其贸易扩展比对外贸易迅速。但东欧国家(在表8.6中，指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完全依赖德国。约从1904年开始德国的出口贸易包含有强制倾销工业品的成分。上述三个最大的经济系统都各自组织起来，反对自己心目中的其他强国的“虚伪”的超民族主义。德国的政治经济与它的两个主要西方对手相比，变得更具有地区性。关于这点我将在第九章中进一步论述。

但这些列强的差异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贸易模式和投资模式仅是略有出入；并且各国资本家可自由贸易，可在任何第三国自由投资。表8.6表明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贸易遍布全球。这是以其独特的金融制度为前提的。因此当英国的次霸权地位终结时，它的对手仍寻求维持“英国式”的财政超民族主义。英镑从来没有和1945年后的美元一样，能够安全牢固地与黄金挂钩。这更多的取决于国际社会的“信任”。金本位制需要他国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对金融制度进行较多控制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支持比像英国那样实行自由放任

主义国家的支持更为重要(Walter, 1991)。 在 1890 年和 1907 年的两次金融危机中，英国银行的黄金储备不足以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因此法国银行和俄国政府不仅借给英国黄金，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买进英国纸币。 到 1907 年，法国银行明确介入维护英国的金本位制。 艾肯格林(1990)断言“金本位制的稳定……要依靠核心工业国家有效的国际合作。”这种看似跨国的结果或霸权的结果是以多边外交为前提的。 如果没有“那个暴徒”波拿巴如此地提升英国的超民族主义，这种格局会主宰整个 19 世纪。

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调配。 罗斯柴尔德、沃伯格、巴林和拉扎德几乎没有国家概念，毫不犹豫地把家庭成员安置在世界各国。 大金融家成为超越民族的和平使者(Polanyi, 1957, pp.5—19)。 他们一致认为战争将会极大地破坏各国的经济。 事实上，战争威胁将会引起股票市场的恐慌，而股票市场与经济周期是密不可分的，一战后尤为如此(Morgenstern, 1959, pp.40—53， 545—551)。 超民族主义仍具有活力并在不断调整。

然而随着超民族主义毁灭性的失败，这一历史时期也宣告终结。这儿且抛开一战的原因不说(将在第二十一章探讨)，仅跨国投资就存在着缺陷。 第一，大多数国外投资是“被动的”——进行有价证券投资、发行公债和建立独立的国外公司(通常是一铁路公司)。 仅有少数投资者能够控制其在国外的公司。 由公司进行的直接海外投资虽在战前已发展起来，但仍未得到普遍认可(Barratt-Brown, 1989)。 在这种国际性的投资经济中，很少有资本家能够控制其他西方国家的资源——就如今天的多国协作所做到的那样。 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直接控制了一些在海外的投资，但这些全被英国消极的超民族主义所淹没。 英国较其以前的改组能力而言，变成了更为消极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投资者。 第二，资本要依靠整体的地缘政治保护。 大部分资本在地方或祖国的保护下，多流入了友好国家。 英国资本都流向了其帝国成员国、美国和其在第三世界的保护国。 法国资本和德国资本都流向了自己范围的同盟

国和保护国。

这样随着国家界限的经济意义的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跨国性也随之大打折扣。西方经济纠缠于国家和跨国的网络中，到达了二者复杂并存的含混阶段。一直到1910年，欧洲还没能充分运用地区经济竞争和民族经济竞争来解释一战。从根本上讲，战争似乎并非国际资本主义导致的(第二十一章证实了这种猜疑)，然而我们必须从地缘政治上加以区分。由英美共同主宰的世界经济应该比由法国单独主宰更具有超民族性。而由法国主宰的世界经济反过来又比德国单独主宰具有更多的超民族性。随着德国的崛起并向世界提出挑战，它崛起的原因以及它具有相对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治的原因都变得至关重要。我将在下一章着重探讨这一点。这一章论述了经济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兴起，在解释它崩溃的原因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

结论

尽管我的论述结尾不明确，让读者意犹未尽，但它的主题是明确的：与那些经济学理论、二元理论和霸权理论的历史相比，地缘政治的历史有着更为复杂曲折的轨迹。在18世纪，战争的激烈程度一再升级，其原因固然是由于该时期没有霸主，但更主要的还是它们在殖民地和欧洲非同寻常的利益争夺造成的。然而仅此一点并不表明国际秩序的混乱。战争得到了控制并与其他秩序来源相并存。拿破仑对霸权的企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在革命中和在以价值为目的的战争中促使了人们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这虽然威胁到了旧的政权秩序，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在于强国们联合起来维护旧秩序，在于它们已经掌握在手的牢不可破的同盟条例，也在于波拿巴的外交失误。我把这随之而来的时期仅看成是英国“高度发展的次霸权”时期。秩序与和平的出现仅在于规范的强化，即来自旧政权协调外交规

范的强化与来自资本主义超民族主义规范的强化。在世纪之末，当和平与秩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所有的这三个前提也遥遥欲坠，其各不相同的原因需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世界并不是二元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君主国家都不像理论学术界所论述的那样神乎其神。二者都被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所渗透，并部分地被塑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已经摈弃了损人利己的帝国观念，即19世纪的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帝国观念。和平与秩序并不取决于它们稳定的霸权，纷繁复杂的秩序也不会产生必要的稳定。正如历史已经否定了霍布斯的国内和平与秩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的观点那样，它也否认了国际和平与秩序需要一个帝国霸主的观念。相反的，它需要公认的规范和审慎的多国外交。

注释：

[1] 许多国际关系专家并不赞成这一论断，他们对国际秩序有着更大的野心，期望从外交中得到比事实上更多的理想的东西。摩根索(1978, pp.448—457)对这个协约尤为失望，但他把目光对准了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受其限制不大的国家。霍尔斯蒂(1991, pp.114—137)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沙皇亚历山大那不成熟的康德理想的冲击，而不是他自己的研究数据：强国之间不再进行战争，并且它们联合治理那些由于不稳定而有战争威胁的地区。

参考文献

Arrighi, G. 1990. Three hegemonies of historical capit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SRC Conference 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Cambridge, September 5—7.

Bairoch, P. 1965. Niveaux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1810—1910. Annales ESC 20.

1973.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3: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C.Cipolla. Glasgow: Fontana.

1976a. Europe'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800—1975.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1976b. *Commerce extérieur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IXe siècle*. The Hague: Mouton.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Barratt-Brown, M. 1989. Imper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March 13.

Born, K.E. 1983. *International Banking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Brewer, J.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Knopf.

Cain, P., and A.Hopkins. 198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

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3.

1986.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Ⅰ: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88—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9.

1987.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Ⅱ: New imperialism, 1850—194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0.

Calleo, D.1978.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lleo, D. and B.Rowland. 1973. *America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D.1967.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Chase-Dunn, C.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Creveld, M. van. 1977. 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L., and R.Huttenback. 1986.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R. 1979.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Eichengreen, B.1990.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SRC Conference 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Cambridge, September 5—7.

Feis, H.1964.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eign Office, U.K. *1931*. *Handbook of Commercial Treaties etc. with Foreign Powers*, 4th ed. London: H.M.S.O.

Gallagher, J., and R.Robinson. 1953.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6.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lpin, R. *1975*.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lover, R.A. *1973*. Britain at Bay: Defence against Bonaparte, *1803—1814*. London: Allen & Unwin.

Goldstein, J.1988.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J.1991. The Tax-Seeking State. Ph.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olsti K. 1991.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pkins, T., and I.Wallerstein. 1979. Processes of the World System.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Imlah, A.H. 1958.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ann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gham, G.1984. Capitalism Divided? London: Macmillan.

Jenks, L.H.1963.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 London: Nelson.

Keegan, J.1988. *The Price of Admiralty*. London: Hutchinson.

Kennedy, P.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Hyman.

Keohane, R. 1980.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ed. O.R.Holsti et a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berger, C. P.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norr, K.1956.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sner, S.1976.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Kutznets, S. 1967.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X: Level and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Long-term tren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5.

McKeown, T. 1983.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nineteenth-century tariff level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

Markham, F.1963. Napole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itchell, B.R.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Detroit: Gale Research.

Modelski, G. 1978.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

(ed.) 1987. Exploring Long Cycles. Boulder, Colo.: Rienner.

Modelski, G., and W.R.Thompson. 1988.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3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orgenstern, O.1959.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rgenthau, H.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O'Brien, P. K., and G. Pigman. 1991. Free trade, British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SRC Conference 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Cambridge, September 5—7.

Organski, A.F.K., and J.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arton, M.1984. *Diplomacy, War and Technology since 1830*.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Platt, D.C.M.1968a. 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b. Economic factors in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ew imperialism. Past and Present, no.39.

Polanyi, K.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ollard, S. 1981.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crance, R.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osenau, J. *1966*. 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R.B.Farrell.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emmel, B. *1970*.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w, A.G.L.(ed.). *1970*.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1815—1865*. London: Methuen.

Simon, M.1968. The pattern of new British portfolio foreign investment, 1865—1914. In The Export of Capital from Britain, ed.A.R.Hall. London: Methuen.

Strachan, H.1973. 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 London: Allen & Unwin.

Thomas, B.1968.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 to 1913. In *The Export of Capital from Britain*, ed. A.R.Hall. London: Methuen & Co.

Trebilcock, C. 1981.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1914. London: Longman Group.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 San Diego, Calif.: Academic Press.

Walter, A. *1991*. *World Power and World Money: The Role of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Hassocks, Sussex: Harvester.

Woodruff, W. *1966*. *Impact of Western man: A Study of Europe in the World Economy, 1750—1970*. London: Macmillan.

Woytinski, W.S., and E.S.Woytinski. 1955. 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s: *Trends and Outlook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第九章

围绕德国的斗争(一)：普鲁士与集权民族资本主义

三个对手、三种理论的争端

就在1900年前，当国家基础结构移植入公民社会时，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经济的集中、合作与联合(见第十四章)。就连跨民族主义的故乡英国，也变得更加集中化和地区化。而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德国，与他国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到1914年，德意志帝国成为“集权民族资本主义”的头号倡导者——主张把半集权的君主国、划定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权力的绝对优势转向了中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种权力配置的特征是什么？其结果如何？[1]

如果我们从1800年左右开始考察，那可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获得德意志帝国的是二流强国普鲁士王国，仅控制了北德意志三分之二的地区，并且大部分是落后地区。就普鲁士的领土、人口和经济资源而言，它对权力的要求可谓是狮子大开口。想要获取德意志霸权，其实力还差得很。奥地利和德意志邦联也对此觊觎已久，是普鲁士夺取霸权的两个劲敌。直到1815年，德意志还是一个包括奥地利(它的总统)、普鲁士和三十七个小国的松散邦联，其中大多数国家都软弱

可欺；然而它们也得到周边强国的保护，并受到邦联会确保宗教信仰自由信念的鼓舞(普鲁士把路德教定为国教，[2]而奥地利则把天主教定为国教)；全德意志有无数的小君主、小城市和小的商业团体；人们普遍享有公民权。由于有着如此多的国界限制，检查控制很不奏效，各地的话语能力也相去甚远。1800年，奥地利成为一流强国，控制着比普鲁士多两倍以上的领土和人口。然而奥地利的经济更为落后，其行省享有充分自治，因此奥地利在动员资源方面无能为力。奥普两个对手的实力旗鼓相当，不相上下。

19世纪，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和德意志邦联，起先是以秘密的方式，然后便表现得咄咄逼人。表8.1—8.4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赶超轨迹。在1850年前或1860年前，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农业资源或者工业资源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普鲁士德国无论是在农业效率、还是在总的工业规模和人均工业规模上都是奥地利的两倍，然后发展得更加突飞猛进。在1866—1867年的奥普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吞并了较小的国家，打败了奥地利和法国，建立起德意志帝国。到1914年，普鲁士德国已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奥地利几乎沦为它的保护国。这也是与工业资本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更为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的胜利。普鲁士德国已把“集权合并”的政权战略嫁接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身上。在奥地利，局部的民族主义已在巩固它的联邦倾向。集权化的“民族”普鲁士最终战胜了邦联德国和多民族的奥地利。

集权民族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从长远来看，权力发展的三种模式，即一种成功两种失败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这是此处提出的第一组争论。

第二组争论源自日益发展的德国经济的“民族”构成。它实际上两次改变了政治经济的绝对连续的统一体，即第三章所定义的从市场概念到利益地区概念的转变。大多数德意志国家逐渐从起初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成自由放任主义；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且较少具

有选择性，到1900年左右，它已接近重商主义。最后，由于政治经济与地区征服主张的相互交织，它体现了三种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转变也改变了阶级构成的平衡，即从跨民族的阶级构成占主导地位(先是越过国家界限)，到民族的阶级构成占主导地位(局限于本国)，最后向民族主义的阶级构成发展(这里指一国公民组织起来反对其他国公民)。这些动荡不安、争吵不休，甚至仅是部分的过渡，仍然导致了这一时期民族地区利益的总冲突：德国在1914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战争。这一章着手解释市场战略向地区战略的转变，跨民族阶级向民族主义阶级的转变。(这种解释将在第二十一章完成)

"战略"和"转变"是互不相同的两个定义。战略是指为更好地达到目标在方式上的理性选择——以提升经济利益。转变是指那些被非经济权力过程以难以捉摸的、潜意识的方式改变的理性概念。这完全不同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历史，后者倾向于理性选择的经济主义，即以"经济利益"来解释发展。似乎是经济的理性的"最近发展"战略带来了权威的资本主义组织、国家计划和贸易保护主义(第十四章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述)。格申克龙(1962)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当代版本，尽管他的德国祖先已倾向于弗里德里希·利斯特的观点。森加(1985)接受了利斯特的理论，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英国"联合"的自由放任主义与"非联合"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具有更少的经济理性——他把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称之为"联合的"，把贸易保护主义称之为"非联合的"。他认为这就是德国接受后者的原因。

对此，我有两个不同的观点：

1. 我认为经济统一的正确概念——其中"我们"是指可共同分享经济利益的人——是难以定义的，是由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权力来源所构成的。当前德国的"我们"和"民族"的经济利益，不仅是由经济权力关系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有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军事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地缘政治权力关系。

2. 后发展理论家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德国政策的转变,即从贸易保护主义到重商主义再到帝国主义与战争的转变。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与经济理性相冲突的外部问题。与之相反，我则解释了19世纪向更为地区化的利益概念的普遍转变。经济问题、政治经济、阶级斗争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因而产生了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权力运作者面临的往往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权力关系。转变源自这两种斗争会合的途径，而这是任何权力运作者都意识不到的。

纯粹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清楚从市场到地区的转变。19世纪中期对于“经济学”最恰当的定义就是从跨国向国家转移。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把市场和劳动力配置看作是抽象的，是跨国的。诚然，亚当·斯密的名作《国家论》，其题目用了“国家”这个字眼。但他的“国家”仅是地理学上的例证，在其理论中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他运用“苏格兰”和“英格兰”(民族地区)等同于“大不列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多数英国人所做的那样)。他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如充分夸大其作用的个体理论，围绕生产要素的阶级构成理论，以及像市场和劳动力配置那样的跨国结构理论。在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国家”竟被忽略了。

德国的理论是与事实相悖的。财政学家(见第十三章)赞成国家经济干预。他们引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理论，并指出美国关税的成功。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嘲讽说斯密提出的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脱离现实个体代表全人类的“世界性政体经济学”，忽略了民族社会的现实性。自由放任主义实质上是英国能够主宰全世界的一层烟幕。德国应反击有选择性的关税以迎合不同部门和地区的需要。随着发展的继续，有选择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能够被逐步取消。

利斯特派的观点在奉行路德的中央集权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北部德国，比奉行天主教跨民族主义的南部德国，更能引起共鸣。但在德国人争论“民族经济”的需要时，也就默认了他的基本观点。一旦这个

问题不是根据“经济学”而是根据“德国(或者法国或者俄国)经济学”系统地作出论述，那么其解决方案中民族主义因素就可能多于跨民族主义因素。然而“德国”并没有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或文化实体存在着(至少其主体是这样的)。歌德和席勒指出：“德国？但它在哪儿呢？我不知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国家。”(Sheehan, 1981)是谁缔造了德国？其答案就是四种社会权力来源的结合。

第三组争论集中于现代国家的特征。到1900年，德国是“现代化”的，它的经济赶上并超过英国，其资金组织、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发展迅速。但德国仍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半集权的君主国。这是一条独特的德国式道路吗(独特的道路)？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我赞成马克思的理论，即认为它是“波拿巴主义的”，享受有限的权力自治；我还赞同马克斯 · 韦伯的观点，即把重点放在它的多重权力自治上。这里我需要指出，它的自治并非集中于国家精英手中的、中央集权化的自治。尽管仍有很多自治集中于中央，但它的中央机构是异乎寻常的多特性的(如第三章所定义的)，最终由于缺少权力决断机构而导致了德国的衰落，如第二十一章所论述的。1914年的浩劫，就是被制度化了的多特性机构所导致的意外的后果。

“德国”的发展

1815年，“德国”处于政治上的半存在状态，仅有着虚弱的邦联，并沉湎于德意志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神话中。在话语能力的网络里，德国有其鲜明的生活方式，它很少接触民众然而却吸收了职业的和行政的资产阶级。如第七章所述，在出现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之前，弱小的“德意志民族”仅是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着。但是反对波拿巴的斗争，却使德国投向了老奸巨猾的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怀抱中。德国迂回反复，最终挣脱了它们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

国家。

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是王朝君主国，对于盛行的民族主义丝毫不感兴趣，尽管那仅限于占有资产的阶级。在彻底征服了中欧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遂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若损害彼此的利益进行扩张，则难如登天。处于狭小地理范围上的紧张的两国关系，地缘政治促使它们制定出不同的方案。在南部和东部，普鲁士有强国作邻，即奥地利和俄国。因此向西部和西南部的小的德语系国家扩张，显得更为容易一些。由地缘政治促成的一个王朝事件，使"德国"的扩张更加如火如荼。霍亨索伦王族通过联姻取得了虽零星分散但却极为繁荣的莱茵地区。1815 年的方案策划推翻法国霸权，把这些国家扩大联合成集团国家。普鲁士的领土虽已扩展到北部德意志，但其领土互不相连。统一是普鲁士梦寐以求的目标，它提出了含蓄的"小德意志"方案，即不包括奥地利统治的地区。

对于民族统一的任何"大德意志"方案，奥地利都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因为奥地利为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德意志帝国提供皇帝人选，并且奥地利还是现在的邦联首领。但该邦联是多元化和墨守成规的，对奥地利夺取霸权几乎毫无用处(Austenson, 1980)。奥地利应向东南方向扩张，因为在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日趋没落，而且 1815 年奥地利为换取意大利领土已放弃了佛兰德。奥地利的扩张并不局限于德意志，因此它变得更为多民族化。对于德意志统一，奥地利比普鲁士表现得更加兴趣索然。欧洲仍处在王朝主义和经济跨民族主义的统治下——但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如表 8.1—8.4 所示，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德国经济都飞速增长。在 19 世纪 50 年代前后，德国经济应异常繁荣，因为它经历了从学习英国革新，到学习中欧革新，一直到发展自己的工业。棉线出口在国内供应中占的比重从 1835 年的 25%(依赖英国进口)，增长到 1853 年的 44%(冲破英国限制)一直到 1874 年的 88%(赢得自主权)(Tipton, 1974； Tilly, 1978； Trebilcock, 1981, pp.22—111； Perkins, 1984)。这种持

续增长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从某种意义上它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因为西部德国长期繁荣，鲁尔和萨尔丰富的煤铁储备，为工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但这种发展是相对“国家化的”和“民族化的”。普鲁士率先拥有关税同盟、便利的铁路(利斯特认为是德国发展的“双胞胎”)和先进教育这三个主要的经济支柱，从而为“小德意志”民族统一方案提供了便利。

1. 关税同盟。到 1815 年，德国的权力运作者认为工业化是可取的，但他们不赞成国际政治经济。英国领导的自由贸易已与经济发展紧密挂钩，但这却与拥护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者的见解相冲突，与国家的财政利益相冲突——因为绝大部分的税收来自海关税收。然而有三十九组海关据点和税收被认为是多余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的北德，也希望比奥地利和一些南部国家征收更低的关税。由于普鲁士的领土零星遍布北德，因此它不得不与邻国签订经济协议；而奥地利与其已结成集团国的邻国却无需这样做。北部国家还控制着德国主要河流的出口，控制着通向欧洲多数发达市场的陆路出口。为了在德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普鲁士只能把海关改革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来看待，成立北方的低关税同盟。

普鲁士与其邻国达成一致。在确保前者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取消国内关卡。1834 年，地方协议扩展成关税同盟。十八个国家——几乎包括了德国北部和西部的所有国家——结成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接受了普鲁士的低关税政策，并允许普鲁士代表它们与其他强国缔约。一个共同体的行政机构收集起这笔税款，然后再按照各国人口的多少分发下去。这样行政管理储备可观，出口贸易激增，并且国家的财政收益也得到了大的提升。由此可见，关税同盟是成功的，对普鲁士领导地位的取得，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Henderson, 1959, 1975)。它产生了民族经济的萌芽，并实际上成为民族经济的管理机构。它是经济利益、邦联国家财政政治战略和普鲁士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既没能进入德意志关税同盟，也没被包括在其东部的北德意志领土的国家中，有一些赞成进一步的贸易保护，但奥地利却不赞成。1850年，奥地利把自己的关税同盟扩展到半个匈牙利帝国。但是德意志南部国家与西北部国家的交流比与奥地利的交流更为便利，这也逐渐促成它们加入普鲁士低关税同盟。而且，奥地利被普鲁士占主导地位的关税同盟排除在外。1865年，当普法关税得到关税同盟认可时，却没有征求当时仍为邦联首领的奥地利的意见。奥地利在德意志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被普鲁士所取代。

这至关重要吗？随着自由放任主义逐渐与重商主义并存且二者同时占据主导地位，关税同盟也逐渐降低关税以与之同步。关税是选择性的、实用的，市场也较少受到国界限制。主要工业区已忽略了边界存在。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波希米亚以及东奥地利，其工厂都从英国进口纱、生铁和机器设施；然后把完成的纺织品和加工过的生铁销往当地和更远的东部地区，通常用之换回食品原料。起关键作用的原材料是煤，与第七章所论述的一样，大多数煤矿都分布在边界上或边界附近。

对这种两地间的而非国际的经济，关税同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没有直接冲击经济的发展(Trebilcock, 1981，pp.37—41)。奥地利在邦联中的经济领导地位被普鲁士取而代之，但二者所起的作用都不是决定性的。作为财政收入有效方法的关税同盟，不是任何德意志国家的专利。事实上早在1867年，当德意志国家卷入战争时，它们的海关官员仍在收取关税——仅比平时减少了10%。这一切反映出了不堪一击的跨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的争斗可能会继续，但已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因为一旦地缘经济转向普鲁士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其他国家则一定是支持了跨民族主义的衰落。

2. 铁路。在任何地区，铁路都会促进煤、铁、钢的生产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并通过降低市场费用促进农业商品化。在总的国民生产中，德国铁路降低了5%—10%的运输费用，节省了一笔可观的支出。

在西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的莱茵地区，其工业得益于当地丰富的煤铁储备，从19世纪40年代起发展迅速，甚至已接近英国—比利时—法国北部工业中心的水平。铁路扩大了市场，增强了地区联合，并把农业品输往落后地区，把钢铁输往先进地区。普鲁士的谷物运向西部，而来自西部的半成品在德意志加工为成品后，以比西部国家低廉的运输费，并凭借对东部的技术优势，输往东部。铁路使各地经济更加走向统一。弗雷姆德林(1983)说，铁路是“德国工业革命的英雄”。

通常情况下，铁路由国家出资修建并属于国有。与英国不同的是德国的多数铁路出现于工业化之前，并且国家规划比市场需求的意味更浓一些。三种国家定型被包括在内——资本主义的、君主的和军国主义的。铁路为君主国带来了收益：到1910年，铁路提供了普鲁士国家财政收入的44%，使精英自治逐渐摆脱了国会控制。像其他国家一样，普鲁士也很快从军事角度来看待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到边境以及储备军事据点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防御。君主、军队和资产阶级三种动机间很少发生冲突。国家已经意识到，只要对矿藏、钢铁厂、金属工厂以及纺织厂进行合理配置，那么它们也能提供军事装备、地缘政治权力以及独立的财政资源。随着人口的城市化，对货物、乘客以及军队和军需品的运输，在逻辑上几乎是等同的。普鲁士的政权掌握在容克地主阶级手中，铁路使他们得以向新兴市镇提供物资。一种更为地区性的集中化经济正在形成，一个更为协调的土地—工业—军事的统治阶级正在兴起。

铁路也削弱了跨民族主义，巩固了国内经济。铁路就像蜘蛛网一样，每一根丝都缠绕在本国领土上，只有少数几根丝与其他国家的铁路网相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条普鲁士的铁路线几乎绵延了整个萨克森国界的长度，其上有很多条线路通向普鲁士，而只有一条通往萨克森。这是从军事和民族经济两方面进行考虑的。与普鲁士毗邻的萨克森地区的经济更为发达一些，但已建立的铁路限制了它进入普鲁士市场，而密集的铁路网使普鲁士人在任何地区都能买到便宜商品。并且

在战时普鲁士能对萨克森形成强兵压境之势，就如1866年那样。铁路部分地归化了经济，使其更为国家化。

3. 教育。同样的问题可适用于运河、公路、电报以及尤其是从开明的绝对主义那儿继承来的教育结构。第十三章指出，普鲁士君主已对大学里的贵族和教授，还有教育公职人员(受过教育的政府行政官员)作出让步，允许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在国内传播。这使仍四分五裂的普鲁士成为实施基础义务教育的第一大国，并培养了一大批教师骨干(到1848年已有2.9万人)。其掌握读写能力的人在19世纪中期占85%，与之相比，法国占61%(仅包括读的能力)；英国占52%(读写能力都包括)；外来参观者凡写到普鲁士教育的都非常羡慕(Barkin, 1983)。1853年后教育趋向保守，但仍鼓励技术培训以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俾斯麦宣称："有学校的民族才有未来。"这里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国家。

1872年后，德意志帝国在教育上和军事上的开支并重。它并没看到这两者就如"枪支与黄油"一样可二者择一。德国招募的士兵文化水平在欧洲首屈一指，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自豪、值得称道的事实(见第十四章)。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全民教育。1882年，在普鲁士中等规模的学校有66所，到1911年减少到51所(Hohorst 等,1975, p.157)。到那时其他国家也达到了这一水平。但普鲁士教育是国家化的，由位于北德的其他文字的载体，即虔诚的路德(福音派的)教派强制推行。尽管是极不情愿的，但政府还是动用了虔诚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基础结构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它们无意间还促进了普鲁士的发展，促进了这个最初多国家的地区经济和财产拥有者的规整化和国家化。整个(小德意志)德国的容克贵族、莱茵地区的工业家、商人、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都提高了读写能力，接受了同样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共同迈入了公民社会，而这个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普鲁士式的。

对国家的争论有软弱派和强硬派之分。许多经济学家持前种观点，认为国家方针应是"自由多于推进"(Trebilcock, 1981, p.78；参见

Böhme, 1978)。国家系统的组成部分仅是从市场资本主义“无形之手”的扩散中“除去枷锁”(Schumpeter 的短语,1939, p.280)。事实上，随着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Pottnds, 1959)，国家对经济的实质性干预也在逐渐减少。其他经济学家持强硬观点，我本人也赞成这一观点。金德尔伯格(1978，ch.7；参见 Epstein, 1967, p.109)指出国家干预使经济联合更为民族化，并因此促进其快速发展。但因为这具有很大的无意性和间隙性，仍然必须处理好已制度化了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帝国的形成：特殊方式

1865—1871 年间，普鲁士征服了邦联，并把奥地利从(小)德意志剔除出去，建立起第二帝国。这个新国家的本质就是导致了两次大的争论，引起了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争端——源自德意志的“特殊方式”和“自治”。我将一一论述它们。

许多自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帝国”是发展的畸变，而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途径。他们定义了“德国特殊方式”，即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半集权化多于政党民主化的国家。他们把这归因于由国家中保守的社会精英和有产阶级所支配的快速工业化。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使他们无力建立起政党民主。对这一观点马克斯 · 韦伯给出了自己的经典论述(Beetham, 1985, ch.6)，并被多次引用(Dahrendorf, 1968； Böhme, 1978；Kitchen, 1978； Wehler,在 1985 年提出了修正主义观点)。该争论假定资产阶级按常规是赞成民主道路的——这是比较社会学的传统观点(Moore, 1973； Lipset, 1980)。

马克思主义作家攻击了这种“特殊方式”的自由主义观点。布莱克伯恩和埃利(1984)指出劳动会否定资本主义与民主间的必然联系

(Poulantzas, 1973; Jessop, 1978)。他们说德国资产阶级从未迫切地要求过自由主义，因为他们对这种半专制的政权并无异议——这种政权在限制政治公民权和否认劳动力集体公民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最低限度的公民权。鲁谢迈耶、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1992)进一步扩充了这种争论。在引证了许多历史的和当代的实例研究后，他们指出，单就资产阶级本身而言，几乎从未要求过民主权。但如果受到下层工人阶级的推动，尤其是农民变化无常的推动，他们也会要求更多的民主。如果没有上述压力，他们很少会主动这样做。资产阶级如果在一个地主贵族占统治地位、并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中兴起，那么他们会欣然接受独裁统治的，就如在帝国一样，如果没有德国的特殊方式，那么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就如自由主义一样"顺理成章"。

且不论自由派和他们的批评家有什么差别，但他们对下列一连串同样的问题却各持己见。二者都认为半专制帝国的出现是两种权力运作者——旧王朝和新兴资产阶级——妥协的结果。自由派认为由于旧王朝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才被迫妥协；而批评家认为是旧王朝和资产阶级协议两分天下：由旧王朝控制政治，资产阶级控制经济。自由派认为军国主义是旧王朝才有的，是不稳定因素，应该被推翻；而现代资本主义崇尚自由。其批评家认为军国主义是两者共享的：旧王朝用来发动战争，而资产阶级用来镇压工人阶级。在接受了最近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悲观态度后，布莱克伯恩和埃利认为这是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行之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秩序的再生产，可以在相对缺少纯粹代议制民主的国家里得到保证。"它是一种"来自上层的资产阶级革命"，穆尔的"来自上层的保守现代化"就发生在这儿，同时还发生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和复兴时代的意大利(Blackbourne and Eley, 1984, pp.84, 90; Eley, 1988)。我在纠正两个共同缺陷的同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述：

1. 他们过分注重阶级关系，忽视了民族争端。他们也没有把社会的统一性考虑在内。他们只是在德意志这个既定的国家社会中，看到

了旧王朝和资产阶级关系的不同(Evans, 1987, p.114,也提出了这种批评意见)。但"德意志"在哪儿呢?无论在哪儿,它都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和旧王朝的统一性。这两组政治联合实际上是处于变动之中的:资产阶级逐渐融入一个独裁国家,融入与众不同的德意志联邦——一个包括三十九个政权、两种地区宗教、普鲁士、奥地利和邦联地缘政治的德意志。这些作者中有很多人,特别是布莱克伯恩和埃利已凭经验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的理论却忽视了它。旧王朝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就如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建立在本国民族定型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德意志的特殊方式仅存在于细节之中。如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许多国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专制主义,如罗坎的观察以及我在这一卷展开的论述。所有由于民族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只是在地区、宗教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独特性上存在分歧,对此我们必须明确。

2. 由于他们非常注重针锋相对的阶级因素,所以其观点也着重强调深思熟虑的、理性的共同战略和利益。他们假想旧王朝和资产阶级都知道彼此所需、斗争原因以及成败结果,但与事实相去甚远。当阶级争端与民族争端紧密交织在一起时,其同一性便变得极为错综复杂,每次斗争结果也会对其他斗争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专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内部联合(后果)既不是任何一个强大的运作者有意促成的,也不是它一贯反对的。它是几种权力网的产物,这种权力网的关系纵横交错,其复杂性无人能控制。

1848年革命是阶级与民族冲突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极好例证。从很多方面来看,遍及中欧的1848年革命都是法国十年大革命的延续——并且它是以爆发于巴黎的一次革命尝试为开端的。然而如果历史重现,处在多国文明下的欧洲竟是如此具有自觉意识!1848年革命中的三个主要阶级是旧王朝、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众(包括手工业工人和一些劳动者)——类似法国十年大革命时的阶级构成(尽管现在有更多的手工业工人和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这将在第十五、十八章中论述)。话

语能力网络的扩散也促成了1848年革命的爆发，在德国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但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由于受早期西方革命的影响，1848年革命中的阶级带有早熟的阶级意识。革命者很快要求公民权和政治权，而旧王朝也意识到必须避免重蹈法国同僚的覆辙。当国内发生混乱后，旧王朝和资产阶级很快捐弃前嫌，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大都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来自下层，而不是彼此双方。1848年革命中成立的“秩序党”也不再像1776年或1789年那样。大多数资产阶级和一些专业人士、政界野心家和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革命，只剩下革命者和稀稀拉拉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以及学生追随者孤军奋战(Stearns, 1974；Price, 1989)。布莱克伯恩和埃利指出，由于害怕人民群众(Sheehan, 1978)，在帝国期间，多数“自由派”并没有签署男性公民普选权。

阶级研究与民族研究过程是不可分的——保守的普鲁士是德意志最为富裕的一个邦。北方路德教的“民族自由派”认为随着普鲁士的改革，自由与进步也会随之出现；而在南德占主导地位的“邦联自由派”，则多数是天主教徒，认为自由对国家来说是间隙性的，他们寻求的是邦联改革。这种在统一问题上的分歧比阶级问题更甚，引起了1848年革命期间法兰克福议会上谁是名副其实革命者的激烈争论，且相持不下，并阻碍了协调改革方案的出台。许多资产阶级首领视造反首领(革命者)为这场僵局的罪魁祸首，要求普鲁士出兵镇压。普鲁士人镇压了革命，废除了原来的德国皇帝，转而选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邦联支持者现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排他性现状的拥护者，另一派是在法兰克福议会中拥护君主的民主人士(Hope, 1973)。

普鲁士改革并非毫无希望。它的教育公职人员、教师和文职人员在1848年革命中大显身手，并要求从内部进行改革。旧王朝准许通过了一部妥协宪法。以更激进运动会被镇压为条件，一个软弱的议会系统建立起来。国王能自由任命大臣、官员、法官和上议院议员，并指

挥军队。下院即州议会，拥有辩论、非正式参与立法以及赞成或否决预算的权力(令人疑惑的是预算在那时并没能被执行)。它由具有选举权的男性公民(年龄在25岁以上的男性)以多数票选举产生。三个“阶级”有着同等比例的选票：4%的大资产阶级，16%的小资产阶级以及80%的人民。有些改革家接受了这一比例，还有一些要求更多的席位。从1859年开始，普鲁士州议会中的多数即自由派一直都否决军事预算。宪法有点模棱两可。俾斯麦(1862年后的普鲁士首相)指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税收被任意提升，然而需要打破这个僵局。

俾斯麦转向了地缘政治。而霍亨索伦王族成员直到那时还在寻求德意志各邦的统一，以便逐渐把奥地利、法国和丹麦排除在德国事务之外。但到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转向战争。恰巧此时普鲁士与丹麦在边界领土问题上发生纠纷，这成为普鲁士入侵丹麦的绝妙借口。1864年，普鲁士协同奥地利挑起了对丹麦的战争。结果是普鲁士成功地占有了石勒苏益格，奥地利则占有荷尔施泰因(一个未定的战利品，因为它距奥地利的其他领土非常遥远)。1866年，俾斯麦鼓足勇气，冒险一搏。他说服国王去入侵奥地利及其德意志邦国，并与意大利达成秘密协约以迫使奥地利两线作战。良好的铁路交通帮了普鲁士动员的大忙。由于奥地利被迫两线作战，二者差距逐渐拉大。但即使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柏林证券交易所以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作了奥地利取胜的打算。奥地利虽然打败了意大利，但却被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萨多瓦战役中打得一败涂地(Craig, 1964； Rothenberg, 1976, pp.67—73； McNeill, 1983, 249—250)。

事情至此并未结束。普鲁士军队一旦进入奥地利，其铁路优势就不复存在，其乌七八糟的两轮车、马匹、人员和枪支就会陷入泥沼中。偶尔还会弹尽粮绝，也不再有大规模运动战的地势。如果奥地利继续战争，欧洲参谋本部可能会从不久前的美国创举中吸取教训：在美国内战中，北方进行的是工业社会无情的浩劫战。俾斯麦很清楚奥地利已陷入财政危机，并面临来自东南部的民族混乱，但他同时也害怕法国干

涉。他很快提出了和平条款，对奥地利没有领土要求，但也实现了有限的目标——向奥地利各个盟邦展示了它的软弱。大多数邦转而加入了普鲁士占主导的北德意志联邦。

现在普鲁士与危险但却孤立的法国关系恶化了。1870年，看到斗志低下的奥地利与“公海”中的英国都不会加以干涉，俾斯麦便把矛头转向法国。靠战争起家的普鲁士军队比较容易地征服了这个对工业战争可怕性一无所知的欧洲国家。接着，普鲁士征服了最后一个德意志国家，并很不明智地从法国手中夺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俾斯麦的战略是由软到硬的——先是协商，然后是外交周旋，最后是“铁血政策”——对德意志而言，联邦方式与奥地利方式只能两者择一。第二帝国建立起来——它的君主、法律、通讯网络和制裁都是以普鲁士为主导的。普鲁士的独裁君主制与军国主义帮助其实现了统一，并主宰着这个民族。

第八章所定义的权力兴衰的五个原因，在这些高度戏剧性的事件中就混合了四个。尽管普军斗志受到了一系列胜利的鼓舞，但意识形态权力的差别是很小的。普鲁士的经济现代化恰如利剑出鞘，其铁路和快速装填式撞针枪使其在战场占据了优势。再次，军事权力本身的平衡也向普鲁士倾斜，因为莫尔特克及其将领发展了比其对手更适合工业化战争的策略和训练。第三，普鲁士与其对手相比，更为团结统一，也更为热衷于工业军国主义。但它决定性的政治优势来自外交。俾斯麦对于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是深思熟虑、小心谨慎的，在前两次战争中建立同盟，在所有的三次战争中都使潜在敌人保持中立，留给将领们的目标也明确集中。与之相反，奥地利与法国的外交，其作战目标混乱不堪，使将领们无所适从。第四，个人决策者的能力和权力——莫尔特克，尤其是俾斯麦——在复杂多变的险境中极为重要。如果没有俾斯麦的政治主导，这场赌博到现在也不会发生，德意志的三种选择也仍然悬而未决(Pflanze, 1976)。个人尤其是位高权重的个人在世界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还有，就像早期英国对法国的胜利，那是在特定

环境下反对特定敌人的总体优势，即把全部的可能性老练地动员成了现实性。在这场动员中，占优势的联盟外交是至关重要的。

普鲁士的胜利无论是对德意志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实现了德国统一，并凭借武力终结了邦联主义。现在军国主义取得了很大的合法性，跨民族主义得到了削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现代者被吸引到普鲁士中。他们看到普鲁士的优势在于对工业、科学、教育和资本主义的开明态度。专制国家不再是君主和旧王朝的私有财产，它也与资产阶级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自由派的理论)。它也不仅仅是二者联合镇压劳动者的产物(如马克思主义)。它是为解决交织在一起的阶级和民族斗争而产生的令人始料不及的结果。

因此俾斯麦说，普鲁士"总处在制定德意志法律的位置上，而不是从他国接受它……如果革命爆发，让我们积极地承担而不是消极地承受"(Gall, 1986, I, pp.62, 278)。他的言论被称作"来自上层革命"的描述而载入政治词汇表。自由派分成两派：少数顽固的进步派和多数顺从的民族自由派。他们在意识到国内"警惕与效忠敌对的义务"时，都宣称在民族事务与对外事务上与俾斯麦无条件合作。它的国内优先论比自由论更为集权化：确立帝国首脑在法律上的领导权，统一民法，建立德国国家银行。随着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一些限制，一个普鲁士领导的、国家法律统治多于议会统治的、体现公民权多于政治权的法制国家建立起来。

普鲁士政体在1867年扩展成北德意志邦联，1871年扩展成德意志帝国。基于一部邦联宪法，许多管理，包括对警察、法官、教育的管理，按惯例都掌握在各邦手中。增税要与各邦国王和代表共同商定，市政府实行自治。阶级投票在帝国议会中被废除了，但在重要的普鲁士议会中仍被保留下来。选区的分布仍偏向乡村地区。从乡村到城市的强制移民实际上减少了工人的票数。其中也有国外投票但没有议会支配权。德国国会不能任命首相，也无权参议对外方针，军队不是对德国国会中的首相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霍亨索伦王族保持行动自

由，资产阶级被准许成立法制国家(如马歇尔的公民权)但仅限于政党民主。这种半专制国家，其争端集中在代议制问题上。

新政权的反对者可能把其诬蔑为“一个关税的国会，一个邮政的国会和一个电报的国会”(Eley, 1983, p.282)——在第二帝国水平上，这是民事政府机构承担的责任——但它却在联邦与激进的夹缝中赢得了选举。它的“自由主义”与英国或法国的自由主义不同。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它却在专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实施中以及更为地区化的利益概念中忍辱负重。政权逐步巩固，紧跟其后的资产阶级也日益壮大，且资产阶级诽谤邦联主义是反动保守的。奥地利的情况完全与此相反，其现代意识形态都被地区“民族主义分子”从集权化的自由派中清除了出去。

联邦主义者并没有消失。他们转入地下，既掩护了自己，也能继续反对集权国家。阿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不甘做附庸，他们在德国国会里组织起桀骜不驯的地区党派。一些自由分子维护地区利益，大多数南部的自治邦都反对帝国集权化，天主教徒抵制普鲁士路德教的集权政府。现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在一个国家内交织在一起，普鲁士曾成功地克服过这些问题，但现在它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特点。

此外，旧政权和资产阶级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其同盟的稳固性也大打折扣。随着重工业逐渐有实力与英国抗衡，因而赞成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并且如果有潜在市场存在时，他们就会通过法案(并且此后经常有法案通过)以保护早期工业。1850年后，利斯特被重新评价。但贸易保护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呢，还是像利斯特所显示的那样？德意志向工业自主的过渡发生于19世纪中期后的自由贸易阶段。这种争论也受到现代化民族主义不可预料的后果的影响。“利益”是贯穿德国的一条主线。随着工业家也进入到普鲁士—德意志政府中，他们认为自己及其经济是民族性多于跨民族性的。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路德教派信徒，依靠国家帮助来对抗劳动者；在国家日益保守的教育体系下变得社会化；赞同关税同盟，并以

合法的方式与国家协商信贷设施和通讯基础结构问题，还有很多受雇人员也在工业和民用服务业之间举棋不定(Kocka, 1981)。工业家和国家管理者针对外来竞争酝酿了“民族化”的解决方案。

施莫勒指出，贸易保护是

> 国家和民族经济同时制定的……这种体系的实质不在于货币说或贸易平衡说，也不在于航行法律，而在于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既在于社会及其组织的全部转变，也在于国家及其机构的彻底转变——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取代地区经济政策。(Ashley, 1970, p.55)

但起初容克地主并不同意。他们要出口农产品，而对工业产品的关税保护可能会招致国外报复，进而引起新世界的干涉。表8.4表明美国的农业生产力远高于德国。19世纪70年代，蒸汽船降低了横越大西洋的运费。由于进出港口的铁路运费非常低廉，美国谷物和其他的一些货物以比当地生产更为便宜的价格进入欧洲。美国还培植了比普鲁士黑麦更软的谷物。19世纪70年代后期，容克地主和农业生产者在经济领域转向了保护主义。

然而这与他们的纳税负担比起来，也许算不得什么。尤为反常的是，他们要求减税的同时，国家却要求增税。看似一直向前的部门“经济”利益与更为复杂的——民族的、阶级的和军事的国家形势交织在一起。权力的失衡再加上武器在技术上的更新换代，增加了军费开支，而与此同时的财政收入却是一直下降的。因为自由贸易减少了关税，法国的战争赔款也在1875年结束，还有经济萧条也增加了税收拖欠。联邦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它的主要直接税收来自各邦的“人邦捐赠”。但这沉重打击了容克地主和农民业主，这些俾斯麦的忠诚拥护者。他们也要求国家分权，给各邦更多的权力。间接税收有两个不利因素：他们需要的仅是各邦联邦议会最低限度的同意和帝国大会的初

始同意，他们对消费者的打击比对生产者更大。俾斯麦本人也在这些政治领域转向了保护主义。

民族自由党和进步派、主要的自由贸易者和议会拥护者，是他实现计划的主要绊脚石。但俾斯麦现在有了可乘之机。1878年，两个激进分子企图刺杀皇帝。第一个导致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制定。当俾斯麦听说第二个的图谋时，他说："现在我有办法对付他们了。""社会民主党？"他自问自答，"不，是民族自由党！"(Sheehan, 1978, p.183)他解散了帝国大会并策划了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骇人听闻的选举，其结果是大获全胜。在新议会多数派、农民保守派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下，他提升了关税，为军事预算提供资金。帝国政府在联邦国家中增加了财政自主权(在帝国大会也增加了稍低程度的自主权)，并且随着农民利益的观念转向关税，他从更为两厢情愿的政治经济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财富(我对关税的论述是吸收了霍布森1991：第二章的研究成果)。"黑麦与铁"的同盟组建起来，尽管它也包括了西方的一些农场主在内。德国分别在1885年、1887年、1902年和1906年提高关税。

但这种关税并不高于其他国家，也不高于德国前阶段的关税(Barkin, 1987)，它们的意义在于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随着在选择性保护主义问题上达成一致，民族资产阶级、旧政权和一些农民逐渐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而且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也进军贵族阶层，购买农村庄园，并使其儿子参军。大资产阶级逐渐钻到旧政权中，就像在18世纪的法国那样骗取了信任(见第六章)。在所谓的"政治联合"中，容克地主和工业家互相交换产品、子女，在政治经济领域合作，争取农民并且镇压工人。他们也有分歧，特别是在税收方面，但其反对派却更为分裂。

19世纪80年代，专制民族资本主义被制度化。纵向组织成大集团、横向组织成卡特尔并与银行业紧密融合的工业，逐渐渗入到由农民贵族构成的专制君主政体中。他的成功使中产阶级紧随其后，尽管被

剥夺了一些英国、美国、法国同行所津津乐道的政治参与机会，但他们可以共享经济成功、教育机会以及像公职人员一样在行政管理、管理和专业领域从事一项职业，并共享一种建立在强大成功的民主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社区感。最近成功的取得在于这些集团中双向的军国主义路线：国外的军事冒险和国内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专制联合正在把旧政权、新兴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融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中。

然而德国经济的成功也引起了主要的阶级变动，破坏了阶级关系的稳定。农业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从1850年的47%下降到1909年的25%。东部的容克地主把着眼点放在内部，转到他们当地的经济问题上。与此同时工业家和金融家却群集于政府里，商讨如何解决由保守的容克所主导的政治、经济、税收和地缘政治问题。农业商品化促使西方阶级关系更为多样化，产生了农村工人阶级和更为独立的农场主(见第十九章)。中产阶级——在私人企业和政府官僚机构中的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和流动职业者——的权力上升。起初是由名人领导的部门政党控制的，1900年它也迎合大政党提出了反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要求(见第十六章)。产业工人的权力也逐渐增加，由于被蛮横地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统一在阶级组织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下(见第十八章)，这限制了政府的分而治之选择。

开始于1900年的阶级选举力量约有1/3的农民，1/3的中产阶级(包括独立的农民)和1/3的工业无产阶级，但阶级与选票并不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贵族，现在也包括工业家，仍操纵着部门控制，而所有的阶级与大多数政党都在与民族相对照的区域权力争端上发生分歧，尤其是通过教派表现出来。阶级、宗教和地区因素混合在一起，相互竞争。政府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阶级极端，都主张民族国家中央集权，也都在北部和路德派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民主党强烈赞成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把国家社会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丝毫不受非集权经济或工团主义的影响。因此它在路德教社区中更能引起共鸣。

政府和社会民主党都没有得到多少热情的地方主义者或天主教信徒

的支持，路德教普鲁士和天主教奥地利的冲突，在文化斗争之后，已巩固了天主教中央党。天主教教堂在世纪初的德意志国家中所拥有的大地产和世俗权力已被剥夺。从那时起它就在地方社区中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更为国家化的路德派相比，它更为成功地抵制了19世纪的世俗化。在文化斗争中，教士、天主教自发组织，甚至把信仰天主教的产业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防卫他们的地区权力，特别是在乡村的地区(Evans, 1987, pp.142—150)。整个欧洲的天主教都在反对一种无神论但也是国家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央党既反对民族集权化，也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它在教权主义上是保守的，但却有自己的社会方案。在多数个人意识中，在所有的政党方案中，阶级与民族因素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种半独裁的政权中，要想通过立法，就需要帝国议会的多数票。尽管政府操纵着各部门，并进行有选择的镇压，但它仍需通过帝国议会各党派来驱动主要国内政治。因为社会民主党控制着路德教工人，也因为少数异教徒党派均拥有牢固的地位，所以政府不得不向中产阶级、农民和天主教信徒妥协。它的决策受到资本主义、君主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束缚。因此，它不能鼓励在温和派工人和政权、中产阶级、农民以及天主教自由派中成立中间派联盟来除掉社会民主党。面对政权阻挠，任何其他党派都没有能力组建这样一个同盟。布莱克伯恩(1980)指出，从1890年起，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资产阶级进步派同盟是应该能够永久的在帝国大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但中央党宁愿与政府妥协也不愿以其阶级地区的敌意政见与旧政权相左。我们在第十九章将会看到，政府在乡村中有着相当的影响。路德教农民是拥护国王的，有的受到右派的压制；天主教农民宁愿作实用主义的调解。政府允许一些区域自治以换取对中央的控制。

路德教工人阶级仍然受到排斥，它的激进核心信仰是一种表面的军事国家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党自己关闭了合作之门。1900年后，进步党指望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但遭到断然拒绝。第十九章论证了

社会民主党的农民式盲目：仍信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寻求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胜利。对相同数量的农业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取向上的举棋不定却坐视不管。他们加入了保守党、区域农民党，但绝大多数还是加入了天主教中央党。天主教工人和其他工人在阶级政治上产生了分化。大多数中产阶级因在英法出现的自由主义而气馁，天主教徒在阶级争端上仍是保守的，在民族争端上是“忠诚的反对派”。这些压力减少了政府对我即将论述的资本主义、半独裁、君主政权、军国主义等形式的削弱。它仅贬低了路德教教义。尽管它对部门分而治之的选择受到限制，但它“容纳”的定型却完好无损。

政府有两项国内优先权：通过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进行年度预算和七年(后来是五年)军事拨款；在有秩序镇压劳动者和少数派异教徒的同时，进行温和的社会改革，并使之现代化、工业化。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在于中央党、右派和温和的地方主义者。保守派支持政权但却反对现代化。容克地主反对在工业发展和税收改革上的优先权。工业对所有的这些都不屑一顾。天主教中央党和南德国家视国家现代化为集权化，并加以反对。使政府最为惴惴不安的就是，在危机中，“在野”政党和临时结成的“在朝”政党会和“帝国敌人”即帝国的敌人勾结在一起，投票推翻年度预算或军事拨款。

但它的这种担心从未变成现实。政府左右逢源，在保持行动自由的同时，逐渐实现了其主要目标。内阁权力下降，议会多数派消失，而皇帝也因姑息政治家们的屈辱而脾气暴躁。但拨款通过了，对民主的进一步要求也未出现。独裁一体化使德国成为欧洲发展最快的工业民族。工人阶级有发动革命的危险，而社会民主党的危险更大，包括城市居民、新教工人、资产阶级、农民、天主教信徒和针对政权的非集权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日益壮大。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的选举中占据多数议席，这使右派和中央党投向了王朝怀抱，部长们得以实现其渴望已久的税收改革。国内政权可谓稳如泰山。它的特殊方式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许多独裁政权，从奥地利到日本，都设法采取了它的成功

制度。

帝国和政府自治

这个政府拥有多少自治权？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斯·韦伯分别给出了两个主要答案。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Marx and Engles, 1968, pp.96—179)，马克思承认国家精英享有“有限”自治。他还定义了三种自治政治运作者：“官方的共和反对派”、政府官员和路易·波拿巴，着重强调了波拿巴在没有一种生产模式或一个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特定形式下，拖延了各阶级及其反对派的彼此对抗。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分析扩展到其他事例时，总把俾斯麦和帝国包括在内(Poulantzas, 1973, pp.258—262；Draper, 1977, pp.311—590；Blackbourne and Eley, 1984；Wehler, 1985, pp.55—62)，但他们认为波拿巴或俾斯麦对阶级冲突的操纵在结构上受到上升的资产阶级的限制。波拿巴得以幸存是由于他为私人财产提供了最有力的社会保障，使其不受民众起义的侵犯。俾斯麦引起了一次“国家行政机构的创造性独立，其内部自治的范围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政治动力的限制”(Blackbourne and Eley, 1984, p.150)。这种国家形式可能是自由的，也可能是独裁的，但资本主义最终决定着它们自治的范围。

韦伯指出帝国(他生活在其中)有利于自治，但他也强调自治的障碍首先就是官僚机构。第三章引用了他关于现代政府中官僚高于政治统治者的重点论述，他指出：

> 在现代政府中，自从权力的执行不是通过议会的言论或君主的公告，而是通过管理惯例，实际的统治者就必然也不可避免的是官僚机构……自从俾斯麦辞职以来德国便是由所谓的“官僚”作出决定的。(1978，Ⅱ, pp.1393，1400，1404)

但我们不能仅凭韦伯个人的生活阅历，就对暗示的社会权力做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论述。第十三章指出官僚人数太少，远不能适应在全国推行有效军事基础设施渗透的需要。俾斯麦曾两次试图毁坏可供选择的权力组织，然而反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和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都失败了，只是加强了对方的力量。官僚机构规模太小，在政治上不能依赖其履行立法(Ross, 1984)。

事实上，在官僚机构的权力问题上，韦伯自己也推翻了这种强调论述。他认为尽管官僚在目标实现上是蛮有效率的，但他们本身并没做什么。他承认在德国有两派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主要的行政官——进一步说是由法律规定的两个行政官，皇帝和首相——和"各党派"。首相实际就是俾斯麦。韦伯坚信是俾斯麦主宰着德国的政治，留下"一个没有任何自己政治意愿的民族"。但皇帝及其身边人的蠢行，既不受部长们限制，也不受独裁议会的限制，对外交方针产生了火难性的影响(1978, Ⅱ, pp. 1385, 1392, 1431—1438；要想细察，见 Mommsen, 1984, pp.141—155)。但官僚和这两个政治行政官对保守派和容克地主"政党"也是谦恭顺从的。占统治地位的君主，作为容克地主血缘网络的世袭首脑，与容克地主有着同样的骄横自负，同样的生活方式，并招纳容克地主加入其法庭和高层官僚机构：

> 不要以为官僚机构独掌大权就不存在政党统治。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保守的德国政府身上，德国实行的议会政府制度……在于这一公理：每一个政府及其代表必须是"保守的"，除了对普鲁士资产阶级和中央党作一些政治委任权的让步。这点是由官僚统治"上层政党"的特征决定的……只有掌权的保守官员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的政党利益，主导着国家事务的方向……无论何时，当站在执政党背后的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或社会权力利益濒临危机时，王权总是有名无实的。(Beetham, 1985, pp. 165, 179)

因此韦伯也指出官僚机构和行政首脑精英自治的局限性：他们没有宣战权，不能限制资本主义，只能听从于保守党。

这个政党实行的不是来自社会阶级的国家精英自治(像真正的精英理论家在著作中谈到的那样)。容克作为一个阶级，以前曾占主导地位，现在正走下坡路。但他们仍握有德国大权，因为他们过去在国家中的经济主导地位已被制度化。与之相反，现在控制着德国经济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没有实权。以前掌权的阶级通过控制国家机构来反对目前的主导阶级。这种"政党"是与国内社会和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如我在第三章所论述的)。我在第四章也提到，英国掌握政治权力的旧政权，通过旧王朝的自由主义，保持了更多的自由放任主义，甚至超出了英国的工业要求(同样见 Mann, 1988, pp.210—237)。他们拥有"政党"的权力。相比之下，韦尔和斯科克波(1985)也声称是韦伯的嫡系，他们认为英国在 20 世纪没能成功地采纳凯恩斯的各阶级合作主义，是由自治政府的官僚机构权力导致的。谁是谁非有待于事实的论证——并且是唯一真正重要的论证——但谁更倾向于韦伯主义，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我。德国的国家自治是多重的，包括两种明显的精英因素、官僚机构和二元行政首脑，以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化了的政党。

事实上，韦伯的三个政治运作者是一种过少地估计。如果我们遵循机构国家理论，我们在帝国中至少可列出十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前两个就是韦伯所说的主要行政官：

1. 最高皇帝的权力是能被授予的(也能被剥夺)。

2. 帝国首脑和下属的大臣们——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罢免。但皇帝仅是无规律地执行这些权力而已。他们通常是由容克地主和西部贵族集团中的路德教徒来担任。

然后我增加了帝国的行政机构，也按韦伯的意思体现了中央版图的"政党"关系：

3. 宫廷并非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而是与皇帝联在一起的，尤其是

通过内阁的个人参谋圈子，通过党派纠纷和阴谋。宫廷主要直接代表路德教的容克和贵族，其中也掺和了一些贵族化的或有权势的工业家、银行家、教育公职人员和(后来的)天主教徒。

4. 军事，实质上普鲁士的军事(尽管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保留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按常规对皇帝负责，最高统帅与宫廷联系在一起，二者局限于相似的阶级中。陆军与海军有着互不相干的统帅机构，二者没有正式联系，二者的高层都有贵族等级和直接立场互相涉足——高层官员有单独晋见皇帝的权利(见第十三章)。

5. 官僚机构是最为协调的一个机构，大臣们拥有部分权力，然而也拥有自己集团的法律权利和阶级团结。它通过大学代表着旧政权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妥协。19世纪后期的内阁在宗教多样化方面作出让步，接受了一些天主教徒。在官僚机构的高层也受到直接立场的影响，并且整个官僚机构都受到联邦主义的影响。大部分的国内事务都由各邦自己处理，而军事、外交和重要的通讯基础设施则是由帝国统一决策。然而普鲁士的最高权力，第十个机构，反作用于这种多样化。

因此我增加了议会机构——帝国议会和正式政党——在国内社会代表其成员和投票人。帝国议会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它在否决预算方面比政党拥有更多的权力，但它的权力受到限制且不明确。对政府的顺从使大多数党派向集权化和寡头政治方向发展。大多数党派仍是在部门中，而不是在公众选举中引人注目。因此，用于18世纪英国的三元模式(见第四章)仍是适用的：

6. 由名流组成的“在朝”党派通常是皇帝、首相和大臣们咨询的对象——保守党代表路德教的农业地主和他们的依附者；民族自由党代表的主要是路德教的城市资产阶级，二者都是国家化的。

7. “在野”党派通常不是被咨询的对象，但其支持会保证政权无需作出过多的不情愿的让步，就可占据帝国议会的多数——他们是更为非国家化的进步党、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天主教中央党以及农民党。这些党派逐渐脱离了贵族控制，变成了公众选举的力量。

8. 被政府称作帝国敌人的“被排斥”党派，也是帝国的敌人，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寻求他们的支持——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再加上少数异教徒和独立党派。

然后我增加了联邦机构。尽管联邦主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也几乎没给各邦政策创制权，但仍有三个独立的权力机构需要加以考虑：

9. 联邦议会(德国国会上院)——二十五个联邦国家议会的上院。他们共同拥有立法权(和皇帝一起)和宣布战争与军事管制法的权力。虽然是由皇帝主持议会，但普鲁士的代表拥有集体否决权。它的主要权力在于为直接税收进行复杂的财政分配安排。

10. 普鲁士邦——这个“省”政府实际上比帝国政府的权力更大。它控制着政府的心脏地区，对心脏地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并且还决定着帝国管理的特征。此外，对现有军队的控制是由普鲁士作战部执行的。

11. 地方政府——城市有充分的自治权，可以决定自己的法律、征收追加税、扩充公共所有权(Kocka, 1986)。由于在德国各地差异很大，这改变了各党派在地方上的“在朝”、“在野”和“被排斥”的状态。例如，在巴伐利亚，天主教和他的附属党派是“在朝的”，甚至连社会民主党在很多城市也都是“在野的”。

这个国家是多形的，它的定型也出现在多重机构当中。沿着半代议制路线发展的现代化，与多重机构一起，仅对皇帝一人负责。这使法国与18世纪的普鲁士人的先驱相比，更为分权，也更为分裂。那时的君权掌握在国王和他的高层官员手中，而现在它更加分散了。法律规定分权，但并没有明显地界定它们，这一点与《美国宪法》不同。贯彻政策需要这样的机构，即它的法律权利需人为地模糊，以保持君主的行动自由，就像19世纪大多数的君主宪法一样。这赋予特权给非正式的权力中心和君主与首相的中心地位。一个上级部门派系主宰着首都，它的阴谋、小集团和游说皇帝的企图是首要的政治进程，可能正在颠覆着内阁和军事中的理性官僚机构。

中央的部门权力关系也刺激了法人压力集团的产生。与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的权力运作者更少依赖经济市场和公众选举。法人组织在首都的势力膨胀，使整个国家都为之俯首帖耳，并且潜入了内阁和帝国议会的内部。迪芬多夫(1980)指出，法人很早就在莱茵地区界定了商人与德意志国家的关系特征。它们在 19 世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层次：从雇佣者组织和卡特尔到像海军同盟或东部边境协会这样的压力集团，一直到像无数的共同协会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组织。德国与自由国家相比，其组织彻头彻尾地独裁。美国从其资本主义法人身上看到了更多的游说成分，但它的政府太小了。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希尔弗丁创造了一个新的说法，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认为它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但对于德国，他应考虑得更复杂些。韦勒提出了更恰当的措辞：这一政权是"多党派的但却不协调的独裁主义"(1985, p.62)。与那些奉行君主独裁的自由国家，如英国或法国相比，它的集权色彩实际要淡一些。因果很少一致的复杂的部门阴谋最终导致了方针政策的产生。

然而多形派系主义与全盘混乱并不相同。国家的真正决策者——君主、首相和部长——拟定了稳健协调的部门权力策略以保持国家事务的方向。大政方针的制定，像关税或赋税改革、主要的海军方案、文化斗争或福利立法都需要专制权力。帝国议会被解散，大臣被解职，其反对者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因为更少天赋或更多思想观念的大臣的反抗斗争，俾斯麦得以极其娴熟地在党派之间运用有选择地镇压和诱导以及分而治之的策略。俾斯麦得心应手地把阶级与民族、国内与国外事务联在一起，这种政策在一个帝国内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的反对派是"在野派"和"被排斥派"的不稳定混合，即资产阶级自由派、农民、工人、天主教徒、南方的地方主义者和少数派异教徒。全盘镇压是不可能的，最好是按部门进行分而治之。政策似乎极不稳定，因为这受到现实动荡的影响，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总指挥。俾斯麦并不认为自己是战略决策者，而把自己定位于敏锐地捕捉总体关系与

趋势的人。他常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在树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路，只是凭感觉来辨别方向。

但即使没有俾斯麦，政治也会与追求国外目标粘在一起。十一个机构可减缩为四个。政治机构都是为四个相互交织又兼容性很强的扩散性功能目标服务，在第三章我把此称为"高层次定型"，每一个都与社会权力的起源有关。它们的广泛兼容性与政权的派系是融合在一起的，尽管它们最终毁灭了后者。

1. 资本主义是国家的经济定型。政府中的任何一个人实质上都是土地拥有者，或是工商企业者，他们使用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商品。保留私有财产是毋庸置疑的最终目标；因此应加快工农业现代化以提高私人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

2. 军国主义表面上缔造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宫廷和君主的随从被灌输了效忠、荣誉和铁血的思想。官僚机构被一体化、等级化。资本家变成了后备军官，他们的儿子在大学里就加入了统一的兄弟会并取得了决斗经验。这并不是一个有着不可一世、炫耀武力的反动分子的国家。军人的水平不同；很多军官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些是自由主义者——如卡普里维，一个普鲁士的将军和短暂任期的首相。然而与大多数的西方和南部国家相比，德国较早地运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内外的问题。当韦伯、欣茨和后来的一些观察家写到德国资本主义趋向"封建化"时，他们其实是用词不当。"军事化"应该更为恰当。"封建化"暗示着封建因素多于资本主义因素，而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生产模式。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封建国家。"军事化"则意味着军事与资本主义并存，而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这样随着资产阶级逐渐与旧政权势不两立，许多人在国内外方针上转向了军国主义路线，转向了专制、侵略和高压策略。"秩序"变得无比神圣——比单纯的财产储备弥散得更广——是旧政权引以为傲、被国外旅行者经常责难的一种价值观。

3. 半独裁的君主政体。德国的"代议制"实质上是二元的。一方

面它深深地受到皇帝君权的影响，政治运作者必须通过以皇帝为中心的布满君权装饰物的上层网络来操纵。一个有决定权的君主可能会变成可怕的权力运作者。好斗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仅是一个行为乖僻者，偶然的危险行为证明了这一点(如韦伯提到的)。尽管德国君主与奥地利或俄国的君主相比，受法律制约较多，王朝特征较少，但皇帝的倾向还是要加以考虑或控制的。然而法律也是议会通过的。帝国议会尽管不是说一不二的，但皇帝必须要与之磋商甚至听从它。这就是君主们梦想打击它的原因。在德国，就是因为这种二元制才产生了对君主模棱两可的定位。

尽管这三种高层次的定型本身体现了意识形态，但政权也随之产生了两种自主的意识形态：

4a. 路德教义。德国路德教派企图使国家宗教化。[3]在文化斗争失败后，随着政府寻求与天主教合作，转而把路德教作为一种敌对的国家意识来看待，使这种倾向有所削弱。而马克思社会主义逐渐在路德教工人中流行起来。路德教义作为合法的国家意识形态，1880年以后逐渐被取代。

4b. 国家民族主义。随着公民权的扩大和党派的公众选举，国家民族主义也在某些阶级和地区生根，这促使政府野心勃勃地动员民族力量，在国内反对帝国的敌人，在国际上反对列强对手。尽管它支持资本主义、君主政体和军国主义，但1900年后，这种国家民族主义也对它们施加了混乱而独立的“民众”压力。(见第十六章和二十一章)

因此德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主的——其国家精英和政党是多形系列的，不是十分协调的，这体现了兼容性强而又明显高层次的定型。让我增加第五个定型，在民族争端上，仍有点不协调和易变。君主在路德教派和国家民族主义支持下，甚至超出法律许可去尝试更多的民族集权化。

现在我能沿着第三章确定的线路进一步减少这些定型吗？在某种终极的实例意义上，一种定型会最终把自己强加给别人吗？在帝国中

它们是否押下赌注，迫使政府在它们之中作出选择？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认为最终的"范围"是被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强加的。事实上，德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已经通过1848年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德国还通过1914年的"一战"，通过经常站在有产者的一方调停工业争端，通过不断地镇压民族和工人运动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所有1917年以前的政权都会这样做。

但国家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定型也不总走在观念意识的前面。帝国不惧怕工人或农民。当代人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可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产是"自然的"，它也不需要永远的警惕。"秩序"在1848年革命中尤为重要，但从此后很少有来自下层的严重"骚乱"。军队并不像同时期的美国那样部署着随时准备反对劳动者，并且——因为德国的军事部署是形式化、有秩序的——那儿很少有暴力和凶杀(见第十八章)。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与福利国家立法对社会主义的打击并不是致命的，反而是他那规范的部门性分而治之策略的有选择镇压和来自半独裁定型的威逼利诱，对社会主义的打击更为严重。这些法令企图分化资产阶级政党，就像福利方案企图分化社会民主党与平民百姓，分化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一样(Tayler, 1961b；Gall, 1986, pp. II, 93—103，128—129)。

在布莱克伯恩和埃利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中，最薄弱的部分是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普遍的社会主义而与旧政权结盟。第十八章指出，事实上几乎恰恰相反，是这种结盟导致了普遍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产生。因为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工会和政治协会很少能找到自由同盟。镇压实际上是多此一举；而协作或许更能解决问题。进一步说，这种军国主义、半独裁主义、资本主义和路德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变成了自我实现——作为回应，核心的路德教工人阶级欣然接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从而激起了现在看起来或许是必经的进一步镇压。

这种政治对资本主义、并最终对其期望的“范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德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并不仅仅如此。这些定型并不是等同的；也不是辩证法的直接对立派。它们只是情形各异。在它们当中无需作出“终极”选择，模糊的君主政体也确保了这一点。政权从未直接面对它们，在它们当中作出选择。只有路德教义被贬低，并被国家民族主义所取代。政权转向了一种兼容性战略——包括资本主义、半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在内的战略。因为它没有决定孰先孰后，其机构也就变得更为多形化。但它们体现了一种更独裁化、集权化、区域化和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帝国打开了期望中的资本主义“范围”的缺口。

我对这一观点的论证跨越了好几章。这一章已经开始。第十四章论述了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关系；第十六章论述了它与假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关系；第十八章论述了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通过这几章的讨论，论证了这种兼容性趋势的国内力量：它把这所有的四种定型很好地融入成功而稳定的独裁民族资本主义中。然后第二十一章论证了这种兼容性战略在对外政策上的虚弱，如政权在可选择性政策中选择失误，其兼容定型也增加了在国外的敌人，并导致了毁灭自身的战争。后来(并非该卷论述的范围)战争在德国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在其他地区产生了布尔什维克——这样政权进一步完全打破或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

对普鲁士的结论

我已描述了德国的崛起，那是独裁合作在工业社会的应用，是“纵向”阶级关系和更为“横向”的部门权力关系的妥协。工商业资本家和许多中间阶层进入了政权或围绕在政权周围，宗教和地区分离主义者被部门分而治之的劝导所迷惑，工人阶级和少数派异教徒被排斥、隔离

和镇压。随着旧政权的现代化、阴谋化并历尽艰辛闯过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一种新型的现代国家方式，即集权民族资本主义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它仍具有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征，并且变得更加半独裁化——在这些高层次的政治定型中避免了“最终”选择。只有它的意识形态定型从路德教转向了国家民族主义。部门独裁权力对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军国主义在国内有所分散——当然也反对劳动者和少数派异教徒，但更多的是选择性反对其他——并且在地缘政治上反对列强对手和国外资本家。它的民族主义加快了政权的转变，即从自由保守主义向沿着此路发展的社区恐怖意识和经济利益合作观念转变。它的资本主义与大多数国外资本主义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富有压制性、区域性和民族性。它或许会在德国扎根生长，除非被自身的军国主义所推翻。

它的崛起并不是无争议的或必然的；它的成功是不彻底的。我没有简单地把德国认为是独裁的或军国主义的，把英国看成是自由的或跨民族的。它们的差别仅是程度的深浅而已。进一步说，德国从自由保守主义和跨民族主义的偏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关系到几种相互交织的权力来源。普鲁士的优势起先几乎是偶然的，然后被军事政治和外交技巧、特别是被俾斯麦所夸大。19世纪中期的经济发展在逻辑上有很大程度的自治，但也受到这些相同力量的束缚。在普鲁士旧政权、资产阶级和区域分权者的伟大政治妥协中，没有任何一种主要的运作者留意到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融合。然而这恰恰改变了它们的共同点。这种融合的结果就是德国崛起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民族国家。它被后来交织在一起的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和列强的竞争所扩大(这些将在第二十一章讨论)。通向先进工业化的路线，包括那些自由主义或改革主义提供的路线，在国内被制度化——尽管在某些方面是不协调的制度。它唯一致命的弱点还没被揭露出来。

但在方法论上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来解释19世纪的德国发展。因为除普鲁士外，还存在另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它在许多方面是

普鲁士的对手。叙述德国历史不提奥地利就像叙述哈姆雷特——一个显然最终注定要失败的鲁莽王子——不提他的优柔寡断一样。

注 释：

[1] 把一般来源运用于19世纪德国的有哈默欧(1958)、泰勒(1961a)、亨德森(1975)、伯彻罗德特(1976)、盖斯(1976)、米尔沃德和索尔(1977；第一章)、伯默(1978)、基钦(1978)和辛德(1978，尤其在第三章)。

[2] 事实上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新教包括两个教派：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1817年，二者在普鲁士——后来在德意志的其他国家——合并为单独的福音教派。我把这一派称作“路德教派”，因为这表明了它的主要特征，并且也是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措辞。

[3] 后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纳粹党，从路德教那里得到的支持远超过天主教。

参考文献

Ashley, P. 1970. *Modern Tariff History: Germany—United States—France*. New York: Howard Fertig; reprint of 3d, 1920, ed.

Austensen, S. 1980. Austria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in Germany: 1848—186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2.

Barkin, K.D. 1983. Social control and the Volksschule in Vormärz Prussia.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6.

1987. The second founding of the Reich, a perspective. German Studies Review 10.

Beetham, D. 1985.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rchardt, K. 1976. Germany, 1700—1914. In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Pt. I, ed. C.M.Cipolla. Brighton: Harvester.

Berghahn, V. 1973.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Blackbourne, D. 1980. *Class, Relig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Wiesbaden: Steiner.

Blackbourne, D., and G. Eley. 1984.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öhme, H. 1978.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Germany*. Oxford: Blackwell.

Born, K. E. 1976. Structural changes in Germ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mperial Germany*, ed. J.J.Sheeha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Calleo, D. 1978.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aig, G. 1964. *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Dahrendorf, R. 1968.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Diefendorf, J. 1980. *Businessmen and Politics in the Rhineland, 1789—183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aper, H. 1977.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ley, G.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tate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 R.Samuel and G.Stedman Jon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8. In search of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the particul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Epstein, K. 1967. The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second German Empire. *Review of Politics* 29.

Evans, R. (ed.). 1978.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London: Croom Helm.

1987. *Rethinking German History*. London: Unwin Hyman.

Fremdling, R. 1983. Germany. In *Railway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30—1914*, ed. P.O'Brien. London: Macmillan.

Gall, L. 1986.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2 vols. London: Allen & Unwin.

Geiss, J. 1976.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merow, T.S. 1958.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815—7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nderson, W. 1959. *The Zollverei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5. *The Rise of German Industrial Power, 1834—1914*. London: Temple & Smith.

Hobson, J. 1991. The Tax-Seeking State: Protectionism, Taxation and State Structures in Germany, Russia, Britain and America, 1870—1914. Ph. D.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ohorst, G. von, et al. 1975.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unich: Beck.

Hope, N.M. 1973. *The Alternative to German Unification: The Anti-Prussian Party, Frankfurt, Nassau and the Two Hessen, 1859—1867*. Wiesbaden: Steiner.

Howard, M. 1965.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 London: Cassell.

Jessop, B. 1978.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Kindleberger, C. 1978. *Economic Respon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rade, Finance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tchen, M. 197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 London: Croom Helm.

Kocka, J. 1981. Capitalism and bureaucracy in German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34.

1986. La bourgeoisie dans l'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re del'Allemagne. *Mouvement Social* 136.

Krasner, S.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

Lipset, S.M. 198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ist, F. 1885.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 Group.

McNeill, W.H. 1983.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Blackwell.

Mann, M. 1988. The decline of Great Britain. In my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rx, K., and F. Engels. 1968.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ilward, A., and S.B.Saul. 197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Mommsen, W.J. 1976. Domestic factors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before 1914. In *Imperial Germany*, ed. J.J.Sheeha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4.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erkins, J. 1984.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1850—1914.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0.

Pflanze, O. 1976. Bismarck's Realpolitik. In *Imperial Germany*, ed. J.J.Sheeha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Poulantzas, N.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Pounds, N. 1959. Economic growth in Germany. I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ed. H.G. Aitken.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rice, R. 1989.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Ross, R.J. 1984. Enforcing the Kulturkampf in the Bismarckian state and the limits of coercion in imperial German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6.

Rothenberg, G. 1976.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Rueschemeyer, D., E.Stephens, and J.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umpeter, J. 1939. Business Cycles, Vol. I. New York: McGraw-Hill.

Senghaas, D. 1985.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 Leamington Spa: Berg.

Sheehan, J. L. 1978.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What is German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 in Ger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3.

Snyder, L. 1978. Roots of German National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tearns, P. 1974.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Taylor, A.J.P. 1961a.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Methuen. 1961b.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London: Arrow Books.

Tilly, R. 1978. Capital formation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7: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Capital, Labour and Enterprise, Pt. I, ed. P. Mathiason and M.Po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pton, F. B. 1974. National consensus in German economic histor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7.

Trebilcock, C. 1981.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Great Powers, *1780—1914*. London: Longman Group.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hler, H-U. 1976.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1890. In *Imperial Germany*, ed. J. J. Sheeha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5.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Leamington Spa: Berg.

第十章

围绕德国的斗争(二)：奥地利与邦联代议制

我们该叫它什么?

我们现在讨论[1]的政治单位有着漫长而又富有影响力的历史，但却没有确切的名字。穿越历史时空，最为准确的名字应是王朝的，而不是领土的：从13世纪一直到20世纪，它始终处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即今天的奥地利和它们的首都所在地维也纳。因此“奥地利”可作为这个国家的简略命名。得益于大规模的封建和王朝扩张，它成为一个强国。从1438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连续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德意志)皇帝，这确立了他们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联姻与侥幸的屠杀一起导致了两种特殊的扩张。在西方，勃艮第、佛兰德和西班牙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之手；在东方，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王权也未能幸免于难。哈布斯堡王朝对多数西方国家的控制没能长久，但在东方，它于1526—1527年取得统治地位后就一直维持直到最后。

1760年，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这些领地(除西里西亚之外，都输给了普鲁士)，还有比利时的佛兰德和北部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它们还从波兰的肢解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中大捞一笔。现在多数帝国已不再

是德意志国家，1806年弗朗西斯一世宣称自己为奥地利皇帝，抛弃了他的德意志君主头衔(波拿巴早已经剥夺了他的头衔)。但匈牙利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拥有它们自己的政府机构，包括议会。1867年，奥地利被迫承认匈牙利进一步的自治，并再次重新调整自己。它缩短后的称谓即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君主政体(它实际的称谓却比这长得多)。匈牙利的领地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奥地利的领地包括所有的其他地区，从乌克兰的布科维纳穿过加里西亚(南部波兰)、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一直到亚得里亚海岸(尽管像比利时一样，这时大部分意大利已丧失)，绕了一个大的弧形。在这一半中唯一可被接受是法律因素多于领土因素的准则："两院制议会中有代表性的王国和领地"(匈牙利有自己的议会)。1917年，查理一世最终宣称这一半为奥地利。第二年他被剥夺了王位，其国家也随之消失。

命名可反映这个国家的特征，就像伟大的勃艮第公爵早期命名的困难曾经反映了他的国家特征一样(见第1卷：438—439)。这不是一个像英国、法国或后来的德国那样的民族国家。它没有自己的法律。在主要的行省中，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被分别授予王权，并宣读了不同的加冕誓言。约瑟夫二世在匈牙利拒绝这样做，但他的失败(见第十三章)让继任者不得不引以为鉴。这样到1760年，该国在四种主要的形式上已定型。

1. 在"民族"争端上，它的定型是"邦联"的(如表3.3所定义的)。哈布斯堡王朝宣称保卫每一个行省并尊重它们传统的风俗、法律、特权和宗教。在表3.1的条款中，它们贯彻其声明的基础权力是软弱排他的，依赖于与每个行省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党派和教派间的协议。

2. 在"代议制"问题上，它的定型是王朝君主政体。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是独裁统治者，被授权可随心所欲地统治，但必须在上面一段所制定的法律范围之内。它们的专制权力几乎是独裁的，像一个统治家族，一个封建贵族领地。君主、宫廷、内阁和高级军官组成了相当自

立而隔离的国家精英，来行使这种专制权力。但这个王朝高高在上，与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族统治相比，较少陷于国内社会之中；因此它的基础动员权力很小。各行省之所以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是因为除此之外，它们要么接受蛮横强国(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普鲁士)的统治，要么接受代表单一民族团体的知名人士的小国(捷克人、马扎尔人、塞尔维亚人)统治。这时东欧面临困难，陷入强国和存在民族纠纷的各国争夺中不能自拔。哈布斯堡的保护骗局也有益处；在现代社会，也被证明是解决地区不安全的最慈善的方法。

3. 不过，由于地缘政治防御和保卫小“民族”免受大“民族”侵略的缘故，这也暗示了军国主义的定型。军队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关键支柱，19 世纪的观察家把其形容为“王朝卫士”和“忠诚的学校”。

4. 在经济上，随着农村地主和城市商人开始把经济资源作为商品，这个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统治着相对落后的地区。与法国的绝对统治相比，哈布斯堡的王朝统治绝少有封建特权，因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冲突不多。

哈布斯堡各王朝在意识形态上的定型既软弱又不确定，尽管在一些行省为天主教义所加强，它们也用世俗化的政治和与其他教派的微妙关系对其进行攻击。由于不能动员民族主义，它们一般的“反动”倾向大多是由王朝统治决定的。

在整个 19 世纪，哈布斯堡各王朝都保持着军国主义并畅行无阻地向资本主义迈进。它们的问题在于民族争端和代议制争端。迫于压力，它们不情愿地向代议制的邦联主义发展，承认各行省在集权君主政体下的“民族”权利和自由。但在该转变完成之前，政权却在 1918 年崩溃了，产生了一系列小的民族国家，现在正从苏联的遏制下重新出现。

这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当面临民族权力时，邦联国家会覆灭吗？或由于它们邦联主义的王朝君主政体与来自阶级和民族的代议制压力不相容，哈布斯堡王朝会毁灭吗？它们的毁灭是意外的，甚至是偶然的

吗？哈布斯堡王朝为先进的工业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邦联政体形式吗？

对这些问题，其客观性很难保证。因为人们对于昔日维也纳的辉煌仍念念不忘，再加上东欧人那种可以被理解的信念，即他们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比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的统治更舒服。另一方面在于目的论的偏见，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是失败的反动派，所以它们看来是注定要覆灭的，这从1790—1914年间的几个走向失败的历史性转折点可以得到证明。1790年，约瑟夫一世废除了他大部分的开明改革；1914年，弗朗茨·约瑟夫卷入了一战，并最终毁灭了他的王朝(见Sked, 1981)。因为这是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是退盟主义艺术家的维也纳，是穆齐尔和卡夫卡的维也纳(后者实际上来自一个行省的首都布拉格)，就像华尔兹和白制服的维也纳一样，知名历史学作者对自己的杰作洋洋自得，他们把此比喻为外部的辉煌和内部的混乱、荒唐和衰落。

我的立场在这些观点之间。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并没有注定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很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它们的大国军国主义与其对手相比，有所衰落，但这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财政问题；并且也没必要在1918年的失败中终结。地区民族主义的分裂力量也被夸大了；它是哈布斯堡王朝困境的产物而非成因。在一个更为保守的辩论中，我持的观点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在于它的军国主义的王朝统治。它们没有实行公民权以适应现代社会。这或许是自由的或半独裁的，联邦的或邦联的，是通过协议或通过暴力取得的。这一时期的普鲁士和美国通过这种混合方式解决了阶级和民族问题。但哈布斯堡王朝面对阶级和民族问题，其解决方案是狭隘和不协调的。这最终导致了它们的覆灭，首先是战争，然后是战争引起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局势。因为这些军事王朝离不开战争，所以它们的覆灭不是天定的，而是其自己傲慢招致的结果。

哈布斯堡王朝的资本主义

19世纪的经济萧条令哈布斯堡王朝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和军事代价。由于欧洲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在战场上败给其他强国，其结果显而易见是要受到惩罚的，因为其现代工业和农业资源日益匮乏。那么经济萧条是哈布斯堡王朝衰落和覆灭的一个原因吗？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对此持肯定态度。他的书名《失败的经济冲刺》(1977)就表达了这一观点。奥地利对近来发展并不热心，没有及时“起跳”，错失良机。这是以前的经济历史学家所持的普遍观点，但近代研究证明这是错误的。

首先，他始终坚持罗斯托、格申克龙和孔德拉季耶夫的理论，即工业化经济突然“起跳”(罗斯托)或“冲刺”(格申克龙)到一个“长的波状周期”的上升阶段(孔德拉季耶夫)。不论这一理论是如何适应英国、德国和美国经济——并且持怀疑态度的人正在增多(见 Tipton 1974 年关于德意志)——它却不能适应法国(长期以来已被确认)，也无法适应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和1873—1879年间由于经济衰退而中断(Rudolph, 1972, 1975, 1976; Good, 1974, 1977, 1978, 1984; Gross, 1976; Ashworth, 1977; Huertas, 1977; Bairoch, 1982; Komlos, 1983，尤其是他尖刻的附录C)。其次，萧条的原因在于把奥地利与其对手普鲁士德国进行比较。事实上，奥地利的增长从1850年开始就落后于德国。但此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落后于德国。德国的增长率可谓首屈一指。在其他方面的对比奥地利也做得很好。如表8.1所示，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欧洲名列第五。古德(1984, p. 240)指出，1870—1914年奥地利的年增长率为1.3%，仅有德国、瑞典和丹麦能与之媲美。哈布斯堡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成功。

但造成经济萧条的理由还有两个需要指出。第一个是财政的。19世纪60年代早期财政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就是奥地利在1866—1867年的战争中被普鲁士打败。经济衰退集中在人均产值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上，这主要是由战争引起的。普鲁士在1815—1864年间国家太平，而奥地利却深陷在与意大利和一些小国的冲突中——极大地牵制了人力和财力——并且公债也耗尽了经济发展的投资。为了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经济霸权，奥地利被迫维持1848年前的白银流通比率，这使本已恶化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奥地利的债务纠纷使它的个人投资不可能像德国的个人投资那样一帆风顺(Huertas, 1977, pp.36—48)。

但只提财政破产还不全面。奥地利的军事支出并不比普鲁士高——或者说也不比其他强国高(见第十一章)——并且不可能危及经济。进一步说，财政体系也不足以把收入转化为军队。经各行省议会同意的久远的军事款项，已无力应付1815年前日益膨胀的军事开支(见第十一章)。哈布斯堡王朝迫于无奈，其借债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它们在1811年宣布破产。1815年后，军事压力虽有所缓解，但奥地利相对其他强国而言，仍是“忍辱负重”。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都谣传过奥地利的破产，并且在1859年也只是勉强躲过了难关。

奥地利的财政就像那些法国旧政权的财政一样：支出并不很多，但却与特殊的权力集团有着无休止的协议，这导致了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的征税负担、财政政治危机和过多的债务。由于专注于维护其特权，议会同意新税项的步伐都很缓慢，而且君主未经许可也不能向地方机构征税。议会赞同扩充军队，但每当地缘政治和民族压力上升时，这些军队又不够用了。因此国家就再次举债，牵制了投资资源(如韦尔塔斯所说)。财政困难归根结底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议会的问题。我将在以后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经济萧条的另一个原因与各行省间的不平衡有关。到1914年，单捷克斯洛伐克自己就占有奥匈帝国工业生产的56%，其工业生产能力

超过了法国。奥地利的银行存款是加里西亚的十倍，人均收入是其三倍之多，读写能力是其两倍之多(Good, 1984, pp. 150, 156)。肯尼迪(1988, p.216)坚持致力于强国对手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见第八章)，认为地区不平衡是奥地利权力“最为基础的弱点”。这可能会产生三个消极后果：一是奥地利和捷克的中心地位会剥削和阻碍中外围的发展；二是外围的落后可能会阻碍中心的发展；三是这种悬殊会降低整个的经济联合。只有第三个后果有着实质性的意义。

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这两条理由(根据他们居住的地方)或许是错误的。从1850年起，奥地利的发展就遵循德意志模式，落后了20到30年(Pollard, 1981, pp.222—229)。捷克和奥地利是最初的中介者，从先进的欧洲国家进口半成品和机器设施，然后把制成品输往东南部。不久它们变成了工业自主国家，为东南部提供铁路、机器和高科技。德国式的银行卡特尔和国家信贷方案为在东南部的投资开辟了渠道，尤其是在铁路方面。工业化也受益于最近的发展战略(民族化的铁路、关税和银行信贷)——“保守”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意识到工业资本主义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以匈牙利为例：起先，它用农产品交换奥地利的制成品，成为农业生产大国并渗透到了国际市场。然后从1900年起，其轻工业突飞猛进，用电力——不再需要接近于原始的能源——和农业收益、哈布斯堡王朝的财政专长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出口(Komlos, 1983)。古德(1981，1984, pp.245—250)在1867—1913年的地区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地区间的相互利益增强，地区差异下降(就像该时期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到1900年，它们的境况几乎与美国相同，并且要比意大利或瑞典稍强。这一时期的美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失败吗?

但这种资本主义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它并没有促成哈布斯堡土地上的经济一体化。并且经济变得更为跨民族性，直接促成了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捷克和匈牙利的工业与国外的联系同其他哈布斯堡地区的联系一样密切。经济扩张也加剧了君主政体下的语言冲突，因为越来越多的非德语系的人来到了平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后来进

一步增多)。奥地利那时发展了两种资本主义经济，一种是跨民族的，一种是“哈布斯堡式”的(在这里“民族的”这个字眼并不恰当)——前者引领着经济抛弃了从忠诚到王朝发展的理论，并向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个体化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发展(门格、冯·米斯、海克)，攻击利斯特的德国继任者的独立存在主义和民族主义(罗舍尔、克尼斯、施莫勒)(Bostaph, 1978)。当他们的社会学家体现了政权的相似性时——普鲁士的贡普洛维奇和奥地利的拉岑霍弗都强调权力的军事基础——经济学家在其理论中也体现了政权的差异性。哈布斯堡王朝在它们的土地上取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但它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的成功远逊于霍亨索伦王朝。然而这在政治联系上或许有点牵强附会。地区主义如想要危及哈布斯堡的集权，还需其他地区的鼎力相助。

民族主义与代议制，1815—1867 年

哈布斯堡的政治危机最终变成了“民族的”危机。像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运作者(只是有时被阶级、经济区域和宗教等加以限制)超越了大多数历史性著作的界限，不仅彼此争斗，还与哈布斯堡国家争斗，并最终毁灭了那个国家。这些“单一民族”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语言社区；也有一些成为宗教社区。但它们也根源于地区政治机构。单一民族在我所处的时代之初很少存在，甚至连“假想的社区”都不存在。然而最终它们都成为拥有相当选择性权力的真正社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四种社会权力来源的发展对语言社区(有时也对宗教社区)和地区政治机构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意义，把它们融合成了“多民族”。

君主国在整个处于争议的阶段中都有多种语言。在1780年的24万人口中，24%讲德语，14%讲马扎尔语，11%讲捷克语，8%讲佛兰芒语或瓦隆法语，7%讲意大利语，7%讲乌克兰鲁塞尼亚语，7%讲罗马尼

亚语，7%讲塞尔维亚语或克罗地亚语，5%讲斯洛伐克语，4%讲波兰语；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小语言团体共占6%。随着佛兰芒语、法语然后是大多数意大利语的流失，斯拉夫语被广为接受。在1910年的51万人口中，23%讲德语，20%讲马扎尔语，13%讲捷克语，10%讲波兰语，9%讲塞尔维亚语或克罗地亚语，8%讲鲁塞尼亚语，6%讲罗马尼亚语，4%讲斯洛伐克语；并且还有一些更小的语言集团共占7%。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这样的语言差异相媲美。事实上这些数字甚至都被低估了。这些"语言"开始并不是一致的。大部分人口没有受过教育，讲着互不相同的方言，有些甚至彼此无法沟通。一些书面语言只是当时被标准化并被限定了语法的语言。然而，如第七章所述，到1815年，几个行省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其读写语言已达成一致；并且一些知识分子也正宣称他们的"民族—语言的"社区应该有共同的政治权利。

然而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仍是无足轻重的。1848年前，"民族主义者"寥若晨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小集团。他们只是对周围人群的"民族冷淡"不满。这一时期产生重大"民族"差异的地方，不是被其行省旧王朝的阶级联合所强制推行——如在马扎尔贵族中——就是体现了近期哈布斯堡的统治，正虚弱地制度化为平民社会(如意大利)。以波希米亚为例，是捷克语还是德语为其统一语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德语是公共场所和经济机遇的语言——行政、法律、教育和商业，捷克语是大多数家庭的日常用语。这个时期哈布斯堡的统计划分并没有产生统一语言。许多讲捷克语的人仍把自己归入德语系列，因为德语是机遇语言(Cohen, 1981, ch.1)。1867年后，许多在匈牙利领地中的人由于相同的实用的原因，把自己归入讲马扎尔语的行列，这揭示了前面引用的调查数据中所揭示的讲马扎尔语的人数激增的理由。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民族"运作者是理所当然存在的；我们必须解释他们的出现。不同的现代化进程有利于他们在欧洲的出现——资本主义的扩张、国家现代化、争取代议制的斗争、交通基础设施的延伸

和大规模的动员战争。在奥地利，这种决定性的促成因素是从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始的。这种公民权有着同阶级基础一样的"区域性"。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多数政治都包括征税和执政——政府的支出与收益。在奥地利这些政治成为区域的和联邦的。各行省拥有或曾经拥有过有着某些历史性渊源的议会或立法机关。匈牙利议会拥有绝对的权力；其他行省的议会也几乎拥有半权，并再次宣称他们陷入了财政危机。这些"议会"机构——尽管受到限制，并赋予贵族豁免权——使得奥地利与盎格鲁—美洲世界更为相似，而不是与其他的集权君主国如普鲁士或18世纪的法国相似。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的困境是"无代表不纳税"，这是落后行省占主导地位的保守贵族和先进行省的贵族资产阶级联盟提出的。像其他地区一样，代议制仅意味着对议会和官方财产的限制性投票(见第十三章)。直到1848年，"自由派"的要求仅是对征税和分享官方战利品的议会投票。然而在一个联邦国家中，这是极富威胁性的，因为与阶级不满不同，地区不满会被行省贵族控制的准军事力量甚至有时是正规军团表现出来。哈布斯堡王朝实质上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国内战争。他们不得不从没有起义的行省抽取更多的税收和人力去镇压它们。但这些行省心存疑忌(它们或许很快就处于同样的境地)，故意拖延，这迫使政府不得不借债，以勉为其难地维持着一支数量不足的军队，或干脆放弃一些特殊的权力给行省。

这个政府长期以来面临艰难的抉择。任何最终的失败都不是由于缺乏意识或努力——不像德国政权的最终失败。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降低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节省着直到宪法解决方案得以实施。这是各个财政部长特别是科洛夫拉特的建议，科洛夫拉特是财政部长，实际上也是1815—1848年间国内事务的总理。这是明智的，但它默认了哈布斯堡王朝不应再扮演一个强国角色，或许也对国内事务产生了影响。一些起义的文化语言社区越过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得到来自相邻强国的援助。18世纪末随着匈牙利与普鲁士达成谅解，在法国和佛兰德的佛兰芒起义者得到法国革命的支援。19世纪中叶意大利起义得到皮埃

蒙特和法国的支持；20 世纪初南斯拉夫起义得到了俄国援助。 民族和军事定型既是地缘政治的又是国内的。 一种低的地缘政治轮廓引发的国内分歧和引发对手强国的分歧可能性一样大——1815 年后主宰外交方针的梅特涅如是说。 当君主们意识到经济发展和限制军事的必要性时，他们希望保持强硬的外交姿态。 在这种矛盾中他们无法找到出路，深陷于国家各部门中，伤痕累累，筋疲力尽。

下面是兼有代议制和民族争端的三种可能的法律策略：

1. 王朝的中央集权。 它致力于借助由现代化产生的基础权力来加强王朝绝对主义。 国家精英则通过军队和国内管理推行中央集权。 但这二者几乎都是由奥地利日耳曼人指挥的。 这就确立了德语为该国家的官方语言。 奥地利日耳曼人的“陷入”式统治削弱了王朝邦联主义和中立的基础，引起了由经济发展产生的语言社区在财政和执政上的不满。 市民社会和国家变得互不相容。

2. 邦联党民主。 它通过与各邦议会的广泛协议成为了实质性的民主。 将豁免权、财政权和执政权一起考虑，承认邦相当程度的自治。

3. 联邦半独裁主义。 这是解决方案 1 和 2 的妥协， 接受了像德国那样的半民主法律，尽管仍有更多的联邦主义成分——有着更为独裁中心的美国联邦主义。

政权仍然四分五裂，但直到 1848 年梅特涅和君主们仍然向第一个解决方案努力，毫不掩饰地拓展王朝中央集权，丝毫不以已达成谅解的法律作为幌子。 梅特涅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联邦主义的不信任：“只有通过集权才有可能建立各权力分支的统一，并因此树立它的权威。 分权后的权力就不再是权力。” (Sked, 1981, p.188)1815 年的解决方案给了王朝喘息的时间，缓解了地缘政治压力和国内不满。 稍加变通后，这种策略在匈牙利外部运行良好——匈牙利王朝对议会做出了一些让步。 但这种策略在国家的实质性邦联定型方面，违反了已达成的谅解。 因此在 1848 年招致了大规模的抵抗。

1848 年革命是一次争取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全欧范围的运动，是由处

于现存政治公民权界线以下的社会阶级领导的。但工人和农民对经济的不满也是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遭遇了农业歉收、价格飞涨以及工业活动与雇佣的低潮，有革命的愿望。在法国和英国的宪章运动中，这种原因赋予1848年革命的特征是阶级斗争。但在更多的邦联制政府里，这是以“民族”争端的形式出现的，如我们见到的德国。随着革命蔓延到更为邦联的奥地利，它控制了更多的区域、各邦和“民族”的组织——这导致了更为恶劣的1848年战争。十多万人在奥地利革命[2]中丧生。

意大利行省(得到外部意大利政权的援助)和匈牙利要求拥有自己的议会，并形成了独立于帝国军团和地区军队之外的起义军。但维也纳和布拉格也看到了1848年革命中的阶级冲突——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激进者要求政党民主和社会改革时，大资产阶级在支持“秩序党”之前却左右摇摆。因为布拉格的激进运动混合了阶级不满和语言不满，它在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发生了分裂。维也纳的激进运动全是德国人，但也在两种可互换的德国民主上发生了分裂(像德国应付它的对手那样)。一派是大德意志，他们寻求通过法兰克福议会在全德发展公民权，另一派仍是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寻求在维也纳建立君主立宪制。由于德意志是统治民族，两派都不赞成各邦自治。在其他邦他们也很少进行革命呼吁。

因此革命在阶级和各邦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大多数邦的运动是由对中央集权心怀不满的贵族领导的，因为这些贵族受到了中央和朝廷的排斥。但为了无需对广大民众做出经济让步就能赢得广泛支持，贵族们打出了民族主义的口号，尤其是利用了语言争端——这对所有的非德意志有识之士寻求获得公职或履行法律至关重要。他们要求，公共学校教授当地语言应像教授“帝国语言”一样受到赞同。这种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变成了全民的意识形态，着重强调了各邦中存在着各阶级间的统一体。

在造反的辩论中，一个多阶级、多民族间的妥协可能会实现，并通

过有限投票产生联邦议会。但国内战争容不下辩论。王朝面临四个敌人——意大利、匈牙利、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起义者——正在竭力发展相容方案与军事联合。但大多数军队仍是忠于王朝的。只是各邦的军团多数怨声载道；甚至半数的意大利军团驻扎在意大利，严阵以待。得益于拉德茨基的指挥天才，帝国军队打败了反叛的意大利(它的城市贵族曾愚蠢地疏远农民)。匈牙利的反叛力量仍然非常棘手，控制着大部分匈牙利并威胁到维也纳，正形成强兵压境之势。但他们是由贵族保守派领导的，对维也纳或布拉格的叛军没有多大的号召力。

与此同时，维也纳事件就像巴黎、柏林或法兰克福事件一样如出一辙。中产阶级贵族、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都和政府为敌，并且各自为战，仓促间组成了民兵和中央委员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但为了分化他们仍承认了一个议会(不包括匈牙利和意大利)。在议会中有产农民(被免除封建义务的承诺所收买)和忠诚的斯拉夫人会以多数票击败日耳曼起义者。真正的统治权被这个国会和委员会与民兵所分享。君主蓦然发现半数以上的维也纳驻军是乐师。在混乱的巷战之后，军队撤离了城市。直到匈牙利向维也纳推进的军队被帝国军队和克罗地亚军队击败时，政府才松了一口气(克罗地亚的不平之处在于要反对他们的地区压迫者马扎尔人)。画蛇添足的是，政权又纠结俄国军队帮忙来彻底摧毁匈牙利。维也纳遭受了血雨腥风；起义者受到了严厉镇压。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阶级起义和民族起义没能很好结合，以及军队对王朝的忠诚。

像在普鲁士那样，胜利的政府许诺改革。斐迪南皇帝退位后，由他十八岁的侄子弗兰茨·约瑟夫继位，约瑟夫承袭了其前任的政策。关于法律的争论进一步展开。自由的“克莱姆西尔宪法”提出了邦联的半民主制，它保留了君主对外交事务和进行战争的权力，但限制他在国内政策上的权力。部长们将对议会负责。君主可拖延但不能否决议会的立法。它承认在学校、政府和公共生活中的语言平等，但严格限制在统一的帝国之内：“帝国所有的民族权利平等，每一个民族在维护

和促进普遍的民族性、特别是自己的语言方面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克莱姆西尔宪法将适用于除匈牙利和意大利之外所有的邦，因为这两个邦要制定自己的宪法。

更为保守的反提案是“体育场宪法”，它承认议会但也承认君主的否决权。它安排了联邦等级式的政府：在两院制议会和大臣之下是各邦的议会和管理机构，然后是地方的议会和管理机构。它包括匈牙利，后来又憧憬意大利的加入。它为德国的半独裁大家族提供了一个更为纯正的联邦模式。有几个大臣赞成它。随着权力优势转向保守派但又有着微妙的改革愿望，体育场宪法是可行的。

然而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拒绝作出让步。他热衷于王朝中央集权制。一个强大的王朝总能获得内阁党派的支持，并且约瑟夫军队的胜利也赋予了他这种压倒性权力。将军们被委任为各邦总督，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主导着中央和各邦的管理机构。这一切都只对“王朝议会”负责，它由皇帝任命的部长和顾问们组成——一个有着不确定成员和宪法地位的咨询机构，而非行政机构。

但1859年和1866年的战争失败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并且引发了各邦贵族和德国自由派进一步的改革压力。君主承认了一个Rechtstatt(像德国)以保证个人的公民权，但集体公民权仍受到限制。所有组织不得不到警察局注册，以寻求集会和示威的许可。像在德国一样(直到1908年)，警察参与反对集会已习以为常，一旦集会者有“颠覆”的苗头，警察就有权监禁他们。1860年，弗兰茨·约瑟夫下令成立议会和市议会，并恢复各邦议会。所有的这些机构都有受限的投票权和自主权。第二年另一项法令降低了议会权力。宪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如果它们不能迎合弗兰茨·约瑟夫的意愿，就会惨遭修改，帝国缺乏一部毋庸置疑的政治宪法。

在弗兰茨·约瑟夫漫长的统治中(1848—1916)，他仍是一个积极推行部门分而治之政策的君主。他能在一周内接见一百多个信仰者，然后又随心所欲地结束他们的晋见。他在一天十小时的工作日中要求并

孜孜不倦地阅读几百种备忘录。他运用(并且也准许大臣们运用)特权，即保护权去干涉官僚机构的日常工作。他对自己的管理绝对保密(禁止作记录)。他三番两次地介入基本自治的城市维也纳的管理。他断然辞退敢于争辩的大臣(Johnston, 1972, pp.30—44, 63; Deak, 1990, p.60)。弗兰茨·约瑟夫不像霍亨索伦王族那样把派系阴谋彻底制度化，而是进一步在其臣民身上验证。他对法律和机构的厌恶使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统治者。我不能像列举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机构那样列举哈布斯堡的国家机构。这是一个高度多形的国家，但它定型的制度化却少于德国。该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王朝特征、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尽管它的多民族定型仍是变动的——但所有的一切纷乱和冲突都围绕着弗兰茨·约瑟夫个人和部长们及国会展开。

以我的后见之明，这种王朝权力程度的出现是一个错误——五十年后已经老朽的弗兰茨·约瑟夫也竭力去扭转它。这种错误是因他而起的，他应该对此负责。但王朝中央集权也依靠两个基础：军队和管理机构。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我以浓墨重彩探讨了它们的权力和制约。它们使这个四分五裂的帝国出奇地秩序井然，但却无力解决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它们不能改革国家财政以获得更高的税收和军事现代化，而这是与其他强国竞争和战争工业化所必需的。第二，它们也不能极大地提高公民的忠诚性，只有在对其作出一些特殊让步时例外——对马扎尔人、对加里西亚的波兰人和对犹太人作出让步(由于他们没有政治国籍，这确保了其忠诚性)。这些集团分担了镇压其他“民族”的重担。

如果王朝中央集权制运行良好，那么弗兰茨·约瑟夫就不得不以低地缘政治姿态赢得时间。当他把半独裁主义制度化时，军事节约会缓解各行省贵族和议会的不满。然而他并没有实行节约(Katzenstein, 1976, pp.87—88)。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以武装中立的姿态进行动员，以防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其实它实际的锋芒所指是俄国。政府卖掉了很多国家铁路以支付动员，这在以后的日子里减少了财政收入。

“卖掉家中的银子”并非经济策略的明智之举，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关于该方针的一个更近的例子中的精辟论断。随着皮埃蒙特紧张局势的出现，奥地利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战争在1859年打响，皮埃蒙特节节败退，但当法国如所预料的那样参战时，法国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的全面胜利，使大多数意大利行省的丧失已成定局。战争实质上使这个国家陷入了贫困。为了换取提高关税，也进行了一些轻微改革。弗兰茨·约瑟夫不得不采取节俭措施。但这是俾斯麦的时代，奥地利并没有与其和谐共处。普鲁士与皮埃蒙特在1866年入侵奥地利。战败使奥地利财政崩溃，并对匈牙利贵族作出了大的让步。各邦的代议制得到强国对手和膨胀军事野心的支持，最终战胜了王朝中央集权制。

在1867年的“协议”中，匈牙利贵族同意提供30%的联合预算(主要用于被弗兰茨·约瑟夫控制的联军)以换取下列一系列权力：在它的领地中控制议会和行政机构的权力，磋商外交政策的权力，形成自己的预备役军队即Honved的权力。匈牙利人现在可自由地镇压他们自己的少数派。协议包括三个机构：两个帝国的行政机构和君主。如果行政机构在联合负责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由弗兰茨·约瑟夫进行最终裁决。他对外交方针和军队的控制权毫发未损。因此我把国内方针和国外方针分开来谈。

二元君主政体下的国内政治，1867—1914年

弗兰茨·约瑟夫的国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被置于帝国的两部分之上，他缺乏必需的集权行政机构与匈牙利周旋；他不得不每隔十年就与匈牙利再次协商有关匈牙利对联合预算的贡献问题。但他仍能维持部门分而治之政策，利用一个邦和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邦和另一个民族，并提供选择性的奖赏和惩罚。如一个参与者所指出的：

> 在这种纵横捭阖中，要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有的现存因素，即奥地利－匈牙利的君主……国家、各邦、民族、宗教组织、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都激发自己对宫廷恩典的忠诚。(Mocsary, in Jaszi, 1961, p.135)

但分而治之政策肯定要把阶级和民族包括在内。像19世纪其他的半独裁政权一样，它对区域作出的让步比对中央议会作出的让步更多——它们有更多的专断权(在地方事务上)和更广泛的豁免权。但这在奥地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参与地区管理的不再仅仅是日耳曼人和保护国的贵族。特别是在捷克，商业和工业也扩充了经济权力。各邦语言从家庭和非正式的社会领域扩充到所有的公共领域，如在中等阶级中盛行。民族认同感以极权化的形式出现，并且语言争端也能动员它。那些被划分为讲捷克语的人增多，讲德语的人减少。在捷克土地上的日耳曼贵族，特别是自由派政党，丧失了权力(Cohen, 1981)。

这改变了君主自己部门的权力策略。如果它继续依靠奥地利的日耳曼人，那么就会疏远与少数派的关系，现在正行使区域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尤其是捷克，为没取得与匈牙利一样的代议制而勃然大怒。这样弗兰茨·约瑟夫与奥地利日耳曼贵族的关系恶化。1867年，斯拉夫人开始对马扎尔人在他们领地中的主导地位不满。到1880年，匈牙利和奥地利日耳曼压抑了其他邦的政治抱负，这超出了弗兰茨·约瑟夫所能忍受的范围。

在1879—1880年间，他抛弃了奥地利日耳曼人的“自由”党(到现在他们的自由主义已所剩无几)并要求塔弗伯爵成立“保守民族”内阁，王朝通过它能得到捷克和波兰的支持。1882年，内阁极大地扩大了地方投票权，意识到(按照行省)是贵族和民族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贵族自由派，现在能够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部门控制。他们也很快进入并控制了各邦和地方的管理机构。在其他地方(见第十六章)，民族主义的核心团体已是公共机构的受雇者。各邦内持异见者现在都

根据民族使之合法化，在像匈牙利那样的地区，他们仅仅是贵族；在像斯洛伐克那样的地区，“民族”和其语言是由少数知识分子创造的。语言(有时是宗教)社区导致的邦联代议制争端使得民族作为真正的共同体诞生。民族主义现在十分矛盾，它经常与君主结盟，然而有时也会粉碎这种同盟。

随着王朝中央集权制的衰亡，弗兰茨 · 约瑟夫开始倾向于联邦半独裁统治。奥地利的投票人数在1897年得到增加，尽管效仿了第九章所叙述的普鲁士模式的有阶级侧重的选举权。1905年，弗兰茨 · 约瑟夫最终宣布：“我决定在二元君主政体中采纳通常的投票机构。”1907年他在奥地利的领地中也这样做了。然而匈牙利贵族却拖了他的后腿，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或许会破坏自己在领地中的霸权。弗兰茨 · 约瑟夫把德意志帝国宪法转向了更加邦联化的模式。这使他陷入了完全不同的处境。因为主要的保守派的反抗现在来自野心十足的匈牙利贵族和日耳曼资产阶级，而他在一些争端上的同盟实际是被压迫民族和阶级的。更为甚者，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保守派，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阶级意见日益相左，他没有回避家长式统治的社会立法对其政权的资本主义定型的调停——尽管预算制约阻止了立法全面实施，王朝也仍然遏制议会权力和工人的集体公民权。

无论如何，王朝、阶级和民族的纠结压制了自由主义。起初集中在日耳曼人中对绝对主义的抵制，自由党如今力图维持现状以捍卫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因此代表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政党像反对君主专制一样反对自由主义。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党派中融合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民族——从犹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Boyer, 1981)到农民和斯拉夫人的人民党起义(这将在第十九章叙述)，再到泛日耳曼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Schorske, 1981, pp.116—180)。最为独特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奥地利社会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是跨民族的。从1899年起，社会党党员在伦纳和鲍尔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把日耳曼和马扎尔的民族主义者当成资产阶级，其他的剥削民族

只是暂时的类似于无产阶级。因此社会党党员毫无保留地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作为潜在的君主立宪制而存在。

宪法在许多邦运行良好；但匈牙利议会拒绝扩大选举权，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选举权扩大因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在语言争端和公共肥差的瓜分上未达成一致，导致了帝国议会和波希米亚议会的混乱。宪法执行不利的障碍主要是匈牙利和日耳曼主导阶级的双重侵犯剥削，然后是保守的王朝。因为各方在本国领地中只包括20%—25%的人口，尽管他们控制着中央的每个行政机构，但却都不同意男性公民普选权。妥协仅仅是一项特殊的政策，以避免更多的让步。它扮演角色的成功之处在于阻碍了完全民主，除非处于牢固地位的民族会作出让步，尤其是向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作出让步，民主在国家内部是受到阻碍的。这已不再是一个拥有王朝、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多邦的国家。它也不再是一个受到民族纠缠的国家。它是一个王朝、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内部宗派化的民族主义国家。它仍保留了彻头彻尾的多形特征，但现在却不能解决它的宗派主义。

王朝继续对民族和阶级执行部门的分而治之政策，但却不能把这些实践变成稳定的制度。我怀疑弗兰茨·约瑟夫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半独裁战略上——他已当了五十年的统治者，曾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德意志王子"(尽管经过计算他仅有3%的德国血统)，丝毫没有表露出对被压迫民族的真正同情。最终他恢复了王朝权力，不可一世，在1913年和1914年解散了帝国议会和议会。而结局似乎并不明朗。弗兰茨·约瑟夫的两个继任者(弗兰茨·斐迪南在1914年被谋杀；查理在1917年继位)希望匈牙利妥协。他们对德国—捷克冲突的观点很模糊。但他们拥有基础结构权力来操纵它们吗？哈布斯堡王朝可能已失去了所有三种战略的机会。匈牙利已阻碍了王朝中央集权制；几个民族现正阻止着更为民主化的战略。

但一种更为温和水平的政治可行性仍在向哈布斯堡王朝大开方便之门。1879—1893年的总理塔弗，把政治成功定义为"保持君主政体下

所有民族的平衡状态并很好地调和不满情绪”(Macartney, 1971, p.615)。国家能通过——维克托·阿德勒把其定义为“乱七八糟的绝对主义”——提供国内职能和地缘政治职能走出困境，多数民族和阶级认为二者是行之有效的。

从国内来讲，君主掌握着潜在的、更为压制性的国内行政机构的平衡。匈牙利、日耳曼、捷克、克罗地亚和波兰能有效地渗入它们区域的平民社会和管理机构。如果它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地区少数派会遭到更多的镇压——就像在1867年后的匈牙利所看到的那样(并像中欧的少数派在20世纪末可能会再次看到的那样)。某些阶级也赞成这一点：捷克工人为反对日耳曼资本家而寻求保护，就像鲁塞尼亚农民反对波兰地主寻求保护一样。那些语言和阶级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地理上蔓延——这儿一个多数派，那儿一个少数派——使得很难产生原则性的解决方案。但它延长了“混乱”的部门统治。它的中部国家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且它的国内行政机构在20世纪初飞速增长(见表11.1—5和附录表A.1)。除了语言争端,它的增长是广阔交感性的(像这一阶段的其他国家一样；见第十四章)。它提供了有效的国内职能以适应“平衡和很好地调和不满情绪”的状况。

但哈布斯堡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地缘政治军国主义。每个民族仅能提供一个小国。如果哈布斯堡王朝不统治它们，其他王朝也可能统治它们。历史上的哈布斯堡王朝传教团曾与地方基督教联合以防范土耳其人。现在的威胁来自德国和俄国(Taylor, 1967, p.132)，甚至南斯拉夫最近刚得到其许诺并怀疑这种许诺，也对反动的俄国谨慎小心。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联盟的多数派政党认为南斯拉夫争端是二元君主政体下的国内问题。只有在1914年后它才发生分裂，分离主义者才开始出现。1873年后，被赋予地方自治权的波兰人，宣称对奥地利温和统治的绝对忠诚——直到他们能恢复自己的波兰国家。这如果要包括打败俄国和德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捷克、斯洛伐克和鲁塞尼亚也惧怕俄国或德国。大多数国家都赞成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政体作为中欧

各民族的联邦——仅仅要求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的军事和外交权力以及一些预算权力的中央国家，再加上蓬勃向上的经济政策，这些就是它们梦寐以求的。

如果它们不能制定一部宪法，以使政府有合适的代议制和责任，那么它就不能动员全部的公民赞同，但这或许并不重要。如果我们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点来看待奥地利一匈牙利，那么它的平稳更令人迷惑了。就这个政权而言，日耳曼、捷克和其他的议员把议会搞得一团糟，然后竟一度退出议会好几年，而它却相安无事。但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绝对主义的保证，他们也能通过区域管理机构和资本主义从内部对其施加影响。在所有的议会冲突中，在所有的奥地利和匈牙利行政机构的争吵中，危及政权的叛逆在1867—1914年间下降了(Sked, 1989, p.231)。社会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两个工业领域中上升，但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像在德国一样)。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人暴力也大为减少。与1848年或1867年不同，大邦不再举行运动要求自治；在任何自古就有的土地上不再有起义发生(在新的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却是麻烦不断)。与匈牙利的十年“宪法危机”终于在1908年化解，此时匈牙利的预算贡献从30%上升到36.4%，显然这是一项极为适用的解决方案。各邦的民族和阶级已安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在其他方面，地缘政治主宰着一切。

最后的自负：军事地缘政治，1867—1918年

1867年妥协使得弗兰茨·约瑟夫独揽军事大权，并主导着对外方针。同样的军国主义矛盾继续困扰着他。宪法的财政方案依然不能为他的强国战略提供足够的士兵和军需品(见表11.6；参见迪克，1990, p.64)。匈牙利不信任联合军队并且拖它的财政后腿，这使得奥地利一匈牙利的军队在装备、军需品和后勤保障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对

手，遏制了高级统帅采纳现代化的战术。然而妥协并未使得弗兰茨 · 约瑟夫节俭行事。1867 年，日耳曼地缘政治的最终意图优先转向了东南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使得奥地利和俄国有机可乘，进入了巴尔干半岛。王朝说服了自己，对内部南斯拉夫问题的解决就是进一步占有南斯拉夫。有人说这体现了政权的反动和王朝的本质。斯凯德(1989, p.265)问道："这不正是王朝侵占领土的意图吗？"但我怀疑任何 20 世纪初的政府都会拒绝这种领土占有——就像占有非洲和美国一样。太平洋的扩张揭露了这一点。领土扩张恰恰是由地缘政治思想决定的，如第二十一章所述。

但这并没有带来节俭或低姿态的外交。如果奥地利与俄国结盟，共同分享巴尔干半岛两国保护国的利益，它或许是可被容忍的。然而奥地利却进入了相反的联盟体系。1867 年后，奥地利成为德国的盟国，基于文化和经济纽带以及相似的政体，它们之间的纠纷冰消雪释，这就像盎格鲁—美国结盟一样理所当然。但它并没有带来地缘政治利益，因为这两个强国很快在俄国问题上分道扬镳。德国开始害怕俄法结盟以及俄国飞速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随着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这种担心几乎变成了种族主义的：条顿人和斯拉夫人将在中欧两败俱伤，因此德国期望成立奥地利—德国—马扎尔同盟以镇压斯拉夫。这不符合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也进一步激怒了俄国。奥地利现在不堪一击，无力抵抗俄国的进攻。然而奥地利的外交却变成了反斯拉夫的。有人把这归因于匈牙利在其外交政策上有了更大的影响。但弗兰茨 · 约瑟夫必须对此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他把俄国作为其"天然的敌人"，并且他本人也是反斯拉夫的。奥地利外交不仅失败在"节俭"这一问题上，更主要的是它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敌。

形式急转直下。1912—1913 年，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俄国支持新涌现的斯拉夫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并垂涎奥地利的领土。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了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并不赞成军国主义外交，而是一个南斯拉夫权力的倡导

者。君主被迫去报复，否则就会丧失威吓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者的能力。俄国的反应是万分紧张，但那只是由于德意志联盟能保护奥地利。我们在第二十一章将会看到，奥地利的参战决定与德国不谋而合，那就是迫不及待，最好赶在俄国军事动员完成之前。这两个中欧强国沆瀣一气，挑起了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导致了自己的覆灭。它们或许是错误的：在避免战争的同时，更有技巧性的外交一样能显示力量。或许俄国应该发现另一种机会来证实奥地利对斯拉夫的束手无策。但外交形势是瞬息万变的。

在第二十一章我探讨了滑向一战的过程，指出所有的独裁和半独裁政权作出的决定都是宗派化的。但至少拥有可怕战争武器的德国的参战几乎带来了胜利。奥地利是用列强中规模最小、装备最差、军事指挥最糟的军队宣战的。大多数军队都陷入了两线作战，将军们也费尽心思地领会外交家们的指示，以搞清楚它们到底跟哪国交战(塞尔维亚还是俄国)? 达成宪法解决方案的连续失败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多形国家很适合混乱对付，而不善于应付危机外交和战争——也就是决策快捷深思熟虑和理性部署行政机构去实行这些决策。18 世纪奥地利的战争需要已经缔造了第一批现代国家的行政机构(见第十三章)。但到了 1914 年，它那持久的宪法危机已令其不堪重负；它既不能避免战争，也不能有效地把战争进行到底。

然而战争带来的不是即刻的毁灭，而是爱国的狂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感情波动："我所有的冲动都与君主有关"(Gerschen-Kron, 1977, p.64)。奥地利官兵虽然军需不足，但在前线多次进攻俄国阵地(武器装备一直缺少现代化资金)。他们在第一年就丧失了半数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军官和军士——一个令人惊讶的、不平衡的损失比率。从那以后，在普鲁士军官和军士的指导训练下，奥地利士兵的战斗力增强了，在 1918 年夏天表现出色，经受住了俄国、塞尔维亚和意大利这三条战线的沉重伤亡，但却被比俄军还要少的逃兵和叛变军队所分裂。随着战争的拖延，一

些士兵的忠诚性减弱。捷克和罗马尼亚的逃兵组成小型军队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多数斯拉夫人和克罗地亚人仍是忠诚的——更害怕潜在的捷克和马扎尔统治者。到最后投降时，奥地利军队遍布于国外土地上。经历了第一年的战争后，他们不再有多高的作战热情，不像协约国军队那样，他们并没被提供美好社会的景象，只是依照哈布斯堡军事传统的职业主义，盲目而战，更像一支旧王朝军队而不是一支公民军队(Zeman, 1961； Luvaas, 1977； Plaschka, 1977； Rothenberg, 1977； Deak, 1990, pp.190—204)。

如果中欧强国获胜，奥地利就会存活下来；但奥地利在这场战争中站到了错误的联盟一方。从最高的道德原则出发，奥地利的敌人肢解了它。从1917年起，西方盟国不再包括独裁的多民族的俄国，他们开始把民主、民族自决和胜利相提并论。1918年1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许诺"奥匈帝国的人民……拥有自治发展的最自由的机会"。尽管这仍被看成奥匈帝国内的邦联宪法。到夏天，协约国承认了流亡的民族委员会，大多数人也倾向于独立，相信协约国会保护他们免遭俄国和德国的打击。社会民主党赞成分裂，如果那意味着和平的话(Zeman, 1961； Valiani, 1973； Mametey, 1977)。由于战败投降，查理皇帝被迫退位。每一个大的民族集团都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各处的民族国家都取得了胜利。

到1900年，王朝潜在的虚弱是由于大多数民族的地缘政治忠诚实质上是有条件和精打细算的。直到1914年，民族斗争仍是按奥地利会赢的假想进行的。因此，民族各阶级在内部争权夺势。1914年，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保护国，看似已无法维持它军事保护的骗局。当战争出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结局——俄国和德国的瓦解，再加上战胜者许诺的新欧洲秩序，剩余的不确定因素消失。各民族很快决定撇开哈布斯堡王朝，冒险一战。王朝最终也没有达成阶级和民族的代议制宪法和半代议制宪法，因此它也不能动员民众对它的忠诚。在和平时期的政治中，这种状态尽管有破坏性，却不是必不可少的。在大规模动员的战争

中它被证明为一个不利因素，尽管不是致命的(因为奥地利战绩甚佳)。但是当国家在新的欧洲秩序中战败时，它立即导致了国家的毁灭。

反事实的政府战略

奥地利经历了意外的情况后没能存活下来。为了估计它更一般的生存可能，我们必须进入历史反事实的不可靠的环境去研究。如果奥地利能够幸存下来，那么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周围的环境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这就要求更为协调的民族国家，而奥地利作为一个松散的邦联国家是否有点不合时宜呢？有两种标准或许能使奥地利继续存在：实行我所叙述的三种理想宪法中的一种，或者像从前那样胡乱对付。

宪法的实现总是很难而在奥地利则变得更难。君主个人偏爱的是王朝中央集权制，但它不能突破这一点达到“民族中立”。它对奥地利日耳曼人的中央集权制的偏袒导致了各邦民族的反对，并且它也没能为低姿态外交和军事经济赢得时间。它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日趋衰落的强国中不过尔尔。在 1848—1866 年有多次机会与竞争宪法妥协，被王朝自己的外交拒之门外。它仅是被迫作出特殊的妥协，尤其是对匈牙利贵族。这使得原则性的邦联主义无法达成，并且它自己也陷入两个统治民族的包围中。在这些机遇的关键时刻，如果王朝接受体育场宪法模式，赞同邦联半独裁统治，它一定能拯救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宪法妥协都能达成。一部宪法是一个权威的基础，可以用它来分配权力。它并不需要绝对的权威。德意志帝国在国内运行良好，就是因为它的宪法赋予了王朝自己决断的余地。但哈布斯堡王朝已建立的政治制度远不能满足其需求。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语言民族主义的扩张伴随着工业化、区域投票和国家行政扩张

的到来，它们所要求的统治权远非政权所能提供。多民族代议制可能会被包含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之内。但当民族间的冲突开始使局势恶化时，排他性的政权策略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宪法。这的的确确促使弗兰茨·约瑟夫最终意识到——在头脑里，尽管不是从内心里——宪法才是解决方案。但多形的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原则现在在政府内部激起了反对意见。当哈布斯堡的外交蠹行产生了军国主义而不能自拔时，它们才深思这一问题。

因此奥地利的覆灭并不是由先进的资本主义或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各个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刺杀的——先是1914年的继承人，然后是1918年整个的王朝。事实上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它们一定能踉踉跄跄，苟延残喘，甚至能为民族主义的意见分歧提供政治和军事职能。它们甚至能穿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代，经受住无产阶级战争和工人阶级战争的冲击，到达成功的更高层次。在20世纪初作为一个邦联半代议制国家出现。奥地利或许不像更为集权的民族国家那样，能够动员市民的贡献和牺牲精神。但那种论证需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提醒我们，许多与现代化结合的政权形式，其消亡多数是由直接的地缘政治和战争造成的。

但奥地利政权的真正弱点，即导致其覆灭的弱点，是由它自己引起的。由于弗兰茨·约瑟夫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整个这一阶段是统治者，也由于他是一个积极的王朝统治者，亲自对排他性的宪法混乱和奥地利外交中致命的军国主义负大多数责任，因此他必须对其后任的覆灭承担大部分骂名。一流强国的好胜本性使得他竭力去控制跨越边界的民族，这招致了耗费巨资的战争，因此政权配备极差，并在两种相反的政治战略中左右摇摆。它不是邦联主义的，在本质上邦联主义被发现是不存在的，它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军国主义的邦联主义。在他们与多民族代议制进行了必要程度的兼容之后，还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王朝统治几乎已经过时了。面对阶级与民族问题，它只能以陈旧的、排他

性的方式，步履维艰地继续其统治。

现代化压力需要一个对阶级和民族更普遍的宪法解决方案。这部宪法或许是政党民主的，像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那样；也或许是半独裁的，像德意志帝国的那样。它也许像英国或法国那样是中央集权的，也许像美国那样是联邦的。但王朝统治不能体现普遍的权力和义务，以适应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四种社会权力来源——即官僚政治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规模动员的武装力量和想象中的分享公民权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在和平时期这种压力还可承受。但战争是国家的伟大质检员，经由联盟外交所激活。哈布斯堡王朝急不可待地把自己完全置于军事和外交检测中，并且发现自己不够格。这个国家的多形定型不像德国，它们最终迎头相撞。王朝统治和军国主义与邦联代议制势不两立。君主虽然认识到了这种矛盾，但却无能为力。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制定和谐的政权战略——他们的转向是灾难性的。他们的墓志铭早在二十年前就被诗人格里尔帕策公之于众了：

那是我们上院的诅咒，
从妥协道路到妥协行为的斗争，
最终被妥协的方式所耽误。

关于德国与全球的结论

本章和第九章讨论了中欧德国三条可供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三条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但都包含着其他的政治定型并反作用于资本主义。一个坚持不懈的政权战略即半独裁联合，显而易见是取得了成功。然而其他的两个战略，即民主邦联主义和王朝邦联主义却失败了。因此德国的资本主义变得更具有独裁性、区域性和民族性，而不是分散性、市场性和跨民族性——而如果其他两种政权形式的任一种

取得成功，这种趋势可能会相反。

这并不是一个特例。事实上，从1848年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那个真正看似特殊的趋向，就是其他国家也在从几种平衡的选择中向更为独裁化、区域化和民族化的选择发展。美国也受到地区争端的困扰，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内战，取得了温和的民族集权化(尽管仍保留了部分的联邦制)结果。意大利完成了统一，它的新政权努力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从1867年的明治维新起，日本开始摆脱分散的封建主义，推行适应德国实践的半独裁联合。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邦联主义也遭到了失败。与此相反，民主英国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集权——尽管从19世纪80年代起极其轻微。因此在德国发生的一切开始看似是现代化逻辑的一部分，一个统一民族国家的全球性发展。吉登斯(1985)也这样描述过。

因为有许多偶然性因素包括在内，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在原则上是可逆的，然而却真实地发生在这一时期(最近它已发生了逆转)。这种趋势通过两个互不相同但却交织在一起的权力进程的联合来运行：

1. 资本主义商业化和工业化，当与国家现代化交织在一起时，就被有着基础结构的“自然化”社会和因税收与执政而必然引发的阶级斗争，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引导。对政党民主的要求(议会和执政权力)通常与政权自己对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即制造一种有限民族公民权的观念相融合。邦联政权，无论是准民主的或是王朝的，都无法对这种阶级和民族融合坐视不管。因为这种融和对他们国内的意见不同者来说是如此“现代”。然而奥地利的幸存表明，正像普鲁士作为一个集权和半独裁国家，能剥夺掉资产阶级大多数的自由主义那样，一个只要适度成功的邦联政权就能明显地在阶级民族的出现中幸存。哈布斯堡王朝仅用匮乏的资源就能把分裂的民族主义限制在空洞的、易控制的政治领域内。

2. 在这一点上第二种力量插手了。国家卷入了地缘政治军国主义之中，需要所有权力资源的更大规模动员。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或民族

公民权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国家，与像奥地利或德川时期的日本这样的邦联国家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逻辑上是具有优势的。奥地利或日本对其地区权力网络较为忽视，只是剔除了那些被传统的特殊实践所推崇的物质或精神约束。从金泽市开出的商船队长的黑船、普鲁士的铁路和克尼格雷茨的撞针枪，这些力量在改革者们看来都是民族现代化和动员的具体体现。而且所有的优胜者都被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吹捧为“现代”。成为一个强国——在中欧或日本仅是为了生存——一个中央政府比邦联政府更能有效地处理其领土的基础结构联合。世界各地自封的“现代化者”认为这是必要的。德国或日本邦联或跨民族王朝都不能轻而易举地提供这一点。他们在战争中幸存或先发制人地挑起战争，使其身处险境并因此而衰落。蒂莉就是这样分析欧洲民族国家取得胜利的全部过程的——战争需要和产生的是中央集权和互有差别的自治国家，毁灭了的是那些在几种形式中摇摆不定的国家(1990, pp.183, 190—191)。在这些事件中揭示出的最大讽刺在于美利坚诸州同盟。它们参战的目的是维护脆弱的邦联制(和奴隶制)，然而当它们与一个占优势的敌人斗争时，却发展成为比它们所抵制的国家更为集权、强制和流动的国家(Bensel, 1990)。南部也被一种普遍的地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撑——一个最初的民族国家(仅对白人而言)。

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军国主义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了所有四种社会权力来源的影响——很少以明显的方式呈现给参与者。典型的是这种结果不是任何一个主要的权力运作者所期望或追求的。在公民权上阶级和民族的融合，民主和半独裁联合政权战略的出现，邦联政权接连的合适战略，是完美无缺的瞬间，并且是靠现代化的泥泞道路解决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模棱两可是外交和战争的推动力。这里，“战略”依靠的不仅仅是计划的机构，以应付阶级和区域交织在一起的要求。它还要求：首先是预测和影响相互之间通常很少了解的其他强国的外交；其次是预见在改革了的军事条件下其联盟的战争结果。我们已经粗略地看到弗兰茨·约瑟夫在作出正确的策

略时所面临的这些困难(从我们20世纪后期的纸上谈兵看来，表面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将在第二十一章进一步着重探讨这一问题。

注 释：

[1] 这一章的资料主要来自卡恩(1964, 1974)、休格和莱德勒(1969)、麦卡特尼(1971)、布里奇(1972)、戈登和戈登(1974)、卡岑施泰因(1976)、特别是斯凯德(1989)。

[2] 奥地利革命的材料主要来自拉思(1957)、佩奇(1969)、迪克(1979)和斯凯德(1979, 1989, pp.41—88)。

参考文献

Ashworth, W. 1977. Typologies and evidence: ha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a guide to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0.

Austensen, R. 1980. Austria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in Germany: 1848—186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2.

Bairoch, P.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Bensel, R. 1990. Yankee Leviathan: The Origins of Central State Authority in America, *1859—18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staph, S. 1978. The methodological debate between Carl Menger and the German historicists.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6.

Boyer, J. 1981.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idge, F.R. 1972. From Sadowa to Sarajevo: The Foreign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1866—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ohen, G. 1981.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ak, I. 1979.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rschenkron, A. 1977. *An Economic Spurt That Fail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od, D.F. 1974. Stagnation and "take-off" in Austria, 1873—191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7.

1977.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ustria.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7.

1978.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Austrian growth after 178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1.

1981.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ustria-Hungary, 1867—1913. In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P. Bairoch and M. Lévy-Leboyer. London: Macmillan.

1984.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rdon, H.J., and N.M. Gordon. 1974. The Austrian Empire: Abortive Federation?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Gross, N.T. 1976.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750—1914. *In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Pt. I, ed. C. Cipolla. Brighton: Harvester.

Huertas, T. 1977.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Policy in a Multi-National Setting: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41—1865*. New York: Arno Press. (Reprinted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Jaszi, O. 1961.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ton, W. 1972. *The Austrian Mind: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1848—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nn, R.A. 1964. *The Multinational Empire*, 2 vol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576—19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tzenstein, P. 1976. *Disjointed Partners: Austria and Germany Since 181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nnedy, P.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Hyman.

Komlos, J. 1983. *The Habsburg Monarchy as Customs Un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ustria-Hunga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uvaas, J. 1977. A unique army: the common experience. In *The Habsburg Empire in World War I*, ed. R.A.Kann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artney, C. 1971.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ametey, V.S. 1977. The union of Czech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ichsrat, 1916—1918. In *The Habsburg Empire in World War I*, ed. R.A.Kann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Brien, P.K. 1986. Do we have a typology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

Pech, Z. 1969. *The Czech Revolution of 184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laschka, R. 1977. Contradicting ideologies: the pressure of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the Austro-Hungarian army of World War I. In *The Habsburg Empire in World War I*, ed. R.A.Kann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llard, S. 1981.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th. R.J. 1957. *The Viennese Revolution of 184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othenberg, G. 1977. The Habsburg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In *The Habsburg Empire in World War I*, ed. R.A.Kann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udolph, R.L. 1972. Austria, 1800—1914. In *Banki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ed. R.E.Camer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The pattern of Austrian industrial growth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11.

1976. *Bank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ustria-Hung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orske, C. 1981.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Sked, A. 1979. *The Surviva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Radetsky, the Imperial Army and the Class War, 1848*. London: Longman Group.

1981. Historians, the nationality question,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Transla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1.

1989.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815—1918*. London: Arnold.

Sugar, P.F., and I.J.Lederer, (eds.). 1969.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Taylor, A.J.P. 1967. The failure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In his *Europe: Grandeur and Decli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Valiani, L. 1973. *The End of Austria-Hungar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Wangermann, E. 1969. *From Joseph II to the Jacobin Tria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eman, A. 1961. *The Break-up of the Habsburg Empi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一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一)：定量统计资料

现代国家的兴起是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中的老生常谈，然而对它的分析却很不充分。国家现代化包括着四个发展过程，这四个过程指：国家的规模、其职能的范围、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代议制。争取代议制的斗争通常与其他三个行政进程分开，被认为是建立一个独立而全面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持续不断，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例如 Beer, 1973, pp.54—70； Eckstein, 1982)。1863 年，阿道夫·瓦格纳系统陈述了现代国家持续扩张的“法则”，并且这现在仍影响着统计学家在国家预算中对那些大规模的预算进行慎重的考虑(如 Andic and Veverka, 1963—1964)。现代国家的发展被描述为是“向前和向上”的演化进程。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着重研究过 20 世纪一些现成的财政统计数据，他们以职能和多元的方式来解释发展。希格斯(1987)把他们的理论区分为四种模式：现代化理论(国家发展到与更为社会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相协调)，公共财产理论强调民族防御(公共财产是由国家提供的，因为它们不是以私人的利益而是以公众的利益来投资，而且一个消费者的获益并不减弱其他消费者的获益)，福利国家理论(在复杂的社会中市场削弱了私人救济和国家介入)，政治再分配理论(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获取利益)。希格斯指出 20 世纪美国的发展不适合所提到的这四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其发展得到了三次剧烈危机即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推动。这些危机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向国家干预的方向偏移(皮科

克和怀斯曼在1961年对英国作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且这与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相结合(从真正精英国家理论借用的一种理论)，并且阻止着政府组成回复到低层次化。

在扩张国家中战争扮演的角色已很古老，但它是否能被归入更为一般的“危机”概念是有争议的(拉斯勒和汤普森在1985年也提出这一观点)。或许与战争相分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发生在1850年之前。但它们并没有刺激国家的增长，1850年前只有战争起到了这一作用。政治干涉者对大萧条的反应看起来是独特的，而不是一般现象的一部分。下层社会阶级提出了被马歇尔称为“社会公民权”的要求，这在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除战争之外，19世纪的国家发展并不是对危机的反应。值得称赞的是，希格斯承认了这一点并总结道：“大政府的发展无论它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和多维的，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真正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动力是‘更为混乱’的，与理论家所设想的相比，对外生的影响或震动更为开放，在他们的结果上具有较少的决定作用”(1987；259)。他是正确的。他的四种国家发展理论囊括了所有多元国家理论的缺点。国家不能系统地反映他们的社会；他们也不是简单地实行一个基本的现代化、公共财产、福利、再分配，或者甚至是危机职能。他们也不能系统地反映一场辩证的阶级斗争或国家精英的利益。而是这些他们都做到了——并且进一步——置身于机构和职能的错综复杂中，这需要细致地进行分析。

韦伯也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国家发展理论：它是整个西方纵横几个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合理化进程”的一部分。他害怕规模和范围不断增长的官僚国家“高高在上”的权力，并且他也简短地指出了这种国家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原因：对一支现役军队和整齐划一的法律和税收的联合需求，资本主义企业对统一技术和可预测服务的需要，公民权要求对待一致性所产生的压力。这是敏锐的，但韦伯却把这种分析从属于一种本质上向前向上的发展历程(尽管他也不确定是否喜欢它的结果)。

真正的精英国家理论(见第三章)也从本质上讲了一个向前向上的发展故事。在波吉(1990)看来，这是被国家本身的“侵略”倾向推动的，尽管也与阶级和多元机制以及一些附加的偶然性相互作用。斯科克波(1979)提供了一个更缺乏逻辑性的真正精英理论。她认为1789年以来的革命同时促进了国家的规模、范围和官僚主义(希格斯危机理论的另一种版本)。(我在第十三章中对她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吉登斯把韦伯和福柯(1975)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描述了一个独揽大权的、全面监督和控制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他认为这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权力容纳器”。它“吸纳”了社会并实际上就“是”社会(1985, pp.21—22, 172)。但是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集权国家在何时何地出现。他或者福柯也没搞清这个集权国家叫什么？谁控制它？谁应为它做什么？事实上是否有个国家精英在掌管着它？

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考虑给出了一个向前向上的解释。他们指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而是一种曾经扩张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着重地分析国家，但他却用维多利亚时期反对“过于膨胀的官僚机构”的冷嘲热讽对法国和德国进行了描述。他把法国描述为“这个骇人听闻的寄生体，像网一样缠住了法国社会的机体，并阻塞了它所有的毛孔”(1968: 169)。这一章的图表表明法国并不比同时期其他的欧洲国家大。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一成不变地写着“资本主义国家”。米利邦德(1969)的书是这样开头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和行为的高度膨胀……已成为政治分析纯粹的最司空见惯的一种。”他的书名是《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了他对这种膨胀的解释。沃尔夫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把发展和官僚主义归因于集中的资本需要，以便用可预测的、合理的公共财产和一种明显的中立机构来控制阶级斗争并通过福利改革来缓解它(1977, pp.59—79, 263)。他的历史，几乎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很少提到国家的军事活动。

这种向前向上的历程描述反映了国家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发展的可信

度。一些杂乱无章的数据在经过整理后也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如 Poggi, 1990, pp.109—111)。有人提到国家官员在数目上持续不断的增长时(如，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经常引用弗洛拉(1983)关于公共就业历史统计的汇编。布鲁斯 · 米切尔(1975，1983；Mitchell and Deane, 1980)有价值的财政汇编也经常被引用。他们指出整个这一时期，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现金支付大幅度增长。财政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 · 阿尔当进一步宣称，国家花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尽管它在整个19世纪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张(1975, p.221)。在简略地阐明了统计学的两种类型并承认了19世纪发展的某些不均衡性后，格鲁(1984)转向了他的主要问题：在19世纪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程度的国家扩张？并且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性？格鲁对国家的一味发展看起来是信心百倍的。

但情况真是如此吗？在本章里，我在国家财政和就业方面列举了系统的大量资料，把规模、范围和官僚主义细致地区分开，以研究哪一些增长了，它们又是在何时何地增长的。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情形迥异、错综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的进程。更令人称奇的是，在“漫长的19世纪”中，国家就其国内社会而言，并没有变得更大。然而这一趋势的缺乏使得三种进程相混淆——一支衰落而日益离散的军队，官僚作风日渐膨胀和平民范围的极大扩充。关于这三个进程我将在它们各自的章节中分别对其分析论述。

我已收集了五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规模、范围和官僚制度方面的系统化资料——低于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层次的所有的政府层次。在奥地利国土上，1867年前的“中央政府”仅仅指的是维也纳政府；1867年后，它指的是二元君主制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两个王座。在第一卷中我扩充了方法论，以便用它们产生的统计资料为国家讨论提供基础。税收和支出总数也象第一卷中那样进行分析。税收为我们提供了国内社会国家和权力运作者关系的线索，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它与国内社会权力网络隔离或相融合(这些概念在第三章已给出解释)。支

出反映了国家的职能，它给出了国家总体规模和其职责相对重要性的财政索引。由于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我对这些财政数据进行了调整；并把它们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以衡量国家经济的规模。

在现代我们能在国家就业上增加统计资料。官员数量也可以看作是国家规模的检测尺度，并且还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然而，人事部门的数据已被证明是极不可靠的——实际上，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官僚机构的胜任能力而不是规模。我在第十三章将进一步讨论人事部门的资料，以阐明官员的就业情况、他们的职责、组织网络和社会背景——揭示他们作为精英或官僚以及隔离或嵌入国内社会的均衡性。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些数据称作"统计学"而没有丝毫的不合时宜，因为这个词和它的同源词出现在 1800 年前的英语和所有的欧洲语言中，其意义是与国家有关联的数据——揭示国家现代化还在进行当中。

这一卷将会讲述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自相矛盾的历程。一方面 19 世纪已看到了一个理所当然应被称作现代的国家的出现——不比其公民社会庞大，但却承担了更多的国内职能，准代议制也变得更为集权化、官僚化和能人制度化，其基础结构也能有效地渗透到它所有的领辖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并不是划一的，而是多形的，在每个阶段适应不同的政治定型。这在基础结构上导致了一个政权，并肯定不如它的前任具有协调性。

国家的规模：支出倾向

我首先把支出倾向作为整体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费的金钱越多就意味着国家越发展吗？

表 11.1 包含着可利用的支出数据，它是以当前的价格，按 19 世纪中期国家的货币来衡量(几个国家在这一时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对

于奥地利、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德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数据从一开始就是适用的；而对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却是从 1790 年，即它建国后才开始适用的。奥地利的数据需仔细斟酌，因为它们有时指的是整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而有时仅指西半部(奥地利帝国仅包括总人口的 60% 强)。地方政府很少被连贯地记录下来。英国的地方当局、法国的各个部和公社、德国的联邦州和乡镇的数据以及对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估计，贯穿 19 世纪中期，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适用的。奥地利的一些地方数据在世纪末变得适用起来，但我坦白，我不能完全理解它们的结构，于是就删去了。

像本章提供的所有数据一样，支出数据也将有所保留。后期的数据比前期的数据更加可靠，而且中央政府的数据比地方的数据更为可靠。一般来说，在这些幸存下来的统计的意义和准确性上，我会听从专业历史学家的建议。我并没有宣称这些数据是完全准确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然而，我只是宣称它们是这一时期所汇集的资料中最为全面的。

从金钱这方面来说，所有的中央国家都发展迅猛。1760 年，英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花掉了 1 800 万英镑；1911 年，它几乎花掉了 1.6 亿英镑。法国也同样发生了 8 倍的增长。其他国家的增长幅度甚至更大：奥地利和普鲁士—德国几乎增长了 40 倍(应该考虑到的事实是，从 1870 年起，在表 11.1 中的奥地利数据仅指奥地利帝国)；并且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骤然增长了 200 倍还要多(从一个很小的数据起)。

如加上地方政府的数据会使发展加速，但这较难解决。在这一阶段早期是存在地方政府的，但无论我们还是同时期的中央政府都无法知道它的规模或花费，因为它是高度自治的(后边会讨论一个重大发现)。那部分已知的地方政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说明的，对中央政府而言它开始很小，然后在这一阶段后期比中央政府发展得都要快。地方政府的开支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就下降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所有政府的开支(中央加上地方的)应该增到甚至超过表 11.1 所给出的数据。

表 11.1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全部支出，

1760—1910，当前的价格

	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		法　国		英　国		美　国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年	百万弗罗林	百万马克		百万法郎		百万英镑		百万美元	
1760	58	61		506		18.0			
1770		51		333		10.5			
1780	65	64		411 +		22.6			
1790	113	90		633 +		16.8	23.0	4.3	
1800	167	106		726		51.0	67.0	11.0	
1810	216			934		81.5	94.0	8.7	
1820	160	201		907		57.5	70.0	19.3	27.7
1830	138	219		1 095		53.7	65.0	17.0	33.1
1840	165	204	234	1 363		53.4	64.0	28.9	67.6
1850	269	252	334	1 473		55.5	66.0	44.8	89.2
1860	367	323	496	2 084		69.6	87.0	71.7	171.7
1870	332	1 380	2 360	2 482	3 348	67.1	92.0	328.5	611.7
1880	432	519	1 851	3 141	4 180	81.5	112.0	301.0	621.1
1890	560	1 044	2 690	3 154	4 289	90.6	123.0	378.9	854.1
1900	803	1 494	4 005	3 557	4 932	143.7	265.0	607.1	1 702.1
1910	1 451	2 673	6 529	3 878	5 614	156.9	258.0	977.0	3 234.0

注：所有的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在所有的表中，对美国而言，1900年实际上是指1902年，1910年是指1913年。

资料来源：

奥地利：中央政府正常和额外的纯支出：

1760　Janetschek, 1959, p.188。

1780—1860　Czoernig, 1861, pp.123—127(在这些表和以下的表中，1780年实际上是1781年，1860年实际上是1858年)。数据指的是整个奥地利帝国。

1870—1910　Wysocki, 1975, p.109；奥地利帝国支出了奥匈帝国二元君主政体约70%的财政收入)。匈牙利的数据未能找到。

在1858年，100个旧弗罗林约等于105个新弗罗林。在这些表中和以下表中我都没有调整这个数据。

普鲁士—德国：在这些表和以下表中相邻年份是：1821，1829，1852，1862，1872，1881，1892。

1760—1860：普鲁士中央政府的数据和1870—1910年间的所有德国政府的数据：Riedel, 1866，表 xv—xx；Leineweber, 1988, pp.311—321；Weitzel, 1967,表 1a。值

得注意的是，Andic and Veverka 在 1963—1964 年间给出的地方政府的数据比 Leineweber 和 Weitzel 给出的在某种程度上高一些。

1870—1910 德国中央政府的数据：Andic and Veverka, 1963—4。

法国：

1760—1770：Riley, 1986, pp.56—57，138—48，1761 年和 1765 年份的资料。

1780—1790：Morineau, 1980, p.315———一般的支出仅指 1775 年和 1788 年，比全部支出的数额要低估一些(因为在这两年未发生战争)。

1800—1810：Marion, 1927, Ⅳ，pp.112—113，325；指 1799—1800 年(共和国 7 年)和 1811 年。

1820 Block, 1875，Ⅰ，pp.495—512。

1830—1860 1913 年法国统计年度回顾摘要，p.134。

1870—1910 Delorme and André, 1983, p.722；1870、1900 和 1910 实际上分别是 1872，1902 和 1909。

英国：

1760—1910 中央政府：Mitchell and Deane, 1980；公开财政表；到 1800 年是净支出，然后是毛支出。

1790—1910 地方政府：Veverka, 1963, p.114；指的是英国并包括爱尔兰。由于 Veverka 没有给出资料参考，我也无法核对它的出处。他的人口数据不准确。在所有表中 180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801 年的。

美国：

1790—1910 中央(联邦)政府、1790—1910、和所有地方政府，1900 和 1910；1795 年的美国人口调查局：表 Y350—6。这种标准化的来源包含的仅是邮政利润。我已经从美国减去了这一部分并增加了全部的邮政支出。财政部 1947 年，419—422。

1820—1890 州政府 1820—90，从 Holt 1977 年的资料计算出来的。Holt 不完全的州资料被转变成按人口计算的数据，然后被集中到全部的美国人口中。

1820—1890 地方政府，1820—90,来自 Legler 等人 1988 年的计算。表 4 和 Legler 等人 1990：表 3。注意(a)：这是全部的收入数据，而不是支出数据；(b)：我已经估计了 1820—1840 年间的数据，认为在 1820 年所有地方政府的人均收入是城市平均收入的 8%，1830 年的 9%，1840 年的 10%(已知的比例是 1850 年 12%，1860 年 16%，1870 年 21%，然后缓慢地连续上升)。这些数据因此只是大约的估计。

像这样的数据为向前向上的历程提供了主要证据，然而它们并不是非常有意义。我们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它侵蚀了这一时期所有的货币价值，并且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世界范围内快速的人口增长，尽管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普鲁士—德国和美国，因为它们的领土扩张了或有大规模的移民。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支出增长，那么一个国家实际控制其国民的能力就削弱了。在表 11.2 中我既考虑到了通货膨胀，又考虑到了人口增长，以固定不变的价格把支出占 1911 年人均水平的百分比表达了出来。

表 11.2 以固定不变的价格所表现的按人口计算的国家支出趋势，

1780—1910，中央国家和所有地方政府(1910=100)

	法国		英国		美国		普鲁士—德国		奥地利
年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1780			70						
1790			45	32	12		63		
1800			74	51	14		86		21
1810			96	61	9				19
1820	27		77	50	18	8	94		19
1830	31		76	48	14	8	80		14
1840	35		68	42	16	13	68	32	19
1850	43		87	53	22	14	82	46	25
1860	50		86	57	23	18	69	44	25
1870	67	63	69	50	57	35	118	83	35
1880	85	81	71	67	56	37	32	48	41
1890	92	89	75	63	68	51	63	66	54
1900	99	96	103	118	91	80	78	86	72
19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支出来源和注释同表 11.1。以下是固定价格的来源。

法国：Lévy-Leboyer, 1975, p.64。1908—1912 年的价格。

普鲁士/德国：1790—1860，普鲁士；1870—1910，德国。1790 年实际是 1786 年；1800 年是按 1804 年的价格计算来的。1820 年实际上是 1821 年。

1790—1800 Weitzel, 1967,表 Ia。

1820—1910 Fischer 以及其他人等 1982, pp.155—157。1913 年的价格。

英国：1780—1840，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3, p.41——他们对"南部城市最好的推测"价格指数——与 1850—1910 相接，Deane, 1968。这两个指数在 1830—50 相交叠的阶段仅有轻微出入。

美国：美国人口调查局 1975 年，表 E52—89。Warren, Pearson 在 1790—1890 大规模的价格指数与劳工统计局 1890—1910 年的指数相衔接。

奥地利：Mühlpeck 等人：1979, pp.676—679。1914 年的价格。

这两种限制抵消了很多的国家发展，尽管是按照国家和政府水平来区分其发展程度的。按真正的人均标准来看，地方政府的增长比中央政府延后，但却迅速，只有法国是个特例，它的两种增长率并没有明显差异。法国和奥地利的增长是卓有成效和稳定的。这一时期英国和普鲁士的中央政府实质上经历了停滞，并且在世纪中期后宣称处于衰落；

但它们的地方政府的增长是相当可观而又稳定的。在美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百年不遇的向上的温和倾向，由于内战的巨大推动力，数据急剧增加扩大。我将在后面解释这些各自的倾向。现在我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发展尽管不尽相同，但却是真实可靠的。在本世纪，按照它们的支出来衡量，国家的确是变强大了，尽管不是气势恢弘；并且区域性国家的增长要比中央国家的增长迅速得多。

但我要增加第三种限制。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实际上集中于我们要讨论的五个国家。这样它们的经济增长就应该走在国家发展的前头，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经济重要性在实际上都有所下降。

表 11.3　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中的百分比，1760—1910

	普鲁士—德国		英国				英国		奥地利	美国		法国		法国
	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商品生产
年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a	b	a	b								
1760	35			22								12		16
1770	23			11								7		9
1780	22			22					17			8		
1790	24			12		16			27	2.3		12		13
1800	23		19	27	29	36				2.4		9		12
1810			27	37	31	43				1.5		10		14
1820	19		20	23	24	28				2.9	4.2	7		14
1830	17		16	19	19	23	12	15	9	1.8	3.5	7		12
1840	12	14	12		14		11	13	9	1.7	4.0	8		12
1850	9	12	10		13		10	12	11	1.7	3.4	9		13
1860	8	12	11		13		9	10	11	1.9	4.5	9		13
1870	15	18	7		10		6	9	11	4.5	8.3	10	13	14
1880	4	13	8		11		6	9	12	2.9	5.9	13	16	18
1890	5	13	7		10		7	9	13	2.9	6.5	14	18	19
1900	5	14	9		16		8	14	15	2.8	7.9	12	16	19
1910	6	16					7	12	17	2.5	8.2	11	15	15

注：在 18 世纪末和整个 19 世纪，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了国民收人约 15%，超出了商品生产约 25%。

资料来源：支出来源和注释同表 11.1 一样。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商品生产。
普鲁士—德国：
1760—1800 Weitzel, 1967,表 1a，在资料遗失的年份是用他的预测。
1820—1910 Leineweber, 1988, pp.311—321——在生产要素费用方面的国民收入。
美国：全部年份：Mitchell, 1983, pp.1886—1889(国民生产总值)。
奥地利：
1780—1790 国民收入：Dickson, I，pp.136—137——估计 1780 年的国民收入为 3.57 亿弗罗林(他估计范围的正中点)，1790 年为 4.1 亿弗罗林。我没有采用 Dickson 自己的百分比估计。它们只是通常和平时期的收入，比实际支出要低一些。
1830—1910 奥地利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Kausel, 1979, p.692。我已经计算了 1830—60 年间柴厄尼格支出的 70%。1867 年帝国分裂后，奥地利提供联合预算的 70%，匈牙利提供 30%(1908 年，匈牙利提供的预算上升到 36.4%，但我并没有调整 1910 年的数据)。
英国：国民收入估计：(a)Deane and Cole, 1962, p.166；(b)Crafts, 1983——推测了 1770、1790、1810，1820，1830—191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Deane, 1968, pp.104—105。
法国：国民生产总值 1760—1790：Goldstone, 1991, p.202。国民生产总值 1800—1810 (实际上是从 1781—1790 年和 1803—1812 年的数据计算出来的)：Markovitch, 1965, p.192。1788 年的支出来自 Morineau, 1980, p.315；1820—1910 的来自 Lévy-Leboyer, 1975, p.64。商品生产＝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市场价值(即不包括服务业)。1740—1767：Riley, 1986, p.146(1770 的数据实际上是 1765 的)。1790—1910：Marczewski, 1965, p.LXX。

表 11.3 通过表示国家支出在国民经济——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全部商品生产中的百分比，来调查这种可能性。

这里有一点我要指出：对国民经济规模的估计甚至比支出数据更缺乏精确性。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最好的测量手段，并且他们有时甚至会用国家间互不相同的基础来源进行分析测量。他们的数据收集了特殊的工业、地区或涵盖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销售或所得的数据。在这一时期估计服务部门的生产尤为困难。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面临这种困难时，站在生产的角度上(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估计，一些站在收入的角度上(国民收入)进行估计，甚至还有一些人干脆把服务业忽略不计(商品生产)。这样，除非差别悬殊，国家间的比较是投机的。因为他们经常运用不同的方法，我也谨慎地在一段时期内对不同组的估计进行了比较。因此这些数据不能为了特殊的目的而使用。庆幸的是总趋势是明显的。

这种趋势显然是惊人的。相反——我信心十足——在多数读者的意料之中，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政府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下降。资料的确是不完整或不一致的，但大部分的总方向却是相同的。

英国的数据是最完备的。他们在18世纪以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突飞猛进，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然后平缓衰落。然而我有点怀疑表11.3中b列的那些极端的英国数据，那是来自克拉夫茨(1983)对工业革命时期国民收入的估计。他对迪恩和科尔(1962)的估计下调的数据会造成1811年全部的政府支出(对此我们有精确的数据)占国民收入的43%。尽管1811年是个重要的战争年份，我仍然怀疑在20世纪之前的政府是否拥有基础权力，在必要时征用这一份额的国民收入。甚至在一战时，英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再加上按比例扩充的武装力量，也不过征用了国民收入的52%。在某一点上，经济历史学家倾向的数字在社会学合理性面前必须让步。然而，无论英国政府活动的精确比例是多少，它在漫长的19世纪却是大幅度下降了。

普鲁士—德国的这种趋势甚至更为显著。它的早期中央政府单独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比后来德意志帝国所有层次的政府占的比重都要高许多。奥地利支出最高的年份也是在早期，即1790年(尽管1800年和1810年的数据如果是可利用的，那无疑要更高)。在法国没有一个总的趋势，尽管在后面我会论述可利用的数据降低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国家活动。除了受内战冲击的1870年的数据，联邦国家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增长。但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相对有差别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依赖的：与欧洲国家相比，每一层次上的美国政府都是小规模的。就像俗语警句所说的，美国拥有的政府权力比欧洲要少得多——像我们在第五章定义的、对资本主义自由政权所期望的那样。

在20世纪的战争之前，18世纪后期的国家可能拥有世人瞩目的最高财政支出率。很显然，我们无法对早期的国民生产总值作出恰当的

估计，但大部分的猜测都认为17世纪以前的欧洲国家支出低于国民生产或收入的5%(Bean, 1973, p.212； Goldsmith, 1987, p.189)。我们能冒险作出的第一次计算是1688年的支出，当乔治国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估测国民生产总值时。他的数据已被林德特和威廉森修正过了(1982, p.393)。我获得了他们从整体上对英国的估计，然后把1688—1692年间的平均国家支出进行了分割(前几年的支出资料是适用的；见 Mitchell and Deane, 1980, p.390)。这认同了英国的国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拉斯勒和汤普森(1985)也作出了一个相似的计算，尽管不幸的是，他们没有给出自己的方法细节。他们估计1700年的国家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5%。

国王也估测了荷兰16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岁入，但他的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太低，国家岁入则太高。他认为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Goldsmith, 1987, p.226以表面的价格接受了这一点)，但这简直高得离谱。得到荷兰省人均收入的数据后(Riley, 1980, p.275)，曾对荷兰国民生产总值持不可知论的两个派别，作出了国家岁入占国民生产总值8%—15%的估计。那些持高国民生产总值的派别(Maddison, 1983；de Vries, 1984)比那些与国王立场相似的派别(如 Riley, 1984)更深地打动了我。我最终赞成10%——这在一个国家是很高的税收。17世纪的国家可能会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5%—10%，并且这或许在18世纪早期仍然适用。拉斯勒和汤普森估计英国在1720年的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9%，尽管没有计算方法的解释。我能断定法国在1726年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5%(支出在 Morineau, 1980, p.315；随后的国民生产总值，Goldstone, 1991, p.202)。此后它就上升了：赖利(1986, p.146)估计在1744—1765年间的和平年份是8%—10%，战争年份是13%—17%。

因此表中所反映的18世纪向上的趋势早已开始。这种推断是不完整的资料来源所能得出的最清楚结果。像经由财政手段所衡量的，国家在整个18世纪迅速扩充，1815年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主角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然后在19世纪它们就衰落了。在国家生活中的第一次重

大变化——它的规模——发生在18世纪。如我在第三卷中将要指出的，国家规模第二阶段的增长发生在20世纪中期，且在“一战”期间已经开始。因此韦伯对“高高在上”国家的担心，他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他或者是对“一战”作出了反应，或者是有过人的先见之明(他死于1920年)。同样，那些向前向上的历程，即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一个国家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他们社会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以目前的价格，来自国家绝对的财政规模是发展的，并且按人均标准来看也是平稳增长的，但与国内社会有关的国家财政规模现在是静止或下降的。

这是一个如此重要而又反直观的发现，以至于看似有必要花一些时间进一步考察资料来源和方法，以验证资料的可靠性与合理性，但我不会那样做。下降趋势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很容易被解释清楚，并且也与其他趋势相吻合。我们将要看到的是19世纪两种相反的趋势，并且通常无法互相抵消：国家民用职能的大幅上升和大多数国家更大幅度军国主义的下降相抗衡。

为什么国家传统的、军事定型在经历了18世纪剧烈的上升后，会出现下降呢？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总的下降趋势和表11.3中的例外。首先，国家支出像它一千年来所做的那样，变化按照不管国家是处于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而总是以受到战争袭击的影响而上升。表11.3仅是部分地反映了这一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战争在奥地利和美国政府财政中的作用。在奥地利，支出最高的年份是1790年，这是由镇压佛兰德和匈牙利起义造成的。但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由于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对国民生产总值可估计的数字应该更高。美国在表中所列出的所有年份都处于和平时期。如果我们加上内战时期的支出，我们就会发现战争对支出的巨大影响。1860年，按照表11.1，美国联邦支出是7 200万美元。到1864—1865年间，战争双方的支出一跃达到原来的30倍，达到18亿美元——北方联邦在1865年达到13亿美元，其中军事支出占90%(美国人口调查局1961：71)，南部邦联在1864

年还不足5亿美元(Todd, 1954, pp.115, 153)。这个总数远远超出了后来任何一年的联邦支出(尽管存在国家人口和财富大规模的增长)，直至持续到一战期间的1917年。那时，支出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如表11.3所示，这是国家卷入大规模战争时的平均水平。和平通常会让美国软弱无力；战争却魔术般地使它在骤然间成为庞然大物，强大无比。

表11.3也显示了战争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普鲁士—德国的支出最高年份是1760年，这是七年战争的影响；1870年的上升是普法战争的影响，这也使其在表11.2中成为在1870年按人口计算支出最高的国家。英国在18世纪支出的顶点是1760年和1780年，前者是由于七年战争的影响，后者是由于美国革命的影响，1800年和1811年支出的大幅上升表明了拿破仑战争对其造成的沉重负担。对法国来说，早期支出最高的年份是1760年，受七年战争的冲击。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并没有在1800年和1811年的数据中反映出来，因为法国得到了被占领国家的资助。在1740到1815年间，大部分国家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战争，目的是为了争夺更多的人力、税收和工农业产品。它们的国家已被军事化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普鲁士是完全符合这一模式的，布鲁尔(1989)强调了立宪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但需指明的是18世纪后期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不过是从军事教练员、征募新兵的官员、强征组和随之产生的征税官员的完善网络开始的。

直到19世纪这一国家活动仍未结束。在我目前的时代结束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发生了常规影响。到1918年，全部英国政府的支出激增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2%，并且军事和战债开支占支出的90%以上(Peacock and Wiseman, 1961, pp.153, 164, 186)。在战争期间计算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非易事，但军事和战债开支也占大幅度膨胀了的国家预算的90%(法国1932年度统计，pp.490—491)。德国的增长情况类似，或许奥地利也如此(它的数据仅能支撑战争的头一年；见奥地利统计大全1918, p.313)。只有美国在一战中幸免于难，它的中央政府支出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变为3倍，但在1914年到1919年只是从2%上升到6%。

这些要点直接阐明了19世纪国家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欧洲战争的频繁性和持续性在19世纪居高不下，然后在1815—1914年间逐渐降低。在欧洲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冲击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相匹敌。甚至18世纪中期的斗争，即奥地利继位战争和七年战争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相提并论。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虽然征用了千军万马，但持续的时间很短。克里米亚战争没有严重地牵制法国或英国；它们帝国内部持续不断的战役也没有(尽管都影响到了相关年份的国家支出)。只有美国内战可与早期的战争相提并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解释为什么奥地利、英国、普鲁士—德国的支出下降，而美国的支出却急剧上升。

表11.3所表明的这种趋势的第二个原因是，军事策略、组织和技术的发展减少了19世纪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波拿巴征用未经训练的民众持枪奔赴战场的巨大成功，意味着战士技能的下降，对专业士兵的需求越来越少。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包括永久职业军骨干和机动的被征入伍的新兵以及预备役部队。这样在战争一开始军队就能够得到快速扩充。在18世纪中期，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军队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就扩充了两倍；在拿破仑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他们的军队扩充了4到5倍。在一战中，这种趋势继续存在，在战争开始两年后就扩充到8倍。这些军队发展并不适用于海军，海军仍需职业化士兵。这样其海军力量独占鳌头的英国，在和平时期的积蓄少而又少。我将在第十二章探讨这种国家军国主义变化的本质。

表11.3所反映出趋势的第三个原因是传统的。战争对国家支出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和平时期，就像它在上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所发生的那样。国家在战争期间负债累累，当战争结束时，它不得不偿还战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直接的军事支出趋近完结，但在以后的五十年里战债偿付占去了很高比例的预算。如表11.3所示，英国政府

的支出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逐年减少，直到 1870 年才开始回升。如果战争频繁，就像 1740—1815 年间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那样，或者像 19 世纪的奥地利那样，那么这种回升的发生也只是到下次战争发生时。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只有 19 世纪有望看到这种完全的回升。

联合这三个军事原因一起解释了表 11.3 中这种主要的、非常明显的趋势。事实上他们的解释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支出为什么没有下降得非常剧烈。答案是国家增加了其他方面、主要是民用方面的支出(Grew, 1984)。表 11.4 详细列出了民用和军用目的在中央政府支出中的比例以及民用在所有政府(中央加上地方)支出中的比例(地方性政府的军事支出微乎其微)。没在表中列出的剩余部分，是债务偿还费用。负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模糊了军用支出和民用支出的区别，因为在 19 世纪期间借债从支付战争转向支付诸如铁路、学校这样大型的公共资金项目。以德国为例，统计来源给出了每笔借款的准确目的，因此我们能修正这种不确切的低估。而即使没有这种修正，表中所反映的趋势也是一目了然的。

表 11.4　拨给民用和军用的支出在全部政府预算中的比例，1760—1910 年

	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年	民用	军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1760			9	86		14	50		6	75				
1770			9	90					15	39				
1780	28	51	8	84		24	33		7	66				
1790	21	62	25	75		21	27		13	31	36	26	19	
1800	14	61	22	74		24	64		5	31	36	12	56	
1810	15	57				9	75		11	59		16	49	
1820	33	35	45	38		48	25		17	29	31	16	56	60
1830	35	33	50	34		47	30		18	28	31	34	65	66
1840	35	33	53	35		49	34		19	26	31	34	65	72
1850	34	47	48	37		29	35		22	27	35	42	49	75
1860	39	51	49	36		17	39		34	25	41	49	46	79

(续表)

	奥地利		普鲁士—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		
	中央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年	民用	军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民用	军用	民用
1870	46	24	22	40	35	32	26	49	28	32	50	24	35	81
1880	45	19	15	82	63	39	30	54	35	53	61	24	41	80
1890	39	19	25	78	65	32	34	50	37	36	59	34	55	75
1900	47	17	35	59	64	36	38	54	36	48	65	28	64	74
1910	60	16	40	52	67	40	37	59	47	40	68	29	68	79

注：民用支出 + 军用支出 + 债务支出(这儿没有列出) = 100%。

资料来源：也见表 11.1。

奥地利：

1780—1860：Czoernig, 1861, pp.123—127。

1870—1910：Wysocki, 1975, p.109—113；Wagner, 1987, pp.300，590—591；Mischler and Ulbrich, 1905：Ⅱ，p.95(只是奥地利帝国)。这有时已包括重新计算过的来源数据。所有 1870 年和 1910 年的数据和全部支出来自维斯基，军事支出来自 Wagner 重算过的数据剔除了匈牙利对联合军队和 bonved 储备力量的军事支出。1880—1900 年的债款数据来自 Mischler and Ulbrich。民用支出 = 剩余份额，因此对奥地利的数据必须谨慎对待。

普鲁士—德国：1820—1870 年是普鲁士的；1880—1910 年是德国的。

1760—1860：Riedel, 1866,表ⅩⅤ，ⅩⅥ，ⅩⅧ，ⅩⅩ。

1820—1910：Andic and Veverka, 1963—1964, p.262；Leineweber, 1988, pp.312—316。我调查了他 1820—1870 年的数据，从民用支出中减去了"民用储备费用"(以使德国数据与其他国家的具有可比性)。

法国：

1760 Riley, 1986, p.56—57，138—148(这一年是 1761 年)。

1780—1790 Morinead, 1980, p.315，1775 年和 1788 年只是普通的支出(或许民用支出被过高估计了约 30%)。

1800—1820 Marion, 1927, Ⅳ，pp.234，238，241—242，325，1928：Ⅴ，14，19；Block, 1875，Ⅰ，pp.495—512。1800 年的数据是 1801 年、1802 年和 1803 年的平均预算，分配给民用支出的比例都是 23%—25%。1810 年实际上是 1811 年；1820 年的数据是 1821 年和 1822 年预算的结合，这两年的数据都是可用的，但只是近似值。

1830—60 法国 1913 年年度统计；Block, 1875，Ⅰ，491—493。

1870—1910 Delorme and André, 1983, pp.722，727。

英国：中央政府的来源像表 11.1 一样。Mitchell and Deane 给出的只是预算的"主要构成条目"。我猜测剩余的种类不全的条目都是民用的。1860 年这些条目共占总预算的 12%；在所有的其他年份，所占比例要低得多。地方政府，1790 年联合王国的数据来自 Mitchell and Deane, 1980,公共财政报表。所有可用的资料来自 1880 年(实际是 1884 年)。早些年的估计程序：1820—1860 年，贫乏的法律收据即英格兰和威尔士加上英格兰、威尔士各郡的收据，再加上 12.5% 英格兰的额外支出。注意 Veverka, 1963, p.119 估计联合王国支出在 1840 年占 34%，1890 年占 47%。

美国：来源像表 11.1 一样。退伍军人的津贴算在军事支出里。我没有考虑地方政府的军事支出(州政府负责国民自卫队的拨款)。

表中所有的纵列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民用支出的相对增长。到1911年，民用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60%—80%。再加上民用借债，德国的比例能增长到67%—75%(Leineweber, 1988, pp.312—316)，因此所有国家中全部民用支出比例的真正范围约在70%—85%之间。在这一阶段之初，我们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缺乏区域性政府的数据。但资料中反映出的可利用的趋势引导我猜测。18世纪中期的范围仅比表中所给出的中央国家的数据略微高一些——也就是说，它们会在15%—35%之间。这种民用支出比例的提升——从18世纪60年代的约25%上升到20世纪的约75%——表明了现代国家范围的第二次巨大改变，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次增长从19世纪中期起稳步前进。它没有受到经济周期的巨大影响：从1873年开始的农业大萧条没有对其产生大的冲击(像希格斯的危机理论可能建议的那样)。我们也将会看到，为应付危机而上升的大部分支出像福利支出，也没有对其产生大的冲击。

除奥地利之外，大多数民用增长是在区域性政府的水平上。一种分工传递开来：大部分新的民用职责传给了地方或地方政府，中央国家仍保留着其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小一些的中央国家仍保留了很大程度的军事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内战后的美国，它的小联邦州甚至在1910年仍是军队占主导地位。中等规模的中央国家，像英国、法国和德国，其民用和军事职责的分开相对平均些。在奥地利的土地上，如我们在第十章看到的，它与各省宪法解决的失败，意味着中央哈布斯堡政府仍握有其大部分的权力和新民用职能的大部分(1867年后，与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中央政府“两分天下”)。

中央和地方职责的分配在不同国家间是互有差异的。美国从其数据是可靠的这点来看，联邦政府的支出少于地方和州政府。在德意志帝国，区域支出很快超过了中央政府，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最大的地区性土地是普鲁士自己，它的支出比中央帝国政府都要高，然而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德意志”国家。这两个国家中的这种悬殊直到卷入

“二战”时才又反过来。在奥地利、英国和法国，整个阶段的中央支出都远高于地方支出。中央与地方协调也情形迥异。在中央集权的英国和法国，所有层次的政府在19世纪末开始协调它们的行动，并且地方支出服从于国家政府。在部分联邦的德国，协调和账目计算落后了那么一点点。在邦联的奥地利，它更为特殊，各省和帝国在不断变化。在美国，联邦政府在整个这一时期与州或地方政府联系甚少，并且对它们的支出一无所知。协调可能会被认为是对自由的一种侵犯，并被最高法院禁止。国家，按照我给它们定义的“民族”定型具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是如此的集权化或联邦化。

这些差异使得总趋势中的相似性更加突出。如格鲁(1984)所观察到的，这种范围的拓宽遍及有着不同体制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欧洲国家。19世纪介绍的主要是非军事政府的支出。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在和平时期民用支出的提升代替了过去仅仅是作为战争的一个副产品。1846年，英国中央国家的民用支出与它在1820年以及每一个人侵年份比较都相差无几。但从1847年开始，几乎在每一个年份，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其民用支出都稳步增长。在所有可被利用的国家统计中，这个模式都已被确认。战争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我们能够为中央国家的这种转变确立象征性日期：民用支出第一次走在军用支出的前面，并控制债务偿还结果的那个时刻。有解释认为这最早发生在1820年的普鲁士，尽管这是误入歧途的，因为军队仍由主要行政部门使用，并且其军费部分地来自那里。但英国在1881年真正实现了这一点——一个时代的头号强国把其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多地用于和平活动，而不是军事活动，这对有组织的国家而言，在全部历史中或许是第一次。中央政府仍是一台制造战争的机器，但它现在至少也有一半是民用的。我们可以通过标明这种半军事、半民用政府的一个“双形政府”来对现代国家的多形模式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审视(如第三章所期望的)。因为这是一主要成功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创新。在第一卷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

的国家——冒着生存危险降低军费，像早期的萨克森或波兰所做的那样——不仅仅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大国都在效仿。就连比利时、挪威和瑞典这样的小强国也都在效仿(比利时1895年年度统计；Woytinsky and Woytinsky, 1955；挪威官方统计, 1969：表234；Therborn, 1978, pp.114—116)。

这种相似性是显著的。小强国的军事化程度比大国略轻一些，在美国，整个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较少军事化的，但它中央政府的军事化程度却远远超过了欧洲一流强国。但这些仅是重要的区别。在此或者在后来给出的人事部门统计中用于频繁表达的概念很少能得到支持：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独特地扩大了其规模。我参考了马克思早期对法国的论述，肯尼迪(1988, p.217)在这一点上对19世纪奥地利的论述，以及布拉福德(1965, p.98—99)和布兰宁(1974, pp.11—15)在这一点上对18世纪德国的论述。但无论是财政资料还是人事部门的资料都不能恰如其分地说明这种陈旧的理论。

我也修正了戴维斯和胡滕巴克(1986)的论点，并且这一论点被奥布赖恩(1988)所重述，即在19世纪末，英帝国的军事支出已如日薄西山。按人口计算的英国支出是最高的，但它的民用国家支出也是如此。英国是最富裕的欧洲国家，两项支出它都能够做到，肯尼迪(1989)也这样认为。按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看，无论是英国的民用支出还是军用支出都与其他的欧洲一流强国不相上下。1910年军事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高到低是法国占4.1%，德国约为2.9%，英国为2.8%，奥地利为2.7%，美国最落后，仅是1.2%。[1]法国(像俄国)竭尽其资源来维持其主要强国地位。幸亏隔离在另一个半球，才减缓了美国的压力。从强国的规范来看，这是仅存的偏离。

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国家生活中的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规模宏大的军事国家已迈入18世纪，并在19世纪末变成了一个具有民事和军事双重职能的双形国家。18世纪的国家已第一次把其实力渗透到整个领土——依靠征募新兵的官员和税收顾问和征税官员的网络。尽

管这些依靠存在，但它们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家”，而是进一步与民事官员共同主宰国家机构。

国家的范围

支出(也包括人事部门)从军事活动转向民用活动看起来就像拓宽的国家规模一样不同寻常(如 Grew, 1984 年强调的)。哪一种民事职能增长了呢？这种层次上的资料没有细致到能轻易作出比较的程度。我只能对 1870—1911 年间的资料进行半系统的研究。幸运的是，这几乎是所有的民事职能增长发生的时候。

传统的由战争主导的国家也已实现了三种主要的民用支出。(第四章指出它也产生了很多特殊的地方立法。)它的心脏是君主的家族和宫庭；它的肌腱是必须支持其军事活动的财政机构；它的大脑是法律和治安的行政管理机构。在 18 世纪中期，这三种支出占了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小型民用支出的 75% 以上。(我们缺少对普鲁士和美国的说明。)然而表 11.5 表明，到 1910 年，这些民用支出的比例已下降到 5%—20% 之间，这是个很显著的变化。1870 年后，按照钱币的标准来看它们是上升了(尽管不在法国)，但以实际或相对的标准来看它们并没有上升。实际上 1911 年的税收官员比 1760 年少了；王室家族和宫廷也缩小了——在美国和法国已被废除；并且尽管平民的警察力量现在已实质性地增多，但司法警察却没有增加。

表 11.5 表明这些传统的国家职能已在世界范围内被超过，先是被两种主要的增长领域即教育和运输超过；然后被两种小一些的增长，即邮政电报服务和“其他的经济服务”，主要是环境活动和农业与工业津贴——所超过。这在所有的国家都惊人的相似，尽管它们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方面有很大不同。

英国上升的中央支出主要归因于普及基本的话语能力如教育、邮局

和电报的增长。到 1901 年，这些支出占了全部民用支出的 70%。既是象征性又是物质性的通信、教育和公路主导了区域性政府的支出。在法国的预算中，教育和邮政电报服务，道路、桥梁和船坞占主导地位；在美国预算中，教育、公路和邮政服务是主导性的，联邦政府承担的只有邮政服务。在单个的美国州政府中，到目前为止，扩张最大的部门是教育(Halt, 1977)。

表 11.5　在民用支出条目中上升的百分比，1870—1910 年；以及它们在 1910 年的国家总预算中的百分比

	奥地利		法　国		德　国		英　国		美　国	美　国
	中　央		中　央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州政府
	Inc.	Cont.	Inc.	Cont.	Inc.	Cont.	Inc.	Cont.	Cont.	Inc.
行政管理/法律和治安	11	6	(33)	14	42	21	21	6	11	183
教育	67	3	429	9	248	19	531	19	18	400
其他福利			70	3	151	10	152	8	5	432
运输	398	29	34	9	89	11	338	12	17	238
其他经济	14	2					385	14	13	
服务业			}83	2}	188	2				
邮政和电报	74	6					259	8	8	
其他		14		1		4		0	8	

注：括号内的数据表示下降。

资料来源：参见表 11.1。

奥地利：Wysocki, 1975, pp.230—241。是奥地利帝国的数据。"其他"这一组来自维斯基提供的不完整资料。我猜测大部分的"其他花费"是财政部支付给不同部门的其他资金。

英国：时间跨度是 1880—1910 年：数据只是适用于从 1880 年(对某些条目来说是从 1884 年)到 1910 年，适用于联合王国中央政府加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政府。因此那些数据将略高估计了最先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条目在国家总预算中的百分比(如邮政服务)。它们也会过低估计了行政管理的费用，因为地方政府的费用没有单独列出。

美国：1913 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来自美国。1976 年：表 Y533—566。只有在 1870—1900 年间，在州政府水平上上升的百分比才是适用的——从霍布特 1977 年的资料计算而来。

在德国，教育再次成为最大的发展领域，位居第二的是国家资助和拥有的各个企业，包括铁路在内。铁路在国家最大的部门中扮演了一

个特殊的角色，占用其全部支出的 50% 以下(并且在其收入中占的比例更高，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铁路占去了奥地利民用预算的最大份额，其花费由其他国有和私人企业的支出来支持(像德国一样)。在小强国之间出现了一种相似的模式：在挪威和比利时，铁路、其他国家直接管理的企业和教育占主导地位。切记这些是毛支出，国有化工业通常也会带来收入，通常是利润，我会在后边考虑这一点。

这些预算反映了增长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普遍的，另外两种是较为多变的——比格鲁(1984)认为的更为多变：

1. 这种随处可见的主要增长，我把它叫作基础结构的国家职能(像维斯基 1975 解释的奥地利增长一样)。这种基础结构使得国家能够把物质性和象征性的通信遍布到整个领土内。从财政角度来看，这是国家职能在这一阶段非常容易做到的、最大和最普遍的延伸。

2. 然而各国间在多大程度上对其物质基础设施和资源，尤其是铁路实行国有化，存在很大差别。尽管英国、美国和法国管理并经常资助铁路，但铁路并没有实现国有化；法国拥有铁路，但并不是铁路车辆；其他国家控制着铁路，还有许多国家控制着一些其他企业。

3. 表 11.5 也反映了福利国家、尤其是德国多变的开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提供的救济少得可怜(它的总水平通常因残存记录不完整而不明确)。一些中央政府一直为战争的退役人员提供福利(其水平因为我提供的资料而不明确)。现在中央国家正开始为社会公民提供最基本的权利。

第十四章将要分析和解释这三种民用范围内的提升。但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个导言：至少与历史上的国家民用支出相比，它们的扩张范围是很普遍的和一致的，这一时期至少在热衷于政治权力的多数运作者之间是这样。在旧的国家职能中，军队和法律与治安带有很大成分的军国主义色彩；陆军和海军也被派往国外，以为统治者和旧政权取得荣誉；宫廷支出是用作他们个人的消费。认为基础结构支出对经济和军事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种说法看上去是合理的；同时福利支出也许被

认为是对全体人民的幸福作出了贡献。现代国家的较大范围或许会比传统国家的较小范围更具有协调性。我将在第十四章讨论这个问题，但当然协调要取决于为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政府收入与代议制

在我对政治斗争的叙述中，政府收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就像它们在第一卷分配的那样。[2]提高收入或使之合理化的努力，在法国和美国引起了革命，在奥地利引起了民族起义，在英国导致了改革；而普鲁士却勉强维系着传统收入，使改革和革命的可能性降到极致。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治实质上是财政斗争，与前几个世纪毫无二致。

财政与政治的这种紧密关系在19世纪有相当程度的削弱。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再加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降低了财政紧张状况。国家需要的收入在比例上已比早期更少(如Webber and Wildavsky, 1986, p.207 也提到过)。通常抽取财政会带来原则性的抗议，但这是牢骚不满，而不是愤怒的叫嚣(除了在纠纷四起的奥地利)。因为伤痛减轻了，某些已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使早期的革命派和保守派同样大吃一惊。政党民主派与君主派相比，证明对这种低层次的收入支出更为温和。议会能按法律程序对呈递给他们的账目进行审察，批准款项，对可选择的款项进行辩论，并对收入投票表决。代议制使得收入的适度支出让双方都能接受。君主处于更为特殊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早已确定的税额并豁免他们政治同盟的税收。在理论上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征税，但在实际上——如我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君主卷入了无休止的派系谈判之中。或许君主派比政党民主派更深地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政治中。但解决办法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

表 11.6 来自直接税和间接税收以及国家财产的国家收入百分比,1760—1910 年

	奥地利			英国			法国			普鲁士			美国		
年份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1760	53	35	12	26	69	4	48	45	7						
1770	48	33	19	16	70	4									
1780	41	37	23	20	71	5	41	49	10						
1790	27	36		18	66	9	35	47	18						
1800	29	45		27	52	12									
1810	30	42		30	57	11									
1820	44	50	6+	14	68	16				36	33	30	10	62	26
1830	39	45	16	10	73	17	40	22	38				5	71	21
1840	25	49	29	8	73	19	c30			24	34	41	18	42	37
1850	29	44	22	18	65	16	c28			22	32	46	23	58	20
1860	27	42	35	18	64	16	c23						26	54	18
1870	35	30	26	26	59	12	26	31	44	20	24	55	26	58	16
1880	32	31	37	25	61	16	21	38	41	17	25	58	15	67	17
1890			26	50	18	18	36	42	8	30	62	16	64	20	
1900	28	20	42	27	47	22	21	36	43	7	28	65	16	58	26
1910	28	29	43	(44)	(36)	(17)	22	33	45	9	22	69			

注：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仅指中央政府。普鲁士和美国的数据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就像在正文中和附录表 A.6 和 A.12 所解释的那样。就美国而言，商业税收是包括在直接税收之内的。英国 191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911 年的。1910 年的数据在附录表 A.7 中已给出。

资料来源：见附录表 A.6—A.12 各国的表格。

在表 11.6 中反映了被中央政府支出的普通毛收入来源的总趋势。首先要指出三个要点：

1. “毛”意味着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收集的费用已被加入到从收入来源中让渡的利润中(那就是净收入)。这意味着我有时会偏离更常用的统计数据——如把美国邮局的总支出加到利润中，为了美国收入统计，利润只出现在通常的来源中。

2. “普通”意味着我已从计算中减去了所有的贷款(偶尔的盈余也是早些年保留下来的)。减去贷款距理想状态很远，但贷款方面的来源资料各国都不一样，通常是不完整的。然而可用的贷款资料的确反映

了一种趋势：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因为战争尤为频繁，所以贷款也尤为频繁。它们在19世纪中期的铁路大繁荣中异常活跃，然后便消沉了，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出现(奥地利比其他地区更为频繁)。钱币的借入和贷出——现在通常是纸币——对放利者、富裕的外国同盟和降低铸币成色的行为而言，与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以系统而有意识的努力去借款支出相比，变成了一项更少有专门性的手段。这种政策表明一种经济"体系"存在有限意识和(伙同关税政策)一种国家经济责任的最少意识。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势头，这种政策在提供可观数目的钱币方面会很有效。因此表11.6省略的其他小前提仍然是有用的财政镇痛剂。

3. 尽管我的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数据是准确的，但美国和普鲁士—德国的资料却出现了问题。美国和德国(1871年后)的联邦政权其特定的收入——几乎是所有规定的关税和消费税——按法律转入了中央政府。然而它们的地方政府获得不断变换的资源，即在其他国家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能发现的资源。因此，把德国和美国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与其他国家的收入来源相比较，就会产生完全不真实的结果。我们也应该包括它们的区域性政府的数据。对德国我在表11.6中的解决方法就是继续计算1871年后普鲁士的收入(当普鲁士变成新帝国的一个区域性政府时)并把它加到被估测的构成联邦德意志国家收入的普鲁士上。这两个总数在附录表A.9中已被区分开来，普鲁士毕竟是1871年前地位重要的国家，1871年后它仍然囊括了几乎2/3的德国。在美国没有一个州政府能起到普鲁士那样的主导地位，因此我计算了已知州的人均收入数据，并把它们加到联邦政府的收入中。这儿涉及了一些估计的整体数据，因为在这一阶段早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保留了它们的收入统计。细节已在附录表A.11和A.12中给出。普鲁士—德国和美国这两种层次的政府大致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中央政府。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收入组合。这儿不能对差异作简单的、一般性的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预示收入来源。代议制的国家成形有助于解释收入优势——君主国更倾向于"国家财产"——但工业化

政权很显然拥有选择权和施加给它们的不同影响。除了美国偏离外，最为普遍的模式就是当国家财产在收入中的比例上升时，税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下滑。在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直接税收下降显著；间接税收减少的幅度要小多了。在英国和美国，直接税收围绕一个适中的模式上下浮动，并且间接税收下滑轻微(在美国仅处在边缘上)。下面我依次解释三种收入类型：

1. “直接税”经历了三个现代阶段，即分别由地租、财产税并最终(但只是在我目前的时期之后)由所得税所主导。地租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的直接税，对土地的整体规模进行征税和估定本地区的土地价值。大的土地所有者对他们自己和当地的农民进行评估。在更为商业化的英国和美国，繁荣的土地市场意味着其价值能被更精确地评估。所有的国家精英都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地主阶级，不会轻易让问题脱离他们的控制，因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土地所有者的合作和农民的顺从逐渐减弱。他们抗议说，由农业为国家提供资金，而工业却逃避责任，这是不公平的。贵族政党提出不祥的警告：要注意农民造反。他们被处处留意。英国地租在1816年被废除。略微落后的经济仍与地租并存，但收取的比率降低了——像奥地利的主要地租用于军事支出。现在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被迫转向其他方面。

他们转向对像房屋和工业建筑那样的财富象征征税。对像马车和仆人那样的奢侈物品在18世纪末试行征税，但这种收入几乎不值对其进行评估所花的费用。法国大革命极大拓宽了财产税的范围，达到了后来我们熟知的，从1799年一直持续到一战都未改变。“四种旧的财产税”指对不动产，对房屋的租用价值，对商业和专业的执照费以及对不动产的门窗的数目征税。其他国家也临时效仿了这些模式，但没有革命的冲击，他们从自己也根植其中的阶级中征得的税收少而又少。1900年前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增加了遗产税，在遗嘱证明的辅助下实施。美国实行了法人税，尤其是对那些受益于国家管理，像铁路和保

险这样的法人团体征税。法国征收的财产税最高，约占收入的 20%。其他国家就少得多了。这对他们的需要来说是杯水车薪。

不像大多数研究税收的历史学家那样(像 Weber and Wildavsky, 1986, ch.6)，我对所得税一提而过，因为它对总收入的贡献不大。美国内战时期的政治家对所得税期望值很高，但其收入少得可怜，并且不久即被宣布为非法。只有在 1911 年后它才开始得到永久恢复。英国政府从皮特 1799 年的方案起，拥有众多的所得税方案(Levi, 1988, ch.6)。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得税高到极致，几乎提供了全部收入的 20%。它在 1816 年被废除，1842 年被皮尔适当地作了恢复，此后断断续续地得到扩充，并被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德国所效仿。

在财产税真正平稳增加时，所得税却收效甚微。他们即使对某些财产来源和超高水平的收入征收的税率也很低。所得税是自我估价的；纳税者通过发誓，将自己的财产列人卷宗交给地方行政长官。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有产阶级感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民族”而战时，是有成效的，但这种办法在和平时期就不奏效了。个人所得税评估起来也很困难。除了政府的雇员，它不能直接从其收入中扣除，除非按正规计算的工资和薪水雇佣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人的所得没法被估价，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有正规记录的个人收入。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丹麦除外)所得税仅是对少数有家产者征收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战后(Kraus, 1981, pp.190—193)。

表 11.6 表明只有英国和美国的直接税几乎自始至终都维持了同一水平。但它们的起始水平是很低的。随着其他国家水平的下降，除了普鲁士已终结外，1910 年所有国家的水平都不相上下，维持在总收入的 27%—44% 之间。但如果我们继续看下一年，即 1911 年，我们会发现英国的直接税突然由总收入的 27% 上升到 44%。这种激增源自劳合·乔治对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极力扩充，这是法国大革命后第一次有意识的努力，即对富人征收重税。自由党代表着一个混合的阶级—宗教—区域的利益，倾向于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他们日益增长的支出主要来自递

增的直接税，而不是由关税或销售税组成的递减的间接税(Hobson, 1991)。美国进步党也寻求类似的改革，尽管没有成功过。

一个改良主义的政权策略只会出现在一些政党民主派中，它体现了重新分配的所得税。如果不总是政府实施管理干预，它后来会主导政府理论。当所得税的实际收集被官僚化和合法化时，国家收入就和社会再分配一样，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形式。这将发生在“一战”期间和“一战”之后，显示了国家基础权力可观的增长。

但有一点除外，即直接税在19世纪的国家中并不盛行。社会不再是农业的，但也没有完全成为工业化。对农业征收的直接税少得可怜，工业也不可能榨出更多的油水，因为它仍然没有带来足够的可计算工资和有薪水的雇员。进一步说，工业化时期对富人征收直接税从技术上更容易，但富人控制着国家，他们不愿对自己征税。

2. 政权采用“间接税”后，农业国传统递减的主要支柱，能否走出他们深陷其中的征税负担的泥潭呢？关税和消费税是对可看得见的运输过程中的货物和在边境、港口和市场——在这些农业国拥有基础权力的地方——的货物征得的税收。但即使在这些地方征收技术也仍然是简单而特殊的。间接税至少有一半自始至终地来自少数货物，通常是盐、糖、烟草和酒精。后两种货物的存在为道德所不容，对其征税那时是(并且现在仍是)合法的，因此比较容易推行。这种税收通常得到更为普遍的关税收入的补充，尤其对进口食品原料的征税。间接税因此不成比例地聚焦在生计商品和非常普遍的麻醉剂像酒精和烟草上。它们是递减的，对城市贫民的征收尤为困难。18世纪的国家在财政上是保守的，尤其是商业繁荣的荷兰和英国，其收入的70%来自间接税(Mathias and O'Brien, 1976)。但十年革命使得有产“阶级”对“民众”反对生计商品高价格的暴乱心怀恐惧。这激发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得税的随之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1848年，统治阶级永远扔掉了这个负担。间接税在世界各地都下降了。

因此各国是否陷入了它们传统财政困境的一个更为紧张的局面——

去离间支持它们的有产者或被它们排除在外的民众，去冒来自内部的政变或来自下层革命的危险？ 然而，幸运的是，他们手头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总支出的相对下降，另一个是第三种收入类型的增长。

3. “国家”财产包括来自王室或国有化财产或出卖政府特权和垄断权的收入。 传统上，这种财产普遍包括王室主宰的土地，并得到合法收费和出卖特权的增补。 这些税收从相对意义上来讲(有时也是绝对意义)大大地减少了，而美国联邦政府 19 世纪中期从它独一无二的出售所谓的“处女”地的能力中获益匪浅——印第安人被粗暴地排斥在了土地所有者的行列之外。

但国王的权利能被现代化和扩大化。 费用能被征收，垄断和特权能被认可，然后假定管理的经济和职业扩张的范围从银行、保险业和运输服务到医药、建筑和法律服务是“秩序井然”的。 这种国家税收的削减被用一系列的印章和邮票进行了隆重纪念。 这种收入有时与对法人征收的间接税相重叠(是我把一项收入条款的分配归人这一类或那一类，即直接税和国家财产，有时也是任意的)。 国家财产的其他形式是极易区分的。 国家的邮政垄断能产生一部分利润。 然后我们必须加上传统的独特性，即私有财产只统治了“活人”本身。 国王的权利包括在矿业和港口利润的份额。 日益膨胀的采矿业和航运业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不论有无全部的国家所有权。 国家的公路、运河、尤其是铁路也带来了收费和交通费。 19 世纪早期运河在美国某些州的收入中占主导地位；后来铁路几乎在世界各地举足轻重。 这些新扩张的国家职能大部分是有用的，不仅没有争议，甚至是受欢迎的。 在收入方面他们有优势，即能养活自己，甚至能产生利润。

各国所有收入都来自它们的财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国家受益最多的是国有及运行中的铁路和其他的工业(通常是采矿和其他通讯工业)。 铁路是最大的造币机器，普鲁士是它们主要的剥削者，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实际掌管了所有的私人铁路。 1911 年，普鲁士从它铁路所有权中的获益不少于收入的 58% 和全部收入的 47% (包括它的帝国收

人)。弗雷姆德林(1980：38)认为普鲁士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家，然而却有着一个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利润”概念。货物和乘客率受到财政、政治目标的影响，尤其是避免涉及到与普鲁士或帝国立法当局谈判的直接税或间接税。

美国和英国对国家财产的依赖较少。它们很难用自由贸易的经济哲学和政党民主解释这一点。后者意味着它们在收入来源上没有政治优先权，对国家财产的征税像所有的征税一样，需要征得议会的认可。然而这在二元制君主国家和(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更为集权下经济统制的法国却并非如此。在普鲁士对收入的选择总是政治与技术并重的。如理查德·梯利(1966)所强调的，直接税、间接税和借债暗示着国内社会某些有组织机体的同意，这是政权乐意避免的。国家财产提供的是“隔离”的财政资源。但奥地利政府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被迫在19世纪50年代末大量出卖其铁路网络来获取现金。专制的俄国获得了更多的收入隔离：到1910年，1/3的收入来自铁路，1/3的收入来自对酒销售的垄断(Hobson, 1991)。

国家财产在君主国有着很大的魅力。对国家精英而言，它提供了潜在的自主财源；对政党来说，它产生的财政麻烦比税收要少得多。代议制定型的确预言：政党民主国家在收入类型上不存在政治优先权。而其他政权比较偏爱这一点，有时占优先地位的就是国家财产收入，因为它为平民社会提供了隔离的权力。君主国已找到缓解税收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各国摆脱了数个世纪以来刺激代议制斗争的财政危机。主要是在有着繁荣经济、并能平稳增加流通的和平时期，它们被要求执行新的国家职能，通常能养活它们自己，有时能获取大的收益。对代议制的驱动并没有走到尽头。随着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相当多的阶级，它又怎么会走到尽头呢？但它已丧失了传统的财政来源。它会发现新的来源，但与此同时在19世纪末已发生了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减轻税收的问题。

民事和军事人员与官僚政治

在向前向上的历程中用来衡量国家规模的另一个标准是政府人员的数量，但那要预先假定我们——或者事实上是这一时期的各个国家——能计算它们。国家能否计算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计算其官员数量，它就不可能被称得上是官僚政治的。表 11.7 包含着我所发现的这种人员的总数。尽管是不完整的，尤其是在民事部门就业方面，然而与以前的所有汇编相比，它们都更接近于完整。

各国至少知道其军队的规模。可用的数据有三种类型：最小的数目包括野战集团军和作战海军；最大的意味着“纸上力量”，或者那些在理论上能被动员的；中间数目表明那些实质上能用作所有军事目的的(如不仅指战斗部队)。我努力估计这种中间数目：实际上在任何时期都有严格军事纪律的作战力量——野战集团军、驻军、指挥部参谋人员、补充人员，如果能实际动员的话，还包括预备役部队和服兵役人员(这在英国的资料来源中“体现出来”)，加上海上和港口里活跃的海军人员和补充组织。

我没有把纸上力量和预先估计用作从议会提取资金的目的。土地登记簿基本线索的纸上力量实质上导致了对奥地利军事力量的过高估计，并且依赖预先估计导致了对英国军事力量小的误差(这些曾被用过，例如 1983 年被 Flora 用过；1988 年被 Modelski 和 Thompson 用作截至 1820 年的海军资料)。我排除了那些实际上没有应征入伍的兵役适龄人员和预备役人员，但包括那些在国外服役的国民，包括那些在殖民地的军队，也包括了按人数拨款的欧洲雇佣兵。这对 18 世纪的英国来说尤为重要，它的相当多的黑森和汉诺威的军队有时被忽略了。但我没把从殖民地招募的军队计算在内。因此，例如，英帝国全部的武装力量比我提供的数据要多一些，但它们在帝国人口中的比例却少得多。在

这个例子中为镇压印度而必须维持的小规模军队与它两亿的人口比起来，英国的军国主义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相比，对英国的军国主义就严重低估了。军事资料的可靠性和合理性为了比较目的而言是好的。

民事部门人员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表 11.7 中最为重要的优先研究发现是，没有一个国家知道公共官员的数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与这些数据相比，综合档案会发现更多的数据，但它们仍然不会是公共官员的总数。我的早期数据，除了法国之外，仅是由中央政府计算的官员数量。对那些少得离谱的数据，我并没有包括它们。因此普鲁士政府对 1747—1748 年间和 1753—1754 年间的记录，使得约翰逊(1975，附录一)得出结论，约有 3 000 人被国王和大臣们认为对他们负责。这的确测量了普鲁士的“行政机构”，但这在普鲁士所有执行公共职责的官员中仅是一小部分。1804 年，在普鲁士王室工作的官员也远少于 27 800 人(Gray, 1986, p.21)。普鲁士的平民政府因此包含一个小的行政核心，由中央控制；一个分权的王室领地管理部门；一个无法控制又不可知的大的行政中间地带。前两者可能被潜在地隔离到平民社会之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第三者则被完全融入了平民社会。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把普鲁士称作“官僚政治的”，这是很荒唐的。(我将在第十二章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奥地利(与瑞典一样)是第一个产生职业统计的国家，包括官员统计，这发生在 18 世纪中期。然后，约在 1800 年前后，美国和英国也开始统计计算中央政府官员。所有的统计仅限于一定层次以上的全职官员。我表中的法国数据与此不同。它们是目前的历史学家对所有执行公共职责官员总数的估计，比任何国家的当代数据都要高。如果我们对其他的国家作这种估计，同样也会得出更高的数据。例如，表 11.7 中英国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数据并不包括地方的土地税征税官员，只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据估计约在 2 万到 3 万之间，比民事服务人员的统计总数多(Parris, 1969, p.22)。在法国，财政部长内克尔估计有 25 万人帮忙征税，但猜测——承认没有精确记载——仅有约 3.5 万人

是全职的，依赖这一职位谋生(1784, pp.194—197)。只有随着19世纪中期的官僚化(后面讨论)，大多数公共官员才是可统计的。

政府就业的概念和因此而起的官僚机构的概念，在19世纪末之前是不适用的。谁“主宰”着政府？政府精英包括那些在部、局工作的少数高层官员，首都的委员会，再加上一些重要的地方官员。朝臣也处于政府的心脏，就像宫廷是大多数首都的中央政治机构一样。然而朝臣很难成为政府的雇员。他们是享有特权的贵族，与其委托人一道，因世袭而得到其职位。我们称之为“地方的国家精英”包括某些拿薪水的官员，尽管不必非得是薪水最高的官员。这些人或许是充当和平法官的兼职地方名流，朗拉特、麦雷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是这些人“主宰”着政府吗？是半自治合作组织的成员如像法国议会中的法官“主宰”着政府吗？这儿不确定的普遍因素是：那些在地区和地方层次上正常行使政府主要民事职责的根深蒂固的地方名流能否真正地“主宰”它。他们几乎都是兼职官员，然而他们的职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答案显而易见，当国家行政管理如此直接深入到它们的平民社会时，谈到“它”仅是一个有限意义的政府。“政府”并不是一个协调精英的整体，与平民社会明显不同。“它”是不存在的。

“政府雇用”的范围在低层次上也是模糊的，并且这持续的时间更长。常规的手工任务和职员任务是由全职临时工完成的，开始时他们不被列入官员记录之内。18世纪组织最好的政府机关可能是英国的间接税务部。1779年，它的中央机构几乎雇用了300名全职官员。但也就在那一年一份文件出其不意地揭露了还有1 200多名职员临时工(Brewer, 1989, p.69)。特威利尔(1976：11—15)指出：直到1899年，财政部中的临时工仍几乎与正式官员数量不相上下。尽管到那时他们已被计算在法国的统计之内(并且表11.7也反映了这点)，然而他们是何时进入官方统计的仍不清楚。范·里珀尔和沙伊伯(1959, pp.56—59)推测，美国的官员人数到1816年约低估了50%，在这一阶段的其他年份约低估了25%。

低估对女性公共就业的增长也是模糊的。在该世纪末，多数临时工是女性，但她们的增长仍然不清楚。到1910年，女性在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雇员中占半数，而在法国和奥地利仅占1/4。这种差异是真的吗？该时期法国大多数的详细人口统计证明并非如此。这显示了女性公共就业突然出现了一次中断。1891年，在政府就业的女性逐渐增至33.3万人，然后在下一次普查中，即再次稳定增长之前的1901年，骤减到14万人。这或许是一次虚假的人为差异，即突然排斥兼职雇用和学校教师的结果。在这一时期对女性就业的调查估计通常是不可靠的。鲍斯(1987)重新分析了美国1900年的人口调查手稿，估计官方的统计数据，即女性在政府就业中占20%，应该被翻番甚至更多。如果不对每一个国家准确的人口统计程序、工作组织和性别作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我们就不能确定总的趋势。

我的早期数据来自有限的计算训练——其中两个德意志国家被称为公职人员，法国被称作法国政府——被国家统治集团正式雇用的官员和准职业身份的男性(除了在公职人员中计算的独立的专业人员)。随后19世纪中期后的计算能力拓展到了区域性政府且向下到了手工工人和小职员。约到了1890年，事实上所有那些执行政府公共职能的人——除了在低层次和女性就业中相互叠加的范畴——都被计算在人口之内。表11.7也是如此计算的。随后的民事官员的增长几乎可以被看作是真实的。

因此我们不能用浅显明了的方式解释这种上升的民事就业趋势(像大多数作者所做的那样，如 Anderson and Anderson, 1967, p.167； Flora, 1984； Grew, 1984)。这种绝对成比例的趋势看似是显著上升的。然而计算能力也是在加强的。只有1870年以后的上升才显然是真实可靠的。它在那时上升迅速，尤其是在区域性政府方面。这进一步促成了由支出得出的结论。在19世纪末，政府的民事活动增长是实质性的。在此之前，其增长的真正规模远不及对官员进行统计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本身是重要的，它反映了全职政府就业方面的真正增长。政府

现有官员在其领土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分散在5%—10%之间，应对他们在地方、地区或中央政府的上级负责(并可被统计)。除了美国之外，有时也不包括奥地利，他们在这种层次之间联合也是相当可观的。各国现在处于潜在地根植于“国家忠臣”的广阔覆盖下，其独特的政治性我将在第十六章探讨。

军事倾向则非常地明晰。除了美国之外，最高的武装力量，无论是从绝对意义还是从人口比例来看，最早出现在拿破仑战争或七年战争中。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内战时期之外都非常少。然后在内战时期达到了与其他国家持平的比例：占北方人口的4.3%，南部同盟的3.7%，除黑人奴隶之外南部同盟的7.1%。(几乎没有黑人奴隶参加南部同盟的武装力量。)[3]这种扩张与民事政府的就业是平行的。联邦州在1860年有3.7万名官员。到1861—1862年，两个交战联盟的官员达到约17万人(Van Riper and Scheiber, 1959, p.450)。就这一方面而言，美国内战既像早期的欧洲战争(它没有导致民事官员的急剧膨胀)，但它可能更像一战。

表11.7　奥匈帝国、法国、英国、普鲁士—德国和美国的政府就业，1760—1910年(在全部人口中的百分比)

	民事部门										军事部门				
	中央政府					所有层次									
年份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1760	0.06		0.26			0.17					1.66	1.78	2.36	4.14	
											1.17	0.82	0.58		
1780	0.05						1.29				1.41	0.89	2.76	3.76	
1790					0.02		1.01				1.52	0.85	0.97	3.42	0.02
1800			0.18	0.37	0.04		0.91				1.35	2.93	4.91	3.73	0.12
1810			0.24		0.05	0.12					2.38	3.66	5.30	3.88	0.16
1820			0.22		0.07								1.02	1.33	0.16
1830	0.35		0.17		0.09	0.37					1.38	1.23	1.01	1.15	0.09
1840	0.37	0.26		0.11+	0.11	0.41		0.29			1.56	1.02	1.10	1.05	0.13
1850	0.40	0.41	0.24	0.20+	0.11	0.45	0.84	0.41	0.33		1.56	1.09	1.20	1.04	0.09
1860					0.12	0.57		0.41	0.47		1.60	1.23	1.74	0.82	0.09
1870		0.60		0.55	0.13	0.50	1.11	0.53	1.15		0.86	1.66	1.14	0.98	0.13

(续表)

年份	民事部门										军事部门				
	中央政府					所有层次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奥匈	法	英	普—德	美
1880		0.87			0.19	0.53	1.53	0.46	1.56		0.73	1.40	0.96	0.96	0.07
1890	1.06	0.91	0.32		0.25	2.92	1.83	0.99	1.70		0.79	1.47	0.96	1.07	0.06
1900	1.14	1.10	0.40		0.31	3.30	1.80	1.66		1.36	0.88	1.59	1.51	1.12	0.17
1910	1.17	1.40	0.64		0.42	3.15	2.14	2.60	1.57	1.68	0.86	1.65	1.04	1.05	0.15

关于来源和脚注，见附录表 A.1—A.5 包含的各国独自的数据。

军事数据的可靠性使得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并且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普鲁士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时期，然后在德意志帝国后期部分复兴之前衰落了。与盛行的自由模式相反，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竭尽全力发展欧洲最高水平的军事动员。从那之后，法国也倾向于在比例上保持最大的武装力量，奥地利则在欧洲强国中拥有的军事力量最小。如当代人所意识到的，奥地利落后于其对手的军事动员，表明了其作为一个一流强国的衰落。

这些数据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用被承认有效的不精确数据，能确定财政趋势。尽管我们不能肯定民事就业的本质，但国家就业总的增长再次被证明不比其国内构成的变化更为显著。军事就业下降剧烈(美国除外)，民事就业在这一阶段的早些年里在形式上是增长的，在以后的年份里在本质上是增长的。这与支出数据是相吻合的。第二，把对官员的统计能力作为官僚化的一个最低层次，这对军事国家来说在1760 年就已达到了，但对公民国家而言至少到另一个世纪才开始实行。

临时性的结论

我证明了现代国家生活中两次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8 世纪的国家在与它们的平民社会有关的方面突然变得规模宏大。我们是否认

为19世纪的国家是增长的取决于所用的衡量标准。支出以金钱的标准来看增长飞速，如果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那么其增长就比较和缓。但这一时期与平民社会有关的增长，在多数国家实际上衰落了。漫长的19世纪更多的是私人经济增长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是国家扩张——除非战争的强加影响。然而这掩盖了第二次剧变——在国家本质方面两次伟大的19世纪的转变：

1. 国家职责从它们狭隘的传统军事定型转向三种扩大的民事职责。最伟大、最统一的是提供了新的物质和象征性的通讯基础设施。第二种尤其在君主国和后来的工业国中出现，即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干预增强。第三种也是最近的一种，在这一阶段末的某些经济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发现，即提供了社会福利的现代方式。这三种扩大的民事职责一起清楚地表明向一个新的双重职能即半军半民国家的转变。

2. 我只是临时提出了第三种戏剧性的转变。国家在这一时期变得极其官僚化，但早期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军事而不是民事行政管理上。官僚化减少了直接的职位安插。这会被更间接或许是更民主的渗入模式所取代吗？或者官僚化会导致一大批国家忠臣从平民社会分离出来吗？在民事和军事政府机构中相同的模式会是如此明显吗？

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向前向上的理论所阐述的相比，是一个更为错综复杂、各不相同的进程。一个财政准确性较少、默契性较多的政府出现了。但这种总趋势是通过三个不同的进程体现出来的：一个相对下降但却变得更为明显的专业化、官僚化，并且是潜在性的军事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分离；官僚化的发展，首先是在政府的军事方面，然后是在民事方面，并且一个民事政府或许会默契地拓展了其范围，这些分别是下边三章的主题。

注释：

[1] 这些数据与霍布森计算的军事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是相似的：法国占4.0%，德国占3.3%，英国占3.0%，美国占1.1%，俄国的比例在3.5%—3.8%之间。

[2] 政府收入最普遍的历史是由韦伯和怀尔达夫斯基(1986)作出的。他们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了这一时期。也见阿丹特(1975)和沃伊廷斯基和沃伊廷斯基(1955，pp.713—733)。然而他们的收入数据都不如这里给出的全面和可靠。霍布森(1991)给出了1870—1914年间最为全面的收入分析。

[3] 内战的数据来自库尔特(1950，p.68——人口)；克赖德贝格和亨利(1955, p.95——实际上在1865年服役的联邦军队)；利弗莫尔(1900，p.47——1864年服役的联邦军队，约有80%的入伍者处于备战状态中，像在联邦军队中一样)。这些是随时准备入伍的人员。很显然，从某一点来看内战期间入伍比例是非常高的。

参考文献

This bibliography includes references cited in the appendix tables. It excludes official statistical sources adequately described in notes to the tables in this chapter or in Appendix A.

Abramovitz, M., and V.Eliasberg. 1957. *The Growth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Great Brit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ddington, L. 1984. *The Pattern of War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lbrow, M. 1970. Bureaucracy. London: Pall Mall Press.

Anderson, E., and P.R.Anderson. 196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ic, S., and J.Veverka. 1963—4.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Germany since the unification. *Finanzarchiv*, N.F. 23, 2.

Ardant, G. 1975.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s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an, R. 1973.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Beer, A. de. 1871. *Die Finanzen Osterreiches*. Prague: n.p.

Beer, S. 1973.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is *Patterns of Government: The Major Political* Systems of Europe. New York: McGraw-Hill.

Blanning, T. C. W. 1974.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ainz, 1743—180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k, M. 1875.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Comparée avec les Divers Pays de l'Europe*, 2nd ed., 2 vols. Paris: Guillaumin.

Bolognese-Leuctenmuller, B. 1978. Bevolkerungsentwicklung und Berufs-struktur, Gesundheits- *und Fursorgewesen in Osterreich, 1750—1918*. Munich: Oldenbourg.

Bose, C.E. 1987. Devaluing women's work: the undercount in employment in 1900 and 1980. In *The Hidden Aspects of Women's Work*, ed. C.E.Bose et al. New York: Praeger.

Brandt, H-H. 1978. Die Osterreichische Neoabsolutismus und Politik, *1848—186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Brewer, J.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London: Unwin Hyman.

Bruford, W. H. 1965. *Germ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Literary Re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low-Cummerow, E. 1842. *Preussen, seine Verfassung, seine Verwaltung, sein Verhaltnis zu Deutschland*. Berlin: n.p.

Chandler, D.G. 1966.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Church, C.H. 1981. *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rvisier, A. 1979.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Coulter, E.M. 1950.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1—186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rafts, N.F.R. 1983.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zoernig, C., Freiherrn von. 1861. *Statistisches Handbuchlein fur die Oester-reichische Monarchie*. Vienna: K.K.Hof-und Staatsdruckerei.

Davis, L. E., and R. Huttenback. 1986.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L.E., and J. Legler. 1966. The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15—1902: a quant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Deane, P. 1968. New estimates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1830—1914.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3.

Deane, P., and W.A.Cole. 1962.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lorme, R., and C.André. 1983. *L'Etat et L'économie: Un essai d'explication de l'évolution des dépenses publiques en France (1870—1980)*.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Dickson, P.G.M. 1987.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ull, J. R. 1975.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Arms and Diplomacy, 1774—178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peux, G. 1976. *French Society, 1789—1970*. London: Methuen & Co.

Eckstein, H. 1982. The idea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rom dignity to efficiency. *World Politics* 35.

Fabricant, S. 1952. *The Trend in Government Activity Since 190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iner, H. 194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2nd ed. New York: Holt.

Fischer, F.W., et al. 1982. *Sozialgeschictliches Arbeitsbuch*. Vol. 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Munich: Beck.

Flora, P. 1983.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2vols. Chicago: St. James Press.

Fortescue, J.W. 1915.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13 vols. London: Macmillan.

Foucault, M.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London: Lane.

Fremdling, R. 1980. Freight rates and state budget: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Prussian railways, 1880—1913.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9.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ldsmith, R. W. 1987. *Premodern Financial Systems: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stone, J. 1991. *Revolutions and Rebell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atz, A. 1949. Die österreichische Finanzpolitik von 1848—1948. In *Hundert Jahre o Wirtschaftsentwicklung, 1848—1948*, ed. H. Mayer. Vienna: Springer Verlag.

Gray, M. 1986. Prussia in transit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Stein reform ministry of 1808.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6.

Grew, R. 1984.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state.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C.Bright and S.Hard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ampson, N. 1959. *La Marine de l'an II: Mobilisation de la flotte de l'Océan, 1793—1794*. Paris: M.Rivière.

Hansemann, D.J.L. 1834. *Preussen und Frankreich: Staatswirthschaftl. u. polit., unter vorzuegl. Beruecks. d. Rheinprovinz*. Leipzig: n.p.

Heitz, W. (ed.). 1980. *Quellen zur Deutsche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i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Reichsgrundung*. Darmstadt: Wiss. Buchgesellschaft.

Higgs, R. 1987.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J. 1991. The Tax-seeking State. Ph. 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ohorst, G., et al. 1975.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unich: Beck.

Holt, C.F. 1977. *The Role of State Governmen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conomy, 1840—1902.* New York: Arno Press.

Janetschek, K. 1959. Die Fiananzierung des Siebenjahrigen Krieges. Ein Beitrag zur Finanzgeschichte des 18. Jahrhundert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enna.

Jany, C. 1967. *Geschichte den Preussischen Armee*, 4 vols. Osnabruck: Biblio Verlag.

Johnson, H.C. 1975.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ien-Lafferrière, F. 1970. *Les députés fonctionnaires de Fr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Kausel, A. 1979. Osterreichs Volkseinkommen 1830 bis 1913. In *Geschichte und Ergebnisse der Zentralen Amtlichen Statistik in Osterrich 1829—1979.* 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Vol. 550.

Kennedy, P.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Debat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 125.

Kennett, L. 1967. *The French Armies in the Seven Years'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Kraus, A. 1980. *Quellen Zur Bevolkerungsstatistik Deutschlands, 1815—1875.* Boppard am Rhein: Harold Boldt.

Kraus, F. 1981.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 P.Flora and A.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Kreidberg, M., and M. Henry. 1955. *History of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Department of the Army.

Kunz, A. 1990. The state as employer in Germany, 1880—1918: from paternalism to public policy. In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ed. W.R.Lee and E.Rosenhaft. New York: Berg.

Legler, J.B., et al. 1988. U.S. city finances and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1850—190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90. Growth and trends in U.S. city revenues, 1820—1902.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eorgia.

Leineweber, N. 1988. *Das säkulare Wachstum der Staatsausgab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Levi, M. 1988.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évy-Leboyer, M. 1975.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histoire de l'administration. *Histoire de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Depuis 1800* 23.

Lindert, D. H., and J. G. Williamson. 1982. Revising England's social tables, 1688—181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

1983. English workers' living standard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new look.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6.

Livermore, T.L. 1900. *Numbers and Losses i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 1861—6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ynn, J. A. 1984.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1—9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cartney, C.A. 1971.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addison, A. 1983. Measuring long term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on a macro-economic level. In *Productivity in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ed. R.Fremdling and P.K.O'Brien. Munich: Klett-Cotta.

Marczewski, J. 1965. 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 Cahiers de Institut de Science Economique Appliquées I, no.163.

Marion, M. 1927.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 6 vols. Paris: Rousseau.

Markovitch, T. 1965.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Paris: 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e appliqué.

Marx, K. 1968.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Selected Works*, K.Marx and F. Engel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sson, P. 1968. *Napoléon et la Marine*. Paris: Peyronnet.

Mathias, P., and P. O'Brien. 1976. Taxat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Miliband, R. 1969. *The Capitalist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ischler, E., and J. Ulbrich. 1905. *Osterreichisches Staatswörterbuch*, 2nd ed., 5 vols. Vienna: Hölder.

Mitchell, B.R. 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Detroit: Gale Research.

Mitchell, B.R., and P.Deane. 1980,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delski, G., and W.R.Thompson. 1988.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orineau, M. 1980. Budgets de l'état et gestion des finances royales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263.

Mühlpeck, V., et al. 1979. Index der Verbraucherpreise 1800 bis 1914. In *Geschichte und Ergebnisse der Zentralen Amlichen Statistik in Osterreich 1829—1979. 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550.

Necker, J. 1784.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France*, 3 vols. Paris: n.p.

O'Brien, P.K. 1988.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120.

Parris, H. 1969. *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Allen & Unwin.

Peacock, A.T., and J. Wiseman. 1961.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ggi, G. 1990.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rochnow, P. M. 1977. Staat im Wachstum Versuch einer finanzwirtschaftlichen Analyse der preussischen Haushaltsrechnungen, 1871—1913. Ph.D.diss., University of Munster.

Rasler, K., and W.Thompson.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tax revenues, and global wa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Riedel, A. F. 1866. *De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 Staatshaushalt in den likten beiden Jahrhunderten*. Berlin: n.p.

Riley, J. C. 1980.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Dutch economy after 1650: decline or growth?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3.

1986.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thenberg, G.E. 1978.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cott, S.1978.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geborski, M.L., de. 1843. *Des Finances et du Crédit Public de l'Autriche, de sa dette, de s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et de son système d'imposition, avec quelques rapprochements entre ce pays, la Prusse et la France*, 2 vols. Paris: Jules Renouard.

Therborn, G. 1978.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Thuillier, G. 1976. *Bureaucratie et bureaucrates en France au XIX e siècle*. Geneva: Droz.

Tilly, R. 196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russia, 1815—186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Todd, R.C. 1954. *Confederate Financ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Turner, R.S. 1980. The Bildungsbürgertum and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in Prussia, 1770—1830: the origins of a class. Histoire Sociale-Social History 13.

U.S.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Bicentennial Ed., Pt. 2. Washington, D.C.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1947. *Annu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an Riper, P.P., and H.N.Scheiber. 1959. The Confederate civil servic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5.

Veverka, J. 1963.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1790.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

Vivien, A.F.A. 1859. *Etudes administratives*, 3rd ed. Paris: Guillaumin.

Vries, J. de. 1984.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Dutch economy, 1675—1900.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3.

Wagner, W. 1987. Armee-Gliederung und Aufgabenstellung, 1848—1866. In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848—1918*. Vol. 5: *Die Bewaffnete Macht*, ed. A. Wandruszka and P. Urbanitsch. Vienna: Verlag de Osterreichischer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r.

Webber, C., and A.Wildavsky. 1986. *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eitzel, O.1967. Die Entwicklung der Staatsaugaben in Deutschland.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nberg.

Wolfe, A. 1977.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Woytinsky, W.S., and E.S.Woytinsky. 1955. *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s: Trends and Outlook*.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Wrigley, E.A., and R. Schofield. 1981.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ysocki, J. 1975. *Infrastructur und wachsende Staatsaufgaben. Das Fallbespiel Osterreich, 1868—1913*. Stuttgart: Fischer.

第十二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二)：军事权力的自治

从第十一章我们可以得知，自1760年至1910年之间，军事活动左右着国家的职能，并且消耗了国家一半的资源。事实上，到1914年，甚至是整个20世纪，军国主义依然处于现代化国家职能的中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缘政治和社会和平思想主导着西方社会，这一特定时期导致了社会学对军事组织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性的忽视。本章则是介绍军事权力三大要素之间的总体关系，即谁控制着军队，军队的内部组织如何，以及军队的职能是什么。[1]

1. 关于"控制"问题，早在第三章讨论有关国家的主要理论时，就已涉及。军队是被统治阶级控制，是被多元化党派民主控制，还是由自治国家的精英所控制？或者军队可以摆脱外来的操纵，以一种"军事社会集团"的方式来实现制度上的自治？就本文所涵盖的不同时代、地区和政权而言，一个答案是远远不够的。

2. 军事组织包括两种体系(官兵关系与军队和外界各阶层的关系)和两个现代化进程(官僚主义化与职业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个观点："公民军队"的出现同时削弱了军队中的这两种体系(例如，Best，1982)。当然，军事组织基本是"集中强制性"的。士兵需要有强制性的纪律，以使他们能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消灭敌人。大多数的军队都有着严格的纪律制度。因为在这一时期，多数军队是以有序的兵团和运动作战。所以，军事等级制度便被异常地突出出

来。军队是部门性的权力组织，是经常用来镇压平民阶级和大众意愿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军事组织已经发生变化。它被官僚化地并入国家机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自身制度上自治权的终结。而是在阶级和国家官僚主义的困扰下，实现了职业化。

3. 军事职能一旦被国家垄断，就会成为我所定义的国家的“军国主义结晶体”。这包括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地缘政治，即进行对外战争；另一方面是指国内，即镇压不满分子。这两方面虽然都还存在，但也有所改变。

总之，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且相互矛盾的趋势：尽管在形式上，军事权力被纳入国家，尽管国内公民权已广泛增加，但是，在这一时期，军事集团的自治和部门性权力也在增长。这既对西方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也造成了一定危害。评论家曾问我，为什么要将政治与军事权力分开？（例如，在几次友好的争论中，Runciman，1987 和 Erik Wright 都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已经被分开，并各自独立，而且还带来了破坏性后果。本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西方军事力量为了一个显示权力的“世界性历史时刻”而在不断地加强自己。

职能：1. 国内军国主义

为了维护国内秩序，陆军和少量海军基本上留驻在国内。然而，这一时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地变化。[2]我把国内的镇压程度划分为四个级别。最低的级别是一个国家不采用任何镇压措施，而是通过调解、仲裁和仅仅劝说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秩序问题。很明显，从未有一个国家曾完全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所有手段就会偶然地或者是常规性地演变成为镇压。第二级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维持治安——通过仅拥有简单武器并受过严格训练的武装力量与犯罪和骚乱作

斗争，无需诉诸军事力量。这几乎不是军队的职能。在18世纪，治安大多是由被正式委任并部分地受当地贵族控制的警察来维持的。甚至伦敦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由各教区拼凑起来的警察维持治安。但是，如果骚乱演变到第三级——暴乱，警察对此也会束手无策，常规武装部队、民兵和其他基本的准军事化组织就需要召集起来而显示力量了。

暴乱基本上是示威。当遇到更强大的军队与之对抗时，暴乱者通常会被驱散。权威人士可能仔细考虑相关的补救措施。这通常是暴力所获得的例行结果。如果这样也无法起作用，那么镇压就会上升到第四级，即全面的军事镇压。实际上这就是战争，通常使用正规部队。无论是政权还是军队都不欢迎这样的国家，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维持正常秩序方面是失败的。全面军事镇压的局势也是相对无法控制的。一旦开火，马队横冲直撞，骑兵挥鞭猛抽，暴动者和士兵都失去了控制，这或许只在一个有限的街区，也或许会蔓延到其他地方，都很难预料。这就可能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而政府通常的做法是抛弃作出镇压决定的官员。

从1600年到1800年，随着军队被国家从地方贵族和他们的家臣手中接管，大国都获得了更多的第三级和第四级的镇压权。此后，18世纪的专政权，在他们的首都，有时甚至是在全国，都增建起新型的准军事化警察机构。最著名的是法国骑警队，约三千名士兵由陆军部长直接指挥。18世纪80年代，在维也纳由一支三百多人的武装警卫队维持秩序。这些常规性准军事组织基本是一种威力的显示，他们的目的是进一步全面地监视并制止犯罪和骚乱(Axtmann, 1991)。对常备军持谨慎态度的立宪政权，发展了民兵组织，但是由地方贵族来统领，其地位略低于军队。

19世纪最主要的发展是出现了市政的、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警察。虽然这些警察既不像军队那样拥有大量的兵力的军工厂，也不具备军队那种能诉诸第四级别的潜力，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与军队不相上下。

他们不对军队或教区负责，而是对更具广泛性的市政当局负责。英国的警察力量处于一种极端状况：没有武装，除了在紧急情况下由伦敦进行协调处理外，一般是由自治市和郡区域性控制。在其他国家，市政警察组织和准军事化警察组织是同时发展的。在法国，保安局最初由巴黎人组成，对内政部负责；后来增加了市政警察力量和武装宪兵。武装宪兵是由骑警队发展而来，配有武器装备，对陆军部长负责。尽管从1900年开始，普鲁士的警察就正式与军队分离，并逐渐有市政控制，但是它仍保留了大部分的军事化特征。在美国，军队与逐渐演变成国民警卫队的各州民兵合作。而各州民兵则进而与地方警察局合作。这些形式各异的警察力量和准军事化组织意欲在第三级的镇压中取代军队。现在，军队专用于第四级的镇压，因为有其他警察力量密切协作，政府只有在爆发了严重有组织的暴力时，才使用军队。

当代社会学家解释说，这些发展状况是受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理论都占统治地位且相对温和。他们已深入了解了这些发展状况，特别是常规化警察力量的发展，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弥散性社会变革：通过常规化的警察和"内在化的纪律"，市民社会便获得了自身的"和平"。福柯(1979)论证说，社会的惩罚形式由权威的、公开的、特殊的、惩罚的以及暴力的特点转变成为弥散的、隐蔽的、常规的、惩戒的和内在化的。他的证据仅来自于各类监狱及精神病院。对于更加广泛的社会来说，这种说法有欠公允。然而，吉登斯(1985，pp.181—192)和丹德克(1989)进一步扩展了福柯的观点，他们认为更广泛的"惩戒性权力"必须通过公共和私人管理机构的记录资料及时间表来使之常规化，并实施监督。这些记录资料和时间表包括：工厂生产的日常程序，政府机关和会计工作的惯例，无处不在的时刻表，正式的成文法，经济市场的各种强制性因素(特别是自由劳动合同)，以及学校教育的监督惯例。在最初的紧张时刻，顽抗被约束为内在的屈服，直至演化为暴力。

吉登斯引用马克思的评论，即工业资本主义将"模糊的经济强制

力”引入到阶级关系中，以强调工厂的重要。这恰恰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者如安德森和布伦纳的观点。他们认为，鉴于历史的生产模式是通过暴力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经济过程本身做到这一点的。埃利亚斯(1983)在论述西方“文明化进程”的发展时，也强调了暴力偏离阶级关系的观点。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是隐蔽的、制度化的(尽管女权主义者坚持家庭暴力仍然存在)。我们不再统计数量，而是用精神分析法去治疗各种受害者。

无论是埃利亚斯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军队所产生的后果，但是吉登斯和丹德克注意到了。吉登斯声称：“它涉及……不是战争的减少，而是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外向’的军事权力主要集中指向其他国家”(1985, p.192)。梯利(1990, p.125)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作了补充说明，即在 20 世纪的第三世界并未发生类似的转变。第三世界的武装力量主要将大量军事力量用于对内解决自身问题。历史上的西方政治制度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抑制作用。梯利认为它与西方历史不同——西方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权力改革——从双重职能(战争／镇压)转变成单一职能(战争)，从而将军队从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

这一变革真的存在吗？事实上，它是真实的——但是其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首要原因却与福柯、吉登斯、丹德克以及埃利亚斯所引证的不同。他们的正确之处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除去一部分美国的内陆城市——社会秩序是以远远少于历史上大多数社会所存在的镇压情况来维持，这使得当代西方社会将主要的军队用于对外方面。但是，这种状况主要是在 20 世纪实现的，并且主要归功于另外两个权力的获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公民权，以及对劳工关系调和的制度化。尽管在这一时期，这些权力开始出现，但是它们主要是在 20 世纪实现的。事实上，主要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实现的。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公民权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并未得到实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中，军队仍是主要用于国家内部。[3]有证据显示，直到 1914 年，这些国

家既没有“惩戒”的办法，也没有将军队从国内的镇压中解放出来。

丹德克和吉登斯依赖两方面的证据资料来证实公开暴力的减少；一方面是当代对18世纪以小偷小摸、流氓作风和拦路抢劫为特征的描述，另一方面，是19世纪普通暴力犯罪的减少，例如格尔等(1977)可以证实这一点。尽管众所周知，犯罪统计资料并不可靠，但是暴力犯罪率的下降却可能是真实的(尽管会部分地被日渐增长的非暴力性财产犯罪所抵消，Emsley，1983，pp.115—131)。正如丹德克、福柯和吉登斯所论证的那样(埃利亚斯认为这一改革过程应开始得更早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日常秩序方面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友好和平，而这一改革的步伐开始于18世纪且历经了整个19世纪。然而，普通犯罪(相当于我对镇压程度所划分的第二级：治安)并不是18世纪的军队所需要关注的问题，除了在欧洲，那些仍然存在着有组织的盗匪的落后地区，小偷小摸和流氓行为是由那些警察、地方行政官员或者是地方贵族的家臣负责治理的。有时，这些行为甚至被视为社会的正常现象而得到容忍。只有在暴力行为升级到第三级，即有武装的暴动——主要包括粮食暴动、走私骚乱、劳资纠纷和反对强制性征兵的暴动(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叙述的)，军队和民兵才会被召集。

梯利(1986)以法国为例，对随后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他论述到，集体抗议并非减弱，而是发生了双重改变：从粮食暴动到工人罢工，从地方性组织到全国性组织——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在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这两方面都达到顶点，并开始制度化，以至于工会和政党的宣传活动不再遭受正规军的镇压。但是在1914年以前，情况则截然不同。罢工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常常遭到军队的镇压，与早期粮食暴动者的遭遇十分相似。在1830年、1840年和1871年，大约有1 000多名政治抗议者在与军队的冲突中被杀害。尽管后来的事件没有如此激烈，但是梯利说，在与军队的对抗中，几百人数十次在公共场所遭到逮捕并被关押超过一天。1905年至1907年，法国

发生了工人和农民的暴乱，临近结束时，军队所采取的逮捕行动是最大的行动之一。在1851年和1889年都发生过类似的突然逮捕行动(1889年以失败告终)。

梯利将19世纪称为“反叛的世纪”(1986，pp.308—309，358—366，383—384)。19世纪，法国武装力量在镇压方面的作用仍同1789年以前的那个世纪一样。另一方面，国家的某些部门也陷入了相反的另一种调解的极端方式。正如我们将在第十八章中所论述的，在世纪末的法国，受劳工部支持的县长和城市区长们一直试图在劳资争议升级为暴动之前使之缓和。法国国内军国主义是多元化的。

法国的历史独具特色，但它的暴力事件却并非如此。在美国，直到1860年，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掠杀印第安人；随后内战爆发，当大量重组的国民警卫队从镇压印第安人和奴隶转而攻占南方并开始驱散罢工工人和城市暴动时，被占领的南方充满怒火(Hill，1964：ch.4；Dupuy，1971，尤其p.76)。戈德斯坦(1978，pp.1—102，548)以文件证明，在美国，从1870年到20世纪30年代始终存在着“大规模和持续的”对劳工的镇压，包括屡次调动国民警卫队支援那些需要军队的地方。这一现象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有所衰退。但是，这种衰退是因为政府和资本家对劳工采取了双重策略——镇压公开的和社会主义的抗议，调和局部的，对杀害工人的抗议(参见第十八章)。即使有更多选择，美国国内的镇压仍是军事或准军事性的。仅仅是到了20世纪初，才有某些政府机构开始做劳资调和工作。

奥地利的暴力镇压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军队驻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要塞，并且每十年就要镇压数次民族纠纷。尽管1848年到1849年的革命没再出现反复，但是抗议和镇压都没有减弱的迹象。政府逐渐地更加依赖常规联合部队，而不是可靠性较差的地方准军事组织(Deak，1990，尤其pp.65—67)。无论奥地利还是普鲁士德国都几乎不存在真正的劳资仲裁。因而它们的军队也能够介入国内事务。刚刚跨进20世纪，德国的要塞和军事重镇就成为镇压暴动的主要目标。从

1820年开始，德国地方军的司令官就有权在没有市政当局要求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介入市政事务(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两者都是共同行动的)。在1913年臭名昭著的察贝恩事件中，这种情况达到顶峰。在这一事件中，一个地方军上校专横地驱散示威者并囚禁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这个上校因此受到军法审判——但他被宣布无罪，而且维护了他专断的军事权力。在德国历史上，军队介入政治的情况长期存在。1909年，荷枪实弹、上有刺刀的士兵仍在胁迫罢工的矿工。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军队极少真正大量地使用暴力。通常，一种基本是准军事化力量的仪式表演就已足够了(R.Tilly, 1971；Ludtke, 1989，尤其是pp.180—198；也可参见本书第十八章)。

在大多数国家，虽然军队的镇压职能依然存在，但新式警察和准军事化当局也同时发展起来——在党派民主的国家也最终实现了对阶级冲突的国家调解。因此，对于中等程度的骚乱，军队已不再被经常使用。虽然暴动仍像20世纪时那样频繁发生，但政府已拥有更多的镇压方式，特别是针对那些真正有威胁能力的暴动。几乎没有什么政府或军队司令总是喜欢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并开枪射击。只有俄国政府和军队才经常这样做；也仅是在美国，由于它所具有的个人或地方暴力传统，才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参见第十八章)。军国主义镇压仍具有三种传统形式——首先是存在，其次是显示其存在，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真正使用暴力——但是现在它已增加了更为广泛的含义。

事实上，英国的历史才真正具有特色，是军队镇压逐渐减少的明显例证。在18世纪，和平时期的军队有10 000—15 000人之多，屡次用于镇压暴动，最严重的事件是1780年的戈登暴动，当时震惊世人，共有285人在此次事件中被杀。在法国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作好了镇压准备，它们多数不再驻扎在走私区域内，而是分散驻军，以防备法国和国内的激进派分子。两支由中上阶层组成的民兵——志愿军和义勇骑兵队加入军队。1816年、1821年和1830年到1832年的暴动者被士兵镇压了；在1839年到1848年期间，宪章主义者也遭到军队的镇压。由于被

英军占领，爱尔兰始终是一个反叛的殖民地。此后(在爱尔兰稍迟些)，英国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直到1889年至1912年罢工浪潮的到来。但是现在有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当局也开始着手建立自治城市和郡的警察力量。如果强大的曼彻斯特警力(在1849年，每633个人当中就有一名警察)无法控制当地的罢工者，伦敦的城市警察局和内政部会在一天之内派出10倍的警力。尽管在1869年到1910年之间军队至少使用过24次，甚至可能更多(Emsley，1983，p.178)，但是大多数罢工者要面对的是身穿蓝色制服的家伙们所制造的声势，而不是英国士兵(现在他们穿的是卡其布军装)。军事镇压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但自从1848年以来，这种情况已日趋衰退。

对于劳资关系的调和，主要的国家机构都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参见第十七章)。为什么在英国会出现这种独特的从军队到警察的转变(另外，党派民主国家也普遍存在调和方式)？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性质的和解？对此有三种主要原因：

1. 资本主义的都市化令有产阶层感到恐慌，他们无法再以地区性庇护人的传统特权来控制所在地区，有时他们偶尔也会通过军队来寻求支持。他们不得不忍受面对集权“专制”的警察部门时的恐慌。他们要比其他国家更早地面对这一切。因为他们经历了城市的混乱以及与工业化、资本主义相伴而来、并由法国战争所引起的独一无二的政治暴动和一直持续到宪章运动的改革时期(参见第四章和第十五章)。而且18世纪的爱尔兰也出现了严重危机，在那里，由于警察部门正有计划地实现集权化，新教的统治地位面临着威胁，而这一集权化已成为英国本土的榜样。

2. 军队本身也希望从镇压行动中撤出，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损害了军队的道德风气，而且与英国的帝国义务相抵触。英国拥有与之相称的最小型、最职业化的军队。英国无须对边界进行管辖，也无须其他特殊力量执行低烈度的维和任务，而这种特殊力量很容易转化成暴力

统治。

3. 1848—1849 年，宪章运动的衰退不但使激进派抗议者的士气低落，而且使新兴的警察力量有了喘息的时间，在他们被要求进一步控制暴力事件之前，能够有效地对待最低程度的威胁，并处理犯罪行为。新的体系开始运转，到 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时，伦敦警察已形成了“继续前进”的策略，它意味着，只要不导致正面冲突，不停地喊话和前进是可以允许的(Mcneill, 1983, pp.187—188)。现在政府可以避免全面暴力所带来的不稳定、不合法的影响，并使军队从镇压暴力的职能中解脱出来，以保卫帝国。

是否是因为弥散的内在化“纪律”横扫了整个社会，才使新兴的警察力量发挥了作用？吉登斯适当地强调了 19 世纪行政权力和交通通讯发展的作用。而这一点比弥散性更具权威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当完全自发的地方暴力可能减少时，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却可能增加——正如宪章运动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此后，权力机构受益于在宪章运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工联主义。警察也获得了权威性权力，在对中等程度的暴力使用武力时，可以快速反应，灵活用兵。动用枪炮和骑兵的做法已被抛弃。

几乎没有迹象显示潜在的暴动者受到了傅科和吉登斯观念中的“严格约束”，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念中的纯经济方式的剥削。宪章主义者们经历了物质上和组织上的失败(第十五章将对此作出解释)；农业工人屈服于人数减少、流放和暗中威胁(Tilly, 1982)；资本主义给城市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减少了粮食暴动；熟练工人转向地区性负责任的抗议行动(参见第十五章)。这些形势转变的根源是来自权力机构的权力制衡，而不是来源于更具弥散性的“纪律”。其他国家政权因缺乏类似凌驾于国内反对组织的优越性，所以它们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来支持正在形成的警察部门。

通过这种分级别的方式来分析历史上所存在的镇压状况，所得出的结论要比福科、吉登斯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单纯考察世界—历史

性改革而得出的结论更为复杂。我们应将军队和警察组织的特性以及政府运用策略的特征都囊括进去。而他们在论述中都忽略了这些方面。事实上，从大约1600年到1800年这一较早时期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国家控制的军队主要负责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镇压时，更重要的变革就已开始。然而，此后使用军队被认为是不适宜的手段，特别是在大城市。随着枪炮技术的发展，枪支的使用和射击时间都大大缩短，在人群中使用军队会造成大量伤亡。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了解到战争也变得更专业化，更注重火力的集中，而骑兵已很少使用。

战争与国内镇压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许多政府都注意到军队的这两大职能在战术、武器、驻营以及纪律等方面截然不同。这威胁到军队在其所主要扮演的对外角色中的实力。因此，专制主义政府——更多到依靠军队而不是依靠强大的弥散性纪律来进行统治——首先在他们最大的城市设立警察(第十三章介绍说明，专制主义政府一般首先建立官僚主义行政机构)并建立起准军事化的全国性警察机构。英国在设立警察机关上，一方面部分地借鉴了在爱尔兰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军队要扮演双重角色而过度紧张。

第二次改革大约开始于1800年，革命时期和工业化时期的骚乱暴露出军事手段的不适宜性。在19世纪前半期，由于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常规军队在处理不同等级的威胁时所处的位置不同，它们的角色也出现了三种分工(现在仍然存在)。此后，两种“绥靖”政策促进了这一改革。最低层次的威胁和普通犯罪开始呈现减少趋势，其部分原因可能应归功于新兴警察力量的高效率，同样也可能要归功于吉登斯—福柯—马克思主义式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和严格纪律的过程。其次，在此后阶段，尽管各政府的处理方式不同，但随着公民权和劳资关系的调和，国家减少了对较高水平武装力量的需要。戈德斯坦(1983)指出在1900年以后，军队虽然仍在四处活动，但是在更具宪法性和党派民主的西北欧政府内部，军队的介人已逐渐削弱。

戈德斯坦注意到了“安全阀”的特别作用。没有它，局势会变得

更加糟糕：从1850年到1914年之间，四千万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大多因对欧洲不满而离开，前往新大陆。但是他将镇压行为的减少主要归因于政治原因。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促进教育的发展，加快都市化进程。然而，这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终，在混乱与镇压的五十年之后，政府改变了方针，开始有选择地调和并吸收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和谐共存地良好秩序的要求。现在军队镇压将被用于对付真正的极端主义分子——对工人运动采取有选择、有深远意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将在第十八章中讨论)。在党派民主政治的三个政府中，一旦政治公民权和劳资关系实现制度化，军队进行镇压的状况就会相应地减少。在世纪中期，英国中产阶级就已被统治者所联合；而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则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有类似举措。英国的劳资关系最为制度化，而后是法国，只不过法国的主要变化发生与战争之后(参见第十七、十八章)。至于德国和奥地利，它们都没能实现代议制，而奥地利甚至还没有实现民族化和形成为国家，因此它们仍同以前一样需要军队。我也注意到自己在选取国家实例时存有偏见。这些国家都是主要大国，与小国相比肯定要使用更多的军事力量。西方多数小国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政府缺乏镇压能力，实际的镇压程度较低，较早地过渡到完全代议制民主(包括早期的妇女选举权)，较早地实现了劳资关系制度化，并且较早地过渡到福利国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德国人和美国人相比，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以及(1830年以后的)欧洲低地国家的居民使现代社会的“强制性纪律”更为内在化。他们更有可能因较少受军队的强迫压制而获得更多的公民权(正如Stephens，1989所论证的那样)。

多数大国的军队仍然是既对外也对内，但是现在它们得到警察和准军事组织的补充并且还有调和方式的多方辅助。如果社会变得更有纪律性，那么大多数纪律仍是由统治集团的强制机构来专制地执行，而不是由公民自己以弥散性内在化的方式执行。从长远来看，现代国家的发展应更多是国家的“平民化”，将国内的军国主义降低到较低程度。

国家的多数职员都是着装平常、举止普通的人，他们大多以非军事主义的方式工作并将野蛮暴力推到幕后(Poggi，1990，pp.73—74)。但是在这一时期，民政官员促使野蛮的军事力量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与特殊的“半野蛮的”警察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许多“民事”调停者共存——并屈服于野蛮本身。这种状况在许多国家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以后。尽管国内军国主义工具已减弱到较低的力量等级，但军国主义仍然存在。

如果在一些国家中，某些社会团体现在能够更积极、更自发地服从，那么这主要是缘于他们所获得的宝贵的公民权，而不是缘于现代社会生活中无意识的常规化。因为政府权力的平衡与公民权力的获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所以军事镇压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就他们而言，政府同样要面对来自反对者的困扰，但他们拥有比以往旧式武器和武装骑兵更加先进，更为精准的武器装备，这使得大多数军队能够集中于对外战争。因此，对军队而言，只是调整而不是结束了它们的双重职能。国内的军事镇压仍具有直接针对性，那些不同阶级、种族以及地区和宗教的少数派为获得更多的公民权而战。因此，使军队层次化的两个等级——他们的阶级构成和他们的官兵关系——仍与他们国内镇压的职能息息相关。随后，我将阐述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导致了军队内部出现划分等级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受到在国内镇压中与之休戚相关的保守势力和中产阶级的限制。

职能：II. 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

战争和备战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国家的主要职能。第十一章阐明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在18世纪，军事力量的威胁和使用都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战争并非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通常外交官都会尽量避免战争。但是在18世纪，有78%的年份存

在着大国之间的战争，而到了19世纪，则只有40%的年份中发生过大国间的战争(Tilly, 1990, p.72)。因此，战争可能是人类社会所知道的最无情的竞争方式，这有一个不断了解的过程——处于一场战争之中，或近距离地关注一场战争，学习它的教训，使军队现代化，面对威胁，开始参加或密切关注战争，如此连续往复。从未密切关注过战争并使军队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是不可能长期幸存的。军国主义也同样渗透着较温和的外交手段——诸如谈判联盟、皇室联姻以及贸易条约。事实上，所有外交调停在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军事力量的平衡和本国的自身安全。战争和军队都是国家领导者和外交政策所关注的中心。所有曾定型为军国主义的国家——今天，也几乎都是如此定型的。

是谁在操纵着他们的地缘政治军国主义，并最终决定着战争与和平？持续了整个18世纪后半期的专制政府的传统实践已说明了问题。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君主的私人特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描述了他是如何在1740年夺得西里西亚的——这对普鲁士的世界历史性崛起至关重要：

> 在父亲去世后，我发现全欧洲都处于和平之中……以年轻沙皇伊凡为首的少数派使我企望沙俄能更多地关心其国内事务，甚至超过对维护国事诏书的关注[国事诏书决定，由一名妇女玛丽亚·特里萨继承奥地利王位]。此外，我发现自己可以支配已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并且国库充盈，而我本人是个急脾气。正是这些原因说服我发动战争，与奥地利的特里萨，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女王相对抗……雄心抱负，有利的优势，为自己博取声誉的渴望——这些都强烈地影响着我，一定要进行战争。(Ritter, 1969, Ⅰ, p.19)

除去腓特烈在描述中的装腔作势，仍可以看到那令人生畏的对战争发动的个人决定权。他还一一列出自己的敌人，这也是王朝外交的另

一个特征。

这一宪法特权是以另一个条件为保障的，即君主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玛丽亚·特里萨(1740—1783在位)是奥地利第一个获得最终权力保证的统治者：现在奥地利的士兵是向她宣誓效忠，而不是向自己的司令官。她从未率领士兵发动战争，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也一样；而普鲁士国王很快使这一切结束。他们需要指挥控制权的等级束缚(这将在后文进行介绍)。

19世纪的民主化是如何与这些君主特权相对抗的？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非常糟糕。君主成功地维持了对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领导权。正如第十章所论述的那样，当哈布斯堡家族在1867年承认了匈牙利王国的实际自治权时，其外交政策和军队仍作为是弗朗茨·约瑟夫的特权而大部分被保留。他应经过协商来缔结贸易条约，但是他可以通过免去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外交大臣的职务，而逃避这一点。在他的长期统治中，军队事务和财政预算都处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而他也将这些事务放在首要地位，远远高于对国内事务的考虑之上(Macartney，1971，pp.565—567，586多处)。当然奥地利政府也是一把与众不同的巨大保护伞，主要用于维持专制王朝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权力，并以此来防卫那些来自周围强大邻国且与他们存在摩擦的民族。但是哈布斯堡的特权并非典型。在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仍是总司令。他无须与德意志帝国国会协商，就可以决定外交政策或进行战争。他应该取得德意志帝国的参议院中其他德国统治者的同意，但是他的支配地位使这一做法仅仅成为一种形式。在这些国家中(包括俄国)，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能完全控制外交政策或者将外交事务委托给他所信任的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

随着政权的不断民主化，我们也许可以假设情况发生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考虑一下欧洲最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即在1905年独立后的挪威。宪法只是象征性地保存了皇室的行政特权和在紧急情况下的动员军队权、宣战权、调停权、结盟或解除联盟的权力以及派遣公使

和接待外国公使的权力。在所有问题上，国王都应与议会正式地协商。但在事实上，议会对此好像并不介意。里斯特总结道(1965, p.46)，外交部“几乎从未强烈地感到民主社会的外交政策也与人民大众有关”。挪威的各个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态度都十分冷漠，这是因为它们被组织和吸收在国家之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现在仍是)这是19世纪的标准。

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阶级和其他主要利益集团被限制于国家范围之内，将外交政策的实施权留给了想象中“民主的”最高行政官员们，在这方面他们实际上与旧时的专制君主相类似。在最民主的意大利，到1900年，其君主就已失去了国内的主要权力，但并未丧失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博斯沃思(1983, p.97)说：“外交政策是国王和其最亲近的顾问们的事情。国家主义者的‘舆论’令人厌倦，尽管予以组织和引导，也许会有积极的作用，但它却从未作出决定。”

因为英国是当时最大的党派民主政体，所以其决策权具有特别的意义。英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以及“军队行政机构、军队司令和军队部署”仍是皇室特权，正如通常的立宪君主制一样。然而，从1688年开始，军队的行动受到严格约束。议会决定陆军和海军的规模、财政以及内部法规。议会同意在英国使用外国军队并维持和平时期的常备军(Brewer, 1989, pp.43—44)。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权正式归属议会。

然而，日常的外交政策则无须得到议会的同意，除非它违反了大陆法律或带来新的财政义务(Robbins, 1977a)。在1914年，议会不得不批准宣战(如同法国一样，但不像其他参战国)，而在7—8月的危机时刻，每天仍主要是私下决定外交政策。外交大臣仅位次于首相。议会无法对他实行更多的控制。通常外交大臣是一个世袭贵族，位列上议院议员，而不是平民百姓——一个精心的设计以避免产生公开争执。平民了解情况的要求经常被以“与公众利益无关”为托辞而拒绝。外交大臣经常与首相协商外交事务，偶尔也在他的处理权限之内与相关的内阁

同僚及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协商。他很少与全体内阁成员协商。同罗兹伯里勋爵一样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人可以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Martel, 1985)，而像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样在点懒散的人则只驾驭着外交政策的大趋势，不存在要与“局外人士”协商的困扰。少数互相称之为“政治家”的人们通过乡村宅第间传递的信件进行交流，或者通过在缙绅俱乐部的交谈进行沟通。在自由主义外交中，宫廷已被俱乐部而不是下议院所代替(证据来自 Steiner，1969；Steiner and Cromwell，1972；Robbins，1977a；Kennedy，1985，pp.59—65)。与这种紧密联合的私人团体形成鲜明对比，公众舆论是不定型不统一的，并且难以专注于某些特定问题(Steiner，1969，pp.172—200；Robbins，1977b)。一个本质上是旧体制的行政机构在外交政上仍是孤立的，即使工人议员们正涌入下议院。英国各阶级关注的是国家大事。他们将日常外交政策交给专家们处理。

在最先进的党派民主政体中，我们希望美国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毕竟，美国革命是直接针对于类似的习惯做法——特别是未经同意就为外交政策而征收行政税。事实上，美国宪法已明确剥夺了行政部门的征税权，并将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赋予国会。然而宪法第二条又授予总统所有的行政权，而且在其他的条款中未对此做出任何明确限制。在当时，这些残余的权力主要被用来引导外交政策的日常行为，到了19世纪，又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批准。实际上，总统只要不宣战，不缔结条约或者不向那些已处于困境中的行政机构寻求附加款项，他就可以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这看起来就如同这样一个局势——在1990年到1991年期间，各方都大致同意发动波斯湾战争——尽管偶尔仍引起争议(参见西奥多·德雷珀和布什总统的法律顾问所进行的交谈，发表于《纽约书评》1990年3月的第1、17期)。

事实上，19世纪早期的美国总统受到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制约——主要是与英国、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关系问题——直接影响了北美的版图，影响了美国居民和利益集团的生存问

题。但是随着大陆扩张的完成，美国外交政策转向海外帝国主义，它抛弃了美国人以国家(或大陆)为中心的观点。行政机构的自主权得到加强。1900年以后，麦金莱总统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随后的外交政策中操纵着国会和公众舆论。这些外交政策基本是通过行政方式来制定的。1908年，伍德罗·威尔逊论证说帝国主义已改变了宪法的含义："在外交事务中，总统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优先权，以使总统握有绝对的实际权力。"(LaFeber, 1987, p.708，本段依据他的文章)即使如此，在这个最完善的立宪制国家中，一旦各阶级和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形成了全国性组织，国家的外交政策还是由相当孤立的行政机构所控制——以宪法作为形式上的依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众舆论和政治党派在正式的外交政策中仅起到极小的作用(Hilderbrand, 1981)。外交政策仍是一小撮知名人士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私有领地，而且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仅听从少数几个所谓"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建议(这一点将在本书第十六和第二十一章中作进一步探讨)。在党派民主政体和半独裁的君主政体中，国家精英保有日常外交上的自主权。

如果危机出现，这种状况就会发生改变。在美国，国会拥有(现在仍有)决定战争和开征新税的决策权。在英国，这些权力当时是(现在仍是)归全体内阁成员，并且在内阁中，根据可能出现的党派、议会或公众舆论进行讨论(现在仍是这样)。而如果战争逼近，对于所有的政权行动自由来说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抑制因素：金钱。即使是专制主义者，如果提出一项代价昂贵的外交政策，不论是谁提供税款或贷款，都必须按惯例通过批准。现在，在其他权力运作者之间，公众舆论开始变得重要了。

但是只有在出现危机或战争的情况下，控制权才会受到限制。外交事务比国内政治更缺少可控制性和可预见性。多国外交是指各独立政权遵循有限的常规约束不断地重新估计地缘政治的利弊而进行有选择的外交。一国的下述行为——包括以战争恫吓、缔结一个新的联盟、炫耀武力或进行海军演习、增加军队数量以超过那些被实施经济制裁政

策的国家，或仅仅是为了防御领土，私下对由商人或白人移民组成的富有侵略性的压力集团提供支持——这些都可能构成对其他国家的挑衅。国家的挫败暗示了它们的弱点，或者可能在国家之间产生预料不到的连锁反应。许多国家发现，在危机时刻，日常外交会将它们置于困境，使它们面对讨厌的敌人或联盟，陷入无法选择的境地，不是退缩就是参与侵略。秘密外交更进一步限制了选择的可能。

于是危机就突然降临到议会、统治阶级或纳税阶层面前，这时公众舆论就绝对占据优势并制约着政策的选择。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十一章中所论述的，在 1914 年，政府通常仅给议会和公众舆论两种选择——参战或退缩并受到羞辱。我们已逐渐习惯了一种进退维谷的选择(最近在海湾战争中，这种状况导致美国和伊拉克再次遭受灾难)。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持战争。国家精英控制着全部日常外交和军事部署，因此他们避开了民主的抑制。事实上，对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的外交负有主要责任的是最高行政官员，而不是国家或阶级，正如君主们决定着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外交事务一样。在外交政策中，宪法与代议制定型化的重要性比在国内政策中少。公民权利和义务体现出民族性、狭隘性和蒙蔽性。它现在仍然如此。

但是君主和行政官员并非独立决定日常外交政策。他们会听取专业外交官的意见。这些外交官的社会基础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来自旧政治体制：君主的近亲、贵族、绅士和有祖传财产的资产阶级(总体讨论参见 Palmer, 1983)。奥地利和德国是旧政治体制保留最多的国家，直到 20 世纪，外交部门仍由贵族把持。普雷达多维奇(1955)试图对两个国家在 1804 年到 1918 年的状况进行标准化的对照比较。他发现在普鲁士的“高级外交官”中贵族所占比例仅在 68%到 79%之间波动(末期比重为 71%)。在奥地利，这一比例则在 63%到 84%之间浮动(末期为 63%)。仅从贵族阶层来说，两国的发展趋势相同(这就限制了外交官因政绩而被封为贵族的可能性)。1914 年，德国外交使团的组成包括：8 名亲王，29 名伯爵，20 名男爵，54 名无爵位的贵族，仅有 11 名是平

民。在级别较低的领事部门，其职位则全部由平民担任。尽管他们通常是富有的、毕业于正规大学，并来自各类行会，但在外交部的全部548名官员中，69%的官员是由贵族担任并且垄断了高级官职。在1871年到1914年间，唯一明显的变化是容克阶层和于1800年被授予头衔的贵族势力出现衰落，与之相应的是西方化新贵族的兴起。这两种趋势产生的原因是：随着部门机构的扩大，普鲁士人和旧贵族在人数上出现短缺，而不是因为试图开放部门机构。近亲联姻、反动行会组织的会员资格和新教徒的优势以及对犹太人的完全排斥，使休戚相关的集团得到加强(Rohl, 1967, pp.106—108; Cecil, 1976, pp.68—68, 76, 79—86, 176—177)。

在法国，尽管旧的政治体制遭到革命的冲击，但它的外交官却得以幸存下来。在1815年至1885年之间，在所有的大使中，73%的人仍拥有贵族姓氏。在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1)，法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中，已知有了70%的人出生于有地产的家庭，有祖传财产的资产阶级或高级官员家庭，其比例比其他任何政府部门都有高(Wright, 1972; Charle, 1980a, p.154, 172)。此后，衰落趋势最终来临：虽然1871年到1878年间，被委任的使节中89%的人是贵族，但到1903—1914年间，这一比例仅为7%，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不幸的是，这些人未能留下任何详细资料。我敢打赌，他们代表着与贵族、有遗产的资产阶级相等同的共和党人，只是手边没有资料证据(Cecil, 1976, p.67, 引用未公开发表的研究，也许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这个时期，旧体制仍在英国外交部和外交机构中占统治地位。其高级职员依然是由贵族和富有乡绅的子孙担任。他们都在最好的公立中学受过教育(特别是伊顿公学)，并升入剑桥大学(Cromwell and Steiner, 1972)。

尽管美国在革命中已推翻了贵族的统治，尽管美国外交机构的威望比其他国家低，但是美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差异不大。美国外交官和国务院代表着美国的有祖传遗产者和东部利益集团——这些人或许是更有教养，更缺少活力的后裔(据称，当时最有才能的孩子都进入银

行业)。即使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仍然要求新加入外交使团的人有私人收入，表面原因是为待遇低。伊尔奇曼(1961)说，在当时外交使团的职员中始终充斥着古老而富有家族的子弟。尽管资格考试取代了个人的出身背景，但“良好教养”仍是考虑的首要因素：在1888年至1906年间，至少64%的人来自东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仅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8%)。

有所有国家中，这种社会等级的不平衡是有其存在基础的：旧政权的统治者说外语，在国外广泛游历，娶外国女子为妻，并且是文化的世界主义者。他们之间能相互理解。对此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在过去是——现在仍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异乎寻常的特征。当国家的内部活动遭到下层阶级或其他阶级的抨击时，当大部分内政部长和议会议员是由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中更为广泛的各色代表人物来担任时(参见第十三章)，外交政策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人员的任命仍存在局限性。外交政策仍是十分孤立、私下进行的，它是由国家行政精英和旧体制党派所组成的特殊联盟来进行控制，尽管旧体制党派的经济权力已在衰落。

因此，军队首要的地缘政治功能使它在行使第二类国内功能时，出现细微的区别。军国主义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使之与国家旧体制的核心产生一种极为隐秘的关系，而镇压功能又使之在总体上倾向于有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保护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资产阶级的利益，防备不满工人。军队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环节，将以前和现在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连接起来。现在我将详细分析军队本身。

军队：阶级，官僚主义化，职业化，1760—1815年

这是我第一次考察18世纪军官集团的社会构成。这一工作比较简单：事实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贵族；绝大多数的低级军官也一样，

只有海军、炮兵以及英国除外(英国拥有最庞大的海军和数量最少的贵族)。军官是贵族，就好像从来就应如此。法国仅有5%到10%的军官不是贵族。然而，大多数贵族并不是军官，普鲁士除外(某些时候，普鲁士的贵族终生都是军官)。在其他国家，军官集团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贵族网络，但与社会上最强大的那个贵族网络不同。正如本书第六章所阐述的，在法国，这一度是一种颇有争议的发展状况，最终以将特权授予更古老，通常也较贫穷的佩剑贵族来解决。在奥地利，玛丽亚·特里萨曾试图授予军官们更高的贵族头衔，通常是授予那些贡献较少的贵族，但是只取得有限的成效。战争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主要任务。尽管军队在旧体制中仍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它已不再完全处于核心地位。

英国显然是军事化程度最低的旧体制。然而，英国国内的陆军军官集团几乎完全是旧的体制：军队的最高军衔由贵族支配；军队的低级军衔由乡绅担任(Razzell, 1963)。购买军官职位离不开财产，财富是政治生涯的保障。在较偏远的印度驻军中，军衔售价低廉且缺乏吸引力，那里的军官多是来自商人和从事专门职业工作的家庭。海军甚至更为开放，军官多来自乡绅、商人、职业工作者以及来自沿海地区的航海业团体(就像法国海军所做的一样)。海军不太注重对个人财富的要求。海军军官以其薪水加上独特的额外津贴及奖金为生。许多人都出身于尽管不富有但体面的家庭的年轻子弟。所有军官都必须先作为水兵服役两年，尽管他们是作为海军候补生或船长助理而有特定的军衔。大约10%的军官来自于“非体面”家庭，包括一个著名的雇农之子——詹姆士·库克船长(Rodger, 1986, pp.252—272)。如果在陆军中，他的升迁是无法想象的——并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武装部队中也几乎如此。

在所有的陆军和部分海军中，仍然包括一些在世界各地“服役”的雇佣贵族——他们是来自移民家庭和边界地区的贵族或是来自偏远地区，像德意志小邦、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贵族。这些人经常四处迁移——弗雷德里克·冯尚伯格曾在五个外国军队中服役(Brewer, 1989, pp.55—56)。甚至在1760年，军官集团就显示出了社会集团的明显特

征，它不是一个仍嵌入在旧体制中的特权等级，而是一个正在不断职业化的集团，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习俗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作风。

军官与士兵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普通士兵和水兵被有文化的当代人描绘成社会渣滓，“卑贱的人”(Brodsky，1988)。在今天的学者当中这一绰号仍在使用(Jany，1967，p.619；Rothenberg，1978，p.12；Dandeker，1989，p.79；Holsti，1991，pp.102，104；Berryman，1988，赞同对美国军队使用这一称呼)，但是它的准确性令人怀疑。在那些年代，有文化的当代人存有偏见。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军官通常来自较高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十分普通的人都可能是“渣滓”，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征入伍或强征服役的人，他们是不情愿地入了圈套，就像囚笼里的动物，而且受到残酷纪律的约束。当强征服役和四外搜索威胁到平民百姓时，平民所要面对的主要是军队。因此，他们也成为军队的敌人。军队中雇佣兵的比例占有1/3，他们与当地平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因此平民对士兵和水兵们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士兵处于同社会分离的地位。

我们拥有18世纪后半期关于英、法两国军队的适量资料。法国的研究揭示，它的士兵并非是社会的渣滓，大多是市民、手工业者和有文化修养的人、农民以及基本上未得到充分代表的农业工人。到1789年，在已掌握的有记载的资料中，63%的士兵是手工业者和店主。(Corvisier，1964：Ⅰ，pp.472—519；Scott，1978，pp.14—19；Lynn，1984，pp.46—47)。许多城市豁免年轻人的兵役，使得多子家庭中的次子们可以跟随父辈学习生意，而军队也乐于接受有技能、有文化的人。英国军队的新兵主要来自制造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与全国总人口相比，这些人当中市民和苏格兰人较多，可能有文化的人略少些。因此他们虽是劳动阶层，但并不是社会最底层(参见资料在Floud，1990，pp.84—118；正如作者所述，这种显而易见的新兵文化水平较低的现象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个别军官自己对新兵文化程度作出评估，但可能

是在选拔除了具有标准能力外更具特长的人)。其他主要的欧洲军队可能比法国和英国军队更缺乏技能和文化，因为他们的征兵制度通常规定豁免有技能的手工业者(奥地利的军队首先是豁免自耕农)，并豁免那些可以出钱雇人服兵役者，那些代服兵役者也是社会最下层的人。然而，在一些较小的德意志国家，某些主要的新兵来源区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率。在英国和法国的和平时期，海军中的水兵主要是航海职业的典型代表，尽管在战时，会由于强行征兵而带来贫困的外行水手(Hampson，1959；Rodger，1986)。法国和英国军队的素质水平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高，但是我怀疑具有极端社会背景的是军官而不是士兵。

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士是最关键的环节，他们几乎都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并且通常来自中产阶级。军士是从士兵中选出的，事实上形成了军队中地位较高的士兵，至于提升到军官集团最底层的可能性则很小。在和平时期，军官在自己军团中的作用很小：法国军官每两年就有七个半月的假期；英国军官拥有更多的假期而且存在滥用现象。军官不在时，军士与士兵关系密切。海军则完全不同。在海上，军官与士兵密切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罗杰(1986)描述道：在纪律松散的英国军舰上，军官更多地是劝说而不是命令自己的士兵。有军舰上，专业技术人员同军衔权力同等重要。这或许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观点，也许情况在1797年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年的海军叛乱揭示了人们对惩罚严厉的纪律怀有深深的敌意。

假设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和有限的联系，那么所有的国家和军官集团都确信纪律必定是惩罚性的。18世纪中期，有些战术是让士兵长时间地暴露于炮火之下，虽然这种描述不太准确，但是这里一种反复无常、逐步积累的致命因素。在海军的交战中，水兵不得不承受近距离的致命火力威胁。但至少他们还要在炮火中忙碌。而陆军士兵则经常是消极地站着等待或缓慢地向前移动。在需要面对类似威胁的任何军队中，都要求不断反复地去训练，以将可以理解的恐慌驱赶到意识的边缘。这种训练是18世纪军队所具有的显著特征。但即便如此，“纪

律”仍没有完全内在化。士兵整体地被抛弃，不是在战斗中，而是发生在和平时代，因为如果在战争中这样做不仅困难而且也太惹人注目。据说1/3的普鲁士军队——战斗力较高的部队——被雇用围捕另外1/3开小差的军队(留下1/3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18世纪军官不断增加残酷训练，任意实施体罚并极少通过有人性的竞争，就像许多海军司令那样，在海上他们拥有十分专断的权力。斯科特(1978：35)说许多法国士兵是在接受纪律处分时，才与他们的军官有第一次个人接触。

因此，军界是一个特殊而残酷的等级集团，其中存在两个等级，它们之间由专断的、具有惩罚性的权力来连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被隔离的制度机构，不再反映外部更为复杂的市民社会。因此，具有等级制度的独特军界经历了三个演化过程：官僚化，职业化和民主化。前两个过程持续不断地影响了整个时期，最后一个过程则通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突然产生了影响，据推测，最后由于19世纪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巩固(Huntington，1957和Janowitz，1960提供了典型可靠的叙述；Dandeker，1989，最新版)。

在第十三章一开始我就提出了自己的官僚机构模式。其中包括五个构成因素：人事部门占两个因素，军官任命占两个因素，总体结构占一个因素。官僚机构的人事部门是带薪水的并且不存在对行政管理的所有权或转让权；人员的任命、提升和解职是依据客观的能力标准。官僚机构的各个部的机构是根据职责和等级来进行合理安排；各部门也同样被安排成单一职能，集中化的行政机构。最终，除了受政治影响的最高层，整体上与市民社会的政治斗争相隔绝。从一开始，军队官僚化就受到国家的引导。

职业化是现代化的总体特征，而且不仅限于军队。但是泰特勒(1977：6—8)注意到对于职业化较为通常的两个因素来说，军队增加了第三种因素。正如其他行业的职业化一样，士兵和水兵都获得了专业技术的垄断权。这使所有其他人都处于一种无法与之竞争的业余水平；其次，这一专业化整体还是具有独特的集体团队精神，并在自身的

传统和荣誉感中固定下来。但是，不同的是第三方面，服兵役是为了国家。职业化同官僚化一样是在国家内部发展的。

社会学家们经常注意到官僚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既密切又相互冲突的联系(例 Parsons，1964)。事实上，当他们与社会隔绝时，官僚机构就发展了一种职业化的团队精神和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可能与官僚机构的有效合理性发生冲突。至于现代军队，这种相互纠缠的官僚——职业的精神气质也包含了一种独特的阶层团结。这三方面的结合促进了军官等级的产生。

官僚化主义源远流长，尽管其主要历史阶段发生在我所生活的历史时期。它主要源自于国家机构以外，首先是教会，其次是私人的印度公司——尽管在最初，在塞维利亚的西印度群岛贸易法庭是由西班牙国家垄断控制[4]。他们有序的结算体系、确定的指挥程序、带薪的文职官员和军官都应对那些中等规模的行政机构所面临的困境负责。这些机构要应付一系列扩展到广大地理区域上的广泛职能。也许行政规模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有些起点水平过高。如果没有更好的合理化标准，行政管理就会十分困难。但是在对十个拥有 65 名到 3 096 名职员的现代组织的研究中，霍尔(1963—1964)发现这些组织的规模与六个官僚化的标准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重要联系。这六个标准与我本人所确定的标准十分相似。同样，在前现代化时期，官僚化的主要职能压力更多地来自扩展到大范围、有组织且多样化的职能问题，而较少来自于规模问题。

1500—1640 年的军队改革将官僚化带进国家机构。到 1760 年，陆军和海军被分为具有标准化规模和专业职能的两种部队，它们的军队与总部之间通过相互关联的两条指挥链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产生于 18 世纪，是现代商业组织的产物，它将参谋机构和战斗编队区分开来。另一个则是一体化的等级制度，具有标准化的军阶，从将级军官、上校、少校、上尉以及中尉逐渐降到军士和普通士兵。两个指挥链通过部门联合(一个陆军部队包含所有专业化领域，由一个参谋机构协调，

从属于一个指挥官)，通过一个“将级”军官领导的一个“总参谋”与其他部门协调。海军也通过相互间密切协调来克服在广阔海洋上，因舰队分散所产生的战术困难。专业的标准化供给，火炮和发展起来的海军战队，随着信号和指南手册的出现——所有一切都并入到一个有效的“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Dandeker，1989，p.77)。军官的任命也实现了官僚化，尽管最高层的君主和议会尚不情愿将作战总指挥权委任给一个将级军官。他们宁愿分而治之。陆军(通常不是海军)的创办者被保留下来，富有贵族投资建立并指挥自己的军团。但是到18世纪中期，奥地利、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的君主及陆军部长制定了集权法规以抵制贵族。1766年，当玛丽亚·特里萨牢固地掌握了军官升迁的控制权时，她取消了保留下来的领主，这可能是最后一个如此做的西方君主(Kann，1979，pp.18—19；参见 Scott，1978，pp.26—32，Brewer，1989，pp.57—58)。

军政府是相对集权化、惯例化、纪律严明、特征相似且具有官僚作风的——18世纪最“现代化”的权力组织(Dandeker，1989，ch.3)。这些特征直接来源于军事权力的效率。战争要求引导了军队职能的多样化和武装力量的地理弥散性。另外，规模的作用远远小于职能和地域范围的作用，因为军事改革已集中于轮廓日渐清晰、定型的步兵、骑兵、炮兵以及其工兵部队和后勤部队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区别。专业化要求有能在更遥远的距离之间进行协调的新手段，特别是对海军而言。更加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规模主要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官僚机构使军队可能膨胀。在战场上，作为非正式、松散的军事组织毁灭了，官僚化却获得了胜利。

人事政策较少官僚化。的确，薪金已成为平常事。水兵和士兵是付薪的“雇员”，从属于指挥链上的一个军官，军官的身份地位仍是变化的，多数军官是固定薪金的国家雇员，然而他们也是通过购买来获得最初的军衔和随后的升迁。普鲁士军官被授权通过他们的指挥权占有流动的国库资源。但类似惯例已逐渐被淘汰。

官僚机构在第二类人事标准——竞争标准上变得滞后。文化修养必不可少，但是除了炮兵和海军军官，其他官员极为缺乏正规的资格证书和广泛训练。随着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桑赫斯特在1802年成为英国的后方，建立了第一批综合性军事院校——1748年建立的玛丽亚·特里萨军事学院和1751年建立的陆军军官学校(1776年，法国又在十二个省区建立了同样的军事学院)。许多普鲁士的军事院校历经一个世纪之久。但主要征兵标准是社会背景，它假定一个贵族或乡绅在成长过程中就培养了军官潜力——有过竭尽体力的体验(特别是骑马)，勇敢，举止庄重，通晓如何对下级下达命令，以及有荣誉感。一个奥地利的陆军元帅曾经特别赞扬过一名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他拒绝赞扬贵族出身的军官，因为他说一个贵族就应该勇敢(Kann， 1979，p.124)。大多数军官是在工作中学习，借鉴于操练课本和简单的指南手册，并且他们在年轻且毫无经验时就陷于战争。升迁将根据战争中其调动各种关系的能力(以证明他具有适合自己军衔的能力)以及战功。

此后，战争强度的增加使久经战场锻炼的军官集团扩大。其经验即是新兴职业化的核心。非职业化的战争勇士正在消失并受到鄙视：因为只有我们专业人士才能了解什么是战争。一种独特的职业化精神气质正形成中，它仍是贵族化的，但不具有排他性和家族性特征。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强烈地影响着正在增强的官僚和职业化以及正逐渐引入的有限民主化，它似乎对贵族的统治和惩罚性纪律产生威胁。较高的战争强度使经验丰富更成为职业特性。当书本知识和正规学校教育并未取得进展时，非专业人士就已在波拿巴的军队中消失了。亲戚关系仍十分重要，但任何外行或不胜任的贵族及战争知识分子几乎得不到升迁。军官集团的竞争和猜忌，正如军事自传的读者所了解的那样，更多地集中于谁得到了提升，去指挥谁，而较少集中于家族关系。他们不再注重资格，更多地是注重工作业绩。

自然这对法国革命军影响最大，法国大革命带来贵族的移民出境和退出军队。军士的升迁机会突然增加，这些机会突然降临到那些原本

毫无运气升迁为军官的人，甚至包括普通士兵。与1789年10%的比例相比，到1793年已有70%的军官是由服役士兵提升而来，尽管其中大多是低级军官。最高级的军官仍主要由前贵族担任；战斗部队中40%到50%的上校和中校是贵族，与之相比，担任上尉和中尉的贵族比例只有10%到20%。但他们要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官员、商人和资产阶级的投资人分享军阶，后者的构成比例为40%的高级军官和30%的低级军官。手工艺者、商店店主，雇佣劳动者及小农占据了大多数的剩余职位，比例为5%和33%。在士兵中，资产阶级、中等集团和手工艺者的比例下降，农民的比例增加，尽管仍未被充分体现出来(Scott, 1978, pp.186—260; Lynn, 1984, pp.68—77)。

突然间，军队不再是对古老社会的拙劣模仿，而是具有新社会的模式。纪律的条文被编集成典并适用于军队的各阶层：现在法国军官比他们的士兵更可能冲在正战斗的队伍中。它用激情、个人化和部分内在化的高标准来平衡惩罚。林恩(1984, p.118)断定，普通士兵们是被“作为公民而不是臣民”来对待的。我发现所有有关军队的类似言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夸张。军队面对的是明确的死亡可能性，它几乎从未完全使纪律内在化；它不得不以集中压制的形式来完善纪律，或强迫士兵们笔直地站在炮火下，或去冲锋，而不是退缩或逃跑[5]。但是作为一种趋势，从18世纪到革命时期的军队，林恩的论述是充分的。

接下来的二十年，军官集团变得更为资产阶级化，因为对非贵族来说，贯穿军衔提升的机动性增加。在1804年，拿破仑的18个陆军元帅中仅有3个是前贵族，一半军官来自士兵(Chandler, 1966, pp.335—338; Lefebvre, 1969, p.219)。拿破仑失败以后，在随后的各届政府中，对社会背景的要求变化多端。1851年波旁王朝复辟，在最高级军官中增加了贵族，但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清洗一个同情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军队。在混乱的二十年后，终于找到了权宜之计。对军队共和派俱乐部的压制是与三项鼓励性措施相结合的——在阿尔及利亚征服地的升迁机会，军队退休金的增加，取消部长开除军官的权力。法国军队仍存

有分裂，无法抵制1848年的革命或1851年路易 · 波拿巴的复辟，但是它激进的“公民性”特点被削弱了许多(Porch， 1974， pp.115—117，138—139)。 那么革命战争是否改革了其他国家的军队？

关于军队的等级制度

革命战争改变了对普通士兵的控制，并使军官集团一体化和现代化。 但是事实证明政府和指挥官们最初所担心是多余的，它不会是对“国家公民权利和义务”作出进一步认可。

官兵关系逐渐发生改变。 大规模动员起来的士气和减少残酷纪律的影响是如此的明显以至无法忽视。 它实际上在所有军官集团中都增加了“进步的”宗派信念。 海军战役和殖民地战役也再三证实，当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时，他们的战斗力较强。 三年以后，普鲁士在德意志耶拿城的耻辱，使普鲁士军队废弃了任意体罚，扩充了规则手册，并开始将人道主义的责戒写人手册。 在1818年，他们首次提到要将士兵的“荣誉”感与纪律协调一致——一个真正激进的见解(Craig， 1955，p.48； Demeter， 1965， pp.178—180)。 在玛丽亚 · 特里萨统治下，早在1759年炮兵部队就引入了一个进步法规。 它极力主张应“通过对荣誉的热爱和良好的待遇，而不是暴行，不合时宜的殴打和鞭笞”来鼓励士兵。 但是直到1807年这一法规才被扩大到步兵集团军，并且直到19世纪末它才被经常充分地用来阻止野蛮行为(Rothenberg， 1982， pp.117—118； Deak， 1990， pp.106—108)。 纪律仍基本保持了强制性——正如它今天所做的那样——但它逐渐变得合理化并成为指导性原则。 军官和士兵之间不再如此隔阂，他们正逐渐变得屈从于所呈现出来的单一军事等级。

在1805—1807年和1813—1814年之间，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比这走得更远，为了也成为“武装化国家”，它们调动爱国热情并允许官兵之

间的关系更加自由。新兵中外国雇佣兵逐渐减少，以至于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军队变成了“民族性”的。两国政权都开始建立后备力量即战时后备军。但是，1815年以后，所有政权由于害怕将武器交入自由民手中，而逐渐放弃公民军队。奥地利大元帅，查理大公适时的建议，应在扩大征兵范围的同时将服役期减为八年(许多国家政府规定的服役期为终生)。他的计划遭到拒绝，因为退役士兵有可能将专业性的领导能力用于领导反叛起义。通过观察，科洛雷多伯爵在宫廷中使这一论据确定无疑：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一个省区来堵住胜利敌人的枪口，但武装人民简直就意味颠覆帝位(Langsam，1930，p. 52；Rothenberg，1982，p.72)。1831年奥地利放弃了战时后备军。普鲁士人虽保留了战时后备军，但对之施以严格约束。在整个19世纪，普鲁士人和其他德意志国家对“职业化”军队与“国民化”军队的优缺点进行争辩。如果论争是以类似的措词提出，职业化的观点总会取胜。

然而，上文中提到的妥协观点“军事公民权利”却取得一定进展。在德国，这一观点作为对成年男子服役的回报而影响到了对成年男子普选权的承认(在被控制的条件下)(Craig，1955；Ritter，1969，I，pp.93—119)。在法国将公民权利定义为“血税”，它穿越欧洲和北美，在许多国家产生回应。在任何国家公民军队的形式都没能持久地流行，这种类型的军队曾在瓦尔密击败过普鲁士人(参见第六章)。然而，大规模军队呈现出一种不太完整的参与形式，它由执政政权界定，被一个合理化军事等级来严格约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武装后不再是真正的“公民”，而是“民族—国家的忠臣”。

在军队的等级制度中，19世纪的职业军官对待士兵当然比前辈们要好。这一变化的发生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次是在1815年以后，伴随着军队规模缩小而发生的，到中世纪以后，随着军队的再次扩大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在第一阶段，财政上的强制因素减少。为了使军官和军士忠诚而实施福利计划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包括退休金和为老兵提供在国家机构中任职的机会(将在第十四章中进一步讨论)。工资水平与

那些在民用企业中工作的已卸任的军官和士兵基本保持一致(可能奥地利的军官除外)。武装力量也提供了更多稳定的雇佣机会，能保证大多数人服役期较长(Porch，1974，1981，p.89；Berryman，1988，pp.26—27；Deak，1990，pp.105—106，114—125)。

此后，随着第二次扩张阶段的到来，各国通过扩大他们的预备力量来解决问题。在军队各个级别长期服役的专业人员成为骨干力量，他们领导并训练大量被征入伍的后备役军人。这些军人经过短期培训(在普鲁士是三年)，然后进入由正规军监管的预备役军队和本地军队。当真正出现战争威胁时，已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役军人就组成军队的大部分。整个19世纪中期，军队主要从农民中征募士兵且更确信他们的忠诚，同时给予有技术的城市居民和从事工业贸易的人豁免权。随着短期征兵在欧洲大陆的扩展，这种偏见消失了，然而，重要战争仍趋向于不征召工人阶级中有组织的核心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先锋队”——在矿业、交通运输和金属制造业中的熟练工人——被要求去进行生产而不是参加战争。仅海军从这些人中征募新兵。因此陆军士兵，特别是高水准的前线部队，趋向于既从农村地区，也从小城镇或工人阶级特性较弱的工业区征募新兵。工人阶级不忠诚的观点对军队的影响比恩格斯和保守派评论者所预期的要小。

吉登斯(1985，p.230)论证说恰恰那段时间，军官成为被隔离的专家，士兵成为大众公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指挥官们紧紧地控制着能统治士兵的军队组织，以减少士兵们对自己作为公民或阶级成员的认同能力。中世纪战争所带来的教训是那种由于过分细致的计划，在地图及时间表上进行协调所产生的各师之间配合松散的作战方式已陈腐过时(由波拿巴发展起来的，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在1870年普鲁士人的组织已压倒了法国人的干劲。这使得将军们甚至能够用严格纪律来控制那些与18世纪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相比要松散得多的军队。广泛的权威性组织取代了简单的训练。铁路、电报(最后是无线电报)以及参谋体系，这些都使指挥官们能够有效协调多支部队，每一支部队都

代表了每个士兵的最远地域，许多陆军部队是在本土征兵，他们部队的士气是基于地域的团结一致和同志间的友谊忠诚。

在美国内战中，新征的本土士兵确信大部分士兵是为了保卫自己家乡的完整或利益，而不是保卫原南方或联邦政府(或与之相关的价值利益)的完整和利益而参加战斗，甚至战死时，地方士气尤其显示了其威力。六十万人战死沙场和较低的开小差率都证明了这一约束的惊人力量，它甚至约束了那些未经训练就被调上战场的士兵。

但是除了美国在内战时曾大规模动员兵力以外，在城市工业化占压倒之势的英国，地方性征兵仍对大部分落后保守的农业区存有偏见，而这些农业区能够提供习惯于上述部门性纪律约束的剩余劳动力。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共和党人为寻求取代地区性征兵体系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政治斗争。但他们在保守力量与陆军部队高级指挥机构的联合夹击之下失败了。陆军部队保留了其地方性和反动性。

为防不测，指挥机构增强了保守性。区域性部队组织是由从地方军事后备力量中征召来的军士充实。因此，军官和军士是以扩军和所谓的“阶级性”、“民族性”的公民军队为中心，相当成功地发展了部门性和区域性权力关系。在士兵与自己军官的直接表面关系中，士兵被组织性所包围。更高部门和参谋指挥部可以为了某些隐避目的，而调动他们的部队和舰队。现在，士兵几乎没有能力在自己的部队或军舰之外采取集体行动。正如我们在第三卷中将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即使是在可怕环境下，甚至是不合适的命令，他们几乎都必须绝对地服从——除非他们的军官也缺乏忠诚之心。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正规军和后备力量都是绝对忠实的。

麦克尼尔(1983, p.260)论证说，一个正在工业化的社会同时也正在将“指挥的首位原则”奉为神圣。如果这是指平民社会，就有些笼统，但是用于描绘正在扩编的武装力量，则极为精确。那些所谓“公民的”、“民族的”或“阶级的”军队都仅仅是骗人的。它们事实上是被社会保守派所约束的部门性权力组织。到1910年，在大多数国家

中，大约20%的成年男子受到这样的约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的轮廓才进一步呈现出来，现代国家正在它们的军队中造就大批忠诚者(正如在它们的平民化政府中所做的那样，参见第十三章和第十六章)。实际上在1848年和1917年之间，没有武装力量会在它的部门性忠诚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在20世纪这一点对于军队的两大主要职能——战争和镇压都极为重要，并且通常是决定性因素。

随着熟练技能这类观念的不断发展，在军官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个持久性变化。技能教育的成分逐渐增加。制图学、后勤学以及战术的比较和历史研究成为军队骨干和总参谋部人员训练的一部分，这主要出现于19世纪早期。此后，在战争工业化的情况下，火力被大规模增强，要求对一些基本机械知识的了解不再仅限于炮兵部队，普鲁士军队的一系列胜利是专家治国的鲜明典范，尤其被法国迅速学习。大约1870年以后，受过军事学院的培训成为进入军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进一步学习则通常成为得以升迁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作为精英的参谋机构中。按惯例晋升名次与军官的服役记录和资格相联系，同时在广泛的专家治国的准则下，庇护人制进一步衰落。

由于不同原因，英国和奥地利略有落后。正如我们将很快看到的那样，英国军官集团的社会构成继续保留着乡村性和反动性，这与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社会并不相符。英国陆军仍保留着保守性和对参谋学院及改革派所作努力的轻视，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的惨败带来沉痛教训，才推动了其落后的军队职业化(Bond，1972；Harrles-Jenkins，1977；Strachan，1984；Brodsky，1988，pp.72—82)。奥地利的落后是由于政治上的混乱。它的军队主要作用是维持国内安全，它具有保守性，怀疑职业化是“自由化”(Rothenberg，1976)。但是在1870年以后，它也有所改变。到1900年，优秀的军事学校和毕业后的训练课程长期主导着升迁机会(Deak，1990，pp.187—189)。

最后，反动分子并不恐慌。教育无法取代古老的贵族原则或激进的军事政策。教育被融入其中。在对20世纪更为普遍的流动趋势的

预测中，随着教育成为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途径，事实上士兵向上直接升迁的机会减少了。在1870年的法国陆军中，14%的师级将军来自士兵，但是到1901年则少于3%(Serman，1978，p. 1325；Charle，1980b)。由于不同原因，贵族除了让步别无选择——很简单，在19世纪末陆军的扩军中，没有足够的贵族担任军官。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异常幸运地坚持下来，甚至是在法兰西共和国时期，最高级军官仍完全是贵族。1870年师级将军的30%有贵族血统，到1901年，仍维持了20%的比例。比例的下降必定带来更多的资本主义化，然而，这也导致了更多地从罗马天主教徒中征募新兵，而不是从国家学校征兵。这样的军官集团保留了社会的反动性和政治的反动性。军官集团与共和国政府的反复冲突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达到顶峰，直到1941年才实现了政治妥协，这立刻就挽救了共和国(Girardet，1953；Charle，1980a)。

当然，有一支军队没有贵族。美国军队也有其独特的特点：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立刻既扩充了代表有产阶级的军官集团，同时也扩大了大体上代表受过教育的白人成年男子的军官集团，但是，一旦重新回到和平时期的体制模式，美国军官就缺乏代表性。海军军官绝对是来自现代化城市中的上等阶层，也就是说，来自东北部的资产阶级和职业化中产阶级。他们多是军官、银行家、律师和法官、制造商、官员、“科学上的”专业人士(医生、药剂师、工程师)以及商人子孙(按降序排列)。(Karsten，1972，表1-2。)

相反，陆军军官明显地是——由于美国内战的结果——南方人并来自乡村、来自可能正在衰败的旧体制，1910年在14名最高级军官中，有13名是南方人，并且大部分来自乡村地区。尽管缺少大量资料，但是可以看出大部分军官或者是军官的子孙，或者是种植园农场主的后裔，还有的是来自那些生活在小城镇或大城市的专业人士家庭——律师、医生、教师、政府职员以及部长大臣。贾诺威茨将军官集团概括为“老式家庭、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乡村、上—中产阶级”——正如美国所提供的一样近乎于旧体制。但是因为这样的阶层

不再统治着美国(除了南方)，所以它是一个有些被隔离的集团。根据1890年北方的报道，陆军是一个“拥有它自己的领域，独立并且由于独特惯例和纪律而被孤立的团体，是被选拔出来的贵族，并拥有传统的光环”(引自 Janowitz，1960，pp.90，100；参见 Hutington，1957，p.227；Karsten，1980；Skelton，1980)。

这种带有等级制度特征的小型集团，以独特的方式控制着它的士兵。这些集团不是被征募的士兵，而是职业化的志愿兵，数量上占优势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早期外国雇佣兵的后裔？)，也包括黑人。他们满意于陆军所赋予他们的安全进入(白人)美国社会的权力(Berryman，1988，ch.2)。尽管并不庞大也不具有影响力，但美国陆军忠于它那保守的主人，正如我们将在第十八章中所注意到的。

在其他国家，贵族和反动势力的优势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和普鲁士是最极端的，其次奥地利最与之相似。拉泽尔(1963)指出英国陆军军官的个人社会背景几乎从未发生过变化。贵族和土地乡绅(不及人口比例的1%)1780年占国内陆军军官的40%，在1912年占41%，在最高级将领中(少将及更高军衔)，他们的优势略有下降，从1830年的89%降至1912年的64%，但这是通过在各团之间增加分层来计算的，同时精锐团甚至在构成上变得更加趋于旧体制，在风气上更具反动性。在高级军官中，普鲁士陆军也保持着贵族特性。在普雷达多维奇(1955)对1804年到1918年之间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的总参谋部所作的比较中，奥地利军队在1804到1859年之间，其将军中贵族大约占95%，此后到1908年这一比例骤然跌落到41%。但在普鲁士军队中，直到1897年，贵族稳定地占据90%的比例，此后在1908年仅降到7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扩大的总参谋部中，两国的数字进一步下降)。等级的降低使得贵族优势减弱，随着1900年前后的扩军，优势进一步下降——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考虑到贵族人数所占的固定比例正应如此。1860年86%的上将和上校是贵族，1931年52%是贵族。1860年

更具资产阶级性的战时后备军预备力量的一体化，使低级军官的构成产生巨大差异。到 1873 年，仅 38%的中尉是贵族，到 1913 年降到 25%——这也是在确切数据中唯一下降的比例。在所有军官中，贵族人数从 65%降到 52%(Demeter，1965，pp.28—29)。

因此，德国和英国的模式十分落后。由于军官人数的增长，而贵族—乡绅的人数并未增加，使得贵族—乡绅的优势被迫衰落；旧贵族仍支配着最高等级阶层；几乎完全不接纳工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的子孙。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将陆军留给了旧体制。陆军(包括外交)是旧体制进入德国国家核心的一个桥头堡，与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相比，这确保了军国主义在外交政策和阶级关系上的优势。

但是“贵族”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当它融入明显的职业化精神气质时，它变得缺乏特殊性，而被所有军官共同拥有。在德国贵族中军衔依然如同在 18 世纪末一样，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给予较贫穷的小贵族，如内塞诺、沙恩霍斯特和克劳斯威茨以升到较最高职位的权力。19 世纪早期，军事教育的改革和强化使军团在职业平等中实现制度化。在大学的学生军团、学生斗争会、以及参谋学院中，教育增强了军队的精神物质。“教育”一词不再仅仅意味着“教育”而是培养——在军队中，就是荣誉感的培养。作为一种道德品质，“贵族”现在的含义为“荣誉”，成为军官的独特象征。

从迅速扩充的德国海军，这一显然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化的军事部门中，可以洞悉后果。海军要求广泛地进行技能训练，并大量地从城市港口征兵。近代海军缺乏传统和身份地位。因此，它只吸引了少数贵族。1890 年至 1914 年间，在海军学员的行政阶层中，仅 10%至 15%的人来自贵族家庭，尽管这比那些工业资产阶级或商业资产出身的人所占百分比要高。在 1907 年有文献充分记载的阶层中，在专业人员的出身背景中，占优势地位的是：45%是大学教师的子孙，26%是非贵族的陆军或海军军官的后裔。海军仍需要来自“有教养家庭”并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海军明确地拒绝那些来自社会下层阶级的申请人，因为这

些人可能会妨碍来自有教养家庭的青年人的申请。然而资产阶级没有服役经验。贵族最受重视，富有的人次之。成功的行政军官被封为贵族。在士兵的待遇方面，军官模仿了傲慢的普鲁士人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水兵的起义中普鲁士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工兵部队军官的骨干来自出身背景略低的家庭，主要是行政机构的中低阶层。他们被看作是“实用的”人员，不适合指挥职位，正如在陆军中那样，犹太人(除非接受过基督教洗礼的人)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分讨厌的人。尽管陆军和海军的特质并不完全相同——海军的军国主义更多的是反英和维护帝制——“海军展示了一条通向‘封建化’的上层资产阶级道路”(Herwig, 1973, pp.39—45, 57—60, 76—78, 92, 103—104, 132)。在反动的贵族武装力量中，甚至资产阶级化的部门都仿效他们，就在德国人领导工业资本主义的时期，它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仍极力避开本国的武装力量，并且也正被本国的武装力量所回避。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1866年和1870年似乎就已证实了这一点，它的海军技术精湛，尽管与要求它所承担的作用相比，规模太小。但自相矛盾是它那非凡职业化的现代性在本质上却是旧体制。海军当然是技术性的，对军官有一个较高的资格标准，根据当代资料统计，它是唯一一支人员普遍具有文化的军队(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1913, p.181)，它的参谋机构对战争的工业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包括对铁路后勤学的大量应用。因为它的军官和军士集团具有社会内聚性，是依靠军官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与受竞争折磨的法国陆军军官相比更是如此。在1870—1871年的战役中，这一悬殊差别特别明显(Gooch, 1980, p.107)。公众言论对“普鲁士的效率”这一自相矛盾的表达有一个缓慢的理解过程，因为这一军官集团具有技术的先进性和社会的反动性。这一联合体是一种高速发展的等级特质。因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士骨干被部分地灌输了下文所提到的价值观。但这正是对较普通矛盾的一种极端看法：那些具有社会反动性的军官集团正运用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先进的手段，掌握最先进的

专家治国技巧。

奥地利的军官集团也具有社会保守性，但它也有从其国家形式中剥离出来的独特特性(已在第十章中讨论)。它保留了王朝的和(不稳定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直到1859年，其军官的微弱多数还是从国外特别是从德国征召的，但偶尔也从英国大量征募。王朝也同样依赖于罗马天主教徒而且主要是依靠奥地利的日耳曼人，这些人1910年占正规军军官的79%，仅占总人口的23%。所有其他民族都未被充分体现。最初贵族统治着军官集团，但随后衰落，正如在普鲁士德国的军队中一样，相对于人员扩充，德国贵族人数不足。到1870年，职业的副职官员仅有20%是贵族，并且部分是来自那些因在政府机构中工作而刚刚被授予贵族头衔的家庭。随后，贵族将军的人数下降，正如我们所预期并且在上文得到证实的一样。1867年以后，政府对马扎尔人作出了让步；他们统治着自己德国部分的亨维德(Honved)预备军，并且在正规联合陆军中，有少数马扎尔人军官在升迁过程从身份差别中获益。

1870年以后，奥地利也大规模扩充它的预备力量，并且完全资产阶级化，如主要的资格限制是教育程度。这就排除了罗马天主教徒过多的加入，降低了日耳曼人的优势(降到60%)，将捷克人和马扎尔人的人数提升到公平的比例，路德教徒被过分体现，并在总体上使犹太人被过分突出(他们在预备军官中占17%到18%，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4%到5%)，其他民族和宗教仍未得到充体现(Rothenberg，1976，pp.42，128，151；Deak，1990，pp.156—189)。

这是一个特殊的军官集团，它被资产阶级化，并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而且采用专家治国的方式，但是特殊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调和了它本质上的王朝忠诚。陆军更紧密地拴结于奥匈帝国，而不是领土上的统治阶级——与“民族”的联系更少了。它在社会上的孤立和那不切实际的仪式(如它的纯白制服)增加了它类似于等级制度的一面和团结一致的一面。奥地利的军官，无论他们的官衔和身份地位如何，甚至相互是陌生人，都能通过互相熟悉的将“你”发成“Du”的谈吐，显示出他

们的共同性(在其他地方仅是知己和仆人才使用)，而不是使用更为正式、更常在德国社会其他领域使用的 Sie。这在此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奥之间极不愉快的场面，德国军官认为他们受到奥地利联军的侮辱或亵渎。

奥地利军官与社会的隔离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在俄国陆军中，非贵族军官的人数比例也在增加，从 1895 年的 26%上升到 1911 年的 47%，同时保留下来的贵族与大俄罗斯的贵族统治无关。到 1903 年，这些至少拥有少将军衔的贵族中有 91%不占有土地或财产，甚至没有一处城镇居所(Wildman，1980，pp.23—24)。这一军官集团也正从阶级结构中分离出来。

但奥地利的军官也更进一步地与他们的士兵分离。因为士兵是从各民族中按大约均衡的比例从本土征募的，并且还因为君主提防同一民族的军团，因此军官和他们的士兵很少说同一种语言。因此，陆军指挥结构很少能从阶级结构或区域性语言共同体所提供的社会统治集团中得到增强。奥托·鲍尔，社会主义的领袖描述了自己在军官训练中，所确信的那些受资产阶级化影响的东西(尽管没有民族的影响，因为他明显的是在描述全德国的统治)。陆军的职业化精神特质要求军官尊重士兵中的上等阶层。但是

> 阶级等级……在有身份的绅士阶层和工农阶级之间存在差别……整个旧式陆军的结构使乡绅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如此明显，以至于有时不是作为阶级分隔，而是作为等级的分隔显示出来。[但是与普鲁士兵面对容克军官不同；]奥地利的小资产阶级的子孙会以他的军刀作为上级命令，要求农民来见他。尤其荒谬的是……这存在于预备军官的关系中。(Kann，1979，pp.122—123)

无论荒谬与否，奥地利的军事等级——在当代人看来是这些大国中

最软弱的——仍在惊人地起着作用。除了他们有能力在俄军炮兵阵地上带领那些农民屡次进行自杀性冲锋，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就使半数奥地利陆军被歼灭，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类似等级制的职业化、资本主义化和王朝化军官集团的部门性约束力量。

军队旧体制成功地吸收了所有工业革命所抛给他们的东西，没有对民主公民权作出任何让步，资产阶级的子孙需要将他们的举止变得优雅以便成为军官；有才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需要军士的特权；其他阶层需要的是管理法则，而不是专断的纪律。这些就称得上让步？这与现代化国家的民政权力所作出的让步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这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19世纪武装力量的独特隔离性和日益增长的部门性权力。一个军官等级通过军士和长期服役的骨干延伸到有部门性纪律的广大公民，使他们转变成国家的忠实者。“公民权利”不仅仅是马歇尔的普遍权力的实现，也不是国际和平主义的开始。它与军事力量的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国家”部分是部门性组织、中央集权和暴力。

关于独立自治的军事力量

也许这种职业化自治权的形式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它几乎接近于一种明显的军事等级制，并且拥有杰出的骨干力量和对士兵的部门性控制。历史上和当代的许多社会(如英国)都拥有一种不存在重大社会危害的职业化军事等级制度。事实上，如果战争爆发，可以考虑他们统治社会的权力，但是在和平时代，他们可以有自治形式，却几乎不能拥有统治市民社会的权力。然而，在19世纪的和平时代，欧洲“自治形式”可以导致“控制权”。我们前面注意到，外交几乎很少被市民社会所控制，它主要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私事，由类似于旧体制人事部门的军官集团来支配。这未必就意味着灾难。指挥官们通常在地缘政治方

面十分谨慎，对混乱和战争的破坏性十分有见地，对死亡的恐惧有充分的体验。军官集团通常支持殖民冒险，以玩弄真正的战争游戏，开辟发展前景。但是他们对于大国之间的战争十分小心。战争的工业化是保持谨慎的另一个原因。随着给略加训练的士兵供军事武器的可能性的增加，进一步扩大了可调动军队的规模，这意味着可以越出农民和边缘地区，来武装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过程——或者说反动的军官集团(完全是不必要的)对此持怀疑态度。

然而工业化增加了专家治国的权力和军队的危险性。这发生在两个方面。首先，军官集团处于19世纪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最前沿，使用着资本主义最先进的产品和组织形式，分享着实证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军队开始相信细致的计划和协作能给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并且可以通过推测取得胜利。尽管现代化有益于军队，但它也能导致过于自信。也许战争的教训及对下一次战争可能性的预言，便是战争的不可预见性。因为在两次战争之间，武器和战争策略都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因为没有人会恰恰在上一次战争失败的地方再被打败，而且很少是针对相同的敌人，下次战争的命运完全是不确定的。一支真正明智的军队——关心的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明确政治目的——将仅仅利用战争来威胁对方，如果它比敌人拥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由外交来提供，使强有力的同盟国屈从，或使敌人丧失同盟国。然而，最“现代化的”、专家治国论的、专顾自己的军队最善于藐视其他同盟国，它们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国内力量。尽管外交官和指挥官是来自同一阶层，但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和职业经历是截然不同的。外交官对于专家治国的战争知之甚少，而实际上将军对联盟如何建立也一无所知。在19世纪末，最现代化、最奉行专家治国的、最专顾自己且政治上十分无知的陆军是德国军队。它忘记了俾斯麦的外交对取得1865—1867年和1870—1871年的胜利作出了同样多的贡献(参见第九章)。并且它忽略了随后在其他并非纯粹专家治国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法兰西共和国和其新型军事纪律的加强。它那专顾自己的军国主

义就是它的傲慢自大。

其次，在19世纪末，军队特权的专家政治过分抨击防御。在传统上“进行战争”包含着三个阶段。动员一国的军事力量，将它们按战时程序集结，并将它们送入真正的战争。但是工业化、重炮和铁路可以将大量的人力和火力输往前线。这有利于从铁路末端迅速地配合进攻。首次进攻火力可以更集中，但是防御也必须是迅速的协调作战，才可以将火力集中在进攻者身上。总参谋部的计划变得复杂且具进攻性，它详细计划了在紧急状况下采取的三个先发制人的行动：动员后备役军人，占领铁路网，并使用前进所需的海陆空间，有时是不受国家边界和领海的限制。不断向前推进，占有进入邻国的铁路控制权是最具挑衅性的行为，因为它构成了事实上的侵犯，尽管并没有宣战。俄国将军奥布鲁切夫认为动员就等同于战争。在他著名的1892年备忘录中，他写道，在现代战争中，胜利属于军事部署最迅速的一方，“抢在敌人之前发动猛攻”。他总结道：“动员不再被看作是和平的行动；相反，它代表着战争的最具决定性的行为”。

对防御准备和进攻之间的界线抹煞也首先发生在外交方面。1894年法俄联盟授予高级指挥机构以自主权。如果奥地利、德国或意大利动员军队反对它们中的任何一国，它们都将立即动员军队。1900年联盟被限制为仅针对德国出现军事动员的情况，并且在1914年这一条约实际上被履行。大幅度进攻步伐，短暂但可能是仓猝的战争，都超出了平民政治家和外交官的控制(Kennan, 1984, pp.248—253；他重复了奥布鲁切夫的备忘录，见p.264)。同样，1909年莫尔特克(德国的)将军和康拉德(奥地利人)之间的单独讨论中威胁要将俾斯麦的国家间防御联盟转变成一种鼓励对每个国家进攻的联盟(Albertini, 1952, I, pp.73—77, 268—273)，英法协约促使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军事准备，这一直对双方内阁长期保密(参见第二十一章)。

无论专家治国的信心还是高级指挥机构的计划都能在事实上先争取到那些依赖于可靠渠道的政治家们。正如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中所关

注的，政党民主的政治机构使军队比君主政体下更负责任。在 1914 年 7 月奥地利、俄国和德国展开了一系列先发制人的军事动员，首先倾覆的是它们自己的政权，随后是整个欧洲的政权。此后，自主的、有内聚性的军事等级制度被证明拥有统治社会的决定权。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思想体系，它尽管仅是一种“世界历史性时刻”的力量，但却摧毁了旧的体制。

结论

通过回顾漫长的 19 世纪，我已对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发展进行了探索。大多数内在的发展都支持军事等级制度的理论——来自平民和国家控制的武装力量在制度上拥有自主权，陆军和海军的组织已更加完善，并且逐渐与市民社会更加隔阂，同样也更为脱离国家。在征募、训练和团队精神方面，军官集团已转而依靠自己。它是与旧体制以及资产阶级后代的独特融合，并且在前者的思想控制下，形成了一个与先进工业化社会中任何主要阶级都毫不相同的军官集团。内在的官僚主义、职业化和专家治国理论的发展增强了他们活动的隐蔽性。长期服役和军士骨干，加上指挥机构与个别区域性军事团体之间存在的更紧密协作，确保了在不对公民、民族或阶级作出重大妥协的情况下，对众多的士兵和水兵实施有效的部门性控制。许多国家已试图规划出军事上的永久防御措施和军事触角，以牢牢地拥有自己的领土和人口，并控制人民的忠诚。特殊孤立的并且具有内聚性的武装力量已成为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在现代国家和整个市民社会中产生出一个重要的、独立存在的军国主义结晶。

但我必须证实这一点。军队的职能也将军事力量与社会、国家纠缠在一起，在许多方面限制并减少了等级制度的自治。军队在市民社会中的持久嵌入是源于它们的第二类职能，即国内镇压，这使军官集团

能够进入广泛的政治权力网，并加入在经济上起支配作用的阶级。因为军官集团浸透旧体制的反动准则，他们普遍同旧体制和资本家一样对城市暴动和工人骚动充满敌视。然而作为来自农村的反动分子，军官不仅仅是现代工业资本家的傀儡。他们的职业化也使他们不愿将精心控制的力量显示演变成为真正的刀枪相向。这种勉强情绪促使他们与不断扩编的警察及国家准军事机构相勾结。职业性的谨慎通常使他们支持城市各阶级之间的妥协。正是因为这种重实效、有节制的镇压标准使他们的部门性训练组织几乎总可以提供忠诚的士兵。在他们的镇压职能中，军队因此代表了新旧两个统治阶级的结合。到1900年，军事力量网已通过调解帮助国家的两个阶级形式结合。一个形式是旧体制，另一个则是资本家。他们的等级制度所具有的内聚性和他们对士兵的部门化控制使统治阶级更加安全。

在某种程度上，军队、旧体制和资本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开始渗入到军队的主要职能——战争。在外交政策方面，军队与政府首脑、在本质上是旧体制的政府外交官及政治家的合伙人相勾结，它基本上独立于大部分政党或公众舆论(我将在第十六章和二十一章中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在专家治国方面，他们还与工业资本家进行勾结，这些工业资本家所生产的产品为军队提供了武器、通讯设施和补给(在第十四章中将探讨这一问题)。这种“军事—工业综合体”在某些时候也包括一些更为广泛的关系，如与国家的关系，与广大主张中央集权的中产阶级压力集团之间的关系(将在第二十一章中讨论)。但在其他造成战争的原因中，军队仅是一种隐蔽的因素。军队的专家政治鼓励了隐蔽的等级制度和被孤立的过分自信。它也贡献出了自己的秘密定时炸弹——战术的内在发展开始超出防御阶段，特别是逐步升级的现代化。

各方面的相互纠缠刺激了军事结晶中的双重性——等级制度的自治权及与之伴随而来的旧体制和资本主义的防御战术。1914年，旧的自治权走到了尽头。官僚化、职业化、军事—工业的专家政治、旧体制中统帅部和外交的支配地位，以及制定军事和外交决议的孤立性，所有

这些方面的结合体重新创造了一个军事力量自主权，它融入国家的形式仅仅是一种伪装。作为军国主义的形式，最重要的是独立并且大大超出其他所有的国家形式。

有些人担心这会对旧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形式产生反作用。如果将军队推入大规模动员战争，许多指挥官怀疑会产生阶级危险。改革可能同样威胁到军队的等级制度、旧体制、政府及资本主义。大多数指挥官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他们最坏的担忧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会成为现实。但是，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毫无意义的屠杀中，军队的等级制部门性权力仍结合在一起。只有俄国陆军因破坏了团结而激起了革命。在所有其他实例中，部门性军国主义都幸存下来：在战胜的军队中强化了社会保守主义，在战败的军队中怂恿了激进的右翼独裁主义——并从此以后发展成法西斯主义。战后，阶级冲突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现在又与军队反叛者和忠实者之间的冲突相融合。多数反叛者是已退役的水兵和预备役军队，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控制他们的纪律已十分松散，同时大部分忠实者都是前线的骨干部队。这种纪律约束的士气差异，给了右翼独裁者和法西斯主义者 squadristic 和志愿军以决定性优势。军事力量——尽管它被 20 世纪的社会学家所忽视——被证实对 20 世纪的社会具有巨大的致命影响。实际上 1914 年的世界性历史时刻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注释：

[1] 本章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来源于瓦茨(1959)、贾诺威茨(1960)、古奇(1980)、贝斯特(1982)、麦克尼尔(1983)、斯特罗恩(1983)、邦德(1984)、安德森(1988)以及丹德克(1989)。

[2] 埃姆斯利关于警察力量的比较研究为该部分的论述提供了广泛的依据。

[3] 第三世界国家劳资关系的制度化对其社会的非军事化没起太大作用，这可能归因于如下事实：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比西方国家薄弱得多。许多国家的工业工人阶级，如拉丁美洲，其所占的人口比例远远少于历史上同期水平的西方国家。

[4] 事实上，我将其归于 18 世纪的改革预兆，早在 17 世纪的西班牙就已初露端倪——尽管后者对前者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正如本卷所示，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几个国家上，难免会夸大它们的共同影响。

[5] 在第三卷中将涉及到对“一战”士兵士气所作的杰出研究，那时我将对这些强制性措施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参考文献

Albertini, L.1952.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Vol.I.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M.1988.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urope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Fontana.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1913.

Axtmann, R.1991. Geopolitics and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s: The State Police and Public Order in Austria and Irelan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Ph.D.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Berryman, S.1988. *Who Serves? The Persistent Myth of the Underclass Arm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Best, G. 1982. *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70—1870*.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Bond, B. 1972. *The Victorian Army and the Staff College, 1854—1914*. London: Eyre & Methuen.

1984.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870—1970*. London: Fontana.

Bosworth, R.1983. *Ital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London: Macmillan.

Brewer, J.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London: Unwin Hyman.

Brodsky, G.W.S.1988. *Gentlemen of the Blade: A Social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Since 1660*.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Cecil, L. 1976. *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 1871—191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D.1966.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Charle, C.1980a. *Les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France au XIX ièm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80b. Le recrutement des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1901.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no. 2.

Corvisier, A.1964. *L'armée francaise de la fin du XVII ième siècle au ministère de Choiseul: Le soldat*.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raig, G.1955.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andeker, C.1989. *Surveillance, Power and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Deak, I. 1990.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meter, K. 1965.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in Society and State, 1650—1945*.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Dupuy, R.E.1971. *The National Guard: A Compact History*.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Elias, N.1983. *The Court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Emsley, C.1983. *Policing and Its Context, 1750—1870*. London: Macmillan.

Floud, R., et al.1990. *Height, Heal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Giddens, A.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rardet, R.1953. *La société militai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15—1939*. Paris: Plon.

Goldstein, R.J.1978.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Moder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83.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Gooch, J.1980. *Armie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urr, T.R., et al. 1977. *The Politics of Crime and Conflic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Four Cit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Hall, R.H.1963—4. The concept of bureaucrac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

Hampson, N.1959. *La Marine de l'an II: Mobilisation de la flotte de l'Océan, 1793—4*. Paris: M.Rivière.

Harries-Jenkins, G.1977. *The Army in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erwig, H.1973. *The German Naval Officer Corp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ilderbrand, R.C. 1981.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ill, J.D.1964. *The Minute Man in Peace and War.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Guard*. Harrisburg, Pa.: Stackpole.

Holsti, K. 1991.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 lchman, W.1961. *Professional Diplo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nowitz, M.1960.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New York: Free Press.

Jany, C.1967. *Geschichte den Preussischen Armee*, 4 vols. Osnabruck: Biblio Verlag.

Kann, R. 1979. The social prestige of the officer corps in the Habsburg Empire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1918. In *War and Society and East Central Europe*, Vol. I , ed. B.Kiraly and G. Rothenberg. New York: Brooklyn College Press.

Karsten, P. 1972. *Naval Aristocracy: The Golden Age of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Father's occupation of West Point cadets and Annapolis midshipmen. In The Military in America: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 ed. P.Karsten. New York: Free Press.

Kennan, G. 1984. *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P.1985.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Fontana.

LaFeber, W.1987. The Constitution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Langsam, W.C.1930. *The Napoleonic Wars and German Nationalism in Austr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G.1969. *Napoleon: From 18 Brumaire to Tilsit, 1799—180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udtke, A.1989. Police and State in Prussia, 1815—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nn, J.1984.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cartney, C.A.1971.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cNeill, W.1983.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Blackwell.

Martel, G.1985. *Imperial Diplomacy. Rosebery and the Failure of Foreign Poli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A.1983. *The Chancelleries of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Parsons, T.1964. The profess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hi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 ed.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oggi, G.1990.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rch, D.1974. *Army and Revolution. France, 1815—184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The March to the Marne: The French Army,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eradovich, N. von.1955. *Die Führungsschichten in 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1804—1918*. Wiesbaden: Steiner.

Razzell, P.E.1963. Social origins of officers in the Indian and British home army: 1758—1962.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4.

Riste, O.1965. *The Neutral Ally: Norway's Relations with Belligerent pow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llen & Unwin.

Ritter, G.1969. *The Sword and the Sceptre*. Vol. I : *The Prussian Tradition, 1740—1890*. Coral Gables, 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Robbins, K.G.1977a. The foreign secretary, the cabinet, parliament and the parties, and

1977b. Public opinion, the press and pressure groups. Both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Sir Edward Grey*, ed. F.H.Hins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dger, N.1986. *The Wooden World*, London: Collins.

Rohl, J.1967.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Germany, 1890—190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

Rothenberg, G.1976.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Napoleon's Great Adversaries: The Archduke Charles and the Austrian Army, 1792—1814*. London: Batsford.

Runciman, W.G.1987. The Old Questi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9.

Scott, S.1978.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rman, S.1978. Le corps des officiers francais sou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a Second Empire. Thesis, University of Lille Ⅲ.

Skelton, W.1980. Officers and politicians: the origins of arm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The Military in America: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 ed. P.Karsten. New York: Free Press.

Steiner, Z.1969. *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iner, Z., and V.Cromwell.1972. The Foreign Office before 1914: a study in resistance. In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 Century Government*, ed. G.Sutherl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tephens, J. 1989.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breakdown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39.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trachan, H.1983. *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Wellington's Legacy: The Reform of the British Army, 1830—5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Teitler, G.1977. *The Genesis of the Professional Officers Corp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Tilly, C.1982. Proletarianization and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in East Anglia and elsewhere, 1500—1900. *Peasant Studies* 10.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Tilly, R.1971. Popular disor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a preliminary surve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

Vagts, A.1959.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Wildman, A.1980.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V.1972. *Le conseil d'état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Colin.

第十三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三)：官僚机构化

在对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官僚制度”一词无处不在。然而，它很少有明确定义，并且经常被误用。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从韦伯开始，社会学家们就经常精确地使用这个词。韦伯(1987：I，220—221)给官僚制度划分了十个构成要素：

1. 官员是自由的，仅在公职工作中服从于权力。
2. 官员被组织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公职等级制度中。
3. 每一种公职都有一个明确界定的权限范围。
4. 所有公职都通过自由签约来担任。
5. 对公职候选人的选择是根据资格，通常是考试和技能培训。
6. 支付官员以薪金并给予养老金。
7. 公职职责是政府任职者唯一和首要的工作。
8. 公职成为一种职业，包括被上级提升或因业绩而晋升。
9. 官员与行政手段的所有权相分离。
10. 在工作中，官员的行为要服从组织纪律和组织管理。

这的确比我们所需要的更详细——并且在对现代公职方面的研究表明，这十个构成要素大多是密切相关的(Hall，1963—1964)。为了进行宏观的历史性概括，我已将韦伯总结的十个要素简化为五个主要特征。其中，两个特征是关于全体官员的，两个是关于公职结构的，还有一个表明他们与广大社会关系的特征：

被称为官僚的官员，(1)由于处于受雇用和拿薪金的地位，而与官职

的所有权分离。(2)是根据客观的能力标准被任命、晋升和解职。

官僚制度的公职是(3)被组织在各部门之内，每一个部门都实行集权并体现着劳动力的职能划分；(4)各部门联合成一个综合的政府，这也体现着对劳动力的职能划分和中央集权等级制。

最后，官僚制度的先决条件是(5)从关于社会准则的广泛社会斗争中隔离出来。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受“形式上的”或“作为手段的”合理性所支配，从包含在政治和社会准则中的“本质上的”合理性中分离出来。各种官僚制度在贯彻来自自己政府以外的实质性目标方面是有效的。如果一个政府引入实质的或价值的合理性以及政党斗争，那么它将会融于社会之中，进而减少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官僚制度以行政管理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为先决条件。

这五种主要特征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每一种特征都可以在没有其他特征的情况下出现——尽管特征(1)不可能脱离特征(2)而存在，并且特征(5)往往是以其他特征为先决条件。所有政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官僚主义性质，但是成熟的官僚制度要求五个特征同时具备。它也是一种普遍的、全国统一的民政类型。官僚机构化已伴随并鼓励了民族国家的成长。

假如现在西方国家大多是官僚政治，那么这一章依据经验提出两个简单问题：这些国家何时实现了官僚机构化，并且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声明，在这里我不是要对这些问题给出完全独创性的答案，确切来说，我是综合了现存的研究文献。众所周知，许多国家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实现政府的官僚机构化，但是就我所提到的五个国家而言，它们当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被证明是某一方面的先驱，因为它们都对社会权力根源纠缠在一起的现象作出反应。然而，官僚机构化仍是不完善的(正如它今天依旧不完善一样)，特别是在政府的最高层。正如军队中，官僚机构化和官员的社会身份互相约束，因而在国家政府中产生了一个双重性的形式：作为“精英”政府，它是温和的专家治国的官僚主义；作为“政党”，它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政策。国家仍未实现中央集

权制。

旧政权的行政管理

正如第十二章所示，官僚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家武装力量进入政府的，在出现文官政府之前，国家已基本上完全实现了官僚制度化。到1760年，军事改革冲击着文官政府，尤其是在海军的后勤部门和财政部门。然而这并未走得太远。在18世纪的文官政府中，“雇佣”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那时存在着五种担任官职的情况和四种酬劳方式。

官职的担任：

1. 世袭的所有权主宰了最高层次官职的担任——当然这由君王来决定。高级官职可以直接传给男性后嗣。除了皇室家庭成员和宫廷侍女，这一时期高级官职没有女性担任。

2. 官员可以被推选出来，通常由与他同等地位的人来推举，任期终生或有一个固定的期限。

3. 官职可以购买。根据严格的法律，这些官职很少能传给后嗣，但实际上，经常成为世袭的，与第一类情况很难区分。

4. 通常行贿与更高一级官员搞好关系，从而可以通过他的任命权获得官职。所有权归庇护人而不是真正担任职务的官员，他可能被解职，这取决于庇护人的意愿。

5. 以现代的方式，如能力或经历等类似的客观标准来获得和解除官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人能占有它。

酬劳：

1. 许多官员没有正式的酬劳，而是依据他们的社会地位来履行备受尊重的职责。

2. 官员享受官职的报酬，也就是适当的酬金和由职务所带来的

津贴。

3. 薪水不直接付给从事公职工作的人(正如现代的模式)，而是付给一个领干薪的庇护人，然后由他雇用并付薪给一个代理人去做公职工作。

4. 按现代社会的方式，薪水是直接付给担任官职的官员。

担任官职的情况和酬劳之间有许多种结合的可能，尽管有几种结合占有优势，仅有一种结合方式——财产所有权、只拿薪水、真正从事工作的官员——才能被认为是潜在的官僚，因此他们是18世纪中期国家行政官员中地位卑微的少数派。其他结合方式则嵌入了某些具有排他性、分散性和部门性行政控制的形式。正如韦伯所注意到的，官僚制度以官员与其行政手段相分离为先决条件(他采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由于政府的官僚化，行政官员不可能从自己的决议中获益，他们必须受行政等级制的控制，如果不遵循客观的行政准则，那么他们一定会被免职。在18世纪这些条件无法实现，因为行政官员或他们的庇护人"拥有"公职并可以从中获利。所有者及庇护人的财产权阻碍了国家政府的中央集权化、合理化和独立性。

照我们看来，他们的权力像是"腐败"——并且它们最终被认为是腐败并被废除。但在18世纪，这样的权力构成了一种"行政代表制"，通过允许统治阶级的区域性政党来分享国家政府的控制权，以限制皇室的专制主义。在英国和荷兰，刚刚萌芽的政党民主不仅仅意味着议会；而且在专制主义的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官职所有权是对集权化专制统治的主要限制，同时减少了国家自主权。事实上，这使它很难像一个运作者那样去谈论"国家"。旧政权的官员较深地融入市民社会。

随后，出现了两种改革的努力，第一种是来自专制主义，第二种来自于对公职的民主拥有倾向。它是对代表制进行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重新定义。

第一阶段：王朝的君主政体和战争，1700—1780 年

现代官僚制度的第一代铺路人是王朝的君主们，在形式上他们高于自己军事和民事权力中的区域性社会。皇室家庭和私人领地的政府实际上是属于君主的，现在君主也无可争议的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国家精英作为一个“它”，一个运作者，潜在地存在于名流显贵的随从、朋友、亲戚以乃君王的侍从之中。这个“它”仅仅构成君主政体核心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整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君主政体核心之外为由贵族、高级牧师和地方显要组成的政党，它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行使着有效的自治权。专制暴君的实际权力受到软弱无力的基础结构权力的限制，其特征为依靠区域的——有时也是中央的——拥有公职的行政官员，王朝君主制定型为双重性的：作为宫廷及政府中的派别主义和阴谋诡计，实行中央集权的王朝和行政权力分散的旧体制政党都已过时。

由于原因略微不同，两个最不具代表性的政权，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发起了 18 世纪官僚制度的攻击。其他的德意志各邦、瑞典和俄国也加入其中。第一次主要倡导国家改革的思想运动，即财政学派，主要出现在信奉路德教的北德意志地区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奥地利各所大学中(Johnson, 1969; Raeff, 1975; Krygier, 1979; Tribe, 1984, 1988)。在整个 18 世纪，财政学者们发展了一种“行政科学”。他们通过论证认为，政府各部门(Kammer)应该实现中央集权化、合理化，通过系统收集统计资料来获得信息，并服从于普遍的行政和财政规则。这将更好地实现三个政治目标：提供良好的秩序，鼓励臣民(而不是公民)的经济活动，并且例行抽取他们的财产收入作为国家岁入。他们最喜爱的比喻就是：国家就是一台机器。

一个结构良好的国家必定与一台机器极为相似，在这台机器

中，所有的轮子和齿轮都能精确地互相调整；而管理者一定是工头，是主要的动力，或是灵魂……，这调动了一切。(贾斯蒂，一名财政主义者，由 Krygier，1979，p.17 引证)

18 世纪早期的财政学者都是法理学家、大学教授和知名的行政官员或其顾问，他们强烈要求君主废弃允许地方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政策。这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官僚们"(约翰逊的措词)后来卷入了中欧的开明专制主义，要求实行大规模的国家改革。反教权主义也成为奥地利财政学派的特征。到 1790 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中有三十多名财政学派的教授任教，并出版了大约六十部关于这一问题的教科书。此后，在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者的影响下，财政学衰落了(Tribe，1988)。处于"现代化"理论中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阶段的中欧为英国的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

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国家比西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王朝化，并更隔离于市民社会。它是一个庞大的联盟，其中，皇家中央政府和军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等级，与许多省及历史上著名的王国中的统治贵族等级和权力行政机构相分离。正如第十章所示，哈布斯堡家族创造了一个勒索保护费的勾当：各省同意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以避免潜在的更糟糕的其他人或相互之间的专制主义。皇室核心是一个中立的"它"，代议制的公职担任使之相对不受约束——在这个天主教国家中许多官员和军官是"中立的"外国人和新教徒，后来，许多犹太人担任了官职。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的后果之一就是突然发生了重要改革。周围的强国都企图瓜分由一个女继承人玛丽亚·特里萨登基统治的哈布斯堡家族领地。面对可能被瓜分的局面，精力充沛的女王被迫依靠她的核心皇室，在财政学派和普鲁士军政府提供的联合模式下，节约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库资源。她的高级官员们尤其受到普鲁士军队观点的驱使，普鲁士军队从西里西亚抽取双倍的岁入，他们已在 1740

年之前就这样做了，当时西里西亚已是奥地利的一个省(Axtmann, 1991)。奥地利军队最终服从于君主并且职业化。大部分高级皇室官员开始领取薪金，他们的退休金被转化成为一种单一的合理化退休基金，这一措施比其他地区采取得都早。从1776年起，高级官员必须出示学过财政学派的证明，大学和报刊实现了自由主义化和世俗化。大部分主要的政府部门——特别是维也纳城市银行(事实上的国库)、矿业和铸币部门，以及财政部(核心部门)——现在成了官僚组织。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表格11.7所展示的奥地利早期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中。

然而，奥地利的官僚机构化受到两方面的限制。首先，个别部门没有被并入一个单一功能的等级制度的结构中。与更早时期集中于宫廷的国家机构并存，这些机构中没有独立的持久内阁，没有有效率的首相，反而是许多委员会和大臣们为了接近君主和影响宫廷而进行竞争。君主政体、宫廷、教会、高级军官和行政官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我们甚至可以将他们认为是国家精英，如果难得这是一个统一体的话。但是奥地利国家不是一种独立的官僚政体。它是一个君主政体。它的所有目标都是通过相互贯穿且政党渗入的政府来实现的。

其次，在政府中，仅仅是在中央皇室等级的特征中具有这种部分的官僚机构化，主要在维也纳，其地位高于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等区域性的行政机构，这些区域性行政机构的公职或是由社会阶层选举或是被地方贵族和教会中较高职位的人所拥有。正如表4.2所指出的，皇室行政机构比国家更缺乏地方性的基础权力，政府官员嵌入得更深。玛丽亚·特里萨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这个欧洲最大的帝国中，野心勃勃地实施了“开明”计划，但他们不可能使之制度化。约瑟夫二世有意识地与地区性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主张进行艰苦的斗争，但他失败了，匈牙利贵族和低地国家的贵族、商人和教士以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自由权和代表特权为名义发动反叛。当约瑟夫将他们推得太远时，这两部分人便开始与普鲁士谈判(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勒索保护费的行当)，约瑟夫的继任者利奥波德，恢复了他们的特权和官职。开明专制主义

回缩到首都地区(Macartney, 1969; Beales, 1987; Dickson, 1987; Axtmann, 1991)。一个独立自主并奉行原始官僚制度的18世纪国家，其基础结构是软弱无力的。奥地利没能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实行官僚机构化和现代化。

普鲁士政府几乎是一成不变地(尽管这毫无帮助)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官僚"制度，我主要依据他们对帝国的研究。普鲁士的皇室国家核心也明显地向官僚主义的人事制度转变——再次是由于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普鲁士，改革者与其说是财政学派的，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来自军队。正如普鲁士在中世纪王朝战争的考验中获胜一样，一个不断膨胀的军事财政政府包围着皇室领地、王室特权(铸币厂和矿业)、社会阶层以及城镇居民。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下，一个由四名部长组成的总税务代表管理机构监管地方中负责战争和领地的部门，监督税务长官和地方官员(县长)。一名部长的名言是："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国家是这支军队的司令部和粮仓。"(Rosenberg, 1958, p.40)

因此，1750年以后，很少存在拥有公职的现象。中央和区域的高级官员领取薪金和退休金并且由君主任免。在财政学派影响下，18世纪3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法官的培训和考核。到1780年，法官必须得到大学的法学学位，经历两年在职训练，并且还要通过一次考试(Weill, 1961; Johnson, 1975: 106—133)。参加任职考试的要求在1770年到1800年之间扩展到高级行政机构。大学学位成为正常的资格要求，它赋予行政人员一种"全国性"的文化内聚力——大学是"德国人"身份的主要标志。1794年的法律条文强调了所有这些资格要求，并承认行政人员的合法任期应视他们履行其职务的能力而定。他们现在不被称作皇室臣外，而是"国家的职业化行政官员"(王国的公职人员)。他们是真正的官僚，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官僚主义的铺路人，普鲁士已超越了奥地利。在"全国性"官僚制度方面，普鲁士走在了前头。

然而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化也是有限制的。如同它的前辈即军队一样，它是旧政权的定型，这是因为它是贵族，尤其是容克贵族相妥协的产物。正如表4.2所示，普鲁士国家的基础结构是有效的，因为它主要协调了国家精英和来自统治阶级各政党之间的关系。随后而来的是国家现代化和资产阶级扩张的紧张形势，直到19世纪20年代，少数贵族才进入大学，人们公开承认在接受私人教育、“有实践经验的”显要官员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富有平民及“国家”官员之间存在着冲突。君王在他们之间操纵着，既唯恐受贵族的过分控制，又担心官僚特权阶级的威胁。在普鲁士(随后在俄国)，旧政权和殷实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生在国家政府的机构以内。

普鲁士人的斗争成功地实现了妥协。资产阶级的专家得到承认并且贵族开始接受教育。大多数高级文职和军职官员仍是贵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前，陆军、海军和民政部门的大规模扩充，当时贵族最终无法提供足够的后裔来任职(Bonin, 1966; Koselleck, 1967: 435; Cillis, 1971, p.30；第十二章中所叙述的军事资料)。事实上，随着容克阶层丧失了其经济力量，他们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机构中的职业(Muncie, 1944)。考试也只是一种资格认证而不是竞争。高级官员可以选择推荐那些他们所喜欢并已通过考试的候选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行政机构仍陷于旧体制中。因此，行政人员虽然是为国王服务，但也拥有自己阶级授予职务的独立性。像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通常选择不执行他们所厌恶的命令(Blanning, 1974, p.191)。

普鲁士的民政机构也是作为军国主义定型的。行政官员身穿制服并被授予正式的军衔。军国主义也扩展到中、低阶层中(Fischerand Lundgreen, 1975, pp.520—521)。陆军的动员依赖于一支强大的受地训练的后备役军队，尤其是军士。在战争结束后如何安置这些老兵，并如何为了下次战争而有目的地留住他们？甚至在18世纪，霍亨索伦王室就敦促大臣们建立一种由国家雇用退伍老兵的方式。作为城市审计员、工厂监察员、警察、小学教师甚至是牧士和以后的铁路雇员，老兵

都受到欢迎。从1820年起，假如有文化并且有计算能力，所有服役九年的军士都可以要求提升到行政机构，从事办事员和会计工作。此后，奥地利对那些服役十二年的军士作出此项担保，法国则在1872年将类似惯例写入法律条文。20世纪德国许多有关纪律和处罚的规则和行政机构法规，甚至将高于一切社会秩序和实施这一措施的军队视为首要地位。军事管制法保留了普鲁士德国政府一种长久存在(Ludtke，1989)。

旧体制和军国主义这两种国家形式，赋予行政机构一种与众不同的“普鲁士”特征。这两种形式增强了对政府彻底控制。这与其说是通过韦伯的合理会计做法，不如说是通过集体精神和惧于惩戒的结合。这种结合方式是有战斗力的军事贵族的标志。这个现代政府就被传统阶级和各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所渗入。

对普鲁士官僚政治的第三个限制，从相反方面起作用，这减少了国家同质性。正如奥地利一样，普鲁士也没有成功地合并各个不同的行政部门。在各部门中出现了等级制度、阶层和职业结构。但部门之间的关系仍十分混乱。总理出现于战时遇到的一次入侵的危机。它的一部分大臣具有地方性的权限范围，另一部分有职能性权限范围。最初他们都位居皇室枢密院，但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下，这一机构被废弃了——腓特烈想将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手，而不是由大臣们来掌管。他的部门性分而治之政策减少了官僚机构化并使任何一个可能组织力量与他相对抗的首相被挫败(Anderson and Anderson，1967，p.37)。所谓的内阁不是大臣委员会，而是与大臣维持独立联络的宫廷顾问们组成的顾问班子。随着普鲁士的扩张，新的机构沿着旧的部门激增：

> 五个主要的官僚制度按不同目的而运行，它们相互对抗并且只承认国王是它们共同的主人……1740年以后，独立的官僚机构不存在了，机构职能没有被逻辑地划分并分配给那些处于官僚等级制度中的人们。普鲁士政府变得越来越分权下放……被分成

相互对抗的几部分。(Johnson，1975，p.274)

行政机构混合了两种责任原则，一种是官僚集团做出共同决定的原则，另一种是受到大多数改革者支持的“一人决定原则”。普鲁士政府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中央集权化的。在它的高层，它融入了一个以君王为中心不愿放弃分权的贵族宫廷。大臣们，甚至在有了总理一职后的历届总理都依赖于宫廷阴谋和正式的行政职务来施加影响，其目的就是直接可靠地接近君王。专制主义仅是一种虚构的君主统一。尽管其官员是雇佣身份，但它也不可能是官僚政治。

然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国家是18世纪最具官僚制度(主义)的国家。两个国家都各自通过进一步的自治增强了王朝的君主政体，这种自治权来自奥地利的王朝联邦主义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法国尽管在形式上是专制主义国家，但并未如此孤立。几个世纪以来对地方贵族和共同团体的特权所做的调节甚至已融入到市民社会中的最高层，嵌入到一种仅仅能被描述为独特的腐败和“代议制”的专一形式中(Bosher，1970；Mousnier，1970，p.17；Fischer and Lundgreen，1975，pp.490—509；Church，1981)。

法国存在两种主要的雇佣状况。大多数行政人员被称为官员，通常是拥有通过花钱购买而得到的官职，他们的财产权受到法人团体的保护。少数人被称为“委员”，是领薪并实际工作的雇员。随着委员们对所有权的追求以及国王为减少贪污贿赂而进行的斗争，这两种雇佣地位之间的界限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到18世纪70年代，在法国有五万名拿薪并可免职的行政人员，大多在政府各部、海关和邮政局工作。他们身份低于行政官员，通常是从属于官员。尼克尔(1784)估计，仅在法庭、市政机构和财政机关就有五万一千个可贿买的官职职位。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加上以下几个可贿买官职职位的部门：皇室家庭、包税、其他国家和政府机关开办的金融公司，以及由行会监察员、督察员和执行官——甚至假发经营者来掌管的办事机构。泰勒(1967，p.477)和多伊尔

(1984, p.833)估计这些人总共占成年男子的2%—3%——大约有20万人。我们应再加上内克尔所估计的，在21.5万兼职国库岁人收税员中的大约10万人(其他职位可能被算入上文提到的可赎买的官职中)。这些职务中有些是赎买的，有些是领薪的。我妄猜一下，在这些官员中至少有20%是领薪的官员。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测，因为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发现(正如我在第十一章中更普遍地注意到的)。

在任何一个部门中，对于任命或晋升都不存在客观管理。大多数高级官员都预先受过法定的培训，但这对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都是很正常的，它不是行政技能的培训(这在普鲁士也是行政技能的一种部分的训练)。根据我们用韦伯的两个人事标准分析，法国行政人员中大约5%可被称为官僚。法国充斥着私人和团体财产权，并彻底地植根于市民社会中。

在各部门内部及部门之间，各种机构也没有多少官僚组织。在关键的政府部门，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等级制度就已发展，包括薪水的级差和职务的高低。但是即使在这样的部门以及其他无法控制的地方，正如它们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所做的那样，所有权超越了信息和管理的等级及职能界限，法国政府混合了集体管理和个人主管的形式，但随后二者都夭折了。旧的行政法院已分成各种专门的立法委员会，部分委员会并入宫廷法院。正如大多数国家一样，财政大臣已成为关键性官员。但是他在顾问委员会和宫廷中却没有特殊地位，并且他甚至几乎无法对漫无条理地发展的财政机构行使权力。在地方省份，他们更多地依赖一个个地方行政长官和他那一小撮职员的能力，但是他们必须与地方贵族友好协作，充满了专一特权。

改革者们知道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的政府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法国启蒙运动是在财政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提出了更具危险性的政治要求)。在大臣当中如尼克尔，都有庇护人，他们计算人数和费用，消除大臣的贪污腐败，并且试图整顿主要的行政局面(没有

人能了解全部，更不用说改革)。但他们的进展，正如尼克尔所承认的，是有限的：

> 副代表、通过选举当选的官员、管理人、二十分之一税的收缴和管理人员、租税的收税员和国家特派员、盐务税官员、督察员、递送传票的司法人员、徭役工头、间接税的代理人、审计官、后备税官，所有这些皇室国库人员，根据各自特点，每个人都克制他那小小的权威并将无知的纳税人纳入他的财政学，这些纳税人不可能知道是否受到欺骗，但是却不断怀疑并担心这一点。(引自Harris，1979，p.97)

20世纪的主要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旧体制从未有过预算案，从未有过立法条例来预见并认可某一特定时期内收入与支出的总数……它仅了解破碎的不完整的国家"(Marion，1927，Ⅰ，p.448)。

许多历史学家被吸引去用"官僚主义"这一措词来描述这个国家，我认为这一点是异乎寻常的。例如：哈里斯将皇室总包税区——它是将占有的公职作为私有财产和利益的标石——称为"巨大的官僚机器"(1979，p.75)。在旧体制的法国几乎不存在官僚制度的痕迹。

王朝主义经历了某种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但在普鲁士特别是奥地利，政府机构仅仅与最高的皇室层次上的各个阶级隔绝开来。从总体上说，这似乎并不比旧政权控制下的政党统治更重要。这种旧政权是带有重要政治性的阶级和融合官员的联合，这在法国尤为显著。在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我们也发现了高度融合的旧政权——但存在于一个萌芽时期的政党民主中，它包含各种议会政党派别以及腐败的官员。这种结合体产生了一种与普鲁士一样具有内聚性的英国政府，但英国远未官僚机构化(对于英国与普鲁士的比较，参见Mueller，1984)。

大约1800年，在英国，那些抽取职务薪水和收益并雇用代理人来做实际工作的领干薪的人，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拿薪水并亲自工作的

高级官员。事实上，国家财政部所有的三百个职务全部是由代理人担任的(Binney，1958：232—233)。在海军部，财务大臣任命并付薪给自己的军需官，让他来做自己的工作，甚至在付清所有的部门支出以后，两名负责预付薪金的审计官员还保有自己原本就相当优厚的薪水的大部分(每年超过 16 000 英镑和 10 000 英镑)。据 1780 年的公开揭露，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财务大臣和审计官员从未真正介入过其部门的工作。在国务大臣的办公室，甚至办公室的清洁工都是另外雇用他人(Cohen，1941，pp.24—26)。在英国，除了在海关和税务局以及技术性的海军部外，对于官员晋升既没有正式的标准，也没有对预先资格和考核的要求。他们甚至将资助人也正式写入推荐信(Aylmer，1979，pp.94—95)。

在部门之间甚至是在部门内部都不可能有中央集权化的指挥系列。在每个层次级别上，它都被职务的自主财产权所挫败。但在 18 世纪情况发生了转变。在代表国王的上议院中，首席财政大臣逐渐成为“首相”，接着是两名主要的国务大臣和地位较低的大臣们以及控制特定部门的委员会。然而国王和议会两院的成员都有独立发挥自己影响的途径并拥有在各部门授予官职的权力。

> 公共事务是在若干个或多或少有些独立的部门中处理的，即无人监督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无人监督他们的支出细节……首席财政大臣不能对政府任何一年的费用支出作一个尚可过得去的猜测。(Cohen，1941，p.34)

直到 1797 年，从未试图对官员数目进行统计。

正如在法国，“贪污腐败”是受到坚决维护的。而在英国，则是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性腐败，因为它的根源来自议会中的国王和大臣们。腐败给业主和庇护人带来回报，但它也保证了皇室政府只能通过有产阶级的“第一国家”政党来发挥作用。政府并不与政治和阶级隔离。腐败而特殊的“代议制”对于后来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农业社会是十分适

合的。一方面，它们缺乏交流和政党纪律，这在以后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增强了议会代议制；另一方面，它们的人口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超出了控制，这种控制来自皇室顾问班子或从议会辐射下来的排他性家族网络。在法国，行政代议制产生了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但在英国则产生了高效的行政机构。事实上，直到18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改变，尽管市民社会产生了惊人的变化。

然而，英国的官僚却活跃起来，当时国家的军国主义使国库财政压力逐步升级——首先是在海军的技术部门(而不是在更贵族化的陆军)，接着是在海关和间接税务局。布鲁尔(1989)指出，间接税务部成为第一个由国家高级官员直接掌管的民政机构。一个“原始组织图表”中包含了四千八百名职员，他们大部分是领薪俸的(尽管这一用图表的表现手法当时还未发明出来)，体现了职能和等级上的联系与控制的正式途径，提出了正规的书面报告，事实上是实现了可预见的税收(这在18世纪是不同寻常的)。这与执行历史悠久的土地税的腐败政府形成对比，同时也冲击着财产所有者，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精心策划了对官职的控制。间接税由异常高效且存在着专制暴君的国家即克伦威尔的共和国所采用。尽管在本质上存在争议，但间接税的征收并未在旧政权中造成太大痛苦。它是从商业上的超额利润和无权势的穷苦人的消费中征收的税额——它为有利可图的全球扩张提供了资金。然而间接税务部是一匹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在18世纪80年代，到极力主张议会调查代理权的改革者们对它的官僚制度模式大加称道。

现在官僚政治存在许多外部压力。同时，更为矛盾地是对于全国政府也存在许多外来的压力。第四章用图表表明了一个猛烈抨击浪费和腐败的全国性“经济改革”运动的发展。这取决于两种刺激力量。首先，正如其他国家那样，这来自于现代战争的财政压力。由于七年战争创造出这次改革运动，它是英国迫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压力第一次进行的真正改革。其次，这次运动与旧政权的“在野党”以及正在形成的“受排斥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全国性联盟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共

鸣。这一联盟的形成更多地归功于商业资本主义以及此后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弥散。它的高效行政机构理论也是归功于此。功利主义与财政学派不同：它的合理性是形式和系统的并且偏离了中心，被市民社会中各种潜在的关系原则所控制，不太需要国家权威性的指导。我在探查着那只藏在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无形之手"所产生的影响。

我已将国家现代化和官僚机构化的第一阶段用图表表示出来，这是针对那些可统计的、亲自工作并领取薪俸的合格官员以及各部门职务和等级的合理化。到目前为止，官僚制度的第四、第五个标准几乎没有变化，这两个标准使不同的部门相互结合，使党派政治与行政机构分开。主要的改革来自似乎不那么"现代"的权力关系方面。早期的改革运动产生于最缺乏代议制的君主政体中。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专制王朝，几乎不具备商业、工业和都市化(Aylmer，1979，p.103，也注意到的一样)。王朝主义可能是一个"它"，一个孤立的、实行中央集权的运作者，它有能力借助于一种自觉的行政科学来整顿"自我"。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王朝主义都由于联盟和军国主义的定型而得到增强。与之相反，处于(萌芽期的)政党民主的英国，政府是皇家的并且是带有鲜明特点的——中央集权化的和权力分散的；议会也是如此，在宫廷党派和农民党派之间，官员和郡县的缙绅之间有分化。任何改革都必须得到两派的同意。然而，由于它们历史性的妥协而使腐败制度化，可以从专制政府中收买王室有权势的人物和显要的特权。在这个方面，法国政权虽然在形式上是王朝制的，但其政权的融合和"腐败的代议制"几乎是一直达到最高层，这与英国极为相似。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王拥有高级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属于他们自己并需要实现现代化。在这两个国家中，可以考虑采用财政学，但在英国却不行。事实上，世袭君主仅能通过与贵族和教会的妥协而渗透入它们的领域，并融入到区域性行政机构中。但是，不像在英国(或其美洲殖民地)，没有人怀疑君主拥有支配他或她自己的权力。

对于改革，世袭君主也受到地面战争压力的驱使，这一点在中欧表现得最为严重。军国主义财政和人力的过度滥用推动了国家现代化的节奏；军事财政机构首次被合理化(普鲁士人的司法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外，是与军事机构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提供了一些组织化模式。在法国也感到了压力，但是政府没有能力使军事改革深入到财政部门，当拿破仑战争最终将类似的军事—财政负担带到英国时，改革也即将到来，并通过类似的部门程序进行。

因此，官僚机构化的第一阶段与其说由“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引起，不如说是由各国传统的军事体制引起的。这在最不具备代议制的君主制国家中能最强烈感受到。有一个例外：英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实施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是不成功的。官僚机构化主要是来自旧的君主政体和军事化国家，而不是来自新的市民社会，它的限制主要是产生于国家矛盾，与合理的行政机构相对的是部门性的分而治之以及来自贵族而又依靠贵族的自治权。

第二阶段：革命、改革和代议制，1780—1880 年

在这一时期，国家现代化转入了这样一个轨道，它主要由政治上的代议制和革命党人领导的全国性公民权的斗争来界定的。美国独立战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1]随着独立的获得，美国就不能回到“旧式腐败”。通过使州变小并对当选的政体负责，将会避免专制主义。原则上，国家的合理化首次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联邦主义者也沉浸于财政学派，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的理想之中。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是一个废寝忘食地读雅克 · 尼克尔著作的人(McDonald, 1982, pp.84—85, 135—136, 160—161, 234, 382—383)。欧洲的意识形态共同体跨越了大西洋。

美国宪法主要发展了我所定义的官僚机构化的五个标准中的四个。

尽管这仅仅是在联邦的层次上，从 18 世纪 80 年代末到现今，所有联邦官员都是领薪俸的。每一个部门都通过等级制和职能实现了组织的合理化。在权力上实现了汉密尔顿所鼓吹的一人原则。等级制的最顶点是三个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卿和陆军部长)，此后又加上邮政部、海军部长和司法部长。这些部对财政部负责，并在总行政官即总统的领导下在内阁碰面，他们必须向总统和国会递交书面报告，他们还从下属部门收取类似的报告。除了总行政官仍是首席政治家以外，形式上的权力分割将政府与政治分开。反之，州和地方政府设想出了更加融合的行政机构。但在联邦层次上，美国政府机构则是被设想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官僚制度，在世界上至少有五十年内是官僚制度成熟的唯一国家。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改革者的国际团体将美国作为他们的理想而大加赞扬。官僚主义的铺路人已跨过了大西洋。

理论和实践并不总是一致的。白人的研究表明，早期的行政管理在依靠形式上的等级制度的同时，也同样依赖于庇护主与依附者的关系网。改革者通过控制会计职能、合同招标和政府赠地的规定，将这些关系网砍除了一些。1822 年，国会要求各部部长汇报所有雇员的工作效率。陆军部长列出了他的雇员情况并附上以下的话：

> 部门中唯一无能的职员是亨利上校，他已七十四岁高龄，并且从 1775 年就开始服役。从其年龄来说，没有能力承担高级职员的职责，但是，从他对所有革命事件的回忆来说，他对革命赔款的审查是有用的。(美国国家官方文件，1834，vol. 38，p.983)

也许亨利上校正是部长的叔叔，或许陆军部真的喜欢听他讲关于美国革命的故事。但部长不得不为他作出解释，可能在其他任何国家部长都不需要这样做。

然而人事部门并未如此实现官僚机构化，并且他们在整个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开始明显地减少了类似的做法。他们是领薪俸的，但

任命、晋升和解职的标准却含糊不清的。华盛顿除了反对“家族关系、懒惰和酗酒”之外，没有确立任何原则。这已经是进步了。正如芬纳(1952，p.332)具有讽刺意味地评论道：华盛顿的三个标准在英国，后两个不是担任公职的障碍，第一个标准是一种积极的推荐。而正式的担任资格权却被滞后。1818年，资格和考核才被引入军队，但在1853年(除了少数一些会计)仅仅用于行政机构。直到1873年它们才实现标准化，并且至1883年才得以普及。在良好行为中，职位占有权是早期的准则，但随着著名的政党分肥制的发展而衰落。

所有的总统都会将政治朋友任命到政府中。正如美国的民主化，重要的统治权让步于政党控制的政府公职。从1828年到1829年，杰克逊在政府所进行的党派清洗中，10%到20%的联邦官员和40%的高级官员被解职，这些职务由他所属的共和党中忠于北方者所取代。党派的清洗持续了整个19世纪中期，任意授予官职的权力主宰着大部分的州及地方政府。一旦总统所属的政党颠覆官僚政治，国会和司法部就会介入进去。联邦政府被迫将预算案提交给国会任命的委员会，以削弱对财政中央集权化的控制。立法机关负责调节各政党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竞争，为了进一步使政府官僚机构化，立法机关成为了程序上的代理人(Skowronek，1982，pp.24—30)。随着英国持续稳定地改革，美国政府的官僚机构化出现倒退，被商业官僚制度所赶超，特别是在铁路方面(Finer，1952；Yeager，1988)。

联邦政府的落后存在着三方面原因。第一，相对而言，美国没有卷入国外战争并且军事预算较少。在其他国家，军事财政的压力不断地使国家的中央政府扩大规模并趋于合理化。在美国，1812年的战争的确迫使军队和会计部门组编，但这个幼小的国家在进入20世纪以后就没有任何大陆敌人。内战大大增加了南北各州的面积，但这仅仅是暂时性的，因为内战的结果毫无异议地保留了联邦。第二，形成了无法预料的特色。在美国，按照宪法，对不断增加的关税岁入实施委托管理。这些岁入的充裕被证明是惊人的，通常有大量剩余，这几乎不

需要那种从理论上讲国会所要求的“高效或节俭的组织机构”。这个国家很少体验到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而这在其他国家则对官僚机构化产生压力。

第三，宪法并未解决两个特殊的政治具体化形式——代议制和民族问题——这阻碍了被视为潜在专制政治的官僚制度。宪法表明同时代的人认识到官僚制度的技术可行性——早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需要官僚制度。美国成年白人男子不赞同政府所做的一切，尤其是中央集权政府。政治权力网具体表现为由复杂的政治派别和政党组成，它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宗教信仰、经济部门、地区经济利益和各个州。事实上，美国政治可能经历过如此众多的利益集团的最快激增。为了确保政府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各政党和政治派别限制集权化的国家权力，并且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层次上，使他们自己融入于多重的州议会和政府机构中。

在任何一个单一政党都没有强大到能够控制国家的情况下，选择了“邦联”的解决办法。随着美国政府的成长，它开始被在政府各个层次上实现了制度化的各类政党所分化。因此内战的结果开始了缓慢而且部分地重新中央集权化(仍在联邦宪法的限制范围内)。纠缠不清的阶级政治和地方区域性(以及对奴隶的隔离，宗教等)使这个国家软弱无力，产生分裂，在整个这一时期仅仅实现了较低程度的官僚机构化。

法国是更加野心勃勃的第二次革命的发源地。在 1789 年 8 月 4 日，法国革命党人废除了与“封建制度”形影相随的公职贿赂。他们打算减少官职数量，只保留一群数量较少的领薪俸的核心官员，并将大部分公共职能移交给无薪俸而承担义务的公民。它的合理性如形式一样真实存在，体现了新公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经济都没能从法国大革命和恐怖统治中幸存下来。为了补给军队和城市，为了搜寻反革命分子并贯彻许多新的法律，需要重新创造旧体制国家的大部分机构。它现在是发薪俸的，不允许用金钱购买官职，致力于合理的等级制和职能的原则，并且表面上实行中央集权化。这

些都是主要的现代化形式。但是它缺少目标，也缺乏关于自己利益的现代化主张。

“正如洪水不断泛滥，水会逐渐变浅并混浊，因此，法国大革命衰退并仅仅留下新式官僚制度的淤泥。困扰人类的枷锁被作成官样文章，”卡夫卡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强烈谴责(Janouch，1953，p.71)代表了20世纪对革命遗产的冷嘲热讽——不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胜利，而是国家官僚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成功。奥布赖恩(1990)说，法国大革命没有带来自由的解放，而是导致了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共产主义。斯科克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它们的中央集权制和合理化。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一个“职业化官僚制度的国家”，它“在社会中大规模地存在……作为一个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仅仅受到权力分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1979，pp.161—162)。梯利(1990，pp.107—114)声称法国大革命为中央集权化的“直接”政府提供了“最惊人的措施”。此后革命军队将此(随地区不同而变化)强加于其他国家。

然而斯科克波对20世纪革命的比较误导了人们，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仅在19世纪末，国家的基础结构权力就已有了很大发展。他们仍受到互相竞争的各类党派相互敌对的国家形式以及市场资本主义(斯科克波，承认这一最终的限制)的限制。如果革命党人夺取了一个20世纪的国家并废除或回避了资本和党派竞争的影响(正如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分子所做的)，他们也许会利用这些扩展的基础结构来大大强化国家专制权力。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革命党人即使夺取了国家政权，也无法掌握这种潜在的权力。

首先，法国大革命拥有第六章中所确定的独特的思想力量。他们宣布了由国家所领导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复兴纲领，并且他们能够动员起来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同美国人一样，他们已预先了解了官僚制度的国家看起来应是什么样的——借用政府的官僚经济学派的模式(Bosher，1970，pp.296—297)。在炽热的革命气氛中，他们扫清了一些

障碍——一举废除了公职所有权和地区行政机构的排他主义，并以薪水和各种部门正式取代他们。这一点十分重要。正如梯利注意到的，它消除了法国的城镇差别，资产阶级的城镇不再是从属于旧政权的行政城镇。其次，革命党人使政治代议制中央集权化，这样在国民议会和两个主要委员会中，主要派别就能够为整个法国制定立法。毫无疑问，拥有这些权力，它们比旧政权更有能力使国家政府现代化和官僚机构化。它们渴望直接而不是间接地进行统治——并在某些方面，它们确实实现了这一点。

然而，这没有增加整个政府的规模和范围。斯科克波(1979, p. 199)用教会对所增加的领薪俸的官员的数据统计，来假设这样一个行政机构的扩大。但是正如表11.7和附录表A.3所显示的，直到1850年以后，公职人员的总体数量才上升到旧政权时的水平。从1791年以来，核心的内阁官员并未激增，国民公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引进了薪俸标准和职务合理化。关键的财政部根据职能和等级而进一步完善(Bosher, 1970对之简称为到1794年为止的“官僚制度”)。然而这一官僚制度的标准是与党派标准相混杂的。当委员会管理职务资格时，他们坚持要提交一份履历书，其中包括对革命忠诚的证明。

此外，除了在军事领域和反复无常的恐慌统治，革命政府的功绩极为有限。马加丹特(1988)指出它在税务上的无能为力是可悲的。如果一个财政机构设法收到它所需税收的10%，是否可以称之为官僚制度呢？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见，革命政府被迫——在公安委员会控制下，据说在中央集权化最严重的时候——派出政治上可靠的特使来领导武装队伍，并允许他们更为策略地自由抽取所需的基本供给。通过德·拉·图尔·杜·平夫人(1985, p.202)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渗透力。在描述过她那散布整个法国的反革命网络后，她评论道，他们的通讯联络竟未被窃听。这一点很奇怪，他们遮遮掩掩地生活在地下室和废弃的农场中，在夜幕的掩护下溜到乡村的信箱发信，然后革命党人的邮政部门——是从旧政权中承袭下来的——做完剩下的事

情。恐怖政治的左派分子并不了解控制邮政部门的右派在做什么。

在督政府和波拿巴的统治下，一旦政治妥协和联合成为可能，斯科克波所强调的一些国家权力就成为现实。政府各部、县长和领薪俸的官员根据波拿巴所制定的《民法典》的客观法规治理法国(Richardson，1966；Church，1981)。伍尔夫(1984，p.168)声称，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在官员统计方面处于“不容置疑的领先”地位(尽管我怀疑这一资料的收集是早于奥地利的统计资料)。但它仍缺乏官僚制度化的特征：没有预先规定的客观任职资格标准，没有考核，各个不同部门之间几乎没有联系。部长们不是向国会汇报，就是向波拿巴本人汇报。国会是由不承担行政责任的忠诚知名人士组成。波拿巴采取部门分而治之的君王策略，寻求保证一个统一的官僚政治。他也采用私人金融家包税的安排，这使人们联想到旧政权(Bosher，1970，pp.315—317)。行政分裂在波拿巴时期幸存下来。夏尔(1980，p.14)叙述道，19世纪的法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但却存在着多重政府部门。直到1848年革命以后各部部长还将自己的任命、晋升和解职标准强加于他们的部门。

这一切中最普遍的是法国在政党政治中融入行政机构的做法：在整个世纪法国行政人员仍分为雇员和官员(Chaple，1980)，雇员是从旧政权的代理制传下来的，在略带贬意的现代用法中，“官僚”只适用于那些由上层官员制定客观准则的中低级行政人员，它是一种旧政权的官员与革命的公民行政人员相结合(隐喻)的产物。官员和有组织的团体充实着高级行政机构。如军官一样，他们应该表现出为了共同理想而承担起党派的义务。波拿巴试图通过仅从帝国的知识人士家庭征召年轻人，并通过对他们进行服役训练来保证这一点。他的后继者仍使用忠诚者，但也青睐那些受过重点大学教育的多才多艺的杰出人士，并且从1872年开始青睐那些毕业于被视为高等专科院校的精英(Osborne，1983)。学院集团本质上采用了政党合理化，减少了形式上的官僚机构化。

由于19世纪的法国政权的寿命没有能超过20年的，随着在各行政

部门、县级部门、司法部门和军队任职的高级职员被肃清，行政机构的党派不断变换。正如美国选举所做的那样，这导致了党派分肥制。保皇派知名人士与众议员—官员交换位置(Julien-Laferrière，1970)。共和派仍然稳固地盘据于地方政府，这导致了19世纪中期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公社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县长通常扮演调停人的角色(Ashford，1984，pp.49—68)。共和主义的长期趋势逐渐带来了官僚机构化。由于共和体制的制度化，他们任用知识界精英并将政治与行政机构分开。1848年以后开始使用竞争性考核，它与非正规的在职训练共同分担职责，并且顶住了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最后反动(Thuillier，1976，pp.105—115；1980，pp.334—362)。共和主义者在1880年最终赢得了民政机构。现在的法国行政机构具有突出的官僚制度特征，尽管仍由一个党派集团所统治。

因此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一样，对于官僚制度所作出的允诺比行动要多。原因是相同的：政党政治没能从政府中分离出来。阶级和民族政治也未能稳定下来。政党民主是多形化的，定型于各种不断变化且相互纠缠的政治——行政的形式。然而，这些复杂的行政发展可能就像一个半满的水杯。我们可能强调水的容量，或者强调空气的体积。斯科克波和梯利强调的是官僚机构化和国家权力；我强调的是这两者之间的范围。比较是一种较好的衡量手段。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是否被革命、政府和波拿巴推向更大程度的官僚机构化？然而问题不能如此简单地提出。正如梯利所注意到的，革命以及革命期间发生的几次战争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冲击，也使它们的官僚机构化。各国不仅是独立的可比性实例而且是欧洲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社会中的独立单位。我继续以这些实例进行讨论，然后，我将转向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第四章可以看出，英国在政治代议制上的斗争是与行政的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带来财政压力，经济改革便首当其冲，依靠它实施公民权改革。战争时期，有产的纳税人认为

“旧式腐败”代价太大。旧政权的自我改革受到来自社会下层阶级压力的推动。从18世纪80年代早期，议会议长们宣布反对贪污贿赂，到18世纪80年晚期，议会开始制定立法，从90年代开始改革派的部长减少。在内政部的20名高级官员中，收入依靠薪水的人所占比例从1784年的56%上升到1796年的95%(Nelson, 1969, pp.174—175)。到1832年，拿薪水成为正常现象，官职拥有权实际上已丧失。挂名闲职的废除使大多数部门内部实现了职能和等级制度的重新调整。立法禁止禄虫和议员担任公职。战争产生了首相对议会负责的真正的内阁政府。各部长在内阁和议会中花费更多时间，而他们所领导的各部由领薪俸的常任秘书来控制。1787年的一个法令把当时由各自指定拨付专款支付的各部财政合并起来。到1828年所有的收入和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从单一专款中收支，它的账目呈交给议会(尽管支出不受财政管理并且保留政治性)。到1832年政府已进行了改革(Cohen, 1941; Finer, 1952; Parris, 1969)。

在官僚制度的一个标准上，英国处于落后状态：直到19世纪中期都没有引入雇佣和晋升的竞争标准——并且即使在那时，改革也是最低限度的。尽管功利主义和激进的改革者要求进行考核和技术培训，但没有一样得到实现。通过自我改革，旧政权坚持保留了新兵征召和任命部分官职的特权。改革的原动力是削减行政机构和节约资金。表11.7表明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在1797年到1830年之间文职人员的增加要比人口增长的比例小。议员们向议会汇报，“旧式腐败”已消除并且无需进一步减少费用。改革运动消退，到本世纪中期以后，官僚机构化未再深入下去。人们容忍了妥协。

在第二阶段，英国的官僚机构化存在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传统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国库压力，迫使旧政权提高税收，削减开支，实行合理化措施及中央集权制，但却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原则。第二，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对政治公民权和功利主义的政府施加了一种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压力。这两个原因相互促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

家正为它的地缘政治而斗争。与法国相比，这种解决旧政权和新兴阶级之间斗争的方式更为稳妥。与美国相比，这种解决方式更中央集权化。再加上第三阶级的压力(很快就会对此进行讨论)，使英国超越了其他国家所出现的对官僚制度的限制。现在官僚制度的铺路人是近邻的欧洲。

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之后，普鲁士王朝在19世纪仅仅实行了有限的现代化。到1800年，它被党派争执所冲击着。大多数改革者是贵族，他们在寻求行政合理化，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是资产阶级专家。在地方政府中，他们将贵族和乡绅排他性的控制视为障碍，而在高层则是法院。出于周密谨慎的考虑，他们建议采用代表大会和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战争似乎是由他们操纵的。拿破仑1805—1806年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摧毁普鲁士军队之后，君主政体开始寻求改革以期增加效率，避免社会动乱，但这没有引起新兴法国霸主的反对然而无法抵消新兴法国霸权。改革者们极力主张通过有限的议会和单一的行政机构来操纵上至首相下到各地乡村的权力。尽管在短期内他们获得了优势，但到1808年他们招致了更多贵族和法国的敌意。在落后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太薄弱，无法施加更多的民众压力。这些专制主义的现代化者离开君主就会一无所成。为了缓和法国的敌意，君主便抛弃了他们。

在拿破仑战败以后，达成了一种妥协(Mueller，1984，pp.126—166；Gray，1986)。在区域性层次上没有变化。容克和教会的机构直到1848年革命都完整无损地幸存下来。在中央行政机构，学术资格和考核得到加强，各所大学都进行了改革。贵族们开始进入大学，逐渐减少了旧的党派活动并使官员的民族性文化融合得到巩固。在实现一人控制之前，同僚共享权力的状况开始削弱。一个复兴的国家议会现在使各部部长和朝廷大臣们坐到一起，而更为内行的部长们已占据优势。在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的软弱统治期间，官员的权力自然扩大了，与其说它是一种合理化的官僚制度，不如说是如欣茨所说的

"贵族—资产阶级的贵族机构"。这种权力使资产阶级成员"封建化"(Muncie, 1944)同时使普鲁士贵族"进步化"。但是随着专制主义的复兴，排他主义也复兴了。"内阁"恢复了，直属职位即军队指挥官具有单独参见国王的权利，这一权利还扩大到文职官员。官僚制度仍从属于任何一个君王选定并信任的人——专职化的部长大臣或贵族老朋友。党派冲突减弱了官僚制度的团结，并在1848年将其分裂——在那次夭折的革命中，文职人员和教师在两派中都是积极分子(Gillis, 1971)。

国家仍让人感兴趣，它的各党派扎根于市民社会。直到阶级和全国代议制再次得到公正对待，并且只有增加了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罗马天主教徒，国家现代化才能进入到第九章和二十一章中所描述的半独裁主义。普鲁士促进了官僚制度的最初发展，但是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普通官僚制度的国家只存在于黑格尔的思想里，而不存在于德国人的现实中。

奥地利是第一个官僚主义的铺路人，它衰退得更早，更完全。因为对地方贵族权力渗入最少，奥地利王朝政府由于法国大革命和代议制运动而引起了更大的恐慌。约瑟夫二世的继任者在18世纪90年代退回到极端保守状态——现在主要的官僚机构化出现在警察机构内(Wangerman, 1969; Axtmann, 1991)。在与波拿巴的战争中遭受失败，尽管未受其羞辱，但是奥地利人仍限制军队改革并依靠天主教会来动员反对法国的支持力量。到1815年，奥地利政权已成为欧洲改革前进的阻碍。第七、第十章指出这个由多个地区组成的王朝国家正在与地区分裂运动进行斗争。在1867年，甚至连皇室政府都分裂成两部分。

这是国家生命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从军事占优势地位的国家过渡到具有相反形态的军事—文官国家。官僚制度用于铺路的形式正是代议制和全国性公民权，它是从君主制度和地缘政治军国主义转变而来的。军国主义仍对官僚制度的效率施加压力，但是大约在1810年，王

朝政权已达到了官僚制度的极限，君主专制主义与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化之间的矛盾，以及争取公民权的阶级压力的削弱，都成为进一步实行王朝主义的障碍。相反，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政权处于一种更为商业化的市民社会中，它包含着广泛的政治阶级，在旧政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已实现了相互妥协的制度化，这就允许存在更大的政党民主。因此在行政机构中就具有更为官僚制度化的职责。但是即使这些国家的党派民主和官僚主义也不是完全协调的。各政治党派经常与精英组成的专家政治官僚制度相冲突。国家保留了多型化。尽管大多数党派反对旧政权的排他主义，但他们担心国家效率。为什么要赋予国家更高的效率、更高的内聚性以及官僚制度的基础呢？这也许可以有助于国家精英的专政主义策略，也许会有助于与之竞争的党派。美国各政党改变策略，以便确保他们的国家更具融入性，并减弱官僚制度。英国各政党采取了妥协方式。一旦共和国得到挽救，法国各政党也采取了妥协方案。

在卡夫卡—斯科克波—梯利三人所声称的革命扩展的国家权力中现在包含了什么内容？我提供一些证据。通过革命，法国超越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法国也许会成为一个比奥地利更落后的国家。法国进行了改革——也许因为它以前如此地落后和懒惰。但是，法国的现代化不如美国走得远，也不如英国彻底。美国的推动力无可辩驳地具有革命性(尽管斯科克波已在其他地方否定了这一点)。然而，英国未发生革命，奥地利和普鲁士也没有因为缺少一次革命而落后。我的结论是革命对于国家现代化来说并不是必须的，或者它对国家权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斯科克波和梯利都同意)。更确切地说，在这一阶段(尽管不是在较早的阶段)党派民主运动通过改革或革命强化了国家的官僚制度。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同，党派民主运动具有法国大革命中积极、民主的一面，而不是其消积、独裁的一面，这鼓励了官僚机构化。党派民主更希望官僚制度化，因为它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它。那些解决了代议制和民族争端的

政权更希望官僚机构化。

对于那些相比较的观点，我另外加上有关相互依存性的看法。这种依存增加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和军国主义者的重要性。这很适合斯科克波和梯利的更普通的理论模式，因为他们都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军国主义的作用。战争继续存在并使国家现代化。但是，这些战争的主角即法国陆军，与它的军事前任者不同，从政治和民众的角度，它威胁着所有的旧政权，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产生不同影响。从军事上，英国只经历了半总体战，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世纪中期所经历的这种战争将旧政权转变为现代化政府。政治对于英国的影响更是难以估价，但是第四章提出了革命者和法国战争促进了旧政权和资产阶级的合并，这使有限的代议制政府制度化得以实现(避免了更为民众化、民主性政府的出现)。反过来这也逐渐地使官僚制度的现代化得以实现。因此，法国大革命可能加速了英国的国家现代化。但是，同样的力量可能在中欧却起到了减缓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在中欧，法国现代化陆军的压力要高于国家的压力并且使政治代议制受挫，以至于官僚机构化也因此受阻，这是由于温和的改革者和软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受到雅各宾主义的影响。不管卡夫卡、斯科克波以及梯利的观点如何，法国大革命为国家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混合遗产。

第三阶段：国家行政机构和工业资本主义，1850—1914年

第十一章指出所有19世纪末的国家都大量增加了它们的文职范围和人员，特别在中低级层次和地区性层次上。官僚机构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并努力地与这一蔓延趋势保持同步。到1910年，英国和法国几乎实现了它们曾规划的官僚机构化，美国在18世纪20年代开始达到改革的巅峰，而两个君主主义国家正在它们所可能允许的范

围内实现官僚制度化。在这一阶段存在两个相关联的官僚机构化的原因。一方面国家使公民权制度化(尽管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增加了各国行政机构的、全国经济一体化和公司企业的官僚模式。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趋向削弱(尽管并未完全排除)国家职能与行政效用之间的有益冲突。官僚机构的发展伴随着直接反对的减少。

然而，面对那些将成官僚的人是令人畏惧的。大量的国家雇员是否会忠于等级制？他们是否将代表自己的利益或代表本阶级、宗教及语言团体的利益？由于大量的机构扩充是在地方政府一级，那么中央的协调作用是否会减弱？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是政党民主的，那么国家政策是否将由一些排他性的组织网络来决定？这些组织网络包括学院、技术专家官员以及通过正式国家机构获得权力的改革派压力集团。

公民权包括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纠缠的情况各国都不相同。到1850年，美国已使白人的两党民主制实现制度化；然而此时它才进入国内民族斗争最残酷的阶段，当主要的斗争猛烈冲击着相互对抗的联邦权力与各州政府权力时，行政机构不可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在所有三个层次的行政机构中高效政府的协调作用既依赖于官僚制度，也依赖于政党的忠诚。在林肯统治下，分肥制达到了极点：在总统的权限范围内，他撤换了88%的行政人员(Fish, 1920, p.170)。在内战中，民族问题由武力解决了。此后又由1877年的妥协来解决。这就减少了对由一个党派组成联邦政府的政治需要，尽管政党政治在短时期内转而削弱了各州和地方级别的行政机构。英国和法国经历了相反的政治状况：关于民族—国家更为一致，对于(阶级)代议制的意见却不那么一致。但是在英国1867和1884年的改革法令颁布以后以及法国共和国在19世纪80年代得到巩固以后，那些障碍就被排除了。所有的三党民主现在能更明确地确定主权统治并且随后部分地使它实现官僚机构化。

两个半独裁的君主政体在公民权义方面进展缓慢。中世纪的普鲁

士同时要面对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如第九章所述，到1880年，这两个问题都已实现了半制度化。在奥地利，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代议制和地区—民族问题仍威胁着政治性行政机构。然而，意见相左的各民族与其说是与哈布斯堡家族彼此为敌，不如说是互相残杀(参见第十章)。事实上的妥协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持续发生有关政治公民权和行政机构中语言问题的骚乱，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日常中央政府被允许行使自治权。

在所有国家中，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略微加强了这种更具共识的趋势，甚至是对落后君主制的一种补偿。邮政局和电报、运河以及铁路都不存在争议。学校也一样；因为它们通常遍及于一个相对世俗化的中央国家，这个国家反对地区性教会(对于奥地利还要加上语言问题)。1900年以后，这些问题普遍得到解决，从而对中央政府有利。半独裁的君主政体尤其利用国家行政机构来支持其最后的发展，使主要的权力运作者普遍感到满意(参见第十四章)。在扩充政府低层次和技术部门方面，阶级和地区性利益集团通常赞成官僚制度的高效率(参见第十一章)。一旦付薪和考核在许多部门被视为惯例而执行，它们的扩大就相对不会出现争议。

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铁路业的繁荣，国家和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也与民族经济和官僚制度的组织结合在一起。民族经济(在第十七章中对英国的描述)减少了地区差别并进一步使人口“国籍化”。法人组织图表、多分部的公司以及标准化的销售目录都与国家统计、行业职务划分和财政控制相类似：这是对控制组织的官僚制度的反映，这些组织的规模，特别是职能范围和地域范围日益扩大(Yeager，1980)。随着代议制和民族斗争逐渐制度化，随着在许多国家职能方面达成共识，同时工业资本主义也提供了多种模式，国家主权和官僚机构化实现了扩大。

在这一阶段，官僚机构化甚至更多地影响着地方和区域性政府：英国的郡和自治市、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奥地利和德国的州和乡镇以及

法国的县和公社。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由地方公职拥有者或受尊敬的贵族控制。但是行政机构和福利事业的国家职能产生了常规的地方行政机构，为无报酬的贵族所讨厌。随着岁入分配的增加——尽管在美国联邦政府并非如此，中央行政机构的劳动力分工得到发展。

在中央政策制定的最高层次上，官僚机构化仍然最为薄弱，尤其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半独裁的君主政权延长了部门性分而治之的党派策略，并且阻止了一体化的内阁政府。因为各部、法院和议会都保留有制定政策的自治权力，所以压力集团的政治活动激增。在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的行政机构中重要的学院派和技术专家的改革联盟相互伴随并相互渗透从而使之得到发展——其中一些联盟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摇篮”(Rosenhaft and Lee，1900)。为避免分裂，即要依靠那些受过教育的官员的社会团结，同样也要依靠官僚制度。大约在1900年，部分官僚行政机构被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殖民化”(参见十六章)。国家外交政策的分裂真正开始了——对世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将在第二十一章中进行讨论)。

但是官僚制度在政党民主中也仍不完善。现在英国显然成为精英统治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开始于1850年——通常是提高各部的效率，未与议会协商，在议会中任命官职的特权仍很重要。许多做法经常是从英国的殖民活动中得到的。内部审查也得到了改进。在1853年，按业绩而任职和晋升实现了制度化，并在1879年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885年占据了优势地位(Cohen，1941)。随着公立学校如牛津、剑桥以及教会中实施精英统治的改革，在征聘过程中废除了任命官职的特权。在行政机构最高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实行择优录取，然而仍保留了一定的限制，几乎所有新招雇的人员都来自公立学校或文法中学，并且主要来自两所古老的大学。与普鲁士不同，英国早在改革开始之初，缙绅和高层职业家庭就已占据了这些高等学院。因此在高层行政机构中阶级构成和民族团结已得到确定(Mueller，1984，pp.108—125，191—223)。在1904年到1914年间80%的职员上过牛津大学和剑

桥大学。

低级“技术阶层”的晋升变得十分困难，从1902年到1911年，平均的晋升机会是0.12%，集中于缺乏权威的部门，如海关。在陆军部和殖民部无人员晋升(Kelsall, 1955, pp.40—41, 139, 162—163)。这些人普遍具有合理无私的公共服务思想。国家不再是一个家长式的家庭权力机关，它过去曾充满了“腐败的”庇护特权。它的“公务员”是公开中立的，被赋予国家市民社会的最高利益。黑格尔所认为的官僚们的普遍阶级状况，总是一个难以理解但适合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概念。如果这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概念，那么在19世纪末的英国行政机构中，就是一种似乎更为合理的表现——仅限于英国的统治阶级。

第十一章指出在这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内战时期)美国政府规模小、费用低廉，并且很容易筹措资金。19世纪末它在规模上的迅速膨胀急骤地增加了分肥制和腐败，尤其是在没有官僚制度控制的地方政府，政府依赖贿赂和佣金来做事(Keller, 1977, p.245)。但是最终出现了对节俭和高效的要求，尽管比英国要晚得多(Skowronek, 1982)。美国创造发明的有限公司意味着高效的官僚制度模式已经出现(Yeager, 1980)。1882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对一部分联邦行政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分类”——保护他们免遭政治清洗并且通过竞争考核进行，被分类的职务从1884年的10.5%上升到1895年的29%。在随后的时间中上升到45%，并于1909年达到6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比例更上升到80%多，并维持至今。

最初，在保护背后的动机是相当复杂的，由于离开政府的各党派都是通过给予行政机构的职位来拉拢他们的忠实者(Keller, 1977, p.313)。但是，借鉴于企业，受保护的行政机构逐渐采纳“人事管理”的科学(职务、专业、薪水、晋升、年金和效率报告等等的安排)以及“行政管理”科学(标准化的会计制度、档案和记录、采购和供应以及各种合同程序)。这方面的大部分也在北方各州和地方政府中贯彻实施。1913年的塔夫脱委员会汲取芝加哥创立单一的预算和人事局方面的可取经验来

使联邦账目，考核和晋升准则、职位分类和薪金体系、个人效率记录和所有联邦机构的纪律规章标准化。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战争努力所带来的行政混乱的刺激下，这一改革以及单一联邦预算的巩固才得以实现(van Riper，1958，pp.191—223)。

官僚机构化的大部分成果是通过进步运动取得的。在行政改革中，进步运动的目标对准了国家“效率”。这是一种新兴的野心家和职业化中产阶级(Wiebe，1967)以及企业自由主义之间联盟的思想(Weinstein，1968；Shefter，1978，pp.230—237)。它要求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应有一个中立、高效的国家行政机构思想出现。美国政府现在最终可以克服党派的任命权和邦联主义，因为美国的行政机构已与国家文明社会中权力阶级的运作者密切结合在一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塔夫脱总统在行政机构改革方面有更重要的经验，这一点也有所帮助。任命权仍保留着——并且至今仍存在——在所有政府的三个等级的最高层。政治上的被任命者通常兼具教育和专业技术资格和效忠政党两方面。

双重性也成为英国和法国最高层中央政府的特征，与美国不同的是，它们的地区性政府已从属于中央政府。英国征召的高级文官几乎完全来自著名的公学(属于私立的)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来自那些忠实于国家权势集团的上中产阶级，法国征召的文官来自于重点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他们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技术资格，也忠诚于兼具先进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共和体制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是20世纪法国政权的特征。

最高行政机构在整个20世纪完全融入阶级和全国性政党忠诚者之中。所有政权都排斥了邦联主义和完全成熟的韦伯学说的官僚制度。在这一时期，行政机构与政治的分离完全是在低层机构和中层机构的官员中，而不是在民族国家的最高层中。在大多数国家，这种分离是地方性的。“官僚”的常规性概念对于低级的文字工作者还有些真实性。高层国家行政人员保留的官僚性如同政治性一样多，尽管无私的

公共服务思想的社会化部分地削弱了他们的政党政治。

结论

在整个漫长的19世纪，我所提出的官僚制度的五个组成部分得到以下的发展：

1. 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中央行政人员和大部分的地区性官员都领取薪金。通过等级特权和贿买而担任官职的现象已几乎消失。在地方机构中只有兼职并受人敬重的官职才大量幸存下来。

2. 通过客观的竞争尺度来任命和晋升的方式也得到发展，但是时间相当晚，到1914年在部分国家仍不完善。

3. 部门内的公职安排在最初变化相当大，到19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部门中的官职安排都类似于官僚制度模式，即在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下，根据职能的不同划分。

4. 美国最早实现了将所有部门合并成单一的、中央集权化的全国性行政机构。此后，美国在这一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倒退。在英国和法国，它的实现较晚，并且在所探讨的这一时期末，德国和奥地利还未完全实现。

5. 政党政治与行政机构隔离实现得最晚。在任何国家中央政府的高层都未完全隔离，但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分离是最薄弱的。

因此，所有国家在这一时期都发展了根据所有五个标准的某种官僚机构化。在1760年，各国离官僚制度不再遥远；到1914年，全国性官僚制度和行政制度已实现制度化。这增加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和程度较低的行政机构的内聚性。中央国家行政机构已趋于一元化，或者作为半独裁主义者——有执行君主政体决议的官僚——或者作为政党民主——有执行全国议会立法的官僚。

在任何国家，官僚机构化都是以它的思想为先导。财政学派、启

蒙运动、功利主义、进步主义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主要来自那些出身于旧政权和职业化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行政官员。所有这些人都提倡他们所称的“合理行政机构”和我们所称的“官僚制度”。引人注目的是，官僚制度化是如何被意识到的，在它实现之前，整个西方的思想家们又是如何清楚地将之系统化的。思想家们能够有说服力，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官僚机构化是有职能的。它是针对行政机构在职能和地区范围以及多样性方面迅速膨胀的一种有效降低开支的反应。因为思想家们是在国际间进行交流的，所以一国的权力运作者通常可以在国内采纳官僚制度的方法之前就获悉了其他国家已改进的方法(尽管我对此没有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现代的官僚国家，首先作为设想而出现，然后不可抗拒而实用地展现在现实之中。

然而，详细考察各国就修正了上述现象。就近观察，现代国家行政机构的兴起不是进化或由直线发展而来的。在各时期之间，组织上的目标存在差异。如果没有这些目标存在，那么各种思想意识就证明是无效的。这些目标也影响着思想意识的转变(从财政学派到功利主义再到激进主义等等)。我所列举的每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领导着官僚机构的进程。随后它的发展又无法越过新的障碍。我将官僚机构化区分为三个阶段，受以下三方面控制：(1)君主政体和军国主义形式；(2)代议制和全国性公民权形式；(3)工业资本主义形式。构成这一切的潜在原因是现代中央国家从军事占支配地位到具有双重相对形态——半文明半军事的转变。

民政机构是国家精英深入市民社会的最重要方式。在1760年，它也是政党渗入专制主义国家甚至可能是政党民主国家(和议会会议一起)的重要形式。18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拥有高效的行政机构，并通过它支持形式上的专制君主权来统治市民社会，因为“它的”民政事实上是充满着统治阶级和教会的所有制特权。在早期的军事革命以后，军政已不再完全充斥着这种特权，而稍微多地由国家控制(第十一章指出国家因此丧失了对部分自治的军事特权等级的某些控制)。

由于上述的军事控制和战争的压力，各国世袭君主发动了第一次官僚制度的攻势。然而，他们的官僚制度因素既是与部门的分而治之策略以及旧政权下各党派的依赖相紧密结合，又受到它们的约束。在第二次官僚机构化的过渡阶段，在大众(主要以阶级为基础)民权运动的压力以及战争、革命和政党民主的压力下，各政府带头领导和清除“腐败”公职拥有的特权。但是第二次官僚制度攻势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政权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充分解决各国代议制和全国性的主要问题，从而使它们有能力管理一个具有内聚性、高效、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国家。在第三次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一些国家的政府在使中央集权的政党民主制度化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并且也进一步发展了官僚机构化。但是官僚机构化，尤其在行政机构的中低层，现在也得到了大家公认的新增加的国家行政机构极大的帮助，这些行政机构的大部分有助于实现全国工业化(也包括全国的重整军备)。只有高层行政机构抵制了完全的官僚机构化，因为政权仍然需要忠实的政党党员支持。

民政机构没有丧失太多的内聚性，甚至还获得了一些内聚性，正如他们在这一时期中的发展——但是具有两个限制条件。首先，与其说内聚性是自治国家的一个特征，不如说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正如我可能是在第三章中所提出的。一个国家是否能高效并团结地运转，既依靠那些融入并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民族性内聚力的官员，同时也依赖于其本身对官僚制度的接受力。这种融入和表现形式经过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排他主义的和主要是权力分散的公职担任到被认为是普遍的并且主要是全国性择优录取。

正如表4.2所启示的，18世纪的普鲁士和英国是代表了相对团结的民族性的文明社会，因此在行政机构上是有效的例证。旧政权的法国国家缺乏有效性，是因为它代表(并且有助于)的社会无凝聚力。奥地利国家正如一个高度自治的、但未能扎根于它的市民社会的国家所能达到的效力一样，它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再晚一些时候，三个政党民主的国家，真正代表了早期工业化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并且有全国性组织的阶

级(在成年男子中)，尤其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职业中产阶级的代议制，因此，它们更具效力。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有国家作为自治的运作者，如精英理论所提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相对团结，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要的国家运作者保持了融入性，如果更具普遍性，它融入各种市民社会的权力网络，主要在全国各阶级中。在一个国家中其运作者如果从市民社会中得到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在团结行动上就存在困难。第三章指明，早期自治国家(例如，封建制度国家)通常已具内聚性，但软弱无力。也许在现代社会中自治的政治强国实际上是政党宗派化国家的自治。第二十章支持这一假说。

第二，各国没有完全实现中央集权化，这是因为它们权力网的扩展超出了这一章所讨论的民政机构各部门的范围。它们的武装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主权，与文职行政人员相比它们更融入于旧政权。它们的外交使团甚至具有更多的旧政权特点并且与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关系更密切。君主政体下的法院和政党(阶级的、部门的、地区性的以及宗教的)，又为之添加了它们独特的宗派性、社会的融入性以及被人们认为协调某些方面的能力。民政官员协调各方面的能力仅仅起到缓和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它们自己多重部门的协调仍存在着缺陷。它们或者通过政党忠诚者，通过官僚制度的确进行了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太可能成为分裂主义的源泉——或者它们没有进行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自己的职业化和专家治国的能力就被用来达到目的，而这些目的与其说是由“整个”国家需要和目的所决定，不如说是由更狭隘的专家治国—官僚政府形式所决定。第十四章探讨了这些可能性。

注释：

[1] 关于美国行政机构的资料，主要来自菲什(1920)、怀特(1951，1954，1958，1965)、范里佩尔(1958)、凯勒(1977)、谢夫特(1978)，以及斯科夫罗内克(1982)。

参考文献

Albrow, M. 1970. *Bureaucracy*. London: Pall Mall Press.

American State Papers. 1834. *Documents,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 S., 1809—1823*. Vol. 38, miscellaneous, Vol. 2, p.983.

Anderson, E., and P.R. Anderson 196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shford, D. 1982. *British Dogmatism and French Pragmatism. Central-Local Policymak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Axtmann, R. 1991. Geopolitics and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s: The State, Police and Public Order in Austria and Irelan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Ph. D. dis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ylmer, G. E. 1979. From office-holding to civil service: the genesis of modern bureaucrac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0.

Beales, D. 1987. *Joseph II*. Vol. I: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0—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nney, J. 1958. British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1774—9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lanning, T. 1974.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ainz, *1743—18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nin, H. von, 1966. Adel und Burgertum in der hoheren Beamtenschaft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 1794—1806. *Jarh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le-und Ostdeutschlands* 15.

Bosher, J. F. 1970.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wer, J.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New York: Knopf.

Charle, C. 1980. *Les Hauts Fonctionnair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Gallimard/Julliard.

Church, C. H. 1981. 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hen, E. W. 1941.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Civil Service, 1780—1939. London: Allen & Unwin.

Dickson, P.G. M. 1987.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yle, W.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ner, S. E. 1952. Patronage and the public service: Jeffersonian bureaucracy and the British tradi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30.

Fischer, W. and P. Lundgreen. 1975.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 Til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sh, C. R. 1920. The Civil Service and the Patron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lis, J. R. 1971.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Crisis, *1840—1860*: Origins of an *Administrative Ethos*. Menlo Park,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y, M. 1986. Prussia in transit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Stein reform ministry of 1808.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76, pt. 1.

Hall, R. H. 1963—4. The concept of bureaucrac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

Harris, R. D. 1979. Necker, Reform Statesman of the Ancien Rég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nouch, G. 1953.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London: Derek Verschoyle.

Johnson, H. C. 1969. The concept of bureaucracy in Camer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9.

1975.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His Official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ien-Laferrière, F. 1970. *Les députés fonctionnaires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Paris: PUF.

Keller, M. 1977. *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lsall, R. K. 1955.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Britain, from 187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oselleck, R. 1967. *Preuss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Stuttgart: Klett.

Krygier, M. 1979. State and bureaucracy in Europe: the growth of a concept. In *Bureaucracy: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ed. E. Kamenka and M. Krygier. London: Arnold.

Ludtke, A. 1989. *Police and State in Prussia, 1815—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artney, C. A. 1969.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cDonald, F. 1982. *Alexander Hamilton: A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Margadant, T. W. 1988. Towns, taxes, and state-form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leventh Annual Irvine Seminar on Social History and The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Marion, M. 1927.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 Paris: Rousseau.

Mousnier, R. 1979. *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1598—178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eller, H. -E. 1984. *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uncie, L. W. 1944. *The Junker in the Prussian Administration Under William II, 1888—1914*. Providence, R. 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Necker, J. 1784.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France*, 3 vols. Paris: n. p.

Nelson, R. R. 1969. *The Home Office, 1782—1801*.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O'Brien, C. C. 199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3.

Osborne, T. R. 1983. *A Grande Ecole for the Grands Corps: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the French Administrative Eli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arris, H. 1969. *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Allen & Unwin.

Raeff, M. 1975. The well ordered polic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n attempt a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Richardson, N. J. 1966. *The French Prefectoral Corps, 1814—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 H. 1958.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haft, E., and W. R. Lee. 1990.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Germany — *Beamtenstaat, Klassenstaat, Wohlfahrtstaat*. In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ed. E. Rosenhaft and W. R. Lee. New York: Berg.

Shefter, M. 1978. Party,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olitical Parties: Development and Decay*. New York: Sage.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wrone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G. V. 1967.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

Thuillier, G. 1976.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Ministères au XIX^{ièm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80. *Bureaucratie et Bureaucrates en France au XIX^{ième} siècle*. Geneva: Droz.

Tilly, C.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Blackwell.

Tour du Pin, Madame de la. 1985. *Memoirs*. London: Century.

Tribe, K. 1984. Camer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6.

1988. *Governing Economy: The Reformulation of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Riper, P.P. 1958.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New York: Row, Peterson.

Wangerman, E. 1969. From Joseph *II* to the Jacobin Trials, 2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nglish ed., 3 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Weill, H. 1961.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Samuel von Coccej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einstein, J. 1968. *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 Boston: Beacon Press.

White, L. D. 1951. The Jeffersoni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01—1829.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The Jacksoni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29—1860*.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The Republic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69—1901*.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The Federalist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789—1801*, 2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Wiebe, R. H. 1967.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 Wang.

Woolf, S. J. 1984. Origins of statistics: France 1789—1815. In States and Statistics in France, ed. J. C. Perrot and S. J. Woolf.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Yeager, M. A. 1988. Bureaucracy. I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 III, ed. G. Porter. New York: Scribner's.

第十四章

现代国家的兴起(四)：民事机构的扩展

第十一章证明了在国家的发展中存在着两次显著巨变。第一次变化历经整个 18 世纪并延续到 1815 年，其间国家规模迅速膨胀，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军国主义所造成的。前几章指出这种非常具有政治性的社会生活加快了各阶级和各民族的发展。本章所关注的是第二次显著变化，大约开始于 1870 年。它不仅大大扩展了国家规模，而且也扩大了国家中的民事机构的范围。在保留了(一种削弱的)军国主义加上传统的犹太教和慈善功能的同时，国家又获得了三种新的功能，围绕这些功能，正如第十三章所表明的，官僚化仍是中心问题：

1. 所有国家都大规模发展物资和信息通讯的基础设施：公路、运河、铁路、邮政、电报和大众教育。

2. 部分国家拥有进入各种物资基础设施和生产性工业的直接所有权。

3. 就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各国开始将它们的慈善事业扩展到更加广泛的福利计划中，即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的萌芽形式。

因此，各国加强了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尽管缩减了财政计划，但市民社会进一步政治化。人们不可能重新回到那种传统的无视国家的作法中。阶级—民族的牢笼依旧存在，只是更加趋于平静。因为缺少了世界历史性的喧嚣，社会生活变得更具"适应性"，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但这是何种意义上的强大呢？是否正如精英统治论的管

理主义者所设想的国家理论一样，在更多的基础性权力的支持下，独立自主的国家更专制地“介入”市民社会？抑或是国家的成长仅仅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在功能和基础结构上的反映？这可能增加市民社会的聚合性权力(正如多元理论所述)而非国家的权力，或者它可能使国家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分配权力(正如阶级理论所述)。那些扩大了的、更加不同的国家现在是否固化成一种没有最终模式的多形性呢？而且如果它们变得更加多形化，是否也会变得缺少协调？

基础设施的增加、政党民主和民族

国家基础设施在政党民主的体制下增长最少。这些较少国有化的经济资源，明显地服从于资本需要，并且在最初缓慢地转用于社会公民。三党制民主政体明显不同——与美国早期是最软弱的国家，甚至在全国联邦范围内分裂政府相比，法国是最活跃的国家——但它们确有共同特征。我首先以英国为例来探讨这些问题。我认为英国变得更具多形性，它固化为军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具意识形态化、联邦化，是更加彻底的政党民主。在本章中，我仅讨论地缘政治军国主义对国内的一部分影响。在这些政治形式之间是否存在某些明确的关系，是否有处于“最终首位”的可能？第三章论证了在辩证的正面冲突中，国家的各种形式很少相互对立，而是强迫它们作出直接的政治选择或相互妥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否就是如此？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是否也是这样？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人都希望它如此。甚至不干涉主义的倡议者们也都毫不怀疑对国家管理的需要。亚当·斯密希望国家提供公共设施，这些设施是私人运作者无法从投资中获得利益的——对外防御、国内安全、国民教育以及公路网。还应加上铁路，而这是19世纪国家所主要进行的建设。斯密

准确地看出，这正是市民社会(他实际指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身调整，而非国家干预。

19世纪早期的英国，如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随着法院和皇室的特许权及庇护特权网的衰败，独立国家的精英所提倡的激进主义事实上正处于衰落状态。在1830年以后，一种集体的“政党”，而不是精英，国家激进主义开始发展，它更多地关注于协助和管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立法不再是专门性的，而更多是计划性的，它不断通过各届议会会议来制定，并依赖于由内阁部长们始创的议会公法(而不是私法)。现在议会也采取例行的小型特别委员会和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研究社会状况并提出立法。其他类型的党派民主制同样建立了类似的计划机构。19世纪50年代以后，它们的行政基础结构也开始发展，尽管更主要的仍是协调而不是介入市民社会。

但市民社会和国家行为包含着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内容。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中，道德—宗教的争论产生了强烈共鸣(Marsh, 1979, Weeks, 1981, p.81, Cronin, 1988)。威克斯和福柯(法国)认为，这暗示了统治阶级用“高压统治”支配着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有几分道德——思想意识形式的经济简化论观点，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以至于道德的表述变得更加复杂并且更有争议。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区别对待商业事务和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对前者，国家应仅仅帮助资本主义自我管理，而对于社会问题，国家应进行干涉甚至采用高压统治都是合法的。因此，在议会中为《十小时法案》辩护时，麦考利勋爵声称：

> 我同议院中的任何一位先生一样，坚决赞同自由贸易原则，即……不需国家干预理智的成年人所签署的纯商业方面的合同。这一原则不应有任何例外，除非涉及到公众健康和公共道德方面的问题。(Taylor, 1972, p.44)

然而在现实中，正如其他辩论运作者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公众健康及道德”之间的划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两者彼此相互渗透。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化将思想意识潮流不同程度地融入资本主义——道德的新教主义、启蒙运动、进步的功利主义理论、个人和社会“改良”的概念、一种英国担负着全球道德责任的帝国意识，以及政权对下层“危险阶级”的恐惧。除非下层阶级真正反叛(正如宪章主义运动，或在1848年时那样)，政权很少注意到他们在政治上的阶级利益。下层阶级不仅仅从经济威胁的角度被认为是“危险的”。正如麦考利勋爵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社会政策的争议充满着将个人和阶级利益与“健康和道德”相联系的广泛隐喻。社会问题产生了“堕落”和“疾病”，它们继而传播了“腐败”和“传染病”。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迅速增加了社会密度，从而导致下层社会伤风败俗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各阶层，正如它们早期所肯定做的那样。1851年的调查显示工人或工人家庭很少去教堂或参加礼拜，这大大震惊了国家政府。引导下层社会走向健康、纯洁的道德和宗教，既是统治阶级的责任，也关乎其利益。

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公众健康运动，在早期理论中就达到顶点，这实际上是基于相同的起源理论：通过无数社会行为非针对性的作用，无形的力量进行扩散，不论这种社会行为是善意的、混乱的，或是恶意的。国家应支持善行，最好是用不易觉察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实施——最典型的也许莫过于铺设地下供水和排污的陶瓷管线系统。这些管线代表了人类集体力量的真正增长，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死亡率急骤下降，受到广泛称赞。于是在公众健康、街道照明设备、排污系统、最低住宅标准、基本保健、警察部门、监狱和《济贫法》的监督、对工作时间和雇用条件的规定以及让大多数孩子接受初级和部分中等教育等各方面，各种政策方针逐渐产生。高效的通讯系统、良好的公众健康和平民扫盲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人类的整体发展起作用。正如第十一章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增长超过了国家扩张，甚至国库财政对国家扩大的抵制都有所减轻。因此国家民事机构的扩大得到

了能够进行有效组织的人，即社会的主导阶级、宗教、少数民族组织及教会的共同认可。正如格鲁(1984)所述，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长是与“国家中立”思想和保护自由思想的出现相吻合的，因为在大多数被限定的新“活动领域”中，市民社会的运作者可以发挥作用而不受国家干预。

然而，资本主义和道德可能发生冲突并会因此而相互制约，这种制约不是固定的，是随着复杂的政治进程而波动起伏。接近世纪之末，军国主义开始影响社会活动。大英帝国的权力更加依赖于“国家效率”，其核心是(仅仅是)健康的母亲和儿童以及国家的基本教育水平。事实上，从国家效率这一概念上说，资本主义竞争与军事竞争趋于融合，尤其是随着德国逐渐成为主要竞争对手。如果像宪章运动中那样，以正面阶级冲突的言语要求改革，这些改革就会遭到暴力镇压；资本主义国家会显示其威力。如果提出改革仅仅作为对阶级冲突的一种理性的互利妥协，在正常情况下也无法改变传统旧政权自由放任主义。技巧在于以缓和阶级对立、树立道德和国家目标的方式提出改革，这样那些不道德或无爱国心的资本家及纳税人便会遭受谴责，并在统治政权中造成分裂。与宪章运动同时的《工厂法》运动谴责对童工和女工在健康和道义上的剥削——也就是对家庭生活的剥削——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见第十五章)。大部分立法融合了控制社会的动机、慈善事业和对社会人口密度的增加造成许多国家服务功能面向全国的认可。社会生活现在不可避免地具有共同性。然而，国家的牢笼正捆扎它的围栏，这反而增加了真正的自由；城市中铺设的各种管道正戏剧性地延长着胎儿、婴儿和母亲的寿命。

然而至此尚无人能以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的观念进行思考，即仅仅在健康而有文化之上的层次，保证公民积极参与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尚无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因为(直到1910年)没有累进税制来支付它。但它却是一个有意识的立法改革方案，是激进派、反对派和折衷派斗争的结果，并逐渐在国家和政党精英中引起改变。到19世纪60

年代，改革法案已不是由无公职的下院议员而是由各部部长提出。由于受基督教和世俗道德的影响，还受到民族主义和各政党竞选压力影响，自由资本主义已能够自发产生社会改革——条件是改革不是以阶级的名义，也不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

无论是资本主义、道德改革或军国主义都不能直接针对国家的进一步定型，即一个有一定中央集权却仍是“联邦制”的国家。根据表3.3，实际上英国(即使在宪法上不是)仍具有相当的“联邦性”，相当多的权力属于地方政府。诚然，维多利亚时代的法令、各议会委员会和大委员会也产生出一些“技术专家官僚”，一些明智的精英“渐进主义者”试图扩大中央政府的作用(Lubenon, 1971)。只要他们不抛头露面而只是以道德和国家的言辞，用特殊的补救方法来抨击具体的社会弊病，那么改革就会产生。但是如果他们提倡以国家干涉作为社会改良的普遍原则，他们就会与控制选举程序和议会的地方党魁发生冲突。

当国家问题以直接对抗的形式爆发时，中央集权者通常会遭到失败。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实际创建由地方名流充斥的国家权力机构。在皇家各个调查委员会，专家人士由贵族成员平衡，并且集权的提议在议会的立法中被打了折扣，而且在履行时将再次被打折扣。当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专家治国论者埃德温 · 查德威克公开提倡中央政府干预市政卫生时，他很快遭到质疑，并且其公职生涯也到了尽头。从《济贫法》改革，经历工厂立法到公众健康与教育，社会改革是由政府和议会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的，但是却由各自治市、郡、教区的地方名流以及其19世纪中期地方政府的2.5万个地方职能部门人士来履行(Sutherland, 1972; Macdonagh, 1977; Digby, 1982)。行政机构仍是联邦制，尽管英国“宪法”被认为是仍由(中央集权的)议会主权的学说来统治的，英国的各行政机构——国家精英和政党，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仍是在协调并辩论统治阶级的国家道德和物质问题，而不是作为市民社会中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国家对之进行干预。

到19世纪中期，三种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道德意识的国家

以及联邦制民族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制约，并且随着国内民主政治范围的扩大对潜在的国家自主权形成了诸多限制。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不断增长的国家独立性、帝国的军国主义和第五种国家形式——政党民主的冲击下，联邦意识削弱(后文将进行讨论)。当然，即使对于成年男子来说，英国也不是一种完全成熟的民主制选举国家。但是 1832 年以后，选举权扩大到足以逐渐迫使那些在某些领域中超过仅仅部门性庇护—被庇护者的组织机构的党魁们相互进行有计划的竞争。在 1867 年和 1884 年，随着两党为了互相抬价而扩大选举权，加速了有计划的竞争趋势。现在带来更加持续不断的大量宗教性、地区性和阶级性的压力。保守党人代表英国教会和英格兰，自由党人则偏袒不信国教者和凯尔特人。小资产阶级和熟练工人得到了公民权，而追逐名利的职业化中产阶级却能在政治上施加影响。部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领导人在国家问题上互相转变立场，并在思想斗争中扯平，中间党和精英集权者现在博得了“现代”的称喻，而地方显要则获得“自由主义”的言辞。到 1900 年，部分主张实施中央集权并拥有全国性党纲和宣传机构的政党呼吁实施一种民众性选举，这一呼声有时甚至超过了地方名流的首脑，并减少了他们的自主权，节制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偏爱。

现在政府最大的国内职责是教育，这是为了适应中产阶级的要求(正如第十六章所指出的)，而中产阶级是主要的选举人。一种正在形成的“思想意识上的公民权”传播着同中产阶级全体选民一样形形色色的各类信息：忠于资本主义，国家高效，国教主义或非国教主义，“社会纯洁性”，禁酒和慈善事业，甚至还包括女权主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自由主义和自由党转向更进一步的福利主义；它使自由主义转向非国教主义并趋向于国家行动主义(以保护教育反对国教主义为条件)；并且它巩固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省与英格兰的联合(主要是通过地区性党派联盟的手段)。教育也使许多工人具有地方政治性，尽管工人们的全国性政策集中于选举权的改革和工会权利。自由

党的中产阶级和道德主义者更加呼吁要求公共福利(Cronin, 1988)。然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相结合最终产生了战前最后一届自由党政府制定的政策。

正如第十七章所指出的，在各种工业关系中，积极的国家干预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也同样由于来自下层的阶级压力，但是只有当能够找到共同的实际道德的原因，并超越雇主和工会的“私利”时，它才会产生效用。道德压力补充了少数劳工立法所包含的强制力。与此并行的是对教育采取更多的干预，通常是通过财政刺激，这是因为在填补私立学校之间差距的政策上表现出众多不足之处。通过《济贫法》，公共医疗服务悄悄提供所有在实际上是最后手段和最低限度的国家基金健康服务。尽管对于严格服务水平的决定来说仍留有地区性，正如它们的行政权那样，但是，地方政府所作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更加一致的服务，尤其是在公共健康方面。这在全国均有保障性。所有这些都暗示了更进一步的中央集权化，限制了在资本主义中政党民主的各种“干涉”——通常通过道德说服、财政劝诱或隐蔽的专家政治，但有时也通过直接的立法压力——以及一个有限的国家自主权，它既不是从与资本主义或联邦制的正面挑战中衍生出来，也不是源于直接的斗争，相反它产生于地区、宗教和阶级的形式、道德主义和国家主义纠缠在一起的一种政党政治的无意识结果。由于这些方面无法正面挑战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独立自主的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如精英理论所预见的那样)几乎未能出现。因为出现专家统治—官僚化的干涉主义国家的先决条件是有较大的工人阶级压力和广泛动员的战争，而这两个条件都是到1914年以后才具备的。在战前“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中，道德和中产阶级占优势。它是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含蓄妥协，它适度地改变了国家的资本主义形式。

法国和美国的发展轨迹相同，但法国有着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在最重要的国家形式上它们与英国相当类似，只不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远不那么明显。在19世纪末，实行中央

集权制共和国的政党最终牢牢控制了法国，政府与教士、贵族和金融资本的抵抗相抗衡，同早期的共和制国家一样，他们设计出了一个比英国和美国更加集权、更具干涉性的国家，但是其主要干涉的对象不是资本主义或阶级。相反，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主要在道德的思想意识领域进行斗争——反对罗马天主教教会在教育、家庭法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力，以及共和国对控制军事力量的旧体制的讨伐(集中体现在“德雷福斯事件”中)。

资本主义继续支配着政治经济。我们再次看到一种双重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胜利；由第二种国家形式的政党民主改革、从天主教到一种世俗的中央集权化福利主义道德的思想意识以及改革国家军国主义的最后努力所共同做出的调解。

美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民主和邦联制的故乡。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它的国家权力最弱。内战猛然地转变了这一切。美国北方，尤其是南方，在国家干预方面比其他任何一个19世纪国家走得都要远。南部邦联严重武断地干预自由劳动和私人财产权并欺凌地方和中央的政府以及海关——是对为各州争取权利的政体的讽刺。资源基础更庞大、更丰富的北部联邦更多地依赖于对制造业商品供应的市场刺激。但是在创建第一个国家信贷体系和独立于英国的金融资本阶级方面，这种“北方式的利维坦政体”尤其信奉干涉主义(Bensel, 1900; ch. 3)。内战以后，虽然巨大的国家行政机构很快解体，但获胜的联盟保留了内聚性，并发起全国的经济大发展，在南方重建期间，它还直接控制了整个南方。正如本塞尔所观察到的，在内战期间，美国成为一党制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由北方金融界、工业界和自由土地农民组成的共和党显要们充斥着国家机构。然而我们再次看到，这些有效结合了专制权力和行政机构权力的各州不是依靠其独立自主的精英们，而是依赖于在市民社会的政党中被制度化的精英。

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强大的国家”联盟是脆弱的。大多数根源于地方性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在南方重建中失去兴趣并转而准备对付南方的民

主党。政党的派别性重新浮出水面。为保住总统职位，保守的共和党人被迫在1877年制定了一项选举政策，将自治权归还南方。政府又重新回到南北战争之前的形式：一种“法庭与政党”的形式，根源于地方的政党派别控制了占优势的小规模邦联，它的法院被放任主义和地方主义所统治，它那最具凝聚力和目的性的政党派别(南方民主党人)坚定地反对中央国家权力(Keller, 1977; Skowronek, 1982, p.30; Bensel, 1900, ch.7)。

同北方一样，美国的资本主义此时开始发展了，而南方仍是死水一潭，其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赋予地方资本主义以各种相当独特的形式，同时又存在着顽固地反对联邦国家的各种力量。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北方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与中产阶级之间集中在宗教道德主义的紧张关系。但是它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因素：它的自由个人主义太强，而它的企业公司比其他国家发展的规模更大。由于各企业与政党派别活动密切结合并寻求地方和国家政府的特权，因此出现了“公司腐败”的恶臭。因此，同他们的极端对立面南方民主党人一样，改革者也在寻求缩小而不是扩大政府的基础设施(Orloff, 1988)。然而华盛顿与其他四个首都(如果算上布达佩斯，就是五个)不同，它不是一个主要的、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城市。作为一座小型的，前工业化的南方城市，华盛顿不容易受现代企业公司所控制。因此，部分企业开始在联邦政府一级支持“现代化”改革。进步运动推进了这些有点自相矛盾的潮流。另外，它还推动了中产阶级在教育、教派性的宗教福利主义、中产阶级女权主义方面的既得利益，以及有工会组织的熟练工人的利益。所有这些(除了女权主义者)都在两党中得到牢固确立。这些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政府层上表现不同，但始终设法迫使在联邦政府的层次上与南方民主党达成一致，这给总结进步运动带来困难(对于专业历史学家以及非专业的门外汉皆然)。但是，一旦公司受到极小的限制，自由资本主义和南方各州的权力交织而产生的牢固的力量，就不容许中央国家对资本主义(及种族资本主义)有任何道德约束。

在所有三个党派民主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形式继续保持繁荣。国

家的干涉仍然有限并有助于资本主义(除了美国南方)。然而几乎不存在再分配。在这些领域中精英理论不再适用，多元主义则受到超劳工的资本支配权的限制——阶级理论在这里适用。但是集中于国家干涉的限制性因素低估了出现的各种民族国家形式。英国和法国——甚至弱小的联邦制美国——都是对历史的根本背离。19世纪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没能根本地改变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或者市民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权力分配对比。如果这就是全部历史，那么最终资本主义形式将处于首位。但是这些国家也改变了聚合性权力关系，也就是市民社会自身的身份，资本主义本身也正是如此。随着对两种历史性可选择的相互作用网络，即区域性社会和跨国舞台的抵制，每个基础设施都趋于增加现存国家的领土边界和国民的内聚性。

尽管资本主义打破了地方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原则并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但其古典思想家们(以及反对者)更主要地是期待它能跨越国界。然而，很多人没有对此作出这样的打算，“全国性”铁路、公路、公共设施、公共健康、警察部门、法庭和监狱以及教育和使用国家主导语言进行扫盲，这些都为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中央集权化的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受到美国南部地方名流的蓄意阻挠，因此，美国民族保留了与众不同的地方性。在几乎所有的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毫无意识地驶离跨越国界的权力组织，向国家权力组织发展。

不仅政党民主，所有国家的全国性基础设施也都得到了发展。仅从1882年到1907年的二十五年中，五个国家的人均邮寄信件的数量就上升了2到4倍。到1907年，平均每个法国人每年邮寄34封信件或贺卡；奥地利人是46封，德国人是69封，英国人是88封，而美国人则是89封(*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1913, p.205)。几乎所有这些广泛的私人和商业通讯网络都被限制在一国领土之内。在整个西方，民众的正规学校的教育发展水平几乎惊人地相同。在五个国家中年龄在5到14岁之间的儿童在校比例从74%(奥地利帝国)到88%(法国)之间

(Mitchell, 1975, pp.29—54, 750—759;尽管奥地利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处于落后状态，其比例为54%)。地区差别开始明显缩小，这一直持续了整个20世纪。在所有的五个国家中，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地区工资水平处于或是停滞或是不断增长的状态，随后从大约1880年开始这种变化减弱。对住宅估价的地区性差异显示了类似的倾向(Good, 1984, pp.245—250; Soderberg, 1985, tables1 and 2)。不仅出版的文字而且复制的图片都增加了国家的一体化。君主或总统挂在墙上的照片也都象征了地方行政官职并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报纸和杂志都再现了加冕典礼、检阅军队和议会开会这些全国性仪式的场景。

人口统计资料——女性生育率、私生率和结婚年龄——似乎与民族国家无关。毕竟，这些方面表明了这一固有情况即主要的直接管理者是跨国的教会和民间习俗而不是国家。然而沃特金斯(1991)指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之间，由于每个民族国家都明确得出了自己的标准化全国人口统计图表，各地区人口统计数据的差异正在缩小，但她没有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授予国籍的做法已采用了多久(或者到其他任何中间时期)；然而在很长时期里，性已民族化了。

考虑到第七章的讨论，这毫不令人惊讶。在第七章中，我论述了阶级和国家的动员力量来自于它们将外部组织与由亲密家庭和社区关系所产生的内部组织联系起来的能力。到19世纪末，这种能力对国家政策制定者来说已很明显。英国的改革者开始发展集中领域作为全国公民的基本形式。他们对家庭安排、父母责任、性道德、身体上和道德上的“健康”、“优秀的母亲”和“健康的”(指身体和道德的双重意义)家庭、邻居和学校等等的立法产生了影响。优生学是家庭生育与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思想意识。政治家们和20世纪受人欢迎的作家们通常以一种惊人的帝国主义语言来表述它：

> 我知道帝国是不可能在步履蹒跚、垂头丧气的公民中建立。

因为我知道帝国“不是来自擦亮的枪支，而是来自孩子和婴儿们的口中，他们具有上帝赋予的力量，可以镇住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仇人……”

各民族的历史不取决于战场，而是由托儿所来主宰，最终取得胜利的军队，是婴儿的部队。(Davin, 1978, pp.17, 29)

对优生学的看法也是更温和，更随意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时，社会风气一改维多利亚时代在两性关系中过分拘谨的状态，鼓励女孩将两性关系发展成婚姻、生育的爱(Bland, 1982)，并且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运用一种“母性的民族主义”言辞来寻求福利收益(Koven and Michel, 1990; 毫无疑问，奥地利也是如此)。各阶级的家庭和邻居，不仅仅包括成年男性的政治公民，正作为一个互相影响、情感丰富的团结社团进入国家。

尽管我对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知之甚少，但19世纪的个人身份观念一定有巨大变化。私人的和社会的个人行为都被限制在国家之内，地方性和跨国界的身份一定是在无意识中衰弱的，它没有表现出许多权力冲突。甚至那些权力来自以前的地方或跨国组织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地方名流、天主教教士、马克思主义的斗士，也似乎在自己的感觉中更具“国家性”。这在以前各著名政党中已明显出现，并且正如我在第二十一章中所指出的，它也逐渐减弱了工人组织跨国界的说服力量。市民社会的全国性组织以及资本主义和它的各阶层的全国性组织大量增加。国家的基础造就了民族国家。

当然，每个国家都独具特性。在英国，一个世纪以来无论在工业化之前还是在国家职能扩展之前，国家和一个“统治阶级的民族”碰巧合二为一。到1800年，这一阶级—国家在整个英格兰都是同民族的，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程度略弱一些。英国的新教教徒统治着爱尔兰。语言和文字仅使用英语，这也是出于最实际的目的，在英国本土和海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它的生产、交易和消费严重依赖其军队，

它开始从政治上更加集中于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国家基础性权力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在国家和民族的融合上工业化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经历了二个阶段。英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很大程度上英吉利化了(以它自己独特的英国和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的双重形式)。

法国和美国略有不同。早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兰西民族的城市资产阶级就已实现了政治化。因此中产阶级可以比其他国家更早加入(或反对)一个共和化的民族。尤金·韦伯(1976)指出这一资产阶级民族只在19世纪末扩散入各省和农民之间，这主要通过我所认定的那些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邮政和教育等进行的。同样，在一个分裂的世纪中，大规模的公民军队(在这个世纪的多数时间中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其军队比例都是最高的)和共和国的政治运动也起到了某些作用。事实上，共和国政府在有意识地通过扩大国家基础设施来稳固它们自己的政权。它们的反对者(尤其是天主教教会)，更多地盘踞于地方社区，并主张权力分散。因此铁路修建背后的一个有力动机就是使分散的共和国要塞易于互相通讯和资本流通。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共和党人的民族国家取得了胜利。

美国统治阶级也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但除了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在一项与众不同的工作上起到辅助作用——在讲多种语言的下层社会移民中创造出一个只讲英语的民族。尽管全国教育专家网确定了统一的教育模式，但大部分教育机构都是由各州经办的。美国相对孤立于其他先进国家，这也促使其发展了一种比其他国家更自足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更全国化的市场和企业组织。联邦政府的基础设施既可以说是民族的市民社会的起因，也可说是其结果(Skowronck, 1982，指出它更是一种结果，但以后才明白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民族呈现出的是更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化，而超民族主义。

但在整个西方世界，邮政服务、学校和铁路才导致了民族和具有全国组织的阶级产生。一部分国家服务机构——健康法规、警察、法院

和监狱——也提供了更多的官方干涉。但是大部分机构仅仅提供了“地下”设施，如光洁的瓷制排污管。通过这些设施，区域性(或移民)差异的混合导致了全国的权力界定网。在不知不觉中，国家基础设施导致了民族国家的产生。

然而有些国家却无此幸运。它们的语言和宗教团体混杂于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中。而且，正如下文指出的那样，这些在工业化上相对迟来的国家经历了更加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部分经济可能比民族经济更紧密地与国外相结合。在这方面尤其混杂的有俄国、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在奥地利的领土上，国家、工业化、语言和政治公民权的斗争遏制着不同的地域范围(正如第十章所指出的)。君主制渴望工业化，但这也可能造成更多的跨民族性和地区性的相互依赖，甚至比其全部版图的依赖性更强。它希望扫盲，但如果有些人持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它将使用何种语言？如果它为了政治参与权而牺牲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要求，那将是加强他们对现存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忠诚，还是促使他们支持与其竞争的地方国家呢？四种相互支持的力量在其他地方创造着民族—国家——一个国家有着更协调的基础设施，相对平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共同的语言团体，以及各阶级普遍要求的政治参与权——在奥地利、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不具备这些条件。

晚期发展和军事工业的复合体

西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重权力运作者的文明世界”，交流着文化信息、商品货物和受竞争的地缘政治外交和战争所控制的各种服务。一旦工业化在某些国家中实施，它会很快扩散到其他地方。正如它极大地推动了集体权力一样，它会立刻被其他大部分主导权力网络所接受和发展，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正在兴起的技术知识界的通讯网络起

到支持作用。在"后来者"的国家中，知识分子认识到早期工业化的长处与不足，并敦促国家精英党派计划他们自己的改革。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由后来者们发起的各种挑战也迫使早期工业化国家去适应它。尽管经济是主要手段(利用大量的工业权力)，但权力的运作者和目标不同。统治权力运作者的所有四种类型——思想意识、经济、军事和政治——在发展战略中相互结合。尽管美国和奥地利落在后面，但它们的结合通常是无意识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许多经济历史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发展战略问题。格申克龙(1962，1965)提出了后发展的经典理论。他将后起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实现归因于：(1)在发展中存在一种比在英国更强烈的"爆发力"；(2)对生产者的商品有更大的压力；(3)更大规模的工厂和企业；(4)对大众消费水平造成更大压力；(5)农业扮演次要角色；(6)各大银行起了更积极的作用；(7)政府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后起的国家发展速度更快是因为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权威工业及金融公司之间密切协调的极大帮助。国家精英和各党派改组国家财政以寻求制定宏观经济适度通货膨胀的信用政策。他们组建信贷银行，为工业和农业提供贷款；吸引英国的熟练工人并资助典范工厂；能建立或资助铁路和其他通讯基础设施；尤其扩大教育规模。最后，他们鼓励合并和卡特尔，以建立可以在科学研究和机械设备上投资的大型企业。国家精英和资本主义各政党在共同的利益追求中结成了联盟(Senghaas, 1985 对上述后期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

由于事后的思考，我们也能领悟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即国家领土内的经济相对平衡。如果政府的扶持发展进行得太迟缓或不平衡，那么不同的经济部门或经济地区可能变得更加依赖于跨国经济而不是国内经济。在这种"本国境内的外国领土"发展道路上，"买办"阶层可能希望保持自己国家的软弱以便与外国资本联合，甚至与其他国家联合，这一状况在 20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日显突出。尽管在 19 世纪跨国阶级阵线没有走得太远，但发展的不平衡能动摇一个国家，迫使精英政党关

注于内部社会的紧张局势而不是地缘经济的发展。

在第一次后起国家的发展浪潮中，普鲁士德国、瑞典、日本和意大利(仅在北方)拥有相当平衡、弥散和商业化的社会。德国的成功依靠于由国家调解农业与工业化的特殊关系(参见第九章)。毫无疑问，瑞典、日本和北意大利同样具有偶然性。但在这些强国之后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俄国和奥地利这两个较大的、更具多样化的后起帝国，以政治经济的不稳定为代价，获得了快速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1908年以后，俄国存在着政府支持工业发展的短期努力，前两个时期是由外国资本引发，而后一个时期则是由国内资本引起。在最后的阶段中，俄国的工业化是相当成功的(Mckay, 1970)。但农业更为关键，因为粮食出口换回资本和资本货物的输入。政府忙于进行农业改革，但在改革社会的动乱中受阻。奥地利发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无法更多地增加本国的内聚力(参见第十章)，后期发展战略可能促使经济增长，但同样也会导致分裂。德国的后期发展行为被证实很难向东转移。

为什么国家精英和政党采取这种后期战略呢？为什么与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主张？中央集权的地方性计划不是发展的必然特征，本书第一卷分析了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两种类型：一类是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统治帝国”的产物，而另一类是政权分散的“多重权力运作者的文明世界”的产物。欧洲已成为后者的典型例子，并由于工业革命这只“无形的手”而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要来自军事征服与统治：很明显，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中央集权经济统制下经济发展的一种更和平的形式。我对此确定出六种原因，前四种原因与后期发展理论的经济主义完全一致(我特别取自 Pollard, 1981；参见 Kemp, 1978)，第五和第六种原因源自非经济的国家形式。

1. 所渴求的发展是明确的并且对之作出权威性计划。在后发展的欧洲和在相对发达并受欧洲大国影响的非欧洲国家，前途似乎很明朗。在竞争性地缘政治中，工业化国家能动员起更多更强的集体权力；其他

国家不得不作出反应或被统治。“科学先生和工业先生”——正如诸多中国作家所说的——由于他们权力的必要性，最终会引起所有权力运作者的注意。

2. 发展资源受益于权威的中央集权化的地区组织。很明显一些工业部门得到了大规模组织的更多帮助。铁路需要大量资本投资并带动了钢铁、煤矿和工程建筑这些投资密集的工业。1880年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企业规模，尤其是扩大了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和矿业的规模。权威组织可能得到公司支持，但国家可能适合于更加地区化的中心资源如关税、货币和主要信贷投机。铁路和其他输送物资和信息的设施有一个地区的、通常是“全国的”基础。在这方面有竞争力的后勤是关键。如果国家建起了一个全国性铁路网，国内市场就会被激活。在19世纪各国工业沿着交通线路，从关键的煤炭自然资源开始迅速扩散开来。尽管铁、钢和位于煤田附近的工程行业产量不及英国，但在国内市场仍有竞争力，这是因为运费较低。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者也是如此。到20世纪末交通运输网遍布全球，但19世纪的交通通信类似于第九章所论述的那些纵横交错的全国性交通网。市场在一国领土内实现了一体化。

3. 市民社会的运作者没有能力组织起如此集中化的地域资源。这种能力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但经过漫长的19世纪，政府的组织和规划的程度大大超过了私人经济机构。与政府相比，各资本主义企业仍然弱小。1910年，克虏伯铸钢厂是欧洲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它拥有6.4万名员工和大约6亿马克的营业额(Feldenkirchen, 1988, p.144)。然而普鲁士—黑森的国家铁路雇用员工56万名，耗资30亿马克。政府的一个部，普鲁士公共工程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雇主，其员工比68万人的军队还要多(Kunz, 1990, p.37)。其他文职机构和军队的规模大致相当，资本主义公司较小：最大的法国公司是施奈德公司，仅雇用了2万名员工(Daviet, 1988, p.70)。

在每个国家众多的小型公司中，大型企业都如鱼群中的孤鲸。

1910年，法国仅有5%、德国有8%和美国有15%的劳动力就职于超过1 000名雇员的企业中。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些数字分别上升到28%，20%和30%(Pryor, 1973, p.153; Mayer, 1981, pp.35—78; Trebilcock, 1981, p.69)。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劳动力的集中率上升，但也仅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水平的1/2到1/3之间：1910年，法国百家最大的公司占全国制造业产量的12%，在英国这一比例为15%，在美国则是22%(Hannah, 1975; Prais, 1981, p.4，附录E；Daviet, 1988, pp.70—73)。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仅仅在美国那些最小的州和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明显出现国家代理前期的经济计划。

各银行、卡特尔和托拉斯所调动的资本远远不及国家精英。在早期工业发展中，英国资产阶级基本是自筹资金，而在较为落后或中央集权化较低的国家中，私人投资者仅在政策的帮助下，才能提供这种资本。国家精英用关税保护生产者，筹划地方投资者和银行的卡特尔，从国外银行家手中调剂贷款，并用收税来降低并保证利息率。大规模经济发展的计划依赖于国家。

4. 发展得到市民社会中国家精英及/或非经济性权力运作者的支持。[1] 在19世纪大多数首要运作者之间出现了一种经济共识。一时间仅有天主教教会反对国家和"现代主义"。19世纪中叶工业发展得到大多数人的狂热拥护。国家基础设施由于技术上有助于工业而被接受，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概念加入到新古典主义的利率概念中：旧体制和资产阶级也指望国家来保护他们共同的财产权，以反对无产阶级。理查德·梯利(1966)认为，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所造就的团结使他们能够共同扩大和发展普鲁士国家的基础设施。

但是即使所有这四种经济压力的联合也无法明确要求国家来协调发展。在国家的一些特别规章制度的帮助下，金融家的寡头政治协调了自己的大部分任务。20世纪末，除了那些单一民族国家外，各种计划机构——协同行动的跨国公司、非官方机构、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类似组织都已建立起来。今天，在第三世界中，后发展的尝试趋于在相对

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与相对市场战略之进行间循环摆动。尽管这是必要的，但各种经济关系和利益是对19世纪的后发展国家为什么如此强烈地依赖于中央政府这一问题所作出的不适当的辩解。我将续继确定两个进一步的影响。

5. 军国主义的国家形式支持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经济发展。第十一章中的开支数据表明19世纪末，国家开始大规模军事化并以半军事化结束。地缘政治和军事压力不断地在后发展国家间增强了规模和权威组织，此后它们在各国中也是如此做的(Sen, 1984)。所有国家甚至美国在整个漫长的19世纪，武装力量是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组织。和平时期，军队是最大的私人企业规模的10倍，战争时期达到50倍。在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家，最大的客户就是政府，它购买士兵和水兵的武器、制服和弹药，另外还有官员、法院和首都城市的奢侈品。早先，军事供给来自国家控制的军舰修造厂和兵工厂或通过自主转包人的途径购于大量的手工作坊。这两种做法使国家机构与资本主义企业出现分离，从而使较早处于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经济发展速度降最慢。但是在19世纪出现了首次的现代意义上的一体化"军事工业复全体"，它历经向前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铁路加强了军方介入经济发展的动机。在最初的怀疑之后，最高统帅部看到铁路能够彻底改革军事后勤。甚至英国交通线路的规划都受到海军要求确保港口和海军船坞的通信设施的压力影响。在其他国家，最高统帅部、国家精英和资产阶级在建设全国铁路网中相互更加密切地合作。发展越晚，帮着设计路线的军队就越多，因为在许多战争中铁路影响了战争结果——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役中法国受益，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受益，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受益。此后在法国、俄国、奥地利或德国，新的线路需要军队的允许和参与。国家的监督增加(Pearton, 1984, p.24)。

第二阶级随着19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开始发展，麦克尼尔(1983, p.279)称之为"指挥技术"。一直到世纪下半叶它是以资本家开辟的大

规模枪炮和弹药生产为先导——普鲁士的后膛装弹炮，法国的米涅式加长子弹和美国使用可替换机械部件的科尔特 6 发左轮手枪及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此后法国海军船坞率先使用装甲战列舰，军备竞赛随之而来。生产规模通过联合企业和卡特尔逐步升级(由于政府的鼓励)制造商(正如在今天的美国)拥有唯一的支配性顾客，对于这些顾客来说，产品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各军事国家不得不拥有这些产品，几乎无论费用如何。他们的“介入”，虽然主要是由于引诱力，但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为武器生产提供的公共信贷，其规模使私人资本市场望而却步。特里比尔科克(1973)确信，在 1890 年到 1914 年之间，其规模比得上更早时期的铁路投资。技术受军事的“命令”而向前发展。从通过贝塞麦炼钢方法制造的可互换的机械部件，到全部轻金属合金、涡轮机、柴油机和液压机，这一时期主要的技术突破都是这种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副产品。制造商已有客户保障，在面对不断增长的国际竞争时，能够在研究上比其他工业倾注得更多(Trebilcoch, 1969, p.48; Pearton, 1984, p.77—86)。

面对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无畏级战舰的图片，这艘 1906 年军备竞赛的极品，我们发现很难理解，这种战争舰以其巨大的球状船体，角状的上层结构和那无数的隆起，曾经一度似乎是如同今天设计豪华的 F-17 歼击机或三叉戟级潜艇一样是高技术和极先进的。但无畏战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它们是由当时最大的工业集团所建造，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并产生了历史上最集中的火力。与今天的类似企业不同，它们同时也提供了大量雇佣职位。

美国军事的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发展首先仅在形式上不同，随后便落在后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更关注于扩张和大陆联盟的一体化，而不是与主要的强国进行军事竞争。但是对于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各部特许并资助纵横大陆的运河及随后的铁路修建，以辅佐军队屠杀印第安人，为军队提供工程服务。内战突然产生了大量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联邦得到维护，使大陆一体化并促

进了工业集中。大量的战争债务，由政府公债提供资金偿还，扩大了股票市场，同时也资助了铁路公司。正如本塞尔(1990)指出的，国家有效地创立了--个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美国大型企业的兴趣通常以纯技术和资本主义逻辑的措词来解释(Chandler, 1977; Tedlow, 1988)，但是正如罗伊(1990, p.30)所观察到的，“创建各企业公司的决定性运作者是政府”。事实上，他指的是各州政府，因为主要是由各州政府进行协调管理。然而在接近19世纪末，随着对北美大陆的深入，且几乎没有地缘政治的压力，美国经济比其他民族国家更缺少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它那巨大的大陆市场引起了著名的企业革新——福特公司的T型车、西尔斯·罗巴克目录表、电灯泡——然而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一个公司支柱——德国，具有实质上的“受控制的”经济。

6. 君主制的国家形式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经济发展。不像大多数早期工业化国家，多数后发展国家是集中在旧体制上的君主政体，独立的君主大国受旧体制党派支持，这些党派比那些统治阶级政党更具狭隘性。君主制与旧体制联盟拥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可以绕过议会来寻求国库财源。第八章和第十一章指出这些国家从国家财产中利用税收和岁入达此目的。而国家铁路提供给国库额外的收入，普鲁士国家的一半岁入都来源于此。为了国家岁入，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和国有化工业都受到所有铁路的压榨。

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军方和较少的君主政权推动后发展战略；而后，混杂在一起的军事动机与资本主义动机通过地缘政治的竞争扩展到政党民主制。因为主要国家各形式之间的关系是经双方同意而产生的，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前述的第四个前提。逐渐地，国家精英和政党、最高统帅部和资产阶级所制订的各项政策(尽管缺乏言辞修饰)包含着一个工业化社会所渴望的目标，但是如果不管市场那只跨国的“无形之手”，那么也无法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一目标。

因此，这又是一个国家干涉不利于市民社会权力运作者的难得例

证。正如吉登斯(1985)所提出的，随着权力的重新排列，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维坦式政体。对于地域渗透，后勤上的障碍正在消逝；国家基础设施均匀地遍布于市民社会，从而减少了国家中的历史隔离性；一部分统治阶级希望给予政治统治制定经济规章制度的权力，甚至是主创权力。但是在政党民主中，“干涉”主要是协调、劝说和劝诱，而不是压制。尽管君主政体利用国库岁入的便利规避政党民主，但它们并未使其反对资产阶级。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君主们、旧体制政党、最高统帅部和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有时为了利益相互竞争，但它们并非处于辩证的、正面冲突中。资本家欢迎国家的信贷、通信基础设施和保护。军备竞赛保护了它们的资金与商品市场，同时充分就业创造了商品消费市场。它们认识到虽然最高统帅部和国家精英的利益并不是它们的利益，而且双方共同利益很少，但总体上双方的交易是有益的。君主制政府声称它们修筑铁路，建立国家工业并特许私人发展工业，是本着一种中立的，专家治国的原则。一个普鲁士的商业部长声称“由谁修筑铁路不是问题，只要有人修筑这些铁路”(Henderson, 1958, p. 187)。后起的国家协助私人资本家发展经济并通过协助军队来掌握并扩大经济发展。同时它们也可以安心地利用岁入所得来规避政党民主。

由于资本家、军队和君主政权的目标及形式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无人能从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政府的形式是累积的结果，我们将发现其结果是一场灾难。国家精英和政党很少反对资本主义。事实上，它们需要赚钱的工业，以获取商品和税收。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也支持私人财产权。当政府与阶级问题发生正面冲突时，它们通常与统治阶级站在一起，尽管这可能由于它们对道德和公共秩序的追求而有所缓和。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外交中政府的自主权比在国内政策中要大的多。在国内政策中，政府的自主权更多地运用于从属阶级而非统治阶级。

但政府并非仅仅维护资本家的财产，国家资源的一半被用于同其他

国家的军事竞争。由于军事和资本主义形式交织在一起，政府和资本家阶级都拥有更庞大的全国性组织和更加地域化的利益概念。这并非任何一方的意图。由于地缘政治的竞争又反作用于各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因此它们的组织变得更具全国性，它们的利益概念更具地区性。这就是19世纪各国主要的权力自治，不是一国精英蓄意制定策略，而主要是四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政府形式所产生的无意识后果。这四个形式是：资本家、军队、民主政党或君主政党，以及正兴起的民族国家。

社会公民权、军国主义和君主政治

从表11.5中可以看到国家民用范围的三大扩展部分。在讨论了基础设施的扩展和资源的国有化以后，我开始转而讨论三个部分中最次要的部分：福利事业，并讨论马歇尔的“社会公民权”的第一次运动。如表11.5所指出的，在福利方面政党民主并不是花钱最多的。的确，英国和法国刚刚开始现代福利事业的计划，而且英国在这一时期末，明确地转向实施累进税制。但德国仍是最大的福利支出国，最著名的项目是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尽管直到1913年，它的费用才超过由地方管理的社会援助计划和《济贫法》计划(Steinmetz, 1990a, 1990b)。表11.5也忽视了法国和美国从军费中支出的巨大福利开支。最早的福利国家运动大多出现在军事和君主制国家。

现在各级政权都存在着更大的“管理”问题。资本主义和城市化已削弱了对下层社会的部门性控制。无产阶级劳动者屈从于资本家市场，周期性地经历贫困、流动和反叛的状态。随着商业化横扫乡村，农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因为资本主义也给予工人和农民以集体行动的权力(参见以后各章)，所以需要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管理形式，尤其在新兴城市。

很久以来“良好秩序”的政权措施就是双重的，即“管理”与“福利”相结合。我们在第十二章中注意到，现在管理变得更为多样化，开始是准军事力量，后来是经济警察的出现。福利也更加多种多样。传统上，地方性的《济贫法》已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工业化，地缘政治的变动性和部门性失业，更加不稳定地增加了《济贫法》的费用，使这些法规的实施十分勉强。在英国和整个德国(以及也可能在有着更贫困记录的国家)，19世纪前半期的《济贫法》成为最大的国内支出。救济是最低限度的，穷人几乎没有权利的意识尤其是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贫困、体弱或年迈的人，如能通过在工厂做工而表明自己“有用”，可能不会饿死。但另外两种福利方式也已发展起来：自我保险和选择性国家福利。这不是指广泛的公民权而是地区性特别是部门性福利，它寻求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建立起忠诚者的网络。

自我保险从下层社会出现，来自各类互助会，这是早期工会组织的主要“保护性”功能(参见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这些工会在相对熟练工人中和在稳定的行业中广泛发展，并且因此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有些时候甚至是鼓励，因为它预示了节俭和体面，从“危险阶级”的下层排除了手工业者。他们可能在社会下层中鼓励地方主义，但直到这个时期的最末期他们都没有更多地涉及到政府。

在此之前，许多国家都已推行部门性福利计划。现代的法国和美国诞生于武装革命斗争和大规模动员战争。许多成年男子在保卫“他们的”国家中丧失生命或者残废。对残废军人和阵亡士兵的家属，对那些孤儿寡妇进行补偿的旧式特别支出被制度化，其金额也得到增加。在法国革命人士提出了一项对老兵和受伤士兵的抚恤金计划，并由波拿巴进一步强化。到1813年，它要花费全部军事预算的13%，超过10万名老兵接受了抚恤金。这一比例和数字一直保持到1914年(Woloch, 1979, pp. 207—208)。

美国联邦政府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为老兵和被扶养的家属支付伤残和阵亡抚恤金，到1820年，抚恤金的数额超过了所有民用支出。在

每次战后的第二十年和第三十年这笔费用支出达到顶峰，然后渐减。内战将抚恤金扩大到名副其实的老年养老金系统。到1900年，有一半本国出生的白人老年男子接受了这种养老金。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老兵的投票者占全部选民的12%到15%。1890年，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达到42.8万人，超过所有工会人数的一半。1892年到1900年之间，军队抚恤金再次超过所有联邦民用支出以后，才有所减少。但是从1882年到1916年这些抚恤金花费了所有联邦支出的22%到43%。尽管更贫困的邦联各州未支付抚恤金，但是南方各州大多数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批准了(拮据地)这些抚恤金。美国有了第一个福利州，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但它仅限于那些已对他们的州表示忠诚的人(这一段引自Orloff和Skocpol的研究，参见Orloff，1988)。

事实上，美国和法国的公民权有一种军事色彩。有时，法国人将公民权作为兵役定义为——兵役的血税。美国宪法确立了公民军队——在宪法条款中通常被解释为保证携带武器的权利(包括自动武器)。这些州将自己根植于公民士兵中，报答他们昔日的服役并从那不包括老兵的社会团体中贿买政治支持。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政体缺少在农民大众中的渗透性。一支大规模的、报酬优厚的军队在每一个法国村庄都建立一个忠实的基层单位。到1811年，大多数部门每1 000人中就至少有3个领取退休金者(Woloch, 1979, pp. 221—229)。这似乎并不多，但这可能是19世纪早期的国家向市民社会最彻底的渗透。美国则不同。白人成年男子选举权和两党体制导致了为争夺农民和工人的投票而进行的竞争。白人工人和工业资本之间的北方共和党人联盟出现了。北方工人对税收的赞同部分是用老兵的薪水买到的。这些“社会公民权”是有选择和部门性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各政权是从农民和工人手中获得了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忠诚，不像在农业社会里存在着对血统和地方的狭隘忠诚。

在老兵的养老金方面，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没有跟随法国和美国。然而它们的老兵，尤其是军士级别，被给予在国家平民就业中享有优先

受雇权(在法国也存在这种状况)，正如第十三章中所解释的。另外，这一政策与第三种方式相联系：首先由俾斯麦提出选择性的福利方案。

后发展的国家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并预料到危险及利益。去英国访问的外国人不仅注意到其先进的技术、经济活力和议会，也发现其城市的污秽、犯罪和阶级冲突。日益以国家为中心的德国知识界，对宪章运动十分了解，并从如果将工业化留给“无形的手”来操纵可能发生的一切吸取教训。他们称之为“英国病”，即阶级冲突，俾斯麦认为正是这一弊病致命地削弱了1870年的法国军队。他们研究英国的《济贫法》、合作社和互助会，法国的全国性工厂，比利时和法国的疾病和老年退休金的保险基金，以及比利时的互助团体。在德国流行的保险模式是自由的自助模式，这是与一种“社会的”或“家长君主制”模式相对抗(Reulecke, 1981)。王朝君主已实行了特殊的福利政策。1776年普鲁士将矿工日工作时间限制为八小时，保证其固定收入，禁用童工和女工，并且使保险金制度化，所有这些都是免除矿工兵役的结果。在玛丽亚·特里萨和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各部长所采用的各种福利措施，后来却因资金缺乏而中止。

但是德国首先将特定补助金改成普通的补助金。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从1885年开始实行起，占德意志帝国费用支出的10%，在实施10年后达到20%，到1910年达到30%。鉴于几乎所有剩余的费用均用于军事，我们可以看到立法的重要性。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工人们保护自己免于贫困，并劝说雇主对他们施以援助。然而其他国家并未效仿。1885年到1887年奥地利采取类似做法，但它的保险范围很小(Macartner, 1971, p. 633; Flora and Alber, 1981)。即使德国的立法也并不是完全慷慨大方的。它提供了低水平的意外事故和疾病补偿金，但仅覆盖了受雇人员的一半，并且仅够给年满70岁的人以养老金(后来降为66岁)——如果工人每年已工作300天并工作了48年。只有养老金包含了国家对保险额的分担，所以这个计划更主要的是强制性自我保险，它没有触及更有争议的工厂安全或工作监察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来能防止意

外事故和疾病(Tampke, 1981)。 这可能侵犯了财产权。

俾斯麦试图部分控制劳工，希望诱导有熟练技术、有组织的工人放弃社会主义。 社会保险的立法是他的政治诱骗，《反社会民主党法》则是他手中的棍棒。 他没有从工人那里寻找到积极的热情，仅仅使阶级斗争不能损害到国家和军队。 但对于更多地缓解工业中熟练工人的基本贫困这一目的来说，似乎足以达到其目的了。

但是也潜伏着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 俾斯麦的立法扩大了许多已在某些大型重工业中确立的政策(Ullman, 1981)。大工厂主是实施老年及残疾养老金和意外工伤保险立法的主要支持者(尽管后来他们反对失业保险)。 最初，持反对态度的是较小的雇主。事实上，与早先的打算相比，由于资金的短缺，俾斯麦被迫更多地采纳自我保险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由大企业的雇主们提倡的。 此后，在新兴的轻工业部门中，福利计划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 因为这些企业的合格产品具体地体现了工人的工作动机。 他们趋向于按资本主义的方式使福利"商品化"(Steinmetz, 1990a, 1990b)。 与其说俾斯麦的立法所预期的是福利国家(正如通常所争论的那样)，不如说是 20 世纪末美国和日本的企业：从公司内部劳工市场中获利的工人，成为资本主义的忠实者(有时忠于军国主义)，他们拒绝工会和社会主义。 正如马歇尔所论证的一样，它试图使阶级冲突制度化，但是是以部门组织来回避阶级，这些组织将享有特权的工人与他们的雇主及国家拴在一起。

因此，早期的法国、美国、和德国减轻贫困的计划具体表现为两个原则，一个是从国家中得到的军事公民权，另一个是得到君主制度和公司资本主义支持的自我保险。 两者都不是全体公民所能享有的权利(更非全部成年人的权利)。 各项权利的给予是有选择的，仅仅给予那些为资本和政权提供关键军事或经济动力资源的人。 其意图以及有时产生的影响，是将阶级意识一步步地改变成国家主义或地方主义。

然而，这两个计划彻底地扩大了国家的活动，并远远超出了地方部门的权力网络。 它们通过政党民主也是可扩张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许多英国的自由党人，美国的民主党人和法国的激进分子开始将福利与累进税制联系起来。自由党由于受到一个有创造性和说服力的政治家推动，在1914年以前制订立法。劳埃德·乔治将工会和私人保险公司计划纳入一个由政府管理的更加综合的体系。享受保险仍不是普通的公民权利，因为这些保险金的使用被限制于有正式稳定职业的人，但这太过广泛，不适于部门性分而治之的战略，尽管实施保险金的意图是削弱劳工党。但更重要的是，保险金是与累进收入税制相提并论的。通过其他人的财富，将有组织的解除部分人的贫困：社会公民权首次得到国家承认。现代化正开始经历它的第三次巨变。

隐藏在各式各样计划背后的是三个主要条件——在政治上处于下层的广大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动员的战争状态，以及公司资本主义。如果继续保留这三个条件，部门的社会军事和阶级的地方主义权利可能被改革成广泛的社会公民权。所有三个条件的确被保留下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实际上成了总体战，它涉及了所有公民。只有在美国，部门性权利有效地经受了国家生活中的第三次巨变即社会公民权的到来。但这个巨变发生在更近的时代，在本书所讨论的时期之后。

第十一——十四章的结论

这四章讲述了西方国家生活中发生的两次现代化巨变。历经整个18世纪，这些国家已成为较大的强国。令人惊讶的是，相对于市民社会，它们大约在1800年达到最大规模，此后便衰落了。但国内仍然是传统的、狭隘的而且主要是军事的。各国只不过负责岁入的征收和招募新兵，尽管它们也在深深地费力融入社会生活，从而使其具有政治性。在19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改革中，它们不再从(相对的)规模上扩张而是在范围上扩展。它们的民用职能是广泛的并仍在不断扩大。现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化更浓，尽管远不如18世纪末痛苦和强烈。到1914年，它们成为双重的军事—公民国家。两次巨变相当大地冲击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由于国家精英和各党派寻求协调他们已扩大的职能，国家变得更具代议性和官僚化。而市民社会则"归化"为民族国家，受国家主权和边界的限制。

第二次巨变是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展，不像精英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增加国家精英的自主权和专制特权。而是与之完全相反。国家具有双重性、中心地位和地域性的范围、精英和政党。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被政治化，各政党比精英们更加巩固。如果我们将目光局限于国内的公民活动，那么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活动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简化论变得似乎有道理。在这些障眼物中，马克思指出了要害，他把19世纪的英国政府描述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相互保险契约"或者是一个"为了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尽管他有点低估了道德思想意识和政党民主可能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的各种限制。这些限制引起国家更多地"干涉"资本主义自由，尽管主要是通过劝说、劝诱和隐蔽的措施，而不是通过公开敌对的立法。总的说来，这些国家更加明显地定型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其他。就国内而言，国家在这方面不像是一个运作者，更像是一个权力角逐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唯一目的造成了国家机构的内聚性。

美国和法国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情况，尽管美国在各种不同的政府场所驱散了精英和各党派——美国南方仍是例外——相反法国却使他们集中甚至聚集于首都。当然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半独裁君主制中，甚至更多地在独裁的俄国，君主政治下的精英和政党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力(尽管很少有精英团结)。但就是总体而言，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即西欧和北美的国家——在公开的权力与市民社会中主要资产阶级在国内政策的冲突方面，它也并非总是如此。但是在19世纪的国内政治领域中，简化经济论引起强烈共振。

上面提到的简化论极大地忽视了两种更进一步的国家形式，当它们

联合起来，会给资本主义带来彻底革命，从实际上变革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首先，国家基础权力的增长不仅仅是中立的。它增强了前几个世纪所推动的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归化。这种加强不是通过直接的正面斗争实现的，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阶级斗争。另外，它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没有任何人有意这么做，权力网被转向国家领土、控制、社会生活国籍化的领域，甚至还发生在与它更密切的领域，如社会身份和利益的地域化。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现代化国家逐渐定型，然后与长期存在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些斗争是关于国家将如何中央集权化和民族性或者分权化和联邦制的，从而产生全国性中央集权化的补充形式(尽管，在这方面美国落后了而且奥地利偏离到邦联主义上)。阶级简化论也忽视了第三种国家形式，即军队，它是现代国家的形式。与以前一样，现在它并不支配着国家，而是在国家内部变得更具独立性，更有能力以基础权力来控制“它的”武装力量，并且更具潜在的极端危险性(正如第十二章所提出并由第二十一章证实的一样)。

历经整个19世纪，虽然有些不平衡，但这两个更进一步的定型使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活又一次变得更全国化和更地域化——因为资本主义也正对它们再次做出调整。与其他形式相比，这三种形式——即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军队——在这一时期似乎在普遍因果关系的更高层次上起作用。然而这三者从未在正面冲突中相遇，否则我们也许可以从其结果中“最终”评价他们；或者在一种有组织的妥协中相遇，对此我们可用多元理论进行评价。多数国家看起来似乎是相对和睦的，关于政府目的，各党派和精英享有广泛的共识——在英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而法国、德国和美国开始的时间则要晚二三十年，在奥地利根本不存在这一状况。然而这是一种未经思考和验证的偶然共识。各形式是“累积的”。另外，在半独裁的君主制中，它们没有对相互之间的最终矛盾加以认真考虑——尤其是，如我们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时期政党民主或君主政权的形式增加了更具体和多变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里看到。但是因为国家还不是完全的代议制，

所以多元理论仅具有一种有限的解释作用。

由于国家更加多形化，它们表面上的内聚性具有了潜在的欺骗性。在早期，由于被一小撮精英分子和相当特殊的政党控制着，许多国家已具有真正的内聚力，这些控制者包括王公诸侯、商人寡头、教士神父或武士阶层。他们在所控制的政治领域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然而他们无法控制外界的社会生活。我们已看到自治权的衰退，控制权的增长。国家已开始以精英为中心，以政党为辐条，市民社会正是以此得到组织化。但是当国家起到这种作用时，便丧失了早期的排他内聚性。

我研究的基本宗旨是：社会不是一个系统。对于人类的存在没有一个最终的决定性结构——至少在社会中，社会运作者或者社会观察家还无人能够了解认识。我们所称的社会仅仅是形形色色的相互重迭交叉的权力网的松散聚集体。现在，国家已在代议制和官僚化的组织道路上前进了一半——但并没有系统地面对、评价并调解那些接踵而至的多形化形式，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是，这些国家正动员可怕的共同权力，而对于这些权力，它们——事实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很好地驾驭。第二十一章将指出在1914年7月，欧洲各国偶然累积的多型性开始倾覆了整个多权力运作者的文明世界。

注 释：

[1] 这里可以有多个事例证明，仅国家精英可能支持这一点，然而却能够强制性地获得他人的屈从——正如布尔什维克在后来所做的一样。但是没有一个19世纪的国家拥有这样的专制特权。

参考文献

Bensel, R. 1990. Yankee *Leviathan: The Origins of Central State Authority in America, 1859—18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nd, L. 1982. "Guardians of the race" or "vampires upon the nation's health"? ; female sexuality and its regulation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In *The Changing Experience of Women*, ed. E. Whitelegg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A. D.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Cronin, J. E. 198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7.

Daviet, J.-p. 1988. Some features of concentration in Franc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oncentration Proces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H. Pohl. Wiesbaden: Steiner.

Davin, A. 1978. Imperialism and motherhood. *History Workshop* 5.

Digby, A. 1982. *The Poor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Historical Society.

Feldkirchen, W. 1988. Concentration in German industry, 1870—1939. In *The Concentration Proces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H. Pohl. Wiesbaden: steiner.

Flora, P., and J. Alber. 1981.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 P. Flora and A. 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a tool of analysis.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Paris: Mouton.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od, D. F. 1984.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ew, R. 1984.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state.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C. Bright and S. Hard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annah, L. 1975.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Economy*. London: Methuen & Co.

Henderson, W. O. 1958.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russia, 1740—1870*.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M. 1977. *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mp, T. 1978. *Historical Patterns of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Longman Group.

Koven, S., and S. Michel. 1990. Womanly duties: maternalis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s in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Kunz, A. 1990. The state as employer in Germany, 1880—1918: from paternalism to public policy. In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80*, ed. W. R. Lee and E. Rosenhaft. New York: Berg.

Lubenow, W. C. 1971.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Growth: Early Victorian Attitudes Toward State Intervention, 1833—1848*.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Macartney, C. A. 1971. *The Hapsburg Empire, 171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acDonagh, O. 1977. *Early Victorian Government, 1830—1870*.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cKay, J. P. 1970. *Pioneers for Profit: Foreig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1885—191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Neill, W. H. 1983. *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 Blackwell.

Marsh, P. (ed.). 1979. *The Conscience of the Victorian Stat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Mayer, A.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Mitchell, B. R. 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rloff, A. 1988.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America's belated welfare state.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M. Weir et 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earton, M. 1984. *Diplomacy, War and Technology Since 1830*.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Pollard, S. 1981.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ais, S. J. 1981. *The Evolution of Giant Firms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yor, F. L. 1973. Propert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Nations.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Reulecke, J. 1981. English social policy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seen by German social reformer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W. J. Mommsen. London: Croom Helm.

Roy, W. G. 1990. Functional and historical logics in 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2.

Sen, G. 1984. *The Military Origi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ival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enghaas, D. 1985.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 Leamington Spa: Berg.

Skowrone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derberg, J. 1985.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d dynamics, 1840—1914: a comparison between France, Great Britain, Prussia and Swede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4.

Steinmetz, G. 1990a. The local welfare state: two strategies for social domination in urban imperial German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990b.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of an autonomous state: industrialists, Junkers and social policy in imperial Germany.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2.

Sutherland, G. (ed.). 1972.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 Century Govern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Tampke, J. 1981. Bismarck's social legislation: a genuine breakthrough?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J. Mommsen. London: Croom Helm.

Taylor, A. J. 1972. 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Tedlow, R. S. 1988.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oncentra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Concentration Proces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H. Pohl. Wiesbaden: Steiner.

Tilly, R. 196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russia, 1815—186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Trebilcock, C. 1969. "Spin-off" in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armaments and industry, 176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22.

1973. British armaments and European industrialization, 1890 —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26.

1981.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1914*. Essex: Longman Group.

Ullman, H-P. 1981. German industry and Bismarck's social security legislation.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Britain and Germany*, ed. W. J. Mommsen. London: Croom Helm.

Watkins, S. C. 1991. From Provinces into Nations. Demograph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ber, E. 1976.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eks, J. 1981.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Longman Group.

Woloch, I. 1979. 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第十五章

英国工人阶级抵抗的兴起，1815—1880年

工人阶级运动的理论

多数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事件都始于英国。在19世纪，英国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也是唯一拥有大量工人阶级的国家。正如表15.1所示，最显著的例子是，早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时英国制造业的工人数量就已比农业工人多。实际上，英国的工业化要比其他几个主要强国早一百多年(正如表19.1所揭示的那样)。

英国工人的较早出现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在20世纪初，当其他主要强国正经历着劳动力规模类似的工业化时，工业化的性质、民族性质和阶级性质都已发生改变。在英国宪章运动中，发生在早期工人阶级身上的一切是无法重复的。尽管此后这些早期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并且现在仍认为是——未来工人阶级的原型。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在斯托克波特经营一家工厂)住在英国。他们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首先来源于在英国的经历，并在事实上影响了所有后来的作者。他们讨论了四个主要问题：

1. 资本主义将存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质的界限作为类似的“普遍阶级”而弥散到整个市民社会。

2. 制造业资本主义使劳动力一体化，工人们集体地相互依存于生产和劳动力市场。工人成为互相依存的“集体劳动者”，他们组成工会并承担共同的阶级行动。

3. 工作以外的广大工人团体强化了相互之间的类似和依存。这些团体有能力管理自治的社会和文化组织。

4. 三种集体行动的力量促成了阶级政治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有革命的必要，这个政党有能力获得政治权力。

尽管这些内容中的许多东西可以接受，但是在五个方面我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模式相违背：

1. 尽管在事实上工人的确发展为“集体劳动者”，但这却很难发展成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在相对单纯的经济冲突中。正如韦伯所谈到的，与马克思确信的情况相比，工人们拥有更加多样化的经济力量来源。

表 15.1　根据部门得出的英国劳动力百分比，1801—1881

	1801	1821	1841	1861	1881
农　业[a]	35	29	23	19	13
工业、矿业	29	39	44	49	49
服务业	29	31	34	32	38

a. 包括林业和渔业。

资料来源：1801—1821：Evans，1983，p.412 他也提供了有关 1841 年和 1861 年的略低些的工业数据。1841 年、1861 年的资料来自：Bairoch 等，1968。

尽管无人拥有生产工具，但是许多人控制了相关的职业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帕金(1979)所称的“关闭”，即对于其他想寻求使用相同技能的人关闭劳动力市场。因为 19 世纪劳动力供应充足，“关闭”依赖于阻止使用“受雇顶替罢工者工作的人”(在美国使用“拒不参加工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使工人技能单一化，他们互相可以替换，很容易取代。因此为了发挥“关闭”的作用，工人们不得不将联合扩大到整个阶级，他们彼此都同意不做工贼。然而，资本主义

的发展没有统一降低技术这就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集合体：

A. 工人是与自己的同事及雇主之间存在一种部门化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不是与其他所有工人相互依存。雇佣关系本身就具有双重性：尽管雇主与工人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必须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合作——雇主为了获得利润，工人则为了得到工资。对立和依存是各类关系的正反两面。如果稀有的劳动技能与雇主有特定联系，并且是在工作中培训的，那么工人的依存性就会增强。工人被剥夺了离开企业的权利，因为在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就成了非熟练工人。在罢工期间，雇主可能不愿使用工贼，因为这将牵涉培训费用而且短期劳动力的效率低下。这就使得雇主和工人可以共同发展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培训要求不同工作分为几个层次，在其中工人可以从低层向高层提升。尽管雇主和工人之间仍存在冲突，但是他们的相互依存性也被强化了。雇员从外界的工人大众中隔离出来，冲突只针对特定雇主，不能再概括为阶级冲突。

B. 相互依存的第二种形式不包括雇主，仅涉及工人，但是在较小的地方性团体中是由行业、职业和产业来界定。尤其是需要技能的手工业行业或职业可能共同行动以控制技能的提供。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不容易受到工贼攻击，也不需要争取更广泛的工人支持来制约工贼。他们的做法可能是纯部门性“工人贵族”的策略。熟练工人可能对雇主的反对十分强烈，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工人阶级整体。政府和雇主也可能安抚拥有上述市场权利的工人，同时保留着对不称心工人的镇压。因此工人中的地方主义使对手采取部门性策略。

那些不具备这两种狭隘依存性之一的工人更容易遭受工贼劳工的攻击。他们必须寻求更广泛的联合以限制可替代劳工的提供。这就形成了认同和对立的阶级定义。相比之下，两种更狭隘的团体意识到两个敌人——雇主和圈外工人。有特权的内部工人通过斗争来对抗被圈外工人取代的威胁。这一根本的地方—部门化错误路线将技术性职业和非技术性职业分开，使行业工会和企业工会、产业工会和普通工会分

开。这些区分将在所有章节中普遍存在，它们是更广泛的阶级组织所并存的要素。

2. 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解决资本主义弥散性与权威性之间存在的紧张状态。他们有时强调资本主义弥散的特性，有时又强调阶级斗争的某一特定权威性。他们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劳动过程、生产特征和生产中的各种直接关系。直到近代，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仍是“生产力主义者”，他们相信各种关系决定了阶级和阶级政治——通常以工厂的生产关系为模式。然而，劳动过程与阶级冲突一样经常导致部门化或地方性。在解释更为广泛的类似阶级的工人运动时，我更专注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在市民社会的弥散，而对工厂和劳动过程关注较少。后几章显示了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学术争论。生产力主义的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已削弱了无产阶级地位和社会主义政党更广泛的潜在要求。

3. 马克思主义也趋向于经济简化论。其第三和第四论题——都涉及工人团体和政治——似乎要纠正这一点，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追随者将这些看作是主要由融入论题一和论题二的经济权力关系决定的。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并不赞同这一点。

政治权力的定型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冲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多数后来的作者都忽视了国家的作用。他们认为，工人的政治在本质上是由其经济条件决定的。通过观察政治是如何可能成为斗争本身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最初经济条件的产物，近代作者对以前的观点略作修补。但这仍然不够。雇主和工人的冲突开始涉及国家，因此国家的其他具体化形式也开始构成工人阶级运动。这尤其表现在弥合成强化工人阶级的错误路线方面。正如我在第十一章中曾指出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国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的劳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各种政治权力的关系深刻地决定着工人阶级的兴起，或者使之无法形成。

4. 同样，工人团体也不仅仅是消极地接受各种以生产为中心的权力关系。他们也反作用于生产关系，正如我在对美国工人的调查研究中

所认识到的(参见第十八章)。但是这也同样对更为密切的家庭和性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特殊影响。马克思对性的问题没有兴趣，恩格斯对此则较感兴趣，但是二人都认为工人阶级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男子，并且这具有普遍性。然而，阶级一直是与家庭、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本章主要讨论了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经历的一个转变，即从重视家庭和团体到重视男子和就业。其结果是产生了与阶级组织相对的部门—地区性组织。

5. 所有先前的推论都是阶级冲突极少是一种辩证的正面对抗，因为它涉及了无数独特但却并不矛盾的逻辑学方面。我将证实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辩证的革命方法中，冲突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在正面对抗中，资产阶级相当清楚地看到来自下层的威胁，并且了解约束它的内部宗派性。在正面冲突中，工人阶级更可能是失败而不是胜利。

如往常一样，我集中讨论的是阶级组织，但是我也运用主观阶级意识的IOTA模式，关于这一模式曾在第二章中有所介绍。记住，理想的模式具有一致性、对抗性、总体性和选择性，强调发现于社会现实中各种不完善的部分因素是片面的。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或反对资产阶级，通常会使组织内部的工人意识与其他集体认同和反对的基础相互竞争，甚至在激进分子之间产生了缺乏阶级总体的强烈意识。现在我要探讨更多的工人选择。表15.2将对19世纪和20世纪工人(及农民)在面临的资本主义时所设想的主要抉择进行分类。

表15.2　工人和农民面对资本主义的选择

斗争策略	对资本主义的战略		
	竞　争	改良主义	革　命
经　济	保护主义	经济主义	工联主义
国　家	互助论	社会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

工人运动在“激进”程度上存有区别——从竞争经过改良主义到革命——并且在他们是否寻求改造国家以及各种工业关系上也存有区别。

这产生了三对选择。第一组是最“温和的”——不改变资本主义但为工人在资本主义内部“竞争”提供各种机会。如果工人接受现存的市场规则和条件，仅运用集体团结以取得市场优势，我就将之称为保护主义。合作社通常是保护主义者，如同罗伯特·欧文的示范工厂、宪章运动的土地计划或今天规模巨大的巴斯克·蒙德拉贡企业。它们内部是集体主义的，但如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他们也是根据外界市场来运作。无处不在的保护主义大多是由工会保险基金提供支持，这使 19 世纪多数工会的实际名称——在英国称作“互济会”，在美国称作“慈善团体”，在德国称作“救济协会”。

但是由于现存的市场规则和法律偏见，通常迫使工人放弃仅有的保护主义。工人们要求从法律上认可工会，并立法以减轻合作社的信贷和资本问题。正如蒲鲁东所倡议的那样，这就是“互助论”。多数所谓的社会民主其实是互助主义，他们寻求的国家管理仅是为了维护工人组织的权利和自由。19 世纪的多数人们并没有体验到国家是“方便公民的”，并且倾向于将自由界定为从国家获取的自由。多数工会所期望的是互助权利加上通情达理并持调和态度的雇主。在本卷中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如同先前的多数历史一样，人们很少对政治感兴趣。他们宁愿避开国家，但是在与国家发生冲突时，就对政治产生了兴趣。马歇尔说过，工会组织的权利在概念上与自己认为的公民权是截然不同的——这些权利尽管合法，但在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各种政权在整个 19 世纪都抵制类似的权利，有时甚至采取残忍的方式。因此马歇尔的公民权的进化阶段存有缺陷。在某些事例中，直到彻底进入 20 世纪集体的组织权利才得到承认。而这时人们获得大多数其他公民权利和主要政治权利已有很长时间了。在 19 世纪早期，国家财政的苛捐杂税开始减少，政权对承认工会的抵制就成为工人政治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政府不允许自由成立组织，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造它。工人就会转向表 15.2 中所列的其他选择。

第二对选择是寻求通过改革从内部修正资本主义。经济主义描述

了工会寻求直接从与雇主的讨价还价中获取收益。经济主义不仅限于对工资提出要求，也可以就工厂中的控制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社会民主主义预示了政治改良主义(尽管这一措辞会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性言语产生混淆)。第三对选择是通过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那些以经济手段寻求革命的人——工业起义、大规模罢工——被标识为工联主义(有时是工团主义)；对于那些寻求夺取国家的人，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故意避开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了实行中央集权下国家经济统治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暂时”阶段)。我们将看到，当面对充满敌意的资本家和政府时，许多斗士完全越过互助论，他们绕过改良主义直接采取两种革命性的选择。改良主义在一战以后才盛行起来。

这些都是理想中的模式。工人很少一心一意地追随，相反他们是将所有选择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它们的松散联合就是当时所称的“社会主义”。一旦工人开始了政治性选择，这一联合也会坚持赞成民主政治。鲁谢迈耶、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1992)指出，在整个现代世界，工人一贯迫切要求民主的。因为统治阶级所控制的国家不可能不干扰他们，所以他们要求国家应由人民(最初是指男子)来控制。在本章中，我给最早的一个民主运动提供了文件资料。

最后应注意到两个细节。因为制造业资本主义在整个19世纪的英国一直在扩张，所以主张“生产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预期工人运动也会稳步发展。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宪章运动中，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行为达到巅峰，此后工人运动变得更温和、更分散了。英国工人阶级已不再可能如宪章运动的早期阶段那样团结并富有战斗性。为什么工人运动不是直线发展的？其次，工人阶级的发展包含着一种组织上的新事物：工人能抵制有组织的迂回包围。这在最初支撑了社会的层次化。由于阶级结构是不对称的，人们很少能成为历史的运作者；与从属阶级相比，统治阶级能够组织得更为广泛。在19世纪的英国，他们的迂回包围遭到动摇。那么这是如何被动摇的？原

因是什么呢?

企业资本主义和大众政治，1760—1832 年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 18 世纪晚期的三次革命，正是这三次革命改变了英国的阶级关系：企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国家以及群众不系统的识字能力。我将依次讨论前两次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探讨第三次革命。[1]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到 1760 年英国农业已实现了资本主义化，这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地主、佃农和无地的劳动家庭。许多无地者，包括男人和妇女，现在都被迫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这些工作由企业家来提供，他们是“中间接受者”。这些企业家拥有制造业和商业资源的绝对私人所有权。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分以及工厂、作坊或作为工作场所的街道的区分均毫无意义。

企业家也威胁着大多数手工业者。第四章讨论了手工业者在有产“者”和无产的“民众”之间处于一种暧昧的阶级立场。他们不确定地处于小资产阶级下层的边缘。在历史上，他们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组织。行会使城市居民区和需要技能的职业融入地方团体中，这些团体由“师傅”的家庭、其家庭成员以及“雇工”组成，他们的松散联盟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行会得到国家的特许和承认。作为回报，行会取得了提供手工技艺的垄断权。流动维修工人，如木工业、石业、制皮业及(日益增多的)金属业的熟练工人作为工匠组织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流动，共同控制着从业和工资的评定(Leeson, 1979)。到更近的时期，这两个组织大部分熔人更松散的手工业组织并形成流动者。手工业者利用地方工会的条件差异，运用流动网以获得流动工作的好处。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就业机会。所有这些组织在本质上都是保护主义者，它们自定价格，很少与雇主讨价还价。在各行业，18 世

纪的流动组织能够比企业家组织得更广泛。例如，1764年，伦敦的6 000名制衣业罢工工人沿着组织网在全国“消失”了。流动也可以避开《结社法》(在1799年到1824年这一法令宣布工会为非法组织)。广泛的组织性和流动性使工人能够迂回挫败雇主和商人。

但是在劳动者中，手工业者仅占5%到10%的比例，他们的组织是局部的，不具有阶级性，仅限于一个行业。他们与广大的农业工人或临时的城市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在19世纪早期，手工业者也受企业家的压迫。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全国化，流动迂回避开企业家的能力被削弱了。手工业者也失去了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的控制权。一些工业化的手工行业，尤其是磨坊和织布业，也丧失了对工场和从业的控制权。因为企业家包围了它们的市场和工场并用机器和非熟练工人取而代之。在两类大型现代化工业即棉纺织业和制铁业里，工厂无产阶级正在出现——在棉纺织业中主要是年轻的单身妇女和儿童。拿破仑战争从各方面加剧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这些压力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和低工资，而人口的增长和大量向城市迁移又使这一状况更加恶化(O'Brien，989)。城市中较高的死亡率(通过传染性疾病)也平衡了劳动人口。

企业家针对手工业者的平衡攻势，一方面迫使工资降低，雇佣那些工资水平更低的妇女和儿童，另一方面还采用雇主控制学徒的计划，排除手工业者与原料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各行业开始“密集化”。部分手工业者成为受残酷剥削的家庭户外劳动者，到手工工场工作的其他人则幸存了下来。

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正确评价工人阶级所具有的特性。除了棉纺织工业，工厂中很少具有工人阶级的特性，甚至多数棉纺织工业中的工人数量也较少。1851年，平均每家纺织企业刚刚拥有超过100名的雇员，即使那些同时拥有精纺和织布的企业，其雇员人数平均每家也刚超过300人。到1890年，这些平均数仍未增加到2倍(Farnie，引自Joyce，1980，p.158；本段所有其他资料均来自Clapham，1939，Ⅰ，

pp.184—193, Ⅱ, pp.22—37, 116—133)。在英国有一些大型矿山和钢铁工业。1838年,英国康沃尔郡的锡矿工人平均近170人,全国的煤矿工人人数平均仅50人,但是也有大约十二个东北部的煤矿,每矿雇用了300多名工人。1814年,苏格兰卡伦钢铁厂雇用员工2 000人(“欧洲最大的制造业”),但是平均每家苏格兰钢铁厂雇用员工才20人。在英国有大量制造玻璃、刃具、陶瓷或羊毛织品的工厂。1871年的人口普查估计,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量的1/4)的一半在“工厂”,但这些工厂平均仅有86名工人。制造业中,绝大多数工人是在小型工场。这些工场大部分没有使用蒸汽动力。通常每个机器都是独立人工操作的,工作结束后由人工维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蒸汽动力和手工技术之间的优势平衡还远未建立”(Samuels, 1977, p.58; Greenberg, 1982)。

在“现代”工业中,多数就业问题也未解决。185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最大的部门是农业和国内服务业,其次是棉纺织业、建筑业、普通劳动者、女帽及妇女头饰的制造者、鞋匠、矿工、裁缝、洗衣女工、海员和丝织业工人。妇女就业人数几乎与男子一样多。多数工厂的工人是年轻的未婚妇女和儿童。大多数男子却带着自己或其家庭生产的商品进出于市场,这些商品一般是在家中或小型作坊中生产的。他们有时也生产自己的工具来维护机器,或者为在工厂中的工作商谈价钱。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许多家庭同时从事制造业和农业劳动。尽管工匠们已丧失了某些自主权,但是他们仍是契约自由代理人,他们管理并付钱给自己的工人,而这些雇工通常是自己家族的成员。然而,他们的管理现在很难有保障。许多工厂的工作,如那些在家庭、作坊、牧场、矿山和街道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工作的多样性和无规律性普遍存在。

因此,乔伊斯(1990, pp.145—153)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很少存在无产阶级化并且阶级的身份意识也较少。而我的结论却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段出现了工人的矛盾体,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被工人的多

样性所统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立足于生产力主义和就业或职业的现代概念之外，并深入家庭和社区。幸存下来的手工业地方主义和雇主的部门主义开始流行。但是这些很少能给工人家庭提供总体的特性。“工厂”伴随着“工场”、“家庭作坊”和“街头作坊”而出现，正式就业也与行业雇用和临时雇用同时出现。但是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界限。相反，它们互相渗透，从而阻止了任何一种单一就业形式笼罩着众多家庭和地方社区。最明显的地方主义本应使男子与年轻妇女和儿童相互竞争，然而，他们却通常共同存在并组成与手工工场和工厂相互渗透的家庭生产单位。

在这一时期，家庭作坊为阶级团结提供了一种衡量截然不同的劳动过程的标准，它使工作、家庭和社区之间产生了密切联系。随后，相对于临时就业的稳定就业将工厂从家庭和街区中分离出来，将男性从女性的工作中划分出来，并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区分开。但是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作的多样性涉及到大多数的工厂、家庭作坊和家庭，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工人单一化，而这从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与其说这是工厂生产方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工业资本主义弥散的结果。工业资本主义的弥散性通过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通过工厂、家庭作坊和社区表现出来。

这种阶级结构仅是部分情况，它几乎不可能单独导致任何阶级行动。但是它受到英国三种国家形式的推动——旧政权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联邦主义(在表3.3中所指定的意义)——现在由于中央集权趋势的影响而开始超越极限。在这一时期，政权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添加到中央国家的法典中，排除了行会和熟练工人的“行业限制”。在1799年至1813年之间，最低工资标准、限制学徒进入同行业的规定以及固定价格都被废除，而1779年和1800年的《结社法》禁止成立工会。手工业者在抵抗市场的力量中丧失了法律保护。他们简直是义愤填膺，但最初毫无政治目的，他们试图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地进行局部性反抗。但是正如众多缺乏技能的工人一样，多数行业面临同样的威

胁。因此，行业工会放弃了经济上讨价还价的保护主义。于是引发了一系列局部的罢工和资本家的停工：伦敦鞋业工人在1818年和1824年举行罢工，1824年和1828年发生了兰开斯特棉纺织工人的罢工，1824年造船木工罢工，1825年布雷福德羊毛精梳工人罢工，1826年动力织布机和手织机的织布工人罢工，1828年基德明斯特地毯编织工人罢工，1834年伦敦裁缝工人罢工。所有的罢工都失败了。其后果是工资削减得更多，血汗劳动加重，更多的妇女儿童在工厂和“家庭仆役工作”中就业，对劳动技能的要求更低，劳动力市场也更加密集。工业行为对工人的阶级认同有所强化，但仍是一无所获。

因此工人被迫转向民族国家，首先是传统的示威游行和议会请愿。组织较好的上层行业如：丝织工人、制鞋业工人、钟表业工人、制靴工人、家具木工、木工、裁缝、马具工人和印刷工人等起了带头作用。在工人中，这些人拥有话语能力的发展基础，他们支配着技工学校和欧文派的“科学之城”(1850年在700所技工学校中就有500间阅览室)，同时也控制着互济会、宗教组织以及杂志和报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向外延伸到了其他同样受资本主义攻势影响的团体，尤其是那些类似织布工一样在家做外包活的工人。工人的需求现在趋向于互助论。他们开始要求中央政府承认工会的集体权利，管理学徒年限，确立“公平”的价格和工资，并且补偿工人被机器取代的损失。在议会中的两个极端，激进派和上层托利党人都对工人给予同情，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作用。1824年，《结社法》终于被废除，但是紧接而来的罢工浪潮又促使1825年制定了新的《结社法》，它仍以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限制了工人权利，仅给予工人集体组织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认为是与表达个人的自我利益密切相关，而在道义上认为这具有合理性。工人只有参加那些在事实上仅严格限于要求增加工资、降低价格和工作时间的集会，才拥有合法的结社权。其他所有更广泛意义上的结社则是阴谋非法限制行业的违法活动。这就意味着，除了大部分仍控制生产的工业行会之外，所有普通的全国性工会都遭到排斥。尽管法院承

认，地方性集会不能被有效起诉，但可以并实际对罢工进行起诉。对工会的镇压并不少于《结社法》存在的时代，劳工和手工业者之间更具一致性，早期的劳动者有能力避开《结社法》。旧政权认为对工人困境的怜悯不应阻止进步，而政治经济学家相信实际上自由贸易法是道德的。议会拒绝作出立法，这阻止了互助论的实施。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每当中央集权政府相当一致地镇压持保护主义和互助论观点的工人时，工人的煽动就会扩大到阶级和全国的层次。有段时间，改良主义在工人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国家不能保护他们，那么国家就应实行改革。第四章指出，选举权的要求在一些民众的传统思想中产生共鸣，E·P·汤普森(1968，p.213)观察到，工人阶级不是产生于“某些即难以归类又毫无差别的人类原始材料”。历史赋予的其他社会身份——宗教、平民政治和“英国人生而自由的权利”的民族概念，以及新教徒的精神平等(正如我们后来在法国和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中所见的)——孕育了工人的反抗，尽管并非总是具有阶级意识。在传统激进的自然权利思想中，从洛克到潘恩，选举权的要求得到了社会权利的支持——生存权，为了公共利益土地应公有，限制财产。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注意到的，市民社会的出现、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地缘政治的竞争都推动了民粹主义向下层社会弥散，这一思想更具大众化，更激进，也更具有全国性中央集权的特性。

但这也是得到了国家军事形式的巨大支持。正如第十一章所指出的，18 世纪的战争要求大规模地强征人力和财力。由于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海军和陆军，陆军主要从国外和爱尔兰征募，因此英国更需要资金而不是新兵。它主要根据资本主义的旧政权形式所确立的优先权来筹集资金。英国从富人那里借款并偿还他们，它提高税收，主要是对日用消费品——啤酒、烟草、盐、糖、茶、煤炭和住房等征税。1800 年到 1834 年(直到债务偿还负担减轻)，英国的债务负担始终十分繁重，但税率却在递减，在有储蓄者和无储蓄者之间进行再分配。这也扩大了经济的影响。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率每年上升 3%，而同时工人的实际工

资却下降了。和平年代，失业现象仍大量存在，国家的主要民政活动依然是救济贫困。大约有一百万人申请救济，并遭受地方统治阶级的羞辱性统治管理，许多家庭被济贫院拆散。同经济一样，政治也不仅仅剥削男性工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庭。中央政府充分了解自己要优先考虑的事情。1820年到1825年之间，贫困救济的花费占中央政府支出的6%，而对债券持有者的现金转让则占了53%(O'Brien, 1989)。在如此严重影响他们生活并明显带有阶级不平等的财政剥削下，工人家庭为什么未被政治化？鼓动性宣传将选举权的改革与国家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连接起来。以手工业者的话语能力基础，政府因对人民不公平而受谴责——从大众的意义上说。

因此，三种鼓动性宣传密切结合在一起：由手工业工人和外包活工人为先锋反抗工业资本家的剥削；将这些不满转化为针对中央政府政治经济的互助论和民主政治；民粹派反对旧政权的资本主义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对人民的剥削。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许多工人开始激进化，他们的阶级认同感增强。1800年以后，他们日常使用的术语是“工人阶级”，并且“工人阶级们”成为更加常用的措辞(Briggs, 1960)。他们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们劳动，而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们却收获我们的劳动成果。1834年，欧文主办的报纸《危机周报》统计了两个阶级的人数：“劳动大众”，包括“所有财富的生产者”和“各生产阶级”共有8 892 731人，而“非生产者”有8 210 072人。它控诉道，每年当生产者得到1亿英镑的财富时，非生产者们就会得到3.33亿英镑(Hollis, 1973, pp.6—8)。代表手工业工人的记者宣称：“我们”—“他们”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依靠共同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建立在彼此互相保护的道德准则的基础之上。它赋予我们一种超越对手那自私自利思想的道德优势(E.P.Thampson, 1968, pp.456—469)。

我们是否清楚了解对自己的阶级敌人？在1832年之前并不具备这种意识，因为那时的政治敌人与经济敌人不同。实际上，政治上的同

盟经常在经济方面是敌人。小资产阶级，包括小企业家们也是消费者，而不是储蓄者。他们也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改革斗争与其说具有阶级性，不如说是民粹的。作为民主派的民粹派受到辱骂，如雅各宾派或平等派，它们不具有阶级的特征。激进派的目标与其说是针对工业资产阶级，不如说是指向那些“旧政权中腐败”的官吏，他们以租金和垄断国家特许权为生，并领取年金。富有活力的资本家使激进派感到迷惑。《危机周报》区分了第三类中间“阶级”，其构成包括“销售商、主管人和制造商”，他们(相当软弱地抱怨)是“必要的，但人数太多”。部分手工业工人的报纸将企业家确定为阶级敌人：“雇工和工人的利益完全对立，它如同黑夜与白昼一样”；或者“资本家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什么也不创造；他们由工人阶级来喂养，是工人阶级提供给他们服饰和住宅”(Hollis，1973，pp.45，50)。但是，工人也要面对议会、地方行政长官、地方牧师、政治经济学家、密探和汉奸、正规军队和地方自耕农组成的民兵。通常与工人的雇主相比，“旧政权的腐败”、“教会和国王”或者“政治经济学”似乎是更强大、更具暴力性的敌人。对他们的攻击也同样能从上述的阶层中得到支持，有时这些阶层与“勤劳阶级”建立部门性联盟，共同反对“旧政权的腐败”；有时他们又与旧秩序的家长式统治因素结成联盟，以反对政治经济学(这在后来出现的更多)；他们偶尔还会与新教徒或持不同政见的人民党联合。

这些弥散的部门性联系通常也具地方性，它诋毁了任何纯粹的阶级意识(Prothero，1979，p. 336；Stedman-Jones，1983；Joyce，1991)。在1832年前，工人的敌对者实际上并不是单一的阶级。尽管“它”大部分是团结一致反对劳工的，但是在公民权方面，对于它应该代表哪一个阶级，新教国家应该如何建立的问题上，都存在着很深的意见分歧(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这就削弱了地方对工人的部门性控制，他们的政治不满得到了激进企业家的支持，1830年，工人甚至还得到了辉格派的支持。

这些政治阵线从根基上削弱了一个可供选择的阶级概念。最流行的激进主义经济选择方案是罗伯特·欧文的理论。他那保护主义的生产合作社的主张强烈地吸引着手工工人和外包活工人。他们迫切渴望市场能安全公平。互助论的潮流也紧随其后。在19世纪20年代，约翰·格雷、汤姆斯·霍奇金和威廉·汤普森以《穷人卫士》和《先锋报》为阵地，攻击资本家是寄生的中间人，干涉了手工业工人与市场的合理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国家应予以保护的。诺埃尔·汤普森(1988)称他们是“工匠社会主义者”。极少有人倡议改革生产关系，而不是市场关系，正如现代社会主义者们所做的。就这一时期手工业工人的不满来说，这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但是，经济观点被淹没在争取选举权的政治斗争中。尽管许多工人对于他们同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改革法》的措辞时)，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如果没有这一联盟，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所渴望的互助立法。一个正在兴起的阶级正通过截然不同的劳动过程与工人家庭联合，但是政治使他们对敌人和其替代者感到迷惑。

E·P·汤普森有一句名言，称这一时期为“英国工人阶级创造的时代”，正是这一观点使他遭到大量的批评。柯里和哈特韦尔(1965)称他的这一说法是“一个神话，一个绝对想象和理论预想的构思”。他们注意到，正如其他人对英格兰(Prothero, 1979, p.337)和法国(Sewell, 1974, p.106)所作的研究一样，19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通常仅限于手工业工人；汤普森错误地假设了手工业工人与其他工人的联合，并且在地方显要的部门性控制下，“既冷漠又沉默的大众”没有受到猛烈反抗的影响(Currie and Hartwell, 1965, p.639; Church and Chapman, 1967, p.165; Morris, 1979讨论了有关概念的问题)。如果说1830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这在事实上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然而为了产生某些影响，它仅仅需要大众的政治斗争来部署与经济斗争相同的敌人——这在1832年后发生了。

宪章派的无产阶级起义，1832—1850年

工人阶级的斗士们看到他们对已获批准的《大改革法》的担忧。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多数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旧政权结合成单一的资产阶级，同时国家定型为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并且更加中央集权化。尽管已获选举权的中产阶级仍保留了某些多样性并且难以驾驭，但是《大改革法》消除了他们对那些地位更低的人们的政治兴趣。一些激进议员敦促采取更进一步的选举权改革，但是到1837年多数资产阶级选区的投票将他们排除出议会。议会认为选举权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激进"包含着两种不同含义：对于手工业者集团，如伦敦工人协会，和部分中产阶级活动家，它仍意味着选举权的扩大和国家对生活标准的保障。但是对于其他人，它仅意味着自由放任的不干涉主义。

1834年新的《济贫法》代表着新的政体，它扩大了对工人家庭的严酷控制，同时却减少了知名人士发放特定救济金的权力。在工人的抗议集会上，新《济贫法》被痛斥为"解除了婚姻关系——所有家庭感情的毁灭，甚至是在世界所有国家的穷人中实施暴力和最野蛮的压迫。"(引自D.Thompson，1984，p.35)。内皮尔将军是镇压宪章运动的北方部队司令，在解释造反行为时，他强调了《济贫法》的作用：工人阶级已"被剥夺代表权"，他们的财产"几乎被国家为还债而收取的间接税所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由于新的《济贫法》，他们所剩无几的财产也已"有名无实"(Napier，1857，Ⅱ，pp.1，9)。但是市政管理改革和新的警察当局也在巩固新政权的地方权力，以使它更具地方统治阶级的代表性。《新闻法》削减了新闻界的特权。《爱尔兰强制法》表明了镇压的趋向。所有普通工会却被视为"阴谋集团"而遭镇压。著名的全国统一工会成立于1834年，据推测拥有会员50万人。

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新政权激起了全国工人阶级的认同感、

反抗性甚至整体性。新政权的经济攻势减弱了狭隘的行业地方主义的力量，刺激了家庭的道德暴力。新政权的政治攻势，尤其是《济贫法》，直接伤害了大多数最贫困的人。但是对手工工人的激进分子来说，更主要的威胁来自对工会组织权利的骚扰。他们都期望获得选举权，并且现在由于选举权具有阶级性，所以他们不得不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地方主义和部门性控制权都削弱了；工人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了。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宪章运动——正如本卷所讨论的任何一次运动那样，它的含义是以“阶级为基础”，是“大众的”和“彻底革命的”。

宪章运动的形式主要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成年男子的民主权，同时这一运动还拥有自己文件，即《人民宪章》。[2]《人民宪章》提出的六点要求包括：普遍的成年男子选举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无记名秘密投票，议员不应有财产限制，平等分配议会选区以及对议员支付薪金。许多宪章主义者支持妇女选举权，但是其领导人声称，如果现在对这一点提出要求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但是宪章主义者并未将投票作为最终目标。正如我在整卷中所强调的，政治的公民权不是其渴望追求的内在本质目标。大多数人更愿意避开与政府的冲突。但当政府开始剥削他们并在政治上如此排斥他们时，他们便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宪章主义者希望投票权能使自己从新社会和经济剥削中获得自由。他们迫切要求更低的累进税制，《济贫法》的改革，削减地方政府和警察的权力，“十小时工作制”法和反对“工资奴隶”的互助论保护，包括工会组织权。“‘宪章’和更多的东西”是他们最流行的口号。面对监狱审判者，一名被捕的宪章主义者辩护说：

> 严重的贫困是我们不满的原因——如果他们能得到应得的工资，我们将不会去关注选举权。只要雇主们愿意为工人做点事，使他们得到起码的生活享受，我们将是地球上最满意的。[D.Thompson，1984，p.211]

已有选举权的阶级不可能给予宪章主义者更多的支持，因为他们反对大部分的社会经济目标。在早期的领导层中，中产阶级的激进改革派给予了帮助，而后来，他们无法再次起作用，于是开始寻求温和的运动方式。在众议院中，约有10到46名的议员也支持先前宪章派的动议，尽管对此仅有少数人持支持态度。宪章运动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工人运动。

这一运动吸收了各种身份的工人群众。一些斗士、成员和被捕后幸存下来的示威者的名单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职业(细节见D.Thompson，1984)。没有一个人是典型范例，但是他们又都有一致性。在他们中间仅有少数人失去了社会地位，有一部分人是职业工作者，如校长、牧师、临时医生和律师，但更多的是店主。而工人的数量最多。唯一大量未被充分体现的工人是农业工人和家庭仆佣，这些人被雇主压制在部门的控制下。在英国几乎没有独立的自耕农；第十九章指出，在其他国家自耕农可能具有组织能力并采取激进主义。事实上，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工人占大多数。贫困的外包活工人过多地用来作为代表——织布工人、框架编织工、羊毛梳刷工和制钉工。在较早的手工业中，人员最密集的行业也是如此，如制鞋业、裁缝和部分建筑业。矿工和纺织工人是“现代”职业的突出代表。虽然固定的工作日程意味着他们中很少有人担任组织者，但是他们常常遭到逮捕。矿工获得了特殊的暴力声誉，而裁缝工、金属制造工人和毛纺织工人则过多地作为和平抗议的代表。

几乎所有手工工人都参加了宪章运动，正如他们的工会所做的。仅有少数几个稳定的上层行业被证实进行了反抗。在伦敦，几乎所有工会都在宪章运动的组织中结成同盟——包括受到威胁的行业工人，如制鞋工，木工和裁缝以及受威胁较少的行业“贵族”，如砌石工、制帽工、皮革精整工、雕刻工、镀金工人及技师(Goodmay，1982)。在英国东南部的兰开夏郡，只有最稳定的工会——印刷工人、装订工人和马车制造工人的工会——没有加入宪章运动。几乎所有其他工会如：棉纺

织工人、棉布印花工人和染色工、裁缝、制鞋工人、建筑工人和技师等等的工会都结成了联盟(Sykes，1982)。诺丁汉郡的大部分行业都加入了运动，尽管受威胁的框架编织工和制鞋工人被过分代表(Epstein，1982，pp.230—232)。多萝西·汤普森总结道，在每个行业中，“从有技能的上流社会人士到售廉价成衣商人的各个分支都能在宪章派中找到，他们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1984，233)。由于运动的平民性(很快将讨论这一点)，使地方主要行业起领导作用。工人职业的多样性没有阻止阶级的行动。

仅有职业分类无法表明这一阶级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因为它是以社区和家族为基础的——正如早期制造业资本主义以及大多数早期激进工人运动一样(Calhoun，1982，所强调的)。许多工业区是由工人阶级居住区环绕组成的城市或城镇中心。这就提供了比上述的部门控制更自由的组织空间，如同内皮尔所警觉地注意到的。在这些区的旗帜下，进军的有利条件推动了大量的示威游行。在工人居住区，运动主要集中于书面和语言沟通的公共集会地点——教堂、阅览室、学校、酒馆和报刊经销店。组织机构是集中于社区而不是职业。

因此，宪章运动中有许多支持宪章主义的妇女和妇女社团。政府当局通常不会逮捕(并且文献也是如此记载的)妇女；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反对鼓动女性。后来的回忆录贬低了她们的作用。但是，与此后直到20世纪中期的任何一次运动相比，在这次运动中，即第一次工人阶级运动，可能有更多的女性运作者。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来，工人家庭的破坏、童工和女工、《济贫法》以及递减税率制对工人家庭的剥削都主要是针对男性雇工。男性斗士们甚至更清楚这一点。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标语(引自Bennet，1982，p.96)写道：

为了妻儿，
我们拼死战斗。
上帝，请帮助我们吧！

妇女也提出两项次要的宪章主义要求：更严格的教育管理、更严厉的禁酒。多萝西·汤普森(这一段主要来自他的观点)认为，随着《济贫法》的不断人道化和工厂条件的趋于稳定，19世纪40年代女性运作者逐渐减少(1984，ch.7)。后来我论证认为，《工厂法》使宪章运动男性化。宪章运动不提倡性别平等。它的领导和运动纲领，尤其是《人民宪章》本身，反映了那个时代男性的支配地位。但是当时是对整个家庭的剥削，在受剥削的关系中，男子和妇女并不存在明确的区别，而且男子和妇女共同分享剥削补偿的一部分。早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并不象后来的运动那样，男子占主导地位——并且如此强大。

宪章主义者肯定能动员起来。《人民宪章》先后三次被提交到议会，并且是以庞大的请愿书作为后盾。签名是运动的最低程度。1839年仅有不足13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1842年达到300万人，1847年到848年间则有200万至500万人签名(对这一数字存在两种争论)。大批群众参加了运动，但是从事农业和家庭服务业的工人却几乎没有参加签名活动。由于制造业的成年人少于500万，因此多数人至少在一次请愿书上签过名(在运动中，中产阶级的签名者为数不多)。在19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没能与宪章运动相媲美的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

激进派的人数虽少但令人敬畏。1842年，全国宪章协会(NCA)在400个地方分会中共有5万名成员。到19世纪40年代晚期，宪章派土地公司已拥有大约7万名成员。宪章派的主要报纸《北极星》，在发行最多的年份拥有6万名读者。在被杀害的激进分子的公开葬礼上，汇集了5万人。激进派立即在几个城市发动了数次人数在4 000到7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具体人数并不确定，时间也存有争议)。1842年全国宪章协会的干事在伯明翰附近参加了大型集会，“普遍的呼声是我们必须拥有《人民宪章》——太棒了，噢，太棒了，千人之中无人使用(会员)证”(Epstein，1982，p.229)。宪章运动共有三次鼓动高潮：1839年到1840年，1842年和1848年。我们不知道卷入运动的具体人数，但是双方都有人想一次总罢工以作为预防措施防止1839年事件的重演，

可是领导人却在最后时刻退缩了；1842年的罢工是19世纪英国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罢工。

从中心指导的意义上来说，宪章运动从未出现过权威性的统一组织。因此它的思想和抉择观念(除了《人民宪章》)所包含的内容形形色色，动摇不定，而且很少被明确阐述。但是运动仍是积极的，具有相当的阶级意识，并且敌视资本家。费格斯 · 奥康纳尽管承认自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但仍怒斥资本家雇主，他认为他们是“吸食人类血液、吞噬婴儿骨头的奸商”。他的一个听众转述道：“他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富有的压迫者和贫穷的受压迫者。在劳资斗争中，全部问题将自行解决”(D.Thompson, 1984, p.251)。布朗特尔 · 奥布赖恩谴责“资本主义战争”。正如《北极星》报所述，激进派现在很少责骂“旧政权的腐败”，更多的是斥责“阶级立法”和“工业政体”、“商业政体”，“以及任何其他以牺牲人类生命为基础的政体”(Stedman-Jones, 1982, p.14)。

全国领导人惟恐在公众或委员会中出现煽动情绪(因为担心警方密探)，但是激进派的行动和轻率言辞往往过激。1842年的罢工被普遍认为是试图迫使所有工人参加罢工。正如一封被截取的信件所述：

> 现在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刻。我们希望付给相当1840年水平的工资，如果他们不肯，革命就是后果，我们已让所有行业——裁缝业、皮匠业、制刷业、扫烟囱的工人、修补匠、驾货车的司机、泥瓦匠、建筑工人、煤矿工人以及其他所有行业，全部停工。

一名激进分子在曼彻斯特的集会上讲道：

> 罢工的蔓延将势必带来普遍的暴动。政府当局必将进行镇压；但是我们必须反抗。现在除了寻求确确实实的力量斗争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让人们走出来，进行战斗；如果团结一

致，他们就不可战胜。(D.Thompson，1984，pp.287，297)

宪章主义者经常得到现代作者的支持，因为从任何马克思主义和生产力主义者的意义上讲，几乎没有人是社会主义者(例如 Hobsbawm，1962，pp.252，255；Musson，1976；Stedman-Jones，1983)。但是这具有党派性的目的论观点，明显地来自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工党的理想幻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灾难性未来观点，作为目的论，它甚至没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受剥削的大部分直接原因来自中央政府，所以政府正是攻击的主要目标。当时(正如现在)选举权的确重要，而它的实现可以为激进派所期望的一切创造良好的机会——即一个更人道的《济贫法》，工会的互助主义组织权和更多的累进税制。

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宪章运动将明确的政治目的和互助主义的经济目标结合起来，这似乎符合资本家对工人家庭的剥削。正如多萝西·汤普森(1984，p.337)在其杰出的研究中所作的推断，宪章运动似乎有一个合理且更广泛的纲领——减缓迅速发展的中央集权化(除了国家的土地和交通运输所有权)，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调查经济单位的规模以及避免新的帝国主义。对此我们还应加上对儿童更加仁慈，这包括更多的教育和禁酒。她确信，宪章运动的纲领减缓了经济的增长。然而，通过使政治集中来解决工业问题，它就有可能纠正了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商业偏见(第四章中已作描述)。

部分宪章主义者已经准备更进一步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以达到他们的目标。“物质力量派”组织了武装俱乐部，拥有几千支长枪和上百支滑膛枪；他们反复按军事编队进行操练，举行火炬游行威胁地方当局。其中的部分人组织领导了1839年爆发的大起义，这次起义始于新港、纽卡斯尔和西约克郡。全国领导人几乎都反对这次起义，尽管有些人支持有组织的操练和武装这些较温和的做法。在计划中，很明显有些事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一旦纽波特的起义失败而无法蔓延开来，许多阴谋家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逃开了。在纽波特的起义中，大

约5 000名工人手拿长矛，试图在2万多名增援士兵从附近的山上赶到之前，卤莽地将狱中囚禁的宪章派领导人解救出来。1840年发生了重大暴动，同时在贝里、伯明翰和东北的煤矿产区发生了激战，出现了许多抢砸食品店和工厂的骚动，他们焚烧牧师的住宅和警察局，向军队投掷石块。1842年，宪章派民众控制了诺丁汉郡达四天之久，随后军队将他们驱散并逮捕了其中的400人。他们也控制了波特里斯两天，结果导致9人被流放，116人被监禁；在哈利法克斯，一群下层民众在被驱散之前严重打伤了8名重骑兵。1848年，制定了一份在兰开夏郡、西约克郡和伦敦起义的计划。在格拉斯哥，军队向一群反对《济贫法》的下层民众开枪，造成6人死亡。在布拉德福德，一群武装起来的下层民众击退了警察和临时警察，只有配着刺刀和枪的重骑兵才能驱散他们。

宪章主义者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少，或者具有地方性，或者缺乏凝聚力以及太胆小，而是因为他们的全国性组织太软弱，没有彻底革命的计划。这正是1917年以前所有“革命”运动的真实状况。只有当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混乱逐步升级到他们认为有可能推翻政府时，才开始成为革命者。事实上，在宪章派内部存在一个严重的弱点。他们发现很难筹措组织资金，这对于一个针对国家的运动来说是严重缺陷(这在1848年的大失败中是显而易见的)。在1801年到1851年间，当伦敦人口从100万上升到270万时，在资金上采取集体动员的可能性减少了。工厂和居住区的空间与整个城市政治层次的组织空间存在这巨大的鸿沟(Goodmay, 1982)。因为宪章运动是以地方社团为基础，所以它主要是在中心城市进行斗争。但是也有例外，如果革命不能发生，主要原因并不是由宪章运动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他们的煽动与来自法国1789年或1848年的阶级(尽管不是全国性的)运动中下层社会的任何鼓动一样有力。特别是，宪章派所拥有的一切(并且是与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者所共同具有的)是他们那热切的家庭和社团组织在道义和感情上所提供的热诚。

然而，工人的对立面所缺乏的是弱点和分裂，尽管多数史学家集中注意的是上层阶级而不是下层民众。与1789年、1848年或者20世纪早期的俄国不同，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分裂。在第五章中，我们注意到一些政权分裂的基本状况——在法院、法国议会与国民议会之间、教堂以及军队中——既促进了真正革命性危机的发展，又有利于起义领导权的左倾和阶级倾向。但是英国议会甚至没有讨论过《人民宪章》。正如马歇尔所提出的，现在不存在一个从个人公民权向广泛政治权利的演化。而前者是坚决抵制后者的。

没有一个拥有全国性或地方性权力的人对宪章运动抱有足够的同情，提倡对《人民宪章》的任何一个观点作出让步。温和的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改革家结成联盟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果。在面临威胁时，中产阶级就会保护财产和秩序，数千人加入临时警察的行列。正如约翰·萨维尔在对政府反应的详细研究中作出的结论，“在政府中，有财产利害关系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紧密相联，无论这一利害关系是多么少”(1987， 227；参照 Weisser， 1983)。随后，在1848年的最后一次群众示威游行失败之后，宪章运动迅速衰落，一个内阁部长的妻子给另一个部长的妻子写道：“我十分幸运地确信整个事件的发生都显示了我们中产阶级的良好风气”(Briggs， 1959a， p.312)。

因此宪章运动在最后阶段唤起了资产阶级更持久的阶级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就是一个正面阶级斗争所产生的事例。如往常一样，斗争不是产生一个辩证的革命综合体，而是统治阶级取得胜利。

资产阶级的团结使之有能力始终如一地、审慎地采取镇压手段——一个温和有序的军国主义国家形式。宪章运动没能遇上经常称颂的英国妥协和实用主义思潮。自从1832年以来英国就很少展示类似的特性，取而代之的是镇压的手段。内阁对这些政策争执是冷静的，不存在宗派之间的政策倒退，也没有导致过强的反应和严重的野蛮行为。军队通常只是为了将伤亡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才行动。仅在发生暴乱的

情况下，在适当的诉讼之后能予严刑——尽管与惩罚相比，冒犯者的暴乱经常相形见绌(惩罚包括死刑、流放和长期监禁)。那些仅仅进行鼓动和组织的人被指控为“煽动叛乱”、“鼓励动乱”或者“阴谋集团”，通过适当的诉讼程序，仅判一年左右的监禁。1848年在20个推选出的宪章派委员中，有14人很快被捕，并被监禁达一年之久(Saville, 1987, p.162)。

理解英国法律的重要性及其相当中央集权的作用，这一点十分关键。正如萨维尔所论证的，司法的警察机构实现了中央集权化，牢固地从属于政党民主的议会，而议会是拥有最高权力的法律制定者。不像大多数欧洲大陆的政权，在国家中军事、警察和司法几乎没有独立自主的形式。正如我们在以后讨论美国时所关注到的，法律和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们不会与更重实效、更君主化的成见共同分享国家。这一成见认为，在对骚乱的控制下，将操纵法律来维持秩序或达到更高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的英国以及整个19世纪的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宪法，但是它们同样拥有一个(有限的)政党民主和代表资产阶级财产法则的最高法律。他们都以政权的一贯性和统治阶级那无可比拟的伪善，将劳动者的煽动视为“阴谋”进行镇压。正如我们将在以后几章中所注意到的，英国后来丧失了部分思想上的伪善性(而美国却未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是在19世纪中期，这种伪善思想仍很强大。它具体体现在托利党的内皮尔将军身上，他同情宪章派，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辉格党，但仍主张不惜代价来维护宪法。

内皮尔的军队已实现职业化，在世界上包括在爱尔兰和英帝国镇压平民骚乱的众多经历中几乎从未有过战败的记录。内皮尔确信其士兵的纪律性。他的策略也十分明显：集结军队。因此，小股分遣队不会因孤立地留在驻屯地而被制服——他认为类似的小灾难将会立即被宪章派宣传为“巴士底狱”的象征，从而进一步鼓动起义。如有可能，让骑兵用他们的军刀刀背来驱散手持镐头的矿工们，如果矿工不退让，就让步兵用滑膛枪和刺刀来驱散他们。使用大号的铅弹以减少伤亡。

“击溃才是主要的，而不是要屠杀生命”(Napier，1857，Ⅱ，p.4)。警察、民兵或部队愿意服从命令，事实上，地方行政官、各级官员和士兵也不感到恐慌。起义的成功——可能所有起义和革命的成功——依赖于恐慌的发生。在纽波特的起义中，当30多名士兵被5 000多挥舞着镐头的示威者包围时，他们甚至也没有恐慌。士兵们开了枪，当第二次射击的烟雾消散时(这次不是使用大号铅弹)，人群四散而逃，至少留下22具尸体。

击退宪章派主要骚乱的是指挥聪明、充满信心、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是具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民兵，是新组织起的地方政府机构和新的制度化的警察机构——所有这些都正确履行了国家法律。演讲、乌合之众和长矛(内皮尔认为它设计得太短)如何能够反抗如此高效的中央集权化的武装调动呢？没有巴士底狱被袭取，也就没有任何革命发生。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与其说革命是头脑清醒的果断起义的产物，不如说是政府优柔寡断的结果。因为英国统治政权是坚定的，所以就不会发生革命。

当1839年的一系列事件使这一点变得清晰明朗时，宪章派的反应出现了分裂。可以听到关于道义派与物质力量派之间的争论。[3]大多数领导人知道议会将拒绝第一次请愿的道义力量。对于最难作出的决议，他们仅是拖延：真的要采取下一步可想而知的措施，还是施加起义的压力？可能大部分的物质力量派领导人都将起义视作为一种压力而不是真正夺取国家权力。法国在1789年到1791年的上半年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现在宪章派领导人也尝到了物质力量派所带来的苦果。如果国家政权如此团结，对压力的反应如此迟钝，那么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多数人对物质力量派的抵制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正如韦德说过的：“如果没有先行的道义观和中产阶级与你联合，武器的呼啸将仅仅带来痛苦、流血和废墟”(Jones，1975，p.151)。奥康纳再三论证说，不管多么人多势众，人群总是被受过训练的军队打垮。因此，主

要的分歧是在策略上，而不是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上。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宗派基础：较稳定的上层行业与人数较多的下层行业之间，而下层行业支持物质力量派(Bennet，1982，pp.106—110)。进一步地分裂导致了衰落的开始，经过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骚动最终结束了。但是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拓宽视野。

对宪章运动衰落作出解释的传统做法是，不仅根据有效的镇压和随后的策略分歧，而且还依据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平民生活状况发生的两次普遍改善。第一，人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复苏，直到19世纪70年代经济才再次出现下滑，这结束了工人的绝望时代。第二，政府对严厉的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从而削弱了激进派领导人极力主张政治解决问题的基础。

这些讨论确实有些道理，但是仍需要扩充。宏观的经济趋势与社会运动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可能简单地因为经济的发展或衰退就导致起义。在这些方面，最好的解释是戴维斯(1970)提出的著名的"J"曲线，它的依据是革命发生在紧随经济高涨而来的短期骤降趋势之时。当民众的期望上升以后却突然受挫。这样的"J"曲线通常发生在革命前，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根据这一理论，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达到高潮，随后70年代经济出现了急剧倒退，这时应该再次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但是起义并未如期而至。起义应是有组织的(正如资源动员理论所论证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具体的解释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组织起义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我随后将给出答案。

是否是因为政府缓和了社会政策，从而逐渐侵蚀了宪章运动(正如Stedman Jones，1982，pp.50—52提出的)？19世纪40年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即消费税负担的减轻(第十一章对此已作出证明)。这一结果不是由于政府观念的转变，而是因为(正如第十一章所指出的)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债务循环结束了，而且没有再次发生其他战争。因为自从18世纪60年代，倒退的战争财政使多数阶级政治化，但是它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工人家庭的政治化。正如第十一章所认为的，现在捐

税的减轻正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发生。在征税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时代，宪章运动，至少是它的早期阶段，是最后的运动之一。19世纪晚期，阶级政治化的新形式出现了，但是在19世纪中期有一个短暂的停滞时期。工人的骚动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主要是限于直接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这使工人运动趋于缓和并非政治化。

有时需要指出较稳定的政权还具有另外两个标志：对《济贫法》的实施更为宽松(D.Thompson，1984，p.336)，在“勤劳阶级”之间(尤其在持不同政见者之间)进行协作，这种协作使工人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旧政权。从而保证了1846年废除《济贫法》，并鼓动禁酒和教育改革。然而，19世纪40年代反对《济贫法》的暴动仍然发生了，宪章运动的激进派几乎没人被协作运动所诱惑，而这并没有在宪章运动的衰落中产生积极的影响。阶级间更广泛的合作仍在《工厂法》运动中产生，但是它——以及经济和税务高涨——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在于改善不如说是加强了地方主义，正是地方主义最终战胜了宪章运动并使之解体。现在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复杂的过程。

《工厂法》运动主要反对对三种不同身份的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的剥削。对这三种工人实施“公平的工资”和“合理的工作时间”的主张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激进派支持，但是许多人还是希望控制或结束工厂对女工的雇用，而且更多的人——甚至包括工厂主和他们的妻子，大多是福音会新教徒和积极主张禁酒的人——攻击雇用童工。主要有两个极端派别即激进派的左翼和托利党的上层支持这些观点。有时这两个派别联合起来，正如来自利兹市的议员迈克尔·萨德勒提出了《十小时工作法》，就得到了宪章派的支持，在议会的选举中他也以此来反对自由党的对手。罗奇代尔棉纺厂的厂主约翰·布赖特虽然属于激进派，但也支持自由放任的观点，他反对《工厂法》，认为这是“限制贸易”并“侵犯了自由权利”。在议会中，来自各郡贵族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上层怒斥工厂主的不道德行为。这种家长式的政治形式所提供的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政权的不团结。这使工人能够从中获

利。工人的利益获得是通过政权的分裂斗争，而不是通过辩证的正面对抗或体制的妥协。

议会始终为儿童制定立法。老皮尔的1802年法案是《学徒健康和道德法》，这暗示了它在道义上的家长式风格。皮尔是托利党人，在当时可能是议院中唯一拥有学徒的雇主。他呼吁对儿童要采取道义上的家长式统治，而无须克服受保护的议会利益集团的敌意。随后，托利党制定了1819年法案，禁止在棉纺厂中雇用9岁以下的童工。到1832年，议会完全是工厂主利益的代表，战线更加牢固。但是《工厂法》运动公布了童工在矿山和纺织厂工作中的惊人苦境，它通过斥责对女工的血汗雇用来呼吁施行父权制。妇女作为家庭道德的承传者，被大多数宪章派和保守派人士认为是社会道德结构的根本。他们认为未婚妇女应从事那些将来有益于为人母的工作，如家庭服务或零售业。已婚妇女则应呆在家中。

在宪章运动期间，为了确保这些道义上的家长式目标，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辉格党制定的1833年法案和1836年法案，建立了控制工厂和童工工作时间的工厂委员会。1846年超党派的《矿工法》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和妇女下矿，并建立了监察员来执行禁令。1844年托利党制定的《工厂法》主要是针对纺织业。它规定13岁以下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6.5小时，妇女每天工作时间最长为12小时；它也保护机器和扩大监察员的管辖区。超党派的1847年法案将纺织厂女工的工作时间减少到10小时。1850年法案和1853年法案规定了女工的日工作时间。尽管这些是补充实施的法案，但是它们也认可了在儿童不工作时，对他们进行教育的责任。由于得到主教们的支持，所有法案都在上议院通过。1860年到1867年间，议会将立法扩大所有产业。但是直到1874年，立法才扩大到男工。

这一立法依次揭示了童工、女工和男工之间的局部差别，这是以道义主要是家长管辖为借口的。童工首先被控制并排除。这很少引起争议。据记载，工人阶级的男工和女工也意见一致：儿童不应成为工资

奴隶。因为这从体力和道义上都是对他们的贬黜，同时打破了家庭和父母的权威，并通过竞争降低了童工的工资。由于前两个观点得到议会的极力赞同，第三个观点，即“限制行业”也捎带通过。消除了劳力“拥挤”的最大原因，工人工资就可能提高到足以让孩子们呆在家中的程度。然而道义的争辩同样也限制了女性就业，尽管限制的程度较低。工人的观点再次相当一致。因为所有人都想减少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能确保妇女得到这些仍是一种收获。对行业和劳力拥挤的限制再次顺便通过；工资有可能再次提高。

但是这些进展也产生了一些意外的后果。对一个群体的工作时间作出限制，也会影响到其他群体。因为男工和女工是一起工作的，不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妨碍了工作效率(尤其是1850年和1853年法案制定以后)。这次运动认识到了这点，它希望能同样缩短男工的工作时间。有时工作时间会缩短。但是由于考虑到雇用童工的花费会较高(尤其是如果提供教育的话)，童工和女工对雇主的吸引力减少了。在工厂的就业中童工被排斥，同时女工的正式就业机会减少。男工欢迎这一点，他们确信收入将会提高到“家庭工资”的水平。妇女的反应不同，尤其是成年未婚女子和寡妇，现在她们的经济自主权被削弱了。“现代人”包围的就业场所——工厂、矿山和铁路工场——开始变得井井有条且男性占绝对多数。棉纺织厂仍十分混杂，但是现在男工和女工之间有了稳定的等级区分(不包括童工)。

这里不仅仅叙述了工人立法的进展，而且也叙述了资本家与思想道德和家长制政治形式的联合体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这些都削弱了宪章运动的家庭—社区的阶级团结，并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活动变成兄弟会式的狭隘地方主义。我们唯一能清楚地探索这一点的国家是英国。因为其他国家，在工人阶级大规模出现之前，家长式道德就迫使女工和童工离开了工厂。仅在英国存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人的反抗运动。现在这一运动也已地方主义化，并进一步衰退，但是随着经济和捐税的减轻，它又得到增强。工人阶级的非政治化、活动转向工作场所以

及更多的订货都增强了他们的经济武器。19世纪40年代中期，正是在如此的地方主义和经济主义环境中，保护主义的宪章派土地公司出现了，它计划购买土地让工人耕种——这是政治失败的一种反应，也是向狭隘(并且是落后)经济行为的转变。正是由于宪章运动在正面阶级冲突中遭到失败，19世纪中期以后才兴起了“体面的工联主义”。

地方性工联主义的兴起，1850—1880年

19世纪中期以后[4]，工会的发展速度虽然放慢了，但仍然在日积月累地发展着。据韦布斯(1920，pp.472，748)估计，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工会会员不到10万人。而最近估计，1860年前后的工会会员在50万人到60万人之间，1867年大约为80万人，到1876年则达到160万人(Fraser，1974，p.16)。但是工会充溢于更大的合作社和“互济会”中。1874年，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估计，互济会拥有400万成员和800万受益者(Kirk，1985，pp.149—152)。大多数工人以保护主义的形式参加，政权对此没有反对。

然而工会也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到1860年，大多数工会具有地方性并主张经济主义，这对多数作者来说是保守的或贵族性的。尽管不再单纯是违法的，但按照阴谋集团的法律，工会仍备受困扰。正如我们在下面章节中所指出的，在美国(第十七章)，有特权的行会地方主义比工业工会或总工会容易钻法律的漏洞，尤其是如果他们控制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多数工会仅限于上层的有技术阶层。除了城市手工业者，还应加上有技能的技师，在作坊和工厂控制下的钢铁工人和矿工，以及纺织工人和其他更多由工厂创造技能的行业。工会的重心从手工工场转移到大型的机械化工厂和矿山。国内劳动力市场在铁路、制铁业和炼钢业中得到发展。大多数工会试图限制行会的加入，阻止“熟练工人的助手”、“佣工”和“铆工”；限制女性就业；要求“家庭工

资”——仅针对男工(Savage, 1987)。他们寻求对工厂和作坊管理实行制度化，与雇主消弭纷争，调和罢工，确保工会会员的工作效率，赋予会员一定的社会地位。此时激烈的罢工很少出现，大部分罢工发生在采矿业。对地方行业及部门性企业的认同比对阶级的认同更加巩固(Joyce, 1980, pp. 50—89)。一名锅炉制造工(引自 Fraser, 1974, p.59)在诗中写道：

资本和劳动似乎
是由我们的上帝把它们连在一起，
在精神世界里
难道它们不像一对孪生的巨人?
只有劳动又能做什么?
就如同转动那没有谷物的碾磨机!
那么资本本身又能做什么呢?
只能贮存它的种子，
吞下一粒金色的药丸。
我们被捆着
去攀登那通向光明前途的山峰。
困难使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因此将同心协力，
向惊异的人类展示
资本和劳动，
是我们奋力划动船只的双桨，
是我们翱翔高空的翅膀。

(Fraser，1984，p.59)

然而，体面的工会正向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转变，这就是

将社会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体制，认识到就业条件是与他们所能利用的行业循环相联系(Hobsbawm，1964，p.350)。他们整体意识增长的另一个标志——佩林(1963，p.42)称之为"工会发展史的里程碑"——是1851年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全国工会，即技师统一工会(ASE)。尽管仅限于男性熟练工人，但是它承认了他们共同的全国性利益。技师统一工会为其他工会提供了一种从地方组织通过地区性组织形成全国性组织的模式。

技师统一工会的规章制度阐明了行业工会的主要矛盾：

> 如果对于那些还没有通过试用期的劳役(即学徒期)获得权利的人，我们被迫通过限制来约束他们加入我们的工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上述的侵害是罪恶的后果，当坚持不经审查就可以加入工会时，其结果是导致手工业者的生产条件降低到非熟练工人的状况，不会给那些被允许加入工会的人带来永久利益。(Clegg 等，1964，p.4)

尽管工会认为对非熟练工人的排斥是"被迫"的，但是这种排斥性强化了地方主义。然而工会仍在发展壮大，并最终使其成员的共同身份和组织实现了政治化。最初，技师统一工会最关心的是使互济会的利益标准化。但是1852年当雇主们在全国范围内胁迫技师统一工会时，他们和其他手工业者都被迫进入一个更广泛的组织和政治领域。阶级斗争具有日积月累的辩证因素。工会卷入到争取10小时和9小时工作时间的运动中，它迫使雇主求助于地区性和全国性组织；反过来，这又进一步迫使工会建立全国组织。到1880年，工会会员从最初的5 000人上升到4.5万人。事实上，被称为"新式"工会的威望并非是新型的(Musson，1972)，但却是"全国的"工会。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全体工人的国家。

尽管政治化不是阶级的首要任务。但19世纪50年代，在改革同盟

中，工会和中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合作，它的格言是“有工作者应该拥有投票权”。到19世纪60年代末，自由主义继承宪章运动，成为大多数工人激进派的政治信念。他们也参加了跨阶级的合作、教育和禁酒运动(Kirk，1985，pp.70，132—173)。作为回报，他们接受了互助论的立法，这一立法确保合作和互济会的权利以及改善教育。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赞同互助论的观点，即应授予劳工工会以共同的公民权利。伪善的资产阶级正在一个更加地方化的稳定社会中松懈下来。在政权中，宗派活动再次出现。更多人提倡建立体面工人的“自由团体”。

实际上，对于工人，英国现在也将其定型为政党民主。部分托利党人和自由党人开始确信，应将投票权授予那些体面的工人。这一时期，政党本身开始更加群众化，贵族性减少，同时更多地卷入真正的竞选中。如果支持改良，两党的各个派别都可望从选举中获利。1867年的《保守党改革法》给予市镇中的户主以选举权，同时完整地保留了乡村的保守党权力——德比勋爵说，他的法案将“挫败辉格派”。自由党采取了报复行动，1884年它将法案的涉及范围扩大到乡村。事实证明，在许多乡村选区和煤矿工人集中的地区，他们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1885年，由工会提名并忠于自由党的矿工被选入议会。因此，工人也进入了议会，这是工会与政党民主的政权进行部门性协作的一个结果。

职工大会(TUC)是全国性温和的互助论者和与通敌者联合的全国性象征。在1868年到1869年间，它是作为辩论社团而创立的，通过工会的法律约束进一步扩大发展起来(正如劳工组织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经历的情况类似)。1871年《刑法修正案》将多数的工人纠察定为犯罪，这甚至威胁到行业工会。1875年职工大会通过在资产阶级联盟中的游说，成功地将其撤销。

各工会也共同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努力来理解“社会”的性质。社会是一种受到本身法律约束的系统的整体。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学科中传播。英国实证主义者推广并普及了孔德的学说。

孔德是实证主义的缔造者；斯宾塞所著的有关社会进化的书籍，赢得了众多读者；马克思和更自由的社会党人都在讨论资本主义体制，后者还与激进派及工联主义者辩论这一问题。他们的理论大多对社会总体作了一种双重假设——“社会”即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体制，又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它同样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学而保留下来。

体面的工联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工人贵族”，当然也不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正如 Foster 在 1974 年所提出的)。宪章主义和阶级运动在工会拥有体面的地位之前就已崩溃。作为其失败的结果，此后许多人都不再拥护起义。值得注意的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手织机的织布工人大量消失。相反，体面是对下列情况的一种地方性合理反应：(1)宪章运动的阶级趋势遭到正面失败；(2)随之而来的阶级团结被分割为经济主义的地方性策略；(3)政党民主的政权原则承认，地方主义不构成任何威胁，并且在事实上还包含了积极的功效；(4)在经济的发展中，以经济多样性的新形式来促进 19 世纪中期以后的地方主义。我将从工厂开始叙述第四个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预期的，19 世纪中期以后，工厂的发展没能巩固阶级的身份。乔伊斯(1980)指出，棉纺织厂推动了部门性家长式统治，甚至是服从。这符合卡尔霍恩(1982)提出的论据。早期的激进主义在城镇的许多小型手工工场中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不是存留于工厂占优势的地方；同时吕德(1964)证实骚动的人群(除了在宪章运动的巅峰时期)是由不太遵守纪律的工人组成的，他们比工厂工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F·M·L·汤普森(1981)证明，从 1840 年到 1880 年，大型工厂是对工人实施部门性控制的主要机构。

这些调查结果也符合了纽比(1977)的“服从”模式。他写道，服从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态度，如果农场主操纵了工人的全部生活，这将导致 20 世纪的农业学(他的研究领域)。20 世纪的农场主和 19 世纪末的制造商不仅是积极的物主管理者，同时也是地方社会的教育和政治机构的行政长官和领导者。工人缺少向这种广阔空间挑战的权

力，但是能够通过控制一种惯于顺从的方式达到目的。他们甚至可以使顺从内在化：如果唯一可能的现实是雇主施行统治，那么这个词在事实和标准的双重含义中就变成“自然的”了。因此，乔伊斯指出，应给予(男性)棉纺织工人以选举权，使他们能够投票给雇主、辉格党或托利党。小型企业发生了更多的冲突，这是因为与手工业者相比，小型企业主几乎没有更多的社团控制权。激进主义主要存在于大城市，而不是中等市镇的工人中间；工厂主的寡头统治可以控制罗奇代尔、哈利法克斯和沃尔索郡，但是无法控制曼彻斯特、利兹、诺丁汉或伦敦。工厂集团并不鼓励阶级组织，但却支持部门性组织。上层社会从组织上阻挠下层社会的能力并未丧失。马克思认为上层社会受到挑战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已制度化的工厂有助于阻止挑战，就如同工厂的出现有助于它的开始一样。与其说工厂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不如说它是中世纪庄园的工业对等物。工厂里的工人成为大老板的部门性雇员。

此外，在工厂、繁荣稳定的商行与控制着劳动力供应的行会相交汇的地方，工会“产生”了劳动关系。尽管女工形成了地位重要的少数派雇员，但是在工会中男工仍占压倒性多数。家庭工资、男子作为养家活口者以及同志关系等等的劳动观念具有男性化的特征，正如大多数工会是在酒馆里召开会议的(Hart，1989，pp.39—60)。在工厂和稳定企业之外，以及与市场不确定因素的交汇之处，不定期领取救济的无组织的工人占据了优势，其中多数是男子也包括部分女性。在某些领域的男性临时工中，爱尔兰移民占优势。这导致了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乃至暴动(Kirk，1985，pp.310—348)。在早期，当多样性还未稳定为地方主义时，爱尔兰籍工人已在宪章运动中明显的表现出这一点。兰开夏郡激进派的两个团体现在成了对手。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已注意到了新的分裂，尽管这种分裂通常是男人之间的分歧。马克思已经分析了19世纪中期的法国工人和不定期领取救济的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后来，他又强调了英国工人和爱

尔兰工人的冲突。同时代的其他人则将“工人阶级”多元化。正如激进的《蜂箱杂志》在1864年所写的：

> 工人阶级……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包括熟练的手工业者和技工，另一部分人则是体力劳动者、小商贩——这些人以他们自己都很难描述的方式来维持生计——以及形形色色的粗俗之人。(Fraser，1974，p.209)

梅休注意到，在“各行业”之中只有手工业的熟练工人拥有固定工作和工资：

> 手工业者几乎是狂热的政治家……，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是人民中的一个不同阶层。到当时为止，他们如同仆人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无论如何他们都显得毫无政治观点，假如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也宁愿去维持“事态的原状”，而不去争取工人群众的统治地位。(Evans，1983，p.170)

在维多利亚时代，技术和性别的紧密结合在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个主要的错误方针同时代的人开始将工人分成“体面人”和“粗人”。格雷(1976)和克罗西克(1978)指出，(男性)手工业者建立自己的协会，实行内部通婚，职业世袭，他们通过互济会拥有一定数额的积蓄并建起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像从非熟练工人中划分出来那样，他们也从中产阶级中划分出来。中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化”，相反却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宗派。他们比非熟练工人拥有一种极大的优势：由于控制了劳动力市场而就业稳定。非熟练工人是临时工人，其工资水平也未达到家庭工资的标准。这阻碍了他们为互济会和其他手工业组织捐款。也许最有力的对比是涉及维多利亚时代工人们最大的恐惧，即济贫院(Crossick，1978，pp.112—113)。在格林尼治，体力劳动者进入济

贫院的几率是人口平均数的5.5倍；传统的手工业者(裁缝、泥瓦匠、制桶匠)进入济贫院的可能是平均数的2/3；机器工人则仅是1/4。技工的谋生机会比体力劳动者高出20多倍。

性别差异、手工行业、在家庭以外工作和临时的工厂劳动——加上更具部门化控制的农业和家庭服务业——几乎产生不了阶级认同。大多数的集体行动仅限于有技能的“同业人”。民族国家也由于鼓励部门性联盟而使阶级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在工人阶级能够再次出现之前，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都必须结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尤其1880年以后，这两方面都未终结；但是如第十七章所指出的，它们都被削弱了。

结论

英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发展是独特的。在随后几章中将不再重提本章中所探讨的各种主要权力关系。工业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早期弥散性，得到国家军国主义的进一步加强，也使其历史的“联邦”形式更加中央集权化。三种紧密结合的力量产生了一种极早熟的工人阶级运动，它以注重家庭和社区为特征。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初，爆发了宪章运动，这一运动同我们后来在其他国家发现的起义运动相同。然而，它也遇到了一个同样果断的、有阶级意识并且伪善的统治政权和资本家阶级，它们控制了力量更大的、守纪律的军国主义。宪章运动和政府及资本家之间发生的正面冲突，不存在逻辑辩证的解决办法。工人阶级失败了，如同它已失去的所有类似正面冲突一样。而且在随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几乎没剩下什么残余力量，它最终失败了。这是因为工人的地方主义能够为行会工人获取统一阵线，这些行会工人在内部或外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排斥权。第十七章描述了这些地方主义是如何遇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再次发展更广泛的阶级组织，尽管要

比宪章运动更温和。

19 世纪中期地方主义对阶级的替代也涉及家庭。虽然早期的阶级运动从家庭和社区中获得了巨大支持——这种支持比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要强烈得多——但是，后来地方主义以男性为主，主要关注就业问题，是生产主义派。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也将阶级作为一种关系来分析。在整个这一时期，无论国家政权还是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都没有始终如一的战略，无论这一战略是反动的、实用主义的还是进步的。他们的战略倾向——事实上，正是他们的一致性——随着相互作用而定型。例如，从《大改革法》的宗派主义到宪章运动直至 19 世纪 60 年代，政权由实用主义的让步转变为有纪律、伪善的军国主义，再转变为巩固政党民主所带来的实用主义退让。这样做是由于它自身的认同，外部的压力以及工人运动的一致性都发生了改变。

我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不同，没有将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辩证的，由正面冲突和所有有组织阶级的决心构成。我以两种方法证明这种辩证法的正确性。首先，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也破坏和削弱了阶级。以现状为例，斗争的决定性结果是，政府虽然保持了一致性和团结，但是军国主义加上无法预期的后果造成地方的工人特性。后来，当政府松懈时，它又产生了政党的宗派主义。其次，阶级冲突极少是单纯和正面的。因为它包括了复杂的权力网，对于运作者来说，其中的相互关系不是系统和透明的。因此，对于双方来说，他们的决心产生了无法预期的后果。我已集中关注了家庭和阶级之间的非系统联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思想道德、家长式统治和政党民主这些国家形式之间的非系统化密切联系。它们的紧密联系带来了一系列人们未曾期望的后果。例如，通过《工厂法》，工人获得的收益并非完全是国家政权所期望的。而工人运动基本成为男性化的运动，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我也许还要加上另一组非系统化的相互作用，即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作用，它也发生于这一时期。但是我还未能探索出它们的

最终后果。

注释：

[1] 这一部分的主要资料来自汤普森(1968)、珀金(1969，pp.176—217)、马森(1972)、普罗瑟罗(1979)、亨特(1981)，以及卡尔霍恩(1982)。

[2] 关于宪章运动的主要资料引自布里格斯(1959b)、普罗瑟罗(1971)、琼斯(1975)、爱泼斯坦和汤普森(1982)中的不同文章，斯特德曼—琼斯(1983)、D.汤普森(1984)。

[3] 它们可能起源于爱尔兰人的解放斗争，因为许多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就是爱尔兰人。

[4] 关于这一时期的主要普通资料的提供者是佩林(1963)、珀金(1969)、马森(1972)、弗雷泽(1974)、托尔弗森(1976)、亨特(1981)、埃文斯(1983)和柯克(1985)。

参考文献

Bairoch, P., 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Bennett, J. 1982. The London Democratic Association, 1837—1841: a study in London radicalism.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 Epstein and D.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Briggs, A. 1959a.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 London: Longman Group.

1959b. *Chartist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1960.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ed. A.Briggs and J.Saville. London: Macmillan.

Calhoun, C.1982.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Oxford: Blackwell.

Church, R. A, and S. D. Chapman. 1967. Gravener Hens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n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E.C.James and G.E. Mingay. London: Arnold.

Clapman, J.H.193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egg, H. A., et al. 1964.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889*, Vol. 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ossick, G. 1978. *An Artisan Elite in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Croom Helm.

Currie, R., and R. M. Hartwell. 196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8.

Davies, J.C.1970. The J-curve of rising and declining satisfactions as a cause of some great revolutions and a contained rebellion.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 H.D.Graham and T.R.Gurr. New York: Bantam.

Epstein, J. 1982. Some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Nottingham.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Epstein and D.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Epstein, J., and D.Thompson (eds.). 1982.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London: Macmillan.

Evans, E. J. 1983.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1783—1870*. London: Longman Group.

Foster: J.1974.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raser, W.H.1974. *Trade Unions and Society*. London: Allen & Unwin.

Goodmay, D.1982. *London Chartism, 1838—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y, R.Q.1976.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reenberg, D.1982. Reassessing the power patter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Anglo-

American comparis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Hobsbawm, E. J. 1962.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Mentor. 1964. Labouring Me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llis, P. 1973. *Class and Conflic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815—185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unt, E.H.1981. 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Jones, D.1975. *Chartism and the Chartists*. London: Allen Lane.

Joyce, P. 1980.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Brighton: Harvester.

1990. Work. In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 2: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ed. F.M.L.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rk, N. 1985. *The Growth of Working Class Reform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Leeson, R.A.1979. *Travelling Brothers*. London: Allen & Unwin.

Morris, R.J. 1979.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80—1850*. London: Macmillan.

Musson, A.E.1972. *British Trade Unions 1800—1875*. London: Macmillan.

197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labour aristocracy, 1830—60. *Social History*, no.3.

Napier, Sir W.F.P.1857.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General Sir Charles James Napier, 4 vols. London: Murray.

Newby, H.1977. The Deferential Worker. London: Allen Lane.

O'Brien, P.1989.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3—1815, on the long-run growth of the British economy. *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 12.

Parkin, F.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elling, H.1963.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London: Macmillan.

Perkin, H.1969.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othero, I. 1971. London Chartism and the trad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4.

1979.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London: Methuen & Co.

Rudé, G.1964. *The Crowd in History 1730—1848*. New York: Wiley.

Rueschemeyer, D., E.Stephens, and J.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muels, R. 1977.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3.

Savage, M.1987. The Dynamic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ville, J. 1987.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well, W.H.1974. 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Marseilles. Past and Present 65.

Stedman-Jones, G.1975.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review article. New Left Review, no. 90.

1982. The language of Chartism.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 Epstein and D.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ykes, R.1982. Early Chartism and trade unionism in south-east Lancashire. In The Chartist Experience: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 *1830—60*, ed. J. Epstein and D. 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Tholfsen, T.1976.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Thompson, D.1984. The Chartists. New York: Pantheon.

Thompson, E.P.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Thompson, F. M. L. 1981. Social control in Victorian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34.

Thompson, N. 1988. *The Market and Its Crit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ebb, S., and B. Webb. 1920.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London: Longman Group.

Weisser, H. 1983. *April 10: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ngland 1848*.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第十六章

中产阶级国家

理论问题

在第四章和第九章中讨论到了19世纪的政权，它们主要由数千个大家族控制着，且需要外界的援助。确实，直到19世纪末，工人才形成了有组织的威胁；农民组织起来较早，但是(正如第十九章将要表明的)其组织很少有破坏性。大多数工人对国王、国家和资本无论是热爱还是不满并不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稳定的权力组织，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然而组织上的迂回管理却需要较低阶层的管理者和忠于政府的人，以前这些人来源于特殊的部门性的网络，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普遍性，数量有所减少。然而令统治者们欣慰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群忠心耿耿的部下——中产阶级。

自此，这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绝对是忠诚的。正如很多作家所认为的那样，国家政权最担心的是国家极端主义的那种周期性趋势。我将持怀疑的态度来审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被我称做过分热心和超级忠诚的国家主义找到一个更加特殊的社会定位。考虑到这种长期存在的阶级忠诚，本章将经常打破年代顺序的界限，概括延续至今的连续性。19世纪晚期创立的中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证明是属于我们的。在西方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中产阶级具有与工人阶级同样重

要的作用。

中产阶级的定义一向都是有争议的。“中间群体”的兴起立即为19世纪的观察家们提出了概念上的问题。由于受这个阶级中的不同层次的影响，大多数人使用了复数的“中产阶级们”。选举权问题尖锐地提出了阶级的定义问题：应当允许中产阶级拥有投票权。但是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呢？而且这个问题是由重实效的政治家，而不是由清楚的概念来解决的。同时代的人们下了定义，但历史学家把“中产阶级”仅仅用作“剩余的一类”。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格雷认为“生产关系”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了区别，但只是建立了“中间阶层之间的区别”，所以不能机械的运用(1977, pp.134—135)。这个模糊的建议被克罗西克响应，对他来说“低等的中产阶级”从分析的角度是薄弱的，但是作为一个“同一时期描述术语”(1977, p.14)是有用的。哈里森(1971, p.101)说，20世纪给中产阶级下定义是困难的，但是“在早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成员资格、身份的检验更加客观……尽管根本并不严格，甚至也不确切”。客观的也能是模糊的吗？社会学家能提供更好的概念吗？

社会学家确实提供了更多的概念——小资产阶级，有着旧的、新的和传统的一面；中产阶级，有其新的、旧的和分裂的特点；新兴的工人阶级、服务阶级；专业和管理阶级——这些阶级可能处于“对立的阶级位置”中。或者作为替换办法，有许多中间阶层、职业阶层或社会地位层次；或像“白领”、“职业”或“半职业”这类混合的阶层术语。法国的术语与之相同。德国则把阶级和“财产”的术语——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分为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这种过多的描述体现了五种不同的理论。中间群体就是：

1. 处在工人阶级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2. 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一种偶尔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

3. 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对立的阶级位置中(Wright, 1985,

pp.42—57)。

4. “分裂”，即各种中间阶级分裂成不同的阶级或等级——最普遍的观点(例如，Dahrendorf， 1959)。

5. 分裂的中产阶级(例如，Giddens， 1973)。

在这五种观点之间(由 Abercrombie and Urry， 1983， pt. I 再次回顾到)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 我借鉴了这些理论，但主要结合了第四种和第五种。 我这里想说的是独立但(像其他阶级一样)仍然“不纯粹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包含着三个内在的部分，每个都有不同的权力组织。我也坚持认为以前大多数社会学因三个理由而未能充分理解中产阶级的复杂性，这三个理由是：

1. 大多数作者已经进入了有关另一个阶级问题的争论，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Blumin， 1989， pp．6—7 和 Mayer， 1975，也抱怨过)在涉及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中产阶级(正如这一术语所暗示的)据称是现代阶级关系的明确特征。 从这一观点来看，中产阶级缺乏独立性，因为大部分都站在资本家一边(见 Ehrenreichs 对 1979 年的“专业——管理阶级”理论的批判，例如，Aronowitz， 1979 或 Goldthorpe， 1982)。 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劳资双方的关系，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正如我所反复证明的那样，社会并不是单一的，不能简化为社会权力的唯一来源。 现代社会并不能简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其阶级关系也不能简化为劳资双方的关系。

2.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合用了一个狭隘的“生产主义”，集中于常常是普遍存在于大的制造业中的雇佣关系。一些人把工人阶级局限于“生产劳动”中，几乎把所有的群体都放在资本家一方。 很多人利用“资本的全球功能”(Poulantzas， 1975；Carchedi， 1977)。 赖特(1985)曾试图用一个相当原始的“生产关系”的模式来涵盖中产阶级的多样性。 他区分了三种雇佣权力的来源——财产、组织权力和技能。 每一种都来自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模式(尽管他认为财产权力和由此产生的生产模式占统治地位)。 中间群

体倾向于在某一方面地位较高，而不是在三个方面都高——因此，他们处在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上”。我接受赖特提出的很多理由，但他的理论是生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只有雇佣关系真正在考虑之内，而权威和教育只是由于在功能上有助于经济生产才被引入。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雇佣关系。达伦多夫(1959)论证说，在雇佣中，权力关系作为现代社会阶级中基本的决定性要素，已经取代了财产所有权。戈德索普(1982)用这样的术语定义“服务阶级”，即在工作中负责的专家、经理和高级的技术人员。他对服务阶级的其他特征，如普通的教育经历是相当敏感的。但无助于定义他的职业阶级(实质上是职业的聚合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再一次被解释为职业关系，这可能是我们走出中间困境的向导。

3. 新韦伯主义者对中产阶级的解释仅仅是把网撒得更宽。他们把共同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风格、学校、社会影响和通婚、还有正式的职业关系等都考虑在内。而且人们都已超出了单一的经济功能。但是他们倾向于把这种多样性与主要由教育所定义的一般概念“市场位置”融为一体。帕金(1979)，论证教育“证书”使中产阶级较大的远离了劳动力市场。再如科林斯(1979)，他并不是实用主义者，但是对这一点却相当嘲讽：教育不仅仅是对经济需要作出的回答；它本身也是权力的一部分。

吉登斯把教育的权力放入一个更加宽广的理论中，即市场权力怎样在任何特定形式的市场容量关系中存在着流动的封闭，阶级便形成了(他强调说)。他的观点部分与赖特的相同，他详述了三种市场权力：财产、教育，或技术资格和劳动力。这就给了三种基本的现代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教育所定义的中产阶级。这样分类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即把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独立的工匠——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这也可能是一个奇怪的结论。吉登斯通过加入了一些辅助“阶级关系的近似机构”如在企业和消费模式中的权力关系，使得他的模式更加合理。然而总的来说，他的理论以教育所赋予的市场

权力代替了生产方式中以雇佣为中心的关系(1973, pp. 107—110)。

阿伯克龙比和厄里(1983)已经进行了敏锐的观察，我们应把生产和市场关系结合起来，而且起源于这两方面的总的作用也有助于给中产阶级下定义。这些步骤虽然必要但仍不充分。我进一步总结出三个步骤：

1. 三种总是不纯的生产关系：(1)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2)统治集团尤其是资本家的公司和现代国家的官僚政治(3)国家特许的权威职业，它们的撞击产生了中间集团。我有时在关系(2)中又分出私人等级制和社会等级制，但是全部的生产关系共产生了三个不同的群体：

(1) 小资产阶级：小家庭企业的业主。

(2) 流动职业者：涌向公司和官僚集团的带工资和薪水的雇员。

(3) 专业人员："有学问的人"，集中在国家特许的有组织的公司里。当然，很多人处于这些群体之间"矛盾的阶级位置"上，另一些人则混在一起，分辨不清(如被公司雇佣的专业人员)，还有些人从事有个性的职业，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停留在直接生产关系的水平上，我们可能不得不把这三个群体看成是独立的阶级，因为他们的雇佣关系是如此不同。然而通过第二步和第三步，一个共同的阶级地位就产生了。

2. 我回忆起**权威的**和**分散的**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由权威的职业组织构成的。它还体现在分散的资本运作中，包括消费(正如很多作者注意到的)。我们将看到，这些有助于把我们的三个阶级派别统一成一个整体。

3. 资本主义永远不能自我建立。正如我所论证的，它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政治权力的网络中。我们也将看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民族公民权，也使中产阶级成为一体。

确实，所有这三个标准——职业关系、分散的权力关系和所有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给中产阶级加上了一个共同的性质：他们与上层统治阶级主要是一种增强效忠的部门关系——如果对一些人来说，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超级忠诚"。这样，他们就成了由常规所定义的、单一阶

级的组成部分：它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等级制度中起辅助作用的中间参与部分。我将从经济关系开始讨论。

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拥有和控制它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力，并雇用非自由的工资劳动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定义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企业不按照市场税率(一般低于市场税率)使用从属的家庭劳动力，业主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或是朋友合伙，通常是建立在非契约的基础上——利润、损失和劳动义务按照家庭和朋友间的松散协定来划分而不像与个人无关的较大的合伙企业。小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但没有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它是专一家庭式的。

显然，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生意越做越大，上层小资产阶级就逐渐融入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是相对分散的，因此并不像别的生产方式那样，它不能经常排除别的阶层进入。

第四章讨论了为什么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组织实质上是小型的和分散的。工匠、工人、小贸易商和家庭企业带来了工业革命。小"资本家"与"熟练劳动力"的界限变得模糊，如同非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通过技工在"中等阶层的阶级"中占优势，将他们融合在一起。然后，第四章和第十五章都讨论了技工的分裂。大多数技工在不太稳定的各个行业中沦为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中期繁荣的手工行业中，20%的技工也许会在十年内上升为小业主。这种新的小资产阶级成为"非体力的"，从下层"工人"中分离出来，变得更富有、更安全并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Blumin，1989，pp．66—137)。小业主仍然统治着中等群体。"商贩"构成了维克托里安斯所描述的中产阶级的半数以上，在19世纪中期他们的人数正在增长(Booth，1886；

Best, 1979, pp.98—100, 104—106)。

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仅仅是享受中等的财富和地位，不能被接纳进最富者的圈子，但是他们跟资本家合作。1880年后大型公司兴起在德国和美国(英、法、澳大利亚是1900年之后)，甚至最大的企业供应链的两端都产生了小的散工者。私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承约人以及占优势的临时工人，还有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集中注意力，把他们的家庭财产转移到继承人那里。一些小公司为大公司和占统治地位的消费工业、建筑及公用事业打杂。它们的积蓄被律师、经纪人、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到政府债券和股份上。小资产阶级正幸福地分享着膨胀分散的资金。

它的忠诚有助于打败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以及此后仍然继续的革命。迈耶(1975)说小资产阶级在1871年之后只有一条路——倒退。正如威纳(1976)所论证的，这种讲法有些夸大。它的成员大部分是保守的，而不是反动的。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他们似乎是自满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熟"与经济繁荣和大英帝国的优势结合在一起(Tholfsen, 1976)。1832年到1867年间，小资产阶级的选民比率接近多数，以后大约占1/3，但是选举仍然被"传统结构的顺从团体和顺从网络"采取分离的办法组织了很长一段时间(Moore, 1976)。政治消极跟感伤的理想主义走在了一起。小资产阶级起居室里的画面描绘了国内的安详、中世纪和苏格兰高地的浪漫主义以及孩子们的天真。布卢明(1989, pp.138—191)和瑞安(1981)还画了一幅美国国内小资产阶级生活舒适温馨的图画。

然而，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飞掠而过的黄金时代吗？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了股份有限公司、卡特尔、贸易团体和保护贸易主义。像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阻碍了小资产阶级，这一点通常存在争议(例如，Gellately, 1974 和 Lash and Urry, 1987，综合了这种文学)。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不如美国和德国那么有组织性。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小资产阶级的零售部门，百货商店对所

有国家的小店主和商人都构成了威胁，而且英国和法国从国际竞争中蒙受的损失更大。从19世纪80年代起，小资产阶级大概就受到全体资本家的威胁，数量和权力减少，引起了对社会地位恐慌的喧嚷和妄想狂的政治——这是爆炸性的，一般来说是右翼分子，最终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个骚动的阶级派别。

然而，这又证明是神话。战前的小资产阶级是烦躁而不是激动的。确实，直到现在还一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小资产阶级对经济表示不满。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国家里，来自奥匈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来自德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些集体行动的政治结构，其狭隘的经济表现倾向于重视实效和公道——是最有组织性的。例如，当德国法庭裁决保险法律只适应于工人时，中产阶级表示反对，并在1911年制定了自己的保险法(Kocka, 1980, pp.258—259)。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少能引起国内政治的骚动；在对进步运动的辩论中，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并不积极。查普曼(1981, p.236)记录了从1720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小公司之间的小冲突。大多数问题起源于零售价格的不变，但由于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合作社，小资产阶级便大声抗议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Crossick, 1977, p.17)。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该阶级的分裂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来。但即便不满足，小资产阶级也很少退出去形成他自己的政党。

在大公司有更高的效率以前，小资产阶级仍然在衰落吗？在经济学家们强调规模经济的半个世纪之后，效率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被提出来。普瑞斯(1981)并未找到规模经济：大公司吞并小公司，不是因为它们的效率更高，而是因为它们对市场形成了更有权威的权力，也因为有了股票市场的特征。尼古拉奥夫(1978)对希腊企业的研究发现小的和中等公司是最有效率的；清则(1981)发现比较小的日本公司有的利润很大，有的没有收益。但现在还未能找到早期关于利润的数据。在历史文献中充斥了小资产阶级的苦恼，但没有利润和损失成本的计算，没有经济下降的证据。(Gellately, 1974, 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小企业的淘汰率是很高的，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可能一直是这样(Blumin，1989，p.115)。

小企业严重剥削家庭劳动力。然而，这是很少被经历的剥削。伯陶克斯和伯陶克斯—瓦米(1981)生动地描述了法国面包师傅的生活。面包师傅和他的妻子过着一种几乎从不间断的苦工生活。在每周的六天里，丈夫从凌晨3—4点开始烘面包，一直到中午之后，妻子从早上7点或8点到晚上8点在店里卖面包。然而生意就是他们的生命和成就，满足了理想主义者“意义”的眼光，物质主义者讲实际的眼光，即有创造性的自我表示。现代人很少能感受到在工作中自主和满足，然而这些目标仍然是较有价值的。即使利润和工资很低，很多人仍试图进入商业，并且大多数人体验到它是令人满足和辛苦的，等等。这没有产生不满——冗长的工作时间也没有促进阶级组织的产生。

在没有利润数据的情况下，数量常常被用来表明无产阶级化。结论几乎总是一致的：数量下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表明了经济下降和无产阶级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著名预测(在《共产党宣言》中)现已影响了其追随者和同样的评论家。在列出一些相当微弱的证据后，普兰塔斯宣称“小资产阶级的穷人化和无产阶级化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过程”(1975，p.152)。但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也同意，只是补充道，一个新的工薪阶层已经出现去填补这一空缺(Geiger，1969，pp.92—94)。吉登斯试图做得更精确：

> 这些数字……表明了一个一般的模式，这一模式适应于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很大的差异：从19世纪的最后十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小企业相对减少的模式……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继续下降，但下降的坡度却有了相当的减缓。(1973，pp.177—178)

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对这个正统神话的曲解：合作的有组织的资

本主义时代已经被无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所取代，一些小企业又兴旺起来。拉什和厄里(1987)争论说，合作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减少，然后又增加。

然而，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减少主要限制在制造业和相对的比例，并不是绝对数量上的下降。吉登斯分析了后者，但是他却将相对下降的时间表解释错了。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人口调查确实显示了小制造业的下降。1930年，英国有93 000家机构雇用的人数低于10人；到了1968年，只剩下35 000家。在德国、法国、美国下降的幅度更小。只有意大利和日本避免了下降的命运。到20世纪60年代，雇用人数少于10人的企业在英国仅占制造业的2.1%，在美国占2.4%，在联邦德国占6.2%，在法国占10.8%，在日本占12.2%，在意大利占18.2%(Pryor，1973，p.153；Kiyonari，1981；Prais，1981，pp.10—11，160)。但是总的职业趋势在各国和各个时期都是复杂和不同的。

1911年，英国的人口调查将“雇主”、“小业主”和“雇员”区别开来。前两者象征小资产阶级(尽管第一种也包括少数的大资本家)。在1911年和1931年间，他们净增长了14%，保持了对劳动力准确而相对的分担额。在1931年和1951年间，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减少21%；相对的分担额减少的稍多些。将农业排除在外使之净减少了28%，在采矿和制造业中减少得最多。但是雇主减少在时间上最早，比“小业主”减少得更厉害。后者起初是增长的，1951年的数字是1911年数字的141%，在农业方面增长更大，其次是交通运输、餐饮业和批发商(Routh，1965，p.20)。在1951年和1971年间，这些趋势颠倒了：雇主增加了近50%，几乎回到了1931年的水平(比例上涨25%)，然而小业主的数量略有下降。雇工方面最近的增长发生在大多数生产部门，包括制造业(Routh，1980，pp.6—7，18—20)。总之，绝对数量在1911年之后增长，但对劳动力的相对分担额却轻微下降。

这表明了英国的三种趋势：(1)尽管19世纪中期，小资产阶级上层

(雇主)轻微减少，但这被一个数量增长的家庭小资产阶级(小业主)所平衡。(2)总的趋势可能会掩盖部门间机会的转移。1900年，在建筑业中的机会最大，后来机会转移到别的服务部门。(3)小企业在不好的经济时代发展相对较好。例如在1962—1978年的纺织工业部门，小公司经受困难时期的能力比大公司要好得多，一些公司还获得了较大的利润(Champman, 1981, p.241)。目前，在萧条的经济中，小制造业主正再次增长(正如在所有的国家里一样)。

如果较早时期有更充分的职业统计资料的话，那么，这些资料无疑会描绘出小资产阶级数量下降的另一种形式。1911年的人口调查，在经理、管理者、办事员、熟练工、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中并没有发现小业主——只有3%的体力劳动者和6%的熟练体力劳动者(Routh, 1965, p.4—5)。比1911年更早时，散工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在一些熟练技工当中。这几乎可以肯定，引人注目的职业转移影响了小资产阶级，切断了他与体力技工的历史性联系。小资产阶级也变成了贵族(Bechhofer and Elliott, 1976)。但是，这与无产阶级化是相反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在1900年左右正在扩大，之后也没有缩小。

这样，英国的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组成部分**变得更加独特，在更加不确定的程度上，从下层和上层都分离出来。到20世纪中期，小企业的相对下降减少了与资本家上升的重叠，尽管这一趋势现在正在倒转。在下层中，散工的较早瓦解大大减少了与工人阶级的重叠，也减少了这两个阶级之间同代内的流动。在这两个障碍之间有一个滞后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减少，加上不断受较大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可能会增加小资产阶级对已确立秩序的忠诚。尽管很多人经历了艰苦的时期，但还有很多人在不同的部门里增加了财富。不平衡的经历可能会阻止集体政治活动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之后，上层阻碍的加强可能会强化局部的特征——集中体现为家庭组织、家庭和朋友之间非正式的规范协议以及分享对劳动力的剥削。

别的国家发展就不同了，正如拜洛克等人(1968)历史上人口调查汇

编所揭示的那样。它们的种类，“雇工和独立者”和“家庭工人”表明小资产阶级——在单一国家内部比在国与国比较中更加可靠，因为各国人口普查的定义各不相同。我也补充了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史国际委员会(1981)的研究，从而使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和政治情况更加详细。

首先，农业在任何国家里都是重要的。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提供了长期的农业数据。尽管经过20世纪农业中总的雇用人数下降了，但是农民业主(“雇工”和“独立者”)下降得最少。到20世纪晚期，农民业主实际上增加了对农业的统治，当时补助金有助于大的农场进人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60年和1983年间，农场主的数量下降了一半多(超出了本卷涉及范围)。

在别的地区，比利时的数字最早，它揭示了长时期内小资产阶级的相对下降：1846年占非农业劳动力的40%，1880年占30%，1910年占23%，直到1945年才稳定下来，然后到1961年下降到19%。下降发生在大多数部门，但在制造业中下降最大。但是绝对的数量是不同的。因为非农业劳动力在1846年和1910年之间增加了250%以上，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了50%。以后，数量就保持平稳。小企业从重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消费商品和零售贸易中，其性质转变为补充性的，而不再与大资本竞争了。自治的政治组织表面上是以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出现的，但在比利时分歧严重的多党政治中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率重实效的压力集团(Kurgan, 1981, pp.189—223)。

1866—1936年，法国在这方面没有总体的相对或绝对的发展趋向。小资产阶级在相对静止的非农业劳动力的33%和43%之间波动。1954年，相对地大幅度下降到19%，1962年下降到16%。尽管建筑业是上升趋势，但大部分部门下降了。但是当非农业劳动力上升时，绝对数字却保持平稳。尤其是独立技工在法国存在的时间较长。当别的国家转入批量生产时，法国提供了全世界的奢侈品——在路易斯安那的每一个漂亮的种植园里都少不了一架购自巴黎的钢琴(Gaillard, 1981, pp. 131—188; Jaeger, 1982)。大企业甚至跟小企业的合作生产在

1901—1931年间也增长了，尽管小的家庭单位略有下降(Bruchey, 1981, p.68)。小企业经受衰退的能力较好。与技工的联系确保19世纪小资产阶级仍是激进的共和党，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最终转向右倾。小资产阶级下降较晚，且只是相对不稳定的下降。

因为在领土和分类系统上的变化，德国数字是难以解释说明的。从1882年到1936年，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看起来一直有一个大的绝对增长和小的相对增长。然后，这两种倾向都发生倒转。1946年劳动力的膨胀轻微的绝对增长才开始。这两种状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服务业增长一半多，制造业下降，建筑业和交通业保持平稳。考夫霍尔德(1981, pp.273—298)记录了独立的制造业工匠到1900年之前才发生瓦解。这种突然的瓦解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剩余的小资产阶级转向极右(Haupt, 1981, pp.247—272)。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当然也在增长，只是当他们据称支持的纳粹掌权时才下降了。

清则(1981, pp.961—989)表明，在20世纪日本的小企业在绝对职业中大量增长，在相对职业中略微增长。但是，是经济繁荣而不是暴跌，增加了它的份额。小企业既包括更多的受赤字影响的企业，又包括非常多的盈利企业。小企业充分参加了全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最近的阶段把共生的参与看作是集成工业、高技术改革和劳动密集型服务扩张的转包商。我找不到一种政治，这是自主的人数仍然较少而不满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

美国的人口调查并不承认像这样的瓦解，但是布吕什概括了美国的研究(1981, pp.995—1035)。技工的瓦解，小制造业的下降，小服务业的回弹——所有这些都和其他地方一样发生了。大小制造业的增长在1870—1900年经济膨胀期间，折射出日本的模式；但是在1954年的繁荣之后，当数量下降时，又转向法国模式。在银行方面，小企业更重要，这是美国极为明显的特色，是联邦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

尽管各国有其特殊性，我们还是看到了三种一般倾向：

1.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小资产阶级只是在相对比例上下降，而不是绝对数量上下降。

2. 最大幅度的相对下降发生在20世纪中期而不是之前，这在吉登斯的时间表和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定义中已经有所表明。当然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的极端主义之后，在中产阶级政治的法西斯主义阶段发生的。因此，小资产阶级经济的显著下降(正如数字所计量的)不可能一直都是这种混乱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1]

3. 相对或绝对下降，不平衡分布，导致了部门之间的流动。

这些趋势暴露出想象的小资产阶级的下降，经济的绝望和因此而产生的神话般的地位恐慌论。另外，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国经济；所以这一阶段巨大的经济增长，使所有的阶级都得到提高。虽有一些衰退和混乱；但是总的繁荣趋势却发展得很快，包括小资产阶级。尽管不再具有最主要的优势，但在绝对数量上仍然在增长。在大多数国家里，它被推到了制造业的边缘，不包括新旧殖民化的服务业。回到第四章的一个论点：英国的工业企业在一战前保持小的规模，是因为行业间的特殊行为不适合合作。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反对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垄断和权威组织的成见。同样的成就夸大了小资产阶级的衰落。

小资产阶级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或者遵循1870—1900年间的日本和美国模式(1945年之后的意大利模式；Weiss, 1988)——小企业完全参与增长，找到新的可获利的产品和服务行业；或者遵循法国和更标准的欧洲模式——小企业能更好地经受衰退、增加劳动剥削和忽略利润。伯杰(1981)把这一点看作大资本和小资本正常的共生。在生产的产品需要简单技术和密集劳动力的地方，或者在需求不稳定的地方，大企业就将其承包给偏僻的街道企业，它们采用较低的工资和不统一的劳动。这些是对市场时机的反应，实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混乱而不是有权威的组织。

大小资本的共生比冲突更加普遍。去掉中产阶级政治和农民(在第

十九章被讨论)，小资产阶级没有促成有特色的反对大资本的激进经济行为。它专注于资本主义和政体，因为它在经济上部分地依靠它们。它的忠诚引起了妥协，或是为了建立反对工人的支持而设计的运动，如战后意大利的情形(见 Weiss， 1988)，或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更出于本能的宣言，如美国的反托拉斯立法或撒切尔主义的政治。

当技工消失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很早就出现了。除技工外，小资产阶级并没有无产阶级化，而是部分参加了资本运作。当家庭与工作紧密结合时，小资产阶级的经验是明显的，但是它的经济权力依赖资本，并且在这种依赖中能做得相当好。其保守主义并不是起源于像 C. 赖特·米尔(1953)或普兰塔斯(1975)所说的地位恐慌、意识形态或任何别的半妄想狂的心理作用模式。不是失败而是适度的成功和全力以赴的努力地工作，确保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忠诚。与老一套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该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中并没有过多地表述小资产阶级。

流动职业者

流动职业者是指在资本家的公司和现代国家官僚政治的统治集团中被雇用并可以流动的人员。1914 年以前，这两个等级制组织之间的差异有时是重要的，但它们更深地植根于政体政治而不是雇佣关系。统治集团是分等级、守纪律和部门化的，其内部的封锁政策把流动职业者和别的派别或阶级区别开来。封锁政策既是牢笼又是机会：**牢笼**是因为它使雇员从集体行动中孤立出来，并且允许资本和政体从侧翼包围流动职业者，**机会**是因为它允许职业向统治集团上层移动(大体上是向下)(参阅 Abercrombie and Urry， 1983， p. 121)。流动职业者包括白领工人、经理、公务员、售货员、较高层次的技术人员和一些同类人员。他们有周薪或月薪，而不是按小时支付工资，在体力工人中按小时支付报酬是正常的；而且一些工作体现出明显的集体一致性(店员在服装、佩带饰物和生活风格方面经常是相似的)。但是，全部的生存机会与其

说是由目前的工作所决定，不如说是由获得一项职业来决定。

达伦多夫坚持认为社团和官僚的职业定义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个“天生分裂的阶级”。他得出结论(我就不这样认为)认为中产阶级的两个主要部分处于两个不同的阶级中，即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

> 在属于官僚阶级组织的一部分有薪雇员和不处于这种位置的有薪雇员之间能划出一条相当清楚的重要界限。邮局职员和会计，当然还有较高的行政人员，这样一些职业都是攀上统治地位的阶梯：女售货员这样的职业却不是……统治阶级的理论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官僚政治的社会职位，而工人阶级的理论同样地适用于白领工人的社会职位。(1959，p.55)

这种陈述包含的内容既有道理又有些奇怪。尽管女售货员的工作与工人阶级的工作可能是相似的，但为什么那些有职业的人被认为是“统治阶级”呢？这样称呼邮政职员看起来是奇怪的(并且达伦多夫后来在1969年修改了他的观点)。像在邮局里，那种高等形式化的等级制度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大多数店员只是在这些部分的最底层移动的。他们被更多地看作是非体力钢铁工人的变体，在体力劳动市场的内部向上爬，很少获得很高的地位。钢铁工人仍然是钢铁工人，邮政职员也仍然是职员，不是经理，当然也不会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了。实际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不太官僚化的机构中，获得职业的机会经常是最大的。这又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依仗权势而组织起来的。

职业雇用是近来出现的。在农业社会中，除了在一些教会和军队之外，统治集团集中控制他的人员的现象是很少见的。第十三章表明早期的现代国家并不是官僚主义的。这两次工业革命仅仅引起了缓慢的职业发展。英国1851年的人口调查，计算在薪金职业中被雇用的人员占人口的1%至2%，主要是在铁路和邮局中，其次是在商业和财政

业中。1870年之后，在整个西方，商业店员、旅行者、会计、银行和保险公司工人是增长最快的种类。制造业和公共事业仍然没有提供管理性的职业。到1911年，办公室和管理方面的雇员构成了英国劳动力的7%，主要是在交通和商业中。贝劳克估计在比利时占9%，在法国占12%，在德国占13%，但是差异可能会起源于不同的分类系统。在各个地方的薪金职业中，4/5的人是男性，就是这个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我将分别介绍办事员、售货员和经理的职业。

1. 国家、商业和公司产生了**职员**。工作和顾客的关系通过聚集、储存和回顾过去、整理现在活动的书面措施而常规化。这就需要能读会写的基本技能，这种技能最初是相当欠缺的(Perkin, 1962)。起初，文字工作的任务没有跟更高层次的需要经验的任务分离。到19世纪中叶为止，在商业工业和行政机构中从店员(和售货员)到经理的位置的晋级是经常的，并且比体力工人向上爬的幅度更大(Blumin, 1989, pp.120—121)。但是随着进一步的程序化，仅仅文字工作与别的技能分离开来。男孩女孩所受的大量中产阶级教育使过度的需求饱和。单身女人成为一支“后备大军”，但文字工作不再被男人们认为是可以提升的理由。因此，办事员的工作就退化了，而且在一些部门比另一些部门更厉害：1909年，46%的保险公司男性职员每年获得160镑(收入税降低到最低额)，相比之下，铁路职员每年只有10镑(Klingender, 1935, p.20)。

2. 消费者商品和服务的扩散，使销售人员扩大，他们需要具备的是文字技能和“高尚的品格”，因为大多数的消费者是中产阶级。再者暂时的需求过剩让位于同样的三种压力。在同一时期，教育和女人施加了同样降低了的压力。在销售量大、收益低和例行业务的地方，最显著的是在大商店里，对工作的技术需要也就减少了。在销售影响企业财富的地方，仍保留着较高的业务往来，并且保留了销售职业。

3. 复杂的合作组织产生了**经理**，这些经理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具有处理各种不同信息的经验和文字工作能力。一些信息是在工作中学到

的，但是其他技能则是通过现代高等和中等教育培植起来的，这些技能有的是技术性的，有的是从无法记忆的大量现象中寻找联系。教育机构中的分层(后面将作讨论)对经理的造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通过有差别的教育资格所层化的多水平的新成员，提高了工薪阶层中的职业分化。1900年，办事员及售货员的工作和管理之间的鸿沟，以及在行政机构中的“机械的”与“智力的”等级之间的鸿沟都在进一步扩大(正如第十三章指出的)。

结合了这三种位置的大组织在1900年出现在各个部门。办事员、售货员和别的正面化职业从经理的同等级职业中分离出来。在国家管理并有稳定产品市场的工业中，受过独特教育和培训的人进入了离得很近的职业统治集团。面向中产阶级顾客的组织中，中产阶级的雇员较受欢迎。在市场不稳定的行业，尤其是在金融业和商业中，有更多的职业。当教育和性别关系的变化加强了大组织的增长以及金融和商业领域职业机会的增长时，有薪水的中产阶级发生了分裂。独特的流动职业者和“较低的中产阶级”——有无产阶级化的工作和集体行动的潜力——刚好在1900年之后分离。

因此，白领工作在20世纪变得无产阶级化。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即有正式职位者是否也无产阶级化了？阶级行动可能来自这一社会学问题。要记住所有的薪金职业都在扩大。从1911年到1971年，在英国非体力雇员在绝对数量上几乎增长了4倍，在对劳动力的相对份额中增长了3倍。经理的膨胀率几乎与办事员和销售工人的膨胀率一样大(Routh，1980，pp.6—7)。由于总的流动机会上升，也许在他们自己的工作生活中，相比父辈母辈而言，没有人失业。

斯图尔特和其合作者从他们对1920年以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数据分析中得出结论：“个人团体或雇员类型实际上并没有被无产阶级化。”(1980，p.194)正在扩大的办事员和销售职业分化成三种。第一类是最低等的工作——很少有人从事的一个职业——由体力工人和从劳工以外新吸收来的妇女(随着妇女受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增长)所担

任。仅仅通过分析性别关系(超出我此处所写范围)，我们就可以估出这一点对社会层化的真正意义，但是它并未向下流动，或在客观上经历无产阶级化。第二类别的大部分重要性降低的工作，尤其是在制造业中，由受雇用的以前从事体力劳动的年纪较大的男人所担任，这些前体力劳动者移入不太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中(也许是由于衰弱的健康)——又一次没有无产阶级化。第三类是真正的职业，它留给了那些低水平的办事员和在售货员位置上的年轻男人。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 1970 年与 1920 年是一样的。目前的工作头衔像店主或销售助理，并不能表示一个清楚而不含混的阶级位置。最大群体的占据者女人们的命运更多地取决于性别而非职业，而且较年轻的男人们仍是中产阶级的流动职业者。由于职业、教育和性别关系紧密结合，办事员和销售的重要性降低并没有使人们无产阶级化。

这些发现适应于 1920 年以来的时期。一些英国作者论证了无产阶级化发生的时间更早。然而，他们的证据是微弱的，大部分是一些年轻店员的零星抱怨，诸如"以这样可怜而微弱的薪金或津贴，一个人怎能生活和养活一个妻子，同时又穿得体面呢？"(被 Price 引用；1977, p.98；参阅 Lockwood, 1958, pp.62—63；Crossick, 1977, pp.20—26)。对一个年轻男人来说，以他那最初的薪水来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子及孩子永远都是艰难的。店员长期依靠他每年的利润和晋升来维持生计。在英国没有证据表明，一战前年轻男人无产阶级化；在美国则有证据表明，这些年轻的男人并没有无产阶级化(Blumin, 1989, pp.267—275, 291—292)。这儿还有一些来自几个国家的证据(Crew, 1973, 1979)，在这些国家里实际并没有从非体力职业到体力职业的向下流动。然而，一战确实对穷人进行了再分配，它的负担主要落在薪金较少者身上；在德国魏玛时期，后来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恶化了这种情况。像这种相对的恶化，可能会影响中产阶级转向极右派和纳粹党(Blackbourn, 1977; Kocka, 1980, pp.28—29)。但是，在法西斯主义统治前后和在别的国家，白领阶层没受什么苦。

我们研究人员不容易在专业和流动职业间就位。我们很多人并不喜欢流动职业者，并清楚的感到他们蒙受的痛苦。历史学家经常描绘19世纪晚期流动职业中不吸引人的个性和神经官能症，他们大概是“传统的”较低的中等阶级价值系统的发明者。据说是在残酷环境中对失败和夸大了的个人野心的绝望恐惧，孤立了市郊的中产阶级。外表的特征，如干净和礼貌，经受的压抑、沉闷孤独和挫败受到极大的关注。这种让人印象深刻的神经官能症的分类是由克罗西克(1977， p.27)从这个群体中的个人自传中得出来的。也许专业学者们也大部分来自于这个阶级(自从战后大学大规模扩招以来)，他们共同憎恶这样的出身。白领文化被认为是病态的，只有转向精神压抑的社会苦难可以解释，厌恶使含义模糊不清，正如克罗西克在书中引用的一个同时代的人的话：

> 较低的中产阶级受到了挫败，并且是孤独的。尤其是在其自传中，有自我强加的隔离和孤独感。“这儿有真正的家庭生活，”马斯特曼写道，“家庭强烈的爱、小的花园和装饰的别墅以及对孩子们的希望”。(1977，p.27)

挫败和孤独感或强烈的家庭的爱——究竟哪一个是呢？

流动职业者是很容易被哄骗的。职业将经理、官僚融人到部分的等级制度中。对等级制度的尊重是职业提升的条件。除了家庭以外，个人最依赖的也可能是组织。从《小人物的日记》(1892， 1965)里的克罗西克到在《政治者》(1956)中的怀特，作者们都取笑流动职业者的顺从、整洁和干净，对上级的紧张及适当的尊重，以及对上层社会生活风格和价值的模仿，这使他们有些略微古怪的行为。在这种担忧中，缺乏男子汉气概从而长期是男性的职业尤其受人嘲笑。但是，这并不是病态的。流动职业者要获得权力主要是靠进入由他们的上级所决定的有组织的等级制度中。他们的“眷属们”依靠这一点。他们的世界观受到他们所能领会到的统治集团的水平以及进一步设想到的人物(也可

能会感觉错了)的影响。他们一直是资本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忠诚守纪的下级。他们将来似乎也是如此。

因此(和其他许多别的人一样)，我拒绝接受由伯利和米恩斯(1932)、伯纳姆(1942)、钱德勒(1977)和加尔布雷思(1985)所提出的“经理革命”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公司经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特阶级，经常反对控股的资本家，改变企业目标——长期的公司增长最大化(因为薪水依靠这一点)，代替了短期的企业家利润。但是研究表明，公司的成就和目标由企业家控制和由经理控制并没有什么大差异，而且经理不会支持控股者所反对的利益(Nichols，1969；Scott，1979)。该证据的收集是在新近一系列的企业合并、资产倒卖、废除契约等高潮到来之前完成的，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公司是资产阶级的。赖特甚至使用了“资本经理重组”的概念更好地描绘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极限”。正如斯科特说的：

> 由于他们在大企业上的位置，公司经理负责处理计算表格和货币账户，利润和增长的标准……这些都是资本生产所需要的……企业被市场客观的约束所包围，客观的市场约束用来保持企业与资本家的理性方法相一致。(1982，p.129)

流动职业者直接依赖公司权威的等级制度，而后者则依靠分散的商品市场。被认为与所有有效而弥散的权力混合在一起，它是作为理性本身而不是约束而被体验的。流动职业者的忠诚是理性而真诚的。资本主义尤其是为它自身而运作。由合作的资本主义和官僚政治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扩展和稳定已经在职业发展中反映了出来。作为个人，一些流动职业者获得成功，而另一些则失败了。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成了为维持20世纪经济发展负有责任的组织成员。

我的大部分论据是从英国经验中摘选的。但在流动职业者之间，而且确实在这些被讨论国家的低级白领工人之间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差

异。科克(1980)对美国白领工人与德、英、法白领工人的比较揭示了在阶级组织方面国与国的差异，但他把这些或者归结于不同的政体，或者归结于不同的民族的工人阶级(第十八章也把这一点大体上归结于政治权力关系)。在民族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从经济的差异中暴露出什么来。在整个西方，流动职业者经历了一个成功而乐观的社会环境(正如布卢明对19世纪所强调的)。他们的价值已经统治了我们的时代。个人流动和成就价值的统治并不是由他们原先的企业形式而是作为有组织的职业来实现的。流动职业者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作为个人(不像小企业家那样，他们已经促成了工业革命)，而是在更广泛的部门权力组织中作为一个忠诚的下级而存在。

专业人员

专业的唯一性并不容易与普遍的阶级理论相适应。“专门职业”一词经常被各种职业用来要求获得特权。定义不能同时既适合医生、军官、建筑估算师、图书管理员和护士，又适合不同的国家。但是作为理想的类型，专业就是“有学问”(包括技术上和文化上有价值的知识)的职业，它需要特殊的教育，并且在国家和职业组织之间的谈判结束之后，颁发其业务执照。我根据约束进人和控制业务的执照等级来区分专业权力的等级，这种执照等级实际上由该专业所控制。因此专业权力实质上是官方的和特殊的，它将大多数专业人员从大部分流动职业者中鲜明的区分开来——戈德索普(1982)、阿伯克龙比和厄里(1983)把他们归入单一的“服务阶级”。

我借用了强调权力而不是功能的专业社会学家的观点(Freidson, 1970; Johson, 1972; Rueschemeyer, 1973)。而且，我还接受了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论点：专业部分地依靠社会上有价值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些知识永远不可能是纯科学和纯客观的，因为社会权力影响了对权力的分类。在西方，因为有组织的教会权力的影响，关于终极意义的知识仅仅需要教士的职业；关于生病和健康知识已经主要受到医生权力的影

响，为什么需要得到“精华的”普遍教育和狭隘的技术技能的教育，其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构建在文化基础上又行使部分职能的这种知识分类形成了我进行分析的背景，并给予专业人员提高了的证件。

现代社会产生了专门知识，这使它的实施者能潜在地发展专业权力。他们是否这样做，要依靠其消费者的能力，看他们能否靠权力组织起对这些知识的供应。主要有三种消费者：资本家企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政府。前两者组织(见第四章)19世纪的政府是软弱的(见第十四章)。没有人能控制从他们自己的需要中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当职业在官方权力的缝隙中组织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专门职业。但是，专业机会在20世纪早期减少了，因为资本主义公司和国家官僚政治使官方的权力增长。战后，最强的自立专业特别是医学，为分散的个人和家人(不管属于什么阶级)服务，而较弱的“半专业”是为公司和国家服务。然而，这种官方权力的平衡只是解释了个别专业的权力。为了达到中产阶级专业的普遍位置，我补充了更加弥散的权力网络。

“专业”原先指人，他们把宣讲基督的信仰作为生活的使命。到1700年，它已经扩大到教会、法律、医学和军事这四个组织。这些专业成为(1)有学问的；(2)有技术的；(3)带有团队精神的(在医学中最弱)；(4)讲授服务于调解社会的道德；(5)服务于国家(对大多数圣职人员来说最弱)。第十二章讨论了在国家内部作为独特阶层的军官是如何进一步变的专业化。然后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了其他职业，同样具有以上特征。

当资本主义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时，它的技术基础扩大了。对机器与工厂的固定的投资以及对劳动的技术需求都随之增长。技工和做散工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一起领导了早期的工业革命。他们的行会和熟练的工人组织(在第十五章中进行了讨论)现在分裂了。那些技能无论怎样提高，都集中在资本家企业生产的过程中，在企业内部受到控制和学习的人仅仅变成了工匠。而那些技能影响企业组织，太通才化，在企业内部不能进行有效学习的人，大部分可能获得专业自主。现在大部

分工业都与科学相通并进行了合作——如从含磷量低的矿石中制造钢，或者用电来收发电报。其他是技术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如建筑物和装有沉重震动机器的车辆都需要建筑学和测量学上的改进。因商业财政变得复杂，而产生了会计，由于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产生了商业律师。企业仍然是小型的，这些服务还不是企业活动的重点。

知识的消费者和供应者都求助于政府来给有竞争力的专家整体发放许可证书。正如第十一章证明的，政府是热心的，因为他们能从颁发许可证书中得到收人。在英国，发许可证的高潮从1818年(军事工程师)经过1848年(建筑师)和1865年(测量师)一直持续到1880年(会计师)，并在此过程中吸收了内燃机工程师、电机工程师、市政工程师和化学家。所有分享进入管理权的专家团体都与国家的(和私立的)教育机构进行谈判，他们现在仍然这么做。

正在出现的股份有限公司于是扩大了对雇用的全体专家工作业务的权威控制，这些专家服务于“职业”管理(比它起先军队里的表现具有更鲜明的特征)。这些成员从专业中半路退出来转向职业。1900年，会计受公司领导，首先受公司内部领导，然后以公司审核的方式向合股公司的外部风险持股者报账。在20世纪，很多专业公司本身变成了大的股份有限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大的会计公司正在审核主要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账簿，与“公司百万律师”的出现相平衡(Galanter，1983)。会计师和律师所保留的专业自主可能起源于对分散的小商业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服务。但是在与商业和政府联系的专业中，专业人员的任务(尽管不是最初的进人权)并不能从公司的业务和官僚的流动职业者的任务中明显区别出来。

各国都发展了各自的专业业务。革命的美国对专业垄断和较弱的国家管理的强烈抵制与早期的经济集中结合起来，用以提高管理专业人员的公司权力。在别的地方，后来的工业化带来了更大的公司和更强有力的国家管理，这两者都减少了专业的教育自主。德国和法国的专业人员资格在与优秀的国家教育和行政部门职业的结合中开始变得更为

重要——在法国是与高等的院校结合；而在德国，国家甚至对受过大学教育者和公司人员(通过“专业官僚”的观念)更有权威性。然而，这些都是在一个主体上的变化：专业权力在早期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组织的夹缝仍然有用，但是，后来就变得更服从于日渐增长的官方权力。

医疗专业的权力并没有下降。在18世纪以前，外科医生、内科医生、药剂师、杂货商、面包师、乡村神父、有学问的人和乡村男女贤人都从事诊断和治疗。然后随着科学和培训的发展，地方医疗团体的出现，接着合并，使规则标准化。城市密集传播的疾病威胁了所有的阶层。阶级利益、慈善团体以及在科学进步中产生的启蒙和功利的信仰都要求得到国家的特许。在1855年，伍斯特医药和外科协会成为英国医学学会。1858年立法把所有有执照的公司都放在已成为协会的总理事会领导下，汇编了一本有资格的医生执业者的登记册。这个被国家准许的团体对于“谁是医生”下了个定义：“医生就是由主权国家的法律授予达到一定权利特权和职责的人，在该国司法权的范围内不能授予他人”(Mackenzie, 1979, p.55)。弗赖德森嘲讽地评论：“专业最有策略、最宝贵的特征——它的自主权——因此被归于主权国家，从这一点，它最终是不能自主的”(1975, pp.23—24)。

但是，弗赖德森用文件证明的，官方权力对医学专业的统治是失败的。当消费者和国家都倾向于认为官方权力无效时，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医学专业都控制了自己颁发执照证书的权力。尽管激进主义者争论说消费者能够控制自己的保健事业——医疗权力的产物比实际所需多得多(Illich, 1977)，但是一个高技术的健康医疗模式却统治了保健事业，并证明消费者不能对健康事业作出评价，因为医学对过去150年大众健康改善的贡献不如在饮食、工资、住房和环境方面的贡献大(Mckeown, 1976; Hart, 1985)。医疗模式在制度化的同时也获得了专业权力。在整个19世纪，医学权力都在增长。以前只是为上层家庭看病的医生，现在为不知名的郊区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服务。病人不再集中传播疾病，医生也能以技术和专业术语为他们的服务下定

义(Waddington, 1977)。古德(1969)也观察到医生——和别的自主的专业人员像精神分析家、神职人员、律师和大学老师一样——强行进入了私人领域。当事人对不健康、疯狂、死亡、犯罪、应得惩罚和智力评估等的恐惧，使他们陷入难以与别人分担的忧虑和脆弱中。当事人厌恶组织，因此他们拖延。对个人隐私的需要保证了专业人员的权力。当处理分散的当事人时，专业权力便能更好地幸存下来。

政府也失去了对颁发执照的控制。正如第十四章所强调的，19世纪的国家很少插手国内社会的习俗，没有公民压力，英国政府便几乎无所事事。而这种压力是针对中立的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干预管理——对穷人的管理除外。政府缺少检查专业的专家知识，而且它的一些专家本身也是专业医务人员。枢密院要监督1858年执照的发放情况，但是在一阵关于公众健康利益的最初兴奋之后，它的医学职位被专业所控制，专业现在能使更高的教育、市政保健和新《济贫法》深入人心。《济贫法》医院开辟了20世纪“英雄般的外科手术”。像这样的专业权力在国民保健制度创立之后仍保留了下来。

对业务和(更少程度上)对资格的医学权力，现在在西方世界中是统一标准的，与很多阶级理论所强调的正式职业关系相反。无论是被国家、资本家保险企业雇用或作为合伙人、个体业主，医生都是杰出的专家。他们的技能，最初是为资产阶级家庭服务，到20世纪就为所有的公民服务。公民和国家都不能对他们实行权威的控制。也许最大的审查现在正出现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保险公司拥有更大的权力。

国家在对待更多的即将专业化的人员时权力更大。在第十四章中描述的国家功能的增长——在20世纪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新的专业知识。19世纪晚期出现的第一个大的群体是学校教师，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在后来变得更清楚。在他们之后，大约1900年出现了一些其他有学问的职业——社会作者、图书管理员、城市规划者等等——他们有较低的权力，经常被称作“半专业”人员。政府经常是一个垄断的雇用者，更直接的控制了服务的供应。在20世纪，半专业出现了女性化趋

势。在大部分半专业工作中，女性现在占大多数，并且妇女在社会上的权力更少。半专业人员使得职业和较低的白领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但是，较高专业的直接的“生产关系”不同于别的阶级和阶级集团，并且他们比小资产阶级或官僚这样的流动职业者的职业更加远离资本主义。他们不能很好地适应马克思主义者的分类系统，比如赖特的分类系统。但是专业人员也卷入了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分散的组织。考虑到这些，我们就能把这三个部分中分散的权力看成一个整体。

1. 专业人员收费，部分由专业人员决定(也许是与政府、保险公司等谈判)，部分由分散的市场力决定。比起流动职业者，他们更少受以向上为中心的部门雇用组织的约束。所收的费用能使他们大多数人在中产阶级上层范围内生活通婚并购买特权消费品。近来公司与专业人员就专业服务订立契约的倾向，为专业人员的收费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2. 专业的进入受到资本主民族国家的两个弥散特征的影响：这两个特征是有活力的教育和培训要求，还有(不是很普遍)资助没有报酬的师徒和专业合伙人资金。这些条件限制使得初入行者只能是来自相对特权家庭的人，高等教育使得专业人员能参加到精英文化中。不过，对教育的依靠也许会把他们从真正的资本家阶级中分离出来。正如帕金(1979, pp.54—73)观察到的，大部分资本家的财产被他们的儿女直接继承，而大多数教育证书的继承却是不直接不完善的。教育把专业人员的子女推入有竞争的流动性中，同别的中产阶级的子女竞争。然而，作为成年人，教育使他们置于更高的社会群体中。这些差异就减少了形成单一的资本家——专业阶级的可能性。

3.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事人影响了专业人员。当事人的要求来源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家庭与商业，主要来自于对半专业化和对医学的期望(普遍的健康保健事业的进入是由政府和保险计划提供的)。专业人员为他们的当事人提供了阶级服务。正如凯恩观察到的英国律师：

> 当事人是一些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机构(法人)和中产阶级分子[因此律师是]概念上的思想主义者……他们认为并因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重要关系……以及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式。(1983，pp.111—112)

律师分散地参加了资本的循环。

4. 分散也影响了专业组织。他们有的为国家或企业工作，有的操纵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在那些企业中，费用按照企业来划分，它们是一些垄断固定价格的公司)。准资本主义企业或准国家部门部分的行使专业权力。

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就这样对专业施加了分散的约束，它的直接的“生产过程”不同程度地有自主权。因此，就政治经济而言，专业人员一般是资本的忠实盟友。在再分配上，他们的利益与财富、安全、工作管理和较好的教育联在一起。在财产所有权上，他们反对集体控制。确实，在关于人道主义和道德问题上，他们经常是自由的，部分是由于优异的教育，在20世纪变得更加自由。在这些方面，半专业人员是更加自主的。他们的顾客更多了，在公民需要和社会控制之间，他们的专业角色经常受到干扰。他们依赖的教育，是一种普遍而非保护特权的教育；他们很少依赖财富和公司组织，他们的收入一般来说是比较低的，尽管生活非常舒适。妇女占很大比例。因此，一些半专业人员在20世纪温和地开展了激进的政治运动。

单一阶级的三个阶层

单一阶级的三个阶层都有不同的生产关系。正如在一些生产主义的理论中，如按照划分阶级位置的唯一标准，这将会产生三个分离的阶级。但是他们也都部分参与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那我就从资本主

义开始谈起。

1. 这三个阶层参与了经济等级制度。达伦多夫认为这就支持了一个分解的理论。在小资产阶级中从投资顾问到做散工的建筑工人，在专业人员中，从外科医生到小学老师，在流动职业者中，从市场管理到售货员——不同位置间的差别很大。然而这将中产阶级合成一个矛盾的整体。对流动职业者来说，这是明显的。“预期的社会化”确保了等级制度是各等级之间的共识。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的抱负也合而为一，大部分小商店变得更大，使它的顾客升级，发展了与更大的商业或更富有的消费者的共生关系。专业等级制度包括获得合伙关系和荣誉。所有这三个结构在整个中产阶级中向上流动。阻塞可能会使以前的流动职业者与温和激进的半专业者合并，但是等级间的流动性也把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捆绑到受纪律的对上忠诚上。

2. 中产阶级的消费不同(正如新韦伯派指出的)19 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参加了消费经济，购买了多种多样的食物和衣服，购买或更安全地租赁单独的住所，雇用女仆。家庭中的男成员在财产特权下通常有资格投票选举。利用更广泛的公民权，他们可能会控制当地郊区的政治。雇用另一个劳动力的能力就是一个重要的阶级标志。在 1851 年的纽约，60%的“小店主、较低的专业人员、农场主等”雇用至少一个仆人，相对熟练而实际非半熟练或根本不熟练工人的比例只有 10%(Armstrong, 1966, pp.234, 272—273)。我祖母对 1901 年的说法是：一个经营小型园艺业的男人，他没有工作的妻子要付给睡在厨房里的女孩“两先令六便士”的周薪(大约是一只鸡的价格)。

后来，中产阶级的独特消费被改变并最终下降了。累进的所得税和一战使国内服务减少。群众也逐渐被允许进入安全的多种多样的消费经济中。在除了一个特征(雇用仆人)之外的所有特征中，工人阶级的消费倾向于反映前十年或二十年中产阶级的消费。工人获得品种繁多的食品、衣服、安全的住所，住在郊区，汽车、保险抵押——甚至包括致癌物质——已经与中产阶级联在一起了。

3. 这三个阶层都把收入转变成小的投资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繁荣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见第四章)。在自己的小商业上投资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是必要的，有很多专业人员都购买了一项合伙企业或业务。流动职业者在他们的公司中得到股票，并可在咨询和投资中使用个人的专业知识。大多数人都能传给子女一部分资本。在英国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中产阶级的婚姻不同于工人阶级的婚姻，因为前者的父母能帮助购买房子，而后者的父母却办不到(Bell, 1969)。经过20世纪中期，占优势的中产阶级储蓄与职业抚恤金计划、保险和抵押等互相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欧洲更晚一些，这种投资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从工人阶级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储蓄债款和生活计划(住房、职业、退休)进入到资本循环的中心，并从资本主义的繁荣中获益。工人们没有积蓄，而且他们还经常向一些亚文化的赊买者(放债者)或当铺借款。中产阶级的积蓄与极富者的财产在形式上是相同的。

因此，无论他们的特殊性和内部的多样性是什么，中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在部门的等级中共同分享了资本主义：阶级消费标志以及将过剩的收入转成投资资本。1900年，中产阶级正在到处扩大、繁荣和参与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的模式。正如关于两者的德国名词：中产**阶层**、**团体**所揭示的，平民社会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也被意识形态与政治公民权相缠绕并部分定义。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公民权

前几章论述了出现在19世纪的“国家”是以现代化的旧政体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各个联盟为中心的，现代化者主要是一些自由的公务员和专业人员。很多国家组织都接触过产生于意识形态的公民权的话语能力网络。现在新的阶级需要政治上的公民权和意识形态上的公民

权，这主要是由国家资助或国家管理的教育，有助于将民族和国家合并成一个民族国家。[2]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产阶级的财富越来越依赖正式的教育。而小资产阶级却依赖的最少，但另外两个阶层无论与资本家还是与工人阶级相比都更多地依赖教育，尤其在一战以前。国家教育的扩展部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政府工作所需要的一项职能，正如前几章描述的。但是它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政府控制的要求和附属阶级对意识形态公民权的需求——揭示了阶级和国家的具体形态。经常作为中产阶级生活中心的“文凭主义”本身也是由这些所定型的。

在教育上的阶级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欧洲存在学校的三级分化(虽然美国除外)。由于教育几乎是普遍收费的，所以财富也按层次排列。最低水平的初等教育学校一般不是为中等学校做准备。它包括下层阶级全部的教育经验。中等教育然后分成了低级的“现代学校”和高级的“传统”学校，后者控制了大学的入学。德国大部分学校由国家控制。政府开办了传统的高级中学和现代的实科中学和职业中学，并设置了大学入学的资格必要条件(一般来自前者)和进入行政部门、专业的必要条件，法国政府控制了传统的公立学校、学院以及“专业的”——从1891年开始称为“现代的”——学校和他们所授予的不同资格证明。在整个欧洲，大学预科是典型的传统学校：对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的学习在1890年占了大学预科学习时间的77%。在英国大部分学校是私立的，但是在1902年后，国家控制增多了。三个独立的皇家委员会体现了英国的“三方面主义”。克拉伦登委员会(1861年)评估的是培养国家领导人的九所大的公立(意即私立的)学校。汤顿委员会(1864年)评估的是为“由包括最高层和最低层之间的人组成的英国社会的那些大阶级”所开办的学校。纽卡斯尔委员会(1858年)则是审查为“劳动阶级”的11岁以下子女开办的收费低廉的学校。

因为美国缺乏文化贵族和专业，也缺乏大的行政机构，所以它的公共教育是落后的。直到20世纪末，层化还没有波及到学校或大学，只

在很高层次上有所体现。甚至当大批学校出现时，阶级分离仍然受到学校问题上的政党民主政治化所限制。大部分学校是由当地政府办的，地方政府在美国联邦政体三个等级中是最民主的。南部的例外——只为白人办的有效率的学校——则保留了下来。

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已成为完全的或几乎完全的政治公民。这主要是教育扩展的结果，它使得中产阶级家庭能分享国家的文化生活，并把他们与工人和下层农民区别开来。教育一开始就包括女孩和男孩。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1913年之间，国家资助的初等教育和现代中等教育扩大了两至五倍，西方国家的大学生数量扩大了三倍。但是欧洲的扩大仍然是分开的。英国的男孩子大多在私立小学中所学的不过是“读一小段报纸上的普通文章，从听写中写一篇相似的散文，练习计算包裹单上的款数”。人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它能使男孩获得店员的资格，能参加国家的文化生活。只有少数工人子女能上这种学校，并非所有工人子女都能读会写。后来1870年和1902年之间的一系列教育法使国家的初等教育扩大，这使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子女出现了分层。工人的子女学的守纪律、诚实、清洁的内容和文化课内容一样多，而且他们的教育一般不是为中等教育做准备。中产阶级的子女包括许多姑娘，大部分升入中学继续读书。

教育扩大也使中等层次的职业从较高层次的职业中分离出来。德国较高的行政机关和专业塞满了来自传统学校和大学的人员；中等行政机构的低级专业人员和管理位置的成员则都来自现代学校；而那些从中学或大学辍学的人比那些完成学业的人更趋向于充当低级位置的成员——从现代学校中辍学的人填充了较低的白领职业。在法国和美国，同样的模式是明显的，只有一点例外，大部分金融业和商业的位置仍被受过一流教育的人员占据。在欧洲和美国大学中，存在着一种从商业网外流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商人子女比进入商业的毕业生更多。大学仍然是分层次的。古老的上流社会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常青藤大学联合会等等)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大学联谊会向那些可能成为“上

升的资产阶级”的人灌输传统价值。

因此，经过大学训练的专业人员、公务员和金融与商业的流动职业者便成为“有学问”和“有文化的”，而不像在他们下层以及在制造业中的人，只是在技术上有资格。教育隔离也把不同于大部分职员和销售人员的“经理”作为表面实用的类型分离出来。它让能读会写的中产阶级女孩大量进入这些位置。虽然被性别关系弄的模糊不清，但非体力劳动者更明显的与体力劳动者分离。职业阶级关系现在完全与教育隔离联在一起了。

参加该时期社会流动性激烈辩论的几乎所有撰稿者都同意教育隔离是统治政府有意发明出来的，它阻止了更大范围的向上流动。因为最高位置的增长远远少于中层位置和技术位置的增长，并且，因为教育正在扩展，统治政府意识到在“有学问”的职业中潜藏着过分拥挤现象。隔离因此成为保护自己子女的尝试。然而这并没有在中产阶级中招致大量不满。毕竟，中等水平的职业机会正扩大到极点，隔离也使他们免受下层的竞争，而且教育本身还规范了子女的思想，使他们形成对三层等级的忠诚：“传统学习”最高，“现代技术”次之，“能读会写”最低。

在 20 世纪，大部分正式教育的隔离结束了。所有的孩子们可以免费入学(除了最高水平的教育)，并且在形式上不靠任何背景取得了进步。一战后，教育也不再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专有。有选择的中等教育扩大了，接受了很多工人的子女。现在，阶级背景的影响变得不太直接了。20 世纪，在英国有选择的中学中，专业人员、经理和巨富的子女大约有 70%入学，低级的非体力劳动者子女有 40%入学；工人子女有 20%—25%入学(Little and Westergoard，1964；Halsey 等，1980，pp.18，62—69)。国际比较分析表明，各国在较高水平教育的不平等方面并无不同(尽管美国看来比欧洲国家更开放些)。20 世纪早期，所有的学校都允许工人子女入学，尽管中产阶级的子女占支配地位。首先是有选择的中等教育，将 20 世纪的中产阶级统一为整体。

上述情况都是在一个主题上的变异：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公民权的增长。经济权力依靠国家教育，并因此依靠争取公民权的斗争。中产阶级分享了意识形态的公民权，其内容和机会由他们中的较优越者来决定。

但是，教育不仅仅加强了阶级。它也加强了国家的**民族**成形。正如我全面论证的那样，政治斗争实际涉及了国家在任何阶段的**行为**。第十四章表明19世纪晚期教育是主要的国家增长和公民活动。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中央政府、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接管了私立学校或扩大了他们自己原有的学校，而将私立学校留作在增长的公立系统中的孤岛。因此这个时期可以看作世俗的中央集权国家同分权者和教会的地区宗派联盟之间的政治冲突(经常是很严峻的)。在已建立教会的国家，异教派联盟一般是乡土主义者和少数派教会的联盟，如在英国和德国。那些最依靠教育的人——首先是老师和政府的流动职业者，其次是别的专业人员，然后是私人部门的流动职业者——对世俗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变得更加忠诚，与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国家本身是多种形态的，而且中产阶级的人们也有地方区域和宗教社区的身份，那么正在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公民权和民族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

中产阶级政治的民族主义

我已经说明了经济权力关系将把中产阶级的男人们推向保守主义。部门统治集团的忠诚、繁荣、文化特权和自满，无产阶级化的稀少，资本家投资渠道的统一，在消费、文化和资本方面从工人中区别他们自己的愿望——所有这一切就鼓励了保守主义。我们不期待政治兴奋和极权主义，也不能预料无产阶级联盟或社会党人的同情，但是应当预料到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如果国家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没有别的具体形

态，中产阶级可能会使历史学家厌烦。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历史学家已经觉察到了在中产阶级中存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政治民族主义**。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每项关于民族主义和正在萌芽的国家压力集团的研究都表明，国家实质上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正如在别的非劳工自愿协会中，带着这样的先决条件：在压力集团中的最高位置被名人所占有)。但是这些研究事实上并不包括验证这种主张的证据。它们仅在德国是这样的，被引用的这些德国证据，确实表明了一个不同的模式。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鹦鹉学舌般地提出了有证明文件的另一个主张，然后继续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是民族主义的。

霍布斯鲍姆(1990，pp.121—122)，在捍卫他关于战前国家主义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主张时，实际参考了战后纳粹的证据。然而，甚至在那儿他也是错误的：纳粹证据证明了与战前德国同样的(非小资产阶级的)模式。科齐(1990)是一个例外，他承认他的关于谁是民族主义者的证据不带普遍性。想象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据说反映了焦虑、不安全和在祖国内对权威人物的渴望——是对经济集中和劳动侵占的“挫折”“不幸”及“地位恐慌”的反映(Howard，1970，pp.103—104；Wehler，1979，pp.131—132；Hobsbawm，1989，pp.152，158—159，181；Hobsbawm，1990，pp.117—122)。别人把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看作是通过转移灾难给外国机构的经济和性别失意的纯化。我拒绝接受小资产阶级经济行为是病态的理论(尽管解释得很好)。现在对于中产阶级的政治我持同样的观点。

病态理论注意到了一个共同的西方模式，是由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引起的。然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不是一致的。它也不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反映了——有时是夸张地——各种统治政体的两难境地。

我首先评价来自下层的威胁。从19世纪80年代，大量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接踵而至。第十九章表明农民政治并没有对中产阶级形成很大

威胁。相比之下劳工更成问题。然而在它的直接的生产关系中，劳工面对的只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抵制组织工会的权利。专业人员相对而言没有卷人资本——劳工的冲突中；尽管流动职业者有时卷人，但在劳动关系任何单独的解决方法中，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尽管经理和官僚可能会利用“资本的全球功能”(Carchedi, 1977)，但他们也会通过镇压或和解来解决问题。因为，实际上，工人政党寻觅的是共同主义和联合管理，而不是打败资本主义，所以经理和官僚支持他们。从他们直接的生产关系中，我们可能会预料到小资产阶级的敌对情绪，而不是不同的专业人员和流动职业者流动到劳工中去。

“政治经济”又一次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的经济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开始有了更多的冲突。如果工人在现实中正式拥有公民权，国家实质上将不再是中产阶级的。工人将在数量上超过中产阶级的投票者，并可能再一次引导政治、经济转向他们自己的利益。正如我强调的那样，政治通常将利益集中在国家的费用和收益上。

国家费用意味着岁人，现在则是在来自“国家财产”中潜在的递增的直接税和递减的间接税和岁人之间进行选择。正如第十一章表明的，尽管税收负担现在并不重，但税率是递减的。当军事消费在1890年之后上升时，工人和农民政党的反对声音更大。在20世纪，国家利益出现了相当大的转移，在传统的腐败意义上，“政府机关的果实”不再存在。但是官僚化意味着政府机关有助于受过教育的人的进人，并且最好的政府机关促成“有学问的人”的进入。在商业和制造业中的流动职业者的位置是这样，专业人员的垄断也是这样。技术学历体现在一个全国性的文化生活中。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妇女)能够参与这样的文化生活，而工人却不能。劳工运动对意识形态上的公民权的需要增长了，这就是说比起来自政府的任何其他东西来说，教育是劳工运动更需要的，当然工会组织的权利除外。但是，因为政府正在获得很多别的国内职能，其他政府服务也变得有利可图。劳工只是开始寻找

对其自身的直接服务，并把国家控制转移到别的服务中去(例如《济贫法》进入到社会公民权之中)。在政治经济上的冲突直到一战晚期才变得很剧烈，但是它在1900年业已出现。国库岁入的再分配和普及教育现在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

但是，这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并很少导致领导阶级的反对。在美国，其主要阶级政党并不是按阶级划分的，在英国和法国，只是有一部分按其划分。别的政治形式与阶级冲突交织在一起，在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各不相同。科克(1980)证明尽管美国白领工人看起来根本不害怕无产阶级，但德国的白领工人仍很害怕。两个美国"阶级"加入到同样的政党——并且，即使美国职员感到伤心，他们仍加入到类似的工会中。但是德国职员却加入到敌对工人的政党和工会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彼此是阶级的对手。在英国和法国，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落入到两个极端之间，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各国间不同的结果是由于阶级和政治经济主要跟三种政治定型交织在一起。

1. 在19世纪期间，虽然中产阶级获得了政党民主，但是它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获得的。到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更早)，在所有的三个自由党的国家中，中产阶级有完全的政治公民权。到1900年，他们的选举很少被名人和部门赞助的当事人的政党控制，而是由大量的有会员资格的政党和压力集团所控制。群众集会和与个人无关的竞选主要是针对中产阶级的。在澳大利亚和德国，财产投票权以及有限的议会主权赋予更少的党派民主和政府行使更多的分而治之的权力。中产阶级被允许进入政府的只是政党，而工人阶级却被排除在外并遭压迫。在奥地利分而治之也使一些民族卷入，且有时将爱国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美国处在相反的极端上，没有阶级排斥现象。英国和法国处在中间。英国公民权的扩张正好贯穿了整个19世纪，法国情况是多变的，只有在19世纪80年代，才形成按照财产分配公民权的制度，但是，并没有纯粹分离出阶级。例如1900年，大部分有技能的工人与中产阶级一起拥有投票权(和集体组织权)，然而没有技能的工人却没有这种权

利。美国政党民主政体包括了跨阶级的联盟；在英国和法国，部分是这样；在德国和奥地利(不过如此而已)，则是按阶级划分的。

因此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经济使得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其次是法国和英国，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少发生。有着相同的经济权力关系的中产阶级对较低阶级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们被分别融入到政党民主中。

2. 正如前面几章证明的，教育也涉及到多种**国家**形式，集中在宗教和地区的网络系统中。这为跨阶级的联盟创造了很多可能性——例如，世俗的中央集权之间的进步联盟(法国)，世俗主义者和少数宗教派别之间的联盟(这种联盟在德国永远不能成为现实，但这种可能性却深深地影响了那里的民族主义)。这些联合体实际上支配了奥地利的政治，使得阶级、地方政权和宗教缠绕在一起，更广泛得多地威胁到国家。

3. 战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因为国家**军国主义**的形式是如此不同。美国是扩张主义者，但并不反对其他列强。英国起初只是期望保持全球自由贸易和保卫它已经形成的全球帝国，但是，不久即转向加强防备正在崛起的德国强权。当法国和其邻国的领土看起来受到德国威胁的时候，它从领土扩张转向了防御模式。尽管这个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看成是侵略者，但奥地利和德国政府渐渐认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模式。对跨国的民族主义(奥地利)和被(德国)包围的恐惧，导致它们陷入更加好斗的地缘政治中。如果在各国不同的地缘政治氛围中，中产阶级到处拥护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那它确实是中产阶级不合理性的妄想狂的特征。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所有这三个政治形态与阶级冲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非比寻常的民族主义。

美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扩张，并没有冒与别的列强进行战争的危险。美国只是击沉了西班牙笨拙的军舰。因为美国在卷入古巴、菲律宾和中国时，是小规模的，冒的风险不大，那里没有支持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动员。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是软弱而特殊的。帝国主义更多

的是被总统权力所驱使，并得到那些有利害关系的参议员，像马汉海军上将那样的地缘政治家、一些报业巨头、传教团体和(尤其)一部分对该地区有兴趣的商业集团的支持。但也受到一些形形色色人的反对，这些人是另外一些特殊的商业团体、自由党人、企图避免跟非白人发生纠纷的种族偏见者，以及欧洲军国主义和征兵制度的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Lasch，1958；Healy，1963，1970；LaFeber，1963；Beisner，1975；Welch，1979；也可以参看 Hollingsworth 的散文，1983)。里斯塔德(1975，p.167)有些不同意见，他强调了这个时期在民主党中增长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但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政治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国家教育实质上促成了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美国学校的稀疏和地方控制可能使民族主义减弱。

在 19 世纪的美国并没有多少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英帝国正处在好的时候，不需要国民的防御。印度的强硬抵抗遭到了小型专业军队的反击。这些军队靠在印度征集的兵源——由其他地方土著人组成的分遣队增强了攻力。关于“我们”是谁的英国民族主义，是更坚定的统一信念而不是分裂(尽管有特殊的英格兰——不列颠、苏格兰——不列颠等等的双重身份)。英国和美国都发明了相当理想化的、自由和表面上爱好和平的民族主义。英国在全球传播了文明、议会和大不列颠的和平，美国提供了“在山顶上的城市”、“地球上最自由的人们”这些闪闪发光的指路明灯。这两个国家都实施了相当大的反对“土著”的野蛮行为。但是在政党民主中，并没有人看到攻击其他列强的很多特征。(我调查了第二十一章中“自由党”的政府是爱好和平的一般论据。)

在 19 世纪的法国存在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但在中产阶级中是很少的。的确，伟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创造了流行的帝国主义，但是 1815 年之后，它后悔了自己的卤莽。中产阶级对由君主政体、路易·波拿巴和试图在国外寻求利益的经济压力集团所信奉的帝国主义保持了相当的漠然。它正在努力奋斗以使共和政体免遭暴力。当胜利最后于

1870年降临时，中产阶级为共和党人，仍然是反对教会并主要是反对军国主义的。流动职业者和专业人员的中产阶级集团特别忠诚，因为各种教育机构坚定的拥护共和政体。相形之下，小资产阶级组织从19世纪90年代起转向右倾，向着社会天主教教义和保守但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发展(Nord，1981)。但是，在法国，民族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空论，就忠于共和国的意义而言，教师和公务员似乎一直都是最“爱国的”。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教育慢慢变得世俗化和标准化，整个国家都在灌输共和政体的美德(Moody，1978)。在法国乡村和城镇中极具人格魅力的学校校长极力颂扬共和国、爱国主义和世俗的公民义务(Weber，1976，pp.332—338；Singer，1983)——但并不是攻击性的：教科书里对其他西方大国敌视的内容很少，尽管书中教育人们，法国对于教化落后人种有特殊的文化义务(Maingueneau，1979)。

妄想狂患者的理论忽略了自由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功和它颂扬民族主义的心境。在英国，它更多的关注道德、浪漫和感情而不是更加激进；在美国，它更积极地肯定自由和个人的男子汉气概；在法国，实质上是现代和世俗化的。这种中产阶级，地位上升并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把统治阶级的国家变成了民族—国家。它们的民族主义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成功而不是失败。

对美国来说社会地位平等一直持续到一战。但是1900年，英国和法国的民族感情发展得有些更具军国主义色彩，因为德国想做大国的野心似乎在膨胀。法国在1870年至1871年间受到侵略并被打败，1900年后，很多法国人再次感到了威胁。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左派一直是爱国主义的代言人，但现在已为右派所取代——尽管其君主制度和神职制度削弱了爱国主义的要求。法国的中产阶级也分裂成为两个看似敌对的阶级，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它对旧政权的厌恶，引导它将大的激进党与左派建立了联盟，以确保世俗教育的政府和民主党对军队控制的成功。一旦成功了，仅在1900年后，资产阶级政党就有些转向右派，同时德国的威胁又一次出现，这将民族主义从全球的殖民扩张转

向地区的国家防御。那些更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政党在战前大大缩减(尽管大学里仍有很大影响)，因为共和党和激进的中间派和类似的法国政府变得更加爱国，同意重整军备。但他们的爱国主义绝对是防御性的：重整军备以对付预料中的德国进攻。许多法国爱国主义者(有点过度自信地)在狂想：这将导致阿尔萨斯—洛林的收复，但主要的政治家不提倡进攻德国(所有这些人都受惠于E.Weber，1968的著作)。他们调和政治、经济和征兵制度的冲突，只是及时巩固了1914年防御努力的成果。法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阻碍了政府，而是再次鼓舞和挽救了它——有较大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因此使民族国家得到增强。

安全和自由竞争的英帝国主义，采取了自由和表面上爱好和平的意识形态。在1880年以前，帝国主义刚刚形成，还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仅有的几次游行示威有的是由抨击帝国政策或研究政党政治的人道主义和宗教团体所组织的，有的是由与国外或与扩张的军队有经济利益的压力集团组织的。1885年戈登将军死于苏丹，标志着“土著”更顽强抵抗的新阶段，从而引发了最早的帝国主义的街道游行示威。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是一个“受欢迎的医治商业萧条和失业、缓解国家不安全和确保未来繁荣的政治改革方案”，罗宾森如是说(1959，p.180)。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起先更多地集中在反对“土著”，而不是反对欧洲的感情上，但是法国、德国也先后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帝国主义和“对民族效率的要求”影响了两个政党，在这个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引起了共鸣。自由帝国主义者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身心健康和教育以此来发展民族力量；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海外帝国和权力方面。我在第十四章中说明这一切是怎样打算为广阔的国家重新集结家庭和母爱主义的强烈感情。

1900年后，种族偏见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矛盾情绪。它较早且清楚地表达了欧洲对于“落后”人民的优越感(有时混合着脆弱性)。用自然科学的有共同性的生物群体来解释人种：白色人种统治黑色、棕色和黑

色人种。尽管帝国主义的种族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滥用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它同样是遍及全国的。但是日益增长的社会密度、国家基础和语言有时也是宗教的社区，现在也给种族偏见一个民族定义，尤其是在政府增强的民族中(现在为止也包括德国)。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条顿人和斯拉夫人来说，“种族”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发展了一段有共同世系的虚构历史。在20世纪里，在讨论帝国问题和关于同德国甚至与美国竞争的问题时，英国政治家和受欢迎的作者以很普通的方式，用单词“种族”来指英国人。因此种族主义在政府和民族之间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因为欧洲一直是分裂的。

但是，从一个常识性的民族种族概念到进一步倡导侵略的准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大相径庭的。就当代生物科学而言，与其说可持续的种族主义，倒不如说是优秀的种族主义。在英国，它有时由报业巨头和右派压力集团像海军联盟、全国服务同盟、帝国海上同盟和樱草花联盟所支持。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这些压力集团有中产阶级的根，尽管没有人提供这些成员和参与政治活动者的阶级成分的证据(Fieldhouse, 1973; Fest, 1981; Summers, 1981)。预备役军官、预备役和训练团、男童子军和国际文化组织提供了被认为主要是中产阶级的更体面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茁壮成长(Kennedy, 1980, pp. 381—383)。最近科齐(1990)的研究显然被这个“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模式所吸引，然而由于证据缺乏而使其谨慎。实际上库切关于在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内部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者的有限数据证明，该集团已被退休的军官、传教士、记者和有特殊物质利益的商人所统治。曼根(1986)已经指出，帝国宣传主要是在当局者的子女所在的公学(即私立的)中传播，这些学校不是中产阶级的子女所在的学校。当我转向有文献记载的德国民族主义时，我将给压力集团的成分作一个不同的解释。

普赖斯(1977)毫无根据地认为好战主义是下层中产阶级的。然后他用以下的术语解释了这一点，即中产阶级面临封闭的流动和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所引起的地位恐慌。我已不接受他论证的经济基础——这个

时期的下层中产阶级正顺利发展——然而接受工人阶级就可能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产阶级可能希望保持这个国家是它们自己的，保持税收下降，保持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

但在英国的政党民主中，阶级动员起来的地区、宗教和部门的国家形态相互交织在一起。保守党领导层不同情工人并反对很高的社会支出；但是它仍维持的是国教会和农业与附属于农业的商业费用，并支持军队的开支。因此，英国中产阶级分裂了。它的制造业人士，不信国教者和凯尔特文化的保卫者们，还有很多的专业人员，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高尚、自由的自我构想中，被教育而呆在自由党中。一些人信奉了罗斯伯里或霍尔丹的自由帝国主义。但是其他人却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看似由专业人员统治，并督促与劳工达成选举上的协议。这就鼓励了工业主义者的进一步背叛，鼓励一些所谓的"上层中产阶级"转向保守主义。然而党内仍存在阶级紧张关系。尽管自1906年以来，有一个真正的左派再分配政党，也即"不信国教的商人在众议院中仍是自由党的支柱。"(Bernstein, 1986, p.14；参阅 Clarke, 1971；Emy, 1973；Wald, 1983)。中产阶级的自由党人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仍井水不犯河水。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压力集团与右派保守圈子有紧密的联系——有的与官方保守党保持联系。他们与那些同与自由左派有联系的国际和平主义者进行竞争。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人数有所增长，因为德国的行为看起来证实了他们的论点，但在1914年，尽管自由党内阁里有反战派，但更多的人却与之相反。

确实，英国政府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两难问题：是保持旧的注重道德民族自由主义还是加强军国主义。但是，这儿有个**防御警备**的折中立场：如果受到攻击我们就应战斗，现在就准备我们的**防御**。这成为像尼科尔森和艾尔·克罗的外交家和两党领袖的观点。在坚定的全国防御政策上，他们同意温和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因此，大多数英国民族主义者既不特别好战，也明显地不属于中产阶级——虽然也不是工人阶级(见第二十一章)。

1914年，英国自由党政府与其说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它自己的极端和平自由主义所左右。如果当权，保守党可能受到党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正如在德国那样)。英国的中产阶级仍然是忠诚的——但只是对它的模棱两可的国家形态忠诚。我认为受过最高等教育和政府的流动职业者都患有“超级忠诚的精神分裂症”，受他们国家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新的帝国主义影响。我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这将与有充分证据的德国的结果相似，后面将详述之。这也与政府流动职业者的国内政治相似。很多人讨论了民族国家的自我形象，因为它能够将妥协和实用主义的发展独特地融为一体，它们在调和阶级冲突方面比政党领袖所希望的更出色(如我们在第十七章将要看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政府流动职业者使得国家竞争的学说超国际化了，令他们的政治头子感到很不舒服。然而，一旦两党进入战争，中产阶级便会团结起来(除了一些勇敢的和平主义者)，忠诚地抛洒热血——使得英国的民族国家进一步地走向没落。

在德国和奥地利，融合着阶级、民族和君主主义的国家形态产生了中产阶级不稳定并最终不忠诚的民族主义(在第十章论述了奥地利)。因为阶级和民族彼此交错并对政府保持忠诚，所以也没有任何一方单独对哈布斯堡提供充分的支持。同样，在19世纪晚期，政府内部故意互相挑拨离间，有附属阶级和民族的地方，就有狭隘的统治者。对阶级和民族的支持仍然是老谋深算的。地区中产阶级很少有明显的等级制度，在此基础上把保守主义和忠诚拴在一起。正如从本章讨论中我们可以预测的那样，奥匈帝国中产阶级没有攻击无产阶级的社会党联盟。但是也产生了其他联盟。一些中产阶级贵族(尤其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专业人员和地方官僚)控制了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他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农民、非社会党工人和民粹党中的下层中产阶级，以及与社会基督教的异教者尤其是德国人和(捷克人)组成联盟，其他人(大部分在落后省份和匈牙利)与反对哈布斯堡的当地旧政权联盟；此外制造商、金融家、公司经理和中央政府官僚(尤其是奥地利的日耳曼人或犹

太人)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及其最后的侵略。要分析上述情况，会浪费很多篇幅，但是中产阶级忠诚的保守主义很少发现一个合适的对象。奥匈帝国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有些保守和明显带有侵略性的，但总是令人兴奋的是，通常总有国家被推翻——战争失败后，导致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的兴起。

德国分而治之的形式也不一样，政府为了不让劳工和少数种族进入政权，因此把中产阶级带入政府的边缘状态。这就致使中产阶级向右转反对工人阶级；也使北部和路德派的中产阶级(和农民)转而效忠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而天主教徒和南方却转成了温和的地方-地区的不忠分子。但中产阶级的政党被挡在政府的核心之外，这就使旧政权和资本家占优势。比如不像自由党国家，奥地利的群众政党没有控制政府。因此，尽管中产阶级强烈反对社会党，以保守主义及民族主义为主，但它并不能与现在的政权强烈区分开来。它的自治也得到其独特的公司组织的支持。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政治有时是激进的，一般是反对无产阶级的(Gellately, 1974; Winkle, 1976; Blackbourne, 1977; Kocka, 1980)——它的自治作为其敌人的反对力量甚至受到君主制分而治之的鼓励。

1900年之后民族主义者的压力集体具有影响力，因为德国人对被包围的恐惧在增长。到1911年，殖民团体、日耳曼联盟、东部边界协会、海军联盟和防御联盟比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有更大更多的发言权。有些较小的压力集团(老兵协会、青年德意志联盟)是政府宣传的力量。有些(东部边界联盟)是与容克、军队和法庭相联系的单一问题的集团。但是这个最大和最有毅力的团体(海军联盟和泛德联盟)成为自主的，它受人欢迎并具侵略性，限制了政府和政党，不采取外交和解政策。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起先蔑视这样的民族主义，后来在选举压力下，两党逐渐衰落了(Eley, 1978, 1980, 1981)。

因为在这些压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工人，在大多数压力集团中也没有农民，因此通常把它们描述为中产阶级的团体(Wehler, 1979;

Eley, 1981)。然而数据(Eley, 1980, pp.61—67, 123—130和Chickering, 1975表5.1—5.2;参阅Kehr, 1977)允许更大的精确性。

最大的是海军联盟。它由富商、教授和前军官组成,它的全国领袖仍然是贵族。在1900至1908年常务委员会26个成员中,有10个大商人,5个是土地贵族,9个是前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1个是教授,1个是退休的公务员。这些人都是大学毕业生。1912年,在9 000个分会官员中,20%是较高的政府官员(经常是市长和县长),19%是教师,18%是中层和低层的行政官员(尽管如德国经常的统计中,这个种类包括很多在私人部门的办事员),11%是资产阶级,9%是专业人员,8%是土地所有者和前军官,8%是企业主和经理;还有一些神职人员、技工和农民,实际上没有工人。国家雇员的过多代表是惊人的——占2%到3%和50%到60%的海军联盟官员(包括教师和一些新教教士)。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他们提高了的教育水平:1%的人口和61%的地方领导者在大学水平的学校中学习过。

泛日耳曼联盟也同样是不平衡的:在将近2 500个地方领导者中,没有农民、工人或技工。大约66%的人接受了大学水平的教育,54%是国家雇员(其中一半是教师),长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者甚至更不平衡:77%已经参加了大学水平的学习。奇克林证明:在所有的民族主义压力集团中,大多数公务员都来自中层到高层的行政部门,但没有人来自最高层。

东方边界协会以乡村居多的东普鲁士为中心,拥有更多的农民和技工,大约各占20%。但是,即使在这里,公务员和教师也都占优势。在1894—1900年26个分会抽样中,他们占会员的近50%,后来这个比例上升。仅仅是教师就单独提供了10%—14%的会员,在协会工作人员中,在总委会中占25%,并且别的公务员占了总委会的30%。在奇克林的当地协会领导人的抽样中,74%的人上过大学水平的学校。

其他组织的普通成员成分有相当大的臆断。埃利认为海军联盟拥有比例不相称的小资产阶级,但没有说明原因;奇克林猜测泛日耳曼联

盟主要还是中产阶级的，尽管来自受教育人士和公共部门的人不成比例。所有的压力集团实际上都来自德国北部和路德教区。天主教乡村和天主教小资产阶级相对没有受社会帝国主义的影响(Blackbourne，1980，p.238)。路德教是普鲁士的官方宗教，因此有点国家主义。

请允许把奇克林(1975，pp.73—76)对温和的和平运动的研究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作一个有趣的比较。大多数和平主义者来自“非农村的中层到低层的中产阶级”，以小商人和企业主为最大群体(尤其是做海外生意的人)，然后是来自小学的教师和专业人员。与地位恐慌论非常相似但是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平主义者。妇女也构成了1/3的成员。然而民族主义的压力集团主要是男性成员。奇克林得出结论：和平主义者主要是那些在民族国家的主要机构——官僚机构、大学和军队中被免职的人们。

国家教育正式来说是民族主义的，学校被认为要鼓励一种民族军事感。正如皇帝在一个会议上告诉教育工作者说：“我正在寻找战士。我们需要有活力的一代，他们能担任有智慧的领导人和国家的官员”(Albisetti，1989，p.3)。小学教师是否服从皇帝还不清楚。很多学校(大部分在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进行了抵制，出身工人阶级的小学生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得到过这些信息。国立中学的老师作出了努力，在中产阶级学生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孩子们的热情很少集中在政府和皇帝身上，而是更多地集中在抽象的人民和帝国上(Mosse，1964；Albisetti，1983；Schleunes，1989)。大学的影响最大，失去了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色彩。人道主义的概念培养了受腐蚀的教育。学院鲜明的主张国家主义，尽管只有少数人直接在政治上活跃，但这些人大都是右派。学生社会生活出现了“保守—忠诚的”学生团体，学生联谊会以及别的民族主义学生组织的增长。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影响，自由主义也衰落了。“学术青春的‘精神重生’所集中注意的并不是目前的政府而是两个标语，德意志民族主义和世界政治”(Jarausch，1982，p.365)：因为两千万德国人正住在国外，帝国应当扩大。国家教育不仅

仅是对政权的忠诚社会化，而且是一个更抽象的民族主义。

因此，并不是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政府雇员(对国家依赖性最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路德教徒(最多地融入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可能成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奇克林(1984，pp.107，111)指出这些男士是皇权文化的监护人，然而他们也许正在远离皇帝。小资产阶级并不专门是民族主义的政党成员。技工、农民和小商人的旧的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人新的中产阶级两者也都不能很好地被民族主义所代表。

这就将民族主义置于一个极其不同的情况中。也许我们应当真的称它为"国家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另外这些运动的情形很少与地位恐慌的妄想狂患者的理论所描绘的消极形象一致。它体现的不是政权核心而是国家内部部分人过度热情的超级忠诚的民族主义。一个特殊的压力集团已使从中层到高层的国家殖民化。它们正督促政府履行其已被争论过的真正价值，因当前要求实行的国内政治的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和皇帝本身的局限正在起破坏作用。超级忠诚主义并没有把它本身看作是焦虑或反动的，而是看作轻快、牢固而现代的，带着一个未来的形象——一个真正流动的统一而团结的民族国家，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而且一定没有君主政体)是这样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少数民族和社会党人正试图破坏国家统一。但是如果政府把它的首脑交给真正的国民，他们将可能被扔到历史的垃圾箱中。让这些民族主义者肩负未来的历史重担是不公平的。大多数人并不打算给德国当局造成实质上的极大伤害。只有当旧政权在1918年崩溃且魏玛的那些敌人变得更强大时，他们的继承者——现在得到更多的农民和资本家的支持，但仍然集中注意国家和路德教义问题——就变得极端卑鄙无耻。

经过所有这些变化，现在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至少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与公认的观点相比，出现的民族主义很少是中产阶级的，更明确地具有中央集权制的特色。中产阶级的所有三个阶层在阶级问题上对它们的政权都表示了忠诚。然而它们的政治观点是变化的。因为宗教和地区的身份影响了它们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民族主义者大

部分是由政府流动职业者、受过较高教育的流动职业者和专业人员形成的。但是它也随政体特征而变化。民族主义有时过度热情地夸大了对政府的偏爱，产生了主张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但是甚至在德国，这也仅仅是要求一个表面上积极的旧政权为它的花言巧语负责，并变得更像民粹主义者。英国和法国在外部威胁下，产生了凝结起来的党派化的民族感，以巩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奥地利和美国党发展了民族主义的独特变形，一个目标是反对政府，另一个仍未被地缘政治的清慧声音所唤醒。这些变形并不是从直接的生产关系中产生——因为后者在国家中是恒定不变的，而是由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民权交织而成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多于经济性，然而政治使国家分派，减少了“它的”内聚力。我在第二十一章解释一战的起因时，将证明这一点是重要的。

结论

中产阶级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已有一百年了。只有两个中间群体无产阶级化，并且这两个群体都没有给中产阶级造成多少混乱。大部分技工那么早那么完全地就无产阶级化了，以至于他们对中产阶级未留下什么烙印。后来，办事员、售货员和一些没有职业前途的技术工作变得与体力工作一样，然而，他们中占优势的女性职员几乎没有经历无产阶级化。如果低层白领工人比体力劳动者更少参加劳工运动，这并不是假定的中产阶级地位意识，而是因为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在体力工人中也减少了参与：较高比例的女工，占优势的雇工组织以及在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地区。中产阶级一直被无产阶级化；中产阶级“分裂”的出现主要反映了性别的差异。

男性占优势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三个阶层，每一个都由独特的生产关系所定义：小资产阶级、公司和官僚政治的流动职业者以及专业人

员。他们是中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因为他们拥有了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弥散的特征。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在等级制中参与分层的职业和市场关系、特权消费的标志和把收入转化成小的投资资本的能力。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们也共享了与国家教育相联系以获得就业权利的意识形态的公民权并享有拒绝接受在他们以下的人们的政治公民权。民族平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受到资本的支配，由中产阶级下属水平的人来充职员。到1914年，在联邦制度化的地方，正如在三个政党民主政体中，大的阶级变动没有发生。随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公民权主要以中产阶级的民族公民权的模式而制度化。

在与劳工的斗争中，中产阶级大体上始终对资产阶级表示忠诚。没有一个国家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联盟相接近。当它们能够跟非阶级的、像宗教和地区那样的政治团体建立联盟时，它们的距离最近。下一章将集中论述劳工和农民怎样勇敢地对付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极大的限制了他们的选择权。然而，我并不希望陷入这样的陷阱中：认为中产阶级只是与资产阶级和劳工(加上农民)有关，为此我批评过陷入这种陷阱中的其他人。不能把中产阶级降为仅仅是资本主义和政权的忠实仆从。20世纪初，它也是民族国家的主要支持者。此外，两个阶层——政府流动职业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职业者以及专业人员——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独特拥护者。

美国、英国和法国没有中产阶级社会党人(直到20世纪中期国家职业的扩展)，但是，产生了一些关于民族国家的相当有竞争力的观点，从保守的(尽管有点防御性)民族主义到自由的和平主义。在整个奥匈帝国和德国，中产阶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国家的流动职业者，都表示了更加自主、好战和抽象的民族主义，且能戏剧性地转而反对统治政权。在奥匈帝国这一情况现在发生了。在德国，超忠诚的国家主义已使政府不舒服，而且在不到二十年之内就转变成了革命。“一战”强化了自由国家中的民族建设，也激化了别的国家关于民族含义的冲突。业已证明，民族—国家和各民族与资本主义和阶级一样对

20世纪文明的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产阶级为20世纪文明的出现配备了成员，它那更具国家主义的各阶层充当了它们最激烈的有时是破坏性体制的成员。

中产阶级的出现与独特的权力来源有关，它有自己的组织和集体意识——通过“不纯粹的双重信条”所概括的一种关系，即分散的资本循环所产生的在组织上部分中间参与和在权威的民族—国家里更独立多变的参与。分散的资本主义和权威国家的相互作用再一次塑造了现代社会。

注 释：

[1] 其他经济因素的威胁，如通货膨胀或税收政策，可能也导致了20世纪20—30年代小资产阶级的混乱。但在1914年之前，即在本卷涉及时间范围内却没有这种状况。

[2] 关于19世纪的教育，材料来源如下：英国：穆斯格罗夫(1959)、珀金(1961)、史密斯(1969)、萨瑟兰(1971)、米德尔顿和魏茨曼(1976)、赫特(1979)、里德(1987)、西蒙(1987)和斯蒂德曼(1987)；法国：哈拉金(1975)、吉尔德(1980)和明奇(1987)；德国：马勒(1987)和哈劳斯德(1982，1990)；美国：克鲁格(1964)、科林斯(1979)、科克(1980)和鲁滨逊(1986)；还参照了林格(1979)、凯布尔(1981)和霍布斯鲍姆(1989：6、7章)的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 and J.Urry. 1983. *Capital, Labour and the Middle Classes*. London: Allen & Unwin.

Albisetti, J. 1983. *Secondary School Reform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rmstrong, W.A. 1966.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early census returns. In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E.A.Wrigle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Aronowitz, S. 1979. The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or middle strata?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P.Walker.Boston: South End Press.

Bairoch, P.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in English and French).

Bechhofer, F., and B. Elliott. 1976. Persistence and change: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7.

Beisner, R. 1975.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 Arlington Heights, IL: Harlan Davidson.

Bell, C. 1969. *Middle Class Famil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erger, S. 1981. The uses of the traditional sector in Italy. In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 ed. F.Bechhofer and B.Elliott. London: Macmillan.

Berle, A., and G. Means.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Bernstein, G. 1986. *Liberalism and Liberal Politics in Edwardian England*. Boston: Allen & Unwin.

Bertaux, D., and I.Bertaux-Wiame. 1981. Artisanal bakery in France: how it lives and why it survives. In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 ed. F.Bechhofer and B.Elliott. London: Macmillan.

Best, G. 1979. *Mid-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Fontana.

Blackbourn, D. 1977. The Mittelstand in Germ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871—1914. *Social History*, no.4.

Blumin, S. 1989.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American City, 176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th, C. 1886. On occupations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01—1881.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49.

Bruchey, S. 1981. Remarques complétant les conclusions générales [and] Etats Unis.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Burnham, J. 194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London: Putnam.

Cain, M. 1983. The general practice lawyer and client: towards a radical concep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ed. R.Dingwall and P.Lewis. London: Macmillan.

Carchedi, G. 1977.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handler, A.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man, S. 1981. Royaume-Uni.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Chickering, R. 1975. *Imperial Germany and a World Without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PanGerman League, 1886—1914*. Boston: Allen & Unwin.

Clarke, P. 1971. *Lancashire and the New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etzee, F. 1990. *For Party or Country: Nationalism and the Dilemmas of Popular Conservatism in Edwardian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1981.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Crew, D. 1973. Definitions of modernity: social mobility in a German town, 1880—1901.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1979. *Town in the Ruhr: A Social History of Bochum, 186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rossick, G. 1977. The emergence of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a discussion. In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1870—1914*, ed. G.Crossick. London: Croom Helm.

Cunningham, H. 1971. "Jingoism in 1877—1888." *Victorian Studies* 14.

Dahrendorf, R.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The service class. In *Industrial Man*, ed. T.Burns.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Ehrenreich, B., and J.Ehrenreich. 1979. The profession-managerial class.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 P.Walker.Boston: South End Press.

Eldridge, G.C. 1973. *England's Mission*. London: Macmillan.

Eley, G. 1978. The Wilhelmine Right: how it changed.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ed. R.J.Evans. London: Croom Helm.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ome thoughts on the nationalist pressure groups in Imperial Germany. In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ed. P.Kennedy and A.Nicholls. London: Macmillan.

Emy, H.V. 1973. *Liberals, Radicals and Social Politics, 1892—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st, W. 1981. Jingoism and xenophobia in the electioneering strategies of British ruling elites before 1914. In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 ed. P. Kennedy and A.Nicholls. London: Macmillan.

Fieldhouse, D.K. 1973.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Freidson, E. 1970. *Profession of Medicine*. New York: Dodd, Mead.

1975. *Doctoring Together: A Study of Professional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Elsevier.

Gaillard, J. 1981. Franc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Galanter, M. 1983. Mega-law and mega-lawyering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In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ed. R.Dingwall and P.Lewis. London: Macmillan.

Galbraith, J.K.1985.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4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eiger, T.1969. Class society in the melting pot. In *Structured Social Inequality*, ed.C.S.H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Gellately, R. 1974.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Sage.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Gildea, R. 1980. Education and the classes Moyenn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Making *of Frenchmen*, ed. D.Baker and P.Harrigan. Waterloo, Ont.: Historical Reflections Press.

Goldthorpe, J.H. 1982.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formation and future. In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d.A.Giddens and G.Mackenz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e, W.J.1969.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he Semi-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ed.A.Etzioni. New York: Free Press.

Gray, R.Q. 1977. Religion, culture and social class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dinburgh. In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1870—1914*, ed.G.Crossick. London: Croom Helm.

Grossmith, G., and W. Grossmith. 1892 and 1965. *The Diary of a Nobod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Halsey, A.H., et al. 1980.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rigan, P. 1975.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s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

Harrison, J.F.C. 1971. The Early Victorians, *1832—1851*.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art, N. 1985.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Medicine. Ormskirk, Lancs.: Causeway Press.

Haupt, H-G. 1981. République Fédérale Allemand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2 vols. Paris.

Healy, D.F. 1963. The United States in Cuba, *1898—190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U.S.Expansionism: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obsbawm, E. 1989.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Vintage.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ngsworth, J.R.(ed.). 1983. *American Expans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ist or Anticolonialist?* Malabar, Fla.: Krieger.

Howard, M. 1970.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his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Temple Smith.

Hurt, J. S. 1979. Elementary Schooling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60—191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Illich, I. 1977. Disabling Professions. London: M.Boyars.

Jaeger, C.1982. Artisanat et Capitalisme. Paris: Payot.

Jarausch, K.H. 1982.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Rise of Academic Illiber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German professions in history and theory. In *German Professions, 1800—1950*, ed.

R.Cocks and K.H.Jaraus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T.J.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Joll, J. 1984.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Kaelble, H.1981.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in Europe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ed.P.Flora and A.J. Heidenheim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Kaufhold, K.H. 1981. République Fédérale Allemand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ᵉ et XXᵉ Siècles*, 2 vols. Paris.

Kehr, E. 1977.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nnedy, P.1980.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Kiyonari, T. T. 1981. Japan. In th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ᵉ et XXᵉ Siècles*, 2 vols. Paris.

Klingender, F.D. 1935. The Condition of Clerical Labour in Britain. London: M.Lawrence.

Kocka, J.1980. White-Collar Workers in America, 1890—1940. London: Sage.

Krug, E. 1964.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New York: Harper & Row.

Kurgan van Hentenryk, G. 1981. Belgique.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Petite Entreprise et Croissance Industrielle Dans le Monde Aux XIXᵉ et XXᵉ Siècles*, 2 vols. Paris.

LaFeber, W. 1963.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sch, C. 1958. The anti-imperialist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inequality of ma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4.

Lash, S., and J.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Little, A, and J.Westergaard. 1964. The trend of class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5.

Lockwood, D. 1958. *The Blackcoated Worker*. London: Allen & Unwin.

Mackenzie, W. 1979.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Health C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Keown, T.1976.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London: Arnold.

Maingueneau, D. 1979. *Les Livres d'école de la République, 1870—1914*. Paris: Sycomore.

Mangan, J. 1986, "The grit of our forefathers": invented traditions, propaganda and imperialism. In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ed. J. MacKenzi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yer, A.J. 1975. The lower middle class as historical problem.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

Middleton, N., and S.Weitzman. 1976. A Place for *Everyone*. London: Gollancz.

Mills, C.W. 1953.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dy, J. 1978. *French Education Since Napoleo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Moore, D.C. 1976. *The Politics of Deference*. Hassocks, Sussex: Harvester.

Mosse, G.L. 1964.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uller, D. 1987. The process of systematisation: the case of Germa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 D. Muller, F. Ringer, and B. 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sgrove, F. 1959. Middle-clas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2.

Nichols, T. 1969. *Ownership, Control and Ideology*. London: Allen & Unwin.

Nikolaou, K. 1978. *Inter-size Efficiency Differentials in Greek Manufacturing*. Athens: Center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Research.

Nord, P. 1981. Le mouvement des petits commerçants et la politique en France de 1888 à 1914. Mouvement Social 114.

Parkin, F.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erkin, H. 1961. Middle-clas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ritical no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4.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ais, S.J. 1981. *The Evolution of Giant Firms i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ice, R.N. 1977. Society, status and jingoism: the social roots of lower middle class patriotism, 1870—1900. In *The Lower Middle Class in Britain, 1870—1914*, ed. G. Crossick. London: Croom Helm.

Pryor, F.L. 1973. *Propert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N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eder, D. 1987.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England, 1869—1920.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 D. Muller, F. Ringer, and B. 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nger, F. 1979.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On segment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French secondary education, 1865—1920.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 D. Muller, F. Ringer, and B. 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inson, R.E. 1959. Imperial problems in British politics, 1880—189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Ⅲ, ed. E.A. Benians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uth, B. 1965. *Occupation and Pay in Great Britain 1906—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Occupation and Pay in Great Britain, 1906—1979*. London: Macmillan.

Rubinson, R. 1986. Class formation,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Rueschemeyer, D. 1973. *Lawyers and Their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Germany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yan, M. 1981. *Cradle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Family in Oneida County, New York, 1790—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ystad, G. 1975. *Ambiguous Imperi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tockholm: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Books.

Schleunes, K. 1989. *Schooling and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Prussia and Bavaria, 1750—1900*. Oxford: Berg.

Scott, J. 1979. *Corporations, Classes and Capitalism*. London: Hutchinson.

1982. *The Upper Classes. Property and Privilege i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Simon, B. 1987. Systematisation and segmentation in education: the case of England.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 D. Muller, F. Ringer, and B. 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nger, B. 1983. *Village Notable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riests, Mayors, Schoolmast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mith, R.J. 1969. Education, society and literacy: Nottinghamshir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12.

Steedman, H. 1987. Defining institutions: the endowed grammar schools and the systematisation of English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d. D. Muller, F. Ringer, and B. Sim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A., et al. 1980.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Occupations*. London: Macmillan.

Summers, A. 1981. The character of Edwardian nationalism: three popular leagues. In *Nationalism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Before 1941*, ed. P. Kennedy and A. Nicholls. London: Macmillan.

Sutherland, G. 1971.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Tholfsen, T. 1976.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Waddington, I. 1977.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consultant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sociology of an inter-professional conflict: In *Health Care and Popular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J.Woodward and D.Richards. London: Croom Helm.

Wald, K. 1983. *Crosses on the Ballot: Patterns of British Voter Alignment Since 188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ber, E. 1968.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France, 1905—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hler, H.-U. 1979. Introduction to imperialism. In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ed. C. Emsley. London: Croom Helm.

Weiss, L. 1988. *Creating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Small Business Since 1945*. Oxford: Blackwell.

Welch, R., Jr. 1979.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Wertheimer, M. 1924. *The Pan-German League 189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hyte, W.M.1956.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inkler, H. A. 1976. From social protectionism to National Socialism: the German small-business mo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Wright, E.O.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第十七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年(一)：英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1880至1914年间，大部分西方国家经历了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见表8.2和8.4)农业发生了变化，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和海外的人口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大城市出现，高科技产生，尤其是综合技术应用于三个工业部门——钢铁业、金属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农业和工业产品在国内通过公路，在国际上通过蒸汽船输送到各地。银行和证券市场用闲散的资金在全球投资，然后以利润的形式获得收益来提高消费。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加强了各地的经济统一，尽管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因素，从总体上意向不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改变了社会。集体权力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整个西方大众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并稳定的保持在基本生活水平之上。因此，人均寿命开始了显著迅速地延长。从1870年平均40岁——这可能仅代表另一个像马尔萨斯历史周期那样的最高点——到1950年增长到70岁。女性的平均寿命超过了男性。社会日益城市化、工业化。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经济权力关系的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

整个这一时期，在我们的理论中必然有经济决定论的成分。

经济革命也改变了分散的权力关系——这是接下来三章的主题。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阶级力量在不断增长，而且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政治化。首先，土地所有者、商人、工业资本家联合成为资本家阶级；正如我们看到英国已发生的那样(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和德国正在发生的那样(参阅第九章)。第二，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员和流动职业者正融合成为中产阶级(参阅第十六章)。第三，大土地所有者阶级融入了全球的商业资本主义并且卷入了所有的阶级冲突之中(参阅第十九章)。现在大部分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均衡的分离。(只有英国例外，是唯一的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因此我把这种双重性留到下面的这章节中。)第四，工人阶级运动的出现，主要集中于冶炼行业、采矿业、交通业，并是工人阶级运动在职业和政治方面集体组织起来。在这种体制下的阶级斗争——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政治化。正在成长的国家基础设施的权力，公民权的出现，和各国资本部分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有这些都变成了国家组织内的冲突。阶级之间变得更加对立，阶级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个别权力关系得到变革——这个过程实际上开始于18世纪晚期，完成于20世纪初期。

然而，这些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分散权力关系革命实际上比马克思意识到的更为不明确。我们在第十六章中看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兴起有点支离破碎。第十九章中证明土地所有阶级(除大农场主之外)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城市工业阶级的关系尤其多样化。这一章和下一章也将证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集体组织中，在意识升华和政治观点方面——实质上并不明确。就组织而言，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加强工人阶级组织而且还加强了三种形式的工人组织、阶级组织、地方性组织和部门性组织。实际上，产生阶级化趋势的核心工业是最注意区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是最注意部门性的。这三种组织都是关于政治性的新型组织，是在经济权力关系各个方面真正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组织联合起来并未像马克思设想的那

样向统一的革命运动发展——也没有像其他作者设想的那样进行改革——而发展成为十分模糊的个别权力关系。西方社会学家采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那些模糊的问题。解释那些方法是下一章主要的理论目的。

这一时期的模糊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工人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在表 15.1 中，我区分出服从现在资本主义的工人(和农民)的三对策略。这三对策略在整个这一时期都摇摆不定。这两个富于斗争性的策略并不是在寻求改变，而是同资本主义展开竞争。从经济角度说，这些策略是保护主义的，在劳工运动中以最温和的形式存在。于是，工人们结合在一起组成合作社和提供福利和保险的互助金。在此，这种策略转向政治化时，为工人企业和组织权利(集体公民权)而向政府寻求帮助时，我称它为“互助主义”。改革家也实行两种策略。从政治上——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进行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我把这称为社会民主，这一政治上的策略在这一时期仍然罕见。比较常见的是经济策略——工业上的调解和集体就工资和条件达成一致协议——我将此称为经济主义。这一对革命策略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集权论者所看到的，通过政治革命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也是工团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所看到的，通过迂回国家的一般经济打击所取得的革命成就。

所有这六种策略对于进入现代雇佣关系的工人有着明显的吸引力，甚至革命者也要为维持日常生活而同雇主合作。他们也不反对互助金、投票箱、失业保险、免费教育或者其他保护主义、改革主义的诱惑。甚至主张和解的工人一直都发现资本主义总是将财产权置于首位，如果资本主义市场力量发威的话，工人就会受到粗暴的待遇或者予以解雇。然后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价值论和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方案。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人接受国家主义的方案，因为他们没有与对工人友好的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像霍尔顿(1985)提到的那样，可能工团主义尤其适用于那几十年，尤其是管理权延伸到非产业的工人，他们不习惯有纪律约束的工厂生活和有规章制度的工会。到 1914 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工人或雇主的策略制度化。所有的策略

都行得通，吸引着各种竞争的激进团体，从而分配权力关系极为模糊。

对于工人的各种选择方式的吸引关键在于这种统治制度下的政策漂浮不定。资本家虽然不愿作任何让步，各州的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各州运用立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手段来支持资本家，如果工人们顽强抵制，集体组织起来造成劳动力匮乏，并且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那对于政府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如果资本家仅仅是压迫工人，那么改革和互助主义将没有任何成果，所有的工人也将处于相同的境况下。工人们可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退而转向掩饰最少的保护主义，他们也可以参加游行，集体罢工或进行政治革命，就像沙皇俄国发生的那样。大部分雇主和管理机构也都意识到其他的策略。他们更加小心翼翼地压制工人——实行有选择的部分压制。资本家需要工人的合作，国家精英需要工人们顺从地纳税、服兵役和遵守公共秩序，政党需要拉选票。资本家可能会和工人们和解，其他政府形式可能劝说并迫使国家精英和政党进一步妥协。因为工人和农民拥有不断变化的组织力量，资本家、国家精英、政党可能作出实用主义的、有选择的反应，加强地方主义，同那些有技术，有财产或有选举权的工人进行和解而压制其余的工人。

地方合作政策一旦实施，保守派、经济学家和互助主义者就会比革命者占优势。集体罢工和政治革命——甚至是机构改革的迫切要求——需要人数上的分量和阶级团结。与此相对，"温和派"和地方主义只需要资本家、精英或政党分子对某些工人们作某些让步以便使革命的幽灵减退。一旦这些工人通过这种方式获益，他们就不可能站在革命者一边。阶级团结现在被打破，革命的幽灵又消退了。只要某些资本家，精英和政党同某些工人妥协，保护温和的改革，地方主义、部门主义，革命势力的削弱从长远来看，会比革命更有可能实现。

但是，这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似乎减少了。1883年马克思去世不久，他的理论得到了证实。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他所预料的"集体劳工"。实际上，这是它的第二次出现。但是它不像第一次宪章运动

时的工人组织，这时的工人阶级是由大的资本主义工厂和国家企业中的正式职工组成。尤其是来自冶炼业、采矿业和交通业的正式职工组成。手工业者大部分都消失了。技术的区别仍然存在着，但是它们受到半技术工作的调和，所有这些都被同一工资和经理制度连接为一体。这一革命也具有宏观的经济后果，并且加剧了国际竞争。雇主们反对过时的技艺保护主义，他们想出“科学管理”的方法来控制劳工，有时借助于司法和警察压制的方法。这些攻击增加了确定工人阶级身份的可行性，然而也经常会对它无能为力。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熟练工人的反应。他们会不会运用其组织和劳工市场的剩余力量来寻求他们的保护主义的部分利益？他们会不会像马克思坚信的那样，同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阶级运动？资本家和国家精英政党面临着两种同样重要的选择：冒压制所有工人会激化阶级斗争的风险或者是同部分有威望的工人妥协去压制其他工人。在下两章中，我研究了这些策略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我认为各种形式在解释结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分散的权力关系方面的经济革命仍保持着其内在的不明确性，要完成经济革命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帮助。我从“权力先锋”开始，即这一时期前半期的先锋国家，唯一的工业化社会的国家以及产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会运动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对英国劳工的增长所作的解释

可以将这一阶段劳工的大体情况简单总结一下。[1]第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18世纪80年代晚期随着新工联主义出现而产生的。新工联主义更富于激进性，它吸收了非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变得更加广泛和政治化，部门化越来越弱。这一运动在1890年以后被遏制，然后稳定下来，又不断发展，尤其是从1910年以后不断发展壮大。

但是工会成员90%都是男性，女性成员只是在1888—1914年间，从2%增长到10%。甚至在纺织行业和教师行业大部分职员也都是男性。工会男性手工劳动者增长非常引人注目，由12%增长到32%。这500万人组成了工人阶级的核心——他们在工厂督导团监督下的工厂里，在采矿业和运输业中工作，其中工会成员占大多数。在政治上，工会首先与自由党合作。然后有一些工会组成工党为工会谋取利益。到1914年，一多半工会成员加入了工党，1910年在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工党通过斗争在56个工人阶级选区中赢得了42个选区——尽管是在与自由党的选举协定的帮助之下取得的。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时期，劳工通常被描绘为改良主义者，经济学家工会将经济与社会民主的工党联合起来。但是，它的政策更加温和，它的经济策略通常介于经济保护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然而，互助主义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这些都同少数派的趋势竞争：马克思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在满怀希望地鼓噪着，而随着劳工组织的影响渗入政府机构里，便产生了一种没有想到的改良主义。

我们先从工会开始，许多历史学家借助于第十五章中马克思的四篇论述来解释工会的成长。他们论述道：

1. 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定型分析扩散到整个经济，它替代了更加多样化的生产关系。

2.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劳动过程的转变导致“集体劳工”出现，形成了单一的工人阶级。

3. 这种情况由于城区工人居民区密度增大和隔离得到加强，尽管也有人指出这造成了一种主要是“防御性”的团结。

4. 劳动过程的转变产生了政治上的要求，这种政治要求由于工人阶级的社区得到了加强。这就使劳工组织向改良主义的工党转变。

在第十五章中我在五个方面批评了这种模式：

1. 出现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带有竞争性的“集体劳工”组织——工人阶级、部门技工和国内劳动力市场所造成的部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相

互依赖。

2. 在这种模式中有种紧张不安的关系，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领域里的扩散，尤其是表现为工厂劳动过程中的权威性组织的场所。在早期，扩散比劳动过程更能决定工人阶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强调劳动过程的转变。我不同意这一点。

3. 由于这种经济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领域里占优势，它的各种政治定型也起到了决定劳工运动的作用。

4. 从更深层意义上说，劳工运动的出现是区域性的。它的参与者主要是男性，而且主要以雇佣劳动者为主。由于生产的转变，这影响了行业和某些社区劳工运动的联系。

5. 所有这些后果是，阶级冲突通常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是对抗性的，要用辩证法解决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通常情况下也会集团化和区域化，从而产生更复杂和竞争性的后果。我认为工人阶级通常情况下一般会失去阶级对抗性。

本章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的身份；但这仅仅是一部分；它将雇佣关系与家庭、社区分离，将男性与女性分开。但是结果却也取决于政治的定型。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形仍不明确，但是其他的国家成形却不这样。国家的非军事化——其他文职范围的扩大，极力将军国主义推向国外和(爱尔兰)各地区——以及它的政党民主与更集中地解决民族问题(除爱尔兰问题外)的办法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促使劳工奉行温和的互助主义。主要是因为不同运作者没有想到的结果，改良主义最终成为英国工人的主要策略，但仅仅是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

工人阶级社区和民族平民社会

到 1900 年，工业化大大影响了居民社区，工业化减少了本地特殊

的部门控制，并且从生态学上进一步将工人同其他人分隔开来。城市发展快于经济的集中。到了1901年，大部分工人居住在人口超过2万的城镇中而其工作的同事却不足50人。有75个城镇的人口超过5万，每个城镇都有很多雇主，都缺乏内聚力并且缺乏部门的社区控制。在这些城镇中，大部分有组织的冲突都发生在稳定的工厂或车间中。这也许涉及到约一半工人，剩下另一半工人仍处于区域控制之中或者无固定工作。电车和火车也将中产阶级带往市郊远离了工人。等级制度不再是在某地，而是跨地域重新产生，甚至是在区域内部产生。资本家集中在伦敦、保健的温泉区、海滨和南方。而工人集中在北部充满烟尘的工业区。为了社会秩序有必要对偏远地区进行管理，因为工人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意识。

斯特德曼—琼斯(1974)认为自19世纪90年代起，一种明显带有防御性的工人阶级文化主宰着大城镇。传统的部门性控制，如慈善学校、夜校、图书馆、互助会、教会和自由教堂让位于国家教育、公立图书馆、体育报道、赛马报道、足球赛和音乐厅。他认为音乐厅的歌曲表明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变得具有防御性，内在的转折加强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而远离激进的社会主义。(工人们远离了想象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这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分困惑。)

有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社区工人意识到他们不同于小雇主。尽管1900年以前在普莱斯顿大部分投票的工人是托利党的人，他们不想同中产阶级的保守党同流合污，工人们建立了自己的保守党人俱乐部(Savage, 1987, p.413)。然而他们的社区并不仅仅是设立障碍。工人家庭迫切加入到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消费市场中，在1870年到1890年间，商品零售价下降了20%，周薪提高了20%(Feinstein, 1976, 表65)。商店和分散贸易使全国市场和统一的广告牌遍布城镇、地区甚至全国。地方保护主义消费和信贷网络仍然存在，但家庭也加入到国家经济消费者的行列，家庭消费市场的控制扩散了，成为非个人和国家化了(F.M.L.Thompson, 1988)。体育运动从乡村转移到

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娱乐行业，职业足球成为其核心部分。这里，直接的地区管理削弱了市场的力量，足球、板球和其他俱乐部都由当地的名人经营(Hargeaves, 1986)。体育成了各个阶级政治活动家的流行语——“这可不是板球”。“这是击打腰部以下的犯规行为”——这些都是共同的注重“比赛规则”的证据(Mckibbin, 1990b)。这些发展并未将工人们隔离开来，却使他们融入了国家的主流。

生态上的阶级隔离，一半男工人享有选举权，公开选举权使工人涉足政治。但到目前为止，阶级合作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集中在熟练工人和中产阶级的自由党和不信奉英国国教者之间的合作。现在政府的主要民事活动就是教育。越来越多的工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同自由党人和非国教徒合作担任本地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文化普及率剧增。1900 年，已婚者只有 3% 不会在登记册上签自己的名字。与此相对照 1860 年有 3%(Stone, 1969)。从 1892 年起，义务教育促使工人更多地参加到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来。

工人社区中男女之间的隔离看来有所加强。这一阶段，女性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化普及的最后一次浪潮主要在工人的女儿们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使女性参加到国家的文化生活中。现代节育办法开始普及，死亡率颠倒过来：不再是女性比男性早去世，而是女性开始比男性长寿。工资增长，物价降低和消费经济意味着女性依靠男性维持生活的程度降低了。女性的身体状况能承受住生育(Hart, 1989, 1991)。男性维持整个家庭的经济，尽管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再那么重要。在家庭中主要有两种习惯，或者是男人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女人以作家庭花费，剩下的留给自己自由支配，或者是他们将所有的工资都交上去，再得到固定数额作为己用。大部分女性找到临时的兼职工作，她们一般把挣到的少量工资用于家庭或者是个人消费。消费分为两部分：男人的自由花费和女性的家庭开销。酿酒，运动和烟草行业为男性提供了娱乐活动：“拥有体面工作的男人聚到一起，他们穿着便装，戴着手表手链、戴着礼帽，远离工作，这时女人主管家庭，”

达维多夫谈道(1990, p.111)。

减轻广大工人在社会雇用中的压力，难道会使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分离和更具有冲突性吗？ 我们必须警惕把早期阶段浪漫化。 节制仍是19世纪女性的首要原则，所以一些隔离和冲突长期存在。 然而在职业两极化的这一阶段，女性和男性的社会生活仍是部分隔离的。 前面章节表明，在早期小资产阶级的骚动和民权运动中，社区加强了阶级运动的整体性。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缺乏这种力量。

因此，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当复杂，阶级居住区和文化有点处于分离状态。 有些看起来是内在的和具有防御性的，有些鼓励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性，有些鼓励工人参与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党民主生活。 男人和女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 但总体来说，家庭和社区生活并不只是简单的雇佣趋势向阶级极端化的趋势发展。 不像国家那样，阶级变得越来越广泛却越来越分散。

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策略

集体劳工的论著强调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工人的非技术化过程促进阶级发展的作用。 我现在是批判地评定这些论著。 它阐明雇主们用机械化和理性化生产来限制技工的特权，它抑制技工，同时提高新兴的半技术工人，这两个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一起参加到内部的劳工市场中。 技术工人都很激进，半技术工人，甚至一些非技术工人开始形成自己最早的工会。 他们首先是在“新工会”中，然后更长时期在激进的老工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中逐步融为一体，这是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以普赖斯为其代表(1983—1985)，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佩林(1963, pp.85—86, 98—100)的赞同。 此外还有格雷(1976, pp.167—169)、克罗西克(1978, p.248、1981, p.162)、贝恩斯(1981, p.162)、亨特(1981)和塞恩(1981, p.230)。

他们的论点在20世纪70年代工业社会学家中盛行的劳动过程和非技术化理论中得到了共鸣（例如，Bravorman, 1974; Fridmann, 1977和Buravay, 1979; Hill, 1981, pp.103—123给予了关键性的解释）。这些理论以制造业的大公司作为典型来描写20世纪早期劳工形成过程。在当前社会学对这一阶段“福特主义”的理论的强调中业已引起共鸣，该理论以1907年福特汽车公司大批量生产T型车为例。利用的经典理论，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作为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征，同目前的时代形成对照，他们认为目前的时代是“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和“灵活的重组”。

爱德华时期的英国公司与这一理论似乎格格不入，乔伊斯(1989)和麦基宾(1990)观察到在生产、采矿、交通等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只有一半，另一半劳动力在商业领域、小规模的出版行业或是仍“在街道上”工作，同工会没有接触。甚至典型的生产企业或是家族公司的联合(私人公司)。只到20世纪20年代联合公司才占据优势。1905年在资产方面最大的50个生产企业中，有28家企业生产饮料和进行蒸馏生产(其社区的重要性在前面我已经取得强调过了；10家纺织企业，只有23家企业生产工业品(Payne, 1967, p.527;参见Ashworth, 1960, pp.90—102)。大约有100多家公司，每个公司雇用了3 000个工人，分布在平均每个公司的3家工厂中。

在所有国家中，甚至最大的工厂在国家组织面前都会显得相形见绌。排在军队之后的最大部门是邮政，1908年邮政拥有11.4万工人，比任何一个私有企业的工人要多4倍。在10个最大的生产企业中，国家拥有2个(皇家造船厂和皇家兵工厂)。另外8个企业，每个都有1.3万名雇工，这8个企业类型多样化：2个纺织企业，每个企业有25个多厂，3个铁路公司或工厂；2个同国家关系密切的军械公司，另一个是工程公司。第11位的是联合批发协会(Shaw, 1983)。如果把采矿企业包括在内，这两个采矿企业将排在前10位(Taylor, 1968, pp.6—65)。如此多样的企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吗？

是的，相对大一些的企业都用蒸汽动力，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象征，但是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蒸汽动力才占据主导地位。蒸汽机用于交通业之外的行业在1870—1896年间增长了25%，在1870年有一半多蒸汽机的应用仅限于纺织业，到1907年低于1/5，蒸汽尤其应用于采矿业、钢铁业、机械制造业、造船业和铁路以及公用事业。但是其他能源也出现了，直到1907年，有1/4的发动机是由电力驱动的，煤气和内燃机(煤气和油作燃料)在小企业中战胜了蒸汽(Ashworth, 1960, p.86; Musson, 1978, pp.166—170)。使用这些初级动力的技术改变了整个经济的工作地点，从主要的生产过程中淘汰了手工劳动。根据1901年统计，国内失业率减少到2%(主要是服装行业的失业女工，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低于实际数字)。这些技术使个别工作实现了机械化(尽管两台机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在工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工人的工作任务也得到改变，工作时个人技术的要求降低了，操作机器的压力增加了。但是它不仅仅在制造行业，也使整个国家经济的雇工统一。这些主要的动力机械需要大量的煤，在各工作地点以外均需要煤的运输及贮备。尽管制造业仍然停滞不前，但是采矿、交通和分流业则不断增长，正如在表17.1看到的那样。

表17.1　英国劳动人的工业分工

	1851	1881	1911
农业，林业，渔业	21.6	13.0	8.6
矿业，采石业	4.1	4.6	6.5
制造业	33.0	32.1	33.3
建筑业	5.2	6.9	6.5
贸易与运输	15.5	21.4	21.5
公共服务，专业人员	5.2	6.1	8.1
家庭，个人服务	13.4	15.3	14.0
百分比总和	100%	100%	100%
工作总人口(百万)	9.7	13.1	18.6

资料来源：Deane and Cole, 1969, p.143。

唯一减少的阶层是农业工人，但制造业雇佣工人同总人口和雇工人数的增长保持同步，制造业工人的增长比率落在采矿、贸易、交通、公用事业和专业人员后面。1907年对生产的调查显示，采矿业的净产值是1.6万英镑，使其他的大企业相形见绌：工程业(500万英镑)，棉纺织业(4 500万英镑)，建筑业(4 300万英镑)，钢铁制造业(3 000万英镑)。采矿业雇工增长的人数比1850—1919年的总量还多，这表明当时是劳工人数增加，并非现存劳工的工作强度增加了——可能这在大多数第三产业内也是如此。

贝恩和普赖斯(1980)提供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工会成员的统计表。我把从克莱格等人(1964, p.1)得到的关于1888年的数字加进去。通过工会的密度水平——即工会新成员的潜在比例，我发现了两个关于工会权力的原始标志物。对于工会来说，那就是工厂中的劳动力；对于整个劳工运动来说，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非农业劳动力。

1. 在25%的密度水平时，工会变成重要的部门性权力运作者。雇主仍然能绕过他们对工人实行家长制式的控制；但是现在这样做就要冒险。动员它们成员的工会现在就可能分裂。如果在危急状态下，它们还能动员非工会成员，这样将导致广泛的阶级冲突。如果通过技术、工业，或通过宗教、伦理信仰，或通过社会身份，将工会成员同非工会成员隔离开来，这风险就会降低。雇主进行公司合并并向有组织的可控制市场的工人作出让步，即严厉制裁其他工人。英国的地方主义主要是用技术，有些地方用种族(如英国反对爱尔兰)。

2. 在50%的密度水平时，工会成为阶级的运作者，工会可以领导整个工人阶级。这是政府可能更倾向于订立国家或地方协议，分而治之的策略已经不太现实，如果不愿妥协的话，剩下的办法就是大规模镇压，而这样做法往往代价颇高。

1888年，全国的密度只有5%，3/4的工会成员集中于4个工业行业中：工程业和造船业(25%)，采矿业和采石业(20%)，纺织业(16%)，建筑业(12%)。除了采矿业超过50%，工业密度都在20%以下。只有

采矿业工会接近于将所有阶层联成一体，尽管有些企业技工仍存在部门性权力这种现象。从全国意义上说，这意味着部门性、通常是技术性权力运作者的松散联盟，它能使重要企业分裂，但却不能瓦解阶级之间的敌对——就像这一时期所有国家的劳工运动那样。政治体制和资本家可以试图通过全方位的压制，而取得某些成功：在采矿业和一些技工中使用军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小规模的抵抗会被孤立起来。换一种做法，将这些工会进行地方性的合并就可以避免普遍的让步。

仅仅在1888年后的四年中，“新工会主义”成员增加了1倍，达到了150万人，在密度上达到11%。采矿业和工程造船业，各占全国成员的21%，是棉纺织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人数的2倍。“新工会主义”成员密度呈曲线上升。直到1901年，它的比例是19%，然后比例保持稳定。到1911年，工会成员达到了10万人，密度达到19%。采矿业居于领先地位，交通业工人人数跃居第二位——铁路业工人(其密度稳定增长)，公路运输业和海运工人(有两次人数猛增的时期即1888—1892年和1910年以后)。建筑业工人被地方政府和教育行业的工人超过。到1914年，建筑业成员才再次增长到410万，密度增长到25%。在所有这些工业部门以及在煤气、印刷和邮政行业中，密度现在都高于5%。

工会成员仍然是男性，1901年，女性占劳工的3%，但只有8%是工会会员。1914年，男性密度为32%，女性为9%。这里所给的女性密度比例偏低，男性的密度比例偏高。在制造业，采矿业和交通业这些核心工业中男子的比例还要高。女性被排除在可能产生工会的雇佣关系之外。1911年，被雇用的女工39%仍是家庭女仆，然而，许多激进分子具有煤气工人领袖威尔·托雷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女人不会成为优秀的工会会员，因此，我们认为把精力花在工人组织上会更好(Hinton, 1983, p.32)。

总之，工会首先在各个部门地位变得重要，然后成为阶级的运作者，遍布一些重要行业，但仅仅是在男性工人中。工会在采煤业中力

量最强大，然后是工程业、造船业和铁路行业、棉纺业、再后是建筑业和政府部门。现在在采矿业中，甚至部门性的镇压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可能失败，而在其他主要行业中也是很危险的。雇主在对付女雇员时相对来说仍是随心所欲。

我开始讨论个别工会同企业的斗争，这为集体劳工理论提供了一些支持。早期的建筑业工会是在小的，分散的工地和流动的劳动力之间发展起来的。像第十五章所说明的那样，各行业之间的工会组织在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非常普遍。建筑业工会现在落后了，但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个人技术要求的降低，尤其是在泥瓦工和石工中，扩大了工团主义并引入了激进的工联主义——但延续至惨重失败(Holton, 1976, pp.155—163)。

工程业受到劳工形成过程变化的严重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这种影响是双重的(Burgess, 1985)。从19世纪80年代起，大批量生产对机器商店产生重要影响。许多新的塔吊和纹盘机，然后是机械铁床、磨床、钻床，都是由半熟练的技师操作，技师取代了熟练的钳工和锻工，随着现场学习的增加，师徒关系减弱。然而，这些机器也提高了维修工人和机器制造者的技术。

这种情况转移而非冲淡了技术，并打破了旧的部门领导和寻求各层面团结的新的激进分子之间的联合。雇主们趁着这一阶段的不团结发起了攻击，声称他们应像美国和德国的业主那样有权做“自己工厂的主人”。19世纪90年代，他们在整个国家内组织起来，1897年鼓动工程师联合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罢工。雇主选择了滞销的一段时间。六个月以后，工程师联合会按照提出的条件妥协，撤回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承认雇主给工人分派机器的权利。工程师联合会接受的学徒减少，而半熟练工人增加(到1914年工人队伍中半熟练工人占20%)，还接受了计件工。由于不能破坏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会仍然保持分离状态。工会的许多分会要求制造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共同规章制度，并吸收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作为他们的成员。雇主的胜利渐

渐鼓舞了不同阶层之间更广泛的团结。然而到1911年，工程师联合会重新恢复了工会，新的麻烦又开始酝酿。

雇主的攻击扩散到设立技工工会的其他工业部门——造船业、印刷业、制鞋业和家具生产行业。由于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整个19世纪90年代，雇主们组织起来，他们利用贸易循环来选择对抗的时机。他们的两个主要策略是：运用权威的国家组织，利用无序而分散的国际市场，他们的阶级力量有两个领土上的来源，即国家的(很快成为他们的主要薄弱地区)和跨国家的(最终成为他们力量的主要地区)。

虽然有些雇主试图捣毁工会，但这几乎不可能。英国雇主的策略开始时或多或少地同任何一个地方雇主的策略有相似之处。但是英国的技工工会比其他国家的熟练工人有更多的武器进行战斗。他们的历史悠久得多，在罢工谈判和国家精英和政党方面均根深蒂固。他们通过影响立场来提高集体公民权。1874年以后，再一次是1906年以后，英国法律要比其他主要国家的法律对工会罢工和罢工纠察有利。因此英国雇主被迫采取了经济策略，雇主被剥夺了司法权力或者警察压制工人的权力。他们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而且来自政党和政府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劳工冲突中协调解决。

也没有任何一方的经济武器能够完全理想地适用于战争。大部分改组和机械化出现在那些非传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雇主很少与那些老牌的技术工会对抗。比较新的工会部门像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制鞋业、服装加工业、稀有金属加工业、自行车、电力和发动机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化学工业等等。在这些行业中产生了新的技术级别，这些产业工人的技术得以提高而不是像手工匠那样降低。这些技术是真正稀有的技术，但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要比通过学徒学到的更多。在他们的中心地区，在工程业已长期建立的地区，手工技工仍未遇到挑战，他们能控制学徒工，他们同学徒工的报酬也不一样，这种关系保持得相当稳定(Penn, 1985)。

然而有一些变化是普遍的。在任何地方，技工失去了受雇和解雇

的权力，失去了订立契约的权力。非技术工人从普通工作加入到相同的生产组织中，所有级别的工人都拿工薪，并且有类似的雇佣条件。不再像原来的手工技工那样，工人已没有阶层之分。手工技工工会只有放弃新的工业部门，新的熟练工人和未熟练工人才能维持完全的部门主义，这是他们不愿做的。雇主拥有的非罢工工人比其他国家更少。农业已被剥夺了劳动力，只有爱尔兰组成了"农业"劳动力(许多雇主采用英国效率低的爱尔兰模式)。雇主也援助新的熟练工人。他们在整个行业内部的劳动市场雇用熟练工人，这些工人在他们的劳动力队伍中都是些有责任心的工人。在这种交流中，雇主控制劳工但变得依赖技术工人。工人得到雇佣保障而且雇主的专断权也下降了。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雇主能够像美国那样理顺法庭和议会力量的话(参看第十八章)，大部分雇主将会坚定地争取无工会工厂。但因为英国是国家法令制定平民化的国家(像第十二章证明的那样)，他们做不到。许多雇主只能同工会谈判。到 1875 年，工会和谈判规则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合法地位，这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早。在给皇家委员会的证据和与当时调查者的谈话中，雇主们均认为工会是不会消失的。正像一个作者在 1906 年所提到的。

> 我在德国或美国……从未听到过雇主说一句支持工会的话。雇主憎恨和害怕工会。在英国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绪。我曾听到不利于工会的批评，有时有谴责，但是没有仇恨。我更常听到的是雇主和经理对工会公平甚至是友好的观点。(引自 Mckibbin, 1990)

工会也会寻找盟友，他们把目标对准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并吸收更少技术的工人加入工会。他们朝着政治和非技术工人努力——这是新工会主义的两大特点。

这些都是集体劳动力产生于以工厂为主的劳动过程这一观点的全部

证据。工会增长的其他领域都无法以此解释，开始出现的阶级意识的特点即使在这些行业内部也不能只用这些术语来解释。我现在转向其他工业部门。

采煤业是最主要的部门。英国矿工联合会的成长是以地方联合会为代价的。这部分是矿主对国家组织的反应，即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又因为联合会支持联合各阶层的两大传统要求，即坚持八小时工作日和反对用滑准法按煤的价格来计酬。采矿业工会也已朝着政治联合的方向努力，这是由1884年郡选举法案开始的独一无二的地理中心位置使他们通过选举议会"自由党—工党"成员未影响共同的政党民主。

所有这些在1893年大罢工中是显而易见的。采矿业工会抵制按滑准法将工资降低25%，并且全国性的停业。在议会中的自由党—工党议员的警告和压力下，政府进行了干预，显然这是自由放任政策胜利之后的首次工业争端。随之发生的和解确实是工会的胜利。罢工鼓励了一线采煤工(他们至今仍是工会的主要力量)，其他地下工人和地面工人的团结。矿业联合会成了"新工会"，吸纳非技术工人加入。阶级团结是国际压力迫使雇主加入国家组织的结果，是传统工会要求的结果，是政党民主政治定型的结果，机械化和非技术化很难形成阶级团结。矿工能接受非罢工工人，是因为他们就工资和工时问题团结一致，并且因为隔离的孤单矿工社会不怕使用暴力，他们寻求互助主义—工业关系由政治法规来约束，实行最低工资，限定工作时数，这些要求仍然是自由党—工党的。只有在1909年他们才隶属工党，直到战后一直保持党内自治。

尽管在采矿业中劳工的历程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采矿业工会的要求却具有代表性。十小时，然后是九小时，再后是八小时工作日，是19世纪工会的主要要求。1880年以后，在工商业衰退时期，国际竞争导致工资下降，迫使工会要求最低工资数。滑准法计工资在棉纺织业、制鞋业和钢铁制造业中非常普遍。棉纺织业工人加入他们的工会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熟练纺织工人支配着他们：这使得较低层次的工人

形成，并转向半社会党人的新工会。加入民主党的纺织工人，在兰卡斯郡他们成为选举者，但仍受雇主部分控制(Joyce, 1980)，他们通过纺织业工人联合会给两党施加温和的压力——不像约克郡激进的纺织工人建立了独立工党，即工党的前身。雇主协会对国际竞争作出反应，又一次领导雇主攻击工资。1893年棉纺织业的普遍罢工促使工人各阶层更加团结一致。最终的协议是将削减工资10%降到3%以下，并且不是通过罢工而是设立政府议事程序来解决争端，这就是《布鲁克兰协议》，它建立了协商解决的政府协议模式。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老工会”中，在国际市场力量的压力下，雇主们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促使工人更大程度上团结起来。不是团结一致就是衰退，甚至对许多专业的技工同志会也是如此。尽管某些部门非技术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他们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传统的。由于更大的经济力量导致劳资双方建立更加广泛的阶级组织，所以在工厂里绕开了技术差异和特权问题。工会的范围更加广泛，政治性更强，但是形形色色的民主广告超过了在劳工发展过程的各种变量，这些广告正在建构政治结果。

“新工会”一般要追溯到1899年煤气工人和船坞工人罢工。煤气工人工会是由威尔·索恩领导的，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同盟成员，他的秘书是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该工会在成立的头四个月便在伦敦拥有两千名会员。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增加了煤气产量，劳工的劳动强度增大了，而并不降低技术要求，像观察到的那样，这正是所有新工会的模式。工会要求三班倒，而非两班倒，以把劳动时间由十二小时减到八小时。工会的核心人物是有技术的锅炉工，这些人在工作方面受过相当长的训练并能控制生产，难以被不参加罢工的工人代替。伦敦煤气公司没有进行斗争便作出让步。国内劳动市场脱离了创立者的意愿。煤气工人工会遍及全国，经常得到社会民主同盟的帮助，他们的情况很具传播性。在1889年8月，工资的问题遍及伦敦船坞。有秩序的集体游行赢得了公司的同情，并使劳德市长和曼宁

大主教干预此事。和谈的结果是工会取胜。工会成员激增到3万人。在社会主义组织的帮助下，新工会遍及全国各个行业，包括船坞工人、海员、搬运工人、卡车工人、铁路工人和各种各样的生产行业。制造业、建筑业、白领职员，甚至还有农民。到1890年，这些工会共拥有35万会员。

大部分工会不能保持所取得的成果。成功主要是在煤气业工会、白领工会和铁路工会。从1910年起，白领工会增长的速度比体力劳动者工会的增长速度要快，主要是通过吸收政府雇员，尤其是教师(包括许多妇女)和邮政工人。商业和工业职员几乎完全没有组织起来，销售行业的工会主义者大体上都局限于合作运动。在20世纪，公务员仍继续主宰着白领工会，因为政府比雇主更有妥协性(Bain, 1970)。甚至有限的政党民主选举权也迫使政府雇主同工人和解。

铁路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属于排他性的技工工会，但是在1889年它突然产生了铁路工人总工会这一竞争性对手，铁路工人总工会面向所有阶层，而对保护主义不屑一顾："总工会将是一个保持战斗性的工会，而且不会为任何弊端或偶发事件资金所害。"它斗争的焦点是工时，也迫使技工工会这样做。雇主进行反击，称他们受到相对总收入而言工作支出比例增长的压力。总工会几乎被他们的攻击所击垮，但是19世纪90年代，一个技工工会接管了它的斗争。铁路工人联合会，即现在全国的铁路工会的前身，通过对各阶层开放而变"新"，新工会已成功地推动了老工会的发展。各阶层的团结再一次集中在传统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争端上，即工时，而不是关于劳动过程中的任何转变，工会正向着更广泛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像阶级一样的组织喜欢共同的规章制度。这届政府执政后期说服雇主达到了这一目的(Bagwell, 1985)。

但大部分新工会失败了，旧有的很快消失，有的慢慢衰退了(直到1911—1914年罢工浪潮时才复兴，由此才产生了20世纪的总工会)。从1891年起，雇主才同政府的攻击步调一致。新工会几乎得不到老工会的支持，尽管它们的状况激起了中产阶级的同情，但是它们的社会主义

未能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尽管在1893年大萧条的打击下，停止和解雇工人使大部分新工会遭到破坏，然而它们仍取得了重大成功，它们的一些阶级意识被老工会利用。我将用我的IOTA模式来阐述如下：

1. 新工会和老工会都寻求更广泛的各阶层团结并形成了一个大工会，阶级(更准确说是一般工业的阶级)而不是部门技工的身份得到了加强。

2. 它们动员了积极进取的团结性，用力量和决心来压制雇主和舆论，而且阻止破坏罢工者上工，但由于它们缺乏全面控制而使雇主转而收买某些工人复工，于是它们使用暴力。它们强烈而广泛地抵制它们的阶级对手，然而它们最终的目的在于和解。

3. 工会的扩大鼓舞了整个阶级，虽然只是从广泛而非集中程度。工会发展壮大拥有更多的全职官员和行政机构，这是由工会全体成员而不是地方附属机构选举产生出的，有了更多的跨工会联盟。关于棉纺织业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更加一致。工会联盟将代表选进了议会和政府委员会(Martin, 1980, pp.58—96)。工会更加强大有力地卷入地方政治中，工会分会工人俱乐部、合作社、互助会、社会党人俱乐部、贸易委员会和劳工政治委员会等组织进行合作，最明显的是在选举学校委员会方面——运用了永久的"劳工意识"，包括互助主义和改革主义两者的结合(Thompson, 1967; Crosscick,1978, p.24)。这些组织的成员主要是男性：职业、家庭和社会区都被性别分隔开来，并不是所有激进分子的生活都来自职业身份。在利用职业、家庭、社会区生活中所产生的宪章派产生的执著的宪章派并未出现。宪章派产生于职业、家庭和社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剥削。

4. 如果IOTA的前三个因素增强了阶级的形成，那么第四个则减缓了阶级的形成。工会向国家精英分子和政党寻求帮助来反对雇主，更新了跨阶级的部门性联盟，这种联盟在近来英国政党民主中非常普通。政府的技术管理人员和一些中产阶级表示同情。大概有一半工会会员拥有选举权，两党竞争选票以避开独立工党。因此，跨阶级政党民主

折衷了这些需求，从而使可供选择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数目更少。

因此，工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党人的改革和抱有联合自由主义思想部门同盟之间的行业内部矛盾。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大部分工会会员的收入都在平均收入以上，拥有保险和工作技术。工会男性成员站在工会一边，反对工会以外的男女工人。但是工会的团结和扩张也在不断增长，工会和罢工超出了以前仅局限在技工中的范围，而囊括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的许多阶层，因此其结果不仅仅是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垄断本地工作和关闭工厂同盟。为免我们迷失在工业的特殊部门中，请记住同样的模式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所有工会成员的密度都在增长，加入英国工会联盟和工党的人数在增多。大部分增长发生在两个相同时间，1889—1892年和1911—1914年(正像在所有国家一样，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集中传播)。到1914年，在工业部门中工会成员的密度比开始阶段变化小了。几乎每个地方部门会员的密度都占25%以上。现在工会已成了劳工关系中的正常组成部分。考虑到各种产业中的条件和过程的不同，这些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更加深刻，它促使我们把劳工增长更多地解释为整个经济和政府特性的扩散，而非作为直接劳动过程的反应。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生产关系是重要的，劳资双方之间性质的根本差异遍布于整个经济。其中其他形成的职业——国内外工人、分色、临时雇佣——都在急剧下降，尤其是在男工人当中。前两种工会现在被委托给少数民族，第三种主要是女性工人，女性已不再是典型的非技术工人。能参加集体行动的绝大多数工人，无论是正式的技术人员，半技术人员或非技术人员，都加入到同业主经理的正式雇佣关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划分的两个阶级，恰恰存在于他们所认为的整个广泛分散的体系中。经济的兴衰，国内和国际上的工资，工时、成本、价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和竞争之间的关系促使两个阶级作出一致的反应。全国罢工和停止，政府裁决和全国协议变得更经常了。在1899年有一个全行业的协议，到了1910年有七个(Marks, 1989, p.86)。

雇主的阶级身份由于力量的增强而扩大了。联合起来的雇主的进攻策略，只能是动员使用民法和警察来进行镇压，主要依靠经济组织——全国性停业、全国性的破坏罢工的劳工组织(受到法律和警察的保护)——来坚持没有共同竞争的长期对抗。当雇主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时，便没有任何空子可钻，本位主义的技工最终处于下风。

但是雇主是以一定的代价取得成功的。工人的组织能力得到提高，尤其是四个部门(工程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政府部门)的工人现在是劳工的核心。工程技术进入工厂使他们成为领导者，他们过去常常组织起来，运用权力来控制劳工市场。位于单一阶级居住区内的大工厂，铁路车间或者是采矿厂使工人能在雇主不在的情况下形成集体的团结，这给工人留有更大的空间，从而导致隔离的工人群体“脱离所有者的直接控制”(Kerr 和 Siegel 1954 年分析说明了阶级团结的增长)。交通运输业工人特有的流动性使他们能同各种职业的工人保持接触——工人不得不充分了解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而交通运输工人最适合在全国工人中传递信息。政府雇用的重要性进一步为工人活动提供了空间：大型海军制造厂的工人、小邮局的工人或学校职员，并不与“雇主”直接打交道，而是与一个负责分化政治雇主而且主要是促成和解的非个人的政府打交道，双方在同一地方，即民族国家的领土上相互对抗，彼此对抗新的权力，对未来毫无定识，对自己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

劳工的政治策略和体制

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全体男性劳工被迫参与政治，这时他们便遇到现存的国家定型。有些政治传统经过这一时期并未有何损伤。工人可能仍然处在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或保守仁慈的专制统治之中(许多仍这样保持着)。但是 1867 年的各区和 1884 年的各县中大部分男性户主被

吸收入政党民主。66%的成年男子现在拥有选举资格，包括40%以上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尽管有许多因带有偏见的登记手续而不能参加选举)。大约有一半选民是工人，随着专门控制的减弱，政党政治发生了变化，由于各党派竞相争取工人的支持，按照财产获得选举权部门性地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1867年法案是托利党制定的，1884年法案是自由党制定的。在某些地区，托利党安抚工人的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Preston，见 Savage, 1987, pp.13—61)，大多数自由党是这样做的(对伦敦来说，见 P.Thompson, 1967)。政党在关税问题上的分离加强了跨阶级的行业联盟：伯明翰工程业支持保护主义，兰开斯特支持棉花自由贸易。

国家文职官员范围的扩大确保了政党民主为地区宗教的政府形式获得了更大的民权。政党民主现在将焦点放在控制工人的教育上：更多的英国国教徒和英国工人站在保守党一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和凯尔特人则站在自由党—工党一边。在爱尔兰之外，大部分地区(也可能是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牢牢地坚持国家政党民主。这两大政党最终使主要通过中央集权解决争端的办法制度化。英国现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族国家(见表3.3)，至少在英国本土是这样的。民权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政府职员的数量。从而形成了相对中央集权的和解和统一，正像20世纪那样的市政厅。在地方贸易委员会的选举压力下，为争取雇员接受工会费。1891年，保守党政府的"公平工资决议"同意中央政府契约中工会费决定。公务员是积极的和解者，尤其是商业委员会中的公务员。到1904年，委员会适用1896年《和解法案》在整个工业中创立了162个联合谈判委员会。从1909年起，自由立法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劳工介绍处扩大了委员会同工会和雇工的商谈，1911年《健康及失业保障法》纳入工会福利基金，从而使工会保守主义的核心人物进入了国家政府(Davidson, 1972)。全国性合并——中央集权制改革作为对责任的回报——进一步促进了和平。

然而，19世纪90年代的政党合并踌躇不前，劳工中的激进分子跃

跃欲试。1899年工会联盟代表会议选举以很小的优势投票支持独立工党。下一年成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除了获得"劳工成员重返议会"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策，而除了工会外没有其他组织。但是在1901年塔夫河谷案的判决中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在保守党的"法治"政府统治下，法庭认为工会在法律上应对个别罢工工人造成的损失负责，这是另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权概念的表现形式。保守党政府支持的进一步的法律判决使的法律的打击进一步加重。保守党的工会主义消失了，并且劳工代表委员会成员两年内增长为原来的两倍多。保守派大体上成为一个阶级政党。工人们仍然投票支持他们——尤其是在英国南部和中部，另外还有国教徒——但他们不是作为工人投票，他们力图联合有组织的劳工已经完成，即使他们的地方性控制在小城镇或乡村地区仍然有效。

但是自由党作出了反应，它的右翼"新自由党人"为互助主义者组织起来的权利和社会改革提供了保证，如贫困救济，加强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英国的道德—意识形态定型体现在与自由的非国教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布思的社会调查唤起信仰者对贫困和失业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更多的是国家结构的问题，并不是穷人和失业者的过错。对自由的道德同情是记者和教授们动员发起的，商人很少有人这样做(Emy, 1973, p.53)。布思本人称这个计划为"有限的社会主义"。它大体上都是合作主义者。在劳埃德·乔治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即他的1911年关于健康和失业保险计划以及他从递减间接税制到进步的直接税制的重大转变。国家将进行重新分配并且鼓励人们通过国家管理的保险制度自立。只有大公司的工人才可以享有保险，但保险是由政府、大部分工会、大雇主和私人保险公司一起提供的。从20世纪来说，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的改良运动。这种改革较少地来自劳工，更多地来自试图召集工人、中产阶级、一些地区和宗教的跨阶级的政党。

然而，自由党并非推进改良主义的理想工具，这两大党都继承了旧

体制的利益，托利党(广义上)是英国国教、农业和商业资本的政党；自由党是非国教和工业政党，托利党变得更加英国化，尤其是在英国南部，自由党更加北方化和凯尔特化(尽管不在爱尔兰)。在这些方面看来，这两党都是跨阶级的政党，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尽管这一时期许多雇主脱离了保守党，自由党仍包括工业家和工会(因为工会多集中在北方和凯尔特地区)。在下一个工业对抗不断增长的时期，这导致了政党内部的宗派主义。除了劳埃德·乔治外，政党领袖使政策偏离了社会整体的战略，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分离。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改革方案并未被采纳，只有一部分改革被采纳。地方政党更难逃脱。所有劳工运动都将工人选举作为政治公民权的关键要求——实际上就是工会官员——到文职机构。在英国这一点由于激进分子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而得到加强。实际上，英国劳工醉心于人事和手段，而非其他的目的：它的三个首要问题是普选权(尽管以男性为主体的运动给女性选民的实际帮助很少)、工会的集体公民权以及选举工会官员担任公职。自由党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向联合起来的劳工作出让步。

随着政府新的行政机构权力的产生，政治与人民生活毫不相干的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也可能躲不开政府，现在最好能参与管理影响许多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收益和支出。选举权是令人向往的公民权的象征，所有国家的女性和工人一样都清楚这一点。但是工人遭受深重政治剥削的半个世纪也一去不复返了，税收负担和《济贫法》减轻了，工人代表参与地方政府，一半工人参加选举。工会想为所有的工人争取选举权，自由党并不反对，尽管他们不很情愿(他们赖以得到公众支持的地方大多也是工会获得力量的地方，即广大女性)。如果不是战争的干涉，自由党不久将扩大选举权。自由党的领袖也转而为工会争取集体公民权。自由党领袖认识到工会领导应对此问题负责并为它所困扰，所以一上台便制定了1906年《贸易纠纷法》以调整塔夫河谷案判决。工会现在享有全部的集体组织，这是英国(到撒切尔时期)合作主义不满的终点，现在在自由党—工党的传统内最终制度化。如果它发

生于1820年，工人们甚至可能满足于没有投票权。但是宪章运动和后来政党民主斗争的历史，被扩大的政府公民权的范围所加强，从而使得这成为阶级政治的核心。

真正的问题在于选择自由党候选人。如果只能在工业家或律师这二者中选其一、那么选举权又有什么用呢？就在自由党候选人当选的工业选区，他们的活动家大部分是按阶级来划分的。例如，在约克郡西部，不是新自由党分子而是工商业巨头控制政党并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排除在外(Emy, 1973, p.289; Lavbourn 和 Rayndds, 1984)。甚至最温和的劳工活动家都意识到在自己的政党之内也被挡在真正的权力之外。尽管合作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合作主义的原则和改革政策、但它缺少同志友谊。它的激进分子都是理性主义的技术治国论者，他们对群众大选感到不自在，对于工党缺乏政策却又集体联合感到迷惑不解。自由党是社会名流的政党，并不是进行社会运动的政党，这就是它的主要缺陷之所在。

社会主义提供了同志友谊——团结的、重感情的、整体的——注重工人主宰自己生活这一观念。工党，首先是阶级政党，它的领袖都是以前的工人，它没有单个的党员，只有工会的集体成员。许多激进分子当面对雇主们一致的攻击时也感受到阶级对抗。这些雇主受到宣判劳工行动非法的法庭规章的支持。许多激进分子也感受到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发展趋势的威胁；他们得到了自由党员的资助。英国社会党人源于民粹主义和激进非传统习俗，增加了新经济制度的含义。它把最初的小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和男性劳动阶级的同志友谊以整个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松散的马克思主义化，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信徒海德曼到哲中主义的汤姆·曼和威廉姆·莫里斯，到实用主义的基尔·哈迪，工党的最早领袖——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工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弊病在于需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第二次革命促进了阶级融合。社会主义思想和同志友谊能扩大对字面意义上的理解。汤姆·琼斯记得南威尔士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这样的：

> 在这次工人运动期间，社会主义像新的宗教传遍了山谷，年轻人彼此询问，你是社会主义者吗？语气就像一个救世者问，你得到拯救了吗？在一代人眼中，矿工的前途有了转机。

乔伊斯敏锐地评价说：

> 社会主义如此奏效并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可接受的思想意识在起作用，而是它破坏了几十年人们对赖以生存的专制主义和顺从的理解。它闯入了雇主对当时形势的控制……穿入了工业社会的中心地区。专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详细说明人们前途范围的能力。(1980, p.229, 335)

工人现在能和雇主在同一地区内组织起来，并能运用思想体系去理解它。劳工受到经济、雇主、敌对的法庭、扩大了政府行政机构的压制。

它的选择将是什么呢？那时社会主义已经崩溃，他们转向带有合作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1914年以前的多数劳工领导人都缺少改革主义的思想。很少有人讨论劳工进入议会后有何见解。正如一个公务员评论他和劳工领导关于1911年《国家保险法》的谈判时说："他们不为他们的工人说话，不知道他们的工人想要什么，也不能束缚他们的工人遵守法令——对付他们的工人相当困难(Moore, 1978, p.113)。他们没有伟大的政治方案，甚至几乎没有基本的争论。工党和工会联盟更多的是为互助主义和手段而战，而非为改良主义的结局而战。他们对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感兴趣(尽管新自由派人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在公众事业方面减轻了失业，但没有实际的方案。令激进的自由派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工会甘愿接受集体的讨论还价也不愿接受政府的干预(Emy, 1973, pp.293—294)。就像其他国家的劳工那样，劳工对国家福利立法几乎不感兴趣。所有的劳工运动都不相信国家行为，因为国家通

常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不是带给他们好处。”

除此之外，民族问题仍起作用，虽然现在只是在政党民主内部，这更加强了工党对国家的不信任。新兴工业的核心，也就是劳工的核心，集中于苏格兰、威尔士、英国北部，这些对首都持怀疑态度的地区，与不信仰国教的劳工力量交织在一起，对于已经建立的英国国教会持怀疑态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劳工才归附英格兰—不列颠民族国家。直到那时，政府的思想还是保守的，最好能避免这一点(Pelling, 1988, pp.1—18; Heclo, 1974, pp.89—90; Cronin, 1988; Brown, 1971 的观点同这一观点不同)。

然而，一旦社会福利方案制度化，工会就会参加管理(Marks, 1989, pp.105—106)战争期间工会的参与大大地扩大了。劳工艰难地参与国家的改革，自由合作在两次战争爆发的时间转向了改良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分子、互助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社会民族国家中身份的不明确。劳工是不是市民参与者呢？1867 年和 1884 年以后，许多人拥有选举权，矿工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议会代表；其他人拥有强大代表席位，能够施加压力。许多激进分子在地方政府和教育委员会任职。工会的集体公民权最终得以实现，但是需要对法官保持戒备。实际上政府认可比雇主认可的程度大得多，有时比政治家认可的程度还大。但是和解的国家不是他们的国家，不是真正拥有民族公民权的国家，正如严格的选举制度、法律判决和英国国教的建立所体现的那样。无论劳工领袖多么小心谨慎，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是被排除在议会中心之外的。

除了坚定的革命者和忠于自由党—工党的成员，对其他所有人很难说他们不明确的地位会产生什么。他们的分裂、部分联合和部分公民权，使工联主义，但首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不真实、不合理的。1913—1914 年间是一个逐渐增强的工业对抗时期，当自由党和劳工政治没有获得任何让步时(政治家正为爱尔兰危机所困扰)，工联主义重整旗鼓。仅仅是在 2 000 个工会主义者的影响下，便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浪

潮，并形成更广泛的工业工会。但是随着这些工会同国家所支持的集体契约的扩展有关系，它们变得与其他工会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进行的实际行动熄灭了工联主义所迸发出的短暂火花(Holton, 1976, p.201; Hinton, 1983, pp.90—93)。由于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工会联合在一起，"他们罢工是支持而不是反对工会控制"(Hyman 1985：262)。

集体谈判象征着工人阶级的进步，然而却熄灭了指向对手的阶级仇恨的火花。像斯特德曼—琼斯阐述的那样(和像第十五章所证实的那样)，尽管积极进取正是新工联主义的特征，新工联主义没有把政府想象成进行血腥镇压、剥削和腐败的机器，而政府在1790—1850年期间正是那样做的。他说，政府现在被看作使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一个中立机构(1974：479)。这一章揭示了这是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国家的强制性和腐朽性减弱了；国家剥削的不是工人的全部生命。

关于是继续保留自由党—工党还是决定与工党一起奋斗一直争论不休。但这仅仅是策略问题。工党于1906年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突破(这一段基于Mckibbin, 1974)。有29名劳工代表当选为议员，他们都是工人和工会官员，同剩下的众议院形成明显的对比。但是有24人当选，是因同自由党签订选举协定的结果。如果工党保持它负责的压力，那么它的领袖就相信自由党将对普选权作出让步。在有限选举权方面，协定给予两党真正但是有限的实惠。这比互相反对要好，假如相互反对，则保守党一定胜利。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中，工党先是获得40个席位，后又获得42个席位，但是仅有一个自由党候选人。在1910—1914年期间，工党赢得了更多选票，但没有赢得任何补缺选举。工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会，然而工会仅仅只有勉强多数的成员支持其政治要求，自由党仅凭协约在矿区拥有的席位，它们的群众激进主义在工业区衰退了。

欣顿(1983, pp.80—81)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最可能的后果是协约的失效(由于活动家们的憎恶而撕毁协约)，这对于两党和将工党与集权制的自由党重组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从而使得三党民主将保持更长一段时间。麦基宾(1990)认为自由党在赢得工人选票方面已经失约了。他相信，选举权的扩大将进一步加速其衰退，两党(保守党与工党)民主将重新出现。然而选举权将在穷人和妇女中扩大，这二者均拥有很少的工会成员而且不会立刻被工党吸引，三党民主原本会扩大的。

但是战争的确发生了，从1920年起，工党选区人数大大增多，工党脱颖而出上台执政。自由党现在分裂了，部分由于内部阶级分裂，部分由于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的派系斗争。如果工党领袖更精明一些，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工党的激进分子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想拥有自己的议员，但工党却不能给他们提供这种人。

英国劳工在其他行动的压力下开始奉行改良主义，政府文官范围的扩大，雇主的催迫及平民政府方面的压制，迫使它坚决争取建立全国组织，如可能时它就和两党合作使互助主义和联合制度化。然后保守党决定成为敌对的阶级政党，而由于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冷漠，劳工和自由党领导人的积怨将使劳工放弃自由主义。在自由党和战时政府方案中，管理方面的牵连，使它转向福利国家。在这一时期之后，便是它的选举前景和计划，这一计划难以适应预见的整个战争后果和全体男子，然后是全体女子的选举权。然后它设计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民主方案。阶级政治将出现，但是是以男人为后盾的。

结论

全国劳工选举或自然采取的策略主要有四点决定性因素。

1. 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认为的集体劳工阶级部分出现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其原因不是当时生产工艺的改变，而是完全扩散性经济的出现。资本家感到了这种“完全”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但他们的反应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劳工阶级的进攻。为了防御，一个更加全国

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尽管是由一些具有部门利益的熟练工人领导的，而且部分被组织成部门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在英国，工会作为一个阶级的运作者出现，然而它们同时追求的是部门性和地区性的目标。经济权力关系的模糊性并没有自己澄清。

2. 工人运动的扩大仍保持在男性工人之间，而且随着职业的两极分化使它与复杂的家庭和社区发展隔离开来，从而使它的剥削本质狭隘化。阶级尽管变得更加广泛，但可能变得不那么激进了。

3. 因为国家政治仍然摇摆不定，男性化的阶级斗争主要是由英国政治定型，即主要通过跨阶级的政党民主、民族问题和国家的部分民主化来解决的。这些限制了资本家和体制的压迫，而且革命的社会主义，限制阶级政策的部门性和地区性变化，使阶级冲突的集中制度化进一步加快，国家缓和将占据主导地位，除非爆发一些重大的灾难，如战败、罢工等等。

4. 直到1914年，政府对劳工的温和政策的形式还未确定，尽管可选择的范围已经很小。占主导的是互助主义者，并带有一些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以两种政治之一而出现，有的来自自由党，有的来自自治的工党。

到1914年，20世纪英国阶级斗争的大部分参数似乎均已到位，这是资本家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了广泛政治性和模糊性的工人运动，而政党民主平民化的国家政治定型解决了大部分模糊的问题。然而，我忽略了英国一个重要特性，因为它涉及到英国所没有的东西，即只有英国才不存在大规模有重大影响力的农民阶级。

注释：

[1] 这一部分关于工会材料的来源是韦伯斯(1926)，潘林(1963：85—148)，克莱格(1964)，克罗宁(1979，1982)和马丁(1980：58—131)，和关于工党的材料来源是麦克考宾(1974)和摩尔(1978)。

参考文献

Ashworth, W.1960.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870—1939*. London: Methuen & Co.

Bagwell, P.1985. The new unionism in Britain: the railway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Bain, G.1970. *White Collar Trade Unio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in, G., and R. Price.1980. *Profiles of Union Growth*. Oxford: Blackwell.

Baines, D.E.1981. The labour supply and the labour market, 1860—1914.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2, ed. R. Floud and D. McClos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verman, H.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own, K.D.1971. *Labour and Unemployment, 1900—1914*. Newton Abbott: David & Charles.

Burawoy, M.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gess, K.1985. New unionism for old? The Amalgamated Society for Engineers in Brita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Clegg, H.A., et al. 1964.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889*, Vol. 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onin, J. 1979.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Croom Helm. 1982. Strikes, 1870—1914. In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1875—1914*, ed. C.Wrigley et al. Brighton: Harvester.

198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7.

Crossick, G.1978. *An Artisan Elite in Victorian Society*. London: Croom Helm.

Davidoff, L.1990. The family in Britain. In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2: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ed. F.M.L.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dson, R. 1972.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n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1875—1914*, ed. C.Wrigley et al. Brighton: Harvester.

Deane, P., and W.A.Cole.1969.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y, H.V. 1973. *Liberals, Radicals and Social Politics, 1892—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instein, C.1976. *Statistical Tables of National Income, Expenditure and Output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5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n, A.1977. *Industry and Labou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Gray, R.Q.1976. *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greaves, J.1986. *Sport, Power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rt, N.1989. Gend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 politics. *New Left Review*, no. 175.

1991. Female vit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healt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Sociology, Marburg.

Heclo, H. 1974.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ill, S. 1981. *Competition and Control at Work: The New Industrial Soci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inton, J.1983. *Labour and Socialism*. Sussex: Wheatsheaf.

Hobsbawm, E.J.1968.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lton, R.1976. *British Syndicalism, 1900—1914*. London: Pluto Press.

1985.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 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Hunt, E.H.1981. *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 London: Heinemann.

Hyman, R.1985. Mas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ncy in Britain: contrasts and continu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Joyce, P. 1980. *Work,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Culture of the Factory in Later Victorian England*. Brighton: Harvester.

1989. Work. In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2: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ed. F.M.L.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rr, C., and A. Siegel. 1954.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Industrial Conflict*, ed. Kornhauser et al. New York: McGraw-Hill.

Lash, S., and J.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aybourn, K., and J.Reynolds.1984. *Liberalism and the Rise of Labour, 1890—1918*. London: Croom Helm.

Lovell, J.198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dock strike of 1889 in British labour hist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McKibbin, R.1974.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1910—19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hy was there no Marxism in Great Britain? In his *Ideologies of Class. Social Relations in Britain, 1980—19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ks, G.1989. *Unions in Politics: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R.1980. *T.U.C.: The Growth of a Pressure Group, 1868—197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oore, R. 1978. *The Emerg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1880—1924*.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More C.1980. Skill and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870—1914. London: Croom Helm.

Musson, A.E.1978.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 London: Batsford.

Payne, P.L.1967. The emergence of the large scale company in Great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20.

Pelling, H.1963.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London: Macmillan.

1968. *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Penn, R.1985. *Skilled Workers in the Class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ard, S.1985. The new unionism in Britain: its economic backgrou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Price, R.1983. The labour process and labour history. Social History 8.

1985. The new unionism and the labour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Savage, M.1987. *The Dynamic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w, C.1983. The large manufacturing employers of 1907. *Business History* 25.

Stedman-Jones, G.1974. Working-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London: 1870—1900. Notes on the remaking of a working clas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Stone, L.1969.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42.

Taylor, A.J. 1968. The coal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ed. D.H.Aldcroft. London: Allen & Unwin.

Thane, P.1981. Social history, 1860—1914.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2, ed. R.Floud and D.McClos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F.M.L.1988.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London: Fontana.

Thompson, P. 1967. Socialists, Liberals and Labour: The Struggle for London, *1885—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ebb.S., and B. Webb.1926.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London: Longman Group.

第十八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 年(二)：工人阶级运动的比较分析

理论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全国统一的经济、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和农业的商业化。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它都导致了资本集中、工业科学、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采矿业和交通业的扩大及合并。在每一个国家这些部门都急剧扩大，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也急剧增多，这导致雇主在工资、工时方面以及对不熟练工人施加了压力。这次经济革命在所有国家都惊人地相似，工人们反应相似，尽管不明确，但还是建立了集体组织。本章通过图表说明在数个国家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有冲突。它主要集中解释令人感兴趣的结果：这些国家经济具有如此明显的相似之处，产生了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第十五章中有六种不同类型的思想意识——还有工业中阶级斗争的不同结果。俄国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德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准革命的道路；英国走的是互助主义的温和道路；美国主要是奉行没有社会主义的地方主义；法国仍在激进地讨论这六种观点。第十九章列表说明这一时期在农业中相似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两者都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把国家看作独立的个体。我把关于劳工运动没有可比性的方面如跨国组

织、政府组织、民族主义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放到一边，直到第二十一章。我用基本上相同的工业经济和农地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工业经济和农地经济多方面的相似性主要是由政治成形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团体的结构所起的作用要小一些。这加强了本卷广泛的概括性：现代社会结构更多地被经济和政治权力组织所围绕和支撑。

正像第十七章对英国证明的那样，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阶级组织、地方组织和阶层组织，这三种有竞争力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因为它们都得到发展也都削弱了其他组织，劳资关系相当模糊，并不是所有组织都按照单一的逻辑发展。然而，在工人阶级组织参加争取公民权斗争之前的五十——百年，就有了各种各样争取公民权的策略。正如罗坎(1970，pp.102—113)所观察的，劳资斗争在现代西方四个主要分裂趋向中出现得最晚——出现于中央集权和地方主义之争、国家和教会之争、旧的土地所有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之争以后，我应该加上一点，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主要是军国主义的，因此在工人阶级出现以前，现代国家定型于“代议制”、“民族”和“军事—文职”的问题上。然而，整个西方资本家和工人反应都相似，模棱两可，在生产领域有相似的变化，工人政治在不同相当程度上受这些定型的影响。

一种大趋向是可以作为所出现的复杂的政治经济交织现象的基础。在国家至少让一部分工人参与政党民主的地方，工人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就分开了。在这方面阶级组织、地方组织和宗派组织并肩发展，后两者削弱了潜在的阶级团结。因此，社会党人的思想意识更加温和，更加经济化，最多等同于互助主义和工联主义，偶尔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牺牲工人阶级的团结。只有在政党民主方面未对某些工人作出让步的体制才能克服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阶级团结才能得以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进行激烈的改革甚或进行革命。

这并不完全是最初争议的问题。当然，我借用了列宁1902年著名的宣言：“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产

生工会意识”(1970， p.80)。

就“工会意识”而言，列宁的意思不仅仅是经济主义，因为狭隘的工会利益也要互助立法来保证组织起来的自由。但是列宁认为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成分是富有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代表——知识分子从外部加到工人阶级斗争中去的。这些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自觉的成长中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

列宁的论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些论著的核心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强调的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和榨取剩余价值都不足以解释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出现。他们自己所产生的这些经济远远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甚至通常也称不上是改良主义，他们所产生的阶级力量还不如部门煽动者的力量(参看 Marks, 1989, p.15)。但是列宁论断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一定是外部知识分子带来的是不正确的(就像列宁在其他地方意识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一样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尽管仅仅是在他们多样化的生产经验被普遍的政治剥削经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借鉴了更近代的作者的观点。伍思诺(1989， part 3)曾强调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尽管他没有提出全面的观点。李普塞特非常有名的论断是政党民主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分崩离析(1977， 1984)。李普塞特认为国家可以被置于连续的单一政治体制之中，从封建制度到自由制度，从其可以预测工人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和范围。他说，因此封建体制产生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混合体制产生的是社会主义改革，自由体制不会产生社会主义，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有许多正确之处。但是我反对他过分使用了“封建制度”。我也反对他对劳工历史和民主过于温和的观点(尤其是在美国)。他的观点是将镇压缩小化，而忽略了各国政府中的军事和文职的变化。和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也忽略了民族问题。

国家并不是一维的，本章区分了四种基本型的国家成形。所有国家都被定为资本主义，因此这对于预测整个时代的阶级成果的变化没有

多大帮助(除美国这一非常特殊的例子之外)。军事主义和政府文官职责范围的扩大如果不平均的话，可以提供多一点的帮助。但是总的来说，代议制和国家定型能解释大部分劳工斗争的多样性。

关于国家劳工运动的数据比较

我提供的是关于所讨论的五个国家再加上瑞典等这些国家劳工运动的简单数据比较，然后我再转向对于这些国家的细致分析，以俄国代替奥地利，因为关于奥地利的研究很少，对俄国的研究却很多。[1]

表18.1所列出的工会成员的比例，是在能得到所有国家数据的时候开始的。这些数字只是大致的。工会和政府的记录有很多不精确之处，国家的统计资料是用不同方法搜集到的。我排除了农业和军事力量。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很少能团结起来，然而在不同国家，农业和军事力量比例的变化很大。

表18.1　1890—1914年非农业平民劳动力中工会成员所占的百分比

	奥地利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瑞典
1890	1.0	12.2	2.2	3.2	3.5	1.2
1895	2.0	11.6	4.0	2.7	3.5	1.6
1900	2.3	13.7	4.2	5.9	7.8	7.0
1905	3.4	14.0	6.6	10.2	14.3	10.2
1910	6.5	18.8	8.1	13.5	12.5	11.0
1914	6.5	23.6	8.3	12.5	13.4	12.2

注：非农业劳工数据也排除了军队成员。所有估计的数据由其他可利用的数据直接算得。

奥地利：非农业劳工(NALF)——《法国年鉴》(1913, p.183), 1914年的数据事实上是1912年的，Bairoch等(1968, p.85)。所有数据仅是奥地利帝国的。

英国：NALF——Bain and Tilly(1974,附录B)；Mitchell(1983, p.171)，这些年是1891, 1896, 1901, 1906, 1911, 1914。1896、1906和1914年的数据是估算的。

法国：工会成员——Shorter and Tilly(1974,附录B)；Mitchell(1983, p.163)。1890和1914年的数据是估算的。

德国：工会成员——Bain and Price(1980, p.133)，排除带薪雇员联合会。

NALF——Mitchell(1983, p.164)，数据是1882、1895和1907年的。NALF数据是根据这些估算的。

美国：Lebergott(1984, p.386—387)。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劳工数据要想精确是不可能的，Lebergott的数据来源排除国内的公务员(Bain和Price的数据包括公务员，但也把在那年有两份工作的人记录了两次；他们的工会成员数据也包括加拿大的)，因此，我的工会密度数据可能有偏差，或许偏差1%到2%。

瑞典：工会成员——Bain and Price(1980, p.142)，NALF——Bairoch等(1968, p.114)。

在这整个时期工会会员在所有国家却是少数派。直到1914年，英国的比例到那时是最高的，但它仅是非农业劳动力的1/4。因为每个地方的工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的密度高，女性的密度低，男性密度至少高1/3。但是图表表明整个时期工会会员的数量稳定增长。对工业的分析将揭示同英国激进派的相似(在第十七章中讨论过)：直到1914年，在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属制造业中，男性熟练工人的密度达到50%。所有国家工业和职业的相似之处如此引人注目，所以在这一章我很少讨论特殊行业的关系，除非谈起相反的。我对英国的讨论能大致代表作为领先行业所发生的变化。

国家工会的密度不同主要是因为各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不同，没有严重的落后者。特别指的是按照思想意识或政治上的厌恶程度对工会一致或不一致。尽管法国工会的密度比期望的要低。这可能部分归因于法国的调查数据有误，部分归因于法国早期有特色的工会的出现，法国工会成员被限定为军事人员，他们能动员非工会成员举行示威和罢工。总之，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工会成为男性熟练工人，然后是非熟练工人和女工组织起来减轻痛苦的正常手段。工会是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集体反应；它们恰恰是马克思关于出现的集体劳工的中心观点。

罢工的比率通常被用来表明集体劳工经济上的激进程度。表18.2表明国内非农业劳动力参与罢工斗争的比例。与另两个相比，我倾向于这个标准。罢工损失的工作时间的长短受单一大罢工的影响而没有规律的波动，而罢工的数量由于很小的罢工而膨胀，衡量一般的激进程度则更轻。

表 18.2 1891—1913 年(五年均数)罢工的非农业劳动力占平民的百分比

	奥地利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1891—1895	—	2.5	1.0	0.1	2.7
1896—1900	1.4	1.1	1.1	0.7	2.3
1901—1905	1.2	0.6	1.6	1.2	2.9
1906—1910	2.2	1.3	2.5	1.4	—
1911—1913	2.2	5.0	2.0	2.0	—

资料来源：劳动力见表 18.1。罢工：奥地利——《法国年鉴》(1913, p.184)。英国——Cronin(1989, pp.82—83)。法国——Perrot(1974, I, p.51)。德国——Cronin(1985,表 3.4)；自由工会数据，1890—1898；官方数据：1899—1913。美国——Edwards(1981)。

罢工非常少，每年罢工人数只占劳工的 4%，一次大罢工浪潮的罢工人数是它的 2 倍，就像 1912 年英国的罢工那样。1905 年俄国革命使罢工人数增长了 10 倍。尽管罢工不统一，但整个时期罢工都在增长，在美国罢工没有持续增长。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这些国家工业水平如何，罢工比例却是相同的。

所有国家都受到资本主义跨国传播的影响，尽管有些国家比较先进，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然而不同国家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特色(德国与美国的卡特尔—托拉斯、法国的乡村工业等等)。所有的资本家都对国际市场状况和技术有所反应并采取行动。俄国可能是落后的，但是它的大企业装备有最新式的机器、账目结算和科学的管理等等。每个地方的冶炼业、采矿业和交通业这三个现代工业部分也都有点双重性。它们包括了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然而它也(加上化学工业)产生了最大的企业，这些企业拥有最发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以鼓励雇主和雇工建立部门组织。这些企业还拥有强大的雇主对工会进行抵制。尽管有这种双重性，在不同国家的同一行业大部分工人的行动方式惊人地相似。就像格里特(1985, p.126)观察到的那样。

因为贸易周期和雇主竞争超越国界的扩散，雇主和工会的进攻也是如此。罢工浪潮遍布西方世界。五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有这样的数据，1889—1890 年有罢工浪潮；六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有这样的迹象，

1910—1912年六个国家都这样——这些日子任何国家都没有发生其他罢工浪潮。(Boll, 1985, p.80, 1989, Cronin, 1985；这些作者也尝试着提出1870—1873有早期的国际罢工浪潮)。社会党领袖(像第二十一章所表明的那样)建立了稠密的国际交流团，并认可马克思的基本的工人组织跨国理论。

如果经济权力关系相似，甚至是跨国相似，但是政治不是，表18.3表明劳工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不同命运。劳工中社会党人的选举增加了，但是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比例增长，德国、奥地利、瑞典(加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2]处于一个极端，直到1914年它们的社会党成为最大的单一党，获得了大部分男性工人的投票。另一个极端是英国的社会党为获得5%的选举而斗争——或许是男性白领工人10%的选票。英国工党也使用严格的选举权而进行反对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它获得的实际选票少于工人的支持。因为一半多的男性工人没有选举权，政党在压倒多数的工人阶级选区支持候选人，在表18.3的第二行，我对工党的选票作了相应的调整。任何调整都是猜测性的，但是我估计英国工党的选票可能与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获得的选票不相上下，比北欧社会党获得的选票少。

表18.3 1906—1914年国家选举中投票给社会主义者的(男性)选民的百分比

	1906—1908	1909—1911	1912—1914
奥地利	21	25	—
法国	10	13	17
德国	29	—	35
英国	5	7[a]	—
调整以后[b]	10—15	14—21	—
瑞典	15	29	33[d]
美国[c]	—	—	6

a：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中，工人的投票率为6.4%和7.6%。

b：调整是将34%的英国人(几乎都是体力劳动者)从特权阶层中排除出去。假定这与成年男性投的票相一致，那么劳工的候选人数会翻一倍。

c：注意，所有的黑人男性都没有公民权。

d：在1914年的两次选举中，社会主义者的投票率为30.1%和36.4%

资料来源：Cook and Paxton(1978)。

很难衡量雇主的思想意识。他们的思想极端程度的标志是通过采取的行动所杀害工人的数目(他们的过失行为杀害的工人数量，比在恐怖工厂和采矿业以外事故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在劳工争端中，没有关于劳工死亡的官方系统的记录。通过梳理每个国家都在本章参考文献中列出的二手资料文件，我已经对每个国家作了大致的估计(见表18.4)。挑起暴力反对工人的是雇主和当局，事实上所有的牺牲者都是工人。

表18.4　1872—1914年劳工斗争和被杀害的工人

英国	德国	法　国	美　　国	俄　　国
7	16	可能有35	可能有500—800	可能有2 000—5 000

英国的谋杀记录是最少的。它的七次死亡事件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和1910—1913年间。令人吃惊的是，半独裁统治的德国紧排在后面。在死亡的人中，有8个死于1889年，3个死于1899年，2个死于1905年，3个死于1910—1911年间。在法国，1872年死亡人数为1个或2个，1891年死亡人数是9个，1905年的死亡人数是1个，1907年死亡人数是19个再加上好几个。英国、法国和德国死亡的总人数可能被低估计了，但是偏差不大。它们的范围同俄国和美国的范围遵循了完全不同的规则。美国估计的范围变化是由美国劳工历史学家提出的，尽管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对美国南部黑人施行私刑或枪决(被排除在总数之外)将涉及到劳工的争端。然而美国实施暴力的规模仍不及俄国的规模，俄国的伤亡人数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因为劳工争端融入更广泛的城市抗议，新出现的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之中。但是区别如此显著以至于是真的。看起来雇主和政治体制对工业行为的反应在方式上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国内军国主义的水平同它们在代议制国家成形中的地位没有关系。俄国是君主专制最严重的国家。但是美国是政党民主最完善的国家。

工会的密度、罢工、死亡和对特定的人为政党投票只是工人战斗性

和社会主义最粗糙的标准。但是它们提出了一种更广泛的倾向：经济关系在整个西方世界有以共同模式扩散的趋势，政治关系却不同。我现在将更加密切地关注个别国家，集中考察它们的政治成形。除非所说的情况相反，应该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所有国家的扩散大致相同。

美国：政治成形和社会主义的衰落

对于“社会主义为什么如此少”的十三个答案

关于美国劳工历史的讨论，传统上将中心放在假定“美国例外”上面，尤其是美国缺少社会主义。桑巴特提出的经典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缺少社会主义至少有十三种解释(对于这些观点来说看 Lipset, 1977; Foner, 1984; Laslett 和 Lipset, 1974)。把根据美国是否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民主代替了社会主义，而把这十三种解释分成三组。

个人主义

1. 小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大部分殖民地是小农业主建立的，他们仍是革命的中心，是杰斐逊运动和杰克逊运动的中心。小私有者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占主导地位。早期美国不同情“封建社会”，后来的美国不同情社会主义(Hartz, 1955; Grob, 1961 强调了五个关于个人主义的论题)。

2. 边疆理论。最早是特纳在1893年提出来的，特纳认为，在残酷的环境中开拓边疆的斗争就如同对敌战争，这导致了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产生而反对集体主义。由于边疆拓展要求对神话般的文化引起共鸣，它影响了整个美国，是种族优越感和生存空间，而不是阶级斗争得到了鼓励(Slotkin, 1985)。

3. 新教教义鼓励个人主义。没有国家宗教，拥有强大的新教教派，美国鼓励个人从自己的伦理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

4. 迁移的机会鼓励个人寻求个人发展而不是集体发展。

5. 资本主义财富在美国人中扩散。 他们一直不愿干预私有财产关系。 美国工人一直就是物质主义者。

地方主义

6. 种族主义、奴隶制分裂了早期的工人阶级。 直到二战以后一直存在种族隔离制，每个地方黑人和白人的阶级团结依旧很难，尤其是 20 世纪早期大批黑人移民北方的时期(Laslett, 1974 年强调了所有地方主义的解释)。

7. 移民。 移民潮加剧了伦理、语言和宗教信仰的分裂。 老一点的移民群的据点已确立，加强了具有种族特色的地方主义。 19 世纪晚期的天主教移民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因为教会后来进行十字军东侵反对社会主义。 克拉迪特(1981)声称移民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伦理而不是以阶级为归宿的。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自给自足的种族文化社区，而不是工人阶级社区，工人社区并未加强而是削弱了集体劳工的力量。

8. 大陆的多样性。 美国大陆的面积和多样性使不同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不同。 不同工厂的工人在空间上一直相互隔绝，并且工厂一直在向没有团结起来的地区迁移。 为了确保不出现世代相传的工人阶级社区，工人们更多地迁移。 全国性的阶级团结从未真正出现过。

9. 宗派意识。 美国劳工由于派系斗争而内部分裂，像劳动骑士团、美国劳联竞争的社会党、工联主义者、产业联合会和共产党等。 如果它们更多地同资本主义战斗而更少地相互争斗，结果将大不一样(Weinstein, 1967:Bell, 1974)。

美国民主

10. 早期男性民主。 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工人阶级出现以前，美国成年男子获得了民主。 曾用珀尔曼(1928, p.167)名言“自由投票权”，这是赞成美国民主观点的绝妙用语，不用求助于其他像社会主义一样的思想意识，而是通过自由民主，工人们就能缓解不满情绪(Lipset, 1984)。

11. 联邦主义。 美国宪法规定在相对较弱的中央政府(拥有很小的非工业资本城市)和相对强大的州政府之间实行分权制。 在政府的三个分支：总统、国会两院和独立司法权。 工人不得不分散对政府各机构的注意力，这就削弱了国家的阶级政治化和阶级团结(Lowi, 1984)。

12. 两党体制。 直到劳工出现，两个跨阶级的政党才建立起来了。国会选举建立在大的选区之上，总统选举，只建立在全国范围内。 出现了第三党，包括劳工党，都不能通过首先获得少数代表而在国家政治方面稳步前进。 由于劳工在选举总统或参议员方面不够强大，它在能赢得选举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就能发挥作用，而不用去组成一个不能赢得选举的劳工党。 然而，政党在联邦体制中要比在更加集权政治中要弱。 这就放松了对政党的约束，它们对更广泛的阶级纲领没作出什么回应。

13. 压制。 关于美国民主比较愤世嫉俗的观点是强调非凡而特别的压制水平，即动员司法和军事来镇压美国工人阶级运动(Goldstein, 1978; Forbath, 1989)。

这十三个论据在解释美国社会主义相对弱小方面有一定价值。 是这些决定了结果吗? 这就是说所有这些不平等机会都摊在社会党人身上，社会党人怎么可能取胜呢? 但是在美国无论是敌视还是特别之处都不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的程度。 美国并不是一直都如此例外，像它逐渐在劳工关系中代表一个极端。 美国同其他国家的情况在性质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同其他国家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不是类型不同——我们已经看到1914年以前英国社会力量相当小。 美国并不是生来就极端化，美国是逐步走向极端化的。 因此，维护美国从开始并且一直都是例外的观点——或者是极端解释——第一群体的大部分——它的正确性非常有限。 我们将看到美国的极端主义产生于这一时期。

截止到“一战”时美国劳工的发展

我首先关注的焦点是美国极端主义的本质和形成时间。 有几个作

家认为它在于美国的政治权力关系而不是经济权力关系(Montgomery, 1979; Forer, 1984, p.59; Marks, 1989, p.198)。美国同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不同是因为在1912年总统选举中从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的选票超过尤金、德布斯的政党所获的6%的选票。美国同英国不同，美国白人社区没有一个工会占主导的劳工党。美国既没有重要的社会党人，也没有工会为主的劳工党。但是极端主义也不仅仅是在政治上，20世纪的工会也变得激进，最终削弱并变得无足轻重。1990年，美国工会会员是不到劳动力的15%，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低的一个国家，而且仍在明显的衰退。1958年艾森豪威尔重新指定5月1日为法定的劳动日——得到美国劳联的称赞——这是美国劳工史上一项聪明的重新命名(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作为一名外国居民，我一直对美国国家政治或州政治缺少工会而感到震惊。《共产党宣言》对美国大学生就像《吉尔伽美什史诗》那样陌生。

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两种极端主义是什么时候兴起的？表18.1和18.2说明1914年以前美国工人加入工会或多或少是我们对工业化水平的期待。确实，根据霍尔特(1977, pp.14—16)对钢铁业大部分精确的比较研究，1892年美国工会密度大约是15%，而英国落后，在11%到12%之间。对于国家工会成员是早期那个时代的估计证明，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工会密度大约是6%，美国是5%。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会密度大约是10%，美国是9%，直到1880年，美国工会的密度下降到4%，在再一次增长之前是英国的一半(Ulman, 1955, p. 19; Rayback , 1966, pp. 104, 111; Montgomery, 1967, pp.140—141; Fraser, 1974, p.76)。由于英国工业化的程度较高，我们期望英国工会的密度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定。这些数字表明，美国工会在开始时并不比英国工会的势力弱，因为美国相对低的工业化水平将证明这一点。

这些数字都是不确切的，即使完全精确，它们对阶级组织的衡量也是粗略的。高工会密度和高罢工比例表明，阶级意识觉悟高的工人以

及“商业工联主义”一般都被看作是典型的美国特征。在对20世纪美国劳工关系特征的分析中，下面三点是显而易见的。

1. 几乎在整个19世纪，美国工人经历的工业化水平相比较而言并不比欧洲落后。美国工人积极参加早期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美国不需要像宪章运动或1868年起义那样的准革命运动。但是美国的好斗分子是激进的，被灌输以民粹共和主义思想。因为工人大部分在北部，各州的主要民族问题并未将他们分开。美国工会是激进的但不是革命的，美国工会或多或少的像英国那样发展，与英国相比有点落后。小的行业工会花费心思确立社会地位，制定福利计划，试图单方面制定比率惯例，雇用它们自己的劳动力，严格限制其他的互助会，逐渐成为地区组织，然后是国家组织。超出它们能力之外的是在大的工业工会方面的数次努力，它们面对贸易周期和雇主的攻击是脆弱的。很少有工会同情社会党人，大部分工会都奉行保护主义或者是温和的互助主义，它们期望使它们自己的“立法”生效——同19世纪中期英国的经历非常相似。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极右主义或极左主义没有什么市场。(Ulman, 1955; Rayback ,1966, pp.47—128; Montgomery, 1967, 1979, pp.9—13; Wilentz, 1984)。

然而，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一种想象的面貌已经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家庭和本地社区的联系倾向于支持工作的团结一致。但是在英国大部分城市中，这种支持被伦理—宗教社区削弱了，伦理宗教社区这样的组织比工会更容易争取当地两党民主的政治支持。(Hirsch, 1978; Katzenelson, 1981)。

2. 英国工人随后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作出断然的、像阶级形式那样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比美国工人的反应更加强烈在铁路联合会的领导下，美国企业、采矿业、银行业从1870起开始合并成更大的企业，托拉斯和垄断组织受到不确定的排斥，但是股权公司兴盛起来。大约在1900年开始了企业合并高潮并且开始有了科学管理的观念。1905年，100家最大的公司占国家工业资本的40%，超过任何国家。公司合并可能使任

何一个国家的雇主对技工自治、技术、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猛烈的攻击。技工和工会尤其受到攻击。大规模雇用非罢工工人、不熟练工人和不加入工会的人为先锋，他们大部分是移民和从农业迁移而来的。雇主变得更有组织更有进攻性，更加有创造力。他们的间谍渗入各种水平的工会，直到劳联自身的最高委员会。古德耶橡胶公司雇用了 800 人的“飞行中队”，训练了他们三年以胜任工厂的任何工作以防罢工(Montgomery, 1979, pp.35, 59)。19 世纪晚期的极端主义者是雇主而不是工人。

根据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的论证，雇主的极端主义应当增进团结和对劳工运动的进攻。它确实如此。工人们是在几次大罢工浪潮和工会扩张中作出回应的。群众罢工的主要武器是工联主义，1870 年以后的七十年内在美国像英国或德国一样普遍。在 1872 年，10 万纽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下一年接着至少有 8 个北部的主要城市举行反对失业的示威游行。1877 年铁路工人罢工，受到许多城镇的同情和普遍示威游行的帮助。“19 世纪最大量的工人卷入到劳工冲突中”并且赠予“全国范围工人的阶级觉醒”(Rayback, 1966, pp.135—136)。19 世纪 80 年代有一个“大工会”运动，劳动骑士团要求技工和工业公司团结一致反对资本。直到 1886 年，骑士团有 70.3 万成员，占非农业劳动力的 10%。1886 年 5 月 1 日为缩短工时有一次全国性罢工；19 万工人走出工厂，另外 15 万工人未罢工而缩短了工时。这一年底，又有 10 万工会会员参加了罢工。

像许多早期工会那样，骑士团不能稳固它们的组织而衰落了。现在，劳工开始同主要的技工工会合作。这样将会有更大的罢工浪潮。1889—1894 年第二期罢工规模是后来罢工规模的 2 倍(Montgomery, 1979, pp.20—21)1892 年，一次总罢工使新奥尔良三天处于瘫痪状态；然后是缓慢罢工，它破坏了全国的铁路网。1897 和 1898 年，10 万采矿工人罢工。1902—1909 年西部矿工联盟罢工，要求对“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一次彻底革命”。在所有情况下非工会成员和工会成员一起参

加罢工，许多罢工是社会党人领导的。

在罢工人数方面，在好战的社会主义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到1900年美国工人运动并不落后(表18.2证明了第一部分的观点)。1872年德国有10.9万工人罢工，1889—1890年有39.4万人，1900有13.2万人，1905和1912年大约有500万人。法国的罢工浪潮也有类似的上升趋势(Boll, 1989)。19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有相当可观的罢工浪潮。1894—1895年罢工浪潮相对1889—1893年间较小。然而，1910—1912年间，罢工人数上升到新的高度，那时有100多万人卷入罢工(Cronin, 1989, pp.82—83)。这一阶段末只有美国有所不同，1905年后，劳工的不安没有较大增长。外国的社会主义观察者像恩格斯、爱德华·埃夫林、埃莉诺·马克思谈到社会主义早期的激进性。他们欣赏美国具有共和特色的社会主义。骑士团在其宪章中宣称："我们宣布劳工的工资体制和国家的共和制度有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冲突。"但是外国社会党人期望本国的共和主义和小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像德里昂的社会工党和德布斯的党那样达成有创造力的妥协：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党在美国可能不一样，但为什么英国式劳工党和技工与工业工联主义的合并不能发展成单一的工人阶级运动呢?

3. 直到1900年，美国的劳工政治也没有落在英国后面(美国是一个有着最可观的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党人领导大罢工要早于英国。他们的思想影响劳工骑士团将政治和经济口号融为一体，像"废除工资体制"和"解放工人阶级"。劳联劳工、骑士团、农场主和激进的政治分子多次试图成立统一的劳工党(将在第十九章中讨论)。这些政党在工业城和农场的地方和州选举中取得的胜利早于英国劳工。英国社会党人将美国模式看成是可以模仿的典范。

在1893—1894年，劳联获得很大发展。它讨论了改良主义的计划；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公共设施、交通、采矿公有，废除血汗工厂和劳工契约；实行义务教育。序文强调"独立工党的政治基本原则"，

它们的最高要求是将产品实行全民所有，全民共同分配。这由个别工会加以讨论，然后在1894年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大部分工会同意这一要求，但是劳工领袖，尤其是工会主席塞缪尔·龚伯斯，反对政治工联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这一要求。工联宪章允许国家工会派比州和地方工会——社会党人主要的根据地更多的代表参加投票(Grob, 1961, p.141)。因此，1894年大会有部分舞弊行为，会议陷入僵局。个别目标得到批准，但是对公民权的要求由于提及土地国有而被削弱。序言以1 345票比816票而失败，这个方案作为一个整体以117票比735票而失败，社会主义因将龚伯斯逐出职位而遭到报复。

1895年大会开始澄清结果。龚伯斯通过向个别目标让步而重新任职，但是他组织了大量选票反对政党政治。他得到许多工会宪章的帮助，这些宪章禁止政府候选人——跨阶级的两党制方法，政党成员只能因政党政治而不和。因此，龚伯斯仍任主席一直掌权到1924年他去世为止。尽管社会党人有好几次动员了大多数成员(1/3以上)，劳联一贯反对工党，社会党人能够通过他们喜欢的所有方法议案，但是如果劳联依靠两党来实现立法议案，他们必死无疑了。

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工会在英国之前有点向改革的工党靠拢。英国工会联盟只在1899年为工党投票，基本上没什么政策。美国的结果最初是封闭的，并不是过多地由对美国例外的长篇大论进行解释而决定，然而它却因此一贯被批准，但我们不能仅仅将它归于龚伯斯的阴谋诡计。投票表明了两种相关的模式。

1. 美国这个国家相当支离破碎。像大部分国家一样，宗教至关重要，教会因以种族、本地、社区为中心而大大加强。劳联成员和领导人有一半是天主教徒。劳联大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很少得到来自天主教代表的支持，但是他们动员了2/3的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我在这一章的结论中解释这一时期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

2. 技工和其他工人之间的宗派界限也很重要。在五个一般的采矿业、纺织业、酿酒业工会对各阶层开放，规定会员人数要低于劳联会员

的25%，但是劳联大会上左派选票占49%—77%。行业工会从失去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到失去内部劳动力市场，像制靴工人和制鞋工人、机械师、木匠给工会提供了断断续续的支持。捍卫者关闭了技艺工会，像印刷工人、塑造者、机车工程师，他们大量的为龚伯斯“纯洁而单一的工联主义”投票(Marks, 1989, pp.204—210, 235—237; Laslett, 1974)。但是劳联宪章允许这些国家技工工会操作选举。

因此，劳联的“集体劳工”被宗教—种族，本地社区和技工宗派分裂开来。它算不大上是国家阶级运动。我必须尽力解释其原因。

从这一阶段开始，美国劳工发展为独立的有组织的党派。三种发展趋势进行竞争，每一种发展趋势在每个不同的组织中占主导地位——同其他地方的劳工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劳联的大多数以及整个运动大多提倡保护主义、宗派的技工工会主义。第二，一般的产业工会，劳联成员占少数，寻求广泛的阶级合作运动。“二战”以前，这两大工会的成员如表18.1所示，合起来的数目并不落后于与之相比的其他国家；并且它们分裂后本质上并不比英国或法国工会差。但是激进产业工联主义者也转向奉行工联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the “Wobblies”)。从1905年起，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了不熟练工人和边缘工人的短期罢工，这些人经常是没有选举权的女性和移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并未太多干扰付费成员(在1912年高峰期只有1.8万会员参加)或者同雇主谈判契约。但是它们充满豪言壮语的罢工引起了有产阶级的恐慌。战争对它们起到了破坏作用。然后它们分裂为新的形式。产业工会形成了同劳联敌对的组织——产业组织大会。

第三种趋向是改良的社会主义，是少数产业工会发展为改良的社会主义，并且在西方发展为社会党。到1912年发展到不大可能再有发展的阶段时它的成员增长到11.8万人。1914年它选到市和州办公室有1 200名代表，控制了许多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和城镇的市政厅以及大部分小产业部门、采矿业、或铁路枢纽。但是1912年后它很快衰败分裂了，其活跃的部分组成了共产党。

因此，宗派化有三种倾向——技工工会主义、产业工会主义、改良的社会主义——都缩小了。尽管20世纪30年代在成员和战斗性方面有实质上的膨胀，但仍不及欧洲发生的情况。美国的工会运动基本上是支离破碎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劳工运动几乎销声匿迹了。现在劳工关系组织的主要形式是非工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和授予雇主特权的比较稳定合作的部门，还有二级部门赤裸裸严重地剥削主宰着劳工。

因此，像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的经济和政治行动看起来是第一个主要的转折点[3]。广泛的国家阶级本身和社会主义的崛起，然后都撤回到占主导地位的有美国特色融为一体的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宗派主义。我们发现了其他地方非技术技工的阶层界限和一些国家(例如法国、德国)的宗派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是，独有美国将二者融合，外加一个自称的地方主义，独有宗派主义与党派思想和地方社区有关，这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身份和力量。为什么综合？编年学最能使第一组解释无效——通常是对于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自我称颂的看法——声称持久的“美国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一部分(Wilentz 1984年也谈到这一点)。19世纪美国工人阶级表明：美国有和其他国家一样多的阶级组织，有和一些国家一样多的早期社会主义。世纪末美国的阶级组织和社会主义怎么了？我的答案紧密结合有美国特色的四大政治成形。

美国的四大政治成形

1. 国内的军国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雇主的极端性。因此，一种看似合理的答案是美国工人阶级受到暴力镇压。大部分大罢工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在相对有利的19世纪早期以后(根据Katznelson, 1981, pp.58—61)，内战后美国发生剧变走向另一个极端。培夫脱和罗斯(1970：281)简单阐明了最主要的因素：在世界上所有工业国家的劳工历史中，美国劳工史是最血腥和残暴的劳工史。实际上，专制的俄国情况更糟，但是这个例子除外，关于美国这一时期尤其例外，或者说美国

工业暴力和辅助军事镇压极端化。许多作者颂扬美国例外甚至未提这一点，而更糟的是他们宣称美国实际上几乎没有暴力(Perlman, 1928; Hartz, 1955; Grob, 1961; Lipset, 1977, 1984)。但事实恰恰相反。

自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工人面临着两种压迫。第一，他们被(自由派资本家)对宪法和劳动合同的随心所欲的解释所侵扰。就像我们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看到的一样，公民权被认为其本质是个体，而非集体的。虽然工会和罢工从原则上自1842年起就是合法的，但是大部分次一级的行为，因同情而加入的罢工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合抵制都被认为是否认雇主控制自己财产的合法权利的"阴谋"。如果雇主雇用不参加罢工的工人，而罢工纠察队员阻止他们上班就被认为是非法。雇主劝说警方执行法律或者他们自己去法院获取强制执行法令。法官把工人的策略说成是个人基本财产权的"暴行"、"专横"、"篡权"。大多数劳工法都是各州自己制定的。但自1894年开始，最高法院开始介入，把《谢尔曼法案》从防止企业垄断的初衷改为防止工会的垄断。如果罢工或联合抵制不涉及工人自身的工资或工作条件，也不源自合法的个人权益，就被认为是"恶毒"的。自19世纪80年代，因同情而参加的罢工有15%以上被法令禁止，在20世纪则高达25%之多。雇主没有被禁止其继发性地关厂和开放工厂；他们可随意处置自己的财产。

法庭同样干扰行业工会方面的立法。到1900年，州和联邦法院已经废除约60部劳工法，尤其是关于反对惩罚罢工工人、用代币券支付工资(在企业的商店中消费)，为男人规定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虽然法院通常对女人和孩子负有道义责任)，减少阴谋的法律等等——所有这些法律都被作为"阶级立法"而废除。司法对普通工会或者社会党人的镇压最为严厉，因为他们能发动基于个人利益的广泛罢工和联合抵制活动。对能够把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组织在一起的罢工，法院颁布禁令，称这些罢工是"专政"、自由的对立面(Fink, 1987; Forbath, 1989; Woodiwiss, 1990)。

第二，法律得到军事和准军事力量的支持。在大罢工中逮捕了1 000—2 000人，在小罢工中逮捕了100—200人，工人是习以为常的。警察和迅速膨胀的全副武装的力量完全应付得了大多数罢工。但是在少数规模较大，被认为有危险的罢工，或者当不参加罢工者需要保护时，正规军、州民兵和雇主的私人武装力量通常代表合法的权力——这在欧洲是不为人知的。1877年和1903年间，在500余次争执中使用了州民兵，有时这些武装力量还得到联邦军队的支援。最大的私人军队——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拥有比美国军队还多的人员。

他们不仅仅逮捕人。这一时期，在劳工关系方面，仅有沙俄的死亡统计数超过美国(如表18.4所示)。为什么美国这么残暴？可能因为枪支更普及。任何见过罢工的人都知道罢工的场面：人们你推我挤，拳头挥来挥去，特别在工厂的罢工纠察队活跃时更是如此。双方手中都拿着枪，很容易造成死亡。目睹了英国足球流氓和美国少数民族骚乱者与警察的搏斗，我无法相信在美国造成更多死亡是因为美国年轻人比英国年轻人在情绪上更具有“暴力”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美国人有枪。但是，我们必须为美国的屠杀加上第二个原因：美国的雇主和警察不愿妥协，所以暴力倾向会演变成行动，并允许使用含“炫耀性的武力”。这种僵化、不灵活是美国和沙俄共有的特征。

在沙俄和美国，几乎所有的暴力都是由雇主，政府当局实施的，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工人。在1877年的一次铁路工人罢工中，4.5万人的州民兵和2 000人的联邦军队造成了至少90名工人死亡。在1894年的铁路工人罢工中有34名工人死亡。在1902—1904年的罢工浪潮中，根据可靠数据，至少有198人被杀害，1 966人受伤，5 000多人被捕，这是暴力的高潮期。在这之后，暴力仍零星可见，特别是在西部，如1914年在科罗拉多煤矿工人罢工中死亡74人。

暴力，像合法的镇压，集中针对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罢工，针对想联合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建立大工业工会的罢工。难怪记载暴力行为的主要编写人罗伯特·戈德斯坦总结道：镇压对削弱美国劳工扮演了重

要角色，并且是劳工激进主义和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1978，pp.ix, 5—6, 550)。威伦茨(1986，pp.252—253)指出1886年至1894年间受镇压后的失败是工人罢工事业的转折点。谢夫特同意劳联手工业工会主义战胜了统一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者被完全打败了。霍尔特(1977)指出镇压可以解释美英钢铁工业工会的不同发展轨迹。尽管最初美国钢铁工业工会比英国钢铁工业工会的力量更强大，但1892年对霍姆斯泰德罢工的镇压最终摧垮了他们。他们于1901年被美国钢铁公司毁掉，尽管公司最初谨慎地提供给导致手工业工人后来分裂的养老金和股票持有者的权益(Brody, 1960, pp.78—95)，但工人们最初表现得很团结。他们没有对雇主决定赶走工会的做法作出相应回应。雇主雇用了大批工贼、平克顿手下的人和联邦军队，并把罢工工人列入黑名单，进行工业间谍活动。最终雇主们可以把许多手工业工人从团结的整体中剥离出来，从而镇压其余的工人，这是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美国极端主义——这一段令人吃惊的时期已经深深地留在美国政治和学术回忆录中。

用军事主义来解释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为什么美国的镇压不像我们后来看到的欧洲镇压那样，反而增加了工人的团结性和社会主义性？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美国的三种政治形式。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工人会作出那样的反应。

2. 资本家自由主义。在美国，资本主义形式呈现出极端(就像前面提到的十三条解释中的第一条)。镇压由国家来实行，国家已经特别根据法律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它体现了一种彻底神圣合法化的资本主义概念。宪法把自由、个人及其财产这两种合法原则结合在一起，并在已制造出来的**成文**文件中将其神圣化。如果在镇压水平方面与沙俄比较最合适，那么两个国家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沙俄的镇压源于专制君主制，它的法律是受政治利益约束的沙皇的意愿。虽然俄国资本家欢迎镇压工人，但他们很少发起或控制这种镇压。甚至德国和奥地利的资本家，虽然在政府中有更大的权力，也不得不与王权和贵族分享政权，他们承诺提供秩序和权力以促进除私人财产自由外的其他原

则。用韦伯的话说，美国资本家们，一个“政党”，特别是通过司法制度，控制他们的政府。它的神圣的法律和警察制度，使财产权和自由权神圣化。

就像我在第五章所解释的，美国还把政治概念之上的法律概念中的秩序和公民权神圣化。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过。自1900年起，当总统因为国家经济的分裂而进行调停时(像所有国家的政权做法一样，甚至德国和俄国)，上述做法在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罢工中有轻微影响。但在美国，法律概念特别体现在不罢工的范围上。如果欧洲的雇主引人工贼，他们就不能指望获得警察和军队的坚决保护。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精英们也许认为是工贼，而不是罢工对社会秩序构成的危险更大。他们经常迫使雇佣者与工人修好，重新建立关系(见 Shorter 和 Tilly 1974 年的参与后者的大量法国事实)。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却很少发生，国家精英严格地遵从财产法，雇主可以和他们喜欢的任何人签订私人雇佣合同。如果雇主和工贼签订合同，法律和州政府会尽全力保护他们。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控制着文人—军队体系。

美国资本家的信念得到这部神圣法律的支持。他们自以为是地相信他们的私有经济利益、法律和根本的自由的价值的平等。在争执中常常搬出上帝。1902 年，无烟煤矿的领袖说：“劳动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保护和关心——这不是由工人煽动者，而是由基督徒来实现的，对这些基督徒而言，上帝用无穷的智慧控制了这个国家的财产利益。”(Rayback, 1966, p.211)

美国资本家也正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巅峰。他们发明的企业经济正欣欣向荣；他们在国家和除南部以外各州的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杜波夫斯基(1974, p.298)说：“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人和社会党人失败了，不是因为美国例外，而是因为当国的统治者最有信心，团结最紧密时，他们分别到达了各自的顶峰。”

我们从 1840 年的英国可以看到英国统治阶级团结一致，摧垮了宪章主义者。但是现在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再表现出如此正义的强

大。相反，英国的企业家就像工联主义者约翰·霍奇(后任工党内阁首相)所说的："因为一直打板球，而得到了荣誉。"(引自 Holt, 1977, p.30)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工业资本家几乎别无选择，因为不是他们，而是玩板球的旧政体成了政府和政党的核心。以前已经消灭了反叛的工人阶级，这个政府现在面临重大的部门劳工运动，这个政体需要他们的选票并且准备与之握手言和。保守党和自由党都不愿让雇主实行他们的阶级政策，都认为法律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就像所赋予的真正的议会自主权一样。美国的国家精英和各党派支持法律，而且这比政治利益考虑变换得慢。因此，个人主义较少地由工人内在化(如美国例外论的第一部分解释)，而较多地由集中于司法的国家精英和资本家阶级内在化。

这种明显的美国司法压迫并不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在今天，它的现代版非常盛行。存留的工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恫吓，尽管受警察和准军队恫吓的次数比以前少了。更底层的工人阶级，主要是黑人和拉美人，因为有强大的警察和准军事组织，而被控制在内城区的绝望中。政党民主的议程上也没有经常出现镇压——这些集团不资助政党，而且几乎没人投票。

这引起了对传统政权一个尺度概念的怀疑。比较政治社会学的主要传统是把政权分为专制派对君主立宪派，独裁对民主政权，其基础是"右—左"连续的统一体——我对代议制的称谓。持此观点的作品从摩尔(1973)、李普塞特(1984)直至鲁斯切梅尔、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1992)的、实际上也包括我第一卷中的后面章节，甚至还有最近的作品(Mann, 1988)。然而，像鲁斯切梅尔和史蒂芬斯承认的那样，美国历史在这种传统中坐立不安。在穆尔之后，他们提出为什么美国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同时却在南方有庞大的压抑劳工的农业存在。像他一样，他们寻求解释为什么德国型的工农业资本家之间的专制联盟没有发展。他们的原因很充分，而且和我的类似。

首先，联邦制允许南方地主实行镇压；其次，工业资本家们在民主

国家内似乎也能适当进行镇压。但我的理解更深入一些。美国政治制度完全由联邦主义控制(稍后探讨)，其多样性极大地压制了大众自主权的表达，像第五章所描述的，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这种定型第一个是以司法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限制了社会真相和反对权力的运作者的策略选择。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政权”暗示的一样，这些限制不受外来政治制度影响。司法力量体系是政权的一部分，而国家的形式是多样的，让我们转向第三个美国政治成形。

3. 党派民主。美国在19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制度化的两党民主。两党操纵着镇压大权，妇女不能投票，且南方黑人已丧失了他们短暂的投票权。但是工会人员基本上是男性和北方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投票了。工作上男性居主要地位，共和主义也许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正如蒙哥马利所指出的，对老板的“男士”风度是美国工人阶级的美德“它的含义包括所有的尊严、声誉不服从的平均主义和男性的统治权威”(1979, p.13)。美国工人的骄傲，他们说话时的武断，他们系在(手枪)皮套带子上的工具——所有这些都给外国观察者留下深刻印象，认为这些是对权力的有力声明。男工也许因这种状态而感到从国家那儿得到了权力。与俄国甚至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不同的是，美国工人不会轻易将暴力和法律强迫看作是应该被推翻的政府的可预料的特征。直到1896年，参加投票的比率都很高——高达85%(75%在城市)——而且移民也更容易登记。大部分工人，包括工会成员，能“自由”投两党的票，而两党的行政却支撑着他们的镇压统治。李普塞特说道(1984)，比起欧洲工人，美国工人的政治不满少一些，不需要把经济不满政治化为社会主义。1896年后，白人男性民主削弱了。居住和公民权要求，对准了移民，而且进步立法的目的是反对城市机器大大降低了参加投票率，特别是工人参加投票率(Burnham, 1965, 1970, pp.71—90)。

但是美国政党民主轻微削弱会给工人带来好处吗？它是像李普塞特说的是一个宽厚的、负责的政权吗？镇压表明不是如此。要记住美国

政党民主组织的两个特点。第一，政党更多地植根于地方区域，种族宗教分离的权利体系，而不是国家或阶级体系，工人并不是赞同或反对镇压而是为了不同利益，这些利益是关于“战利品”，及他们地区、种族、宗教团体的利益。因为工会正变成立足于工人的地区组织，它们自己经常支持反移民的政治。因为在美国宪法制度下，镇压不是由政治家，而主要是由法庭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从选举中除去了(类似于现在)。

第二，在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里，工人仍占少数。到1914年为止，他们仅占人口的1/3多一点，大体和农民平分秋色，也许是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双倍。工会工人是少数。他们必须关注许多无组织工人，许多部分地由当地贵族控制，而且也要关注其余的两个阶级群体。他们最后失败了。工人提倡降低财产自由，然而农民和中产阶级深深地依附于财产并能摆脱许多地方劳动依靠。劳工企图使拥有少数财产的防卫从大的、团体财产中分离出来，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失败了，因此失去了农民、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很多没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失去农民的支持特别具有毁灭性。尽管很多人反对当权者对工人的暴力，并且也对团体“垄断”表示非常不满，但他们并不支持仍有争议的“工会垄断”的解决办法。农民—劳工政党的失败(在第十九章中讨论)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两者的联盟，大多数地主阶级可能会镇压少数工人。主要是地主阶级(加上他们各自权力的依赖者)，而不是工人，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个人主义更加国际化。

美国政党民主对工人并不宽容。给予他们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民主党和共和党是跨阶级、地方—地区、种族—宗教、部门的联合。工人确实热情支持工人的竞选人(Bridges, 1986)。但政党却并不适合表达阶级利益，特别是在民主党变得更为乡村和基督教化时，它具有明显的南方保守派的特征，而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党北方派，以工业的(工人和生产商)和清教徒为特征。许多当地的例外也加深了分离主义。党派的全国团结被政党和行政之间明显的联邦分离削弱了。是总统，

而不是政党，组成了内阁并起草纲要。因此，政党不像那些在宪法体制下体现议会主权的政党，很少因为需要形成连贯的纲要异化而受到适当地约束。派系之间继续进一步分化。

工会必须给两个政党的个别政治家施加压力，龚伯斯说："回报你的朋友，惩罚你的敌人。"尽管在城市工业选区，这样能产生有同情心的政治家，但它不能用立法纲要驱动一个国家政党，也不能选举参议员，更不用说总统，或者委任法官到高一级的法院。它的成功大部分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但他们的立法可能被法院搁置一旁。

在联邦水平上，工会的直接影响可能少于在英国或甚至德国国家政治中的工会影响。这种观点和这时期的一些说法相反(比如 Rayback, 1966, pp.250—272)。这看起来也是与直觉不一致的，因为德国是专制王权国家，而半数的英国工人不能投票选举。但德国政府必须机敏地策划以推动反工人联盟，而且采取一些创新进步的计划，像社会保险，以使社会主义处于绝境之中。在英国，工会能够选举议会议员而且这影响了两个党派，特别是自由党，因为它需要工人阶级的选区。在议会里，政党对行政和法院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塔夫·韦尔案件中，法官在取消了某些工会组织权利后仅仅五年，1906 年自由党政府选举立即获得《贸易争端法案》，授予工会以它们需要的组织自由。不像大部分自由党立法，这很容易便通过了托利上议院。

相反，美国工会从全国政党那里得到的很少。众议院对限制罢工禁止令法案表示同情，但参议院并不如此。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童工法，并限制女性雇佣的条件。但在其他国家，跨阶级的道德和男性舆论存在以"保护"妇女和儿童。比起英国和法国，工厂安全法规更少、更晚。美国劳工部的建立引入了和解程序，并把工会带入行政的势力走廊，但这也只是在 1914 年，继英国和法国之后。州际铁路的八小时工作制，对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和海员的改善是真正的收获。1914 年的克莱顿法案规范了公司，有时被认为是工人的收获。该法案断言"人类劳动不是商品或贸易货物"，工会是合法的，也没有违反反信任

法。但这的确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留下了“阴谋”和滞后，同情行为(Sklar, 1988:331)。实际上反工会禁令的频率在克莱顿法案之后上升了，达到了20世纪20年代因同情而举行的罢工的46%(Forbath, 1989, pp.1252—1253)。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组织者也对新劳工法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疑问：“他们是怎样实施的?”(Dubofsky, 1969, p.158)

直到1932年，《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才授予工会组织权，但英国早在1906年就已颁布。他们在被镇压中付出了代价之后，美国民主最终让工会获得了集体公民权。拉斯莱特(1974, pp.216—217)指出，威尔逊政府作出的让步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党：它大部分的附属工会已转向民主党。如果这样，它们被诺言而不是被行动所诱惑，而且它们勉强接受了比欧洲同行更不好的一些条件。工人取得了一些收获，主要是作为大众选举人，而不是作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选区(例如中产阶级和农民)一起为政党服务。通过直接的参议员选举来扩大选举控制力，规范商业垄断，广泛的义务教育，现代的收入税，这些改革是通过现代的跨阶级合作达到的，其中，有组织的工人起了辅助作用(Lash, 1984, pp.170—203；Mowry, 1972; Wiebe, 1967)。不是所有的马歇尔“社会公民权”必须来自阶级行为。1913年引入的现代收入税(尽管直到战争时仍然很少)，受到来自竞争性党派体系，而不是来自工会的压力(也像英国那样)。但总之，在最严酷的镇压期间，工人利益并不经常受助，而且更经常地被美国的党派民主阻碍。

4. 联邦主义。美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成形首先是邦联，然后是联邦。是权力分离的政府而不是中央集权的政府实施了镇压。工人的抵抗运动在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之间，在法庭和各政府机构之间的作用下逐步瓦解。在这期间，民权国家范围的扩大，在大部分国家都注意使工人运动全国化，但却进一步分裂了美国的工人力量。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执行了大多数新的职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在和工人相关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意义(我间接引自Lowi, 1984)，这分离了潜在的民族阶级统一。大部分劳工法是由各州自己制定的。到1990

年，各工业州如马萨诸塞和伊利诺伊都有比联邦政府更多的抚慰性的劳工法。大部分政策都是镇压性的，有些政策还非常残酷。这种不平衡性对这个广阔大陆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每年，北部一些州可能会通过一些进步法案。并且对保守的法庭统治提出方案，而西部一些州可能会刺杀几个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人员，西南一些州会攻击平民党，南部一些州则不断强化种族主义。全国范围广泛的阶级**整体**这一概念难以实现，即使对那些被枪杀了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南方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联邦问题。种族主义者支持国内军国主义者打败在以土地占统治的南方形成阶级动员的企图。这就意味着在联邦这一阶层上，由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坚实的利益集团，在选举中基本上未遭到反对，利用资深的国会委员来保护他们的保守统治。正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后来所发现的，他们很难控制亲劳工立法。他们的"一党政权"在南方正在增加对国会山的选票，尽管它是反动的，但它还是民主党。

地方、地区政党和社区组织在联邦宪法强化以后繁荣起来，它们得到了种族—宗教移民浪潮的不断补充。市政府把这些利益分给下属部门，特别是通过从政府法律颁布"不同意见"和经济利益的许可和赞助。许多工人的利益——包括居住条件、健康、运输控制和公共设施，以及公共场合的人员雇用——都由市政水平决定，通过分散的权力关系，而不是阶级关系进行渗透。商品是通过种族、宗教社区和城市赞助机制来分发的。土生土长的熟练技术工人在这些机制内产生重大的本土影响，跨阶级联盟经常直接反对新加入的移民工人。联邦主义、分离主义政党派别和种族分子相互作用，削弱了阶级的整体意识。阶级和国家不是对抗的双方，它们相互加强——或者说缺少任何一个则会彼此削弱，正如在美国一样。阶级被局限于雇佣关系是这一时期非常普遍的趋势，而且变得更深刻了。

国内的军国主义、资本家自由主义、党派民主和联邦主义——所有这些同时对美国政治和阶级起到了分化作用。斯科罗内克(1982)客观指

出，“这个法庭和政党国家”阻碍了美国国家政权官僚政治的发展——但联邦主义也是如此。美国国家政权基本上仍是军事化的，正如第十一章的资料所揭示的那样。因此，在文人—军队问题上，美国内部机制的形式仍以军国主义者为优势。

工人的反响：地方主义

但这些自由资本主义者、民主政党和联邦军国主义最终完全彻底成功地击败了工人，因为这增强了他们固有的趋势，不是用阶级，而是用**地方主义**来作出反应，镇压指向一般的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是手工工会主义。技术工人宁愿逃避，而不去做些有用的事。雇主们部分根据贸易循环选择可选的，或选择更普遍的镇压。当满额订单要求全力生产时，他们便会承认手工业工会的力量，并同意劳联要求国家允许的请求。大多数手工业工会压力是地方上的，是针对个别雇主的，需要市政的政治支持，而且需要无罢工行为。技术工人的非正式牢固团体建立起来，对于警察的渗透或镇压相对是无懈可击的(Marks, 1989, p. 53)。有选择的镇压加剧了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工人的正常分裂，成为更策略性的、组织性的地方主义。[4]手工工人迈步走自己的路，留下一些不太受欢迎的同志去听天由命。

在这点上，美国与沙俄截然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俄国国内的政治暴力对所有技术水平都进行同样的镇压。第二，俄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允许技工组织逐渐成熟起来。技术工人没有组织的来源，并让它发展下去。镇压分裂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却联合统一了俄国的工人阶级。正如社会主义的伟大战术家列宁分析俄国事例那样，主要战术家塞缪尔·龚伯斯也分析了美国事例。

龚伯斯和他的劳联通常避开政治，尽管劳工联盟1908年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对议员进行游说的组织。但这一组织并不活跃。龚伯斯和米切尔对国家市政基金的会员资格更加忠诚；这是一个先进公司领导者的压力集团。龚伯斯和米切尔想要国家市政基金说服

商业巨头们加入劳联和雇主协会之间的协议中来，该协议会减少大型罢工的可能性。当当地许多工会正活跃地在国家和市政水平上呼吁支持劳工立法时，劳联在全国倡议“志愿捐助主义”(Fink, 1973; Rogin, 1961/62)。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按法律条款执行的：因为法律禁止工会的“压力”，非正式的志愿协议是工会的主要保存力量(Fink, 1987, pp.915—917)。但龚伯斯走得更远一些。他反对以社会保险立法作为降低工人独立的手段。甚至这并不是唯一的因为工会有如此强大的保护主义和互助主义作基础，他们领导中的许多人对这些政府干涉表示怀疑。但龚伯斯强烈地反对工厂的法规和工业争议的仲裁使工人步入“超法律主义”的陷阱。他甚至反对禁止开除工会成员的法律：

> 我对试图确保通过涉及雇主解雇雇员权利的议案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如果我们保证颁布一项使此行为非法的法律，我们的敌人肯定会主张以任何理由单独或集体即(作为一个整体)退出工作都是不合法的，他们将努力保证颁布一项能达到如此效果的法律。(Fink, 1973: p.816)

这看起来很古怪，但是他自己作为雪茄制造商联合会的组织者的经历教会了他避开政治和立法，集中精力对私企营业主施加直接的经济压力。这个联合会努力游说以制定一项纽约州的法律来消除廉租公寓的建设(雪茄生产家庭在雇主所有的廉租公寓的单元里居住和工作)。法庭裁决新法律不合宪法，工会成功地为一项修订法律展开游说，而且法庭也裁决这是不合宪法的。龚伯斯的阐述如下：

> 我们讨论了进一步立法行动的可能性并决定加强组织工作。通过我们的工会，用罢工和鼓动宣传来给制造商施加压力，直到他们相信——也就是对他们而言，用很小的代价放弃公寓生产体制，让工人在像样的工厂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因此我们通过经

济力量成功地实现了我们通过立法没有获得的东西。(1967，I，p.197)

因为这项法律对劳工造成了很大伤害，我们应该放弃它转而支持“经济力量”。他的雪茄制造联合会的顾问阿道夫·斯特拉瑟在1894年说：

> 在联合会，不改变美国的宪法和各州立法你就不可能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我反对为了争取在我们死后才可能颁布的法律而浪费时间。(Forbath, 1989; p.1145)

与政治激进派和社会党人的联盟只能伤害劳工。龚伯斯的自传对社会党人就像对资本家那样表现出了很大的敌意。尽管他一直宣称尊重马克思和他的观点，他说他对社会党人的不信任是在1874年“汤普金斯广场暴乱”中产生的。当时他跳进地窖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他的经历

> 成为将来我理解劳工运动的指南。我看到激进派和制造轰动新闻的人是如何集中所有有组织的社团来反对劳工运动并提前使正常的、必要的活动无效，他们是多么地专业——我看到知识分子与联盟结合在一起的危险，这些知识分子不懂拿劳工运动作实验就是拿人的生命作实验。(1967，I, pp.97—98)

龚伯斯提倡回到“单纯简单的”工会主义，意识到那是一个回归。正如他在1914年写的，劳联“是被过去的历史指导，并从过去吸取教训——它沿着很小阻力的线路发展”(Rogin, 1961/62, p.524)。

龚伯斯相信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群众运动扩展得过了头。劳工不得不从有“永久”组织的最强大据点开始慢慢重建，提

供给组织成员职业、福利、丧葬保险、医疗报销和罢工基金等。尽管这些是内在的愿望，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成员和工会之间永久的关系(Gompers, 1967, I, pp.166—168)。只有资金充足的组织能够经得起长期的罢工和停产。说服这些没有类似资源的群众是没有用的。他们必然会失败。龚伯斯说那是整个时期的教训。那就是他为什么那么蔑视和憎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因为他没有充足的资源，没有罢工资金，甚至没有正式的成员就领导工人进行罢工。他说，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叛徒，不是美国劳联的领导人。

但龚伯斯的策略对整个工人阶级不利；实际上，他们预料说阶级统一并不存在。对政治的放弃减少了活动的范围，削弱了“集体劳工”的整体，因为它意味着放弃了也许对工人阶级家庭和社团有利的社会政策。劳工运动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严重的限制，成为男性雇佣经济主义。甚至龚伯斯的策略都是地方主义的，因为它们要求工人有罢工基金，企业主找不到破坏罢工的人。原则上，不罢工的工人会被整个阶级的“一个大工会”排除在外，但这一策略在群众暴动和镇压中失败了。龚伯斯相信，组织大批非熟练工人实际上伤害了手工工人。20世纪的许多美国工会，如著名的卡车司机工会，通过暴力抑制了不罢工工人。但是这些不罢工工人很少能成功地承担技术工作。

虽然龚伯斯说这些持续的、有耐心的组织会逐渐为其他工人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但实际上，除了手工工人，其他工人很少能提供大量的工会资金，也很少能限制本行业的技术培训。在实际操作中，他的这种理论等同于手工艺保护主义。在宪章运动之后，新工联主义产生之前，劳联退回到了英国工会在1850年到1890年的水平。1900年之后，美国的工人运动变成了所有发达国家中最软弱的——部分是因为龚伯斯和劳联在面对无情的合法镇压时，持有一种不很坚定的意识。

但是通过限制候补工人的数量，劳联手工保护主义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劳工运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移民。这样，关于美国所谓“自然”的地方极端主义的第二种解

释，在应用到1900年之后这段时期内是有效的。当然，从一开始，种族主义和移民分化就没能促成工人阶级的团结，特别是在政治上。黑人白人的分裂大部分局限于南方。这段时期，经济利益中最持久的分裂实际上出现在亚洲的移民和其他的移民之间。大部分美国工人组织对华工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这种敌意一部分来自对“黄色人种”的歧视，一部分是因为在西部，来自中国、经过训练的劳工正在取代白种工人的位置。除此以外，美国的种族—宗教对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出现在兰开夏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对立，在德国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的对立或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对立。

起初在这方面美国也不例外。实际上，在劳工骑士团和像在1877年或在霍姆施塔特那样的大罢工中，或在煤矿工人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经常包括黑人)、男人和女人之间显示了惊人的团结精神。但种族经济关系却变得更糟。部分原因是因为从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数量的增加，使居住地和工作的种族分化变得更为严重。在工人运动中的分化使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劳联主要吸收本土和北欧的成员，另一方面，普通的组织和政党组织吸收东欧、南欧和黑人作为成员(Shefter, 1986, pp.205—207， 228—230)。劳联反对移民的游说活动现已成为一种主要立法上的行动，这更加深了地方主义。

关于美国的结论

我没有提到对美国例外论解释的全部十三个理由，但我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点也不例外。美国不是从一建立就存在着这种极端分化，而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转折点出现在1900年左右，主要是因为四个“高水平的政治成形”加剧了工人之间的分化——如国内军国主义者、自由资本主义者(司法集中的)、民主政党、联邦主义政党。像李普塞特所说的那样，统治的形式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它对工人既不友善也不爱惜——一维“民主”就是这样——像他提出的。政府是多形的，而不是唯一的。面对残酷的镇

压，美国劳工的分化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手工工人和非手工工人之间的区分也就更为明显。绝无仅有的是，熟练阶层、国内劳动市场的地方主义和思想派系主义相一致。占主要地位的劳联派使阶级范畴狭隘化了的同时，机构分裂为派系化的工人组织，并不断加深，扩大了地方主义和种族—宗教分裂主义。

虽然还要继续战斗，还要进行一些决策，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工人运动再度兴起，但美国已不再有工人阶级，工人可以称自己为“劳动者”而不是“工人阶级，他们深受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Halle, 1984)。我认为这是偏离社会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正如李普塞特所说的那样，也正如这些章节里强调的，美国政府不像其他的保守政府一样，并没有强调工人阶级的身份。不像大部分欧洲国家，仅通过国家公民权的一般战斗，一个国家范围的阶级整体地位是不会给予工人的。普通政治需要并没有消除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种族、宗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联邦主义和派系主义更强化了这种差异。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工人阶级不能取得公民身份，如果工人争取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就会遭到全国范围的镇压。在中央阶层和阶级敌人的政策推动下，工人们被迫进行全面罢工，以期实现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权。这种因政治上的强制而使全国阶级最终实现团结的现象在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小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的零星的影响可能过多“决定”以后的结果。但白人男性工人在军国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及民主政党和联邦政府的早期介人，加速了工人的分化和纷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阶级本身逐渐消失。

社会主义理念需要一种社会整体感或两择其一的东西。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提供社会整体化的经历。私营企业或单一贸易、工业等类似的组织联合是最接近于真正的可实现的社会整体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联合网络渗透到世界各地，这是局限于小社区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因此，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动向就不容易被个人以同样

的方式体验其整体性。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对不同的公司，工业和技术行业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工人们可能会有过激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可能会因行业、地区的不同而稍有差别。因对政府不满而引起的骚动使不同的运动变得逐步统一起来。阶级和政府相互加强，派系主义和地方本身也是一样。除此之外，工人也被分为有组织的熟练工人和无组织无技术的工人。在历史上，美国工人一直是这样划分的。美国劳工没有清楚地表明权力关系整体性的一种意识，或发展他们可选择的一种模式。到1914年，这已经相当清楚了。

美国不是一个"例外"，但它确实变得"极端"。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抱怨，而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成形进一步加强了它们的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这种极端主义可以解释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跨国界，也就是说如果工人运动和国内战争无关，就会发生不存在的与事实相反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所坚信的，离开单纯的工人阶级去实现社会主义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斗争。没有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资产阶级就可能真正拥有了霸权。在当今这个国家交往日趋紧密的世界，拥有真正的霸权对世界的威胁是相当大的。

俄罗斯帝国：军事独裁与革命

俄国在这一时期所爆发的工业化和农业改革是剧烈而不均衡的[5]。1861年废除的农奴制加速了因土地而引起的纷争，对此我们将在第十九章予以分析。大约在1900年后，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俄国尚处于雏形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了。大型工厂和许多无产者移入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促生了一个更致力于后勤的工人阶级。通常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集中并没有按俄国发展水平和产业工人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所期望的那样，而是真正产生了一个更加庄严、植根于团体的工人阶级。俄国

是因为政治成形而导致了革命，而不是因为工厂规模的大小。

在表现方式上，沙俄表现出的是不同于美国的另一个极端。直到1900年，它一直是欧洲唯一的君主专制政权，唯一不用党派民主来进行粉饰的政权，一个国内精英和政党大多以宫廷派系相互联系的政权。在保持俄国核心领土周围的大帝国时，其军国主义色彩也很突出(虽然英国的军国主义也保留了附属的爱尔兰岛)。这样对内对周边的地带都不同寻常地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政权。沙俄政府确立为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高度独裁化，军事化和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它拒绝了“国民”或“国家政府”的标签)。

但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团体的东部边缘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的影响。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所讲的，经济发展得越晚，宣称科学知识和着眼未来的技术治国和知识分子就会涌现得越多。在俄国的专业人员、绅士、贵族还有政府管理人员中，一个有自知之明的、部分自治的知识分子兴起了，促进了另一种进步方式。政府精英分子派系化，右翼宫廷政党主张实行专制主义，支持沙皇实行18世纪的策略——给原来的农奴以财产，进行全民教育，赋予公民权。保守主义被涂上民粹的色彩，激励沙皇成为沙俄或斯拉夫人民或东正教教会集团的首领。另外也有左翼人民运动。自由党提倡民权和部分政治公民权。在本土的人民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之外，形成了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在其他国家，这种多样的策略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俄国的沸腾中，知识分子们同时争辩所有这些首创的法规——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形象生动描述的那样。两种政治被混淆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比较敏锐的权力。

这个国家陷于内部党派纷争与国外暴乱的包围中。因此随着19世纪末国家平民阶级的壮大，派系主义也在膨胀。像其他地方那样，平民化也导致和解政策迅速发展，但它仍是国家政策的从属部分而不是主导。具有不同背景的国家部门、官员提出了军事镇压、家长政治、政策协调、有限和解、劳工组织自治等各种治国策略。财政部与安全部

显然发生了分歧。

政体也有多种选择，但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一种。国家成形为独裁国家。极权政治被专制君主批准，他的话就是法律，其大臣单独向他汇报，他的喜好、脾气、决定都至关重要。但没落的罗曼诺夫家族中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亚历山大二世是最后一个明确采取开明或保守专制主义政策的沙皇。他于1881年被谋杀。统治到1894年的亚历山大三世把工业化同强力镇压结合起来。尼古拉二世后来面临更大的混乱与犹豫不决，不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国家事务中，这对专制君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缺乏远见，他总被别人的意见、看法所左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反动的歇斯底里——他和他的宫廷转而实行摇摆不定的军国主义。

以“战略”一词来美化这些互相倾轧的不同党派精英的政策，可能会误导别人。大多数的传统与天性都是反动专制的。但面对内忧外患时，这些政治家在温和改革与血腥镇压之间徘徊不定，由于对深植于平民社会的自治力量的恐惧，内部争斗的解决通常有利于军事镇压。专制镇压在俄国与其说是国策，不如说是一种暂时的观望政策。这种政策为规定政令，满足国外势力的企图要求，或鼓舞国内士气提供了脆弱的基础。一个更好的沙皇可能会做得更好。

在俄国，是政治精英而非资本家主宰政治舞台。他们应付劳工联盟、罢工和社会党，正如他们对付类似的团体组织的宣言一样。而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取缔。武装军警被调来驱散示威游行或罢工队伍。在1895—1905年间，军队对罢工游行进行了两千次镇压。政府给来自别国的工厂工人签发护照，若他们违反雇佣合同，护照就被取消。政府还拟订了详细的规则文件，用来规定劳动纪律。其中部分是关于体罚与对雇主和经理完全服从的规则，所有这些都源于俄国军规。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士兵之间的独特的合作经历使他们于1917年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家的统治。甚至当政治精英试图和解的时候，他们采用的是强制的家长式作风。工会中最奇怪的是由莫斯科警长自

1896年创建的祖巴妥夫协会，一方面，它体现了像祖巴妥夫这样的改革派在劳工关系中实行中立家长政治的真实渴望，另一方面，体现了赞成专制与保护财产权的极端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个协会在1905年革命中崩溃(McDaniel, 1988, pp.64—88)。工人没有国民权，更不用提政治权利了，但农民和中产阶级也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因此没有一种温和的工人策略——保护主义、互助主义、经济主义或改革主义——能自由组织，取得成果。也没有出现处理劳工关系的稳定的法律制度框架。实际上工厂内存在相当多的潜在的合作，而个别大臣、省长、警官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中的一些人作出了改革的许诺，却没有可靠的政府来实现。尽管无政府主义派试图采取恐怖主义，工联主义也无法让人相信罢工可避开这种状况。由于共同的军国主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派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1900年以前，民主派——资产阶级派和无产阶级派——都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讨论马克思，主张民主要求政治经济的根本变革。大多数想实现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者寻求真正的解决办法。

因为工业化的步伐决定了手工业者还不够成熟，因此，作坊组织和地方主义一开始还比较弱。它们经常遭到政府镇压的破坏。因而政治家与雇主，同其他国家一样，很难在“负责”或“值得尊敬的”工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很少向技工作出让步，目的是迫使工人脱离群众。俄国劳动关系中几乎没有地方社群主义。即使当国家出资的互助社会保险计划被大肆宣扬时——在其他国家划分工人的标准是根据其收入的水平和稳定性——所有的工人组织要求有一个普遍的国家资助项目。政治家与资本家，或许是无意的，将工人逼进了革命分子领导的阶级。列宁早在1899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 俄国工人阶级身受双重压迫；它既受资本家的掠夺，又受地主的剥削，为防止他们反抗，警察束缚他们的手脚。每一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只是使警察军队放松对工人的控制。每一次经济

> 斗争必然成为一次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会把二者结合成**无产阶级斗争**。(1969, p.36，他强调过；1902 在《怎么办》中加以重复，1970，p.157)

1905年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加强自我意识。他们的统治能力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遭否定。在远东几个省，领导无方、供应不足的军队四分五裂；城市粮食供应中断；在许多农村地区，农民通过抢地夺取了政权真空。1905年大约2 080万工人举行罢工，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时期的任何一年，是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一次罢工人数的两倍。这次反抗与社区游行，面包工人罢工及各地的“国家”自治运动遥相呼应(西方和苏联历史学家仍在研究)。发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暴动、游行在某些方面更类似早期资本主义和宪章主义时代的街道、社区革命，而不是像现代工人阶级的以雇佣关系为中心的斗争。俄国革命使群众队伍壮大，也激起了家庭和社团经济政治斗争情绪的高涨。独有在这个时期，俄国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才变得“统一”——目的是建立一个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高度集中、高度政治化的国家。

但大多数工人还没有革命倾向，或者除在请愿书中表达不满之外的一致其他选择。在城市中心，1905年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广泛发泄不满情绪的游行示威，还不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地方—地区上有组织的参与反叛的军人、农民、郊区示威者和地区—国家的持不同意见者单独行动，因此可能遭到分单独的镇压。许多组织仍保持纪律性，这就足够了。在圣彼得堡，仅“血腥星期日”一天，军警就杀害了至少130名示威群众，300人受伤。对此列宁(与在本章开头引用科钱的他的早期观点矛盾)评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在这一天的进步要远大于以前几个月几年取得的进步。”(Kochan, 1966, p.80)第二年，军队对波兰全国暴动及工人暴动的镇压中杀死了2500人。政府又以集体绞刑对付不断扩散的恐怖主义。

但沙皇现在害怕了，原因是要求公民权的农民群众、地区及全国的

工人、城市反抗者在耗尽刚刚战败的统治阶级的力量。温和派趁机说服沙皇，只有把土地改革同工业发展相结合，才能打败德、日等对手。政府应该同意给予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杜马(议会)还是召开了，尽管有举足轻重的选举体制。工业采取了互利性让步：从1906年3月起短时期内，工会合法化了，条件是它们不干涉政治，也不再举行罢工。劳工权利意识，即使是家长制的，也比没有强。劳工分化成乐观互助派和改革派(与统治自由派希望的一个与社会主义辞令和实际妥协联合的更“西方”的工会出现相重叠)和持怀疑态度的革命派。

统治阶级显然在考虑采取德国式的合并。这就要求将部分和解与镇压相结合。最明显的策略就是满足资产阶级对公民权的要求，制定一个土地分配计划，并镇压工人和地方暴乱分子。但从心理上，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不屑一顾就如同他们害怕群众一样。这就要求自由派控制改革运动和工人，限制农民。但即使经济学家联盟，也就是立法者，也对互助者不断扩大组织权利与政治公民权的要求感到压力很大，这远非沙皇或宫廷所能达到。尼古拉犹豫不决，听信妻子之言。为使它更顺从，将杜马两次解散，宪法也被修改，但仍以失败告终。自由派也失去了权力和对工人的影响力。这时另一个人物出现了，即令人生畏的斯托雷平。他下令发展经济，实行军事现代化，土改，所有这些政策在抵制公民权，镇压城乡暴动的同时，也分裂了农民阶层。杜马宪法第三次修订，将50%的席位给人口只占1%的土地拥有者。这最终保证顺从的杜马可以持续到5年任期满为止。体现对劳工阶层镇压的斯托雷平的分裂政策接管了国家权力。

1907年劳工联盟被非法取缔，这使具有全国组织经历的立法者们很痛苦。工人阶级领袖和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找到了更多的革命理想的实施者，尽管他们很少冒险公开行动。到大约1910年为止，革命道路的选择已局限至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三个非法政党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但是由于政府对工厂、社区的大规模的镇压，无论是经济派、互助派、改革派，还是革命工联主义、无政

府主义者，都不能担当工人和工人社团的领导者。

斯托雷平于1911年被秘密暗杀，其政府又被第二次和解所围攻。其检查职能被削弱了。劳工联盟再次被赋予半条生命，既合法，又受迫害。立法者们1906年7月也经历过类似的矛盾，被允许组织工会，却无法进行改革。当罢工、游行进行到一定程度，军队就会干预镇压。然而军事镇压使革命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尤其是在1912年连那金矿大屠杀后，200个矿工的死亡在所有的主要工业中心激起了大规模罢工，一直持续到1914年。

统治阶级在军队现代化后本来可以被说服实行改革，斯托雷平的全面的土地改革本来可以发生在1917年2月的，但德国先发制人(见第二十一章)，挑起了战争，阻止了这一切。这场战争增强了保守派的力量，加强了镇压。但随着战势恶化，军队、后勤与政府产生了分歧，分崩离析。1917年革命爆发，这些革命基础更加牢固了，不满的官员、造反的士兵和海员也加入了工人、农民、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工人中的布尔什维克核心支持力量由以前的立法者，变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派。

一系列的镇压干扰、温和改革计划、和解以及更残酷的镇压，疏远了工人阶级中的民主派与温和派、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到1914年止，政府战略从未最终确定下来，但它的敌国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国家公民权的主要要求没有被否定，其中一些具体措施被接受。国家成形变化无常，也不一致。但在危机时刻，政府似乎暴露了真面目。若改革派不能担当领导，革命派就要领导革命了。

毫无疑问，在1914年，甚至在1917年早期，大多数俄国工人比煽动家还“保守”，这主要从两个意义上讲的。一是对革命道路的怀疑，二是对立法派、温和派甚至沙皇寄予改革的希望。但十年来，温和派和分离派并未有有影响的运动。史学家指出了对工人阶级一般层次的划分——熟练钢铁工人对更年轻的、以前是农民、非熟练工人以及女工和城市的无产阶级(最近又由麦基恩在1990年加以强调)。但这种

划分没有像美国那样深入到不同的工人组织，也比英国的程度小。但却明确了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前者对后者的领导权。

除非有一场改革运动能推翻君主专制，走上西方合作的道路——像盎格鲁—美国或德国那样——其劳工运动很可能要经历一场革命。当然，事实确实如此，正如另一超级强权国家美国一样，这场革命证明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力。战争与农民阶级在革命发展中起了非常显著、必要的作用。我在第十九章将讨论这个问题(战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下一卷讨论)。但即使没有战争和农民阶级，俄国工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阶级，并且同激进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分子一起被逼到反抗的边缘，因此他们在这样一个既趋于和解，又实行高度军政集权的专制国家，不但在雇佣关系，而且家庭生活中都有共同的经历。剥削，既广泛又深刻。若这个国家屈从于外敌，镇压的手臂被折断，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共同反抗，不管后果如何。

法国：有争议的政治成形和社会主义竞争对手

根据惯例，我把法国劳工运动中有特色的地方归于政治成形[6]。然而，国家的工业化特色，对此也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法国的工业化开始较早，但进展异常缓慢。举例来说，手织工人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甚至在本行业1882—1890年的大萧条中也是如此，比起在英国、德国的同行业的消失时间要长一些。其他国家类似的早期工人组织也有较强的生命力。手工工匠很长时间控制着工会。由于革命的帮助，农民紧紧抓住他们的农场和劳动力，减慢了城市和制造业的增长。在19世纪50年代里昂地区的5个城镇中的工人例子中，54%—66%的人做着父辈曾干过的活。43%—53%的人在1902年后的10年仍然如此(Lequin，1977，I，pp.222，251)。劳工短缺引起了潜在的不罢工工人的短缺和高比例已婚女工。工业在法国郊区扩散的目的是与劳工资源

和消费者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无产阶级因此以某种分权方式出现。工业、农业、雇佣和当地社团很少分离，靠工厂工资生活，居住条件很差。工业化产生了通常意义上的工会组织。记者联盟解散，互惠的福利团体取而代之；手工工匠受到使用机器和女工、童工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威胁。比起英国，法国的无产阶级化进程更缓慢，尤其是北方的纺织工业，仍保留着家庭组织方式和雇主控制方式，和从事生产的工匠中心明显不同，这其中最大的生产地是巴黎和里昂(Aminzade, 1981, 1984)。直到20世纪的重机械行业中的“新工厂”才有家庭、工厂、市镇的明显区分，虽然影响着周围的“红色郊区”，但还是有工会占据中心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工厂(Perrot, 1986; Cottereau, 1986)。

法国工业化的这些明显特征使得工人阶级的发展缓慢下来。在数字上它们确实反映出来了。但在阶级意识和组织上，法国劳工的激进分子是早熟的，大部分是因为争议政治成形使革命传统仍然很活跃。只有国家成形被解决了，因为所有的竞争性政党都赞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政权。但在民主共和党派、君主派和波拿巴派之间，代表权相互竞争，导致了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相当的反动性，国内军国主义不断发展壮大。

面临这些威胁，巴黎和里昂的政治社会党人提早控制了劳工组织。在1815—1848年间，工匠们要求从王权统治那里取得政党民主和组织权利，这刺激了国家的阶级组织，超过了我们从停滞的工业化所预料的水平。无套裤汉主义转变为工匠社会主义，早于其他国家——正如被流放的二十五岁的马克思在1843年发现的，即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他第一次实际与工人阶级的交流中。共和社会党首先发展了巴黎的，然后是国家的报纸杂志思想力量体系，还有带阅览室的俱乐部，而且包含整个19世纪30年代在工匠中流行的咖啡馆。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党人正把福利团体组织成奇特而集中的国家组织，并在不太熟练工人中间以基础方式扩大。

在1848年，革命先锋中的工匠联盟形成了“小共和国”，把它推向左派(Gossez，1967；Lequin，1977；Aminzade，1981：ch.6；Sewell，1986；Traugott，1988)。尽管被镇压并被迫后退到地方、地区水平，社会党在拿破仑三世时仍保持着对工人组织的秘密控制，拒绝了他的融合双边互助组织的企图，他希望以此来分裂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幸而，地区工联主义几乎没有出现，因为革命传统在面临广泛的普遍镇压时，繁荣了阶级组织。工人通过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协同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雅各宾主义的革命口号转变为更具工人阶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和工联主义。

从1875年开始，表面上法国类似美国，享受男性的政党民主。男性工人拥有政治权利。然而，某种程度上被限制的政党民主没有顺利实行制度化，只是通过危险的中间派联合而幸存下来。1875年，共和党只以一张参议院选票战胜了分裂的专制分子，而且只是在1879年接受到一份明确的选举命令。统治者拒绝给工人以组织权利。对于左派来说，19世纪70年代对巴黎公社的军事镇压(死亡三万人)和统治者对劳工的继续仇视占了主导地位。红色，血的颜色，成为工人的代表颜色。极左主义仍然很强大，不断公开，在地方地区工人团体中广泛扎根。大约1880年，统治者开始在集中民权问题上和解。首先大赦了幸存的公社社员，然后在1880年，使工会和罢工合法化。但王权派和波拿巴分子的威胁仍然存在，又得到军队派系主义、教权主义和教会国家舆论支持。有限的党派民主政权在左派和右派都有敌人，其中一些敌人(像右派主义者军官团)渗透到了政权本身。

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政权的民间范围扩大到其他任何地方，和中间派共和主义结合在一起。国内军国主义变得更公正和警惕。所有的政权精英和主要政党都对政党感兴趣；秩序保护是他们主要的国内职能。因为没有秩序，他们就会崩溃。他们能对公众的不满作出要么军事镇压，要么让步的反应。如果他们相信暴乱，而不是承认公众不满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而且如果他们害怕军队本身——他们

也许要求让步。只要基础财产不受影响，政府也许会和解。19世纪的多数政府不完全是由工业资本控制的，而且除了俄国和美国，他们的司法警察力量经常干涉以求和解。因为他们害怕左右派，包括政府军队。因为政权现在是党派民主，法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肖特和梯利(1974，pp.30—32)对19世纪法国罢工的定量分析表明地方行政长官不断干涉，通常是应工人的请求来阻止或终止暴乱。分析表明，当政府干涉比不干涉时，工人的需求有容易得到更多成功的趋势。长官和副长官的行为不同，有的寻求和解，更多地站在雇主一边，但大部分寻求何种方式能更快使他们的管区平静并保持他们个人良好的治安秩序的行政记录(Perrot，1974，Ⅱ，pp.703—714)。资产阶级共和党对工人的态度也不稳定，镇压和合作相互交替，是为反对派从上面寻求支持。

作为对这种不稳定国家成形(与俄国不同)的回应，这种形式没有最终的决定方式，法国工人具有它主要的特色：思想上的派系主义。它在两方面踌躇，一方面是互惠者和改革派与资产阶级极端派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由醒悟产生的更多革命机会与共和党和国家精英。觉醒有三种主要形式：雅各宾传统的社会党形式，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于19世纪90年代废除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工联主义。相对分权的工业扩散也刺激了工联主义。经济主义、互惠主义、社会民主、工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出现了，互相竞争和辩论削弱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内聚力。

法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一样，大约于1900年，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威胁了手工业控制时，采取了进攻行动。工匠们被迫保护工联主义。和大部分国家一样，直到20世纪，中型车间的工会和罢工比起主要工厂(仍然有效地控制在厂主手中)更普遍一些(Lequin，1977，Ⅱ，p.129)；而且在工匠和手工工人共同生存的城镇，比起工匠缺少的地区，出现了更强大的运动(Hanager，1980)。不管怎样，大部分法国工会缺少人员和统一性来挫败企业主。这刺激了思想的保守

主义。

尽管人们之间由于技术造成的本位主义很少，工会形式上仍然很弱，会员费也很低，会员几乎全是男性。激进分子——在19世纪很罕见——主要转向政府而不是工会以寻求社会保险和其他集体福利。到19世纪末时，当工会发展了保护主义的劳工交流时，这些很快变为“直接行动的工联主义”的有广泛基础的组织。在争取男性选举权期间，在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社会党联合期间和1906年后的改革社会主义潮流期间，工人的政治承诺增加了。但这些趋势也分裂了激进分子和激进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集中于政治，忽视了工业，使一部分激进分子转向了革命工联主义。主要的工会联合会CGT，是由工联主义者从1895年开始领导的。然而他们根据宪法上的偏见(给国家的，而不是地方的附属组织以特权)来反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改革派，此偏见支持了美国保守派龚伯斯。

从1899年起，亚历山大 · 米勒兰成为第二个进入资产阶级内阁的西方社会党人，工联主义者强大起来。政治社会党人现在分裂了。右派和米勒兰加入了现在的激进派政府，左派为避开政治加入了工联主义，并宣称用大规模罢工作为革命武器(Brecy, 1969)。CGT的成员很少(低于联合工人的半数，低于所有工人的5%)，但他们领导了多数罢工和游行示威。我们应当记得在这期间法国的政治是更多地围绕激进的国家而不是阶级，是由共和党的集权运动控制的，以从地方上植根于天主教的反集权者手中夺取对教育和家庭法律的世俗控制。因为工人激进分子一般都支持这种趋势，工联主义者不能动员整个阶级意识——工联主义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政党是针对政治问题的。这种分歧主要是来自政治成形，而不是因为法国工业的特色。

但是，与联邦制的美国不同，革命的共和传统的广泛推动，特别是雅各宾主义，促进了国家集权和思想认识的统一。领导者自豪地称自己为“革命者”，承认全部的法国国家资本主义，禁止敌对的，可选择的社会主义。尽管商业、工业和熟练水平的断层出现线出现了，但没

有一个转变为明显的地区性组织，而且，也不与思想派系相对应或强化它们。在1906年总罢工失败后，军国主义分子欢迎饶勒斯的统一才能。他于1905年创立的社会党融合了革命口号和政治改良——广泛的选举权，市政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福利的扩展。它甚至由于开始融合革命口号，集中化组织和集体谈判，改善了与CGT的关系。到1914年，出现了一场思想的社会党—工联主义运动。它宣称目标是发动革命，尽管我们也许怀疑它的能力(Gallie, 1983, pp.182—195[7], Lequin, 1977, Ⅱ, pp.297—370是明显持怀疑态度的)。

法国社会主义也集中在经济和男性职业的政治上。许多已婚女工没加入工会。大多数工人忽视了她们。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节日和旗帜，但"红色郊区"很少能产生足以能激活整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社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在美国，是男性选举权的存在。活跃的社会党人和工联主义者已经有了选票。他们对流行的妇女运动不大感兴趣，这一运动关心非职业问题，如妇女选举权和婚姻法。在大多数国家，男子选举权的早期获得确实延搁了妇女选举运动的开始。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斗争这一时期，统治者内部表现男子选举权的政治斗争也趋向把男子和妇女区分开来。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在工人阶级生活的整个经历中深深扎根。

总之，这种派系化，不是普遍的地方社会主义，大部分是从法国工人进入政权推断出来的，在制度上，这个政权是高度集中的，但在其他任何方面——特别是政党民主和国内军国主义方面是派系化的。

德国：专制的混合

到1914年，德国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霸头，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党。它提供了一个压制性的国内军国主义完全可能现代化的最明显的例子。沙皇的劳工关系部分是条件反射，部分是犹豫不

决，但德国政权试图用一种现代化的战略来驯服工人阶级，以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罗思(1963)定义为工人阶级的“消极联合”。但对战争命运而言，这也许已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内部制度化阶级冲突的主要方式。

正如第九章证明的那样，德国的经济兴起已经和政治、军事政权相互关联。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交通建设和国家统一促进了工业化。比起自由或天主教国家，工业化在普鲁士和其他保守的路德派邦国，如萨克森，进行得更深入一些。工业化很快就打上了半主权国家主义的烙印，但也有经济特色。和英国或美国的共同职业相比，小手工业、家庭小作坊、国内服务业保留得更完好，还有不同寻常的重视重工业，创造出了明显的二元的工业结构。多数熟练工人在转移到大型工业之前开始了手工业，而且他们很早就在手工业内形成了工匠的社会价值观念。另外，也存在明显的性别之分，妇女很少被正式雇用从事生产，尽管她们的临时雇用对家庭生计是必不可少的。在工业时期的生活中，有组织的德国工人阶级是工匠居多，但比起法国来，男性居多，只有 2% 的社会主义团体成员是女性。因为这些特殊性，德国劳工的经济轮廓基本上类似其他地方(Kocka， 1986)。像往常一样，受威胁的短工和失业工人发动了早期的骚动；更安全的手工业中工匠占据了第一稳定的工会；工厂工人(大部分是纺织业)相对温顺些，他们受雇主控制，不可能去罢工。工匠们经历了频繁的经济压力，特别是来自迅速、广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约 1900 年，金属行业和矿业的工人(不存在和政府、军队密切相联的铁路业中)和半熟练、非熟练工厂和作坊的工人联合发动了大规模工人运动。这是一场根本上归因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特殊运动(Tenfelde， 1985，也论述过)。

第九章描述了德国代议制和国家政治成形。1848 年革命迫使德国政权和阶级作出关键的决定。德国政权接受，而且被迫形成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国家，部分上是联邦的政府，而且它们提供有限的政党民主化改革来联合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犹豫了，但是被工人激进主义和

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秩序施加的压力所困扰。激进的工匠被孤立了，结果左派增加了。他们开始称自己为“工人阶级”，与工匠俱乐部，教育社团和当地工会合作，并通过政治流放和进步的欧洲社会党人取得联系。但他们人很少，经常陷入困境，并被镇压，不能与政权对抗，或利用政治同情来挫败军国主义。国家和由许多国内前线哨所支持的地方警察力量控制工人的联合，而且比西方国家更直接(Ludtke, 1979)。工人们被迫形成防御的阶级意识，但在普鲁士和路德教派的地区，他们也使相对的国家主权政治观念深入人心。

一旦普鲁士政权顺利地制度化，它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放松了。在19世纪60年代工会团体(主要是福利社团)。甚至表示直接的、代表工人利益的罢工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合法化了，尽管仍被警察密切监视(农业和家庭工人甚至直到1914年还没有获得这些权利)。随后的工会和罢工的扩展由于各地的行业而地方化，由于各地的宗教和政治而派系化。1870年，在7万名工会成员中，40%属于自由联盟，40%属于社会党组织，20%是独立派或基督教徒。工人政党在19世纪60年代从教育联合组织中兴起，不受自由派失败的约束，支持完整的公民权和政治公民权。1867年男子选举权的突然引入产生了政权所期望的影响，削弱了自由派联合工人的企图。然而有组织的工人不可能支持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而且有比例的抗议取得了未曾料想的结果，即允许工人政党取得逐步的选举成功。工人政党发展了改良的社会主义，比法国晚，但比英美早，而且是在国家工会形成以前。工人政党在1875年联合为社会民主党的前身，接着帮助联邦地方团体成立国家工会联盟。这个政党很早就获得了国家政权和绝对的路德教对劳工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仍有争议。在1867—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创立过程中，普鲁士对自由派和国家权利作出了让步。这个复杂的过程让普鲁士政权对两个阶级和国家战略有不同寻常的警觉。尽管有男子普选权，普鲁士君主仍对帝国议会和私人地产(旧政权)持有庞大的权力。大规模党派民主选举程序出现，但政权仍能选择党派进入它的智囊团。

男性工人阶级只有部分政治权利，正如仅有部分民权一样。社会民主党在城市工业区赢得选举，但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特色没有确立。像英国(更脆弱)和法国，工人政党仍能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和资产阶级和基督派政党联合。

俾斯麦自觉地参与了指挥半独裁政权联合的统治策略。作为1871—1890年的帝国宰相，他提出了一大堆民权来分而治之——从政权中踢出激进劳工、少数民族和分离主义分子，同时也包括中立中产阶级自由派、基督教派和一部分工人。此策略有四项主要条款：

1. 普鲁士德国政权在中欧的扩张会分散国内阶级斗争的注意力，经济扩张也会和政权的军事扩张相一致，这在第二十一章讨论。

2. 如第九章描绘的，俾斯麦分离了自由派。多数资产阶级政党被吸收到政权中来，只留了少数自由激进派在外，使他们和劳工联合。

3. 187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限制了工人的集会和政治公民权。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实际上所有的大型团体都被禁止；然而，根据授予每个公民政治军事的参与权利，他们能在选举运动中进行组织。但这并不起作用。政权培养出的分离主义，也遭受了挫折。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也遭受同样待遇(不像许多自由国家的财产特权)。选举特权也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实行控制。甚至在《反社会党人法》废止以后，工人也没有取得完全的公民权。集会的权力不完全，而且警察和军事当局几乎总是为雇主们调停劳动纠纷，军国主义也制度化了。尽管士兵们全副武装，但他们如其说是暴力的武装，不如说是仪式上的武装。正如我们早期看到的，实际上德国人在劳动纠纷中很少被杀，远远少于法国、美国，这两国都是男性民主国家。这是独裁联合，不是专制或党派民主镇压。举个例子，根据奥地利立法，工人集会要通知警察，警察会坐在看台上。如果他感到有破坏发生，就会戴上钢盔，这就表明是非法集会的信号，必须马上解散。几乎总是如此。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警察的钢盔也许恰恰是劳工与半独裁政权联合的象征。

普遍的排外，加上社会党的领导，使手工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在不断扩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内，鼓励了享有阶级身份的概念。在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中，该党拥护国家主权并在表面上拥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一般的行会垄断和在雇佣关系中发生内部对外部的抗争，工会并没有地区性组织。主要的分裂是思想上的：存在于最大的社会主义(绝对的路德派)“自由工会”，基督教联盟和雇主支持的“黄色工会”之间，这是一种重工业中内部劳工市场的表现，也存在一点工联主义；整个时期不能回避君主制，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权力的联合(Saul，1985)。

4. 俾斯麦通过体现表面社会权力的立法，来削弱阶级本身和社会的呼声。通过1883年的《国家疾病保险法》；1884年的《意外灾难保险法》；1889年的《老年及残疾保险立法》。正如第十四章指出的，这第一福利政府限制了覆盖面，对象只限于熟练工人和重工业内部劳工市场有特权的那些人。大企业主也提供住房和其他福利措施来维持一个稳定的劳工群，多数人支持这项立法。大工业家和国家精英的合作(在第九章中有注释)给予国内劳工市场地区主义以政治意义。社会党、社会主义团体和罢工一直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中的熟练工人中，这种情况持续到1914年，晚于其他国家。在大型企业中，工人们由于国内劳工市场特权而更被孤立于阶级团结之外(尽管许多清教徒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俾斯麦对于他的福利政策很明确，强调养老金水平应根据收入多少来划分，因为这样“对雇主更有利，因为它会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也就是对总体安全中的每个企业最重要的支撑，并因此鼓励它为它的目标而奋斗”(Crew，1979，p.127)。“工人中的上层分子”能有很少的“地区的社会公民权利”。

俾斯麦是少有的“政治家”，对当代政权的范围扩大很敏感，他的政策通常把国内和国外策略交织在一起。他对1870年表现出来的法国军事弱点进行研究，总结出四项政策教训。不像拿破仑三世，他会让大部分中产阶级，甚至部分工人参与支持德国的军国主义。如果小资

产阶级和工人激进派不进行联盟，他们可能会发展革命的幻想——但是他们不可能执行或削弱德国在国外的力量。高尔(1986)被俾斯麦政策的有机统一所打动，他把此称为“白色革命”。但在对熟练工人的姿态中是矛盾的，而且俾斯麦自己也阐明了这一点。在文化斗争中，他对天主教会反政权和对南方分离主义煽动的担心导致他反对这一点。这就迫使天主教社会党人左倾。他对议会的轻蔑导致了他1888年开始的颠覆阴谋，并导致了他下台。没有与农民、中产阶级和主要少数教会中至少两者的妥协让步，是很难在半工业社会中保持君主专制的。因为法西斯社团主义还没出现，议会的设立便是代价。

在俾斯麦下台之后，这项策略被部分恢复。基督教和农民对政权的支持得以恢复，影响了劳工、民族和分离主义极端分子的孤立。我将在第十九章深入讨论。《反社会党人法》以失败而被撤销；社会党人能通过选举产生的秘密组织经受住镇压。但对工人的权利，特别是集会权利的限制被保留下来。福利国家沿着俾斯麦的道路继续前进，扩大版图，但对那些被排除在民权和政治权利之外的地方化的工人影响不够。

但社会民主党仍是孤立的，缺少联盟，实际上趋向疏远了这些盟友。它的马克思产业主义制止了农民的支持(见第十九章)。不明朗的路德主权说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疏远了天主教会，阻碍了反对专制的、坚实的、潜在联盟的形成。这样，天主教会转向支持自己的农民和协同劳工运动，后者在20%—25%的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变得更重要。工人阶级团体和社会主义在城市工业路德会的集团中变得孤立。甚至到1914年，德国也只是半工业化。选举分配结果在自耕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几乎相同，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比例是6.5比3.5。社会党控制了新教工人阶级并争取天主教工人的选票——因此选出许多代理人——然而仍不能影响政府贯彻互惠派或改革派的政策。而且，没有联盟，就不能影响它正式提出的革命。

俾斯麦下台后，一部分天主教徒和自由派分子，甚至少数工业家赞

成自由化。集会的自由——个人权利的最终完整——在1908年终于通过。随着团体成员的增多，工会从社会党那儿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更倾向于互助主义(Mommsen，1985)。但统治政权不愿进一步和解，而且它们有充分的宪法权力来分离自由派。在各个部门和警察专权的支持下，多数企业主继续阻碍工会集会，这就更正式且真实地提出了民权让步。尽管表18.1表明工会在增长，但除“黄色工会”外，很少被企业主承认。工会帮助管理日益扩大的社会福利，而且，当雇主被迫在罢工中讨价还价时，工会会有实际上的认识。但很少有集体讨价还价共识(确切数字不同，见Schofer，1975, pp.137—164；Stearns，1975，pp.165，180—181；Crew，1979，pp.146，218，250—251；Mommsen，1985，p.382；Spencer在1976年谈到1914年让步性的讨价还价在鲁尔区增长)这样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团体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缺少重要联盟，苦恼且有孤立。

对劳工的影响经常有记载(Roth，1963；Morgan，1975；Geary，1976；Kocka，1986；Nolan，1986；还有Evans，1982年的许多文章)。虽然被排除在外，但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而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路德派马克思主义核心转向了产业内部，发展社会主义亚文化群，组织工人与合唱团、乐队、体育俱乐部、图书馆和形成社区节日。这些是基本的娱乐活动，但他们也通过社交活动(Lidtke，1985)统一联合了工人整体。尽管多数工会成员是熟练工，地方主义仍被社会党人和自由工会中央委员会挫败。工会逃避危险，把大部分战略和选择问题留给了政党(Schönhoven，1985)。类似其他人民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的国家，社会党支持广泛、完全的议会主权，包括妇女选举权。因为政权精英分子坚决提倡家长制标准，另外政党也出台了家庭纲要，尽管当地集会男性占绝大多数(直到1908年，国家才不禁止妇女和少数民族参加政治组织)。尽管政党和工人阶级文化体现了这时期的普遍的性别不平等，在(男性)雇佣家庭和社区组织间，仍有低于同时代标准的歧视。族长性政权维护了德国社会主义广泛的整体意识。

社会党发展成有实力的选举力量，占据了 1/3 的选票，到 1912 年，组成了最大的帝国议会党，它的政治控制着主要工会，表达了产业主义者，中央集权口号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目标。然而它没有为超议会策略，甚至议会改革结成联盟。它坚持尽最大努力为选举而战，但仍处于国家政权控制的体系中。罗思称之为“消极统一”，“允许敌对的群众运动合法存在，但阻碍它进入权力中心”(1963, p.8)。政党右翼赞成温和的改良主义，并与政权达成妥协——但只是在卡普里维时期和贝特曼—霍尔维格时期偶尔发生。少数的极左派提倡革命，但缺少人员和联盟来反对武装到牙齿进行镇压的国家政权。大多数追随中左派，赞同革命——但只是在将来。德国最终完全工业化，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党。如考茨基所指出的，政党不得不为革命而组织，而不是组织革命。

国家统治部分转移，部分有意识地修改相对成功的半独裁策略来联合劳工。这种策略转变比美国偏离马歇尔“进化民权计划”偏离得更远，因为统治集权整个时期只部分地作出了民权和政治权利的让步，同时以社会权力的不完全让步给予来进行实验。劳工们披着马克思产业主义的外衣，戴着政治家眼罩，什么也没贡献(第十九章详述)。

鉴于劳工的孤立和“消极的统一”，像马歇尔指出的，看起来没有明显的朝向自由或社会民主的道路。或像马克思或考茨基指出的，没有明显的革命道路。这是绝对君主专制和各阶级要求的政党民主，地区政府和要求分权的教会对峙的结果。德国的经济与其代议制和国家定型相比没有特色。相对仪式上的国内军国主义更没特色。事实上，“专制国家资本主义”和“消极统一”，如果没有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加快，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最近可与之相比的发生在美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不同的阶级关系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同形式的制度化，主要是由不同的国家定型，而不是由工业化导致的。

其他欧洲国家

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介于德国的半独裁主义和英国、法国的党派民主之间。奥匈帝国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德国，直到1891年都在不断镇压工会和工人政党，使工人由左派转为一个马克思社会主义政党。但是王权面临更强大的联合。这也影响到工人，从单一的跨国家到许多地区性、全国性的运动(Gulick，1948，pp.21—24；Shell，1962)。虽然集权，但土地贵族和军队相对较弱的瑞典和丹麦王朝已让渡一些党派民主权利给农民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而且崛起的工人与两者联合起来，推动远离英国的互惠主义成为改革者的社会民主(见第十九章)。半民主化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政权也以法国为榜样，在冷静地游移，尽管伴随着更多的“国家”竞争。在日本，明治复辟分子修订并采用了德国的战略。

在所有这些国家，王权和旧王朝试图在半议会的政权中保持中央集权(在斯堪的纳维亚失败了)。中产阶级没有像美国、英国或法国那样，被纳入政党民主之列，也没有像俄国那样被完全排除于政权之外并被镇压。显而易见，这些国家大不相同。在一个极端激进的地区内，资产阶级仍然对王权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就像西班牙或(根据地区、国家而不同)奥匈帝国。另一方面，在政权中，比起德国，资产阶级被纳入一个甚至更独立的地位，类似于日本。前者是极度扩大的联邦主义，而后者是集权制国家。

就像在德国，我们可以从这双重的代议制和国家定型推断出工人的大部分权利。就阶级而言，工人运动既不是部分地在国内(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不是被完全排除在外和被军事镇压(如俄国)。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特殊路线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而是被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改变后的，它的可行性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工人的影

响也是深远的。比起英国，这些国家有更积极的社会主义，有比法国(尽管西班牙是个例外)更一致、更统一的以政治为主的战略；比起俄国，更缺少革命性。每一处的工人组织支配着地区。除了西班牙，最紧密的平衡是德意志帝国的消极联合：名义上有部分的民权和政治权利，但又被排除在国家和消极的统一之外。

唯一的例外是西班牙，因为它的阶级表现和国家问题相互交织[8]。在西班牙，工联主义达到了它的最强大的欧洲方式；而且它在20世纪的发展已经稳人正轨。这种人轨能用我的政治中心范例来解释吗？答案是肯定的：工联主义在西班牙的强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明显的政治构成，包括重要的民族和地区公民权利之争。就像在奥地利，问题出现了，各阶级应当从哪个邦要求权利？

从1876年开始，西班牙有了宪制王权、正式的(即使是腐败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合法的工会(尽管带有通常的资产阶级组织权的限制)。但它在经济上落后(大约俄国的发展水平)，没有广泛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主要在地方的资助人—受益人网络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不是在阶级之间。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政府中交替执政，背后有银行业、工业和地方权贵的支持。政党精英们分配权力，控制了暴动的途径，而且在所有阶级中扩充成员。这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半外围国家中很普遍(Mouzelis，1986)。兴起的工人阶级将在哪些地方适合这一点呢？政治也包含阶级和左—右倾思想，特别呼吁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敌人。工人运动也许会附属于激进主义，因此有现代的法国或英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但在地方贵族势力牢固确立的地方，这种政治不能改变他们。工人和有组织的农民一起对国家政治不抱希望，并转向了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

这种可能性由于卡斯提耳的统治而引起的地区愤恨而更进一步，有时达到了民族分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策略，转向中央政权，在西班牙的部分地方变得似乎合理起来——乡村未被影响地区有无政府主义，工业中有工联主义。我不是宣称对西班牙地区复杂的不同

情况我有专家的评价，但这两个政治原因——在广泛的阶级组织出现以前，部分民权和政治权利，加上地方分离主义——看起来能解释西班牙劳工中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事实上的分裂。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明显的地区形式，在加泰罗尼亚强调工业化，那里分离主义和工联主义加强了，在卡斯提耳和阿斯图里亚斯加强了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现在的情形朝着1917—1918年和1936—1939年的悲剧性的分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西班牙在细节上，而不是在我说的总体规模上发生了偏离。西班牙阶级斗争的明显性主要是由于国家权力的竞争，其次是工人运动的进程——就此而言，就像奥匈帝国，权力政治唤起了严肃的、与阶级斗争相互交织的“国家”。

结论

引用无数个别细节来支持本章的全部论点是没有必要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像工业化转型那样发展，其间交织的，首先是代议制的、国家的、国内军事政治定型方面的变化，其次是不同形式的工人组织。在第十五、十七、十八章中我提出了19世纪劳工工业转型的三点描述：

1. 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工业资本主义不止产生了一个劳工集体，而是三个。他们互相竞争和削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工人中普遍产生了阶级身份的意识，和一个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意识。一些工人也许还以为资产阶级支配着他们的全部生活，并产生了可选择社会(尽管这些选择很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尽管工业化也促进了另外两个更小集体化的工人团体：地方集体，由技术和劳工市场的权力产生；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局部的互相依赖。广泛的政治性阶级发展起来，但只是和地方主义、部门主义不完全地、持久地竞争。

2. 我描述了阶级身份加强的两个时期。第一次(第十五章)来自(第

一次)工业革命，但只限于英国。这是特别的集体化，因为革命促进了混杂的职业状况：工厂、技工贸易、街头工作、家庭作坊都互相渗透。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熟练阶层、近邻、家庭成员都受到了影响，这就深化了人们对熟悉的工人阶级身份、矛盾的雇佣关系、家庭以及当地社区反抗外来压迫的意识。第二(第十七、十八章)，第二次工业革命遍及所有这些国家(不管它们是否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处都产生了集中的资本、大型工厂，还有雇主们讨厌的简单技工，同时把临时工升为正式工和半熟练工人。这使广泛的工会和被禁锢的工人发展了他们自己居住社区之间的交流。作为回应，工人们发展了广泛的、政治性的、能清楚表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阶级组织。

工人阶级确实产生了两次。但它的产生是受限制的。在第一时期，它集中于技工身上；第二时期，集中在熟练和半熟练金属工人、矿工，和大城镇的运输工人身上。在这些中心之外——在第一时期，在未受威胁的商业领域，在多数农村，在家庭仆人之中；第二时期，在其他工业和小镇上——大部分工人仍然受到分散的控制，对阶级身份没有意识或采取敌对态度。这使激进分子觉醒，意识到他们对广大选民的影响有限，对武装军队的影响更小。甚至在中心，工商联合会和分散的劳动力市场控制能减少阶级统一，使对立双方相互妥协，从而远离阶级。整个 19 世纪工匠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熟练工人。主要的地区断层线是在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之间。中心内部工人市场发展了，产生了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新的部门的相互依存，以及有组织的工人和无组织的临时外部工人之间的分离主义。当这些人被定义为“工贼”或“拒不参加罢工者”，地方主义就变为暴力，尽管有人称为“社会党人”。这样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且也作为一个部门或地区。为争取工人身份和精神的斗争仍在继续。

3. 在第一时期之后，职业和家庭—社区生活也没像马克思预料的那样简单地相互强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正式的职业将生活分成两部

分，更多地是因为有正式工资的职业——特别是在工业和产生了大部分工会的熟练阶层中——变成以男性占主导地位。集体劳工的领域、组织、意识仅限于变为集中雇佣的生产性的。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关心生活的整体性。不足以像宪章主义者和雅各宾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们热情减退，内在的士气也削弱了。就像我们在第十九章见到的那样。在多数国家，产业主义和国家主权说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削弱，这妨碍了对农业人口的有效的吸引。

这样，劳工经济的发展是含混不清的，也许能转为马克思所期望或渴望的轨迹，也许下降为更加分裂或保守。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政治的柔韧性上，工人和农民是相似的，像农民一样，他们拒绝许多不同的道路。道路的不同很少由资本工业化的差别来决定。德国和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个领导国，发展了西方最大和最小的社会党。法国由于工业化的落后，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是早熟的。

工人运动多样性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权力的定型，是有军事王权和代议制以及民族敌人之间的斗争推动而开始的。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后来大部分国家定型为强大的资本主义类型，而且大部分也开始大幅度平民化。但它们实质上已经把不同统治策略制度化，工人对此的反应是作为阶级、地方和部门的运作者，而且带有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当统治政府直接面对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时，有四种主要策略或倾向，夹杂着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代议制。

1. **专制军国主义**的例子是沙皇俄国。工人们一致地(尽管并不是完全一致)被否决了权利并遭到镇压。因此，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和社会主义只取得了有限的、不稳定的发展。俄国工人变成为工人阶级，他们的激进分子，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2. **自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例子是美国。工人的权利很不平衡，尽管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已经很牢固地制度化，集中民权还是被限制并遭到残酷镇压。因为这种镇压是选择性的，工人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美国劳工变为部门性和地区性的，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且首

要的是没有社会主义。

3. **自由改良派内部合作**的例子是英国，也包括英国的白人自治领和荷兰、比利时。法国与此相类似，尽管用复杂方式在以前描述过。资本自由主义在欧洲并没有制度化——瑞士是最好的说明。自由民主逐渐扩散，同时阶级越来越受到注意(还有财产)。旧政权把中产阶级和农场主融合入政党民主的最高机构中。政权中的资产阶级政党看到了以阶层和阶层、组织和组织方式与工人、地区、部门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当它们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兴起。不愿展开国内军国主义，在自由主义、现代互惠主义派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改良派形式之间，在阶级和工人组织的地方形式之间妥协。后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把这种策略更深远地推向全面的**改革合作**中。

4. **半独裁联合**的典型例子是日耳曼帝国，然后是奥匈帝国和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介于半独裁主义融合和自由融合之间)。君主制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农场主的首轮交锋中取得胜利，在执政党民主方面没有让步。借助于半议会制使部分的分而治之策略制度化，并且使军国主义缓和为军事力量的礼节性表演，这就成功地瓦解了它们，把它们绝大多数融合入这种制度。极少数不包含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极端分子与手工业者的联合，形成了表面上的革命社会政党和联盟。但是它们的孤立以及它们对有限的政党民主政治的介人，实际上削弱了影响任何革命抉择的力量——或者，实质上，削弱了任何重大的改革主义或互惠主义——对两者的抉择。

但是这些策略或转变不能完全解释结果，因为我也增举了变化着的**国家**定型的例子。让我们就有无阶级特征和有无社会主义来考虑这两个极端的结果。俄国独裁统治高度集中。工人们经历了这样一种全民族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以至于他们形成一种在就业、街道及社区等关于他们自己身份以及他们对于身份的强烈的阶级感和民族感。军国主义者变得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从属于信奉革命的中央集权学说的社会党。可能他们的革命激情会被无限地抑制，但是这种制度也离间了城市自由

主义者、地区民族主义者和农民，导致他们在全民族动员的战争中失败。无产阶级和整个民族一起起来推翻了它。美国在结果上是相反的一个极端。但是美国是仅次于最严重的国内军国主义的一个例子。这里的镇压是由强大的资本主义和俄国的两个对立的政治极端政党民主和联邦主义联合实施的。因为它加强了地方—地区、民族—宗教和熟练工人内部劳力市场的地方主义。美国社会党人派系化，然后又分裂。在由这两大力量统治的20世纪中叶，这两大极端的例子有重要意义。

中间的结果也是部分地由国家与代议制成形的显著结合产生的。在德国，相当部分的工人被排除在集会权和政治权之外。在俄国，这加大了阶级统一，削弱了地方主义，但激进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选票威胁。甚至连阶级也是根据竞争性的国家成形来划分的。尽管这加强了路德派和北方派的统一，但在天主教和南方派中间削弱了，同时它们削弱了工人、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德国工人阶级也许是像马克思可能希望的那样组织和成为社会党人，但规模很小，而且没有得到好的领导。根据国家成形，由工业和劳工的地区—宗教介入调节，工人运动有时是高度国家主义者(如德国)，有时是高度反国家主义者(如西班牙部分地区)，最常见的是综合妥协。

对农民而言，国家成形帮助他们认识到了宗教差异。为什么天主教徒比清教徒更抵触社会主义？最直接的原因是教会财产驱使他们如此。但是为什么？也许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是无宗教信仰的——但这应疏远所有的教会。也许这类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保守”。它支持等级制度，但国家路德教也如此，它对北欧的社会民主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起着传导性的作用(后来是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一批不成比例的带有路德派背景的工人变成社会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或有的后来成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

但另外天主教会在两种意义上是反国家主义的。它是过渡性权力组织，而且是以提倡地方地区主义进入“国家”政治的。在这时期它尤其反对国家主义，因为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成形为世俗的，并在天主

教地方权力主要主管的两个领域——教育和家庭进行蚕食。国家教育和民权，尤其是家庭和法律是它所害怕的。因此，教会激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主义——在法国最为明显。而在奥地利、德国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持续存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另一种国家主权说，因此教会绝对反对它，这样教会能倡议它自已的保护主义、经济主义，甚至互助的工会。我们发现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型式的趋势(尽管不是一种完美的集合)——马克思主义和有争议的社会民主——在北欧路德派之间或作为世俗的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反对天主教统治的南欧已经发展起来。相反的，非政府的清教主义(像英国不信教主义或大部分美国新教教会)与温和的经济主义和工人协同作用相互联系。第十九章把争议扩大到农民。教会的政治姿态很少取决于正式的教义，而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是多数还是少数派教会以及国家的身份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这时期，教会政治主要围绕国家问题进行成形，甚至在农民阶级中更加强烈。

注 释：

[1] 这两个国家的数据贫乏，近来的东欧革命或许可弥补。它们工人阶级斗争的民族成分(方面)被忽略了。

[2] 1912 年，挪威工党占选票的 26%。1915 年上升到 32%，1913 年，丹麦社会民主党获得 30%的选票。其余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英法选举之后，到 1909 年，意大利社会党获得 19%的选票，然后在 1913 年，合并独立党和改革派，它们包括了 23%的选票(库克和帕克斯顿 1978 年的数据)。

[3] 正如美国同事曾劝我的，或许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存在第二个转折点(尽管我不太相信)。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增长(看起来是增长了)是相反的——再一次的由于政治成形而不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在 1914 年以前，对美国来说事情就已基本定下来了，但是为了恰当地支持这一论点、就必须对 20 世纪的发展作全面探索。在本卷中将不涉及这个问题。

[4] 这部分是马克斯对美国地方主义不精确的分析，否则，他对地方主义的分析将会是杰出的。他错误地把美国和经常受小小镇压，如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那样的国家归于一类(1989：75)。

[5] 关于工人阶级，我主要是依据邦内尔(1983)、曼德尔(1983)、史密斯(1983：5—53)、斯温(1983)的研究。关于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工厂制度的有趣的比较，参见布拉沃伊(1984)。关于制度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参见霍布森(1991)。关于沙俄劳工政策，见麦克丹尼尔(1988)。关于劳工镇压，见戈德斯坦(1983：278—287)。

[6] 关于这时期的法国劳工史，我特别参考了诺兰德(1956)、勒弗兰克(1967)、里德利(1970)、佩罗特(1974)和莫斯(1976)的作品。

[7]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一点我不同意加利。他弱化了战前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力量，这点是对的(他把后来的力量归因于“一战”，这部分争议我将在第三卷评论)。但他

弱化革命性质或相当于性质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它已派系化。马克思主义和工联主义在1914年前已完全确立，正如他声明的，它们不是"一战"的产物。

[8] 这几段主要依据马莱法基斯(1970)，他过度强调阶级，还有米克(1974)和吉纳(1984)。

参考文献

Aminzade, R. 1981.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patterns of industrial pro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Bain, G.S., and R.Price. 1980. *Profiles of Union Growth*. Oxford: Blackwell.

Bairoch, P., 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in English and French).

Bell, D.1974. The problem of ideological rigidity. In *Failure of a Dream?*, ed. J.H.M.Laslett and S.M.Lipset.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Besançon, A. 1986. The Russian case. In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d. J.Baechler, J.A. Hall, and M.Mann. Oxford: Blackwell.

Boll, F. 1985. International strike wav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1989. Changing forms of labour conflict: secular development or strike waves? In *Strikes, War and Revolution*, ed. L.Haimson and C.Ti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nnell, V. 1983.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ecy, R. 1969. *La grève générale en France*. Paris: Etudes, et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s.

Bridges, A. 1986. Becoming American: the working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ivil War.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ody, D.1960.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The Non-union Era*.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Burawoy, M. 1984. Karl Marx and the satanic mills: factory politics under early capitalism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Burnham, W.D. 1965.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univer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

1970.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Cook, C., and J.Paxton. 1978. *European Political Facts, 1848—1918*. London: Macmillan.

Cottereau, A. 1986. The distinctiveness of working-class cultures in France, 1848—1900.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ew, D.F. 1979. *Town in the Ruhr: A Social History of Bochum, 186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ronin, J.E. 1985. Strikes and the struggle for union organization: Britain and Europ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1989. Strikes and power in Britain, 1870—1920. In *Strikes, War and Revolution*, ed. L.Haimson and C.Ti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bofsky, M. 1969. *We Shall Be All*.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4. Socialism and syndicalism. In *Failure of a Dream?* ed. J.H.M.Laslett and S.M.Lipset.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Edwards, P.K. 1981.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974*.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Evans, R.J.(ed.). 1982.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0—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Croom Helm.

Fink, G.M.1973. The rejection of voluntarism.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6.

1987. Labor, liberty, and the law: trade union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orde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4.

Foner, E. 1984.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7.

Forbath, W.E. 1989.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Harvard Law Review* 102.

Fraser, W. H. 1974. *Trade Unions in Society: The Struggle for Acceptance, 1850—1880*. London: Allen & Unwin.

Gall, L. 1986.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London: Allen & Unwin.

Gallie, D. 1983. *Social Inequality and Class Radicalism in France and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ary, D. 1976.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1848—1919.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6.

Giner, S. 1984.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atalonia. Sheffield: Anglo-Catalan Society.

Goldstein, R.J. 1978.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Moder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83.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Gompers, S. 1967.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An Autobiography*, 2 vols., 2d ed. 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Publishers.

Gossez, R. 1967. *Les ouvriers de Paris*. Vol. I : *L'organisation, 1848—1851*.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Grob, G.N. 1961. *Workers and Utopi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rüttner, M. 1985. The rank-and-file movements and the trade unions in the Hamburg docks from 1896—1897.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Gulick, C.A. 1948.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Vol. I : *Labor's Workshop of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imson, L.H. 1964—1965.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917. *Slavic Review* 23 (1964), 24(1965).

Halle, D. 1984. *America's Working Man: Work, Home, and Politics Among Blue-Collar Property Own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nager, M.P. 1980.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Artisan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ree French Town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artz, L. 1955.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Hirsch, S. 1978. *Roots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obson, J. 1991. The Tax Seeking State: Protectionism, Taxation and State Structures in Germany, Russia, Britain and America, 1870—1914. Ph. 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olt, J. 1977. Trade unionism in the British and U.S. steel industries, 1880—1914: a comparative study. *Labor History* 18.

Katznelson, I. 1981.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ntheon.

Kochan, L. 1966. *Russia in Revolution, 18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Kocka, J. 1986. Problems of the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the early years, 1800—1875.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ditor, A. S. 1981. *The Radical Persuasion, 1890—1917*.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Lash, S. 1984. *The Militant Worker: Class and Radicalism in France and America*. London: Heinemann.

Laslett, J.H.M., and S.M.Lipset (eds.). 1974. *Labor and the Left*. New York: Basic Books.

Lebergott, S. 1984. *The Americans: An Economic Record*. New York: Norton.

Lefranc, G. 1967. *Le Mouvement Syndical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Payot.

Lenin, V.I. 1970. *What Is to Be Done?* Manchester: Panther Books.

Lequin, Y. 1977. *Les ouvrier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1848—1914)*, 2 vols. Lyon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s.

Lidtke, V.L. 1985.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M. 1977.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 ed. S.Bialer and S.Sluza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4.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his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Lowi, T.J. 1984.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analysis. In *The Cost of Federalism*, ed. R.T.Golembiewski and A.Wildavsk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Ludtke, A. 1979. The role of state violence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example of Prussia from 1815—1848. *Social History* 4.

McDaniel, T. 1988. *Autocracy, Capitalism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Kean, R. 1990.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lefakis, E.M. 1970.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ndel, M. 1983.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Macmillan.

Mann, M. 1988.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In M.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rks, G. 1989. *Unions in Politics: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eaker, G.H. 1974. *The Revolutionary Left in Spain, 1914—192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B.R. 198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Detroit: Gale Research.

Mommsen, H. 1985. The free trade unions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imperial German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Montgomery, D. 1967. *Beyond Equality*. New York: Knopf.

1979.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Labor and the republ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60—1920. *Le Mouvement Social*, no. 111.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Morgan, D.W. 1975.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ss, B.H.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1830—1914: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uzelis, N. 1986. *Politics in the Semi-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an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owry, G.E. 1972. *The Progressive Era, 1900—192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olan, M. 1986. Economic crisis, state policy,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1870—1900.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land, A. 1956. *The Founding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1893—190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lman, S. 1928.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Perrot, M. 1974. *Les ouvriers en grève*. Paris: Menton.

1986.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R. 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yback, J.G. 1966.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Free Press.

Ridley, F.F. 1970.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in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gin, M. 1961—1962. Voluntarism: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an antipolitical doctrin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5.

Rokkan, S. 1970.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Roth, G. 1963.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Totowa, N.J.: Bedminster Press.

Rueschemeyer, D., E.Stephens, and J.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ul, K. 1985. Repression or integration? the state, trade unions and industrial disputes in imperial German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Schofer, L. 1975.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 Labor Force: Upper Silesia, 1865—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önhoven, K. 1985. Localism-craft union-industrial union: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in German trade un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Sewell, W.H., Jr. 1986.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1789—1848.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Katznelson and A.R.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efter, M. 1986.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 Katznelson and A. R. 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ell, K.L. 1962.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strian Soci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Publishers.

Shorter, E., and C.Tilly.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lar, M. J. 1988.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wronek, S.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t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lotkin, R. 1985. *The Fatal Environment: The Myth of the Frontier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1800—1890*. New York: Atheneum.

Smith, S. A. 1983.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mbart, W. 1976.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Spencer, E.G. 1976. Employer response to unionism: Ruhr coal industrialists befroe 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Stearns, P. 1975. *1848: 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New York: Norton.

Swain, G. 1983.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Legal Labour Movement, 1906—1914*. London: Macmillan.

Taft, P., and P.Ross. 1970. American labor violence: its causes, character and outcome.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 H.D.Graham and T.R.Gurr. New York: Praeger.

Tenfelde, K. 1985. Conflic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1880—1914*, ed. W.J.Mommsen and H-G. Husung.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Allen & Unwin.

Traugott, M. 1988.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8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

Ulman, L. 1955.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 Trade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nstein, J. 1967.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2d 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iebe, R.H. 1967.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 Wang.

Wilentz, S. 1984. Against exceptionalism: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790—1920.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 26.

Woodiwiss, A. 1990. *Rights v. Conspiracy: A Sociological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ur Law*. Oxford: Berg.

Wuthnow, R. 1989.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九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斗争，1880—1914年(三)：农民

对农村阶级进行的比较研究很少。工人被反复谈论得令人厌烦，而农民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可是，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农民人口最多，是最大的选举团体，大部分士兵也是农民。在这一章[1]里，在我看中的五个国家中，拿四个来比较它们的农村阶级斗争，此外，再加上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挪威和瑞典——另外加的国家足以让我代表"左派"农民政治。这里未谈及大不列颠的情况。从马克思开始进一步发展的阶级划分理论大多数是以英国状况为基础的。表19.1表明了这是怎样在误导人们视线的。

表19.1 各国劳动力的部门分配(每一部门所占百分比)：

国家	年代	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合计
大不列颠	1871	15	47	38	100
	1911	9	52	40	100
法国	1866	45	29	27	100
	1911	41	33	26	100
丹麦	1870	48	22	13	836
	1911	42	24	30	96
德国	1871	49	29	22	100
	1910	36	37	27	100
美国	1870	50	25	25	100
	1910	31	32	37	100

(续表)

国　家	年　代	农　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合　计
瑞　典	1870	61	8	12	816
	1910	46	26	14	96
奥 地 利	1869	65	19	16	100
	1910	57	24	19	100
匈 牙 利	1870	70	9	21	100
	1910	64	18	15	100
俄　国	1897	59	14	25	100

a. 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

b. 丹麦和瑞典的官方统计数字包括大量未充分说明的职业，尤其是在早期。

资料来源：奥地利—Kausel(1979：698)。德国—1871 数据来自 Fishcher 等人(1982：52)。所有其他数据来自 Bairoch 等(1968)。

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我们看到英国(除了它的爱尔兰殖民地外)都保持这种异常。1911 年，它的农业劳动力仅占 9%，比其他任何大国的这一比例的 1/3 还少(小国比利时次之，是 23%)。在其他两个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劳动力那时刚刚超出农业劳动力。除英国和比利时外，在其他任何地方，这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虽然，在 20 世纪初美国的阶级关系中，农业并不重要，但在别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前面几章列表说明的资本、劳动力和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结果将决定性地由主张平均地权的人改变。为了透彻地分析现代阶级关系，我们必须分析农村的人口。

但是，分析农村政治的普通理论有三个障碍，马克思的遗论是灾难性的。他预言农业人口会减少，就像英国一样。结果确实如此。但仅在 20 世纪中期，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基本制度化以后，他还固执地认为农民无力组织阶级。他的错误让社会学家犯了巨大的政治偏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其次，一种反农民偏见已支配着西方大部分思想，把农学家们看作是保守的、传统的和反现代化的，并且注定被扫入历史垃圾堆(Gerschenkron, 1943; Moore, 1973; E. Weber, 1978; Jenkins, 1986)。再次，农村政治在事实上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为理论提出非

常艰难的任务。 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能将它们的教权主义、君主主义、费边主义、民粹主义、共和主义、社会民主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融为一体呢?

理论的发展，经济方面比政治方面要好，20世纪的第三世界比西方的要好。 林茨(Linz, 1976)、佩奇(Paige, 1976)、索罗金(Sorokin, 1930)等，斯廷奇库姆(Stinchcombe, 1961)和沃尔夫(Wolf, 1969)都主要分析了现代第三世界的经济利益、集体生产力以及对全球商业化作出的反应。 然而，正如我在全文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也是政治。 一些斗争目标放在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勒索、税制和军队征募上，经济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因为政党追求掌权——中央的、地区的和地方的——以便实现它们的目标，因而政治具体化也构成了农民运动。 尽管这些作者承认用经济变化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是不够充分的，他们把政治看作“外界”影响(Wolf, 1969, pp.290—291, Paige, 1976, pp.43, 47)，或者将它们作为以经验为依据的细节加以补充(Linz, 1976)。 其他人把政治理论化，却仅用它来解释阶级政治(Moore, 1973; Rneschemyer, Stephens, and Stehpens, 1992)。 我认为农村政治的差异主要是随着民主政党和国家政治具体化互相结合而产生的，因而决定性地构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

农村的阶级

我划分了三个主要的农村阶级。 在这一节里，我分析它们的经济利益和权利。 在下一部分我叙述一下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土地所有权的动力，即资本主义商业全球化对农民的影响。 最后，我考察政治权利关系是怎样与这些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阶级是:

1. 庄园主——贵族、绅士或对他人土地有使用权的人——拥有大片土地，中等或大规模地雇用劳动力。

2. 农场主——欧洲大陆的术语，农民——通常拥有他们自己的土

地，雇用自己家的人耕种。

3. 无地劳工，为第一阶级，有时也为第二阶级工作，可以是偶尔、季节性或长久地，以实物领取工资，自由或契约身份。

两点说明：第一，租地自行经营产生了居间的身份。根据拥有土地的规模和是否雇工，拥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法律特权的租地经营者，为共同利益与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结合在一起。相反，缺乏保证的佃农或面临失去租佃权利威胁的佃农与无地劳工的关系更密切。第二，农民是参差不齐的，既有富裕的市场型农场主，又有生产的粮食只够自己食用的小土地持有者。大部分富裕农民雇用劳工，一般说来是季节性地从家庭外雇用，而穷困的农民受雇用人不仅要在他们小块土地上劳作，而且，还要以自由身份、契约或交谷租种的方式受雇于较富裕的农场主。我特别注意佃农和小土地持有者(dwarf-holders)。

这三个阶级中的两个阶级将不会耽搁我很久。第一阶级的利益和权力是明显的。庄园主和地主处于欧洲新老统治政体的核心。他们控制着美国南部，影响着其他地区的大商业财团。他们在每个地方组织保守的“秩序政党”(Parties of order)致力于维护财产关系，反对民主(Rnese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三阶级即无地劳工的利益和权力也容易掌握，尽管他们是矛盾对立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受雇于大农场主，通常受到明显的剥削，遭受低工资、专横职权和无正当权力的折磨。大部分活动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政党将它们的努力集中在这一部分人身上。但是劳工不善于在集体组织中，劳工是贫穷的——他们分散于不同地区，几乎没有文化；在雇主的直接控制下生活和工作，经常吃住在农场，有时被作为债务奴隶；而且他们要服从农场主部分控制的当地慈善机构——教会、行政机构和政府。尽管这是一个潜在的阶级，但无地劳工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广泛的或政治的阶级。

第十五章赞同纽比(Newby)的解释(1977)，部分控制怎样导致了与其说是阶级意识，不如说是“依从”：农场工人从农场主那儿得到他们的

必需品，而不是反对他们，而且，发展并内化了吸引他们的依从策略。农村的社会鼓动家实际上在威胁着这种依从的成功。劳工(和租地经营的农场主)可能把他们自己看作与其说是一个阶级的成员，不如说是跨阶级的村庄和集体庄园的成员。阶级身份和激进政治通常不出现于地主所有制中，其中地主和佃农都有地方自治权，尤其在南部欧洲常见的以谷物交租的形式中(参看，例如，在西班牙，Malefakeis, 1970)。在所讨论的这些国家中，这种情况仅出现在法国东南部和美国西部的一些州——它滋生了激进主义。除非地主的局部控制机构被取消，否则农村无产阶级会成为一个最突出的潜在阶级。

第二阶级即农民农场主是个问题。他们对于其他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清楚。虽然大部分农民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这一点他们与大土地所有者、无地劳工和城市阶级截然不同。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生产中心论，他们没有固有的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生产是自主的。大多数的生产剥削发生在家庭内部，一般为家庭中年长的男性所实施。大部分小土地持有者都受到一定的劳务剥削，尽管这几乎还没提供一个总的阶级身份(因为他们也是财富私有者)。

然而，韦伯的阶级分析是基于市场上的信誉斗争而非生产斗争，这可能更适合农民。韦伯认为阶级是随历史转化的：从消费信誉斗争开始，首先，转向商品市场的竞争冲突，然后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争议。"历史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债务奴役的威胁，反对城市债权人"(1978, Ⅱ, P.931)。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比韦伯预测的还要长。

19世纪晚期，农民主要遭受信贷和物价的剥削——在抵押契据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谷物扣押制度、垄断价格方面——这使债务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债权阶级处于对立。马克思也注意到这种发生在19世纪法国农民中的现象——将要来临的无产阶级化。但他怀疑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组织能力，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他出色地剖析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农民们尽管彼此相似，他们却不互相依存，他们的生产方

式使之彼此分离——“只有地方的密切联系”，使农民好像一麻袋土豆中的土豆一样，个头大但形状不一，是有活力、无能力组织的阶级。这是错误的。可以把农民非常有效地组织起来(如 Wolf, 1969)。

然而，无论它们的阶级利益怎样，三个农村阶级都有部分共同的特性。它们都易受气候和谷物疾病的影响。用所有亚文化群的意识形态的反响来表达它们“比较接近土地”，它们被地域分割成村庄，有明确的本地区组织和政治。大部分工业工人由工会或企业组织，而农民则由社团和当局组织。我们将看到，进入 20 世纪，这使得宗教与中央—外围组织远远超过罗坎(Rokkan)所构想的时间框架之外，这也是恰当的。最后，欧洲(尽管不是美国的)的农民比城市工业人口更传统，与旧政体和教会的关系更长久、更制度化。农村政治更多地与旧政体和教权主义有关系，无论是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而言。

行业主义使得作为生产者的农场主与消费者城市工人处于对立状态中，农场主的利益在于食品高价格，而城市工人希望价格低些——由于物价受到价格支撑体、税收和关税的影响，这些不同点容易政治化。可是，农场主通常要买一些产品，而所有的农场市场几乎不发生变化。当谷物生产者追求保护制度时，块根植物、葡萄酒和牛奶生产者却去追求开放市场。因此，行业经济利益往往范围较狭窄。然而，农民具有与城市工业工人不同的亚文化。如果他们的经济利益确实冲突，那么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就会很快扩大他们的利益。

所以，除了庄园主的保守主义以外，很难从农业阶级及其阶层推断出任何一种必要的集体特性或政治。在大农场主和无地劳工之间，马克思最显著的阶级划分理论是最难组织的。别的冲突界限看起来模棱两可。罗坎所谓的土地对工业的矛盾尤其似是而非——实际上是信贷阶级斗争与生产者——消费者行业斗争的混合物，其中的每一方都可能是农民反对不同的敌人。当全球的资本主义改革影响到 19 世纪晚期的农业时，农民就这样做了。

农业的全球商业化

当西方经受商业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之时，农业为其提供了农产品和劳动力。铁路(从19世纪40年代)发明以后，甚至各洲大陆也在商业上联为一体。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投资资本，因此加剧了农村的分化。庄园主和富裕农民在损害公有土地、贫穷农民和教会的情况下，扩大他们可以占有的土地。正如梯利(Tilly, 1979)所表明的，工业革命中，大部分无产阶级化发生在农村。无地劳工移居到工业区和海外。由于制造业集中于城镇，农村的工业和手工业衰落了(这种情况在法国和瑞典很少产生重大影响)。《共产党宣言》预言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要快于城市工业的两极分化。

但那时，两极分化停止了。在1860年到1886年间，人口普查委员会的统计数字表明，农民并未像预料的那样消失。卡尔・考茨基在《农民问题》(1899，1988)中，提出了当代最好的阶级分析理论。考茨基看到农民家庭雇工比自由劳工受剥削要深。为了保住他们的土地，农民家庭劳作得更辛苦，消费得更少，以此度过不景气的日子。他们的自我剥削——实际是家长制剥削，男性家族头目剥削消费不足的妇女、年幼男子和孩子——以及他们不愿出卖土地，从而导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恰亚诺夫(Chayanov)宣称这是一种新的"农民生产方式"。可考茨基也声明农民家庭成员不是自主的，他们的生产与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小土地所有者或村民和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双重身份的家庭成员在大农场或工厂干白日工，在他们村舍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生产部分生活必需品(也许有一些市场产品)。小农场也培养了季节工、零工，这也是军队新兵的来源。在农民家庭、资本主义和军事国家之间已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考茨基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预想，面临着工业雇佣制，农业雇佣制将会消亡。但他认为农村的两极分化结束了。

考茨基的主张是正确的，尽管没有充分表述出来。农民为什么兴盛，也有着正面的原因。土地拥有的集中具有成本费用和效率界限。韦伯在他 1894 年的论文中指出，普鲁士容克地主为了筹集资金投入到他们剩余的庄园，被迫将土地卖给农民。这样，由于工业争夺劳动力，农业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农场工人节省资金，投到他们拥有的小块土地上；另外，庄园主的工资高于正在剥削他们住户的农民的收入(Granthman, 1975)。许多食品生产出来，其价格小庄园和大庄园是一样的。粮食产品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情况也不是这样——但是欧洲农民可以专门种植根茎植物(在德国西部；Perkins, 1981)、奶制品(丹麦)，或蔓生植物(法国南部)；农民也结成合作社来购买机器和耕作技术以及分配产品，这就驳斥了马克思“一麻袋土豆”的比喻。正如早期的发展情况那样，到 1900 年，大部分的大庄园并不是先进的农业经济而是滞后并起反动作用的——在欧洲易北河东部、俄国、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美国南部都是这样。在先进地区，庄园主、农民和无地劳工的经济共同联合成最先进的工业和金融部门。

这就导致两种有选择的农村政治：阶级民粹主义和部门性分割主义。当农场主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网络，信贷冲突加剧。凭土地(若是领主)或收成(若是佃农)作抵押可增加借贷，在美国大草原诸州，农场主抵押土地来购买铁路股份，这是他们销售能力的生命线，但是，铁路公司与银行相互勾结，耗费他们的投资并威胁着土地的赎回权。小农场主从大农场主和银行家借用资金。佃农被迫遵行谷物留置制和交谷租田制。更为贫穷的农民受到的威胁最大，尤其是在那些可分割的继承权分割了拥有的土地的地方。农民认为受到城市和农村大资本的剥削。他们要求取消或减少债务信贷，根据有利的条款借贷，对银行、铁路公司和化肥农机生产公司进行调节。这就是阶级民粹主义；基于信贷和市场的关系，韦伯式的阶级冲突，将“人民”和合作资本主义对抗。在左派联盟中，将工人和农民与相似的对手潜在地联合在一起。

但是，市场竞争使农场主的部门特性凸显。农业萧条扩散得很

快，因为生产者被迫降低价格。一个州之外的形势改善可使他们的廉价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如1880年左右美国的谷物和阿根廷的牛肉在欧洲倾销。分工细化更易受到商品市场的变化的影响。如果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如在19世纪80年代葡萄根瘤蚜虫毁坏了法国的葡萄园)或外国竞争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如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农场主提高了碾磨技术，廉价出售普鲁士的黑麦)，那该怎么办？一项政治补救措施是：国家通过津贴、贷款和关税强制保护市场。但是农业关税招致外国的报复，伤及其他产品的生产者，因此通常遭到城市制造商的反对。部门政治时常使农民和工人相互处于对立状态中，若工人是左派的，农民就倒向右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类庄园主能领导部门性抗议；而庄园主可能领导分散的和保守的运动，农民则领导部门性的民粹主义。

因而，农村的政治经济产生了矛盾的阶级和部门利益，由于债务、信贷和关税，这种经济被政治化了。从1873年起，农业大萧条加剧了这种变化。许多人认为萧条使农民变得保守，抵制危及他们生存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例如，Jenkins, 1986)。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化退潮，就没有多少农民去反对现代化。他们不需要反动或革命，而需要有限的国家介入以在短期内减少苦难，以使他们公平地参与长期的现代化。如果不满针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者如银行或铁路公司，那就可能变成激进的了。但这些不满也隐含了切实可行的政治补救措施：关税调整、信贷和互助合作。政治活动通过国家得以展开。在那方面，农民将会面临怎么样的政治具体化？

国家和农村阶级：四种一般形式

如前面各章所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代议制的和全国性的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正如罗坎(1970)所认为的，这不仅仅发生在阶级和部门之间，也发生在中央集权者和分权者之

间、教会和国家之间。代议制运动以两种方式抵制绝对的君主政体：减少中央国家权力或接受中央集权化以及分权化，既引起了政党问题，也产生了全国性问题。在这些斗争中，教会在农村尤其重要，它们为本地区动员提供了主要的基础结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有三种可能的地位：作为国教(新教比天主教更有可能)、多数人教会或少数人教会。因而，它们的地位与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不同。

尽管与农民有关的政治具体化是复杂的和独特的，但是它们在某一方面比工业具体化要简单。到 1900 年，农民是欧洲的主要兵源，大部分国家正向农民妥协(部分原因是避免工农联合运动)。因而，军国主义在农村的阶级关系中衰落，除非那里的地区民族主义激发它们。(这里讨论的国家主要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外省，而就美国南部来说，情况不大一样。)因此，我把农村的政治具体化简化到二维空间内，依据二维中任何一方的三种立场来区分它们，即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在这一时期，君主制在所有先进的国家都受到政党民主的挑战。目前的结果各国也不同，从力量均匀平衡到处于困境的君主制，再到已经被制度化的政党民主废除或由于组织政府而变得无权的君主制。民族问题产生更多不同的后果，但在我的这些国家里能区分出三种结果。表 19.2 细分了九种理想类型，尽管我的这些国家仅占其中的六项。

表 19.2　19 世纪农业国家的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

集权化对联邦主义	君主制对政党民主		
	公平竞争	弱化的君主制	政党民主制度化
大部分政党	德国	斯堪的纳维亚	法国
中央集权化者	奥地利和德国	俄国	
君主制	大部分奥地利国土	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	
中央集权化的			
民主人士			
联邦的			
大部分政党			
联邦的			美国

在这两种互相结合的政治具体化的基础上，就可以预测农村政治的国际变体。但因为我没有涵盖许多国家，也因为把国家作为单个全体来讨论只有叙述的意义，所以，我把它们简化为四种广泛的形式：

1. 政党民主(对大多数男人)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法被制度化。在法国政治组织中出现集权化，在美国是邦联制。但在这两种情形中，存在的政党被严格制度化，而新的政党包括农民的党派相当无力。但因为一个邦联国家能允许更多的地区变化，因此主要的例外出现在美国，在某些地方和州的政治中，暂时由农民政党控制。

2. 平衡竞争的力量仍在争夺政党民主，它们中的大多数赞同国家集权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这主要是独裁主义的君主制度与同样集权化的、主张中央集权的工人阶级处于对立状态。这里，大部分农民运动犹豫动摇，最终倒向右派，加入到旧制度的政党，或形成自治的保守党或为君主政体所接受的“中右”政党。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核心奥地利和日耳曼地区，这是主要的形式。

3. 政党民主仍被公平地争夺，但是在集权化的独裁的君主制度和邦联民主派之间进行的。在这方面农民政治上倾向阶级民粹主义，在农民自己控制一切的地方，通常是左派民粹主义；在他们不能控制一切的地方，它便显示出右派倾向。这种形式遍布奥匈帝国的其余地区，但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它却是一种失败的形式。

4. 政党民主仍被争夺，但是与较弱的君主政体站在一起反对同最终成功的城市自由者农民和工人联盟——双方都是集权主义者。在这里，农民倾向左派，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潜在联盟。如在斯堪的纳维亚那样，旧政体被和平颠覆，实现了社会民主；就像在俄国那样，推翻(旧政权)需要革命，农民和工人同样被迫倾向左派。目前，对在沙俄国内的少数民主主义者研究得还不充分，这就使我不能对反对邦联对手的君主制斗争予以适当关注。

法国和美国的政党民主

19 世纪，法国仍是中央集权制国家，1890 年后，其政党实现了民主制度化。它的经济是多种多样的。各地区的农业发展不同，工业化速度缓慢，并且多是小企业，这些小企业遍及小城镇，与家庭农业共有劳动力。1789 年革命者与农民建立联盟，使农民财产制度化，然而他们要求高税收，降低食品价格，还要农民当兵时，农村人口就逐渐后退。西部佃农的行动则更进一步，在地主和教权部分控制下进行武装暴动，这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Bois, 1960)。一些地区和城市共同进行了非基督教化；但在其他地区，教会加强了对学校、慈善机构、医院和社区娱乐场所等的部门控制。由于不能直接向集权化进行挑战，教权主义成为本质上的邦联主义：宗教职权的范围扩大，使国家中央权力的范围缩小。在保守的西部和激进的东南部，存在总体的区别，还有许多小的教会宗派，其中城镇和它们的内地仍被共和派和保守—教权派分成几部分(Garrer, 1973, Ⅰ, pp.515—516; Merriman, 1979)。但法国太复杂，无法细分，只能是农村对城市、农民对工人。

因而，农业萧条使农民的不满发展成不同的地区运动。在东南部，大部分农民和专业化的小土地持有者(生产葡萄、橄榄、水果或花卉等)，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1900 年后易受生产过量的影响，容易受到大种植者竞争的影响(也降低了小土地持有者的工资)，还受到中产阶级商人在价格和信贷上压榨的影响(Smits, 1975; Judt, 1979; Brustein, 1988)。1880 年后，他们从共和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结构松散的法国左派(在第十八章描述过)开始变得善于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符合信贷阶级农民利益，适应以谷交租者和无地劳工增加生产的要求。他们划出土地，重新分配，扩大税收特许权和津贴范围，提倡累进税，鼓励合作社(不是集体拥有土地)，打击垄断，在一些地区领导反教权主义运动(Loubere, 1974; pp.206—233; Brustein, 1988, pp.107, 169)。

农业萧条也威胁着右派的农村基础，因此右派也学会了政治的灵活性。当地贵族动员农民和佃农参与信贷、保险和合作计划(Berger, 1972;

Garrier, 1973, Ⅰ, pp.518—522)。教会害怕(如德国的天主教中心就是这样)对农民经济的不满可能会削弱它对部门的统治，因此也作出反应。教会的一个派别放弃了它的君主主义以及与地主的联盟，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农村社会基督教运动。

布鲁斯坦(Brustein, 1988)提出了一个关于西部—东南部的教会宗派的阶级解释。他提出：在农民所有权的地区和左派投票区之间，在中间地带和小租地(与地主土地)及右派投票区之间，这种正面关系持续了一百年。他还重新解释从前的研究(Bois, 1960; Tilly, 1967; LeGoff and Sutherland, 1983)，指出这些土地使用权的不同是农村支持或反对革命的基础。他的结论是：农民天生是左派，而佃农天生是右派。类似的，贾德(Judt, 1979, pp.113—114, 134—136, 279—280)总结关于东南部左派的研究："农民总比组成现代社会的其他群体，对革命具有更大的热情。"本章表明，对这一说法是如何概括过度了。但对法国来说，为什么它看起来似乎又是合理的?

布鲁斯坦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农民的"利益"是左派是右派。他用某种乐观的语言来描述西方地主与他们贫困依附者的关系：佃农同他们的地主一起分担"有益的冒险的安排"；以谷交租者也这样做，而实际上，他们的契约劳工比其他地方的工资更具安全感。但是，这使所有三种人所经受的剥削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一些右派政策与他们的利益相左——例如累进制和反对农村民主。实际上，正如本章总的论点，农村经济"利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比布鲁斯坦所考虑到的更具政治适应性。生产关系既涉及到利益也包括控制。积极的农场地主们对他们的依附者实施地方分割控制，这种控制在引导他们走向保守方面更具决定性。像在其他国家那样，经济和政治权利关系交融在一起注定了农民的结局。主要因为革命对地方的影响仍然存在，将这种变化的农村利益定义带进了20世纪是具有法国特色的。

美国政党民主和邦联制很早被制度化。尽管内战和失败的南方重建时期需要充分解决邦联主义的问题。但战争期间也促进了农业的商

品化(Bruchey, 1965, pp.155—158; Darhof, 1969, p.11)。 棉花和食品的国际市场刺激了现购自运的谷物生产。 东部的农场主专门从事乳制品那样的活动，而大平原和西部的农场主则从自给自足的种植变为小麦和渔民的现购自运生产。 农场主们需要运输和信贷，但易受较低农产品价格和债务的打击。 内战产生了通货和信贷缺乏、高税收、高海关税(为了保护工业)和南部农业歉收，从而使形势恶化。

这并非是不可克服的，但不幸的是，美国的政策对农场主变得不利。 像在第五和第十八章所讨论的那样，国家具体表现为资本家的自由(财产权神圣化)、政党民主和联邦制。 它的民主紧紧掌握在两个政党的手中。 民主党继承了农民的利益，但在内战中失去了权利。 现在共和党人和工业资本家控制着政权。 重新组合的全体选民与其说是由于阶级而两极化，不如说是由于地方的和种族—宗教的社团而两极化(Burnham, 1974, p.688)。 共和党人现在控制着北方诸州和联邦政府；民主党人控制着南方诸州。 为在全联邦范围内竞争，民主党人也讨好并得到了商人的支持。 他们的小农场主代表变得寥若晨星，劳动者的代表都可以忽略了。

政治上的忽视滋长了农场主的抱怨。 运输的高费用激发了对调整铁路规章制度的需求。 购买工业制品的高价格使农场主对城市工业利益和当地零售商抱有怨恨情绪。 国家银行对农场主不利，它们将货币制度还原为金本位而对商业有利。 但农场主从他们的产品中得到的钱更少，而购买却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钱，并且还要支付债务。 资金短缺增加了抵押债款，使他们依赖借款者和信贷商。 在小私有者和有租佃权的农场主之中，南部盛行的谷物扣押信誉的制度扩大到别处。 信贷阶级和部门关税之间的冲突激化。 与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同，美国的关税保护制造商，但对农场主不利，尤其是对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不利(Buck, 1913, p.21)。

因为现存的两大党派对农场主无助，他们便自主地组织起来。 19 世纪 70 年代，保护农业社的成员抱怨，低价格和高浪费，这是由铁路

公司携制造商和中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求助于一些小的第三党：改革党、美钞党和反垄断党。19世纪80年代晚期，更为激进的农民联盟抨击租佃和单一作物制，尤其是在南部，为合作社和农民交易要求补贴。两个政党对商业的控制促使它们更加左倾，与人民党的劳工团体结成联盟，该党在南部和西部最为强大，在中西部还有另外的据点，它的反垄断纲领为小农场主要求更有保障的土地，得到公司的庇护，建立一个联邦国库的“分库”保护农民免受降价和高利贷之害。

进入20世纪早期，在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下，左倾运动仍在继续发展，集中在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等州。那里的农民被迫租佃和抵押谷物，被迫种植棉花，受到由大农场主、地主、商人和债权人组成的当地政府的统治。他们与人民党成员不一样，人民党成员受到外界大都市的商业及金融利益集团的剥削，南方和西南方的小农场主和佃农则受到地方贵族的控制。因而，裂痕与其说是由部门，不如说是由阶级造成的。政治上，资本家支持的民主党控制着西南部(Rosen, 1978)，像他们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巴伐利亚的对应者一样。西南部的社会主义者倡导温和的农民社会主义。他们不把小农场主看作是资本家，而当作积极劳动的生产者。他们采取激进的阶级人民党主义——将土地给予直接生产者——在选举上和民主党人竞争。最终他们超越人民党主义，而要求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些第三党受到当地广泛的支持，赢得许多地方和州的选票(Fine, 1928; Dyson, 1986)。然而，由于两个政党的选民规模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统治，在联邦选举中，第三党未能冲垮两党政治，因此最终都趋向衰落。工农联盟对双方来说都是必要的，但共同的敌人并未产生真诚的团结。农工政党仅在威斯康辛州和明尼苏达州成功地建立起来。与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奥匈帝国某些地区的农工政党不同，为了加强相容却不同的经济纲领，它们并没有一起被排斥在政治公民权利之外。

面对着用资本主义充分灌注的政党，如此脆弱联盟的双方分道扬镳了。第十八章表明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94—1895年是怎样脱离第三

党政治的，在劳工里面只剩下社会主义党这个少数派了。农场主也分裂了。人民党被民主党合并，削弱了它的政策。西南部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开始趋弱，同时又受到地方民主党人的压制(Burbank, 1976, p.188; Green, 1976, p.382)。在南方，多种族的人民党运动反对谷物抵押制度，但由于种族界限，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这弱化和分裂了运动。南方在政治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种植园主和商人寡头的控制下。南方的国会代表们在华盛顿紧密结合在一起持保守态度，妨碍有利于保护工人和小农场主的立法。美国劳工持续不断的弱化也有助于谴责激进的农场主运动。我们再次看到了美国政府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政党民主和美国政府联邦的具体化所产生的明显的抑制作用。

在这一阶段，美国农场主运动成效不大。后来在 20 世纪，在佃农和以谷交租者运动失败后，大、中农场主的联合体在现存的两个政党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农场主的许多部门要求得以实现。

强大的君主制受到挑战：德国和奥匈帝国

如第九章和第十八章所强调的，在关于德国的描述中，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因为普鲁士人和新教徒掌握着国家政权。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政权与天主教教会的文化斗争失败后，宗教问题变得不那么直接了，但它仍然与民族问题渗透在一起。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依赖地主和资本家，再加上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变成了国家的中央集权者；它的敌人是劳工运动和当地支持邦联主义的甚至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少数派(波兰、丹麦、阿尔萨斯和汉诺威的分裂主义者)。

农民属中间力量，既不是整体的核心，也不被看作敌人。但由于把扩大的劳工运动和邦联主义者作为敌人，政府几乎不能疏远超过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此外，因为政府冒险估计广大农场主能够部分控制劳工和佃农，所以它引入了不利于城镇的成年男子投票权。农民的选举发言权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所以他们对民主的扩大持观望态度(Rueschemeyet,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ch.4)。尽管德国工人为争取

公民权利进行了共同的阶级斗争，但该国的工人和农民与斯堪的纳维亚的不相同。

因此，农民倾向于右派，但这种倾向各地区不一样，因为在东部和西部农村的条件不同。农奴制的废除使东部农奴转化为容克门下的农村劳工，但西部农民长期自由并且继续保持繁荣(Conze, 1969; 54; Brenner, 1976)。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经过19世纪中期，直到1873年经济萧条，才受到打击。这时物价下跌，债务增多，既加剧了农民和城市工业工人之间的部门冲突，又加剧了信贷的阶级民粹主义反对资本家的部分冲突。1882年以后，一半以上的德国农民成为小徒弟持有者，被迫受雇为劳工。军队兵员也受到严重打击，出现了象征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农民，如社会主义者一样，也反对受保守派支持的税率递减的间接税。但是，如果农民的不满被理解为反对土地税，而支持海关保护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那么，容克和其他庄园主就会结成一个部门性的局部联盟。他们将转向哪一条道路呢?

在易北河以东，农民在容克的局部统治下倾向于右派。但在德国的西部和天主教区，发生了自主的政治运动(Blackbown, 1977, 1984)。然而，农民在由地区和宗教引起的彼此相依的方面，也对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持矛盾态度。在普鲁士北部的路德教派支持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南部各邦的大部分天主教徒——1905年占帝国的37%——拥护邦联主义。因此，天主教徒能被他们的教会动员起来反对中央集权论的路德派旧政权和那些主张中央集权的不信上帝的无产阶级。北部路德教派的农民在抑制工业工人方面没有特殊兴趣，但却支持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然而，南部天主教区的农村却不这样。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有利于他们的决定(Hussain, 1981)。它长期忽视农村民众，认为他们注定要走向英国式的衰落。然而，1890年，它最终开展了一场农村的选举运动。在信教的黑森和其城市地盘中的农业腹地获得了某些成功，在梅克伦堡州河东普鲁士部分地区的劳工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这些地区，它的主张中央集权的社会主

义被路德派教徒接受。但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信奉土地社会化的理论的阻碍，并且它的城市选民被动员起来部分地反对农业保护和津贴，它对农民没有多大吸引力。因为大部分劳工是小土地持有者，他们希望保护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农民不理解社会民主的思想，从他们身上寻求部门性让步是徒劳的。这项运动大体上是失败了(Eley, 1980, pp.23—24，几乎没有强调它的任何成功)。社会民主党本可以做得很好，正如它的南方姐妹政党所证明的：巴伐利亚党抛弃社会化，而给农民提供抵押保护，这些农民适时地让社会民主党议员返回州议会。

作为南方人和天主教徒，南部的农民支持邦联主义。天主教中央党带头提出了南部要求。因为该党是由城市贵族领导的，所以它对农民的不满不会作出反应。在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那时它支持自由的卡普里维政府减少关税，农民投票者抛弃了它，而在威斯特伐利亚、莱茵河区和巴伐利亚组建了持不同政见的农协，它反对交权和军国主义，支持累进税制和土地保护制度。这是一个左派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盟的开端。但是警觉的中央党也形成了它自己的天主教农民联盟，调整了它的关税态度，倡导土地信贷计划。这个联盟现在衰落了(Faw, 1978)。中央党通过将自身转变为一个部分的农民政党，以及寻求平息部门性不满，重新维护了它的统治。它与北方保守主义者联盟，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保护农民。通过中央党对政府的内部影响，南部农民得到了许多想要得到的利益。

在北方，得不到农民的拥护的卡普里维政府，依靠民族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党分子。他们的农民派别现在衰落了。由大农场主支配的保守党加入其中，它拥护保护政策，并且劝诱农民加入他们的农民联盟。在新教区，保守主义者势力较弱，农民转而倾向右派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反城市、反垄断的言论变为好战的路德派教徒、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者的言论。在黑森和普鲁士的农村，犹太人容易成为债券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正是在这些地区，社会民主党人确立了初步的地位。后来，纳粹党便在这些地区掌了权(Eley, 1980; Farr, 1986)。

因而，德国农民比大部分国家的农民更偏离社会主义者。他们可能采取天主教中央党温和的“基督社会”的态度，或者是被大农场主保守主义者控制的部门性分割主义，或者是右派的阶级民粹主义。德国农民中不满的人渐渐趋向右派，这是政府的两个特征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特征引起的。首先，独裁的君主政体有助于自上而下部分分而治之的农村政治。如果贵族党派对农村的不满有所反应——保守主义者和天主教中央党就是这样做的，但进步党分子和民族自由主义派反之，他们在政体里的影响使他们便于排斥民众的党派，而且他们能使农村不满者屈从右派。其次，如果贵族党派没有作出反应，那么受到民族问题、宗教和地区的影响，自发的农民运动就会出现。北部路德派教徒拥护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化，一些有专支持国家民粹主义，有的左转为主张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在路德派的德国，极端右派和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天主教南部联盟包含着激进的农民运动的更大潜力。然而，不信神的主张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政党不是农民运动的最好代表，于是，中央党得以重新恢复了控制。第三，社会民主党人的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由于忽视了农场主对信贷阶级的不满，而进一步促进了导向右派的趋势。这些都是占优势的政治形势。

奥地利的国土主要是农业耕地，为大庄园主所控制，由无地劳工和小土地持有者耕作。极度的地主剥削、高利贷和某些省份的落后导致极端贫困和债务，向新大陆的大批移民几乎没有缓解这些问题。农民生产和信贷阶级以及部门斗争可能是激烈的——除非受到地主分割统治的压制——但关于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他们由奥匈帝国三个鲜明的特点构成(参阅第十章)。

第一，哈布斯堡王朝的人不仅是君主，而且是世袭君主，即使他们的权力有限，他们也相当专制。尽管他们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来抵制所有的民主，然后，改变策略，企图利用有限的政党民主在阶级和地区民族之间实现分而治之。1896年和1907年，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作过试

验后，政府允许成年男性选民参加主权受限的议会(在匈牙利实施滞后)。在此以前，城市自由党派和农民保守派对被剥夺选举权的农民和无地劳工几乎不感兴趣。突然给予公民权产生了群众性的农民和工人的党派，这些新党派还没有受现存党派的分割控制。他们的目标是政党民主，即议会主权。不像德国，而像斯堪的纳维亚，共同的政治反而暗地里团结了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工人和农民。

第二，由于没有议会组织教会非正式地代表了大多数外省他们现在倡导政治党派。天主教交汇在某些外省市准国家的教会，但最终他是超越国界的，而不是仅仅属于一个国家的。在其他外省，它表达了当地不满者的心声。少数新教教会更经常这么做。农民运动是反教权的或是教权主义的取决于地方教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宗教几乎从不冷漠。

第三，多数民主人士支持邦联主义(符合俄国的第三种形式)，除了在奥地利和德国领土的核心地区(这符合第二种形式)。后来，他们成了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者。这迫使君主政府更加依赖奥地利和德国人，1867 年以后，与其他民族的平民相妥协。因而，地主与劳工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经常也是“地区和民族”的，因为剥削者经常是德国人，或是受保护的匈牙利人或犹太人(在国家行政机构和银行确立了他们的地位)，然而，被剥削者通常是当地的民族。经济上的不满和民族主义相互加剧了。奥地利和德国的民主党派仍旧是中央集权者，而非德国人支持邦联主义，而后是民族自治。考虑到匈牙利人在东南部作为初级剥削者的地位，他们对此的心理是矛盾的。

因此，农村政治在地区之间变化巨大。在奥地利、日耳曼的奥地利南部，所有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围绕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世俗化，阶级和部门的划分使他们两极分化。1903 年，保守反犹太的基督社会党、天主教和人数占优势的农民，在享有特权等级的议会里占了 2/3 的多数，他们大加追求农民利益和保障债务延期偿付权，抵押限制宅地保护法和农业合作农场。他们的主要对手是社会党。该党聚集了

一些无地劳工，但实际上没有农民的选票。犹如他们德国的对应者一样，社会党人在农业计划和无用的生产论及主张中央集权的马克思主义交易方面(Lewis, 1978)影响。

波希米亚是另一个主要工业化地区，捷克工人阶级，与它的奥地利和德国同志一样，起初拥护社会党和主张中央集权的马克思主义，但随着捷克民族主义传播开来，捷克(像巴伐利亚的)社会党人就变得矛盾起来。许多庄园主是德国人，大多数天主教会卷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它使民族主义变成反教权的。所有这些都减弱了农村对社会主义的抵制。就是在欧洲的这个地区，马克思主义党最成功地吸引了无地劳工。确实在他们当中，马克思主义党的主要竞争者是民族的社会党，结合了其各称所示的思想意识(不是希特勒那帮人！)。大部分农民投向中右的农民政党，它支持捷克自治和扩大民主，但它反社会党人，对无地劳工表现冷漠(Pech, 1978)。

在比较落后的斯洛文尼亚，天主教会领导民族异己分子。大部分农民支持教会积极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党，它致力于民主改革和农民经济利益。改奉社会主义的人很少，主要在民族主义影响很少的种族混杂地区。波兰的加里西亚也是落后的乡村地区，历史上有农民起义和大量省份自治权允许波兰贵族和富裕农民剥削鲁赛尼亚的劳工和小土地持有者。波兰的民族起义因此有所抑制，天主教会立场中立，而阶级控制着政治。天主教和主张互助的社会主义各党派为农民的投票与社会党争夺无地劳工。

匈牙利在君主制度中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大庄园的比例最高，1867年后，强硬的匈牙利就贵族对帝国的控制制度化。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因此有所抑制，在匈牙利本国贵族的控制封杀了农民和工人中的阶级组织(Edclie, 1967; Macartney, 1969, pp.687—734; Hanak, 1975)，然而，萧条引起巨大灾难，农民起义在1894年和1897年两度爆发。幼稚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其中一些活动，但当激进的民粹主义的小农政党开始与地主党派竞争时，它更衰

弱了。

但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农村不满者由“地区和民族的”转而反对马扎尔人的统治。首先是新教徒，然后是天主教会领导了斯洛伐克的民族抵制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直到一战后才有些影响，民族和宗教的政治忽视了农民和无地的不满者。克罗地亚的农民反应几乎相反。其他的贵族——一个软弱的贵族资产阶级天主教统治集团——是马扎尔人最高领主的委任统治着。由于贵族们的妥协，在被排斥的大多数农民中产生了强有力的持异议的民族主义，这给农民以荣耀——他们是激进的，反教士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在所有的巴尔干省和国家，贵族和绅士被土耳其统治者大肆杀戮，因而他们的力量很弱。农民和小土地持有者控制着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

因此，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阶级生产和信贷和部门利益很少直接导致政治组织的产生。民族问题处于半公开状态的一场关于分散政党民主的讨论——影响到多种结局的产生。捷克民族不满者加强了生产阶级的斗争，形成了一个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的联盟。在巴尔干各国，信贷阶级和民族斗争相互加强，在农民中产生了激进的阶级的民粹主义。在奥地利和日耳曼人中，工业主义是先进的，而民族主义却独一无二地拥护中央集权制，这在工人之间团结了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但是像他们的德国同志一样，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落入城市工业独立小团体的陷阱之中，在别处结果更保守。除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外，民族自治的要求消弱了贵族和牧师的保守主义，但农民由于民族主义基本上偏离了激进阶级的民粹主义。城市资本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合到一块儿，正像中间派的和右派民粹主义发展。后来，与反犹太主义联合导致了一些严重后果。

软弱的君主制度受到挑战：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

在我所涉及的范围内，包括了丹麦、挪威和瑞典，因为在农民和城市社会主义者之间，他们结成了最成功的二十世纪联盟。这三个国家

经济上不同但政治上相是：很多农民被推到左派那边，首先与自由的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而后又与工人结盟。三国都有相对软弱的拥有土地的贵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使许多农村摆脱了强大的统治。较富裕的农民一般拥有共同的政治权利，这证明在整个 19 世纪，这些权力也可以扩大到教贫穷的农民身上。1905 年，在挪威实现独立后，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是相当中央集权的在种族和宗教上是相似的。他们共同的命运看起来都是类似于国家政体和政治联盟的产物，而不是他们经济的产物。像城市政治一样，农村政治也具体化为政党。

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先把农民和城市自由分子连接在一块，后与工人联合。第一，大部分小农场主是自由商人，按十九世纪的看法，他们是“自由派”。在丹麦，这是因为畜牧和奶制品业在世界市场保持了成功，丹麦的城市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也赞成给佃农合法自由，这些佃农是一个重要的半工、半农团体。挪威农民支持自由贸易，因为这意味着内部自由贸易和摆脱统治他们一直到 1905 年的外国所征的税收。在瑞典不论是大农场主，还是小农场主，更多的是保护贸易主义者。与欧洲大部分国家相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只有较少的地区冲突把农民从城市产业工人中分离出来，瑞典和丹麦的(还有法国)工业化也是有特点的，工业明显分散在整个农村，有助于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将它集中在城市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

第二，农民在斗争中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为争取政治公民权利，而反对相对脆弱的土地贵族和君主制度。瑞典自由派不成比例地来自自由教会和禁酒运动。他们与农民的联系尤其来自他们对民族教育方案的资助。随着劳工的崛起，许多日益扩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趋向右派，因为他们开始反对民主和扩散。剩下的自由派和小农场主倒向了工人社会主义党的民主联盟。因为这些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和路德教的、社会主义者最初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通过削弱马克思的生产力论正统派来对城市自由主义和农民激进主义作出反应。(丹麦社会主义者从来都是一无所为)例

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暂缓了他们从德国社会民主人那里得到的目的在于取消任何关于希望发生暴力革命的建议。

因此形成了三种政党政治：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以及许多中产阶级组成的保守党，农民和少数中产阶级组成的自由激进党，还有工人(手工的而后为白领)变成了社会民主人。介于后两者的实用主义联盟在第一次选举中获得成功，从而导致了现代文明中那种独特而成功的左派形式，即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体制(Munch, 1954, Semmingsen, 1954; Holmsen, 1956; Kuuse, 1971; Osterud, 1971; Kuhnle, 1975; Thomas, 1977; Castles, 1978; Stephens, 1979, pp.129—139; Duncan, 1982; Esping-Andersen, 1985; and Rueschemeyer, Stephers, and Stephens, 1992; ch.4)。[2]农村各阶级本身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的部门利益、信贷阶级利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公民政治利益引导他们左倾。

迄今为止，农民政治集中于经济威胁，这是对农民所有权和在政党民主和民族问题上的农民激进主义的威胁。俄国是一个特例，因为一开始条件就不具备。俄国也是唯一的一个培育了革命农民的国家。因而将俄国的政治和经济融合在一起的要求就具有明显的特点。

正如第十八章所指出的，俄国是一个专利的君主国家，直到 1905 年它才产生了政党民主。此后，仅仅是稍微提了提，现在这个政府主要是遇到城市——工业代表和地区——民族代表运动的反对。看起来国家是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关于俄罗斯帝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我们缺乏证据，而且，也许来自少数民族的农民，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分权者一样，比这里所提到的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但贵族看起来是通过地区的自地方自治机构来控制农民，这是建于 1864 年的地方政府部门，而在农村一级，历史上信奉平等主义的公社(米尔)仍然发挥作用。像法国那样，革命前，大部分贵族已不在农村。

1862 年解放农奴并没给农民带来自治，他们被以别的方式束缚在土地上，这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俄国农民，见 Pavlousky, 1930; Robinson, 1932; Volin, 1960; Wolf, 1969; Shanin, 1972, 1985; Haimson, 1979;

and Skocpd, 1979)。不像奥匈帝国，解放农奴产生了为数不多的商业大庄园。农业萧条和物价下跌，迫使农民在市场上出卖产品，还迫使市场通过出口来换取进口的工业品和外国贷款。经济压力耗尽了牛群，由于土地未被休耕，传统的三圃制造成土地贫瘠(通常质量低下)。在富农和大多数贫农之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拥有的肥沃土地太少，以致不能养活他们自己，也不能为市场生产剩余产品及缴纳国家的形形色色苛捐杂税，政体现代化计划看来只是加重他们的痛苦并使他们参加政治活动。

1905 年战争的失败，使国家分崩离析，各地农民抓住时机，机会发动起义。起义主要直接反对地主和当地政府的行政机构。1905 年，大部分农村的罢工。抢夺财产和没收土地，是直接反对土地所有者，尤其在中央黑土地区和几个驱逐了农民的大资本家庄园，一贯的支持大多来自中层农民和在城市工作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年轻农民(Perrie, 1972, p.127; Wolf, 1979)。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废除或减少地租、税收和劳务。暴力很少直接反对富农。富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劳收，而贵族则不这样。农民“那些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们有权利得到它的思想”。掩饰了宗派活动，这是农民觉悟的提高；自来外界的政治鼓励很少成功,而突袭经常由“米尔”组织(Waling, 1962; Perrie, 1972)。

1905 年革命遭到了镇压，但惊恐不安的政府建立了一个权力受限的杜马。政府和贵族土地所有者现在觉察到了农业的危险状况。政府废除了赎金，地主减少了地租并继续出售庄园土地。当农民在杜马里和通过暴动继续提出要求时，政府改变了方针。它废除了大部分的政治改革，取消了杜马中农民的代表席位，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企图在富裕农民之中发展资本主义农业。

斯托雷平劝诱农民从村社里分割他们的公地，公社被分成几部分，富农能利用这个机会，而最贫穷的农民也能分割出卖他们的小块土地，用这些钱迁到城镇或国外。中农大部分反对分割土地，希望公社保持完整。这些政府内部产生的冲突意味着分裂，几乎不能将所拥有的土

地联结成私有大农场。个体农民的条状地田公社保留完整，这仍是共同行动的强大力量之派。中农支持征用贵族和绅士们的土地，也许是它的国有化，但他们不想按照资本主义的或布尔什维克的集体主义精神模式来重新组织。当地的公社仍是他们的理想。政府对它的打击所激发的怒火于 1917 年爆发出来。

由于深受农民政治的影响，临时杜马席位被取消了(Haimson, 1979; Vinogradoff, 1979)。现在，农民被卷入与左派政党的接触。由于都一起被排除在公民权利之外，使平民阶级团结起来，转向了左派，这种情况我们别的国家也能看到。他们正统的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论阻碍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发展，但社会革命党强调更多的是韦伯的关于收入分配和信贷的阶级观点，而且他们的农民联盟在 1917 年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在 1905 年那样，政府由于战败和行政机构分崩离析而陷入崩溃，像 1905 年一样，农民起义是革命进程的中心；像 1905 年一样，中农起了领导作用，像 1905 年一样，农民骚乱的出发点是要求土地。

因而人们必须这样理解俄国的农民运动和工人一样，实际上他们被完全排斥全公民权利之外，而且政府干预当地的经济，大部分俄国农民不是独立的业主，他们也不想成为所有者。他们要求土地和共同耕作，这并非基于由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安全感，正如沃尔夫和詹金斯所坚持认为的，而是出于他们对专利资本主义的负面经历，认为对他们不会产生任何益处。和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是，在俄国，几乎没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农业，甚至大庄园也是如此。在 1917 年前后，只有俄国农民抵制现代化，仅仅是要求土地，拒绝割断与公社的纽带联系。俄国农民并不希望参与政治，但是他们为政府所迫不得不通过革命来自卫。

结论

我已经确认了农村政治的复杂性。问题不在于大庄园主，他们的

政治无一例外是保守的，也不在于无地劳工，他们的政治演变仅仅来自于他们从当地局部统治解放自己的能力。农民业主中许多是小土地所有者(dwarfholders)，为理论提出了主要问题，正如他们为当代政治所做的那样。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他们自己是一个共同体，通过有效组织来确保他们的利益——与马克思的“一麻袋土豆”理论完全相反。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既不保守(像 Marx、Moore、Paige 和 Stinchcombe 所认为的)也不革命(像 Wolf、Brustein 和 Judt 所认为的)。他们的经济要求大多含着温和的农村改革，这些改革，将韦伯的信贷阶级和局部利益混合在一起。马克思的生产阶级仅在租佃和以谷交租者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出现，并且他们有组织空间。当农业商业化时债权人——债务人阶级冲突便增多，由于部门分裂进一步加剧；因为大部分债权人属于城市资产阶级。这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资产阶级。

但是，农民一般是改革者；他们追求具体的政府干预来反对无管制的为大资本所控制的国际市场。俄国之外的农民有相似的要求：通常要求高关税，总是要减少信贷、运输和工业制品的费用，平等地占有土地和要求法律保护小领主。除此之外，农民像大部分的主张平均土权的人一样，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央政权并希望回避他们。只有在教育领域有的时候，农业工人和农民才欢迎日益文明的十九世纪末的政府。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改革者的社会主义，尽管它确实追求有限国家对再分配目标的干预。农民共同的阶级身份和利益，甚至比工人的更令人莫衷一是。

因而从右派到左派，改革运动跨越了大部分政治范围。如大多数作者所主张的差异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当然，经济差别的确重要，尤其是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所指出的那样，但与政治具体的关系更大。农民政治首先发源于他们参与和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的议会代表的斗争全国性斗争。这些斗争就使他们卷入了城市工业政治的两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对有地的旧政体保守主义的斗争，以后是工人对抗资本家。他们也卷入了关于国家如何民族化和集权化的

斗争。因为农民在地区上是分散的他们通常支持分权的地区运动。

教会在农民政治中的重要性主要不是由农民巨大的宗教狂热引起的，尽管宗教狂热分子在许多农民运动中站在前列。更确切地说，它的根基在于在相对分散的联邦国家里一些教会和农村人口的共同利益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十八章)，在工人政治中也有这种情况，宗教和地区(最终在奥地利的“民族”)的农民政治是交合在一起的，政治上，构建于产生于全球农业商业化的农民的身份和利益。关于国家公民权范围的扩大，也经常使他们感到自相矛盾，这一时期，它的重点放在国家提供或调整民众的教育上。

农民很少形成政治多数派在农民占多数的地方，他们的权力被有限的特许权和议会主权限制所弱化。他们需要四个主要阶级部门联盟中的一个或更多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旧政体的保守派资本家或工人。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他们与所有四个部门都结成联盟：在北德和旧政体的保守派，而后与资本家；在瑞典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而后与工人；这四个联盟在法国都出现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有许多正在变化的联盟。农民看起来与任何人都联合——这是第三个原因，除了他们的人数和实用的中庸，这就是构成了这整个时代关键左右不定的投票的原因。

为什么农民选择或偏离一个联盟而不是另一个？信贷阶级的部门特性和反对方的定义是易变的。反对方和联盟可能选择他们自己。工人是一个问题众生的联盟。尽管农民和工人经常把公司资本家当作敌人，他们的要求很少统一，除了要求较低的累进税和较少的征兵。有时候，农民与工人的要求互相冲突，如在要求关税，降低土地税和农业产品的高物价方面。更常见的是他们仅仅是意见不一致。右派和左派的城市工人运动经常忘记有他们自己要处理的事情。据称，保守派错误地假定指望用传统方式对农民实行分割统论，但是农民业主几乎不接受他们得不到好处的统治，左派政党通常是些更糟糕的违犯者。与实际出现的相比，本该有更多的农民左派主义，更多的工农联盟。左派自身实质上应受指责，受城市产业工人聚居区经验的蒙蔽，它将重点放

在工会互助合作的需求和争论生产者的社会主义。

最糟糕的冒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他们的生产力主义在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也受到批评，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有实际后果。马克思主义党对社会发展本身持有一种以制造业为中心的观点。他们认为农业正在垮掉，而农民将要被无产阶级化——这几乎不是个农民热心的消息。即使实用理论家如考茨基和列宁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观点中解放出来。因为制造业生产的权威性和他们自己被排斥在独裁主义国家的公民权利之外，马克思主义党发展了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社会主义。这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几乎很小。大部分农民支持分权的邦联国家，在20世纪晚期之前很久，在东方和西方，工人拒绝中央集权的经济统治，而农民也不理睬它。

这里，工人运动正在犯它最致命的错误。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是非武装的，并且，在除英国之外的每个国家都是少数派。没有农民联盟，它不能对付其阶级敌人的挑战。然而生产者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思想，体系阻碍的就是联盟。工人在毁掉实现革命变革的机会。没有农民，在另一个五十年它的进步将很小——按英国的方式，直到最终农民数量的解减少，结果被大量忽视了，而且，可能太晚了。在20世纪，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所留下的是列宁和斯大林伟大的令人不快的机会主义。他们领导农民和农民起义，反对中央集权的独裁政府和军国主义，使他们服从生产者所主张的，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甚至有高度独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捷克和法国部分地区，人们追求和建立工农联盟。这有特殊的环境因素，第一，他们的国家在早期就变成相对民族的，这儿没有严重的分权化和农村人口中的邦联运动(在捷克地区农村人口指低于省和国家的饮食标准的人)。第二，在瑞典、丹麦和法国，农村里也发生了工业化。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之间有较少分离；实际上，在家庭内部，他们互相渗透。在瑞典和丹麦，这鼓励了社会公民权利观点的传播，这种

观念由非马克思的社会党人支持；在法国，它鼓励思想体系的宗派主义。在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两种分离的政治政党运动，一个是工人的，另一个是农民的。在别处，这个结果是可能的。在大部分国家，人们可以听到并热烈讨论生产力论和主张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但到最后，它们消失了，它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正如一些旧政府犯了致命的错误而灭亡，而别的政府可以学习和借鉴，工人运动也是一样。当革命者犯了错误，他们通常得付出生命。

因而，右派的错误，尤其是左派的错误，其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农民没有找到现存的合意的政党，他们就形成自己的政党，如美国人民党(不成功的)和各种奥匈农民组织(某些很成功)，此外，还有符合主流的党派，如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最后的名称)，与之可比的法国各党派，它们认识到了农民支持的重要性(尤其当选举权扩大时)，因此修改他们的党纲来赢得选举成功。

经济问题几乎不决定农民政治，尽管它主要推动了政治行动。恰恰相反，国家具体化解释了农村斗争的主要特色，其中农民追求他们的利益，没有认为政治简单地决定阶级斗争，而是从某种最终意义上权衡经济对政治的变化因素。相反，结果由(1)和(2)决定，(1)是阶级和部门利益的潜在相反性，受资本主义基本相似的全球商业化的影响；(2)是在代议制和全国性问题上的相似性与政治具体化相互作用，用根本不同的方式，把农民与国家政体和政党联盟联系起来。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后果，与我的结论极其相似。

注 释：

[1] 本章的研究是我和 Anne Kane 一同进行的，我非常感谢她。关于我们研究的完整的文章已经出版了(见 Kane 和 Mann, 1992)。

[2] 与丹麦和瑞典相比，这些总结不怎么适合挪威。挪威的经济更具有部门性变化，它的人民讲的语言多种多样，并且这鼓励了地区和宗教的重要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有在 1935 年，社会民主党人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与农民联合。

参考文献

Anderson, P.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Bairoch, P., et al. 1968.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Editions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Barral, P.1968. *Les Agrariens Francais de Méline à Pisan*.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Berger, S.1972. *Peasants Agains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lackbourn, D. 1977. The Mittelstand in Germ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871—1914. *Social History*, no. 4.

1984.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871—1914.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4.

Bois, P.1960. *Paysans de l'Ouest*. Le Mans: Vilaire.

Boyer, J.W. 1981.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enner, R.1976.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no. 70.

Bruchey, S. 1965.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New York: Harper & Row.

Brustein, W. 1988.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Regionalism: France, 1849—198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ck, S. 1913. *The Granger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bank, G. 1976. *When Farmers Voted Red*.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Burnham, W. 1974.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tics of heterogeneity. In *Electoral Behavior: A Comparative Handbook*, ed. R. Rose. New York: Free Press.

Castles, F. 1978. *The Social Democratic Image of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onze, W. 1969. The eff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liberal agrarian reforms on social structure in central Europe. In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789—1914*. ed. Crouzet, Chaloner, and Stern. London: Arnold.

Danhof, C. 1969. *Change in Agriculture: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82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vring, F. 1965. *Land and Labor i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Hague: Nijhoff.

Duncan, S. 1982. Class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creation of the rural and urban questions in Sweden. *Research Papers in Geography*(University of Sussex), no. 12.

Dyson, L. 1986. *Farmers' Organization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Eddie, S. 1967.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leadership in Hungary, 1867—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

Eley, G.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Change After Bismarc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spingn-Andersen, G.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rr, I. 1978. Populism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easant leagues in Bavaria in the 1890s. I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ed. Richard J.Evans.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easant protest in the empire-the Bavarian example. In *Peasants and Lords in Modern Germany: Recent Studies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ed. R.Moeller. Boston: Allen & Unwin.

Fine, N. 1928. *Labor and Farme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8—1928*. New York: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Fischer, F.W., et al. 1982.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Vol. 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Munich: Beck.

Garrier, G. 1973. *Paysans du Beaujolais et du Lyonnais, 1800—1970*.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Gerschenkron, A. 1943.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odwyn, L. 1976. *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ntham, G. 1975. Scale and organization in French farming, 1840—1880. In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 ed. E.L.Jones and W.N.Park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een, J. 1976. *Grass Roots Social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H.R. 1971. *Rural Denmark and Its Lessons*. London: Longman Group.

Haimson, L. 1979. Introduction: the Russian landed nobility and the system of the third of June, and Conclusion: observa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the Russian countryside(1905—1914). In *The Politics of Rural Russia*, ed. L.Haim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nak, P. 1975. Economics, society, and sociopolitical thought in Hungary during the age of capitalism.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9.

Hicks, J. 1931. *The Populist Revo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obsbawm, E. 1989.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Hohorst, V.G., et al. 1975.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Vol. 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unich: Beck.

Holmsen, A. 1956. Landowners and tenants in Norwa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Hovde, B. 1943.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1720—1865*. Boston: Chapman & Grimes.

Hussain, A. 1981.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Vol. 1: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 . London: Macmillan.

Jenkins, J.C. 1986. Why do peasants rebel? structural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of modern peasant rebell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Jonasson, O.G. 1938. *Agricultural Atlas of Sweden*. Stockholm: Lantbrukssaellskapets.

Judt, T. 1979. *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e, A., and M.Mann. 1992. A theory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grarian politic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

Kausel, A. 1979. Osterreichs Volkseinkommen 1830 bis 1913. In *Geschichte und Ergebrisse der Zentralen Amtlichen Statistik in Osterreich 1829—1979*. *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550.

Kautsky, K. 1988. *The Agrarian Question*. London: Zwan.(First published 1899.)

Kuhnle. S. 1975. *Patter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London: Sage.

Kuuse. J. 1971. Mechanisation, commercialisation and the protectionist movement in Swedish agriculture, 1860—1910.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Le Goff, T.J.A., and D.M.G.Sutherland. 1983. The social origin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western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99.

Lewis, G. 1978. The peasantry, rural change and conservative agrarianism:

Lower Austr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81.

Linz, J. 1976. Patterns of land tenure, division of labor, and voting behavior i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8.

Loubère, L.A. 1974. *Radicalism in Mediterranean France, 1848—191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yashchenko, P. 1949.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Macartney, C.A. 1969. *The Hap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alefakis, E. 1970.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gadant, T.W. 1979.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and F.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edvedev, Z. 1987. *Soviet Agriculture*. New York: Norton.

Merriman, J. 1979. Incident at the statue of the Virgin Mary: the conflict of the old and the new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moges.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ed. J.Merrima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1897. *Statistique agricole de la France; résultats généraux de l'enquête decennale de 1892* . Paris.

Moore, B., Jr. 197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Mouzelis, N. 1986. *Politics in the Semi-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an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unch, P. 1954.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Norway: a study in class and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

Newby, H. 1977. The Deferential Worker. London: Lane.

Osterud, O. 1971. *Agrarian Structure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Scandinav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ral Response to Economic Change*.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Paige, J. 1976.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Pavlovsky, G. 1930. *Agricultural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ech, S. 1978. Political par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1939. *East Central Europe* 5.

Perkins, J.A. 1981.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1850—1914.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0.

Perrie, M. 1972.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of 1905—1907: its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57.

Raeff, M. 1966.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Robinson, G. 1932.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kkan, S. 1970. *Cities, Elections, Partie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Rosen, E. 1978. Socialism in Oklahoma: a theoretical overview. *Politics and Society* 8.

Rothstein, M. 1988. Farmer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numbers, gains, and losses.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Rueschemeyer, D., E. Stephens, and J.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ndgruber, R. 1978. *Osterreichische Agrarstatistik, 1750—1918*. Munich: Oldenbourg.

See, H. 1929. *Equisse d'une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aris: Alcan.

Semmingsen, I. 1954. The dissolution of estate society in Norwa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

Shanin, T. 1972. *The Awkward Cla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Russia as a "Developing Society": The Roots of Otherness—Russia's Turn of the Century*, Vol. I. London: Macmillan.

Sked, A. 1989.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psburg Empire, 1815—1918*. London: Arnold.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H. 1975. Work routin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a French village: Cruz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

Sorokin, P. A., et al. 1930. *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ephens, J. 1979.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London: Macmillan.

Stinchcombe, A.L. 1961.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rural class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Thomas, A. 1977. Social democracy in Denmark. In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d. W.Paterson and A.Thomas. London: Croom Helm.

Tilly, C. 1967. *The Vendée*, 3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1979. Did the cake of custom break?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ed. J.Merrima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Tomasevich, J. 1955. *Peasants,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Yugoslav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Census Bureau. 1910. *U. S. Census, 1910*.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inogradoff, E. 1979. The Russian peasantry and the elections to the Fourth State Duma. In

The Politics of Rural Russia, ed. L.Haim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Volin, L.1960. The Russian peasant: from emancipation to kolkhoz.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ed. C.Blac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kin, J.1962.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 New York: Praeger.

Weber, E. 1978.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is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 E.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第二十章

理论总结：阶级、国家、民族及社会权力的来源

本卷有两个总结性章节。这是第一个，从第七章遗留的地方开始，概括了现代两个主要权力运作者——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在此期间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因为所涉及到的五个国家(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以及美国)各不相同，我必须在一般概括和肯定特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但是因为历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得出了它自己对漫长的19世纪的结论，所以最后一章将分析那次战争的根源，举例说明该卷书的理论基础并证明其合理性。

正如我们所知，国家和阶级、民族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我将不再概述我关于国家的研究成果，相反，我愿让读者参看第十四章的结论。在这里我只重复一个基本观点：由于国家通过18世纪后期军事扩张和19世纪后期工业资本主义扩张而变得更具社会性，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给西方社会和阶级"赋予了国籍"。

阶级和国家

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西方正逐渐实现工业化。而英国和比利时早就完成工业化了，大多数国家的工农业之间是均衡平稳的，农业也彻底商业化了。资本主义已经极大地加速了人类集体权力，这些

权力主要是分散性的，它们席卷了这个多重权力运作者的文明社会。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突进提高了各个阶级和男女两性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人们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并使寿命延长近一倍。尽管分配不均，但是利益分布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大多数权力运作者都赞同权威性权力机构应该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拓展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范围。资本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化同样也扩散到整个西方。

资本主义也改造了各国的权力分配关系，造就了历史上规模空前广泛的政治阶级。首先兴起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随后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所有这些非统治性阶级都是随着集体组织权威性权力的扩大而兴起的。所有这些阶级都认为(尽管利益不同)他们受统治阶级和政治体制的剥削，并且所有人都共同发动了寻找选择办法的抗议。这对马克思和其后的大多数追随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它对统治阶级和统治政权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马克思未能预料到权力分配冲突的后果，这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 因为资本主义主要是分散性的权力组织，所以它的权威性阶级组织从一兴起就带有基本的两难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是异质的。如果没有社会权力其他来源的介入，它们和统治阶级及统治政权的冲突会是局部、温和和排他的。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他们之间的许多妥协甚至合并，都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农业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发展的异质性，造就了三个相互竞争的集体组织：即“生产阶级”、“信贷阶级”和一个经济部门(与大土地农场主结成部门联盟，它们的对手通常在另两个方面)。无产阶级也造就了三个集体组织：阶级、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多种集体组织，在这些集体组织中尽管生来就带有马克思所预料的辩证冲突，但是毫无疑问阶级决不会占上风。

2. 这三种竞争的经济组织相互争夺的结果主要由更具权威性的统治阶级和统治政权的战略或趋势所决定。毕竟，它们控制着现有的各个

权威性国家和武装力量。假如它们把精力集中在新出现的阶级对抗上(正如我们所知，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大多数统治阶级和政权就会制定一个有效的对策。这是很常见的。我曾经指出，哪里的阶级斗争相对明朗——也就是说，哪里能产生马克思所预料的能导致革命的那类激烈的阶级对抗——那么，那里的统治阶级和统治体制就能最有效地利用更大的制度化的权力去镇压和瓦解它们的敌人。我认为，革命只发生在那些统治阶级及政权被多样化的、非辩证的但相互交织的斗争所迷惑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对付激烈劳资冲突最有效的统治政策是一方面通过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一些工人和农民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对剩下的工人和农民进行镇压。用这种手段它们就能瓦解革命或激进改革所必需的阶级团结。这三种工人组织形式的同时出现削弱了整个阶级，因为它要求对工人的领导权，而其他两个组织则没有要求。

3. 继而，统治阶级及政权的政策或趋势以及工人阶级自身主要由其他三个社会权力来源决定。我请读者参阅第七章，我对截止 19 世纪 30 年代或 40 年代的经济斗争的总结。其中我强调了分散性意识形态，特别强调了权威性军事权力，随后是政治权力的来源。第十七—十九章对后来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作了更具政治色彩的解释。因此，在 1900 年前后，遍布西方的劳资冲突后果由(1)和(2)的相互作用决定：(1)基本相似的资本主义全球扩散导致了各种集体组织和利益关系的普遍混淆；(2)各种权威性国家的成形，即意识形态、家长制、军事，尤其重要的则是它们的两个公民定型，即“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

4. 这种相互作用不像台球那样的独立个体之间的碰撞。阶级、部门、地区都和各种权威性政治形式“非辩证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样有助于彼此相互塑造。运作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不为其所知的情况下被行动的意外后果改变了。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运作者们易于犯“影响全局的错误”。第六章证明 1789 年法国政府是如何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其敌人正在兴起和发展的本质，而犯了毁灭性的错误。第十五章阐明了相反的情况。非同寻常的是，统治国家的统治阶级“辩证

地”面临着单一的、完全同质的阶级敌人——宪章运动。在与敌人面对面的对抗时，他们没犯错误，坚决镇压激进分子，用更强大的市场力量把工人逼向地方主义阵营。最后几章揭示了在马克思主义或路德主义影响下极富成效主张中央集权的劳工运动所犯的更持久的世界历史错误。他们尤其不能理解农民斗争所特有的复杂性，从而把潜在的农民联盟变成了敌人。

这四个决定因素彼此之间不只是表面的。它们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相互塑造着彼此的形式。各种政权战略动向、议会和全国公民的斗争、意外后果、各种错误，它们的关系都源于它们根据背景加强阶级、地方或部门特性的方式。阶级、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继续争夺对工人和农民精神的控制权。从它们和生产方式的关系来看，十分矛盾地把这一时期工农业中的斗争联在一起，可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当然，长期存在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确实削弱了阶级运动所需的广泛团结的基础。在一个没有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与资本相比这可能会永久地削弱劳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将会防止革命的甚至激进改良主义的后果。但是，资本主义栖息于一个国家林立的世界中。在这个时期，权威的议会定型和民族政治的定型往往是无意间促进了阶级组织、地方组织和部门组织发展的矛盾趋势，或使之倒退，尤其当它们冲击工农联盟时。阶级不是纯经济性的；国家也不是纯政治性的。

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都估计过高。它们的分散性权力超过了权威性权力，对于后者它们更依赖于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并被其塑造。尽管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二者极大地加强了集体权力，但是个别权力——社会分层——却改变得不太多。现代阶级关系受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农业商业化刺激而兴起，但是它们沿着内在的矛盾运行轨迹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后果都由很早以前就被制度化了的权威性政治成形所决定。

为什么国家是各式各样的？查尔斯·梯利提醒我们欧洲国家源于

中世纪的各种形态——领地君主制、松散的国家—领主附庸人际关系网络、征服的国家、城市国家、基督教城市国家、城市联盟、市镇等等。虽然梯利列了一张近代早期国家形式衰落表，因为领土国家逐渐稳定下来，并开始占上风，多样性依然存在，崇信基督教的国家的分裂也增加了宗教的多样性。国家尤其在中央和各个地方之间关系上各有不同。1760年，英国圣公会是相对同质的中央集权，吸收了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新教教徒，但是却有一个毗邻的帝国殖民地，即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但却与地方当局有着十分独特的关系(法国的地方也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宪类型)。信奉路德教的普鲁士是君主制和贵族地方统治结合相当严密的国家。天主教国家奥地利是一个邦联君主制国家，包括各种信仰地方宗教的少数民族和语言。美国是一系列独立、扩张的殖民地。所有的国家大体上都不一样，各国都是地域性的，其地域又各具特点。

农耕经济强化了领地特权，而工业经济则削弱了领地特权。今天，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英、法、德三国的经济活动极其相似，因为现代经济使大多数自然产物多次变了样。但农耕经济依赖生态环境——依赖土壤、植被、气候和水——这些条件都是因地而易。欧洲的农耕生态差异很大，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凌乱的资源总汇”。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民族”经济变得更加相似(见第十四章注释)。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寻常的分散性权力组织形式，而国家基本上是权威型的。尤其是在国家的工业阶段，逐渐从领地特权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以极其相似的形式遍布西方。它的分散性权力也完全允许集体运作者和个体运作者“自由”选择其他的战略和没完没了的竞争。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大土地农场主可以作各种地方安排，以允许阶级、地区和部门战略继续竞争。但是国家由于其本质即社会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权威性地进行分配和制度化。尽管各党派和国家精英可以争论并削弱国家凝聚力，但是必须权威地制定有关民权、选举权、中央集

权政府、征兵、税收、联盟等等的法律。

现代政府首先把欧洲的许多领地特权制度化了。然后当面临两个普遍的管理问题浪潮时，政府便极大地扩展了。而这两个浪潮则源于18世纪日益加强的军国主义和持续到1914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此期间，政府变大，与社会相联，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发展的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政府扩大的角色中，它们首先解决了在更加“地域化”的时代中形成的特殊制度。在扩张的第一阶段，军国主义和这些相互作用在每个国家都造就了各自的“现代化”制度：美国使其独一无二的宪法制度化；法国使与其宪法冲突的地方制度化；英国使旧政府自由主义制度化；普鲁士使半专制主义制度化；奥地利(不那么成功)则试图给它的王朝主义赋予更具基础性的渗透力。由18世纪军国主义和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引发的各个现代国家，这以后极大地增强了其社会意义。因此，在早期年代和军国主义阶段互动中铸成，现代国家现存的权威性机构的权力构筑，也成长起来。大约19世纪30年代之后，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吸收了工业社会能够抛向它们的几乎所有东西。

在我所谓的“间隙中兴起”和“制度化”之间，出现了与马克思的阶级辩证并行的又一种辩证。因为社会由多样性的、重叠的互动网构成，它们终年造就了自然产生的新兴集体权力运作者，这些新运作者和旧运作者之间的关系仍没被制度化，但紧接着就会变成制度化了。阶级和民族是同样优秀的新兴运作者。它们令统治阶级和政权大吃一惊，现有的制度并非针对它们而设计的。相反，统治阶级和政府用为时间上更久的、区域上更特殊的目的而设计的制度勉强应付。各国的发展不是从根本上去对付新兴的阶级和民族(而是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然后促进工业化)，但是它们扩大了机构承担了大部分控制社会的压力。这样它们便日益决定了阶级和民族的结果。

在第十七章和十八章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即美国、英国和德国劳工运动分散的发展。这里我只重点论述两种类型的权威性权力，即国

家代议制形式成形和军国主义成形(如果想了解更完整更充分的解释，请参阅第十七、十八章)。18世纪的英国已经形成民主政党的雏形主要是为了把“法庭”和“陪审团”、王朝和宗教冲突制度化。英国也缺少一个有效率的国内军队(爱尔兰除外)。因此对付新兴的中等阶级主要依靠国会，而且国会确实起了作用。到1820年，普鲁士已经把主要发生在皇家政府和军队中的贵族与专业人士的冲突制度化了。这也有助于政府把中等阶级制度化，尤其是当军队在把普鲁士变成德国的过程中获得合法地位时。接着德国政权也创造性地利用了有限的民主政党，它也改变了中产阶级的右派倾向。美国政党民主主要源于使大小农场主之间的关系制度化。美国的军事性和准军事性组织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屠杀印第安人。

当无产阶级兴起时，这三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政府对待无产阶级的方式大相径庭。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具有“天生的妥协性”(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它们的镇压多于妥协)，也不是因为德国是独裁主义国家，更不是因为美国患了精神分裂症。三国的大多数资本家和政治家都希望同一件事：既维持现有秩序又保留特权。但它们有不同的权威性政府机构，而这些机构早已着手履行这些任务。英国有各种竞争性政党和选举权，选举权和阶级分界线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动，而且还会发生变动——但国内军队的变动不大。德国已经把分而治之的政党政策制度化了，不包括各种激进党派——它们拥有大规模军队；军队的力量炫耀已经有了相当的国内法定地位。美国人拥有竞争党派——但他们也拥有具有国内镇压经验的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因此，类似的新兴劳工运动被各个不同的有效国家机构以不同途径疏导了。英国产生了温和的互助主义；德国则在反动的政府、资本主义和貌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了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冲突；美国产生了更大的暴力活动、地方主义和小规模的社会主义。

在所有这些冲突中，国家机构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比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兴起缓慢得多。适用于世界历史这个阶段的理论模式——普遍

弥散的资本主义和更独特的权威性国家机构相互交织在一起——是一种“政治滞后”的理论，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述的国家机构理论中梳理出的。在这个时期，各个国家机构之间的变动促成了形形色色的“集体劳动者”。这给断言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某一套决定资本主义和劳工之间权力关系的理论画上了问号，无论这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集体劳动者比这些理论所说的更具可塑性，顺从于(或不能改变)一些政权，且能以许多形式成形。

的确，这个时期比近期发达的资本主义似乎使受政党民主支配的更复杂的阶级关系制度化了。纵观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独裁政权十分坎坷。独裁政府和半独裁君主制作为统治策略已经从西方消失了，尽管类似的非君主制政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大多数西方理论认为，随着“工业主义逻辑”、“民主时代”或“阶级斗争制度化时代”——各种现代化理论形式的产生，这种多样性的减少和独裁主义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苏维埃集团专制社会主义的突然瓦解激励了进化论。但是存在这样的逻辑吗？为什么沙皇专制、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大部分的现代化政权——都灭亡了？是它们走人歧途并设计了一套可行的、取代政党民主的现代权力关系吗？这些问题有待在第三卷中回答。但是这里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因为独裁政权把军国主义更直接地用于阶级调和中，这可能使它们易于在战争中灭亡。在开始评价它们的可行性时，大战的根源就变得至关重要。

各种国家成形的复杂性也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战争。当代权力运作者发现很难控制结果，正如我们发现很难解释这些结果。权力运作者的许多行为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经常是意想不到的。阶级斗争——农业的、工业的、或这两者的——并不是按它们自己的纯粹逻辑进行的。它们和意识形态、军事、政治权力关系，自始至终都交织在一起，这些关系又反过来塑造阶级自身。现在当国家军国主义强化时，这些关系甚至变得更复杂了。第二十一章追溯了这种大变动介入的源头。

民族和国家

第七章介绍了关于国家的四段式理论的前三个阶段。宗教和商业的资本主义——主张国家主权的阶段出现在这卷开始的时间段之前，只属于我所谓的“早期民族”。然后是在第七章中详细论述的军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造就了作为真正的、在某种程度上跨阶级的和偶尔激进的运作者的民族。但是民族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国家强化的(例如英国)、国家创造的(如德国)、国家颠覆的(如奥地利各地)。现在我又总结了这些不同民族的第四个阶段，即工业资本主义阶段。

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阶段。它的阶级斗争及其对国家的影响促进了民族的兴起。国家第一次承担重大的民事干预功能，资助交通系统：负责运河、公路、邮局、铁路、电报系统，最重要的是建立各种学校。国家主要是回应主要由资本家，但也由其他阶级，即军事集团、国家精英所提出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需求。因为几乎所有各方都重视日益增长的工业社会集体权力，它们敦促国家向着社会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接着，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又增强了社会交流的密度，但受国家领土范围的制约。我们看到社会行为——甚至亲密的社会行为如性道德——变得“自然化”，更具民族同一性。不知不觉地，大部分国家行为促使民族成为一个经验老到的社会，把内在的、情感化的家庭邻里组织和更广泛的、机构性的权力组织连接在一起。

民族不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地方主义仍然存在，正如民族内存在着地区的、宗教的、语言的以及阶级的屏障一样。而西方意识形态共同体和全球资本主义也保留有跨国组织。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军国主义、大众语言文化和工业主义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密度，为更加民族化、更加跨国化的组织留有空间。

民族也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共同体。普遍的、跨阶级的民族必定要涉及到各种公民权概念(尽管类型不同)。但是这些概念孕育着19世纪两个支配性政治定型，引发了“代议制”问题——谁应该是完全的公民——和“民族”问题——公民权应该被限定在哪里，也就是说，国家和民族的中央集权化程度如何。我一直在强调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并且和代议制一样是有争议的。很少有国家以在民主上的同一性为开始时期：大部分国家包括带有不同宗教和语言社区的各个地区；而且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政治机构或自己的政治历史。

国家扩张的军国主义阶段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强化了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18世纪末增强了的军国主义财政和征兵的后果导致了更严重的代议制压力，但在民族问题方面不同的定型，从雅各宾派革命者尝试的中央集权制到大多数奥地利持不同政见者主张的联邦制，各有不同。但是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加强了更代议制化社会和更民族化社会的压力。“自然化”特别有效，因为它是不知不觉在意外的缝隙中产生的，因此难以抗拒。它既包括情绪原因，也包括方法上的原因，微妙地改变了隶属集团的观念。

但是国家扩张在工业资本主义领域仍存有争议。尽管多数国家基础设施的扩展得到各方的共识，但是大众教育与少数派教会和地区语言社区产生了冲突。如果少数派教会在地方上扎根，这就会强化颠覆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在爱尔兰或奥地利的一些地区)。教育的扩展也能传播一种微妙的反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观念。在来自新兴阶级的逐渐壮大的代议制压力下，没有一个中央政权能够简单地把它的语言强加于有自己本地方言的行省。例如，在波希米亚行省的教育扩展，传播的是捷克的而不是奥地利的民族情感。相反，在“大德意志”和意大利，教育助长了跨过现有国界向外延伸的一种民族主义情感。因此，据上所述，民族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促进了民族的三种不同类型：国家加强的民族、国家创立的民族和国家颠覆的民族。

根据各地情况，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也刺激了民族的三种类型。

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在本地方言环境下成为有文化的人。这使现存的国家进一步自然化，或者把国家分裂成了许多更常见的地区性民族(国家分裂)或超国家民族(国家建立)。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要求政治代议制，其结果又是不一而论的。截止到19世纪末，大众化民族——以三种形式——在所有欧洲国家，调动了中产阶级、农民及工人。

在这个阶段，民族也变得更激昂更好战。这种激情主要源出于国家和家庭里交流的强烈的情感范围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其中国家教育和身心健康基础显得十分突出。意识形态把国家视为母亲或父亲，家庭观念得以彪彰。好战是因为所有的国家继续被定型为军国主义；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所有国家都是军国主义者，一些国家从国内角度来说仍然是军国主义的。

在镇压它们的帝国主义政权不能授以地方—民族自治权和代议制的地方，颠覆国家的民族主义日益采用暴力手段。尤其是如果宗教强化的地方，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会展开激烈的、情绪化的反抗。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地方社区生活强化了与剥削他们的民族的差异感。压迫民族反过来认为用国内军国主义对付他们是理所应当的。每一方都在煽动另一方的激情和暴力。

因此，当非代议制的帝国政权开始失去其镇压手段时，颠覆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有了最大的激情和狂热。把阶级关系尤其是地方—民族代议制制度化了的西方国家并没有经历狂热的暴力运动，甚至当其被根深蒂固的种族争端所困扰时也没有出现狂热的暴力行为。比利时和加拿大可能会分裂，但也可能不会发生伤亡之灾。相形之下数百个北爱尔兰人被杀害，因为这个地区从来没有把少数民族社区的代议制制度化，而是隔离了两个社区的密切生活。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现正在遭到杀戮，或许将来在不止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处在独特的语言社区，有时是宗教、地方社区，(许多社区有它们自己的历史上的政治机构)之间的代议制政府制度化。颠覆国家的种族暴力是独裁政权，而不是政党民主制的产物。在漫长的19

世纪就是如此。今天看来仍是这样。

国家强化的民族主义暴力主要集中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1900年，大约40%的国家预算仍用于备战。用战争作威胁仍是这些国家外交的中心。军人的英勇仍是男性文化中受重视的部分；妇女被尊为未来战士的养育者。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正在变的拥有更多的代议制和更加民族化。人们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农民，有时候甚至是工人开始认为自己同反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本国政府拥有同感的利益和荣誉，从而支持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一个敌对的阶级理论则着眼于这些国家代表的是什么人。它的结论是全体政治公民，主要是中产阶级，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旧政权的联盟的基础。确实，我曾强调过的资本主义利益的概念，在这个阶段也被纳入了假定的"民族利益"的范畴。

然而，总的来说，我对这些对抗性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在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民族社区的一员(即把它社会化成共同种族，甚至共同的"人种"的神话)与支持任何国内外民族政策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人们在激烈争论有关民族代表什么的大部分观念。在法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如共和主义者、君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强烈而感情激动地坚持"法兰西"含义的敌对观念。但在英国内陆大众民族过去激进的"新教"观念，现在变得更世俗了，与更保守的帝国主义观念进行斗争，而且一些自由主义者还提出了一种更温和的帝国主义观念。在每个地方只要经历过国内军国主义突然死亡的少数民族和阶级，普遍反对军国主义，尤其反对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在任何国家，正如阶级理论家所指出的，完全的公民更可能支持他们的政府并对其军国主义更有认同感。但我也证明了国家的外交和军国主义仍是秘密的，躲开了民众团体的监督，不论民众有没有公民权。因此，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确实，任何强硬的对外政策的支持)实际上不能在多数中产阶级团体中深入地传播——尤其不能在名声不佳的小资产阶级中传播。

但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已经扩大了它的号召力。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使各国得以发展延伸出两套大纲即民事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罩住

了民族社会。千百万管理者现在靠政府为生；上百万青年被部队军官训练成特有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即是强迫性的，又得到其拥护，这是现代大众军队的特点。这两个男性团体以及他们的家庭——不是更广泛的阶级和社区——是多数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超级忠诚派"，对他们所设想的国家理想具有极端的忠诚。由于各国的理想各不相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军国主义者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英国的文职官员可能会倾向于自由主义理想；法国的文职官员倾向于共和主义理想；德国和奥地利的文职官员则倾向于较具独裁性的理想。但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军国主义的，它们的公务员通常至少可以为一种表面上是"自卫性的"军国主义而战。

所以在工业资本主义相对短暂的第四阶段，民族按着三个基本途径发展。首先，大部分人口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国籍，使民族变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和情感依附的广泛社区。因此，我所谓的"民族性"组织在较大地消耗了地区性和地方性组织(除非当时变成国家自身)较少地消耗跨民族组织的情况下增长起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民族之所在。第二，许多公民——在这点上源于中上层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区和语言社区——被进一步引向民族主义组织，把民族利益和荣誉看作是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和荣誉的必然冲突。第三，实际的民族主义核心不成比例地源于国家在文职和军职雇佣方面自身的扩张。然后国家的理想在公民家庭中产生很肤浅的共鸣。结合在一起，他们能动员民族剩余的人。正如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中所见的，问题是民族人口更加被束缚于牢笼中，而这个牢笼和其他民族牢笼的关系不是由作为整体的人民界定的，首先是由秘密的国家精英和军队精英，其次是由民族主义者界定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会出现，但基本上是不为构成民族的大多数人所知道的。

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强化的民族被简单地描述为三个同心的环带：外层由全体民族国家圈定，并依附于全体民族国家，中层和内核联系更紧，内核即国家主义。漫画家的作品较为贴切和生动地表现了

民族的状况，民族被描绘成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一个黑色的、带着导火线的圆球。这根导火线由主张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者构成；导火线由全体公民构成，他们肤浅的侵略性压力忍耐了很长时间，足以引发爆炸，这是军事政府向外掷出的爆炸物碎片的巨大威力，强制地约束着工人和农民。然而，导火线需要火种。

当欧洲没能控制住欧洲各国的传统军国主义时，火种出现了。当民族主义和阶级，有时候和宗教、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时，它的破坏性尤其厉害。极端民族主义者会和市民阶级和宗教混在一起，把未获民族公民权但想获得的那部分市民——工人阶级和地区、语言、宗教少数派——视为民族国家的敌人，在德国称为“国家的敌人”(Reichsfeinde)。但我的理论模式并不把这些最极端的人看作“非理性的恶魔”。为了预告第三卷：纳粹——可以看作只是欧洲主张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更极端的例子，他们的出现我已经在这里说明了——更具暴力、更具独裁性、更加种族主义。他们代表了三种西方国家的形式——军国主义、独裁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极端的结合方式。他们受到来自“叛逆的”、“超级忠诚的”前线部队和国家雇员超常的核心支持，并且他们的意识形态在路德资产阶级和德国农业人口中得到最大的共鸣。

迄今为止，我不是在叙述一个民族国家兴起的常见的进化故事吗？这个民族国家不断加强它的主权、基础权力及民族动员力。显然国家主权被拓宽加深了。但是我怀疑这些后来扩大的国家是否真的和18世纪末的英国和普鲁士国家那样团结一致。因为随着更多的社会生活被政治化，其冲突和混乱也得以政治化。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政党和国家变得更具多形性。到1900年，政治涉及到外交、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政治经济、中央集权制、世俗化、大众教育、福利政策、禁酒、妇女选举权以及许多具体问题。政治使国家精英反对群众政党，阶级反对阶级，部门反对部门，教派反对教派和世俗国家，边缘地区反对中央，男女平等主义者反对父权制——以及许多其他的对抗。比较之下，18世纪的政治是相对简单的。国家仅仅处在一种过渡阶段，获

得了现代成形，而没有抛弃所有传统的成形吗？ 对于半独裁君主制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的确如此，那里的国会与宫廷对抗，派系在各部门纷争，并最终在君主面前争宠。 但是在各国，外交政策都最终产生了独特的结晶。 外交主要是由少数几个旧政权家族左右，与受民族主义限制的阶级和群众政党有一些隔绝，尽管偶尔由于民族主义政党有所缓解。 军官集团通过把官僚职业和旧政权的阶级成分及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保留了自主权。 军官和军士成了军事特权阶级，与市民社会和公民国家有些隔离。 更普遍的是，虽然民主主义、官僚主义和合理的预算都力求确立整体一致的政治优先权，但是到 1914 年它们仍然极不完善。 甚至现在民主主义对外交和军事的控制依然薄弱。 很难把整个国家视为单一的内聚实体，更确切地说，多元精英和政党以混乱的不同方式彼此混合在一起。

纵观 20 世纪，随着国家职能继续拓展，政治成形也进一步多样化了。 今天，美国在限制堕胎问题上，可以在一个星期里成形为保守的家长制天主教国家，下一个星期在调节银行储蓄贷款丑闻问题上则成形为资本主义，再下一个星期在不是为了国家经济利益而向海外派军的问题上，则成形为超级大国。 这些不同的形式很少协调一致或辩证地统一，通常它们只是各不相同。 它们调动这些不同的，甚至是重叠的交叉的权力关系网，它们的解决方案往往造成一些彼此意外的后果。 我作品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社会不是体系。 我们的整个社会历程没有终极决定性的结构——至少，没有一个是身处其中我们能够识别的。 许多历史上的国家精英受特殊的社会集团——君主、教士或武士——的控制。 他们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又不受社会生活的限制。 他们的国家体现了系统特征，这些特征恰恰源于他们自己的特殊性。 但当国家变成圆心和赖以调节社会生活的半径时，便失去了那种系统性的内聚力。

多形性已经证明是现代国家的永久特性。 当国家变成物质和利益、意识形态、亲密的家庭生活、以及外交、战争和镇压的重要管理者时，许多政党在政治上就变得活跃了。 在考察不同的具体国家时，我

列出了它们的主要成形，并证明它们如何以非系统、非辩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些成形构筑了阶级和民族的真正身份，而又通常不为运作者所自知。在第二十一章中，我按照实际的事实研究这个问题，“达到了顶点”。

社会权力的来源

这一卷继续支持在第一章开头陈述的基本命题。为在人类社会“终极”结构方面——至少就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时空范围而言——作出重要的、但非唯物主义的总结，有可能要在马克思和韦伯之间穿插。在讨论了所有条件之后，我们可以划分出两个主要阶段，在这两个主要阶段中，从 1760 至 1914 年的西方社会的整体构筑都表现为以二元性为主。

第一阶段，大体上从 18 世纪延续到 1815 年，分散性的经济权力关系和权威性军事权力关系支配着西方社会。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革命持续的影响使欧洲及其殖民地能够支配全球；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国家完成了早期由教会开始的大众语言文化的扩张，广泛深入地超越阶级界线增加了社会密度。资本主义加强了人类集体开发自然的能力，它扩展了人口，推动了广泛阶级的兴起和工业化进程。军国主义在有争议的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上使平民社会包括它们的阶级、宗教、语言社区都政治化了。军国主义壮大了大国，灭亡了小国。

此后，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双重统治的主要产物)，抛弃了它那微不足道的历史框架，在夹缝里兴起——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料到它——凭它自己的权力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权威权力组织。18 世纪末，公民权斗争已经结构化，因为各国政府已经把增加税收和征兵的冲突制度化了。19 世纪，资本主义继续革新集体生产力，因为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变得越和平，军国主义在各国就变得越多变(尤其是在国内)、越“隐秘”，

有如封闭的城堡。这样，19世纪中叶以后，二元决定论的第二阶段就出现了。一个占优势的(虽然不是完全的)分散性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权威性民族国家就成了西方社会的主要的重组者，前者提供了基本相似的推力，因此如此分散(并因为所有国家都这样渴望)，后者——主要通过复杂的代议制形式和民族形式——提供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权威性解决方案。

因为在两个阶段中的两个主要改革者不是互相撞击的台球，而是相互交织的，而且因为它们造就了相互渗透的新兴集体运作者——阶级、民族及现代国家，再加上它们的对手——这不可能强化它们的相互关系。也不可能赋予它马克思所崇尚的那种赞誉，说它是具有唯一"终极意义"的社会操纵者，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仍然是二元性阶段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这个文明像任何以前的文明一样接近单一普遍的发展过程。在其他时代或地方还没有支配自然和支配其他文明的人类集体权力扩展得如此广泛迅速。除了处在前沿的具有权力优势的蒙昧主义者和无意识的革新者外，其他时代或地方的权力运作者，没有对如何增长权力有这样清晰的认识。几乎所有人所渴望的、称心如意的未来模式，以最新最现代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形式、军事职业化形式、科学思想意识形式变得伸手可及。因此，其他时代或地方还没产生出如此多的进步和进化的理论。

但是对单一的社会有机体来说，发展不是一元的或系统的，而是"内在的"。甚至现在这也不是进化。我们可以原则上抽象出单一理想型的资本主义"逻辑"。我们可以称之为"边际效用法则"或"价值法则"。我们也可以抽象出一个军事主义的"逻辑"。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敌人的武力。但是一旦我们在第一阶段听任双方自如，而且一旦在第二阶段我们再加上混乱的更多形的国家，那么理想型逻辑对它们的坚持者来说，便变得不纯和模糊了。我强调市场的相对"效率"(即纯资本主义的)对领地(更多军事的或政治性的)利益概念，在这个阶段从始

至终一直很模糊。竞争的政治经济依然是加强集体和个人经济权力的貌似合理的手段。通观这个时期，可以看出一些世俗的趋势：趋于更资本主义工业化、军事职业化、政治代议制化、国家官僚化、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发展。每一个都和其他的结构安排竞争并“获胜”——不是最终意义上的，而是作为一个明确的趋势。在此期间它们的胜利或者是因为对广大权力运作者更具吸引力，或者是因为它们真正变得更强大，但是这些趋势没有一个从单一“逻辑”中兴起，民族国家受到所有趋势的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也是如此。

尽管我把“终极”简化成(大体上的)两个二元定论阶段，但我还必须加上防止误解的说明。社会权力的其他来源也有其分量，更排他也更不稳定。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宗教和语言社区(后者在该时间内被其他权力来源赋予了更大的集体权力)与现存的国家界线不一致的地方。意识形态权力在法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时刻”对阶级和民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军国主义在西方对付世界其余国家并在保留专制君主制的对内政策和美国的对内政策上，仍很重要。军队等级制度为了它自己的“世界历史时刻”也在 1914 年 7—8 月遮遮掩掩地炫耀武力。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的一般概括仍很粗略。

也由于这些原因，西方个别权力关系对当前的权力运作者来说，仍然不清楚。利益和荣誉的身份认同和观念被不止一个互相交织的权力来源和行动的意外后果微妙地改变了。也由于这些原因，个别权力关系也仍然是客观地含混，任何人都很难揣摩清楚。经济运作者作为阶级、地区、部门同时出现，使得国内分层的前景不明确。它的国家现在是二元的平民—军人国家，每一个 Reichshalf 面对着不同的方向，受精英和政党之间不平衡权力的控制。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西方同时对一系列部门的民族国家“社会”和更广泛的跨民族文明妥协，各种意识形态，如和平与战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宗教；种族主义——都在民族和跨民族之间摇摆

不定。对这一矛盾心理系统没有任何解决方案。但是这里有一个更特殊的矛盾心理。大部分含混状态，在现实中得到了解决，并且所有这些矛盾心理的运作者和意识形态有助于解决和实际干预了大战。所以，到最后，我们本末倒置了。

第二十一章

经验主义的巅峰——超越巅峰：地缘政治、阶级斗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卷在分析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达到了经验主义的巅峰。该大变动结束了那个时期并极力阐明我的现代社会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社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后果明确地决定了20世纪的命运。查明战争的原因对理解现代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这次战争也引起了令人震惊的迷惑：这次战争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任何一次战争。它作为道德教训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它的根源和屠杀。几个世纪以来支配世界的欧洲多国文明几乎自取灭亡。它给人以希望的主导哲学，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在1914年8月一个令人疯狂的星期里被消灭了。那些主导强国眼睁睁地走向灭亡或加速衰落。大家都认为表面上理性的实践者，即那些外交家和资本家，把他们的技术用于战争，而战争几乎毁灭了他们。那流血成河的四年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或人类社会是有理性的吗?

有无数的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外行能给论述战争根源的庞大文献里补充些什么呢？我对历史文献的综合不会比乔尔更高明。但是社会学家可以做出一些有特色的贡献：关心基础社会模式和通晓一般社会理论。甚至经验主义历史学家也意识到理论有助于查明战争的根源。

大多数争论集中在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是基本根源这一问题上。那些赞同国内根源首要性——内部政治首要性(始于德国的争论)——的

人已经在前面几章中划分的六个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中的两个因素中找到了终极根源，即经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经济帝国主义下，所谓的对资本的需求会产生民族主义经济竞争和战争。在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所谓的对外侵略作为统治策略可以缓和国内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那些宣称外交政策是首要性的人——现实主义或外交优先——也分裂了。“宏观现实主义”学派强调整体的地缘政治逻辑，这些逻辑是由代表大国的政治家表达的。战争是解决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理性方案。地缘政治危机的“微观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则类似于我在第三章中加以分析的国家理论“混乱”说，强调国家的松散性和易犯错误性。微观现实主义指出特殊的地缘政治结构导致不可预见性、危机和错误估计。那些强调混乱甚至更坚定地抵制所有有关战争理论的人，把战争归咎于纯粹偶然性或人类的非理性。

习惯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社会学学者，能给争论中内部的一方补充概括的才能。确实，大多数社会学学者对研究内部表现出职业上的兴趣。把社会变革归因于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因素是我们的惯用方法。但是，这个独特的社会学学者，承认外部政治的重要性。他也将把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交织起来作为他一般社会理论的一部分，用以阐明多种权力网络对基本多形国家的影响。1914年事件并不是根本上源于国内结构或现实大国利益的逻辑。它们也不是源自人类的非理性或偶然性。主要由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谈到的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重叠的权力网络中的四个权力，它们互动的意外后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四个权力网络是：阶级、“政治家”、军人和民族主义政党(第五个是特别压力集团，虽在殖民政策上很重要，但几乎未被算作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因为这些权力网络以不同方式与不同的政权相互交织，再加上错误估计和意外后果，大国之间也就很难相互理解。1914年，它们“非辩证”的交织达到了本卷所描述的权力进程的社会大变动的顶峰。

滑向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两种冲突的“核聚变”为开端。首先是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制和其持不同政见者南斯拉夫之间的巴尔干冲突，而南斯拉夫受其邻邦斯拉夫塞尔维亚的援助和斯拉夫大国俄罗斯的保护。其次，是两个大国阵营之间的敌对，即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三国同盟和俄罗斯、法国、英国三国协约之间的敌对。在每个阵营中，另外两个强国都保证，如果其盟国受到攻击，就会得到它们的援助。虽然意大利和英国没将自己的军队正式投入战斗，但都期望它们作出些支持。巴尔干冲突很难协商解决。或迟或早奥地利都将竭力打垮它的令人讨厌的塞尔维亚邻居。但是为什么这也应该是强国联盟之间的世界战争？在总共持续了仅仅一个月的一系列事件之后，“核聚变”发生了。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者弗兰兹·费迪南大公，在奥地利行省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市被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地利的调查证明该阴谋由塞尔维亚政府集团策划(虽然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承认此事)。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于恐怖主义的足迹暗暗地深入到富有同情心的各个政府里。然而当时这是很罕见的，甚至引起了更严重的暴行。在它的盟国德国的支持下，奥地利政府于7月23日给塞尔维亚下了一道严厉的最后通牒，要求如此控制塞尔维亚的政治运动，以至于会侵犯它的领土主权。塞尔维亚恳请德国给予帮助。如果俄国或奥地利采取行动，两个联盟就可能会卷入其中。

各大国能意识到地方危机正变成重大危机。7月25日，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做出和解的答复，但奥地利一心想要一决雌雄，拒绝接受调解。同一天俄国开始讨论动员其军队反对奥地利，并求助于协约国。从技术原因上来讲(后面将解释)，军事动员是迈向实际战争的一个步

骤。7月28日，奥地利在德国怂恿下，对塞尔维亚宣战。奥地利的进攻准备进展缓慢，为调解留下了时间。但是德国和奥地利表现得对此没有一点兴趣。7月30日，沙皇命令驻扎在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俄国军队总动员。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迅速援引了双方的条款。7月31日和8月1日，奥地利(既反对俄国又反对塞尔维亚)、德国(既反对法国又反对俄国)、法国(反对德国)随后进行了军事总动员。8月1日后，各国相继宣战。8月4日，德国入侵法国和比利时，战斗在西线开始。英国于8月6日加入战争。8月8日意大利宣布中立，但1915年加入协约国一边。

这样，一些大国在危机中表现得比其他国家更具侵略性。塞尔维亚、德国、奥地利发起挑衅行动，而德国和奥地利实际上则是侵略。一些人把这次战争视为奥地利和德国的责任(泰勒 1954：527；拉斐 1965：268)；另一些人则单指占支配地位的合伙人德国(斯通 1983：326—339)。然后是俄国，它对塞尔维亚的鼓动是挑衅性的，它的军事总动员是战争逐步升级的媒介。作为最后一个参战的国家，英国的直接责任相对较少。但德国宣称英帝国主义是使大国处在不稳定性之中的。1914年，德国政府通过把罪责从眼前危机中转移开去来证明其“侵略”是合理的：德国正在保护自己以对付强国长期营造的包围圈。德国只要求获得一块平等的“阳光下的地盘”，而英国和法国不愿德国与其分享。战争植根于英国霸权之上。我考虑并主要反驳这个论点。不过，英国受到“指责”，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没能向德国发出一个明确的威慑信号，而直到7月30日德国依然指望英国中立。法国只不过支持它同俄国的联盟并捍卫其自身安全，就如它早已声称的那样，尽管许多法国人赞成通过战争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法国的秘密外交政策亦有可指摘之处。

那么，这就是查明直接原因的优先次序：略过不太重要的国家塞内加尔，我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德国和奥地利上，之后是俄国，再次是英国和法国。前三个国家是专制君主制，后两个国家是自由主义政权。

这就提出了有关代议制国家成形的显而易见的内部政治问题：与政党民主制相比，君主制就有些特别危险吗(记住我把英国划归后者，而非前者)？ 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问题的深度是显而易见的。 几个根源的过程迅速交织在一起。 一个特殊的结构性冲突——在奥匈君主制中民族主义者相互斗争——超级大国的对手和开明的君主制军国主义，这两个一般性结构问题熔和在一起。 这些交织的过程造成了两星期内形势的急转直下：忙乱的外交、奔波的军队、误解以及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接着是五日之内世界战争的爆发。 因为这种战术混乱的特殊深层结构，所以内部和外部因素就结合起来。 由于这场战争是为公认的地缘政治理由而战，所以我就从外部政治开始进行简单分析。

现实主义者的大战理论

受现实主义支持(实际上，得到所有合理的选择理论支持)的外交史，根据由“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统帅解释的国家地缘政治利益来寻找战争的一般根源。 它作了三个假设：各国有各自的“利益”，或者至少政治家们表达了这些利益；国家利益之间一直在相互冲突；如果有危险，战争就是维护利益的惯用手段。 战争总是一个潜在的结果，因为它是达到国家目的的合理手段(除非它变得太具破坏性，因为核战争时代已经来临)。 为解释真正的战争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何爆发，现实主义补充了第二层分析。 战争爆发或是因为强国有意识地挑起战争，以重建国际秩序(宏观解释)；或者是因为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大国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导致战争(微观解释)。 在宏观情况下，侵略者理直气壮地认为战争是合理的；在微观情况下，战争仍是合理的，但处于环境条件和人类知识的较低层次——当任何政策抉择都带来危险时；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世界中的运作者共用了现实主义的假设。这涉及两个前提：

1. 如果政治家体现了运用不同假设的社会身份，现实主义就不会起作用。显然，政治家确实体现了社会身份，而不止是自己国家中立的标志。但是这些身份可能没有什么差别，或者它们可以暗中破坏现实主义者的假设，劝说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参与。最终，他们的社会身份确实可以说服他们自己作为现实主义者参与。对人类来说，现实主义者的预测越不具有普遍性，政治家的著作就越能体现某种社会身份。尤其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因为，正如第三章中所述，在现实主义者的外交中有两个动机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民主荣誉感实际上是混合在一起的。

2. 政治家必须是有责任感的权力运作者，但在实际上却受政策和事态的左右。如果他们是其他权力运作者的傀儡，或受宗派化的其他权力运作者压力的折磨，他们可能不会像现实主义者那样参与。理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他权力运作者的特征。

本章说明社会身份实际上倾向于在政治家中间强化现实主义者的行为，但是混乱的宗派压力过分加强了这种趋势，导致了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完全无法理解的后果。

第十二章证明 19 世纪政治家的主要身份和旧政权一样。他们是君主的白人男性亲属和受庇护者，来源于贵族、绅士、“旧”商人集团，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宗教和地区社区。在共和国中，他们不是来自不同的“显贵”家族，而是来自残余贵族、旧乡村士绅或富有的“旧”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民族”目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由其阶级鲜明的反动目标和其他依附社区界定。这很清楚，例如，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及以后不久，当时“国际秩序”意味着像法国一样镇压社会改革运动，而且当时的外交被社会意识形态大肆渲染。就在 1914 年之前这也仍是真实的吗？

大多数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相信社会身份在政治家们的估计中没

有什么关系。许多身份已经使政治家们完全失去个性，授予他们一个相当显贵的头衔——他们就变成了权贵——这样就在外交文献和外交分析中形成了诸如“德国侵略”、“英国啰嗦”等等完美的常规辞令。在背后隐藏着真正的社会身份的转换。除了俄国和奥匈帝国，政治家们现在正式代表的不是封建王朝而是民族国家。“国家的理由”变成所谓的“民族利益”——在涂尔干追随者的意识中这是公认的，甚至是“神圣的”，这个目标和物质利益的估算不同，并且优于后者。正如凯南所说，公子王孙的犬儒哲学消逝了：“在[民族国家]自己看来，它羡慕自我陶醉的观点。它的象征总是要求最高的尊敬；它的事业值得最大的牺牲；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这些都不是有限的目标。”(1984，pp.256—257)

通常国家甚至不用“它”指代，更确切地说，国家被人性化，大写成基本的权威形象，这就是母亲或父亲。根据语言习惯，出现了把温柔气质安在国家身上的风俗——因此，在英国和俄国是“她的”利益、道德、荣誉、尊严和民族安全，在日耳曼人的祖国则使用“他的”。奥地利政治家与众不同，使用更古体的“君主”作为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的代表。政治家之间的交流中，通常也指政治家和国家这两类运作者，以及指首都和外交部或大使馆馆址两个地方(凯赛道或威廉大街)。由其政治家运作的、人性化的国家(母亲或父亲)落户在其首都的外交部大楼内。民族国家也有神圣的象征，尤其是国旗和国歌。公众游行表现出的行为像在教堂里一样：虔诚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全神贯注的地站着)和强烈的情感(热泪盈眶，满腔激情)。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仍是——神圣的。

因此，通常不能像算计物质利益那样仔细地算计民族利益。它们通常不能清晰地交替反对其他利益。如果不能不知不觉地带来这些利益，就根本不会带来利益。有效规范的团结和偏见，像非正式的英裔美国人联盟或为所有这些列强所分享的对非白人种族的蔑视，位于深层，很少被表达出来。当讨论殖民地或谈判贸易条件时，外交家确实

承认地区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在这里经济压力集团扮演了它们最强硬的角色。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没有参与边境地缘政治的讨论。因此斯通(1983，p.331)作了略有夸张的评论：外交文件和该时期的私人信件“仅仅表示对权威、战略、高层政治的关注。”正如我们所知，“荣誉”至关重要。

运作者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全社会中多么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一个比较有思想的参与者，俄国将军基洛依夫，1910年在他的日记中吐露心声，他总结这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我们像任何强大的国家一样奋力拓展我们的疆域，拓展我们的‘正统’道德、经济和政治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Lieven, 1983, p.22)。虽然基洛依夫通过给“正统”加上引号，稍微拉开自己和该词的距离，但是他最终“理所当然的”给该词增加了分量。因为大多数参与者确实如此，地缘政治可以更接近合理的现实主义体系，包括共同的规则和信号。残存的旧政权和跨民族主义甚至加强了现实主义的假设。亲戚关系和全世界的贵族文化仍和政治家们结合在一起。尽管大多数人用他们的母语写作，但许多人用至少三种语言讲话。他们的公文里夹杂着法语和拉丁文的时髦用语。他们通常能彼此很好地理解，尽管我们将看到他们对彼此的国家了解甚少。

19世纪末，地缘政治也把追求的“民族利益”系统化了。“地缘政治”在19世纪80年代由凯杰雷创造出来用以表示“把国家想象成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科学——充满活力，受空间限制的强国，按照明确的政治重要性行动，通过殖民吞并和征服拓展其空间”(Parker, 1985, p.55)。地缘政治学家当时界定了四个“关键的”(这个词意思是“生活必须的”)民族利益：

1. 捍卫国家的领土高于一切；

2. 通过正规的地缘政治帝国主义或作为友好联盟或国家代理人的保障来扩展对领土的控制；

3. 利用19世纪革命的广泛权力确立全球战略控制的殖民范围和海

军范围；

4. 通过在大国体系中运用经济和军事权力来保证前三个“关键”利益。

这些目标体现了利益和社区鲜明的中央集权的领土观念。我们在地域上被界定为国家的成员，而不是地方地区或跨民族集体的成员，获得对未来领土而非市场的控制权，可能会在集体利益的界定和评价上占主导地位。政治家们并不拒绝市场获得和利益，但设想这些东西会随领土的扩张滚滚而来。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民族利益服务。地图室成为外交部和最高统帅部的中心，地理学家成了国家权力的学术仆人。外交家彼此心知肚明当权者会按照地缘政治行事，根据领土的地理位置和他们的政治能力所带来的领土的主要经济和军事资源，对其他国家的这些资源施以压力。皮套裤和地图是帕默尔提出的这些旧政权地缘政治的简明特征(1983， p.xi)。

并非所有强国都同样致力于领土扩张，而且没有一个为寻求这个目标而排除其他所有目标。德意志帝国刚刚统一，就出现了有关领土贪欲是否得到满足的讨论(俾斯麦的论点)。实际上，在1871年到1905年间与其军事实力相比，德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当的妥协性，因为美国政客没有把美国土著和“黄种人”算作完全的人，他们相信其自身是爱好和平的，并且在对西方列强的关系上也是如此。英国很早以前就已经构筑起它的帝国，现在只希望维持它，并确保英国的和平和海军演习所展示的影响，由于割去了阿尔萨斯—洛林，法国的利益在新领土范围内缩减了。所以英国和法国的政客们觉得还是采用较少的领土权力理论更可取，尤其是海军上将马汉的海权论只要求殖民地港口和中途港口——“非正式”就不是正式的帝国(Mahan, 1918， pp.26—28)。地理学家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盛行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另一学派则主张以法国为首的强调地区、边境的渗透性及国际合作理论，这是早期论述过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理论。

然而，综观漫长的19世纪，国际基础权力和民族公民权的增加弥

散了身份和社区的“民族”感。地缘政治作为集体利益的“账户”变得越来越受欢迎。麦克金德把马汉、领土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论证世界历史是在大陆人和海洋人之间的循环冲突。哥伦布曾经将优势建立于海洋人一方；现在铁路又将优势赢了回来。俄国或普鲁士命中注定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已经是地缘政治学家牟取私利的场所。在19世纪90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们疯狂争夺贫瘠的非洲领地，它们结成了有承诺的正式联盟。到1914年所有的政治家都认为在地缘政治上和全球范围内，它们的“民族利益”概念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

伴随着公民权、民族主义和神圣的地缘政治利益，现代民族国家应运而生，这就明显地加强了现实主义者的假设。政治家更可能按现实主义者的方式行事，比如说，如果他们正竭力去压制自由主义(正如他们以前所做的那样)。那么现实主义在诠释1914年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学解释的帮助。但许多现实主义者并不赞成这一点：摩根索(1978年)把战争归咎于政治家们操纵的危险的权力平衡体系，这样，无论政治家具有什么样的其他身份和动机，它都可以在任何年代发生。然而，罗斯克莱司(1986， pp.86—88)却指出是强化使然。他认为许多领土更大更多的国家，民族主义广泛流行，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创造出更多的“军事-政治化”的民族利益的定义。尽管如此，在分别估量权利平衡或军事政治化的世界前景时，两位作者还是同意富有侵略性的地缘政治思想是系统的，看上去像是现实主义的。我仅仅希望证明地缘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一致性及系统性比上述任何观点更加软弱无力得多。

导致1914年战争的所谓系统的、现实主义大国格局是什么呢？自1815年后地缘政治已经有所变化。然而，如在第八章中所描述的，俄国和英国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防御上固若金汤，觊觎着最大规模的欧洲扩张路线——俄国进入亚洲，英国横跨向西的海上交通线。英国的商业势力也相当于我所说的准霸权或特殊霸权。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及奥斯曼帝国。在该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外交稳定依赖

于英国和俄国，依赖于特殊的英国霸权和共同协作以及全部六个权力关系网络中的权力平衡。到1910年，英国仍主导潮流并领导贸易，但它在工业上逐渐落后于德国，而德国已经击败了奥地利和法国并在欧洲大陆上占主导地位。法国逐渐在衰落，奥地利则衰落得更迅速，土耳其更是病入膏肓。俄国在防御上仍是牢固的，在亚洲还在扩张，在欧洲则进行现代化，但它的政权很不稳定。

在两个阶段出现了转变。首先，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至1902年前后，存在两个分裂的冲突领域。欧洲大陆中心的强国奥地利、德国及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反对从侧翼包抄的俄法协约。德国和法国在莱茵河岸为敌，奥地利和俄国逐鹿于巴尔干，现在随着土耳其的灭亡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在全球范围内，每个强国都是独立的；然而冲突主要是在英国、法国、俄国(在亚洲)之间展开。但是德国及其海军的崛起，以及1905年对日战争中俄国的失败，导致了重新组合并进入第二阶段。英国解决了和法俄两国的主要分歧后，部分加入了协约国，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许诺。这就是1914年，除了意大利宣布中立之外(后来加入协约国)现实的国际组合格局。

最早的现实主义学派宣称，地缘政治最主要的逻辑来自这些转变，该学派提出了犀利的反诘：世界秩序中的这些根本变革怎么能不伴随着战争呢？不正是这些列强的兴衰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和日俄战争吗？在世界历史的其他时期发生在权力平衡上的类似改变不是已经被战争验证了吗？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些变量中推算出1914年的两条战线吗？不正是俄奥在东方的敌对造成巴尔干地区的不稳定吗？不正是英德在西方的敌对把巴尔干争端演变成世界战争的吗？不正是德国对俄国现代化的恐惧——德国已经达到恐惧的极限，这种恐惧可能是相对衰落的开始——导致1914年德国首先在两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把两条战线上的战争连接成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吗？

宏观现实主义承认在解释1914年7月真实事件的困难。在滑向战争时，几乎没有多少可贵的真实材料可供利用，相反却是大量的人为编

造的材料。这样第二代混乱的微观现实主义学派强调的就是形势迅速变化的不确定性和错误估计。失误当然很多：德国领导人对英国中立和法国军队的恢复力估计失误；英国的警告声响不大；俄国拙劣地修改其动员决定；奥地利则在蛮干。阿尔伯蒂尼关于六、七月外交的不朽巨著(1952、1953、1957)说明上述所有这些失误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格雷、沙泽诺夫、贝特曼、贝希托尔德以及其他人的愚蠢自负和误解，战争本可以避免发生。

但甚至在这样的外交混乱中，都有微观现实主义的模式。正如摩根索(1978, pp.212—218)所强调的，一个权力平衡体系，尤其是以联盟为基础的权力平衡体系诱发了内在的不确定性，大国不能完全预测同盟或假想敌的行为。因此，尽管体系要求平等的权力，但是每个大国都必须会全力争取优势赋予的安全地带。但是由于体系是动态的，并非任何大国都可以以同样速度增长它们的权力，先发制人的战争(在相对势力恶化前发动战争)本来就具有使权力平衡的可能性，大国承认这种潜在的合理性。如果列强们在平衡中失去自信，其中一个强国就可能发动战争。

在日益恶化的危机中，决策制定也可能变得越来越狭隘。因为列强们不能预测其他国家的行动，它们在更狭窄的范围中进行选择。然后它们的选择波及其他强国，令其选择范围更狭窄。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引起了外交的旋转直下，并最终导致战争爆发。侵略战争开始于巴尔干，接着它的后果波及其他列强，反过来，它们的反应通过外交链环反弹回来。因为最初的运作者进一步运动，战争部分地成为它们行为的后果。是刺杀大公的凶手还是塞尔维亚或奥地利应该对五千五百万欧洲和美国人的死亡负责吗？加夫里洛·普林西波至死仍不明白他开枪的后果。接近原因链的开端，孤注一掷的运作者冒险把局部战争作为两个选项中损失较少的一项，这是直接明显的罪恶。大规模战争可能不会发生——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国家的不确定反应。

因此，奥地利政治家决定，不惩罚塞尔维亚会促使其他持不同政见

的民族主义者转向造反。当局不能在耻辱中生存，即使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总参谋长康拉德宣称："君主制已经被掐住脖子了，被迫选择要么让自己被勒死，要么作最后的努力捍卫自己，抵抗进攻"(Albertini，1953，Ⅱ，p.123)。俄国当局肯定赞同这种说法，允许惩罚塞尔维亚以防鼓动恐怖分子。这也是德国政治家的观点：奥地利是它仅有的可靠盟友，必须允许其存活下来；巴尔干争端应该被限制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这个责任推卸给了俄国。俄国当权者感到在保护塞尔维亚时，被迫以武力相威胁，但是也期待调停解决争端。

只有到了7月25—28日，当时俄国显然没有让步，各大国瞪大眼睛面临着一场大规模战争。奥地利和德国找到了为战争冒险的新理由。奥地利的国家领导人感到进退维谷：要避免战争，现在该是它们而不是塞尔维亚要作出让步，这使民族主义者得寸进尺。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双方领导人似乎不愿意妥协。但德国政治家们使奥地利变得更强硬。球踢到了德国的身上。德国政治家们对俄国人的过激反应有点恐慌，但是现在受到先发制人战争的诱惑。令人惊讶的是俄国人尽管意识到三国同盟中的德国将保护它的盟国，但似乎还是愿意对奥地利甚至是对德国作战。如果俄国集中全力最后一决雌雄，从德国的观点看，最好在俄国军队现代化完成(1917年)和奥地利进一步削弱之前马上开始行动。德国的力量已经达到顶峰，将会被永久地剥夺其在阳光下的地盘吗？外交大臣贝特曼—霍尔韦格沮丧地说，"未来属于俄国，俄国越来越壮大，日益恐怖的噩梦笼罩着我们"。贝特曼和德国总参谋长毛奇(不是1866—1871年的胜利者，而是年轻的那个)，曾谈论过对先发制人的对俄战争的"风险估算"(Stern, 1968；Jarausch，1969)。他们可以指责俄国"侵略"。指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影响其他大国，也能影响国内民众的看法，尤其明显地是能影响犹豫不决的英国。

现在英国的反应变得至关重要。对于德国来说，同法俄较量是成败参半的风险，和英国较量也几乎是自取灭亡。但是大多数德国领导人相信到7月29日后，英国不是拖延参战就是宣布中立。为了使奥地

利生存下去，德国应鼓励奥地利侵略塞尔维亚，德国应迅速进攻法国，用奥地利人阻挡俄国人，直到人力物力资源能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在英国表态前，法国很快就会被迫接受1870年缔结的条约。然后用法国的殖民地收买英国。这样就值得冒险，因为将来的形势对德国会更加不利。于是德国宣战了。法国和俄国别无选择。它们必须根据协约国军事条款来保卫自己。英国政治家们犹豫不决，但确信德国侵略会威胁英吉利海峡后，英国决定参战。在最后时刻，所有强国都努力证明它们的对手是侵略者。

没有一个国家作出让步，因为如果从狭隘的角度出发，表面看每个国家都很有理。在每个阶段，每个强国的政治家推测他们只能在逐步升级和更加恶化之间进行选择(Remak, 1967, pp.147—150)。甚至在1914年7月，政治家们仍在以前分析的更广泛地地缘政治参数上，迅速算计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的时机。现实主义者的合理性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能产生合理的目标，那可能是由于很难在瞬息万变的形势里预测其他国家的反应，因为最大的侵略行为(塞尔维亚、奥地利、俄国、德国的)更接近连锁行动和连锁反应的开端。第二代混乱现实主义学派补充了这些推理。

对现实主义者辩解的初步批判

在本篇论述中存有遗漏和没有前提的推理。但是两个现实主义外部学派的观点——政治家们所谋求的神圣的民族地缘政治利益(或许是由普遍的民族主义加强的)，长期以来适当的追求，在危机中给搞乱了——看起来可能还能解释一些滑向“一战”的原因。直到最近二十年，考察解释的几乎全是外交，并几乎总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达(Mansergh, 1949; Albertini, 1952, 1953, 1957; Taylor, 1954; Lafore, 1965; Schmitt, 1966)。但是关于这一点有三个基本问题：战争不是权力平衡在地缘政

治上的重组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次战争并没有被看作是这些重组的合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结构力量导致了现实地缘政治逻辑和外交错误。

在这个时期，为什么能平静地对待大国的兴衰，有两个原因：1.这个“权力平衡”实际上不像本卷中所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也不像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一个。它第一次像真正的赌输赢的比赛，在比赛中，如果一个大国获胜，则另一个大国必须失败——而现代战争可能会使双方都同归于尽，战争并不是大国间某种排次序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正如摩根索所断言)。一个相对真实的“现实主义”方法会从战争导向目标这一事实着手。正如韦伯所说的，它们为“物质利益或理想利益”而战，以维护利益或把思想价值观强加给世界。但是到了此时，突然两方面都不是了。正如我们所知，几个世纪以来，战争已经维护了主要大国在殖民地和欧洲的贸易和领土。但是现在没有可以轻而易举夺取的有利可图的殖民地了(“土著们”正在用任何可能的办法奋力反抗)。没有可以吞并的大国，正如欧洲仅仅被分成大国和被所有大国保护的小国。只有制度化较小的巴尔干地区；战争在那儿可能是合理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但不是一个总爆发。同样，也不像过去年代那样(20 世纪后期)，没有伟大的意识形态，如天主教、民主、文明、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强加给被征服者。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最初所有的大国都声称是自卫。

最近的欧洲战争所关注的是由小德意志联邦中的普鲁士(两次)在欧洲进行的有利可图的最后大扫荡。这一点非常重要：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获得了大量领土。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Mann, 1988)，各大国把那些领土进行分配并建立行政体制，而这些领土分配的体制又使它们更强大。关于这些战争的根源，或许我们应该更严肃地对待这些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而不是大国之间关系的总爆发。

第二个原因强化了第一个原因。当时实际上有两个大国已经赶上

了英国。战争是由德国而不是由美国引起的，双方对战争都没有深思熟虑。英国外交家对待这种改变很现实，当在美洲的军事资源根本不可能赶上美国时，它只是耸耸肩，撤回了大部分军舰，并私下里建议政治家，如果美国人想入侵加拿大，英国是不可能阻止的(Kennedy，1985, pp.107—109，118—119)。在下半个世纪里，两国和平地甚至是合作地实现了美国对英国准霸权的取代。战争与地缘政治的结伴而行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美国远在三千英里以外，而德国却近在咫尺。工商业甚至海军的竞争可能令人感到头疼，但是德国对北海、海峡口岸和英国海岸的威胁顺序不同。英国没有资源同时招架德美双方。地缘政治逻辑建议集中精力对付更近的德国威胁。但是美国人没有攫取加拿大，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他们也没有用海军优势封锁美洲大陆和英国的联系。他们不是罕见的有道德的人，因为他们已在太平洋显示了其帝国主义，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基于跨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休戚相关。两个国家讲着共同的语言，拥有(占领导地位)相同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共同拥有类似的政党民主，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权者不想相互战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很难说服其公民为这样的战争而战。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社会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分散的规范的共同体，一个意识形态的权力网络，这个网络使战争远离它们之间的吵吵嚷嚷。

这些盎格鲁—萨克逊的准则比大多数跨国操作规则更强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不过是对整个欧洲准则的夸张描述。西方社会是一个多权运作文明。它的宗教、文化、世俗哲学、政治制度、经济、君主和贵族血统，以及日益增加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都给大国之间带来一致的标准。当时许多人相信这会抑制逐渐增长的地缘政治和领土利益的界定。外交也被设计成确保和平谈判冲突的手段。例如，总的来说，殖民地差异被安排在有规律的次序中——从一个轻率动作引发的“偶然事件”，到相互武力威胁的“危机”，再到调解和共同

探讨，最后妥协解决。外交并不是在无政府主义的黑洞中进行的威胁和炫耀。它也是规范的理解和有教养的妥协。

确实，在协调外交背后隐藏着分散的反战准则。启蒙运动的遗产，尤其是通过自由主义遗留的遗产，就是人类社会能够通过理智的和平讨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正如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跨国方面主要是加强不同国家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平的议会以讨论自由主义贸易和金融资本为主。它们的理性权力能扭转战局吗？

和平议会可能会向人们提出有关现实主义者叙述的非常为难的“现实主义”问题。为什么德国像美国一样，在所谓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次序上早已超过英国时，却冒着毁灭的危险与英国交战？一个领导德国的工业家胡格·斯迪纳司，1911 年以预言性言辞辩护道：“如果让我们有另外三到四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德国将成为欧洲无可争辩的主人。”(Joll, 1984a, p.156)。斯迪纳司的话是正确的；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他还是正确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的话再次得到验证。让我们希望他那暗示和平的主要市场支配(我的国际政治经济六种类型的前三种的联合)的言论最终在对德国和欧洲的第三次机遇中将会让德国的当权者听到(我在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重新统一之日写下的这些)。如果他们听到过这些言论，对德国和整个世界来说，以前的各国政府本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因此，关于德国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利或者仅仅为了反抗包围和英国霸权而进行自卫的言论，简直是一派胡言。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的，英国不再称霸。其他大国不再给它专业的“霸权主义”商业机构提供积极帮助。最后，我们看到“包围”之说部分是德国行动的后果，部分是民族主义者的夸大其词。但首先，德国的侵略不是自我防御，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进行防御。现状在保障德国现实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方面——如果你喜欢，可以称现状为包围或英国霸权——远远超过发动战争。因此，和大多数历史已经确信的一样，谴责归咎于德国权力运作者，其他大国也该受到谴责。我们仍需解释如何克服集

体利益和西方相对和平的规范。显而易见，它具有社会学根源，超越的仅仅是现实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利益。

当旧政权招募他们时，我们或许可以返回到政治家的社会组成上来，对他们来说，历史上的战争是一项标准的体育活动。但是战争不是在君主国旧政权的士兵和政客中间唾沫横飞的军国主义者直接引起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赞成和平，旧政权中的跨民族主义并没有灭亡。君主们仍保持着家族的团结；贵族则参与了带亲属关系的启蒙运动和教会的跨民族文化。尽管他们崇尚战争，但这是秘密的职业军人进行的有限的战争，而不是由民族认可的全民总动员的战争(在1792—1815年期间，这种战争已经把它们弄得满目疮痍)。旧政权是军国主义的，但是它并不期望一场全民总动员的战争来威胁进行大屠杀，打乱经济正常秩序，甚至颠覆当权者。许多将军明白什么样的恐怖会被迅速释放出来；海军上将也不想派出他们华而不实的战列舰去葬身大海。

因此，更具侵略性的大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参谋长实际上警告过政府不要参加这场战争。许多奥地利人指出，君主制在对俄战争中将不复存在。奥地利最高参谋长曾警告说不能有效地动员军队同时对抗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但是1914年8月却要同时对双方动员。德国警告过不要让三心二意的奥地利把它们拖入战争，不要指望奥地利的有效军事援助，不要同时与法俄交战，如果没有首先获得英国中立，不要对任何国家开战。德国海军元帅也警告说，他们不能挑战英国海军。但是，在1914年，所有这些都被要求去做。俄国指出秘密行动是到君士坦丁堡最好的途径；对德战争只会威胁政权的存在。俄国将军指出现代化项目是防止开战的折中办法；海军元帅告诫军舰将会被困于东波罗的海和黑海，但是1914年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事实。

诚然，在全部三个君主制国家中其他政权宗派不是如此悲观，并且其他的宗派还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或犹豫不决。甚至占卜家们在7月底8月初似乎也把恐惧抛在了脑后。但是在相对平静时期，许多人估计了不利因素并发现了他们的缺陷。他们的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所有这

些担忧被证明是对的。对三个君主制国家来说，战争形势在恶化。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

因此，战争不是理性的地缘政治的理性后果，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君主制——被战争摧毁了，许多人知道存在这种可能性，甚至可行性，并且很可能会发生。于是当欧洲滑向战争时，政治家们发现很难解释正在发生并且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是什么。许多人求助于命运的隐喻。8月3日黄昏，爱德华·格雷勋爵透过外交部办公室的窗子看着街上的风景，发表了著名的宣言："全欧洲的灯正在熄灭。在我们有生之年将不再会看到它重新点燃。"外交大臣贝特曼—霍尔韦格宣称"事态正在失去控制，石头已经开始滚落……我看到厄运在欧洲人民和我们自己人民的头顶上盘旋，它比人权更强大"。俄国外交大臣沙泽诺夫7月25日忧心忡忡地说，他"将在这次事件中被摧垮"。当德国大使告知沙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除非他停止动员时，沙皇指天宣告："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他的内务大臣接上说："我们在劫难逃啊！"甚至连有魄力的行动也会被视为命运。皇帝弗兰兹·约瑟夫最后下定决心，奥地利必须惩罚塞尔维亚并面对其后果。他对总参谋长说："如果君主制注定要灭亡，至少要让它体面地灭亡。"他对礼仪有一种古怪的心理(Albertini, 1953: Ⅱ, pp. 129、543、574； Joll, 1984a, pp.21、31)。

这些运作者没有对自己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们坚持认为在工作上武力胜过人的理性。后来的评论家不能如此轻松地为他们辩护。由于战争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它不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又由于当它的发动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或甚至知道就该如此，他们必须是非理性的。争论被拓展开来，牵涉到整个旧政权和统治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甚至整个欧洲文明。战争被解释为旧政权的傲慢自大，在向后的猛冲中"大动乱中的骑士……准备闯入历史"(Mayer, 1981, p.322)，以德国为典型的独裁军国主义君主制不可避免的命运(Fischer, 1967； Berghahn, 1973； Geiss, 1984)；"强烈的民族主义"外交的毁灭(Schmitt, 1966, Ⅱ,

p.482)；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Joll, 1984c； Koch, 1984)或“有组织的”合作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对工业革命的自由竞争的胜利(Hilferding 和 Lenin 的说法)。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正好这些年出现的弗洛伊德的理论(1914 年弗洛伊德是一个奥地利爱国者)在这方面是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死神，萨纳托斯受“国家主义者的胡言乱语”的引诱，缠住了欧洲(Todd, 1979, pp.60—61)。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所有这些解释以及在我的整个讨论中存在一个问题。恰恰和现实主义相反，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理性或非理性的语言归咎于“列强们”，因为它们在现实中不是单一的运作者。在重要的正式感观上，它们是单一的。“他们”谈判、威胁并且宣战。实际上，政治家们做的就是这个。但是政治家是多元的。当外交事务大臣伯克托尔德、奥地利首相斯图伊克和匈牙利首相蒂斯扎，以及皇帝弗兰兹 · 约瑟夫赞成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时，当皇帝签署由总参谋长康拉德上呈的总动员令时，当皇帝签署由伯克托尔德上呈的宣战电报时，“奥匈帝国”发动了战争。但是这五个人代表了各种性格和信仰，他们也代表了对形形色色政治权力关系网络的定型观点。小心谨慎的老皇帝所关心的是维持他的王朝，宁可由斯拉夫人一致同意不发动战争。总参谋长代表了主战派。他一直确信为挽救君主制就必须打垮塞尔维亚人——并且他似乎想成为战斗英雄，为的是让他的爱人最终嫁给他(Williamson 如此暗示,1988, p.816)。优柔寡断的外交大臣易受德国施压的影响，奥地利首相缺乏经验，而匈牙利首相则对外交事务根本不感兴趣。

“奥地利”意图的决定或执行是神秘的。最后，奥地利大胆地对塞尔维亚行动是因为德国通过伯克托尔德(他也对大公的遇刺感到震惊)施压给康拉德，克服了皇帝的顾忌和两个首相的软弱。这甚至使复杂的奥地利政策权力网络过分简单化了。“大国”奥地利与其说是运作者，不如说是以各种各样非辩证的方式定型的，把弗兰兹 · 约瑟夫作为其中心的势力范围。正如我们在第十章中所见，他故意让宪法、权力和他的内阁构成含混不清，以便使部门分而治之的处理权达到最大。

结果导致了宗派主义。

有时候皇帝感到他的中心地位令各宗派感到不快。1911 年，他给总参谋长康拉德发牢骚，抱怨康拉德对待外交大臣艾伦塞尔的态度："对艾伦塞尔这些频繁攻击，这些刺耳的话，我禁止他们……对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的指责应该指向我。政策是我制定的……它是和平的政策。"(Albertini, 1952, Ⅰ, p.351)。但是，弗兰兹·约瑟夫没有制定政策。在这个多形国家里，更确切地说，他是大量权力网络定型的中心点，这些权力网络有些是国内的，有些源于国外(像德国的压力)，另一些则跨越了边界(像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者的"合理性"是对他和他的顾问提出的许多问题：目标的一致性和为达到目标选择有效手段是相互交织的争夺各种权力形式的斗争的主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欧洲社会普遍的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合理评价的两部分正在以两种难以预料的方式相互作用。第一，在所有国家国内和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尽管各不相同，但是每个国家都处于不稳定状态。第二，因此，其他大国对自己外交政策的反应就变得很难预测。问题不在于非理性的运作者，而在于具有多重身份的运作者寻求各种战略，这些战略的互相作用是不可预测的，并最终具有破坏性。所以我必须列举隐藏在政治家和"大国"背后的主要权力网络。我将从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向外运动，把在代议制问题上国家定型的两种主要方式分成君主制和政党民主制。

君主国的政治家

第十二章说明传统上外交政策和战争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立的"。在三个君主制国家中，君主特权在宪法上依然是私人拥有的。因此，君主的观念和气质至关重要。它造成英德关系上的分歧，威廉二世尊重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但是女王继承者、

他的叔叔爱德华七世的无礼行为激怒了他。再加上威廉易冲动、夸夸其谈的性格和他神气活现的军服"对恶化英德关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肯尼迪说(1980, pp.400—409；参看 Steiner, 1969, pp.200—208)。但在滑向战争时，实际上还没有有个性的君主来支配外交政策。沙皇尼古拉二世软弱无能。他自己情感上希望和平，但是顾问劝说他参战。无主见的老弗兰兹·约瑟夫长期的痛苦经历使他变得相当谨慎。但是他也被说服加入战争。威廉二世反复无常——在好战的军国主义者和口头上的种族主义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在危机真的发生时甚至受到了惊吓。他被说服对采取行动表示支持。我们必须在这些当权者中找出是谁如此巧舌如簧。

接近并影响君主的是独裁半独裁政权下的政治中心。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行，这些过程变得更复杂了。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在德国至少有十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治权力网络围绕着这个中心定型。在德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四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力网络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影响皇帝：

1. 民政网络，由总理、外交大臣和普鲁士军机大臣领导，传递其内阁成员包括外交官的建议。尽管按宪法他们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负责，但是他们关心公众想法，包括在国家政府自身之内逐渐加强的民族主义"政党"(正如我们在第十六章中所见)。民政网络是松散的，因为政府包含现实主义政治家和"超级忠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鼓吹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而非小心谨慎的外交估算。

2. 军事网络，主要是陆军最高司令部，再加上海军部和临时战争委员会。因为这些机构被一条看不清的指挥链连接起来，尽管在机构上也是松散的，但是它们具有社会一致性。它们主要从容克和其他贵族集团中吸收成员，部分代表这些人，部分代表狭隘的类似等级制度式的军国主义。在这段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它逐渐壮大。

当含混的宪法不能解决前两个网络内部或它们之间的争端时，其他两个临时权力网络出现了。

3. 三个“内阁”(陆军、海军、民政)，创始于君主的宫廷，被认为是在君主和大臣之间传递消息，但实际上是宫廷机构自主运作。

4. 直辖系统，是显要的军事官员在没有大臣参加的情况下单独觐见皇帝的原始权力，在19世纪，这种权力被扩大到包括文职官员和其他官员。因此，门第等级高的贵族们能够越过任何其他渠道，竭力直接影响皇帝。

这四个网络之间，有时是内部的，其关系是不清晰的，而且常常是不稳定的。它们作为对特定危机的临时应变措施而出现，但是(正如第九章中所证明的)它们也是专制君主制部门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在近代工业社会，这个战略在维护霍亨索伦王朝权力方面做得非常好。它们把目标瞄准在减少国会、行政官僚机构和军事官僚机构进行解释义务的透明度上(显然，非常不幸地受到有关皇帝行使了多少个人权力的争论的支配，见 Hull, 1982；Rohl，Kennedy 和 Deist 的文章，见 Rohl 和 Somhart, 1982; Eley, 1985)。因此，塞西尔(1976, p.322)总结说，在外交政策中“阴谋诡计、阴谋集团以及世仇是能够扩散的”。以前的章节中已经追溯了这个德国悲剧。与其普鲁士祖先相比，德国没有使任何一个能够执行最终决策的地方形成制度。尽管有君主，但是没有君主制度。

第十章论述了奥地利权力网络是多么松散，因为弗兰兹·约瑟夫王朝的分而治之的形式，是更个人化更王朝式的，比德国的形式更少制度化。这个君主试图把自己身上真正的君主权力制度化。但(正如以前几章证明的)近代国家的扩张范围——被该国的多民族复杂性进一步恶化——已经使有效的个人君主权力成为幻想(这里没有尼采式的超人)。尽管我对俄国行政机构的论述不多，但是它也是王朝的，甚至是独裁的，在争夺沙皇信任的大臣们和宫廷的流言蜚语之间造成严重的宗派主义。三个君主制国家中没有一个把有效的君主权力制度化。

但是形形色色的阴谋宗派主义和混乱状态不一样。德国诡计多端的政治权力网络依附在第九章所论及的四个高层定型的周围。在那里

我指出分而治之政策的后果，是没有能够放弃权力运作者的竞争目标(除了那些社会党人、左派自由主义者和少数派政党之外)。因此，像在国内政策上一样，各个成形没有被优化，但被迫“加”。在题目之间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选择。我们将明白这是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

四个定型中的两个定型不太直接。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来源于旧政权。因此，它们只是温和地定型为民族主义，一个更大众化的意识形态。但是民族主义在各方面都压迫它们——因为受中上阶层国家雇员和国家教育机构的推动。其次，作为一个旧政权他们没有直接定型为资本主义者，或至少定型为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者。然而作为反动派他们确实对资本主义的敌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恨之入骨。到1900年“秩序党”明确意味着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政治家更直接地定型为君主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几乎所有人都是廷臣。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构成了“统治群”。这群人蜂拥行事，但不是煽动的。有几个大臣和国务卿怀疑皇帝的神志，并商讨把他置于约束之下。但他们从未行动，“他们不敢，因为，无论英明还是昏庸，除了俾斯麦，他们都是政客，但他们更是廷臣”(Albertini, 1952, I, p.160)。

在形式上君主决定外交政策；在现实中，君主政体以分而治之和宫廷诡计的方式决定外交政策。在滑向战争时扮演了一个无用的角色。士兵也是如此。大多数皇帝的随从，他的大多数内阁成员，那些享有直辖特权的人，均是来自保守贵族家族的官员。军队是旧政权的训练场。近卫军团围绕着君主。普遍用戒严令来维持秩序。

统帅部

在任何政权中都可以发现这些德国军事特征的痕迹。在所有君主制国家中，军事部门仍支配着包括宪法和独裁统治在内的旧政权。君主、宫廷以及统帅部共同运转，共同思考，也共同战斗。军队生活的

仪式仍强调贵族和皇族之间的联系(许多国家现在仍这样做)。从参谋学院毕业、提升、受勋、调动、检阅都受到支配性的皇家精神气质的影响。杰出的军官出身于贵族或作为其服务的回报被封为贵族。军官配给能永保绅士生活。随着军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征兵的逐渐普及(英美两国除外)，中产阶级的儿子以学员和预备役军官的身份参加到部队中来。所有这些政策可能看上去像是旧政权的高明策略，可以把中产阶级掌握在它的手心，但它也蕴涵了对旧政权稳定性的两个威胁：一个是普遍的威胁，另一个根据国家的不同而变化。

易变的后果是军官团当时蕴涵着一些社会政治紧张气氛。资产阶级对抗“旧社会腐败”被解释成技术专家现代主义对抗贵族保守主义。而在主要解决旧政权—资产阶级冲突的过程中，军队相对平稳地实现了现代化，与德国和英国一样。在法国，只有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军队才达成一致。奥地利军队在王朝鼓动者和国会—内阁控制之间仍是宗派化的，削弱了其斗争的一致性(Stone, 1975, p.124；Rothenberg, 1976, p.79)。1914年，俄国统帅部已经分裂了，不能把一个战略强加于不同的军队集团。俄国是在传统的将军防卫要塞的情况下进入战争的。而现代化者则通过铁路管制向前线输送他们的部队，造成北部和南部前线的协同作战(Stone, 1975, pp.17—27)。俄国军官团那时已有了许多对君主制逐渐失去耐心的自由派技术专家。在三年毁灭性的战争中他们抛弃了对君主制的忠诚。

但是所有的政权，无论自由主义政权还是独裁主义政权都面临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便是军官集团把中产阶级和旧政权团结在一起，它实际上却变得晦涩难解，隐瞒视听，且对政权和整个市民社会是潜在的破坏。那时贵族的日常生活已取消了军事和战术训练，更确切地说任何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取消了军事和战术训练。体育和操场格斗不再和战争联系起来。武装部队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内部等级森严有效地统一起来，与外部断绝了联系，对外部知之甚少。但是由于战争的工业化，在内部正在进行的事情十分重要。军事技术变得富于侵略

性，强调先发制人，并消除了狭隘的技术专家实施的烟幕弹，这个“烟幕弹”掩饰了外交的重要性和获取最终军事胜利的联盟建设。

统帅部的技术专家制订的计划能够抢在政客们之前实施。他们是否这样做取决于责任的沟通渠道。政党民主制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生来就反抗用军队对内镇压的暴虐的君主制。在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统帅部的计划通常受到政府的审查(Steiner, 1977, pp.189—214; Bosworth, 1983, pp.44—60)。1914年，法国军事动员受到普恩加莱的牵制，在距前线十公里处扎营，以避免贸然的边境冲突，尽管此举遭到将军们的抱怨。法国政府也否决了陆军元帅霞飞通过比利时进攻的计划，因为这会使英国持反对态度。毕竟英国和法国之间有关协约的一系列军事后果的磋商对内阁保密了五年，确实制约了外交官的行动。目前看来它会引起很多争议。在三个君主制国家中，指挥极不正规。没有内阁政府，君主是名誉上的统帅，但实际上往往由一个皇族任实际统帅，指挥取决于宫廷密谋。到1914年，奥地利军队是专制王朝“跨民族”的主要支柱。俄国和德国军队表面上创造了各自的帝国。德国军队把它对各国家惊人的影响程度归功于其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迅速而低伤亡的胜利。列强们往往把令他们强大的东西制度化。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军队的责任实际上减少了，因为，对德国国会负责的国防大臣的权力在总参谋长和军事预算权力面前衰落了。德国国会可以通过驳回七年军事预算来向该权力提出挑战，但是它从不敢这样做(Craig, 1955, ch.6)。

但是军队没有在就如何使用军事力量上达成共识。形形色色的陆军和海军派别互相竞争，对此几乎没有在政治上控制或在军事上进行协调(Herwig, 1973, pp.175—182; Kitchen, 1968)。军人们缺乏外交能力或兴趣。碰巧德国陆军是反俄派，海军是反英派；但是“统治集团”一点也不重视地缘政治、国际事务或中欧事务(后面所论及的)、联盟体系和经济动员。它把精力集中在战场的专门知识和国内保守主义上。在臭名昭著的1912年12月德国军事内阁会议上，将军们表面上劝说皇帝认

识到对俄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必要性——被认为是德国战争策划上的大规模升级。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抗议说军舰没有准备好，得到了十八个月的延缓时间(几乎到了战争实际爆发的当天)。但是这个表面上石破惊天的决策没有导致任何实际的战争准备。没有人重视外交准备(孤立俄国)、战争的经济问题，甚至陆—海军的协同作战问题。(Rohl, 1973, pp.28—32；Hull, 1982, pp.261—265)。陆军和海军被局限在狭隘的专家军国主义里。

君主政客和高级统帅是怎样走向战争的

在1914年7月末8月初，军事权力达到了它世界历史性的时刻。在7月28日和8月4日之间，当一系列军事动员转变成宣战时，战争实际上爆发了。俄国和德国的动员是战争升级的主要表现。

在俄国，沙皇和大多数政治家以及参谋机构的新领导雅努士凯维奇只支持反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而不支持反对德国的总动员——威慑奥地利，但不去挑衅德国。雅努士凯维奇在7月25日向沙皇，(也向德国人)提议说反对奥地利的局部动员是可能的。然而，他的高级指挥部很快通知他，铁路系统网络现状不允许任何短期的总动员。他们夸大其词，尽管局部动员可能妨碍以后的总动员，但局部动员还是可能的。在他们所关注的军事效率问题上，将军们做出了判断。而处理外交后果，即考虑他们可能实际同哪个国家交战，却不是他们的责任。

那时存在一种宫廷密谋的狂热。在7月29日，沙皇通过签署两个动员命令：一个局部动员，一个总动员而拖延了他的决定。是雅努士凯维奇拖延了这两个命令，但在以后的三十六小时里，他被命令首先去落实总动员，然后是局部动员，接着再进行总动员。在7月20日下午5点，他传达了总动员命令，这是走向战争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据称后来最高司令部的官员们拔掉电话以阻止任何更深的变动。德国人立

即听到了动员的消息并以为(像在自己的计划中)，这意味着实际的战争。然而，高级司令部已向沙皇保证俄国军队能保持两到三周的防御动员状态。在7月26日同德国大使的一次交换意见中外交大臣沙祖诺夫陷入困境，他问："对贵国来说动员当然也不等同于战争，是不是？""也许在理论上不，"大使回答，"但一一旦按下按钮，处于运动状态的机器就不会停止。"（Albertini, 1953, Ⅱ, p.481）那个按钮，那个致命的比喻就这样开始生效了！但是即使是这种警告，意味着德国军事动员的准确的危险的警告也没有被俄国人领会。

俄国和德国领导人都不理解总动员和局部动员的区别，两者都使他们苦恼，且意义不大。即使俄国仅仅动员反对奥地利，三国同盟的军事条款也迫使德国去进行总动员。这将促使俄国立即进行总动员。进一步说，在这一阶段俄国的任何动员都是错误的。它激怒了德国，且在奥地利前线，它忽视了外交的军事后果。俄国按兵不动的时间越长，奥地利的动员就会促使越多的奥地利军队从俄国边境奔向南边的塞尔维亚。如果俄国决定再晚一点动员和入侵，则奥地利的防御将无法实现。(Albertini, 1953, Ⅱ, pp.290—294, 479—485, 539—581;参见 Turner, 1968; Schmitt, 1966; pp.249—256,给出了俄国的观点。)

在学术研究和研讨中，找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原因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在变化和危险环境中快速作出决定则不同了。这种情况朝廷只是不能应付，军事朝臣想的只是狭隘的技术效率，外交大臣设想避免战争，但对军事事件一无所知，且在宫廷中影响很小。大公爵们各自分立，皇帝集权的范围受到牵制；沙皇皇后受制于拉斯普廷。俄国方面的逐步升级源于他分散的责任，王室的不胜任，以及特别容易被君主国接受的不得要领的计谋。混乱理论适合此时的俄国。

第二次升级是德国在7月31日的反应：宣战准备就绪即对俄国或取消其动员或进行战争的二十小时的最后通牒。德国动员意味着战争，无任何喘息的空隙。1905年的史里芬计划的技术上的错综复杂及

精细的时间表进一步拓展了进攻性军事策略，这种军事策略在第十二章已探讨过。在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等所有中立国家的边境，军队已被动员和集结。在毛奇的 1911 年调整计划中荷兰被排除在外，但这使被进攻的其他部分成为必然。计划宣布，在动员的日子里，必须占领卢森堡的铁路，在第三天占领烈日(在比利时)。一旦德国开始动员，它不可避免的要打破中立，甚至会发生与法国的战争或与英国的战争。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不是各国高级统帅揭示出来的。直到 7 月 31 日，首相才被告知动员也包括立即打破比利时的中立。尽管所有外国高级指挥官都表示怀疑，其奥地利同盟对此也不知情。到 8 月 4 日战争发生，奥地利皇帝才知道烈日的情况。正如首相所认为的，这会导致英国发生战争。但改变计划已太晚了。德国走向战争的最后一步是由其高级统帅以独立的政治渠道进行的，没有全面的内阁。贝斯曼首相和参谋部机构首领毛奇是平等的，各有他们富有影响力的渠道，仅是臣属于皇帝。受人尊敬的提皮尔茨低于参谋部机构首领，但却又是一个更富影响力的宫廷人员。由于皇帝的不稳定性，他的情绪被关注和利用。从 1912 年起，毛奇赞成防御性战争。利用皇帝的好战性，他劝他在 8 月 30 日发布最后通牒，并在第二天发布最后通牒。他亲自向奥地利高级统帅保证，如果奥地利动员反对俄国，德国会全力支持。这时，奥地利外交大臣伯奇托尔德大声疾呼："是谁统治柏林，是毛奇还是贝斯曼？"(Turner, 1970, p.109)。提尔皮茨回答：两者都不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导间的集体协商从未发生过，无论在战争的政治策略问题的执行上还是在世界大战的前景问题上。我甚至未得到入侵比利时的消息，当入侵发生时立即引起了海军问题。(Albertini, 1957, Ⅲ, pp.195, 250—251)

从 1912 年起，外交部长毛奇和贝斯曼一直不断的煽动预防性战争。然而他们没有同工业家或金融家共同协商来讨论战争的经济后果。(Turner, 1970, pp.84—85)军人、外交家及资本家各行其是，促使他们各自不同的权利集团采取不同的专门政策。只有一个反复无常的

皇帝不受他们约束，高高在上，在柏林也是一片混乱。

在维也纳，主要的混乱集中于军方和外交势力集团之间，陆军元帅康拉德的凌驾于军方计划的最高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又无力控制外交，以决定奥地利的敌人是谁。迫在眉睫的德国的压力促使奥地利动员既反对俄国，又反对塞尔维亚。因此，在一场大战疯狂的改变着从塞尔维亚到俄国的边疆时，曾经发动过战争且急于准备反抗的国家有可能建立最统一的统治机构。

混乱也通过许多外交网络而下降。驻塞尔维亚的俄国大使哈特维格数年来一直鼓动贝尔格莱德反对奥地利。他的政府不批准，且宫廷支持者阻止他的免职。塞尔维亚首相实际上对在波斯维亚行刺大公爵的阴谋已有耳闻(它是通过在政府内的敌人组织的)。由于忘记了控制波斯维亚的是奥地利的财政部长，他将警告错误的通知给了好战的奥地利内务部长，而内务部长封锁了消息。德国大使斯齐斯基鼓动奥地利好战分子，并在维也纳散布主战的外交部长杰戈的观点，而不散布犹豫不决的首相贝斯曼的观点，范·布罗讽刺的评论说，贝斯曼和杰戈组成了“一个公共异常灾祸委员会。”(Turner, 1970, p.86)在伦敦，德国大使里切夫斯基建议柏林要谨慎小心，但杰戈有时甚至是贝斯曼也对他的军事电文置若罔闻。

君主国确实富有侵略性，但这并不是因为任何孤注一掷的残忍的军国主义。第一：它们的侵略只是源于政体那几乎是随意的军国主义的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在国内或地域政治领域，它更主动顺从于军人，而不是自由政府。这是传统自由战争理论的合理部分，这种理论断言是独裁政体，而不是自由政体发动战争。(我现在这样认为)第二：那些军队已经发展为一种私有的特殊集团性的隔绝体。他们非常专业的特征致使他们更富有侵略性，专门性行动。第三：这场主要的灾祸性战争，是由于君主国局部性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偶然促成的。除了君主外，没有人拥有至高的权力和责任。正是这种内部的混乱夹杂着随意性的军国主义精神，使君主国处于危险境地。没有一个人能充分的控

制军队和外交渠道的影响来制定合理的、现实的决策。

我已经解构了国家或是强国。确实，“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行动者正式宣战，这一行为决定着世界的未来。然而，这个“行动者”实际上是形态不同的，是由派系化的权利网络形成的，体现着多重的结晶。在他之上便是执行者——平庸的君主和令人烦恼的总理、大臣以及外交部长——都依靠计谋来了解正在进行的事情。那么，在政党民主中又有什么不同呢？

政党民主

从康德以来，自由主义者(最近，甚至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已宣称“共和政体”的“立宪的”自由主义的或民主的国家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而独裁国家则是好战的。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自由主义者有一种人类自然的乐观的天性——即自由个体将不愿走向战争——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视自由主义的政体为资本主义的，视资本主义为超国界的或世界性的。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道尔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明确地给自由主义的和平性以定位。

道尔定义这样的政体为自由主义的，即它们拥有市场或私人财产经济，公民拥有司法权(公民权)，拥有代议制的政府，在这样的政府里，立法机构在公共政策上起有效作用，并且立法机构至少由30%的男性选出或由已达到一定的财富标准的能行使选举权的居民选出(在20世纪，他增加了妇女选举权这一标准)，他的政治标准就是我们所阐释的政党政治。他列出了18世纪晚期的三种自由政体——一些瑞士的州，1790年至1795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及美国。至1850年，有八个自由主义政体(包括英国)，至1914年有19个，至1980年有72个，然后，他确定了是否这些自由主义政权或其他政权曾经发动过现代战争。

道尔相当大胆地宣称：没有两个自由的政权曾彼此发动战争。但

他相当慎重的选择他的范围，即使如此他的证据在接合处也很牵强。他宣布1832年大选改革法案之前英国是不被当作自由政体的，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此不久之前，他曾同被认为是三个自由政府中的两个(法兰西共和国、独立之前和之后的美国)发生了大战。然而，即使英国的选举权(不均等的)向有财富、有成就的人开放，它也明显的符合其他标准。他的限制性历史时间框架也使之排除了17世纪后期的英国—荷兰海战，这场战争蔓延于那个时代最自由的强国之间。他说自由国家包括大约1900年的意大利，但不包括西班牙，但这两个国家此时有相当类似的“腐败”政体。这一点上，是有一点误导行为。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发现这样就避免了把美西战争作为一个例外。他也排除国内战争，然而美国内战发生在占支配地位的两个自由政权之间(以他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他的断言限制在20世纪，那他会变成事实(到目前为止)——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发现。

但道尔并未像自由主义者辩护士那样在此停止。他也发现自由政权相当积极的走向反对非自由政府的战争，尤其在现代的第三世界。从二战以来，它们积极的疾呼并疯狂的侵略它们定义为“共产主义”(现在为独裁)的政体。为什么在这种自由政权之间的行为与其他类型政权之间的行为有如此不同的对照呢？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包含着许多真理。第三世界的政权，尤其是那些标明共产主义的政权，威胁着资本主义，而其他自由政权则不会。(尽管我不认为这是最终恰当的回答。并且，在共产主义可以构成威胁之前，美国在20世纪这段时间发动了对中美洲的侵略)。但在19世纪，在非自由主义政权也是前资本主义时，这一理论是没有很大帮助的。道尔给出了一个选择性回答：自由政权相信它们强烈的要求合理合法，因为它们依靠道德上自主个体赞同，自由政权尊重其他的道德自立，但认为非自由政权缺乏道德合理性，因而以意识形态的热忱攻击它们。

在道尔的对自由主义的有限辩护中，我发现了其优点。它保持了一点儿乐观，但又有些忽视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在一战前，他的自

由政权的外交政策比他所说的还要更大程度上受地缘政治的驱使。三个主要的自由主义强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的相互关系，在道尔把它们列为自由主义之前就主要以战争的方式顺利解决了。之后，不但英国，而且美国在它们利益一致的范围内通过殖民地种族灭绝或战争的形式来自由扩张。除非它们的殖民扩张或海军势力受威胁，它们不会发动对欧洲强国的战争，无论是否是自由主义政权。它们的自由主义(在对彼此时)在当时被定义为务实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对于法国来说同样真实。正如第八章所述，从 1815 年起，由于四国同盟的胜利结盟，法国被谨慎的中立起来，同时也保证了比利时和荷兰(相邻的两个自由主义政体)的中立。之后，若法国要攻击它们，将使法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同时，对法国来说，要攻击比自己强许多的英国也毫无意义。(尽管它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确实相互冲突)

在皮埃蒙特—意大利成为自由主义政权之后，他的动机也同样的混合在一起。同法国的战争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可能性，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在该时期摇摆不定。但因为法国更多的受德国的威胁，且皮埃蒙特—意大利能从对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战争中获取利益。法—意联盟导致了 1859 年和 1914 年的战争。意大利更多的是通过地缘政治因素，而非自由主义的团结一致来确定了它在 1914—1915 年的位置(道尔提示的正好相反)。对于意大利来说，独裁的俄国攻击奥地利比自由的英国和法国攻击德国更为重要。同俄国联盟(与法国和英国联盟中立德国)，意大利从奥地利攫取了领土。

把目光投向剩余的欧洲自由国家，第八章已表明：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其他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靠英国的全球经济。它们的外交政策部分的被英国主宰着，低地国家的地缘政治也受强国势力的限制。在 19 世纪期间，仅存的独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瑞典和丹麦。它们之间的战争必将是海战。1805 年之后，它们都没有专业海军。无论何时，斯堪的纳维亚在成为自由主义政权之前曾经经历了一场长达两个世纪的权利和小型军队之间的遏止性平衡。瑞士的州由于

传统地缘政治的原因，无论它们自由与否，它都中立。希腊没有自由主义的竞争对手。

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入欧洲之外的世界：由伦敦主宰的英帝国的白色统治充满了同样有选择力的自由主义，且在彼此攻击时没有地缘政治利益。加拿大也没有攻击美国的任何欲望。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根廷和智利在这段被道尔定义为自由主义者的时期内没有发动对彼此的战争(1891年之后)。对哥伦比亚(从1910年开始自由政权)来说，同它们两个政权的任何一个交战，在地缘政治上一直都是困难的。

以上详尽阐述了道尔的1914年前的自由主义政体。我已找到了为什么它们不彼此交战的地缘政治原因。但它们不是足以解释下面的两个例子——盎格鲁—美利坚认得和平与也许是斯堪的纳维亚内部的和平(为什么北部力量的平衡从未完全打破？)——两者都取决于更广泛的标准化的团结一致，而不是单纯的共同享有政治自由主义。这并不是驳斥道尔，而是以两种方式修正他。

1. 在1914年，自由党民主政府由于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原因，比独裁专制政权有相对少的侵略性和军国主义色彩。代议制国家在转移战争方面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道尔)所说的更好。并非许多战争都简单的由单一交战国发动的。大多数战争，比如一战，包含着一种外交政策急剧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变化的环境迫使利益的快速再计算。自由主义者错误的羡慕独裁政权表面所拥有的隐私，灵活、敏捷和简洁有力的决定和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一个大国的统治来说，实行一项有效的世界政策通常是必要的(Kennan, 1977, p.4,他也是在道尔的同意下摘引的)。

但这章所陈述的正好相反，尽管没有一种政权完全连贯(每一个政权都是多形态的)，但能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国家在追求现实利益时(包括转移代价昂贵的战争时)比君主制政权是好一点儿的。我也相信，由于更加国际主义和较少的把单一的镇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们在外交上争取联盟时比独裁政权更有优势。这可能是在20世纪主要的战争中

民主政权战胜独裁政权的决定性原因。尽管它们不擅长军国主义，但它们在由联盟国动员更大的可动员性的军队方面更具优势。但那是第三卷要阐述的问题。

2. 道尔正确的强调了地缘政治的标准模式和思想体系，但标准模式不仅仅是政权形式。因为国家所共有的远远多于自由主义，因而存在于盎格鲁—美利坚和斯堪的纳维亚内部关系的限制性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种情形。分散的模式的共有将有助于防止不和理性的战争变为现实。因为它们并非为了某国利益而战——就像“一战”(尽管它们有助于继续进行部分的被意识形态定义的战争，就像拿破仑战争那样)。因此，民主政权与君主政权之间缺乏共享的模式加深了大国之间的误解，加剧了1914年的紧张局势。

第十二章已经阐释，政党民主政治在国内事务和军事事务上比在外交事务上更大程度的控制着政权。确实，在传统的对外政策的执行中，在政党民主政治国家中，这种阶级和政治政党的对外事务的相对漠视要比在君主政体中更多的导致孤立的自主。因为世界主义者，也是军国主义者的政权在宫廷中有更大的影响，在外交政策中有更多利益。但在危机中就不同了。不能花钱，不能建立同其他强国的正式约束，没有内阁和国会、大众媒体及众舆论的突发兴趣的多数人的赞同，不能宣战。在第三章，我把阶级、压力集团和民族主义政党作为潜在影响政治家和军队的主要权利网络加以区别分析。在危机中，它们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那时政策的选择可能早已限定。自由主义国家可能被限制在孤立的传统外交政策中。这可能导致一种毫无选择余地的悲剧性选择，即必须在战争和因后退而冒民族羞辱之险之间进行选择，或像格雷所说，“在战争和外交尊严间”进行选择。另一方面，政党中的政治家受公共所能接受的观念的限制。他们接受的公众舆论的基调很少是好战的。在没有民意测验的情况下去检验一个时代，我们必须依靠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为的公众舆论。在英国和法国，大多数政治家认为选民对传统的大国外交漠不关心，但除非自卫，他们是反对

战争的。在变成第三世界的过程中，战舰是好的，由于较少的动员反对强国，因而外交困境也不存在。在1914年，英国自由主义政府统治，包括三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和六个自由的国际主义者的内阁成员。1911年，该内阁以十五票对五票反对确定协约国。罢工充斥着英国政治，并且在北爱尔兰濒临内战危险(可能在2014年发生)。法国政治由于军事征兵的争论几近破碎，但却很少关注巴尔干半岛各国和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媒体被戏剧性的政治谋杀案充斥着。在普遍的漠视中，普恩加莱取得了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并操纵内阁支持他为所欲为的行动。(Keiger, 1983;参见 Bosworth, 1983,关于意大利的叙述)政治家被期望私下里而不是公然的以战争相威胁来解决危机。这就使政党民主政权产生了困难：尽管它们可能相信地缘政治利益需要坚定，甚至是准备就绪的战争，但它们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很轻易的这样说。只有不执政的右派人士才可自由的这样做。

曾经有，且现在仍有，两个解决困境的方案，一个是由法国政治家，另一个是由英国政治家来举例说明的。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帕勒奥洛将法国的方案比作潜在的决定。法国政府曾向俄国将军和金融家们提供了军队和财政上的激励，诱导他们迫使沙皇结成法—俄联盟。认识到现在已是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时间了，帕勒奥洛不断督促俄国领导人支持塞尔维亚，保持法国对它们的支持。他没有能够将俄国的动摇或挑衅性动员报告到巴黎。法国公共舆论绝不会瞥见俄国的犹豫或侵略。如果需要走向战争，一定要保持坚定的自卫表象。在危机期间法国外交很多都是不确定的(证明有罪的证件可能已被销毁。)很难估计法国外交欺诈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的动员；它可能有助于动员战争，但这决不是决定性的。

英国自由主义政府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尤其在 Williamson, 1969 和 Wilson, 1985 关于下面段落的材料中)。在总理阿斯奎斯默许的支持下，外交大臣格雷感到甚至不能就英国的意图向法国或俄国作出私下的保证。他个人相信地缘政治逻辑意味着对协约国的尊敬，正如他的外交

顾问爱里·克劳和尼科尔森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相信对德国的摊牌已不可避免。这样，“政治家”已彻底被社会化为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英国权利和荣誉的自卫，并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自卫。到大约1912年，对他们来说，德国寻求欧洲的统治权并取代英国作为领导大国的图谋已很明显。

作为一个近乎霸权主义的强国，似乎有助于形成一种高的道德腔调(就像今天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即使德国会再次使法国战败，这也不重要，因为他的海军不够强盛且不足以威胁不列颠群岛。重要的是，在他们已发表的声明中，这种结果，夹杂英国的懒散态度，将是一种民族“羞辱”，并包含着对他们已同法国达成的内在谅解的一种违背。毕竟，法国已撤军舰到地中海，并保证皇家海军将保持运河和平。格雷本人最好的表达了英国政治家一代所持有的荣誉意识：“当国家已衰落，他们在最后一息的自尊，如果确实无增长的话，也将不会消退。他们对民族尊严的坚守如塔西佗在最后一息对提比略的爱的掩饰一样。”(威尔逊在他1985年对协约国的研究中开头时引用的话。)

看看格雷是如何人格化国家的。它们具有人的特性，如尊严。在它们的位置上，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的进退两难的窘境。英国地缘政治的利益在于与俄国达成的协议——来阻止发生同俄国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并避免俄国涉足运河，这必须与法国达成协议，法国和俄国应友好相处。然而就战争来说它们都不能依仗英国的支持。因为以后他们可能被激励而去发动战争。因此，格雷的谨慎是有其地缘政治原因的。

然而，内政似乎最为重要。格雷和他的顾问认为——一旦德国攻击法国和比利时，威胁运河港口，英国舆论将一致支持以军事介入的方式维护英国的荣誉。但格雷相信，直至这件事发生，公众舆论和内阁多数将拒绝军事介入。把协约国转变成一个联盟或提出威胁德国都会分裂政府，因为几个大臣会辞职(宣战时两名已辞职)。这将迫使内阁辞职。保守党会支持格雷，并在自由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组成新政府。

这会毁灭自由党，甚至会导致爱尔兰内战。因而格雷没有这样做。他粗略的通知内阁并未征求他的集体意见。外国政府被告知英国未做任何许诺，并对所有选择公开。格雷对该结果反复公开和秘密声明，使好战派杰戈怀疑里切夫斯基大使在英国使馆关于英国介入的警告(Williamson, 1969, pp.340—342)。德国外交家直到7月30日还相信英国将保持中立。此时，他们已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如果他们不相信英国中立，他们不可能发动战争。

战后，贝斯曼和提尔皮茨痛心地抱怨英国的欺骗行为。英国已诱使德国走向毁灭。但事实并非如此。格雷的行动是胆怯了些。然而仍拥有他那真正的自由公众舆论的直觉所应允的尊严。他不希望战争，在英国领导者中，没有倡导预防战争的，但形势要求的不是英国的尊严，而是提比略式或法国式的掩饰。在公开场合或内阁中什么也不说，但私下里警告德国：若法国遭攻击，英国会介入；并不像法国私下警告俄国，任何挑衅都会减少英国介入的机会。不像法国的欺骗、英国的自尊可能是导致战争危机的必要原因。但格雷的错误不在于个人的习性或社会的无法解释。它们源于不能解决军国主义政治的结晶；夹杂于独立现实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英国政治家，与自由主义政党和公共舆论主体相比，更多的拥护军国主义。没有对英国地缘政治的最终决定，只有迷惑和世界大战。

因而在危机之时流行的观点，在政党民主中起了破坏性作用。因为政党体系的调节，他允许对政体的传统孤立，然而又限制了他行动的自由，尤其他运用军事威胁的能力，同时，又没给政府一个实际可供选择的政策。政府陷入危机，君主国的政治家较少受限制且他们不积极的政党民主政治活动不会被误解为藐视或懦弱，这两点英国早在四十到四十五年前已显示出来，当时德国已攻击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尽管当时还没有威胁德国的海军)。除非决策者清楚的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有报应的行动会再次发生。这就使得独裁政府更易发起攻击，就像二战前再次发生的那样。正如道尔指出的，在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

间缺少共同的标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不会彼此和谐，而会彼此误解不同的多形态的结晶在外交危机中，这加速了战争爆发。

国会和政党很少创造外交政策。不稳定的半孤立的政府往往会使地缘政治衰落。他或像在英国一样导致犹豫不决，或把政府所操的舆论转向他所要求的目标，这两者在二十世纪的政党民主都曾出现。前者的典型出现于英国，后者的典型出现于美国，当时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操纵美国舆论转向战争。(Wilson 的资料请看 Hilderbrand, 1981, pp.133—135)

为进一步阐明这一点，让我从今天所认为的两个完全的民主政府中举出两例：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英国也在 1983 年卷入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在这两例中，几年以来，关于影响边远国家命运和使用一小部分可支配资源的决定，都是由一小群高层政治家和军事人员作出的，且实际上未受任何公共监督和影响。美国逐渐开始秘密地支持南越当局，为其提供帮助、军事硬件和顾问。英国开始减少在南大西洋的军事存在，也没标明任何持久的防御性义务。当南越衰落，阿根廷入侵时已是危机四伏了。美国和英国政府都不希望被看成是“败退”，且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在国旗下和肤浅的政治民族主义下操纵了统一的公共舆论。当五十五万美国人在污秽的战争中被杀时，民族主义衰退了，美国撤退了。在它们用尽肤浅的民族主义之前，相对脆弱的敌人和好运气使英国取得了胜利。实质上，是两国政治家私自的决定而导致了其大规模的战争。尽管时间太早，还不能理解导致 1990—1991 年海湾战争的全部行动，但它们有相似的表象。

希望真正的民主外交政策的出现是很天真吗？在这种民主政策中，民众舆论和政党通常不会被困扰，它们可能在保存根深蒂固、大众社会利益约束的政权下公开讨论传统的外交政策，其中之一便是不会让许多人在无用的战争中丧生。

政党民主政治也是多形态的，主导性的民主政治是不连贯的，尽管

在君主国中表现不突出。不连贯的民主政治的出现并不在君主国的朝臣派系里，仅部分的存在于被认为代替宫廷、国会的机构里，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于日常现实主义者的隐私和政府自主的冲突中及全国“和平淡漠”的国家潮流里。(我们将看到在危机时他能转化成肤浅的民族主义者的夸张和言辞)这就引起了费解的问题：阶级和国家如此冷漠，以致允许他们的政府孤立了？果真如此，那是为什么呢？这两种政权类型不同吗？我将自己的焦点扩大到受欢迎的权力运作者身上，这主要是阶级和国家。

阶级、国家(民族)和地缘政治

再回到我的阶级组织的三种理想的典型结构中来。

1. 跨国界的：当阶级本身和组织跨越国家界限时，国家和民族大部分与阶级关系无关了。个人和集体利益由全球市场界定，而不是国家的领土。现代跨国阶级会更广泛的爱好和平。他们会拥有外国行业并监督政府把地缘政治转向调停外交。若跨国阶级在1914年已占统治地位，战争则不会发生。同样的推理可运用到无阶级跨国运动者中。例如，若天主教会能保留跨国力量达到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现实主义战争将不可能发生(尽管可能不是宗教战争)。我们可以猜想，现代这个时期跨国主义已衰退。

2. 民族主义的：一个国家的利益与另一国利益冲突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准阶级出现；在国际劳动力分工上有明显不同的利益。民族主义的阶级关系鼓励明确的领土统一和利益。鼓励侵略性的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若这种阶级占统治地位，则大战可能源于民族统一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益的冲突。

3. 民族的：阶级本身和组织局限于各自的范围，而没有明显的指向外部世界。尽管阶级在国内进行争取国家认同的抗争，但他们在地缘

政治中是内向的、无力的。他们没有真实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没有倾向于战争或和平。由于无知，民族的阶级可能把地缘政治留给专职的政治家。此后，战争或和平便不是大众的而是专业人员的责任(来自于旧政体)，且占主导地位的孤立的现实主义和外交优先直接延续到现代社会。国家阶级情绪可能被民族主义取代，这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或者是无知的，处于危机困境之中的阶级自发的把国内危机转向国外(例如，Howard，1970, pp.103—104)。或者是统治阶级和政权创建或操纵民族团结以便把国内的阶级对抗转向国际冲突(例如，Mayer, 1968、1981)。在这两种情况下，国旗飘扬，锣鼓阵阵，是外国人而非统治者遭攻击。在这种方式中，一个实质的政治民族主义是源于国家的有组织的阶级。

跨国阶级未导致战争，他们反对战争，但却被以下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完全统治。

1. 民族主义阶级，他们带有建立于他们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富有侵略性的地缘政治策略，能够理性的发动战争。这已被经济帝国主义论证：资本家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理智、谨慎的导致带有严重但可承受的战争危险的地缘政治，经济强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了利益要对战争负责。

但民族阶级也能以其他三种方式导致战争。

2. 国内阶级的挫败或侵略行动被统治者操纵来转向外敌，即社会军国主义的理论。由国内经济权力关系间接导致的阶级利益要对战争负责。

3. 国家阶级自发的发展为好战的陌生的恐怖：即政治民族主义的理论，政治权力关系和其本身要对战争负责。

4. 民族性困扰阶级仅存在特定利益群体的压制下，把地缘政治留给了旧政权，这要对战争负责。这是我所圈定的政治理论。这儿，经济权力的运作者避免了对外政策，使孤立的或与外交、军事有特殊关系的权力运作者对战争负责。

在政府和阶级类型的变动中，以上四种解释都起一定作用。单一的强国不能用来充分的解释战争或侵略。充分的解释必然牵涉所有的力量，我从资产阶级开始，依次来分析解释主要阶级。

资产阶级与经济军国主义

为了避免战争，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寄希望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跨国组织和资本的相互依赖性。一旦资本家的财产和市场模式设置成机构，企业将忽视国界去追求利益。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忽视国家，但认为国家间的贸易产生相互依存，由于国家资源不同，各国将优化它们最好的产业——即相对最终优势。尽管经济中可能产生争议，但战争破坏会使各国共同遭受损失。贸易也需要跨国经济协调以保证货币、信贷的转换顺利进行。因而资产阶级会支持和平的地缘政治。

英国自由主义者 J · A · 霍布森(1902)争论说，因为可理解的症结，帝国主义是当前资本的需要产生的。英国社会中的财阀拒绝同工人分享国家产品，因而产生剩余资本，然后向帝国输出。霍布森的理论被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列宁和卢森堡修正，他们补充说：利润下降，而非低消费是资本出口的根源。对于霍布森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家的竞争压制着国家走向领土军国主义和战争：新军国主义和对非洲的争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这种经济军国主义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错的，并没有剩余资本。最富侵略性的大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拥有最少的剩余资本，只有几个殖民地因为特定资本家的压力在此时建立；几乎没有被看作是好的倾销市场；且 19 世纪晚期的殖民扩张没有为任何国家奠基。18 世纪的民族兴盛让位于整个 19 世纪在疯狂的民族抵抗中对贫困领土的攫取，殖民竞争在 1880—1900 年间达到顶峰，这主要是英国同法国和俄国的较量。然而那时战争并未发生。这些强国并未发生战争。这种殖

民竞争实际在1914年以结盟形式作战。尽管殖民冲突开始包括德国并经常涉及兵戎相见的备战紧张局势，但它们是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的。这时期殖民竞争并未立即攫取利益，也没导致战争。(Robinson and Gallagher, 1961; Fieldhouse, 1973, pp.38—62; Kennedy, 1980, pp.410—415; Mommsen, 1980, pp.11—17)

但经济军国主义理论仍可部分的保留。尽管殖民地并非如此重要，但更广泛的经济竞争是重要的。菲尔德豪斯错误的认为军国主义背后是权利和政治，而非利润。在埃及、苏丹和中亚，他标榜为政治的冒险活动被用来保护同印度的交流，这对英国来说经济上也是必要的。而且，几乎没有军国主义，没有为了自己的权利追逐是同考虑获取经济利益完全分离的。即使英国的新帝国主义不是由于倾销资本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因：在同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和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中，保持英国贸易和金融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没人知道非洲市场价值多少，但让别国攫取非洲然后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这是相当危险的。毕竟，南非是通过钻石和黄金的发现而由一个毫无价值的地区转变成这个时期一个获利丰厚的殖民地的。从这方面考虑，韦勒(1979)和蒙森(1980)总结说，政治和经济不应被分离。

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把定义阐释得更精确比完全抛弃他要好。问题关键不在于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对立，而是两者混合的变动。请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八章所分析的六种国际政治性经济。

一端是市场利润，即一种资本主义的利润概念，这种利润是利用市场优势通过制定自由贸易条例而获得的。这种市场不被看成一种没有领土疆界的特定地理上的地区，而是一套跨国界的分散的确定的动能性活动，可能遍布全球。国家与利润无关，这是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并仍统治着经济学。这种理想类型在其内涵上是跨国的，是和平的，在走向战争时他肯定不会被理睬。

另一种概念更好的全部体现了领土意义上的一致和利益，并带有对领土的权威性控制。最具领土性的概念是地缘政治军国主义，把人侵

和它的地缘政治权利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对领土的控制定义为利益，这看起来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这种入侵不会是完全的非经济的即使希特勒(他没认真思考经济学)也想利用他所征服的领土资源，甚至有时把侵略直接指向经济目标（例如：罗马尼亚的石油）。但他的主导性逻辑并不是受国内经济的驱动。侵略的目标的选择主要不是基于资本家的利润观念，而是政权对地缘政治同盟结构和军事平衡的再计算。如果阶级和其他权利主体支持这种地缘政治性军国主义，它们就会在政治和军事利益面前屈从，举例说，就像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一种混合的市场—领土利润观念。保护主义是最温和的，仅仅是运用国家权利，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关税或进口限额来保护国内经济。重商主义在有争议的国际合理性法则中运用了更富侵略性的技巧，如津贴和倾销出口产品，国家指导国内和国外的投资方向及国家对垄断或国内企业在国外运转的支持等。这两种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便是资产阶级组织成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的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重商主义政策可能会被其他大国定义为敌对政策。但作为回应，它们可能不会以大的战争相威胁。因为战争会威胁更多利益。更可能的后果是对保护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外交妥协。

然后我们继续探讨两种利润导致的军国主义。经济性军国主义控制外国领土，若需要时甚至可通过战争形式实现。正如霍布森和马克思主义者提示的那样，这种类型是由于国内经济或资本的需要而产生的。资本组织本身彻底变为民族主义，资本家阶级指向的是地缘政治和战争，而非相反的东西。这在19世纪晚期社会帝国主义获取殖民地时很少见。他还在另外的地方吗？最终，在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利润驱动会压倒国内阶级(或其他)的不满，并通过对外冒险活动来转移视线，冒险活动不获利，但他提高了利用国内阶级和利益群体的能力。

战争可能源于两种广阔的经济方式：或者是政治政权和军事特权阶级的地缘政治性军国主义将市场放在一边，尽可能的扩大资本家重商主义的合理性，或者是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的军国主义放弃他自身市场的

合理性并追随地缘政治的军国主义政权和军队。第三种方式：妥协，也是可能的：战争源于资本家和国家权利网络的整体性，并牵涉到利润观念问题。

资本家是怎样认为的呢？他们很少系统的思考这些问题，但他们的设想大相径庭。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述，资本是在国际和国内部分之间分裂的。一些资本家确实全国性的联合在一起，由国家辅助来控制出口、进口和对外投资，但另一些则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更感兴趣。其选择要受经济因素流动费用、贸易条件、自身规模及利润等的影响。(Gourevitch, 1986, pp.71—123)很多资本家赞成对第三世界人民的侵略性的地缘政治。但几乎所有资本家在对欧洲强国的态度上更谨慎，因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和战争的代价将是非常昂贵的。在欧洲，大多数仅实行了实际的保护主义，这并不表明是基本的国家对抗主义。关税在世界市场内与经济和金融相互依赖生活。一个主要特例(后面探讨)是俄国和德国的谷物竞争。它们的高关税使两国疏远并激起了德国的军国主义。

在别处强国的排列不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导致的。奥地利—德国联盟没有给奥地利带来经济利益。它需要外国资本，就与强国联盟，却什么也没得到。(Joll, 1984a, pp.134—135)法国和俄国变的在金融上互相依存，但这是它们互相谅解的结果而非原因。对法国和德国来说，经济竞争不是主要问题。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各部门之间不同)的竞争存在，但并不多于同美国的竞争，同美国的竞争中两个强国都无敌对关系。无论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把侵略性民族主义指向源于工业或商业资本家的竞争。两种经济实际上更为互相依靠。在1904和1914年间，英国成为德国最好的顾客，德国成为继美国之后英国第二大顾客。(Steiner, 1977, p.41; Kennedy, 1980, pp.41—58, 291—305)。战争中强国的排列，从根本上不是源于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

然而，如在第九章所述，至1914年，一种民族主义经济竞争观念盘旋于重商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之间，并扩展开来，尤其在德国，更坚定

的要求在国外的领土控制，以“中欧”和海军的“世界政策”的口号表达出来，这使同盟所带来的“包围”理论顺理成章(后边论述)。法俄联盟也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无论法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是什么，现在有足够的经济原因来支持沙皇。侵略性领土模式的利益和竞争存在的地方，便会恶化经济民族主义，但经济竞争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原因，而是其产物。军事和政治权利运作者诱使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而非反之亦然的事。

地缘政治力量总是影响经济理论。没有任何利润观念真正和纯粹在经济上要求客观。他们的经济利益和选择权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其他来源。市场利润最近已成为一种“英国与启蒙运动与朝代”理论，他依靠的是共享的欧洲思想意识和外交，依靠的是英国海军和商业权利。他易受谴责之处在于他伪装了英国的利益。随着英国势力的衰退和对欧洲大陆事务卷入的减少，市场理论的基础似乎不那么客观了。尤其在德国那儿兴起了一种更受保护的被权威性的组织起来的。以领土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正如第九章所指出的，这作为经济理论比作为市场替代物更为准确。由于发展起来的普鲁士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市民的关系，这种资本主义正在运转并有相当的影响力。是这种权力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加强了重商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

但即使是民族主义经济竞争显著的地方，他也很少刺激资本家的战争贩运活动。资本主义的压力集团通常在殖民政策上是积极的，因为特定的工业或商业群体在特定领土上的生死攸关的重要利益，例如：大多数国家看到很小但有影响力的中国议事厅的出现急想在那儿深化西方的帝国主义。(例如 Campbell, 1949)但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很强，因为它们害怕代价昂贵的战争。因而，很少资本家在对其他强国时，能像流行的服饰和民族主义政党那样好战。参战会损害全球经济，这不是他们的经济利益所要求的。即使军火生产商也跨国化供应——在军事秘密中没有政府禁运——因而他们比起热战更倾向于冷战。战争的经济衰退如此明显，以致所有大国都希望战争时间短：数月内，整个

国际经济将会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家倾向于给出和平性建议，但他们在制定决策的决定性场所——内阁、部、宫廷中是无足轻重的。在敌人攻击面前，没有政府会采取详细步骤来发展经济计划组织。在德国(正如在欧洲其他地方)，外交部几乎是排他性的，由知识贫乏，对经济事务不感兴趣的贵族组成。德国议会中的民族主义批评家批判了这一现象，但毫无作用。(Cecil, 1976, pp.324—328)。没有政府会在敌对主义爆发面前计划经济征服(德国的侵略计划，Fischer 编目 1975, pp.439—460，在战争期间出现)。资本家曾以跨国组织为代价发展某些民族主义者，但这是增长的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束，而非原因。战争基本上不是根源于资本家的经济理性或重商主义者或经济帝国主义的多样性。

社会帝国主义和民众阶级

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是“内部政策”的紧张局势替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结果吗？政府把战争看作是解决这种紧张局势的方法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答案很清楚是肯定的。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把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看作是解决内部民族问题的唯一方式。因为奥地利的侵略是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一“内部政策”是有决定性的，正如威廉森(1988)所观察的那样，“内部政策”是不可区分的，因为他跨越了奥地利的边界。在涉及不同的国内问题和策略上，社会军国主义通常成为争论的话题。君主国的问题是地区民族主义，不是阶级，哈布斯堡王朝的动机是具王朝性的，同操纵或合法相对无关。让我们考察一下其他的权利。阶级自发的或被操纵的政治民族主义要为战争负责吗？

正如前几章所指出的，在整个 19 世纪，阶级斗争变得更为广泛和政治化。代表各阶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及国家宪法中抗争，并且一些阶级取得了国家公民资格。公众舆论通过政党和压力集团之间的竞选活

动而制度化，并通过发行大量报纸来调节，军队招募带来大量军事经验。因而国家阶级的“内部政策”与对外政策的执行关系更为密切(反之亦然)。

阶级地缘政治的不同是通过它们所拥有的公民权利的多少来确定的。公民权利越完全，政治民族主义就越多。我是从拥有最少公民权的阶级开始论述的。

在俄国，工人和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奥地利和德国，工人大部分被排除，农民依据地区而被更大程度的排除在外。尽管他们在三个政党民主的至高无上的国会中被给予了选举权和代表权(至少在英国给予了选举权)。但工会和工人的党仍对国家的政治化经济不满，许多美国农民和法国农民也如此。

因而，对大多数工人和农民来说，国家并不真正是他们的。当然，只有少数工人好战者是社会主义的皈依者。尽管社会主义观念通过核心工业广泛传播。(见第十七、十八章)。农民也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依恋于保守主义的组织(见第十九章)。但许多农民仍部分的被父辈的雇主、教堂、种族语言社区统治着。他们可能忠诚的跟随着自己的主人走向战争，就像有史以来的仆人们做的那样。大众文学和大众媒体可能给国家、国旗和君主增加一些现代的、分散的选染的情感。但一些局部的能动员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组织，尤其是基督教堂和地区民族性少数民族社区，对集中化的民族国家有种矛盾的情绪。

农民通常是反战的，因为他们在军队征募伤亡中受害最大，正如我在第十二章中强调的那样，他们对军事的忠诚不在于民族主义，而在于军事纪律，这种军事纪律仔细地将本地部队的忠诚塑造成对更多部队的忠诚。那些军队的象征日益民族化，但士兵和海员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由“有组织的迂回策略”和纪律产生，而不是由对真正国家公民权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依附产生的。

因而，工人和农民并不强烈坚决地支持国家，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在外交政策中利益相对很小。他们更关心为争取工会组织的

权利、受教育的机会、累进课税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或者说他们仍受制于当地社区陈旧的依附关系。但人们确实倾向于成为反军国主义者。因为军队仍压制他们(第十二章)。且他们国内舆论界的自由联盟经常是强烈的反军国主义者；而农民经常把军国主义、集权主义和军事征募等同。劳工运动反对军事预算，倡导社会和平主义，并论证说资本家和王朝战争都不包含人民的利益。在俄国，在农民和同样被排除于公民权利之外的中间阶级组织之间广泛存在这种情绪。在奥地利，民族性也被排除在外。在一些农民和中间阶级中产生了相似的激进的影响。在政党民主政治中，由于很少被排除在外，所以工人中既没有很多的军国主义，也没有对军国主义的很大怀疑。

但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民族主义严重加强了国际紧张局势。一些“工人贵族”的理论宣称工人阶级被牵连到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竞争中，但他们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所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运动时期中代表名额明显不足，包括在第十六章提到的所有压力集团和暴动中有关的帝国冒险活动，如布尔战争或美国入侵菲律宾(Weber, 1968; Price, 1972; Eldridge, 1973; Welch, 1979, p. 88; Eley, 1980)。是谁真正导致了战争？显然不是工人阶级或农民。

工人阶级或好战者也被视为一个大的、超国界的团体。它的六条主要的思想体系(在第十五章中已说明)：互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几乎总是超国界的。因而，这大都是经济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观点。宣称他们同马克思一样，也是超国界的。尽管民族主义损害了美国劳工的超国家主义，但它增强了它的反军国主义性(为保美国清白，它反对对外的冒险活动。)几乎所有劳工领导都赞同共产主义宣言的那句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的圣歌是《国际歌》的不同版本。下面是不坚定的工团主义者的版本(Dubovsky, 1969, p.154)：

起来，忍饥挨饿的囚徒！
起来，世界上不幸的人！

为了正义怒斥罪恶，
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诞生。
世界将立于新的基地之上。
我们曾一无所有，我们将拥有全部。
这是最后的战斗，
让我们各归其位，
工业联盟
将是整个人类。

在主要的工人运动中很少有明显的民族主义，除美国外，也很少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特别是特定的时期内)因为“人类只有一个”。甚至连法国那激进的社会主义——法国和马赛的革命传统——在这一时期也有些沉默。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地区民族主义者，奥地利—匈牙利和爱尔兰的社会主义者试图获得他们的民族主义——但很少社会主义者支持军事入侵或国外战争。

社会主义也有两个小的但很有影响力的超国家的基础，他们与流亡者和知识分子密切联系。流亡者是强迫性的超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是积极的吸收超国家主义。整个19世纪，工匠好战者，由于流亡而被君主国惩罚。他们聚集在自由政权的日耳曼小邦和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及美国。只有在美国，他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相互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是流亡者和国际性教师及新闻工作者。这是超国家主义启蒙运动的真正继承人。19世纪晚期，在俱乐部、咖啡屋、小酒馆和杂志的流亡者和知识分子网络成为跨国界传播社会主义的潜在基础。马克思、布朗基、巴枯宁、傅立叶、列宁、卢森堡的读者及其家族很少能读一种外国语言。几个放浪不羁的世界主义者，主要是犹太人，作为翻译者和出版者就足够了。由流亡工匠和放浪不羁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在1864年建立了第一国际。在这个联盟之前曾建立了有效的国家组织，左派分子和好战者是坚定的超国家主义者。

但大量劳工组织成为民族的组织，无论它们的思想意识是什么，它们的活动没有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当保护主义、经济主义或工团主意想要回避国家时，它们通常是地区性组织，很少在国外。互助主义者向民族主义国家提出要求，因而能加强国家的领导。它们所取得的每次成功都加强了国家的承受力。民族国家是产生国内集体权利或个人权利，财富或安全的唯一现实环境。劳工是民族的，因为国内社会被民族国家权威性的控制着(这一点马克思从未认识到)。这使工人同资本家分离，现在的资本家很少需要民族政治的调节。他们能允许体现资本家财富关系的市场来统治，实际上，资本家组织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一些是超国家主义的，一些是民族主义的，还有一些是民族政党的。与之相对照的是劳工活动和组织被完全限制于国内。正如尤·盖达所说："尽管我们可能是国际主义者，但各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在国家范围内为整个人类的解放而工作。"(Weber, 1968, p.46)

国际组织可能会拥护超国家主义的观点，但到了1890年它已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的委员会，每个代表都代表着民族利益。民族主义国家积累和调控劳工的真正场所(Olle and Schoeller, 1977, p.61)。这使劳工的反战情绪中存在两个弱点：

1. 因为他的实践全部是民族主义的，所以他对地缘政治是漠视而非积极的。普赖斯总结说(1972, p.238)，与其说英国工人反对布尔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不如说是对之漠不关心。第一国际和其他国际劳工大会仍然谈论着商店，却没有有效地决策制定机构或大众追随者。面对战争，各国工人阶级的政策同其他国家互不依赖，从组织上说，这减弱了劳工们阻止战争发生的能力。

2. 人们对于军国主义的担心主要是国内原因，因为它承担国内镇压的角色。尽管人们担心自己国内的军国主义，但如果外国政权的军国主义有镇压性，人们会更怕外国政权的军国主义。法国工人害怕德国侵略，因为这是对共和国的反动威胁。德国和奥地利工人害怕俄国，因为它威胁所有工人的组织。只有受制于反动政权的俄国免受影响。

在其他地方，担心能被用来消除工人对战争的支持。

在1914年，这些弱点瓦解了超国家主义者和劳工领导们的超国界的鼓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大多数领导担心，如果他们反对战争，他们数十年建立起的影响深远的政党和工会组织将会在其他阶级的战时全力支持下被镇压。国外无产阶级不能保护他们。德国工人只有德国的组织，且这些组织必须全力保护。工人也不相信，他们能对抗政府所作的宣传，即主要的敌人是反动的俄国(Morgan, 1975, p.31)。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动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形式上继续反对军国主义所激起的战争。但他们大多数人认识到工人能够，也应该团结起来来保卫共和国。英国社会主义者没有对外政策，但他们追随他们的自由党同盟。工人阶级组织追随富有同情心的政党和政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有侵略性，而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受民族局限的，因而工人阶级不能阻止战争的扩散。

有更牢固的公民权的阶级也是民族性的组织在一起，但国家是他们的。因为国家象征着他们想象中的社团，他们更容易与它的“伟大”、“荣誉”和地缘政治利益相连。随着国家变为民族国家，国家的宗教原因可能变成宗教的民族利益。前几章已说明了中产阶级加入民族社会，成为投票者、陪审员、家庭的主人、仆人雇佣者、后备军官及国家教育、文化、市场的参与者。蒙森(1990, pp.210—224)制定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变迁图示，它开起了世纪自由主义和相当的和平主义，但从19世纪80年代起，民族特性和感情变得富有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如种族优越性，陌生的恐怖，为国家和种族生存而进行的生死斗争以及流行的军国主义出现了。然而，在第十六章我有点怀疑这种被广泛持有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特点。民族主义的力量和特色在国家间不断变动，民族主义吸引的政治野心家和高等教育者远远多于剩余的中产阶级部分。它也仅是倾向于扩大政权意识形态并可能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政党民主在旧的世界主义和新的帝国主义对民族伟大性的认同上产生分裂，中产阶级也分裂了。

因而，无论是规模侵略性民族主义还是被政党民主政府蓄意操纵的社会帝国主义，都没有多大意义。右派集团拉拢它，却没有成功。一些敌视外国的人，包括报业巨头以好战的忠诚来鼓吹他。他们使政权不断变动，动荡不安。但他们不会变更其政策。英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模糊的，包括自由主义信念，他们认为国家带有世界性的人道主义、基督教主义、民主文明和更多的帝国情感。帝国主义具有对殖民地更富有侵略性的种族歧视特性，但在战争频繁的欧洲，它通常更具有防御性。政治民族主义倾向于扩大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国及英国政府的真正防御性重新武装的政策。自由政府不怕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而是要求和平公正的公众舆论。这些国家有相当的社会压力，如英国的阿尔皮斯特罢工浪潮、法国的罢工浪潮及征兵暴乱，但政府并不经常用流行的帝国主义来解决这种紧张局势。

民族认同当时植根于集中和广泛的社会实践之中，但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如此。以前我们知道经济型帝国主义存在地缘政治的根源。因而，政治民族主义缺少民族阶级组织本该提供的精确的那部分经济利益。尽管有根据证明英国担心德国的竞争和保护主义，大众的反德情绪还是更加扩散开来。民族主义者将其帝国和海军的重要性置于直接的经济要求之前，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竞争，而反复谈论阿尔萨斯—洛林及对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军事力量的威胁。然而，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主义是不会稳定的。反对者的身份可能会迅速转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英国和法国民族主义从主要反对对方而转向反对德国。似乎为战争而存在的富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在危机中突然出现，并在此后同样快速的衰落。1914 年 8 月战争爆发时，劳合·乔治嘲讽说：“仅是过了个周末，战争就盛行起来。”(Albertini, 1957, p.482;参见 Weber, 1968, pp.31—32 关于法国迅速转变立场的问题。)

这种肤浅的不稳定性会在危机之时扰乱政权或被政权利用。如果政府在周末宣战，国家将积极的追随(主要是中间阶级)。这是在政党民主中实施肤浅的民族主义的诡计——现在仅是如此，只不过现在的国家

还包括工人阶级和妇女。但诡计是有局限性的，且一贯如此：最基本的中产阶级选民并没有预见到在另外一个强国的战争中所需的额外费用，更不用说牺牲生命了。(Steiner, 1977, pp.250—253)法国和英国政府还怀疑工人阶级的忠诚，即使是德国首先发起攻击(从1914年他们就为这个理由欢呼)。政党民主政府谨慎的关注着政治民族主义，但他们并未被严重的转移视线，且战争开始后他们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在另一个极端，在君主制的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更不明显。(Lieven, 1983, pp.38—46, 153—154; Kennan, 1984)1900年之后，巴尔干半岛的危机助长了泛斯拉夫的民粹主义，这促成在斯拉夫民族反对日耳曼德国和奥地利的斗争中俄国的领导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泛斯拉夫主义者是中间阶级，很少得到工人、农民或贵族的支持。但俄国中间阶级的公民权是不明确的。与西方富有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同，泛斯拉夫主义不局限于右派政治。从沙皇崇拜到极度的无政府主义，它无处不在。但政权并不热情友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甚至不想告诉人们他的外交政策的执行情况，更不用说以普遍法则的形式使其合法化了。

因而，除德国外，对社会帝国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操纵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公众和政府习惯于彼此孤立。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外交政策过于淡漠，中间阶级民族主义的主要成分有过分的自卫性。在中间阶级，农民或工人阶级之间有相对较少的民族或超国家组织。他们的在主导性或地区间的相互封锁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中间阶级的积极与肤浅，农民的顺从，工人阶级的勉强以及军人的纪律，通过这些漏洞他就能在他们的赞许下发动战争。[1]

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和政体的变质

德国的侵略助长了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向世界大战转变。即使其他

地方社会帝国主义不明显，如果它在德国盛行起来，它的理论也会盛行。这种理论在德国的历史学家中间相当的受欢迎。自从费舍尔的关于德国战争的报告发表以来(1961，英文版 1967；1969，英文版 1975)，许多人已肯定了他的两个基本观点：德国的领导阶级具有持续的侵略性，准备并且希望在 1914 年之前进行一场为期十年的大战，它的动机既是为了通过社会帝国主义来解决国内阶级的紧张局势，也是为了取得世界的统治地位(Berghahn, 1973; Gordor, 1974； Geiss, 1976, 1984)。在政权冲突发生之前，只有费舍尔在对政权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强调的问题上作了让步。(Wehler, 1970,1985)。我们不能回到外交政策的首要性或摈弃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理论。(Mommsen, 1976; Joll, 1984b)

德国的军国主义是无可置疑的。俾斯麦也操纵军国主义向低消耗的社会军国主义发展，即用殖民地来转移国内阶级和其他社会紧张压力。(Pogge Von Strandmann, 1969; Wehler, 1981)。以后的政府照此效仿。一个普鲁士部长说，他希望殖民政策将把国内视线向外转移，但这仅发生在一定限度内。因而，我们必须在德国国会中提到外交政策问题。因为在外交事件中，民族情绪通常能团结起来。我们外交政策的无可否认的胜利将在德国国会辩论中留下好印象，并且，政治分裂因之会缓和下来(Geiss, 1976, p.78)。

范·布罗总理在跟德国皇帝的一个亲信谈话时讲的更为深入：获取对君主普遍支持的方式是激活“民族主义信念”。一场胜利的战争会解决很多问题，就像 1866 年和 1870 年的战争挽救了王朝一样(Geiss 1976, p.78)。

马克斯·韦伯持有一种自由帝国主义的观点：

> 我们必须认识到，德国的统一是一个不成熟的恶作剧，这种恶作剧是国家在很久以前制作的。且如果这是德国世界强权政治的结束而非开头的话，由于其昂贵的代价还是不实行的好。

韦伯倡导的不是帝国主义代替改革，而是帝国主义和改革一同来实现德国的稳定和现代化。(Mommsen, 1974, pp.22—46)

在其他国家，体现这种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观点是罕见的，并且，德国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团结国民反抗外国人。帝国的敌人被看作是外国势力和国内敌人的结合体——社会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少数民族，并且首先是天主教徒。他们或多或少地被认为同外部敌人有关系——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与国际阴谋有关，天主教徒先是与奥地利，后又与罗马教廷勾结，教皇和斯拉夫人和俄国勾结，阿尔萨斯人与法国，自由党与英法勾结等(Wehler, 1985, pp.102—113)。政体社会帝国主义体现了部分分而治之的战略：团结核心的忠臣，新教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然后是中间阶级和天主教徒，孤立社会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和少数派。

然而，德国政府并未稳稳地操纵社会帝国主义走向世界战争(如Fischer、Geiss和Berghahn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政府期望能实行一种转移国内紧张局势的外交政策。但这种政策同发动大战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在这种政策和发动一场反对欧洲相邻的三大强国的两线作战的战争之间存在一条豁然展开的鸿沟。这样一场战争能去解决阶级斗争问题吗?

布罗不这样认为，他继续他以上引述的言论：另一方面，一场不成功的战争将意味着王朝的结束。他在1911年这样解释：历史显示，战后必有一段时期的自由主义，因为一个民族要求赔偿在战争中的牺牲和所作努力。但任何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战争会强迫王朝作出让步这种事，在以前似乎闻所未闻……谁会去做，并慎重的做考虑考虑后果(Kaiser, 1983, pp.455—456)。

他的继任总理在1914年7月进一步阐述："不能预见结果的世界大战必将极大的加强社会民主力量，因为它追求和平并将颠覆许多王权……"一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他必然导致现存秩序的巨变。

这不是离题的、不加考虑的评论。这是德国战前最后两任总理在

一场辩论中提出的，这场辩论是关于左派和右派在民众战争动员和阶级斗争中的影响的。尽管一些极端右派分子认为战争可能再度激起对王权的支持，但大多数保守分子认为的正好相反。大多数左派分子也这样认为。正如列宁在1912年在奥地利流亡时所写的："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对全西欧的革命来说将是很有用的事情。但看起来弗兰茨·约瑟夫和沙皇尼古拉不可能给我们那种欢乐。"

如果能够保证胜利，社会帝国主义将是一个极好的政治战略。但战争本身不能提前保证他的胜利，且德国政治家们在这种自信思想的担架中也不可能进入大战。他们知道战争会危害社会秩序。我们不能谴责1914年德国的深思熟虑，前后一致的社会军国主义战略的侵略。

但"内部政策"和多种社会帝国主义可能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扩大德国的侵略(如 Kaiser, 1983 和 Wehler, 1985 已指出的那样)。如第九章所述，国内和地缘政治也被牵涉进来。从国内说，政府倾向"政治大联合"，将"生产性"(即有产者)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帝国的敌人(国内和国外的)。政府将在生产阶级中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贝斯曼将这描述为"对角线政治"，自由主义，"中欧"和"世界政策"三个竞争性国际政治型经济和外交结合体的出现，都同国内政治相牵连。对角线政治背离了自由主义，因而包含更富有侵略性的地缘政治。但他们又不在其他两种可能性中选择，因而向非现实主义的灾祸转移。

自由主义集中于像汉堡那样的贸易货物集散地轻工业和金融业资本上。它得到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在威廉大街，它的外交官经常促成国际调停。他们推理说：法国割让且德国占有了阿尔萨斯——洛林；英国和俄国也不必对抗。1890—1894年之间的总理卡普里维转向了对国内改革的自由主义的包装，转向了自由竞争的政治型经济，转向了英国的调停。但皇帝撤销了他的职务，而不是去调停工人阶级。之后，自由主义衰落了，失去了政权的支持，军事和政治民族主义者也反对他的对于保守主义者和农民都无利益的政治型经济。

由普鲁士容克领导的土地保守党，超越了保护主义而转向扩张主

义。 它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变成了俄国，内心主要的担忧是波兰劳工。海关关闭了进口俄国谷物的德国市场，这对于俄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打击，俄国需要以谷物出口来偿还机器制品的进口和债务。 俄国转向同法国联盟，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的外交消息。 许多保守主义者通过传播条顿和斯拉夫人的种族冲突恶化了这一消息。 在财政和社会上保守的容克最初不愿投票赞成为军事侵略而征税和动员大量军队，但1909 年之后，当他们想通过与民族主义政党联盟来扭转日益下降的国力时，政治动因降低了这种抑制性。 他们精选的工具是军队，他们的思想意识是沙文主义和日益增长的种族主义，他们的地缘政治视俄国为敌人，视奥地利为同盟，视一个德国统治的中欧为解决方案。 他们倡导混合的重商主义、经济帝国主义，通常指向西方的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

一些重要的工业家也支持保护贸易制度和扩张。 他们的动机往往是重实效和注重市场定位，但他们向政权的合并则增长了领土的利益概念。 因为主要的竞争者是英国、美国和法国，所以许多人支持世界性的重商主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在对非洲的争夺中，他逐步升级为经济帝国主义(与政权自身的地缘政治帝国主义相连)。 当德国意识到在殖民争夺中起步太晚而无利可获，只能冒险与欧洲帝国交战时，这种观点平息了。 工业家们却没有就此止步。 他们对向东扩张也不感兴趣。 然而，源自于独裁政权的市场压力支持了侵略性的重商主义。 在1897 年，这将他们和其他人卷入了海军。

德国海军的建构具有复杂的甚至个人习性的原因。 皇帝的个人激情、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的传播技巧及宫廷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 但伟大的德国海军的观念具有国内政治上的吸引力。 德国似乎由军国主义产生，然而军队的扩张是无可置疑的。 军队扩张不被许多中间阶级或天主教的南部德国所支持，因为他可用来集中镇压国内暴乱。 即使是高级统帅和容克们也不愿武装工人(对假定忠诚的农民的征募已达到其极限)，也不愿允许资产阶级在扩大的军官集团中占多数的统治地

位。但资本集中性的海军需要很少人力，不能被压制，并有利于重工业，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现代化。当工业家被说明服于战舰的经济优势时，他们同容克保守主义者和代表农民的天主教中心讨价还价。在1897年，增长谷物关税达成一致，作为对海军第二条具有决定意义的条款的回报。少数社会改革赢得了民族自由的胜利。(Kehr, 1975, 1977; ch.1—4)

战舰建设得到了政权、工业和许多中间阶级的支持，他被南方人和天主教徒所接受，没有任何人有力的反对，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扩大了就业机会)。传统的自由供应某一类市场产品的商人，像汉堡航运业大亨们转变成其信仰者。它迎合了四个高水平的政权：君主专制主义(因为他是皇帝的新玩具)、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且不疏远这四种集团国内的敌人。1900年之后，海军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大部分资源。战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内部政策"即来自地方的经济利润，来自政权的局部分而治之的策略及国家已经不经意间制度化了的军国主义。

但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海军的"世界政策"在物质意义上讲很不现实。战舰被认定是保护德国商业和殖民利益的。然而，战舰更大程度上是用来与在北海上迎之而来的英国军舰相对抗的而不是保护商业或殖民利益。实际上，争论集中于战舰的象征性地位，而不是他实际的物质实体。贝斯曼辩论说，战舰对于德国来说是必要的，"为了他的伟大形象的总体目标。"(Jarausch, 1973, pp.141—142)。这种统计式的帝国主义，牵涉着带有民族荣誉意义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它缺少现实主义者或外国资本利润能提供的精确的理性。尽管战舰似乎是对准英国，但它的结果既不涉及"恐英症"，也不涉及对它的国外影响或军事政权的评价。

无意的外交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渲染世界权力的战舰建造，疏远了大英帝国并导致了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海军竞赛。英国是处于领导地位并能够把它的大部分全球海军引向国内海域的。正如150年以来一

样，英国外交集中于“海洋”政策。“我们是鱼”，索尔兹伯里勋爵宣称说。皇家海军保留着英国基本的军队，国内水域防御绝对优先。在1913年格雷毫不掩饰地说：“海军是我们唯一的防御方式，我们的生命依靠它，且只依靠它。”英国政治家认为，如果德国攻击法国，但又不保证比利时中立的话，英国必须开战。一支大规模的德国海军在低地国家港口能够发动对英国致命的打击。

如果德国能减少其大陆的义务并协调与俄国或法国之间的矛盾，那么德国的资源能达到提尔皮茨的目标，即德国和英国主要舰船的比例为2∶3。这会中立英国的海军力量(尽管结果还不明确)。但“政治大联合”意味着不仅是德国“生产性”阶级的团结，而且还有他们的外国敌人。德国的外交没有争取俄国，因为容克没有从制度上被抛弃。他们也不试图打破法—俄联盟。在国内，政权包含着小派别，掺杂着政治成形，也未抛弃他们的外交敌人。一个外交后果是德国被它的敌人包围了，没有独立的资源保证，德国海军不会统治北海，德国已然将英国推给了敌方协约国，而且也不可能打败英国或消弱英国对大陆协约国的援助(Kennedy, 1980, pp.415—422)。

且结果证明确实如此。慎重、成功的“内部政策”对于“对外政策”产生了无意识的、灾难性的后果。国内权力胜利的对抗外国强国，助长了外国的客观威胁和德国的狂妄。我们不想伤及俄国、英国和法国，为什么他们对我们如此敌意呢？从1906年起，政权把德国描述成“循环的地缘政治合谋的牺牲品”。费舍尔学派将之作为受公众舆论操纵的政权，创造了支持宣称侵略是唯一的防御战的论断的国家(Geiss, 1976, pp.121—138)。比起合谋，我更倾向于混乱，把政府盲目的作这种决策主要基于国内原因，很少考虑外交后果，因而政权对外国的反应感到吃惊。但包围孤立政策的信条使德国更可能报复。这是一个领土与军事的比喻，引用皇帝的话说即用“锋利的宝剑”冲过“吊桥”突围出去。

最后的联合团结包含了中间阶级、南部德国人以局部分而治之政策

为先导的天主教徒、激进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地区少数派被成功的孤立。但成功动摇了德国的中心政治。正如第十八章和十九章所述，富有生产力的主张中央集权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被排除在外的左派里活跃起来，不但未被天主教的自由主义者的务实联盟阻止，反而削弱了它招收农民或天主教徒的能力，而被卷入政权的中心党则同保守主义妥协，而不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正如第十六章所述政治民族主义集中了公务员和国家教育机构，且变得比其他国家更倾向于民族崇拜和民族主义。从一种意义上说，这仅仅扩大了政权的优先权，但它也减少了自身行动的自由。由于疏远了工人和少数派，政权只能依靠中间阶级的投票支持。由于放弃了国会的全权统治，政权只能依靠它自身官员的忠诚。他们的民族主义压力是富有影响力的，并动摇着社会的稳定(Eley, 1980)。

在国外包围孤立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夹攻之下，主张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权有向狂热发展的倾向。比起英国或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更无力打击敌人，且无论是通过资本家还是现实主义者的利益限定，更都具有更少的可操纵性。这是对德国政治狂热元素的一个基本的政治解释，它不是建立在阶级的经济忧虑或他们认为的“现实恐慌”基础之上。(在第十六章我已推翻了这种理论)

1914年7月，贝斯曼指出了德国为什么处于困境之中：

> 这种早期的错误——使每个人都面临挑战，把你自己放在每个人的位置上考虑，这种方式实际上不会削弱任何人。原因在于：毫无目标，对即使很少声望的成功的需要及对每个公众舆论潮流的担心。以外交政策而喧嚣的民族主义政党想保持和加强他们的地位。(Stern, 1968, p.265)

他很精明，但是这种精明来得太迟了。他已经放弃了外交努力，转而采用皇帝提出的“锋利的宝剑”。

社会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外交是重要的，但这是一种转移和无意识的

后果，而不是蓄意的政治策略。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辩论说，政权没能解决国内问题，从而导向对外侵略。相反，它在将绝对主义转向现代半独裁君主制的成功导致了地缘政治的灾难。德意志宫廷和国会的秩序是通过增加国家成形(通过允许大多数局部性派别保持他们的德国敌人的意识为代价)而取得的，这同联合精英的合力论是相似的(Snyder, 1991, pp.66—67)。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且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经济保护主义和军事准备中拥有集中权力和利益的精英们彼此同意对贸易的积极支持，从而产生了比任何单独一个精英所期望的还要更具侵略性后果。因而，正如布罗和贝特曼所意识到的，德国被放到了“每个人的位置”上。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就必须在容克、君主、陆军、海军、工业资本家及中央集权论的民族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布罗在攻击容克的免税特权中败下阵来。贝特曼支持外交妥协时，被中央集权论的民族主义者挟持并被削弱。

政权继续走向任意的、欠考虑的帝国主义。地权平均论又盛行起来，且从1912年起，军队的扩展多于海军。到1914年，只有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失败了。在他们的现实主义优点方面，在中欧和国际政治之间没有达成协议。政权的摩擦持续不断，外国敌人也未被抛弃。政权中包含着资本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且变为民族主义者，这些团体都没有优先权，关于这种政权最终代表谁也没有进行最终测验。的确，它在林林总总的派别间的流行依赖于避免这种测试。它是流行的，但它的流行又威胁到和平及它自身的生存。这种无意识行动的后果的威力从未具备如此的灾难性。这种半独裁的合并性战略的国内胜利证明了它的地缘政治的傲慢。

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因素促进了德国的衰落。这场由军国主义导致的世界战争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世界历史的不幸，这源于他的地缘政治地位。它的封建领主的敌人是他的东方邻居和最大的陆上竞争对手，即俄国的重工业(舰船建造业)的敌人便是西部的英国，即最大的海上强国，而这两个对手的明显同盟是同样令人苦恼。且让

人担忧的是南部的法国。一个处于欧洲中心的强国又一次陷入同时攻击两翼的陷阱，并采取了我们在第八章所提到的别国采用的方式。毫无疑问，德国在中欧的领土地位加强了它的傲慢。

结论

任何特定的事件都有其特定的原因。抛开普林西波的幸运(计划的暗杀已经失败；当大公爵的敞篷马车出人意料地经过他身旁时，普林西波已退到一个茶馆里)，抛开几个斯拉夫人和奥地利人的卤莽，抛开几个外交官和将军的错误，则大战可能不会在它发生的时间发生，甚至根本不会发生。详细的研究更普遍的、结构性的原因，我只能从这种普遍的潮流中解释，这种潮流使某些地方的战争形成可以或可能的结果。偶然事件会发生，但它们只是偶然性的被无意间彻底忽略的东西可能有一个全面的长期潜在的永恒的模式，尤其对于参加者来说。这一卷并不提供永久性的东西。它也不会在它所涵盖的一百五十六年里提供足够长时间来彻底考察这种可能性，但它已开始这样做。这一章是对这个开头的延续。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解释不能单独或主要集中于对内与对外政策。决策是由国内和国外政策所决定的，并牵涉到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国内的联合导致了政治民族主义倾向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广泛阶级和政治阶级之间更多的斗争；在强国加强地缘政治中，政治家和军事家代表着这一切。没有任何国家能孤立于其他国家而在独立的真空发展；各自都以没有预计的方式影响他国。没有人能控制全局或预测其他民族、阶级、政治家或军人的反应。

“内部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学派都错误地把社会和国家看作是体系，中央集权的和同一性质的体系。在“内部政策”的观点中，阶级和其他国内势力运作者理性的决策通过诸如经济或社会军国主义的政

策来调和他们的利益。从“内部政策”现实主义的观点看，政治家是理性的计算地缘政治的利益的。这些学派都承认，运作者会犯错误，现实主义者试图把错误整合到他们的微观解释之中。然而错误计算的规模确实惊人。运作者确实想理性的行动，核实他们民族、阶级和地缘政治的利益并寻求达到此目标的最经济的方式。但没有人成功，这是 1914 年 8 月最系统的特色。它源于重叠的、交叉的权力网络相互作用的无预计的后果。运作者在策略间相互作用的无预计的后果。运作者在策略间相互效仿和转移。这种策略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预测的，且结果最终是灾难性的。

这种“模式化混乱”因处于现代国家中心的制度化矛盾而恶化。

一方面，现代政治家的外交和现代军事家的专业主义是系统化的，因而他们控制了我们在第十一章至十四章所描述的大量的权力基础。通过他们作战争冒险的决策，政权和强国被颠覆，经济荒废，百万人被杀害或致残。“内部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家所列举的“好的缘由”似乎仍然适合这种水平的冒险和危险。然而，无论政治家还是军队，阶级还是民族，都不能在这种“好的缘由”的基础上行动。因为，另一方面，享有最高权力的国家制定“它们”决策所凭借的结构是无序的，有四种明显的方式。现代国家在结果上是中央集权的，但在结构上是多元的，部分化的。

1. 君主政体：在这儿，传统条例和危机政策的制定都是通过错综复杂的谋略完成的，而军方能在危机中自动行动。君主和他们的顾问制定了部分分而治之的策略，精心的避免任何一部分负责外交责任。他们制定计谋，希望集权于自身，当工业家、资产阶级议会雄辩家及政治民族主义者崛起时，他们被卷入了分而治之的计谋之中。在对战争负不同比例责任的三个大帝国——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之中，贵族、将军、资本家、政党贵族的势力达到了国家的顶峰，影响到国王本人的统治，致使他有时小心谨慎有时胆怯懦弱，并最终导致卤莽的行动。

2. 政党民主：这儿我把常规条例和危机决策的制定区别开来。危

机决策的制定集中于国会和内阁，在这里最终的责任是相当明显的确定的。然而，旧政权和共和党贵族政治家的常规外交决策的制定比在君主政体中则更为私人化、孤立化和自动化，因为阶级和政党主要是被民族或当地组织掌握的。他们的孤立有两大缺陷：政治家不能为达到外交目标而任意分配资金，他们也不能威胁战争。这意味着他们在威慑力方面是欠缺的，即必须欺诈的策划或必须等到被攻击时才能表现出侵略。政党民主的划分是介于半孤立型的旧政体和现代国会及内阁之间的。它的派别主义在危机时通过急剧的外交政策反映出来，并在与政治民族主义的自由和军国主义形式的抗争中被削弱。

3. 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侵略性、领土性的外交靠近。政治家们认为大国变动已使世界更为危险。军方发展了侵略性的策略，并轻视外交，且制定了对士兵和海员的有效的局部性纪律。但市民和国内机构的增长使国家倾向于民族国家，并减少了政权的孤立。社会生活中立化，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依恋。在这样的民族内，一个更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尽管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于国家行政人员和国家教育制度之内，但在中间阶级及主要的宗教及语言社区内慢慢扩散。社区民族的定义在增长；地方的和超国界的民族定义在衰落。经济利益的领土定义，在和平保护主义、重商主义以经济军国主义之间转换，牵涉到政体假定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更普遍的民族主义认同和荣誉。

4. 因而，所有政治就显示了外交的无力和不稳定性。军方转向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现在只是半孤立性的政治家证实了市场的不连续性。少数跨国组织支持和平外交；少数民族主义压力集团支持从直接的经济军国主义转向侵略性的地缘政治，尤其在殖民地方面。但大多数阶级和其他权力运作者变得局限于民族组织和政治的牢笼，不关心常规外交事件，但在危机中却很焦虑。他们的外交政策大多由国内政治决定且是肤浅的和夸张的。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及资产阶级和政党民主中的一些中间阶级，因为国内的原因而反对军国主义，并保持着夸张的跨国主义和和平主义。尽管他们的观点不规律的限制着政治家，

但他们不能制定外交政策。

多样化派别主义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更为深入。这两大国一方面被旧政权的君主、政治家和军方不可摆脱的纠缠，另一方面又被阶级和现代民族所困扰。它们走向了现代国家多样化成形的极端。这两个强国(和斯拉夫的)侵略应对战争的爆发有直接责任。我拒绝了德国人把责任转向包围孤立主义和英国霸权的企图，因为德国人从这种情形下获得的利益比它在战争中可能获得的还要多。德国的侵略是欠考虑的或不现实的，它产生于旧的君主政体，加上军事特权等级及民族阶级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奥匈帝国增添了明显的混乱因素：一个铤而走险的王朝和将军加入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者的行列。俄国宫廷增添了它升级的军事动员造成的军国主义混乱因素。政党民主增添了他们的混乱因素，无力通过威胁战争来惊醒他们人民的限制，政治家们不规律的保持着半孤立性。政权不同程度的分担着现代国家潜在的矛盾：国家的权力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日益派别化和多样化。但国家仅仅反应的是现代社会，拥有大规模的集体力量，他们普及的权力网络有其片面性。正如我对“一战”所作的分析和理论。“一战”恐怖的展示了现代国家结构和现代社会。

今天的变化还不足以使我们完全满意。我们已经从“一战”中学会了怎样去避免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吗？或者我们继续重复这场悲剧和战壕中这年轻诗人的命运吗？

致德国

你像我们一样盲目，你的伤痕无人指明。
没人宣言要征服你的土地，
探索着穿过思想局限的原野，
我们跌倒但我们不理解，
你只能瞥见精心设计的未来。
我们只有思想中渐渐狭窄的路

我们站在各自最珍贵的立场上

咒骂着、憎恨着、盲目的交战。

(Charles Hamlton Sorley

D. 1895, Aberdeenshire, Scotland;

d. 1915, Battle of Loos. Flanders)

注释：

[1] 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对公众舆论和参战士兵反映的各项研究。我将在第三卷分析这些，但有一项支持我观点的关于法国的研究，请参看 Becker, 1977。

参考文献

Albertini, L. 1952, 1953, 1957.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J.-J. 1977. *1914: Comment les Francais sont entrés dans la guerre*. Paris: PUF.

Berghahn, V. R. 1973.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Bosworth, R. 1983. *Ital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London: Macmillan.

Campbell, C. 1949. American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In *American Expans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J. R. Hollingsworth. Malabar, Fla.: Krieger.

Cecil, L. 1976. *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 1871—191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aig, G. 1955. *The Politie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esit, W. 1982. Kaiser Wilhelm II in the context of his military and naval entourage. In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ed. J. Rohl and N. Somb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yle, M.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s 1 and 2.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Dubovsky, M. 1969. We Shall Be All.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Eldridge, G. C. 1973. *England's Mission*. London: Macmillan.

Eley, G.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view from the throne: the personal rule of Kaiser Wilhelm II. *Historical Journal* 28.

Fieldhouse, D. K. 1973.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Fischer, F. 1967.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Chatto & Windus.

Geiss, I. 1976.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 W. Koch. London: Macmillan.

Gordon, M. R. 1974. Domestic conflic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British and German cas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6.

Gourevitch, P. 1986. *Politics and Hard Tim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erwig, H. 1973. The German Naval Officer Corp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ilderbrand, R. C. 1981.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obson, J. A. 1902.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Nislet.

Howard, M. 1970.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his *Studies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Temple Smith.

Hull, I. V. 1982.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 188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rausch, K. H. 1969. 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s calculated risk, 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

1973. 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ll, J. 1984a.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Group.

1984b. The 1914 debate continues: Fritz Fischer and his critics. I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 W. Koch. London: Macmillan.

1984c. 1914: the unspoken assumptions. I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 W. Koch. London: Macmillan.

Kaiser, D. E. 1983.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Kehr, E. 1975. *Battleship Building and Party Politics in Germ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iger, J. 1983. *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Kennan, G. F. 1977. A Cloud of Dang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P. 1980.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2. The kaiser and German Weltpolitik. In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ed. J. Rohl and N. Somb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Fontana.

Kitchen, M. 1968.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1890—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och, H. W. 1984. Social Darwinism as a factor in the new imperialism. In his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d War*. London: Macmillan.

Lafore, L. 1965. The Long Fus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ieven, D. C. B. 1983.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Mackinder, H.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23 (reprinted by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951).

Mahan, A. T. 1918.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Mann, M. 1988. The decline of Great Britain. In M.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Mansergh, N. 1949.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Group.

Mayer, A. J. 1968. Domestic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Hajo Holborn, ed. L.Krieger and F.Stern. London: Macmillan.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London: Croom Helm.

Mommsen, W.J. 1974. *The Age of Bureaucracy: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 Oxford: Blackwell.

1980.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0. The varieties of the nation state in modern history: liberal, imperialist, fascist and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nation and nationality.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ation State, ed. M. Mann. Oxford: Blackwell.

Morgan, D.W. 1975.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rgenthau, H.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Olle, W., and W.Schoeller. 1977. World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estrictions upon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policies. Capital and Class 1.

Palmer, A. 1983. *The Chancelleries of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Parker, G. 1985.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Platt, D.C. 1979. Economic factors in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ew imperialism. In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ed. C.Emsley. London: Croom Helm.

Pogge von Strandmann, H. 1969. Domestic origins of Germany's colonial expansion under Bismarck. *Past and Present*, no.45.

Price, R. 1972. *An Imperial War an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emak, J. 1967.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1871—1914*.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Robinson, R., and J. Gallagher. 1961.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Rohl, J. 1973. Introduction. In *1914: Delusion or Design? The Testimony of Two German Diplomats*, ed. J.Rohl. London: Elek.

1982. Introduction. In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ed. J. Rohl and N. Somb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hl, J., and N. Sombart (eds.). 1982. *Kaiser Wilhelm II: New Interpre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crance, R.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othenberg, G 1976.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Schmitt, B.E. 1966.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2 vols. New York: Fertig.

Snyder, J.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einer, Z.S. 1969. *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Stern, F. 1968. 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war: the limits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Hajo Halborn*, ed. L.Krieger and F. Stern. London: Macmillan.

Stone, N. 1975.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New York: Scribner's.

1983.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London: Fontana.

Taylor, A.J.P. 1954.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odd, E. 1979. *Le fou et le proletaire*. Paris: Laffont.

Turner, L.C.F.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hlieffen pla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

1968. 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 1970.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Arnold.

Weber, E. 1968.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France, 1905—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hler, H-U. 1979. Introduction to Imperialism. In *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ed. C. Emsley. London: Croom Helm.

1981.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1890. In *Imperial Germany*, ed. J.J.Sheehan.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5.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Leamington Spa: Berg.

Welch, R. 1979.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Williamson, S.R., Jr. 1969. *The Politics of Grand Strategy: Britain and France Prepare for War, 1904—191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Wilson, K. 1985. *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附录：

国家岁入及雇佣状况的附加表

表 A.1　国家雇佣状况：奥地利(奥匈帝国 1760—1860 年及奥地利 183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奥地利		奥匈帝国	
	奥地利	奥匈帝国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1760		15.00	10 奥匈	0.06	26	0.17			250	1.66
1770		17.00							200	1.17
1780		22.00	11 奥匈	0.05					310	1.41
1790		23.00							350	1.52
1800		24.00							325	1.35
1810		25.00			31	0.12			594	2.38
1820		27.00								
1830	15.83	29.63	55 奥	0.35	111 奥匈	0.37	242	1.53	410	1.38
1840	16.86	30.50	62 奥	0.37	126 奥匈	0.41	280	1.66	475	1.56
1850	17.82	31.10	72 奥	0.40	140 奥匈	0.45	318	1.79	485	1.56
1860	19.13	33.50	190 奥匈	0.57			308	1.61	535	1.60
1870	20.60	35.90	102 奥	0.50			177	0.89		
1880	22.14	39.04	118 奥	0.53			162	0.73		
1890	23.90	42.69	254 奥	1.06	697 奥	2.92	188	0.79		
1900	26.15	46.81	297 奥	1.14	864 奥	3.30	230	0.88		
1910	28.57	51.39	334 奥	1.17	899 奥	3.15	247	0.86		

注释：

1. 1830年以前的所有数据涉及整个奥地利(奥匈)帝国，而1860年以后的所有数据仅指奥匈二元帝国时期(有时称为西里西亚)，因此不包括匈牙利(因为一般无法得到有关匈牙利的类似数据)。

2. 直到1880年，有关政府职员人数的数据通常来自政府内部的资料，此后的相关数据取自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统计数字，因此，在1890年有关文职人员的数据呈现出一个巨大飞跃，对此应谨慎对待。

3.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奥匈帝国：1760—1790年，Dickson，1987，Ⅰ，p.36；1790—1910年，Beitrage zur Osterreichischen Statistik 550，1970，Ⅰ，pp.13—14——提供了1786、1828、1857、1869年以及1880—1910年的数据(其中也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已对缺乏数据的几十年给出估计数字。奥地利：1830—1910年，Bolognese-Leuchtenmuller，1979：Ⅱ，p.1。

军职人员的数据：1760—1790年，Dickson，1987，Ⅱ，pp.343—355页；1800年，Rothenberg，1978——野战军，警卫部队以及其他原地待命但已被动员的预备役部队；1810年，Rothenberg，1982，p.126——"1890年实际动员计划"；1830—1910年，Bolognese-Leuchtenmuller，1979，Ⅰ，pp.57—60以及Ⅱ，p.5——现役的陆军和海军职员；1850年和1860年(实际是1857年)的数据是指奥匈帝国，但不包括伦巴第和维也纳；1860年以后的数据仅指奥地利Reichshalf。

文职人员的数据：1760—1810年(实际到1806年)引自Dickson 1987，Ⅰ，pp.306—310；1830—1850年(实际是1828、1838年及1848年)的中央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K.K.统计月刊》，1890，pp.532—534；1830年(实际是1828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Macartney，1969，p.263；1840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是从特格博斯基1843：第306页给出的关于1839年的类似总数及麦卡特尼1969：第263页给出的关于1842年的类似总数中推测得出；1850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K.K. Statistiche Monatschrift，1863，pp.104—105——总计52 000名人员，假定包括全部行政官员的26%(正如在1845年及1848年中公职人员所占比例)；1870—1880年各级政府文职人员数引自K.K. Statistiche Monatschrift，1873，p.22；1881，p.54——包括公职人员及67%的法律和卫生工作者(在以后的人口普查中被归类为公共部门)；1890—1910年的数据引自Osterreichisches Handbuch，1890、1900、1914，K.K. Statistiche Monatschrift，1904，p.696——然而，Bolognese-Leuchtenmuller，1978：Ⅱ，表60的注释虽然再现了19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但是无法解释1890年和1900年文职人员的数量分别降低到495 000人和617 000人的现象。

表 A.2 国家雇佣状况:英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1760	6.10	16	0.26			144	2.36
1770	6.41					37	0.58
1780	6.99					193	2.76
1790	7 065					74	0.97
1800	8.61	16	0.18			422	4.91
1810	9.76	23	0.24			517	5.30
1820	11.30	24	0.22			115	1.02
1830	13.11	23	0.17			132	1.01
1840	14.79			43	0.29	163	1.10
1850	16.52	40	0.24	67	0.41	197	1.20
1860	18.68			76	0.41	325	1.74
1870	21.24			113	0.53	242	1.14
1880	25.71			118	0.46	246	0.96
1890	28.76	90	0.32	285	0.99	276	0.96
1900	32.25	130	0.40	535	1.66	486	1.51
1910	35.79	229	0.64	931	2.60	372	1.04

注释：

1. 1840 年的军职人员数据包括在编的民兵和警察，但不包括志愿军。1850 年的数据包括在编民兵和警察，以及被征入伍的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军人(最后总共达到 16 720 人)。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Wrigley and Schofield，1981。

文职人员的数据：中央政府——1800—1830 年根据下议院的数据统计、英国议会档案和 1797、1810、1819 年及 1827 年公职人员的编制所测算出来的；1840—1880 年引自 Mitchell and Deane，1962；1890—1910 年，Flora，1983：Ⅰ，p.242。各级政府——1840—1880 年引自 Mitchell and Deane，1980；1890—1910 年引自 Abrammovitz and Eliasberg，1957，p.25。实际年份是 1891、1901 和 1911 年。

军职人员的数据：1760—1790 年及 1810—1860 年的数据来自下议院的统计、英国议会档案：1760—1770 年引自 1816 年的档案，12，p.399 以及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547—549；1780 年(实际是 1781 年)引自 1813—1814 年的档案，11，pp.306—307 以及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547—549；1790 年(实际是 1792 年)和 1810—1830 年的数据引自 1844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169 以及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547—549；1840—1850 年的数据引自 1852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30，pp.1—3；1860—1910 年见 Flora，1983，Ⅰ，pp.247—250。1800 年联合陆军部队的数据见 Fortescue，1915，vol.4，part 2 p.939，海军的数据从 1860 年的英国议会档案，42，pp.547—549 得出。

表 A.3 国家雇佣状况:法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总人数(千)	百分比%
1760	25.70					460	1.78
1770	26.60					220	0.82
1780	27.00			350	1.29	240	0.89
1790	27.19			275	1.01	230	0.85
1800	27.35			250	0.91	800	2.93
1810	27.35					1 000	3.66
1820	30.46						
1830	32.57					400	1.23
1840	34.23	90	0.26			350	1.02
1850	35.78	146	0.41	300	0.84	390	1.09
1860	37.39					460	1.23
1870	36.10	220	0.60	374	1.03	600	1.66
1880	37.67	331	0.87	483	1.28	540	1.44
1890	38.34	348	0.91	472	1.23	600	1.55
1900	38.96	430	1.10	583	1.50	620	1.59
1910	39.61	556	1.40	562	1.42	650	1.65

注释:

1. 法国国内征募的新兵人数在 1800 年总计约有 350 000 人,1812 年约有 450 000 人。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1760—1780 年,Riley, 1986, p.5;1790—1910 年,Dupeux, 1976, p.37。

文职人员的数据:各级政府——1780 年的估计数获得于 Necker, 1784(参见正文);1790 年和 1800 年(实际是 1794 年和 1798 年)的估计数取自 Church, 1981;1850 年(实际是 1846 年)的政府官员名单引自 Block, 1875, pp.117—119;1870—1910 年的相关数据引自 Flora, 1983, Ⅰ, p.211。中央政府——1850 年(实际是 1846 年)的相关数据引自 Vivien, 1859, pp.172—178,以 Jalien-Lafferrière, 1970 作为参考修正,并且不包括军职官员;1870—1900 年,引自《人口普查》和《分类统计结果》,实际所指年份为 1866、1876、1891 年及 1901 年;1910 年,引自《法国年鉴》1913:第 264 页。实际所指年份为 1913 年。

军职人员的数据:陆军——1760 年的数据引自 Kennett, 1967, pp.77—78;1770—1790 年,引自 Lynn, 1984, p.44, Scott, 1978, p.5;1800 年和 1810 年(实际是 1812 年),引自 Addiugton, 1984, p.26, Rothenberg, 1978, pp.43、51—55 页,Chandler, 1966;1830—1870 年,引自 Block, 1875, Ⅰ, p.566(不包括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海军——1780 年,引自 Dull, 1975, p.144;1790 年,引自 Hampson, 1959, p.209;1810 年,引自 Masson, 1968, p.257;1870 年,引自 Block, 1875, Ⅰ, p.583。1860 年以前有关海军职员其他年份的数据均为推断估计数。陆军和海军:1880—1910 年,引自《法国年鉴》1913:"往事摘要",第 132 页。

表 A.4　国家雇佣状况：普鲁士—德意志帝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普鲁士	德意志帝国	普鲁士		普鲁士		德意志帝国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1760	3.62								150	4.14
1770	4.10									
1780	5.00								188	3.76
1790	5.70								195	3.42
1800	6.16		23	0.37					230	3.73
1810	7.00								272	3.88
1820	11.27								150	1.33
1830	13.00								150	1.15
1840	14.93		16+	0.11+					157	1.05
1850	16.61		32+	0.20+	55+	0.33+			173	1.04
1860	18.27				86	0.47			149	0.82
1870	24.57	41.01	135	0.55	283	1.15			400	0.98
1880	27.19	45.23			413	1.51	704	1.56	434	1.07
1890	29.84	49.43			535	1.80	900	1.70	529	1.12
1900	34.27	56.37							629	1.05
1910	39.92	64.93			c.1 000	3.92	1 700	2.35	680	1.05

注释：

1. 1870年以前得军职人员数据是指普鲁士；1870年以后的数据是指德国。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普鲁士——1760—1810年的数据来自 Turner, 1980；1820—1870年的数据来自 Kraus, 1980, p.226；1870—1910年的数据来自《普鲁士王国的统计年鉴》1912。德国：1870—1900年的数据来自 Hohorst等，1975, p.22；1870年的数据实际上是1871年的。军职人员的数据：普鲁士——1760—1810年的数据来自 Jany, 1967；实际的年份分别为1763、1777、1789、1813、1820、1830、1840、1850、1859年。Jany所列的关于1820—1840年的数据并不包括军士或军官，并且将其向上调整了23%(这是19世纪普鲁士陆军中军士和军官的正常比例)；1870年普鲁士的军队总人数是315 000人(贾尼加上了2 400名海军人员)。德国——1870年的数据来自 Weitzel, 1967, 表8, 1872年的数据。1880—1910年的数据来自 Hohorst, 1975, p.171；1890年的数据实际上是1891年的数据。文职人员的数据：普鲁士——1800年的数据的估计数字是由一名普鲁士的高级军官"以保留"的方式提供给 Finer, 1949, p.710(正如他在1850年的估计一样低得离谱，他的保留态度也许是正确的)；1840年，Bülow-Cummerow, 1842, p.225, 1839年的公职人员数字；1850年，普鲁士王国的1849年年鉴表和官方 Nachtrichten(Tabellen und amtlichen Nachtrichten den preussischen Staat für das Jahr 1849)，公职人员在1849年的数字，因此1840年和1850年的数据大约对全国的雇佣状况低估了20%—30%；1860年(实际是1861年)的数据来自 Jahrburch für die Amliche Statistik 1863；1870、1880、1890年(实际上是1869、1882和1895年)的数据来自《普鲁士王国统计手册》，1869、1898；1910年(实际是1907年)的数据来自 Kunz, 1990。德国——1880—1910年的数据来自《丹麦王国统计年鉴》1884, p.19, 1889, p.14, 1909, p.33(实际是1882年和1895年)；1910年(实际是1907年)的数据来自 Kunz, 1990。

表 A.5 国家雇佣状况：美国，1760—1910 年

年份	人口总数（百万）	文职人员				军职人员	
		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总人数（千）	百分比 %
1760	1.59						
1770	2.15						
1780	2.78						
1790	3.93	0.7	0.02			0.7	0.02
1800	5.93	2.6	0.04			7	0.12
1810	7.24	3.8(估)	0.05(估)			12	0.16
1820	9.62	7	0.07			15	0.16
1830	12.90	11	0.09			12	0.09
1840	17.12	18	0.11			22	0.13
1850	23.26	26	0.11			21	0.09
1860	31.51	37	0.12			28	0.09
1870	39.91	51	0.13			50	0.13
1880	50.26	100	0.19			38	0.07
1890	63.06	157	0.25			39	0.06
1900	76.09	239	0.31	1034	1.36	126	0.17
1910	92.41	389	0.42	1552	1.68	139	0.15

注释：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 11 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总人口：1760—1780 年美国的数据，引自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表 A.6—8。文职人员的数据：中央政府——1790—1810 年的数据是根据美国国家档案，第 38 卷的数字，详情如下：1790 年(实际是 1792 年)的数据在第 1 部分，pp.57—68；1800(实际是 1802 年的数据在第 1 部分：pp.260—308；从 1810 年推断的 1810 年和 1816 年的数据在第 2 部分：pp.307—396；1820—1910 年的数据在美国，1975，表 Y308—317。各级政府——1900—1910 年的数据来自 Fabricant，1952，p.29。军职人员的数据：美国，1975，表 Y904—916。实际所指年份是 1789、1801、1821、1831、1841、1851、1861、1871、1891、1901 年以及 1911 年。

表 A.6 国家岁入状况:奥地利,176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弗罗林)	直接税	间接税		国家财产	
			普通商品	盐,烟草专卖品	印花税,各种收费	垄断利润
1760	35.0	53	19	16	2	10
1770	39.5	48	17	16	9	10
1780	50.1	41	18	19	13	10
1790	85.6	27	36		NA	
1800	65.5	29	45		NA	
1810	25.0	30	42		NA	
1820	112.2	44	20	30	4	2+
1830	123.0	39	23	22	4	12
1840	193.3	25	23	26	4	25
1850	202.5	29	24	24	4	18
1860	355.1	27	17	25	9	26
1870	259.6	35	30		15	21
1880		32	31		20	17
1890		NA	NA		NA	NA
1900		28	30		17	25
1910	1 159.2	28	29		17	26

注释:

1. 实际所用年份为:1763、1770、1778、1821、1830、1841、1850、1859、1868、1883、1898、1913 年。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760—1780 年的数据,引自 Dickson, 1987, Ⅱ, pp.382—383,和平时期的纯收入,“印花税和各项收费”等同于 Dickson 的“其他类”的分类。1790—1810 年的数据来自:Czoernig, 1861, p.122;1800 年和 1810 年的总收入正如 Beer, 1871, pp.390—391, 所重新估算的那样它考虑到了货币的变更(这极大地减少了 1810 年的总收入,也可能减少得并不多)。那些年份的其余收入的大部被 Czoernig 分类为“特殊”栏,可能是一个混合的类别。1820—1860 年:引自 Brandt, 1978, Ⅱ, pp.1072—1073、1100。1820—1830 年的一般收入;在这些年份中享有“垄断利润”的企业正在消失,这些利润假设是从总收入中扣除直接税、间接税和印花税及各项收费之后的剩余(其数量在 1820 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或许它已被混入到高得非同寻常的“盐专卖品”类别中)。1870—1910 年的数据引自:Gratz, 1949, pp.229—230。

表 A.7 国家岁入状况：英国，176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英镑）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邮票和邮局
1760	9.2	26	69	4
1770	11.4	16	70	4
1780	12.5	20	71	5
1790	17.0	18	66	9
1800	31.6	27	52	12
1810	69.2	30	57	11
1820	58.1	14	68	16
1830	55.3	10	73	17
1840	51.8	8	73	19
1850	57.1	18	65	16
1860	70.1	18	64	16
1870	73.7	26	59	12
1880	73.3	25	61	16
1890	94.6	26	50	18
1900	129.9	31	47	22
1910	131.7	27	47	22
1911	(203.9)	(44)	(36)	(17)

注释：

1. 1800 年的数据实际上是 1802 年的数据。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Mitchell and Deane, 1980；公共财政表格。

表 A.8　国家岁入状况:法国,176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法郎)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1760	259 *l. t.*	48	45	7
1770				
1780	377 *l. t.*	41	49	10
1790	472 *l. t.*	35	47	18
1800				
1810				
1820	933			
1830	978	40	22	38
1840	1160	约 30		
1850	1297	约 28		
1860	1722	约 23		
1870	1626	26	31	44
1880	2862	21	38	41
1890	3221	18	36	42
1900	3676	21	36	43
1910	4271	22	33	45

注释:

1. 仅指一般收入,不包括所有贷款。
2. 数据引用的相邻年份有:1751、1775、1788、1828 年。
3.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760—1790 年:Morineau,1980,p.314,他把牧师的捐献作为国家财产归类为直接税和假设的补贴。全部以图尔城制造的里弗为计算单位(Lt)。1830 年(实际是指 1828 年)的数据引自:Hansemann,1834。1844—1910 年的数据引自:《法国年鉴》1913:第 134—139 页;1840 年直接税的数据等同于中央政府的四类直接捐赠的总额,再加上所估计的潜移资本所获税的 5%。

表 A.9　国家岁入状况：普鲁士，1820—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马克）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铁路	其他工业	总和
1820	96	36	33			30
1840	169	24	34			41
1850	183	22	32			46
1870	550(651)	24(20)	10(24)	24(20)	30(25)	65(55)
1880	805(982)	21(17)	8(25)	30(25)	22(18)	71(58)
1890	1744(2 140)	10(8)	14(30)	51(42)	15(12)	76(62)
1900	2607(3 139)	8(7)	13(28)	54(44)	16(13)	79(65)
1910	3732(4 630)	11(9)	3(22)	58(47)	16(13)	86(69)

注释：

1. 所有数据指一般收入，不包括所有贷款与公积金。
2. 数据引用的相邻年份有：1821、1844、1871 年。
3. 1870 年及以后：各数据仅涉及普鲁士(不是指整个德意志帝国)。括号以外的数据来自普鲁士政府的财政收入统计。括号内所加的数据占帝国岁入的 60%(几乎全部来自间接税)。普鲁士的人口占帝国总人口的 60%，各邦向帝国上缴的财政收入通常来自人口税，因此括号内的数字可能是更精确的估计。
4.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820—1850 年：Leineweber，1988，p.315。注明：1850 年普鲁士财政收入约是德意志大邦的平均数，小邦的收入依靠传统的政府资源(Heitz，1980，pp.406—408 的数字)1870—1901：Prochnow，1977，pp.5—7。

表 A. 10　国家岁入状况:联邦与州的岁入:美国,1820—190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美元）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1820	25	10	62	26
1830	31	5	71	21
1840	33	18	42	37
1850	69	23	58	20
1860	100	26	54	18
1870	501	26	58	16
1880	446	15	67	17
1890	584	16	64	20
1900	837	16	58	26

注释：

1. 计算方法：1820 年政府岁入是当时各州的半数，到 1870 年比例约为 3/4，到 1900 年达到所有州收入的总和。这些州每年计算人均收入，再乘以当年美国全国的总人口数得出岁入总额。然后所有州的收入之和为联邦政府的总收入。

2. 国家财产包括邮政岁入。1975 年美国的数字不包括邮政岁入，只有当邮局产生盈余时，才将盈余算入。

3. 各时期的政府财产岁入来自邮政，早年还来自运河通行税，19 世纪中叶还有土地特许费。

4.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1975 年

美国 1975 年的统计：表 Y352—357，美国 1947 年的统计：pp.419—422；Holt，1977，pp.99—324。

表 A.11　国家岁入状况：联邦的岁入：美国，1792—191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美元）	税收		国家财产
		直接税	间接税	
1792	4		98	2
1800	11		89	11
1810	10		87	13
1820	19		80	20
1830	27		82	18
1840	24		56	44
1850	49		81	19
1860	65		82	18
1870	430	17	68	15
1880	367	1	82	17
1890	464	0.2	80	20
1900	670	2	71	27
1910	900		69	31

注释：

1. 国家财产主要指邮政收入。美国 1975 年的统计数据是邮政的净岁入，只有当邮局产生盈余时，才将盈余算入。我已将所有邮政岁入统计在内。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人口：美国 1975 年的统计：表 A.6—8。岁入：美国 1975 年的统计：表 Y352—357；美国 1947 年的统计：pp.419—422。

表 A.12 国家岁入状况:美国各州,1820—1900 年

(按总收入百分比的全部和主要来源)

年份	总收入(百万美元)	主要的岁入来源				
		税收			国家财产	其他
		直接税	间接税	商业		
1820	5 930	25	7	17	43	8
1830	4 263	25	1	14	42	18
1840	9 085	24	4	40	19	13
1850	19 462	53	1.5	23	22	1
1860	35 643	62	1.6	13	18	6
1870	70 911	64	1	17	16	3
1880	79 125	63	0.1	19	18	1
1890	119 988	60	1	20	18	2
1900	167 407	52	4	23	20	2

注释:

1. 1820—1900 年全美国总人口的数据是以各州数据为基础得出的总和(参见表 A.10 的注释 1)。

2. 所引用的参考资料请参见第十一章的参考书目。

资料来源:

1820—1900:计算根据 Holt, 1977, pp.99—324。

译者说明

本书由众多译者通力合作完成，具体分工如下：前言及第一、二和三章：姚朋；第四章：安蕾蕾、杜晓德；第五章：安蕾蕾、陈莉；第六章：安蕾蕾、夏春红；第七章：安蕾蕾、金旭东、陈莉；第八、第九章：孙建霞、刘平；第十章：孙建霞、刘平、杜晓德；第十一章：孙建霞、夏春红；第十二章：林琳、刘平；第十三、十五章：林琳、陈莉、房艳丽；第十四章：林琳、杜晓德、朱昆仑；第十六章：王灵、刘平、金旭东；第十七章：陈春华、朱昆仑；第十八章：陈春华、王永芹、夏春红；第十九章：张玉芝、陈莉；第二十章：陈世英、房艳丽；第二十一章：王仕英、金旭东、刘平；附录：林琳、杜晓德、陈海宏。

陈海宏负责全书的审译、组织和统稿工作；朱昆仑负责全书的校译和校译的组织工作。